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

【上卷】

访录者 [美] 唐德刚
著述者 [illegible]] 王书君

山东友谊出版社

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

【下卷】

访录者 [美] 唐德刚
著述者 [美] 王书君

山东友谊出版社

首次公开披露张学良将军口述录音内容！

全景式记载张学良叱咤风云、慷慨悲壮的一生！

- 中国大元帅的花花公子
- 中国最年轻的军阀
- “不抵抗将军”为何兵谏蒋介石
- 西安事变后为何亲送蒋介石回南京
- 中国“哈姆雷特”如何度过半世纪软禁生涯
- 蒋介石永不原谅，张[illegible]挽联说“情同骨肉”
- 与周恩来八天[illegible]夜情定一生
- 自称“平生[illegible]憾事，唯一好女人”
- “伟大的爱国者”为何时常[illegible]

ISBN7-80642-427-X/K·58

（上、下卷）　定价：69.00元

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

【上卷】

访录者　［美］唐德刚
著述者　［美］王书君

山东友谊出版社

口述实录

张学良世纪传奇

【下卷】

访录者 ［美］唐德刚
著述者 ［美］王书君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美）王书君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2

ISBN 7-80642-427-X

Ⅰ. 张… Ⅱ. 王… Ⅲ. 张学良(1901～2001)－生平事迹 Ⅳ. K8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5423 号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

访录者 （美）唐德刚

著述者 （美）王书君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39.25 印张 8 插页 900 千字

2002 年 4 月第 1 版 2002 年 7 月第 4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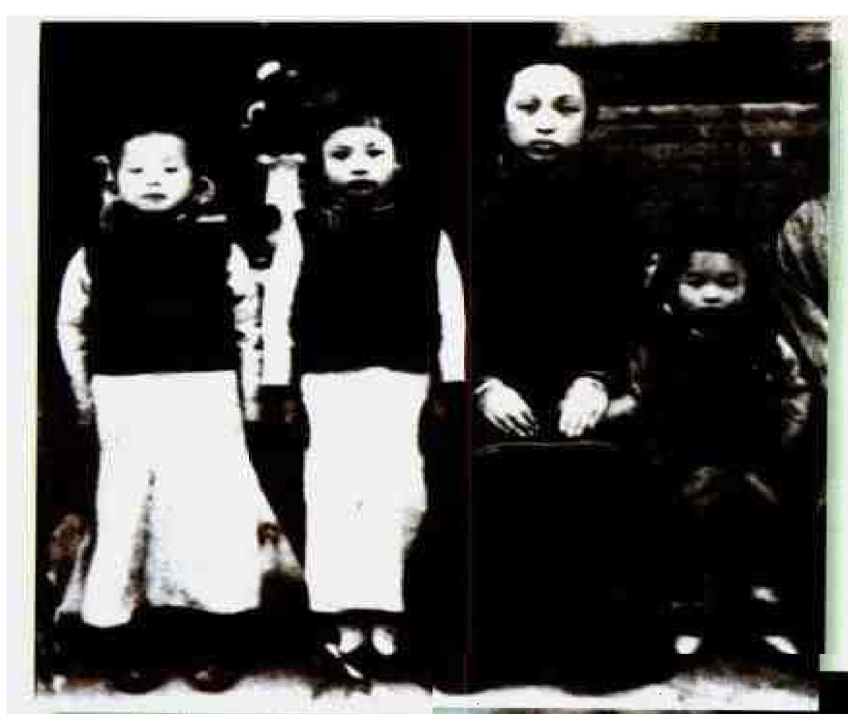
印数 25001—45000

ISBN 7-80642-427-X/K·58

(上、下卷) 定价:69.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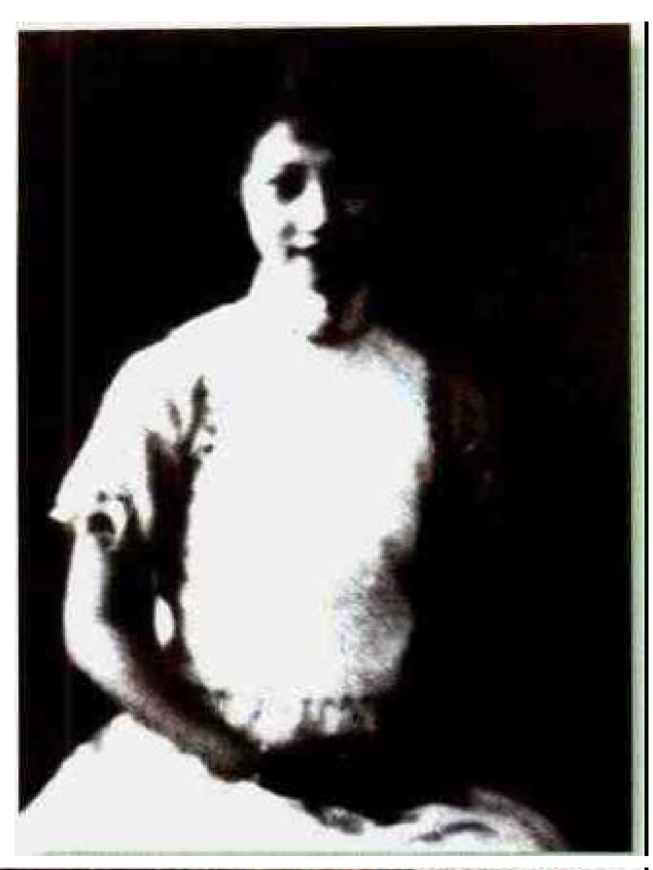
少帅英姿



张学良姐弟与母亲在一起合影（自左至右为：张学良、张冠英、母亲赵氏、张学铭）。



青年时代的张学良



少女时代的赵四小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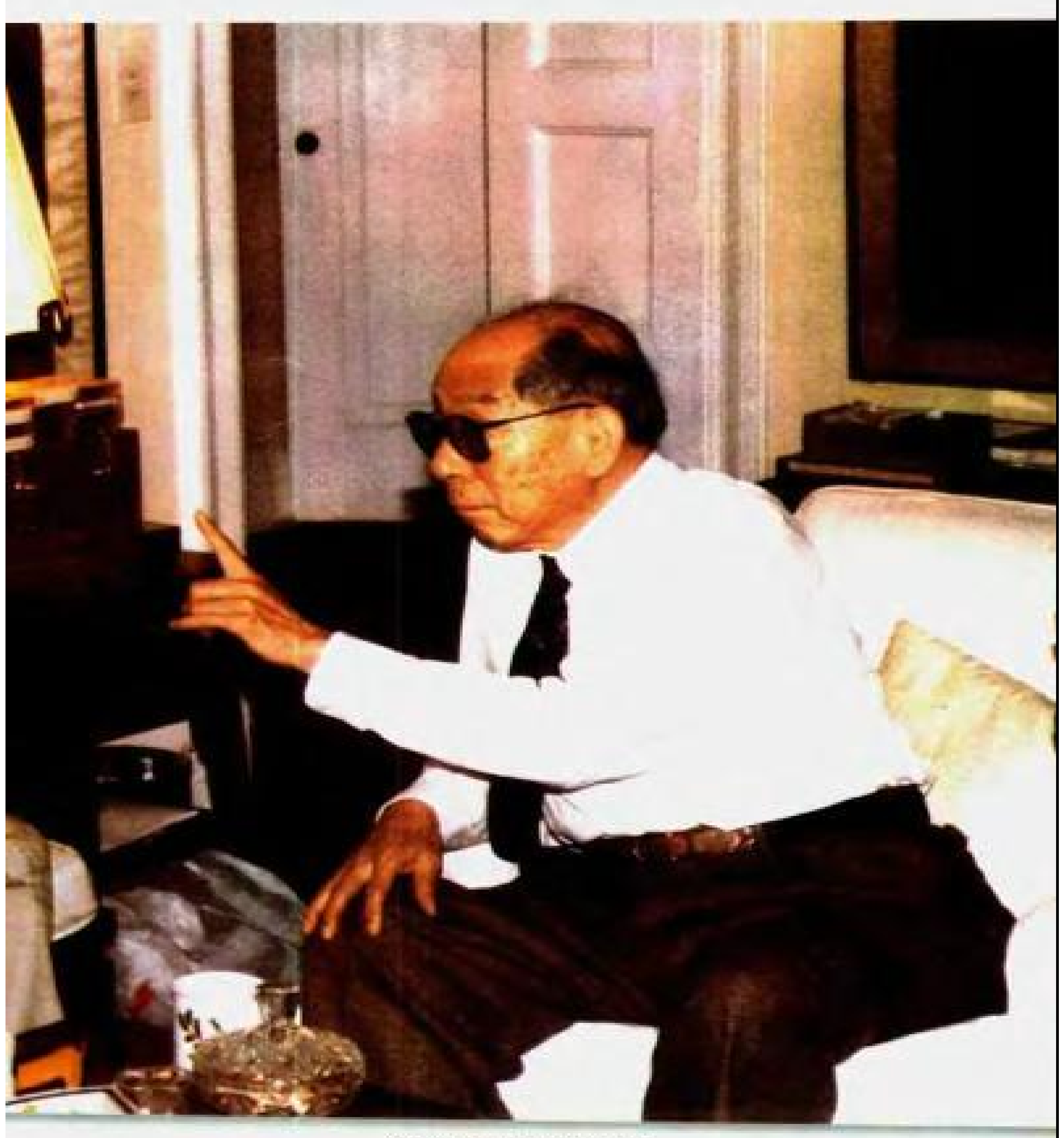
1934年时的张学良将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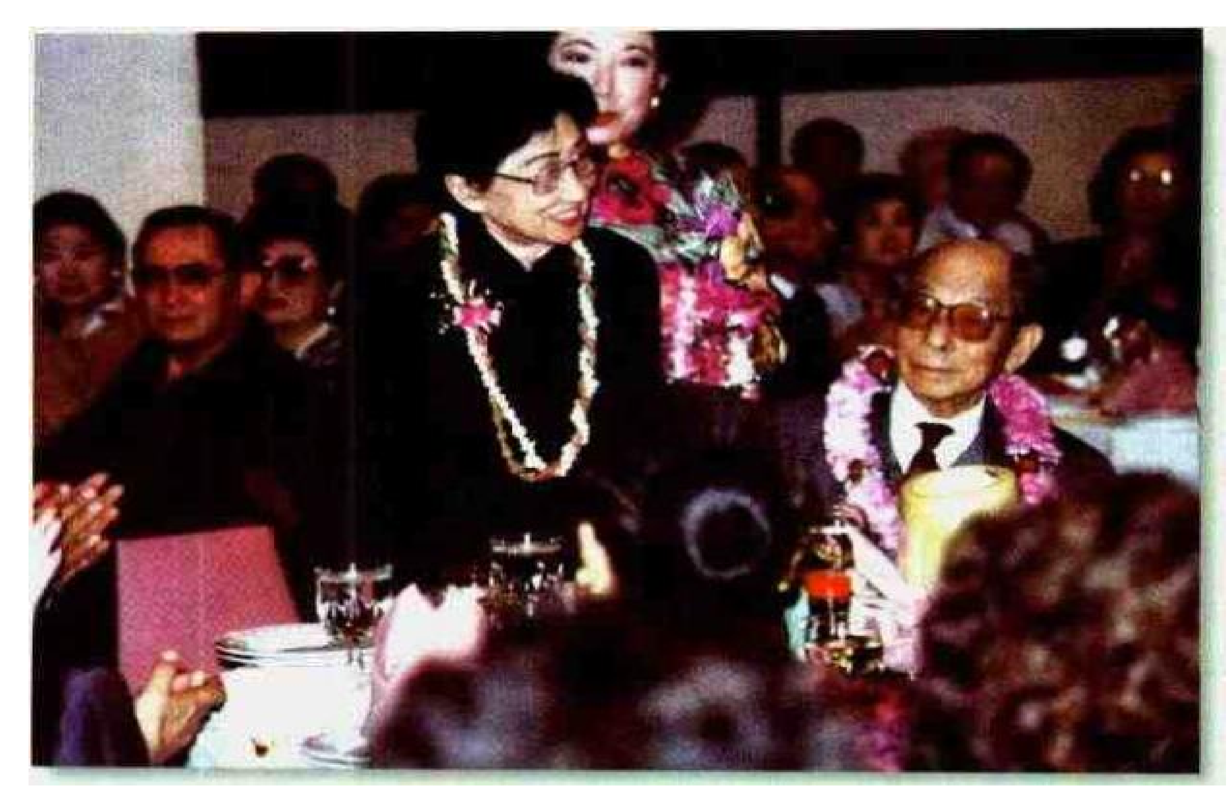
张学良将军 1988 年摄于台北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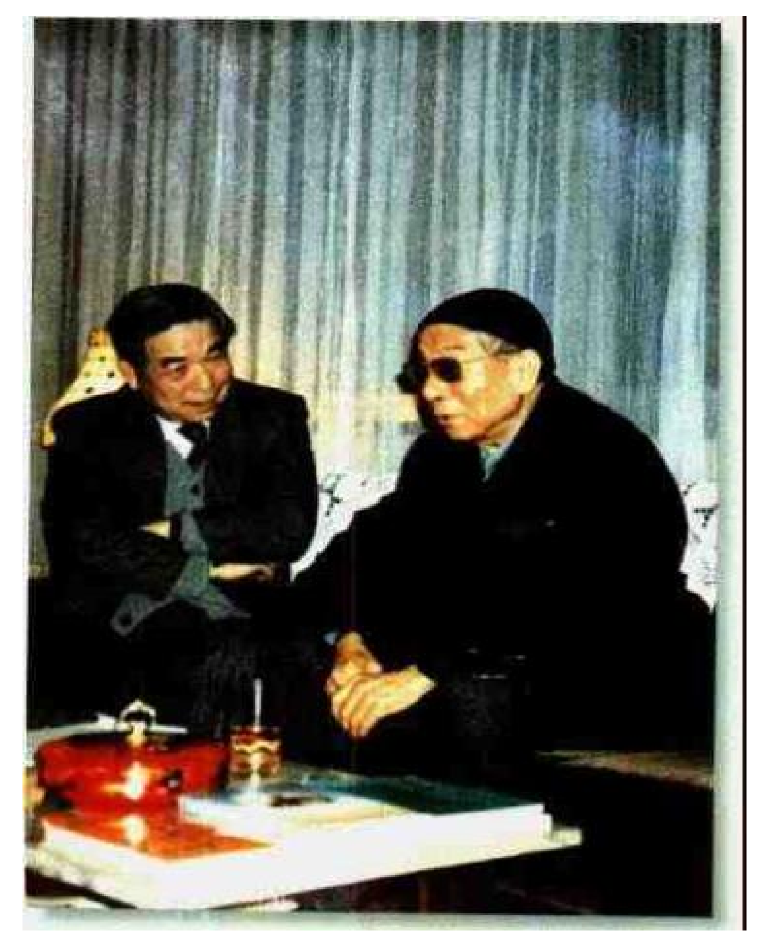
1990年6月1日，国民党元老张群发起，在台北隆重举行张学良将军九秩华诞寿宴。图为张学良与夫人赵一荻在祝寿宴会上。



1991 年夏天时的张学良将军



1999 年 6 月，张学良夫妇与前来参加祝寿活动的各界来宾合影留念，站立讲话者为夫人赵一荻。



1990 年 1 月至 5 月，唐德刚教授采访张学良将军。



1990年12月17日，在台北北投寓所，唐德刚教授与张学良夫妇在庭院内合影。



1991年5月　张学良将军作客美国新泽西州鲤鱼门饭店，与友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唐德刚教授。



论张学良将军的赤子之心（代序）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
纽约市立大学原亚洲学系主任

唐德刚

迄今为止，我还没有信任何宗教。可是，我坎坷的一生，和经历中的无数次悲欢离合，却又使我感觉到，这些遭遇似乎都有一些神秘的力量，在冥冥中预为安排。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我作为一名留美五十余年的海外游子，竟然有机缘同幽居台北、闻名遐迩的张学良将军相识，并同他十数次地餐聚，听他在席间笑谈往事，听他讲述那些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前所未闻的故事。

我与张将军相识，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汉卿将军及其夫人，风云半生，幽居五十年，可谓中国近现代史上历时最长、知名度最高、最多姿多彩、最神秘莫测的一对夫妇了。他们被新闻记者、作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追逐了半个世纪，却往往难得一见。他俩惊鸿一瞥，也会变成世界各国新闻的"花边"。更有甚者，坊间有关张氏夫妇的著作汗牛充栋，往往在海峡两岸一销数十万册，各书中虽免不了瞎子摸象、人言言殊，但读者的兴趣却并不因传闻异词而稍减。

对于这样一位传奇人物，我本人对他虽然也有极大的兴

趣，但鉴于“一识张汉卿”是如此的困难，所以，我从未想到要去凑凑热闹，去“拜识荆州”，去和他畅谈往事。

一九八九年底，我应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之约，赴台湾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我在纽约市大也是个大忙人，在去与不去两可之间，本想婉谢了，谁知不争气的学术癖好以及会议盛情邀约我为学术第三组的“引言人”，使我在拖了一下之后，终于“黄牛”不了啦。既然非参加不可，乃漏夜赶写了一篇讲稿，电传给大会秘书处，并于十二月二十七日赶到台北。所以，那次赴台北，也有很大的偶然性。

会议之后，我本拟稍作逗留便赶回纽约，回程机票已订好为一月十二日，大西洋彼岸我的办公室里还积牍如山呢。

就在这个时候，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那是我的一位小朋友、适任新闻局专员的郭冠英先生打来的。冠英说，他不知道我要来台北，所以，他把给我的信寄到美国去了。接着，他把信中的内容告诉了我，他说，张汉公有意要同你见见面。郭君这句话，如雷轰顶，令我震惊不已。

我认识郭君，是在一九八七年的春季。那时，“北美二十世纪中华史学会”在纽约市大召开一次国际学术会议，我是该会“地区委员会”的主席，负大会事务安排的总责。我们除邀请了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之外，为了礼貌起见，也邀请了两岸驻美官员前来参加会议。北京的官员应邀参加了，但台北国府官员则婉拒了，他们国府驻纽约的“新闻处”仅派了一位秘书来做非正始的观察员，这位观察员便是郭冠英。我作为大会事务的总负责人，很有礼貌地接待了他。这是我们认识之始。

后来，我们又在不同的公私场合碰面，交谈之下，我觉得这位小老弟颇有学养，他虽在政治圈中求上进，然未染上官僚气息，他学识在不断进步，思想也十分开明，在闲谈中国近现代史掌故时，我才知道他曾和张学良将军晤过面，谈过话。

一位青年在某种场合遇见了一位大人物，谈过一些话，这也算不得什么稀奇。很快，我连郭冠英这位青年的名字也逐渐淡忘了。我真没有想到，在台北我们又得以重逢，且竟然接到他这一则大出意料之外的电话。

接着，郭君又到旅舍来看我，再谈此事。我甚感好奇，便问他，张学良将军这样一位重量级的神秘人物，怎么会知道我这位远在天涯海角的教书匠呢？

“他看过你写的关于他的文章，阅后非常欣赏。”郭冠英说完，便用手指抓抓他自己的大腿，笑着说道，“可能他觉得你搔中了他的痒处。”

“奇怪了，”我问郭冠英，“他读的是哪一篇文章呢？”

“是你写的《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那一篇文章。”郭君告诉我，“那篇整版刊登在《中国时报》上的文章，他是用了二十倍的放大镜通篇看完的，他觉得你写得很好。”

“你是怎样认识张汉公的？”受宠若惊之余，我又问郭君。

冠英告诉我说，他有一位同窗好友叫王一方，一方的父亲便是王新衡。这王老先生曾奉蒋老总统之命，前去“保护”张学良。王、张两人相处多年，感情不错，因而，两家便有了通家之好。一方聪颖活泼，幼年时即在张府进进出出，颇受张氏夫妇喜爱，视同子侄，对他无话不谈；一方也深知张伯伯的好恶。

冠英既是一方的幼年好友，及长大成婚之后，郭、王两家也变成了通家之好，所以，郭君夫妇也可偶尔与汉公夫妇会会面，也知道些汉公对外人著作的感受，因而，他两人都知道张将军对拙作曾有好评云云。

我那篇拙作，原是替我的学生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将军的政治生涯》一书所写的序文。

傅女士在纽约大学历史系读博士学位，我是她的跨校主任导师。傅的论文杀青之后，被东北辽宁大学出版社看中，要做英译汉后出版，为此，作者一定要我为此书写一篇序文。婉拒不得后，我就写了一些做导师时的未尽之言。台北报刊发表拙作时，是直接取自中国大陆出版的原书，并作了些许斩头去脚的处理。此文发表时，我本人事先根本不知道。

当张汉公他老人家对拙作发生兴趣时，经常在他家中进出的小朋友王一方得知此事，就告诉了冠英，一方没有想到冠英会认识我；后来，汉公和他的老部下、老学生王铁汉将军偶尔谈起此事，汉公想不到王铁老也认识我；汉公有一次和台北"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先生谈，想不到惕吾先生也认识我，并知道我和他贵社的社长刘昌平先生是同乡，且为中学同学。这样三凑六合，才促使汉公决定要同我见见面。

一方奉命后，乃通知冠英，冠英就给我写了封信。后来，他从台湾当地的报纸上得知我参加研讨会的消息，终于在岛上就地找到了我。

此事可谓我平生最具戏剧性的"奇遇"了。在一方和冠英两位小朋友的安排下，我就在北投与张汉公相会了。

当我初见张将军时，我觉得我的文章写得一点也不错。当时，张先生已是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了，但还是那样风流翩翩。

我与张先生在台北相识，深感他老人家对我们这些晚辈是十分看重的。熟识之后，他有意让我为他的回忆录捉刀。我们前后相聚十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前后共非正式地录制了十一盘录音带，我也初步拟好了写作大纲，并曾将第一章的草稿送交他一阅，我们并计划进一步访谈下去。

然而，写传之事的进展并非我俩设想的那么如意。鉴于当时政治方面的因素，以及张汉公当时的处境，时任国民党秘书

长的宋楚瑜知道此事后，就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这么多的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来作传呢？"言下之意，我是从美国来的，对台湾的事经常说三道四，态度不友好，是亲共的。这样一来，张先生就有点恐慌。节外生枝后，这本拟以中的《张学良"我讲你写"录》，就此不了了之。

九十年代初，是我与张汉公交往相当频繁的时期。我俩台北分手之后，翌年三月底，张先生便赴美探亲访友，曾在纽约逗留达三月之久，我们在不同的酒宴上多次相聚，相谈甚欢。

这期间，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就在他九十一岁寿辰即将来临之际，张先生一行来到我位于新泽西州的北林寓所造访，我并得以为张先生设宴暖寿。那天，刚好郭冠英也在纽约，他就开着车子一路摄影，在我家中稍事休息后，我们又驱车直奔宴会所在地。

当我驾车把张先生带到鲤鱼门餐厅时，就倒车把车泊好，张先生见此情景，还大为惊讶地说："德刚，怎么你还会倒车？"原来，张先生会开飞机，会开汽车，但他不会倒车，因为那时他当"少帅"，停车后下车就走人，车则由他的副官随后处理。所以，张先生汽车开得很好，但不会开倒车。当然，他更不会开"历史的倒车"。

宴会上，我邀请了我四十年的老友袁家骝教授与其夫人吴健雄教授陪客，所以，那天大有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聚会，哈德逊河畔畅谈历史的味道。

迨至一九九四年，我的学生王书君教授应邀由山东青岛社会科学院抵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我与书君相识于一九八一年五月。那时，正值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我作为中美两国之间的"交换教授"，先后在中国大陆十二所大学里授"美国史"。在济南山东大学授课时，我接触到上千当今祖国最可爱可敬、最热情好学的尖端知青，我们

经常为学术问题谈至深夜。这些青年中的一位，也是给我印象极深极好的一位，便是本书的作者王书君同学。他问学的热情使我感动，同时，在那种西方书刊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他问学的深度也令我惊异。

我们分别之后，年年都有信函往来，并有机会在一九八五年哈尔滨国际红学研讨会上以及在北京、枣庄、青岛举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相逢。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原来，自山大历史系毕业之后，书君孜孜向学，锲而不舍，短短几年，我昔日的学生如今已晋升为教授，并先后有五十万字的《美日海空大战》和六十万字的《二次大战风云录》等五部著作问世，我有幸为他的著作撰写过四篇序文。

书君来到纽约后，对张学良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得知此事后，我欣然将十一盘录音带转交给他，在他又广泛参阅了其它海内外有关张学良的回忆文章、有关著作之后，短短几年，竟然撰写出一部总计一百章，囊括了张学良风云际会一百年的传奇经历，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笔生动、老少咸宜、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此书可谓首屈一指，的确令我这八旬老翁倍感欣慰。

谈到张学良将军的一生，我认为其最大特点有二：一是他渴望中国统一之心结；二是他强烈抗日爱国之信念。

张学良的可敬之处，还在于他在这个“与世纪同寿”的“转型期”中，始终能随时代不断进步。孟轲曰：“孔子，圣之时者也。”能随时代进步，也是孔圣人圣德的一方面。说句恭维的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张先生在这方面，可谓圣贤之书没有白读，甚至可说是“得圣人之一体”。

在上世纪初年，他本是一位旧军阀的纨袴子弟，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本是清末民初那个荒唐时代，所有高干子弟

的共同现象。只是张学良这位公子哥儿更会花钱，更会玩乐罢了，因为在民初的“四大公子”中，他的本钱最雄厚。

可是，一旦过了青春期而及于成熟期，他的生活便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个旧式军阀的儿子，吃喝玩乐，未改其公子哥儿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已能随时代进步，成为旧军阀集团内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领导者。

且看当时在西南中国，那个与东北中国的“奉系”遥遥相对的“桂系”，也是同一类型的军阀集团。

创立这个“桂系”的也是一位“老帅”，名叫陆荣廷。这个“西南中国第一人”的陆老帅，和同时期的“东北中国第一人”的张老帅，在出身和经历上几乎一模一样：两人都是“绿林出身”；招安做官，出长方面；一个是“两广巡阅使”，另一个是“东三省巡阅使”；一个抗日，一个抗法。两人真是不能再像了。所不同者，是陆老帅家中少了一个有现代化知识的“陆少帅”，无法承其衣钵，随时代前进。所以，一旦这个“行伍”集团的“老桂系”搞不下去了，它就被李宗仁、白崇禧那个“军校出身”现代化的“新桂系”篡掉了。

“奉系”就不一样了。当“张大帅”那个“行伍”集团搞不下去了的时候，继之而起的改革派首领，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它就能自我进化，不断延续下去。

因此，从中国历史的进化论着眼，张学良和李宗仁在各自的派系中所发生的作用，是一模一样的，只是一个是老帅的儿子，一个不是罢了。

中国近现代史是分阶段不断地向前推进、发展和进步的。“桂系”两代，阶段分明；“奉系”两代，似天衣无缝。善读史者，当自见端倪。

当学良才二十岁出头时，便已指挥数万大军，南征西讨。年方二十六，便已官拜北京政府的“良威上将军”，与吴佩孚

等老帅平起平坐了。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与他“有个好爸爸”是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张学良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在情场、战场之外，也具有政治家的节操与风范，和青年爱国者的一腔热血。他在二十来岁青年期所具有的现代化政治观念，已非老帅所能及。“年未而立，即负方面，独握大权”之时，他竟能在日俄两大帝国主义环伺之中、守旧派元老将领压力之下，义无反顾，幡然“易帜”。

须知，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

但是，这件大事也只能发生在一位二十八岁、热血沸腾的青年民族主义者的身上，当时如老帅未死，此事便不可能发生，因为：第一，张作霖斯时仍是国家元首，他不可能把“国旗”换成“叛军”的旗帜；第二，他自诩是“中山老友”，是蒋介石的前辈，如今他仍雄师在握，岂可以老事少，以尊事卑；第三，老帅也没有他儿子的现代化了的“民族主义”的新观念。“叛军”内逼太甚，他未始不能“借回纥兵平安史乱”！何况他在内战中并没有被打败，更何况当时日本还要保举他张氏父子做“皇帝”呢。

所以，就日本帝国主义者本身利益而言，日军谋杀张作霖实在是杀错了人，他们杀掉了比较落后保守的老一代，却突出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感的、新起的抗日救国的丁一代。

当年，由于东北当局处于日俄夹攻之中，南京的策士曾有“以外交制奉张”的建议。其实，反过来说，“奉张”又何尝不可“挟寇自重”呢？在中国边患史中，安禄山、石敬塘、张邦昌、吴三桂以及后来的盛世才，不都是好例子吗？学良何尝不可依违其间，待机而动呢？但是，学良不以此之图，偏要易帜归顺，偏要促成国家统一！何也？答曰：无他，一股有志青年强烈的爱国激情而已！

一九三〇年，中原大战如火如荼，白骨累累，哀鸿遍野。年轻的张少帅能在复杂的局面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果断地拒绝“扩大会议”派高官厚禄的引诱，以“爱民”与“统一”为圭臬，为免“民命灭绝，国运沦亡”，毅然决定武装调停，挥师入关，平息内战，再造统一，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笔。

显然，学良青年时期的血性，以及他不愿做帝国主义傀儡的铮骨，也是引起九一八事变的基因之一。但今日史家已完全证实，九一八事变是当年日本朝野蓄谋已久的行动，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大东亚共荣圈”乃至其称霸世界的既定方针。老实说，那也是“北伐”以后，蒋、李、冯、阎三年内战的必然后果。事变既发，张学良之“抵抗”与“不抵抗”，是不会改变事变之结果的。

但即便如此，就他自己的个性而言，面对日本军阀，国难家仇，势不两立。他本是个拼命三郎，他曾亲口对我说：“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当时知道日本人真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

之所以没有拼，他认为是自己“判断错误”，他认为日本人不会这么“人心不足蛇吞象”，真的这么干，对他日本也很不利。

究其原因，在于他当时只是把关东军看做是一批野心勃勃

的日本军人，而没有清醒地看透，原来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凶残强盗。再者，他又迷信国际“非战公约”，寄希望于“国联”，结果，一失足成千古恨。

“不抵抗”之后，面对“国人皆曰可杀”的谴责怒潮，学良不辩一词，浪子回头，卧薪尝胆，戒烟去毒，知耻近乎勇，真是难能可贵。

九一八事变以后，学良再次追随时代前进。环顾当时政坛，能真正洗心革面、大彻大悟的国民党高干，恐怕又只剩下个张学良了。热河抗战之后，他在政治上，决心解除兵权，从此摆脱“军阀”的背景，把数十万大军拱手献于中央。“杯酒释兵权”之外，中国历史上亦绝无此先例。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慢说军阀时代，就是在国民党治下的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龙云、刘湘、盛世才、马鸿逵等等，他们肯这样做吗?

张学良是这些大军头中最年轻的一位，但他却能有此气魄，拿得起，放得下。解除兵权以后，欧游德意归来，他决心要“拥护领袖”，“抗日救国”，那一股赤胆忠心的诚意，足使蒋委员长把那二十余万“东北军”又交还给他。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试问，如冯、阎、李、白乃至其他任何一个杂牌军头，如已把军队交给了“中央”，“中央”会再把军队还给他吗?

接下来，我们要谈谈那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了，这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的最后一记“杀手锏”，它不仅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毋庸置疑，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对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

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

不过话又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惠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

盖西安无变，则蒋氏之剿共战争，以蒋之个性，势必坚持到底。然证诸世界各国近代史各种实例，这一剿共战争，将伊于胡“底”？实无人可以臆测。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古人说，扬汤止沸，莫如去薪。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不谋釜底抽薪，专求扬汤止沸，是消灭不了的；而专靠枪杆子来剿共，就是扬汤止沸，难以奏效。

何况，外患紧迫，大敌当前，谁敢断言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尝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再者，西安事变之圆满解决，对当时南京政府也提供了“全国统一，一致对外”全面抗战的必要条件，因而提早了全面抗战。根据当时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政策，没有西安事变，则国府对日，还得继续“忍辱”，而忍辱又伊于胡“底”呢？

以当年日本侵华的气焰来推测，南京之抉择，是“抗战”？是“忍辱”？其结果并无轩轾，所不同的只是：抗战者，“玉碎”也；忍辱者，“瓦碎”也，欲求“瓦全”而不可得也。

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而国民党一再“忍辱”，弄出个“瓦碎”的结果来，则蒋公与国民党在中国历史上，奚止“身败名裂”而已哉！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如果没有个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党国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

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一言以蔽之，张学良先生与本世纪同寿，我们祖国在上世纪所受的酸甜苦辣，张将军都一身兼受之。我祖国在上世纪“现代化运动”中，分段向前推进，张先生也一直追随时代，甚至领导时代、推动时代前进，亦从未掉队。如今，我中华民族已进入“民主法治”的新阶段，张将军喜见此情此景，以百岁高龄，仍感夕阳无限。

百年沧桑，是非自有公论。评价张学良将军，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历史的记录是不偏不倚的。试问今日之华人，有谁能否认张学良将军有一股子莽劲，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是个伟大的爱国者，又有何人能够否认他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二次大战后，影响历史研究最大的一门学科，便是由杜威大师开山的“行为科学”(BEHAVIOR SCIENCE)。这宗新学派的论学主旨，便是“个性决定行为”。其“决定”的方式，则是通过一种“S－R”或“S－O－R”的程序，也就是“刺激—生机—反弹”(STIMULUS—ORGANISM—RESPONSE)连续反应的运作过程。

这一过程的发展也是分等级的。如果这一个性所决定行为的“行为者”是一介匹夫，那他行为的结果就只限于一家之内；如果他是官吏或教师，其影响则遍及社会；如果他是个秉国政掌重兵的大人物，那就涉及到国计民生了；更上一层楼，如果他做了世界级的伟人，那可不得了啦，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祸福了！

张学良将军，便是这样一位世界级的历史伟人，他的个性所决定的行为，就关系到全人类的祸福。

事实上，他那颗火热热的、老而弥笃的赤子之心所铸造的“个性”，再通过“S－O－R”的过程，所“反弹”出来的社会行为，部分地改写了二十世纪中后期的“世界通史”，也通盘地改写了同一时期的“中国近现代史”。

我们搞近现代史专业的史学家，如今面对这样一位重量级的历史制造者，怎么能不去“秉笔直书”呢？现在，书君的巨著为我们提供了一架了解这段历史的望远镜，让我们一卷在手，便知究竟。

老实说，上述西方这宗最新的学问，同我们东方最古老的孔孟教义，基本上是殊途同归的，至少两者之间没有原则上的矛盾。只是行为科学只泛论人类社会行为变化之通则，内涵是抽象的，没有涉及到“个性”或“人性”善恶的具体问题。而我国儒法两家社会哲学的出发点，则是基于具体人性之为善为恶的问题。其实，善恶的标准都是人类智慧主观地制定的，人性因此也是善恶兼具的。君子与小人之别，只是“七分天赋，三分环境”所养成的不同的人品罢了。

可是，从实际政治运作的观点来看，则有为有守的君子之中，亦何尝没有误国之士？无所不为的小人之群，也每有治国用兵之才。既然如此，那我们观察评价历史人物，又该如何落笔呢？

所以，我国传统史家乃采用所谓的“春秋之笔”，就是把他们的动机与效果分开，不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人物如动机纯正，心际光明，则是国之瑰宝，民之圣贤；行事偶有差池，史家亦只是“责备贤者”而已，无伤大节。反之，小人当国，则不论成败，都是史家口诛笔伐的对象。

曹操说：“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平心而论，他对安定汉末那个动乱的社会是有其功勋的。但是，曹操却永远是传统史家笔下枭雄小人的代表。重视动机、藐视效果，斯之谓“诛心之论”；其功不可没，而其心可诛者，则终不足取也。我国传统史学上这点臧否人物的道德标准，还是值得我们继承的。

不过，传统史学毕竟落伍了，它那衡量忠臣孝子的尺码，

也已显陈腐，它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研究方法，也不够科学，这就需要我们用现时代新兴的社会科学的法则来加以补充。

所以，我们要把我国当代具有世界级的民族英雄，在国家民族历史上试为定位，那我们就得把古今中外历史科学的法则与观念摊开来比较研究一番，不偏不倚，才能粗得其平。

如果我们以“春秋大义”来观察张学良将军，他实在是一位动机纯正、心际光明、敢作敢为、拿得起放得下，而不失其“赤子之心”的爱国将领。就凭这一点，当年假抗日之名，行营私之实，其功未必不可没，而其心实属可诛的某些军人政客党人学者，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就不能跟张学良这样的老英雄平起平坐了。

如果再从当代行为科学研究的规律着眼，则张学良当年的政治行为和心理状态，亦无不可于“刺激—生机—反弹”的通则上找出科学的答案。这是一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如心理学、生理学等等交配后的新品种，不是历史家可以胡说八道的。

简言之，张学良早岁的显赫和晚岁的恬淡，都发生于一个“最后之因”，这个“因”，便是他个性上有颗“赤子之心”，这颗赤子之心经过“S－O－R”的反弹，化为“行为”，是可以翻天覆地的。那是他当年道德上的长处，但可能也是他职业上的短处啊。

朋友们或许要问，张学良有颗永不褪色的“赤子之心”，何所见而云然呢？答曰：正是有所见而云然！

事实上，赤子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各有其多寡罢了。就“七分天赋”而言，张汉公的“赤子之心”可能要比一般人更多一些。

而实际上，赤子之心，也是人皆失之，只是失去者有早晚

快慢之别罢了，而张汉公却能保留至百岁高龄而未褪！

赤子之心为何物，想必读者群中，善男信女都能详道之，恕我在此不多赘述了，我所要说的，只是失去赤子之心的人，应以"政客"为最早。

盖政治最复杂，最诡谲，吃那行饭的人，童心很不容易保留。张学良也是吃那行饭的大头头，可是，他竟然能跻百岁而仍保赤子之心，岂不怪哉？

其实，细细推敲一下，也就没有什么可费解的了，"行为科学"中的"S－O－R"就足以为我们详述之。

原来，张学良虽然"年未而立，便长方面，独握大权"，俨然是一位军政界的大头目，但他却没有学会"怎样做政客"，何也？他没有去学做政客的必要嘛！且看他生为"衙内"，幼为"王子"（东北王之子），稍长"便长方面"。当行伍出身的"老奉系"搞不下去了，在现代化了的"新奉系"中，"少帅"就是事实上的一"系"之主了，何待于"老帅"殉国之后呢？他上无其心难测的上司，中缺争权夺位的同僚，下面多的是忠心耿耿的死士部属。日常行政处事，一切为国、为民、为公、为"系"，也就是为自己，他根本没有必要花大功夫去"勾心斗角"。因此，他也就没有做小政客的历史磨练，他在这个"S－O－R"的链条上，就缺少了这个做政客的"S"，自然也就没有与之相适应的"－O－R"了。

张学良真正卷入政治漩涡，盖在"九一八"之后，而他的对手又是当时中国政坛上的一等高手，所以，"少帅"就开始吃亏了。西安事变之后，张副总司令学良亲送蒋总司令中正回南京，冯玉祥闻之后叹曰："少不更事！"这位姓冯的"把兄"老官僚，就不知道他那年轻的"把弟"，原本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官僚政客嘛！

张汉公好友、已故张岳军先生曾有句名言，曰："人生七

十才开始。”但又有谁能料想到，张学良将军活到了一百岁，还要再来个“人生的新阶段”！这真是二十世纪、也是“张学良世纪”（将军与世纪同寿）的一大奇迹！

私忠大义两熬煎，

原为生民解倒悬。

人生短短一百年，

总应留得清白在人间！

吾为张学良将军作期颐之祝！

谨序于美国东海岸新泽西州北林寓庐

二〇〇一年一月二日

唐德刚 是誉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解放前就读于中央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并考取史学大家顾颉刚先生的研究生。1948年公费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博士、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同时也是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出版《胡适口述自传》、《胡适杂忆》、《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中美外交史》、《书缘与人缘》、《史学与红学》等著作。20世纪80年代，曾在国内十余所大学讲学。1990年1月至5月，对张学良将军进行了十余次采访，并有录音带存世。

王书君 是著名的军事史专家。有《太平洋海空战》、《太平洋血战记》、《美日海空战》、《二次大战风云录》、《二十世纪大海战》、《二十世纪大空战》、《二十世纪大陆战》等多部作品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其中《太平洋海空战》获中国"国防现代化征文"一等奖。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现居纽约。

责任编辑　陶卫东
封面设计　池　劈

云诡波谲，百年中国，见政坛高手强弱过险招；
流光溢彩，世纪人生，显风流少帅袅袅真性情。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采用美籍华裔史学家唐德刚教授采访传主口述录音，真实详尽地记述了张氏从呱呱坠地到101岁在夏威夷谢世漫长岁月中每一阶段的真相。

青年时的"民国四公子"之一、风流"少帅"；中年时的"北中国王"、曾负国人骂名的"不抵抗将军"，西安事变中蒋介石的"克星"；事变后长期被囚的"忧郁的哈姆雷特"；老年后返璞归真，笃信耶稣的上帝信徒。诸般色相，归于一人之身，益增其传奇色彩。即使是囚禁之中对政事的惊鸿一瞥，眼风里也透出饱经的沧桑。而贯穿其中的，尤以与赵四小姐漫漫3/4世纪的爱情，调动着世人注视的眼球。

百年人生，他的经历有丰富的传奇色彩，他的作为有太大的因变参数，他的身上更有太多的谜团！《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一幅传奇传主的肖像写生，一出寻绎前因后果的舞台大戏，更是一部执著严谨、细致入微的解谜之作。

唐德刚教授评价本书——

"总计一百章，囊括了张学良风云际会一百年的传奇经历，且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文笔生动，老少咸宜"，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大部头史学著作，在有关张学良的众多传记作品中，可谓首屈一指"。


ISBN 7-80642-427-X
9 787806 424278 >

目　录

引　子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张学良将军原本打算亲自撰写回忆录，并为自己定下一条原则：写自己经办的以及耳闻目睹的事情。然而，不久，他又打了退堂鼓，决定放弃这一写作计划。

至九十年代初，张将军又萌生了请他人代为自己写传的念头。当时，他最为属意的人选是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

张将军为什么慧眼相中唐德刚教授呢？

其一，唐德刚教授一九四八年公费留美，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五十年代初即已获美国史博士、哲学博士学位；任教哥伦比亚大学时，为中国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唐德刚教授先后采访过胡适、顾维钧、李宗仁等名人，并有相应的传记巨著出版。嗣后，宋子文先生、蒋介石先生等都曾有意让其执笔撰写回忆录；唐德刚教授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

其二，张将军读过唐德刚教授撰写的《李宗仁回忆录》，认为写得不错。尤其是，当他读过唐德刚教授的一篇名为《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的文章之后，大为欣赏，觉得句句说到自己心坎上，颇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遂于一九九〇年初，秘密委托身边的人设法寻找唐德刚教授，意欲在台北北投府邸邀宴他。

当唐德刚教授接到“张学良将军要请你吃饭”的通知后，如雷轰顶，诚惶诚恐。

"张将军鼎鼎大名，赫赫少帅，名闻天下；吾乃一海外教书匠，浪迹天涯，埋头笔耕，执教谋生，何故被邀为张府嘉宾？再说，那时节，张将军仍处在监管状态之中，尚未获完全的行动自由，随意见客，这在政治上对张将军来说，岂不也是极为敏感且犯忌之事？"

一时间，唐德刚教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但名人相邀，岂敢怠慢？乃连夜搞到一张机票，第二天一早便径飞台北。

"当初次与张学良将军相见时，我觉得我的文章写得真是一点不错。那时，张将军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还是那样风度翩翩。"后来，唐德刚教授对本书的作者王书君这样说道。

初次相会，张将军同唐德刚教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从相识到熟识，前后相聚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那时，每逢相聚，唐教授便打开录音机，他们边吃边谈边录。勿庸置疑，若干历史上有关张学良将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都被储藏在录音带里了。

"张将军对我们后辈是十分看重的。"唐教授曾深情地对本书的作者王书君说，"吃了那么多的饭，谈得那样好，真令人回味无穷。我记得有一次到张将军府上去，张夫人还亲手做牛排给我吃呢！我在一旁静观，不由感慨万端：啊，这不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赵四小姐吗？我对张将军说：'我参加的第一个学生运动，就是打倒你张学良。'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上街游行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而今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谁又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赵四小姐又亲手给我做饭吃呢！"

就这样，从一九九〇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五月三日，在十数次聚餐的席间，张学良将军开怀畅谈往事，兴致勃勃地讲述了在风云激荡的中国政坛上，他所经历的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

第一章　细说家世

1873.2

——“我们家本来姓李，不姓张。”

——“我家到东北，大概已经是六代了，是道光年间去的。”

——“有人说我父亲是土匪，不对！他实际上是给人家做保险的。”

我们家本来姓李，不姓张。我们是大城人，原籍河北大城县。

一九九〇年三月，著名史学家唐德刚教授在台北采访张学良时，张将军追溯了张家的渊源。

“那后来怎么改姓张了呢?”唐教授问道。

是这么回事。是张家的姑娘嫁到了李家，可是姓张的家里没有男孩子了，怎么办呢，就把我们李姓的男孩子抱了一个给张家，就这样姓了张。

后来，我把我们李姓的祖宗都找到了。我曾跟我父亲说，现在我们李家已没有人了，你干脆把我再过继过去吧，我父亲听后还连连说“好”，可实际上也没有再去做。

“有书上说，张家是从山东迁居关外的？”唐教授问。

不是从山东，从来没有去过山东！我们祖辈是挑着担子由河北闯关东的。

我们家在真正的家乡是烧碱的，海水不是有盐碱吗，就烧那个东西。那地方真是很苦很苦的。我家到东北，大概已经是六代了，是道光年间去的。

去东北的时候，听说是这样的，地随便给，我们叫做射箭地，就是你能把箭射多远，就把这块地给你。岁租一半给政府，一半给蒙王。东北的地大部分属达尔罕王和齐王，我的一个妹妹就嫁给了达尔罕王子。

据张氏族谱记载，张始祖继业于明永乐五年由山西洪桐县迁河北大城县堤北村，五世祖禄宗迁冯庄，十三世祖天达、永贵迁辽宁海城，传两辈。至十五世，张有财育有三子：长子张作泰，老二张作孚，老三张作霖。

张学良的父亲张作霖，字雨亭，一八七三年二月十二日出生于辽宁海城县城西小洼村，小名叫张老疙瘩。他发迹后，人称“老将”、“大帅”或“雨帅”。

我父亲小时候很聪明。我怎么会知道的呢？我们有一个姓姜的同乡，我们都管他叫姜爷爷，是他讲给我听的。这姜爷爷跟我父亲的老师认识，他们常一起待在书房里。他告诉我说，你爸爸小时候念书时，有一天，他的先生指着“祸福由之”这个词，教你父亲念“祸”。在教第二个字的时候，他不认识这字，我就在旁插了一句，启示他说，就是“祸”的反面，你爸爸接着就念“福”。我当时很惊奇：你爸爸那时才是个小孩子，但脑子反应却这么快！

还有一件玄事。我们乡下，为防备来贼，老百姓家中都在一个棍子上面扎个枪头，叫小扎枪。有一天，我父亲上学堂念书，老师在门后头发现了这玩艺儿，便问这扎枪头是谁的，我父亲说，是我的，老师问，你拿这个干什么？我父亲说，我昨天看见你拿板子打某某人的屁股，假如你今天打我，我就拿它给你两下子。好家伙！老师找我奶奶说，你这个学生我可不敢教了，他要真的给我一下子，我就完蛋了。

由于家贫，张作霖仅念了一年私塾就辍学了。尤其是父亲死后，家境更为艰苦，其母便携子投奔到黑山县的外祖父家。

有一天，母亲对小作霖说："我们生活困难，欠邻居的债也还不上，怎么办？"小作霖听后十分着急，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第二天，他故意把邻居的肥猪赶入水池中，猪受惊狂叫，他也大喊大嚷："猪落水了！"

村中人闻声前来，正当众人束手无策时，小张老疙瘩立即跳下池中把猪拖救了出来。邻居见猪得救，对他大加夸奖，并对他母亲说："多亏作霖救了猪，我们免受了损失，你们所欠的债就不要还了，就算是我们对你们的谢意。"

母亲因生活所迫，不久便改嫁村中的张兽医。在新的环境下，小张老疙瘩对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心灵手巧，很快便跟继父学会了相马和治马的本领。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竟与他后来的发迹有相当的关系。

我们家以前是很苦很穷的，我们上辈没有一个正儿八经地死在床上，我父亲一提起这事儿就掉眼泪。

我父亲和他大哥很要好，谁会想到我大伯父竟然是叫我爷爷打死的！

那时，我大伯父刚二十岁，乡下有一个人的太太与他有点儿暧昧关系，那男人管不住自己的太太，就上我爷爷那儿去告状。我爷爷为这事儿就火了，觉得儿子给他丢脸了。你知道，

我们那地方的人，都凶得很呢。

那天，我大伯父在家中吃午饭，他是倒着脸儿坐在炕上吃，没有任何防备。我爷爷冲进屋，二话没说，狠狠地给了他一棒子。这一棒子正打在我大伯父的腰上，打得他当场就把吃的饭全吐了。后来他就病倒了，不久就死了。

我父亲一提起这事就哭，就破口大骂："他那王八佬的，他自己当王八，他自己管不了老婆，他乱告状！"

有的书上记载说，张作霖"大哥早年夭亡，二哥落草为寇，后被处死"。

对此，张将军予以澄清。

不是的，这事不对，我二伯父的事，说来话长——

我爷爷张有财，挺凶的一个人。那时，地方上有一个小土豪，姓王，手头有几个钱，但人不怎么正派。有一次，在赌场上，我爷爷也在场，看着这个姓王的跟一个年轻人赌。这年轻人把钱输光了，还欠了姓王的钱，这姓王的就紧逼着他要。年轻人说，我都输光了，没有钱给了。可姓王的说，不给不行，回家里去要，就把这年轻人逼哭了。这时，我爷爷在一旁就说话了："算了吧，你已经赢了那么多了！"那姓王的就说："哎，碍着你什么事了，你管什么闲事？"

这下子把我爷爷说火了。我爷爷对他说："我说什么？假如我要说出来，你就在这儿站不住，你就待不了，你就瘪了！"这姓王的当时一听，就不吱声了。

下午，在回家的路上，这姓王的对我爷爷说："你，你要对我道歉，你管这闲事干嘛？"我爷爷说："你的那些手脚，我都看见了，你能瞒得过我？"

这样，两人就争吵起来了。这个说，你要对我道歉，那个就是不道歉，还要骂他。最后，两人就动手了，就打起来了。

那时，我爷爷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当然打不过他三十多

岁的年轻人，结果被打伤了。后来，我爷爷就因这个伤死的，但不是当时死的。

为了这个事儿，我二伯父和我父亲就要报仇，要去打死这个姓王的。那时，我二伯父常练跑步，身体好。我父亲就不行了，跑不动，于是，他就到郝大爷家借了一头驴，准备报完仇后好骑着驴跑啊。

一天晚上，哥俩儿就带着枪去了。那王家当时住的是上房，厢房里住着一个老太婆。他们哥俩儿翻墙进院时，没料到墙是石头堆起来的，一碰，墙便哗啦啦地塌了下来。老太婆听到响声后大喊："有人！"我父亲一个箭步冲上去捂住老太婆的嘴，不让她乱喊，慌乱中匣子枪走火了，把老太婆给打死了。枪一响，打死人啦，上房的人也出来啦，我父亲和二伯父一看势头不妙，撒腿就逃跑了。随后人家就报官了。这样，土匪这话，后来就传出来了，而且被称做"明火"。

明火就是抢劫来了。到了县衙门，就当作"明火案"处理。我父亲当时骑着驴跑掉了，结果把我二伯父抓了起来，判了十年刑。因为用枪打死人的是我父亲，所以，二伯父没有被判死刑。

"你爸爸拐走我一头驴，你得赔我！"后来，我父亲的好朋友郝大爷见到我时，旧事重提，还不忘与我开玩笑。

实际上，我二伯父也没有坐十年牢，而是由我二伯父的二伯父，也就是我二爷去替他坐牢，听说，大清朝有可以替人坐牢的规定。后来，我二爷就死在了狱里。

我二伯父后来当上地方保卫团的团总。他是在剿匪时阵亡的，他死的时候，我还去看过。听说他是弯着腰，自个儿拎着枪向前冲，被土匪打过来的子弹击中面部，子弹从前面这儿进来，从后面出去的。那一仗死了三个人。我二伯父死后，他们全家就住在我们家里。

由于为父报仇误伤人命，张作霖被列为在逃主凶，由官府出具画影，通缉追捕。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那时，驻营口田庄台的“毅军”正在招兵买马。

我父亲没有办法，就投了毅军。毅军的首领是宋庆，我父亲就这么投到了他的旗下。

适值甲午、日清之战如火如荼，毅军中正欲招募一名谍报员，以深入日军后方刺探军情，张作霖应募成功。他敢于冒险，大胆心细，屡有斩获，累次建功，后升为戈什。

我父亲当戈什，就是给宋庆当卫士。当时的戈什达，即卫士长，是于学忠的父亲于文斗。宋庆对我父亲很好，隔不几年，经他提拔，我父亲就升官了，这个官，相当于现在的准尉。

张作霖二十一岁那年，母亲催他完婚，女方是赵家庙乡绅赵占元的二女儿。婚礼那天，张作霖身着长袍马褂，头戴礼帽，带着军功牌和礼品，骑着高头大马，喜气洋洋地前往赵家迎娶。

不久，《马关条约》签订，甲午战争结束，毅军回防河北，张作霖便退伍还乡，以治马为业，力图在当地发展。

那时的草莽英雄，有马或贩马的人，大都是有背景有问题的人。他们的马，大多数是偷来的，偷来的马拿去治病，必定跟兽医接洽；再想卖掉，也大都由兽医转手，所以，兽医最容易跟这些草莽英雄交往。正是这个原因，我父亲认识了很多人，这些人以后都成了他的好朋友。

那一阵子，张作霖好赌。有一次，他赌输了，没钱还债，被人追讨，对方竟扒掉他的衣服，要活活冻死他。幸好豆腐匠钟三遇见了他，见他冻得要死，便脱下羊皮背心为他御寒，并把早晨卖豆腐的钱送给他。后来，张作霖发迹后，不忘钟三之恩德，尊为“钟三爷”，让其享受荣华富贵。

那时，东北边陲，辽河两岸，兵患之后，疮痍满目，豪强四起，割据称雄。其中，有的落草剪径，恣意焚掠，为害乡里；有的则啸聚豪强，绥靖乡村，除暴安民。

当时，义和团变乱后，东北的政府运作不灵了，地方上便治保了。那时，我们东北的女人，大多都是晚上上炮台警戒。为什么呢？男人要睡觉，晚上休息，白天要干活。

我们讲的炮台，就是现在说的碉堡。碉堡不是家家都有，只是有的人家有碉堡。匪有匪道，不是乱七八糟的。我们讲，好狗不吃门前食，那时土匪不抢自己附近的人，我们那时最怕热河来的土匪，我们那儿闹土匪都是热河来的，他们一晚上就过来了，来袭击你。所以晚上警戒的时候，我们那时叫“响窑”。什么叫“响窑”？就是一般女人都在这有碉堡设备的人家中呆着，如果看见有什么动静，看见骑马的土匪来了，就开枪，这时，睡觉的男人就都起来了。

还有，那时的东北，当土匪好像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往往有这样的问话：哎，朋友，今晚上帮帮忙好吧？今晚要出去抢点儿。

我父亲并未当过打劫一类的土匪。有人说我父亲是土匪，不对！他实际上是给人家做保险的。那时，他带了十几个人，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做“保险”这行当。

什么叫保险呢？就是咱们唱戏说的那话儿，叫“坐地分赃”，就是你这个村庄，他那个村庄，由我来负责给你保护，每月由村里付给我多少钱。如果有土匪打你，来这儿捣乱，我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打抢匪，我父亲就是这么起来的。

最初，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自当头目，出没在北镇、台安、中安堡和八角台一带，维持七八个村子的治安，凡被土匪绑架，或骡马被劫，他都负责索回或赔偿，深获地方百姓称赞，因此，人马渐壮，声望日隆。

后来，来了一个人，外号叫海沙子，这是我父亲最愿意讲的一件事。这人的势力比较大。我父亲那时只有十几条枪，而海沙子已有二十几条枪。他经过的地方，就是我后来出生的地方，那时叫八角台，现在叫台安县。他经过这里时，便要过路钱，我父亲说那不行，这地方属我管。他说，不给钱，那我就要打！我父亲说，我在这村庄负责安全，我拿人家的钱，咱俩一打，村庄不就遭难了吗？不行，你不能打！我父亲说，这样吧，咱俩对打好不好？你人站那边，我人站这边，咱俩开枪对打，如果我被你打死了，这地方就归你，如果我把你打死了，你的部下就归我，好吧？

当时的草莽英雄，个个是粗犷胆大、骑射皆精的好汉，"十个清兵，敌不了一个日兵；十个日兵，敌不了一个'胡子'"，这是当年驻东北日军中的一句流行语。"胡子"大都是枪不离肩、举手之间百发百中的神枪手。更有甚者，有的带未离肩，枪已在手，弹指瞬间，对方已应声倒地。

而张作霖更非等闲之辈。他那右肩高、左肩低的体形便是长年枪不离肩，习惯成自然造成的。而如今，尽管海沙子赫赫有名，但他同"一双狐眼，机警过人"的张作霖短兵相接，那真是劫数难逃，离死不远了。

结果，我父亲一个闪电般的扣动，就把海沙子击毙了，这样，海沙子的部下就归我父亲了。我父亲原有十几条枪，现在总共拥有四十多条枪了。

我父亲身上有一枪伤，他曾给我看过，那就是被海沙子打的一枪。那海沙子的第二号首领就是汤玉麟。他汤玉麟不是我父亲的底柱，所以总是不太服。他是海沙子的副手，海沙子死后，他就带队投降了我父亲。

在赵家庙的西北面，有个以金寿山为首、受俄军支持的大股土匪，啸聚散兵游勇、地痞流氓约一百余人，在北镇一带敲

诈勒索，危害乡里，村民不堪其苦，恳请张作霖保护。张作霖率人马打跑了金寿山，将团练移至中安堡。这时，他的保险区扩大到二十七个村庄。

丢掉地盘的金寿山怎肯善罢甘休，一九〇一年二月，金寿山派干儿子打入张作霖的内部，在除夕之夜，直扑中安堡，里应外合，欲将张部一网打尽。

夜半，枪声骤起，张作霖不明敌情，措手不及，只得仓皇突围，率部逃往台安北面的姜家屯，后进入八角台。

这时，张作霖意欲前往高坨子与绿林老前辈冯德麟合伙，借以托身，但八角台商会会长张紫云见张作霖义气非凡，执意挽留，张作霖见盛情难却，遂率部加入八角台团练。

此地团练头目名张景惠，曾卖过豆腐，开过杂货铺，喜交结绿林好汉。此时，两张相见，一拍即合。张景惠执意推张作霖当团练长，自己甘居副手。不久，两张又将附近仗势扰民的回教土匪头目项昭子诛杀，吞并了其残部。在锦州一带的张作相也慕名前来投奔。

至此，张作霖已拥有二百余人，有马有枪，装备齐全。队伍列队绕村行走时，还配以鼓号和旗帜，阵容极壮。邻里各帮派慑其声威，哪敢贸然入境骚扰？乡民遂得以安居乐业。

当时，辽西方圆一带共有“四霸天”，我父亲成为“北霸天”，势力已相当大了。冯庸的父亲冯德麟当时也是诸霸天之一。这土匪的名称就这么来了。其实，我父亲是来了土匪去打土匪的，怎么反被称做土匪呢？这，我真搞不明白。

从某个角度说，一部东北开拓史，就是一部土匪与剿匪的活动史。张作霖就是那种普遍存在于东北乱世之中，以维护地方治安，保护地方商人利益为旨的乡团武装的头领，并以此而发迹。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又逐渐恢复了它的统治权。

这时，新民知府曾韫得知张作霖愿受招安，立即报请盛京将军增祺。当被问及为什么愿意被招安时，张作霖回答得很干脆："升官发财！"

增祺认为招抚张作霖后可以绥靖地方，遂奏请朝廷恩准。

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即一九〇二年十一月，经朝廷批准，张部被收编为省巡防营，张作霖任管带（营长），张作相、张景惠、汤玉麟等分任哨官（连长）。

招安后，张作霖择日赴奉天营务处谢委。该处司员们皆因张作霖出身绿林，名声甚大，要争相看个究竟，殊料一见之后，大感惊讶。只见张作霖，身材短小精悍，哪有山大王的威风，分明是一文雅书生。惟因头戴五品亮白顶蓝翎，身穿天青宁绸军制服，周身沿黑色缎边，袖盘黑缎大盘卡，腰佩洋式军刀，足蹬薄底快靴，两目炯炯有神，倒也显得威风凛凛，气度非凡。

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战争爆发，东北又成为日俄角逐的猎场。张作霖则在日俄两军夹缝中周旋：或暗中助俄粮草情报，甚而还穿上俄军军服偷袭小股日军；或在"愿为日军效命书"上画押，隐藏日军间谍，为日军效力。

翌年，在复杂险恶环境中得到磨练的张作霖，又奉盛京将军赵尔巽之命，将所部扩编为五个营，张作霖升任统带（团长），自新民府移驻于郑家屯。后又被编为右路，委以头领。此时的张作霖，竟然与早年绿林老前辈、时任左路首领的冯德麟平起平坐了。

东北边陲于一九〇七年正式建省，徐世昌为首届东三省总督。他上任后致力剿灭胡匪，整顿旧军，于是，辽西巨匪杜立三便成了首要讨伐的目标。

是年五月，张作霖奉命剿匪，但他左思右想，觉得力胜颇难，惟有智取。于是，张作霖恳请杜立三的叔父出面邀杜立三



任清军巡防营统领时的张作霖。

赴宴，一边暗伏兵力，趁来赴宴的杜立三不防，闪电般将他擒拿，当晚击毙。徐世昌闻讯大喜，赞许张作霖“赴机迅速，兵不血刃”。清廷据报亦给予嘉奖。

徐世昌见张作霖智勇非凡，又调其部抵辽源、洮南一带剿办蒙匪，并将张部扩至七个营，总兵力达三千五百余人。当张作霖苦战经年、剿匪之战高奏凯歌时，又晋升为奉天省前路巡防营统领（旅长），兵驻洮南。

在此期间，张作霖与张作相等八人结拜为兄弟，按年龄顺序是：马龙潭、吴俊升、孙烈臣、张景惠、冯德麟、汤玉麟、张作霖、张作相。

张作霖早年在群虎争雄中脱颖而出，是由其超人的智慧、非凡的胆识、强悍的个性以及动荡的政局诸因素决定的。

在性格方面，张作霖原本是一位“妈拉个巴子”不离口的粗线条英雄好汉，他虽然脾气暴烈，但决不是一介莽夫，他有胆有识，骑射皆精，枪法出众，群雄仰之。

另一方面，张作霖也是一位颇有政治头脑、德才两兼的细线条的政治领袖人物。他案牍如流的行政才能和简朴逾恒的私人生活，也令人叹服不止。

张作霖粗通文墨，儒雅十足，常将《孙子兵法》置于枕边，对军士们训话，滔滔不绝，颇能言之成章；他皮肤白皙，举止文雅，说话声音不太高，往往使远道访客大感惊奇，都觉得他“北人南相”，俨然一位“恂恂儒者”，哪里是什么“绿林豪杰”，哪里是什么“红胡子大盗”呢？

英雄不论出身低。张作霖在具备这些超人才能的同时，又天赐良机，赶上了政治动荡、改朝换代的大变革年代，当辛亥革命一爆发，他那超人的政治智慧和军事才干，强悍的作风以及过人的精明与心机，在通向“大帅”的血腥道路上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了。

第二章　童 年 生 涯

1901.6

——“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

——“我小时候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没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大岁数。”

——“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戴红翎子了，要不是清朝亡了，那我阔气大了。”

我降生的地名叫八角台，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我小时候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能活我自己都很奇怪，那时我母亲又有病，没有奶吃，吃什么呢？就是把那高粱米饭嚼碎了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这么大岁数。

晚年，张将军如是回忆说。

一九〇一年六月三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张学良出生于东北辽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张家窝堡。

适值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沙俄军队又单独出兵占领了东北。俄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整个东北几无完善之区：马贼充斥、盗贼遍野，官商士民颠沛流离。辽河下游，灾难深重。

在辗转前往八角台的逃难途中，身怀六甲的赵氏，由于乡村道路太颠簸，把一个男婴生在了车板上。

张学良诞生在露天的荒野里。东北天气，在阴历四月，仍春寒料峭，赵氏产前三餐不继，产后又没得到调养。惊恐、饥饿、疲倦之中，又继受风寒，以致母子都生了病。

我们穷得连炕席都没有。我原来不叫小六子，叫双喜，这名字也是很有点儿来历的。我下生的时候，我父亲在外面打了胜仗，回来后，见我下生了，双喜临门，所以乳名就叫双喜。

在兵荒马乱中出生的小双喜，乃张作霖的长子，备受其父喜爱。张作霖特请文人给儿子起名为学良，字汉卿，号毅庵。他希望儿子长大后，能像汉朝贤臣张良那样，成为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才。

张学良三岁那年，算命瞎子说双喜命太硬，克父母，必须到庙里许愿，做佛门弟子，才能消祸免灾。

那时候，我母亲就把我许到庙里去当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许到这个庙里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

因为当了和尚，我就不叫双喜了，就把双喜做了个纸人放在庙里，我本人踏着一个板凳跳墙跑了。纸人的双喜就放在了庙里，这样我的名字就没有了。那怎么办呢？就把出庙时听到有人头一声喊什么，我的名字就叫什么，结果头一声听人喊一个小孩子叫小六子。我说笑话，我说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



张学良出生地辽宁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张家窝堡房后的老枣树，古树新枝，果实累累。

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

我父亲被招安后不久，我四五岁时，父亲归朱子桥管，已当上管带了，统领二百多人马，驻防在新民府，训练士兵。我是在新民府长大的。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那里驻有日本兵。有一回，当兵的去玩妓女，双方打起来了，我父亲的兵被日本人打死了两个，父亲火了，非叫凶手偿命不可。那时由官府办案，一个兵给赔了五百两银子。父亲更火了，过了三天，父亲派人打死了三个日本人，一人赔了五百两银子。他说，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不就完事了嘛！这事闹得很厉害，不久，上头就把部队调离了新民府，驻防到辽源。我的原配就是那儿的人。

后来，蒙匪发展起来，闹得很厉害，黑龙江、吉林的部队

都打不了，便调奉天的部队去打。我父亲被调去了，那仗打得很苦啊。

满清政府因我父亲打蒙匪有功，就赏了个功名，叫什么亲家二品贤，但我父亲执意不要，他把功名分开了，给我奶奶一个诰封，给我一个户部郎中。我现在知道了，户部郎中就等于财政部的一个科员，级别是五品官。所以，我小孩子的时候，就戴红翎子了，要不是清朝亡了，那我阔气大了。也许是这个原因，那时我父母就拼命让我念书，将来好当文官呢。

作为一个行伍出身的马上英雄，作为一名正飞黄腾达的清廷命官，张作霖一个很大的遗憾，就是小时候因家境贫寒，没有好好地念书，缺少文化，处事颇难，遇事还往往闹出不少笑话。因此，他把厚望都寄托在小六子身上，发狠心要把长子培养成文武双全的有用之才，以光大门庭。

七岁时，还俗后的小六子马上被送进私塾。海城县的宿儒杨景镇、台安县举人崔骏声以及白永贞、宋文林、张梦九、金梁等人，都曾先后为其授业。

我的开蒙塾师是教过我父亲的，我该叫他师爷。他学识渊博，可是脑筋太古旧。不是我冤枉他，我的启蒙老师杨景镇老先生，说句公道话，他简直王道透了。但因为我父亲小时候跟他念书，所以他对这位老师很看重。

那还是我父亲当了将军的时候。有一次，杨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我作古文时把他惹恼了。他跟我父亲说，我不教你儿子了。我父亲非常恼火，他要用鞭子打我，问我为什么把老师气走了，那时我才七八岁。

提起这事，我真要感谢袁金铠老先生，他帮了我好大的忙。袁金铠问我父亲："你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发火？"我父亲说："我怎么不气？我这儿子写文章骂老师。"袁金铠说："啊，这学生骂教师，那可是非常有意思！"袁金铠又问我父亲："你

看见你儿子写的那篇文章了吗?”我父亲说:“我没有呀。”袁金铠说:“好不好先把文章拿来看看?”这样，就把我写的文章要走了。

他出的作文题目叫做《论民国之害甚于帝制》。我在作文时说，说这话的人是坐井观天，可杨老先生却认为我是在骂他。

袁金铠是我父亲的秘书长，他看了这篇文章后连说:“哎呀，这个先生教不了这个学生，这个学生不是这个先生能教得了的。”

后来，我父亲消气了，不想打我了，我就说，你们是不是另给我介绍一个先生，这样，我就出头了。不久，我就换了另外一位先生，姓白，叫白永贞。

白永贞，辽阳人，字佩珩，清季拔贡，学品端方，颇有文名。他给张学良讲授“四书”、“五经”和古典文学，为张学良奠定了旧文学的底子。

我父亲也很愿为我请英文教师，请谁呢？那时省城有个外交署，外交署有个英文科长，这个人我现在很想念他，我到他那儿去念英文，先生对我很客气。你说这个英文怎么念吧，他是广东人，他老人家说广东国语，教我念英文 nine（九），就发音念作“狗”。那时候念英文，旁边并没有中国字注解，那我以为就是“狗”了。后来又念 dog，他说这是“犬”，我脑子想，这“犬”与“狗”有什么区别呢？我就想，nine 可能是大狗。后来，慢慢地出现 nine dogs，哎，它们两口子怎么堆到一块儿去了？后来才知道 nine 是“九”。我这就是说，先生对我这样的客气，我有许多是自悟，也不能说是自修。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堂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

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楞楞，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得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儿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白老师教了我近两年，他就跟我父亲说，你不要让你儿子念书了，他总不是一个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就让他干什么好了。

金梁亦曾教过张学良，他回忆说："张学良十二三岁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常言道，少时娇生惯养，终不成大器。我孩提时代，深受父亲宠爱，确如千金之子，娇惯任性。惟以我之聪明，尚可引为自豪。

张学良自幼接触的人物，都是张作霖绿林时期的伙伴，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孙烈臣等人，他们大都是操枪弄炮、仗义行侠的草莽英雄，这些人所崇拜的是有良心侠骨、讲义气的山大王。而张作霖智勇双全，重江湖义气，自然成为他们心目中尊崇的人物。张学良耳濡目染，也觉得父亲是一位英雄人物，因此，长大了欲当一名英雄的想法，在幼年的张学良脑海里潜移默化，萌生滋长。

有一次，张作霖把张学良叫到跟前，说："你已经十好几了，古书洋书也念了不少，现在，我这个大老粗的爸爸要考考你，看你究竟是块什么料。如果是块钢，那我就往刀刃上使；是铁，就打门环；是木头，就做个镢头把。"

张学良有点儿紧张，虽然他自信已学了不少知识，但又怕父亲出怪题。想到这里，身子不由自主地微微一抖。

张作霖大吼一声："站好！李世民是哪朝人？"

"唐朝。"

"你喜欢他吗？你愿学仿他吗？"

"不喜欢，也不想学他。"

张作霖瞪大眼睛："那你喜欢谁？"

"我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

张作霖哼了一声，又问："你喜欢日本天皇裕仁吗？"

"不喜欢，我喜欢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的加里波第将军、英西海战殉国的纳尔逊将军。"

"好小子，有种！"张作霖夸奖道，双手抓住儿子的肩膀使劲地摇晃了几下。

然而，张学良母亲对他的影响，则与其父恰好相反。

赵夫人自嫁给张作霖后，颠沛流离，生儿育女，饱尝了绿林惊险动荡的生活。作为母亲，她不希望子女走她丈夫的道路，她渴求子女成人后，能掌握一门技术，靠本领去谋生，过安定的日子。

赵氏宽于待人，却薄于待己。她生性要强，脾气亦暴烈，对孩子们的管教尤其严厉，恨铁不成钢，所以张学良挨打最多。

在张作霖颠沛流离的生涯中，赵夫人一直伴随左右，为丈夫排忧解难。张作霖脾气暴躁专断，同他几个拜把子弟兄时常口角，轻则动嘴，重则动手。每当这时，赵夫人总是劝解众弟兄说："他那个熊脾气，你们还不知道？好兄弟，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三天别理他就好啦。"

"老嫂子多么贤惠，雨亭兄多少大事，都多亏了她啊！"后来，曾当过热河省政府主席的汤玉麟如此感慨地说。

但是，随着张作霖势力的壮大和地位的升高，他开始陆续猎取其他女性。

在北镇时，张作霖看中了私塾卢先生那极为标致的女儿。赵夫人深知丈夫说一不二的性格，就主动为他操办婚事，将卢氏迎娶进门。

一九〇六年，张作霖又连续迎娶了三位姨太太，即三太太戴氏、四太太许氏、五太太寿氏。

三太太戴氏，原为一捕盗班头的儿媳妇，长得非常漂亮，张作霖出资万余，终于得手。然戴氏性情暴躁，恃娇倚宠，后因打骂使女，被张作霖撵出府门，削发为尼，最终郁闷而死。

四太太许氏出身于天津教场，性情刚直，遇事有主见，对子女要求严格。

张作霖最宠爱的当属五太太寿氏，她原是黑龙江寿山将军的女儿。有一次，她在奉天某中学毕业典礼上致答词，张作霖见其风姿绰约，仪态万方，便托人强娶为妾，终如愿以偿。

据说有一次，张作霖检阅卫兵，看到其中有一名小个子，便板着脸问道："怎么你们招这样的小个子当兵？"答曰："这是五太太举荐的。"张作霖马上改口说："怪不得这样精神，叫他去当班长吧！"

后来，张作霖又在天津迷上一位十八岁的姑娘马氏，五太太虽然心中不是味道，但仍亲自将其接回太帅府。后马姑娘生一女，做了六太太。

接连将几位太太娶进门，张作霖已不是八角台干"保险队"时的那个绿林头目了，而是声威显赫、子孙满堂的巡防营前路统领门第。这时，他也不过三十岁出头。

一九一〇年，赵氏带着二儿子张学铭自新民府来到奉天，颇受礼遇，惟独五夫人不尊重她正室的身份，赵氏自觉动摇了传统礼法留给她仅有的这点尊严。更有甚者，五夫人竟派做过老鸨的母亲王老太太前来问好。王老太太自诩地位特殊，不客气地直呼赵氏为"姑奶奶"，她的这一举动，严重伤害了赵氏

的自尊心。

本来就已受不了这股闷气，加上有一天晚上，二儿子张学铭夜间哭闹，住在另一厢房内的张作霖过来，把学铭痛打了一顿，赵氏说："我的孩子我会管！"第二天，就赌气带着学铭回到新民府老家去了。

赵氏心肝欲裂之下，胃痛病加剧，意志更见消沉。原来赖以止痛的鸦片烟瘾，她竟发狠在一天之内戒除了。

我母亲性格非常刚烈。她老人家可以说没享过一天福。

虽然吞神符、喝香灰、跳神、驱鬼，然而都无济于事，等到人已病危，我挂专车来新民府探视时，母亲只掉了几滴眼泪，仍不肯开口跟父亲说话。自古"吞声"之说，刚烈者实如此呀。

"我死后，小六子他们就交西屋妈抚养吧！"这是张学良生母赵氏的临终遗言。

"西屋妈"，即卢夫人。赵夫人生前住东屋、卢夫人住西屋。有鉴于此，张学良对卢夫人一直很敬重，他们兄弟得以长大成人，卢夫人抚育之恩功不可没。张学良一直称卢夫人为"妈妈"，视同生母。

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封建军阀家庭中，尽管天天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宾客如云，但张学良心里总有孤独和寂寞之感。后来在被称作所谓的《忏悔录》中，他回忆这段童年生涯时说："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友。"

但是，正是这些磨难，使他从小就形成了救危济困的性格。

有一年春节，新民府官曾子固到张作霖府上拜年，张作霖对曾子固说："这是我的儿子，名叫小六子。"然后，张作霖叫小六子给曾子固下跪叩头。

叩头完毕，小六子起身后便问道："曾大爷，咱们有钱的人家，过年大吃大喝，满心欢喜，可那些贫穷人家，愁眉苦脸，没钱过年，该怎么办?"

曾子固闻听此言，尴尬无语。张作霖见状，立即喝退了张学良。

"这孩子很喜欢读一些侠义书，这些书里讲一些见义勇为、除暴安民的事，他很感兴趣，也受到一些影响，整天也想弄刀舞棒当侠客。"张作霖说道。

"这孩子，将来定成大器!"曾子固连声称赞。

第三章　大帅发迹

1911.11

——“我父亲问，为什么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

——“我父亲这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忽地站起来，把手枪‘叭’地放在桌子上，说：‘我不赞成！’”

——“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

我父亲每年总是一两次到省城找赵尔巽。父亲没有怕的人，除了赵尔巽，就赵能说他。那次他到奉天，正赶上辛亥革命爆发。

一九一一年五月，赵尔巽取代锡良成为东三省总督。是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赵总督异常惊慌。

当时，驻奉天省城的新军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与革命党

关系密切，他联络镇统吴禄贞和张绍曾，密谋东三省独立。众将领拟推举蓝天蔚为关外讨虏大都督，革命党人张榕为奉天省都督，并要立即驱逐赵尔巽。不料，军机泄漏，赵尔巽下令密调驻防在通辽一带的后路巡防营统领吴俊升前来救驾，以资震慑。

我父亲是以领饷的名义先行抵达奉天省城的。奉天那时就有讲武堂了，那里有我父亲的部属，如张景惠等，约三十多人在那儿念书。

接获讲武堂部属的情报后，张作霖马上意识到这是抢夺权力、问鼎奉天的大好时机。于是，他擅自调兵，亲率五百轻骑，由洮南出发，兼程直驱奉天。

途中，张作霖一行路经吴俊升防地时，吴俊升因尚未接到密令，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热情地为张作霖准备好早餐，张作霖却传言“不吃了”，约他奉天相会。待吴俊升接到调令后，张作霖早已率部安抵奉天。吴俊升惊叹道：“张统领的行动，何其神速！”

我父亲去见赵尔巽，赵对我父亲说，你来得正好，我明天就准备去死！我父亲问，为什么要去死呢？要死，大家一起去死！赵尔巽说，明天，奉天的文武官员们要独立，但我绝对不干。如果他们得逞，那我就去死！

我父亲赶紧对赵尔巽说，你给我下命令吧，把我的军队全部调来。你赶快把城门关上，你再把我那三十多名学员召来，给他们发些枪，我来保护这城。

赵尔巽说，很好，我不但这样，我还要把我的卫队和警察也都交给你，统统归你指挥，你把他们放在城门那儿，叛军来了，打就是了！于是，我父亲从一百多里外又调来了大部队。那时省城里没有多少兵。

危难之中，赵尔巽见张作霖自告奋勇前来效命，自然喜出

望外。就这样，张作霖迅速成功地为自己今后的飞黄腾达，铺垫了坚实的踏脚石。

十月二十日下午四时，赵尔巽在奉天召开新旧两军将领会议，讨论应付时局的方针和东三省应持的态度。

“武汉叛乱，朝廷正派大军剿办，不久即可平定。东三省为皇上老家，我们必须拥戴朝廷。”赵尔巽宣布开会后，首先起立发言道，“现在朝廷还没有谕旨下来，我们的要务是保境安民。我们今天应当郑重地表决一下，谁赞成我的意见，就请举手！”

赵总督话音刚落，统领张作霖首先举手，其他四路统领也随着举手赞同，惟新军这边各镇统、协统和参谋长端坐如佛，没一丝反应，会场一片寂静。

尴尬之际，忽见张作霖起立吼道：“总督劝告诸位保境安民，苦口婆心，可谓仁至义尽。大家如不接受总督的好意，举手赞成，那我们今天在这屋子里的人，只有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着出去！”

只见张作霖双手紧握两个类似炸药的毛巾包，对各位与会者怒目而视。

“各位听我的准保没有错，也许我上了年纪，话没说清楚，大家没听明白，现在我再说一遍。”赵尔巽又重述了一遍。

这次，新军中的卢协统首先举手，其他人也相继举手，赵尔巽欣喜地说：“全体通过了，大家总算给了我一个老面子。”

会议一散，蓝天蔚便抓住卢协统的袖子说：“你这个家伙，在外头我们是怎么说的？说话不算数，到里面又举手！”

卢协统面红耳赤地反驳说：“老兄，有命才能革命，张某那两颗炸弹，你难道没有看见？若是放响了，我们还能有命吗？好汉不吃眼前亏，我是救了大家。再说，我的手仅举到耳

根，只算一半赞成，一半反对，你们不看清楚，稀里糊涂地就随着把手全举了起来，这怎么能怪我呢！”

其实，张作霖手里的圆包并非炸弹，只是从赵尔巽的随从手里拿来的小茶壶，用毛巾包起来，作为“诈弹”，以盛怒来解赵尔巽之窘境，这是张作霖急中生智，也是“东北革命”时的一件趣谈。如此，宣告东北独立的电文就此流产。

那一阵子，我们住在新民府，是蓝天蔚所部的必经之路，我母亲对我说，今晚上可能会出事，今晚上要是打仗的话，你就跑！我记得母亲给我三十块大洋，用白布包着，系在我的腰上。我那时还小，刚十岁，急着问，妈，那你呢？我母亲说，你别管我，也别问，你赶快跑，等稍微平息了，你看到哪个老头好，你就跪下给他磕头，把银子给他，叫他带着找你爸爸去。

后来我才明白，我妈要自杀，要是人家打来，她把我放走，让我跑，她就自杀。可是，我至今不明白，蓝天蔚的军队为什么不打就走了，这事就这样平了。那时，在新民府，我父亲也驻有一小部分军队。

还有一件事，就是赵尔巽的儿子赵世辉是怎么出世的，我顺便讲给你听一听。

他的小名为什么叫添世，你可以问问他。赵尔巽这个老头很有意思。他有个姨太太，那天晚上，他对她说，明天我就要死了，今晚我要十一下，但愿能生个儿子。赵尔巽那时没有儿子，结果，后来就得了这么个儿子。他这儿子后来竟成了我的妹夫。

通过这件事，赵尔巽对我父亲非常看得起，我父亲后来能起来，就是赵大力提拔的结果。

然而，一波方平，一波又起。以奉天省咨议局议长吴景濂为首积极酝酿策划独立，不料，情报又被张作霖探知。

十一月十二日下午，省咨议局开会，张作霖带了一批武弁入会，又把其心腹张作相、张景惠等人密布会场各处，准备伺机而动。

“我们为了响应武汉革命，应立即成立奉天国民保安会，推请总督为会长，发表宣言，脱离清廷独立。”吴议长宣布开会后，单刀直入地说道。

我父亲这时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忽地站起来，把手枪“叭”地放在桌子上，说：“我不赞成！”在主席台上动了枪，这还了得。这时，吴景濂、蓝天蔚等人一声不响，大家都哑口无言。我父亲一看场面被镇住了，就继续说道，我张作霖有枪有人，只要是对地方有利的事，我张某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天，我们一定得尊重总督的意见。

吴议长等人发现周围的便衣军官怀中都藏有手枪，不得不屈服。会议决定，不发表独立宣言，仅把黄龙旗降下，改升黄色旗，去掉预定在旗上写的“光复”两字，仅留“奉天国民保安会”字样，并通电吉、黑两省如法炮制。

会上，赵尔巽被推为会长，仍掌东三省大权，张作霖任“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而蓝天蔚则被撤职，后流落上海。

这样，清廷的老家也终于“革命”了，十一月十二日这天，不能不算是东三省宝贵的“革命”纪念日。

然而，同盟会领导人张榕并不满足这一“革命成果”，他暗中筹建了“联合急进会”，准备在奉天举行武装起义。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张榕等人也加快了起义步伐。但赵尔巽与袁金铠密谋，并串通张作霖，秘密制定了暗杀计划。

一月二十日晚，袁金铠将张榕骗到奉天小西门德义楼赴宴，席散后，袁金铠在前走，张榕随后。这时，张作霖事先埋伏的杀手连开三枪，将张榕击毙。与此同时，张作霖又派兵查

抄了张榕住宅，逮捕其家属，抢掠财物，诛杀革命党人不下数百，陈尸累累，惨不忍睹。

蓝天蔚被逼走，张榕被暗杀，张作霖以铁血手段摧毁了革命党势力，深得赵尔巽赏识。三月十日，袁世凯上台，得知东三省没有宣布独立，张作霖功不可没，多次给予嘉奖。

三月十六日，赵尔巽摇身一变，改任中华民国的奉天都督，张作霖更加死命效力，一跃而成为奉天最高军事首脑。

在这场重大变革中，张学良与其姐弟随着庶母卢夫人进住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奉天城，从此眼界大开。

袁世凯大权独揽之后，张作霖所部被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他本人晋升为中将师长，驻防奉天一带；冯德麟部编为陆军第二十八师，冯德麟本人任中将师长。两师的成立，标志着奉系军阀就此诞生。

然而，区区一师长，对张作霖并无太大的诱惑，他的政治目标是先称霸奉天，尔后再当“东北王”。

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谈何容易。他上有袁世凯亲信、奉天督军张锡銮和段芝贵的掣肘，下要与势均力敌的对手冯德麟暗斗；内有派系相互倾轧，外有日本势力横加干涉。

征途坎坷，荆棘遍地。但张作霖隐忍持重，深谋远虑，以权谋为先，以武力为本，开始以灵活的策略，游移于各方对手之间。

“我深知日本在满洲有许多特权，日本方面如果对我有何吩咐，我一定尽力而为。”自一九一二年起，张作霖便积极开展了对日外交，引起日方高度重视。

在对付老奸巨滑的袁世凯方面，张作霖则采取既讨好又抗拒的两面手法；而袁世凯对张作霖也想恩威并用，既利用，又制约。



任民国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时的张作霖。

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袁世凯委派其心腹段芝贵出任奉天将军，兼任东三省巡按使。段、张之间貌合神离，段芝贵施调虎离山计，欲将张作霖调离东北。结果，翌年二月，袁世凯明令张作霖南下征战湖南。而张作霖却一不作二不休，以同意南征为名，骗得粮饷和军械，然后一翻脸，高喊“奉天人治奉天”，开始着手驱逐段芝贵。

张作霖的驱段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他与冯德麟密谋，让冯德麟先以武力逼段芝贵，他则大造舆论，遥相呼应。

一天晚上，张作霖先令自己的军队打了一阵乱枪，然后向段芝贵急报：“不好了，冯德麟的部队进攻奉天了！”

“那该怎么办？”段芝贵张皇失措地问道。

“不要紧，我有防备。”张作霖安慰道。

“冯部把他的二十八师开过来了，我也没有办法了。”次日，张又向段告急，并恐吓道，“冯德麟此次要来惩办帝制祸首。”

形势危急，段芝贵慌忙取官款二百万及军火若干，乘专车急驰北京。而张作霖为表欢送，又赠以大批珍贵礼物。

可是，当段芝贵的专车一上路，张作霖又电告冯德麟采取行动。冯德麟迅即派兵截车，扣压段芝贵所携巨款及军火，致使段芝贵狼狈不堪，窘态百出。张作霖见目的已达到，乃以正人君子的面孔出现，为段芝贵说情，使段芝贵的专车得以继续南下。

段芝贵回京后，面陈袁世凯。袁世凯知外地人赴奉主政已不可能，决定从张、冯两人中任选一人为奉天将军。当袁世凯征求段芝贵的意见时，段芝贵对冯德麟的进逼使自己丢了乌纱帽万分恼怒，极力推荐张作霖继任。

一九一六年四月十九日，袁世凯正式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而冯德麟仅出任巡按使军务

帮办。

六月六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归天，北京政府改革官制，张作霖改任奉天督军兼省长。以此为标志，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开始形成。

张作霖称霸奉天全省之后，颇重文治武功。他在原绿林兄弟已有势力的基础上，又容纳一批军校出身的新派，同时也网罗了一批官僚政客，协助其治理奉天军政。

然而，冯德麟自认是绿林老前辈，且早年张作霖曾一度投靠过他，自然不甘屈居下风，暗中准备与张作霖一决高下。

恰巧，此时张作霖兼任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发生了内讧，冯德麟便推波助澜，乘机摊牌。

原来，张作霖重用文官王永江，命其整饬军纪，遭到旅长汤玉麟的激烈反对。汤玉麟一怒之下，联络团营长酝酿叛乱，但团营长认为反王永江尚可，背叛张作霖则万万不干。汤玉麟自知闯祸，忽率二百余人逃走，张作霖当即派张作相率骑兵追击。不料，冯德麟派出旅长张海鹏接应汤玉麟，并掩护汤玉麟逃往新立屯。

冯德麟的如意算盘是，利用“汤变”机会，里应外合，掀翻张作霖，然后升吴俊升为二十九师师长，汤玉麟为二十七师师长，张海鹏为二十八师师长，自己当“奉天王”。

张作霖则先下手为强。他安定了二十七师，又增编了二十九师，任命吴俊升为师长。紧接着，他又暗中派于冲汉前去策反冯德麟二十八师的旅长汲金纯，釜底抽薪。

部署既定，一九一七年五月底，张作霖调第二十七、二十九师向新立屯进发，声言要调换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及旅长张海鹏。冯德麟鉴于内部有变，又惧于两师压境，徬徨之际，适逢张勋复辟，冯德麟即率张海鹏赴京参与复辟活动。

事变后，张作霖亲自兼任第二十八师师长，后委任汲金纯

接任，于是，奉天省的军权得以统一。

后来，汤玉麟还是回来了，他自个儿回来认罪了。这个人粗野得很，他的外号叫“汤大虎”。“虎”不是指威风，也不是蛮，是指糊涂的人。大虎，意思是混，混人。

安定奉天省之后，张作霖开始兼并吉、黑两省。

此时，黑龙江省督军许兰洲部发生内讧，张作霖乘机派孙烈臣前去调停，欲在乱中夺权。八月，段祺瑞举荐其部下鲍贵卿为黑龙江省督军兼省长，张作霖顺水推舟极表赞同，因为鲍贵卿是张作霖的同乡，两人又是儿女亲家。于是，黑龙江省军政大权轻而易举地落入了张作霖之手。

一九一八年九月七日，北京政府屈于张作霖的军事压力，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总揽东三省军政大权。

殊料，当时吉林省督军兼省长孟恩远以老前辈自恃，无视张作霖之调度，张作霖便唆使吉林民众上告孟恩远纵兵殃民，恳请国务院罢黜其官职。不久，北京政府授予孟恩远一个“惠威将军”的空头衔，令其去职，调任鲍贵卿为吉林督军，孙烈臣为黑龙江督军。

至此，张作霖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北王”、“张大帅”，这标志着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的最后形成。

张作霖虽为绿林起家，但决不是猛张飞式的人物。他长于权谋，知人善任，礼贤下士。在他当“东北王”时，传有不少轶闻趣事。

有一年春节，张大帅独自在督军署漫步，见一人不回家过年，独自练字为乐。他详问缘由。那人说，离家太远，把路费省下寄回家，家里过年更宽裕，不也很好吗？

“那为何不到亲友家消遣？”张大帅问道。

“外面消遣，浪费金钱，卑职喜写字，亦是消遣也。”

“好小子，有出息！”大帅闻言，赞不绝口。

年后，大帅亲授此人一顶乌纱帽：赴哈尔滨某税务局当局长。



任安国军政府大元帅时的张作霖，摄于中南海。

张大帅曾规定："帅府重地，门禁森严，午夜一过，任何人不许进出。"不料，某日大帅迟归，在门外高喊："我是大帅，快开门！"

"你是大帅也不行，大帅早有话，过了时限，任何人不得进出。"值更者答道。

翌日，大帅召见，守更者原以为大帅会震怒，急忙跪地请罪，不料大帅哈哈笑着说："快起来！好小子，妈拉个巴子的，你不开门，是真听我的话呀，有出息！这样吧，你去接任模范监狱的所长吧！"

我父亲有雄才。

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总统。我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我父亲这人有雄才，大略不如蒋；介公有大略，雄才不如我父亲。

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我可以讲个例子给你听。有一次，我父亲被人扔了炸弹，三个人联合炸他。我父亲幸免一死，可那扔炸弹的有两个人被自个儿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你为什么要炸我？我跟你无怨无仇！"我父亲问他。"因为你要复辟，你跟张勋两个人开会，要搞复辟，所以我们才炸你！""这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参加复辟，我还反对复辟。"我父亲说。"很可惜，我那两位伙伴牺牲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恨复辟！你要复辟，我就要炸死你！"那人说道。"好！如果真是这回事儿，那你误会了，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我是搞复辟的，那你再回来炸我！"就这样，我父亲把他放了。

王铁汉将军曾这样评价张作霖："张雨亭先生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汤玉麟以后认罪，又被派为镇守使、旅长、师长，后官至热河都统。冯德麟在复辟运动失败后，张仍能为之解脱，接回沈阳，并派充三陵都统。张海鹏经人疏解，也重新被委任为旅长、师长。朱庆澜清廉有政声，仍被请回，任东三省哈尔滨特别区行政长官。他那种风仪，颇为那个时代的人所景仰。"

第四章 翩翩少帅

1914.6

——“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

——“我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

——“余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那时，我们住的地方叫新民府，当时铁路就修到这里，还没有修到省府，新民府离省城还有一百二十里地，所以那时新民府很发达。

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说，这是啥玩艺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

吃。

张将军对唐教授回忆了孩童时的趣事。

一九一一年，十一岁的翩翩少年张学良怯生生地从新民府来到了奉天。

随着张作霖的飞黄腾达，张学良搬进了大帅府。当他站在帅府门前时，不由地惊呆了：大门对面立着一座大照壁；外门两侧墩放着石雕抱鼓石，前有一对威风凛凛的石狮雕像；青石垫铺的门阶，宽敞整洁；滚圆高耸的廊柱，威严壮观；而遮阳生阴的青瓦屋檐，朱漆雕花的镂空柱子，又平添一股灵细的秀美。

"啊，好气派！"张学良不禁赞叹道，这不跟画上的那些王公贵族之家一模一样吗？是的，父亲是个很能干的人，是个英雄，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会升迁这样快。

张大帅虽身为封建军阀，但毕竟是苦出身，对妻室儿女要求相当严格。在帅府里，孩子们可以上学读书，可以在府内庭院里玩耍，但不许他们出入茶楼、酒馆、戏院，更不许任何人在外面仗势欺人，惹事生非。

张学良的妹妹张怀英回忆说："我父亲思想封建保守，在家里，有很多禁令。特别是对女儿们管教更严，他要求我们文静，不许出大门，不许穿印度绸，不许剪发。可是，我们大哥却敢于突破父亲的禁区。是他，领着我们在帅府里'藏蒙蒙'；是他，每年七月十五领着我们去小河沿看放灯；是他，冬天指挥我们堆雪人打雪仗。"

张作霖共有八子六女。八子是：长子学良、次子学铭、三子学曾、四子学思、五子学森、六子学俊、七子学英、八子学铨；六女是：长女冠英、次女怀英、三女怀瞳、四女怀卿、五女怀曦、六女怀敏。

当年，十四岁的张学良是这支十几人队伍的头头。弟弟妹妹对他十分尊重，也很听他的话，他对他们也很严格，有差错



张学良与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俊、学英、学铨七个弟弟合影。

就管教，兄弟姐妹间相处和睦，从不分什么嫡庶，也不摆少爷、小姐架子。

大帅府的三少爷学曾最爱逗蛐蛐。有一次，他差孙大虎出府帮他去捉。不料，大虎与大西关税捐局周局长的公子发生争斗，双方一场恶战，大虎被周家仆人痛打了一顿，又被扭送到五斗局派出所。

所长一看，嗬，一穷小子竟敢对周少爷大打出手，这还了得。二话没说，拿出一根皮带对着大虎劈头盖脸地抽打起来，两个巡警也一拥而上，大虎被打得嗷嗷惨叫。所长怕出人命，连连摆手喊停，说道："押起来，找保再出去。"

大虎冷笑着拿起电话说："好，好，我找保，我要七十九号！"此话一出，在场的人都傻了眼，知道此人真的是有来头的。


张学良的六姐妹冠英、怀英、怀瞳、怀卿、怀曦、怀敏合影。

“这还了得，你们简直没有王法了！”当三少爷学曾乘车直奔派出所，见到鼻青眼肿、口角流血的大虎时，怒气冲冲地对所长喝斥道。

“请三爷息怒，求三爷息怒，这完全是误会。”所长连忙赔罪，并上前替大虎松绑。

“啪！啪！”大虎给了所长两耳光，抖起精神骂道：“我说

我是帅府的，你们不信，还说二爷顶个屁，你们不是说谁也不怕吗？”正闹得热火朝天时，桌上的电话铃响了。

“是学曾吗？你马上带人给我回来，一切由我来处理。没啥好说的，快回来！”这是张学良的声音，口气坚决。

翌日，张学良亲赴派出所，向所长一再道歉：“帅府子弟缺少家教，给您添了麻烦，特来赔礼。”所长闻言，惭愧不已，对帅府子弟的风范倍加称赞。

我向弟妹们讲家风时曾说过：为人要正派，千万不要仗势欺人。我们要和老百姓讲团结，才能给老张家增光，否则，只能给爸爸抹黑。爸爸太忙，年纪大了，有时顾不过来，我要替爸爸管教你们。我是大哥，你们要听我的话。

我十五岁那年，有一次，我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爸爸笑了，说：“你那几个钱算什么玩艺？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爸爸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我能挣，而且比你挣得多。”我父亲看着我说：“你好大的口气！”

原来，我姐姐跟我第五个母亲不大和睦，她写了一封信给我父亲，诉说了我们家中种种不公平的事，我父亲看了又生气又难过，便把我找去，把信给我看了，并对我说：“好吧，我待你们姐弟三人不公平，那给你们几个钱，你们自己去过吧！”我说：“爸爸，你为什么生气？你着什么急？她是一个女的，过几年，她要出嫁，她不是我们张家人。而我不一样，你看我，我是你儿子啊，我跟你说过这样的一句话吗？没有！你为什么要生气啊！你要看我啊，你管那个干什么？你不要理就得了，她过两年就走了，你有事跟我说，我都十五六岁了。”听我这么一说，我父亲觉得我这个人很怪。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奉天城，已发展成东三省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发展成一个与列强关系和利益相当复杂的国际城市。年轻的张学良就在这一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逐渐扩大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九一七年六月，张学良加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外国学者和教育家，以及一些英美籍的朋友，其中，任青年会总干事的美国人普赖特成为他的终生密友。

我受西方教师与朋友的影响，超过本国师友。这个人叫普赖特，我为什么现在也叫这个名字呢？这也是仿照他。我参加青年会活动时，这个普赖特在青年会演讲，这个人影响我的后半生。还有一个张伯苓，他们两人对我影响最大。

在基督教青年会里，张学良一边汲取西方文化，一边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有一次，青年会为赈济河北水灾举行义卖，据有关资料记载："张学良身着紫色上衣，在会场往来穿梭，十分活跃。他手拿大把物品，逢人必劝购，他高呼'密斯特'，卖得最多。"

由于青年会办得热火朝天，上海总会的余日章、北京总干事陈敬一、天津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相继来奉天演讲，张学良每次都参加，还在大帅府里盛宴招待。

余日章这个人也很厉害。我跟他见面时，跟他谈话，他说，我看你这个人将来很有些作为。他就告诉我几样事，其一是说，你要尊崇舆论，不要制造舆论。

一次，南开校长张伯苓来奉天青年会讲演，提出一个"中国不亡有我"的观点。

对他演讲的题目，我几乎要上台去骂他："中国不亡有你？"我想，你这个混蛋，你算个什么玩艺儿？可是仔细一听，他演讲的意思就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说大家不要你赖我，我赖你，国家的事，大家都有一份，大家都有责任。我



十五岁时的张学良。

受他的影响很大。

所以，后来张学良曾著文写道："幼时对国家异常悲观，以为中国将从此任列强之宰割，无复希望矣。及于辽宁青年会聆听贵校校长张伯苓先生《中国之希望》之讲演，中有'中国之希望不在任何党派，亦不在任何官吏，而在每一个中国人之奋发图强，努力救国'云云。我闻此大悟悲观之非当，乃立誓本个人之良心，尽个人之能力，努力以救中国。我之有今日，张伯苓先生一言之力也。"

在结交外国朋友方面，少帅与老帅截然不同。老帅交往了不少日本朋友；而少帅的英美朋友众多。从张家父子的政治生涯上看，老帅一直未能摆脱日本人的纠缠；而少帅在重大的行动中，多受欧美朋友的影响。

当时，在大帅周围，负有政治使命的日本人经常来来往往，日本的谍报网也如同蜘蛛网一样笼罩着张作霖。年轻的张学良几乎每天都可见到日本人的身影，特别是在军营里，以松井中佐为首的日本顾问，晃着肩膀，昂首挺胸，张学良对此极感厌恶。尤其是日本教官浦岛义一经常宣扬日本民族优越论，态度异常傲慢，张学良对他更为反感。

"浦岛，我父亲用重金聘你，并不是叫你来宣扬你那一套陈词滥调的！"张学良喝斥道。

当年，奉天街头，日本浪人到处乱窜，日本女人花枝招展，甚至身着浴衣招摇过市。我那时就认为，在中国街头出现这种景象，简直是一种国耻。

可见，少年张学良的爱国意识多么强烈。

少年时代的张学良，在忠孝仁义儒家传统思想基础上，除接受了较深的西方文化的熏陶外，同时，还受到老庄的淡泊、达观思想的影响。因而，自由、平等、博爱、和平、友爱、容忍等观念，他兼而有之，佛、耶、老三种思想，则混为一体。

胸襟坦荡，忠厚义气，简朴清廉，是少年张学良所拥有的美德，当然，这与他良好的家教息息相关。张大帅自当上奉天督军后，尽管成为豪门贵族，但仍治家严谨，生活并不奢华。

张学铭先生曾回忆说："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和我们兄弟几个在一桌上吃饭，平时经常吃高粱米粥和馒头，逢过年才能吃上酸菜白肉等好的饭菜。有一次喝高粱粥，我大哥学良不爱喝，让老将打了一筷子，老将斥责我们说：'妈拉个巴子，当年你老辈若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冻死吗？'从此以后，我们吃饭谁也不敢再挑食了。"

张大帅良好的家教，对少帅的一生有很大的影响。

你知道吴俊升，吴大舌头，他是谁吗？他是我五弟的干爸，我们喊他吴大爷。过年了，他来给我父亲拜年，我们也给吴大爷拜年。这时，他给我们每人五千块钱的一张票子。我父亲一见就火了。我父亲管他叫吴大哥，他说："哎，吴大哥，你这是干什么？"吴说："过年了，小孩子拜年，给几个钱，没什么的！"我父亲说："你给他们点儿钱，没什么，可你不能给他们那么多钱。"吴俊升说："大帅，我的钱，我的一切，还不都是大帅给的吗？都是你给我的！"我父亲这时蓦地把脸绷了起来："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这是说真话？"吴一见我父亲把脸沉下来了，忙说："我哪能说假话？"我父亲说："你既然这么说，那你不要这样子，你回到黑龙江去，你好好做事，别让黑龙江的老百姓骂我的祖宗！"

那吴俊升趴在地上给我父亲磕头，我就站在旁边，真有点毛骨悚然。我父亲对他们够严厉的啦，你听他这话，多厉害！那时，吴俊升当黑龙江的督军，他在那里名声不太好。

张学良气度恢宏，待人宽厚，文采风流，平易近人。他虽然背景特殊，环境优越，但他丝毫没有名门子弟那骄奢、贪婪的不良作风，也没有同时代贵公子作威作福、横行霸道的恶劣

行径。

当时，张作霖之子张学良，张季直之子张孝若，段祺瑞之子段宏业，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为国内外知名的“四公子”，然而，对中国现代史，乃至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有一定影响者，“四公子”中惟学良一人也！

对儿女的婚事，张作霖管束甚严，完全按照封建礼教办事，认为必须听命于父母，不得有丝毫违抗。张学良十六岁时，便由父亲包办，同辽源富商于文斗的女儿、比他大三岁的于凤至小姐喜结良缘，做了少年新郎。

第五章 凤命千金

1916.4

——“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

——“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

——“我要是真的娶了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

——“那时都兴认干娘，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

那时，人家对我父亲都敬而远之，都叫土匪军队，都怕我父亲。但辽源的商会会长于文斗，后来就是我的岳父，对我父亲非常好，他慧眼看中了我父亲。他说我父亲可不是平常人，将来一定会有大发展。就这样，我们两家订了亲。我太太比我大三岁，那时，我根本不知她长的什么样儿。由于算是包办婚姻，我跟我的原配太太不是那么太合得来。

于凤至，一八九七年五月初八生于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原籍山东海阳县司马庄，祖辈逢灾荒年闯关东，在郑家屯落了户。

在这方圆十余里的小镇上，其父于文斗先是靠着一部破马车起家，后又经营当铺、粮栈和丝坊，买卖越做越大。在那兵荒马乱的年代，土匪绑票时有发生，为避风险，于文斗把家眷安置在大泉眼村，于凤至在此度过了她的童年时代。

当时，张作霖奉命剿办蒙匪，曾一度将他的指挥部设在于文斗的粮栈中，两人过从甚密，遂成好朋友。

有一次，张作霖中了蒙匪的奸计，困于荒漠深处，奉天督军徐世昌又迟迟不发救兵，张作霖只好孤军苦战，危在旦夕。在此紧急关头，幸亏于文斗连夜向吴俊升告急，吴俊升派骑兵救张作霖脱离重围。于是，张作霖和于文斗结成拜把兄弟。

关于张学良同于凤至的婚姻起源，于凤至的侄子于兆瀛有详实的回忆。他说："有一天，我祖父请来一位算命先生。按照祖父的吩咐，每个人要有各自的卦。刚算完卦，忽听外面报称：'张统领到。'接着，我祖父就和张作霖谈了起来。"

谈话时，张作霖无意中翻阅卦帖，当他翻看其中一个卦帖时，上面写着于凤至生于一八九七年，属凤命。

"凤命"二字使父亲眼睛为之一亮。他连忙仔细地打量了正在倒茶的凤至。但见凤至身材颀长，五官端正，特别是脸上一双动人的凤眼，更显得端庄大方，精明能干。父亲满意地看着她，自言自语道："凤至，好吉祥的名字啊！凤命，乃吉人之命。凤至，凤至，直到皇后为止。那么，和她结合的人，一定就是皇帝了。"

"原来，姑母卦帖中的'凤命'引起了张作霖的赏识，原因是他很迷信，认为'将门虎子'与'凤命千金'是难得的姻缘。还未等祖父答话，他又说，我手下有个人，对阴阳八卦、



于凤至一九二〇年留影。

麻衣神相无所不通，让他再给核对一下，看那先生算的对不对。当时，我祖父也没当回事儿，就让张作霖把我姑母的卦帖拿走了。”于兆瀛回忆说。

不出三日，张作霖就托粮栈掌柜张杏天来于家提亲。

原来，张作霖回去后找他的下属认真地推算了一番，确认将门虎子配以凤命千金，乃是天造地合之良缘。

此时，张学良才八岁，于凤至十一岁，女大男小不合常规，于家为此颇为踌躇，张作霖便又请好友显泰说情，从中玉成。结果，终于如愿以偿，张、于两家订了娃娃亲。

为了让于凤至将来做好少夫人，于文斗特意将于凤至送到奉天女子师范学校深造。凤至天资聪慧，以优异成绩毕业。

和一般年轻人一样，张学良当时脑海里充满了婚姻自由的想法，对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持反对态度。

“你的正室原配，非听我的不可。”张作霖对儿子规劝道，



"你如果不同意旧式婚姻，你和于家女儿成亲后，就叫你媳妇跟着你卢妈好了。你在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

话说到这份儿上，张学良只好遵从父命。

一九一六年四月，于凤至与张学良结为伉俪。婚后，于凤至以其雍容大度、贤淑聪慧，渐渐赢得张学良的敬重。两人兴趣相投，相敬如宾，体贴关怀，感情日益融洽。

至于张大帅，对这位大儿媳妇更是宠爱有加。

张作霖治家严谨，大帅府里的规矩很多，也很严。比如说开饭，张作霖就规定："过了晚上九点钟，不管是谁，厨房一律不候。"

有一回，刚过晚九点，大帅正在小青楼和五太太闲聊，听见厨房里大勺丁当响，连忙问道："给谁开饭？"下人回答说："是卢夫人外出回来，想吃点夜宵。"张作霖说："不管是谁，今后过了晚上九点，不准给他们开饭。"

可是，有一年夏天，于凤至和二小姐张怀英去看戏，晚上十点多钟才回来，就让厨房给准备点宵夜。在朦胧的月色里，张作霖见一个厨师提着食盒走来，大声喝问道："这么晚了，给谁送饭？"厨师怯声答道："报告大帅，少奶奶和二小姐看戏才回来，还没有吃饭呢。"张作霖一听，忙说："好，好，快给她们送去吧。"

这时，坐在一旁的五太太寿氏边摇着芭蕉扇边笑着说："大帅，您不是说过开饭要守时，不管是谁，过时不候吗？原来大帅您也是看人下菜碟呀。这回您怎么啥也没说，还让厨师赶快送去呢？"

"好厉害的五太太，专揭人的短，连我也不放过，"张作霖一听，哈哈大笑地说，"你真会挑我毛病，凤至这孩子，自从过门来，很少有不守纪律的时候。"

大帅府里，人口众多，交结广泛，关系复杂。

我们过年，从大年初一起，到正月十五，甚至到二月初二，没有什么别的，就是吃饺子。吃饺子这玩艺儿很有道理，很有意思。我们吃饺子，家里有自然的冻箱，天冷嘛，我家包饺子，一包几房子，那屋子像冻箱一样。谁来了，就去拿饺子煮煮吃，这很有趣，你半夜来了，就拿着去煮，照样饿不着。

"很多人来排着队包饺子，几间屋子包的统统是饺子。"访谈时，赵四在旁补充说。

我们到了过年，没有别的，就是赌钱。什么人都来，我家里来的人很多，我现在简单地说一下，看我这个家有多大。你知道，我家厨房有多少人，恐怕你不知道吧，七十个！你就知道我家吃饭的人有多少吧，不仅是我家人自己吃，谁来了，都在我家吃。

就在这样的一个帅府大家庭里，于凤至却上上下下都能融洽相处，帅府中有些大事，老老少少也都愿意同她商量，求她帮忙。许多事情，也非得由她出面张罗，才能圆满称心，皆大欢喜。

大帅府规定，除张作霖之外，其余的人都不许公开过生日。可是，有一年，四太太许夫人的儿子张学曾认为，二十多年来，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自己，在这笼子般的大帅府里熬白了头，今年说什么也得公开地给母亲过过生日。

"每年二月十二为大帅祝寿以后，别人是从不办寿的，如今我的生日硬办了，他要发起脾气来，这不是讨苦吃吗？"许夫人对儿女们说道。她前思后想，还是决定不办了。

"妈，我有办法了，找大嫂子去。"张怀瞳说道。

"今天我请你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件事。就是我生日快到了，学曾、怀瞳他们想替我办一办，我是怕大帅不让，故此先和你商议一下。"许夫人对凤至说。

"这事爸爸不会反对，自己办，又不花公家的钱，有啥不

可以？”于凤至说，“况且，您又儿女双全，绝对应该好好地庆贺庆贺。姨妈，我来张罗怎么样？”

于凤至一席话，说得许夫人心花怒放。后来，张作霖终于同意了。

自从许夫人办了寿宴，在大帅府里，夫人们过生日祝寿算是开了头，不过张作霖有话：“办寿可以，但要自掏腰包。”

“这回可好了，爸爸同意给夫人们办寿了。咱们可要好好地给卢妈办一办，这么多年来，数她老人家最辛苦，上上下下哪一样不是她操心！”卢夫人的生日快到了，张学良和于凤至私下商量道。

卢夫人性情温和，对上对下都像菩萨似的，帅府里的人对她都很敬重，一听说是卢夫人要过生日，大伙都愿卖力操办。

当寿宴开张之际，大帅张作霖走了进来，他从怀里掏出一个红纸包递给卢夫人，还风趣地说：“我知道寿萱最喜欢的就是现大洋，这是一百元，请收下。”卢夫人接过喜钱，上前对丈夫拜了又拜，说：“谢大帅，让您破费了。”

张作霖见儿媳于凤至将寿宴操办得井井有条，非常满意，就对卢夫人说：“凤至这孩子，办事就是周到。”卢夫人回答说：“敢情，谁也比不上！”

于凤至见人都到齐了，就吩咐一声：“上菜！”丫环、老妈子们川流不息地一阵忙活，不大一会儿，四桌鱼翅席摆放齐整，热气蒸腾，香味扑鼻，除鱼翅、海参、鸡、鸭、鱼、肉外，还有蛎子、虾，最后上来的是“清汤全家福”。

张学良第一个站起来，说：“今天是卢姨妈的寿诞之日，可巧爸爸也赶来了，我们家今天人最齐全，让我们举杯共祝卢姨妈健康长寿。”说完，他带头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接着，于凤至也站起来，从大帅开始，一一斟酒，一家人在欢乐的气氛中开怀畅饮。

实际上，于凤至也是张学良事业上的好帮手。

我常跟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为什么呢？我跟你说说这个道理，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



张学良与夫人于凤至一九二〇年留影。

当年，张学良废寝忘食地忙于军政，责任重大，担子沉重，在这种情况下，于凤至既体贴丈夫，在家中做一名贤内助，又积极协助丈夫，做大量有利于东北建设的社会工作。

张学良同于凤至育有四个子女：女闾瑛，子闾珣、闾玗、闾琪。其典故出自于《尔雅·释地》："东方之美者，有医无闾之珣玗琪焉。"

她生这第四个孩子的时候，得了很重的病，爬不动了，是不治之症。那时，她母亲还在。我岳母就和我的姨妈商量，说我太太有一个侄女，就要我娶她这个侄女，以便照料她的孩子。我跟她们说，她现在病得这么厉害，我要是真的娶了她的侄女，那我不就是这边结婚，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中多难

张学良夫妇与子女在一起。

过。我说这样吧，这事我答应，如果她真的死了，我一定会娶她的侄女，你当面告诉她，她自己要愿意，愿意她侄女给她带孩子。她后来没有死，所以，后来她放纵我，不管我，与这事多少有一点关系。

“于夫人跟宋美龄是结拜姊妹吗?”唐教授问。

这倒不是。她随我到南京时，又到了上海，我的太太拜宋老太太为干娘，那时都兴认干娘，我太太是宋老太太的干女儿。



于凤至一九三〇年留影。

在张学良的坎坷人生中，雍容大度的于凤至与他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第六章　演兵习武

1919.3

——“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

——“那时我年轻，才十九岁。后来才知道，张作相存心要提拔我。”

——“我也很奇怪，我喜欢当医生，没有想到我救人没成，反倒变成了个杀人的。”

我父亲原本想造就我成为一个文人，而我原打算要学医，到现在我还喜欢医生这一行。我父亲他也没有说不赞成，可也没有说行，我也没办法。

世人多以为张学良一直把他的军人老子视为偶像，而张作霖一心一意想要他儿子成为“将门虎子”。其实，事实上未必其然。

你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适合干什么？我愿意干自由职业，

如当个医生，画个画儿什么的。总之，干个随随便便的职业。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

还有，我说这个你别笑话我。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即英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儿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

后来，我又立志学造药。那时候，我是想干这一行的，我父亲这人很有意思，他不说同意，也不说反对。后来，我曾一度想入奉天日本医学院学医。

当然，我当了军人，现在我也看到了，不但与我父亲有关，与东三省有关，甚至与世界上的变化都有关系。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么多的事，这说起来话就长了。所以，我说，这都是上帝的旨意。

"汉公，你年轻的时候，不是要到美国去留学吗？"唐教授问道。

是啊。我那时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我的美国朋友普赖特，极力赞成我去美国的，为此，我都想逃走。那时，他把船票都为我买好了，我到现在还记得，七十块美金买一张船票。这钱是我自个弄来的。普赖特跟我很要好，他说，你若到了美国，当学生是不可能再做事的，那我就把你介绍到教会人的家里住，这样，你省钱呀，然后，你再帮帮忙干点儿什么。

我还认识一个人，叫陈英，当时任奉天车辆局局长。那时，我身体不太好，还常吐血，我真没想到我会活这么大的岁数。陈英说，你这是肺病。我是上了他的"当"了，这家伙对我说，你的身体很弱，英文也不怎么好，数学这一套你都不懂，你上美国去能行吗？再说，你要走了，不与你父亲商量商量，多么伤他的心，多不好啊。

他说，我给你出个主意好不好？你就跟你父亲说，你要去美国学军事，那他一定很愿意。你只要到了美国，他能管得着

你学什么吗?

我一想，这主意不错，就跟我父亲说要考军官学校。结果，美国没有去成，反而决定去报考保定军校。我们是由段芝贵保荐的，由于考期已过，校方特意为我们四人另外加考了一场。考试时也真绝，我们四人互相对抄。但数学四个人都不会，主考官一看急了，赶紧拿出去找人代写，结果，我们都考取了。但后来我没有去就学，改入了东北讲武堂。如果去了，那就是第八期，与陈诚是同学。

张作霖是以枪杆子起家的，深知枪杆子的重要性。

一九一九年二月，时任东三省巡阅使的张作霖，因增编陆军需要大批军官，便重建军校，定名为东三省讲武堂。张作霖自任监督，东三省巡阅使署参谋长张作相兼任堂长，熙洽任教育长，张厚琬为总队长。校址设在小东门外，学员名额为二百人，学制一年。

"妈拉个巴子，只要你们是人才，不管你们是哪里来的，我都用。只要你们好好地干，除了我老婆以外，什么都可以给你们，我决不亏待你们。"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的训话颇有特色。

我入东三省讲武堂，是给我父亲激的。我跟我父亲一说，父亲大吃一惊，他说："什么，你要上讲武堂？你别给我丢人了，你去不几天干不了，又出来了，那不是给我丢人吗?"我一被激，就说："人家能，他们能干得了，我为什么就干不了?"我父亲说："好，你若能在讲武堂毕业的话，你出来我就给你个团长当当。"

我父亲教训我一句话，他问我，你真要当军人吗？他说，你要想当军人，就要把脑袋拉下来拴在你裤腰带上。他那意思就是说，不一定是被打死，也许是被长官处死，要干，要当军人，你就要把死字扔开，所以我脑子里一直没有这个"死"字。



一九一九年时的张学良。

张学良志愿入炮兵科学习。学习期间，他决不以身份特殊自异于同学，而是自觉遵守校规，尊敬教官，团结同学，刻苦训练。

有一次，时值隆冬，学校决定全副武装赴野外进行战斗演习，张学良也随队参加。沿途，先演习攻击、防御、追击、退却等动作，继之在野外演习露营及“阵地彻夜”。待到天明，指挥部又命令迅速向省城方向“转移兵力”，要求“跑步前进”。这时，落伍者甚多，而张学良不但没掉队，还兴致勃勃，毫无倦容。

又一次，教官郭松龄同张学良等赴开原、铁岭一带参观日本关东军的实兵演习。当时天寒地冻，又住在野外，据郭松龄讲：“张学良仅以一毯度此寒夜，其忍苦耐劳精神和抱负之雄壮，实系大有可为。”

颇有容人之雅量，也是张学良在讲武堂表现出的美德。他性格豪爽、活泼、诚挚、热情、诙谐，喜开玩笑，遇有性情粗暴的同学偶尔反唇相讥或报以拳脚，他也能忍受，不与计较。有一天，他同一名叫曾钟策的同学开了个玩笑，对方骤然变色，骂他为“胡匪崽子”，在场的同学皆感震惊，张学良心里也觉得很不高兴，但他克制自己，未置一词，未施报复。

在讲武堂，张学良结识了教官郭松龄，这对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及东北军的正规化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郭松龄，字茂宸，原籍山西汾阳，一八八三年生于沈阳东郊渔樵寨村。早年曾念私塾，后因家贫辍学，扛过活，种过地。日俄战争爆发后，他投身军旅。一九〇六年，他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后远走四川，当过营长，并加入了同盟会。

不幸的是，张作霖对他并不信任，更不愿重用。在讲武堂开学典礼上，张作霖甚至还语含讥讽地问他：“郭教官，你不是到南方去革命了吗，为什么回来了呢？你还是回来的好，在

外边没有什么混头。”

郭松龄闻听此言，暂忍屈辱，默默无言，但内心却种下了“潜蓄势力，谋取兵权，以图东三省之根本改造”的信念。

郭松龄经仔细观察，认为张学良虽然生长在大军阀家庭，但具有正义感，有强烈的进取心，很有培养前途。于是，他严格要求张学良，辅导好各科军事课程，以使其具有优秀的指挥官才能。

我头一个月就考了个第一，第二个月又考了个第一。为什么能考第一？因为上讲武堂的都是军人，而我是一个学生，同时，我的记性非常强。我现在老了，但那时的功课，我还能背出一些来。

当时学校里闹点儿学潮，忽然传闻考试有人作弊，就让我们调换位子。那时，我们有两个教育班，差不多有一百多人。有一天，老师出了四个题目，结果，除我之外，没有一个人答完全，就我一个人全答对了，我也从不作弊。本来，别人并不太注意我，可这样一来，同学和教官们都注意我了，这郭松龄也看中我了，我就跟郭松龄变成了好朋友。

当然，在讲武堂考第一，并不是我有多大的能力，实在是讲武堂里的学员那时候都是行伍的人，再加上我在讲武堂也是很努力的。因为我这人怕“犟”，这句话你懂不懂？就是怕“激”。我在临进讲武堂之前，我父亲说，算了算了，你别进了，别给我丢人了。这不是讥笑，是实在的话，因那时我身体很不好，我是在进了讲武堂之后，身体才好起来的。

自从我在抽考中将四个题目，就是步、马、炮、工全答对了之后，我在讲武堂那可真是露了头角，出名了。这件事不久便传到张作相的耳朵里去了，他那时任堂长，他看我，照我们奉天的话，就是有出息啊。那时我年轻，才十九岁。后来才知道，张作相存心要提拔我。

奉系军阀集团中分为新旧两派。旧派是和张作霖一起拉杆子、闯天下的旧部，主要人物是张景惠、张作相、吴俊升、孙烈臣、汤玉麟等；新派是随时招收来的军校出身的人才，先是以杨宇霆为首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韩麟春、姜登选等人，后又加上陆大的郭松龄以及讲武堂的张学良等一批少壮派军人。

而新派中，又分为“士官派”和“陆大派”。“士官派”系指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为主的将领，如姜登选、韩麟春、于珍、王树常、于国翰、邹作华、邢士廉、臧士毅、熙洽、何柱国、关玉衡、董平兴等，杨宇霆是首脑；“陆大派”系指出身于北京陆军大学及保定军校的将领，成员有刘伟、魏益三、霁云、范浦江、刘振东等，首脑是郭松龄。

当年，奉军除了张作霖的绿林兄弟率领的一部分军队外，主力部分都分掌在杨宇霆、郭松龄两派手中。杨宇霆与郭松龄才略相埒，专横跋扈亦相似，正所谓两雄并立。

三派之中，最突出的是郭松龄与杨宇霆、姜登选、韩麟春之间的矛盾，张学良只是从中斡旋。这一时期，郭松龄对张学良是相当服从的，张学良对郭松龄也完全信任。

另外，接近张作霖的旧派、士官派，又称“老帅派”；郭松龄为首的讲武堂派、陆大派倚重张学良，被称之为“少帅派”。

张学良自讲武堂毕业之后，有一进日本陆军大学的机会，但终未成行。

我现在是个基督徒，不能信迷信，只能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本来，日本人也看中了我，日本人答应让我进日本陆军大学，我非常高兴。但我不会日文，不过，日本陆大有这么个规定，就是贵族出身的人，可以带着一个人，叫做陪读，可以有一个人伴着。马上就可以进日本陆军大学了，我得意得很。可

是，就在这时候，第一次奉直战争打起来了。要不是这样，假如我上了日本陆军大学，那就有别的变化了，那我就有可能变成日本派了。

进人军界之后，张学良南征北战，少年得志，很快就博得了“少帅”的尊称。

我也很奇怪，我喜欢当医生，没有想到我救人没成，反倒变成了个杀人的。

一九二〇年春，张学良自讲武堂毕业，名列第一。毕业时，他被授予炮兵少校衔，并正式被擢升为奉天督军署卫队旅第二团团长，后又升任卫队旅旅长。不到一年时间，他已荣膺上校军衔，并能独当大任，“出掌方面”了。

第七章 出掌方面

1920.3

——“我从军中起来，完全是张作相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

——“我还没出讲武堂，就提前当上团长了。”

——“日本人总想以势压人，反而促使我反抗，这是我的个性使然。”

张作相是东三省讲武堂的堂长，那时，军权都在张作相手中。你知道张作相吗？我们不是一家的。有人讲，我返回东北有很多的为难之处，就是指张作相与我有竞争的意思。

不，不，没有这事。本来，我本人起来，我父亲当然是扶着我的，但实际上不是，我不是老帅亲手提拔的，我从军中起来，完全是张作相一手把我提拔起来的。

张作相这人对我父亲，可以这样说，他待我父亲，比我对

我父亲还要好。我曾见过我父亲如何对待他，有时候都感到毛骨悚然。他那时都当师长了，我父亲还对他说骂就骂，然而，他却仍旧那样，恭恭敬敬地站在那儿。

张作相与张作霖是两次结拜的把兄弟。张作相于一八八一年出生于锦州义县南杂木林子村，幼时家境贫寒，仅读了三年私塾。十六岁那年，其族兄遭仇人暗杀，他策划打死了仇人，后率十几人逃到双阳甸南山大庙，不久，又流落到奉天，以打短工于泥瓦匠为生。一九〇一年，他率三十余人到八角台投奔了张作霖，张作霖见他性情淳厚，又与自己同姓，非常高兴，就把他收留下来，视如亲兄弟。

在众多的把兄弟中，张作霖与张作相关系最密切。张作霖每次在帅府大发雷霆，张夫人便派人去请张作相来调解，也只有张作相的劝说，他才听得进去。

张作相对张作霖忠心耿耿，但并非愚忠，他敢于直言，因而深得张作霖的信任。张作相常在别人危难之际给人以帮助，因而在奉系中素有"忠厚长者"之称。

我进讲武堂时，我父亲答应我说，你要好好干，我给你卫队营营长的头衔。我在讲武堂当学生，用的就是卫队营营长的名义，因那时调的都是军官。我那时很年轻，不到二十岁，没有任何可顾虑的事，后来才知道，张作相存心要提拔我，我还没出讲武堂，就提前当上团长了。

张作相当时任二十七师师长，并兼任卫队旅旅长。本来他想让出这旅长职务，可是为了我，他不让了。那时，我在讲武堂还没毕业，上第三学期，我就当上他的卫队旅第二团团长了。不但当了团长，旅里的许多事，包括某人上任出进，他都要我来过问，那我也就毫不客气，就等于我当了旅长一样。所以，从我在讲武堂当学员，从我当卫队旅团长开始，我实际上成了张作相的代理旅长，他仅是名义上的旅长，我一直跟在他

后面晋升，直到我自己拿到军权。

他老先生当师长的时候，很节俭。我们那儿，早餐往往搞点鸡蛋把它炒咸了，叫做鸡蛋酱。他老人家早晨吃鸡蛋酱，还留着一点中午吃，炒一个鸡蛋还舍不得一下子吃完呢。

毕业后，我二十岁时就正式当团长了，我那部下还常跟我开玩笑，叫我"黄嘴鸭子团长"，意思就是还嫩着呢。我那个团第二营营长，当年是我父亲的一个号兵，我小时候，他还抱过我呢。而现在，我当了他的团长了。这家伙总喜欢跟我开玩笑。我当团长时，非常认真，外面出操，我就在操场上站着，动都不动。他就说，团长，你回去玩玩儿好不好，你不走，我们也不能走。我总是对他说，你再这样，可别说我罚你啊！后来，这营长在头一场战役中便被打死了，我很想念他。

不久，张作相主动辞去了兼任的卫队旅旅长之职，由张学良正式接任。

张学良虽然生活在旧军队里，但他善于汲取新思想，他看不惯旧军队的恶习，想改造军队，但又经验不足，便意欲倚重郭松龄。他认为，郭松龄有丰富的军事知识，为人正直，会带兵，能打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遂向其父推荐，请求将郭松龄调到他身边任职，辅佐他治军。张作霖也非常希望他的儿子尽快掌握兵权，便答应了他的要求，委任郭松龄为卫队旅参谋长兼第二团团长。

郭松龄上任后，整顿军纪，剔除弊端，淘汰冗员，训练军队，不到一年，卫队旅面目大变，纪律严明，训练成绩冠于各旅之首。严格的训练导致部分旧军官不满，他们纷纷向张学良状告郭松龄。

"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张学良锐意改革，力排众议，斩钉截铁地声明道。

张学良对郭松龄推心置腹，信任不疑；而郭松龄对张学



任东三省巡阅使署卫队旅长时的张学良。

良，则忠心拥护，万难不辞。在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下，郭松龄对卫队旅中那些绿林出身、以善战而目空一切的旧军官进行学、术两科培训，又成立了一个军事连，调各营中下士到连里受训，三个月为一期。行伍出身的下级军官则送到讲武堂学习，使其具备初步的军事知识。

“训练的成绩虽然好，但不一定善战。”一些旧派军官讥讽郭松龄所率未历战阵的部队，仅是中看而不中用。

然而，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爆发，当时作为援军参战的主力就是张学良、郭松龄的卫队旅，结果出师告捷，一时间，赞美之词不绝于耳。

是年秋，吉林、黑龙江两省土匪猖獗，到处为患。原吉林剿匪司令阚朝玺不分良莠，大肆屠杀，民间称其为“阚大铡刀”，民愤极大，张作霖遂命令张学良率队赴吉剿匪。

吉林边地，山路崎岖，丛林茂密，匪徒凭借山险，出没无常。张学良、郭松龄率领士兵全副武装，日行百里，蹈险入深，两人与士卒同甘共苦，军士无不佩服。

当时，一股匪帮占据佳木斯城，深沟高垒，凭险固守，久攻不下。张、郭两人身先士卒，集中兵力，猛扑匪巢一隅，夺门而入，首先登城，友军乘胜出击，城内土匪顷刻溃散，弃城逃跑。

进城后，张学良、郭松龄严肃军纪，一再申令所属官兵不准扰民害民，不准私取民家财物，恢复市面，赈恤难民，所过市井无骚无扰，商民咸庆，颂声载道。

刚入城时，有一连长搜掠大量财物，被郭松龄撞见。郭松龄厉声质问道：“这些财物从何处掠来？”该连长答道：“是土匪所遗弃的。”郭松龄遂厉声说：“匪遗私取，亦违军法。”下令立即枪毙，军士为之怵然。自是，再无敢妄掠民间一物者。张学良对此举大加赞许，匪患平息后，张学良对郭松龄更加信

任，更加倚重了。

土匪中有不少刀口舔血、悍不畏死之辈。张学良部收降了七百余名土匪，编成两个营，但有个人匪性不改，竟仍把肉票藏在军中，被张学良查出后，立即枪决。此人临刑时，自承该死，还把小腿剁下来赔罪，使张学良大吃一惊。但这些并没有动摇张学良严格治军的决心。

有一次，军中两名通译跑到当地妓院白吃白嫖，人家告状来了，张学良下令将此二人在妓院就地枪决，并暴尸不收。但三四天后，妓院受不了了，说死尸摆在那儿，没人敢上门，无法做生意了。

我们剿匪，打仗前一个小时，就下令不许尿尿，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你根本不知道。因为枪栓无法打开，冻上了，不用热尿一涮，就打不开枪栓。

赴吉林剿匪是我实地参战之始，也是我"剿抚并用"、从事和谈之始。

随着奉系势力的增强，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关系更加密切了，他们在一间房里办公，两人睡一铺炕。张学良把郭松龄当做良师益友，而郭松龄认为张学良是难得的知心上司。两人之间，不仅相知，而且相谅。郭松龄的缺点是心胸狭窄，不能容人，同时性情急躁，求成心切，这是他后来反叛的原因之一。但在当时，张学良对此都能容忍。

这里略举一例。张学良喜读古书，而郭松龄见到张学良读线装书就上火。有一天，郭松龄把张学良的"四书"、"五经"一古脑儿全撕了，气哼哼地说："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张学良也不甘示弱，伸手就把郭松龄的书箱扔到院子里，两人又吵又闹，最后大哭一场。

尽管如此，张、郭相处仍如鱼得水。张学良每次外出去饭馆吃饭，必约郭松龄同往，倘郭松龄不能去，这顿饭即作罢。

张学良希望郭松龄辅佐自己成就大业，郭松龄也真诚地期望张学良能成就一番事业。

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张作霖升任蒙疆经略使，除东三省之外，又控制了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由“东北王”一跃而为盘踞六省区的“满蒙王”了。奉军因此实行了统一建制，拥有五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总兵力达二十万。在中国北方，形成了奉系与直系军阀顶犄而立的两大军阀势力。

扩编后，张学良改任第三混成旅旅长，郭松龄升为第八混成旅旅长。当时，两个旅组成联合司令部，通称“三八旅”，张学良和郭松龄均晋升为少将。

在三八旅“蜜月”期间，张学良放手让郭松龄整训部队。

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把事情交付给你，你便负责，不论做什么事，我都这样，但你折腾坏了，那我可不客气。还有，我把命令下达了，你照命令去做，我决不干涉你的那一套。

因此，“三八旅”的一切用人、行政、作战计划、战略战术、训练官兵等事宜，都由郭松龄负责，张学良自己只是注重调整郭松龄与张作霖之间的关系。

在张学良支持下，郭松龄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多方罗致人才，储备人才，择优升补；举办军官教育班和军士教导队，定期轮训；裁汰匪兵、兵痞，招募良家子弟入伍；严加训练，整顿军纪；军需独立，严禁长官贪占公款兵饷；以保境安民为官兵职责，将《中国近代祸史》列为必修课程。通过整训，“三八旅”官兵的素质大大提高，成了东三省的“新军”，这是东北军正规化、现代化的开始。

郭松龄自己说，他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他曾对我说：“我要不是遇见你呀，就没有今日。我们夫妻在家里，两个茶碗，还有一个茶碗是没把的，就可怜到这样。没有你呀，我也

早就完了。”言下之意，就是不定怎么样了，也许被长官枪毙了，就这个意思。

他自己给自己下考语，就是“鲁莽躁切，跋扈侵权”，那他也真是这样的，我也早就看出来了。不仅我自个儿知道，我也公开地给他讲过这话。

假如你访问一下我的部下，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对我处事的感受。可是，他呀，郭松龄这个人却是非常猜忌的。比如说，我们一个团里头，有三个营长，他一定要配上互相牵制的人在里面。我就跟他说：“茂宸，你怎么这么个干法？”我说，我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要疑他，我就不用，我要用他，就全权交给他。他却说：“我可不是这样子的，人可不能这样子。”我说：“茂宸，假如我对你那样子呢？”他说：“咱俩的关系不同嘛。”我则说：“茂宸，也不是那么不同。”

有一次，奉军猛将刘翼飞被大帅派来任郭松龄的团长，郭松龄认为他所属的团长都得由他亲自任命，拒不接受。为此，张学良劝郭松龄说：“刘辅廷很好嘛，况且是大帅派来的，怎能不用？”

经过这么一说，郭松龄勉强用了，但仅给他中校军衔。那时团长一定是上校军衔，郭松龄开了一个先例，当时传为话柄。刘翼飞也常开玩笑说：“你们谁当过中校团长？”

郭松龄绰号郭鬼子，除外貌长得有点像德国人外，也是因为其秉性特别，刚愎自用，不通世故所致。

一年冬天，奉军举行演习。由于张宗昌的军队在大雪地中受伤甚多，张宗昌就在屋内边喝酒边骂道：“他娘的，这是哪个龟孙子的计划，弄得我们这样惨？”

正在骂时，郭松龄忽然推门进来，听到张宗昌的牢骚话，劈头就问：“你在骂谁？”张宗昌说：“这是我的口头语，并没有指骂任何人。”郭松龄气势汹汹地指着张宗昌的鼻梁骂道：



一九二一年张学良由张作相陪同出访日本参观秋操时留影。

“我操你妈！这也是我的口头语！”

这时，只见张宗昌脸色由红变黑，从炕上一翻身跳下来。左右以为张宗昌要发大火，会拔枪打郭松龄，殊料张宗昌跳下炕马上改口对郭松龄说：“郭二大爷，你操俺妈，你就是俺的亲爸爸，这还有什么可说的。”郭松龄闻此言，气呼呼地走了。

“三八旅”时期，是张学良同郭松龄革除弊制，奋发努力，亲密合作的黄金时期，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的“蜜月”期。

当张学良步入军界，开始走南闯北的军旅生涯时，实用主义在他脑中一度占了上风，至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他反而不屑一顾；自由博爱、信义和平，他也觉得颇似空谈。那时，二十岁的张学良笃信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天下是马上打下来的，主义有什么用？人家有人家的一套，主义不主义，不相干，各照各的干。

一九二一年，张学良由后来任关东军司令的本庄繁陪同，赴日本参观秋操。典礼开始之际，因为张学良的相貌与昭和太子很相像，他出场时，日方还奏错了崇荣乐，日本皇太后见此情景，也大为吃惊。

秋操中，日本人向他展示实力，还请他参观军工厂及金刚、伊势、陆奥等战列舰。

我当时想，日本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日本不能做到的，中国也能做到，请君拭目以待。

我感到这是日本人向我示威，日本人总想以势压人，反而促使我反抗，这是我的个性使然。

可见，年轻的张学良虽不信奉什么"主义"，但却比那些信奉"主义"的人更具爱国心。他看到日本军容如此盛大，更激励了加强训练新式军队的决心。

张学良投身军旅，出掌方面之后，更加勤奋向上。他训练新军，整军经武，由此与东北军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为他以后二十余年叱咤风云的戎马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第八章 三角同盟

1921．2

——“我父亲很厉害，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角同盟’。”

——“当时我父亲非常火，一气之下就把徐树铮的副司令撤掉了。”

——“我年轻时很佩服汪精卫呀，年轻的革命家嘛！”

齐燮元和卢永祥，他们分别代表直系和皖系，已经开火了，江浙战争爆发了。我父亲当时就宣布，他说我呀，不能看到他们各个击破，等打完了再来打我，我宁可现在就叫他们打败，而不是等后来更丢脸地被他们打败。

在作战会议上，父亲说，我决心已下，细节你们筹划好了。开完会后，我们都相对无声，不知此次是否有去无回。回到家，我对于凤至说，你什么话也别问我，我只是来和你告别

的。

然后，我和张效坤、李景林、郭松龄四人歃血为盟，相约不要地盘，只掌军权。

我父亲很厉害，他一定要打，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三角同盟”。

原来，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五年间，孙中山先生提出联合段祺瑞、张作霖，以反对最凶恶的直系军阀，三方联合组成反直联盟，三方合作声讨曹锟、吴佩孚。历史上称其为“孙段张三角同盟”。

在军阀派系斗争中，三角同盟中的“二角”，即张作霖与段祺瑞的亲密合作，源于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的“秦皇岛截械”。

我跟你讲，你知道什么叫奉军，奉军是怎么起来的，奉军势力是怎么壮大起来的吗？冯国璋当总统的时候，段祺瑞当国务总理。那时，冯买了一批军火，计划从秦皇岛上岸。那冯国璋就派人，那人名叫吴大全，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吴大全奉命经手办这件事。段祺瑞当时也正在扩充军力。由于机密被段的陆军部次长徐树铮探知，他就同原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同学杨宇霆密商，由我们奉军派兵去秦皇岛截械瓜分。奉天于是就派张景惠去。当这批军火一上秦皇岛岸，张景惠这一团人马就把枪械全部劫走了。那些军火可以装备三万多人。是日本军火。

那么，这就壮大了奉军，奉军的势力打这儿就起来了。我父亲是奉军总司令，徐树铮当副司令，杨宇霆任参谋长。

后来出了这么件事。徐树铮总想利用奉军势力消除异己，引起我父亲的不满，因此，当直皖于一九二〇年六月火并时，就是徐树铮以奉军司令部的名义请冯玉祥的舅舅陆建章吃饭的。陆建章那时大概给冯焕虎活动，徐树铮把他请来，就在天津把他

枪毙了。为这件事，当时我父亲非常火，一气之下就把徐树铮的副司令撤掉了，又派孙烈臣当副司令，而杨宇霆吓得就没敢回奉天，就这样走掉了，他若要回奉天，甚至有可能处死他。

张作霖久怀“问鼎中原”的野心。虽然奉皖之间一度有合作情谊，但因为徐树铮盛气凌人，自秦皇岛“截械”后，张大帅明为“中立调停”，暗中却助直倒皖，从中渔利。

七月三日，直奉联合起来通电列数徐树铮的罪状，惹恼了徐树铮。七日晚，徐树铮设计诱杀张作霖未遂，被识破后，更激发了奉张倒皖的决心。

八日，直皖战争爆发。当皖军溃败之际，奉军兵不血刃地抢先进入北京南苑，搜缴了皖系大批军械、辎重和财物。

当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曹家花园商议内阁组成和权力分配时，双方产生严重的利益冲突。吴佩孚力持异议，张大帅则不给面子，当面斥责他道：“师长不佩说话！”

吴佩孚是曹锟的心腹，刚愎自用，闻此不敬之言，大为难堪，对张作霖更加怀恨在心。从此，直奉军阀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至于奉张与南方孙中山方面，这时的联系逐渐频繁。一九二一年二月，老同盟会员宁武抵奉天，先和杨宇霆、张学良面谈，然后又去拜会张作霖。

“现在国家成了个烂羊头，”张作霖对宁武说，“孙先生是开国元勋，谋国有方，我想派人去向他请教。你可打电报先去联络一下。”

从此，孙、张之间信使不绝，关系逐渐密切。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张景惠的驻京两师未经正式开火就被直军击溃。五月，陈炯明又在广州叛变。张作霖怒气冲冲地说：“这边有个张杂种，那边有个陈小子，都坏了大事。胜败乃兵家常事，这算不了什么。不过，孙先生是文人，带兵是难

为他，我不求他别的，只要他对救国大计多想办法，这帮家伙让我用武力来收拾他们!”

孙中山先生离粤抵沪后，张作霖又对宁武说：“我要在患难中交朋友。我不写信，信也难写，你就代表我去探望孙先生，请他来东北暂住一阵子。”

宁武向孙中山先生转达了张作霖的邀请。孙中山先生对宁武说：“你能不能给雨亭去个电报，商借一笔款子？有了款子，我不出数月就可以消灭叛逆，收复广东。”

张作霖听后说：“好！我先送孙先生十万元作他的生活费用。回粤平乱问题，请他派代表来奉天详细面商。”

此款由韩麟春奉命亲赴广州交孙中山先生，并带去张作霖及张学良的信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主要是因为那时他已崭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些新思想。所以，孙中山先生除给张作霖复函外，另给张学良回了一信，寄希望于张学良，并赠张学良“墨宝”，上书“天下为公”。回信这样写道：

汉卿仁兄惠鉴：

顷诵手书，借悉一切。所论奉省暂持冷静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顷致书尊公，述此后军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捣北京，略定津保，以覆其巢穴，绝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见不谋而合。望力持定见，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预期也。韩芳辰君来，连日讨论，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兹特遣汪精卫先来谒，一切代述。希赐接洽为荷。专复，敬颂台绥

孙文　九月二十二日

一九二二年秋，孙中山先生派汪精卫来到奉天，与张作霖父子商议讨伐曹、吴的计划。对此，张作霖极为重视。

张作霖对宁武说：“汪精卫我也久仰了。我想隆重地招待

他们一下，表示重视孙先生的代表，做给日本小鬼看看。这差事就交给你办了。”

“你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是不是在一九二三年，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唐教授问张将军。

是啊！那个时候正搞“三角同盟”，总理就派了汪精卫和李石曾来奉天。那时，我还没有做得太高，仅是负责招待他们。我年轻时很佩服汪精卫呀，年轻的革命家嘛！汪精卫这个人说话，那口才真是一流。

当汪精卫抵奉时，张作霖在大帅府摆下了盛大酒宴。张作霖则身穿大礼服，笑容满面地等候贵宾。

当一表人才的汪精卫在姜登选、韩麟春陪同下进入客厅时，张作霖迈着小碎步迎上前，握住汪精卫的手说：“欢迎，欢迎，欢迎大驾光临我奉天。”

“见到雨亭将军，深感荣幸，荣幸。”汪精卫面对盛大的欢迎会，颇有点意外。

张作霖走上讲台，浑身像长刺似的不习惯地拿着讲话稿刚念完头一句“值此金秋之际”，不知怎么顺嘴说出：“快到八月节了吧？”他又回头问秘书长，“还有几天吃月饼？”秘书长赶忙说：“还有十三天。”张作霖笑笑又说：“关里关外，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都吃月饼吧？”

张作霖在台上伸脖向汪精卫打招呼，汪精卫则微微点了点头，这下子张作霖下面要讲的几句话全忘了。最后，张作霖总算把讲稿嘟囔完了。

随后，汪精卫走上讲台，他抑扬顿挫地致答谢词说：“我向欢迎我的你们，致以崇高、热烈、光荣而荣幸的感谢。为革命的发展、进程、前途和希望，来到欢迎我的东三省的奉天。今朝南北联合讨伐国逆，实乃古今之绝唱……”

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场面异常热烈。宴会后，双方在

大帅府会议室举行了会谈。

“我们的意见是，先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出兵北伐曹锟和吴佩孚；由奉天革命政府出兵关内，直捣北京，以收南北夹击之效。”汪精卫开门见山，大谈讨伐曹、吴的计划。

张作霖同意南北夹击，但他强调应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从属关系，意思是不愿当孙中山的配角。

汪精卫提出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家的统一建设问题。然而，张作霖却含糊其词，故意不作正面回答。他摆手让端出奉天稻香村、老稻香村、老老稻香村三家驰名果子店做的月饼，亲手拿起一块递给汪精卫，自己则先咬了一口，边嚼边说：“我的奉天和汪先生的广州，一定会像月饼一样团圆。”

“召开国民会议，是为了全国团结统一，不能像月饼，咬下一口就不圆喽。”汪精卫眨着秀气的眼睛说道。

张作霖哈哈大笑着说：“吃到肚子里就团圆统一啦。”

当时，张氏父子心里最主要的是在军事上如何打垮曹、吴，至于打垮他们后如何解决政治问题，尚无成竹在胸。对国民会议的召开，他们也模棱两可，表示只要打垮曹、吴，怎么都好说。

经过几次商谈，张作霖同意帮助广州五十万元军费。他再三要求广州的北伐军每到一个地方，要先和他打声招呼。

在汪精卫赴东北游说期间，作为一热血青年，张学良与汪精卫曾促膝相谈。

那时，我对汪精卫的行踪很注意，我就问他，报纸上说你去过大连，还说，你作诗三首，去悼醇亲王，这是真的吗？你悼他干什么？汪精卫说，这是真的，是我去悼他的。我就问，你为什么去悼他？他说，我去悼他自有原因。当年，我被捕后，是醇亲王审我，他要是想杀我，那就是他的一句话，但醇亲王没有杀我，他就跟我讲，说你们搞这革命，当然是有原因

的，是看到清朝太坏了。他说，哎呀，假如你们革命成功了，我看你们也强不过我们多少。他这句话，真是说对了，应验了。我们今日革命成功了，可还不如人家前清，弄得这么糟糕！那一阵子，我们之间往来比较密切。

张作霖和孙中山的联合，目的是利用孙中山的声望和力量，为他的反直目标服务。

此外，张作霖又针对冯玉祥对曹、吴的不满，秘密派人联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之前，张作霖通过段祺瑞，先后付给冯玉祥三百万元军费。张学良为联络冯玉祥，也曾付以巨款。张作霖信告冯玉祥说，只要达到和平，奉军可以不入关，冯玉祥阅后甚为满意，当即大书一个"成"字，下署"玉祥"二字。并约定如两军相遇，均向天鸣枪；为资识别，冯军缠红布白日光臂章，奉军缠黑布白日光臂章。

这个时期，在政治上，张学良完全按照其父的主张办事，并参与了张、段、孙结盟活动。但是，张学良那时仅仅是把这个结盟看作是权宜之计，是借用孙中山的革命力量而已。

那时，张学良在奉军军事杂志上还写了一篇题目为《革命》的文章，说曹锟的总统是贿选出来的，推翻曹锟就是"革命"。段祺瑞任执政，张学良是赞成的。

此后，张学良在奉系集团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虽然他在政治上对乃父亦步亦趋，但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日深和无休止的内争迭起，他的人道主义和爱国思想也日益增长。

第九章　直奉之战

1922．4

——“那时，杨宇霆就抓住了我，我就外出带兵打仗，他就在里面辅助我父亲。”

——“我把军情告诉了他们，假如敌人今晚上攻破这儿，那我们就完蛋了，整个地完蛋了！”

——“奉军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垮了，就我指挥的部队没有被打败。”

第一次直奉战争，分东路军和西路军。西路军是整个地垮了；东路军由我父亲亲自指挥，分三个梯队。头一个梯队，就是张作相，他的梯队也垮了；第二梯队是我；第三梯队是李景林。残余兵力就是我们这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等退到山海关，就是我们这两个梯队的残兵，最后在河里同他们打了一

仗，那仗打得很凶呀，又叫做“山海关战役”。

那时，奉天军权都在张作相手中，我父亲这个人就是这样，军权交给谁，没有二话。东路军实际上由张作相统领。

原来，一九二〇年直皖战争后，由于总统徐世昌袒护奉系，致使进关后的奉军垂手而得京津，不但在军事上瓜分了段祺瑞的边防军，武力空前增长，又在政治上大捞一把。为此，直系干将吴佩孚恼怒万分。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张作霖拥立亲日派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

梁士诒一上台，就从各方面打压直系，甚至扣发其军饷，并启用皖系曹汝霖、陆宗舆等充当内阁要员，从而更加激怒了吴佩孚。

适值华盛顿九国会议，梁士诒与日本密商山东问题，答应用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同意将该路作为中日“合办”。吴佩孚得知后，立即痛骂梁内阁“卖国媚外”。

张作霖无力为梁士诒辩护，便以吴佩孚干政太甚为借口，促使曹锟罢免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副职。至此，直奉双方冲突渐趋激烈，指责电报你来我往，大有水火不相容之势。

张作霖公开指责曹、吴作乱，破坏统一。而曹、吴眼见奉张的权势日益增长，认为不把奉系消灭，直系的天下就坐不稳，于是，便针锋相对，驰电回击张作霖曰：“大浩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

张作霖闻此电文，不由火冒三丈，加之利益相煎，决心兵戎相见。

战前，张作霖召开军事会议，众将意见纷纭。张景惠、张作相认为奉军力量尚不能控制北京全局，不如捧曹为首，自居实力地位；然而，杨宇霆一派却力主开战。

不料，此时直系不宣而战，突袭了奉军驻南苑的部队，守军张景惠所部损失惨重。战火突起，张作霖终于决心下定，誓与直系一决雌雄。

第一次直奉战争，段祺瑞方面那真是非常赞成的，因为此战可以报直皖战争的仇，利用奉天来报这个仇。这样，出走的杨宇霆也就回到了奉天。那时，奉天的参谋长姓秦，我父亲不喜欢他，这个人无用，杨宇霆就接替了他。杨回来后，他曾对我说："我当年在职的时候，如果你能干点什么，那奉天肯定比这阵子还强。"那时，杨宇霆就抓住了我，我就外出带兵打仗，他就在里面辅助我父亲。

一九二二年四月十日，张作霖将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自任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总司令部设在军粮城，前进指挥部设在天津河北中州会馆。以东西两路，计三个师，十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总兵力为十二万，外加野炮一百五十门，机枪二百挺，浩浩荡荡，挥兵南下，第一作战目标是夺取保定。

直军方面，前敌总司令是吴佩孚，王承斌为中路司令，彭寿莘为东路司令，孙岳为南路司令，兵力总计为十万，另拥大炮一百门，机枪一百挺，大本营设在保定。

四月二十五日，吴佩孚联合直系各将领发表通电，宣布张作霖十大罪状。张作霖也不甘示弱，联合奉系将领通电声讨吴佩孚。

二十八日午后，两军接火，第一次直奉战争正式爆发。

我们跟曹锟、吴佩孚作战了。曹锟的弟弟曹四爷，同我们张家是亲家，那时是天津的省长，天津那时叫省。我们同曹军打仗，还抽空去天津看望我们的四大爷呢，你说这仗打得有什么意思？

镇威军西线由西路军总司令张景惠统领。两军激战于长辛

店附近的南岗洼一带。当日，奉军初战告捷，直军失利，兵退涿州、良乡一带。

不料，五月三日，直军吴佩孚增调张锡元、李鸣钟两旅北上，李旅并从大灰厂直捣奉军背后。次日，西线邹芬的第十六师，原为直系旧部，又阵前倒戈。而张景惠原以为直军已溃败，得意之际却惊闻大批直军忽然从正面打来，又被伏兵抄了后路，以为是中了直军的奸计，遂下令全线撤退，张景惠本人则乘专车狼狈逃往天津。

吴佩孚电令张锡元旅迅速追击，西路车兵败如山倒，奉军三万余人被缴械。实际上，行进到天津一带的直军仅张锡元旅一部，而张景惠不知实情，酿成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悲剧。

张作相指挥的东路军，在天津以南马厂一带，先由第三梯队李景林率部沿津浦线向徐州方向前进。直军张国榕率第二十六师包围马厂，切断奉军后路，使奉军首尾不能相接，不得已向杨柳青方向溃退。直军沿青县、马厂、静海，进逼良王庄，奉军七千余人被缴械。

首战受挫之后，东路军又受西路败退的影响，急速后撤，弃杨柳青，移军北仓。情急之中，又把铁路电信破坏殆尽，致使京津隔绝。至此，战况对奉军极为不利。

当奉军东、西两路受挫之际，惟有第二梯队司令张学良、副司令郭松龄指挥的“三八旅”小有斩获。当时，张学良的第二梯队司令部设在信安镇的唐家铺，主攻地区为直军据点田家口、胜芳镇一线。

“打孩子，娘出来。我痛击张学良，看张作霖还露不露头！”吴佩孚神气活现地对部下说。他对奉军的这一梯队特别重视，亲自乘汽车前来督战。

直奉两军相接，骑兵先在煎茶铺接火。不久，吴佩孚的大队人马接踵而至，战斗异常激烈，奉军数名团、营长负伤阵

亡。由于奉军的炮火优于直军，直军的伤亡也相当严重。此时，奉军第三旅在右翼，第八旅在左翼，第四旅殿后，对直军呈包围态势。

殊料，直军骑兵突袭张学良设在唐家铺的梯队司令部，情形极其危急，但年轻的张学良以其父所赠军刀上的"事到临头须放胆"为誓言，亲自站在司令部房顶上指挥不足二百人的卫队和幕僚迎击敌军。

随从劝张学良随行李车后撤，他斩钉截铁地说："战况危急，我如何能撤？宁死于此，亦不能动！"主帅镇定，人人奋战，遂将来犯者击退。

退敌之后，张学良料定直军不会善罢甘休，乃乘夜色将两旅埋伏在胜芳和崔庄一带。

两个旅四个团，郭松龄带着三个团前往埋伏，那么，我带一团人，拉三个团的正面。讲到这里，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真喜欢我的小兵，那么，怎么办呢？我要负责任，我要坚守这三团人的阵地，假如敌人从这阵地冲过来，那我们就全军覆灭了。

我拿一团人来守主阵地，那我就要亲自督战，我就到前线去了。可我一到前边，那些小兵就喊："哎呀，旅长，你到这儿干什么？"我说，我不瞒你们说，咱们现在非常危急。我把军情告诉了他们：郭松龄带着三团人走了，迂回到敌人后头去了，现在我们拿着一团人把守这三团的正面，假如敌人今晚上攻破这儿，那我们就完蛋了，整个地完蛋了！所以，我赶紧来跟大家一块儿待着。

"呀，你不要待在这儿好吧，你回去！"他们说，"你快回去，如果我们都被打死了，那没有办法了，假如我们有一个人在，那旅长你就放心好了，我们绝对不会丢阵地，你回去吧，我们送你回去。"

我说你们都别动，我不要你们送我回去，那样目标更大。要回去，我一个人就行，我直接跑回去，你们可不要动啊。我就在你们身后的村庄里头。

直到现在，你可以问问我的部下，我同他们很亲呀。我的司令部就在火线后几百公尺的一个村庄里，我回去时，全部士兵站起来成一排，为我掩护，为我挡子弹。讲到这里，我心情又激动了，我眼泪快掉出来了。那个时代，官兵的感情实在非常深厚。

第一次直奉战争，战况极为不利，张作相问我的意见，我说，我这个军校出身的，能想的主意都想完了，现在只有上前线拼死命了。

五月三日拂晓，直军果然由胜芳突进，张、郭所部伏兵发起攻击，将直军拦腰截断，吴部惊恐万状，阵脚大乱。

四日晨，奉军又乘胜攻占了胜芳和崔庄。是役，奉军掳获直军众多大炮及弹药，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已溃不成军。

正当直奉两军杀得昏天黑地之际，五月五日，大总统徐世昌呼吁双方罢战，并下令道："奉军即日退往关外，直军退回原防地，双方均应静候中央命令解决。"

鉴于战况对奉军相当不利，当日，张作霖不得不下令停火，布署撤兵，长辛店、马厂、静海及杨柳青一带奉军败兵经天津退往滦州。

张学良所部由北仓、河西务走玉田、宝砥、遵化出喜峰口。当时，战区老百姓见到烧杀抢掠的奉军败部，如大祸临头。但张学良、郭松龄所部的"三八旅"，军纪肃然，令人刮目相看。

就这样，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所有的部队都被打垮了，就我指挥的部队没有被打败。不仅没被打败，还把吴佩孚的军队打了，我就是这样起来的。

当郭松龄率第二梯队退守山海关时，已返奉天的张学良写信给他，信中说："方今势危时迫，榆关可守则守之，否则请退处一隅，养精蓄锐，以待再举。"

郭松龄见信后，遣密使见吴佩孚，要求停战。但吴佩孚以为奉军已成乌合之众，欲乘胜穷追，一举攻克奉天，扫平张作霖的老巢，因而，"山海关战役"一触即发。

该战役奉军的部署是：以第三、第十一旅及从前方收集的残余部队约三万余人编为"第一路军"，由张学良任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阵地北自山海关的二郎庙山地，南至京奉铁路南侧。"第二路军"以李景林为司令，率部二万余人；阵地北与"第一路军"相接，再往南至海岸线。

当奉军刚刚配置停当，直军追击部队已抵达前方，总兵力不下七八万人，且后援兵力也正向山海关源源开来。

战火复燃，极其惨烈。

激战中，第三旅第一团团长李长荣负伤，张学良即派王文升前往接替。王文升采用日军战术，以团旗为先导，团长亲立阵头，带领全团向敌阵猛冲。六月十日，该团成功地夺取了直军前沿阵地，不幸的是，王团长却在枪林弹雨中阵亡。

与此同时，第二路军亦有相当进展，直军进攻锋芒严重受挫。

直军在山海关兵败之后，始认为张作霖仍拥有实力，遂有意主和；而奉军在新败之后，亦亟需整顿，企盼偃旗息鼓。

于是，六月十六日，张学良与王承斌会晤于秦皇岛车站。次日，奉方以孙烈臣、张学良为代表，直方以王承斌、杨春芳为代表，在秦皇岛港英舰喀尔号上正式签订了停战和约。

第一次直奉战争是军阀之间为各自的政治利益进行的一场混战。奉军战败的重要原因是主帅指挥不当，部队素质不良。张景惠、张作相所属的衰兵老将皆为绿林出身，缺乏训练，每

以匹夫之勇，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再者，奉军军纪败坏，所到之处，劫财扰民，普遭战区百姓的痛恨。战役结果，奉军死亡约二万人，负伤及逃亡约一万人，被围缴械者达四万人，耗损军费二千余万元。

奉系战败后，北京政权完全落入直系军阀手中。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免去张作霖本兼各职，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并采用离间的手段分化张作霖与其旧部的关系，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等。但吴、冯两人都认为："张使之去留，为三省三千万人生命之所系，对此乱命，一致否认。"随即提出了辞呈。

当时，东北三省议会联合会、商会联合会、工会联合会、教育联合会等各界团体，纷纷向北京政府发出类似通电。很明显，张作霖的势力在东三省仍坚如磐石，他的地位不是北京政府一纸命令所能改变的。

在东三省各界人士的拥护下，张作霖积极着手东三省独立。

一九二二年五月二十六日，张作霖与吴俊升、孙烈臣等联名对阎锡山、唐绍仪等西南、西北、东南督军发出独立宣言。

六月四日，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决议，推举张作霖为奉吉黑三省自治军总司令，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宣布东三省自治，并与北京政府正式断绝关系。至此，联省自治的局面形成，东三省的大权仍然操于张作霖之手，只不过是换了一个名堂而已。

此时的张学良，以"东北王太子"的地位，年纪轻轻就驰骋疆场，雷厉风行，令人刮目相看。由于他遇事头脑清醒，多思善谋，机敏坚定，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很快就显山露水，并迅速成长为奉军中一员骁勇善战的将领。

第十章 整军经武

1922．7

——“我是整理处的参谋长，军队的一切整理和调动，都由我来决定。”

——“我一连枪毙了好几个人，我毫不客气。”

——“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

山海关战役打完了，大军回到了奉天，就设立了整理处，设有总监和副监。我是整理处的参谋长，军队的一切整理和调动，都由我来决定。

我那时二十二岁。我怎么会拿到这份大军权，张作相的军权怎么会到了我的手中，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就在打山海关战役的时候，张作相手下的师长们，给我父亲写了一个条陈，就劝我父亲说，回奉天后要整顿军队，并要求张作相推荐我。我是在多年以后，在我父亲的公文桌里看见这个条陈的。

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败暴露了奉军的诸多弱点：武器低劣，训练缺乏，组织不健全，又缺少懂军事的指挥官，特别是缺乏高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

张作霖痛定思痛，也意识到乌合之众，不要说征战沙场，逐鹿中原，就是退兵自保，也难如愿以偿。自己的那老一套，动不动就"他妈拉个巴子的，你们好好地干，干得好，我除了老婆不给之外，什么都会给你们"，什么"哥们儿兄弟"、"为朋友两肋插刀"，什么"脑袋掉了碗大的疤"等，显然太落后太陈旧了，根本不行，要弃旧图新，得另有新的高招。

我就对父亲说，世上常胜将军难得，您不是也常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吗？军队打仗，总是有胜有败，打胜了的，不一定就是最强大的，因为胜败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失败了的，只要好好总结经验教训，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就能变弱为强，转败为胜。

"嗯，对，对！"张作霖面露喜色，连声说，"你算是说到爹心窝里去了，爹盼的就是转败为胜，以雪我奉军之耻呀！今天爹把你找来，就是让你帮爹出出主意。"

我当时胸有成竹地说，这我明白，依我看，摆脱困境并不难，我们奉军并不是不能打仗，问题是缺乏严格的训练，必须下决心整军经武，选贤任能，使它的面貌有一个大的变化才行哩。

"整军经武"，就是认真整顿和训练军队。只是这整顿和训练与平时一般的操练不同，它不是简单的竞赛，也不是只图个表面红火，而是要提拔优秀青年军官，充实军事人才，要有一个硬实的班底子。总之，是要从根本上改造军队，提高军队的战斗素质。

这事我曾经考虑过。不过，还很不成熟。我初步设想，当务之急是要致力于建设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训练好队伍，改良



张学良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

武器，加强空军，筹建海军，并搞好炮、工、通信等特种兵培训和军工生产。

一九二二年七月二十二日，奉天正式成立了“东三省陆军整理处”。除了最高决策由统帅部直接掌握外，一切日常有关整军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整理处。

整理处不称处长。孙烈臣是总监，张作相是副监，名义上负责。另一个副监是姜登选，行政事务由他负责。我是参谋长，整顿军队的事情，那都是由我负责。军队大整顿大改编后，那时旧派、新派就分出来了。

第一次直奉战争失败后，搞了个审判，我一连枪毙了好几个人，我毫不客气。所以，奉天的老派人恨透了我，旧派一部分人反对我，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看我那时啊，哪像老派人，哈哈。

建军计划，必须从根本做起，小改小换是不行的。彻底整


张学良在北大营检阅步兵。

顿军队，既要照顾到当年和父亲在一起打江山的老一辈人物，又要精选一批后起之秀。

那时，积极参与整军经武领导工作的，除张学良之外，还有杨宇霆、郭松龄、肖其煊及一批从保定军校转过来的优秀毕业生。后来出任军长的何柱国任职时认真负责，博得好评，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和信任，后来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

整军经武的内容，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奉军的组织和管理、改革军制、发展海空军、扩建兵工厂以及进行财政经济方面的改革。

完善奉军的组织和管理，实际上就是张学良、郭松龄改造“三八旅”办法的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其方法是：培训中下级

军官，提高他们的军事素养，增强部队实力。为此，首先充实东北讲武堂，重用有军事学识的人任教官。同时还规定，除个别行伍出身者外，旅长要求必须由正规军校出身的人担任，团、营长以下军官必须经过正式培训，懂得军事之学、术两科。

此外，部队中还举办军官训练班、教导队、学兵队，以培养军士以上人员。增设学科，每日上课两小时。各部队还发行军事杂志和讲义，以广官兵们的见闻。

人事任免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基准，并规定各部队采取考试的方法提拔军官，废除推荐制度，淘汰无能者。要求各级军官的日常工作均有记载，并通过按季校阅及考试进行考核，有功的、成绩好的，就升迁，不及格的就调去受训。

规定各部人员必须足额，军官吃空饷者将受到严厉处罚。发现军人吸鸦片，立即免职。并规定军人的年龄为十七岁以上、四十岁以下，身份不明、无保人者一律淘汰。

实行军需独立，完善后勤制度。改革和完善粮秣、被服、军械、电讯、交通、军医等系统的制度，是改造旧军阀部队、建立正规化军队的重要步骤。军需独立的制度建立和实施后，使军需不再是长官的私人帐房，从而保证了部队的供给。

除此之外，军法也实行了独立。

后来，一九三四年，蒋介石在庐山曾对人说："东北有两件事是需要学的，一件是后勤独立，这在我们的部队里还没有完全做到；另一件是他们的用人制度。"

改革军制，也是整军经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间最主要的变更是：东三省实行师旅制。结果，东三省共编成陆军三个师，二十七个混成旅，五个骑兵旅，两个炮兵独立旅，一个重炮兵团。旅的编制以三团为标准。

其中，三个师分别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张学良；陆

军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暂编奉天陆军第一师，师长李景林。

由于军制的改革，奉军中逐渐形成了以杨宇霆为首的日本士官派和以郭松龄为首的中国陆大派两股势力。张学良由于本人所处的少帅地位，表面上对两派只能不偏不倚，但郭松龄是他亲密的助手，郭松龄的意见常常代表他的意见；张学良本人又是讲武堂出身，以后又任该校监督．随着奉系军队不断发展扩充，讲武堂出身的军官比重也越来越大，所以，实际上，张学良是站在郭松龄陆大派一边的。

陆大派人数多，但大多处于中下层，虽有一定实力，然而影响力较小；士官派人数虽少，但大多居于上层，能够参与决策、左右决策，特别是他们得到老帅张作霖的宠信，因而能量很大。虽然士官派轻视甚至排斥陆大派，但两派平时还能相安无事；然而，一遇机会，双方矛盾便会显露出来。

陆军整理处成立后，杨宇霆不甘心做一个没有实权的幕僚长，想抓军队实权，所以，他千方百计地阻挠张学良、郭松龄力量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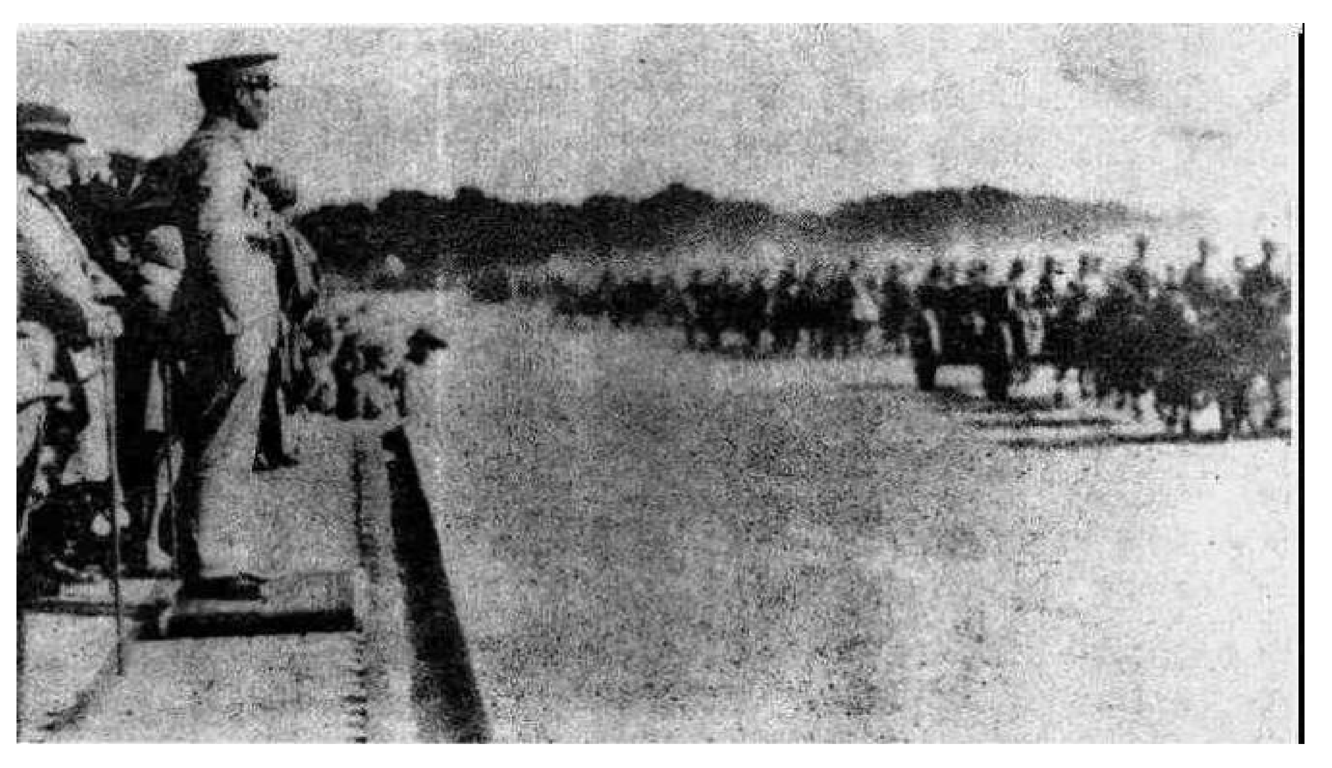
张学良与张作霖既是父子关系，又是部属关系，但不能事事直接找父亲办理，有些事情常常被杨总参议这道关口所阻挠，办不通。

“纵然是你们张家事，人家不答应也是办不通的。”杨宇霆常这样说。

“事事受杨阻碍。”张学良曾无可奈何地说。

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矛盾，由此开始萌生，也为后来张杀杨埋下了契机。

为巩固统治和扩张势力，张氏父子还扩建了兵工厂，大力发展军工，生产重型武器。工人由二百人增加到一万八千人，并先后用重金聘请了日、德、奥、俄、瑞典等外籍技术人员三



张学良检阅炮兵队伍。

十余人。兵工厂每年能生产大炮约一百五十门，炮弹二十余万发，步枪六万支，枪弹一百零八万粒，轻重机枪一千挺以上。应当说，已发展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兵工厂，号称“东方第一”。

东北军最厉害的就是炮兵。那时，中国的炮兵可以说没有正式训练过，只有东北军做到了这一点。东北军的炮兵多，怎么说多呢？国内多数炮兵都是买外国的炮，一门炮顶多带五百发炮弹，惟有东北军的大炮是自己造的炮弹。

我们的炮弹叫瞬发炮弹。本来，人家外国，如日本的炮弹，有空炸的，有碰炸的。我们这瞬发炮弹，是在炮弹前头安有一个像管子一样的东西，有个弹簧在里头，它打到地上，会马上蹦起来，再爆炸，所以叫瞬发炮弹。还有一种直接爆炸

的，那也是奉天迫击炮厂制造的。

在整军经武的过程中，张学良亲自参与其事，知人善任。每遇才干出众者，他都细心记下姓名，随时同他们接近、交谈。将校军官之调整，参谋人员之选拔，张学良都居于关键地位，从而使自己与东北军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

那时，孙中山在给青年张学良的一封信中写道："悉东三省整军经武，养锐待发，曷胜忻慰。"对张学良主导的整军经武，倍加称赞。

后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交谈时，周恩来也极力赞扬东北军军官的学识和军事素养。

经过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卧薪尝胆，休养生息，调整训练，奉军基本上恢复了元气，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空前提高。仅两年工夫，全军的面貌便大为改观，由过去绿林式的乌合之众，一跃而成为训练有素的正规军。

当时，奉军全部兵力号称三十万，能征善战之兵不下二十万。至此，兵精粮足，军火充裕，其炮兵实力已跃居国内各军之冠，"东北虎"雄姿再现。

第十一章 海空建军

1923.9

——“我们还要花钱办航校，买飞机；办海校，买轮船；要建立舰队和航空队。”

——“学良固一学生也，故见学生则喜，见学生能毕业则尤喜。”

——“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

我认为，应当训练官佐懂军事，懂政治，会带兵；训练士兵勇敢，能打仗，不怕死。我们还要花钱办航校，买飞机；办海校，买轮船；要建立舰队和航空队。

一九二一年秋，张学良应邀渡海赴日本参观秋操。当他看到日本空军先进的技术、精良的装备、高超的训练后，震动很大，他领悟到这将对东北意味着什么。

回奉天后，我对父亲说，此行感想有二：一是气愤，二是发奋。日本当局有意炫耀日军威仪，蔑视我们中国人。不过，他们有些方面，如武器、军纪，确实比我们要好，文化也比我们高些。我们东北军在这些方面要赶上去，而且要力争超过他们。

但是，东北的实力究竟如何，这不能不使张学良忧心忡忡，尤其是东北的海空军，还可怜得近乎一张白纸。

回国后，张学良立即从大沽造船厂等地抽调技工赵鸿起、宋茂臣等二十二人前来奉天。不久，原皖系留法回国的航空员姚锡九和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王立序等人，也陆续奉命抵达奉天。

一个大力发展海空军的蓝图，在年轻的张学良脑海里浮现。

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在京奉铁路沿线置于直系海军大炮射程之内，进退维谷，张作霖深感无海军之苦，决意筹建海军。正在这时，北京海军部因经费不足，明令将吉、黑江防舰队划归东三省巡阅使署管辖。从此，东北有了海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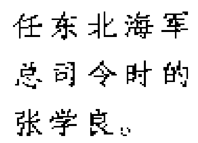
一九二二年春，张作霖在东三省保安司令部内设立了东北航警处，任命沈鸿烈为处长，负责选拔人才，创办海防舰队。

七月，东三省整军经武，在张学良出任整理处参谋长的同时，东北航警处正式成立，并在葫芦岛港设立航警学校，培养干部，训练海军。为此，张学良倾注了大量心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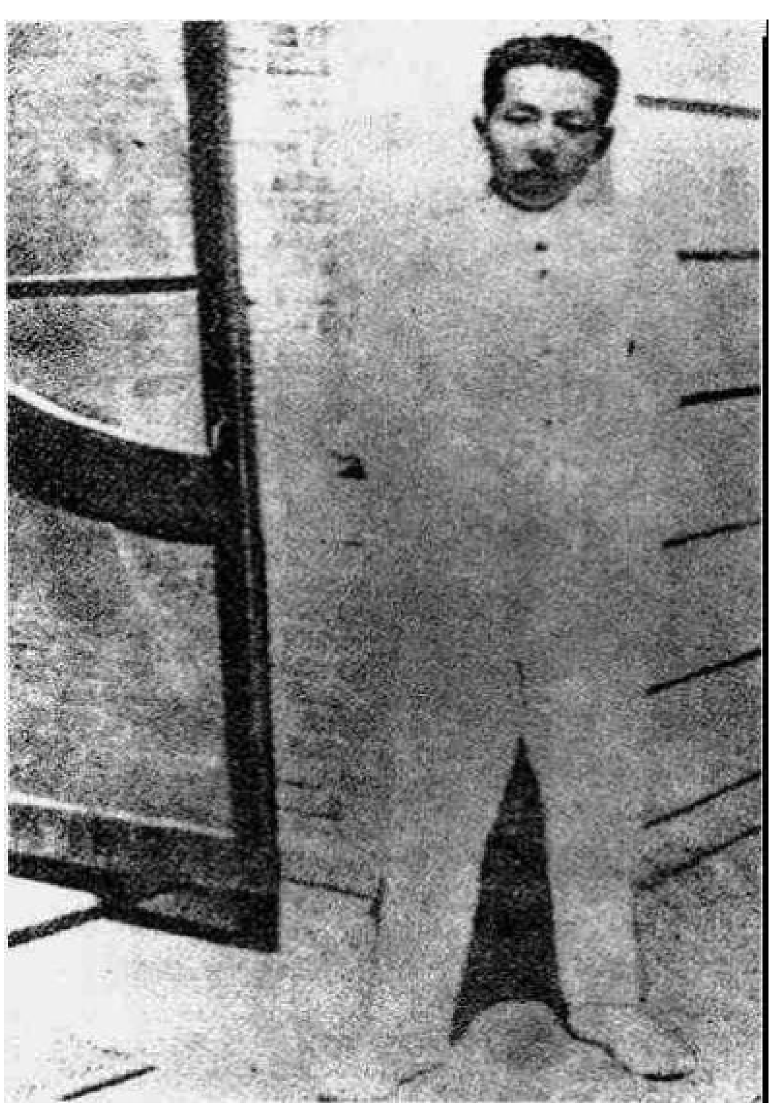
一九二四年，东北江海防总指挥部成立，总指挥为沈鸿烈，舰队队长凌霄。一九二六年一月，东北江海防总指挥部又改组为东北海军司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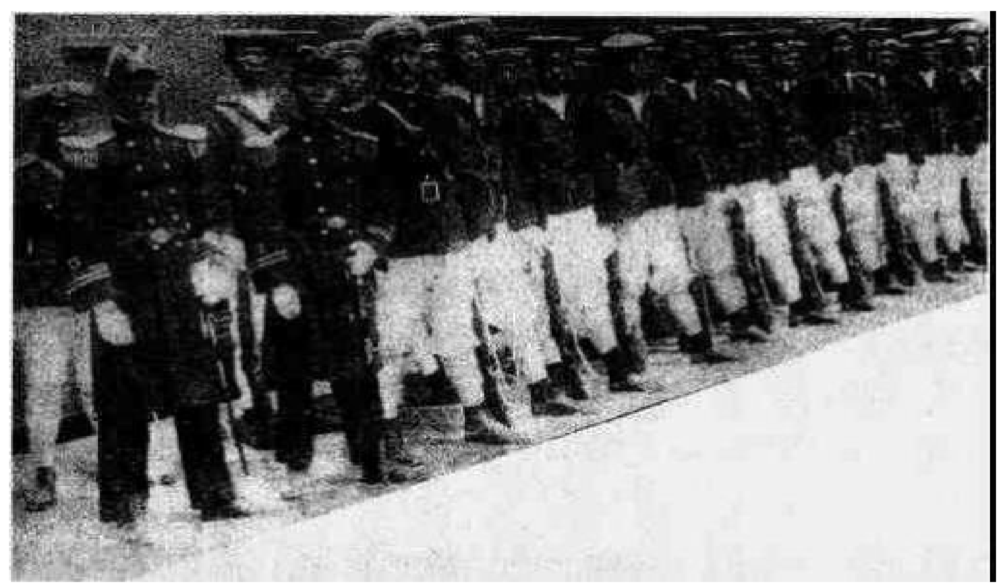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六月，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改编陆海军队番号，建东北海防舰队，总司令为张宗昌，副司令为沈鸿烈。次年七月，张学良出任东北海军总司令。

这时，东北海军已拥有大小舰只二十七艘，约三万二千二



任东北海军总司令时的张学良。





东北海军列队等待总司令张学良检阅。

百吨，占全国舰只的百分之七十六点七，海军官兵有三千三百人，占全国海军的百分之六十一。

至此，东北海军进入全盛时期，并在全国海军中占有相当优势。

在建立海军的同时，奉张又大力筹建空军。

早在一九一二年，当国内只有段祺瑞拥有几架飞机时，张作霖就做起了建立空军的美梦。一九一七年，讨伐张勋的段氏以飞机投弹轰炸，低空扫射，炸得北京墙颓壁坍，辫子军抱头鼠窜，军心大乱。见此情景，张作霖马上意识到，要称霸东北，进取中原，非建立强大的空军不可。

一九二〇年七月，张作霖设立了东三省航空处，派乔赓云为处长，在奉天东塔农业实验场旷地修建了飞机场。

当时，奉军仅有四架大威梅双翼三百六十马力旅客运输机、四架小威梅单翼三百六十马力侦察教练机。这八架飞机，原为段祺瑞的家底，直皖战争时，八面玲珑的张作霖乘战乱良机，将他垂涎已久的段祺瑞的宝贝飞机坐收渔利了。

一九二三年九月，张学良兼任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上任短短几个月，张学良就把东北航空处整编为五个大队：飞龙队、飞虎队、飞鹏队、飞鹰队、飞豹队。张学良兼任飞鹏队队长。

为了把航空处办得更好，张学良聘请了冯庸当参谋长。冯庸是冯麟阁的儿子，当时，冯麟阁和张作霖之间有积怨，可是张学良看重的是人才，他要发挥冯庸的一技之长。

紧接着，张学良又创办了奉天航空学校，并亲兼校长之职，以重金聘请了飞行技术高明的日本、俄国人当教官，培养出不少航空专才。此外，张学良还把一批优秀的青年送到国外深造。

当时，张学良不会驾驶飞机，他便请来了航空处教育长万显章，专门辅导他学习飞行理论知识和指导他实际操练。

"有一天早晨，天气很好，我正在办公室打扫卫生，张总办也早早地来了，进屋后，他没有说什么，只是用非常神秘的眼光对我笑一笑，然后转身将他学习驾驶飞行的帽子和眼镜拿走了。"张学良当时的副官方正回忆说，"我看他仅自己一个人直奔飞机场，没有万教育长跟着，便急急忙忙跟在他后边跑了出来。只见他到飞机场后，找到了地勤工段长刘兆发，将教练机推上了飞机跑道。我一看，准是总办自己一个人要驾驶飞机，立刻感到十分不安，就大声喊了起来：'总办停一停，万教育长没有来，千万不能起飞呀！'但是总办全然不顾，好像压根儿没听见我的喊声，坦然戴好了飞行帽子和眼镜，坐进驾驶舱内，迅速将飞机发动起来。飞机缓缓地冲出跑道，然后就歪着膀身升入空中，向远方飞去。我真为总办的安危担心，同时也为他超人的机警和勇敢而感动。"

由于张学良勤奋刻苦，努力不懈，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能熟练地驾驶飞机，并经常在营口和丹东之间飞来飞去。

一九二五年三月，经过严格训练的六十余名第一期学员从航校毕业了。毕业典礼上，我即席演讲，高兴地说："学良固一学生也，故见学生则喜，见学生能毕业则尤喜。"

最后，大家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一起合影留念。

当时，东北航空处已拥有五十多架飞机，加之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训练机构及教官等，已颇具规模，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出类拔萃，绝无仅有。

东北空军，虽说在军事上还只能起战役侦察、对地扫射、小规模投弹轰炸等作用，但面对多数尚无飞机的其他军阀，却充分显示了自己的优势。

一九二七年，东北空军参与涿州之役，对晋军傅作义部队展开进攻。开战时，东北空军的飞机到前方散发劝降传单，张学良还乘机亲自到涿州上空视察。在九次总攻击中，多次由单



张学良为东北空军航空大队题词。

机执行轰炸任务。

那时，阎锡山的山西骑兵，迂迴于张家口和古北口之间，威胁北京。东北空军每天出动三架飞机监视对方行动。上午向敌方散发传单，投掷报纸，下午扔炸弹，为时达一个多月，钳制了敌方，使其寸步难行。结果，阎锡山的骑兵军终于向奉军投降。

张学良在创建东北空军时，各方军阀势力对他重点培养的航空人才拉拢利诱，明争暗夺，使他面临严重威胁。

一九二七年底，我急电告知机械处处长徐世英，请他马上通知姚锡九，让姚锡九把在法国学习的二十八名航空学员，全部由准尉提升为中尉阶级。并请姚锡九向同学们讲清楚，回国后不用几年，只要尽忠职守，全都可以提升为少校和中校……

原来，兼任留法学生总监的东北驻法武官姚锡九，从法国巴黎反映回来一个情况：湖北某军阀派到法国购买飞机的人员，常到奉系留学生的宿舍里大肆拉拢，结果被几个亲张的留学生饱揍了一顿拳脚。

更让张学良担心的是，以中央自居的南京政府驻巴黎的国民党部，居然也派了专人前往留学生驻地，同奉系派去的学员或明或暗地发生联系。

这批学员是张学良亲自从一千余名学员中筛选出来的，于一九二五年三月从上海坐轮船赴法。现在，他们就要结束全部训练项目，将于明年初启程回国了。可是，国内的各派势力全盯上了这批未来的空军新生力量，众目睽睽之下，怎能不让张学良心焦如焚呢？

张学良越想越烦躁，他让徐世英通知姚锡九提升全部留法学员官阶，就是怕落到"为人作嫁"的境地。这些年来，为培养这批飞行员，他没少费心血，东北也没少掏血本。

一九二七年初，香港。从法国驶来的轮船徐徐靠岸了，徐世英代表张学良远赴香港迎接这批学成归国的航空新秀，学员中途被他人拉走的危险，终于不复存在了。

东北空军的飞机主要来源有二：一是从垮台的军阀手中接收；二是向德国、意大利等国购买。至一九二七年底，东北空军共计拥有百余架飞机，这在当时的中国，已是一支拥有现代技术、具有一定战斗力的空中雄鹰了，在各派军阀之中首屈一指。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将东北空军大队改称为东北空军司令部，他亲兼司令；原大队长徐世英任副司令，并以军事参议官张焕相主持日常工作。

可是，谁又能想到，这样一支势力雄厚的空中力量却好景不长，竟在九一八事变中毁于一旦。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五日，距那个让中国人感到耻辱的日子只剩三天了，就在这天，日本借中村事件妄图武力征服东北的消息传到了东北空军官兵的驻地，一时间，将士们个个跃跃欲试，纷纷请求出战，轰炸日军。



东北航空司令张学良。



一九三〇年十月，张学良（左三）试飞由美国新购进的福特号飞机。图为上机前留影。

“命令全体空军官兵不得擅自行动。”话语简洁、沉重，还没容参谋长陈海华缓过劲儿，张学良已经将电话撂下了。飞行员获知此讯后，各自回营，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自己心爱的飞机和朝夕起落的机场。

十九日清晨，沈阳东塔机场突然遭到日军长达一小时的猛烈炮轰。令日本人奇怪的是，这个具有军事设防的机场，竟没有一点动静。

结果，百余名日本士兵冲进机场，竟不损一兵一卒，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机场，东北空军就在“不抵抗主义”的禁锢下，窒息了自己的生命。

"九一八"导致东北空军损失惨重：丧失飞机一百余架，以及四十余架成套从捷克购来的尚未启封安装的机件、四十五台发动机、八辆坦克以及附设工厂的全套设备。

一支经张学良倾注心血苦心营建，拥有上百名具有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飞行员、百余架飞机的新式东北空军，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偷袭中，在不抵抗主义的影响下，却不战自溃，其中的教训是极为沉痛的。

第十二章　进兵北京

192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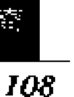
——“那你该先把我打死，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

——“就这样，我们把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

——“冯玉祥倒戈那五十万元钱，还是我在车站交给他的。”

我先说说跟我打过仗的，我的对手吴佩孚，我最不佩服他。那他真是“西蜀无大将，廖化为先锋”。当年我想不通为什么吴佩孚会得到那么大的名气。当然，他是会写点字的人，当年从军的人大多是老粗。但说到他作战，可以说毫无能力。所以，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叫我们把他打得稀里哗啦。

整军经武之后，东北军士饱马腾，气势如虹。





一九二四年四月，张学良任陆军二十七师师长兼东三省陆军训练副监。

此时，曹锟、吴佩孚等直系首领，正全力向江南、向四川发展，没有把张作霖看成是一种威胁，曹锟更天真地认为张作霖是他的亲家，不会拆他的台，所以，他就放心大胆地搞起贿选总统的把戏。

一九二四年，曹锟因贿选总统而声名狼藉，直系的地位也开始动摇。张作霖认为这是讨伐直系、夺取北京中央政权的大好时机。九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东北军进关前，张作霖在帅府广场举行了阅兵式。阅兵台设在大帅府楼外。这一天，张作霖身着蓝呢子大元帅军礼服，上面佩有闪闪发光的金质肩章，头上戴着竖有五六寸长白旄的元帅冠，胸前挂满了各种各样的勋章，腰际还挂着一把指挥刀。

检阅开始，张大帅在身着戎装的吴俊升、张作相、杨宇霆、郑谦等陪同下，威风凛凛地登上检阅台。这时，一队队全副武装的东北军将士，端着长枪，迈着正步，喊着口号，由第一师师长李景林率领，从帅府的东辕门进来，接受检阅，然后由西辕门出去。

郑奎武见张大帅站着检阅时间太长，就从里面搬出一把椅子请大帅坐下。大帅说："不礼貌，阅兵哪有坐着的？"

当部队走到大帅面前时，都举手敬礼，大帅连忙致答礼。时间一长，他的胳膊有些酸麻，张学良便上前用手托着父亲的胳膊。

"当兵的饷银多少？"大帅问。

"步兵八元，骑兵七元，炮兵九元。"军需处长连忙回答。

"弟兄们一个个精神抖擞，士气挺高，我看定能打胜仗。进关每人再加五元军饷吧。"

张大帅说话算数，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军打了胜仗，果然每人给涨了五元。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东北军下了一场官雨，每人升一级。"

阅兵结束，大帅命副官通知厨房备四桌海参席，先犒劳一下带兵的师旅长们。

张作霖热衷于卜卦，迷信风水先生。因此，算命瞎子常出入帅府，成为他奉若神明的座上客，这次也不例外。在众多顾问里，瞎子包秀峰和张振洲被认为操术甚精。张振洲为人机灵，他知道大帅爱听奉承话，就逢迎地说："大帅，这次出兵关里，准大获全胜！"

张作霖听了大喜，以此来鼓舞军心，并一再宣扬："张振洲顾问的卦是相当灵验的。"

九月十五日，自封为镇威军总司令的张作霖，指挥六个军，率兵二十五万，浩浩荡荡杀向关内。他计划在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吸引直军主力，另一路兵出热河，经冷口、喜峰口南下，径抄直军后路，夺取北京。

其战役布置如下：第一军军长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张学良、副军长郭松龄，两军共五个旅，外加骑、炮各一团，约七万余人，负责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同直军主力

对垒，这是整个战役的重点；第二军军长李景林，副军长张宗昌，率二万余众出兵热河南路；第四军军长张作相，摆在锦州作为总预备队；第五军军长吴俊升、第六军军长许兰州，担任热河北路的作战任务。

北京的曹锟闻讯，惊恐万状，连忙拍发“十万火急，限即刻到”的加急电报到洛阳，召吴佩孚火速入京，商讨对策。

九月十七日，吴佩孚就任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出任副总司令。其作战部队分为三军：以彭寿莘为第一军总司令，统帅曹吴嫡系主力的大部分，对付山海关、九门口一线奉军主力；以王怀庆为第二军总司令，统帅原驻热河各军，对抗热河南路的奉军；以冯玉祥部为第三军，应付热河北路。

“我出兵二十万，两个月内一定可以平定奉天！”一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的吴佩孚，在他的“四照堂”点将之后，俨然以“全国兵马大元帅”的姿态，对蜂拥而来的各国记者夸下海口，仿佛胜券已经在握似的。

吴佩孚还说：“张作霖下台后，他的儿子张学良可以派送出洋留学。所有外国人在东三省和南满铁路的权力，我们都予以尊重。”

十八日，战役爆发。东北军以山海关为进攻正面，双方激战十天，战况极其惨烈，伤亡相当惨重，战局胶着，胜败难卜。

那个时候，陕军第一师师长姓张，参加了山海关之战。该师在被我们打得最危急的时候，向吴佩孚求援了。吴佩孚就给张发来这么一个东西，他不是像我们军队下命令那样，按一定的规矩来，而是随心所欲地写道：“张学良黄毛孺子算什么东西？本大帅明天抵达前线，他立刻就得逃掉。”

我是怎么拿到这个文件的呢？原来，张师让我们打败了，他的司令部被抄了，这东西被我拿到了。我看到这东西后大笑：“你吴佩孚这样指挥军队，军人怎么去为你打仗？”我把这

个东西留了下来，当宝贝似的放着，我还想装个镜框，自个儿摆着，可惜在北京时丢掉了。

吴佩孚这人除了会吹之外，没有什么能耐。第二次直奉战争时，还有一件事，我非常看不起他。

吴佩孚手底下有一个旅长，叫冯玉荣，在山海关打左翼，叫我们给袭击了，把他打垮了，这人兵败后自杀了。可吴佩孚赶到后，竟把这人的脑袋割了下来，挂在竿子上。你这个指挥官怎么能对部下这个样儿呢？

人家自个儿已经自杀，已经死了，你还割人家脑袋干嘛？他活着，你杀了他还可以，人家已经自杀了，表示已很负责任了，人已死了，你干嘛还要这样？要杀的话，应该轮到杀你自个儿！

激战中，奉军始终采取攻势，不断派飞机向山海关投弹，直军则奉令采取守势。吴佩孚的锦囊妙计是：暗中调渤海舰队集中到秦皇岛，用海军进攻葫芦岛，并以骑兵从海上绕道，由营口登陆，直捣奉天城。所以，他安坐北京城内，在四照堂从容不迫，饮酒赋诗。

吴佩孚这个人真是不会用兵。山海关作战时，我们奉天，实实在在地出兵七万人，而他光山海关就来了二十一万，是我们的三倍。那他为什么叫我们打败了呢？军队打仗最忌讳的一件事情就是被各个击破。他把他的部队陆续地调来，明白吗？他调来一师，让我们打完了，他随后又调一师，又叫我们打完了。当然了，这也不完全是他的指挥不好，还有后面的交通运输问题。他还不断从海上运兵呢。他的交通指挥非常混乱，军队运不上来。

不久，奉军第一军出乎意料地突破了九门口直军阵地，加上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不太愿为吴佩孚卖力，直军海上突袭计划受阻，前线战局危急。吴佩孚闻讯，大惊失色，不得已于十月十

二日离京乘专车直抵山海关，停靠在长城墙旁，亲自督战。

山海关一线，前线指挥一个是韩麟春，一个是郭松龄。在后头，我就跟姜登选组织司令部，当年就叫“一三联军”。事实上，我等于是总司令，姜登选等于是我的副司令。山海关是我们第三军团的主攻目标，可是，我们没把山海关打下来，中间死很多人呢。我有一个团，差不多整个地全完了。然而，由韩麟春指挥的第一军团却把九门口打了下来，我就决心把郭松龄的第三军团调到九门口去。

那么，山海关这边怎么办呢？我就安排了阚朝玺率一旅人在这儿守卫。这个人在东北军里，我们是看不起他的，他没有什么能力。这样，原来我们三军团的扇面，就暂时由他率这点兵力堵在那儿。这时，假如吴佩孚能看明白，他从山海关打出来，那我们就完蛋了。所以，我说吴佩孚是没有用的东西。

结果，吴佩孚终于没有看明白，他不出关，就死呆在那儿，死守着山海关。可是，由于九门口是韩麟春指挥军队打开的，那么现在调郭松龄的军队去帮着继续打，郭松龄心里就有点惭愧。那时，直军在山上，都看见我们调军队了，从九门口进去，白天往里走，都是很窄的山路，差不多走了一天。谁想到就为了一件小事，这郭松龄就火了。

原来，在九门口开会时，决定由郭松龄担任出击秦皇岛的任务。郭松龄得知后原也很兴奋，不想韩麟春多插了一句：“这样使你也好露脸，大家可以立功。”郭松龄闻听此言，脸色大变，愤然道：“我从来不沾人家的光，我还是从山海关正面打过去！”说完，怒气冲冲地掉头就走。

郭松龄走后，大家面面相觑，大半晌说不出话来。后来，还是姜登选先开口了，他说：“破坏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如此将领，正是该当何罪！”

姜登选说的“该当何罪”是平时哼惯了的一种舞台腔，并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的张学良。

非真欲以军法论处。可盛怒之中的郭松龄听信传言，再加上他所属炮兵团营长阎宗周被撤职一事，他就赌气把军队又调回了山海关。

这段情节，张将军对唐教授有详尽的回忆。

我在后方指挥部，他们打来了电话，说郭军团长把军队又都带回去了。啊！我就感到奇怪。后来一想，哎呀，我明白了！我就赶紧跟他通电话，我骂了他两句，我说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你怎么把军队带回去了？为什么？他咔嚓就把电话扔下了，不说话了。我一看这事要糟糕。那韩麟春就讽刺我说，你看你看，郭松龄叫你惯的。姜登选就对韩麟春说，你得了吧，别难为老弟了，你没看见已把我们的小老弟急死了，别管他了。我说，我得赶紧去。

我骑着马，夜间跑了九十里山路，我要找到郭松龄。我这个人啊，你知道，这些地方我处置事情从不含糊。当我看到我的军队回撤时，便问，为什么又撤回来了？他们说，这是郭军团长的命令。当时，我可以即刻下命令让他们再回去，可我没有马上这样做，我先让他们原地停止。

我问，郭军团长在什么地方？他们说不清楚，好像在前边。我就找了个电话，把他找出来了。他在一个小房间里，正在那儿睡觉呢。那时，天还没有完全亮。他一看我来了，感到很奇怪。那时，小店房有个后院，我就说咱俩到后头说去。

我说，茂宸，你要干什么，你说你要干什么？我是你的学生，也是你的后辈，我视你为我的老师、兄长、朋友，我最尊重你。可是，你别忘了，我现在是你的长官，你现在要约束点儿。我说，我来见你，带了根绳子没有？我拍拍自己的腰间，打开衣襟说，我今天什么都没有带，而你手中有枪，你要干这事的时候，那你该先把我打死。我说，你要不打死我，那我是你的长官，你就动不了，我就要给你下命令！你现在有两个选择，你要么把我打死，要么听我的命令，你自个儿选择，真的，你自个儿选择！

郭松龄说，我惭愧啊，我没有把山海关打开，我现在跟着人家，帮人家的忙，因为一件小事情，他们羞辱我。我现在不

去帮，我只求一死，我愿意自己去死。郭松龄说去死，决不是假话，他这个人是真能做到的。我说，那就好了，你既然决心要死，那就好办了。你说你给我丢人，你没把山海关打下来，你现在又决心去死，那你上战场去死！你拼着命往里打，你这样不是为我争了面子，你也得到好死了嘛。你死在战场上好不好？

郭松龄哭了，我常说他这个人，怎么像女人一样爱哭，郭松龄就是这样的性情中人。他听了我这一番劝告之后，点了点头说："好！"于是就又把军队带回去了。

那时，天也亮了，我说，我一宿也没吃饭，想喝点儿稀饭。

由于郭军两出九门口，晚上退白天进，这里是一段两山夹峙中的四十里长的山谷道，直军在山头观看，说，哎呀，妈呀，奉天到底来了多少军队？昨天白天进了一天，今天又来了。原来，他们以为我们来了双倍的军力，殊不知是郭松龄他老人家把军队又给带回来了，就好像作假一样。就这样，他老人家先声夺人，没管旁的，拼着命率部队往里打。

在战斗最激烈之际，奉军子弹忽告紧急，一、三联军只剩子弹二十万发。当时我非常着急，一面购买大批纸制鞭炮送往第一线，以代替子弹造声势；一面召集郭松龄等重要将领开会。

"我去奉天向大帅要子弹，如一周不回，咱们只有去内蒙索伦当匪。"我无奈地说。幸好数日后，我返回前方，带来了日本供给的步、机枪子弹四千万发，炮弹十万发。收到这些弹药之后，郭松龄率领四个旅出击，一举突破直军阵地，大军蜂拥而入，一下子就打到了秦皇岛。

由于奉军破坏了铁道，吴佩孚的所有军车都出轨了。我到山海关一看，七节车厢叠在一起，上千士兵横死沙场，血流成

河。张作相用手捂着我的眼睛，说你别看了。哎呀，军队到了这个地步，可惨了！

我有一个旅长，我后来奖赏他，让他当了张家口的都统。大家都很奇怪，因为都统那时差不多军长才能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当年当团长，他第一个打到秦皇岛。他给我写了个纸条回来，他说，军团长，你赶快派军队来吧，我逮着的俘虏，不要说拿枪，光拿嘴巴就会把我的兵吃掉，他一个团，俘虏了一万多人。兵败如山倒啊！我那小兵，拿着枪，一个人看管着成群的俘虏，叫那俘虏干什么，就得干什么，比如："架枪！""面冲里！""转过脸去！""不许往外看！"一切尊严皆无。所以，我就说，看到这个样子，我们带兵的，该有多难过！我是当军人的，想想这个职位，看到这个情景，我就难过！

就这样，我们把吴佩孚打得落花流水。我的弟弟常常说我侥幸成功，我跟我二弟讲，你哥哥有今天，是把脑袋拿下来干，是拿命换来的！

正当直奉在山海关血腥鏖战之际，冯玉祥却在怀柔按兵不动。原来，冯玉祥已与张作霖秘密勾结，当他得知直军前线危急，奉军胜局在握时，决定马上倒戈，回师北京，在吴佩孚后方放一把火。

冯玉祥倒戈与我有很大关系。那时我们秘密勾结谁也不知道，是一个牧师，姓刘的，奉天青年会的一个主干事给我们拉的关系。冯玉祥倒戈那五十万元钱，还是我在车站交给他的。

十月二十一日，冯玉祥班师回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直系首领曹锟，并"逼宫"驱逐溥仪出宫，废除了清帝名号。

二十四日，吴佩孚的直鲁豫巡阅使职务被解除。次日，冯玉祥等人在北苑召集军事政治会议，决议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请段祺瑞出面先改组政府。同时，冯玉祥又将其所部改

称“中华民国国民军”。

与此同时，吴佩孚召集紧急军事会议，向部属通报北京兵变及总司令部的退却计划，自己则连夜乘专车退抵天津。

此时，奉军又乘胜发动了心理战：派大批飞机空投劝降书，广传北京政变消息，宣称直军归路已断，主帅已逃，惟有投降才有生路。更有甚者，素被吴佩孚瞧不起的张宗昌，此时率领包括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组成的外籍杂牌军，突袭冷口，直逼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并南下与张学良所部汇合，围堵秦皇岛的直军。李景林部也疾速向天津方向推进。

十月三十一日，自山海关到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部丧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大队人马长驱直人，猛扑塘沽，与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部遥相呼应。

吴佩孚退守天津后，原想集中残部决死一战，并电苏、浙、鲁、鄂、豫等省求援。不料山东郑士琦突然宣布“武装中立”，并派兵炸毁韩庄铁桥，阻止援军过山东；阎锡山亦出兵石家庄，截断京汉路之交通。吴佩孚获悉后，如巨雷轰顶，惊得连话也说不出来。正当他走投无路插翅难逃之际，幸好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为他准备了一艘运输舰，供其逃命。

“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属运穷命蹇，自念尚不足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兵，浮海南下，先至青岛体察形势，再定行止。”英雄落难，吴大帅流下了两行热泪，黯然地说道。

第二次直奉战争，历时两个月，直军大败。对此结局，吴佩孚真是作梦也没想到。

究其原因，从军事观点看，奉张自整军经武后，军力大增，张学良、郭松龄部素质尤优，战法新颖；而直军仍采旧式战法，前方打持久战，后方空虚。奉军后勤充裕，装备齐全，粮草无缺；而直军则多为临时采购，军费又极欠缺。奉军追击

炮极多，射击精确，飞机新式，威力颇大，机枪大炮不仅自造，又多从俄、德、日购买；而直军的武器则多系汉阳造，威力大为逊色。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应齐全；而直军装备欠缺，素不耐寒。



第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着西装的张学良。

就政治而言，吴佩孚手腕乏术，对外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的大联合，致使关键时刻冯玉祥倒戈；再者，吴佩孚本人盛气凌人，导致内部高级将领离心离德。

经此一战，由于张学良、郭松龄用兵巧妙，将校用命，兵锋犀利，势如破竹，两人遂成为东北军中两颗耀眼的武将明星。

我一生常自许，不怕死，不贪生，不屈服，不卖国。

要说我在历史上的笑话，可多了。在山海关作战的时候，你说我跑到哪儿去了？我跑到秦皇岛去了！我在秦皇岛打网球，还洗了个澡。我是跟着英国海军的船去的，一艘小划艇来把我载到秦皇岛，人家对方的阵地我都看见了，人家要知道，就把我俘虏去了。我部下说，你这不是开玩笑，你这是冒大险。这都是我干的事儿。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奉军以寡击众，大家心里都很毛，张学良就对奉军副军长韩麟春说，我们这仗打输了，那就完蛋了；打赢了，奉票一定大涨，我们买了必可大赚一票。于是，张学良与韩麟春两人各买了七十万的奉票。

不久，仗打胜了，奉票果然大涨。但张学良以凯旋之师入关，又交了女朋友，在天津玩昏了头，竟忘了抓紧时间兑换。后来，等到郭松龄倒戈，奉票又大跌，银行来催款，说张学良亏空了四十万。张学良赶快去问韩麟春，韩麟春说："我的都卖了，大赚了四十万，你要，我补贴你好了。"张学良说不要，又从别处找来钱补了亏空。

张学良说他向来不会管钱。早在他刚出道时，直系老军人靳云鹏就告诉他："你要成就大事业，必须如袁世凯一样'杀人如麻，挥金如土'。"张学良说前者难办，后者倒好办。

"菜一律要精选高级品类，多花点钱不要紧。"奉军大胜后，张作霖特别高兴，于农历九月初九在奉天帅府大摆宴席，犒劳他手下的师旅长们。

宴会在老虎厅里举行。张作霖邀大家举杯，他用异常宏亮的声音说："各位将领，今天这桌宴席是特为各位劳苦功高的将士们准备的，客一定要陪好，祝大家多吃多喝！"

"谢大帅！"大家齐声高呼，随即推杯换盏，开怀痛饮，庆贺胜利。

第十三章 问鼎京畿

1924.11

——“什么‘妈拉个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都要统统取缔！”

——“孙先生要紧的是跟我说了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那时，我在上海最出风头了。”

我那大儿子，很可爱，他爷爷很喜欢他，他总是跟他爷爷开玩笑。那时要进关了，召集军官训话，我父亲就一个劲地妈拉个巴子地骂个不停，说妈拉个巴子你们听好，这次妈拉个巴子的仗，你们妈拉个巴子不给我打好，妈拉个巴子打败了，妈拉个巴子，我就把你们妈拉个巴子的都枪毙了。我儿子后来说，爷爷，你骂人家妈拉个巴子，一个，二个，七个，八个，不知骂了多少遍，我都给你记下来了。气得我父亲直吹胡子，可又没办法。

人家骂我们东北军蛮横，凑了这样一首打油诗："头带风浴帽，身挎盒子炮，后脑勺子是护照，妈拉巴子是免票。"

奉直战争之后，奉军源源入关，张氏父子进军京畿；与此同时，孙中山应邀离粤北上。

十月二十七日下午四时，张作霖的专车由关外先期抵达天津车站。站台上人山人海，挤满了欢迎的人群。其中头面人物有段祺瑞、段芝贵、徐树铮，还有天津市重要人物及东北军的张宗昌、李景林。

下车时，张作霖走在前头，杨宇霆、郑秘书长、莫德惠、张学良紧随其后。张大帅下榻处是大军阀曹锟在天津的公馆曹家花园。

曹家花园是曹锟在任第三镇统时，从一个姓孙的有钱人手里买下来的。该园占地面积二百余亩，是奉天大帅府的三倍大，后又大兴土木，重新修葺一新。园子里有亭台楼阁、异兽珍禽、养鱼池和各种花草树木，环境优美。

第二天下午，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等前来拜访张作霖，张学良、杨宇霆等一起招待客人。这次会议决定拥段祺瑞为"临时执政"，在前台主持政务。

客人告辞后，张学良回到客厅，召集东北军的军官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

我说："这次进关要改善军风，一定要把东北军的歪风邪气扭转过来。什么'妈拉个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都要统统取缔！要设个军警稽查处，每师、旅、团、营都要设大帅的'大令'。如果谁敢砸戏园子，砸窑子，搅闹街局，一定要枪毙！"

说到这儿，我父亲笑着摇了摇头，他的意思是要庇护东北军将士，给他们一点自由。

我没理父亲，仍然异常严肃地接着说："吃饭、坐车、看

戏都要给钱；五个人以上上街要有一个人负责；尤其是司令部和帅府的人更要遵守纪律。”

我的话音刚落，父亲就笑着点点头说：“这对，这对。”

我继续说：“明天，在戏院、饭店等一些公共场所设置稽查处，每处都要放上大帅的‘大令’，如有违犯者，一律带到稽查处严加惩治。”

第三天早饭后，大帅下了命令：每人晋升一级，立特等功者升两级。

仗打胜了，大帅的许多下属被任命为省长、督办，大帅府也改为“镇威上将军府”。

在天津住了几天后，十一月十四日，张作霖乘车进京。当专车驶进北京车站时，段祺瑞、冯玉祥等一些要员都在车站迎候。站台上鼓乐喧天，礼炮声阵阵。张作霖走下火车和欢迎者一一握手，然后驱车直奔西城顺承王府。

张作霖在北京一共呆了八天，这中间开了一次会议，并和冯玉祥举行了会谈。不过，这次会谈并不成功，相反，倒加深了冯、张两人的裂痕。

“北京城里有多少东北军？”会谈后的当天晚上，张作霖问儿子张学良。

“就只剩下一个一〇八团了。”张学良如实回答。

这时，坐在一旁的总参议杨宇霆沉不住气了，神色不安地劝道：“大帅，咱们还是回天津吧，然后再召冯玉祥去天津会谈。”

张作霖沉默了好一会儿，从他的目光里可以看出他的焦虑。

“要走，咱们就快走，我担心冯玉祥这小子不怀好意。”斟酌再三，张大帅还是觉得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这时，张学良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劝父亲说：“冯玉祥是

个正人君子，我看他决不会做出什么坏事的。”

杨宇霆忙抢着说：“不行，得赶快走，时间长了会有危险。”说完，他就去要车，然后，三个人携秘书直奔前门车站。

张作霖抵津后，马上给冯玉祥拍了一封急电：“焕章兄，请来津会谈。”冯玉祥见电报后，不禁哑然失笑：“这个张大帅，也太胆小了。”他只好和其他一些官员应邀来到天津。

双方见面后，冯玉祥对张作霖说：“雨帅，您太多心了，我冯某绝不是那种人，请您放心好了。”

这时，孙中山先生应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的邀请，欣然北上，共商国事。

十二月四日，孙中山先生抵天津，随同者有夫人宋庆龄及李烈钧、戴季陶等人。码头上，人群簇拥，军乐齐鸣，欢声雷动；街道上，鞭炮震天，商民咸庆，夹道欢呼。孙中山先生抵津的当天，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一同抵孙中山先生下榻的住所拜会。

第二天，孙中山先生来到张作霖的行辕曹家花园回拜，李烈钧、孙科、邵元冲和汪精卫同行。孙中山从容地走下汽车，态度安祥，气宇不凡，手执文明棍，缓步迈上台阶。

张作霖站在楼门口迎接孙先生，到客厅入座后，军政要员们一一上前同孙中山先生行见面礼。这时，张学良也上前行大礼：“给孙伯父请安！”

宾主寒暄后，双方开始会谈。

“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孙中山先生称赞道。

“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贺？”张作霖回应说。

李烈钧见状，解围说：“事虽如此，但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等人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

李烈钧寥寥数语，使张作霖非常高兴，放声大笑起来。孙中山先生乘机接着说："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

这时气氛遂转和谐，宾主交谈甚欢。会谈中，孙中山先生详谈召开国民会议、订立建国大纲、废除不平等条约等谋求国家统一之道。最后，张作霖只淡淡地回答说："先生这许多主张，请与'合肥'商量吧，只要'合肥'同意，作霖当然服从。"

张作霖这里说的"合肥"，指的是段祺瑞。

会谈结束时，孙中山邀请张作霖进京后再谈。

此时，冯玉祥和张学良很谈得来。他们两人都拥护孙中山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想推孙中山先生为执政。但是，张作霖反对，因为他害怕革命。

会后，张作霖举行了盛大宴会，为孙中山先生接风洗尘。张作霖特地派人请来京津著名宫廷厨师王老相上灶，烹调的菜肴具有御膳的独特风味。精选的菜肴有凉有热，凉菜有清蒸鹿尾、生菜龙虾、芦笋拼鲍鱼、火腿拼松花；热菜有一品燕菜、冬笋鸡块、清汤银耳、白扒鱼翅、虾仁海参、清蒸鲥鱼、鸽蛋烧油菜、腐竹烧鸭腰、蟹黄豆腐等，色味俱佳，满座皆欢。

孙中山先生告辞时，张作霖亲自送出大门，并转身对张学良说："中山乃伟人也，名不虚传，彼有容人之雅量，吾服矣！"

中山先生一行回到旅馆后，杨赓笙询问会见情况，汪精卫抢先说："险哉！险哉！今日乃鸿门宴也！"李烈钧听后讥笑道："如此胆力，岂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

在场的人闻言，同声大笑起来。汪精卫紧锁双眉，面红耳赤，甚为窘愧。

孙中山和张作霖的会见，虽然彼此之间政见不同、但相互

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天津会晤后，张作霖曾对汪精卫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非常难说话的人，今日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只是北京各国公使都不赞成孙先生，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缘故。你可否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包管叫各国公使都愿和孙先生要好的。"

显然，张作霖想用软办法使孙中山放弃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不久，当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叶恭绰到天津欢迎孙中山时，孙中山先生当面质问他们："听说临时执政已经接受了外交团尊重不平等条约的通牒，是不是？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执政偏要尊重不平等条约！你们要升官发财，惧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呢？"

很明显，以段祺瑞为首的军阀实力派，是不愿接受孙中山的反帝联俄主张的。至此，孙、段、张三角同盟，尤其是孙、段之间，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更为不幸的是，孙中山先生在天津病倒了。

他的病你知道是怎么来的？他就是因为见我父亲后病倒的。他本来就有病，见我父亲后，那天很冷，但屋子里挺热，他伤风感冒了，病情发作。他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孙夫人也是那天见到的。

孙先生要紧的是跟我说了几句话，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对我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让我坐下，他跟我讲，现在国家的责任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是东北人，当然他不是特别指我的身份地位。你们东北介乎于日、俄红白两大帝国主义势力之间，你们很难应付，尤其是东北的年轻人，责任就更重。

所以，人家说孙中山亲俄，不对，他这句话明显地把苏俄说成是红色帝国主义。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东北军势力迅速扩大。段祺瑞以临时

总执政的名义发布命令，加官晋爵：令张作霖节制指挥东三省军政事宜；张作相、吴俊升督办吉林、黑龙江军务善后事宜；李景林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令阚朝玺为热河都统；张宗昌为苏皖宣抚使、第一军军长；韩麟春为第二军军长。不久，段政府又任张宗昌为苏皖鲁剿匪司令；杨宇霆督办江苏，姜登选督办安徽。

这样，奉系又夺得四个督办一个都统的权位。北起热河，南至苏皖，完全划入奉系的势力范围之内，其总兵力达三十五万之众，几乎是战前的两倍。这是奉军的鼎盛时期。

张学良和郭松龄率第一、三联军攻下秦皇岛后，收编降军共五万余人，新增编了六个旅，总兵力已达六个陆军师及两个骑兵师，又扩编了炮兵两个旅。特建津榆驻军司令部，张学良为司令，郭松龄为副司令。司令部驻天津，部队分布在京奉路沿线，东自锦州，西至廊坊。张学良所部是奉军中的精锐，但由于他忙于办空军，所以就把实际指挥权交给了郭松龄。

当郭松龄军权在握之际，杨宇霆曾向张作霖进言，郭松龄和张学良相处得太近，而且郭松龄兵权日重，恐生后患，应该予以适当的裁制。张作霖也认为杨宇霆的意见值得重视。不料，这一担扰不久后竟成为事实。

一九二五年，中国的北方成为奉军和冯玉祥国民军的势力范围；直军战败，吴佩孚逃往汉口，重整旧部，号称苏、浙、豫、皖、陕、晋、湘、鄂、川、赣、黔、桂、闽、粤十四省联军总司令，实际上仅控有湘、鄂两省；孙传芳占据长江下游，控制着苏、浙、闽、皖、赣五省。至此，中国的局势呈魏、蜀、吴三国鼎立之势。

这一时期，身居少帅地位的张学良，对政局的态度与其父亲略有不同。十二月一日，北京大学召开欢迎孙科、张学良两大公子大会，张学良发表演讲说："军人之所以成为军阀，因

不仅问分内事，而且干预分外的政治。我决不愿成为军阀。但作苦事，不争权力。”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中山由天津赴北京，受到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院校师生、各团体代表及二十余万市民的欢迎。北京站前人山人海，争睹这位民国伟人的风彩。孙先生虽重病在身，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

翌年，自一月二十日以后，孙先生体内的癌细胞已经四处蔓延，病情加重。弥留之际，孙先生安详地留下最后的遗言：“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三月十二日上午九时半，一代伟人，首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了。北京政府决定予以国葬，国内各机关及北京公使团下半旗，三日致悼，全国举哀，万民雨泣。

至此，孙、段、张“三角同盟”亦告终结。但由于统治大半个中国的直系军阀被摧毁，这就直接推动了南方革命运动的兴起，一时间民众运动空前活跃，华夏民气空前高涨。

一九二五年，划时代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张作霖以“民族利益的保卫者”自居，积极支持这一反帝爱国运动。他还支持罢工工人的募捐运动，并亲自捐款二万元，奉系各省督军每人捐款五千元，张学良捐款二千元。

那时，北京政府派我到上海，我带着两千人的学生军队，这是我办的一个比讲武堂低一级的专门造就军士的班，就带着那批学生去的。那时，我在上海最出风头了。

十三日晨，我率队到沪，派兵分驻华洋交界处，以示保护居民。

两天后，我接见华侨学生会等各界代表。

我说，我此次来沪，一则因沪军官冲突案；一则因西捕惨

杀案。我亦属国民一分子，很愿以个人的资格，据理力争。至于带兵来沪一事，因在天津听说沪案发生后，外国人纷纷征调海军陆战队登岸保护治安。所以在我国领土，我亦不得不带兵来沪，保卫华人生命财产。

二十二日，张学良委派旅长邢士廉为淞沪戒严司令，警察厅长常之英为副司令，并即日宣布："为保全地方安宁秩序起见，华界戒严。"

赴沪期间，少帅张学良与时为上海名门闺秀，尚小姑独处的宋美龄首次见面，立即被她出众的气质所倾倒，称她"美如天仙"，随后还与宋美龄约会了几次。晚年，少帅曾笑着对王冀教授说，若不是当时已有太太于凤至，他会猛追宋美龄。大约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正在追宋美龄，且追得很凶，还跟着到了东京。

那时，张学良年仅二十五岁，连年内战已把他锻炼成一个能征善战的将领，他的脑子里虽然想的是如何为他父亲斩关夺将，开疆拓土，但也开始产生反对内战、反帝和反军阀统治的思想。

八月间，温树德归依奉军，东北海军接收了渤海舰队，张学良亲赴秦皇岛检阅渤海舰队，这样，奉系军阀又在海军方面扩大了实力。此时，张学良心目中新的蓝图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大的海陆空齐备的东北军事集团。

这时，张学良已晋升为陆军中将。十月，他出任第三军团长，下辖姜登选、韩麟春、郭松龄的三个军，总计七万余人的奉军主力部队。

殊料，江浙局势突起风云。原来，一向亲奉、颇受张作霖赏识的孙传芳一反常态，不甘心长江下游被奉军掌控，暗中联合直系和有关各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十月十五日，孙传芳以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讨伐奉军。

二十日，孙传芳抵南京，即令军队过江追击奉军。张作霖急令张宗昌统帅援军抵徐州，准备与孙军大战一场，并调张学良和郭松龄的军队入关助战。

十一月初，张宗昌与孙传芳在固镇一带激战。当奉军与孙传芳激战之际，冯玉祥一再表示中立，实际上，他正窥测时机，随时准备伏击奉军背后。

这时，段祺瑞的北京政府同冯玉祥一样，一唱一和，两面讨好。表面上，一再通电要各方息事和谈，明里安抚张作霖，暗中则纵容江、浙、皖系势力抬头，以便对张作霖的势力有所牵制。

在这种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和巩固京津地盘，张大帅不得已只好下令张宗昌退守山东，褚玉璞等部由宿县、徐州退回到韩庄、临城一带。八日，孙传芳军占领徐州，至此，津浦南段的战争暂告结束。孙传芳以东南五省联军首领自居，在东南五省割据称王。

但是，张作霖并未就此罢休，他称霸东南的野心未泯。不久，奉军又积极筹划进行两面作战：一方面要兴师对付冯玉祥，一方面欲再次挥军南下，与孙传芳等人一决雌雄。

十一月十四日，张学良奉大帅令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殊料，郭松龄和李景林一反常态，拂逆帅命，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力主奉军收缩战线，退回关外。

然而，此议不仅没有被张作霖采纳，反而遭到其严厉斥责，由此而激起了郭松龄举兵反奉的重大事件。

第十四章 郭军倒戈

1925.11

——"我说，你就是叛变了，你也出不了我的手心。"

——"要不是我的部下看守着我，我真是要自杀，要投海了。"

——"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是老师行，还是学生行。"

二次直奉战争胜利后，不占地盘之誓并未遵守。杨宇霆做了江苏督军，李景林、张宗昌也有了地盘，惟独郭松龄功高不赏。郭松龄说，算我倒霉，谁叫你是他儿子，可我是你部下，在你底下，可把我压死了。郭松龄倒戈前几天，十一月十四日，我与郭、李等在天津开会，向郭松龄、李景林转达老帅进攻国民军的密令。郭、李反对动武，力主和平。会上，反老帅之气氛已很浓。郭、李皆对杨宇霆无功而霸江苏却又失地迫返

而感到不满，郭松龄沉默不语。我说，大家稍安勿躁，我给大帅打电话说一说。不料，大帅在电话中骂了我一顿，叫我回奉天。我回到会场，告诉他们说，我去劝劝大帅，马上就回。李景林说，不知道回得来否。我知道事情有点儿不妙。

对郭松龄的反奉活动，当时，张氏父子已隐约察觉。天津会议之后，十一月二十日，张学良去医院探望郭松龄，劝他到奉天直接陈述自己的意见，以释误解。

“东北的事情都叫杨宇霆这帮人弄坏了。”郭松龄气愤地对张学良说，“这次江苏失败，东北军断送了三个师，奉军声誉扫地。败了回来后还包围老将，再叫我们去卖命，给他们打地盘。打下地盘，又得被留学生抢去，这个炮头我是不愿再充当了。”

“上将军脑筋陈旧，在群小包围之下，恐已无可挽救，建议‘父让子继’，由你张学良接任镇威军总司令，改造东北政局，我愿竭诚予以拥护。”郭松龄又正色向张学良进言道。

张学良衔进兵命令而来，骤然听到郭松龄说出这番话，不禁骇然，但他未动声色。对郭松龄之拒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好黯然而返。

不久，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二军接防保大，与奉军发生冲突。张作霖勃然大怒，在帅府召集军事会议，拍案大骂“主和派误我”。他问杨宇霆，孰为主和最力者？杨宇霆说是李景林、郭松龄。张作霖欲即召二人回奉。杨宇霆等均以为李、郭地位重要，不可轻易调动，只可缓图。张作霖不听，竟发急电，令李景林即日夺回保大，驱逐豫军自赎；令郭松龄所部集中滦州，回奉听候面令。郭松龄则以病为遁词，拒不从命。

我说，茂宸，万一你有什么事情，我一点儿不在乎。假如你就是叛变了的话，我也问心无愧。我父亲骂我一句话，说，你除了你老婆不跟郭松龄去睡之外，你甚至吃一个水果，都要

分给郭茂宸一块。所以，我当时就有这个意思，我说，你就是叛变了，你也出不了我的手心。换句话，你的叛变我能把你制止。到后来，他真的叛变了。

张学良在奉天大帅府住了三天，十一月二十四日，又乘专车返回天津。当火车走到离山海关还有一站时，车停了，站长向张学良报告说山海关铁路遭到破坏，不能再往前走了，张学良闻讯大惊。

“报告军长，山海关铁路破坏任务已经完成。”工兵连长杜维纲报告说。

“谁叫你破坏的?”张学良大吃一惊。

“不是军长有命令吗?”杜连长困惑不解。

那时，一、三联军的印章刻的是张学良和郭松龄两个人的名字。一切军务，张学良都放心大胆地交郭松龄全权办理。

闻报后，张学良知道出了问题。从山海关方面过来的人都说郭松龄倒戈了，张学良恍然大悟。他让火车倒退到连山，又转到葫芦岛，连夜乘镇海兵舰前往秦皇岛。

二十五日天一亮，张学良站在甲板上，拿望远镜一看，只见兵车一辆接一辆，拥挤不堪，这是郭松龄正在调兵遣将呢。

这时，郭松龄发表的反奉通电军舰上亦已收到。舰炮长向张学良报告说：“军舰上的主炮可以有效地射击铁桥上的兵车，请示是否可以开炮?”

他老先生叛变的时候，他给奉军所有的部队打了个电报，说是公举我当东三省总司令，当奉天的省长。事发后，我坐船到了秦皇岛，要去见他，他不见我，他不见我这是小事呀。可我接到奉天发来的电报，这电报很奇怪，开头称我为张汉卿先生阁下，后面签名是张作霖、王永江。我父亲喊我张汉卿先生，你说叫我难过不难过？这个电报说，现在那些个军队公举你当东三省总司令，请你回来接事吧。你说，我看了之后，心

里有多难过？要不是我的部下看守着我，我真是要自杀，要投海了。

真的！那个时候，大家也不明白这个叛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连我的部下也不知道，不懂得。开始时，大家都不知道这事儿我在什么位置上。你明白吗，开始都怀疑是我们俩个人闹的鬼。你知道，因为我们两个人太好了！那么，现在叛变了，后来怎么样，后来人们一直都认为我是叛军总司令，他是副司令。

事态异常紧急，在秦皇岛的兵舰上，张学良马上召集幕僚开会研讨对策。

当时我在会上语重心长地说道，东北的问题，我要和郭松龄亲自谈一下。只要我们俩一谈，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需要动武，东北军内部从来没有打过仗。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不要开这个战端。如果东北军在东北打内战，日本人一定要干涉，这对我们东北不利。

“你不能去，你去了，万一他把你扣下，挟天子以令诸侯，那就不好办了。”众人一致反对，我终于没有下船。

商量结果，由我写一封亲笔信，请郭松龄到船上来谈。我在信中写道：“这种内战一旦发生，后患无穷，有可能引起日本军队干涉中国内部争端，负有丧权辱国的历史罪孽，应三思而行。因此，我请茂宸军长亲自到兵舰来一趟，我俩人慎重研究解决问题。特派伊雅格持信见你，同伊雅格随行的人有随从副官陈大章和吴景山两人。张学良手书。”

陈大章回忆说：“我们坐上小汽艇开到岸边。吴景山留下看船，我跟伊雅格上岸到火柴厂去面见郭松龄。郭松龄看完信后，跟伊雅格说：‘军事时期，我不见他，军事完了回天津，我再见他。’郭松龄不见张学良，说明他反奉决心已下。我们回到兵舰上，伊雅格向张学良汇报了送信的经过。张学良一言

不发，沉默思考。”

原来，郭松龄、李景林在接获奉天张大帅的进兵令之后，加快了反奉步伐。

十一月二十二日，郭松龄与冯玉祥签订了“同志结合”的条约。同日，郭松龄在滦州车站一个停业已久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了百余人的军事会议。

会场四周戒备森严，弓上弦，刀出鞘，气氛紧张，如临大敌。郭松龄身披黑呢大衣偕夫人韩淑秀出席了会议。

“今天我要宣布一个重大的决定：请老将下野，请汉公少帅主持军政。各位听了也许觉得很惊骇，可是这是今天救东北、救奉系惟一的一条路。”会议上，郭松龄首先发言说。“若干年来，为了一两个人的野心，年年用兵关内，一声令下，死伤无数，我每次回到关外，总有无数的家庭向我诉说他们的子弟战死沙场，尸骨无存，又没有抚恤。百战勋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赏给，谗佞小人却受到老将的宠信。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到奉天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我今天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决心率领你们出关，请老将下野，请少帅出山，我们大伙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

随后，郭松龄又历数杨宇霆助纣为虐之罪状，然后，拿出已准备好的花名册，请大家签名。郭松龄说：“我这样的行动等于造反，将来成功固然无问题，倘不幸失败，我惟有一死而已。”

夫人韩淑秀在一旁接着应声道：“军长若死，我也不能活着。”言毕，以手帕拭泪。出席官佐均默默无语。

当夜，郭松龄发出“养电”，要求张作霖即日下野。郭松龄又拍案点将，把自己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四个军，第一军军长刘振东，第二军军长刘伟，第三军军长范浦江，第四军军长霁

云。同时，任命魏益三为参谋长。

反奉通电发表的当晚，姜登选刚好经过滦州，被郭松龄截留，两日后杀掉。齐世英闻讯大惊，马上跑去见郭松龄，郭松龄说："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此举显示了郭松龄度量之狭窄。

杀姜登选很不得人心，因为姜登选在奉军中为人平和，甚孚人望。事后，韩麟春说："郭茂宸如果不杀姜超六，事情还是可以转圜的，可是他无故杀人，总是要偿命的。"

在滦州起兵时，郭松龄仍以张学良军团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出兵后不久，才将所部正式改名为"东北国民军"。

起初，郭军认为奉天省城没有重兵把守，准备实行偷袭。不料，军情泄露，偷袭部队遭到伏击，郭松龄不得不率主力部队正面出击。

二十五日，郭军一鼓作气，开出十余列军车，浩浩荡荡杀向山海关。二十六日，占领秦皇岛。二十七日，攻夺山海关。二十八日，进入绥中。奉军抵抗不力，纷纷向锦州败退。

"小六子相信郭鬼子，坏了大事！"

"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当李世民，要清君侧！"

面对郭松龄的突然起兵，张作霖慌了手脚，困在大帅府里，大骂张学良。但他毕竟老谋深算，为去掉郭松龄反奉口实，他当即罢免了杨宇霆；同时，命令张学良竭力"内抚郭氏"，与之"疏通"，劝郭松龄罢兵。随后，他又亲自指派了说客，前往面见郭松龄。

"我所要说的话，在宣言中都作了充分阐述，再也没有必要会见张学良，已没有接受他的劝告改变主意的任何余地了。"郭松龄毅然道，态度相当强硬。

"见一面，把话说完再打也无妨嘛！"日本守田医师奉张大帅之命劝导说。

“那么就见见吧，最好不要带兵来。”郭松龄说。

“这样做学良会被扣押。如果同意会见的话，希望选定一个适当的地点，双方前往。”奉张作霖之命前来的仪峨少佐提出了完善之策。

“若是那样的话，就没有和张学良会面的必要。”郭松龄拒绝道。

二十六日夜，守田一行与郭松龄告辞，登上了停泊在秦皇岛海面上的镇海舰，见到了愁容满面的张学良。

“实在没有死心，想麻烦各位再辛苦一趟，再去劝劝郭松龄。”张学良不愿轻言放弃。

二十七日，郭军抵昌黎，守田第二次前往郭松龄驻地，再交上张学良用铅笔草写的一封信。信中，张学良首先向郭松龄问候病情，然后写了几句悲痛的词句：“倘吾沦为天涯孤客，必无后会之期。”信的末尾写道：“向夫人致意。”

郭松龄看完信后，面露悲痛之色，看了一下身边的夫人，把信递给她，只说了一句话：“信上也提到你。”郭松龄静坐无言，眼中含泪，闭目良久，颇有断肠之感。于是，守田抓住这个机会再进忠言，劝郭松龄不可起事。

二十八日晨，郭松龄对守田说：“此次举兵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现在已不能终止。我已经四十二岁，这样的病体，也许活不了多久了。如果张上将军痛改前非而下野的话，请张学良到日本去留学三四年，我自己的经纶抱负实现一部分之后，就将位置让给张学良君，自己愿意下野，静度闲云野鹤的余生。这不是假的，是真的。为此，请吉田总领事、白川司令官等做保证人也可。”

张学良在秦皇岛徘徊一天之后，见郭松龄已经铁了心，无计可施，遂转到大连，与正在大连的杨宇霆同返奉天。这时，郭军前头部队已占领了连山。

十一月三十日，张作霖发表讨伐郭松龄的命令，任命张学良为前线总指挥。此时，张作霖情绪极为沮丧，甚至已有要逃走的念头。

“您老此时走太早，老郭打到新民府再走也不迟，锦州还在咱们手里，前边尚有不少队伍啊，您老忙什么?”杨宇霆安慰张作霖道。

当时我也劝父亲说，您老在奉天坐阵，我去前方布防，把郭军引到兴隆店，等各路援军到齐，一举可把郭军歼灭。我若顶不住郭松龄，就不是您老的儿子。

此时，张作相、杨宇霆、张学良集结军队，决心利用连山至塔山的有利地形，遏止郭军。不料，郭军不惧天险，不畏严寒，身着单衣，在朔风白雪中冲锋陷阵，一举摧垮了奉军的防线。

十二月五日，郭军进占锦州。六日，猛攻大凌河防线，张作相所部如惊弓之鸟，全线溃败。八日，郭军已准备进兵新民府、兵分两路夺取奉天了。消息传来，全城为之大惊，商店关门，文武百官，纷纷逃避；谣言频传，人心惶惶，一片混乱。张作霖预感到末日来临，整天躺在小炕上抽大烟，口口声声大骂小六子混蛋，骂一阵子又回到炕上继续抽。

这时，大帅府外也堆满了柴草，准备郭松龄来了就放火烧掉。当时奉军为了与郭军区别，官兵都发一块黄布围在脖子上。百姓都说“奉军黄到脖子上了”，意谓垮台在即。

在此关键时刻，守田医师带着一个腹案，第三次前往会晤郭松龄。守田的方案是：排除杨宇霆，同时让郭松龄也下野，为保持张作霖的晚年名誉，让他继续担任现职一年，然后让位给郭松龄支持的张学良，这样对谁都体面，而且各方都能接受。但郭松龄固执地予以拒绝，只是说，在巨流河会战之前，张大帅如能下野，绝对保证其全家的生命、财产安全。至此，

守田无功而返，郭松龄感到自己已稳操胜券。

日本对郭松龄的起事也很紧张。他们意欲乘机插手，乘机要挟，进一步攫取南满特权。张作霖为了应付危急局面，曾口头上答应了日方的要求。但事后就不认帐了，没有履行诺言。这也是皇姑屯炸车的一个伏因。

刘鸣九回忆说："郭松龄反奉最紧张阶段，日本声明南满铁路二十华里以内不准有军事行动，这对张作霖很有利；郭军未能直取奉天，以至失败，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十二月十五日，郭军进抵新民府，奉天咫尺在望。张学良率军退守辽河，奉、郭两军隔着巨流河准备决战。

在巨流河布阵与郭军决战，好似命中注定。巨流河一带地形我很熟，以前在讲武堂时，我与郭松龄就在这里演习过，那时，我是他郭松龄的学生，演习时打过一回仗，演练过攻防战。这时，我就给他写了一封信，说这次不是演习了，是真打，你曾是我的教官，现在让我们看一看，是老师行，还是学生行。

此时，吉、黑两省大批援军迅速赶到奉天前线，张作霖拼凑了七八万兵力，自封"讨逆军"总司令，以杨宇霆为参谋总长，右翼为张作相的第五方面军，左翼为吴俊升的第六方面军，中路是张学良临时组成的第三方面军。

二十二日拂晓，郭军主力霁云部发起猛烈攻势，突破奉军防线，占领了新民府，乘胜对兴隆店张学良的司令部形成包抄之势。

等郭松龄到了新民府，那他差不多是完全成功了，他就把我这个总司令给取消了，免职了。为什么免职了？因为他知道对面是我了。我在对面跟他拼，我还照样给他写信，跟他开玩笑。这时，他自己就任了总司令，这是他的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是他把我的信都公开了，给我的部下看了。他这是什

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以此来表示我对他最好。可是，这样一公开，真相大白，那些旅长、团长就不接受他的命令了，很多人不打了。

“那炮兵司令邹作华的炮弹射出去不爆炸，也是这个原因吗？”唐教授不解地问道。

那是假话，不但是假话，那邹作华当时是真心帮他。

战况瞬息万变。夜幕降临，张作相从右翼出击，偷袭了刘振东的后部；吴俊升从左翼出击，抢占了柳河沟，偷袭了白旗堡，焚毁了郭军全部粮秣、枪械。

二十三日上午，中路张学良所部乘势大举反攻，以猛烈炮火轰击新民前沿郭军阵地，并派飞机投掷炸弹。郭军陷入重围。

为挽回颓势，郭松龄亲立于阵头督战，但郭军此时已成强弩之末，军心涣散，士兵厌战。军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吃张家，穿张家，跟郭鬼子造反真是个冤家。”郭松龄的军旅长也都在前线与张学良接通了电话。郭松龄给旅长下令，旅长把命令给退了回来，给团长下令，团长也给退了回来，大家都不愿再打了。

戢翼翘当时就在张学良身边。他回忆说：“司令部设在车厢里，我们都在车厢里办公，也都睡在车厢里，汉卿的包厢就在我们办公车厢的旁边。最有趣的是两军对垒，我们的统帅包厢竟有电话线通到敌方去，两三天内电话不断，而所有通往新民府的电话全部由张汉卿自己接。我看到他接了电话后，有时很懊丧，有时心情又比较开朗。”

二十三日晚，郭松龄召开军事会议，众将默然。郭松龄深感大势已去，黯然道：“你们都不愿意打了，现在就是因为我。我走，你们跟奉天接头就是了。”

当时司令部有阿拉伯马十余匹，每小时能行八十余里，但

郭妻及文士们不能骑马，郭松龄患难之际不忍弃之，他决定与夫人同乘四套马的民间大车逃跑。

这时，穆春所部的骑兵旅长王永清得知郭松龄向营口方向逃去，便穷追不舍。暗夜中，郭松龄的一名随员衣兜里装有郭松龄的名片，沿途随撕随扔，被王永清部队拾得，因而尾追更紧。追至老达房附近，两军相距已近在咫尺。郭松龄不得已慌忙进村入菜窖躲藏，尾追官兵掀开窖口大呼："请总司令上来！"事已如此，郭松龄只得出窖，束手就擒。

郭松龄曾说，机关枪一出世，骑兵可以休矣，哪知他却栽在骑兵的铁蹄下。

张作霖得知郭松龄已被抓，狂喜不已，立即电话吩咐穆春师长说："妈拉个巴子的，我得叫他来，问问他。你们好好地看着，别叫他寻了无常，等天亮我派人去把他弄回来。"

二十五日晨，张作霖的上校副官高金山率卫队抵老达房，对穆春说："早上出来时还说要活的呢，等到我们在路上时，又接到大帅一份电报，说是不要活的了。"

郭松龄得知大帅命令已到，便要来纸笔写了以下遗嘱：

"汉卿弟：兄夫妇愿速死，请按左项办理：（一）兄为国为民而战，主倡一切，勿罪部下；（二）兄历年所经营之动产和不动产请由鲁穆庭、沈振荣、张振鹭三位军需官核清，除还债外，尽数捐同泽中学。"

这是郭松龄第一次以弟称呼我，以前都是尊称，死前终于恢复了兄弟之实。

写完遗嘱后，郭松龄被上了绑带到堂屋，地下放了一个铺草垫，卫兵令其坐下，将两腿伸开来，给他装上"木狗子"刑具，上面钉好了，再翻过身来趴在地下钉后面。

这时，韩淑秀搂住郭松龄的头，伤心地说："死到没什么，我看你受罪，实在难过。"

给郭松龄钉完“木狗子”后，又给韩淑秀钉上。全部钉完后，郭松龄站起来，当时就不能走路了，两个卫兵把他抬到车上。上午十时十分，押解车开到辽河沿，行刑官请郭军长夫妇下车，然后宣布死刑。

张作霖发来的处决电文如下：

“郭逆松龄于敬日（二十四日）下午，经旅长王永清在白旗堡附近捕获。该逆犯上作乱，罪大恶极，已饬在老达房就地枪决。其妻附逆最力，在滦州时当众演说，蛊惑军心，当饬一并正法。上将军有（二十五日）日、子（时）。印。”

死前，郭、韩皆有就义词。王铁汉将军曾亲见郭松龄被执刑的场面。他回忆说，先是在河边铺一张高粱秸垫席，然后叫郭松龄夫妇跪下，韩淑秀说：“跪？给谁跪呀？不跪，不跪！”

这时，郭松龄拉了拉夫人的青布皮袍，说：“跪下，跪下，听从大帅的命令。”

这是郭松龄临死前说的最后一句话。

第十五章　痛定思友

1925.12

——“我父亲他不听我的，他要完全听我的，郭松龄不会倒戈的。”

——“我就劝郭松龄，你不要急，咱慢慢来，大帅那一套早晚还不就是我们的吗？”

——“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从公的方面来说，老帅是我的长官；从私的方面来说，他又是我的父亲。我这一仗不打，将来闹个不忠不孝。

当谈到与挚友郭松龄不得已进行决战时，张将军如是说。

“张学良对郭松龄始终抱着眷顾深情，一直没有和他绝交。”张学良的秘书处长刘鸣九回忆说，“尽管处境十分窘困，

张学良仍称他为茂宸。当时总部下达通缉令，悬赏缉拿郭松龄和韩淑秀。以郭松龄的首级来献者赏洋十万元，以韩淑秀的首级来献者赏现洋五万元。张学良看到通缉后，还幽默地说："没想到郭大嫂的脑袋还这么值钱啊！"

当郭松龄被黑龙江的骑兵旅长王永清部擒获时，王永清当即电告张学良。高金山也给张学良拍来电报，说他是奉派前来押解郭氏夫妇。张学良马上让刘鸣九给高金山复电，叫他押送郭松龄夫妇路过兴隆店，因张学良的司令部设在这里。

"押到这里干什么，去奉天又不顺路。"刘鸣九纳闷地问。

"押到这里来，我要把他放了。"张学良说。

"这不行啊，大帅本来就对你很恼火。你再把他放了，大帅能答应吗？"刘鸣九闻言大惊失色。

"不要紧，你就写吧！"张学良不容他再辩，毅然命令道。

没等刘鸣九把电报稿写完，张学良又接到高金山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说："抵达老达房，奉帅令已将郭松龄夫妇枪决。"

刘鸣九回忆说："张学良看完电报，跺了跺脚，叹了口气说：'完了，完了！'"

张作霖原拟将郭氏夫妇解回奉天，由他亲自枪毙，但杨宇霆怕郭氏回奉天后所言必对自己不利，乃力劝大帅下令在老达房就地将郭松龄枪决。

临刑前，郭松龄向在场的奉军官兵讲演说："我倡大义不济，死固分也；后有同志，请视此血道而来。"接着，韩淑秀也从容地说："夫为国死，我为夫死，我们夫妇死而无憾，望汝辈各择死所。"

据目睹刑场的民众说，那个女人很刚强，她对押解的士兵说："先打我，让军长看见我走了，好放心。"

高金山先毙韩淑秀，后毙郭松龄。韩淑秀时年三十四岁，

郭松龄四十二岁。

郭松龄夫妇虽死，但张作霖、杨宇霆余恨未消，下令将其尸体运回沈阳，在小河沿体育场陈尸三日示众，并将郭氏夫妇遗体拍成照片，各处张贴、传示。

当印刷品传到张学良面前时，他不忍见此惨状，在文件上批了"以火焚之"四个大字，对杨宇霆的做法深为愤慨。

尽管如此，在郭军倒戈事件平息后，张学良为了承担责任，仍通电奉军各机关，责备自己，负荆请罪。

我在通电中说："学良在此匝月中，忧心如炽，五内俱焚，比日以来，愈益加剧，长此以往，非但贻误戎机，且将一病不起，现已电禀上将军，请免本兼各职，俾卸仔肩，借资休养，使良后此有生之日，为择乡择国之年。"

此外，我还给父亲发去一份专电，内称："学良弱冠从戎，备承优渥，原期竭诚图报，少效愚忠，不料识见浅薄，误用匪类，因致萧墙祸起，扰及乡邦，煮豆燃萁，煎更太极，每念及此，弥觉椎心。"

郭松龄事件虽然平息了，但它对张学良心理上的刺激至深至痛，他没有用更多的笔墨去谴责郭松龄，而是自我责备。

我本不应该批评我父亲。我一生中只有两个长官，我也最了解他们。老帅是有雄才无大略，蒋总统是有大略无雄才。我父亲确实有慑人之威，能御人，但却不会识人，断事也有缺，如杨宇霆江苏被逐仍重用之，下面自难心服。为此我常与父亲争执。有一次我说："我管不了你的部下，你也管不了我的部下。"老帅愤怒地拿个杯子向我丢过来。

对于郭松龄反对内战、倡导和平，为国家之元气、为东三省的兴旺发达而矢志奋斗的决心，张学良是同情的，甚至可以说是心心相映。但郭松龄起兵反奉的方式，他不会苟同，取义而背父，似也不易。而且，张学良心中似也明白，郭松龄的起

兵，就内因而言，也与第二次直奉战争中郭松龄个人的得失有一定关系。

第二次直奉战争，奉军各路人马在胜利后都将部队扩充了。张宗昌出战的时候，本来是一个旅，他一扩编，差不多有了好几个军。李景林是一个师，后来，他一个师就变成了三个军。但是，我的部队没有扩编，我的部下，特别是郭松龄，他嘴上不说，心里也难过得很。所以，郭松龄倒戈，这个原因也有一点儿。我曾说过，我父亲他不听我的，他要完全听我的，郭松龄不会倒戈的。

郭松龄和我谈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倒霉，我当了你的部下。由于老帅压住你了，你起不来，人家都有地盘了，山东督军、江苏督军、安徽督军、河北督军，你什么也没有，你被压制了。可我在你手底下，我也被压啊，我毕竟是你的副手，干硬活，打硬仗，都是我们的人，可庆功受赏的都不是我们，而是他们。

虽有史料记载，说张老帅曾委任郭松龄为江苏督军，郭松龄"赏而不就"，表示愿意继续带兵练兵，但郭松龄"功高不赏"的怨言由张将军之口加以证实，可信度应更高。

我就劝郭松龄，你不要急，咱慢慢来，大帅那一套早晚还不就是我们的吗？我当儿子的总不能去抢爹的，他那一套将来还不都是我接吗？我说你慢慢地等，不要着急。后来，我的话还不是真的变成了现实吗？

那时，我的部下都有这个情绪，这是事实嘛，我有什么法子呢？我当时出了几个道，但我父亲却骂我，说你小子想当督军？我说不是我要地盘，不是那么回事。我给父亲上了条陈，我的意思就是给他郭松龄一个地盘，你如果不愿意，你可以以给我的名义，而实际上由他来管，由他来做就是了。

"老帅为什么不同意呢，"唐教授追问道。

这个事情，我不能很有证据。我父亲不听的主要原因，与杨宇霆有关，在参谋部里面，我父亲是听他的。

郭松龄被抓之后，我曾给他求情。我父亲在电话里骂我，我就说，他当然有罪，他当然应该处死，但应该开个军法会，让他说出来到底为什么。

平时，我是非常佩服郭松龄的，我很看得起他，可他最后到了生死关头，还是没出息，他要跑。跑什么，跑得掉吗？可见郭松龄也不是个英雄。要是我，这事情到了这地步，往哪里跑？就是一死了之！

把他抓住后，他给我写了个条子，说只求速死。很可惜，我把这个条子给弄丢了。我想开军事审判会，要郭松龄把话讲出来，这是杨宇霆最不愿意的事情，他怕郭松龄讲话，导致他地位不保。再者，若郭松龄一入我手中，也可能就死不了啦，所以他就矫老帅之命，下令就地枪决。

郭松龄起兵倒戈的动因，与他的太太有很太的关系。起兵之前，他们与冯玉祥又联系上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郭松龄起兵反奉，亦非一时心血来潮之举。

郭松龄思想新派，矢志革新。他志向不凡，主张“强兵救国”。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看到兵连祸结，国家长期分裂，边防不固，强邻虎视，因而不愿再为军阀当炮灰打内战。

当浙江督办孙传芳利用民众的反奉情绪，组织东南“五省联盟”，打着“为民请愿”的旗号通电反奉时，郭松龄及国民军的代表韩复榘、程希贤等正在日本应邀参观“秋操”演习。忽闻奉军在江南惨败、杨宇霆仓皇北逃、张作霖差密使赴日本订立密约的消息，郭松龄义愤填膺。

在日本观操期间，郭松龄已着手反奉的准备工作。每天晚上，郭松龄都在饭店召集他选送的留日学生谈话。他想借观操

之机，暂在日本思考反省。可是就在这时，他接到张学良的加急密电："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由水旱两路向沪、苏、皖进犯。目前战局紧迫，总座急盼我兄克日归来，主持军事。"

"接奉钧电，自当效命，惟以到日以来，旧病复发，需待诊治疗养病。"郭回电拒绝。

两日后，张学良派朱继先携带他的亲笔信，邀郭松龄即刻回国。信中说："望兄以大局为念，即日回奉，一切容待面谈，万勿延缓。"

郭松龄经过彻夜慎密考虑，决定回国。十月二十四日，张作霖急电郭松龄，命令他径去天津部署军事，准备对冯玉祥的国民军开战。

赴津之前，郭松龄悄悄地对他的参谋长魏益三说："我主张巩固国防，开发东北，最反对为少数人去争督军。试想，这样谁受害？还不是东北人民吗？"这话暗示了他反奉的决心，也表露了他对张作霖、杨宇霆的不满。

一天深夜，郭松龄在天津国民饭店举行的集会上演讲，他悲愤激昂、痛哭流涕地说："我们决不应该为争夺关内地盘替少数人谋求地位，而使广大东北人民遭殃！"

在此期间，郭松龄也加紧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络，冯玉祥向郭松龄表达了愿意合作的诚意。

东北名将何柱国回忆说："据我的叔岳父贾德耀告诉我说：'冯玉祥对东北是早有野心的，而郭松龄也是个雄心勃勃的野心家，两个有野心的人一结合，这个事变就发动了。'"

"老郭由日本回来，就表示不愿再打内战，到天津后就装病入了医院。"有关郭松龄住院的真实情况，张学良曾向别人透露道。

郭松龄起兵倒戈后，在滦州曾与张学良互有信件往来。郭松龄在十一月二十八日的信中对张说："凡所希之功名，皆为

公而求，所望之事业，皆为公而立。自矢此身早为公有，区区之心，天日可鉴。”

郭松龄见张学良做出“义不背父”的决定，又对滦州举兵有诸多误解，便又给张学良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历述了他倒戈反奉的六项原因，并对“忠孝”做了解释，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当张作霖用飞机往下撒传单以召唤旧部弃郭来归时，郭松龄的妻子韩淑秀在阵地上声泪俱下，当众宣读了郭松龄的这封信：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久共，讵忍相逼。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万不得已。”

然后，信中陈述了班师的六项理由：（一）武力统一，拂逆世界潮流；（二）去岁战役，耗款万万，利益安在；（三）东省产业，邻国肆意经营，大好国土，让与外人，而专向疮痍疲敝之内地扰攘争夺，用意安在；（四）此次之战，非敌人侵逼也，非保全家乡土地也，乃为姜、杨争地盘耳，为上将争总统耳；（五）年来饷粮折耗，士卒迫于自己之境遇，生不得饱，死无人恤；（六）京榆驻军，新兵强募，不教而杀，龄所不忍。假使驱之战场，亦必望风披靡。

信的第二部分，主要从“私情方面”提示张学良不要对其父“愚忠愚孝”，规劝张学良要“忠于国家人民”，并说：“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杰；愿公为平民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别，终当相聚，徼天之福，大事定后，仍请我公回奉主持一切。”

郭松龄兵败，原因众多。

首先，据有河北的李景林虽参与冯、郭密约，但关键时刻却又毁约观望。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虽由多伦向热河进兵，攻取承德，以分奉军之势，但郭军得不到其直接的援助。而且，

兵出山海关后，还须留魏益三部驻山海关，以防李景林背约抄后路。

其次，郭松龄为了革新，对奉军老人未作安排，又心胸狭窄，枪杀了姜登选，因而奉军上层都反对他。但是，郭松龄求成心切，自恃掌握了奉军精锐十多万人和全部炮兵，而且大都是他一手培养的，认为攻入奉天只是时间问题。殊料，郭军到达锦州后，日本关东军即向郭松龄发出通牒，明确表示保护张作霖，并调动军队代奉军把守八门八关，阻止郭军入奉天。

我们张家，东北人对我们不错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我们不刮地皮，我家的钱，都是通过做生意、做买卖而得来的。当然，也是靠了点权力。

当时，在巨流河防线，张部兵力虽仅六七万人，但这些都是张作霖的嫡系，同时，部队弹药、给养充足，士兵新发了皮大衣、新棉衣，每人发两个月的恩饷，且一律发银元，还给面包、罐头、香烟等慰劳品，士气旺盛。不久，左路军张作相、右路军吴俊升亦陆续到达，两部共六万多人，总兵力已超过郭军。决战时，表面上打得乒乒乓乓，但总共只伤亡了一千多人。双方都认为是自家人，不肯相互残杀。

二十二日夜，郭松龄孤注一掷，下达了总攻击令。次日，郭军攻势稍一顿挫，炮兵总指挥邹作华当即下令不打了，从而全线崩溃。随即，邹作华电话报告张学良说："茂宸已出走，部下已放下武器，现已控制了一切，请军团长放心。"

张学良在反奉战争中维护奉系统治集团利益的态度是鲜明的，立场是坚定的，在前线也显示了他的指挥才能。在扼守巨流河防线时，韩麟春在防御配置上有不同意见。

我对韩麟春说，郭茂宸是个宁折不弯的人，他一定哪儿硬往哪儿打，我们只要把正面工事做好，就可以取得胜利。

开火后，郭军果然动用主力从正面进攻，韩麟春这才佩服

我的预见。后来，我在西安曾对刘鼎说："打胜了郭松龄，我在东北军中才提高了威信。"

另外，郭松龄兴兵反奉的理念是"消灭战祸"，可是其本身已是"战祸再起"；至于他鼓吹的"实行民主政治"，在当时也超越了时代的发展，有太过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

综上所述，郭军反奉，天时、地利、人和皆失，难免失败。

由于郭松龄反奉，张学良受到张作霖的责骂，但他终究是奉军的继承者，张作霖仍将主力部队交给他，张学良通电罪己，也不过是官样文章。

郭松龄被杀，使奉军失去了一个军事人才，张学良失去了一个得力的副手。张学良始终思念着郭松龄。郭松龄死后的第二年，张学良在复饶汉祥的信中，还以沉痛的心情说："良与茂宸共事七年，谊同骨肉。其去冬举事卤莽，良事前不能察防，事败不能援手。回忆前尘，痛悼曷极！方事之殷，良惟自愧。"

郭茂宸的确是一个难得的人才，若由我处理，应让其出国深造，以后再为东北地方之用。

直到西安事变时，我每遇困扰，常叹曰："如郭茂宸在，我就不会这么困难了。"

一九八一年，九一八事变五十周年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探视生病的齐世英时，两人皆认为，当年若是郭松龄反奉成功，中国历史将改写，可能就没有九一八事变了。

张学良自这次事件之后，从沉痛中接受了教训，一反常态，大权独揽，不稍假人，以致后来，除他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统驱东北全军。

第十六章　斩子让贤

1925.12

——“哎呀，你谈到郭松龄，我心里很难过。”

——“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不跑呀，你们想怎么着吧？结果谁也不吱声。”

——“我说，我就是那个你要见但却没见到的张少帅呀！”

哎呀！你谈到郭松龄，我心里很难过，他跟我，我们差不多像弟兄一样。我父亲常常说我一句笑话，说除了你老婆你不能给他以外，大概你吃点什么东西都惦着他。

他这个人，他自己对我说，我要不是跟你啊，我早就不知什么样了。有一次，我在火车上劝他，我说，你怎么这样固执？他说，你这个人是很有些讲究的。我说，不是的，不是去讲究，但你何必这样呢？他说，我这人就是这样，我是“宁折

不弯”。我说，我与你不一样，我是“宁弯不折”。

对郭松龄反奉，张作霖持什么态度，有何说法呢？

“政治就好像唱戏一样，郭鬼子嫌我们唱得不好听，让他上台来唱几出，我们到台下去听听。左右都是一家人，何苦兵戎相见？”当郭松龄占领锦州以后，张作霖认为大势已去，准备逃走时，向奉天省长王永江苦笑道。

那时，由于形势所迫，张作霖发表了通电，承认因连年参战，影响了人民生活，并表示在反郭之战结束后，将告老还乡。如今，郭乱平息，他不得不有所表示，以履前言。

十二月二十九日，张作霖在大帅府办公厅召开东三省军政善后会议，与会者有张作相、吴俊升、汤玉麟、王永江、杨宇霆，袁金铠以及各厅处长数十人。

“今天这个会虽然还是由我主持，可我是出来向大家作交代的。”张作霖进入会场后，摘掉四喜貂皮帽子放在案上，向全场环视一周，语调低沉地说，“四哥，你先把通电宣读一下，明天就发表！”

袁金铠高声朗读了通电：“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今后将东北行政交王公岷源，军事交吴公兴权，请中央另派贤能来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还没等读完，吴俊升站起来摆手摇头地说：“唔，唔，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撂下！”这时，王永江也连忙站起来说：“永江代理一省政务，也不称职，惟有大帅在，我得以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现在吴督军不肯负责军事，我又不胜任政治，东北大局实在不堪设想，倘有不测，招致内忧外患，大帅有负国家人民倚重啊。”

“苏皖挫败，以致牵动全局，招致叛变，我是罪魁祸首，理应明正军法，幸蒙大帅宽容，准许戴罪立功，这完全是从大局着眼。现在李芳辰已退出天津，冯玉祥正挥军东下，我们应

赶快收编郭军残部，封锁辽西要塞，然后派劲旅策应直鲁联军，击败冯军，占领京津，以安北方大局。在这危急存亡之际，决不是大帅引退休养之时。”杨宇霆连忙起立，口若悬河地道。

接着，许多人纷纷发言，有的说，这次事变仅一个月就平定了，全仗大帅洪福。

“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张作霖站起来用手往下一压，示意让发言人坐下。他说，“行，将来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

“常荫槐来了没有?”说到此处，张作霖脸色骤变，厉声喊道。

“我在这里。”常荫槐从后面角落里站了起来。

“常处长，”张作霖大声叫道，“我命令你坐专车去把张学良给我抓回来，我要亲自枪毙他！你要让他逃跑了，拿你的脑袋来!”

常荫槐刚要转身，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立即站起来摆摆手说：“唔，唔，常处长，你慢走，你慢走，我有话要说。”

“你有什么要说的?”张作霖怒气冲冲地贼道。

“唔，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可现在没有他一天也不行。”

“你胡说!”张作霖把脚使劲一跺，全场震动。

“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吴俊升连忙说，“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和冯玉祥--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奉天就顶不住了。唔，收编郭军，谁也办不到，唔，我不敢去，大帅也不行，非张军长不可！他一摆手，那些人就都回来啦！张军长再往前一挺，天津、北京就落到咱们手里了，那时候，我才敢保你上北京。”

这时，吉林督军张作相也想站起来发言，张作霖向他大喊

一声道："你住口！我姓张的用人，向来是一秉大公，赏罚分明，并不是我自己养出来的都是好的。小六子这个损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地装他妈的了不起。这帮杂种算狗屁！'天下好'带一个骑兵旅就把这帮兔崽子打得懵头转向。郭鬼子、小六子瞧不起吉黑两省的军队，我的天下就是这些人打下来的！我姓张的用人向来大公无私，李景林、张效坤、许兰洲这些人都是外来的，和我素无瓜葛，还有于孝侯是吴子玉的外甥，谁不知道我和曹、吴对头多年，可是我对他外甥是重用的。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扛了个行李卷，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是没把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能吃苦耐劳，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那时候，他感激得把他妈给我当老婆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和郭鬼子拉上平辈！小六子上了贼船，郭鬼子教他学唐太宗李世民'清君侧'。我若不亲自毙了小六子，对不起在座的诸位。常荫槐，你不执行我的命令，我先枪毙了你！"

张作霖怒不可遏，戏剧达到了高潮。

"请大帅息怒！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的对，为大局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给他统帅全军的大权。扭转大局，非张军长不可。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归罪于张军长一个人。"这时，奉军的小诸葛杨宇霆又站起来说情了。

"现在军事刚过，地方疮痍满目，善后诸事，急需整理。"王永江又接着说，"我们先把一些问题处理处理，然后让地方另举贤能接着干吧。"

"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吴俊升一句话把大家都说笑了，空气立时缓和下来。

张作霖站起来说："好吧，你们大家商量好了。"

这时，张作相、吴俊升二人上前一左一右架着张作霖退席。张作霖边走边喊："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张作霖退出会场后，由王永江主持继续开会。会议决定，由各团体代表以东三省人民的名义慰留张作霖仍为东三省军政首脑。至此，张作霖导演的斩子让贤的滑稽戏，就这样圆满收场了。

但是，倒戈的将士如何处理？

在一次善后会议上，张作霖绷紧脸皮阴沉地问道："郭逆夫妇已经正法，其他胁从附逆分子甚多，是否也该彻底查办，以儆效尤？"

杨宇霆、张景惠、吴俊升、汤玉麟等老派人物，素来仇恨新派分子，主张非杀一批跟随郭松龄反奉的将领不可。

"不能这么办！"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张作相赶紧说，"郭松龄既已伏法，其他人员都是我们的桑梓子弟，冤冤相报，将来那还了得。不如让他们戴罪立功，一律免死，以安郭军部下之心。我看最好由大帅给他们赔个不是。"

"他们造反，还要我赔不是？"张作霖勃然大怒。

"那是我们没带好他们，而且今后我们还要做事，我们还需要人啊！"张作相言语坦诚，苦口婆心。

但大多数人反对张作相的意见，双方辩论了两个小时，张作相眼见形势严峻，竟急得哭了起来。

"如果非杀他们不可，那就先把我张作相杀了吧，我可不愿意看到惨剧再次发生！"

此话一出，会场里的紧张气氛慢慢地缓和下来了，张作霖似有醒悟。

"好，那我不管了，这事就交给你和张学良去看着办吧！"张作霖最后表态说。

宽厚的性格，高度的智慧，张作相这几句话，不知保全了

多少性命，也延长了张作霖的政治生涯，从而也使张作相在新派将领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所以，后来皇姑屯事件爆发时，在新老派矛盾重重的动荡局势中，他是惟一能出来稳定局势的关键人物。

这批被保护下来的人，后来在东北军进关和西安事变时，大多数成为东北军的中、高级骨干，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这时，张学良还在新民听候命令，等待处理善后。全线停火后，郭松龄所属的几个军长以及旅长都陆续前来向张学良请罪。

四个军长中只有霁云跑了，他再没有回来。其余三个军长都叫我俘虏了，他们都是我的部下呀！我跟他们说，你们怎么不跑呀，你们想怎么着吧？结果谁也不吱声。

有一个姓范的，他说我与郭军团长也没有什么关系，司令是知道的，我是没有办法，让我干什么就干什么，你饶了我吧。

第二位姓刘，他弟兄三个都是我的部下，一个打伤了，一个阵亡了。他就讲，军团长，你念我弟兄三个，一个残了，一个死了，这账，你找茂宸算就是了。

第三位，这人叫刘伟，他人性格倔强。我问他，刘佩高，你怎么干这个不是人的事？刘说，有不是人的长官，才有我这个不是人的部下。他对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你不忍心把我枪毙，那好，你给我一把枪，我自杀算了。

前面那两个我没有用，刘伟我又用他了，我当时就让他当旅长，把军队还给了他。后来，同冯玉祥的部队在南口打，我派他上前线。我父亲的一个参谋长打来电话，说你好大胆，你怎么把他派出去？我说，你是大本营，你有什么命令你给我下好了，但你决不能干涉我的行动，那是我的职责，这责任由我来负。过滦河，他打斜线，他是旅长，他率领的几个团，十三

个连长都先后阵亡了，他在前线督战，他自己讲，旁人可以退却，就我不能退却，我退却，旁人会说我是假的，旁人都可以保生，我只有阵亡。

我很喜欢这个人，他一度出任第十一军军长。很可惜，他由于思想压力太大，后来竟然精神失常了，提起这事，我心里很难过。

郭军第四军的旅长栾云奎，在巨流河决战时接到停火命令较晚，打得很猛，黑龙江的军队伤亡重大。当他去见张学良时，迎头遇见吴俊升，吴俊升连说几遍："唔，唔，栾参谋打得真好，打得真好！"栾云奎深知吴俊升其人手段狠毒，听到这话，顿感惊惶失措，心想此事凶多吉少。但张学良认为，郭松龄的部下就是他的部下，一律宽大处理，一个也不株连，从而扭转了军官人人自危、士兵灰心丧气的局面。

郭军司令部的副官处长郜汝濂，在郭松龄举兵反奉时特别卖力，失败后他自忖性命难保，正当他彷徨疑虑之际，我突然进屋，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搞的，真是一场大笑话！"接着又笑着说，"别扯啦！赶紧整理队伍去吧，马上还有事呢。老郜，你回参谋部任原职，邹作华，你还回你的炮兵旅当旅长，其他部属都归还原建制吧。

这样大的一件事，没杀一人，没治一罪，几句话就把问题解决了。郜汝濂后来对少帅作了如下评论："是年张先生才二十五岁，就能如此宽大为怀，收揽人心，这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为了搞好善后处理，张学良亲临新民府，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把第三、四方面军又重新整顿好，从此，这支部队对张学良更忠诚了，张学良的威望更高了。

郭军反奉对北方政局的演变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得原本是宿仇的奉直关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双方在报复冯玉祥倒戈

菁变方面，渐成联合之势。

原来，趁郭军倒戈之际，冯玉祥的国民军又翻脸毁约，驱逐了李景林，攻占了天津，段祺瑞的策士曾毓隽被扣，他的灵魂徐树铮被杀，北京和直隶完全落入国民军囊中。一时间，冯系军阀气势很猛。

十二月三十一日，吴佩孚发表通电，宣告结束讨奉战争，接着，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遭到奉直两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也放弃反奉立场转而入伙。转瞬之间，冯玉祥如临深渊，面临严重危机，不得已只好通电下野，出国考察，赴俄国游历去了。

奉军方面，其主力部队编成第三、四两个方面军团，张学良为第三方面军军团长，韩麟春为第四方面军军团长，两个军团合编为一个司令部，即通称为“三、四方面军团司令部”，重整旗鼓，再次入关，进兵京津。

这次，张学良吸取了郭松龄事件的教训，军事大权不假他人，凡一切重大问题必亲自过问，皆由他个人裁决，可谓大权独揽。

那时，张将军少年得志，在军马倥偬之际，也有许多趣闻逸事。

我很愿意自己开汽车，让司机坐在后头。有一次，忽然有一个人，还带着一个随从拦我的车，司机想说话，我摆摆手，不让司机说。那拦车的人说，我们乡长要到通州，想搭您的车，行不行？我说那行啊，他就搭上车了。

说这段挺好玩儿的。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就问，你们到哪儿，他们说要到警察所长那儿去，这警察所长以前是我的一个听差的。我又问，那儿驻着军队吗？他说有啊！我说谁的部队，他说是三、四方面军。我问那是谁的部队，他说你不知道吗？那是张少帅的部队，他很年轻。我问，你见过他吗？他

说，没有见过，那会儿过部队，县长要大家都去迎接，结果我去晚了，部队走了，我没有看到。他问我，你是哪里的，我说我是天津龙飞汽车行的。走了一段路之后，路口有士兵向车内行礼，士兵们可能认得我嘛，他就奇怪地问，后头坐着谁，我说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个官儿，官不大，也不小。我又问，你出来没有发旅差费吗？他说，有啊。我说，那你揩我的油了。说着说着，就到了通州。那人下车后我就说，你这人真是没礼貌，我问了你的姓名，你连我姓什么也不问。那人连称失礼，问我贵姓。我说，我就是那个你要见没见到的张少帅呀！然后，我一加油门就把车开跑了，留下那人目瞪口呆地愣在那儿。

第十七章 情钟一荻

1926.4

——“我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她才十六岁。”

——“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自杀！”

——“我让你牺牲的东西太多了！”

我跟太太认识的时候，她才十六岁。后来，我生病了，她到奉天来看我。她临走时，跟她爸爸说了，说要到奉天看我，她爸爸当时也没吱声，她就拎着个包来到奉天。他哥哥就借机说她跑到奉天去了，老爷子就不高兴了。后来，老爷子登了报，把她赶出了祠堂，这样她就回不去了。怎么办，弄拙成巧了，本来她跟别人已订婚了。所以，我说，天下事情就是这样，姻缘之事，就是这样阴差阳错的。

张将军在这里谈到的，就是当年轰动一时的“赵一荻失踪案”。

说起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结识，也真是难得的人生佳缘。

一九二六年四月，“段执政”垮台，国民军退出北京，京津地区又被实力强大的奉系军阀所控制。张学良率三、四方面军团进驻天津，不久，又将军团司令部移驻北京。当时，年轻的军团长、翩翩少帅张学良经常来往于北京、天津之间。

二十年代的天津，京师的一批达官显贵、社会名流纷纷跑到这里来安设住所，豪宅之前，车马盈门，渐渐地形成了一个上流社会。其中，最著名的交际场所，一是蔡公馆，二是天津大华饭店。

蔡公馆的主人蔡公子是张学良三弟张学曾的岳丈，他刚从德国留学归来，满身都是西洋派头。他效仿西欧的风尚，经常在公馆里举办舞会。他举办的舞会不但排场，而且洋味十足，寓居天津的军阀政客、达官贵人、花花公子皆蜂拥而至，趋之若鹜。

大华饭店更是遐迩闻名。饭店总经理赵道生先生，是张学良的密友。

赵道生的父亲赵庆华，浙江兰溪人，北洋政府时代，他历任津浦、沪宁、沪杭甬、广九等铁路局的局长，在梁士诒做总理时，他官至交通次长，并曾任交通银行经理、东三省外交顾问等职。他一生为人耿直，为官清廉，名声颇佳。此时，则是名闻津门的达官显宦之家。

赵庆华先后娶了两房太太，共育有六男四女。其中，赵二太太在香港生下了赵家第十个孩子。按赵家以出生地为名字的惯例，赵庆华将这个“奶末子”女孩取名为赵香生，学名赵绮霞，英文名字叫 EDITH，因此，又叫赵一荻。由于在女孩中排行老四，人称赵四小姐。

一九二六年春，一荻的姐姐赵二和赵三已届成年，开始参加社交活动，频繁出入交际场所。那时，经常到蔡公馆、大华饭店参加娱乐活动的有赵四的六哥赵燕生，朱启钤的公子朱海北，偶尔，张学良、张学铭、张学曾、汤国祯、朱光沐等人也前往参加。其时，赵四年方十六，受好奇心的驱使，常随姐姐们去舞场观看。

这天，赵氏三姐妹又来到大华饭店跳舞。她们翩翩步入舞厅左侧的休息室，只见哥哥正同一位年轻的军官谈笑风生。赵道生见三姐妹来到，连忙起身指着她们介绍说："张将军，请认识一下，这三位是鄙人的胞妹。"

赵道生介绍完毕，又对三位妹妹道："你们晓得他是谁吗？他就是我常给你们讲的那位少帅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逐一同她们握手寒暄，微笑着说："很高兴结识你们。"

赵道生做了个请的手势说："张将军，请坐下叙话。"大家各自在沙发上坐下来。

赵道生看了张学良一眼，满怀敬意地告诉三位妹妹："张将军是当代知名的爱国将领。张将军很喜欢跳舞，今日你们能结识这样一位舞伴，实在是太荣幸了。"

大家正说着笑着，忽见有人来请赵道生去接电话，赵道生说声"失陪了"，便起身出去了。这时，舞厅那边传来音乐声，赵二急着要去跳舞，拽了赵三起身便走，室内只剩下了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短暂交谈后，张学良注意到，赵氏三姐妹虽属一母同胞，但风度气质却大相径庭。赵二和赵三衣着花枝招展，娇艳有余而本色不足，给人一种轻佻放荡、矫揉造作之感。赵四就不同了，不施粉黛，淡妆素裹，透出一种天然的美，而此种天然之美给人的诱惑力，又是那种经过着意修饰的美所望尘莫及的。

更令张学良好奇的是，这位四小姐不仅举止文雅，性情温和，而且异常美丽。她那副俊俏的容貌，那双乌黑深沉的眼睛，那一头闪动着黑色光彩的秀发，那迷人的袅袅婷婷的身材，以及她那显然还带着明显孩子气的天真纯朴的个性，使他心灵深处蓦地涌起一股浓烈的爱慕之情。

这时的赵四虽只有十六岁，却已情窦初开。她见这位张将军英俊飒爽，结实健壮，眉宇间凝结着勃发的英气，特别是他彬彬有礼，谈吐不俗，虽为军人，却丝毫没有武夫身上常见的那种粗野之气，顿时，一股莫名其妙的情潮猛烈地冲击着她青春的心扉，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此刻，赵四想同张将军谈点什么，忽见对方那犀利的目光正痴痴地盯着自己，颇觉羞赧，双颊立刻泛起了两片红晕，慌忙地低下头，用纤纤玉指捏弄着衣角，以此来掩饰自己心中的惶恐。

一个英姿飒爽，一个豆蔻年华，两人一见钟情，相互爱慕，从此结为密友。

张学良同赵四小姐相识后，除在大华饭店和蔡公馆等高级娱乐场所翩翩起舞之外，他俩还常到西山碧云寺旁的香山饭店高尔夫球场打球。当时的香山饭店是赵四小姐的父亲赵庆华开的。经常陪同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打球的，有张学良的秘书长朱光沐、英籍顾问端纳、秘书伊雅格，还有外号叫“哈马”的李秘书。黄显声有时也来一起打球。

张将军的副官陈大章先生回忆说：“一九二七年夏天，张学良到北戴河避暑，赵四也从天津赶来。陪她一起来的有她的大哥赵道生和二姐，还有一位姓匡的女士，大家都叫她匡大大。我当时是张学良的少校侍卫副官，负责招待赵四小姐等人。张学良到北戴河后，住在联峰山张五爷的一座楼里。这张五爷是天津恒记德军服厂的经理，他是靠包做东北军军服发家的。当年，张作霖到天津时就曾住在他家。因此，张学良与



赵一荻夏装照。

张五爷有世交之谊。张每次到北戴河总是住在张五爷这座楼里，就是现在的八号楼。赵四小姐住在‘必其饭店’二楼，我也就陪住在二楼。张学良经常到‘必其饭店’和赵家兄妹谈天，有时一起到海滨游泳场进行海水浴，浴后同进午餐。”

那清澈碧蓝的海水，那飘动着片片白云的天空，那犹如梦幻般微风轻拂的月夜，那宽阔平展的金色沙滩，令少帅张学良的心情久久难以平静。

最令他感动、最使他动情的，还是赵四小姐对他那真挚的爱。他认为，她不仅对他怀着依恋之情，而且也最了解他，最理解他，最能体会到他内心的隐秘，和他对她那火一般的情感。

张学良在男女生活上，并不像外间传闻的那样是一个放荡无羁的花花公子。张学良曾对随从人员说，他最不满张宗昌到处找女人的那种作风。他说：“有一次在前方作战，我同效坤住在一个房间里，房子中间有张布帘隔着。那时，张宗昌不知从哪里找了三个女人，还一直问我，汉卿，来一个好不好？我那时假装睡着了，根本不去理他。”

张学良评论道：“交女朋友未尝不可以，但像张效坤那种作风，未免太下流了。”

一九二九年三月，张学良出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一天，张学良给天津挂长途电话，问赵四小姐能否来沈阳，如能来就派陈大章去接。赵四说，我愿意去，等我同父母商定后再打电话告诉你。过了几天，赵四来电话说她父母都同意她到沈阳来看看。

据张将军的副官陈大章回忆说：“于是，张学良就派我到天津赵家去接赵四，我和赵四坐火车离开天津时，赵家全家人都欢天喜地地来送行。”


赵一荻男装照。

危难见真情。张学良对赵四小姐毅然决然来沈阳与他相会，是满怀感激之情的。当时，他在东北面临着严峻的局面：大帅离他而去，年轻的少帅主政东北，千钧重担他一肩挑。因此，赵四的到来，对他来说，在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很大的慰藉。

但此时此刻，赵四小姐心里却并不是那么踏实，因为自她来沈阳之后，天津那边就传来不少谣言。好事之徒说三道四，兴风作浪，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有些小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说她失踪了，或云她已私奔等等。在她的家里，也掀起了轩然大波。除了她的母亲和比较同情她的几个哥哥姐姐外，也是一片反对之声。特别是平时一向疼爱她的父亲，如今却暴跳如雷，认为女儿的行为有辱门庭，似乎对她再也不能原谅了。盛怒之下，竟登报声明与她断绝父女关系，而且一怒之下，从此引退，不再为官。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对此，张学良大感不解，一直在追问赵四。但赵四对此也深感茫然，无言以对。

据副官陈大章后来著文回忆说："依我看来，这是赵庆华为使女儿同张学良结为伴侣所采取的一个手段。一九二六年，张学良到北京后，就同赵家有来往。赵四是张学良很好的球友，张学良也常到赵家去，两家关系处得很好。赵庆华夫妇有意将女儿赵一荻许配给张学良，赵四也愿意同张学良结为终身伴侣。但当时张学良已有妻室，这门亲事没法提。赵庆华在赵四到达沈阳的时候，登报声明说她有辱家风，同她脱离父女关系。这就使赵四再也不能回天津了。张学良同赵四也就成为暂时不举行婚礼的夫妻了。"

赵四抵达奉天之后，被张学良安置在北陵别墅。这所藏娇的金屋是一座漂亮的欧式小楼，建造得颇为精巧。小楼四周绿树掩映，庭院中间是一簇花墙，里面栽种着张学良喜爱的各种兰花。围绕花坛辐射出四条甬道，甬道两旁是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常青树。洋房虽然面积不大，但却异常幽雅别致。

陈大章先生曾回忆说："赵四到沈阳后，住在张学良的北陵别墅。有一天，张学良同赵四乘车去高尔夫球场，途中我听张学良问赵四：'你父亲既然同意你来沈阳玩，为什么又登报声明同你脱离父女关系呢?这弄得多么不合适!'赵四听后，一言未发。"

跟随张学良、于凤至夫妇长达十九年的佣人王凌阁老人回忆说："张学良最初向于凤至谈起赵四这件事时，说的是给少帅当秘书的名义，但于凤至不同意。张学良一看，就动起了硬的，后来又动了软的。张学良许愿说，进门不姓张，有孩子不要，家里的事不管，不招待人，对外面只说是秘书。"

可不管怎么说，于凤至就是不答应。后来，张学良掏出手枪来，于凤至见动了硬的，就把胸脯一挺，冲着他说："你打

吧！我给你生儿育女，把孩子拉扯大了，没用了，你把我打死吧！”

张学良一看于凤至不怕这个，便来了软的，说：“我哪里是想打死你，是我已经答应了赵四，我堂堂做司令的，说话不算数？没有别的办法，我只有自杀！”

于凤至没吃他这套，说：“你也别逼我，我也没有亲人了，咱们分开，离婚，你干你的去。闺女归我，小子归你，北陵房子归我。你当司令，国家大事都能管，老逼我干吗？”



赵一荻一九二八年留影。

张学良听她这么说，心也软了，又好说歹说。少奶奶毕竟斗不过司令，最后经过半个月，赵四写了材料，答应仅给张学良当秘书，住北陵，在那儿上大学。

一向胸襟开阔的于凤至，一时也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于凤至是受传统教育很深的大家闺秀，对三妻六妾可以接受，可对赵四这样一位官宦小姐的“私奔”却不能接受，认为有辱张家

门庭，败坏家风。

最后，于凤至终于容忍了这一现实，并给张学良约法三章："赵四小姐对外没有夫人名义"；"对外国人称是你的秘书"；"对中国人称为侍从小姐"。

对此，张学良均点头表示接受。

"我让你牺牲的东西太多了！"张学良曾深情地对赵四说道。

本来，于凤至想用这样苛刻的条件来斩断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的爱情，却没想到赵四一心一意爱着张学良，对这些条件慷慨相允，反而使于凤至更为难了。

不久，于凤至慢慢发现，赵四小姐不仅真诚地爱着张学良，而且她聪明活泼，才智过人，写得一手娟秀的好字，精通英文，熟谙密码，这些才干是自己所不具备的，她的作用也是自己无法代替的。张学良年少气盛，军务繁忙，而自己又必须在帅府内张罗，他身边也确实需要这么一位聪明体贴的人，如果自己和赵四小姐配合起来，一个管帅府内务，一个帮张学良协理军务，一内一外，通力合作，也是对张学良最大的帮助。

这样，赵四小姐终于被于凤至接受了，于凤至和赵四以姐妹相称。赵四小姐对于凤至大姐既尊重又亲热，而且，张学良给她们买的东西，每次她都先让大姐选。于凤至见赵四小姐对自己这样好，也对赵四小姐十分体贴容让。她们和睦相处，精心照料着张学良。每逢张学良外出，大姐于凤至和小妹赵四小姐总是左右相随。张学良的朋友们都非常羡慕他有两位美丽而能干的贤内助。

赵四初来奉天时，于凤至不许她进大帅府，她只好先住北陵别墅。不久，她便迁到帅府后面的一座小楼内，与大帅府有门可通。后来，两人以姐妹相称，关系甚为融洽，始在帅府大青楼特辟一室，作为她的闺阁。白天，赵四化名进入当地一所

大学读书深造，心甘情愿地以秘书的身份陪伴着张学良；晚上，则细心照料张学良的饮食起居。

一九三〇年，赵一荻生下一男孩，这是他们爱情的结晶，张学良亲自为儿子取名叫张闾琳。

第十八章　南口血战

1926．8

——“我父亲命令我去把这一师人都枪毙，你说，这个任务我怎么完成？”

——“这是胡说八道。王永清那时当师长，不是旅长，这事与他毫无关系，与张宗昌也毫无关系。”

——“我们有两个炮团，七十二门野炮，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

我父亲这个人哪，给我的任务向来都是无法完成的。那时，在南口战役中，奉天的第一师师长是穆春，他的这个师打仗很出力，是吴俊升从黑龙江带过来的。这第一师过小枯岭时，他们在一个喇嘛庙里歇息，就把人家庙里值钱的东西给抢劫了。后来人家告到奉天，上头就给我下命令了。我父亲命令我去把这一师人都枪毙，你说，这个任务我怎么能完成？

那么，我就想，这件事，要先查出是谁干的，是这个师的哪一团，是团里的什么人，把那个负主要责任的枪毙就行了，再把那师人解散。

后来，我就把士兵们给解散了，把那些当官的召唤到我这里来。我的意思是把军官们叫到跟前，我就宣布这些事情，让他们举出来是什么人干的，由我负责到老帅那儿去求情，谁有责任就办谁，其余的人也就算了。

可是，没料到我那侍卫长年轻，不善于处理问题。这些长官们来的时候，他们身上都带有枪，都带有随行兵。这时，在车站外头，在票房那边，有一个家伙，想缴那些人的枪，另一方狡辩，结果，那侍卫就给了他一枪。

听到叭的一枪，我的卫队就开枪了，对方也开枪还击。结果，我的卫队长被打死了，另一个姓唐的秘书也被打死了，几乎也把我打死。

这枪弹都往我这车厢里打，我的秘书们吓得趴在地下，那痰桶什么的，都中弹了，打死好多人。那时，朱光沐还不是我身边顶要紧的人，自从打死了不少秘书，他们就从这时起来了。

后来，卫兵们开了机关枪，几乎把这些人都打死了，死的死，伤的伤，仅逃走了几个，叫人难过极了。其实，许多人都不相干。

我说，算了算了，别打了，可气死人啦！我就叫我的副官，这副官是我原参谋长的姑爷，这参谋长在作战时被打死了，我就让他的姑爷来做我的主管。我叫他出去喊话，他就说大家不要打了，但那边的人叭的一下子又把他打死了。我的人打红了眼，两挺机关枪继续向外打，死了不少人，但也有活着的，就是穆春的参谋长，他趴在死人堆里，浑身都是血。

这参谋长跟我见面时说，军团长，我说什么也不干了，你

让我回家吧，你给我点儿路费，我要回去，今后什么也不干了。很有意思的是，他一身是血，可没有受一点儿伤。

“我最近看到一本书，上面说，王永清旅长提着枪，在火车站到处搜寻你，要干掉你，真有其事吗？”唐德刚教授问张将军。

这是胡说八道。王永清那时当师长，不是旅长，这事与他毫无关系，与张宗昌也毫无关系。

张将军在这里回忆的，就是南口战役中发生的一件军纪案。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激烈动荡的一年。这一年，军阀之间混战的次数最多，投入的人力、物力最大，涉及的地域也最广。

在北方，是年一月，奉系张作霖、直系吴佩孚达成谅解，订立了反对冯玉祥国民军的同盟，并联合张宗昌、李景林的直鲁联军，从三个方面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控制的京畿和直隶、河南等地区，随时有被直奉军吞噬的危险。

是年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并调二十余艘军舰在大沽口示威，大有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之势。

大沽口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极大的愤怒。三月十八日，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校学生五千人，在天安门集会。随后，二千余人前往铁狮子胡同国务院东辕门请愿，不料卫队向群众开枪，并以刺刀向徒手群众行凶，死者达四十七人，伤一百三十二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对段祺瑞政府的极大愤懑。

“我们要马上发起一个讨段运动，把他来打倒，继续为死者奋斗，并进一步乘此时机夺取北方的政权。”当时，革命中心广州发出了号召。

就在这混乱局势中，四月九日，国民军鹿钟麟突然派军队

包围了执政府，欲将段祺瑞及安福系要人悉数逮捕，段祺瑞闻风逃入东交民巷得以幸免，执政府卫队则由鹿部全部缴械。这是冯玉祥的国民军又一次发动“北京政变”。

在此形势下，吴佩孚与直、鲁、奉联军加快了进逼北京的步伐，奉军甚至还出动了飞机轰炸北京，市民恐慌不安。

“本军为顾全地方，保全实力起见，将于四月十五日放弃北京，退守南口。”宋哲元、鹿钟麟等人，广作安民告示。

四月二十二日，奉军和直鲁联军进入北京城。五月十三日，颜惠庆内阁成立，北京总算有了一个名义上的政府。

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讨伐国民军，但仍感力量不足，遂派人到太原联络阎锡山。阎锡山认为联合张、吴倒冯对他有利，这就形成了直、奉、晋外加孙传芳，联合“讨赤”、围剿冯玉祥国民军的局面。

当时，三方议定的作战计划是：直军和奉军分别由京汉、京奉两路进军，直攻京津；晋军则从大同方面进攻察绥一带的国民军；交战双方的主战场则在南口；吴佩孚出任总司令。

南口位于居庸关与昌平县之间，是西山山脉最险要之处，万山叠峰，山道崎岖，实为天设之险，久为兵家必争之地。

吴佩孚把进攻南口的任务交给了田维勤，并悄悄告诉田维勤。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都统相酬。这就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为察哈尔和绥远是奉张的禁脔，所以奉张袖手旁观，按兵不动，大有黄鹤楼冷眼坐看翻船之架势。

殊料，田部也太不争气，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且久攻无功；而死守南口的国民军却越战越勇，吴大帅常胜将军的威风竟扫地以尽。

面对窘境，田维勤也学会了寇英杰打假捷电的方法，报捷电十有九次谬误，吴佩孚气得暴跳如雷。然而，不如意的事又接踵而至：南口久攻不下，湖南方面同北伐军作战的告急电雪

片似的一日数至。吴佩孚虽然咬紧牙关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但在久战无功、后方又起火的情况下，不得已把主攻南口的任务让给了奉军和直鲁联军。

为此，张作霖下令将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投入战役。为了保证能啃下南口这块硬骨头，奉军兵分三路，第一路徐源泉，第二路荣臻，第三路韩麟春。总指挥褚玉璞，前敌总司令张宗昌，后方总司令为张学良。

同时，张作霖命令吴俊升、汤玉麟以六师之众进攻多伦；吴佩孚命令刘镇华围攻西安；张兆钾、孔繁锦则奉令进攻兰州，以牵制国民军，并派飞机向张家口散发传单，以瓦解国民军的士气。

八月一日，南口正面奉军发起总攻。主攻的猛烈炮火惊天动地，连北京城内都能听得到。奉军所有步兵精锐和全部炮兵铺天盖地，倾巢而出。但南口前线万众一心，誓死抵御，虽伤亡枕藉，但锐气不为稍挫，战役之激烈程度，为中国有史以来所鲜见。

我跟你讲，我们打南口，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打仗，那南口守得最厉害。我们有两个炮团，七十二门野炮，最少也打了五六万发炮弹。这个炮弹虽与外国的炮弹不一样，没有那么好，可毕竟也是炮弹啊！

七日，奉军全线发起猛攻，左右翼进抵山根南口正面，距国民军仅有里许，但一时竟未能攻克。右翼系奉军第四混成旅，这时悄悄迂回虎峪山村后方；左翼系联军第十一旅，已达山根，迂回绕攻南口之右侧。张学良八日夜返京，九日再赴前线督战。张宗昌亦率卫队前赴昌平厮杀。

面对奉军的凶猛攻势，国民军寡不抵众，弹尽粮绝之后，开始全线败退。

就在南口正面阵地血腥厮杀之际，吴俊升和汤玉麟分两路



张学良（左一）与褚玉璞（右三）在涿州城外指挥奉军攻城。

大举进攻沽源、独石口。攻击中，奉军重迫击炮频频发炮，一鼓作气冲进了国民军阵地，奉军指挥部抓住这个机会，立即下令实行全线总反攻。经过一天激战，终将宋哲元军全部击溃。

在国民军的溃败声中，冯玉祥自莫斯科启程返国。此时，冯玉祥在莫斯科已加入了国民党，冯玉祥的国民军也随即加入了北伐军，冯玉祥重新统领西北军，准备策应北伐军北上。

南口战役结束后，吴佩孚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结果，张学良被加封为良威将军及陆军上将衔，张宗昌被授为义威上将



一九二六年八月的张学良。

军。不料，吴佩孚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举荐，并回电说：“本军系奉上将军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佩孚荐张宗昌为上将军，张学良予以拒绝，当然是做给张作霖看的。

就在各路军阀南口血腥厮杀之际，一九二六年七月，国民革命军广州誓师北伐，兵锋所向，直指湘赣，吴佩孚、孙传芳连连败绩，新的战火又重新点燃。

原来、八月中

第十九章 兵下河南

1927.3

——“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

——“我们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这真是犯罪啊！”

——“内战我是恨透了，那打死多少人啊！”

这是干什么？干什么要打呢？真要是有目的，那还可以，没有目的的战争，打什么？你像那些军阀，今天打，明天打，这都是些什么事？有什么意思？

访谈时，张将军对唐德刚教授发出肺腑之言。

“是啊，全是自己打自己嘛！”唐德刚教授在一旁赞同地说。

就是此次兵下河南，张学良对内战有了切肤之痛的体验。

原来，八月中旬，南口战役结束后，吴佩孚赶回武汉，仓促调集大军与北伐军激战于汀泗桥，大败之后，退守武昌，不久，又退至豫鄂边境。



着便装的张学良。

九月二十七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率国民军南下陕、甘，参加北伐。同日，张作霖在奉天召开了军事会议，宣布与北伐军对抗，计划先以援助吴佩孚为名，夺取吴部靳云鹗盘踞的河南，然后再伺机南下，夺取武汉。

当时，奉系是北洋军阀中实力最强的集团。十一月，张作霖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邀吴佩孚、孙传芳及阎锡山等各方人士出席，商议如何联合抵抗国民革命军。会上，由张宗昌、孙传芳带头，以直、鲁、皖、苏等十五省名义，推举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发表“反赤”宣言，誓与国民革命军一决雌雄。

南下与国民革命军对抗的“安国军”兵分四路，但四路中，实际上参加作战的只有中路和左路，由奉系的三、四方面军团担任，军团司令部设在新乡，由张学良和韩麟春亲自指挥，虎视郑州。

兵下河南，张学良主张应以磁县为止，不要轻易渡过黄河，也不要以占领地盘为目的，重点在于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韩麟春暗受杨宇霆唆使，企图依仗奉军的强大势力，一举推进到黄河以南，多占地盘。

当时，张学良的军团部设在黄河北岸。军队将要开始渡黄河时，奉军总部突然下令，把于珍的第十军序列位置由最后提至最前。这又是杨宇霆的主张，用意很明显，于珍是士官派的中坚人物，是杨宇霆的亲信，于珍率军先行过河，可以首先抢占河南地盘。

果然，在于珍兵抵河南省会开封后，并没有去周密部署军队，随时准备作战；相反，却忙于同地方绅商酬酢，一厢情愿地为其接任河南省督军做准备。结果，竟被靳云鹗部、土著杂牌军队及毅军的米振标部反戈一击，致使奉军人员武器最精良的第十军不战而溃。

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张学良对此事相当不满，他曾对部下刘翼飞说："第十军在南口战役结束后，人员、械弹还都没有来得及补充完备。我原来不想让他率部前来，可是于军长在老将面前，坚决要求南下，急于要当河南督办。"

就在于珍兵溃开封城之际，张学良麾下的奉军主力向郑州发起了猛烈攻势，战况惨烈，胜负难分，战役进程颇具戏剧性。

我们在郑州叫人家三面包围了，不但被包围，人家晚上还乘黑夜派来了游击队，把我们的大炮都拉走了。我接到报告后，担心发生更大麻烦，马上下令说，别打，别打，千万别打，一打就乱套了！我说，让他们拉去吧，尽管让他们拉走！结果大炮被拉走一门，山炮被拉走一门。当时战况就是这样吃紧。

这时，前线临战指挥官情绪低落，个个懊丧之极，不断有

请求撤退的传言。张学良闻讯大惊，急忙赶到前沿指挥部视察。

我就问，你们这是谁的主意？他们知道我这句话来者不善，结果，谁也不吱声。后来，有一个姓赢的，他原是皖系第八军的旅长，是我们奉天人，后来投到了奉系，在我手下当旅长。大家对他挺恭敬的，因为他岁数最大。

他说，这是我的主意。我就问道，真是你的主意吗？这时，大家就都看着我，想知道我的意见。他们的意思是，你要采取措施的话，就应照我们大伙的意见办。

把我气的！我就跟他们说，咱们几个人，要跑，那我撒腿就会跑，那很简单，我们说跑就跑。可是，现在我们对面有整个军队，我们还有炮兵，随便说撤退就能撤了吗？你们说，假如你们真是要退，我现在给你们一个命令，你非得把敌人打退了之后，我们才能撤军。我们现在跟敌人粘着，我们怎么退？我们这几个人跑了，行，那么军队怎么走？军队要渡过这黄河，我们还有炮兵，还有一些重炮，我问你们，我们怎么走？

我跟你讲，战争的胜败，只能说是上帝的眷顾。当时，把我气得简直没法说了。那时韩麟春他抽鸦片烟，不过他的鸦片烟没有多大的瘾头，而我一怒之下，就在那儿抽他的鸦片，自个儿拼命地抽，都抽糊涂了。

我们那时有个铁道队长，姓曹，这个人现在哪儿去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叫铁道队呢？我们那时走铁道啊，铁道上跑的那车呀，还是张宗昌在中东路时制作的，我们管它叫装甲车，是怎样呢，就是拿道木呀，拿铁板挡着，中间夹上水泥，然后，再安上大炮机关枪，好坏就不管它了。

我们打仗时有悬赏。那时靳云鹗部有个指挥官姓高，叫高汝栋，这高汝栋说起来还是我的一个同学呢，我认得他，他是保定军官学校的。他是前敌总指挥，我们那时悬赏十万块钱，

要把他抓住。

你知道我们这军队里的规矩吗？军队里，听到喧哗声，就不是好事，这是《孙子兵法》上说的。

我一早还在睡大觉，我向来睡觉是脱光衣服露着屁股睡的，迷糊之中，忽然听到有人吵吵什么，我就赶紧把衣服穿上，想看看吵闹什么。一看，原来是曹队长在外头。我就问，曹队长，你干什么？他说，我是来向你要钱的。我喝斥他说，什么事你笑嘻嘻的？他原先是我的一个参谋，我当参谋长时，他当团参谋。我说，你笑嘻嘻的干吗琳，说正经话，不要扯淡，不要笑嘻嘻的。你这是干什么？

他说，我把高汝栋给打死了，我不但把高汝栋打死了，还把他的指挥车也拖了过来。

我说你别瞎扯淡，到时候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要你的命。

他说，是这么回事。我们这铁甲车在平汉路作战。铁甲车做什么呢，就是跟着步兵，跟着两连的步兵前进。那么，打进来打出去，差不多是三进三出了，我们的部队退了，这步兵都退了，就把我们扔在了野外。连长安慰士兵们说，你们不用怕，一会儿，他们准会回来拉走我们，这天还黑着呢。可是，天一亮，这火车怎么还不动呢？这铁甲车后面的炮还是俄国的炮，那是张宗昌当年安装的。

一会儿，铁甲车终于移动了，可是，跑了一阵儿，那里头的连长说，不对，方向不对，怎么往那边走了？一看，原来是人家敌方的铁甲车，把我们的铁甲车钩上了。

这人家的铁甲车，就是高汝栋的司令部。我们这铁甲车里有个班长，就他一个管炮的，他说，妈的，给它一炮算了，这个时候不打，什么时候打？打不好，炮筒哗啦炸了，要死大家一块儿死，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结果，咣的一炮，就把他们

前头整个车里的人全部打死了。并不是炮弹爆炸把每一个人都打死的，而是里头的人都被震死、闷死了。一炮打过去，有的人眼珠子出来了，有的人肠子出来了，有的人腿断了。

这样，我们不但没有退却，反而打胜了。我听后马上说，赶快下命令，赶快追击！就这样，把总司令给打死了，把军长给俘虏了，师长也给俘虏了。我们出击了，一下子就打出几十里去，整个地打了个大胜仗。

就这么些事情，不能不说是运气。我打仗，败仗、胜仗我都打过多少回啦，但像这种事，还从来没有遇到呀！

就这样，奉军猛打猛冲，一口气冲到郑州。郑州守军措手不及，纷纷退逃，靳云鹗全军溃败，奉军很快攻占了郑州。

凭借一举攻克郑州的虎威，奉军又进兵开封，结果，米振标部望风而逃，开封城失而复得。

郑州、开封战役结束后不久，蒋介石开始清党。随后，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宁汉分裂，两派军队对峙于安庆、九江之间。奉军见此情势，以为有机可乘，乃推进至西平、上蔡以及合肥、六安一线。

五月中旬，当奉军推进至西平、上蔡一线时，与北伐军唐生智的第八军和张发奎的第四军相遇，发生激战，奉军不支，退至漯河。上蔡方面的富双英军则被张发奎军所包围。赵恩臻命令陈琛的独立第四十六旅前去救援，未果，军长富双英被俘虏，结果陈琛以不听指挥和援救不力罪被枪决。

此时，何柱国奉命由开封前线去增援漯河。何部在临颍一带与张发奎部展开激战。战况之激烈，空前未有。从望远镜中望过去，只见奉方阵地前大片麦地上，全是纵横的北伐军尸体，多到无法计数。

当北伐军攻势顿挫之时，传来洛阳方面奉军万福麟部溃败的消息。冯玉祥军攻占洛阳之后，兵锋直逼郑州，奉军非全线

撤退不可。因此，何柱国旅接获命令，停止出击，并速将坦克车转到临颍车站撤退。

上蔡战役，奉军虽损失富双英部，但对方亦有重大伤亡。奉军停止进攻后，张学良三、四方面军团的主力得以安然撤出。

此役，张学良对韩麟春的军事部署很不满意，两人发生激烈争论。在火车上，张学良痛心地对韩麟春说："假使郭茂宸在，我们恐怕不会遭到这样的惨败。"

张学良认为，奉军主力应在黄河北岸防守，特别是炮兵不应渡过黄河。当时，韩麟春为此大发雷霆，说："没有重武器怎么打？打仗可不是儿戏。"韩麟春是老资格，又专司作战，好大喜功，总想坚持己见，出奇制胜，张学良也不能不尊重他。结果，鄢陵、上蔡一战，奉军第十一军损失惨重，全线吃紧，韩麟春不得不同意张学良后撤的意见。

韩麟春因战事失利，加之阎锡山背信弃义，又反奉倒向了国民革命军，因而懊恼万分，一病不起，奉军三、四军团自此完全由张学良一人掌握。

河南之役，奉军与北伐军双方损失都很惨重。在指挥作战期间，张学良曾带随行人员到民间视察，看到老百姓遭到战争的蹂躏，流离失所，十室九空，饿殍遍野，他触景伤怀道："我们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这真是犯罪啊！"

此次奉军南下失利，不是败于唐生智和张发奎的北伐军，而是由于冯玉祥兵出潼关，占洛阳，逼郑州，威胁奉军侧背；同时，阎锡山又在奉军大后方蠢蠢欲动。这一形势迫使奉军不得不缩短战线，退出河南。

奉军北撤至新乡，张学良令刘鸣九以他的名义先后草拟了三封电报给蒋介石，希望罢战言和，共商国是。

但是，张学良给蒋介石的电报却被张宗昌截获，他向张作

霖告状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你儿子却给蒋介石打电报言和。"

张学良获悉这一消息后，便对刘鸣九说："'张长腿'把咱们告了，你拿上电报稿，准备一下，和我上北京打官司去。"

内战我是恨透了，那打死多少人啊！

晚年，张将军仍义愤填膺地对唐德刚教授说道。

此时，张学良对内战已深恶痛绝，为实现其与北伐军罢兵言和的主张，准备采取相应的措施。

于是，一个大胆的"兵谏"计划，正在他的头脑中悄悄地酝酿着。

第二十章　未遂兵谏

1927.5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

——“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当大总统，那是白日做梦！”

——“我是存着这样的爱心，希望你们也存有这种爱心。”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我打算撤军。北伐军是三民主义的军队，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我研究过，三民主义及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五权宪法的民主政治，有一定道理。如果全国都信三民主义，中国能够统一。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现在占了河北、山东、安徽、河南及热、察、绥等省这么多的地盘，可是，我们连一个好县长都派不出去，都是贪官污吏，天高三尺，地皮都刮光了，整得老百姓怨声载道。为什

么邯郸县出来那么多红枪会，地方上出了那样多土匪呢？都是贪官污吏、连年内战、兵连祸结造成的灾难！

想用武力统一中国当大总统，那是白日做梦！这都是杨宇霆总参议给老将出的主意。民国十年，我同张作相、吴泰来、鲍育才和大姐张冠英等人到日本参观秋操军事大演习，日本人的侵略矛头就是对着东三省。他们说，满蒙地区是日本国的生命线，他们迟早要实行侵略满蒙的政策。东北军能保住东三省不被日本侵略，不当亡国奴，不当朝鲜第二，这才是我们的大功，才对得起东北三千万同胞。

“汉公，我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你在河南郑州与北伐军作战，你撤走时，在桌子上留了一封信。这是怎么回事？”访谈时，唐德刚教授问张将军。

是啊，我是留了一封信。那郑州的事是这样的：白崇禧的中央军打那边过来了，我在撤退之前，留下一封信。这信的内容我大致上还记得。我说，你们过郑州大桥，我不是不会破坏，让你们晚点儿过来，但因为那是国家的财产，我破坏起来很容易，但建一个铁桥却很不容易，这是其一；其二，是我给你们留下许多粮食，我本来可以一把火都烧掉，让你们没有吃的，但我没有烧，我不是忘了，我是想让你们用一用，免得你们让当地的老百姓再纳粮。我说我不是不会那样做，我是存着这样的爱心，希望你们也存有这种爱心。

一九二七年春，张学良虽率兵南下河南，但他“息内争御外侮”的想法，一直在脑际间萦绕。三月十七日，奉军攻入郑州。二十二日，张学良便与韩麟春联名发出“对时局主张的通电”，电文中说：“望海内贤豪，统筹全局，共图国事，息争御外，以挽颓流。”

同时，他又派葛光庭持密信南下，托何成浚转交蒋介石，向国民党试探和平。信中要求双方罢兵息争，并表示愿意服从



一九二七年春，安国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张学良率军开入河南，阻止北伐军进攻。

国民政府。葛光庭在上海待了一个多月，携商定的和平办法，径返郑州复命。

在奉军撤离郑州时，张学良给北伐军留下了粮食、军火库，并执意不炸黄河大桥，还说："中国的事真是难说，我们将来总是会见面的。"凡此种种，足以表明张学良对待国民革命军，从未采取势不两立的敌对立场。

一九二七年五月，北伐军沿津浦路向北推进，前锋越过徐州。在此大军压境之时，蒋介石命令何成濬赴山西游说阎锡山归附国民党，以期兵不血刃，完成统一大业。

何成濬去山西时，须经奉军防线。何成濬秘密到津京后，便与他的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抱病在身的韩麟春晤谈。

"闻兄在徐州作战，如何又到此地?"韩麟春开门见山地问道。

"我去山西，路经此间，特来拜访老友。"何成濬坦然地回答。

"兄此行任务，我知之矣。大概是奉命去运动阎百川的吧?"

"正是去运动百川，设若得手，将来平津发生战争，可以与党军相呼应，贵军难免腹背受敌，彼此至交，才敢奉告。"何成濬单刀直入。

"阎百川可运动，张学良未必不可运动，须知张学良的为人,不但可做革命党，并且可做共产党。"韩麟春郑重地说。

何成濬闻言，不禁"惊喜交集"。后来，何成濬在回忆这件事时说："事后方知其言不虚，且深服其知人之明。"

如此，乃有后来蒋介石派何成濬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晤之举。

一九二七年春，东北炮兵军长邹作华奉张学良之秘密使命

抵达北京。

据高仁绂后来著文回忆，当时，邹作华对高仁绂说："张学良军团长因中国军阀互相混战，没有止境，恐有亡国危险。军团长惟求消灭中国内乱，谋求中国统一，一致对外。新乡会议决定，响应北伐军，与山西阎锡山同时举兵起义。给你的任务是叫你在北京起义响应北伐军。

"全面布置是：公推镇威上将军张作霖为北方革命军总司令，率领奉、吉、黑、热、察、直、鲁、豫八省军队起义；公推阎锡山为北方革命军副总司令，率领晋绥军起义。消灭直鲁联军在山东的军队，由孙传芳负责；消灭张宗昌在河北方面的军队，由张军团长负责；北京方面，由你负责领导起义，北京附近东北军共有步炮兵十五个团，统归你一人指挥，如果张上将军不采纳军团长的建议，命令你率兵包围顺承王府，破坏电信、电话，断绝一切交通，但对顺承王府不许开炮。

"你立刻作军事准备，军团长抵达保定后即下达命令，接到命令后，你要即刻开始行动。起义后，如果张上将军不采纳军团长的建议，你即率兵包围顺承王府，胁迫张上将军就任北方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高仁绂当场拒绝接受这项重大任务，怕担当不起。

"这件事军团长已决定叫你负责，"邹作华对高仁绂说，"不能更改，才叫我亲自来北京传达任务，无论如何，你非接受任务不可。至于各部队，届时军团长会下严厉的命令，叫他们绝对听从你的指挥。"

高仁绂仍然拒绝，他说："郭茂宸领导的滦州起义，是军团长与郭茂宸联衔下的命令，我才同高纪毅排除万难，攻克连山的半永久性阵地，不意到了锦州起了变化，造成相反的后果。那一次算我上了当，这一次我再不上当了，我决不接受这个任务。"



张学良（右）与韩麟春合影。

“这次是军团长个人负责，决无意外的变化。”邹作华又说，“从今天起，你只接受军团长一个人的命令，任何人的命令你都不要接受，连我本人的命令你也不要接受。”当时，邹作华还亲手写了字据，盖了章，交给了高仁绂。

但高仁绂仍不接受这项任务，邹作华脸上顿时变了颜色。

“我考虑的是，如何用兵不血刃的办法占领全北京市，做到安全起义。”高仁绂解释说，“我考虑理由有二：一是，北京市内不能惹起巷战，因外交使团的关系，外侨有了损失，外国使团一定会干涉我们的起义行动；二是，城内所驻系张宗昌部下王栋、王琦的部队，没有东北军部队，必须先用安全办法，解除他们的武装，然后，我们接收西直门，我军夜间入城，即

可办到。”

对此，邹作华表示同意，高仁绂即向他保证，愿绝对负起北京起义的责任。邹作华见状，大喜过望，立刻返回新乡，向张学良报告会商结果去了。

邹走后，高仁绂立即作了起义的部署：一、接收西直门的警戒工作；二、经留守司令周濂批准，在北京城四郊进行局部的军队演习，借此把北京城包围。

这时，京兆尹公署警备副司令李德荣等已接到张学良将军的电报，命令他们绝对听从高仁绂指挥。

不久，阎锡山又趁奉军上蔡战役新败、休整尚未就绪之时，以两师之众兵出娘子关，占据了石家庄以西的郭村，北京震动。为防不测，奉军在京汉路北段的正定、定州和保定布置了三道防线，以此与晋军对峙。

这时，张学良抵达保定，但迟迟未给高仁绂行动命令，高仁绂忧心如焚，坐卧不安。正当他急切待命之时，忽然接到北京张学良公馆副官的电话：“军团长已到了北京，叫你马上来！”高仁绂立即赶到新建胡同。恰巧，邹作华也下车刚到，邹作华神秘地说：“计划变更，停止演习。”

闻听此言，高仁绂如释重负，即刻打电话通知炮兵司令部停止演习，部队回营房。张学良响应北伐军而策划起义的行动，就这样暂告结束。

兵谏没有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原本同意新乡会议计划的孙传芳背信弃义，撕毁盟约，向张作霖告密，张作霖勃然大怒，并把张学良严厉训斥了一通。

由于兵谏流产，又点燃了此后近一年的内战烈焰。

这件事，因为是高度机密，只有张学良和他身边的几个人知道，所以，东北军中在张学良部下做事的人，多数不相信此事。是啊，儿子企图以兵谏的方式逼父亲归附北伐军，似乎有

些不近人情。然而，深知张学良的思想和了解他的性格的人，就能判断出这件事完全可信。

张学良爱国不敢后人，他为谋求中国的统一和富强，是不惜牺牲一切的。刘鸣九先生曾说过："张先生做事情与常人不同，有些别人做不出来的事情，他却能做出来。"

上蔡战役结束不久，蒋介石又派何成浚北上游说阎锡山与张学良，结果，阎锡山于六月上旬即悬挂青天白日旗，归附了南京政府。而张学良等奉军的新派人物虽有易帜之意，但为张老帅察觉后坚决予以杜绝，张作霖并于六月十八日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之职，以继续对抗北伐。至此，张作霖、阎锡山之间的分歧也就无法调和了。

后来，由于蒋介石大量抽调津浦路的北伐军去江西对付武汉方面的东征军，而蒋介石本人又于八月中旬下野，造成宁汉局面颇为混乱。津浦路的张宗昌军和孙传芳军得此机会，遂大举反攻，曾经一度由徐州以北攻至南京附近，乃有著名的龙潭之役。

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奉军统帅部对晋军的态度转趋强硬，以南下攻冯为名而向晋军施加压力。可是晋军却先发制人：八月下旬，奉军将领于珍奉命去绥远校阅，路过大同时，为晋军扣留；接着，晋军兵分三路首先大打出手，向奉军展开进攻，奉晋大战终于拉开了序幕。

第二十一章 大帅就职

1927．6

——“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

——“大元帅一时性急，还请潘总理原谅才好。”

——“爸爸，我不是责怪您，在这种场合要表现得有修养才行，在座的都是文官，对他们要尊重。”

我父亲他比我行，他这人很会办外交，他很会利用局势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有大智。我以前只是我父亲手下的一个将。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国民军被迫退到绥远之后，奉军总司令张作霖在天津蔡家花园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导演了一幕“劝进帐”的滑稽戏。

会议上，韩麟春首先发言说：“国家正处在多事的时候，

要想平定内乱，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各省军政必须有统一的领导、指挥，才能有收效。现在各省军民均派代表在津，他们都拥护老将为陆海军大元帅，以便统一军政大权，迅速平息内乱。今天特请大家前来对这件大事发表高见。"

韩麟春的话音刚落，张宗昌立刻高声说道："既然各省代表们都愿意，我也很赞成，那么，老将，你就做一帝吧！"接着，他又吹胡子瞪眼地说，"俺们的士兵只要多练习编草鞋，准备着用，然后，一声令下，三推两搡地就可以打过长江去。"

此时，孙传芳也竭力捧张大帅。当北伐军进攻武汉时，他先是按兵不动，企图坐收渔人之利；而当北伐军大兵压境时，因屡吃败仗，这位反奉最力的孙传芳，现在又倒转过头来向张作霖投降，不惜与张学良结为盟兄弟，并与张宗昌打成一片，共同倡议拥戴张作霖为北洋派的领袖。

大家七言八语，各抒高见。但最后，众将领还是主张"称帝"一事应先暂缓，眼下当务之急是休整军队，扩充实力，加强与各方面的联系，然后再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也不迟，暂时以安国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号施令。

十一月三十日，由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刘镇华、寇英杰、褚玉璞、张作相、吴俊升、张学良等十六名将领联名倡仪，发表通电说："为统一指挥起见，一致推戴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帅。"

次日，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孙传芳、张宗昌、阎锡山为副司令。安国军的作战计划是：重点进攻河南，援助吴佩孚反攻湖北；阎锡山部固守晋绥，严防冯玉祥再起；张宗昌的直鲁联军配合渤海及东海两舰队，进击南京、上海，协助孙传芳抵抗北伐军。

殊料，安国军出师不利，孙传芳、张宗昌哪里抵得住北伐军的凌厉攻势。张作霖、杨宇霆鉴于孙传芳和张宗昌相继失

败，张学良郑州退兵，前景亦不妙，遂表示愿与冯玉祥弃怨修好，并授意北方“元老”王士珍、赵尔巽等发起和平运动。

翌年四月，为了与南方新军阀缓和矛盾，张作霖又在北方加紧镇压革命运动。北京城贴满了这样的告示：“宣传赤化，主张共产，不分首从，一律死刑。”

更有甚者，张作霖竟不顾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悍然下令调动大批军警，闯进苏联大使馆驻地逮捕了李大钊等数十名革命者，对其进行严刑拷打。

张学良曾向张作霖建议说：“李大钊是个有用的人才，不应该把他杀掉。”

正当张作霖犹豫不决的时候，南方“某要人”突然打来电报，催促将所捕共产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李大钊烈士的女儿李星华回忆说：“有一位父亲的朋友曾含着眼泪低声对我说，杀害你父亲的不单是张作霖。蒋介石前些天叛变了革命，听说蒋介石给张作霖来了一个电报，使张作霖很快下了毒手。另外，帝国主义也插手参与了这件事。”。

此时，孙传芳、张宗昌两部在杭州、南京沿长江一带已被北伐军击败，其残部退到江北；吴佩孚所部退居河南中南部；张学良、韩麟春部又兵败郑州。在这种形势下，张作霖面临三种选择：一、亲自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己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六月四日，张作霖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张作相、吴俊升力主撤兵出关，保境安民；孙传芳、张宗昌主张拥张作霖继续坐镇北京；杨宇霆主张与南京、山西妥协，维持现状。一时间，张大帅举棋不定。

六月十六日，张作霖又在北京召开军政首脑会议。

“今后的敌人已不是北洋系了，而是南方的北伐军，这一仗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会上，张宗昌慷慨激昂地说，“与其

人棺待死，不如痛痛快快地大干一场。老将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的局面，易于号召。"

听了张宗昌这番率直的陈述，张作霖大受启发，众将领也纷纷表示赞同，几天来未能决定的重大问题，最终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下来。

会后，张作霖发表"锐电"，表示决心要讨赤到底，而对于反共者则露出可以妥协之意。电文中声称："几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赤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

六月十六日深夜，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的拥护张作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通电发出。

十八日黎明，北京长安街自东向西迄顺承王府，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小胡同车马阻塞，拥挤不堪。张作霖身着陆军上将制服，安国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孙传芳等随侍左右。

大元帅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最后从前线赶到者为张学良和韩麟春。张老帅坚持要等这二人赶到后才肯就职。

十八日下午三时半，张作霖在鼓乐声中面南站立，乐毕后，高声朗读宣言："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扬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言。"

就职当天，大元帅府发表两项命令，要点如下：

(一)"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于军政府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二）"特任命潘复为国务总理"。

这样，张作霖终于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元首宝座。张学良没有具体的职位，他以不管部大臣兼军团长的身份成为"太子"，冷眼观察政局之发展。

一次，国务院召开由总理潘复主持的国务会议，共有二三百名高级官员参加。会议开得很顺利，气氛也挺和谐。可是，当国务总理潘复要作总结发言时，大元帅张作霖突然高声叫喊起来，说有一条不合理，接着就发起了脾气。

"我现在对于军事还忙不过来，潘馨航，关于政事我就完全交给你了，你不要事事都依靠我，你他妈拉个巴子闹的什么鬼，你以为我不知道？"张大帅勃然变色道。

这一通脾气使在场的张学良非常着急，但又不好说什么，只劝父亲要冷静，不要发火。别的官员也连忙劝道："大元帅有话慢慢说，不要着急。"

张作霖见儿子和大伙都不停地劝，这才坐了下来，不再继续发作。

这时，站在主席台上的潘复被弄得面红耳赤，非常尴尬，他对张作霖解释说："大元帅，您不要误会，我没有别的意思。"

张学良见潘复下不来台，便站起来安慰说："大元帅一时性急，还请潘总理原谅才好。"

潘复挺冷静，他对张学良说："大元帅这是一辈子的脾气了，我了解他老人家，我不见怪。"接着，会场静了下来，潘复继续总结发言，最后，会议总算在平和的气氛中结束了。

会后，帅府准备了二十桌燕翅席招待与会者。宴毕，少帅张学良送走客人回到客厅，恭敬而又温和地说："爸爸，您请回后边休息吧！"

我当时就对我父亲说："说起来，今天这个会还是挺圆满

的。不过，爸爸您今天太急躁了，潘复总理倒还沉着，人家提问题，事先都和您老商量过，咱们哪能发火呢？这又不是开军事会议，那帮老弟兄都知道您老人家的脾气。"

我又耐心地说："爸爸，我不是责怪您，在这种场合要表现得很有修养才行，在座的都是文官，对他们要尊重。不管如何，今天的会开得不错，也给了我们一些经验啊！爸，您老也累了，休息吧。"

张学良回到后房，于凤至见他进来，就上前关切地问："汉卿，今天的国务会议开得怎样了？"张学良就把今天会议的情况和父亲发火的事说了一遍。

于凤至一听也笑了，她说："爸爸还像在东北呢。东北都是多少年的老部下，知道他老人家的脾气，可这是在北京，又都是一些文官，可真得沉着些才好。"

"可爸爸对这些毫不在乎。"张学良说。

"爸爸是大元帅，潘复是总理，两个人是要共事的；不过，我认为爸爸为人还是满机灵的。"于凤至又说道。

"他敢闯敢干也是没比的，我很佩服他老人家这一点，我是赶不上他的。"张学良说。

张作霖自当上大元帅后，就搬进了中南海的丰泽园。一次，大帅举行家宴，几位大太恰好都在北京。张作霖春风满面，神采飞扬地说："这回咱们一家人都全了，可以吃一顿团圆饭了。"

望着满桌子的山珍海味、美馔佳肴，几位太太也都高兴地端起了酒杯。性格活泼、好开玩笑的五太太寿氏喜笑颜开地说："姐妹们，我们的大元帅洪福齐天，咱们姐妹们也沾沾光。从今以后，不要再称呼太太了，这太土气。我建议一律改为夫人，你们说怎么样？"说完，她将杯中酒一饮而尽，众姊妹齐声叫道："好！"

一九二七年六月，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与夫人于凤至合影。后壁四字为“护国佑民”。

有一次，张作霖设国宴，招待外国使节和中国高级官员。宴席非常丰盛，其中有“向阳葵花丝”和“胜利红桃片”两道菜。“向阳葵花丝”是用龙须菜、瘦火腿、鸡蛋松、油菜、油膘洋粉、红油发菜等原料做的。这道菜摆放整齐后像一面中华民国的国旗，造型十分艺术。“胜利红桃片”是用龙须菜、虾片、绿色青菜等原料做的，这道菜摆在盘子里像是一面帅旗，造型美观，颇具象征意义。

参加国宴的客人中有日本的芳泽大使和本庄繁顾问。宴会开始时，主客纷纷站了起来，端着酒杯相互敬酒。芳泽大使吃

得很高兴，他用手指着“向阳葵花丝”和“胜利红桃片”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我们日本人就爱吃这道菜，真好吃，味道太美了。”

张作霖一听，脸上露出狡黠的微笑，以讽刺的口气对芳泽说：“你们愿意吃，恐怕吃不消吧。”

一句话，引得全桌人大笑。国务总理潘复见张作霖面带怒色，忙用话岔开说：“喝酒，喝酒，吃菜吧！”接着，他又悄悄对张作霖说，“大元帅，他们是喝醉了。”其他官员也赶忙插嘴谈起别的话题，张作霖的面色才稍有缓和。

宴会结束后，张作霖回到住所仍怒气未消，他对身旁的人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像国旗的菜，代表了我们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是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以后制定的国旗。他小日本就爱吃，净想好事！他妈拉个巴子的，他能吃得了吗？”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张作霖来到天坛，祭告中华列祖列宗。正当他捧爵而祭，喃喃祈祷时，一不小心竟将金爵摔落在地上，与会者都认为此乃凶兆。

顾维钧曾经拿着张大帅的八字请术士为其算命。术士坦言道，这个命贵是贵，可是正如黎明前的灯胆，马上就要熄灭了。

第二十二章　奉 晋 大 战

1927.9

——“阎锡山已响应蒋介石国民党军，向我方全面进攻。”

——“敌军在望都之役，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

——“这个孽是谁造的，是谁给老百姓造的孽？那就是我们啊！”

“这次准备派你到日本参观陆军秋季大演习，不日即可前往。现在，你已无暇置备衣装，就把我的新式陆军礼服赠送给你吧。”

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抵保定进行检阅。检阅完毕，他对师长刘翼飞说道。

言罢，张学良即令副官谭海派人将礼服取来，刘翼飞穿上后，觉得挺合适。正当他为能东渡日本而感到高兴时，张学良

忽然被急电召回北京。

原来，奉军战将于珍率领的检阅人员在去丰镇和平地泉途中，被大同镇守使张荫梧扣留，并转送太原。因此，京汉、京绥两路东北军顿时处在积极备战状态中，刘翼飞的日本之行随即也成了泡影。

形势突变。九月下旬，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共同讨伐张作霖的三角同盟达成了协议，山西已悬挂上青天白日旗，晋阎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誓师讨伐奉张，独占京津，作为将来向蒋介石要求平分天下的条件。于是，山西当局开始向奉军挑衅，制造纠纷，奉晋大战初露端倪。

为避免更大的无谓的杀伐，张学良致电阎锡山，倡导和平。他在电文中说："实不忍奉晋相见以兵，糜烂北方，致为亲者痛、仇者快。"希望阎锡山能顾全北方大局，息战罢兵，释放已被缴械的奉军，释放被扣押的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恢复铁路被破坏处所，速将晋军撤回原地。

但是,张学良的和平主张却遭到阎锡山的拒绝。阎晋战意已定,不由分说,兵分三路,首先向奉军发起了进攻。

北路，晋军沿京绥路向奉军张作相所部展开进攻，张部招架不住，开始由绥远逐步后撤，曾一度放弃了张家口和宣化，在南口筑成最后防线。不过，此路双方所投兵力皆非主力，战事远没有中路和南路激烈。

中路战场在京西门头沟和京南涿州一带。晋军傅作义部由五台出平型关偷袭涿州成功，切断了保定奉军的后路，与门头沟和京绥路的晋军相呼应，危及北京，此举对奉军的威胁非同小可。

南路，晋军矛头直指正定、定州和保定，这是晋奉双方主力决战的战场。张学良、韩麟春指挥的三、四方面军团的主力大部分都集中在这里。

奉军司令部设在保定，由张学良亲自指挥；晋军则由阎锡山亲自统率。九月底，晋军主力猛攻石家庄，并由定州向正定和望都一带大肆进兵，意欲一举夺占保定。

阎锡山已响应蒋介石国民党军，向我方全面进攻。此刻，我就向手下战将王树常、刘翼飞、张廷枢、李宏顾等通报了战况："商震所部已由京绥路向宣化前进，攻击我高维岳部第九军，其主力部队由徐永昌统率东出娘子关，袭击石家庄，已与我第十五军汲金纯部开始激战。我第十六、七联军及二十九军已在正定附近占领阵地，正与晋军进行战斗中。晋军另有其步、骑、炮各兵种联合的一大纵队约数千人，已出龙泉关，直趋五快镇及阜平一带，威胁我第十六、七联军的右侧背。现令第十师即刻出发，掩护正定第十六、七联军作战，并拒止龙泉关东进之敌。"

岂料，当刘翼飞的第十师奉命出发，向曲阳方面西进，以便拒止东进之晋军时，前方突然发现大部溃兵纷纷退过来。经探悉，奉军第十五军汲金纯部已由石家庄撤退至清风店附近的第十六、七联军阵地，该军的孙兆印师已溃不成军，人员武器损失严重。因此，奉军不得已放弃正定，全线撤退。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一面作好撤退准备，一面决定用第二十九军作骑兵式的迂回，袭击晋军后方据点定州，与右翼第十军沿山坡突击敌人后方，以口袋战术挽救危局。

接令后，何柱国师由任邱向西疾进，猛攻定州东门，经过激战，何师主力冲入城内，直达街道西口。但晋军用冲锋枪组成密集火力，封住奉方占据的街口，双方形成对峙僵局。

就在奉军攻打定州东门的同时，戢军长亲率主力富占奎和黄师岳两师从定州城南猛攻定州西侧火车站，战况异常激烈，戢军长右手负伤，富师长腹部中弹。此时，奉军弹药即将告

磐，战况紧急。但是，经此袭击，晋军的后路被切断，进攻保定一线晋军主力的处境，顿时变得异常险恶。

十月四日，刘翼飞的第十师及张廷枢的第十二师接到命令，迅速向望都集结。原来，由于奉军前方各军作战失利，不得已全部撤至望都，准备在这里与阎锡山部决一死战。

时近黄昏，忽见第十六、七联军上校参谋蔡雄飞率队退经第十师阵地，他对刘翼飞说："我军的大部队伍已由铁路以东撤退完毕了，在我后面已没有后续部队了。"

刘师长用望远镜详细观察，突然发现了一大队人马，正以四路纵队向奉方阵地前进。他们的臂章是黄色的，队伍前头还有乘马的军官数人。当刘师长查明他们是已进入有效射程的敌军后，即令迫击炮、机关枪同时开火。在猛烈的火力下，晋军人马四处逃窜，溃不成军。

晋军遭受这一意外伏击，便欲进行报复。当夜，晋军数次猛攻，奉军伤亡了营、连长和士兵百余名，但晋军并未得手。双方对峙数日，战况毫无进展。

六日，晋军趁夜色打破僵持局面，突向奉方第十师正面展开猛烈进攻，炮火炽烈，弹雨如注。奉军前沿阵地张金相团长胸部被枪弹射穿，中校崔团副亦受重伤，其他营、连长和士兵伤亡达二百多人。战况紧急，传言甚多，奉军处境危殆，一时间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时近拂晓，炮火稍弱，刘翼飞师长用电话急同第十二师师长张廷枢联系说："现在方顺桥的退路已被切断，我们不如同时出击，打开前进道路，或可转危为安，否则腹背受敌，后果不堪设想！"

刘翼飞的这一倡议，立即得到张师长赞成。当两师开始反攻、打响望都战役时，才获悉方顺桥仍掌握在奉军手中，先前失守之说纯系谣传，顷刻之间，士气大增。同时，张学良业已同意

刘、张的反攻主张。于是，刘、张两师连手出击，官兵上下一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晋军阵脚大乱，仓皇后撤。

随后，刘师张连长奉命进行战场追击，不料，由于军用地图印错了东西两村的位置，以致该连误入东村。当刘翼飞率部跟随张连长向东村前进时，见有该连士兵二人失魂落魄地跑回来报告说："师长不要前进了，前村驻有敌军，还有洋马数匹和一部分骑兵。我连误入该村，现正在一庙内被缴械中，我俩乘隙逃了出来，特向师长报告。"

面对这一意外，刘师长当机立断，急令号兵吹冲锋号，散开人马，虚张声势；同时，机枪与步枪齐鸣，手榴弹纷纷爆炸，尘土飞扬，杀声震耳，佯向该村猛冲，随即见有乘洋马的军官十余人飞身上马，疾速向南逃去。

刘师乘机攻进村里，进村以后才知道，正当该连被缴械时，张连长忽听村外枪声大作，人声鼎沸，便知大部队已到，立即抓起一枚手榴弹，高举在手中，大声疾呼道："你们赶快把武器放下，我们的大部队来了！不然，我就扔出它，咱们同归于尽，谁也别想活！"晋军营长自知大势已去，只得唯命是从，三百余人反被该连缴械俘获了。

"乘洋马逃走的是徐永昌和孙楚两位总指挥，他们不知左翼傅存怀部已经溃退。"被俘晋军官兵招供说。

当时，奉军不知道乘洋马逃走的是徐永昌和孙楚，否则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掉他们，一定会策马急追的。此乃奉晋大战中望都之战戏剧性的一幕。

"敌军在望都之役，被我军打得落花流水，并俘获大批官兵，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张学良军团长亲自传谕嘉奖。

刘翼飞觉得很奇怪，像这样的小胜利在大军作战中，影响不大，为什么如此宣传呢？

后来，刘翼飞见到奉军团部副官长高纪毅，高纪毅眉飞色

舞地对他叙说了以下战况："当你们正面敌军攻击正烈时，据报敌军骑兵赵承绶部夜袭保定，突与我第十五军汲金纯部在距保定二十五里的大冉村激战；同时获悉，距保定三十里的方顺桥东站已被敌军骑兵占领，切断了军团部与前线的联络，因而人心惶惶，如无你师和第十二师的反攻成功，那就不堪设想了。因此，望都战斗的胜利，在我军战略上起了很大的作用。"

高纪毅又说："由于你们攻击成功，张军团长当即命令全线出击，在京汉路的第十六、七联军及第二十九军也全线反击，张树森的骑兵旅奉命袭占了新乐东站。当何柱国师突入检查停在那里的列车时，发现有阎锡山的印信和文件等，证明了阎曾在这列车厢内办公。原来，当何部到达东站时，他们才狼狈逃走，连印信、文件等都未及携带，阎锡山险些被俘获。"

就这样，至十月十四日，晋军各路人马纷纷被击溃，奉军重新占领了定州、正定、石家庄及宣化、张家口、柴沟堡等地，阎锡山逃进了娘子关。

晋军退据娘子关、龙泉关深山里之后，由于这里山高路险，地势险要，奉军数次攻击，均未成功，反遭晋军猛烈反扑，从而双方攻势僵持，战局呈胶着状态。

正当晋军各路人马纷纷败退之际，十月十二日，傅作义率第四师却成功地占领了涿州，孤军苦战，企图挽回颓势，扭转全局。

涿州位于平原地区，虽无险可守，但城垣高厚，易守难攻。该城呈长方形，南北长约三里，东西约二里半，城墙高约三丈余，四面各有一门，城外有护城河。由于该城距京汉铁路线仅千米左右，扼京汉线之咽喉，车站和往来列车都在枪炮射程以内，因而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当傅作义部乘虚进占涿州时，奉军兵力正分散于京汉线中段及京绥线东段，仅有王以哲旅驻扎保定。王旅共有步兵三个

团，装备精良，训练也比较好。王以哲先命第二团进攻涿州车站，得手后迫使傅军西退入城。

随后，王以哲调来炮兵，在炮火掩护下，即令第三团攻城。傅军居高临下，拼死护城。奉军反复冲击，死伤甚多，攻势顿时受挫。不料，当夜傅军突由东门冲出，袭击奉军后方，奉军反被迫后撤至涿州清凉寺。

张学良闻讯后，急速增调三万余人投入战斗，并乘飞机亲临涿州上空视察，下令紧缩包围圈，仅在城西留出空隙地带，以备傅军撤逃。但傅军担心出城西后队伍可能会被拦腰截断，遂决定倾全力死守城池。

自十月十六日至十七日，仅短短的两天，奉军便连续进行了四次总攻击。一方死守，一方猛攻，炮击日以继夜，声闻百里，战况极为惨烈。

在各次总攻击中，奉军航空部曾派单机前来散发劝降传单并执行轰炸任务。但有一次竟将炸弹误扔在本军阵地上，炸死、炸伤了好多士兵。从此，一听到飞机声临近，围城奉军便首先跳出工事，向后方逃避，空中轰炸一时竟弄巧成拙。

由于涿州攻守战旷日持久，居民生命财产损失不断扩大，繁盛的南北大街成了一片瓦砾场，经涿州旅京同乡会呼吁和中国红十字会的提议，双方同意将城中的老弱妇孺放出，以免作无谓的牺牲。十二月十六日，双方暂停战斗，城里放出居民一千多人，个个面有菜色，精神萎顿不堪。

炮兵司令邹作华则利用此时机逐一探询，对城内傅军弹药、给养情况及傅作义的司令部所在地详加了解。当晚八时，邹作华调集重炮兵一团，以三十六门大炮同时向东门商会方面集中轰击，除炸死、炸伤许多居民外，房屋损毁尤多，傅作义也臂部受伤。

奉军前几次总攻击不但未能得手，且招致重大伤亡。万福

麟孤注一掷，调动六辆坦克前来参战。奉军的坦克都是从法国买来的，共三十六辆。这种坦克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废品，行驶时发动机声音特别大，动作却非常缓慢。

新的攻击开始了，坦克向城墙一字排开对敌方开火。起初，凶猛的炮火成功地把对方火力压制住了。但在变换阵地时，车身刚向右拐，就被由城墙根火力点发射过来的炮弹击中侧面，立即有两辆歪倒在地上，刹那间便瘫痪了。入夜，幸存的四辆勉强撤回后方，第二天攻击时又损失一辆。至此，这个坦克中队两战损失了半数，且对战事未有明显帮助。

经过多次总攻击，奉军一筹莫展，而傅军却愈战愈勇。万福麟不断受到张作霖的斥骂，最后，他狗急跳墙，决定进行化学战。

“咱们不是有氯气炮吗？把他们都给熏死吧！”万福麟黔驴技穷，竟不择手段了。

不几天，运来毒瓦斯炮弹五百发，弹头有红有黑：红色是燃烧弹，黑色是毒瓦斯弹。发射前，万福麟亲临炮兵阵地视察，并忏悔般地说：“我作损啦！不用说城里的人，就连耗子也统统会被熏死的！”

待五百发毒瓦斯弹和燃烧弹发射完毕，步兵部队蜂拥而上。不料开始攻城时，城上枪炮齐发，傅军火力未见稍减，奉军攻势又遭重挫。

万福麟马上传令指挥化学战的那个白俄来指挥部，问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对方回答说：“炮弹太少。欧战时，一次战役发射几万发才有效。”

其实，这种炮弹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剩余物资，大多数早已是失效的废品，奉军发射时，有几颗毒瓦斯弹刚出膛就落地了，发出的烟雾和怪味把炮兵阵地的官兵们吓得乱窜。后来涿州开城后，据城内傅军士兵说：“这种炮弹发出的气体比空气重，直往地下室或壕沟里沉，气味令人恶心。我们在高

处，就没有受到伤害。”

阎锡山曾为此通电全国，谴责张作霖使用毒气弹，灭绝人性；而张作霖却以仅仅是施放烟幕弹以掩护攻城作辩解。

“不用打啦，把涿州城四周挖上壕沟，架上铁丝网。不投降，就把他们饿死在城里。”连续九次总攻击失败、一筹莫展之际，张作霖不得不下令说。

话虽这样说，但张氏父子仍没有放弃和平取得涿州的打算。张学良派人持函入城劝傅作义投降，保证优待，但傅作义回信说：“老师教授我们的战术中，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课。”

最后，张作霖又派参议王剑秋率领傅作义的山西同乡会代表和红十字会等慈善团体代表来到涿州人城谈判。条件是：先将粮食、蔬菜等送进涿城；开城后，对傅作义尊重并优待；晋军士兵予以收编，不加歧视。

这时，傅作义死守涿州已两个多月，兵民交困，而阎锡山纵览大局，认为死守涿州已经失去战略意义，乃授意傅作义与奉军进行停战谈判。

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奉晋双方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傅作义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打开涿州城门，亲率高级军官、幕僚出南门；奉军方面，万福麟以下高级军官、幕僚在南门外摆队相迎，在雄壮的军乐声中，双方握手言欢，互道辛苦。傅作义身着便衣，负伤的那只手臂还挂在绷带上。

万福麟先陪傅作义到城南松林店稍候，再用专车送达保定，由总参谋长鲍文樾负责招待，傅作义成为张学良军团长的座上客。

我心里很难过。我对我父亲说，我们今天打的这个仗，到底为了什么？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没有任何目的嘛。这个孽是谁造的，是谁给老百姓造的孽？那就是我们啊！

第二十三章　彰德战役

1928.4

——“打死的，那都是相当优秀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之辈，就来邀功受赏。”

——“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津浦路一败涂地，德州不守，我们不撤就回不去了。”

说实在的，在我的心里，对内战我是反对透了。我从河南回来，在那个火车站上，记得这个地方叫木马依，因为前面有红枪会，我们的车子便停下来了。我看到这样一个情景，我非常难过，眼泪都掉下来了。我看见一个老太婆，趴在地下。我说这个人怎么这样，饿得可怜极了，我们把吃的馒头扔给她，她跪在地上就带着土那么吃了。我就问她，你怎么这样？家里没人了吗？有儿子吗？哪儿去了？她说，不知道，儿子当兵去

了。她说，我们年轻的子弟都被抓去当兵了，拉走的拉走，跑的跑，逃的逃，剩下我们这些老的、走不动，逃不掉，没有饭吃，只能挨饿。我就自个儿问自个儿，这是谁作的孽，还不都是我们当军人的干的？今天跟你打，明天再和好，又不打了，后天再跟他打！

我跟你说，打死的，那都是相当优秀的佼佼者，剩下的无能之辈，就来邀功受赏。有意义的战争还可以，可这种战争打得有什么意思？这究竟是在干什么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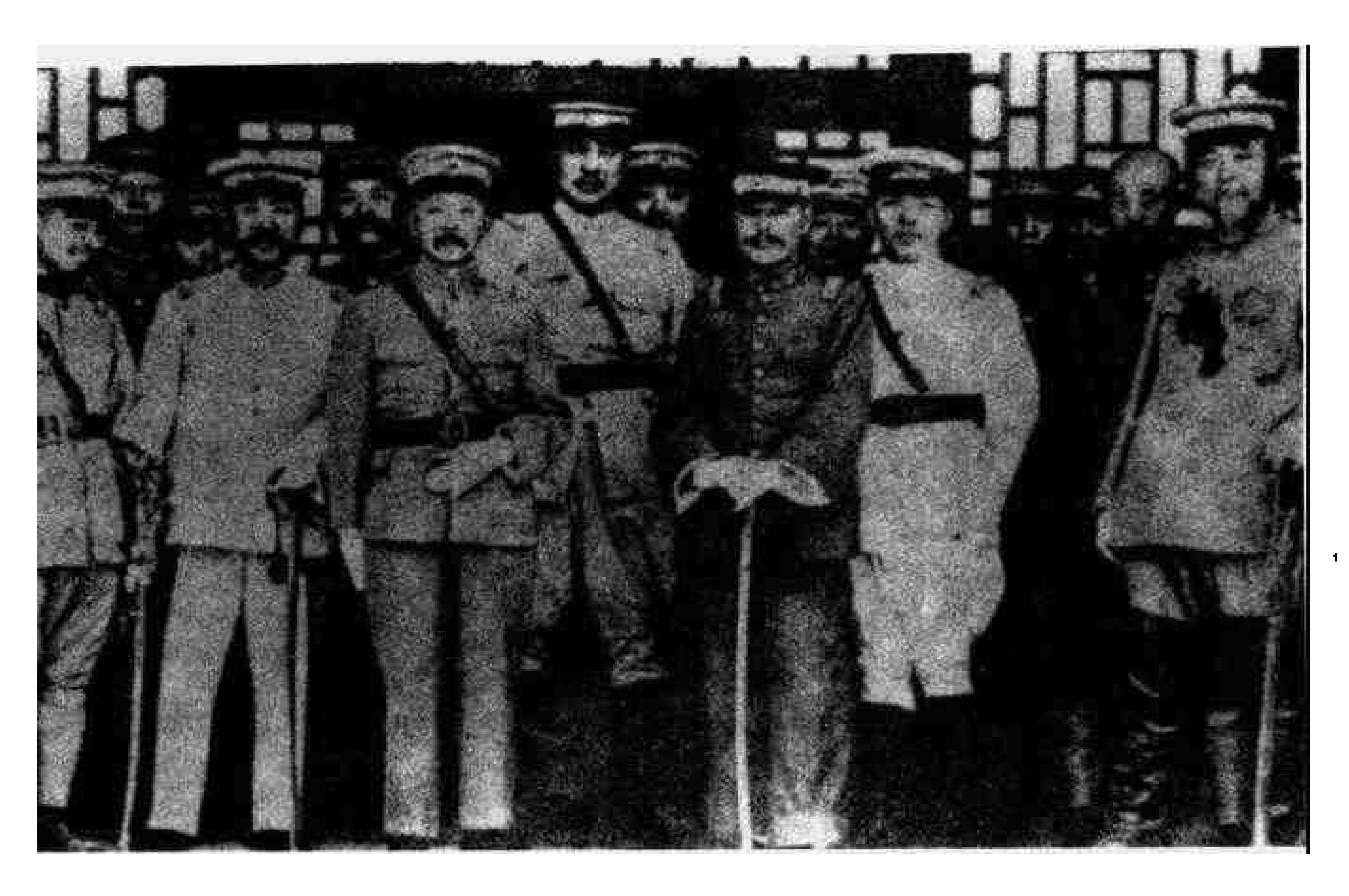
彰德决战，就是张将军所讲的这类"作孽"的尾声。这是奉军独立对抗蒋、冯、阎三大势力全面大战中的最后一个战役。

原来，一九二八年一月九日，蒋介石通电复职。二月，他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调兵遣将，部署北伐。会议决定，蒋、冯、阎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二、三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主力在津浦路；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主力在京汉路的彰德，另一部分在鲁西南；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分布在雁门关、龙泉关和娘子关，其主力大部分集中在正太路。

上述三路进军矛头直指盘踞北方、势力强大的北洋军阀张作霖。

此刻，张作霖也在北京召开军事会议。会上决定：张宗昌、褚玉璞等部在津浦路上，对蒋系北伐军采取守势；以张学良、杨宇霆的第三、四军团为主力，对冯、阎部采取攻势。

奉军方面的阵容是：张宗昌直鲁联军和孙传芳残部位于津浦路；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团布署在京汉路；同时，还从吉、黑两省和热河等地调来所有可以作战的部队，归张学良统领。可见，奉军可谓倾巢而出。目标，全力以赴进攻冯玉祥。另外，奉军张作相和汤玉麟的旧派军队部署在雁门关，王树常的第十军布阵在龙泉关，荣臻和胡毓坤的第十六、七联军虎视娘子关，进攻目标是晋军阎锡山。



一九二八年春，张作霖（左三）、张学良（右四）在顺承王府接见吴佩孚（右五）。

京汉线彰德一带是张学良所部与冯玉祥厮杀的主战场，因而，该部配备主力最多，其中有戢翼翘的第二十九军、于学忠的第二十军、高占奎的预备军和其他直属部队，皆由张学良亲自指挥。

此外，还有马占山和窦连芳的两个骑兵军，从中策应津浦和京汉两路奉军。

这一场奉军对抗北伐军的全面大战，自津浦、京汉、京绥等各方面同时展开后，战线长达数千里，各路人马直杀得昏天黑地，血肉横飞。

决战自一九二八年四月初开始，全面激战约一个月。以后

大致都是奉军逐步撤退的过程，至六月上旬退至滦州，迨至张大帅皇姑屯被炸之后，全部战役即告结束。

在京汉、京绥线方面，奉军对冯、阎始终没有打过败仗。只因津浦路张宗昌部连战皆败，于四月底丢掉济南，一路溃退，主力大部丧失，因而天津动摇，致使京汉路大军不得不全面后撤，奉军就是这样失败的。

三月三十日，张学良和杨宇霆在石家庄站与第八军军长万福麟面洽，密授机宜后，继续南下。两人晚八时许抵邯郸，随即与等候在车站的戢翼翘、于学忠等人面商，决计秣马厉兵，严阵以待，嘱其一俟讨伐令下达，即应与大名、济宁等方面的直鲁联军一齐向冯玉祥部发起猛攻，责令戢、于两人担任进攻冯军的前线指挥官。

军马倥偬之中，张学良拨冗游赵故城邯郸宫，感怀赋诗一首，诗曰：

> 沽酒邯郸大道旁，村人都说武灵王。
> 英雄应有笙歌地，不比吴宫响屧郎。
> 光武艰难定济中，滹沱一饭困英雄。
> 当年天下归心日，都在邯郸古赵宫。

四月一日，忽闻晋、冯、蒋军三角同盟正式宣告对奉张开战，于是，张学良、杨宇霆亦于当日被迫发布了总攻击令。下午四时，张、杨乘专车北返，当晚到达顺德，二日晨抵达石家庄。此后，张学良在邯郸、石家庄、保定、北京一线，穿梭往来，统筹指挥全局。

此时，山西方面，阎锡山军已退入雁门关、龙泉关和娘子关。战役一开始，奉军就向三关同时发起了进攻。

雁门关地势最险，奉军用的又是战斗力较差的旧派军队，

可是，该路经过一番鏖战，居然出人意料地攻了下来，并占领了繁峙，只因兵力不足，未能扩大战果。

龙泉关和娘子关地势不太险要，用的又是奉军的精锐部队，但苦战二十余日，两关都没有攻下。尤其是娘子关方面，奉军主力在此，攻势甚猛，战斗非常激烈，但战况始终没有进展。

原来，雁门关地势虽然险峻，但是纵深甚短，容易攻克。娘子关虽无雁门关之险，但纵深太长，攻势难以奏效，所以奉、阎双方在此地一直呈胶着对峙状态。

此时，张学良在西线颇为得手，该部南下河南北部，西入山西大同，兵锋直逼彰德。

彰德位于京汉路东侧，北面是安阳河，再北是彰河。冯军右翼主阵地构筑在安阳河北面的韩陵山东端。韩陵山坡度平缓，东端有一个小村，这个小村就是冯军主阵地的一部分，他们沿村构筑了坚固的工事，准备长期固守。

该战役奉军兵力布署为：张学良麾下的戢翼翘第二十九军在战役中担任主力左翼攻城部队；何柱国师位于该军的左侧助攻；右翼是高占奎军；于学忠的第二十军为预备队。

四月上旬，何师渡彰河驱逐冯军先头部队后，直逼韩陵山冯军主阵地。何师猛攻小村，久攻不克，大炮陆续增加到二十八门之多，并有轻型坦克四辆助攻，结果仍未能奏效。

何柱国率领他的精锐之师苦攻多日，其中曾多次冲进小村，却又不得已退回，双方形成拉锯战。后来，经过苦战，何师终于攻上了韩陵山，但对是否渡河尚举棋不定。

这时，右翼高占奎军以水治镇为目标，进攻亦大有进展。至此，冯军苦守的彰德一线危在旦夕，战局对奉军相当有利。

当时，张学良坐镇的第三、四方面军团部，曾数次在发报机上截获并译出冯玉祥向蒋介石告急求援的密电，蒋介石叮嘱

冯军坚守，并说自己在津浦路猛攻得手，就是对冯部最好的援助。因此，奉军急欲攻下彰德，以便扭转津浦危局。

事态刻不容缓。于是，张学良命令于学忠军与马占山军从东面向彰德迂回。在精锐主力部队的围攻下，四月十二日，奉军攻下彰德。

十三日，张学良、杨宇霆向帅府发出告捷电。

这一时期，张学良在前线往来督战，无一定驻节地点，食宿办公均在车上。有时，他亲自驾驶摩托车或小汽车往来百里内外，不以为劳。路过村庄时，竟还能挤时间召村农访问疾苦，态度温和如对家人。

四月二十一日，张学良军次邯郸，赋《丛台怀古》七言绝句。诗云：

> 武灵按剑却强胡，朝罢诸侯且自误。
> 当日将才皆颇牧，君王歌舞有工夫。

就在各条战线血腥厮杀之际，四月下旬，张学良暂返北京。一下车，他便在副官的陪同下前往张作霖的住所中南海居仁堂。

见到父亲，张学良先谈了前方的战况：娘子关方面与晋军成胶着对峙状态；与冯部的彰德之战，正如火如荼；而孙传芳、张宗昌部在济宁大败，济南已危在旦夕。然后，他就把撤军问题提了出来。大帅一听儿子又来谈撤军之事，不禁大发雷霆。

"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是要拆我的台！"

张学良的副官陈大章和吴景山这时在门厅隔着窗户，静听他们父子俩在里边争吵，激辩中，张作霖的嗓门特别大。

"你说北伐军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能统一中国，咱们东北军什么主义都没有，统一不了中国，我就不信你小子的话！你是胆小鬼，叫三民主义、孙大炮把你小子的胆吓破了。什么三民主义？我是四民主义，我还有大炮呢，他有吗？二次奉直大战我把吴佩孚打垮了，又把冯玉祥打到陕西去了，阎锡山也被我打败了。我东北军人强马壮，兵多、飞机多、大炮多、大豆多，每年出超三亿多美元，占了八九个省的地盘，有十几个骑兵师。我们兵工厂库房有二三十万条好枪，有一十多门迫击炮，还有山炮、重炮、加农炮，北伐军天上没有飞机下蛋，地下没有四条腿的骑兵，我怎么就不能统一中国？你小六子带领几十万大军不打仗，跑到我面前要撤兵，我一辈子没打过败仗，我不撤！"

我就对父亲说，天下哪有儿子欺骗爸爸的。我说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中国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打就过了长江了。孤军深入是兵家大忌，后边没有预备军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退路，再想撤也撤不回来了。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日本对各方都支持，这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

"我就是不怕日本鬼子！"张作霖说，"日本鬼子在南满路顶多有一万三，我要打日本鬼子，先召集南满路沿线各县县长、公安局长开个会，定个日期，一夜之间就把铁轨都扒了，拉走埋在地下。咱东北军有三十万，重兵先占领旅顺、大连，一万多日本鬼子不就交待了？咱怕日本鬼子十嘛呢！"

这次谈话没有结果。张学良看看天色不早，就退出来回去休息去了。

第二天傍晚，我又去见父帅，继续恳请撤军。我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都是中国人嘛。都是中国人，地盘也是中国的，谁占的多点儿谁占的少点儿有什么关系？他怎么占不还

是中国人占中国地嘛！咱东北要是丢了，就不是中国人占了，而是日本人占了，那就成了千古罪人，咱就要当亡国奴了！东北要是丢了，咱们就没有立锥之地了！现在，东北军都在关内，东北唱空城计了，不撤不行！

听到这儿，张作霖终于省悟过来。他说："好，究竟是讲武堂出来的，有战略眼光，看得远。对，咱们撤！东北的高粱米子儿我还没吃够呢，北京的大米饭我可吃够了。现在就是请我在北京当大总统我也不当了，我什么也不当了，我回东北去！"

此时，津浦路一线频传失败的消息。四月三十日，张宗昌、孙传芳抵不住北伐军的凌厉攻势，于晚十时放弃济南，向德州败退。由于直鲁联军主力大部丧失，已无反击阻挡北伐军之力，因而京津局势危在旦夕。而奉军京汉、正太两路战事又都成胶着状态，无法抽调大军增援津浦路。

我父亲这个人，对于老百姓，那他是非常爱护的，他自个出身微贱嘛。他看到战祸连绵，民生涂炭，所以就这样下决心不打了。

就这样，张学良终于说服了张作霖，同意息兵罢战，退出关外。

津浦路一败涂地，德州不守，我们不撤就回不去了。

日本鬼子在济南杀死我国外交人员，济南城内军民死伤数以千计，张宗昌来电反而以此引为得意，他妈的，太不要脸了！我们决定放弃京津，撤兵关外。

然而，大撤退岂是轻而易举之事？

何柱国师的任务是掩护彰德第一线各部队撤退，待退到顺德，再掩护石家庄以西主力军撤退，因此，何师落在最后。等到何师自己撤退的时候，发现不但所有友军皆已远去，而且连本该策应他的窦连芳的骑兵军也不见踪影了。更令他恼怒的

是，冯玉祥军的前头部队郑大章骑兵军竟对他穷追不舍，何师的处境相当危急。

危难之际，何柱国自当尖兵，身先士卒，率领走在前面的探路人员查看地形和通道，哪里没有敌人，就从哪里钻过去。夜间多走路，白天多休息，弯弯曲曲，向北行进。经过了诸多曲折，总算渡过了滹沱河。

殊料，新的危机又接踵而来。晋军骑兵由正定向无极县横冲过来，幸好，何柱国师一路都没有搞乱队形，一路都作好了打遭遇战的准备。所以，当晋骑兵扑来时，何师官兵立即散开，临时依托一个小村作掩护，很快将追兵打了回去。这时，何师官兵已多日没有吃好睡足，既饥饿，又疲劳，何柱国只得命令就地造饭，休整睡觉。

第二天早晨，走在前面探路的副官丁士林报告说："前面远远看去，好像是我们东北军的骑兵。"何柱国立刻命令快马追上去，并下令无论如何也要追到他们。

不久，探路的丁副官回报说，前方正是窦连芳骑兵军的后卫，何柱国马上和窦连芳取得联系，谈妥由他的骑兵掩护何部，让步兵走在前面。因此，何柱国师终于安全地经由任邱、雄县越过京津路。

奉军统帅部撤退时留有火车头在廊坊、杨村间来回巡逻，并带有命令，要何柱国师撤到滦州。至此，何柱国师与统帅部失去联络多日后，终于第一次接到命令。

与此同时，五月九日，张大帅正式发出息兵"佳电"，电文曰："……令彰德、正太战胜之兵，停止攻击。所有国内政治问题，但期国民有公正之裁决，断不作无谓的坚持，公是公非，听诸舆论。"

两天之后，张学良与杨宇霆复上海总商会五月六日电，电文中说："今内患未宁，外忧又至。我帅座从理服善，息事宁

人，学良等仰赞和平，敢不惟命是听？一言以蔽之，南北一家，彼果无弯弓而射之成心，我确有免胄寻盟之真意。”

奉军为避杀伐再起，主动退出京津，北洋政府从此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次和平移交政权，张学良为此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第二十四章　芳泽诡诈

1928.5

——“知己，还要知彼。爸爸，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

——“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

“此次战争，开衅在彼，公论未泯，责有所归。学良去岁曾贡危言，同是国民，敢忘外患？顷将沪电面陈帅府意旨，释憾罢兵，一致救国。”五月十一日，张学良就奉军同蒋、冯、阎大战及息战罢兵之事，复电曹汝霖。

两天后，张学良就近日时局的演变，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记者问：“对济南惨案有何感想？”

张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言之至为痛心。年来国内各方因政见不同，致生争执，兵乱连年，民生穷蹙，国际地位

日益低落。余等虽属军人，参加战役，但阋墙之斗，实非本心，深需各方一致，早息内争，以互助之精神，谋全面之建设，以求真正之国利民福，国内日趋健全，外患无可入之机。此次若非我国发生内战，日军何由入鲁？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其理至明也。"

记者问："南北双方可否停战？"

张答："余等平日主张，无论何党何派，不分畛域，倘以福国利民为前提，与余等宗旨不悖，均可合作。南北两方，原无不解之仇，倘能互蠲成见，自有合作之可能。但须有相当办法，非空言所能成事也。自统军以来，未尝有丝毫权位野心。平日所拳拳服膺者惟在道德二字，年来政教废弛，礼仪沦丧，人心世道几于无所维系。余等之志愿竭个人之力，以扶持中国原有之道德，使其不至终于废坠。此余等之宗旨，亦余等所负之使命也。"

五月十六日，日本田中内阁举行秘密会议决定，若是张作霖退出关外，而国民革命军追击前来，日本军准备对双方军队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若只是张作霖退出关外，可不解除其武装。

同时，日驻北京使馆武官建川少将抵保定，面晤张学良及杨宇霆，声称若战争波及满洲，则日本为维护特权利益出发，不得不采取断然之处置。至此，奉张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

六月十八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实际上就是当上了大总统，实现了他多年的梦想。但张作霖的心情并不愉快，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想控制他，先后多次派驻华大使对他软硬兼施，要求解决"满蒙悬案"。而随着自己势力的壮大，张作霖觉得一举一动都受日本人的约束，实在难以忍受。在这种形势下，他的情绪非常烦躁。特别是一九二八年五月，

在他返奉前的一个月里，他的脾气更坏，心绪更糟。

“我今年，他妈拉个巴子的，魔鬼总是缠身，这些该死的小日本鬼儿，今天你来，明天他来。如果把我惹翻了，我要给他们点儿厉害看看，让他们明白明白，我张作霖可不是好惹的，急眼了，我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到啥时候，我也不能吃里扒外，和他们小日本儿一条心。”

面对不利的军事局面和日本人的可恶嘴脸，张作霖焦躁不安，牢骚不断，叫骂不止。

说到这儿，张作霖又狠狠地抽了两口烟，接着又说：“南方蒋介石这个东西也来挤兑我。唉，闹不好，回东三省去，在那儿我有独立的江山，在奉天老家我过得不也是挺舒服的吗？”

原来，就在张作霖就任大元帅后的十天里，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七日，日本首相田中在外相官邸召开了有政府代表、驻华外交官和军事首脑参加的所谓“东方会议”。会上，田中义一疯狂叫嚷“中国的东北和日本帝国的生存，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东方会议”是日本侵略中国、特别是侵略我国东北的一次重要会议。会后，田中上奏日本天皇裕仁，报告了会议决策，这就是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

为了贯彻“东方会议”的决议，日本侵略者于同年八月十五日又召开了由森洛、吉田茂、芳泽等人参加的“大连会议”。会议决定，旨在解决悬而未决的问题，今后将在北京由芳泽负责同张作霖、杨宇霆进行谈判。

此时此刻，前有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组成的几个集团军发起的凌厉攻势，后有日本人在东北乘机渔翁取利，内外夹攻，面对危难局势，张作霖如坐针毡，动辙暴跳如雷。

"大元帅，您还是放宽心为好，从远处打算，回东北也对。不过，要想独立，就得找后援。"杨宇霆说的后援，当然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

"找后援？他小日本儿尽找便宜，我就是不上他的当。我们张家父子下决心，绝不找日本人当靠山。"张作霖一听，火气就更大了，他吼道，"我他妈的要是急眼了，就豁出一头来。"

张作霖是从征战杀伐中起家的军阀，他不甘心受制于人，任人摆布；加之，北洋军阀体系的瓦解，北伐大革命的兴起，以及日益发展的工农运动的冲击，都不能不使张作霖的独立观念日渐增强。在这种形势下，他对日本人的态度开始变得强硬起来。

"日本人也太霸道了，他们已经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还不满足，还在到处伸手，连中国人打场仗，他们都要干涉，他管得也太宽了。这两年我张某虽然运气不好，可我手里还有几十万军队，他们休想骑在我的脖子上拉屎，我老张也不是那么好惹的！"

一想到日本人的傲慢无礼和狼子野心，张大帅禁不住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

五月十七日晚，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前来拜会。张作霖料到一场正面冲突已难免，为了故示镇静，晚饭后他邀来梁士诒、李宣成等几位客人，在纯一斋里打牌消遣。

麻将刚过两圈，承启官赵锡福进来报告："芳泽公使来拜访大元帅，现在大客厅等候。"

梁士诒等人把手中麻将推倒，站起身说："大帅有重要公事，我们改日再玩吧。"

张作霖挽留道："我和芳泽没什么可谈的了，应酬几句就完，回头咱们接着打。"

芳泽在客厅里等得很不耐烦。半晌，张作霖才慢慢腾腾地走了进来，不卑不亢地点点头说："对不起。"接着，两人你来我往，唇枪舌战，针锋对麦芒。

"阁下发表的声明，本公使深感遗憾。"芳泽首先发难道。

"贵国政府发表那些言论，也让人很不痛快。"张作霖白了他一眼说。

"帝国政府的警告是完全必要的。"芳泽盛气凌人地说，"阁下如不反省改变态度继续与帝国合作，恐怕后果不堪设想！"。

"我从前和你们合作得够多了。谁吃亏谁占便宜都心里有数，我是打落门牙合血吞。"张作霖冷冷地回应道。

"正因为阁下曾和我们合作得很好，所以我们十分关心此次战乱，对双方发出警告。"芳泽龇牙一笑。

"好个'双方'！连我也被警告了，这算什么朋友，未免管得太宽了吧？"作霖气愤地道。

"请不要误会，"芳泽说，"我们对阁下是友好的劝告，因为大势已难挽回，为使战乱不波及满洲，为保护贵我双方的权益，阁下只有撤回关外才算明智。"

"你们说得容易，仗还没有打完，我能白白认输吗？"张作霖故作不服气地说。

"阁下应该清醒些，你们能打过北伐军吗？"芳泽冷笑道。

"这不劳邻居操心，打打看吧！"张作霖脖筋突然一蹦，"打不过他们，我再撤回去也不晚。"

"到那时候，只怕你过不了山海关！"芳泽威胁道。

"这是什么话！关外是我的老家，我愿意什么时候回去就什么时候回去，谁还敢拦路不放吗？"张作霖脸涨得通红，拍着桌子大声喊道。

"好了，好了，先不谈这些了。"芳泽摇着头把手一摊，沉

着脸，向张作霖提出了签订中日合资修筑吉会铁路合同的无理要求。他从文件包中取出那份郭军反奉时张作霖与关东军代表签订的“合作”密约，放在桌上往大帅眼前一推说：“趁阁下还在北京之际，请把这份由您个人签署的条约改为北京政府签署的正式条约。没法子，时间不多了，务请马上办理！”

“如答应这个要求，日本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过黄河。”接着，芳泽又诱惑地补充道。

“不要急，先放在这里吧！”张作霖把密约拿在手中，眨着眼说。

“你这种态度不行！”芳泽见他又要推脱，顿时脸色发青，提高声调再次威胁说。

“日本人真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事情！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的坟墓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以免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样叫子子孙孙抬不起头的事情！”张作霖已是怒不可遏。

“现在本公使代表帝国政府，正式向你们提出另一严重事件。”芳泽也不示弱，他继续纠缠道。

“又是什么事件？”大帅把眼一翻，问道。

“张宗昌的部队在济南杀死五十多名大日本侨民，张是你的部下，你必须对这一事件负一切责任！”芳泽声嘶力竭地喊道。

明明是日军出兵济南，制造五三惨案，杀人如麻，如今反倒咬一口。张作霖闻听此言，勃然大怒，霍地由座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往地上一摔，顿时磕为两半。

“岂有此理！这件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空口一说，我他妈的负个屁责！”张作霖声色俱厉地指着芳泽的鼻子吼道。接着，他一抬身丢下芳泽，怒气冲冲地走出客厅。

"张君，你可不要后悔啊!"芳泽向门前赶了两步，咬牙切齿地大喊道。

张作霖这么一顶，就把日本人彻底得罪了，早就对张作霖失去信心、早就想甩掉他的日本朝野，闻讯大惊。与张作霖素有矛盾的日本关东军和军中的少壮派，更是难以容忍。双方矛盾进一步激化了。而日本政府则认为张作霖对他们不仅已成为无用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所以，对关东军准备用非常手段来对付张作霖一事，完全采取了听之任之的态度。

对于日本人可能会兴风作浪，制造事端，张作霖事前不是没有想到，但他作为"安国军政府"的首脑，毕竟是权倾一时，是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总统权的。他名为大元帅，其实就是大总统，这个荣耀的得来并不容易，如今要让他拱手让出，确实很难。

但是，年轻的张学良洞察幽微，沉着冷静，认为保存实力比什么都重要，他力主息战议和，退兵关外，而且主张行动愈快愈好。

"对待日方不能意气用事。对日本人的指手划脚可以拒绝接受，但他们提出的关于撤军东北的要求，还是必须认真对待的。"张学良和他的谋士们经反复会商，都认为北京政府的局面确实难以继续支撑，采取退回东北的策略还是比较明智的。

当然，这纯粹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不能由日本人指挥。所以，五月二十五日，中国方面发表了《北京政府正式宣言》，复照日本政府，指出：东三省及京津地方均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对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济南惨案，则予以谴责，提出"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之措置"。

遗憾的是，张大帅过于自信，总认为他手头拥有近四十万军队，什么也不怕；日本人虽然可恶，但还不致于会直接谋害他的性命。

在离京之前，张作霖与儿子曾有一番非同寻常的谈话。

“难道说他们奸，我们傻，我们肚里的肠子比他们的弯弯少？”张作霖捋捋胡子说，“我们在军事上有足够的力量。”

“知己，还要知彼。爸爸，我们的军心不稳，有动摇。”

“什么，咱爷们这棵大树还在，猴孙就要散吗？”

“眼下国民军、北伐军牌子挺亮，对我们冲击太大，如果我们退回关外，东北这块地盘就是一个圈。”

“我懂！小六子，咱们爷们儿有不得不退兵的苦衷，我不离京，一切妥协和其他事件的解决都无从说起，对头吧？”

张学良连连点头。

“这走要有个走法。”张作霖又叹了口气说。

“齐恩铭曾有密电，称：‘老道口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过，请防备！’”张学良说道。

“这里离总站很远，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我看日本人不敢在这里胡闹。”张作霖胸有成竹。

“最近收到密探的情报，日本人可能要对我们采取行动。”张学良表情严肃地说，“日本人狡诈多端，不能不防。”

“日本人惯于诡诈，但真的加害，谅其也不敢。”张作霖撸起袖子来，自信地断言道。

爷俩研究了回奉天的方式和路线。

原来，张作霖打算乘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可公路坎坷不平，一路上要吃很多苦，怕受不了；乘火车又怕发生意外。

张作霖随手拿起一张纸，一扯两半，用红笔分别在上面写了“汽”字和“火”字，然后揉成两个纸球，在手心里摇摇，扔在桌子上，笑着说：“讨个吉利！”

他用手指把两个纸团扒拉得直打转转，然后抓起一个纸团，慢慢地展开一看，字在背面，他没有立刻翻过来看，而是轻轻地把纸条往桌上一拍。张学良伸手把纸翻过来，一看是

“火”。老子伸手拍拍儿子的肩膀说：“就这么定了，火车走！”

张作霖非常迷信，每逢大事必卜卦决疑。此次，他又找来他信任的张半仙摇卦，以择出行的良辰吉日。张半仙说次日凌晨二时动身为吉时。这样，张作霖毫不犹豫地决定，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晨二时离京返奉。

毕竟是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不想给人造成是被人赶走的所谓败军之将的印象，总要走得气派一些。所以，爱讲排场的张作霖还是不忘前呼后拥，他的专车浩浩荡荡，共挂有二十多节车厢，他本人携眷乘坐的是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

“那花车车箱内装潢极为考究。一间大客厅，一间大卧房，车内全用金黄色丝绒装饰，窗帘、座椅皆为黄色。当时马夫人随行，在卧房内为我父亲烧烟泡。”张怀英回忆说。

为安全计，花车特意编排在整个列车的中部，前后方的车厢坐满了随行人员和全副武装的卫队。为防不测，在火车前面还特意设置了压道车，以防有人在路轨上做手脚。另外，行期保密，车次变更，究竟什么时候到达沈阳，并没有个确切的时间。

很遗憾，这种种防备都已经过迟了。日本关东军早已派特务潜入北京，对张作霖进行了严密监视，他的一举一动，日本人都了如指掌。

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一个巨大的阴谋，正在酝酿、策划之中。

第二十五章 大帅蒙难

1928.6

——“日本人后来真是恨透了我父亲，认为是上了他的大当。”

——“这个消息很重要，我看您老改乘汽车或飞机回奉天会安全得多。”

——“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快回奉天！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算不了什么！”

我父亲这人，确实不简单，他很会利用机会操纵局势。日本人后来真是恨透了我父亲，认为是上了他的大当。

就在日本关东军秘密筹划谋杀张作霖之际，五月三十日，张大帅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举行紧急会议。会上决定：即日下总退却令；奉军放弃保定，退守琉璃

河；请王士珍组织维持会，维持北京治安；由王士珍等电请南京政府和平接受京津，避免继续用兵。

六月一日，张作霖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各国公使，随后，又接见北京绅商及各法团代表，宣布本人即将离开北京，政务交国务院代行。

此时此刻，中南海内，安国军大元帅府失去了往日的秩序，各部、厅、办公室的大小官员都在手忙脚乱地收拾档案，焚烧文件原稿，为返奉做准备。

次日，张作霖发表了“出关通电”。声明中说：“若再不休兵，尤大背息争本旨。且去岁添膺艰巨，本出救国之诚，今素志未酬，又何忍穷兵黩武，爰整所部退出京师。”

这天中午，大元帅突然收到一份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五月下旬以来，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交通口铁路一带戒严，行动可疑，务请大帅防备。”

张学良看完电文，严肃地对张作霖说：“这个消息很重要，我看您老改乘汽车或飞机回奉天会安全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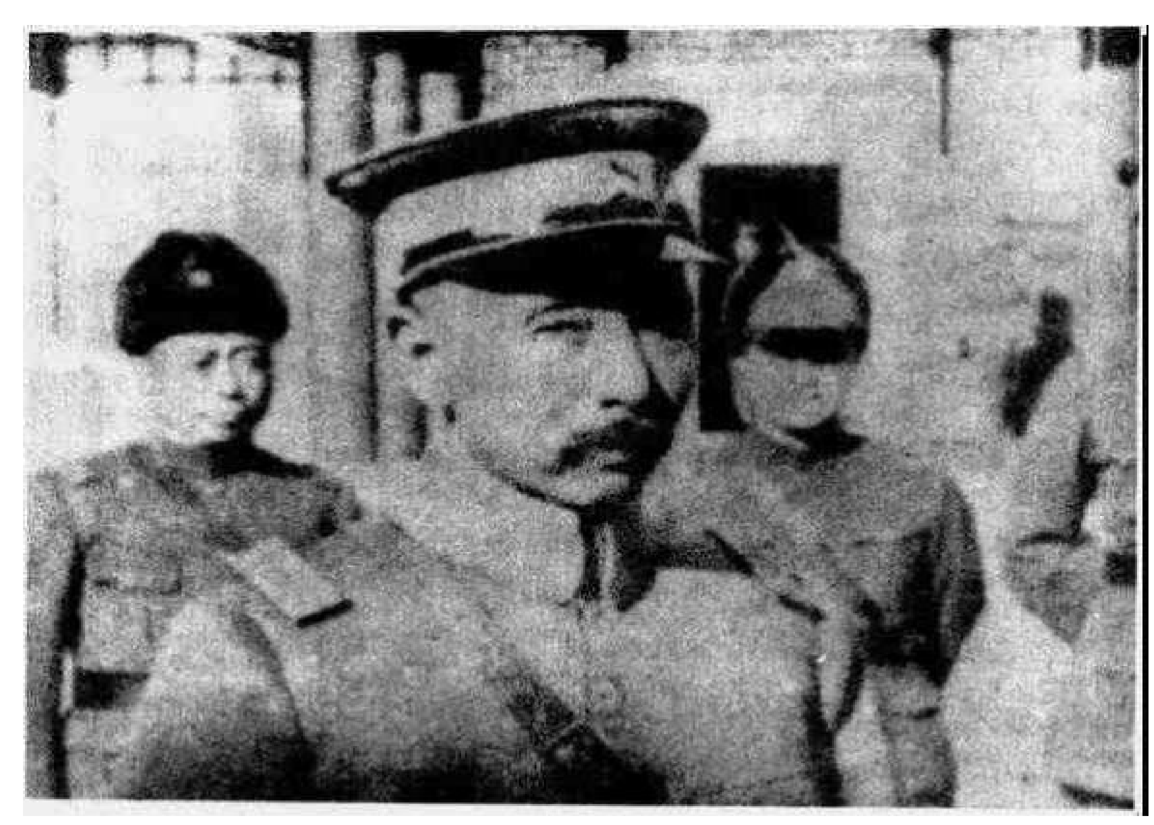
张作霖摇摇头说：“齐小辫办事是精细，可他有个爱疑心的毛病。我决不能让人认为我是个熊蛋包，我要大大方方地坐火车回去！”

然而，事态绝不像张大帅想的那么简单。

原来，就在张作霖准备退回东北之际，以村冈长太郎为首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谋杀张作霖的“皇姑屯行动”绝密计划，正在加紧策划和实施之中。

最初，他们打算派一个叫竹下义晴的参谋去北京刺杀张作霖。可是，关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河本大佐不同意，他对竹下说：“最好不要干没有把握的事情，万一失败了怎么办？让我干吧，别无它途。”

河本大佐谋刺张作霖的绝招是炸车。后来，河本在《我杀



离开北京前的张作霖。

死了张作霖》一书中写道："袭击火车，还是用炸药炸毁火车，只有这两种方法。如果用第一个方法，马上知道是日军干的。如果使用第二个方法，或能不留痕迹地达成目的。因而，我们选择了第二个方法。但为预防爆炸失败，我们还准备了第二道计划，即令火车出轨翻车的计划。这时，将乘其混乱，派遣刺刀队冲上去杀。"

竹下义晴到了北京后，很快便将张作霖要乘火车返奉的计划报告了河本，河本立即行动起来。

炸车的地点，河本最初选中京奉线的巨流河铁桥，但因该处有中国军警监视，怕露出马脚，所以最后改在皇姑屯。该车站近旁的老道口是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的交叉点，有一个三洞桥，由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在上面，京奉铁路在下面。因为

桥上由日军警戒，便于他们做炸车的各种准备。

河本在三洞桥附近设置了岗哨，实行戒严，任何人不得靠近。然后调来工兵，放置炸药，安装了电动引爆装置，并在一僻静处设立了了望台。一切准备就绪后，他还特地将两名中国乞丐先行杀死于桥下，将他们打扮成所谓“南方的便衣队员”，伪装成在作案后被炸死的样子，以转嫁罪责，掩人耳目。

北京中南海，月明星稀，凉风习习。

卧房里，张作霖皱着眉头。人称岳姑娘的六太太马月清忙上前替张作霖脱下长袍，接着又捧来一杯热茶，坐在丈夫身边温存地说：“大元帅，您回过身去躺会儿歇歇吧。”

听到这一句亲切的话语，张作霖的心里稍稍感到一丝慰藉。

“早先我要是听小六子的话就好了，现在看起来和孙中山先生、冯玉祥他们合作就对了。如果那么办的话，现在，我就不会在北京站不住脚。”张作霖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又转身对岳姑娘说，“小六子那年才二十四岁，从年龄上说还是个孩子，可现在一想，我儿子他是有远见的。”

他呷了一口茶漱了漱，吐在地上，又自言自语道：“说起来，孙中山先生是对的，他是真正为国，尤其是他在全国有威望，他若活着，南方不会发动内战。今天我才看明白，其实，民国十三年天津会谈并没分裂到底，原想第二年进京的，没想到，孙中山先生去世了。晚了，一切都晚了。”

“您不要生气，身子骨最要紧。”岳姑娘又在安慰着大帅。

张作霖躺在床上想心事，沉默了好久，又叹道：“咱们还是回奉天吧，我也想家了。”

张作霖是在随行人员的再三催促下，才怀着怅惘和依恋之情与中南海告别的。

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凌晨，张作霖在国务总理潘复以下各

阁员及侍从武官等要人的陪同下，从中南海西门乘四辆汽车驶往前门火车站，大帅乘坐的是第二辆黄色防弹汽车。

当时，日本《朝日新闻》的北京专电，对此情节曾有如下的生动报道：

“浴着新绿街道微透森芒的月光，从过去住了两年的大元帅府正门出来，经过窗子，依依不舍地回望中南海树丛的张作霖眼睛里，竟闪着光亮。

“凌晨一时十三分，在水泄不通的警戒中，张作霖一行出现在月台上。夜深，警卫队的刀枪发出熠熠闪光；凄凉的军乐，挽歌般地响起。张作霖的左手紧抓着佩剑，行举手礼与送行者告别。

“张作霖的表情，显得非常悲痛。一直希望统一中国的他，今日竟不得不以败军之将离开北京，目睹此情此景，又怎能毫无感慨？

“张学良、杨宇霆和孙传芳等人，尤其痛感别离的苦楚，他们在月台上，一直站到列车开走。”

同张作霖一起返奉的除大帅府人员和卫队外，还有六太太马月清、三少爷张学曾以及莫德惠、于国翰、阎泽溥、何丰林、刘哲等要人。前来送行的人群中还有日本人。

当时，温守善作为张作霖的校尉处长，始终未离开张作霖的左右。他随张作霖一起登车，一直在专车内负责照料大帅。

专车抵天津后，总理潘复和鲍贵卿等人都下了车，向张大帅作最后的告别。

列车过山海关时，开了晚饭。六个菜分别是：肉丝烧茄子、猪肉炖豆角、榨菜炒肉、干煎黄花鱼、菠菜熟虾段、辣子鸡丁，外加小白菜汤；主食是大米饭、高粱米饭。

据帅府厨师回忆说：“饭后我进去收拾餐具，只听六太太岳姑娘说：‘看样子，明天早饭就该到家吃了，再睡一宿觉就

到家了。'大帅张作霖对岳姑娘说：'在火车上吃啥也不香，觉也睡不实，咱们到家就好了。'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的一顿晚饭。"

他又回忆说："我们正在洗刷餐具，奉天留守司令吴俊升已先期抵达山海关来接大元帅了。他笑呵呵地说：'大元帅，辛苦了。'又过来向我们打招呼。'唔，唔，各位辛苦了。'张作霖一见吴俊升，非常高兴，他们俩人马上亲热地唠了起来。"

列车开出山海关，大家悬着的心放了下来，庆幸平安无事。有的人在卧铺上脱衣睡觉，张作霖和吴俊升在车上抽烟，然后又召集莫德惠、刘哲打起了麻将牌，一路上挺顺利。

六月四日晨，专车抵达皇姑屯车站，张景惠、刘尚清、齐恩铭、臧式毅等都在车站迎候，其余家人和文武官员，都在奉天新车站等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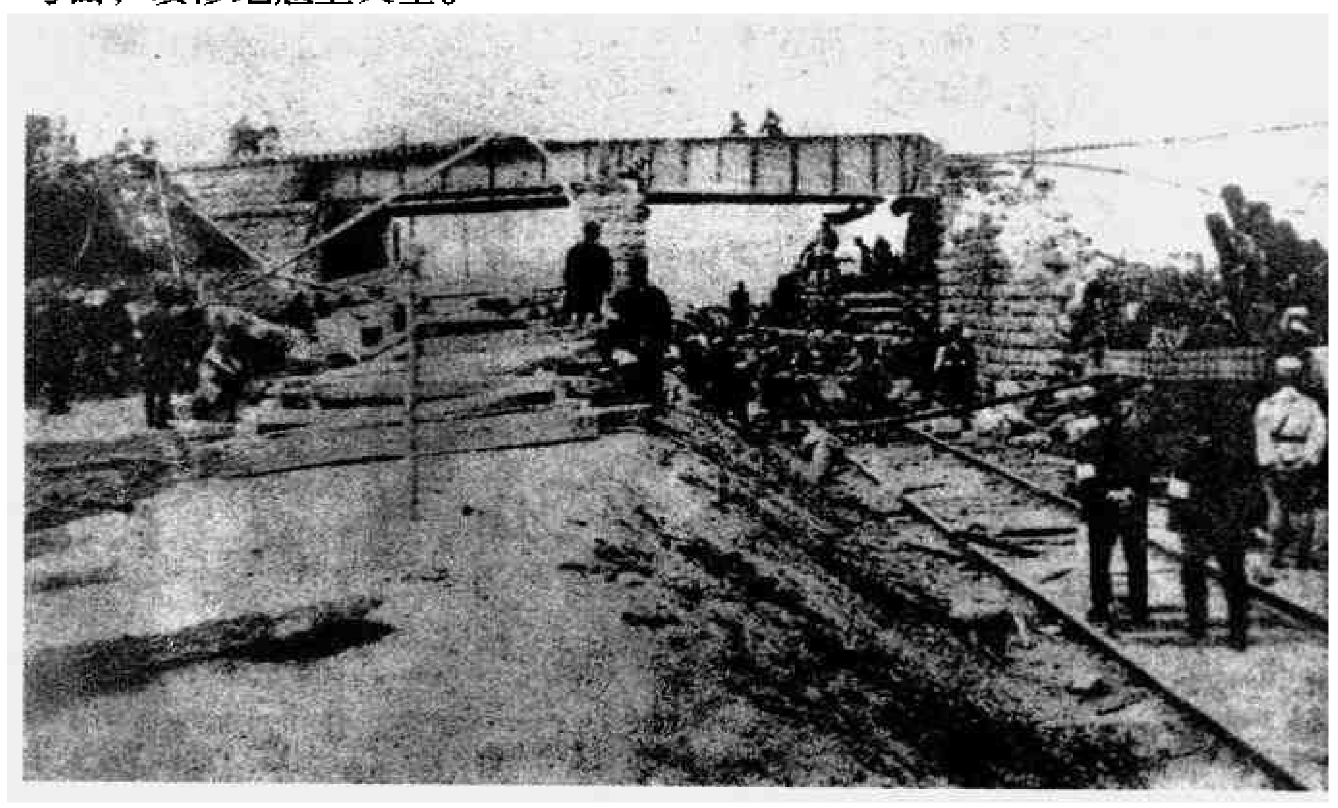
在皇姑屯车站时，张作霖笑着问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你发到北京的密电是不是又犯疑心病了？"

离开皇姑屯车站，张作霖乘坐的那节花车里只有张作霖、吴俊升和温守善三人。

据幸存的温守善后来著文回忆说："早晨五六点钟，张和吴望着车窗外熹微的晨光和青绿的庄稼，边看边谈。正当这节花车穿行老道口交叉点时，轰隆一声巨响，烟尘滚滚，砂石纷飞，正好把这节车厢炸碎。吴俊升脑袋上被扎进一颗铁钉子，当时就被炸身死，躺在车厢一角。张作霖被炸出约三丈远。我也受了伤，被尘土和碎板碎铁皮压在下面，我急忙爬起，来到张的跟前。张作霖当时没有死，内里伤看不清，只见咽喉处有很深的一个窟窿，流了很多血，污染领襟，我用一个大绸子手绢给堵上，由我和张学曾把张作霖抱到赶来的齐恩铭的汽车上。看样子，张非常难受，已神志模糊，当时他还能说话，头一句就问我：'逮住了吗？'我诳他说：'逮住了！'张问：'哪

的?’我说：‘正在审问呢!’张说：‘我到家看看小五。’接着又说：‘我尿一泡尿，尿完了尿我就要走啦!’（‘走啦’的意思是离开人间）很显然，他由于严重脑震荡，神志不清，说的都是呓语。”

布下这个“必死之阵”的关东军高参河本大佐，总共用了三十袋计一百五十公斤黄色炸药。巨大的爆炸将张作霖乘坐的慈禧太后豪华花车炸得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花车只剩下车轮和车床，车顶、窗子等都被炸飞了，看来好像一条失事的破船。被炸毁的中间几节车厢大火熊熊，满铁本线桥梁台的石墙崩裂，铁桥倾覆，一千六百三十八公斤重的铁轨像麦芽糖般的弯曲，凄惨地翘上天空。



图为皇姑屯三洞桥炸车现场。随着一声巨响，桥塌车毁人亡。共炸死五十三人，内有张作霖及黑龙江督军吴俊升。

吴俊升被炸后当场死亡；给张大帅理发的陈蛮子在爆炸后被烈焰活活烧死；六太太在快被火烧着时高喊救命，幸被人们抢救出来；校尉高其祥、会计高维周的骨头被炸断炸碎，伤势极重；张景惠遭受轻伤；日本顾问仪峨也在前节车厢里，当时正往张作霖的这节车厢走来，脚刚搭车厢边，只听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他被爆炸碎片埋压在下面，但却只受轻伤；卫队团长于恩贵幸免于难，但却被吓得屎尿都拉在裤子里。

脖子上炸了个大窟窿、血直往外流的张作霖，昏迷中时而清醒。当时，他喃喃地对身边的温守善说："赶紧给小六子打电报，别叫他坐火车回来，叫他把东北军一齐都带回来，打日本鬼子，报仇。"

一会儿，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派来的汽车赶到，大伙把张作霖抬上汽车送回大帅府。到了大帅府后，又用床板把张作霖抬到五太太的楼上。这时，张大帅已神志不清，众人七手八脚地忙活，打强心针，灌白兰地酒，但仍无济于事。

五太太寿氏见状大哭，秘书长连忙拦挡。不一会儿，张作霖终于强打起精神，问道："抓住了没有？"回答说："抓住了。"

张作霖又喘了口气，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啦！叫小六子快回奉天！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勿忘父仇，好好地干吧，我这个臭皮囊算不了什么！"

喘息一阵子后，张作霖又问："你吴大爷怎样？"回答说："吴大爷死了。"

张作霖一听，气得浑身乱颤，一声没吱，当即气绝身亡了，此时恰好是四日上午九点三十分。大帅瞑目长逝，撒手人寰，享年仅五十五岁。

大帅临终时，并未向身边旧臣宿将行托孤之事，他相信他死后，左右不会有贰心。

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深感责任重大，他跪在帅府仪门前的地上大哭，说他有罪，没保住大元帅，请求杀了他。五太太寿夫人说："已经这样啦，难怪一人，起来吧！"

大帅被炸，身遭不测，这完全是日本人的阴谋，他们的险恶用心不只是为了杀害张作霖一个人，而是想乘炸车事件引起东北社会动乱，并趁乱出兵，进而挑起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使用武力将东北攫为己有。

因此，继皇姑屯事件之后，奉天城内日本侨商会等几处地方也连续发生投弹事件；五日深夜，奉军兵车五节在锦州、榆关之间脱轨倾覆，京奉路因此一度不能通车；九日晚，从商埠的一角又传来轰然的爆炸声音，相隔几分钟之后，又传来第二次和第三次爆炸声；十日，日军又接连在奉天制造炸弹案；十六日，日军一万八千人在奉天城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的野外演习，归途中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

总之，继皇姑屯炸车之后，奉天城内发生的一系列投弹爆炸事件，都是日本人为制造出兵的口实而蓄意策划的。

当时，奉天当局已识破日本人的阴谋诡计。为了稳定局势，防止日军乘机举兵作乱，对张作霖已去世之事严密封锁消息，决定秘不发丧。

说起张大帅之死的保密工作，那真是守口如瓶，滴水不漏，做得非常成功。

皇姑屯出事后，各方都渴望能获知张作霖生死的准确消息，上下都在千方百计地设法探听消息，不断有人要求前来探视慰问。尤其是奉天日本总领事馆，多次要求派日本医师来给大元帅"治疗"，但都被委婉地拒绝了。张学良的秘书陶尚铭以亲日出名，即被禁止进入内宅。

对此，同车受伤的大帅府厨师回忆说："我们住院时，听说大帅病情好转，厨房每天照常给他开饭，每顿能吃些燕窝

粥、面条、鸡蛋等等。医生天天来帅府探望，并报告医疗情况，对这些，报上介绍得挺详细。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蒙蔽日本人。当时，奉天督军参议臧式毅、省长刘尚清担心大帅去世的消息泄露出去，会引起地方上的不安，更主要的是怕日本人会趁机有所行动，因为少帅张学良还没有回来。"

至于大帅府方面，五夫人做得更加出色。她每天照样浓妆艳抹，高高兴兴地接待借口慰问而别有用心的日本官太太们，其中包括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的夫人等人。这些日本太太经常心怀叵测地遥望张作霖灯火通明、烟霞阵阵的卧室。五夫人则面无戚容，从容应对，致使她们确信张作霖只是受了点儿伤。杜医官则天天来府，假装换药并填写医疗经过、处方等，以此来瞒过日本方面的窥探。

结果，虚虚实实，扑朔迷离，日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未敢轻举妄动。田中内阁、关东军的各种如意算盘胎死腹中，未能实现。天皇批准出兵的"大诏奉敕令"，也一直未敢贸然颁布。

第二十六章　学 良 奔 丧

1928.6

——“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

——“经过老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

——“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以后没有经过王秘书批准，不准日本人来见我！”

事发后差不多一个礼拜我还不知道真实情况，部下都瞒着我，我仅知道父亲受了点儿伤。我从北京到滦州，把事情安置好了，这时，他们才告诉我，说我父亲死掉了。如果当时他们告诉我真相，我会立刻赶回去的，我一点儿都不怕日军。如果他们在杀死我父亲后再杀死我，我相信一定会有比我更厉害的“张学良”出现。在政治上搞暗杀是绝对不会成功的。

大帅被炸时，张学良正和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和平谈判。这时，忽接奉天督署电报，谓大帅在皇姑屯被炸，请立即返奉。

情况突变，张学良当即下令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良乡等地的第三、四方面军火速向滦河撤退，并于当晚同杨宇霆离京东去。五日，张、杨专车抵军粮城。六日被阻于芦台。当日晚，孙传芳赶到芦台晤张、杨，商洽直鲁联军到滦西后之布防问题。此后，张、杨转到滦州，布署奉军撤退事宜。

据张学良的警卫营崔成义营长回忆说："一天，张学良将我叫到他的列车上，对我说：'你知道老将遇难了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此事早在临名关车站时已有耳闻，但因从未公布，我故装作不知。张又说：'我打算派你护送我回奉天。'我说：'是！'停了一会儿张又说：'老将遇难，伤势情况如何还不得而知，恐敌人于途中对我有所留难，沿途要多加注意，如有询问我的行踪的，应予保守秘密，以防万一。'我即遵嘱率领全营官兵做好准备。

"我们这一营人全跟着张学良上了火车。第二天早上，到了滦县车站，火车停在叉道上，黄显声率驻在滦县的第十九师第一旅军官到车站迎接。张学良下了专车，随黄显声上了山。山上有一个庙，大概有二十来间房子，张学良就住下了。过了几天，张学良派杨宇霆去滦东五县视察，给部队讲话，这是张学良有意把杨宇霆从自己身边调开。

"杨宇霆去视察部队时，我带着五六十个骑兵也去了。几天后，张学良又把我叫回来，叫我去城里把黄显声找了来，两个人就在专车里谈起来。张学良告诉黄显声说自己准备回奉天，他问黄显声回去的路上有没有危险。

"'怎么没有危险？他们能炸老帅，就不能炸少帅吗？'张学良没说话，黄显声继续说，'有一个办法可以没危险：化

装。'张学良采纳了黄的意见，走的时候穿了一身士兵服装，脸上还贴了一块药膏。"

十七日夜，只见中间的一节车厢上来了一队军人，他们抬着行军锅，背着灶具，拉着捅火棍，穿着油腻腻的旧军装，一看就知道是火头军。

火头军中，但见有一人约二十多岁，剃着光头，一脸愁容罩着略带稚气的脸。与他的年岁相比，此人明显地老了许多。车厢里，其他弟兄们对他细心照料，要他靠窗坐着，并给他倒了杯开水。他好像是有病，又好像遇到了什么极度伤心的事。这人是谁呢？他，就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火车缓缓开动，山海关车站到了。日本宪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每节车厢，他们名义上是检查禁运品，实则企图搜捕他们意欲加害的要人。

"你们都是伙夫吗？"日本宪兵劈头问道。

"你们用眼睛看什么？"张学良同他的随从们一起，瞪着日本宪兵，语气强硬地向日本宪兵问道。

"你们的司令是谁？"日本宪兵单刀直入地问。

"我们这儿没司令，"一个随从逼向日本宪兵说，"最高军阶是上司班长，我就是这儿的司令。你要怎么着？"

对此，崔成义回忆说："专车行经山海关时，机车上水停车，有三个日本宪兵向我的士兵打听本列军车的最高指挥官是谁，士兵答称是崔营长。日宪兵遂来见我，询问列车去奉天干什么，我答以回奉后另有任务，又问张学良是否在车上，我回答说不在。日本宪兵始离去。

"专车在山海关车站约停留半小时后继续向前行驶。经绥中、锦州、沟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皆上车打听张学良是否在车上，看情况像是已经风闻了这个消息，可我皆一一加以否认。

"专车从新县车站继续开行后，张学良嘱咐我说：'经过老

将遇难处时，告诉我一声！' 专车驶过兴隆店车站后，我即报告马上就要经过该地。列车通过京奉、南满铁路交叉点张作霖遇炸处时，张探身车窗外观望，神色惨淡，一语不发，默然良久。专车一直开抵奉天西边门车站，时为六月十九日上午十时左右。”

专车抵站后，张学良的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探视，黄显声已在车站等候迎接。张学良随即由黄、谭陪同，横穿铁道东行，未经车站站台的出口处。来接张学良的也不是大帅府的汽车，而是于凤至开的“魁奤祥”军需庄李殿魁的汽车，以免惹人注意。

当汽车驶抵大帅府时，门岗没认出张学良，拦住不让进。后来一听说“少帅回来了”，这才喜出望外地放他们一行进去。

一进大帅府，于凤至、五太太等全从里面迎了出来，大家见面时都哭了。至此，张学良才知详情。他来到东屋，那儿搭着棚，放着他父亲的棺材，棺材上开着个玻璃口。张学良看了看父亲的遗容，悲恸万分，但并没有“痛哭失声”。

张学良抵奉后，很快将一切布置妥当。奉天当局认为，“军民有主乃发丧”，遂即向各机关、团体正式公布张作霖死亡的讣告，称张太帅于六月二十一日逝世。同时，向各国驻奉领事馆发出通告。

治丧处由张作相任督办，王树翰任总办。

祭礼规模宏大，气氛庄严肃穆。大帅府院内，造起了一座高达数十丈的灵棚，正中央设有祭坛，祭坛上安放着张大帅的灵柩。入殓发丧时，大帅穿的寿衣是北京永增军衣庄做的，黑色，金线绣龙，帽子前齐后圆，带穗。

在时间安排上，六月二十七日为首七家奠，七月四日为二七家奠，七月十一日为三七家奠，十八日为四七家奠，二十五日为五七家奠，八月一日为祭礼，八月二日开始公祭，八月三日为吊唁奠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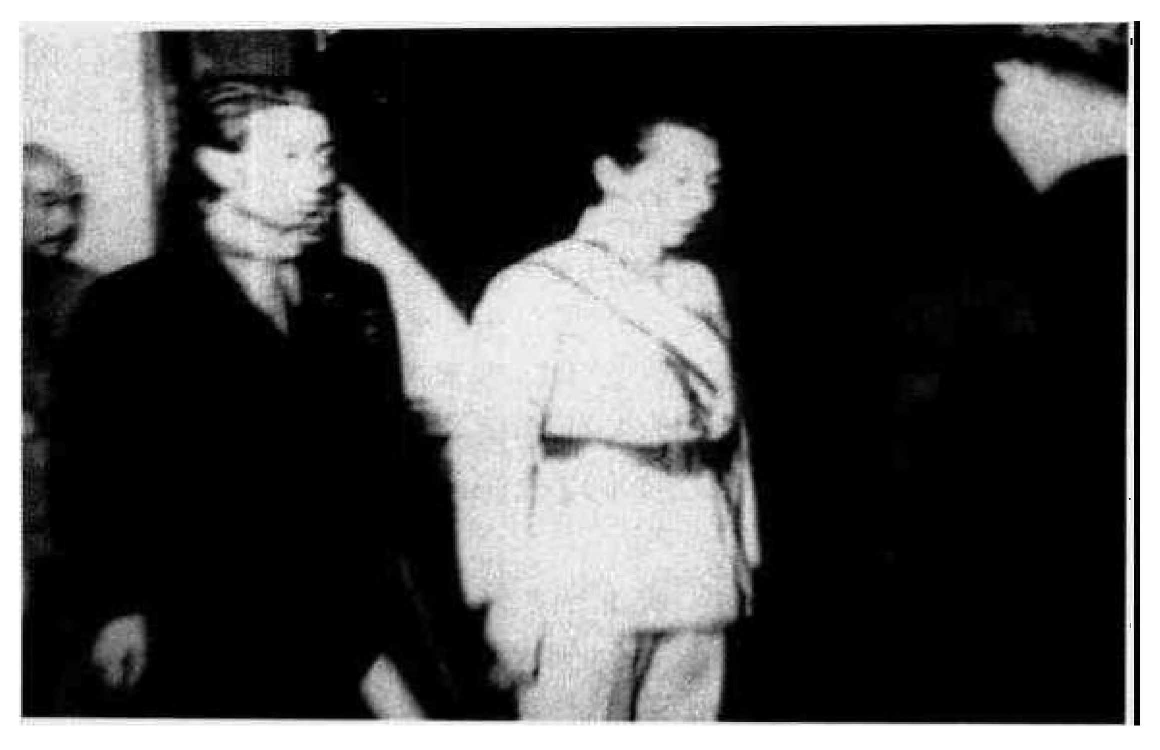


张作霖之灵位。

穿着白色孝服的张学铭、张学曾在灵柩前守灵。张学良身着孝服，面容憔悴，陪着吊丧的来宾向张作霖的灵柩跪拜行礼。在祭坛的右侧，站立着身穿孝服的文武官员，左边是外国领事馆的官员。

日本政府故作镇静，特派林权助为吊唁特使。此外，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及领馆人员、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代理陆军大臣斋藤恒、代理参谋长秦真次、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以及日本顾问松井、土肥原、仪峨等，纷纷露面，阵容庞大，可谓空前。但他们所谓的吊唁是假，乘机窥探东北政局的虚实是真。

致祭中，有一次，林久治郎在日本总领事馆设宴招待林权



张学良在为父守灵。

助，请张学良及其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祯出席宴会。

这次会谈连同吃饭时间在内，前后共四个多小时。会上，对日本特使颐指气使、对东北内政横加干预的粗暴行径，张学良心中异常气愤，他针锋相对，寸步不让。

“日本人太欺负我们了！”回府后，他告诉承启官说，“以后没有经过王秘书批准，不准日本人来见我！”

对于张作霖的横死，张学良从侥幸脱逃的人那里，业已了解到详细的情况，他也早已知道这是日本人一手制造的暗杀阴谋。但是，此事如果由张学良亲口说出，会影响到张学良本人与日本直接打交道，所以，他不动声色，把这一切都埋在了内心深处。

我父亲被炸后回到家中，临死时他要紧的头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不要告诉他知道啊。他是不愿让我心中难过。我父亲对

我，那真是没得说了，他起初不想让我知道他的死讯。

我真正的生日是阴历四月十七，我父亲的死，也是这一天，所以，从此以后，我便把生日改了。

张学良化装返回奉天为父奔丧，首次在帅府拜谒父亲遗容时，并没有“痛哭失声”，他强忍着悲痛，操办着丧事。可是，在举行葬礼时，国恨家仇，齐涌心头，他终于“恸至昏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张学良本来准备在葬礼中捕杀关东军代表等人，后来为左右力劝而作罢。晚年，他对友人说，二次大战后，土肥原等杀父凶手以战犯问罪，是他心中最快慰的事。

那个林权助来给我父亲吊孝，他跟我说了好多事。那林权助可真是头等的外交官，那个人，我真是佩服他万分，他还是日本皇太子的老师呢。他是个外交天才，他念了很多中国书，对中国古典书籍，那真是如数家珍。哎呀，这个人可会讲话了，他劝了我好多话，都是让我搞东北独立的话，我总是模棱两可，没有一句肯定的话。在他要走的时候，我为他饯行。在酒宴上，他再三地逼我。他说，我呀，这么大岁数了，我是田中首相的特使，我这个老头子到你这儿来，没有得到你一句落实的话，你尽说些隔靴搔痒的打哈哈的话，回去以后，让我怎么交代呢？那时，我也喝了点儿酒，我本来是不喝酒的。我让他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就说，你老人家替我想的，比我自个儿想得还要周到，我自己都没有想到这么多。他听了之后很高兴，他说，那很好啊，你到底要想怎么办？我说，但是，你有一件事没有替我想到。他很纳闷，连问什么事，说很愿意知道。我说，你老先生忘了我是一个中国人！他听了以后，便不讲话了，不仅不讲话了，我去为他送行时，他都表示拒绝。所以，我自个儿感觉到我失言了，为这事我后悔得不得了，我没有我父亲那样圆滑老练。他回到日本后就公开地讲，说日本不

要再做什么幻想了，不要再做天真的打算了。这样一来，我就预感到了，日本以后要处心积虑地对付我了。

关于皇姑屯事件，我认为日本军人这事干得很不理智，这是少壮派干的！站在日本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件事，他们得不到什么好处，而只能得到坏处。

"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张老帅？"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评论说，"因为张老帅是爱国的，日本人让他在密约上签字，他仅是在口头上答应，但实际上迟迟不签字，日本人说他没信义，就把他干掉了。作为封疆大吏，张老帅是民国以来为国而死的第一条好汉。"

第二十七章 接 掌 帅 印

1928.7

——“说到这里，我很难过，张作相他不但没有争，整个的是他将我推上去的。”

——“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

——“我老子订的条约，怎么能叫我去坐蜡！”

我给你讲一讲这段事。到奉天我父亲死的时候，张作相他代替我父亲做事，当然，我也担任部分职务。那么，我父亲死后，我回奉天，那时不光军队上，省议会、地方上、行政上，大家都开很大的会。奉天这时候，还没有归顺中央，决定奉天的事的人，叫东三省保安司令。这司令当然应该是张作相来

当。可那张作相在会议上再三说，我一说到这事就想掉眼泪，他讲，大元帅（我父亲被称作大元帅），他去了，他说要是大元帅好好地死去，那我一定接他的事。那么，他现在是这样的遭遇，他在会议上对着我说，那一定得由你来继承他的事业。

所以，说到这里，我心里很难过，他当着众人的面说，我怎么样辅助大元帅，就怎样辅助你。大帅一直是我的长官嘛，我当然要服从你。但是，他说，话要说明白，你要不好好地做，我可要到屋子里当着你的面打你耳光子。

我们奉天人都讲感情，说到这里，我很难过，张作相他不但没有争，整个的是他将我推上去的。后来大家都通过了。我当年在这方面是有点为难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老人，是我父亲的老人，我的前辈，我有事情，我不能如意地去做，当然，有重要的事情，我可以征求他们的意见。那么，有时候他们的意思跟我不一样，问题就来了。他们是那种很保守的老人。遇事意见不同，这个情况肯定是会有的，仅仅是在这一方面，我有相当的顾虑，但是，争位的事情是没有的。

张将军坦率地告诉唐德刚教授他当年的想法。

皇姑屯炸车事件发生后，奉系将领一时群龙无首，人心惶惶，急需确定新的首领。

当时，新派老派虽各有主张，但在许多人心目中，张作相是合适的人选。所以，在张学良尚未返奉时，东三省议会联合会曾公推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并将公推书和印信送到张公馆。张作相坚决不接受，说等张学良回来后从长计议。

张作相一直把张学良视为少主，当时，他惟一的愿望就是辅佐张学良继承父业。而张学良方面，则以自己太年轻，极力推举张作相统掌东北军政大权。

六月二十三日，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召开，讨论保安总司令的人选问题。次日，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张学

良和万福麟两人分任奉天、黑龙江两省保安司令。但张作相却谦逊未遑，一定要“老把侄”继承父业，坚决要求辞职。

七月四日，张学良以子继父业的名义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各界举旗祝贺。是年，张学良二十八岁。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面临着北伐军北上、日本蠢蠢欲动、内部动荡不稳的局面。不仅外部局势错综复杂，内部争斗亦相当激烈。

斯时，在他周围，都是父亲生前的挚友、心腹和亲信。这些人对于张学良来说，好像是他的长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他权位的挑衅者。其中，尤以杨宇霆为首的士官派势力对张学良的威胁最大。杨宇霆对张学良总以父执自居，大面上称张学良为“少帅”或汉卿，背地里却不止一次地叫他“小六子”，不以长官看待。对于张学良制定的重大决策，杨宇霆或持有异议，或事事掣肘，肆意阻挠。许多中外人士由此而认为，“少帅”只能依附这些要人，靠势力均衡和先父的威望来保护他的地位。

日本川岛守人著书评价张学良说：“殊料，高个子，瘦瘦的，脸色苍白，留大背头，穿着整洁，宛如花花公子的张学良，却不是一个平庸的贵公子。从十九岁以后，他屡次驰驱于枪林弹雨之中，有智慧，有胆量，头脑清楚，见识甚高，是个就是没有先父的遗德，自己也会成龙的才俊。”

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张学良发表通电，其要点如下：

学良才质驽下，奉令服务乡邦，时局方艰，责任綦巨。

自今以后，谨遵大元帅佳日（五月九日）息争通电，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自今以往，当以最诚恳之态度与各国相周旋，摒除挑拨离间阴谋，务达共存共荣之目的。

自今以后，当取精兵主义，力谋收缩，一面励行兵农政策，即以收束军队，从事农垦，期于开发地利，为国实边。

自今以后，当励行开源节流主义，实事求是，除去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

自今以往，以全体民意为准则，循序渐进，其一切制度规章，悉采取众意，归于公决。

尽管形势严峻，举步维艰，但年仅二十八岁的“少帅”却能临危不惧，在各种矛盾中遇事沉着，头脑清晰，妥善应对，游刃有余，从而稳定了乱局，开创出新局面。

主政东北后，张学良采取了许多重要措施。一则稳定东北局势，二则防范日本人图谋不轨；同时，派出邢士廉、米春霖等人，持他亲笔信件到北京同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等人联系三省易帜撤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企盼国家早日统一。

在与居心叵测的日本人交涉中，张学良能以含蓄的语言、柔软的举措、恭敬的态度、慎重的表达方法与之周旋。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向外交秘书主任王家祯指示说：“在同日方进行铁路交涉时，要采取抵制、拖延的方针。”

当时，日本方面急切要求解决南满铁路诸问题，为此，张学良受到内部和外部的两面夹攻。他曾气愤地说：“我老子订的条约，怎么能叫我去坐蜡！”

于是，王家祯给张学良出谋划策，让他把问题推到吉林督军张作相那里。当时，张作相一时不明这里面的奥妙，还抱怨说：“都是一家人，推来推去干什么？”

由于执行了张学良的拖延政策，日本无理苛刻的要求直到九一八事变，一直也未能实现。

张学良接替父业之后，公务十分繁忙，常常要出席各种会议，参加一些社交活动。尽管这样，他对大帅府里的日常生活还是很关心的，遇到问题就想办法解决。

当时，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住在东花园门外的一座小楼里。因整日忙碌，每天夜间，厨房还需给他和赵四小姐开一次夜餐。

张学良和赵四小姐对下人都很温和，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就是他当上总司令，主持东北军政大事之后，还是和从前一样。

我对家里人说，不论是我开饭，还是外出，都不要惊动太大。过去老帅在时，一开饭，上差就站在二门里头大声喊“大帅开饭了”，或者是“大帅下来了”，闹得东西两院全都知道，我可不喜欢那个样儿。

大帅府平常过年特别热闹，可是一九二九年的春节却过得死气沉沉。这是大帅府度过的最难过、最伤心的一个年。这年春节几乎到了年根底下，帅府里仍然没有一点儿过年的气氛。上上下下都在怀念逝去的大元帅，里里外外都沉浸在肃穆悲痛的气氛之中。

除夕之夜，张学良心情异常沉重。父亲张作霖生前最重视的就是过年，一系列的民俗活动都得由他亲自主持。无论是给祖先烧香上供、拜灶王爷，还是去关帝庙接财神，甚至于贴对联，都由他老人家亲自决定。

可是如今，父亲，这位基业的创建者不在了，大帅府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往日的风采和往日的希望。尽管少帅一再劝说自己，我已是总司令了，要挺得住，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可是无论如何，他自己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阵阵痛楚袭向心头。

少奶奶于凤至来到卧室。一进门就看见张学良闭目躺在床上，脸上似有泪痕，便知道他在思念父亲，心里难过。她轻轻地坐在床边，亲切地说："汉卿，在这除夕之夜，我知道你心情沉重，你是在想爸爸，大帅府里又有谁不怀念他老人家呢？全帅府的人谁不难过呢？失去爸爸，我们也失去了靠山哪。不

过，人死又怎能复生呢？难过又有什么用？你这样消沉，夫人们会更加难过的。汉卿，你千万要克制一些，况且，国事、家事双重任务在肩，你可千万别倒下啊！”

张学良听了于凤至的一番劝慰，泪水顺着脸颊流了下来，滴落在枕头上。他感激地点点头，并动情地抓住妻子的手，勉强地笑了一下。

第二天是大年初一，张学良和于凤至吃完厨房送来的饺子，张学良又喝了口茶，便换上一套黑色西服。这套西服还是在为大帅治丧时特意订做的，笔挺合身，穿上这套西装，更突显出他那魁梧的身材。于凤至则换上一件蓝色的灰鼠皮袄，两人双双来到楼下大厅里，在张作霖遗像前肃立，默哀良久，给父亲拜年。

五太太寿夫人一大早就吩咐差官到厨房去选大帅生前爱吃的菜和各类瓜果，去西餐厅给大帅上供。

我当时在心里默默地说，爸爸，您老人家安息吧，儿子给您拜年了。总司令职务由我继任了，您老人家就放心好了，儿子一定不会辜负您的希望。

默哀毕，夫妻二人向大帅遗像三鞠躬。然后，张学良向于凤至请求说：“大姐，你自己去给夫人们拜年吧，告诉她们今天晚上照例办迎春晚会，请她们和弟弟妹妹都来参加。”

于凤至一一拜过年。她挂着笑脸，亲切温和地安慰各位夫人说：“请姨妈高兴些才好，我们一定要过好这个年。汉卿的担子重啊，他是国事、家事一大堆，希望姨妈能够体谅他才好。”

于凤至从小青楼出来，又把各房妯娌、姐妹召集在一起，劝说她们道：“你大哥说了，今晚上要开迎春晚会。你们每个人都要想法出个节目，我们要在一起热闹一下，让夫人们高兴高兴。你们一定要动员她们来，好妹妹，嫂子求你们了。”

众人都答应一定动员妈妈前来参加。

晚上，由于少爷、小姐们的动员，各位夫人都来了，全家人终于聚在一起了。晚会开得挺好，不少人都出了节目，有唱歌的，有跳舞的，还有表演二人转的。

晚会后，夫人们刚坐下准备打牌，不料六少爷张学浚突然嚷着说："爸爸年年都给压岁钱，今天大哥也是总司令了，怎么不给压岁钱了呢?"说完，小嘴撅起老高。他这一句话不要紧，把夫人们说得个个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于凤至眼睛也湿润了。五太太寿夫人要掏钱给他们，于凤至忙说："大嫂子给，每人十元。"说完掏出钱来，每人给了十元，毕竟是小孩子，接过钱就跑，到一边玩儿去了。

不久，帅府里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但同往年那张灯结彩、鞭炮震天、喜气洋洋、笑逐颜开的喜庆景象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了。

第二十八章　整军建军

1928.7

——“凡我军人务宜遵守纪律为职责，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

——“学无止境，不要一毕业就把书本一丢，那样是要落伍的。”

——“算了，算了，何必花三十万买一顿骂，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打跟脚，你知道吗？我们东北，由于气温相当低，士兵们站在那儿，你不能让他们立正，那样的话，人很快就会歪倒在地，就跟女人穿高跟鞋似的，根本站不稳，‘叭咭’一下，就摔倒了。当官的必须喊口令：‘打脚！’所以，南方的军官来东北，他们不知道这种情况，会闹出许多笑话。那何应钦老先生到东北来，就冻得他够呛。

谈起军事来，张学良将军眉飞色舞，头头是道，而整军建军，又正是他的拿手好戏。

一九二八年七月，张学良主政东北后不久，为提高军队素质，开始整顿军队。

裁军屯垦是他整军建军的主要内容。其方法是：在正规军中，取消军团、军、师番号，以旅为战略单位，分别编成步兵旅、炮兵旅、骑兵旅，每旅为三个团，每团为三个营，此为张将军首创的“群旅制”。

各旅旅长由战历深、有经验、有威信的将领担任，淘汰了思想守旧、违法乱纪的军官。团长以下干部也选拔有能力、具备新思想的人充任。东北军著名将领王以哲、何柱国等人就是此时委以重任的。

经过裁军整顿，东北陆军由四十万减至三十万，总计编步兵三十个旅、骑兵七个旅、炮兵三个旅。步兵每旅八千人。各旅皆委派新人任职。原来的军长多数被委任为军事参议官，晋升为上将军衔，待遇优厚，但有职无权。至此，旧派人物仅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等几个人因任省长或参议长，尚拥有兵权。

整军后，部队统一番号，正式改称东北军。

与此同时，东三省保安总司令部下设军事、军令两厅，由王树常、荣臻分任两厅厅长。军事厅下设有军务、副官、军官、军卫、军医、军法、航空、航警等八处；军令厅则以番号排列，设有六处，各处处长和各级职员绝大多数以原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员担任。总部设统带部，下有步兵两个团，骑兵一个团，汽车一个大队，负责总部及所属单位的保卫工作，以刘多荃为少将统带。

实行以上整顿和精简之后，东北军克服了由于连年战争而带来的军队建制混乱、职责不明、军官老化等弊端。

编余的部队一部分遣散，大部分去参加屯垦，这样，既使



张学良戴孝检阅部队。

得部队更加精干，又收财政节流之益，且发展了经济，增加了生产，一举三得，备受称赞。

在整军建军的过程中，张学良十分重视对东北讲武堂的改造和利用，以便使其发挥重要作用。

从一九一九年张作霖重建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至一九二八年十年间，讲武堂一共办了八期，毕业总人数为三千五百五十七人。第一期至第六期每期只有二百多人。第七期人数最多时增至九百六十八人，这是张作霖进关当安国军大元帅时期，为了对抗北伐军而扩大了编制，才使学员猛增的。

一九二八年九月，张学良为了统一东北军事教育机构，把讲武堂由小东门外迁回东大营，将东北所有军事教育机构一律并归讲武堂，张学良自任讲武堂监督。

改造后，原讲武堂改名为“东北讲武堂辽宁本校”，后又先后设立“东北讲武堂黑龙江分校”、“东北讲武堂热河分校”两处，并附设了各种主科教育班。其总机关即称东北讲武堂，成为东北军事教育的最高机关。这一阶段是东北讲武堂的鼎盛时期。

在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仅两年的时间里，即从一九二八年末到一九三〇年九月，特别是在整军期间，从讲武堂毕业的学员大大超过前九年的总和。在辽宁本校东大营院内学习的第九期和第十期两期，在校生一度竟达到三千余人。其中，第九期学员中，在职军官计达一千五百人；第十期学员招收青年学生一千五百人。另外，还有高等军事学研究班两期共一百人；机关枪、平射炮、迫击炮研习班三期共九百零三人，炮兵研究班三十五人。仅以上两期毕业的人员总数即达四千零三十八人，大大超过了前八期的总和。

为提高部队素质，张学良特别重视军人入伍前的教育。一九二九年十月，经张学良建议，成立了“东北学生队”，工以

哲兼教育长，直属于东北保安总司令部。这是军人预备队，是培养初级官佐的摇篮。它实行各种军事学校的预备教育，规定必须经过考试合格后方能获得学习资格。

“本队教育系发达学生之体育，陶冶其品性，养成军人之精神，完成中等学校之普通课程，授以浅近军事技术，以为养成军中官佐之基。”此即张学良为学生队制定的学习目的和培养方向。

这一教学目的是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军人，而这一点，正是与旧军人相区别的重要标志。旧式军阀部队的军人，只知扛枪打仗，不需“陶冶其品性”，更不必学习各种知识。

在每期结业典礼上，张学良都发表演讲。他鼓励学员们说：“学生分队是东北军第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是我们东北军的光荣。”他还和学员们一起合影留念。

张学良十分重视用新思想和有用知识培养新式军队。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经常以如下思想教育军人：“凡我军人务宜遵守纪律为职责，以保民爱民为念，以扰民害民为戒。”

张学良在注重初级军人培训教育的同时，对高等军事教育也倾注了大量心血。

早年毕业于讲武堂的金亚东老人回忆说：“一九三〇年夏，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为统一东北军事教育系统，以讲武堂为主体，把东北高等军学研究班以及步兵、炮兵、军需、军医等研究班统统改为东北讲武堂的附设机构。我们这个班，改为东北讲武堂高等军学研究班，约在九、十月间迁到东山嘴子讲武堂东院，班部设在原来的营房团部小楼。

“举行毕业典礼时，张学良将军亲临会场，与全体毕业生合影留念，并依照陆军大学的制度，除发给毕业证外，还发给每人一枚毕业徽章。

“几天后，张将军又在长官公署礼堂举行隆重的宴会，招

待毕业学员，以示重视，席间有军乐队演奏。”

郑殿起老人回忆起当年的军校生活时说：“东北步兵研究班，于一九三〇年十月间成立，是东北讲武堂的一部分，相当于日本的步兵学校。当时东北军培养军官的教育机关，可分为高、中、初三等。高等的有高等军学研究班，相当于陆军大学；中等的有步兵研究班、炮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炮兵学校，工兵研究班相当于日本工兵学校；初等的有讲武堂。炮兵研究班和工兵研究班，都是一九二八年先后成立的。在此之后，步兵第一旅旅长王以哲于一九二九年春在旅内成立了步兵研究班，聘请在日本步兵学校毕业的杜长龄当中校主任。至一九三〇年秋，共训练了两期学员，成绩很好。王以哲将此情形报告了张学良。张学良决定在讲武堂内成立东北步兵研究班，将东北军的校、尉级军官，加以深造，委派杜长龄为步兵研究班上校教务主任，负全责。”

当学员从讲武堂毕业时，张学良几乎每次都亲临毕业典礼讲话，对学员们循循善诱。他也常常将毕业学员召到帅府，或在花园里集会，同他们进行思想上的深入交流。

我在一次讲话时语重心长地说：“同学们回到部队后，要本着所学，好好工作，更要在工作中继续不断地自学，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知识，争取上进。学无止境，不要一毕业就把书本一丢，那样是要落伍的。人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正派，不要做那种没出息的事。有的同学给我写信要钱，胡说什么爹死了、妈病了等等假话，这就是没出息的表现，这是很不好的，像这样的人，是不配做军官的。同学们应当鄙视这种人。要知道，谁也不能把钱随便给人乱用。俗话说，善财难舍、善门难开嘛！希望你们今后要不断学习，努力做好工作。这就是我对你们的临别赠言。”

张学良时代的东北讲武堂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招收学员

注重文化水平。第十期招收一千五百人，全部是从中学毕业生中招收的。这对提高军队的思想、文化素质有重要意义。

张学良时期开办的第九期、第十期以及各类研究班，培养出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军事人才。后来，他们在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张学良治军严谨，制定了许多规章制度，其中，尤其严令禁止军人吸食鸦片。主政东北后，他曾于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六日发出如下训令：

"查鸦片之害，烈于洪水猛兽，不惟我戕身败家，并可弱种病国，尽人皆知，应视为厉阶，岂宜吸食？况为军人者以身卫国，责任綦重，尤宜振奋精神，以期国强。所以军人不准吸食鸦片，迭经明令饬遵在案，特恐日久弊生，用再重申严令，以期戒除净尽，而树强种之基。

"本总司令治军以来，首重军纪，而败坏军纪者，莫甚于吸食鸦片，兴言及此，殊堪痛恨。此次各队奉令后，仰对于所属，详细调查，无论官佐士兵，如有吸食鸦片者，着即一律撤革，并按律治罪，以肃军纪。"

整顿和扩建兵工厂，亦是张学良整军建军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张学良相当注重学习西方的长处，但不崇洋媚外。在他主政东北时，曾打算改建沈阳兵工厂。宁恩承等向他报告，说美国专家提出要作一次可行性调查报告，索资三十万元。张学良说："还不是先骂我们如何不行。算了，算了，何必花三十万元买一顿骂？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东三省兵工厂，是一九二二年在奉天机械厂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整军建军后，至九一八事变前，兵工厂已具相当规模，职员和工人分别增加到一千余人和二万多人，成了当时中国比较完备而又新式的兵工厂。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为了巩固海防，决定在葫芦岛修建军港，为此，他亲自前往主持。他召集驻岛将领一起研究建港计划，测量水位，组织人员施工。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工那天，他召集驻葫芦岛附近的将领，举行了隆重的开工典礼。

几天后，张学良又成功地粉碎了一次内部军事叛乱。

原来，开工典礼结束后，张学良乘火车抵达山海关车站。这时，于学忠军长匆匆来到车上，向张学良报告了一个兵变的紧急情报："我部旅长马廷福中将私自调动部队，移至山海关车站附近，用心不良，请您火速离开。"

火车全速开进北戴河车站，张学良当即下令："驻山海关附近各部队团以上军官，马上到北戴河别墅开会。"

下午，各将领先后到来，带来的侍卫全部留在大门外面休息。马廷福和他手下团长孟伯孚进屋落座后，张学良和于学忠军长走进会议室，全体军官起立。

"将反叛马廷福、孟伯孚拿下，送交军事法庭！"张将军立即下令道。

站立在两旁的侍卫迅疾将两人擒拿捆好。马廷福大喊大叫，侍卫即刻将两人架出，放在"洋车"上，用大衣盖好拉走了。

"马廷福、孟伯孚二人收受了日本的重金，并接受蒋介石的策反，私自调动部队至山海关车站，想挟制我，企图制造东北混乱。他背叛了我，也背叛了我们东北军，用心十分险恶！"

我向其他官员简要宣布了逮捕马廷福、孟伯孚的主因。并说，我们要以民族大业为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东北人特别爱国，东北人受日本人的欺负，那真是一言难尽、说出来叫你不相信。那时代，中国人恨透了日本人。当然，不能说日本人都是坏的，那样说也是不对的。那时的东北，日本军人飞扬

跋扈，那日本兵处处挑拨是非，时时无理挑衅。

采访中，赵四小姐在旁补充说："我们中国人一不小心走到日本人的铁路那边，有时，日本人一下子就把你逮住了，逮住你之后就扔进火车头里烧掉了。火车头不是有大炉子吗？打开门扔进去就把你烧了，尸骨不留。你们没有当过亡国奴啊！"

张学良整军建军的目标，简而言之，只有四句话，这就是：长东北人的志气，灭日本人的威风，增强武力，守土安民。

第二十九章　理 政 建 政

1928.7

——“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

——“要继续发扬朝气，永久保持清洁性，勿为官场恶风所染。”

——“把地方治好了，这是我们青年人之使命！”

“整理司法，凡百内政，均协助民政长官切实进行，俾民治早日观成，即政治改革，可期完善。”

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的少帅张学良，以建设富强的东北为目的，发表上述就职通电。在七十余年前就已提出如此主张，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张学良在整军建军的同时，又积极推行理政建政。

为了尽速将东北地方治理好、建设好，他对地方应兴应革之事，积极经营，细心处理，尤注意人事统一。同时，为防政出多门，他刷新吏治，昌明政治，以求政权稳固。

为加强统一领导，张学良在东三省保安司令部下设立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为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张景惠、翟文选、常荫槐、汤玉麟，另聘莫德惠、刘尚清等为委员，郑谦为秘书长，后由王树翰继之。

东北政委会负责研究、处理东北的政治行政工作。为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目的，张学良任用一批年富力强的“少壮派”人物，如高纪毅、卢广绩、刘鸣九、阎宝航等人。这些人有朝气，干劲大，民族意识强烈，主张励精图治，富国强兵。不久，他们便成了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上午，八时至十时，赴军队或各校视事；十时半至十二时，会客办公。下午，三时至五时，会客办公。”这是当年张学良的工作时间表，这张表不仅张贴在张学良的办公室里，还长时间登在《奉天公报》上。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了解他的办公时间、地点，以便他随时接待来访人员，听取汇报和检查工作。

平时，张学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自一九二六年入关南下河南作战，因军情危殆彻夜难眠，不幸染上吸毒病瘾之后，身体长期虚弱，但他并未因病魔缠身而影响工作。他每天一边打针戒毒，一边坚持处理名目繁多的公务。这从他为自己制定的作息时间表上可以看出。

在张学良的带动下，不少行政人员亦严加管束自己。奉天省长翟文选在他的任职宣言中，对自己提出了六点要求：“澄清吏治，剔除积弊，锐意兴革，外交亲睦，与民休息，愿闻己过。”

作为旧式官吏，能为自己制定这样的戒律，的确令人耳目

一新。由此可以看出，张学良时代的干部有一种向上的精神和劲头。

早在二十年代末，年轻的张学良就意识到法治的重要性。他上台主政后，在理政建政的过程中，为使各项政策顺利下达，保证各项改革收到实效，东北当局订立了许多规章制度。

譬如，一九二八年九月，《东三省交通委员会章程》公布，规定了各铁路领导机关的管理权限。

同年底，东北政委会成立了东北筹赈会。翌年初，该会制定了《赈务奖励章程》。章程明文规定，对“捐助赈款者”、“经募赈款者”、“办赈出力者”给予奖励。根据捐募钱财的多少和出力的大小，分别给予匾额、金质麒麟奖章、银质麒麟奖章和纪念品等不同奖励。

一九二八年底，东北易帜。东三省行政改制，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公署改为省政府，省长改为省政府主席，奉天城改为沈阳市，县公署改为县政府，县知事改为县长。

一九二九年六月，辽宁省政府制定了《赞助建设事业暂行奖励章程》，规定“凡捐资产及以义务劳力协助建设事业之发展者，得依本章程分别奖励之”。

同月，辽宁省成立村政研究委员会，研究事项包括村界之划分、村教育、实业之发展、村民备荒及救济之筹划等十几项内容。

七月，制定了《褒奖条例》，奖励的对象和条件是孝行笃行、尽心公益、有功艺术、硕德淑行等。

八月，制定了《关于行政干部普通奖章暂行条例》，奖励的对象是“在各机关任职满三年以上著有劳绩者；办理一切行政事务著有成绩者；办理地方公益事务著有成绩者；捐助公益款项在千元以上者”。

这些规定，对焕发干部和群众的热情，改善社会风气，起

了很大作用。

九月，又制定了《奖励造林暂行章程》、《强迫造林暂行章程》、《奖励养蚕植桑培柞暂行章程》，规定全省各地应大力开展植树造林和种桑养蚕工作。其目的是为了“增加地利，厚裕民生”。

一九三〇年六月至八月，辽宁省工商厅、农矿厅、教育厅还分别发出《禁止购买日货密令》、《禁止中日合办合作事业训令》、《收回满铁附属地教育权通令》。这些命令具有鲜明的反日色彩，对抑制日本的经济侵略，发展民族经济，提高民族自尊心，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更令人敬佩的是，早在二十年代末，少帅张学良便已着手廉政建设。

以辽宁省为例。一九二九年二月，省政府曾针对机关干部请客送礼现象，下达一个《禁止僚属馈送年礼命令》。命令中说：“查近来风俗奢靡，人事日繁，每值年节岁时，辄尔馈送礼物，遂致籍名酬酢，阴进苞苴，宠赂滋章，官邪斯作。兹当庶政革新之始，若不严行申禁，则官方何由整饬，旧染何以湔除？”

此事虽小，但说明一个大问题：对请客送礼不可等闲视之，如若不加禁止，势必蔓延，导致贿赂公行，走后门成风，干部堕落，人心涣散，社会腐败。

张学良继掌东北政权后，还设立了东北最高法院，以孔昭炎为院长。为培养司法官吏，适应扩充法院、改良司法的需要，又在沈阳成立同泽新民储才馆司法班。在成立司法班的同时，为了培育优秀的警官，又成立同泽新民储才馆警察班。

张学良和他的同僚们在二十年代就能提倡法治，制定各项规章制度，加强廉政，加强司法，不能不令人耳目一新，确实值得赞赏，至今仍具借鉴意义。所有这一些，都是张作霖时代

所无法比拟的。

经过整顿和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东三省做到了兴利除弊，统一了思想，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为建设东北、发展经济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和可靠的政治保证。

在理政建政中，少帅特别注意行政人才的培养。早在一九二六年，在戎马倥偬之中，张学良就创办了同泽新民储才馆。主政东北后，又将储才馆迁入沈阳城内临近帅府西辕门的通天街。

张学良对学员们非常关心。当学员们在大帅府实习时，他在公余之暇，常到学员屋里交送文件或谈话聊天，了解学员思想和身世等情况，谆谆告诫他们要整顿吏治，报国救民。

当学员实习完毕，张学良又派他们到各县去见习，以充实县政兴革的经验。规定见习期限三个月，旅费实报实销，月发津贴三十元现钞，不接受地方招待。学员到外县都穿便服，以便征询民隐，了解民间疾苦。所有县署的一切施政措施，以及文化、教育、财政、经济、司法、治安、实业、建设、地理、民情、民风等情况，均须全面了解，加具兴革意见，按月汇报见习委员会，评定成绩。

为改革吏治，张学良将大部分毕业学员派往辽宁、黑龙江两省充任县长。办法是按照储才馆学员毕业成绩的名次，写出姓名，交各省有关部门任用。另外，还将学员派往各旅军法处、东北交通委员会、北宁铁路局、东北电政监督处、沈阳市政公所及各县政府部门。总之，储才馆所有学员作为新鲜血液，都被充实到各地任职。

张学良对于毕业学员之充任县长者，期望甚殷。在他们谢委、请调、禀辞之际，叮嘱他们要好好干，并说钱不够用，可来信求补助，切勿贪赃枉法，而要树立廉洁的风气。

"荫春县长，来函悉。你能兴利除弊，勤政爱民，殊堪嘉

尚！但切盼勿骄，要继续发扬朝气，永久保持清洁性，勿为官场恶风所染，并要打倒一切旧束缚，励精图治，勉为循吏，把地方治好了，这是我们青年人之使命！”

这是张学良给瞻榆县县长李荫春写的一封亲笔信，倾注了他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

推行反日排日方针是张学良主政后又一个鲜明的特点。

张学良上任后，在吏治改革方面付出了大量心血。而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以反日排日为指导思想，以建设富强的东北为最终目的。

张作霖生前，日本侵略者就处心积虑地胁逼他签署《满蒙新五路协约》。张学良一上台，日本即以此草案为据，逼张学良履约，以攫取东北的铁路权益，建立它在东北的铁路网，使东北实际上沦为它的殖民地。对此，张学良拒绝履行。

与此同时，东北各地人民又纷纷行动起来，组织护路团体，发表护路宣言，宣传讲演，游行示威，揭露日本人的筑路阴谋。而张学良对这一斗争给予了大力支持，日本人大为恼火。

张学良在支持东北人民反日护路斗争的同时，又采取措施，抵制日本的铁路侵略。他上台后，东北当局不顾日本的反对，积极修筑了与“满铁”平行的铁路，如奉海路、吉海路等，这样，就从东西两侧包围了日本控制下的满铁，使满铁大受打击。到一九三〇年，满铁营业发生了创业以来的最大赤字。

为抵制日本人，张学良又引进了美国资本。一九三一年春，东北交通委员会向美国公司借一千万美元修筑通往鹤岗煤矿的铁路；六月又与美国福尔克航空公司签订了《建筑奉天飞机场协定》。

为反抗日本的侵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采取一系列

对策，在“回收国权”的口号下，宣称收回旅大，收回“满铁”，要求日本关东军撤出东北。但日本人蛮横至极，断然拒绝。

日本人对我说，用箭射来的地，你必须用箭再射回去。他日本人的这话很明显，就是说旅大是我们日本人用武力拿下来的，你要收回去，你就得用武力才能拿回去。你想借租约到期就收回去，没那么容易，这就等于不还给你，这是拒绝的话。

在张学良推行反日排日政策的影响下，东北地方的反日爱国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组织起来。

一九二九年七月，与张学良关系密切的辽宁著名爱国人士阎宝航、车向忱等，相继组织了“辽宁国民外交协会”、“国民常识促进会”、“拒毒会”等组织，斗争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

特别是自“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排日运动如燎原烈火，迅猛燃烧起来。它明确提出“打倒满铁”的口号，反日排日气氛异常强烈。

所有这些反日活动，均得到了张学良的大力支持。

当年，东北当局所推行的反日排日政策，是对日本侵略者的有力回击。尽管这些反击还很不够，但日本侵略者却叫嚣说，日本之所以要发动九一八事变，是张学良和东北人民反日斗争的结果，并且至今还在宣扬这种谬论。

只许侵略，不许反抗，这完全是侵略者的强盗逻辑。

第三十章 振兴经济

1928.7

——“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

——“要实事求是，除去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提倡实业，奖励生殖。”

——“建立本港的目的，在于打倒大连港。葫芦岛将成为中国复兴之曙光。”

东北那真是富庶。吴铁成来到东北后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没到过东北，就不知道中国之大。

经济是一国命脉，经济上不能复兴，政治上就永远没有独立自主的一天。

这是张学良的精辟见解，也是毋庸置疑、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息兵罢战，寓兵于农，裁军自守，休养生息，这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的基本政策，他在就职通电中就宣称："要事实求是，除去一切苛捐杂税，以利民生；提倡实业，奖励生殖。"其核心目标则是开源节流，发展生产，振兴经济，建设东北。

张作霖的政权，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东北地区保守落后势力的上层建筑；而他的继承人张学良，则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是逐渐向资本主义转化的政权。他们父子所奉行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

张学良主政东北后，百废俱兴，各行各业欣欣向荣，经济发展迅速。其中，不论是工业、农业、交通运输方面，还是金融、电信、外贸方面，都朝气蓬勃，日新月异。

工业方面。东北是我国工业相当发达的地区。帝国主义入侵前，这里的民族工业就已建立起来，其中煤炭的开采、铁矿的开采，钢铁、冶炼、纺织以及榨油等工业，皆闻名全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东北的民族工业和对外贸易有了进一步发展。但是，随着日本侵略的逐步深入，东北的民族工业处于萧条和停滞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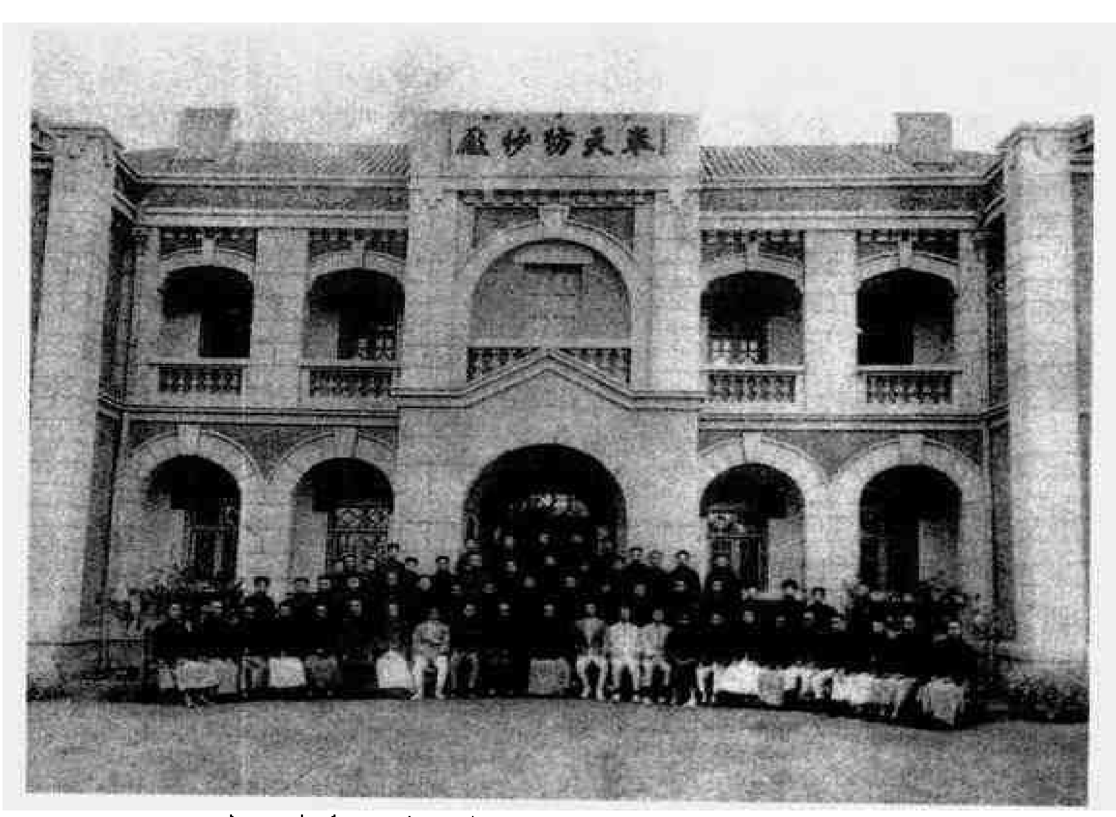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以后，张学良执行了一条不同于张作霖的经济发展路线，使濒临破产的东北民族工商业再次发展起来。

譬如，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在沈阳创办的民族工业肇新窑业公司，从国外购置新式机器，采用新法烧制陶瓷，瓷器色泽优美艳丽，花纹新颖大方，产品数量增加，质量逐步提高，企业日益兴隆。后因生产逐步扩大，资金短缺，为此，杜重远面见张学良，要求给予帮助。张学良得知此事后，除亲自到厂参观、了解情况、派人作详细调查，以求根本解决之外，还慷慨解囊十二万元作为他个人的投资。

由于张学良的支持和厂方的努力，肇新越办越好，纯粹国货，价格便宜，畅销东北各地，闻名国内外。当时，人们称誉



一九二九年，张学良为《东北新建设》杂志题名。



一九二九年，奉天纺织厂全体职员在厂门前合影。

肇新窑业公司为“东北工业界之福音”、“东北之模范工厂”。相反，日本大华瓷厂的产品，质量低劣，销路迟滞，最后不得不改成耐火砖厂。

沈阳一向是东北的工业中心。由于息兵罢战，政局稳定，加以张学良主政的东北当局积极扶植，到一九三〇年底，沈阳民族工业如纱厂、铁厂、油厂、窑业、造纸、火柴等企业，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

其中，沈阳的铁工厂已扩增至二十家，最为著名者为东北大学铁工厂。除铁工厂之外，沈阳的榨油厂已有十八家，造酒厂十一家，印刷厂二十五家，皮革厂六十余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始建于一九二二年末的八王寺汽水公司，一九二八年以后产量大增，每年生产汽水九千箱，价值四万八千元；该厂每年还生产酱油四十万斤，价值四万元。该公司当年创制的“八王寺”汽水，至今誉满东北。

农业方面。张学良为发展东北农业，曾想出很多办法，尤其重视垦殖业，他根据寓兵于农之说，大力推行军垦和民垦。

一九二八年七月，兴安屯垦区公署成立，九月，原炮兵司令邹作华出任兴安屯垦区督办。不久，邹作华率部去洮南、索伦一带安家落户。

兴安屯垦区范围，南以热河省为界，西与内蒙古接壤，北到中东铁路，东与吉林省相连。其内包括辽宁省所辖之洮南、洮安、镇东、突泉、安广五县，黑龙江省所辖之景星、大赉、泰来、索伦四县，还有内蒙古之扎萨克图旗、镇国公旗、图什业图旗等。屯垦区以洮安和索伦为两个中心城，军垦单位以邹作华的炮兵为主体。

军人放下刀枪，拿起镐头，开垦荒地，建设边疆，这样做，既解决了军队的安置问题，又可多打粮食，满足人民生活需要，一举多得。

张学良在进行屯垦工作的同时，还特别重视接收关内移民。那时，关内向东北移民的人数日益增多。譬如，一九二五年时，仅四十九万人，可是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〇年，每年都达百万，其中，一九二九年竟高达一百一十万人。

对数以百万计的移民，东北当局不仅表示欢迎，而且还给予多方照顾。当时曾明文规定："移民户住室，由公家予为建筑。"仅兴安屯垦区一地，在一九二九年五月就接受了河南移民近千户，人口约五千。大量移民的涌入，给东北增加了精壮劳力，为开发东北、发展农业生产起了推动作用。

自从实行屯垦之后，边防得以巩固，经济随之发展。

由于实行了正确的垦殖和移民政策，东北农业产量大增。据东三省官银号调查，一九二九年东北主要农作物总产量为一千八百二十六万三千六百五十吨，创历史最高记录。

交通运输业方面。张学良发展东北交通事业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他长期抵制日本居心险恶的"铁路交涉"阴谋，加紧修筑中国人自己掌控的铁路。

自日本侵略我国以来，中日"交涉"从未间断。此时，吉会铁路的修建问题又成为"交涉"的中心内容。

所谓吉会铁路，是指从中国东北中部的吉林市，中经敦化、延吉，过图们江，直达朝鲜东北部的会宁。若吉会铁路建成，从日本到中国，就可横跨朝鲜而直接进入东北中部和北部，路程大大缩短，从而便利日本对中国和苏联的侵略。这是一条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具有很高战略价值的铁路。

一九二八年张作霖撤出北京之前，日本公使芳泽和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等曾同张作霖多次谈判，形成一个修建新五路的《山本条太郎——张作霖密约》，但张作霖没有正式签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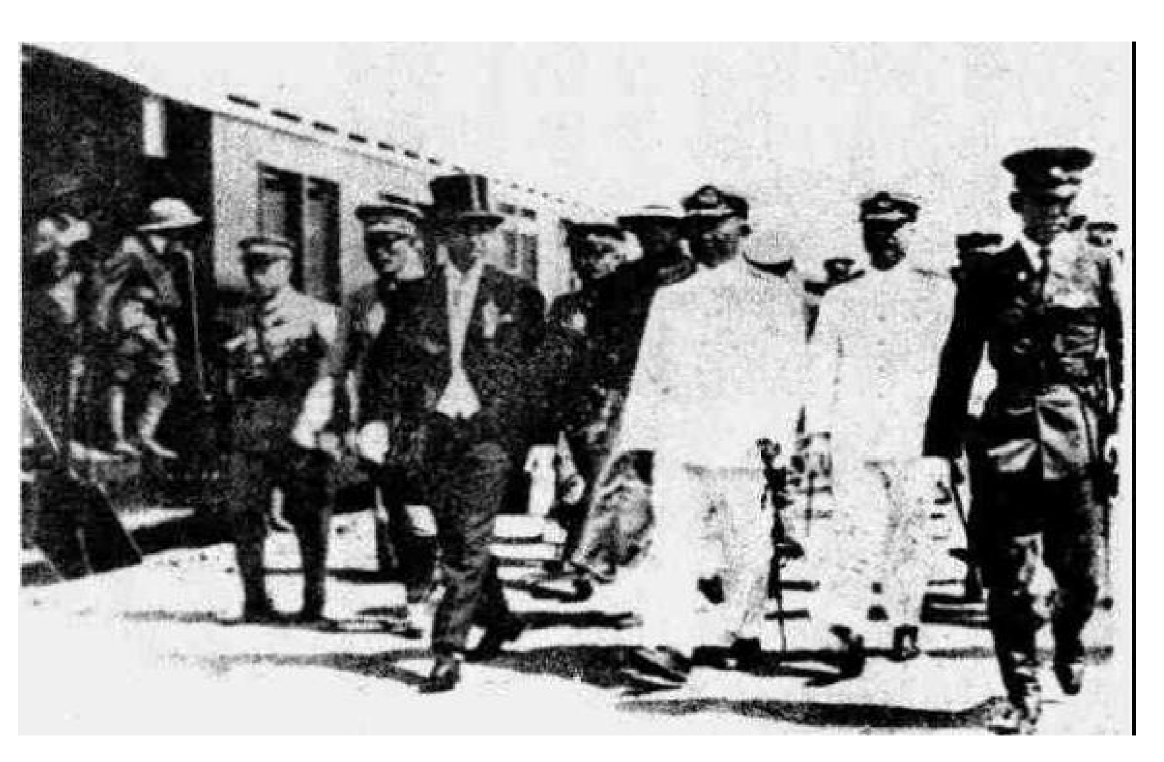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对于其父与日本签订的铁路合同，一直采取"不管日本怎样催促许可动工，决不应允"的态度。

由于日方纠缠不休，张学良决定成立专门委员会对此讨论审核。但他指示说：“我们审核讨论的时间，可以斟酌情形，自由伸缩，欲长则长，欲短则短。”

一九三一年三月，经东北当局与日本磋商，又成立了东北铁路交涉委员会，研究铁路兴建问题，但仍无结果。张学良敷衍的态度把日本人搞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后来，日本方面感到受了愚弄，曾大发雷霆，说：“这简直是对日本的侮辱！”

张学良在抵制日本无理交涉的同时，加紧修筑自己的铁路。一九二八年，大（虎山）通（辽）、奉（天）海（龙）和吉（林）海（龙）铁路相继通车，建筑葫芦岛的计划也在着手进行。

在葫芦岛港开工典礼上，张学良明确表示：“建立本港的



张学良（右四）赴葫芦岛主持筑港开工典礼，在沈鸿烈（右三）陪同下步出车站。

目的，在于打倒大连港。葫芦岛将成为中国复兴之曙光。”

之所以要修路建港，是因为兴建打虎山的铁路引起很多麻烦。东北那时最要紧的出口物是黑龙江的大豆，当时运黑龙江的货物，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非常刁难我们，从大连港出口大豆也受到日本方面的百般刁难。

一九三〇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建设东北铁路网计划》，准备在十年内修筑铁路八千公里，至少要修好“三大干线”，以便与日本控制的“两大干线”（南满路与安奉路）相对抗。可惜的是，这一宏伟的筑路工程刚刚开始，就因九一八事变而中断了。

金融业方面。由于东北内战不休，外资入侵，东北金融业经常陷于危机之中。起初，奉票信誉颇佳，后因直奉战争、郭军反奉、对冯战争的影响，加之其它货币再度泛滥，迫使奉票跌价，发生毛荒。

张学良执政东北后，为改变这种不利局面，采取了三种办法：

一是稳定群众情绪。一九二九年六月，政府明令各界勿得贱视奉票，如有趁机捣乱造谣者，查出严办。安民告示中称：“奉票既为本省主币，命脉所在，无论至何时期，至何程度，公家必出以全力，抱定决心，维持到底，断不任其毛荒，断无变更之事。”

二是发放新币。仅一九二九年就发行哈大洋券一千三百万元，现大洋券三百五十万元。

三是发行公债。一九二九年夏，发放东三省整理金融公债五百万元（现大洋）。

其结果，是货币日趋稳定，市场逐渐繁荣，国库益加充实。

在整顿金融方面，张学良还采用英美的先进模式，注意培养人才。他先派韦锡九去英、美实习银行业务，继派于朝宗、

莫启东、何松亭去英、美留学，并要求宋子文推荐一些人才来奉。一九三〇年，张学良下令成立东三省金融整理委员会，作为金融研究机构，以专家、学者为主，对其十分重视。

电信业方面。一九二九年，东北交通委员会受张学良委托，对电信机构进行了必要的改革。

最早的东北无线电台，创办于一九二三年，设在奉天故宫院内，装有一个马可尼收发报机，与东北各大商埠传递官电。一九二八年，又在故宫院内安置了短波发信机两部，专门与关内各短波电台联系。

一九三〇年二月，东北交通委员会将沈阳台定为总台，哈尔滨、齐齐哈尔、长春、营口、富锦、满州里等六处设分台。同年五月，在短波电台内，又安装二十启罗瓦特德国式发讯机一部，每日可与德、法等国通讯。当年秋，又安装了二十启罗瓦特美国式收讯机一部，以备与美国和南洋诸国通讯。

为加强沈阳与各地的联系，从一九三〇年开始，东北当局陆续在东北各地建立了中、小电台。到一九三一年上半年，已建成的电台有葫芦岛、吉林、满州里、黑河等九个，正在安装的有安东、密山等五个，准备安装的有抚远、虎山、长白、通辽、海龙等十二个。另外，在兴安屯垦区内，设有洮安、洮南、索伦电台，作军事通讯之用。

当时，东北的无线电台星罗棋布，营运甚佳。所播节目，有商情行市、气象报告、中外新闻、文字教授以及音乐戏曲等项，多彩多姿，很受欢迎。其电报线路，陆线长二万三千五百三十五里，水线长三万八千五百四十四里。电报收发亦很繁忙。至此，东北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通讯系统。

这个庞大独立的电讯体系，不仅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群众生活，而且确实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作用。比如，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沈阳无线电总台便及时与其它各地联系，报告事变实

况。次日，沈阳为日寇占领，哈尔滨电台承担起了通讯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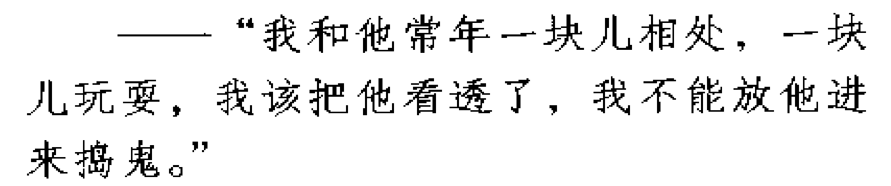
外贸业方面。九一八事变前，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积极努力，东北的经济在短短几年中有了迅速发展，出现了收入大于支出的可喜现象。以一九二九年为例，当年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和东省特别区、兴安屯垦区都有盈余。

经济的发展集中表现在对外贸易方面。当时，东北外贸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日本对华贸易额锐减，对此，日本财界甚至发出了战争叫嚣"有钱搞会谈、派特使，还不如造军舰"；另一种是东北对外贸易额激增，输出贸易额呈现逐年增长之势，输入额则较为平稳，故出超额年年增加，至一九三一年，已高达三亿九千四百六十七万三千元。

在张学良主政东北的短短三年间，东北经济社会的发展突飞猛进，成为东北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第三十一章　围歼张褚

1928．8



——“我和他常年一块儿相处，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

——“我一共给了他三万块钱，这钱他花得乱七八糟。”

——“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你呀，最好的任务是回东北组织游击队。”

过大年，从初二开始，我们干什么呢？我一个，张宗昌一个，还有另外三人，我们五个人就打麻将。一打这玩意儿，两天三宿下不了桌，身边搁个小桌子，吃饭就在旁边。后来还是孙烈臣来了，他来拜年看我们，他一见这样子，一怒之下就把桌子掀翻了，钱撒了一地，也不管了。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我买五口棺材把你们装起来，好不好，大过年的，你们这

是干什么？

按说，张学良同张宗昌一同在烽火硝烟中走过了风风雨雨，相互之间那真是太了解、太熟悉了。

张宗昌，字效坤，绰号“狗肉将军”。一八八一年生，山东掖县人，胡匪出身。辛亥革命后，率所部百余人投靠山东民军都督胡瑛，后又到上海，在陈其美的光复军中当团长。“二次革命”时，他兵败徐州，投入江淮宣抚使冯国璋的怀抱。一九一六年初，经袁世凯收买，张宗昌指使其部下营长程国瑞暗杀了陈其美，自此，他深得北洋军阀的赏识和宠信。袁世凯死后，他跟随冯国璋，成为直系的一员干将。冯国璋做副总统时，张宗昌被委任为侍从武官长，之后曾任第一师师长。一九二一年初，因其所部军纪涣散，到处滋事，在江西被解散，张宗昌只身北逃，投靠奉系军阀张作霖。一九二二年，任奉军吉林省防军旅长。同年底，收容白俄军万人及大量武器，遂成为奉军实力派之一。一九二五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他出任山东军务督办。

“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的张督办。”

“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的张宗昌。”

张宗昌在督鲁期间，横征暴敛，鱼肉百姓，屠杀革命志士，民众切齿痛恨，遂编排了这样的顺口溜来诅咒他，发泄心中的愤懑。

一九二六年初，在对冯玉祥的国民军作战时，张宗昌的鲁军与李景林的直军组成直鲁联军。年底，张作霖任命他为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率直鲁军深入长江下游，占领了江苏、上海。后兵败于北伐军，退回华北。

褚玉璞，也是胡匪出身。自一九一二年起，褚玉璞一直跟随张宗昌，在张宗昌的庇护下，他当过奉军直隶督办和军团长。

张、褚二人，一是流氓司令，一为土匪督办，两人形影不离，臭味相投，天生一对难兄难弟。

一九二八年四月，奉军战事失利，被迫退往关外。七月，直鲁联军撤至唐山、滦县一带。这时，张宗昌、褚玉璞声称要率十万大军出关整顿，为张作霖报仇。而实际上，是企图到辽东一带与日寇勾结，依靠日本人独霸一方。

张学良对张、褚的个人历史及其所部的恶劣形迹洞若观火，为防变生肘腋，他没有同意二人回奉整训的要求，严令他们在唐山一带休整，并要求详报部队的实际人数及其情况。张、褚对此十分不满，声言要采取行动。

效坤想率部回到东北。嗨，我和他常年一块儿相处，一块儿玩耍，我该把他看透了，我不能放他进来捣鬼。此外，随他怎么办，我不管。邻葛主张把他缩编为四个师开往热河，我以为编四个师可以，但不能仍归他带领。他不愿意，我没别的办法了。

"效坤跟老帅出力多年，现在穷途末路，我们不能不管。我主张把他的部队缩编为四个师，调出关来好好地整顿。汉卿不同意，怕他捣乱。其实效坤也不是不能听话的呀！我们正在商议这事。"事后，杨宇霆对何千里解释说。

杨宇霆偏袒张、褚，似有挟以自重、留为后用之意图，也正因如此，张学良始终坚持对张、褚采取彻底解决之态度。这样，张学良与杨宇霆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

此时，张、褚所部南临北伐军白崇禧大兵压境之危，背后，张学良又拒绝他们出关，两人身处夹板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们企图私下先与白军私订协议，盼其网开一面，然后再另行图谋，但他们的诡秘要求遭到白部何千里的严词拒绝。

此时，直鲁联军被暂时安置在滦东一带，由于与日方已有

勾结，张、褚拒绝接受张学良令其向国民革命军投诚的劝告，图谋异动，蒋介石驻北平代表为此致电张学良，向其提出了质问。

“张、褚若不肯就范，决履行夹击之诺言，为断然之措置。”张学良复电说。

此时，张宗昌、褚玉璞所部号称十万，实际上只有六万，其主力是刘本利第四军的四个师，另有白俄铁甲大队二千五百人和卫队旅几千人，总数四万余人。驻扎唐山的褚玉璞部尚有二万余人。

最初，张学良不愿再大兴干戈，曾派员去安抚，同意先在滦县进行缩编，然后再撤往关外，但遭张宗昌断然拒绝。之后，张、褚一面在滦河西岸集结军队，准备进攻奉军，一面派人与日本联系。有鉴于此，张学良当即命令荣臻、胡毓坤的第十六、十七两军在滦河东岸作好战斗准备，并对张、褚部下加紧了劝降工作。

为欺骗舆论，安抚部下，八月二日，张宗昌在滦县城内举行了祭祀“张作霖大元帅”的隆重仪式。只见他身穿孝服，手拿哭丧棒，率领高级官吏，叩首致哀，祈求张作霖的在天之灵保他成功，并宣誓将来必为张作霖报仇雪恨，同时，他还诬蔑张学良不忠不孝，忘恩负义。

可是，就在祭祀的当晚，直鲁军偷渡滦河，袭击奉军，占领滦河铁桥和滦河东岸一部分地区。紧接着，又沿铁道两侧向奉军发起进攻。张宗昌在道南亲自督战，刘本利在道北负责指挥。

三日拂晓，张宗昌所部向奉军把守的团山子、牛各庄阵地发起冲锋，双方战况激烈，奉军伤、亡营长各一名，阵地丢失。在此紧急情况下，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一百五十三团团长江维仁，亲率仅剩的一名营长王茂德带队反攻。经几次冲杀，一

番血战，又夺回了阵地，直鲁军败退，张宗昌险些成了俘虏。

当晚，直鲁军又进攻石门车站，守军第一百五十四团抵挡不住叛军的凶猛攻势，团长阵亡，车站陷落。第一百五十五团旋即奉命举行反攻，团长在激战中亦阵亡，但奉军最终又将车站夺回。

四日，直鲁军再次进攻牛各庄，奉军顽强抗击，击退叛军，并俘虏直鲁军三千余人，大炮七门。五日，张宗昌又发起攻击，被奉军孙兆印的第二十八师击退，铁道以南的战事经几次血腥厮杀，就这样以叛军溃败而结束。

负责铁道以北战事的刘本利原是张作霖旧部，曾任旅长。刘本利部渡过滦河后与奉军丁喜春师对峙，丁与刘是老朋友，交情颇深。八月六日上午，丁喜春派人将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刘本利，劝其不忘旧情，回归旧部。翌日晨，刘本利率所部投降。

此时白崇禧已设司令部于唐山，通令滦河西岸守军严密戒备，忽接前线急报，谓闻隔河枪炮声大作，白总指挥不禁喜出望外。

原来，时已交秋，白部南来军士犹着单衣，此时倘遇战事，实感棘手，不期奉军竟能自动解决直鲁联军，使其不费一枪一弹，扫除了其北上的最后障碍，岂不是喜从天降。

兵败之后，张宗昌见大势已去，只身逃往大连。叛兵一部夺路喜峰口，往关外逃窜，余者四散而去，战事不日便告结束。

与此同时，驻扎唐山一带的直鲁联军褚玉璞所部，亦被国民党白崇禧军队全部缴械。至此，直鲁联军全部被解决，直鲁联军之名从此消失。这对奉军来说，无异割掉了一个赘瘤，拔掉了一根肉刺，张学良闻讯大悦。

事后，张学良曾派员持款到滦县一带抚恤、慰问当地群

众，妥善安排俘虏。

张学良能够在关键时刻以大局为重，识破张宗昌、褚玉璞的本质，并与之作坚决的斗争，对团结东北军、巩固东北边防起了重要作用。这表明了他对祸国殃民的军阀之厌恶，对邪恶势力之憎恨。

一九二九年初，张宗昌、褚玉璞再次崛起于山东，但很快便垮台了。

"有书上说，你把张宗昌接到北京，但他在北京住得不愉快，又到天津去，结果被人家暗杀了，还说你对此很难过，是吗?"唐德刚教授问张将军。

不是，不是，都不是。这是从哪儿看到的？都是胡扯八道。他先是逃到日本，后来在日本不能待了，钱也花完了，他又回到北京。那么，我就劝他，我说，你呀，好好在这儿待着。那时我也没太多的钱，我一共给了他三万块钱，这钱他花得乱七八糟。

我说你好好在这儿待着，总有一天会用着你的。中国和日本，总有一天会打起来的，如果和日本打起来，你呀，最好的任务是回东北组织游击队。他说我自己有难处，去不了，南京我也去不了，陈英士是我刺杀的，因这个原因，陈立夫、陈果夫在，那南京我去不了，我没法子。

所以，我就劝他，我说你好好在北京待着，总有一天你有用处的。他那天是偷着走的，谁也没有告诉，他偷着跑掉了，跑到山东去了。

上山东去干什么呢？那时石友三在山东，他就想勾结石友三在山东搞点名堂。

"顾维钧先生告诉我说，张宗昌到山东去，是有目的的，他知道搞不好就回不来了，所以，就把太太、小孩子托孤给顾维钧了。"唐教授补充说。

张宗昌走的时候，他没敢从正阳门上火车，他搭一个小车站上的火车。他怕我不让他去。他自己也想不到这结果，他不安分呢，他不听我的话。

"我看到一本书上说，张宗昌谁都不怕，就怕你，比较听你的话。"唐教授笑道。

也不全是那回事，滦河之变他就不听我的。顾少川的那位黄太太看中了张宗昌，她拼命地追他。我知道此事后，就告诫张宗昌说，你不要乱来啊。

张宗昌逃往日本后不久，褚玉璞被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军长刘珍年活埋了。

后来，在日本唆使下，张宗昌企图在山东东山再起。一九三二年九月三日，当他结束济南之行，踏上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时，从送行的人群中突然跳出一条汉子，手持一把手枪，窜向张宗昌，咬牙切齿地大喝一声："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

可是，这刺客连扳了两下扳机，枪未响，卡壳了。张宗昌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人，他面无惧色，马上往口袋里去掏枪。然而，他那支护身的手枪前几天已被石友三要去了，情急中，他转身往车厢里逃，刺客则紧紧在后面追赶。张宗昌跑到车厢尽头，纵身往下一跳，又迅疾朝东北方向狂奔，刺客也跟着跳下车，并再次举枪向他射击，结果，枪还是没有响。

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宗昌的两个护兵已赶到，朝刺客开了一枪。巧得很，就在这一刹那间，刺客被铁轨绊了一跤，跌倒在地上，子弹嗖地从他头顶上飞过。这一跌，竟把他手中卡弹的手枪撞灵了，他马上爬起来继续射击。结果，张宗昌的一个护兵应声而倒，另一个落荒而逃。刺客追到十股车道附近时，又朝着已倒在地上的张宗昌的胸口连开了两枪。

站台上来送行的人被这一场面惊呆了，巡逻的车警也木头似的站着，一动不动，许久，他们才举起枪，呯呯呯地乱放一

阵，但刺客不仅安然无恙，反而又疯狂地跳回到站台，高呼道："为父报仇，我投案自首！"

人们定睛一看，刺客原来是山东省政府的参议郑继成。他的叔父郑金声在北伐时被张宗昌俘虏后枪决，郑继成因是郑金声的嗣子，所以他说是"为父报仇"。

刺杀事件马上成了当时社会上的头号新闻。郑继成虽杀了人，可济南法院看守所反把他奉为上宾，那些痛恨军阀的人都把他看做是一位英雄。各民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也纷纷向南京政府提出特赦郑继成的要求。冯玉祥还组织人员编写了有关郑继成的生平和其为父报仇的详细经过。

不久，南京政府的特赦令果真下来了。

张宗昌究竟是不是郑继成打死的，当时就有人提出疑问。最大疑点是，张宗昌的致命伤是头部中弹，这一枪是步枪子弹，而郑继成当时拿的却是手枪。这个谜，直到张宗昌被刺十年后，其神秘的面纱才被揭开。

一九四三年，在河南商丘的一家酒楼上，坐着两个人，一是当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特谍队的成员王慰南，坐在他对面的就是郑继成。

"张宗昌果真是你杀死的吗？"王慰南笑着问郑继成。

"你没见过冯玉祥先生印的那本郑继成为父报仇的书吗？"郑继成狡黠地一笑。

"你别瞎吹了，"王慰南哈哈大笑道，"那本小册子靠不住。"

"你怎么知道书上写的不可靠？"郑继成脸色顿变，两眼紧盯着王慰南问道。

"你刺杀张宗昌的经过，都是我写的。当时，济南市社会股长陆实君，从济南法院看守所拿来了你的口述。我看看很平常，就把其中几点加以渲染夸张，将你写成英雄了。"王呷了

口酒，吃了块薰鱼，又一针见血地说，“实际上，杀张宗昌者，韩复榘也，你不过是个代名者罢了！”

“你，你……”郑继成闻言，弹簧似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

“别激动，听我慢慢说。”王慰南放下筷子，慢条斯理地说道，“首先，张宗昌经过石友三防地时，石宴请他，偏偏要走了他那支防身的手枪，难道石友三会缺一支左轮吗，这不是变相地缴了张宗昌的械？这样做是为了全体送行人员的安全，也保护了你；第二，你连打两枪都没有打响，站台上那些军警竟然一个也不动，没有人来抓你，这不是事先已有吩咐吗？第三，法院的验断书上，明明写着张宗昌是被步枪打死的，而你当时拿的是手枪，这就是说，是预先埋伏在十股车道上的人开的枪。那么，除了韩复榘，谁会派人埋伏在那里呢？”

郑继成见真相被戳穿了，就尴尬地笑道：“老兄，这个你自然是最清楚的啦！”

第三十二章　拒 当 皇 帝

1928．8

——“日本人真请过我当皇帝，真请过我呀！”

——“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不好当得很哪！”

——“谁也没有想到，我张学良这么讨厌，那时，大家谁都以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呢。”

孽子孤城一稚儒，填膺大义抗强胡。
丰功岂在尊明朔，确保台湾入版图。

这是我以前写的一首诗。你看出我这首诗有什么意思没有？

不，我是在讲自己呢，是讲东北！是在影射东北！假如我

不是这样的话，东北不是就没有了吗？我与日本一合作，我就是东北的皇帝啊！日本人真请过我当皇帝，真请过我呀！而且向我申明了，当皇帝！

“哦，这事是谁干的?”唐教授惊讶地问。

就是土肥原干的，他搞王道论。

“他真叫你做满州的皇帝?”唐教授重复问道。

是啊！是做皇帝，做满州皇帝！

“啊，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汉公，这个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唐德刚教授感叹道。

已经把话说明了！为这个，我同土肥原谈崩了，所以我就知道东北不能了啦！

那时，他一直不让我同中央合作。他说，你来当东北的皇帝，我日本捧你，我日本帮你。

那个时候，日本在东北奉天负责任的是秦真次，那时他们叫‘特务长官’。我把秦真次找来，我要他换顾问，把土肥原换掉。

土肥原本来不是我的顾问，他是北京政府的顾问，跟着我父亲回到奉天，接着就当上了东北的顾问。

我为此事跟他火了。本来，日本二十一条上订的，奉天的军人要有两个顾问，一个上校，一个上尉，一定要请日本人。我就跟秦真池说，我要换人。他说你没有这个权，要不要顾问，这是日本政府的权啊。这可把我气死了。我这个人啊，我这个怪人，事情都是这么惹出来的。我说，好，我没权，可他是我的顾问，我没权换，那好，但我有权不跟他见面，这个权我总该有吧！我就告诉我的副官，我说，土肥原顾问随便哪个时候来，我都不见。我说我可以不见他，我不见土肥原的面！你是顾问，但我不跟你谈话！

后来日方让步了，前来商量说，那你想要谁当顾问？这下

子问题大了。听说后来日本人把这个人枪毙了。有一个日本军人跟我很好，我就挑他。他是一个空军，是中佐，后来他就来当了我的顾问。当顾问不要紧，我们相处得都挺好的，后来我问过不少日本人，他们都不知道他的下落，反正九一八事变后，他回去了，不久，日本就把他关起来了，后来听说把他枪毙了。

我辞掉顾问没多久，秦真次调回日本去了，土肥原又回来当上了特务长官。哎呀，这事情可糟了，我晓得这问题大了，他回来当特务长官，那就是升官了，这东北的特务都在他手里头。我就知道要来事了。我这个人脾气坏得很，当年脾气更坏。

唐德刚教授对张将军说："汉公，你这个事太重要了，我现在要写一篇论文，谈中日外交关系。当然，中日外交太大了，我仅写奉日关系，正好可以用一用这些史料。"

说起我的日本顾问，我手下的第二个顾问名叫柴山，他跟我说，这些事啊，不但不是中国之福，也不是日本之福。

怎么个事呢？让我先说说这么两个人，他们是日本关东军的一个武官，还有一个是关东军司令部的文官，这两个人跟我都很要好，都想把事情解决。这两个人的名字我现在都说不出来了，但那时很熟，有事我都跟他们讲。那时，东北大连、旅顺的租借条约都已经期满了，我就想收回，可日本强硬派武官跟我讲，他说，我们日本有句话，那个城是我们用箭射来的，你要拿回去，你再给我用箭射回去。

我说，我们中日之间的问题不解决，总是个大问题，那些怀有野心的日本军人就想把中国给吞并了，把中国给灭亡了，可是你们这些有知识有远见的人，我想可能并不是这样想的。

我说，大连、旅顺，我们实际上是收不回来的，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收回来，我们仅是名义上收回来，大连、旅顺都是你

们日本人的，只不过说主权是我们的，而事实上是你们管。我们还可用一种地方上选举的办法，选举出当权的人，就让他来管理。

谈到拒当皇帝，拒见日本顾问时，张将军又就当时畸形发展的日本政局的情况，向唐教授发表了自己的一些见解。

我再说点儿。日本头一任驻奉天的大使，那个总领事名叫林久治郎，在他的领事馆里，我们差不多谈到晚上十二点。他说，我回东京后，一定先把东北的问题解决了。那时，我们俩谈得很好，他回去后，听说在旅馆里自杀了，或被什么人打死了，详细情况不清楚。所以，我就知道，这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到了这地步，不祥之兆就来了，它自己就把日本给毁了。这事哪能这样办呢？谁要说点什么，就会被打死。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就说林久治郎这个总领事，我跟你说个笑话，他后来办交涉，来送文件，他对我说，你先别看，我走了以后你再看，我把它先放在这儿，我是外交大臣，我奉命而来，咱们扯扯淡，我把东西放下，咱们先谈点别的。你先别看，看了肯定会和我吵嘴，咱俩别犟劲，回头，你爱怎样答复就怎样答复。

我就说，日本人不都是那么坏，他也真是没有办法。他跟我讲，他说的话也是真话，他说，我们那些特务呀，都昏了头了。我说这怎么讲，他说，他们什么材料都收买，向那些情报贩子买。他说，我告诉你，我这个总领事馆里有一个副领事，是专门管情报的，你猜他的经费是多少？他的经费比我总领事馆的经费都多，他有十万元的特别费，他说他的开销就是买情报，甚至你废纸篓里的废纸他都买。那些军人特务头昏了，那真的假的，不管什么玩意儿，他们都相信。日本人说曾颁给我一个勋章，是总领事给我送来的，说我拿起勋章就摔地上了，其实哪儿有这事！这是谁给的谍报，我就不知道了。

"汉公，有人说，如果你不易帜，不跟中央合作，你自己独立的话，中国的情况反而比较好，东北反而可能保下来啊，你当了皇帝，那东北就不会被日本吃掉了。"王一方在旁边，忍不住插问了一句。

"你也真正独立不了，"唐德刚教授接着回应说，"溥仪就无法独立。"

如果当了那个皇帝，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傀儡了吗？你大概还不懂的，如果那样做，我们就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了，日本人要怎么办就怎么办！

"可是你有实力呀，"王一方说，"你东北很大呀！"

说这话的人很不懂情理。我为什么责备你不懂情理呢？那么我问你，我父亲是为什么死的？我先问你，为什么日本人要炸死他？

"因为他不合作嘛。"王一方回答道。

他就是不给他们当傀儡！你要做，你就要当我的傀儡。日本要干什么，他要对你好吗？他要侵吞你呀！我后来跟日本人说，我跟日本人说笑话，我也有日本好朋友，我说，你们日本人不能够叫人家跟你合作。我说一句笑话，说好像你偷我老婆，你不吱声，咱俩也就算了，可你还要夸口说那小子的老婆跟我睡觉了。你们日本人就干这种事，你跟他呀，那傀儡还得当得像个傀儡样。你要知道，给日本当傀儡，不好当得很哪！

"有人说，大帅要在的话，他是不会跟中央合作的。是这样吗？"王一方问。

那不一定！有人问我这话，也有道理。那时候我父亲回到奉天，他要怎么做，那不知道。我说日本人混蛋，也许那时我父亲比我容易操纵，操纵我父亲，也许比操纵我容易些，他们没有想到我这个家伙是这样的，他们原以为我很容易操纵。我现在九十多岁了，我也不再做政治的事情了，我才愿说这句

话。谁也没有想到，我张学良这么讨厌，那时，大家谁都以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呢。

日本人策动张学良搞独立的阴谋破产后，并不甘心，他们又猛下赌注，极力阻挠东北归顺南京国民政府。

在张作霖被炸死后一个多月，东北当局宣布治丧的时候，日本政府就派了一个侵略中国的老手，有名的中国通林权助作为吊唁专使来奉天致祭，其目的就是策动独立，变东北为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独立王国。

在一次餐会上，张学良与林权助你一枪，我一刀，较量了数个回合，双方争论随即趋向白热化。

“帝国政府对于南北妥协的反对意见，业经屡次传达，想必贵总司令已有了解。总之，帝国政府目前认为东三省如与内部统治尚未健全、加之仍然具有共产色彩的国民政府妥协，则势必会侵害日本在东北的既得权利与特殊地位。倘若东三省蔑视日本之警告，擅自悬挂青天白日旗，则日本必具强固决心而采取自由行动。务望决心行所当行，不要为浮言所影响。”餐会上，林权助咄咄逼人地说。

我从容不迫地回应道：“林特使与林总领事屡次给予我个人的忠告，固作感谢；然而对于林总领事的发言，实在难以缄默。我是中国人，所以我的想法当然是以中国为本位。我之所以愿与国民政府妥协，是要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人民所渴望的事。我因顾及今后的邦交，在个人立场上，对于日本的警告会加以考虑。但是，倘以国际关系而论，想必日本政府也决不会甘冒干涉内政之嫌。同时，对于日本政府以种种恐吓之意反对中国实现统一，我颇为不解。”

我的决心，是以东三省人民的意志为依归，我不能违背东三省民心而有所作为。

“田中首相已经有了决定。贵总司令如果拂逆田中首相意

志，将会发生重大事态。”在座的佐藤安之助威胁说。

“令尊和我是好朋友，我把你当做自己的子侄，因此，我要奉告你：你的想法是很危险的！”林权助竟然以父执辈的亲情来打动张学良。

“我和日本天皇同庚，对于阁下的回答，就是这些。”张学良冷冷地回敬说。

最后，黔驴技穷的日方代表竟指手划脚、以强硬的口吻对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你挂旗！”

“你这是什么意思？”张学良听后勃然变色，厉声责问道。

见此状况，林权助打圆场说：“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更好的地位吗？”他接着又说，“希望你不要急于和他们来往。”

八月九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提出对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我方力有不足；软化则东省将会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

张学良迫切希望抵制日本压力，拒绝独立，早日易帜，为此，他派邢士廉偕方本仁南下。八月十八日，邢士廉抵上海后答记者问时说：“东省为慎重措置及免除济案同样之事件出现起见，对易帜乃稍缓实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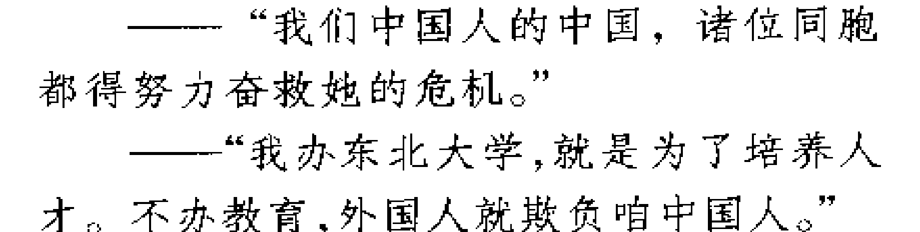
张学良提出的“外交上的办法”，就是希望国民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野心要有充分的警觉，同时，还应尽可能地解除日本对东北外交上的压力。这是张学良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最愿意易帜的重要因素。

自少年时代起，张学良就憎恶日本军阀在东北为非作歹；主政之后，他拒当皇帝，坚决反对搞所谓的东北独立。他旗帜鲜明，立场坚定，热切渴望中国早日统一。简而言之，他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拥有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张将军的机要秘书曾一语道破了一个谜底，他说："张作霖名为大元帅，实际上既是'东北王'，也是当时中国政府的'元首'，他的墓在当时完全可以称'陵'。为什么没有称'陵'呢？这是因为张学良一直反对他父亲称'王'。张作霖生前曾对张学良说：'你将来要做李世民。'张学良反驳说：'时代不同了，你不是李渊，我也做不了李世民。'皇姑屯事件发生后，张学良将军比照'孔林'，决定把萨尔浒陵园定名为'元帅林'，这便是称'林'而不称'陵'的缘故。"

第三十三章　兴 办 教 育

1928.9



——“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她的危机。”

——“我办东北大学,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不办教育,外国人就欺负咱中国人。”

——“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

“现在敝人在名义上虽然是大学校长，然而我在学问方面，却是非常的幼稚，尚未受过大学教育。在年龄方面也与诸同学相仿，所以，我对于大学校长的位置，很有抱愧的地方。而保安委员会曾以余之地位，推以本大学校长的重任，这不过是勉强而已。所以，我很不愿与诸同学称为师生，不过同学罢了。我很愿嗣后时常到校与诸同学接触。至于校长、学生，不过是名义上的问题罢了。

“学问方面更是重要，好的要特别奋勉，劣的要极力改善。现在我们中国正在风雨飘摇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的中国，诸位同胞都得努力奋救她的危机。

“方才我说现在中国需要人才，不是指大人物而言，恐怕大人物多了，不但国家不能富强，反倒要乱。我说的人才，是指专门人才而言。他学的是工，就要作工，学的是农，就要作农，不要存着当官的心理，然而现在中国的学生，如果试问他们毕业后的事业，他们都说要为国做大事业，那么，岂不是就要重开争端了吗？所以，专门人才要作专门事业。

“我很希望大家，将来处身社会，要本着自己的人格，拿在校时的热心来处置社会，拿从前批评旁人的话来整理社会。人人如此，则社会国家就没有不富强的道理。”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出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诚恳地对学生发表演讲，他语重心长，侃侃而谈。

自张作霖时代起，办学也是东三省与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的一个侧面。

日本视东北为殖民地，认为东北不需要办大学，胡说什么东北学生如需要读大学，可进日本设在东北的大专学校，东北没有的科系可去日本读，一心想把东北教育弄成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模式：只有普通教育，而无高等教育。

可是，张作霖没听那一套胡言乱语。一九二三年，在奉天省长王永江的建议下，张作霖办起了东北大学，由王永江兼校长，年轻的张学良也以当局代表身份参与东北大学的创建。

“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

“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如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



一九二八年八月，张学良就任东北大学校长。

“中国惟一希望，在青年；青年之根本，在教育。”

这是张学良当年诸多精辟见解中的一部分。基于这种认识，张学良执政后，对东北大学的新生倾注了大量心血。

东北大学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我父亲去世后，我在东北负责任的时候，我想用父亲留下的遗产办教育，办教育就要办一个大学。东北大学听到了这个消息，就说，我们东北大学也很需要钱，你把钱捐给我们，把东北大学好好地扩充一下该多好，何必再另起炉灶去办一个大学呢？这样，我就把这钱，大约三千万都捐给了东北大学。东北大学后来请我当校长，我这校长，老实说，就那么回事。

我办东北大学，就是为了培养人才。不办教育，外国人就欺负咱中国人。

为办东北大学，我本人先后捐款近二百万元，实在是费了好多心血。



张学良一九二九年为东北大学校刊题词。

东北大学原为南北两校。南校为文法学院，在市内大南关原奉天高等师范学校和文学专门学校院内；北校为理工学院，在清昭陵南、新开河北。两校相距甚远，工作多有不便。

一九二九年初，张学良决定将两校合并，并增设教育学院，以留美博士李树棠为院长。但建筑房舍需款甚巨，省库负担困难，张学良慷慨捐赠私款大洋一百万元。五月，张学良又捐助三十余万元，集资兴建罗马式体育场。稍后，为扩大和建筑图书馆、试验室，张学良又拿出五十余万元，前后共捐款一百八十余万元。

同年夏，北陵新校舍落成，南北两校合一。新建的文学院称汉卿南楼，法学院称汉卿北楼，教育学院在西面，理工学院在东面，附属中学留在南校。

为办好东大，张学良招贤纳士，广揽人才，加强师资。他不惜从全国十几个省重金礼聘专家学者，章士钊、梁漱溟、刘仙洲、梁思成、黄侃、罗文干等纷纷应聘来校，讲学授业。当时，学校经费充足，教职员待遇优厚，一般的教授月薪四百元大洋，少数人竟高达八百大洋或八百两白银。

张学良任校长之初，增设了一名副校长，由私立民国大学副校长刘凤竹充任；增设了一名秘书长，以边业银行总稽核、留美学生宁恩承充任。

张学良身兼数职，工作繁忙，但仍坚持深入学校，接触下层，经常到东大视事。他除研究解决教学、总务等方面的问题

外，还经常深入各院、系，与师生亲切交谈。每至盛夏或公务之暇，他便轻装至校邀学生打球，有时还在别墅设茶会招待全体教授，以增进联络。

东大对学生的要求是知行合一，全面发展。既要学习好，身体好，还要能实践，有爱国思想。张学良主校期间，主张实施德、智、体、群、美五育并重的办学方针。

"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进国家现代化，而消弭邻邦的野心。"这是张学良明确强调的东大办学目标。

在东大激昂慷慨的校歌中，也有"痛国难之未已，恒怒火之中烧"，"唯卧薪而尝胆，庶雪耻于一朝"等充满斗争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感的豪迈词句。

在旧中国，"孔孟之道"占统治地位，"男尊女卑"思想相当严重。那时，女子上中学的很少，读大学者更是寥寥无几。张学良任东大校长后，决定每年招收一定数量的女青年入校学习，给予妇女以研求高深学术之机会。一九二九年九月，东大各系共招收女生五十余人。此一别开生面之举，体现了男女地位之平等，首开东北高教风气之先。

张学良主校期间，东大生机勃勃，当时在校生达三千人，超过北大一千人，教职员工达四百名，各项指标均在国内称冠。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炸死张作霖后，气焰日益嚣张，屡向张学良提出无理要求，皆为张学良拒绝。日本人的行径也激怒了东大学生。一九二八年十月，东大学生拟掀起抵制日货的示威游行。张学良闻讯后，驰往南校图书馆召集学生训话。

"我先说个譬喻。一个富翁死了，留下一个孤儿，才只有七八岁。他的邻居是恶霸，占去一些良田，又抢走了他家的财物。他无力抗拒，气忿得要死，但他觉得徒死无益，姑且忍气吞声，等长大了再说。十年之后，他长大成人，身躯强壮，比那恶霸有力气了，就夺回比原来失去的更多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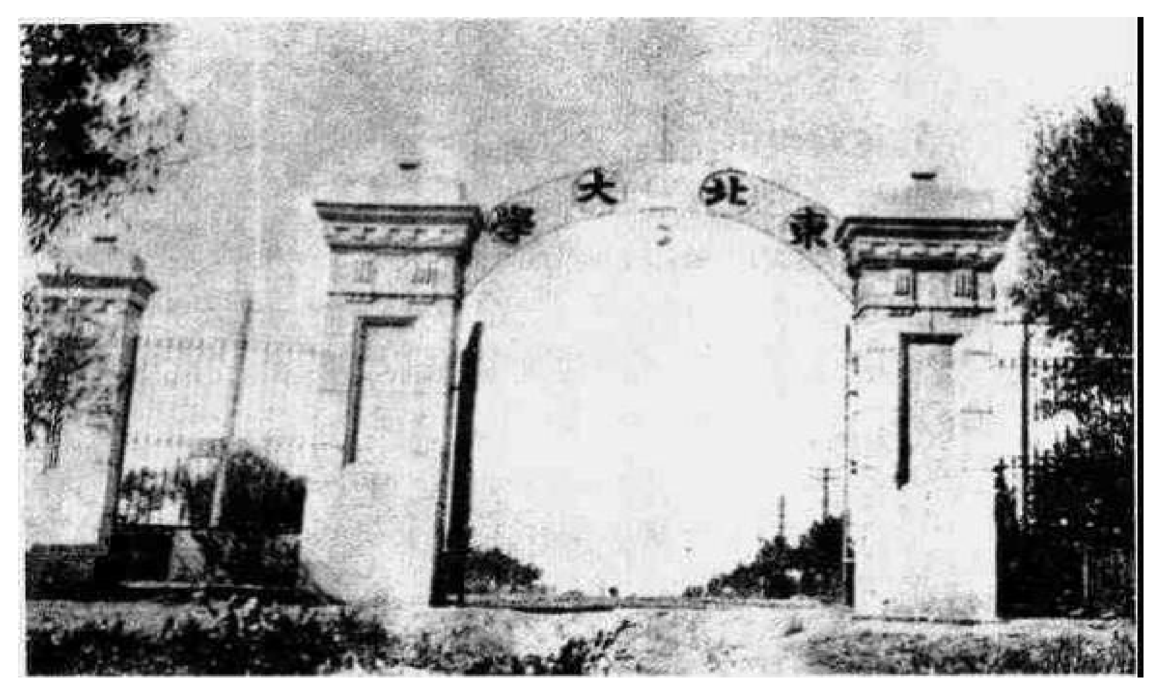
张学良在讲演中打完比方之后，便单刀直入地说："你们痛恨日本鬼子，要游行示威，我有杀父之仇，更是不共戴天。可是，我们正像那个孤儿一样，现在打不过他，闹出事故，他要借口来屠杀。千金之躯不死于盗贼，我们记住仇恨，发愤图强，绝有报仇雪恨之日。我天天碰到恼人的问题，但我张学良决不卖国！它若逼我太甚，干不了的时候我不干了，也决不屈辱投降，甘做卖国贼，致贻后世之讥。但愿有朝一日，把它压倒，消除心头之恨，死而无憾。前几年先大元帅叫我到日本观操，我在横须贺看过它的海军军舰、水上飞机和潜水艇。群机狂飞，多艇跃水，显然是对我们示威。我不能为它张目，可是它的一切军备现在都强于我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必须长志气，卧薪尝胆，急起直追。以我东北之大，奚啻天府之国！整军经武，励精图治，几年后就有越王诏吴的力量，痛饮黄龙，欢歌将代替怨叹。大家不但要长期抵制日货，更要群策群力，致国家于富强，不受外国的欺侮。"

彼时，张学良年仅二十八岁，其看问题不见得能切中要害，亦不见得能入骨三分，但他那韬光养晦，积蓄力量与日本入侵者争斗的决心，言词之间显而易见。

张学良主政东北时期，对东大历届毕业生，皆厘订姓名、年龄、籍贯、职务、常识、能力、品行、操守、言谈、气度、志愿、体格、生活等十二项内容，分函各机构的首长，据实密报，作为考核的资料。对于条件较优者，则倍加勉励，并随时予以提拔。

对毕业生中的高材生，如文法学院的陈克孚、白世昌、应德田等，理工学院的崔九卿、沈启巽、李酉山等，均给以公费，送往美、英、德、日等国留学深造。

"东北大学之所以突飞猛进，发展迅速，主要是钱，这应归功于张学良和张老帅。"原东大校长宁恩承回忆说，"在我经



东北大学正门。

手的时候，我们学校在全国大学中经费是最多的。我们每年有经费一百六十万，而清华大学每年仅七十万。”

张学良除重视办好东北大学之外，还以私资兴办中小学。早在一九二五年，张学良为提高军官的文化素质，便在东山嘴子军营内，辟出一部分院落为校址，开办了同泽中学，招考初中学生两个班，计一百零四名。学生学习的内容，有国文、数学、英文、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美术、音乐、体育等。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同泽中学瓦解，学生纷纷考入他校就读。可是，当事件平复后，他又大力着手予以恢复。

一九二八年，张学良深感女子教育不发达，又兴办了同泽女中。

同泽中学的体制，是董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李静澄负责对外筹款和扩建校舍的工作，学校得以不断地扩大和充实；校内事务由刘申光教务长负责。学校的组织机构有：教

务处、学监处、舍务处、医务室、体育处、总务处。学校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同泽中学从建校之日起到一九三一年，学校的班级已从初一发展到高三共六个学年。全校共有十四个班级，学生约有六百人。

教员的教学方法，采用自学和辅导相结合的方法，培养学生自学能力。学生成立自治会，制定自治条例，纪律严明。学生操行由学生民主评定，由学校通知家长，收到了良好效果。学生学习勤奋，自治力强，校风要比一般学校正。

与此同时，张学良还以私资兴办新民小学。新民小学最初是于凤至于一九二七年捐款在家乡大泉眼屯兴建的，后来，张学良在辽宁各地共办了新民小学三十六所。

新民小学的学制分高等和初等两级。高等学制二年，初等学制四年，由初等升高等时，必须经过考试。

张学良办学是多层次的，不仅兴办大、中、小学校，还办了多种职业学校、成人学校。一九二七年，他曾经面临“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去”的窘境，遂又尝试革新行政管理，办了同泽新民储才馆，招收大学政治、法律系毕业生，学习一年，目的是培养文武兼备的新县长。一九二八年，他又在奉天办司法、警政班。此外，他还对北京民国大学、陆军大学、南开大学等给予资助，积极开展校际之间的交流和往来。

在张学良主政的三年多的时间内，东北教育事业兴旺发达。以辽宁为例，一九二九年各级公私学校共一万零四百零四所，比上年增加四百所，在校学生六十四万多人，比上年增加了二万多人。同年，吉林又兴办了吉林大学。而在蒋介石把持的国民政府管辖区内，教育连维持原有规模也殊为不易，钱都去填内战的枪炮口了，因欠薪而罢教的风潮此起彼伏，这与东北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张学良在东北培养了不少人才，海峡两岸的知名人士有不

少是出自东北。特别是自一九三五年起，团结在张学良身边的大批主张联共抗日的文武官员、热血青年，绝大多数是由东北培养成长的俊才。

一九三〇年元旦，张学良将东北大学和男女同泽中学的学生代表召集到北陵别墅，举行迎新联欢大会。

在别墅门口，有一位青年儒生，头戴针织绒帽，身着青布制服，足登轻便棉鞋，笑容可掬地站在那儿，迎接着一批批客人的到来。他，就是东大校长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与同学们互致问候。

为筹备元旦联欢会，张学良拿出相当数量的私款购买纪念品，并对别墅进行了装饰。别墅大门口两侧新做了个大彩箱，进门的学生们，人人都可到彩箱处抓一张彩票，当场开奖领取纪念品。别墅内新搭起了大席棚，新砌了十几处大炉灶，以便生火取暖。游艺室、舞厅、滑冰场等都做了精巧的安排。在席棚的前边，还特意塑了两个高大的雪人，表示对来宾的欢迎。

代表中间，有一位东大学生同张学良认识，张学良握住他的手说："你今天来了，我很高兴，我还以为你回家探望你老爹了呢。那么，明天你可要回去看看老人家呀！"

"校长邀请，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听校长的话，明天一定回家看我爹。"那个学生红着脸，感激地说。

其他来宾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都投来惊奇的目光。张学良介绍说："这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不打不相识嘛，他是向我提意见时，我们相识的。"

原来，有一次郊游散步，这个学生碰到了张学良，卫兵老远就吆喝学生走开，张学良挥手制止卫兵，并招呼这个学生到跟前来，这个学生朴实地回答了张学良的问话后，又反过来向张学良提出了问题。



一九三一年三月，张学良向同泽新民储才馆司法班毕业生颁发证书和奖品。左立者为教育长孔昭焱。

“校长，咱们的部队在外县驻防，可以占用农民耕地做操场吗？”

“不可以！你说说是哪个县？”

“法库县。”

“告诉我详细地址和部队番号。”张学良递过钢笔和记事本。

这个学生写完后，又低声说：“占用的就是我家的地。我家几代都是穷人，都是靠那屁股大的地方过日子，我爹也是靠这块地供我上学哩，部队占用做操场，我家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校长，如果我家地多，我决不向你说这个话。”

张学良安慰他说：“你提的意见好，我要感谢你。”

不几天，这个学生收到父亲的来信，说部队已把地退还了，还道了歉。

现在，这个学生又同张学良见面了，学生为张校长能为老百姓着想、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而感激，张学良为学生能帮助部队纠正错误、改变作风而高兴。

"快，你抓个彩票，祝你好运气！"张学良对这个学生说。

这个学生伸手抓了一张，打开一看，嘿，一台照像机！

联欢会开得异常热烈，鼓号嘟嘟哒哒响，鞭炮噼噼啪啪鸣。张学良亲自放留声机给大家听。中午，有大肉包子招待。傍晚，师生集合在别墅大楼前面，张学良立于楼台上讲话，他勉励大家好好学习，锻炼身体，爱国反帝，建设中华。师生们报以阵阵春雷般的掌声。

"大好河山夕照中，国人肩负一重重。男儿正要闻鸡起，一寸光阴莫放松。"在联欢会上，张学良即席赋诗赠诸同学，与之共勉。

东北为满族的发祥地，沈阳是清朝的故都，古代史书文籍珍藏较多。但因频年战乱，书籍残缺不全，极需修整。张学良虽为武人，但对文化极感兴趣，十分重视古代文化典籍的保存与修整。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奉天省政府决定开馆续纂《盛京通志》，推张学良为总裁。十二月，省政府又决定设奉天文溯阁《四库全书》校印馆，张学良又任总裁，并拨款二千万元作为开办费。张学良还为此发出《致世界各国电》和《致全国各界电》，以壮其声势，扩大影响，引起各方面注意。

张学良在电文中指出："世界学者所震惊、独一无二、最伟大、最完备之《四库全书》，现已着手印行，公之世界矣。论此书之伟大，则全部三万六千二百七十五册，计二百二十万页；论此书之完备，则自中国始有文字以后，至清代乾隆四十七年以前，中间包括五千余年所有历史、民族、社会、政治制度、宗教、天象、地域、物产、文艺、哲理、美术、医算、农



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前排右三）与校务委员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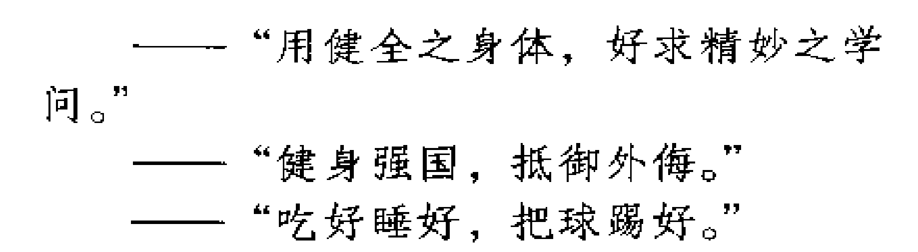
工、商矿及百家杂学等，一无所遗，内容丰富，无可比拟。今学良等为发扬东方文化，使世界学者便于研究起见，深认此书印行之必不可缓。”

张学良不仅关心史书的整理和文物的保护工作，还十分重视和爱护知识分子。早在清朝末年徐世昌任东三省总督时，著名历史学家吴廷燮随徐来东北，曾花费了很大功夫整理《明实录》。张学良主政时，为表彰吴廷燮的治学精神和功绩，曾赠给他一笔巨款，以资鼓励。

张学良器重人才，延揽人才，热心教育，倡导文化，为发展东北的文教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十四章 倡导体育

1928.9



“我今天所欲与诸位说的，首先是提倡体育。说起来，中国的体育界，大多数不甚注意学校中的体育，因此，学生多失之软弱。我很希望本校关于体育方面要特别注意，然后，用健全之身体，好求精妙之学问。所以，体育是不可轻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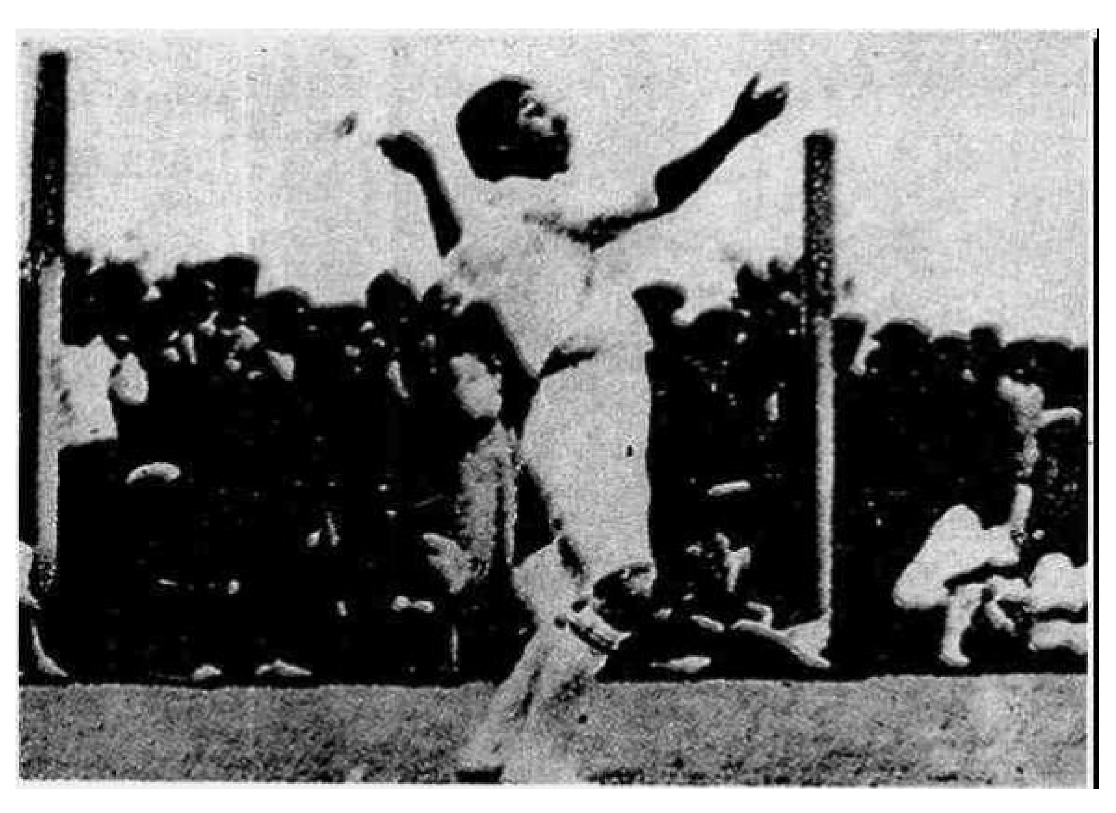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四日，张学良在对东北大学学生的训话中这样说道。

张学良素来爱好体育。他既是运动员，又是体育事业的支持者和组织者。早在一九二一年，在张学良的倡议下，当局便在奉天小河沿修建了第一座新式体育场。主政之后，他曾在东北举办多次运动会并亲临主持。在国内各项体育比赛中，东北



张学良与于凤至在高尔夫球场。

故取得了不少好成绩——[illegible]



一九三〇年夏，张学良在校园参加学生球赛。

郭效汾老人回忆说："张学良校长曾经说过：'健身强国，抵御外侮。'他也常引证谚语'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之中'来说明体育的重要意义，鼓励大家从事体育运动。他本人也爱好运动，他打得一手好网球。记得旧中国著名网球家、东南亚网球名手林宝华曾应邀来沈阳表演比赛，在东大网球场，张校长还和他对打了一场，虽然没有获胜，技术上也还有相当距离，但能周旋几十个回合，应付裕如，看出是有一定水平的。张校长也爱打高尔夫球，还善于骑马、开汽车、驾驶飞机等，常见他出席各种大型运动会，担任大会会长、名誉会长，或者讲话发奖，有时也参加运动。"

现在，美国国会还珍藏着一盘张学良同太太于凤至女士及儿子们打网球的录相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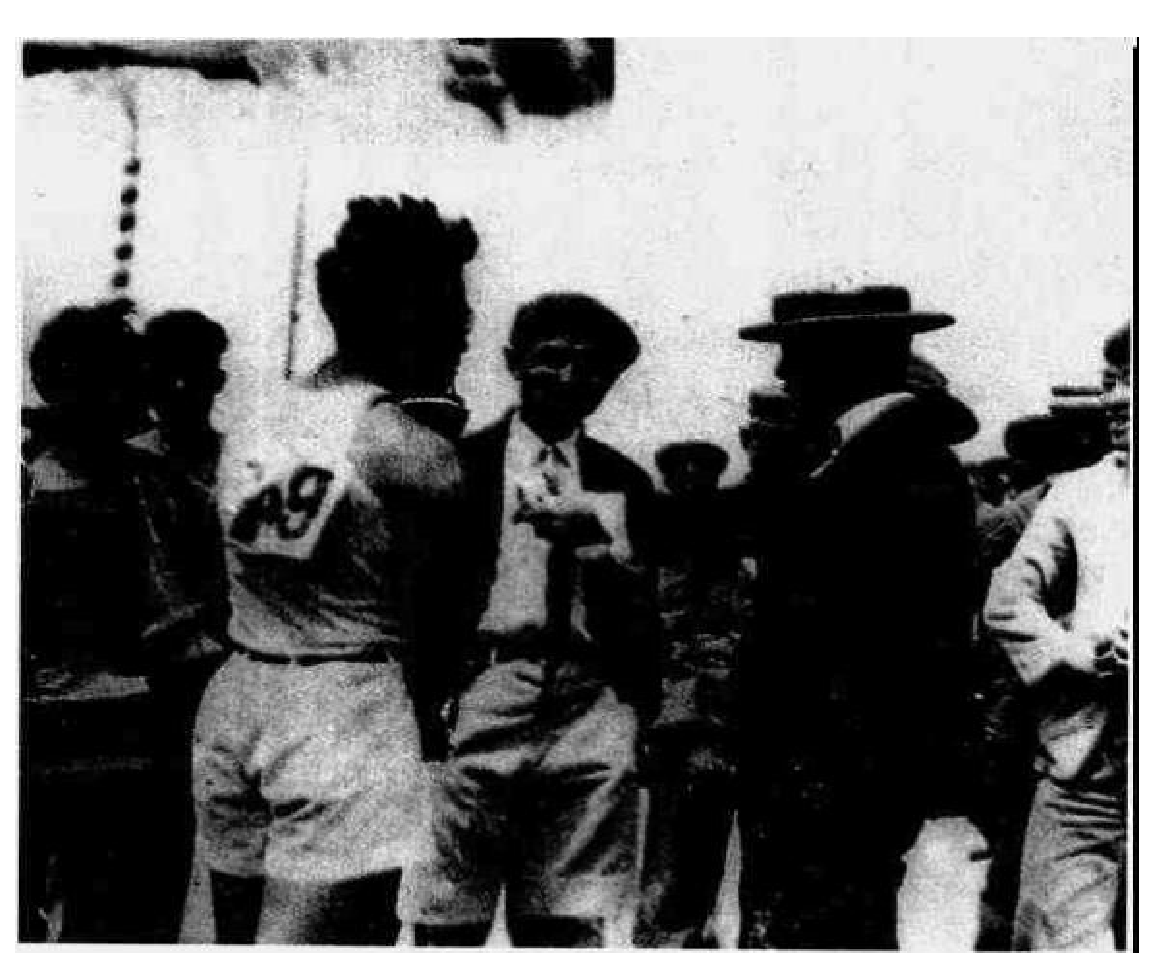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十月，东北四省运动会在沈阳举行，张学良亲临大会并致开幕词。

张学良接任东大校长后，很重视体育运动。当时，东大的体育在全国各大学中名列前茅。特别是一九二九年春，新建的现代马蹄形体育场落成，除容纳全校师生外，还能容纳大量校外的观众，这在当时全国也是首屈一指的，它的建成，对东大体育运动的发展无疑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同年五月，第十四届华北运动会在东北大学运动场举行。张学良身为运动会会长，曾亲自下场参加跳远比赛。

一九三〇年，张学良又选派一百二十三名优秀选手组成东北体育代表团，赴杭州参加全国第四届运动会。在男子十九项



张学良（中）在东北四省运动会上。

比赛中，东北运动员得六项第一；其中，东大体育系学生、短跑名将刘长春独得三项第一，成为轰动全国的新闻人物。杭州市政府为庆祝他取得的好成绩，把一条通往体育场的大路改成了长春路。哈尔滨市女选手孙桂云一人独得两项第一，杭州也把一座桥改名为桂云桥。

不久，为支持东北这两名男女选手代表国家参加远东运动会，张学良慷慨解囊资助三千大洋。他高兴地说："刘长春和孙桂云是东北的光荣，也是全国的光荣，我们能培养出这样的名将来，该多么骄傲！"

为了进一步培养出尖子运动员，尽快提高整个民族的体育运动水平，张学良还把日本、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最优秀的运动员请到中国来，同中国运动员一起进行比赛，让中国运动员学习人家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和要达到的目标。

闯东京，赴大阪，战京都，东北大学第一次派运动队出国远征，就是张学良资助成行的，他还请二弟张学铭在东京妥为联系安排。

这次，东大派出的足球、篮球两个代表队，在日本东京、大阪、京都等城市进行了友好比赛。足球共赛五场，二胜二负一平；篮球共赛四场，三胜一负。这次跨海东征，东大运动员以异军突起之势，扬名海外，为国增了光，日本体育界对此颇为震惊。

一九三一年一月，沈阳市举行冬季篮球锦标赛，以体育系学生为主组成的东大队战胜劲旅冯庸大学队，夺得冠军。此时，张学良踌躇满志，决定拉队伍到上海去碰碰硬。

当时，上海最有名的篮球队是美国军舰"麦令斯号"水兵队，号称"海贼队"，久霸上海篮坛，中国人憋气在胸，但每次都无法击败对方。对东大队的到来，人们也不抱多大希望，不少人直摇头，并再加上一声长叹。但在比赛开始后，面对人高马大的"海贼队"，东大队员个个红了眼，猛打猛冲，智夺智攻，竟然奇迹般地打败了"海贼队"。

第二天，《上海时报》头版头条的红字标题是"争看东北捉海贼"，下边的小标题是"东北大学篮球队，昨晚在中华篮球房中，以三十七比二十一分，打败称雄上海之海贼队，吐气扬眉，为华人争光"。

海贼队队长输球后，幽默又无可奈何地对东大队队长说："这场球我们输了好，你看，不是有那么多中国人为之高兴

吗?"

的确，赢球后，上海观众欢欣鼓舞，把东大队员团团围住，高高举起，大家不断地说："打得好，打得好，打出了中国人的脸面!"

"九一八"后，东北体育界人士在张学良的支持与资助下，成立了"东北体育协进会"，组织东北四省的体育代表队，参加全国运动会及华北运动会，以期让国人知道，东北三千万同胞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于日寇铁蹄之下，呼吁全国团结起来，收复东北。

一九三三年，第五届全运会在南京召开，当东北四省代表队高举着大旗进入会场时，全场鼓掌欢呼，群情激昂。

比赛中，刘长春的百米跑创十秒七的全国最高纪录。其纪录保持了二十五年之久，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才被新一代的运动健儿打破。

之后，一九三三年在青岛举行的第十七届华北运动会、一九三四年在天津举行的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一九三五年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都有东北四省代表队参加，均获佳绩。

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开幕时，当东北四省代表队进入会场时，主席台对面摆出"收复东北"的大字标语，引起全场一片掌声，群众高呼"打回老家去"等口号，群情激奋。这个场面大大刺激了日本驻津总领事，他提出抗议，要求取消东北队参加比赛的资格及所谓的不友好标语口号。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对此根本不予理睬，日本总领事竟以退席来要挟，但他也只能是"退席"而已。

日军占领东北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张学良仍念念不忘体育事业，不忘创造了好成绩的运动名将。

一天，张学良看到报纸上登载"满洲国"派刘长春、于希

为代表参加第十届奥运会的消息，他又着急又惋惜，不住地用手拍自己的脑门。

几天后，刘长春在《大公报》上的声明："我是中华民族黄帝子孙，我是中国人，绝不代表伪满洲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张学良读罢，激动地说："好样的，好样的！"

经过一番波折，张学良终于找到了刘长春等人，他立即宣布："刘长春、于希为运动员，宋君为教练，组成代表团，代表中国参加第十届奥运会。"

对此，南京政府不予支持，张学良毅然拿出八千元现洋作经费，送代表团赴美国洛杉矶。结果，刘长春作为一名中国运动员，在世界体坛盛会上高举着中国国旗出席了奥运会的开幕式。

一九三四年春，张学良从意大利考察回国，蒋介石任命他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这时的东北大学仍由他兼任校长，为了祝贺校长回国并任新职，东北大学决定派足球队南征武汉。

"我们初到武汉时，在去晋谒校长之前，听说他很忙，求见的人又多，有的人一等就是十天半月，我们很为难。"球队教练回忆说，"可是，又有人说张校长重视东大师生，凡是求见的，不用等候，随到随见。记得去求见的那天，接待室里候见的人很多，还有一位穿将军服的军官也在候见，听说他叫米振标，过去做过热河都统，还当过什么总指挥，可是真对不起了，我们加塞啦。"

原来，张学良一听说东大足球队要求接见，马上热情接待。

"足球队还是前两年的人马吗？"当领队和教练汇报完毕，张学良关切地问道。

"对，基本没有动，水平有所提高。"



张学良与儿子在一起游泳。左为闾珣，右为闾玗。

“守门员还是田新元吗？后卫呢？还是外号叫‘疯狗’的小王吗？‘疯狗’可真有股疯劲，身体像块大门板，跑得快，拼命猛抢像只老虎。听说你们住的地方不怎么样，环境很乱，也睡不好觉，我这个校长对不起大家！不过我已经决定了，让司令部腾出一些住房，请你们马上搬进来。吃好睡好，把球踢好。”张学良不停地问着。

这期间，张学良为全体队员举行了一次便宴，宴后还同全体足球队员一起合影留念。

九月，素有“火炉”之称的武汉仍暑酷难熬。这天，长江两岸，汉口码头，彩旗飘扬，武汉三镇成千上万的人都挤在堤岸边、码头上，观看武汉有史以来首次横渡长江的游泳比赛。这是张学良驻节武汉之后，为开展群众性的体育活动，强健人民体质，亲自倡议并主持的万里长江横渡的壮举。

横渡时，如果有船只驶来，那将影响比赛，甚至发生危险，但如强令外国船只停航，同外国人发生冲突，又有可能产

生产重后果，怎么办?

担任比赛总裁判的武大体育系主任袁俊急忙将此情况报告了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在了解情况之后，果断地下命令说："停航！在比赛期间，所有船只都不得通航，外国船只也不例外，否则，一切后果自负。告诉他们，就说这是张学良说的！"

外国人见张学良亲自下了硬命令，只好乖乖地收敛起来，停泊在港口内。张学良的断然决定，使在场的人深感振奋。

比赛指挥台设在武昌黄鹤楼下，在排除了外国船只的干扰后，随着一声令下，运动员们踊跃入水，从黄鹤楼前横渡天堑，向对岸的汉口码头游去。参加者来自各行各业，有军人、学生、职员、工人。最后，武汉警备旅士兵、二十岁的鞠华祥一举夺得了首届横渡长江比赛的第一名。张学良在指挥台上，亲自颁发给他一枚刻有"力挽狂澜"字样的银盾，以资鼓励。

张学良好游山水，体育爱好也很广泛，网球、高尔夫球、篮球、游泳、骑马、射击、桥牌、象棋，样样涉猎，有的玩得很精。他也爱冒险，如一九二七年在保定光园试驾摩托车时，他一头扎入池塘，把在场的杨宇霆吓得说不出话来。

张学良也懂音乐，喜好京戏、大鼓等，他还很喜欢跳舞。对救亡歌曲，他推崇备至，尤喜《义勇军进行曲》。

在张将军的传奇一生中，体育运动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他，这也是他成为百岁世纪老人的秘诀之一。

第三十五章　床次风波

1928.11

——“咱们年轻人干得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

——“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封，派你去日本带给床次。”

——“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二百万，就是再多也可以。”

沈阳事变以后，日本占领军搜索我的住宅时，看见一个大铁柜内只放着两件小东西，他们感到很奇怪。这两件东西，一是一块银元，二是一张收据。

这张“收据”奥妙何在？

“九一八”日军进占沈阳后，一名日本军官率领数名日本兵如狼似虎地冲入大帅府二楼，抢先闯进张学良的卧室，目光突然集中在室内一角的一只保险柜上，他们忖度着，里面除了

大量的机密文件外，肯定还有许多金银财宝。

可是，当日本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保险柜打开后，偌大的柜内却仅有一块袁大头和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收到现大洋五十万元整”，具名是“赤冢、鹤见”，日期是“一九二九年九月”。

日兵睹此景况，大失所望，只得将这两件小东西作为战利品上缴。

以上情况曾见于一九三二年日本各大报纸，当时国内许多报纸也曾转载过。原来，那块银元是张学良占卜是否处决杨宇霆、常荫槐时使用的。而那张收据竟在日本政坛上掀起过一场轩然大波。

张学良东北执政一年多来，对日主要交涉，如对皇姑屯炸车案的追究、东北吉会铁路草约交涉、撤换日本顾问等等，大抵已告一段落，这时，东北与日本的关系比较正常平静。

“咱们年轻人干得也不错啊，他们还很佩服我们哩！”张学良经常这样爽朗地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床次事件”发生了。

日本政友本党是由政友会分化出来的、以正统派床次竹二郎为中心组织的一个新党派。床次原来是日本第一次政党内阁、政友会总裁原敬内阁的内务大臣，为当时政友会的第二号头目，人极能干，有铁腕之称。原敬被刺死后，国内外形势对日本这个具有浓厚保守色彩的政党很不利。民政党滨口登台后，政友会又失掉了政权。一个以争权夺利为目的的集团，一但离开了政权，最容易闹家务，政友本党的出现就是这样的产物。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日本在野党政友本党总裁床次携赤冢浓等人来华访问。床次等人先后在南京、北平会晤了蒋介石、阎锡山，最后来到沈阳，受到张学良和杨宇霆的隆重欢迎。当

时，床次年逾七旬，但仍精神焕发，谈笑风生，颇具政治家风度。

在和张、杨会谈中，床次极力攻击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他说："本人下决心率领政友本党，并联络民政党，共图打倒田中的军阀内阁，以便组织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的联合内阁，并且约定联合内阁成立时，当以本人为总理大臣。而本人此次访华的目的，即是向中国各方求得谅解，以便将来组阁执政时改善中日两国的邦交。"

床次还说："东北地方重要，国际关系复杂，而东北与日本的关系尤为特殊。"并力劝张、杨二人"和衷共济，顾全大局"。

可是，床次走后不久，便发生了"杨常事件"。

据胡俊老人回忆说："一九二九年一月十八日上午，我正在大帅府老虎厅隔壁的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外交处里办公，王家桢走进屋来对我说：'司令长官找你，叫你代表他到东京去联络床次。'我即随着他去见张学良。

"'前番床次来沈阳，曾吐露出他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因欲打倒田中义一的军阀内阁，已经与民政党联络妥当，约定把田中内阁打倒以后，由政友本党与民政党组织两党的联合内阁，床次出任总理大臣。'见面以后，张学良对我说：'床次并希望与中国合作，互相支援，当面又劝我与杨宇霆务要和衷共济，顾全大局。赤冢浓又是杨的好友。现在杨宇霆等因勾结白崇禧、李宗仁等欲图谋不轨，已被制裁。若不把这个事件的内情说给床次，取得他的谅解，不但要影响中日合作、共同打倒田中内阁的密约，而且必然会发生误会，将来若是床次内阁出现时，我们的对日外交将更加棘手。所以，我现在写好亲笔信一封，派你去日本带给床次。你见着床次，务要把杨、常的罪行以及我不得已才制裁他们的苦衷，说给床次等人知道，以便取

得他们的谅解。'说罢，即将他的亲笔信交给了我。"

胡俊在釜山下车，搭船到下关，再由下关乘火车前往东京。然后趋车拜访赤冢浓，向他说明来意。赤冢浓与床次联系后，约定翌日床次和政友本党的干事长在家中接见胡俊。

第二天，见面寒暄之后，胡俊即对床次转达了张学良的一番话，并把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他。床次把信看完之后，面显不快之色，遗憾地说："好吧，杨宇霆已死，现在不再说他了。张将军既愿意继续与我们合作，我们甚是欢迎。张将军既有亲笔信来，我也应当写封亲笔信答复。不过我的亲笔信，需要等候两三天才能写好。现有我的相片一帧，是送给张将军的，君先拿走。三天后，君同赤冢浓再来我家取信，届时我们还要畅谈一番。"

胡俊继续回忆说："过了一天，宁向南来到我的旅馆，把床次的亲笔信交付与我，并传赤冢浓的话说，'将来遇有必要时，床次总裁还要派人到中国与张学良将军接头'云云。我接过床次的亲笔信，真是高兴万分，翌日早晨即搭乘快车回国，于旧历腊月二十八日回到沈阳。我到家卸了行装，即时进城见张学良复命，把此行一切经过详详细细地向张陈说了一遍，并把床次竹二郎的亲笔信和相片交给了他。张学良对我此行甚感满意，慰勉有加。"

一九二九年初秋，两日本众议院代议员拿着介绍信来到沈阳。他们一个是赤冢，另一个是律师出身的鹤见，二人皆为政友本党的议员，是床次的心腹之人。

赤冢、鹤见来到沈阳，当然不是像表面上所说的那样，是来东北观光游玩的，而是怀有特殊的目的。据他们说，在这次日本第十七次大选中，无论从人心向背上说，还是从人物的号召力上说，都非政友本党莫属，并举了好些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们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那就是选举经费问题。

因为他们是新成立的政党，没有什么准备，所以感到经费特别困难。

“赤冢先生在东北多年，不但做过总领事，并且深得张作霖阁下信任，长期做他的顾问，东北简直是他的第二故乡。我党一旦掌握政权，日本对东北的事只有依靠他了。”鹤见向王家桢吹捧赤冢。

“鹤见先生是我们党里不可多得的人才。将来我们党掌握政权的时候，他当然是大臣级的人物呀！”赤冢也替鹤见吹嘘了一番。

据外交家王家桢回忆说：“两个人吐露了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筹集选举经费。我对当时日本政党的情形还比较熟悉，觉得他们的谈话有些夸张。于是，我就问他们：‘你们是自告奋勇来满州找选举经费的呢，还是奉了政友本党干事会干事长的命令而来？或是受了床次本人的委托而来的呢？’”

“我们是受床次本人的委托，并且干事长也同意这样做。”两人态度严肃地说。

“承政友本党和床次先生看得起我们，愿意和我们合作，那么肯定彼此能够对双方都有利益的事情作出各自的贡献。我愿意先代表张学良将军将这一点肯定下来。”王家桢慎重地说道。

接着，王家桢将此事的详细情况报告给张学良，在得到张的许可后，便和他们两人商谈细节。

赤鹤说：“这次选举只要能将政友本党系统的人选出九十人，床次先生就可以组阁，竞选经费大概需要四五百万元，希望贵方能负担三分之一。”

此数折合中国大洋约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

王家桢提出：“若是床次组了阁，日本在东北保有的不合理特权，如在商埠地及南满铁路附属地所设的警察，应该合理

地另行规定有限制的职权等。”

床次的特使说：“我们主要的让步是，日本允许将南满铁路公司逐渐改为名实相副的中日合办公司，像中东铁路公司那样。”

双方最后约定：在日本大选以前，由王家桢到日本面见床次，再恳谈一次。

“多少钱都可以，不用说二百万，就是再多也可以。”张学良听完王家桢的汇报后，兴奋地说道。

“我的意思是先给他们五十万元，其余的等我见了床次以后再说，因为床次所领导的政友本党在日本的声望，并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高。当然，我们能和日本的一个政党挂上钩，就是它现在拿不到政权，也划算得来。”

王家桢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张学良对此表示同意。

张学良认为事体颇大，乃需同东北军政首脑详尽商讨。在联席会议上，与会者都对日本这个强邻节节进逼，重重压迫，而中国只是穷于应付，深感头痛。假如支援一笔竞选费，政友本党一旦能够在国会中胜选，将来出组内阁，日本政府对东北外交采取友好的态度，以避免军事威胁或发生任何暴力，这事还是值得的。最后，张学良决定给床次的政友本党以经济支持，并强调应秘密进行。

“我在张学良处拿了由他签字的领款条子，便到官银钱号去取款。”王家桢回忆说，“付款全是五元以下的小票，五十万元整整装了两大柳条包。我将这笔现款交给赤冢、鹤见二人，他们也无法清点，就给我写了一张收据了结。”商定的条件，已由床次批准，床次并约定在日本大选前，在日本某温泉与王家桢会面。

年底，王家桢和张学良作了详细的商讨，带了充足的现款，踏上了去日本的征途。在抵日本港口下关时，王家桢避开

了新闻记者们的纠缠，坐火车直达那个指定的温泉休养地，第二天就找到了床次的住址，约定了会见的时间。

王家桢回忆说："床次由于被汽车撞伤，在这儿养病已经很多日子了。我和他见面时，他像会见多年的老朋友似的，很热情地欢迎我。这次和他长谈了以后，我才感觉到他已经落后了。在政治上，他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并不能代表日本的进步力量。他所纠合的一帮人，只是一些典型的官僚政客。而他所津津乐道的，也只不过是夸耀其过去罢了。所以，我这次来日本帮助政友本党选举的目的，由于和他的这次谈话，失去了不少信心。我在温泉只住了两三天就上东京了。

"我抵达东京时，正是大选竞选开始前夕，报纸上都在谈论着选举的事。我访问了几个熟人，并和我的驻东京办事人研究了一番日本的政局。我的驻东京办事人也认为政友本党这次获胜的机会很小，保守势力可能占上风。"

张学良收买日本政友本党，支持以床次为首的日本政友本党竞选，搞的是一种秘密外交，虽说是互相勾结利用，但对于双方都是有好处的。由于当时中日关系复杂，在商谈过程中，双方都采取了极慎重的态度。

第二年年初，即日本第十七届大选的前夕，张学良又派王家桢到日本再次会晤床次，援助政友本党。不料此次大选，政友本党与民政党均未获得预期的胜利，政权仍掌握在旧政友会手里，也就是掌握在田中义一军阀内阁手中。后来，政友本党与民政党联合起来，在议会里揭发田中内阁的贪污罪状，田中内阁才告垮台。民政党与政友本党遂共同组成联合内阁，以民政党的总裁滨口幸雄为总理大臣，床次竹二郎仅以副总理大臣的资格兼任递信省大臣，床次暨政友本党企图组阁掌权的目的未能实现。

九一八事变时，赤冢和鹤见两人写给张学良的五十万元收

据被日军发现后，冈田内阁的陆军大臣、日本军人法西斯头子荒木贞夫，即以此大肆攻击政友本党和床次本人，同时以叛国罪嫌疑犯的罪名将赤冢和鹤见扣押起来，又在日本报纸上公开揭露此事。日本政界为此事掀起轩然大波，闹得满城风雨。

不久，床次病故，保守的政友本党从此一蹶不振。

第三十六章　东北易帜

1928.12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南北统一，人心所向。”

我何时挂青天白日旗，日本人不知道，而且不是一面，是全东北都挂上了青天白日旗。日本搞的是什么谍报？我认为日本人用在谍报上的钱都白花了，都扔到废纸篓里去了。

不是因为我父亲被日本人杀死才易帜，我主张国家统一和富强，父亲不死我也会这样做。

一九二八年六月四日，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在北京与

奉方张学良、杨宇霆举行会谈，提出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一）东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接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当时，谈判虽未立竿见影，但却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

随后，国内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蒋介石等已和平接收京、津；六月二十日，新疆督办杨增新宣布易帜；七月十九日，热河奉军主将汤玉麟也宣布易帜，服从三民主义。至此，山海关内都悬挂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仅东北三省仍挂五色旗。

当时奉军约四十余万人，蒋介石等四个集团军共六十七个军又九个师，号称一百万，兵力占优势，冯玉祥、李宗仁便主张乘胜出关追击并消灭奉军。但是，蒋介石怕兵出山海关会遭到日本人的干涉，重演"济南惨案"，因而持反对态度。

至于张学良，他历来反对内战，主张把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希望国家统一；再者，当时张学良对北伐军相当佩服，认为它不但战斗力强，而且有一套为奉军所缺乏的政治工作。他曾对人说："我们争什么天下？奉军南下河北、河南，占领了不少地方，可连一个县长也派不出。"

由于蒋介石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张学良片面地把经过国共合作、获得苏联援助而发动北伐战争的功绩，全都记在蒋介石身上，从而认为蒋介石有统一中国的能力。

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我有诚心服从能统一中国的人。

为早日实现易帜，张学良于七月初成立由王树翰、邢士廉、米春霖、徐祖贻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关内与国民政府磋商易帜事宜。张学良向蒋介石表示：对易帜、实行三民主义皆毫无疑义，但有四个问题须亟待解决，即外交方面、党务方面、政治分会问题及暂停对热河军事行动问题。妥善处理好诸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用箋

(民國十七年十月九日)

蒋介石致电张学良，促其于一九二八年“双十节”实行东北易帜。

问题后，他初步计划于七月二十一日易帜。

但问题并不是这么简单。十八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约见张学良，要求实行《满蒙新五路协定》。张学良答称：“皇姑屯炸弹已将张作霖专车里的所有文件全部毁灭，一切都已无根据。”

次日，林久治郎再访张学良，向张学良转交日本首相田中的信件，信中再次反对东北“易帜”，并要求履行所谓“日张密约”。

张学良对日本的警告极为不满，但同时又感受到威胁。为避免日本武力干涉，他决定推迟易帜日期。他在给蒋介石的电文中说：“弟现在实处两难，不易帜无以对我兄，无以对全国，易帜则祸乱立生，无以对三省父老。现奉垣形势，我兄定悉。”

八月九日，张学良与林权助、林久治郎在会谈中发生激烈争执，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八月十三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著名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对东北易帜，蒋介石已急不可耐，他与张学良电文往还不绝，不断催促道：“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

原来，十月八日，国民党一百七十三次中常会选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并选出国府委员十六人，其中有张学良。因为有人对选张学良不满，蒋介石便解释说：“如果要使国际上承认我们确已统一，要使某国少些借口，要使东三省当局无观望的心思和回旋的余地，只有如此决定去做。”

但为慎重起见，到“双十节”时，东北仍未宣布易帜。张学良诚恳地向南京代表李石曾表示：结束国家分割局面是自己多年的愿望，但立即“易帜”尚有困难，主要是担心日本人趁局势未稳进行干涉；再说，内部也还有阻力。他要求谅解他的苦衷，并表示他将负责做好内部的工作，力争在年底实现这个目标。

一九二八年的“双十节”，张学良为检验和显示自己的军事力量，在北大营举行了隆重的阅兵式。阅兵时，他身穿新式陆军大礼服，头戴法国平顶式军帽，腰系金丝织的刀带并佩挂着礼刀，刀柄和刀鞘镶嵌着金花，下垂金丝绦穗，雄姿英发、神采奕奕，可以想见他当时的鸿鹄之志和良苦用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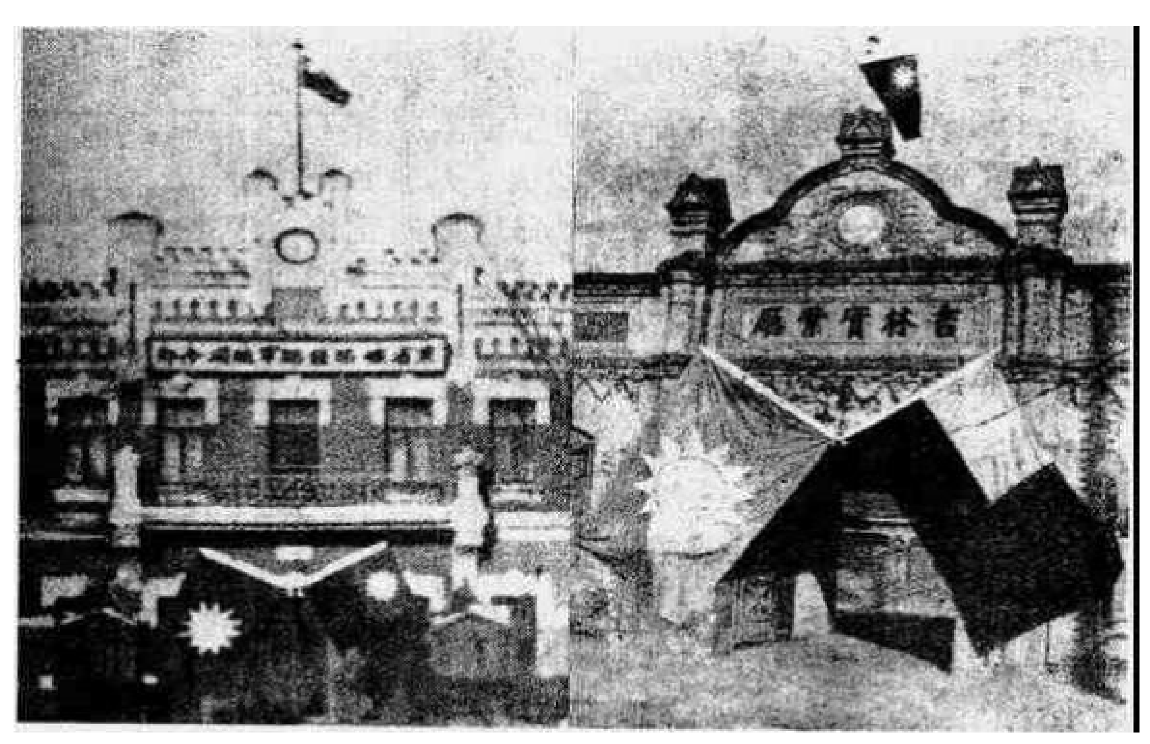
进入十二月份，张学良加快了易帜步伐。十二月五日，他逮捕了阻碍易帜、负责办理对日交涉的陶尚铭，亲日派骨干赵欣伯则逃往大连。六日，邢士廉携蒋介石致张学良亲笔信离沪返奉，信中说，对外问题由中央负责，内政问题仍由现有职员

维持。二十六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十二月二十九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言。

武官誓词是："余以至诚，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此誓。"

文官誓词是："余敬宣誓，余将恪遵总理遗嘱，服从党义，奉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张学良通电易帜。辽、吉、黑三省于同日晨同时悬挂青天白日旗。

行国家法令，努力于本职，并节省经费，决不雇无用人员，不营私舞弊及授受贿赂。如违背誓言，愿受本党最严厉之处罚。"

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说："民国十八年来，战祸频仍，危象环生，人民殷殷望治，机会虽多，惜皆错过，其惟一之光明，即恃总理主张，取消不平等条约，以建设强有力之政府，东北各首领矢志服从国府，目的即在于此。语云：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东北今后，另换一种新的生活，希望同人做事，总要为国为民，不可自私自利。奋起精神，勤黾公务，建设强有力之政府，领导民众经过此训政时期，以达到宪政时期，而将政权归诸民众，如斯则三民主义得以实现，革命方为成功也。"

致词完毕，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同日，南京国民政府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

三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批准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任命翟文选、王树常、邢士廉、高纪毅等十一人为奉天省政府委员，翟文选为主席；任命张作相、王之佑、诚允、熙洽等十一人为吉林省政府



一九二九年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的张学良。

委员，张作相为主席；任命常荫槐、孙炳文、万国宾等十一人为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常荫槐为主席；任命汤玉麟、金鼎臣等六人为热河省政府委员，汤玉麟为主席。

此时，事先秘密制就的几万幅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奉天城内迎风飘扬，红黄蓝白黑五色旗降了下来，各机关、学校、商店、住宅都悬挂了国旗，还有以一百人为一队的若干士兵队，每人手执一面国旗，在城内巡弋。至此，东三省各地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国民政府获得了形式上的统一。

"国难当头了！"日本统治集团惊呼道，"得到经济余裕之张家军阀，与三民主义之国民政府合作，可畏的劲敌飒爽地在满蒙大地登场矣！"

"张学良的行为是对日本明显的侮辱！悬挂新旗帜，满洲问题大大增加了困难！"日本枢密院也不得不发出这样的哀叹。

"南北统一，人心所向。"张将军毅然决然地说道。

当时的《大公报》曾刊文赞扬张将军说："其富于爱国思想，实旧军人所罕见者也。"

易帜成功，北洋军阀遂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蒋介石获得完成北伐、统一全国的盛誉，从而掌握了南京的中央政权，博得了英、美、法等列强的赞赏。张学良也达到分治合作的目的，继续掌控东北，保持了东北集团的利益。

东北易帜，是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做出的第一件有深刻影响的大事，是张学良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以民族利益为重，顺应社会发展趋势而作出的勇敢抉择。

东北易帜表明，张学良不仅是张作霖的继承人，同时也是其父的叛逆者。他一反张作霖"对日本感恩戴德"的亲日立场，代之以铲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地位为目标，从而使奉系军阀由亲日派变为反日派。

东北易帜，其本身求统一、求抗日的历史趋势是完全正确

的，是顺应历史发展方向、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的，它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是张学良将军一生中最令人称道的爱国壮举之一。

第三十七章 处决杨常

1929.1

——“今诸君既未允我卸责，又不来帮助我做事，简直是开我玩笑。”

——“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

——“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树人，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翰香在地下了。”

那时，常荫槐是什么呢，他是奉天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又是黑龙江的省主席。这时，中东路的督办叫吕荣寰，他又是董事长。杨宇霆就跟我商量，要把吕撤掉，让常荫槐当董事长。这事当然要由我下命令了，我最后处决他就是因为这个事情。我说，常荫槐的能力也太大了，他当交通委员会的委员长，又是黑龙江省的主席，现在又要做中东路的董事长，东三

省没有人了吗？他一个人怎么连三个省的事都做了？我就马上把他两人请来了。

下不了决心啊，也没有人商量。我不大讲迷信，但对这件事还真是迷信。我就拿出银元，说这件事情我应当做，银元就出现正面。结果，弹一次是正面，再弹一次仍是正面，弹第三次还是正面。可我觉得不对，我就反过来说，假如这事我不做那我就不对，银元就出反面。结果呢，弹一回出反面，又弹一回还是反面，弹到第三回，我不看了，让我太太看。我太太一看，她就哭了。我问她哭什么，她说，我知道你要杀人了。所以，这块钱我放在铁柜里，后来，人们不晓得我为什么要把一块钱留在铁柜里留作纪念。

杨宇霆，原名玉亭，号凌阁，字邻葛，祖籍河北省滦州戴家岭。清同治年间，其祖父杨正荣携家逃荒，至辽宁法库县蛇山沟村定居。其父杨永昌三十岁时，于清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得子杨宇霆。

杨宇霆聪颖好学，先后就读于私塾、书馆，一九〇四年考中清代末科秀才，后被清廷选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秀。一九一一年回国后，他先后在军队任见习排长、营长、军械科长、军械厂厂长、师参谋长等职。

一九一六年，张作霖任奉天督军，杨宇霆因能文善武、治军严格，深得张作霖倚重，由二十七师参谋长先后升为奉天督军署总参议、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东三省兵工厂督办、奉军总参谋长、江苏督办、安国军总参议及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等要职。

杨宇霆自当上督军署总参议后，经常琢磨讨好张作霖的办法，钻营投机，因而博得张作霖的宠信，倚之如左右手，甚至将个人私章交给他。杨宇霆也以诸葛自命，骄纵恣睢，叱咤风云，盛极一时，很快成为左右东北军政的炙手可热的人物。

当时，对日交涉是最棘手的问题，张作霖总是让杨宇霆去应付。杨宇霆纵横捭阖，软硬兼施，将日本贪得无厌的要求设法打消或使己方的损害降到最低程度，因而，日本人对杨宇霆也很头痛。

张学良深知杨宇霆之为人。张作霖死后，杨宇霆不但不自行收敛，反而比张作霖在世时更加目中无人，飞扬跋扈，自炫聪明，乱出主意。

平时，在张学良询问情况或发表主张时，杨宇霆经常指责他："你不要管，你不知道，我们会做决定"，大有当众僭越、喧宾夺主之势。杨宇霆还经常在背后讥讽张学良说："他每天注射毒针其多，将来必会自毙。"

一九二八年秋，杨宇霆借为父母祝双寿之机，故意大摆排场，炫耀实力，扩大影响。关内不少军阀派代表参加，小河沿车水马龙，热闹非凡，盛况空前，全国各地的代表对杨宇霆恭维有加，称他是众望所归之人，杨本人亦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一言一行，皆以东北第一领袖自居。

当时，张学良亦前来参加贺寿，但杨宇霆竟以普通礼节对待，与一般宾客无异。宴会上，杨宇霆不仅让张学良做"陪席"，而且将张宗昌的同伙褚玉璞列为上宾。张学良颇受刺激，于凤至尤其不满。

张学良回到帅府后，于凤至气愤地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还有你吗？"

杨宇霆如此狂妄，与江湖术士的怂恿也有关系。当他盛极一时之际，在修造法库家乡的祖坟时，曾发现一个石像，他的四名术士借题发挥，一口咬定说这是"九五之尊"的征兆。显然，这种迷信思想更激发了杨宇霆的政治野心

以"摄政者"自居的杨宇霆，口头上虽然也常辩称他对张

学良实无“取而代之”之意。但背地里，他却擅自与桂系军阀勾结。当桂系派叶琪赴奉天时，杨宇霆私下与之会见，并对他表示：“关外事我杨宇霆可以做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

后来，张学良在会议上当面就此事质问杨宇霆，杨宇霆无以为答。

就是这位“太上总司令”，平日里大张其声威。他的公馆每夕张宴群饮，门客接踵，宾朋满座，灯火达旦，文武官员辐辏其门。当时，东北的一些官员们多以为杨宇霆能操纵张学良，故趋附者甚众，杨之势力越来越大，杨府无形之中成了东北的政治中心。

张学良虽然年轻，但他毕竟是从战火硝烟中闯荡过来的，是经过战阵、见过世面的“少帅”，但杨宇霆却瞧不起他，把他看成是一个政治暴发户、一个虚弱无能的人，背地里还将张学良比作“阿斗”。

当时，东北实际上已形成两派：张学良派与杨宇霆派。前者以奉军三、四方面军团的少壮派为核心，他们都是张学良与郭松龄的部下，后者以杨、常为核心，网罗一些政界文人，但无军权。

杨宇霆与张学良的政见分歧，突出表现在“东北易帜”问题上。在“易帜”的当日，当张学良和参加的代表们合影留念时，杨宇霆拒不参加，手提皮包愤愤离去，这一幕竟摄入新闻记录片中。

杨宇霆反对东北“易帜”的立场，颇受日本的重视。日本侵略集团中的一派竭力支持杨宇霆，企图以杨宇霆取代张学良。

有一次，张、杨争论东北究竟应该执行什么路线。

“你走你的中央路线，我走我的日本路线，两宝总有一宝

押中，不是很好吗?”杨宇霆冲着张学良说道。

“如果是你那一宝押中了呢?”张学良反问杨宇霆，杨宇霆则瞠目不知所对。

对于杨宇霆咄咄逼人的气势和另有图谋的政治野心，隐忍日久的张学良不得不予以警告和回击。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某日，张学良在招待高级官员的一次宴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讲话，慨叹东北政令之运转不灵，影射杨氏之专横跋扈。

“我看近日奉天政局略如我之身体，言其有病，则能饭食，言其无病，则确实有病，毫无振作，弄成一个不死不活的局面，甚足痛心!”张学良愤然道，“在座诸君，或为我之前辈，或为我之部下，无论与我如何关系，皆爱我者，故拥戴我为总司令。我本人固不恋恋此职，苟有他人起而代我，我甚愿卸责，转而帮助他人，拥他人为领袖。今诸君既未允我卸责，又不来帮助我做事，简直是开我玩笑。由今以后，本职范围内之事，应做即做，无所用其顾虑。”

但杨宇霆却执迷不悟，故作不知。张学良讲话后，在座三四十人中，惟杨宇霆一人发言，并对省长翟文选作种种指示，侃侃而谈，翟氏唯唯诺诺。一位奉天省长，对杨宇霆都如此卑躬下从，其他官员可想而知。

张学良对杨宇霆虽不放心，但遇事还是征求他的意见，也想给他以适当安排。他原拟要杨宇霆担任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遭到杨宇霆拒绝；又安排杨宇霆出任黑龙江省长，杨宇霆也拒绝；要杨宇霆出洋考察，杨宇霆也不干。正是“学良愈恭谨，而宇霆愈跋扈”。

在杨宇霆的同伙中，常荫槐可算是一个极重要的人物。杨、常二人结成一伙，打得火热，而对张学良，不仅疏而远之，且包藏祸心，事事阴图破坏。

常荫槐，字翰香，一八八九年生，祖籍山东省寿光县，后

迁吉林省梨树县刘家馆子村定居。一九一〇年，常荫槐毕业于奉天法政学堂之后，便在军中工作。一九二一年，任剿匪司令部参谋长。次年，被张作霖提拔为军警执法处处长和奉天清乡总办。一九二五年，任京奉铁路局局长。一九二八年，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副委员长。东北易帜后，被任命为黑龙江省省长。

常荫槐工作大胆泼辣，敢作敢为，但傲气十足，目中无人。他轻视张学良，说张学良"是个孩子，什么都不懂"；每与张学良研究公务时，常口呼汉卿，漫不为礼，且独断独行，上峰之意见尚未确定，他则已按己意而行之了。

在张作霖被炸、东北军撤退的时候，张学良是殿军，可是，当张学良的撤退列车经过各火车站时，所有车站的水塔都被常荫槐所属的部队炸毁，当时三、四方面军团的人对此恨之入骨。可是，张学良在东北执政时，不计前嫌，仍委常荫槐以省长的重任。

但在杨宇霆授意下，常荫槐在省长任内，私编山林警备队十余团，经营自己的武装力量。杨宇霆还伙同他向捷克订购了三万支步枪。当张学良查问时，杨宇霆不得已才承认确有此事。张学良询以何用，杨宇霆说："装备山林警备队。"张质问："咱们兵工厂不是有的是步枪吗？"杨宇霆有恃无恐地回答说："没有人家的好啊！"

这样重大的事，杨、常二人竟瞒着张学良，既不请示，也不报告，明明是要搞独立王国，张学良怎么能容忍他们这样无法无天呢？

另外，常荫槐当过司法处长和执法处长，由于执法过严，积怨较多。有一次，张作霖的岳母王太太的管事人，身穿上校军装，坐火车不买票，被常荫槐查出，当场把军衣扒去，痛打一顿。高纪毅当团长时，有一次没买票乘车，也被常荫槐从车上扯了下来。因执法无情，无论在老派或新派人物中，常荫槐

与许多人结下了仇怨。张作霖活着的时候，老将庇护他，一旦老将死了，他就成了众矢之的。

林权助吊唁张作霖回东京后，对人说："今天奉天的实际情况同日本当年幕府时期德川家康时代相似。"暗示杨宇霆将篡夺张学良的权，如同德川篡夺丰臣秀吉儿子的权一样。

关东军又制造许多杨宇霆图谋不轨的假情报透露给张学良，极尽造谣挑拨之能事。

蒋介石将白崇禧以杨代张的建议密告张学良时，也认为张学良应先下手为强。

奉系老派、陆大派都对杨不满，老派甚至一度传说杨宇霆要兵变。

谈到"杨常"时，张将军曾有这样的一席谈话。

我不甚熟悉日本的历史，但我对林权助的讲话，确很注意。有一天，我从北陵别墅回城，路经鼓楼北，到商务印书馆下车翻阅所陈书籍，恰巧看见有一本《东洋史》，内中载有德川家康一段事迹，乃购一册回去阅览。我对德川家康这一段史实，阅览得特别仔细。

看过这段日本历史，我当时在想，林权助他为什么说这番话？我就联想到我们东北的内部情况。老将死去，东北各军政领导人拥戴我为东北保安总司令。在这中间，有的是老将旧部，有的是经我培育出来的新干部，绝大多数对我可说是真诚拥护的。但因为我年纪尚轻，身体又不好，也有的对我轻视，甚至表现得桀骜不驯，特别是杨宇霆和常荫槐两人。杨在老将掌政时，做过总参议和三、四方面军团长等要职。一九二五年郭松龄反奉，其原因很复杂，但郭对杨仇恨不满也是主导原因之一。郭失败后，老将对杨仍很信任，并仍委以重要职务；而对我则因郭的叛变，时加斥责，不如过去那样相信了。我同杨宇霆之间也时有意见参商。至于常荫槐，他先为军警执法处

长，三、四方面军政务处长，后又任京奉铁路局长，确实是一个精明干练、敢作敢为的人。也就因为这个，他深得杨宇霆的器重和信任，两人的关系极其密切。他们对我总是抱着藐视态度，对我有什么请示要求都带有强制性和威胁性。尤其是常荫槐，倨傲无礼，飞扬跋扈，并没有把我看成是他的长官。但我对他们总是尽量克制和忍耐。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时，还提升常荫槐为黑龙江省省长。当时万福麟为黑龙江省督办，常对万并不是给予尊重，遇事协商，而是傲慢不恭，轻蔑鄙视。他在黑龙江时，编山林警备队，本来不是正规军，但杨宇霆却给以大力支持，得到了优良的装备。他为什么要这样积极抓军队呢？不能不使人生疑。在我就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时，未安排杨宇霆任何职务。一则因为他是老将的"老臣"，地位很高，一时无恰当的位置，二是我对他确有戒心。虽然东北军政重要措施都征询他的意见，重要会议也请他参加，但是并非信任不疑，这也是事实。

看到林权助在东京答记者问的讲话，我又翻阅了日本历史有关德川家康幕府时代的史实，联想到东北当时的政治情况，我感到有些不安。加上当时杨宇霆虽无任何职务，但东北军政要人多其门下故旧，趋承奔走，门庭若市，甚至国内各省军政代表到沈阳来，也多往访谒。他是一个在野的人物，俨然同我分庭抗礼。尤其是当杨给他的父亲作寿时，铺张扬厉，车水马龙，东北大吏荟集其门，炙手可热，真是盛极一时。当时我也参加了祝寿，不断在想，假如杨、常取我而代之，可以兵不血刃地掌握东北政权，莫非林权助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吗？我应该怎样来自处呢？我是等待如秀吉之子那样最后为德川所杀呢，还是先把他除掉？事关杀人，尤其是要杀一个风云中的人物，一时是犹豫不决的。

杨宇霆狂妄自负，目空一切，我对他却无可奈何，真是受

罪啊。

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张学良此时真切地体悟到“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的道理。

杨常事件的导火线是杨宇霆、常荫槐力主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相偕来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理由是，中东铁路自恃系中苏合办的铁路，一向不接受东北交通委员会的指挥，如果成立了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就可以将它纳入管辖之内了。

张学良表示，目前东北甫经安定，涉及外交之事应该慎重考虑，此事须从长计议。杨、常则力主即刻决定，并取出已经拟好的文件，要张学良签字。张学良推托说，现在已经到晚饭时间，容待饭后再作决定，并留杨、常用晚餐。杨宇霆表示临来之际，已告家人回去用饭，还是回去吃了再来。于是，杨、常相率辞去。

关于此后事件爆发的来龙去脉，时任辽宁警务处长的高纪毅回忆说：“他们走后，张学良立即用电话召我进府，这时已是下午五点钟。我进府后，立即被张召入内室，他从容不迫地向我说：‘杨宇霆、常荫槐二人欺我太甚，他们想尽办法，阻挠全国统一，今天又来强迫我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并要发表常荫槐为铁路督办，说是为的能够管理中东铁路。事关同苏联的外交问题，这事要办也应该请示南京，从长计议。但他们要我立刻签字发表，太不成话了。现在他们正回去吃饭，少刻就会回来。我给你命令，立刻将他二人处死，你率领卫士去执行好了。’

“我接受命令后，请示应在何处执行。张指示说，就在老虎厅内执行，并以轻松的语气嘱咐我说：‘你可要小心，他们

二人身边都带有手枪的。'我于是配备六名卫士，由我同张的侍卫副官谭海率领，另由刘多荃担任府内外警卫任务，只许人进来，不许人出去。"

如前所述，众所周知，在下决心处决杨、常之前，张学良又用银元进行了占卜。

另外，张学良将军当年的副官张沛汉也回忆说："晚上七点左右，杨宇霆、常荫槐如期赴约。当时，帅府的规矩是：不论是谁，一律不准带武器，不准带兵。杨宇霆的警卫无例外地被挡在帅府外面，被安排在前院的帅府卫队三连驻地，因为这是惯例。

"然后，谭海副官长对他们说：'屋里热，大家都把皮带打开吧，今天杨总参议在这里打牌要打到十一点多钟，大家在这里喝点酒，吃点夜宵。'这帮人一见酒菜就乐了，都毫无顾忌地喝了起来。这时，外面早已布置停当，帅府卫队把这所房子围得风雨不透，机枪就架在窗户台上，枪口对着酒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谭海高举酒杯说：'大家跟随杨总参议很辛苦，今天多喝点，来，干一杯。'一饮而尽后，谭海厉声说道：'请大家静一静，今天我有一句话，要跟大家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我想你们能够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他提高了嗓门说，'现在大家都站起来，把手举起来，往外走，不准回头，不准伸手，如果谁不守规矩，就武力解决！'这时，谭海副官长的身后一排人个个横眉冷对，端着枪对着这些人，窗外的机枪都伸了进来，他们一看，什么都明白了，乖乖地举起了双手，一个接一个地往门外走，出来一个捆一个，统统都被送进了第一监狱押了起来。"

解决了卫队之后，谭海把一个写着"前院处理完毕"的小纸条送给了张学良。

指挥处决杨、常的高纪毅后来追忆道："我同谭海率领六

名卫士持手枪进入老虎厅，立即对杨、常宣布：奉长官命令，你们两人阻挠国家统一，着将二位处死，即刻执行。杨、常闻言，顿时木然，脸色惨白，一句话也没说出来。杨、常二人分别被两名卫士按住，一名卫士开枪，结果了性命，当夜陈尸老虎厅。”

进门就打，没有切西瓜、吃饭、赌牌等这些事，早就准备好了的。

接着，张学良按照已定的步骤连夜以长途电话向南京报告处死杨、常的原因和经过。他还指示高纪毅以军事法庭会审的形式公布杨、常的罪状。高纪毅他们彻夜工作，通宵达旦。

翌晨，张学良召集张作相、翟文选、王树翰、臧式毅、郑谦、孙传芳等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进府，细说处决杨、常的经过。众人闻言，惊愕万状，面面相觑，哑然无声。

枪杀杨、常的第二天，高纪毅跑到水簸箕胡同郭松龄家，给郭松龄的父亲叩头说：“我们给茂宸报仇了！”可见，郭松龄的部下是十分痛恨杨宇霆的。

与此同时，张学良又把王家桢唤来，让他负责对日交涉。

据王家桢回忆说：“林久治郎总领事刚起床，他接见了我，说：‘我知道您这么早来，一定有要紧的事。’我把杨宇霆、常荫槐二人如何图谋不轨、发动叛变的事告诉了他，并且说：‘幸亏我方及时发觉，当场捕获，沈阳未蒙灾祸，实是万幸。两个罪犯已就地枪决。’林久治郎听了这个消息，一面甚为惊讶，一面感谢我及时将这正确的消息告知他，使他可以及时电告外务省，以免为一些新闻消息所混扰。

“当我从林久治郎那儿回到大楼正厅前的台阶时，正值人们用地毯包裹着杨、常尸首，先后由老虎厅抬出来。西客厅的人已经全散了。走进里间屋的门口时，张学良突然由一张小床上跳下地来，说：‘我实在有点支持不住了。唉，树人（我的

别号），咱们可得真正好好地干啦！若不然，那太对不起凌阁、翰香在地下了。'

"我把去日本领事馆的情形和没有去英、苏两领事馆的原因报告给他。他没有说什么，又上床躺下了。于是我又说：'您好好休息吧！不过这样突然的大事，人心总难免浮动，特别是杨、常两个家族一定很恐慌。基于罪不及妻孥的原则，您是不是可以对这两个家族设法安慰一下？'

"张学良听了这话后，又腾地跳下床来，高声叫道：'叫刘统带来！'刘多荃刚一进屋，张就说：'你赶快去慰问杨大嫂、常大嫂，各送慰问费一万元。'"

杨、常死后，张学良通电全国，历数杨、常的"罪状"。并明令宣布：凡杨、常重用之官员，如不违法，概不株连，从而使局势迅速稳定下来。

张学良并致信杨宇霆夫人，倾述了他不能不杀杨宇霆的苦衷。信中说：

杨大嫂鉴：

> 弟同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唐太宗英明之才，古今称颂，建成、元吉之事，又有何策乎？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办垄断。不期骄乱性成，日甚一日，毫无悔改之心。如再发生郭（松龄）王（永江）之变，或使东三省再起战祸，弟何心对国家、对人民乎？然论及私交，言之痛心，至于泪下。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心中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放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女，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弟之出此书，非欲见谅于嫂，弟之为人向来公私分明，自问俯仰

无愧，可质天日。此书乃尽私交，慰家中老幼，勿奔走流离、胡乱猜疑。已令潘桂庭、葆健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不久，杨、常发丧，有儒将风度、在古典文学和古诗词方面造诣颇深的张学良，还痛心地为杨宇霆和常荫槐分别写了挽联。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写的是：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张学良挽常荫槐联写的是：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因家事罪淮阴！

剪除杨、常，是对奉系集团内部守旧派的一次毁灭性打击，起了"除掉奸雄，消灭隐患"的作用。

自杨、常二人以叛变罪伏法后，东北的政治空气为之一变，张学良的威望空前提高，事无掣肘，人心统一，充分发挥了人治的效果。

为什么要用极端手段处置杨常，张将军曾对唐教授和王一方有几点说明。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杀杨宇霆，杀杨宇霆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可以这样说，杨宇霆是死在郭松龄的手里，死在郭松龄事件上。

不是的，是郭松龄事件给我的教训。我最敬重郭松龄，我前半生的事业完全靠他，自从他在讲武堂看中我，我们就一直合作在一起。他要叛变我早知道，但是我却不忍做断然处置，怕别人说闲话，我认为我可以管住他，他会听我的。我原本可以解除他的兵权，处置扣押他，但我却迟疑不决，终至他起兵倒戈，东北乡里受灾。我对不起父老，我部下在战争中受害，

我也对不起他们，我不能再让这种事发生，只有对杨、常断然处置。

张宗昌要回东北，我不让回，他就要打。当时大家商议应怎么办，捉住他后是不是枪毙。张作相说应该枪毙，我说好吧。后来张宗昌对我很不谅解，还找人来问我为什么要杀他，这都是杨在其中做的手脚，杨是何居心？

杨宇霆巡视三、四军团后回到奉天，我要给他黑龙江督办他不肯，请他统率三、四军团，他也不肯，他说：‘你那些部下，把你当个神一样，我哪会管得住？’我想，哦，你看部队，就是看能不能管得住，管得住就管，那还要你做什么呢？

我那时身体不好，很多事管不了，杨就常召集我部下说有事别找我，要钱、要人可以找他，明显是在拉军队。他向捷克购买三万支枪的事，我也是偶然得知，这么大数目要钱的事，他也未问过我。

杀杨、常，事前我只与王树翰商量过。我说我要放炮，他说万万不可。

我也与于凤至商量过。我本来想把杨关起来，不想杀他，她说，你能关得住他吗，张作相等人为他求情你是放还是不放？这话让我下了决心，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这也是所以我要用银元卜卦的原因。我丢了三次，都是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成色有问题，再押反面，丢三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她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活。”

张学良之处决杨宇霆，实出于不得已，如果不除杨宇霆，东北将政出多门，更加混乱，这是日本侵略者最欢迎的。杨、常被杀之后，东北民间有一戏称曰：“大帅被炸，扬长（指杨、常）而去”。

杀杨、常产生不少负作用。事件发生后，汤大虎就说过，

小六子真要杀人了。后来，他弃守热河逃走了、与我杀杨、常多少都有点儿关系。

老虎厅因有一只老虎标本而得名，杨、常被诛后，这个客厅封闭改为仓库。这只虎现存同泽中学的张学良纪念室里面，它是只小老虎，与一般成年的东北虎体型相差很远。

这只老虎是在吉林打住的。这老虎该死，它跑到县城里头去了，大概是饿了还是怎么的，被人捉住打死了。剖开肚子后，见里面还有一支簪子，很可能是它吃了个女人。

你们谁也没有吃过老虎肉吧，我吃过。老虎肉你们绝对想不到的，味道一点没有，吃到嘴里像鸡的白肉一样，没什么香味，就是很嫩很嫩的白肉，感觉是很奇怪的。

第三十八章 奉苏动武

1929.7

——“那时，我自不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弟的旅，全灭。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

——“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我同俄国没有什么关系，就是跟他们打了一仗。那时，我自不量力，很想施展一下子。

不是扩张，说扩张这不对。那时，要想把东北的地位提高，就必须要打一仗，而且还要打胜。我同俄国打，开始时打

胜了，打胜后，他们把军队指挥官换成了加伦将军，军队都换了。那仗打得惨了，我们有一个旅全灭，是姓韩的，韩光第的旅，全灭。旅长，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旅覆灭。

张将军所言，即一九二九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这是少帅掌权东北时所发生的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

中东铁路，初称东清铁路，一九一二年中华民国成立后，改称中东铁路。

该铁路由哈尔滨至绥芬河，称东线；至满洲里，称西线；至长春，称南线。它横贯东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后南满铁路为日本人攫取，中东铁路仍归沙俄。

一九一六年，沙皇曾派其财政大臣威德到哈尔滨视察，后授权霍尔瓦特为中东路理事会理事长，从此，霍尔瓦特在哈尔滨俨然以殖民地总督的身份作威作福。

十月革命后，一九一九年，苏联政府曾宣布愿将中东铁路及帝俄政府夺取的一切矿场、林场、产金地和其他企业无偿交还给中国人民。但遗憾的是，当时北京政府与协约国采取一致行动，不承认苏联为合法政府，所以对宣言始终置之不理。一九二〇年四月，苏联又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但对中东路的处理，已不是无条件交还中国，却提出由两国共管。

当时，适值军阀割据的时代，中东铁路属于张作霖的势力范围，所以，有关东北的任何交涉必须通过张作霖。于是，苏联人找到当时包办张作霖对俄外交的杨卓。

一九二四年奉苏谈判之际，正是张作霖充实军备、准备进关、欲以武力夺取北京政府宝座的时候。张作霖鉴于冯玉祥受到苏联的支持和援助，在军事上是他打天下的一大障碍，便借中东路谈判问题来要挟苏联，以苏联不得援助冯玉祥为先决条件，并提出在中国境内不准宣传赤化等要求。苏联方面对不援助冯玉祥一事，认为可以答应，但不能诉诸文字，并表示说话

一定算数，对其他问题也都满口应诺。张作霖见停止援冯的目的达到，喜形于色，利令智昏，对于铁路权益问题并未仔细考虑就轻率地签了字，此即“奉俄协定”。

按“奉俄协定”，中东铁路由中苏两国共管，所有权益中苏双方各半，一切事宜双方是平等的。签字后，苏联很快地接收了中东路，但对其他诸事则不闻不问。加拉罕和库兹涅佐夫对什么卢布赔偿、停止援冯、及时召开小组委员会等等全都不认账了。

张作霖此时开始怀疑杨卓。他得知杨卓自从当上中东路监事后，终日穿着将军服，到处招摇撞骗。他又想到对俄外交方面的人多是杨宇霆推荐而来，如签字代表郑谦、俄文科长张裕恒等。杨卓是张裕恒介绍来的，而杨卓的一切活动大部又是通过杨宇霆来向他转达，他实际上不明其中的奥妙之所在。

蛛丝马迹，一团疑雾，张作霖乃决定派人去暗中调查，后来，终于查出杨卓从中捞了至少一百多万。大帅一怒之下，将杨卓交付军法处判死刑枪决了。

中东路虽为共管，但实际控制权却在苏方手中。理事会虽由中方任会长，然而却没有监督权，形同虚设，财权和人事权完全由苏方局长掌控。理事会所设的督办公署，实际上是中方的空衙门，无事可做，办事人员也大都不懂俄文，只是看管着每年从中东路净利中分给中国的那一小部分利润。

更有甚者，苏方还以中东路为据点，搜集中国情报，收买东北涉外官员，并允许共产国际活动，这显然已超出铁路商业经营的职权范围。为维护主权，张作霖曾下令收回地亩局训练所的气象台，并要求把中东路利润平分存入中、苏两国银行。

张学良主政后，本想收回中东路主权，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大业，但是，他却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国际形势。

对日本的估计：由于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于七月一日倒台，新内阁对东北局势采取观望态度。这时，币原重喜郎又重新任外相。币原在对华外交方面曾披着尊重中国主权、日中经济提携、共存共荣、以合理方法保护日本在华权益的伪善外衣，时人称之为“币原外交”。此时币原重新上台，张学良误以为这是日本终将遵守国际条约、对华亲善的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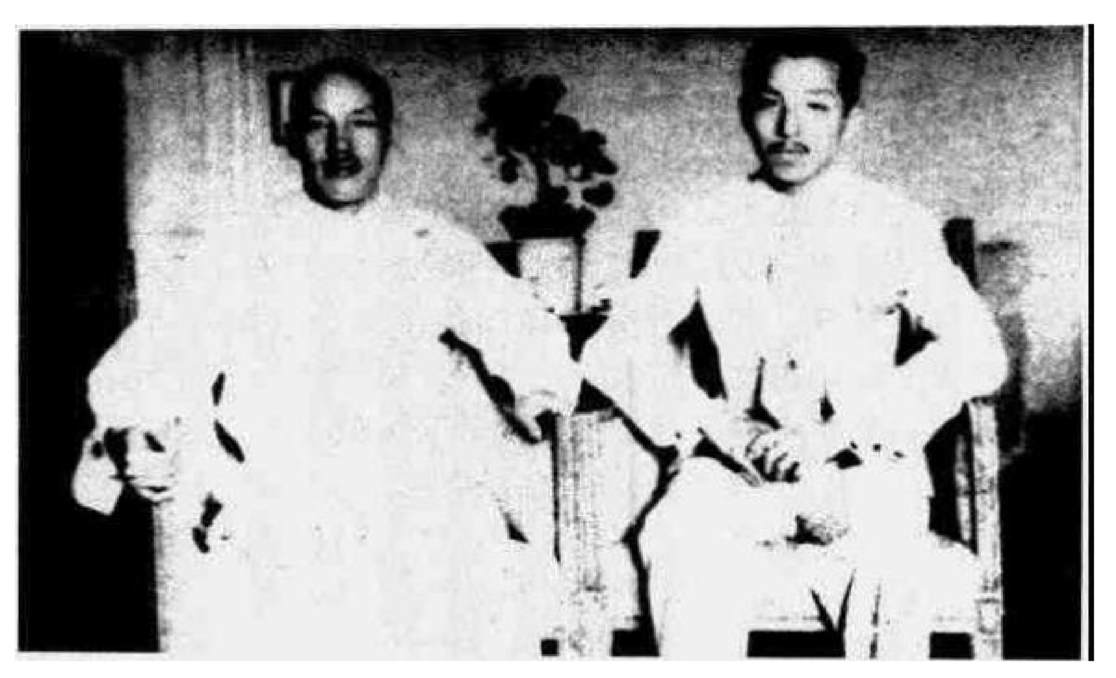
对苏联的估计：中东路督办吕荣寰和几个“俄国通”力主收回中东路，说苏联是“外强中干”，“国内异常混乱，困难重重，决不能打仗，东北出兵收回中东路，还将得到其他国家的同情与支持”等等。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则更加颟顸，他与日本人有勾结，也跟着瞎嚷嚷，主张把矛头对准苏联。

此外，北伐战争中提出的打倒列强与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口号，对东北民众和张学良都起着一定的推动作用，苏方不遵守赔偿贬值旧卢布的诺言，也曾一度引起民愤。

起初，张学良采取谈判方式和苏方交涉，提出：路局一切命令及文件应由局长及中方副局长共同签字才能生效，路局各处处长、科长及沿线的段长、站长应以半数改派华员等五项要求。中方并再次要求召开理事会，但遭苏方拒绝，从而激化了奉苏双方的矛盾。

五月二十七日，张景惠以苏联在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第三国际共产党宣传大会为由，派武装军警包围了苏联领事馆，并捕去苏方人员三十九人。此举如火上加油，奉苏之间顿呈水火不容之势。这是中东路事件的前奏。

事件发生后，苏联提出抗议，声言要采取报复手段；张学良则跃跃欲试，态度强硬；而蒋介石为巩固自己的宝座，达其反苏反共之目的，也热衷于挑唆张学良在中东路问题上采取与苏决裂的态度。



一九二九年七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前，蒋介石、张学良在北平第一次会面。

七月七日，张学良抵北平，与蒋介石、阎锡山会晤，征求对苏问题意见。这是张学良同蒋介石的第一次会面。两人两次会商防俄问题，提出安内御外、武力接管中东路及防止“赤化”的方针，蒋介石并允一旦开战，中央可出兵十万，拨几百万元军费。

对强行接收中东路，东北当局内部亦有人表示反对。

“我看用全国的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能行吗？为收回中东路，恐怕反而惹出麻烦，也须防备日本人乘机捣乱，还是请总司令慎重考虑。”张作相慎审地对张学良进谏道。

好友顾维钧也从国外写信劝阻张学良；张学良的顾问端纳也告诫说，武装冲突对东北不利。但是，对这些善意劝告，张学良竟然未予理睬，仍坚持己见，意欲动武。

事态日益严重。七月十日，中方强制接管中东铁路电报

局，张景惠还查封了苏联远东贸易局、煤油局、商船局、商业联合会。与此同时，中东铁路督办吕荣寰宣布将抗命的苏方局长叶穆善诺夫等撤职，并监督起来，以副局长华人范其光代之。紧接着，东北当局开始大量裁减苏方职工。

这就是所谓“收回中东路权”事件。

七月十三日，苏联外交当局加拉罕强烈抗议中方挑起纠纷，并提出三项建议，要求中方当局立即取消关于中东路的一切单方面的武断决定，释放被拘的苏联人员。

十七日，东北当局发表通牒，说明发动七月十日事件的原因是“欲使我防共之计划不能实施，故为防共计，应先收回该路之管理权”。

苏方对中方的答复十分不满，遂发出第二次通牒：召回俄官员，正式声明同中国绝交。

二十日，中方发表宣言，召回驻苏大使和领事。当日，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孙科开会商议，结果均认为苏联不会出兵，只是恐吓，若苏联出兵，日本也将难以沉默。

随即，蒋介石又以国民政府主席名义发出通电，说“除一致讨俄外，别无出路”；“誓贯彻废除不平等条约之目的，以完成国民革命之职责”。

接着，中方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军民，沉机应变，一心一德，以御外侮”。同时，蒋介石还企图以援助为名，乘机派兵进入东北，但遭张学良拒绝。

三十日，东北当局代表蔡运升赴苏，与苏方代表梅里尼克夫举行中苏绝交后的第一次中苏会议。会上，双方辩论激烈，中方指控苏方侵夺中国主权，苏方强责中方以武力蹂躏正式协定。会议不欢而散。

八月二日，梅里尼克夫抵满洲里，与蔡运升继续谈判，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会议毫无结果，陷于僵局。次日，张学良训

令蔡运升，绝对不能接受梅里尼克夫的恢复中东路原状、中苏共同派兵警备等三项要求。十四日，苏方代表梅里尼克夫奉命回国，中苏第一轮谈判遂宣布破裂，

至此，双方秣马厉兵，磨刀霍霍，武装冲突一触即发。

十五日，张学良发表对苏作战动员令，决定出兵六万，派王树常、胡毓坤分任东、西两路总指挥。次日，外长王正廷向新闻记者宣称，如苏兵胆敢入侵，中国将采取强硬态度。

苏方当然不甘示弱。八月六日，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组建红旗远东特别集团军的命令，任命布柳赫尔为司令员。他就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间，曾担任广东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加伦将军。

在双方加强边界武装力量的同时，小的军事冲突不断发生。满洲里、绥芬河、同江等地都曾发生过激战。初战时，东北军占了上风，多次击败苏军。

九月十四日，驻德苏公使将苏联政府的通牒交南京政府驻德公使，内容包括苏方允换中东路原任局长，但须中方更换吕荣寰董事长，苏方任命局长无否认余地等四条。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对苏通牒表示强烈反对。在东北，一些团体和人士纷纷发表通电，支持当局的强硬态度，表示誓与苏联斗争到底。

南京政府和东北当局的做法，使苏联感到恼怒。远东特别集团军决定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于是，中苏边界大规模的武装冲突爆发了。

十月十二日，苏联远东特别集团军命令黑龙江舰队和黑龙江沿岸步兵组成战斗集团，歼灭东北军的松花江舰队，摧毁同江城防工事。

清晨，载有登陆兵的苏舰驶进松花江口，航空兵则进行空中支援。东北守军尽全力抵御。中午，苏军包围了同江。经过激战，东北军军舰四艘、拖船一艘被击毁，陆战队大队长李泗

亭以下七百余人阵亡，同江失守。此役苏方亦有相当损失。

苏军乘胜进兵，又连续击溃了东北军自同江至富锦的驻守部队，歼灭东北松花江舰队的残兵。三十日拂晓，苏军沿松花江向前挺进，次日傍晚，占领了富锦。但苏军在此地没有久待，两日后即返伯力，东北海军亦撤回哈尔滨。

同江、富锦战役后，中苏双方仍无和解之意，继续调兵遣将。十一月中旬，中苏边界硝烟再起，密山、满洲里一带惨遭战祸。

十七日清晨，苏军步兵、骑兵和航空兵群向离边界四十公里的密山前进。傍晚，在空军掩护下，苏军很快击溃了东北军的步兵、骑兵和白俄杂牌军，占领了密山，缴获了七面团旗和大量武器。此次战役，东北军死伤逾千人。

几乎在同时，一场规模更大、伤亡更惨的满洲里、扎赉诺尔战役在西线打响。这是中苏冲突过程中最为激烈的一次大型战役。苏方参战的是外贝加尔集群，共八千余人，配备火炮八十八门、机枪四百九十七挺、装甲列车三列、坦克九辆、飞机三十二架。布柳赫尔直接指挥这场战斗。中方参战的是东北军第十五旅、第十七旅共一万五千人，配备机枪二十六挺、掷弹炮三十四门、火炮二十五门、装甲列车二列。

十七日清晨三时，苏军开始进攻。苏独立骑兵第五旅从阿巴盖图伊镇出发，切断了扎赉诺尔车站通向内地的铁路。苏步兵第三十五师随同骑兵前进，夺取了阿尔公会让车站，完成了对扎赉诺尔的合围。苏步兵第三十六师在坦克配合下，开始从北面和西北面进攻扎赉诺尔，东北守军第十七旅虽奋力抵抗，怎奈苏军兵强马壮，武器精良。十八日，扎赉诺尔被苏军占领。激战中，东北军第十七旅旅长韩光弟、副旅长魏长林、团长林选青等先后阵亡，团长张秀英于失败后自杀。

苏军占领扎赉诺尔后，于十九日完成了对满洲里的合围。

东北军企图突围，但苏军火力密集，突围未获成功。次日，东北军投降了，八千余人成了俘虏，全部火炮、装甲列车、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都成了苏军的战利品。

苏军在取得扎赉诺尔、满洲里战役胜利后，布柳赫尔威逼参战的东北军余部“放下并交出全部武器，以保证全体官兵的生命安全”，但遭拒绝。苏军决定追击东北军残部，二十三日，苏军占领了嵯岗站；二十七日，占领了海拉尔。

至此，中苏武装冲突基本结束。战役结果，东北军损失惨重。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宣称：“远东特别集团军毁灭性地打击了中国雇佣军和白匪。”

由于军事失败，张学良被迫声明同意恢复苏联在中东路的权益。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学良致电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李维诺夫，要求就中东路事件举行谈判。

十二月三日，双方在苏联境内的乌苏里斯克签订了《辽俄和平草约》,即《双城子草约》。其主要内容为:东北当局将中东路理事长吕荣寰撤职;苏方推荐中东路正、副新局长,以代替叶穆善诺夫与艾斯蒙特;双方宣称都要遵守中俄、奉俄两协定。

六日，东北政委会决定承认《辽俄和平草约》。二十二日，蔡运升与西门诺夫斯基分别代表中苏双方签订了伯力预备会议记录，即《伯力协定》，其主要内容为：两国息争；俄兵退出满洲里一带；中方解散境内白俄军并驱逐其将领；中东铁路恢复到本年七月十日以前中苏共管状态；彼此释放被俘军民，重开俄、辽领事馆；苏方推荐鲁德、简尼索夫为中东路正、副局长；定于一九三〇年一月二十五日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中苏正式会议。

《伯力协定》签订后，中苏边境颇为安定，政治空气日趋和缓。二十八日，蔡运升偕西门诺夫斯基等苏方人员拜见张学良，并将《伯力协定》在东北边防公署调印换约。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伯力协定》条文（左四为莫德惠）。

《伯力协定》的签订，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的心愿，令人欢欣鼓舞。但是，一波将平，一波又起。南京国民政府对中苏《双城子草约》和《伯力协定》与东北当局的看法相左，不仅对某些条款持有疑义，甚至采取公然否定的态度。

南京政府否认《伯力协定》，苏联方面坚持《伯力协定》，这使东北当局左右为难，特别是参加办理交涉的人员更觉尴尬。但由于苏联政府态度强硬，南京国民政府便对《伯力协定》采取了若干补救办法。

“九一八”之后，随着东北沦陷，中东路的中苏会谈已无法进行，不得已被迫停止。

日本占领东北后，不断制造障碍，使中东路不能正常运行。一九三二年，日本炮制成立了“满洲国”。苏联为避免在中东路发生新的冲突，建议日本和满洲国赎买中东路。经过一年多反复谈判，苏联最终以一亿四千万日元的价码，将中东路权售与“满洲国”。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东铁路与南满铁路合并为中长铁路。一九五〇年二月，苏联政府把管理中长铁路的权力和铁路的设施移交给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移交手续在一九五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完成。

奉苏之战，张学良损兵折将，不仅一无所获，且与苏联交恶。苏联认为此事件是中国军阀张学良挑起的反苏反共活动的前奏。一九三三年张学良下野后，曾有意去苏联参观访问，被苏联拒绝；西安事变爆发后，苏联大肆攻击，其中也包括这笔旧帐。

张学良要维护主权的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采用武力，轻启兵衅的办法是不可取的，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危害东北的主要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而不是苏联，这一点，张学良未能准确地把握住。同时，他过分相信和依赖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缺乏自主性。另外，这与他头脑中的个人英雄主义作祟也有相当的关系。

事后，南京外交部竟要将东北方面的谈判代表蔡运升撤职查办。张学良对此深为不满，他说："南京只管叫我们打，什么也不管。打既然不行，就得和吧，可是南京又不叫我管和的事，这简直是整我们呀！"

第三十九章　中原大战

1930．4

——“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为箕豆相煎之具。”

——“你请蒋先生下野，那么他下野，是你干还是我干呢？到底谁干呢？是你要干吗？”

——“孙馨帅，混到现在，你还给阎老七当别动队长吗？”

我当然不去，因为这谈不成的。平心而论，编遣方案，南京确有不公之处，各有各的打算，当然谈不出结果，以后的问题也是由此而来。

当唐德刚教授问到，东北易帜后，为何派王树常出席编遣会议而他自己不去时，张将军断然说道。

“一件事要看你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出于自私呢，还是爱

国呢?”赵一荻这时也在一旁插话道。她一针见血地点出了当时中国动乱的根源所在：各方各派，多为私，少为公。

东北易帜，全国统一后，蒋介石企图用军队整编的手段削弱阎、冯、李三个集团军的实力，于是，三派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骤然激化，各派之间杀戒大开，神州大地再起战火

一九二九年三月，蒋桂战争爆发。计谋多端的蒋介石用收买分化的手段，兵不血刃而定武汉，将李宗仁、白崇禧势力逐出湖北。

蒋桂战争之后，同年十月十日，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等二十余人通电反蒋，蒋介石稳住了阎锡山，又收买冯的将领韩复榘、石友三倒戈，结果冯军败北，退回陕西。

十一月，曾被蒋介石利用过的粤系军阀张发奎，发觉自己有被蒋吃掉的危险，就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联合起来，打着“护党救国军”的旗号，举兵反蒋。蒋介石急调何应钦入粤抵抗。结果，何与陈济棠联合打败了张桂联军，促其退回广西。

接连兵败李宗仁、冯玉祥、张发奎后，蒋介石愈加骄横跋扈，专擅之心日益滋生，国民党内各派对他的不满和对立情绪也与日俱增。

这时，阎锡山环顾左右，见惟独自己还有实力，决心联络一切反蒋力量，与蒋介石决一雌雄，以便实现独霸中国的目的。于是，蒋、阎之间渐呈水火不容之势。

一九三〇年元旦，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首先发表文告，斥责阎锡山、汪精卫等“以投机取巧为智，以好乱反复为勇，气节堕地”。

二月十日，阎锡山发“蒸电”，高唱“戡止内乱”、“礼让为国”、“在野负责”、“武力不足以统一全国”，要求与蒋介石同时下野。这一通电，引起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极大不安。

十四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谓目前正是吾人努力奋斗之

日，决非高蹈远行之时，公开与阎锡山的“引退说”相对抗。

第二天，南京政府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亦致电斥责阎锡山，谓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并申述阎欲与蒋共去之错误。

紧接着，蒋介石发表告军人书，希望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

蒋、阎双方互不相让，电报战日益加剧。二十二日，蒋介石电阎锡山，称本人下野，无异为反动者解除武装，阻止本党革命，劝其临崖勒马，维持和平，并望阎锡山速撤走入侵鲁西之晋军。



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中）、冯玉祥（左）、阎锡山（右）在河南开封会面。三人换谱后不过一年时间，便兵戎相见，混战中原。

此时，阎锡山为扩大反蒋阵线的力量，亲赴晋北，慰问幽居该地的冯玉祥。二十八日，冯玉祥返回太原，准备入伙反蒋。同日，阎锡山电复胡汉民，声称：“既不见谅，尚何多言。”

当时，张学良拥兵三十万，雄踞东北，对关内箭拔弩张的双方，可谓举足轻重。尽管关内各方都在极力拉拢他，都想利用他，但他冷眼相看，决定先不偏不倚，各打五十大板，呼吁双方避战息争。

三月一日，张学良发表通电，表明对时局的看法。电文曰：“当此之时，若不各捐成见，共息争端，势必至元气亏竭，根本动摇。而外人之环伺我侧者，求其大欲，亦遂起而乘之，自亡人亡，不演成灭国灭种之惨剧不止。……武力有时必需，而不可为箕豆相煎之具。”

三日，蒋介石复电张学良，历数阎锡山勾结平津反动派，破坏和平统一之事实，说阎锡山“不知有党国，只知有私利，做惯土皇帝，被宵小包围”，盼张学良仗义执言。

张学良通电的主要意思是倡导和平，让各方息争，他本人不想介入哪一方。遗憾的是，他的息争通电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相反，蒋、阎双方都在积极备战，准备大打出手。

十日，冯玉祥密回潼关，进行反蒋活动。十五日，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五十七名将领，分别代表西北军、山西军、广西军，发表反蒋通电，拥戴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阎锡山等发出的反蒋通电，张学良没有署名，至于阎锡山委任他为“副总司令”，张学良更认为是无稽之谈。阎锡山在要求张学良联名过程中变化无常，视同儿戏，张学良对此不以为然。

关于这一点，九旬高龄的张将军曾对唐德刚教授细说始

末。

是怎么回事呢？开始时，阎锡山在扩大会议之前给我打了个电报，并且我的秘书长还去过他那儿。那时，我们对中央不满，政治上不满，那么他阎锡山就说啦，咱们两个人，有这么个资格，我们两个人给中央政府去个电报，去个建议电报。就像今天人们常说的一样，要改革，什么事情都要改革一下。我就给他回电报说，我赞成，那么，你领头，你先拟个电报稿，我赞成。等到他们拟回来了电报稿，我一看，却变成了请蒋先生下野。哎，这是个什么事？我就给他回了个电报，我说你请蒋先生下野，可咱俩说的是请中央政府改革，你请蒋先生下野，那么他下野，是你干还是我干呢？到底谁干呢？是你要干吗？我说，你要叫蒋先生下野，我不署名啊，我不署名。

我特为派我的秘书长到他那儿，问他，你这是什么意思？咱俩开始的时候，咱俩来往的电报，你都说是要谏政中央，我答应了你，可你现在又要蒋先生下野，你要他下野干什么？后来他告诉我的秘书长说，蒋先生不走，你没法子改革。

孙传芳跑掉了，那是他害怕，这事是这样的。人哪，血气既衰，但却不甘寂寞。他在奉天当寓公，本来很好嘛。有一次，他到我现在的太太那儿，那时我在外面还有一个家，到那儿去见我，那是扩大会议要起来的时候。让他干什么呢？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是扩大会议的首领，他们让他到江南去活动，他当年曾是五省总司令、五省的宣抚使什么的。他就客气地问我的意见如何。但是事实上，他是想让我帮他点忙，不致于空手而去，给他点儿人马呀什么的，意思是如此。他那时还闹点腿上的病。我都管他叫孙馨帅。

他来问我，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说，孙馨帅，混到现在，你还给阎老七当别动队长吗？他听我这么一说，那就是反对了，所以，他也就没再吱声。等后来扩大会议召开了，我一

动作，他更害怕了，他怕我扣他，所以他就偷偷地跑掉了。

此时，南北双方调兵遣将，刀出鞘，箭上弦，生死大战一触即发。

在北方，三月十七日，冯玉祥向西北军下达了动员令。十八日，北平总司令行营卫队被晋军缴械，行营被接收，电政机关亦由晋方接管。次日，西北军东路过洛阳向郑州开进；二十一日，阎锡山在太原召开最高会议，任命徐永昌为前敌总指挥，张荫梧为津浦线前敌总司令，孙楚为平汉线前敌总司令。接着，石友三、孙殿英、万选才、刘春荣等将领通电响应。

三十一日，阎锡山在太原成立第三方面军总司令部，任命徐永昌为总司令，下辖十个军。阎锡山手谕全军："历年作战，我军擅守，今应作出攻击的事实予人看。"

与此同时，阎锡山在太原发表通电，宣布就任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冯玉祥、李宗仁亦分别在潼关、桂林就任副总司令职。

在南方，四月五日，蒋介石为讨伐阎、冯，通电全国将士说："阎逆锡山、冯逆玉祥存封建之心理，具军阀之积习，深恐统一将不利于其割据之野心，和平将消弭其作乱之机会，故处心积虑，必欲破坏统一而后已。……各将士须知，此役为封建军阀最后之挣扎，亦即革命战争最后之一幕。其各忠勇奋发，灭此朝食，以竟革命之全功，而奠国基于永固。"

四月七日，南京中央监察委员会决议，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九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十五日，蒋介石任命韩复榘、刘峙、何成浚分别为第一、二、三军团总指挥，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总指挥。二十七日，蒋介石视察平汉路，给部下壮胆打气。

至此，中原大战全面展开。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达长沙，北及河北，在绵延千里的战场上，尸横遍野，百万军队殊

死拼杀。民众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

大战伊始，双方都以陇海线为中心，以津浦、平汉两线为左右翼。从战争的进程上看，反蒋力量开始时处于优势，如阎军攻占济南，冯军在平汉线上攻入漯河，桂军亦先后攻下湖南衡阳等地，总之，各路人马都有斩获。

七月，冯玉祥决定在陇海线发动总攻势，以配合晋军夺取战略要地徐州。但由于阎军配合不好，加以冯军给养不足，未能如愿以偿。南方桂军又中途受阻。蒋介石趁机调动援军，增强陇海线防务。至此，双方互有胜负，战事呈胶着状态。

最初，张学良存观望态度。因为中东路事件刚刚平息，日本人一直在窥伺东北，有后顾之忧，而东北此时又亟需休养生息。

然而，由于他毕竟拥雄兵于关外，何去何从，将左右整个战局的成败：如张从阎、冯反蒋，则政治上、军事上对蒋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将促蒋倒台；如张从蒋袭阎、冯之后，进兵平津，则扩大会议将失其凭依，顷刻便会土崩瓦解。

因而，战端一起，双方代表云集沈阳，张学良遂成为双方激烈争夺的对象。蒋介石所派的代表有何成浚、方本仁、张群、吴铁城、刘光、李石曾；冯、阎方面所派的代表先后有梁汝舟、张维清、熊斌、秦德纯、贾景德、薛笃弼、门致中、邓哲熙、孔繁蔚、崔献廷、杨廷溥、傅作义；桂系所派代表为何千里等；以后，汪精卫又派覃振、陈公博、郭泰祺等人前来说项。

打着“中央”旗号的蒋介石，对张学良的争取真是煞费苦心。他不仅拉拢引诱，而且还封官许愿，贿赂收买。

早在三月三日，南京政府即明令青岛完全交东北海军维持，中央海军悉数南归。四月，南京政府又拨款五十万元，褒奖梁忠甲及东北边防军对苏作战阵亡将士韩光弟、魏长林等十

二人。南京代表吴铁城还在沈阳代表中央向张学良、王树翰授勋。六月三日，是张学良三十岁寿辰，蒋介石特派李石曾到沈阳祝寿。

二十一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群持委任状及印信至沈阳，劝张学良表明态度，立即出兵助蒋。三日后，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表示此时不便就任。

面对各派的拉拢，最初，张学良徘徊不定，未立即表明态度。他不但要观察形势的变化，同时，东北统治集团内部也持有不同的意见。

一九三〇年六月间，张学良召集东北要员在北陵举行高级会议，对是否出兵入关展开讨论，众人意见分歧。

以张作相为首的东北老派人物，坚决反对向关内出兵，主张东北军只应绥靖地方，保境安民，不与任何方面合作，尤其不应与蒋介石合作。张作相还颇风趣地说："我们吃高粱米的，哪能斗得起南蛮子，最好离他们远远的。"

张景惠、汤玉麟，汲金纯等老派人物，政治经验丰富，对蒋介石的为人认识较深，均持这种主张。

而新派人物王树翰、莫德惠、刘哲、刘尚清、鲍文樾、沈鸿烈等人，却赞同与蒋介石合作，企图在"合作"中求得个人的升发。

在两派的争执中，张学良举棋不定，迟疑不决，遂决定继续"坐山观虎斗"，窥测时机，再定进退。

第四十章 武装调停

1930．9

——“我自一九二六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

——“我就说阎百川、冯玉祥他们不智，他们就不想想，我那时东北那么些军队在你旁边待着，我要一动，你可怎么办？”

——“通电出兵，意在避免战事，求得真正和平。”

谁能统一中国我就拥护谁。蒋先生有理论，有能力，是个领袖人物。三民主义有一民族主义，对内主张民族平等，对外反对帝国主义，讲得好。咱们不能等人家侵略进来再拥护统一，那时候再请求中央支持就来不及了。

“我看蒋先生做中国的领袖，够格。”在一次去北陵打球的

路上，张学良对赵四小姐说，“蒋的言谈举止，像个领袖的派头。阎锡山不行，穿个大衫，像个买卖人似的。”

当时随侍在旁的鲍文樾回忆说：“张学良平时不好议论人，他的话只和赵四小姐讲，他知道跟赵四小姐说走不了消息。我在旁边他也不避讳我，因他知道我没有旁的社会关系，不会去跟别人说的。”

我来说说阎锡山。是不是你告诉我的，还是王铁汉告诉我的，说是徐永昌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阎锡山战不过我。阎锡山这个傻瓜，扩大会议时他拼命要拉着我，我从来是模棱两可的，他要给我这个部长，那个什么地位的，我从来没说反对，可也没说答应。干政治这事，我总是模棱两可，他就没有想到，我摆着那么些军队，我的军队一出去，你怎么样了？我在山海关摆着那么多军队，他一点儿也没有防备这一手啊！

不仅丝毫没有防备，当时，阎锡山对张学良竟然那样信心十足，那样一相情愿。

“你们告诉汉卿，蒋介石不是个好人，”阎锡山对他的游说代表薛笃弼说，“他利用你的时候就用种种手段拉拢你，用不着你的时候就过河拆桥，一脚踢开，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就是镜子，希望汉卿和俺们携起手来，共同倒蒋，同心协力来救国。这里有俺和焕章给汉卿的一封信，还有几条合作的办法，你们带去面交汉卿。俺们一定和他共患难到底，决不骗他。”

薛笃弼回忆说：“我约略记得信内大意是：蒋介石专横自私，排除异己，要救国必须倒蒋。合作办法内最后有这样几句话：一心一德，共同救国，相见以诚，信守不渝。”

一九三〇年七月，张学良到葫芦岛主持建港开工典礼，并借机到北戴河休养。于是，各派代表跟踪而至，群起包围张学良，竭力拉拢这位拥兵三十余万的“东北王”。一时间，张少

帅像婚礼中的“新郎”一样成为政界、军界的焦点人物。

在这场政治交易中，各派代表各谈条件，各出价码。这其中，以蒋介石出价最高。蒋介石不但委张学良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还将河北、山西以至整个华北交张学良控制，并送上现金六百万元给张学良支用。蒋介石对派去的代表说：“只要能达到拉拢张学良的目的，可在中国银行任意提款，不拘数字。”

当时，张学良的副官、马弁都被吴铁城收买拉拢，张学良的一切行动，他们都了如指掌。不仅如此，蒋介石更出价现洋三百万元，分化、收买东北军的马廷福旅长，诱其叛张归依南京。

这时，坐镇东北的张作相恐张学良被各派误导，急忙致电少帅，力劝曰：“须始终恪守原来的态度，勿为甘言所动，勿为威武所屈。”

张学良亦复电表示：“名分决服从中央，举动必以东北四省福利为前提而慎重考虑。”

尽管张学良一再采取克制态度，善守中立，奉劝各方息争，但此时他已有助蒋的腹案，尤其在南京代表吴铁城、张群等催促之下，他迫不得已向他俩口头表示：如蒋军攻下济南，东北即可出兵。张学良还把这个意见通知了阎锡山的代表贾景德。

我看还是蒋介石能统一中国。我要帮阎锡山，这个仗还得再打个三年五载。我刚刚把兵撤出来，刚刚停止内战，要再反蒋，内战什么时候算完？要结束内战，只有拥护蒋介石。

自七月后，反蒋集团内部因各存心计，互不配合，加之蒋介石的挑拨离间、收买拉拢，战事对其益加不利。蒋介石抓住时机，组织反攻，决定把晋军作为重点打击对象，将津浦路当作主要战场。八月一日，将军分三路沿津浦线向北发起总攻

击。晋军支撑不住，向后败逃。十五日，蒋军占领济南。

在中原大战如火如荼地进行之际，反蒋的扩大会议亦在筹备之中。七月，汪精卫亲抵北平。此后，反蒋各派多次召开会议。八月七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第一次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央会议宣言、规则、组织大纲等文件。

扩大会议之后，汪精卫、阎锡山等人立即筹备成立反蒋的国民政府。委员包括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七人，以后又增加了石友三、刘文辉二人，阎锡山为主席。为争取东北军，阎锡山等人准备在政府内容纳多名东北人士，然而，张学良对此加以拒绝。

为说明真相，以正视听，九月五日，张学良电告蒋介石曰："近日谣言自出，实已辩不胜辩。钧座之明，想能洞察。"

同日，张学良亦电告阎锡山："顷接扩大会议东电，得悉北平组织政府，并推学良为委员之一，查此项计划事前良未得与闻，且以各种关系，对于委员一席实不能担任，特此电陈。"

八日，阎锡山在扩大会议第八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说蒋介石有四个必败：一曰与党为敌必败，二曰与国为敌必败，三曰与民为敌必败，四曰与公理为敌必败。阎锡山还致电张学良，以北平政府各部长之半数悉归张支配，请求赞助。九日，北平国民政府正式成立，阎锡山举行登基大典。

蒋军攻下济南后不久，八月底，张学良从北戴河回到沈阳，电邀吉林、黑龙江、热河三省和哈尔滨特区首脑赴沈阳。

九月八日，张学良在北陵召开东北最高军政会议。与会者中，除汤玉麟因防务缺席之外，其他各巨头如张作相、万福麟、刘尚清、袁金铠、刘哲、王树翰、臧式毅、沈鸿烈、方本仁、张景惠等均出席了会议。此外，孙传芳、顾维钧、罗文干、荣臻、王树常、鲍文樾、于学忠亦列席会议。

会上，各方争执激烈，共出现三种意见：一是主张参加北方政府；二是主张出兵助蒋；三是主张继续调停，维持现状，保境安民。

会议至十日上午八时，仍未有任何结果。十一日继续开会。至十二日午后，又召中将以上军官列席讨论。十五日上午，汤玉麟又赶赴到会。

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张学良召开最高全体会议正式会议，继续讨论对时局应持的态度。

会议上，张学良作了重要发言，他说："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如欲抵御外侮，必须国内统一。我自一九二六年即主张停止国内战争，早日促成统一。先大元帅在世时，我曾迭次进谏，未蒙采纳。一九二六年，先大元帅曾派韩麟春赴山西见阎锡山，请他与我们合作，我们也绝不干涉山西的事务。阎锡山表示同意，韩麟春满意而归。但为时不久，阎锡山即将大元帅派往山西的使者于珍扣留，并由娘子关出兵，与我方作战。韩麟春由于阎的失信，气愤病死。阎、冯二氏的为人，一向反复无常，北洋系统的覆灭，二人应负其责。目前阎、冯合作，事如有成，二人亦可能决裂。且以国民革命军系统而言，阎、冯本应为国民党的一部分。至于扩大会议，西山派原本诋汪、陈为赤化，改组派亦骂邹、谢为叛徒，暂时的结合，将来仍须水火。蒋介石亦系一阴谋的野心家，在他的阴谋里，本想以军事解决西北，以政治解决西南，以外交解决东北。他与我们，亦无特殊的关系。从马廷福的叛变，更可看出他不顾友谊和不择手段。不过目前国事日非，如非国内统一，更不足以对外。我们为整个大局计，必须从速实现全国统一，早停内战。最近阎、冯的军队业已退至黄河北岸，蒋军业已攻下济南，我方似应实践出兵关内的诺言。"

至此，与会者对于张学良的主张均无相反意见，一致通过

了出兵调停的议案。

三天后，张学良发出拥护中央、呼吁和平的“巧电”，电文中称：“良曾规劝各方，勿以兵戎相见……战端一起，七月于兹，庐里丘墟，人民涂炭，伤心惨目，讵忍详言！战局倘再延长，势必致民命灭绝，国运沦亡，补救无方，追悔何及，此良栗栗危惧者也……良委身党国，素以爱护民众、维持统一为怀，不忍见各地同胞再罹惨劫……吁请各方，即日罢兵，以纾民困。”

我每次打仗都是为了国家统一。所以阎百川那时没有想到，他没有想到我会干那么一手。我就说阎百川、冯玉祥他们不智，他们就不想想，我那时东北那么些军队在你旁边待着，我要一动，你可怎么办？他就没想到这个，他以为我不会动。那么，我军队一出来，你们不立刻就完了吗，不就垮了吗？我的电报就是武装调停，我的调停包含两个意思：谁不听，我就打谁，你中央不听我的，我就帮着你打中央，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的话是两说的。我就是要让中国停战，不要再打仗了。

阎派人来谈，我都是只听不语，阎却还看不出我的意思。我说就像两个人打架，我在旁边抱臂冷眼看着，你还不警觉吗？阎锡山何其钝也！等到通电发表，我就叫董英斌率部开上火车，向北平直驶，我说若阎军阻止你，我后面部队立刻跟上，于是，董的先头部队乃一路冲到北平，冲垮了扩大会议。

呼吁和平、希望息争的“巧电”发布后，张学良对天津《大公报》驻沈阳特派记者胡政之发表谈话说：“今日兵连祸结，徒苦吾民，而双方绝对的胜负，似均无大希望，故余不得已而被迫出兵干涉。”

张学良决定武装调停后，即任命于学忠为第一军军长，王树常为第二军军长，率步骑兵共十个旅及炮兵团，共约十万之众，整装待发。


...mter Diplomatenbesuch in Berlin. — Deutschland
...Schulwesen. — Das geistige Niveau des Volkes soll ge...

張學良將軍

赞助中国统一主张世界和平

Die chinesische Schrift neben dem Bild bedeutet: ... Chang Hsiao-liang, General des Chinesischen Reiches, Diktator der Mandschurei, ... Sein Ziel ist die Einheit Chinas und der Friede

德国一家报纸称赞张学良制止中原大战，维护国家统一。

出发前，张学良对于学忠说："我们这次入关，乃是为倡导和平，促成统一。东北军以往三次入关，名声均为不佳，尤以张景惠率部入关那次军纪最坏。这次是第四次入关，一切事我都交付给你啦，你要往漂亮处去做。"接着，张学良征求于学忠进兵的意见。于学忠说："我想有两个办法。第一是一枪不放，使地方不受丝毫糜烂，国家不遭些许损失，并可与晋军

保持友谊。第二，如万一用兵，我认为在娘子关方面，可作佯攻的姿态；而另派劲旅直趋大同，山西可指日而下，并不费多大的军力。不过，我们如取下山西，亦难免不为蒋介石所忌。同时，这与我们此次出兵的本意亦不大符合。"

张学良当即同意于学忠的建议，决定采用一枪不放的办法进兵关内。

通电的发表和东北军的入关，加速了阎、冯派的失败和北平扩大会议的瓦解。九月十八日当天，阎锡山自石家庄发表通电，称因军事失利，不可收拾，惟有解除兵柄，宣告引退。

次日晚，汪精卫致电张学良，提出四项主张：第一，立即召开国民会议；第二，立即召开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提倡民主，反对独裁；第四，共同对付共产党。但张学良对此未加理睬。

二十日，南京政府孙科等人致电张学良，称张的十八日通电是"循正轨以遏乱萌，崇中央而消反侧，旭日冲腾，阴霾荡扫，祥云焕朗，河溯澄清，为党国之干城，懋勋劳于柱石"。一时间，溢美之词不绝于耳。

蒋介石趁此有利时机，向阎冯军发出劝告："中正与诸君曾共患难，情同手足。诸君今日已无可退无可逃，实亦不必退不必逃。……虽取包围之势，决无剪灭之心。战事早一日停止，国家危险与人民痛苦皆得早一日解除。中正敬以至诚，再进忠告。"

九月二十日下午，东北军董英斌第五旅先期抵达塘沽，二十一日，直趋天津。二十二日，董旅全部进抵北平。二十四日，东北方面派何丰林、王树常、邢士廉、陈兴亚等为接收平津军政机关专员。次日，东北军第一军军长于学忠抵达天津，发表"拯救民生，消弭战祸"的演讲。二十七日，南京政府任命王树常为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

十月三日，蒋介石又发出“赦免政治军事罪犯”通电，声称：“所有政治与军事上之罪犯，概予赦免，取消通缉，复其自由，并仍得享受一般公民应有之权利。”蒋介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安反侧而定人心，塞乱源而固国本”。

东北军入关后，张学良在答《东三省民报》记者问时说：“此次战争已延长达七个月之久，各处直接受灾者，死亡枕藉，惨不忍睹。即幸免于战祸者亦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长此以往，势将全国糜烂。本人前发通电，原冀止乱于未萌，此次又发巧电，实欲挽救于事后，仍恐空口主张，无裨事实，万不得已，继以出兵，意在促进和平，保全民命。师行所至，对乱党极力防止，对人民加意抚绥，至一切可以免除之杂项捐税，必于可能范围内设法免除，凡此情形，皆为人所共见也。”

记者问：“出兵后第二步办法及接收平津各机关经过情形，外间有种种传闻，真相如何，可得闻否？”

张学良答：“通电出兵，意在避免战事，求得真正和平。辽宁拟共出四军，已出动者两军，如至必要时，吉、江、热更可续出二军。所谓第二步办法者，亦不过至必不得已时，于可能范围内设法贯彻维持和平之夙愿，不使别生枝节耳。至关于接收平津各机关一节，当第一军进驻平津时，并未办理，虽平津各团体及人民再三催请接收，仍未肯派一人前往。后张、吴二代表转示中央政会及蒋主席电令，所有平津一带军政各事，由本人全权负责，始于日前派人前往接收，以维持秩序，俾无停顿。”

在国民党中央军和东北军的联合夹击下，阎、冯军队迅速土崩瓦解。

九月下旬，阎锡山和石友三的部队分别撤到山西和河北新乡一带，冯玉祥部也向河南、陕西方向溃退。与此同时，冯军吉鸿昌、梁冠英等将领纷纷前线倒戈，接受蒋介石的委任。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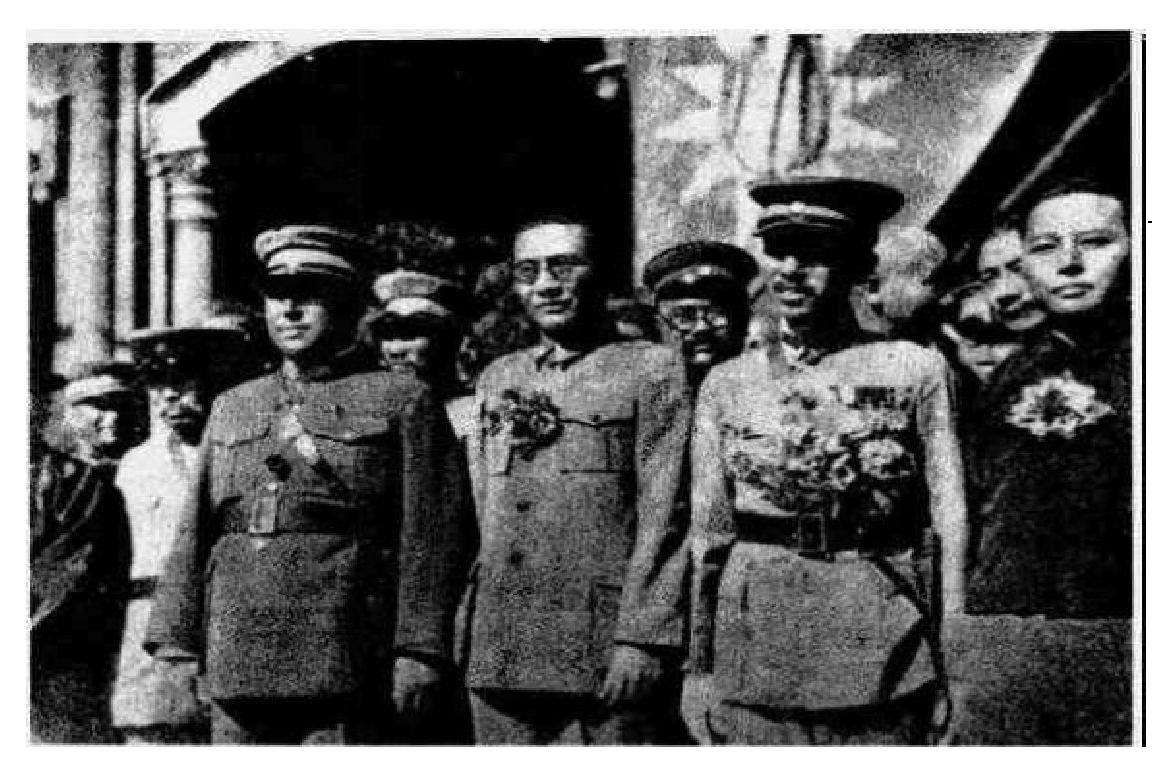


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礼堂
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职。

友三部也反戈一击，归附了张学良。十月一日，蒋军攻陷许昌；三日，占领开封；六日，大军开入郑州。

就在东北军向关内大举进军的同时，张学良的就职仪式亦在进行之中。

十月九日，张学良在辽宁省政府大礼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吴铁城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张群代表国民政府进行监督，并致训词，张学良作答词。各国领事及各机关、各



张学良（左三）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与张群（左四）、吴铁城（左二）、张作相（左一）合影。

法团之领袖均应邀参加，到场者达七八百人。九架飞机翱翔空中散发传单，仪式极为隆重。

吴铁城首先致词说："本党政府特以此重任，付托张副司令者，知张副司令笃信本党之主义，接受国民革命之使命故也。此次振旅入关，拥护中枢，削平内乱，即所以贯彻年前易帜、促成统一、维持和平之主张，故义声所播，逆贼胆寒，戾气潜消，和平复睹。"

张群的致词是："今日张副司令举行庄严伟大之宣誓就职典礼，以副党国之厚望，而慰民众之喁望。鄙人代表国府，参予盛典，谨以满腔热诚，表示最诚挚之敬意，并述个人之感想如下。今张副司令就职之后，更可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辅弼中央蒋总司令奠定大局，办理军事善后，俾政府得以从容

建设，此诚国家长治久安之计，万世不朽之盛事也。愿张副司令与蒋总司令共同努力图之，幸甚幸甚。”

张学良的答词是：“今学良遵奉国民政府命令，就任陆海空军副司令之职，蒙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颁示训词，敬聆之余，无任领惕。窃今国事，时艰方极，才薄任重，深惧弗胜，惟有恪遵总理遗训，努力职守，俾尊邦基益臻巩固，统一早告完成，藉答党国诲勉之殷，而副全国民众期望之雅。谨志数语，希鉴微忱。”

此时此刻，蒋介石扬眉吐气，得意非凡。就在张学良就任副司令的这一天，十月九日，他自郑州飞回离开已近半年时间的南京，基本完成了指挥中原作战的任务。二十二日，南京隆重召开祝捷凯旋大会，各界齐声称赞蒋介石为“党国干城”。

十月下旬，蒋军乘胜追击，深入冯玉祥的统治中心陕西。二十五日，杨虎城部奉蒋之命占领潼关，紧接着，于二十八日占领西安。

至此，为时八个月的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和阎、冯的失败宣告结束。

张学良的武装调停对迅速结束中原大战，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消弭内战，再造统一，少帅此举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写下了绚丽的一笔。

第四十一章 载誉赴京

1930.11

——“本人今后自当谨遵总理遗教，随同兄长，尽忠党国，努力于职守，以求国家与民族的繁荣！”

——“世界上最下等的动物，就是拿权力保护它们自己。十年不打仗，十年休养生息，则国家立即富强。”

——“既然与人合作，就要诚心诚意。”

“愿一切听命中央，并拟择地与蒋主席晤谈，商定维持治安与改善全国状况之程序。”

张学良就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后不久，于十月二十九日发表谈话，明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原来，张学良“巧电”发表后，战争风云急转直下，东北

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进军平津，军行所至，不战而胜。

当时，反蒋各派最担忧的就是"东北虎"南下。当东北军刚刚出关，大军尚未抵达时，反蒋各派的北平"国民政府"便顷刻瓦解。阎锡山这位昙花一现的"主席"刚一即位，即狼狈逃出北平。

反蒋派人物最初群集于石家庄的"正太饭店"，后见形势日危，立即逃往太原。阎锡山则仓皇化装后潜往天津，后转乘日舰到大连避难去了。

东北军出关，为蒋介石立了"大功"。从此，在一段时期内，实现了蒋、张的密切联合。为答谢张学良的"功绩"，蒋介石授他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等八省区军队之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奉系管辖。

这样一来，大批东北系人物"官星高照"，相继被南京政府委以军政要职。如张作相、王树翰任"国府委员"；张景惠、刘尚清分别被委任为内政部长和军事参议院院长；鲍文樾被任命为参谋部次长，参与要津。在华北各省市，包括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市长，均由奉系人物担当。蒋介石的这笔交易，俨然是与张学良平分天下，这使年轻的张少帅确实有点飘飘然，如坠云雾之中。

中原大战结束后，有许多遗留问题尚待解决。为更好地处理善后问题，张学良决定去南京征求意见。同时，蒋介石也热情邀请张学良出席正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中全会。

启程赴南京的那天，赵四小姐特意为张学良穿上了那套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的军装，并帮他在胸前佩戴上国府新近授予他的青天白日勋章和一等宝鼎章，从而使少帅显得更加威武英俊，雄姿勃发。

十一月七日晚十时五分，张学良由沈阳启程南下。随行人员有秘书长王树翰、秘书处长叶弼亮、参议厅长何丰林、参谋

处长鲍文樾、副官长黄显声、卫队统带刘多荃、总务处长朱光沐、侍卫副官长谭海、军需处长苏全斌等人。南京方面的代表吴铁城、张继等同行。南京政府为表示隆重，竟派上海市长张群、国府参军长贺耀祖自济南北上前往天津迎接。

八日，张学良抵天津，在津本宅内接见党政军各界人员和记者，忙碌终日。

十日晚六时，张群、贺耀祖抵津，偕同吴铁城等人在车站谒张学良，代表蒋介石及国府致欢迎南下之词，随即于六时五十分陪同张学良经天津南下驶往南京浦口。

一路上，军警保卫甚严，小站一律不停，各大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军民热烈欢迎。每到一站，几乎都可看到"欢迎促进统一"、"巩固边防"、"劳苦功高"、"竭诚拥护中央之张副司令"、"和平息戈的使者、国家统一的表率"等红红绿绿的标语。

据随行人员回忆说："专车所经过的大小车站，军人行持枪礼，农、工、商行鞠躬礼。十一日晨七时专车行至山东济南府停车休息时，山东省主席韩复榘、河北省主席李景林，以及各界官员前往车站迎接。张将军在火车上接见了韩复榘和李景林，我们随行人员下车休息。火车将要开动时，正在泰山脚下搞训练的十五路军旅长以上军官跑步来到车站，向张将军敬礼送行。从济南出发，又挂了一列压道车在前面开路。"

为迎接张学良的到来，南京政府作了周密的布置。十一月十二日晨六时，长城号铁甲压道车先期抵达，停在浦口站三号月台上。稍顷，卫队车被拖带至一号月台。六时五十分，张学良的专车到达。

这时，军乐声大作，将士们皆举枪致敬。张学良身穿黄哔叽军服，肩披酱黄色大衣，双手着白色手套，精神抖擞，气宇轩昂，被众人簇拥着走下专列。


张学良（左）与前来迎接的宋子文（右）步出车站。

到车站欢迎的有党国要员何应钦、王宠惠、李石曾、朱培德、王正廷、宋子文、刘纪文、马福祥、邵力子、张之江、刘镇华、刘峙、马鸿逵、何成浚、魏道明、刘瑞恒、谷正伦、吴思豫、陈仪、王家桢等以及他们的夫人们。众要员频频趋前，争先与张学良握手。

张学良一行步出浦口站，乘威胜号军舰渡长江。行至中流，威胜舰以信号示停泊在江心的通济舰，该舰官兵齐聚甲板上，高奏欢迎上将军乐曲，并举枪致敬。奏乐完毕，鸣礼炮十九响。与此同时，停泊在江中的各国商船、军舰亦悬旗致敬。

上岸后，张学良一行乘汽车来到南京政府官邸，蒋介石带领国府大员们在门前恭迎。一见到张学良，蒋介石马上急步上前，紧紧握住张学良的双手，旋即又张开双臂，一边拥抱，一边连声说道："欢迎你，欢迎你啊！"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蒋介石夫妇在南京迎接张学良夫妇时合影。前右二、三为蒋介石和宋美龄，左二、三为张学良和于凤至。

"委员长，非常高兴见到您！见到您倍感荣幸！"张学良本是个易于动感情的人，他一见蒋介石如此热情，眼圈禁不住湿润了。

两人携手步入大厅。这时，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镁光灯明灭闪烁，争拍这南北两大领袖非比寻常的会见。蒋介石对于这种场合应付裕如，他扯扯张学良的衣襟，然后摆出一副笑容可掬的样子，让记者们拍下他跟张学良的合影。

随后，张学良又乘车直驱位于湖南路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张学良乘坐的专车由摩托车作前导，达官贵人的座车紧随其后，车队浩浩荡荡，缓缓行进，威武壮观。车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民众，他们伫立在马路两旁，翘首相望，争睹这位再造统一的少帅的风采。

中央党部坐落在绿树、草坪、水榭、花坛之中，幽静典雅，美不胜收。张学良正欲提出参观一下建筑独特的党部办公大楼，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轻声告诉他，开会的时间到了。于是，他俩便同坐一车，前往四中全会会场。

在嘹亮的乐曲声中，张学良和蒋介石携手走下汽车，踏上了铺有红地毯的甬路。军乐演奏完毕后，张学良本以为欢迎仪式已告结束，正欲挥手向乐队致意时，突然，不知从哪里又涌出一大群穿得花枝招展的少女。军乐队指挥的手杖一挥，乐队重又奏起了欢快的舞曲，少女们手持彩带，载歌载舞，有节奏地呼喊着："欢迎张副司令！""向张副司令致敬！"欢迎仪式令张学良目不暇接。

在极度兴奋之中，上午九时，张学良出席了四中全会开幕典礼；十时，至国民政府参加总理诞辰纪念礼；十一时，拜谒总理陵墓；十二时回暂作行辕的宋子文宅邸休息。

当天，几乎每参加一项活动，张学良都受到了形式别致的热烈欢迎，他全天都沉浸在欢快和激动之中。当晚，蒋介石举行盛大的酒宴欢迎张学良。

"余对党国无多贡献，而党国却委以重任，深觉惭愧。"宴会上，张学良致词说，"此次来京，承热烈欢迎，无任感谢。亲聆各要人名言谠论，深为欣慰。嗣后更常恪遵中央旨意，努力边防。"

酒过三巡，张学良兴奋之至，他激动地站起来，面对挂在墙上的孙中山遗像，慷慨激昂地说："本人今后自当谨遵总理遗教，随同兄长，尽忠党国，努力于职守，以求国家与民族的繁荣！"

"好，老子英雄儿好汉！蒋兄今后决不亏待你！"蒋介石也站起来，摇动着光脑壳，一只大手猛地拍在张学良的肩上，动情地说。



张学良与蒋介石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

这时，宴会厅里，桌椅响动，全体起立，酒杯碰撞，欢腾的浪潮在大厅内荡起。

此次，南京政府欢迎张学良礼节之隆重，场面之热烈，规

格之高雅，乃是南京政府自建立之后所绝无仅有的。张学良受宠若惊，感激涕零，连夜电告东北军政要员们说："学良此次来国府，受到蒋主席极为热忱之欢迎，规格之高，实出学良所想像，望各界静候佳音，学良将会赐福于民众。"

张学良在南京期间，既要参观游览，又要参加三届四中全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发表演讲，因而十分繁忙。在南京期间，每次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蒋、张两人总是并肩而行。摄影时，张与蒋总是并立前排中央，蒋并介绍张学良加入了国民党。蒋介石私下对张学良说："北方冯、阎等人脑筋太陈旧，你是青年，是有朝气的，我们两人合作，就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

当时，在南京政府中，张学良一度成了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

十六日下午，在蒋介石的引导下，张学良率东北文武官员六十余人恭谒孙中山陵墓，卫队八百余人由刘多荃带领一同前往，蒋介石对卫队讲了话，以彰显蒋、张之间的亲密无间。他说："总司令的侍卫就是副司令的侍卫，副司令的侍卫就是总司令的侍卫。"

接着，张学良讲道："今天听总司令训话，就是要遵照总理之高尚人格及主义，要一致服从蒋总司令，方可做一个好军人，好国民。军人为民众前锋，应切实做来，以打倒帝国主义。"

十七日上午，张学良参加第八十六次总理纪念周，并在会上发表演讲。他说："余自十九岁参加实地战事，不拘胜败如何，余之所经验者，每时倍感痛苦，因余所到之处，每见闻民众感受战争之困苦灾难。窃思青春国民之血潮，流失于如此无味之争斗，洵为耻辱，此种之血潮流于守护国权，乃为当然者耳。"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就任国民政府委员时合影(右三为张学良，左四为蒋介石)。

他痛斥内战，义愤地说："世界上最下等的动物，就是拿权力保护它们自己。"

他主张持久的和平，并乐观地认为："十年不打仗，十年休养生息，则国家立即富强。"

于凤至没有与张学良同车前往。当时正值辽西大水，于凤至在沈阳主办赈济会，所以她是在张学良之后，另乘专车偕张学铭夫人等三十余人，于十八日抵达南京的。

欢迎于凤至的仪式由蒋夫人宋美龄一手承办。于凤至一下专车，宋美龄便扭动着腰肢快步迎了上去，亲热地与之紧紧拥抱，充分显示出她作为中华民国"第一女性"之风采和魅力。

同日，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闭幕，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院长。张学良在大会上提出一项建议，即国民要注重体育，以健全体格，发扬民族精神，结果被大会采纳。



蒋介石宴请张学良夫妇后合影（左起：张学良、宋霭龄、于凤至、宋美龄、蒋介石）。

当天晚上，宋美龄在私邸设宴为于凤至洗尘。她几乎没有安排什么政治场面，一切都是采取家庭的、女性的方式。这使本来并不太善交际的于凤至很快对她产生了亲密感。几天下来，两人穿梭交往，形影不离。宋美龄的母亲宋老太太见三女儿与于凤至如此亲昵，而于凤至的品性又是这样的文雅娴静，便决意认于凤至为干女儿。

二十五日，张学良致电祝贺蒋介石兼任行政院长，贺电曰："奉读敬电，恭谂荣膺推选，兼秉政权，仰郅治之隆，慰斯民之望，宣劳党国，实至名归。遥听下风，曷胜忭跃。谨陈贺悃，敬请崇安。"

同时，张学良还电告坐镇东北的张作相说："四中全会惟一成绩，即蒋氏能兼行政院长。大权集于一身，蒋氏能否以其



张学良参加孙中山雕像揭幕后与蒋介石等合影。

治军之勇，在政治上转危为安，吾人刮目以待耳。"

十二月二日，张学良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讲，倡导学科学、用科学。

"现在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依据科学。科学是万能的。本党党员不应在社会上成为一个特殊阶级，我们要尽胆力去做工作。现在训政时期，我们要训练民众。所以，我们不是来享受的，是要用科学的精神去求发展的。"

"现在的中国已不是五六年前的混乱状态，现在是和平的统一的。我们中国要谋在国际上提高我们的地位，一切事情都要本着科学的方法去做。"

次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张学良报告了东北外交、经济、政治情况。他呼吁说："东北地处日、俄两大国之间，处境困难，深望永息内争，修明政治，共御外侮。"

当时，张学良下榻财政部长宋子文的豪华官邸。三个星期



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等在中山陵前合影。

里，他同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高官们举行了一系列会谈。会谈中，张学良向蒋介石就中国统一问题陈述了自己的想法。

我当时就认为，中国统一乃是阻止列强的侵略、取得真正独立的前提，破坏统一的行动是不能容许的。希望以和平的手段实现统一。内战只会削弱国力，涂炭生灵，有利于帝国主义各国。

制定和实施宪法，推行议会政治、实行民主主义，以和平的手段建设新中国。万不可以武力统治镇压民众。

希望对挑起内战的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旧军阀采取宽大态度。不可逼之太甚，以免再生事端。

愿意承认蒋介石为拯救中国的英雄，也同意推举他为领袖。希望蒋对国民政府的其他人物或其他军阀，也能一视同仁。对共产党也是如此。

蒋介石对张学良热情洋溢的言论，大体上没有异议。他恭维张学良年轻聪明、老成练达、思路清晰。对于张学良在危难之际帮助了自己，他更是没齿不忘。

蒋介石对张学良只强调了两点：一是希望他坚守东北地区，无论是资源人才，还是对中央政府的忠诚，东北乃是新中国力量的源泉；二是对共产党的看法，他说他不敢与张学良苟同，蒋介石认为，无论从思想上还是从行动上来看，中国共产党都是苏联的走狗，是为害中国的奸贼。

南京期间，是张学良一生中最得意最美妙最难忘的时刻，也是他和蒋介石最为和谐亲密的阶段，这是蒋、张合作的“政治蜜月”。

南京晤蒋后，更增强了张学良对蒋介石、对国民政府的依赖心理。当然，张学良是以入伙的心情与蒋介石合作的。他希望蒋介石能统一中国，共御外侮；同时，他自恃是带着几十万大军与广大东北地区实力与蒋介石合作的，自应成为蒋介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左右政局的人物。

张学良在南京完成了他的使命后，为及早处理北方善后问



辽宁省及沈阳市各界人士举行盛大欢迎会。会后，张学良（左八）与全体人员合影。

题，便于十二月四日下午七时离京北返。

南京方面对张学良的欢送，同欢迎仪式一样隆重。南京高官百余人前往送行。高凌百奉蒋介石命令，随送至天津。

六日晨七时抵达天津后，朱光沐代表张学良对记者发表讲话说："此次赴京印象极佳，张副司令与党国要人感情融洽，其惟一希望中国从此统一，不生内战，入主建设。"

蒋介石在南京盛情接待张学良，曾引发部分国民党元老，如胡汉民等人的非议。

"你跟胡汉民的关系怎么样？他为什么反对你？"采访时，唐教授问张将军。

很多人说胡汉民反对我，曾极力反对蒋介石让我做陆海空副司令。

不是，不是的。其实，他没有反对我。他呀，不是这个意思，当年有人弄误会了。我到南京的时候，蒋先生对我非常的客气，当时，我是国民政府的委员，还给了我的秘书长做了考试院的院长。胡汉民当时责怪蒋先生说，你不应该这样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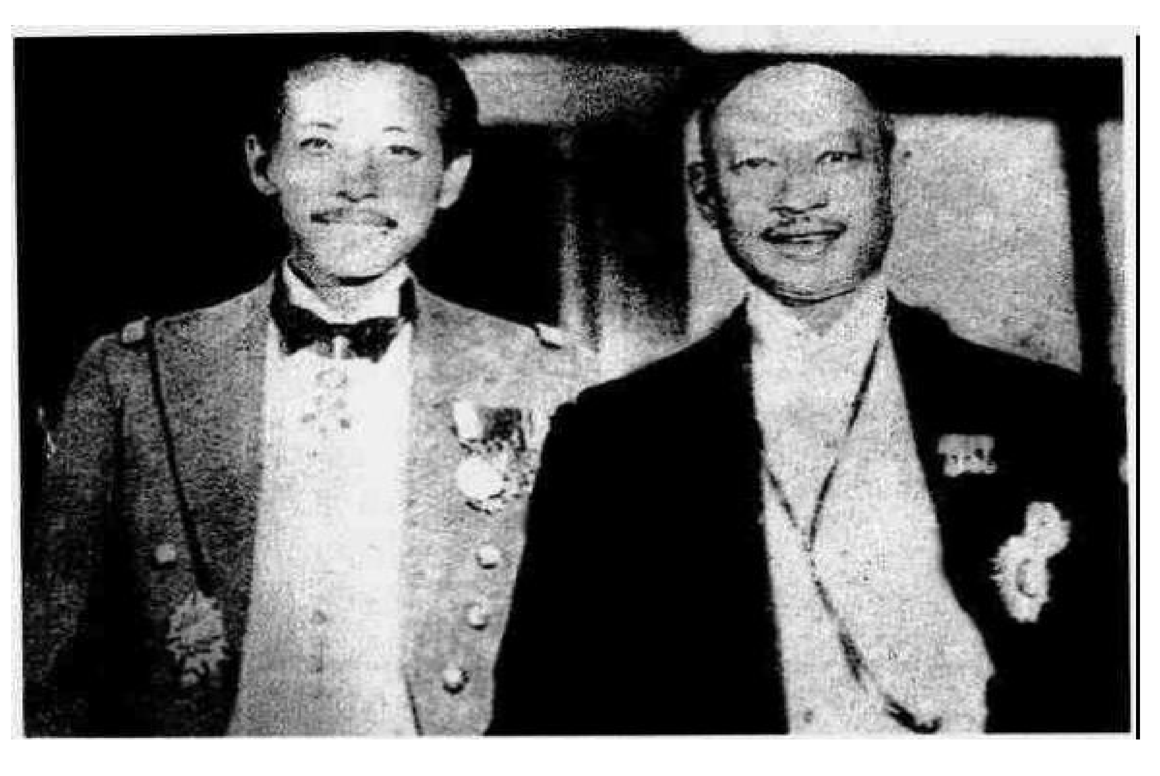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年三月，张学良夫妇在北陵别墅宴请丹麦王子爱瑟尔亲王夫妇并合影。

是个年轻人，你应该实实在在地好好地待他。说起来，胡汉民这人还是相当正派的。

当时，张学良认为，"既然与人合作，就要诚心诚意"。后来，张学良把东北的海军共三万零四百吨的二十多只舰船全部给了蒋介石，总吨位大大超过蒋介石所原有的，其中海圻、海琛等舰是当时国内吨位最大的；蒋介石没有独立的炮兵，张学良便拨一个炮兵旅送他，连炮兵司令邹作华也陪送了过去；张学良把最好的空军教官也送给了蒋介石的航校；中央军校缺少装甲车与反坦克器材，向东北借用，张学良也连器材带教练一齐送了过去。

蒋介石爬上南京最高权力宝座以后，与各地方实力派总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这其中，能给蒋介石以实际帮助、并维护其统治的，仅有张学良一人耳。



一九三〇年十一月，张学良在沈阳接见暹罗王兄时合影。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明令褒奖张学良。五月，张学良第二次去南京出席国民会议，由浦口过江时，江上军舰与狮子山炮台礼炮齐鸣，国民政府军政大员群集下关欢迎，满城张贴着“欢迎拥护中央、巩固统一的张学良将军”、“欢迎维护和平效忠党国的张副司令”等标语。张学良被推为国民会议九人主席团之一，两次主持会议。蒋介石还邀张学良一同阅兵，让其对部队训话。张学良离京时，蒋介石亲自到机场送行。

张学良第二次去南京时，以胡汉民、汪精卫为首的反蒋派已在广州酝酿反蒋，但蒋介石因为有了张学良的支持而底气十足，有恃无恐。

第四十二章　北平主政

1931.1

——“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可是却管那么多的省。”

——“我自个儿最抱歉、最难过的事，就是当时天津市长、北京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的人选。”

——“生活嘛，就是这样，不断地变化，人哪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呢，比如我们不是从奉天来到北京了吗？”

那时，蒋先生把北方完全交给我了，我常常自个儿说了算，那真可以说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能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也有其一了。那时我才二十八九岁，可是却管那么多的省。

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国民政府明令北平陆海空军副司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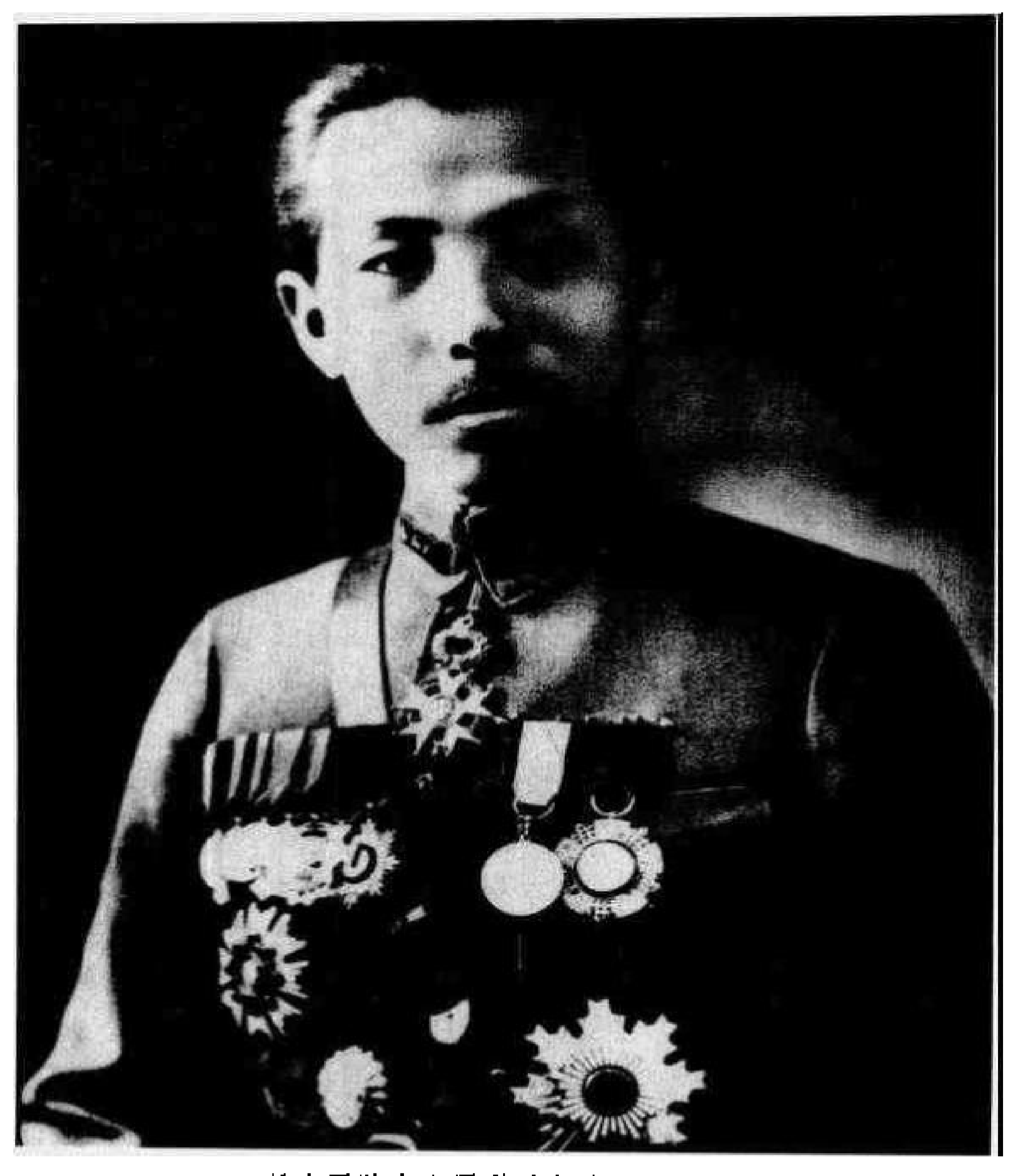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张学良（左三）抵北平后，与前来迎接的汤国桢（右三）、刘翼飞（右五）、朱光沐（左一）在车站合影。

行营节制东北、华北各省军事行政，不战而屈冯、阎之兵的少帅张学良，遂成为国民政府内蒋介石一人之下而万人之上的方面大员。

年初，张学良恋恋不舍地离开大帅府，前往北平坐镇。临行前，办公室的秘书、参谋都在匆匆地忙着做准备，帅府内的丫环、老妈子们也在为少帅夫妇打点行装。张学良则更忙碌，几乎看不到他的身影，他要出席各种会议，找人谈话，接待来访者，连饭都不能正点吃，厨房常常是将菜热了一遍又一遍，静静地等候着他。

抵达北平后，张学良住在顺承王府。该王府地处北京西城白塔寺附近，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宅院。它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是占地面积很大的花园，园内假山叠翠，水光倒影，奇花异卉，绿树成荫。后院是张学良的住宅和办公的地方。

在顺承王府，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各住一个小院，两人朝夕相处，彼此敬重，相处融洽，全力服侍张学良，家庭生活和谐欢乐。



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时的张学良。

斯时，张学良事业兴旺发达。他以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兼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身份，坐镇北平，统摄华北及东北半壁河山，成为北中国的第一号权威人物。这是张学良一生中的黄金

时期。

在南京时，蒋介石对张学良虽然推心置腹，热忱之极，但在北方善后、财政、铁道、党务等实质问题上，蒋介石却是寸步不让。

几经会谈，蒋、张双方达成以下协议：华北善后问题，基本上按张学良的意见办，即改编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等部，由张学良推荐晋、绥两省省主席；财政方面，裁撤厘金，改行中央统一税制，属中央税收由各地解往中央；铁路车辆统归铁道部管理，东北除北宁路外，天图、吉长、四洮均归中央管辖；在东北建立国民党组织一事，第一步应先建立各省省党部；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内部决议征询张学良的意见；晋察冀三省划归东北政务委员会管理；阎、冯必先出洋，由国府发给出洋费一百万元，国府负责保护其安全。

当时，蒋介石答应给东北方面四个部长职务，除宋子文、孙科等少数人外，国民政府各院部强烈反对，结果只委任刘尚清为内政部长，张作相、王树翰为国府委员，张景惠为军事参议院院长，鲍文樾为参谋次长。

阎锡山与蒋介石作战时，曾将晋军扩编为十个军、四十多个师。张学良主政北平时，允将晋军整编为四个军，以商震、徐永昌、傅作义、杨爱源四人为军长；允将西北军整编为两个军；至于客籍的军队调离晋境问题，暂定稍缓办理。

当时，晋军的将领因为粥少僧多，不足分配，意见颇为分歧，孙楚已准备发出不接受整编方案的通电。张学良乃电约晋军将领孙楚、赵承绶、周玳、冯鹏翥等人前来协商，又增编孙楚为护路军司令，辖三个旅；赵承绶为骑兵司令，辖二个旅；周玳为炮兵司令，辖十一个团；另设三个独立旅。并规定：晋军的编制及饷项以能适合晋、绥两省的财力为度；以平绥路西段、正太路娘子关以内，为晋军驻防地区；西北军暂驻晋南；

孙殿英等杂牌军队的驻地及饷项，由张学良向中央商定之。

改编之后，冯、阎及所属将领对张学良没有吃掉他们，反而还多方加以保护，都感恩戴德，对张学良十分尊重。

当年，蒋介石对张学良如此“重视”，并授以统治东北、华北的实权，就南京政府而言，确是绝无仅有的。这是否意味着蒋介石看中了张学良，而诚心与之合作呢？答案是决非如此。

当年，蒋介石面临两种势力的威胁：一种是革命势力，这主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这是他的“心腹之患”；一种是国民党内部的反蒋派，这股力量也是他颇难应付的。为了维护刚刚兴起的蒋家王朝的独裁统治，为了对付上述两种势力，在蒋氏看来，利用年轻而缺乏政治经验的张学良、利用颇具实力的东北军来巩固他的独裁统治，是当务之急，是迫切需要的。这实际上是蒋介石深远的政治谋略。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天津《大公报》记者于除夕之夜抵张学良寓宅采访，让其谈谈岁首之感想。

“二十年来，今日算是一个新生命之开始，”张学良说，“希望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于国家之建设与改造，勿以私人意见、小己利益作投机之举动，为争夺之行为。从前因私人利害之关系，妄事投机，结果，国家人民固然交受其祸，即彼私人亦一无利益，终于失败。甚望以后国人迎此新机，彻底觉悟，勿再蹈前人之覆辙，则公私受其福利。盖乱由人造，苟人人皆以平和为心，则乱无由作矣。”

张学良待人宽厚，不计私怨，对蒋、冯、阎如此，对别人也一样。如前述对跟从郭松龄反奉的将领一律不予惩处；又如后来石友三反张失败后，到北平去见张学良，张学良仍以礼相待。对于政见不同的人，他主张愿留则留，愿去则去，用人重才。

北平行营时期，张学良保荐了一批简任（司局长）人员，除了东北旧人及各方面的推荐之外，他还任用了一些素昧平生而有专长的人。如王韬原是北平市老财政局长，后被选拔为北平市长仍兼市财政局长；老财政科长姚宏被任命为河北省财政厅长；张见庵是地方教育界知名人士，亦出任河北省教育厅长；严智怡是名流，是创办南开大学的严修之子，亦曾被任命为河北省政府委员，等等。

但在北平主政时，张将军在人事安排上，也有终生遗憾之事。

我不喜欢我那同母的二弟张学铭。我常说他这个人是欲大胆小，有好处就来了。他认为我这当哥哥的一切都是捡来的，而不知我这一切都是用命换来的。但他会做功夫，常常把人哄得好好的。

他当天津市长是我最生气的事儿。我自个儿最抱歉最难过的事儿，就是当时天津市长、北平市长、青岛市长这三个市长的人选。这事完全是吴铁城干的。

这三个市长我本来已有内定的人。天津市长我内定的是臧其芳。后来臧其芳为这件事很不高兴，很不谅解。他后来知道了，我跟他谈过这事的来龙去脉。

这个吴铁城呀，他送我人情。吴是好意还是坏意，我不能断言。一方面，吴可能是在送我人情，另一方面，吴在东北工作，他要拉拢他们三个人，一个是我弟弟，一个是周大文，一个是胡若愚。周是我小弟的朋友，原是给我父亲管电报的，我那时有个秘密的姨太太就住在他家，就是这么样一个朋友。胡若愚呢，他是我在北京时玩儿的朋友。我决不想让他们参与政治的，可是，吴铁城就保举他们三个人。

那时，就连省主席都是由我自个儿委任、中央加以承认的。不料，中央忽然发布了这几个人的头衔：我二弟出任天津

市长，周大文出任北平市长，胡若愚出任青岛市长。对此，我非常生气，我有权否认，我想给蒋总统打个电报顶回去。可我再三考虑，我要顶回去，他们三个倒没什么，可吴铁城就不好办了，吴铁城就完蛋了，老先生就火了。我再三考虑，没顶，这是我平生最难过的事儿。

这是吴铁城干的事儿，因为我跟吴是好朋友啊，但你怎么能干这事儿，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我想吴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送我人情，因我们都很要好，于是他就保举了；二是他要拉拢这三个人，想多知道点内幕消息，好以后使用他们三个人。张岳公做事稳得很，吴这人不稳。本来，吴铁城也不是老总统的人，吴是胡汉民的人，是胡派。

我的部下为这事对我很误会，以为这全都是我的意思。换句话说，那时北方都在我手里，因为扩大会议散伙了，老先生把北方全部交给我了，我说怎么处就怎么处，没有个不字。

本来，北平市长这个位置，我部下好几个军长都惦着。王树常就是我第四军的军长，他出任河北省主席，于学忠也是我的军长，察哈尔主席原是我的一个旅长。后来，大家都奇怪，北平怎么出了这么一个人，谁都知道，他是我父亲的译电员呢。

天津原应是臧其芳出任。臧其芳想当，臧其芳教我几年书，可臧在东北大学学生闹事时，我要把他们枪决了。我这人一发脾气，想枪毙人家就枪毙了。东北大学学生曾闹学潮，可实际上哪里是学生闹学潮，是他们几个教授闹学潮，为什么呢？他们几个教授要想办一件事没有办到，他们就鼓动学生，闹得好凶啊，后来，我就要枪毙他们，我的秘书听后给我跪下了，说："可千万别干这事！"我生气得很，说："没有见过你们教授鼓动学生闹学潮的！"我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凶得很呢，我到东北大学跟学生讲："东北大学我不是主动来当校长的，

是你们把我请来的。我今天也有权，你们闹吧，你们再闹我有两个手段，你们随便。一个是我把东北大学解散关门，另一个是我有军队，让军队把学校包围，我要使用武力的，你们自个儿决定。"就这样，学潮终于平息了。

当时我气得要把臧其芳他们四个人枪决，我的秘书王老给我下跪，说我知道你发脾气，你还真干呀？你饶了他们吧！经别人劝着，后来我把臧其芳从东北大学调到哈尔滨当了处长。天津市长这人选，臧其芳始终有看法，后来我跟他开玩笑，同他解释，总算得以谅解。

张学良善于抚驭，他对所属的东北军将领能够推心置腹，一视同仁，而对于新整编的各军将领，也能开诚布公，不分畛域。所以，在他驻节北平期间，除驻防河北中部的石友三接受广州国民政府的任命，率众叛变，向北推进，被张学良和驻豫绥靖公署主任刘峙调派大军南北夹击，迅告敉平之外，华北地区大体上尚称安定。

张学良告别大帅府，来到北平主政华北军政，很快就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但夫人于凤至对奉天的生活仍念念不忘，对奉天大帅府的菜肴，无论是盘菜还是碗菜，她都感到挺合口味。可是，到北京已经半年多了，生活上还是有些不习惯。

"对大帅府的菜，大姐很留恋，我们要是把厨师带来就好了。"有一次，赵四小姐感叹道。

"我是想带的，"张学良听了，不无感慨地说，"只是赵连璧师傅和小朴师傅都不愿意来北京。是啊，谁愿背井离乡呢？我很理解他们，他们的手艺都很精，听说去了公记饭店。"

于凤至沉重地叹了口气说："如果爸爸在，哪能离开呢？"

张学良安慰她说："生活嘛，就是这样，不断地变化，人哪会永远停留在一个地方呢，比如我们不是从奉天来到北京了吗？"

有一天开晚饭，张学良、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同桌进餐。正好餐桌上有一盘烧白菜，于凤至用筷子指着这盘菜对张学良说："在奉天时，厨房里的小朴师傅做的'海米炖白菜'，再放上点豆腐细粉，真好吃，配上虎大爷焖的二米饭，我是越吃越爱吃。"

赵四小姐接着说："我最喜欢吃的是奉天的'火腿烧冬瓜'，还有'冬菇熘鸡片'，那才鲜灵呢。"

于凤至见张学良在那儿深思，便问道："汉卿，你呢？你爱吃哪几种家乡菜？"

张学良似乎没有听见，沉思片刻之后，才慢慢地说："我最得意的是'金鸡扒大翅'，还有'虎皮鸽蛋'。"

赵四小姐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用手指点着张学良对于凤至说："大姐，你看，还是人家行，毕竟是将军大人嘛，当然要与我们不同了，爱吃的都是高级菜。"

张、于二人也大笑起来。

"庄稼汉都很乐意吃白菜，爸爸可是一直不改庄稼汉的口味。"张学良充满深情、无限怀念地说。

赵四小姐和于凤至都赞同地点点头。

第四十三章　通 电 讨 石

1931.6

——“看来，他们大有亡我之心。好吧，我张学良此次要先发制人了。”

——“东北军矢志和平，汉章谅所深悉，如有存心破坏和平者，实为天下公敌。”

——“学良措置一切，无往不深体中央戒除内战、保障统一之宏旨，处心应事，薄己厚人，海内同志，谅当共鉴。”

“汉奸！败类！”

张学良看完密电，十分震怒，掷之于地，大声骂道。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一日，高烧未退、仍在医院观察治疗的张学良，忽接一份被破译的石友三致张学良堂弟张学成的密电。电文中说：“弟部即将进攻平津，后趋东北，望兄即与日本取得联系，以安排后事。”



一九三一年五月五日，国民会议开幕，众代表合影（右起为张静江、蒋介石、班禅、张学良）。

"汉卿，此事你想怎么处理?"赵四小姐在一旁焦急地问道。

"两条泥鳅，翻不了大浪!"满脸怒容的张学良，顿时显出刚毅的神色，"看来，他们大有亡我之心，好吧，我张学良此次要先发制人了!"

原来，张学良武装调停中原大战，意在中止内战，拥护统一，减轻人民疾苦。殊料，中原大战刚刚停火，新的内战又接踵而至。

在南方，五月二十八日，汪精卫、陈济棠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又竖起了反蒋的大旗，宁、粤两个"国民政府"的对立局面出现了。

年初，在北方，蒋介石命令张学良负责处理华北军事善后事宜，所有晋军、西北军及石友三的军队，均归张学良节制整编。岂料，石友三竟图谋不轨，勾结日本，投靠广东汪、陈，突然举兵反蒋倒张。

早在一九三一年二月九日，石友三曾到沈阳谒见张学良，张学良对他颇为优遇。

石友三在沈阳期间，曾请张学良选派一人为其第十三路总指挥部的秘书长。张学良乃派石友三的吉林同乡并且与之深有交谊的张云责前往充任。

此时，石友三已萌反叛之心。不久，石友三要返回关内防地，向张学良辞行，张学良关切地对他说："再多住两天吧。"而石友三竟疑神疑鬼地问别人："是否张副司令要扣留我？"其猜疑成性，由此可见一斑。

石友三自沈阳领走第一次军饷，回至关内后，即以现洋十三万元在天津日租界购买楼房一所，这时，石友三已与日本人暗中有所勾结。

四月间，即有石友三部不稳的传闻。石友三在其防区附近大挖沟壕，对人则解释说："本军修筑沟坝系为防御水患，以兵代工，外闻传言，乃系不明真相。"并派其参谋长唐邦植、驻北平办事处毕广垣谒见张学良，声明绝对拥护中央，服从东北。

"东北军矢志和平，汉章谅所深悉，如有存心破坏和平者，实为天下公敌。外间谣传，固不足信，惟望汉章深体余意而行。"张学良语重心长地电告石友三。

不料，忠言逆耳，以反复无常而闻名的石友三竟一意孤行，执意要走绝路。

截得石友三致张学成的密电后，张学良立即召开会议，同参谋长戢翼翘、万福麟、王树常、鲍文樾、王树翰和于学忠共

同商议，决定先下手为强，调兵遣将，防患于未然。

六月二十八日，东北军抽调孙德荃的第十九旅、王永盛的第二十九旅、于兆麟的第三十旅及王和华的炮兵旅分驻平津，以固防务，布告周知，以安民心。

七月初，石部不稳的传言更加多了起来。此时，南方，广东汪、陈的反蒋"国民政府"已刀出鞘、箭上弦；北方，石友三不仅与张学成朋比为奸，同日寇暗中勾结，且与南方遥相呼应。

有鉴于此，于学忠便以平津卫戍司令的名义，到顺德检阅白凤翔的骑兵旅，以便就近观察驻顺德一带石友三部的动态。

蒋介石一直企图消灭石友三，不断收买石的部下。二月，石友三赴沈阳时，蒋介石曾密令张学良扣留他，经张为石说项始作罢。但是，石友三认为张学良不能满足他的要求，遂与汪精卫等联合反蒋，并与日本勾结，图谋取代张学良。

此时，日本在东北已蠢蠢欲动，石友三倒张必将牵制关内东北军，给日军占领东北以可乘之机。关于这一点，张学良、南京中央及各有关方面，虽然都有所意识，但突发事件又使得他们欲罢不能。

为应付石友三可能发生的异动，张学良召开了北平行营军事会议。于学忠在会议上分析说："石友三部定会妄动，而动则必失败。因为：第一，石部没有根据地，只占六列火车，不能离开铁路线，我们如以少数的部队与之接触，不让他往津浦线转移，以逸待劳，诱其深入，即可将其消灭；第二，石友三鸦片烟瘾很大，常识不足，极端腐化，并对东北军存有轻视之意，骄敌者必败；第三，表面上看来，好像石善于练兵，士兵的体质亦较强，但石不注意士兵的生活，向不正式发饷，兵有二心。我到顺德时曾应石之请，在他那里住了两天，看了看他的军队。当时，石的部队往往半夜练兵，天天从车站来回开

动，有对我示威之意，我看见他的兵都穿得很破烂，有些兵穿的鞋是用麻绳捆着的；第四，石为人性极反复，轻举妄动，用兵也好轻进轻退，一切都贪，不能持久，利于速战。我如能沉着应付，必可将其击溃。”

石友三不愧为大名鼎鼎的“倒戈将军”。七月十九日，他终于发布反蒋通电，露出了反蒋叛张的真面目。与此同时，石友三宣布就任广东反蒋政府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为此，广东方面的邹鲁已寄五十万大洋接济石部，石则嫌少，要求再汇一百万。

石友三的如意算盘是：与张学良堂弟张学成加紧联络，先把东北军驱回关外，占领平津，然后挥兵南下，进攻蒋介石，与汪、陈相呼应。其间，他秘密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勾结，盼其策应他北进的军事行动。

通电反蒋后，石部干戈大动，进攻矛头首指东北军：石军一举扣压了在平汉线顺德方面的火车，将北平、郑州间经过顺德的一段电报电话线擅行割断。更令北平震惊的是，石友三竟以残忍之手段，活埋了张学良派到他那儿去的秘书长张云责。

七月二十日拂晓，石军北犯，白凤翔旅则按原定计划于两小时前撤出顺德，在内邱以南与石部的前卫稍作接触，便节节后退，但不与石部脱离。

二十一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剿赤军北路集团军总司令”。当时，张学良大病初愈，《大公报》记者在面晤张学良之后报道说：“张身体已完全恢复，近来军队换防调遣等事，均由张亲自命令裁决。”

面对石部反叛，张学良立即调兵遣将。同日，张学良命于学忠为第一集团军司令，统辖陈贯群第十四旅、杜继武第十八旅、李振唐第十三旅、董英斌第十一旅、白凤翔骑兵第六旅及乔方炮兵团，负平汉线作战之责；王树常为第二集团军司令，

统辖丁喜春第八旅、黄师岳第十七旅、常经武第十二旅、姚东藩第十五旅、李福和骑兵第五旅及王致中炮兵团，负津浦线作战之责；任命商震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同时，任命万福麟为讨石逆军总司令；于学忠为平汉线前敌总司令；王树常为津浦线前敌总司令。并致电东北军将士，号召讨伐石友三，为国除奸。

受命之后，于学忠当即赴保定督师。次日，蒋介石致电南京国民政府，文曰："石友三图谋不轨，竟敢破坏我'剿赤'垂成之举，万难宽容，请即日提会讨论，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职，所有第十三路部队，归韩复榘节制。"

二十三日，张学良发表讨伐石友三的通电，历数石逆种种劣行，电文中说："数月以来，迭据各方报称，第十三路总指挥石友三鼓煽军心，潜谋叛乱，……其先头部队，已于号（二十日）晚进至石家庄，明目张胆扬言将取平津，所有一切逆谋，业已证实。……学良措置一切，无往不深体中央戒除内战、保障统一之宏旨，处心应事，薄己厚人，海内同志，谅当共鉴。即值该逆叛迹暴露，肆行侵扰之际，犹复勉为容忍，戒饬驻防部队非奉最后命令，不得轻以兵弹相加。区区此心，无非惜念和平，力避战祸，稍有一线光明之路，总思促其反省，自拔迷途，以共保和平之局。讵料该逆包藏祸心，悍然不顾，狡谋猝启，奔窜而前，显系别有肺肠，意图颠覆党国。试思统一告成以来，建设萌芽，民生未奠，内忧外侮纷至沓来，中央虑患忧危，军兴讨赤，蒋总司令入赣之前，诰誓殷殷，言犹在耳，此时甘为戎首，宁复具有天良！综其阴鸷险狠，怙恶执迷，玷辱军人，贻羞民族，匪特国法之所不容，抑亦人群之所共弃。……"

次日，蒋介石与张学良联名发表告第十三路军将士书，宣告此次出兵仅讨伐石友三一人，其余概不追究；如能取石友三

首级者，提升两级，赏洋两万元；带队来降者，提升一级；带枪一支来降者，酌给洋二十元。南京政府并发出通缉令，缉拿叛军首领石友三。

石友三北犯的部队，以孙光前、程希贤为先锋，沈克、唐邦植及石友三本人居中，以米文和殿后。当时，石部实有兵力约五万六千余人，除留有一个旅驻守顺德外，其余全部开往作战前线。

东北军白凤翔旅逐步诱石深入，将石部引至石家庄地带。当时杜继武旅驻石家庄，于学忠令其不得出击。当东北军再由石家庄撤退时，蒋介石曾发来电报，叮嘱说："石家庄系军事要冲，不宜放弃。"但东北军为了执行既定的战略，仍由石家庄转移阵地，将石部引过滹沱河，直至保定、望都一线，并在方顺桥以南严阵以待。

石友三因必须速战速胜，所以自二十七日双方大规模接火后，即以最大的兵力猛攻东北军中央防线。二十九日，中央防线被其突破，石部约三万余人进入大冉，距保定仅二十五里。但东北军左右两翼阵地此刻仍固若金汤。于学忠一面命董英斌堵住中央缺口，一面令白凤翔骑兵旅在敌军右翼安国、博野一带出没，故作疑兵，尽力做大区域的活动，每天更换番号，主要目的是不让石部向东转移。

石部在大冉进入东北军的口袋阵之后，两军相持三天。于学忠命令炮兵向大冉的村外发炮，予敌以震慑，但却不打往村内，恐殃及无辜民众，造成无谓之损伤。

因激战三日无功，石友三即令沈克师由完县迂回。于学忠回忆说："沈克的迂回又未成功，而我王树常集团军对其右翼的压迫，这时已很为接近，同时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又已将其留守顺德的一个旅解决了，形势对石十分不利，乃突于三十一日下午，向我假作攻击的姿态，企图退却，枪声很急，而实际并未进攻。我一闻此种枪声，即判断其夜间必将退却，无再战

之意。这时，北平人心甚为恐慌，我即用电话告知行营参谋长戢翼翘说：‘石军突然枪声很急，判断其今夜将要撤退，一定会经过临城、德州之线，向山东方向撤退，敌人定准是失败啦，请北平放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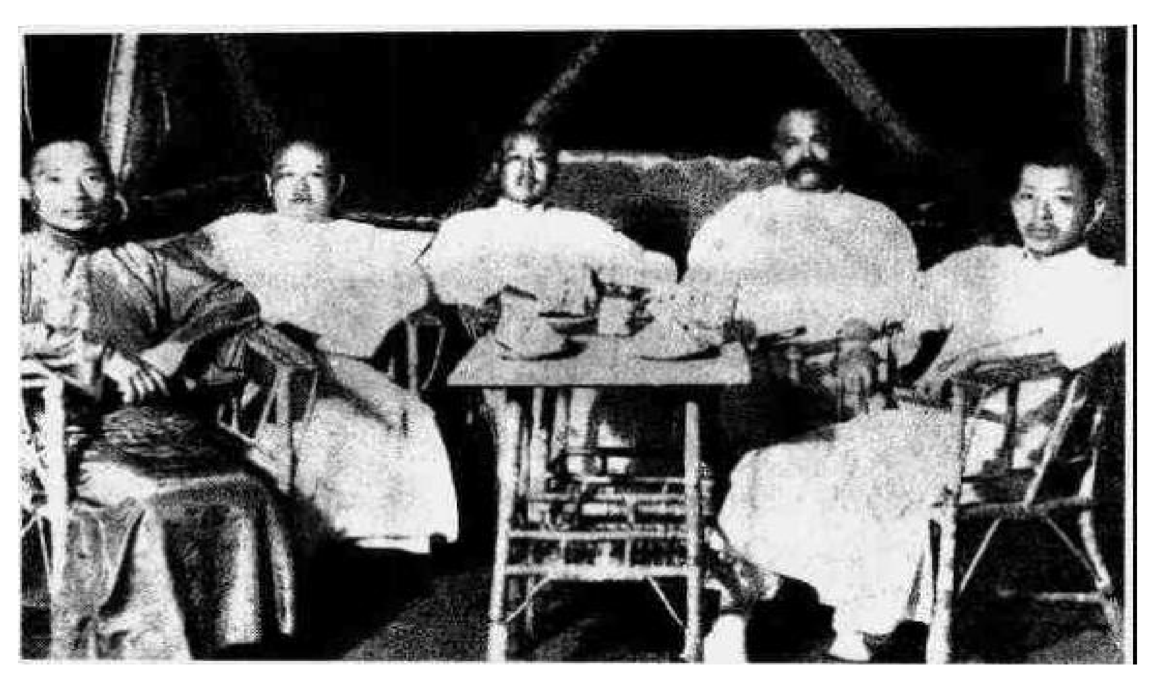
此时，东北第一集团军一面于拂晓发起攻击，一面通知第二集团军以及南路蒋方刘峙所部速抵滹沱河以南，做好向山东方向截击的准备。

三十一日深夜，石友三部果然全军退却。这时，第二集团军的黄师岳旅和常经武旅，都已由东向滹沱河推进，而李福和的骑兵旅更先行抵达深泽以东，南路刘峙的胡宗南师亦星夜赶到深泽以南，两军夹击，一直追过滹沱河，先头部队已抵达深泽。

石军溃退至滹沱河时，正值河水暴涨，行动维艰，渡河以后，军队狼狈不堪，已无战斗能力，缴械投降者甚多。石友三本人及唐邦植仅率三千余人逃赴山东，依附韩复榘。石部师长米文和、孙光前被俘，沈克向东北军投降。石部溃兵窜至山东境内时，北平副司令行营令韩复榘负责收容，第十三路军的原建制至此解体。

这次讨伐石友三之役，虽为时甚短，前后不及半月，但对东北方面的影响极大。当张学良一再调兵遣将入关“勤王”，为蒋介石出力，控守华北地盘的时候，日本人侵东北的危急也逼近了。

“皇姑屯事件”和东北“易帜”之后，日本关东军狗急跳墙，侵略东北的活动愈演愈烈。当时，张学良也深知，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视已久，不可掉以轻心。本来，在外敌即将入侵之际，东北军本应加强战备，严阵以待。但在国运攸关之时，东北军主力却倾全力入关讨石，这就给侵略者造成了“窥视”的良机。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二日，张学良在协和医院与各方将领讨论讨伐石友三的善后问题（右起为张学良、万福麟、商震、刘峙、顾祝同）。

当年东北军的兵力，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时共计约二十八万人。一九三〇年九月，辽宁省调三个步兵旅、两个炮兵旅进关，黑龙江调两个国防旅入关参战，后又陆续调进，而特种兵几乎全部调进关内，先后进关的部队约十六万之众，它们皆为东北军精锐，且是战斗的主要兵种。

后来，当"九一八"骤发时，东北方面的兵力为：吉林省约六万五千人，全部驻在本省未动；驻黑龙江部队只有二万七千人；驻辽宁省的部队，其中包括参加讨石战役后立即返回关外的两个旅，约三万余人；

不难看出，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兵力已相当空虚，分布在辽、吉、黑三省辽阔土地上的东北军的兵力，虽仍有约十二万人，但其中大多为装备、训练较差的省防军。而驻在沈阳的兵力，实际上只有一万五千人，其中正规战斗部队仅有一个步兵

旅，约八千人，数量少得可怜。

对此，东北军将领曾评论说："东北军为了讨伐石友三，不但把棍子拿了出来，而且连笤帚疙瘩都拿出来了。"

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上述形势看得清清楚楚。当年侵华的积极鼓动者、日本众议院议员永田善三郎曾得意忘形地说："张学良把大批东北军调进关内参加内战，东北防务非常空虚，如果日本略一举手投足，满蒙天地不仅非张学良所有，恐怕已非中国所有了。"

此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的压城黑云，正迅速笼罩着整个东北。

第四十四章　日 兵 寻 衅

1931.7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就制造了多起事件，寻机挑衅。”

——“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总司令要我们不要还手，让他们打，好向国际联盟说话。”

在我手里，不能有一根毫毛送给日本。

早在“九一八”之前，日本人就制造了多起事件，寻机挑衅。

原来，就在东北军讨伐叛军石友三之际，一九三一年六月，坂垣征四郎按照他以少胜多的方针，与石原莞尔等拟就了“柳条沟铁路爆破计划”，即用炸药包将位于北大营附近的柳条沟南满铁路炸毁，企图以此为借口，向东北军发动进攻，进而

侵占东北。

一九三一年春，政友会议员松岗洋右在《动荡的满蒙》小册子里，狂称东北是日本的生命线，扬言“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叫嚣“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单位是不完全的，所以解决满蒙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同年四月，陆相宇垣在师团长会议上狂吠：“要在东北四省内进行某种策动。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应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决心。”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磨刀霍霍，伺机动武。

在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做“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嘴脸十分狰狞。这个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正式建立，其目的是“用青年人的纯真的热情和爱国心”死守满蒙，其宗旨则是强调东北“在历史上、地理上、经济上以及国防上都是与我帝国密切不可分割的区域”，鼓吹“必须把满蒙的天地真正变为我们的理想之乡”。

六月中旬，这帮法西斯狂热分子在大连召开“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与会者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嚣张气焰达到了极点。

七月，该联盟向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五千册题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疯狂叫嚣“日本侨民在东北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

为了解东北各地的情况，制定侵略作战方针，日本关东军于一九三一年七月又组织了第二次“北满参谋旅行”。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为坂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两人。

坂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十六届毕业生，早年多次到中国活动，一九二九年五月被任命为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是陆军士官学校第二十一届毕业生，在中国任职多年，一九二八年十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参谋。两人同属日本少壮派军人，积极鼓吹侵略中国、占领东北，是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罪魁祸首。

坂垣、石原等人在外出活动中，总是边旅行、边观察、边策划、边研究，不仅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地形、交通、物产等情况，还观察收集东北军的兵力配置等情报。

在数次考察之后，石原声称“要立刻对中国作战，坚决把满蒙政权握在我们手中”，并认为“拯救没有和平的中国是日本的使命，同时也是拯救日本自己的惟一途径。为此，必须排除美国的障碍。”

坂垣则就满蒙问题作了一次讲演，对其发动侵略的狼子野心丝毫不加掩饰，其核心就是一句话：“迅即把东北变为日本的国土。”

七月，坂垣、石原对东北北部进行了最后一次考察，基本完成了发动事变的准备工作。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加紧调兵遣将。四月中旬，为增强东北日军实力，日本军部把关东军的战略兵团换成仙台的第二师团。该师团的士兵多是在日本北方的寒冷地区长大，适合到中国东北作战。同年七月，日军将两门二十四厘米的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为掩人耳目，日军做贼心虚地用马口铁将巨炮掩盖起来。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关东军司令官。本庄在华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三天后，日本又任命另一个“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为奉天特务机关长。

本庄上任后，马上视察和检阅了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

九月一日，他在给关东军的训示中指出："本职深深有所期待，关东军的责任确实重大。"他还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发出强硬命令："对于胆敢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十八日，他向多位师团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在这种情况下，关东军的演习更加频繁。一九三一年四月，多门师团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的演习。八月，又多次在图门江进行越界架桥和在水中施放水雷的演习。日军经常越过中朝边界，在中国领土上埋设地雷，骚扰百姓。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还同时举行为期两周的演习，进行武装示威。九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二、三两日，日军整天在沈阳北大营附近进行野外演习。四、五两日，又作包围东北兵工厂和沈阳城的演习。八日，在沈阳北又作攻城演习。十四日，长春日军越出铁路附属地作攻击演习。十五日，又举行攻越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

在此期间，日本人又蓄意制造了两起挑衅事件。

六月，突发"万宝山事件"。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此时，租种中国土地的朝鲜人李升薰等人，因引水灌田，擅自挖掘中国农民的土地，引起双方的纷争。驻长春的日本警察和外交人员不断纵容朝鲜人扩大纠纷，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开枪，杀伤中国人多名。之后，日本方面又进行挑拨，诬称中国人排挤并杀害了朝鲜人。于是，在朝鲜的汉城、仁川、平壤等地掀起了大规模的排华运动，结果造成一百多名华人被杀。日本右翼分子亦到处煽动，叫嚷这是侵占东北的好机会。日本首相若槻礼茨郎则煽动说："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

七月，日方又导演了"中村大尉事件"。中村震太郎，其

真正身份是日本参谋本部的间谍，六月，他奉命到中国东北的大兴安岭地区进行侦察。当他们“调查”结束，准备经洮南回国途中，被东北屯垦军第三团捕获。审讯后，他被以非法潜入中国边防重地的军事间谍之罪名秘密处死。七月中旬，日本关东军通过地下通道得知中村被杀的消息后，便加紧煽动发起侵华战争。

中国政府和张学良的东北当局于九月间策略性地承认了这一事实，并表示要严肃处理有关人员。但日本方面却想利用这一事件实现对东北的完全占领。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凶巴巴地叫嚷：“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国的各项权益。”

关东军参谋石原则毫不掩饰，一语道破天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是在柳条沟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九月初，荣臻、臧式毅鉴于战火一触即发，先后派警务处长黄显声、副官处副处长李济川专程来北平请示。张学良对来人说：“东北大事由张辅帅、臧主席、荣参谋长酌情处理，重要问题要依靠中央，不能单独对外。”

六日，张学良致电荣臻：“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时，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本，无论其如何衅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这时，离九一八事变不过十二天。其间，因张作相曾主张抵抗，张学良致张特急电：“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特令遵照。”

日军侵华的利刃已咄咄逼近，可蒋介石却正热衷于对中央苏区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同时还忙着击破国民党内反对他的各派系。

七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宣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武力统一中国的政策。那时，东北局势已经相当紧张，张学良又派王树翰去南京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指示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际联盟，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万一日军进攻，也不可抵抗，以免事态扩大，处理困难。”

九月十一日，张学良在北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叫他于翌日前往石家庄会晤。

那天上午，蒋介石的专车自汉口开来，张学良的专车从北平开来，两辆专车会合后，两人在车厢里举行了秘密会谈。

会谈中，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了，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如果我们回击了，事情就不好办了，明明是日军先开衅的，他们可以硬说是我们先打他的，他们的嘴大，我们的嘴小，到那时就分辨不清了。”

张学良下车后，东北军将领何柱国问他：“蒋都谈了些什么？”张学良说：“不得了啦，日本人要动手了，总司令要我们不要还手，让他们打，好向国际联盟说话。”

就在这时，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已秘密着手在柳条沟地区进行铁路爆破，然后嫁祸于中国军队，乘机举事，挑起战争。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七日拂晓，日本关东军派出一个工兵中队，开入柳条沟地区，隔断了交通。中午时分，他们抓住了八个横跨铁路的农民，强迫他们穿上东北军的半旧军装，对他们说：“你们违反了铁路的戒严令，罚你们修铁路半天。”

这时，日军趁机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中国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然后，日军用机枪打死了四个农民，又抓走了四人，

也拍了好多照片，注明“东北军破坏铁路，被日军发现后的战斗情况”；最后，日本兵又把被抓走的四个农民也枪杀了，照片上又注明“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应有的下场”。

同日下午，日本关东军炮兵进入了预设阵地，该阵地南起浑河铁桥，北至柳条沟铁路沿线，并以沈阳站二楼为发炮的指挥所。

九月十八日，今田新太郎命令河本等人：“就在今晚动手！”

一场肮脏的侵华战争，经过卑鄙的阴谋策划，就这样敲响了开场锣。

第四十五章 沈阳事变

1931.9

——“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九一八事变我判断错误了！所以，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一点儿不服，不认这个账，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没有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为什么呢？我当时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这样

做对他不利。你知道，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如果我知道当时日本人要这么干，我会跟日本拼命的。

已年逾九十的张将军向唐教授谈到“九一八”时，仍抑制不住心中的义愤和激动。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弯月高挂，疏星点点，长空欲坠。高粱地里，漆黑一片。夜幕中，七八名日本兵将四十二个黄色方形炸药包放在距离北大营八百米的南满铁路铁轨接头处。十时十五分，日军悍然点燃炸药包，一声巨响，震撼夜空。

此情此景，当时驻守北大营的王铁汉团长回忆说：“‘九一八’晚十时一刻，忽然南满铁路方向发生爆炸。到十九日清晨一时四十分，日军步兵二百余人，并有跟进的部队，逐次向本团接近，炮兵也开始射击本团营房。此刻，适逢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军事厅长荣臻来电话，询问情况，并严令‘不准抵抗’。我答称：‘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而且现在官兵愤慨，都愿与北大营共存亡，敌人正在炮击本团营房，本团官兵势不能持枪待毙。’荣厅长当即指示：‘将枪缴库，撤出营房，否则，你要负一切责任。’”

日本军队是按坂垣的“柳条沟铁路爆破计划”行事的，但在开始进攻时，还只用不炸的炮弹试探，但见中国军队毫无反应，遂向北大营大举进攻。

由于有“不抵抗”的指示，当日兵进攻北大营时，第七旅驻军毫无戒备，驻军长官均不在营房里。官兵们群龙无首，惊慌失措。当旅参谋长请示对策时，旅长王以哲来电话说：“对日军不准开枪还击，谁惹事谁负责任。”荣臻则在电话中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王以哲和荣臻都是根据张学良、蒋介石的指示，才下达如

此荒唐的指令的。

在这种逆来顺受、任敌肆虐的情形下，闯入北大营的日兵见人就杀，中国士兵有的原地待命，竟被日军活活刺杀在床上；有的从枪库里取枪冲出营房，但仍不敢擅自还击，被日兵追着开枪打死。

生死关头，群情激昂，士兵们再也难以忍受了，他们高呼："我们难道不是人吗？咱们跟日本兵拼了吧！""这简直欺人太甚，我们有枪还怕什么？"

当士兵们刚要反击的时候，突然旅部的王副官跑来，口头传达旅长转达的张学良的命令："对日军绝对不准抵抗，缴械任其缴械，占营房任其占营房。"

"现在不是缴械占营房的问题，而是日军要将我们杀死。"士兵们怒不可遏地说。

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部分士兵被迫还击，从北大营的



被日军攻占后的北大营。

东围墙和卡子门两侧，无数挺机枪及步枪喷吐出愤怒的火舌，向日军猛烈还击。士兵们边打边退，离开营房，退出了沈阳。就这样，在不抵抗的政策下，一夜之间，沈阳沦陷。

当时，张学良一厢情愿地认为，忍耐和避让，可以使日本侵略者找不到借口；打不还手，可以避免扩大事态，取得列强的同情和干预。因此，尽管事前已知日本要大打出手，蓄意入侵，但却没做任何应变准备。

"不抵抗"方针的贯彻，首先松懈了东北高级军政人员的斗志：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回老家锦州为父治丧，事变发生时仍在锦州；参谋长荣臻在事变当天正在为父祝寿，官邸里宾客盈门；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尚在北平；驻沈阳的主力部队第七旅驻守北大营，事变时，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内。

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代司令长官荣臻，召集高级官员紧急会议。这时，沈阳西区与城内的交通已被阻断，只有住在三经路附近者才能参加，当时到会者只有副官处长杨正治、军衡处长朱光沐、电政监督蒋斌和第七旅旅长王以哲等人。荣臻首先述及当日军炮击北大营时，他曾以电话向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交涉，日总领事推诿这是日本军部所为，自己也不知是怎么回事。荣臻旋以电话与住在城内的省主席臧式毅取得联络，接着向北平张学良官邸打了长途电话。

十八日晚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戏院看戏。当他被告知荣臻自沈阳打来紧急电话后，立即返回协和医院。荣臻向张学良报告说："日军袭击北大营，进攻沈阳，我方已遵照蒋主席'铣电'指示，不予抵抗。"张学良要荣臻将情况续报，但不久，长途电话即中断。张学良随即用电话向南京请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熊斌转达蒋介石的指示："不能打。"又说已由王正廷电告国联，听候国联处理。

当时，沈阳北大营及附近的东山嘴守军有二个旅共六个团，另有三个警察总队，兵力略占优势。长春方面，日军只有一个联队和临时调来的一部分骑兵，而守军有步兵、炮兵各一个团，另步兵、辎重兵各一个营，兵力也占优势。但由于日军突然袭击，而守军又奉命不许抵抗，沈阳、长春遂于当夜失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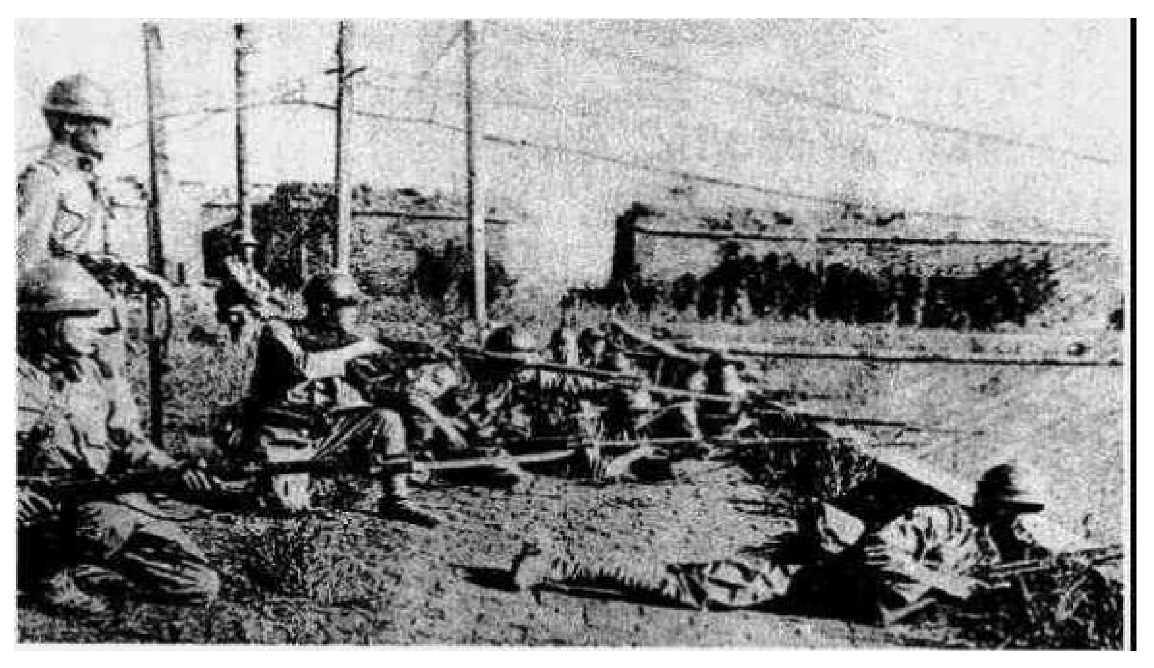
十八日子夜，张学良根据荣臻的报告，在协和医院召集戢翼翘、于学忠、万福麟、鲍文樾等将领开会。

"日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张学良在会上说，"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要兴起大的战争。我们军人的天职，守土有责，本应和他们一拼，不过日军不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于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性的问题，我们只应速报中央，听候指示。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第一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总之，期望这次事件，不致于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接，波及全国。"

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竟天真地说："天快亮了，日军的演习也快结束了吧！"这与十年后美国太平洋舰队发出的十万火急电报"珍珠港遭受攻击，这不是演习"，同样成为历史的笑柄。

十九日上午，张学良召集东北外交委员会开会，顾维钧、汤尔和、章士钊、汪荣宝、罗文干、王荫泰、王树翰、刘哲、莫德惠等人参加。顾维钧主张先请国联迫使日本撤兵，再谈其他，因为国联绝不容许日本作大。刚从日本回国的汤尔和说，日本内阁正欲抑制军部势力，用国联抑制日本，正可使日本内阁便于对付军部。

张学良随后又召集了李石曾、胡适、朱启钤、潘复、曹汝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日军从沈阳小西门城墙上向城内射击。

霖、陆宗舆、王克敏、王揖唐、于学忠、万福麟、王树常、戢翼翘、鲍文樾等二十七人参加的会议，再行商讨。会上的主要意见仍是听命中央，依靠国联。

两次会议的意见都符合张学良当时的想法，当然也更加深了他迷信中央决策和依赖国联干预的思想。

此时，沈阳方面的情况如何呢？目睹惨状的赵安铭回忆说："'九一八'翌晨，我穿着便衣进城察看，但见沈阳城西门紧闭，不准出人；城门和城楼上站着日军哨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城垛上插着日本国旗。我绕行到南门外，见菜蔬、粮食商贩尚在营业，城门半掩，有日军把守，对出入城门之平民未加盘问。我走进辽宁省主席臧式毅所住的上部衙门胡同。胡同口有日军一个分队（班）踞地而坐。我正在宅门徘徊间，有一挑馄饨担的小贩似已察觉我的来意，便悄悄告诉我说：'别进去啦！荣参谋长刚才出来，小鬼子就进去把主席监视起来

了！'"

"九月十九日早饭后，我到三经路去见荣臻，据其家人答云：'参谋长已搭早车去北平见张副司令了。'从这天起，凡沈阳有资格逃难的高级文武官吏，纷纷乘北宁铁路火车逃往'歌舞未已'的北平。在北宁铁路两侧，这时'土匪'乘机蜂起，他们怀着'好小子们，你们捞够了，现在往关里跑'的愤懑心情，劫持过往火车。这消息不断传来，达官显贵莫不诅咒：'东北老百姓也太没心肝了，在这个时候竟还趁火打劫！'殊不知，平日制造'土匪'的不正是这一批'逃难'的人吗？"

同一天，辽宁省安东、营口、凤凰城及吉林省长春亦告失陷。二十二日，吉林省城吉林市失守。十一月十九日，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沦陷。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乘军舰由南京抵九江，准备对红军进行第三次"围剿"，闻讯后立即返回南京。十九日，蒋介石密电张学良："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

日本侵略东北，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南京学生游行请愿，要求国民政府抗日。

二十二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作"一致奋起，共救危亡"的演讲，他说："我国民众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以待国际公法之判断。"

显然，蒋介石仍在乞怜于国联，坚持不抵抗主义。

二十三日，蒋介石又嘱咐万福麟和鲍文樾说："你们回去告诉汉卿，现在他一切要听我的决定，万不可自作主张，千万要忍辱负重，顾及全局。"

接着，负责监视张学良是否抵抗日军的宋子文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副司令已命令我方军队将枪械收藏于兵械库，切勿

还枪报复矣。"将这才放了心。

不抵抗政策致使东北的大好河山很快就断送了，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沉重的灾难。

这一政策究竟出自谁手？张将军十分肯定地对唐德刚教授说是出自十他自己。

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现在很多人都在说，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

我简单地讲这个道理，讲这个事实。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第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许多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

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

我那个时间正在协和医院里养病，我在病中。九一八事变时我的病刚好，但我那时还在医院里住着，还没有出院。后来，马君武先生为此事还开了我的玩笑。

九一八事变后，协和医院也给我难堪，说你不能在我医院里待着了。那时，医院给了我一幢房子住。他们说，因为日本的问题，你在我们医院住着，很不好，我们医院很有点压力，所以我就搬出来了。

我现在就给你讲这个不抵抗的事情。当时，因为奉天与日本的关系很紧张，发生了中村事件等好几个事情。那么我就有了关于日本方面的情报，说日本要来挑衅，想借着挑衅来扩大双方的矛盾。明白吗，我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报。所以，那个不

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

那么政府方面，那个时候还不是蒋先生，我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行政院长好像是孙科，那政府给的回答不外乎是两句话，就是你妥善办理，相应处置。都是这段话，政府从来没有直接明确地给我答复，都是这种笼统的话。换句话说，就是你自个儿好好地去看着办吧，都是这类不负责任的话，没有什么正经话。

怎样来解释这不抵抗主义呢？后来，若干年后，有一次，我到了太原阎锡山那儿，他因为是前辈了，我都喊他是伯帅。席间谈话时，我说，我问你点小事，我说九一八事变时，人家都说我不抵抗，你是不是也这样认为，你是不是也骂我不抵抗？阎锡山点点头，意思是我也认为你是不抵抗的。那我就问他，伯帅，你想过没有，我为什么不抵抗？他说，这个我没想过，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抵抗。

我说，过去我们对日本办事情，"南京事件"也好，"济南事件"也好，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你责备我不抵抗，不但你责备我，国民也责备我，我不接受。但是你要责备我一句话，说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还是把这时的日本看做是平常的日本，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我说你责备这个，那我接受。他听了之后很动容。我说，伯帅，今天你的情形跟我当年的情形差不多，你是不是还要重蹈我的这个覆辙，是不是也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说，伯帅，当年我要知道日本是这样的来头，我这个人敢把天戳个窟窿，我还不敢和他们干吗？

我对他说，我当时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不要惹事

啊，宁肯受点委屈啊！我们历史上都是采用这个办法呀，假如我知道这事情化不了啦，那我就不同了，我的处置方法就不同了。我对阎锡山说，今天这个事情真是化不了啦，日本的这个问题，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没有旁的法子啦，只能，我说只能大家好好地团结起来，抗击日本。自然，我不能保证就能抵抗得了，但尽力抵抗，没有旁的法子啦。

你看不出来，我这个人还是一个很好的说客呢。我就这样把阎锡山说通了，他最后同意在西北同我们联合起来一同抗日。

我还对他说，我说我当年到外国去，到丹麦，丹麦有个记者问我，他说，你这个人啊，非常神秘。

外国人说我神秘，为什么呢？记者对我说，你们中国人骂你不抵抗，但日本人说你最抗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为什么要抗日，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就跟他说了一个笑话，我就借这事来解释，向这位外国记者解释。

我说，我们中国有一出戏，不晓得你看过没有，说的是两个人打架，中间有一个是劝架的。有一方说，我骂他，不许他还口，我打他，不许他还手，我杀了他，不许他出血，那个解劝的“呼”的一枪就把他打死了。什么，杀了人还不能出血？现在日本人，我当时对那个记者讲，现在日本人骂我们，不让我们还口，打我们，不让我们还手，杀了我们，还不让我们出血，这真没办法了，真要出血了，非要流血不可了！

我就说这个笑话给他听，所以，后来阎百川就被我说服了，愿意出兵抗日了。这样，我到山西还做了一次说客，一个很成功的说客。

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

你的指令呢。”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

不是，不是，不是的。

这事不该政府的事，也不该蒋公的事。当晚，根本不知道这就叫做“九一八事变”，也不知怎么向政府请示九一八事变该怎么办，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

待到事变出来了，我就可以请示中央政府了，是不是这样？待日本人要打锦州了，就请示政府了，那政府就说你好自处理，善自处理，那时都是这种话。

“那他这种伪造文件造得好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德刚教授探询地问。

“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但你要说我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这真是历史大翻案，不是不抵抗，是判断错误。”唐德刚教授感慨道。

我情报不够，我判断错误！我怎么个判断错误？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我也判断，这样干对你日本也不利啊，你要这样做法，你在世界上怎么交代？那个时候，我们也迷信什么九国公约、国联、门户开放，你这样一来，你在世界上怎么站脚？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我认为我这判断还是很有道理的。那时，我有个日本顾问，我后来也跟他谈了，他也承认，那样干不但不是我们中国之利，也是日本之祸啊！

我现在也承认我那时的判断对了，为什么呢？要不是九一

八事变，日本不会惨败到那种程度。当然，这话就讲到题外去了，日本当时也是控制不住的，日本政府当时也控制不住他的军人。不单单是对九一八事变。当时，在日本国内，对于老一辈，你不听我的话，就把你打死，就这样动不动就使用暴力，采用恐怖手段。一个国家，我跟你说，一个国家到了这种地步，那这个国家一定要倒霉。怎么倒霉呢？不知道，但它一定要倒霉。

否则，日本不会当年那么强盛，到现在弄得海、陆、空什么也都没有了。当然，我虽然恨日本人，但我也非常佩服日本人，那日本人是厉害呀。

这就是关于九一八事变我所要说的话，外面说的，一直是在给我解过，不，我的过就是我的过。

“这个说法可是历史的大翻案，我们五十多年来，光知道是蒋公让你不抵抗的。”唐德刚教授感叹说。

那个时候，蒋公根本就不负责任，他不负这责任，我也根本没有向他请示的必要。我要请示也是向南京政府请示，没有必要打电报给他，你说是不是？

“顾维钧先生告诉我，说你那天晚上打电话给他，就是‘九一八’那天晚上，你打电话给他了吗？”唐德刚教授问道。

没有这事。大家都是想替我解“不抵抗将军”这个过，其实，这不抵抗我自己也不接受，我判断错误了。“九一八”之后，我最佩服的是《大公报》上写的一篇社评，好像是王芸生什么人写的。

不是张季鸾写的，大概是王芸生，忘记了。我非常佩服，我最佩服这篇文章啦，好像我在哪儿还收藏着它。不是当时看见的，是后来不知什么时候看见了这篇文章。它主要的观点是说，关于“九一八”，无论何人是张学良，他也一定是要这样

办的。他这话真是说到我心里去了。

这文章说得太长。它说，历史上的事情，中国和日本出了问题的时候，都是采取这种措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说无论是谁，处在当时张学良那地位上，也得这样办。所以，它评论说，只有设身处地知道那个环境的人，说出来的话才能公道。《大公报》这个社论，就设身处地地想了。他说旁的话我都忘了，记不住了，要紧的一句话，就是不仅仅是张学良，任何人，如果当时处在那个地位上，他也是这样办。我很佩服这句话。

张将军的自我剖析尽管很诚恳，很有可信度，也颇有道理，但也过于原谅自己。

“九一八”时，张学良面临的是中日关系复杂背景之下的一批狂热的、政府失控的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的偷袭。战史上，偷袭的成功率是很高的，一如八年之后的希特勒闪击波兰和十年后的日本偷袭珍珠港。因而，后人在若干年后，要求年轻的张学良在那千钧一发之际，迅速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准确反应，当机立断地作出正确的决策，挫败日军偷袭，全线反击，变劣为优，反败为胜，实在是难度太高。

再说，这一突发事件也不是张学良一人所面临的问题，是他的东北当局、参谋班子、中央政府及各党派、全国民众所面临的大问题，不是他一人能力挽狂澜的。

但是，假如他具备他父亲张作霖驻兵新民府时的那种个性——你日本兵打死我三个兵，赔了我一千五百两银子，那好，我也派人打死你三个日本兵，我甘愿也交出一千五百两银子；假如他深深体认到作为一个封疆大吏，守土有责，义无反顾，面对北大营被入侵，则应是奋起抵抗的时候了，这应是抵抗的底线了。以此，便不至于使本来有阻敌能力的东北军不战而溃，顷刻瓦解，大好河山转眼间沦陷。


东北兵工厂被日军侵占。

问题很明显，由于张学良在对日问题上和蒋介石的看法一致，因而对于事变发生前后蒋介石所提出的"一切听命于中央，等候国联裁决"的指示奉为圭臬。

东北高层一部分人主张不管南京政府态度如何，应坚决抵抗，因为为民守土，责无旁贷，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亦可使强敌畏而却步。遗憾的是，张学良没有这样做。

结果，面对日本的野蛮入侵，东北大好河山顷刻沦陷，这也是严重失职，咎无可辞。因此，张学良受到全国人民的谴责也是必然的，这也是他后来一直深感后悔的。

九一八事变，日本法西斯轻易地夺去我国一百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三千万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国民政府统计，官方财产损失一百七十亿，光铁路就有四千多公里沦人敌手。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东北军也蒙受极大损失，数万兵力溃散，在国内首屈一指的空军被日本据为己有，大量的枪炮被日军虏获。在国内居首位的拥有五万工人的沈阳兵工厂，也成了日本人的囊中之物。

“造重炮的机器刚装好，就被日本人拿去了。”后来，张学良懊恼地对刘鼎说。

同时，张学良的私人财产损失也相当大。仅边业银行，他的资产就达一千万元以上，银行中还有张家寄存的黄金四万几千两和许多古董。大帅府的六个金库全被日军打开。

更重要的是，张学良政治上损失惨重。后来，汪精卫落井下石，送给他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他失去了东北地盘，政治上相对独立、雄踞一方的局面消失了，入关的二十六万东北军的军饷只得依靠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经济上的依赖势必加深政治上的依附。

“九一八”之后，张学良的政治和军事实力遭到极大的削弱，这是他希望蒋介石来帮助他抵抗日本侵略者、诚心实意地拥蒋之后，所尝到的第一大苦果。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由于失职和全国舆论的谴责，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守土无状，万死不足以蔽辜”，请辞陆海空副司令职。国民政府照准，改任他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仍坐镇华北。

但是，直至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仍未能从九一八事变中汲取教训，他虽然说过蒋介石是阴谋家，但还不知道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还在打东北的主意。蒋介石在这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谈到“九一八”时，曾这样写道：“此亦为外交之转机，亦为国家统一之良机。”前一句话是希望列强干预，迫使日本归还东北；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如果日本归还东北，也不必再交给张学良了。



张学良官邸被日军侵占。

蒋介石一直获得张学良的大力支持，但他并不愿意见到张学良仍旧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而九一八事变中推行的不抵抗政策，是蒋介石对张学良实力最大的一次削弱，以后热河失守以及调东北军参加打红军的内战，都是在不断地继续削弱他的军政实力。

第四十六章　朱 五 敬 酒

1931.9

——“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我最恨马君武的那句诗了，就是“赵四风流朱五狂”。这个朱五是谁呢？朱五是朱启钤的五小姐，她是我秘书朱光沐的太太，他俩结婚的时候，是我给他们主的婚。她小的时候，我就认得她，我同她的姐姐是朋友，仅仅是一般的朋友关系。她的四姐还嫁给了我的一位副官。这首诗我最恨了，我跟她不仅没有任何关系，我都没跟她开过一句玩笑！

张将军在这里同唐德刚教授所谈的，就是九一八事变后不

久，马君武先生于十一月二十日发表于上海《时事新报》上的题为《哀沈阳》的两首"感时近作"，诗曰：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最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阿娇舞几回。

马君武，名和，字贵公，广西桂林人。早年留学日本时，即参加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后为清廷追捕，逃往德国，入柏林大学，成为中国第一位自然科学博士学位获得者。辛亥革命成功后，历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国会议员、实业部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广西省长等职。又曾编撰我国第一部《德华字典》，译达尔文《物种起源》，是我国近代著名的学者。

适值"九一八"后不久，该诗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风靡社会，传诵一时。马老也自鸣得意，他吹嘘说，此诗足以和明末吴梅村谴责吴三桂的那首诗相媲美，将永垂史册。

追根溯渊，马诗是仿李义山《北齐》体而作，原诗如下：

一笑相看国便亡，
何劳荆棘始堪伤。
小怜玉体横陈夜，

已报周师人晋阳。

巧笑知堪敌万机，
倾城最在着戎衣。
晋阳已陷休回顾，
更请君王猎一围。

诗中的小怜，为北齐皇后婢女，貌美，喜着戎衣，为皇帝高纬所宠爱，封为淑妃。时北周军人侵，晋阳失陷，正在围猎的高纬欲率军南下，但小怜恃宠撒娇，硬要再猎一围，致误反攻时机。后高纬反攻晋阳，北周军渐感不支，迨值城垣崩毁之际，高纬忽然下令停攻，其用意是想炫耀武力，让小怜目睹他大军破城的壮观，不料小怜正在梳妆，良久未毕，致使守城的北周军得以喘息，抢修城防。待高纬带小怜并马在高地观赏攻城之战时，北齐军右翼稍作后移，小怜误以为败退，惊呼："我军败了！"高纬不知内情，迅速撤离战场，以致军心动摇。结果，北齐军兵败如山倒，北齐终于灭亡。

很明显，马诗是借高纬的故事讽喻张学良，说他不重江山重美人，在"九一八"之夜，沉缅酒色，置国家大事于不顾，却与赵四小姐、朱五和胡蝶等人翩翩起舞，结果把东北给断送了。

诗中所言的朱五，乃当年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钤的五女儿湄筠，是朱光沐的妻子。她的妹妹朱六，嫁给了张学良之弟张学铭；另一妹妹朱九，嫁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之子吴泰勋。胡蝶则指当时著名的电影明星胡蝶。

无独有偶，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本新闻媒介，如天津日本特务机关报《庸报》，就曾故意捏造有关张学良的种种桃色新闻，在上海等地的报刊上大肆宣扬张学良与胡蝶在北平不

仅相与跳舞，而且过从甚密，张学良还馈赠胡蝶十万元作为酬报，以混淆视听，转移视线。

马君武的诗作发表后，南京方面也乘机煽风点火，授意各报广泛登载，这样，张学良不抵抗的传言便进一步得到了证实。从此，张学良被国人普遍视为“风流将军”、“不抵抗将军”，赵四、朱五、胡蝶更被视为“红颜祸水”，承受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对于马君武的诗，身为当事人的张学良、赵四、朱五多年来均未置一词，只有胡蝶曾于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申报》上刊登了一则辟谣启事，郑重声明说：“蝶于上月为摄演影剧曾赴北平，抵平之日，适逢国难，明星同人乃开会集议公决，抵制日货，并规定罚规，禁止男女演员私自出外游戏及酬酢，所有私人宴会一概予以谢绝。留平五十余日，未尝一涉舞场。”

胡蝶还声称：“蝶亦国民一分子也，虽尚未能以颈血溅仇人，岂能于国难当头之时，与负守土之责者相与跳舞耶？‘商女不知亡国恨’，是猪狗不如者矣。”她还严正指责马诗别有用心。

翌日，明星电影公司导演张石川及洪深、董天涯、郑小秋、龚稼农、夏佩珍等全体演职员，也在《申报》上发表启事为胡蝶作证。启事说：“胡女士辟谣之言，尽属实情实事。同人此次赴平摄取《啼笑姻缘》、《旧时京华》、《自由花》等外景部分，为时几近两月，每日工作甚忙。不独胡女士未尝违犯公司罚规外出，更未尝得见张副司令一面。同人非全无心肝者，岂能容女演员作此不名誉之行动？尚祈各界勿信谣传，同人愿以人格为之保证焉。”

事实是，明星影片公司为赴北平拍外景，一行四十余人于九月中旬离开上海北上，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才到达天津。胡

蝶说:“我们到达天津时，见到大批撤下来的军队，始知是沈阳失守了。”所以，胡蝶到北平，当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

“世间上荒唐的事情还真不少，沈阳事件发生的时候，我那时还跟明星公司摄影队一起逗留在天津，没有踏入北平一步，后来为拍《自由之花》到北平时，已是九一八事变后约一周，未料此行会引起一段莫须有的公案。”

多年之后，侨居海外的胡蝶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我和张学良不仅那时未谋面，以后也未见过，真可谓素昧平生。”胡蝶在回忆录中说，“一九六四年六月，我赴台湾出席第十一届亚洲影展时，还曾有记者问我要不要见张学良，我回答说：‘专程拜访就不必了，既未相识就不必相识了。’”

胡蝶女士的这一谈话在报上发表不久，考试院院长莫德惠曾去看望张学良。据莫德惠事后对记者说，张学良曾问他，是否看到胡蝶的那段谈话，然后说：“到底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读史之余，江泽民主席对此曾义愤道：“什么‘赵四风流朱五狂’，这全是诬蔑！”

那么，九一八事变发生的那一刻，张学良究竟在哪里呢？

据何世礼回忆说：“至于‘九一八’之夜，竟传汉公与胡蝶共舞，则确属诬捏之词。盖当夜乃为辽西水灾筹款演戏，汉公亲临鼓动捐款，并邀先父母作客，且请英大使夫妇作陪，均同坐一包厢，世礼则随侍左右。至十时许，忽见其副官处长汤国桢，或系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我记不清楚了，这两人我都认识，来报告说，请接沈阳电话，汉公嘱其代劳。旋又来告，谓荣臻参谋长必须其亲自接听，汉公方离席，且一去不回，亦无任何交代。先父以其毫无礼貌，非常不快，讵翌晨见报，始知发生此不幸大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当即召开了两次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两次会议之后，即推章士钊、汪荣宝二人起草电报，向

南京政府申述关于东北外交问题的意见。

十九日，张学良致电国民政府，电文中说："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该厂至即时止，尚无损失。北大营迫击炮库被毁，迫击炮厂亦被占领，死伤官兵待查。城内外警察各分所，均被日兵射击，警士被驱退出，无线电发报台亦被侵入，向日领迭次交涉，乃以军队之行动，外交官不能直接制止等语相告，显系支吾，并云由我军破坏南满路之桥梁而起，实属捏词，截至本日午前五时，尚未停止枪炮。以上等情，均经通知各国领事，伊等尚无表示，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余续电，并已转电南京政府谨陈，臧式毅、荣臻叩皓卯印等语。最后复得沈电台报告，日军已于今晨六时三十分入省城，占据各衙署各通讯机关，驱逐我警察，遮断我北宁路站，此后消息完全阻断，情况不明。日方宣传，因我军袭击南满路，故日军施行追击。但事实上我方绝无此事，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未与之抵抗。除电呈国民政府外，敬电奉闻。张学良叩皓。"

从电文中我们奇怪地发现，"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即日军犯我北大营时，亦毫未与之抵抗"，适时，竟是从"颇有政绩"的角度向中央汇报的。

随后，张学良又召集戢翼翘、于学忠、王树常、王树翰等研商大计。于学忠曾经建议说："日本军人现仍继续侵占东北各地，横行不已，我们虽避免全面的冲突，但也应集中几个旅的兵力，牺牲他三团人，给敌人以打击，以挫其侵略气焰，并取谅于国人。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都应各返防地掌握部队。"

当时，张学良说："这些主张都甚好，我现在正命荣翕生

新编一军，可即令他担任这项任务。”

翌日晚，张学良单独邀于学忠谈话，他说：“因为荣翕生已率部队撤下，你的意见已经赶不及照办。我已数次劝告吉、黑两省的军事负责长官返回原防，看他们的举动，均有不愿即行回去的意思，只好候候再说。”显然，此时张学良已改变了主意。

与此同时，张学良曾两次对记者发表讲话。他对天津《大公报》记者说：“君来为访问沈阳之新闻乎？实告君，吾早已令我部士兵，对日兵挑衅不得抵抗。故北大营我军，早令收缴军械，存于库房。昨晚（即十八日晚）十时许，日兵突以三百人闯入我营，开枪相击。我军本未武装，自无抵抗，当即被击毙三人。先是日方以车头载兵将皇姑屯中日铁路交叉处轰毁，随即退去。故日方发表谓我军破毁满铁路轨，绝对无有其事，盖我方避人挑衅之不暇，岂能出此？驻沈各国领事，俱能明了真相。日兵既入北大营，每间五分十分钟，即由附属地开炮，直对北大营及兵工厂等处轰击，当经我方商之驻沈日本林总领事，请于五分钟内，速予制止。林氏先请以十分钟为限，嗣又来电谓已成军事行动，本人无法制止云云。自是日兵占领所有交通机关，并本人住宅亦有日兵守卫，惟截至昨上午六时半止，秩序未坏，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吾信臧式毅主席必在城内，努力维持，不令秩序破毁。此事自应由政府负责交涉。日本此次，既未下最后通牒，又未宣告开战，而实际采取军事行动，令人不解，仍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

二十日晚，张学良又允各外国记者请求，于协和医院发表谈话说：“十八日夜，日军突然袭击沈阳，并将该处与满洲其它各处占领，成一作战行动，此举实毫无理由，且为未有之先例。此事发生，在日本已有数星期之煽动，其作此行动，适逢中国在水灾、共祸与内战分扰期间。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



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张学良病愈出院上车前留影（中为张学良，左为副官长谭海，右二人为医护人员）。

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开枪，并用炮轰击北大营与其他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据日方称，彼等此举有直接原因，但举世已共睹其在事前曾制造战事，可证明此言之虚伪。日方现已发动，但中国方面并无意为交战团体，中国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上述电文与谈话，表明了当时张学良对事变的认识程度，以及他的应对措施。这就是不折不扣、彻头彻尾的"不挑衅"、"不冲突"、"不报复"、"不抵抗"，惟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公理之得伸"，并认为这是处理此一事变的上策。

究其错误之根本原因，在于少帅当时只把日本关东军看做是一批野心勃勃的军人，而没有清醒地看透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同强盗有何“舆论”和“公理”可讲？

这时，北平各界人士、东北籍旅平学生以及东北军的中下级官兵，都要求与日军作战，群情激昂。

张学良在接见北平市各界人民抗日救国会的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都无怨。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中国在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张学良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我也是情愿的。”

张学良对东北籍旅平学生会代表说：“我得听从中央，忍辱负重，不求见谅于人，只求无愧于心。我敢断然自信的，第一，不屈服，不卖国；第二，不贪生，不怕死。我现以两事与同学们相约：（一）请你们尽力研究中日间的条约关系和妥善解决途径，有何意见，可随时函告；（二）有愿投笔从戎的，请先行报名，以便将来我和你们一同抗日。”

张学良又向主张立即与敌人作战的中下级官佐们说：“我爱中国，我更爱东北，因为我的祖宗庐墓均在东北，如由余手失去东北，余心永远不安。但余实不愿以他人的生命财产，作余个人的牺牲，且不愿以多年相随、屡共患难的部属的生命，搏余一民族英雄的头衔。日本这次来犯，其势甚大，我们必须以全国之力赴之，始能与之周旋。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当更为严重。诸君爱国的热忱，可暂蓄以待时，将来必有大可发挥的一日。”

张学良对东北大学的学生代表说：“这诨号是汪精卫起的，世界上哪有不抵抗而成为将军的呢？真是莫大的讽刺，这比挖我祖坟还厉害。”

这些演讲，表明了张学良对事件的鲜明态度，这是一位所谓的“不抵抗将军”坚决要求抗日杀敌真实心灵的写照。

这时，面对日军偷袭，张学良国难家仇，痛苦至深，战乎？和乎？撤乎？擅令开火乎？听命中央乎？依靠国联乎？矛盾丛生，举棋不定。军事方面，对外，他必须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对内，他又无东北军抗击关东军的整个作战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犹豫彷徨之中束手无策，最终因判断错误而致国土沦丧，江山易手。

人们不禁要问，张学良为什么会判断错误，是哪些因素导致他判断错误？分析起来，不外乎以下八个方面。

一是幻想以夷制夷。张学良当时对国联《凯洛格非战公约》和《华盛顿九国公约》相当迷信，他一厢情愿地幻想以夷制夷，企盼通过国联干涉、通过英美干涉来制止日本的侵略，这无疑是幻想而已。事变后不久，当国联调查团到达东北时，张学良曾很乐观地说：“我想，国联现在既然派李顿爵士率领调查团前来调查，一俟清楚后，可能会采取措施帮助中国，制止日本侵略，解决中日纠纷问题。”

直到一九三二年底，日本加紧增兵，准备进攻榆关和热河时，张学良对国联的本质才有了清醒的认识，他才恍然道：“惟有武装自己，舍身奋斗，才是救亡图存之计。”

二是醉心全国抗战。张学良认为：“日军不仅仅是一个联队，它全国的兵力可以源源而来，绝非我一人及我东北一隅之力所能应付。”“我们是主张抗战的，但须全国抗战，如能全国抗战，东北军在最前线作战，是义不容辞的。”

日寇进攻锦州时，张学良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文中反复强调：“我以东北一隅之兵，敌强邻全国之力，强弱之势，相去悬绝。”

在东北军各级军官中，也有全国抗战的思想，他们认为：

“东北为中国之东北，非东北人之东北，故言抵抗，必须全国以整个力量赴之。”

张学良一直认为“单靠东北军是一定抵抗不了日本的”，“如果是玉碎还可以碎，要是瓦碎则不必”，“玉碎”，系指全国抗战。

另外，张学良还主张“先统一后抗日”。但在一九三一年时，国内各党各派山头林立，各自为了一己不同的主义和利益，刀枪相向，厮杀正酣，势不两立，“哪管东师入沈阳”，因此，渴望那时就出现“全国统一，全面抗战”的局面，确实极难做到，也是很不现实的，或者干脆说是根本不可能的。

三是过分依赖中央。张学良自易帜后，诸事听命中央，依赖中央。他曾说：“现在我们既已听命中央，所有军事、外交均系全国整个问题，我们只能速报中央，听候指示。”在张学良心目中，中央就是蒋介石，服从蒋介石就是服从中央。而中央奉行的则是蒋介石的一贯政策：“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

四是迷信以和止战。张学良和他的部下以为，只要处处满足日本的要求，它就找不到发动战争的借口。但实际上，以退让求和平，不但得不到和平，反而会使侵略者得寸进尺，助长其嚣张气焰。

何柱国将军曾指出：“东北军方面，因为过去既有俄、德、法三国‘干涉还辽’的历史，当时又有九国公约的保证，加上一九二八年皇姑屯炸车案，大家都以为由于当时的沉着应付，不放一枪，使日本找不到任何借口，因而避免了事态的扩大。这一切，都使东北军很多将领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不抵抗是上策。”

因而，事变发生之际，东北军缺乏独立的武力抵抗日本关东军的思想准备。

五是畏惧日本军力。张学良认为，日本军力强大，仅仅二十余万东北军打不赢日军，即使加上中央军也不见得有十分的取胜把握。他曾说："科学时代，勇力没有用了。"其思想中，"武器至上"的观念较重。直到晚年，他在采访中还说："怎么打？咱打不过人家嘛！"

六是低估国民力量。张学良原系旧军阀出身，如果当时就要求他意识到或者让其坚信，只要使用他的军队，同时动员全国各阶层民众，是可以抵御日本入侵的，这未免难度太高，也是他力所不能及的。然而，广大的东北军官兵和广大的东北人民乃至全国民众是要抵抗的，也是能够抵抗的。东北军也曾有过抵抗计划，也曾设想过如敌军挑衅，则"先发制人"，"一举歼灭之"。当时，如果东北军能破釜沉舟，在东北民众、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给侵略者以坚决的回击，是有可能制止侵略者丧心病狂的挑衅和入侵的。遗憾的是，张学良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七是力避消耗实力。张学良曾对部下说："当时，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抗日，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更为严重的是，惟恐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灾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以期有朝一日打回老家，消灭日本侵略者。"

一九三三年出国前，张学良召集他的幕僚密议"还乡大计"，他指示部下说："武要保全东北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虽然张学良并非仅因保存实力而不抵抗，但他认为抵抗导致"瓦碎"也是不值得的。

八是缺乏决断能力。张学良文武双全，潇洒倜傥，但他年轻气盛，勇猛有余，老练不足。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局

势，很难应对裕如。加之他长期使用吗啡针，导致体魄衰弱，精神萎靡。因而，他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决断能力。当时他错误地认为，只有“不抵抗”，才能有利于大局，才能有助于中日双方争端的解决。

显而易见，“不抵抗主义”的产生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并非马君武“莫须有”的“更抱阿娇舞几回”等造谣污蔑之词所能解释得通的。

朱五前几天还来过这里呢，她跟我现在的太太是很要好的朋友，她俩是同学，都是天津女子中学的学生。朱五有一个小姐，她的小姐很聪明，你不晓得吧，你看过一个名叫《太阳、星星、月亮》的电影没有，那就是她姑娘写的。

这朱五调皮得很，我说一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一回在香港，在一次宴会上，马君武也坐在那边，这朱五就拿着个酒杯走了过去，说：“马先生，马老，你知道我是谁吗？我就是你诗中所写的那个朱五啊，来，我敬你一杯酒，我谢谢你啦，你把我变成名人啦！’马君武抬头一看，朱五就站在他面前，惊得他拔腿就走。哈哈……

第四十七章 痛击寇奸

1931.10

——“我这个人铁面无私，我是毫不客气的，他勾结日本人，卖国，我就把他枪毙了。”

——“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在大沽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七天，以待全军集结。”

——“国难当头，诸位激于义愤，种种爱国举动，昭著世界，非惟学良衷心钦佩，全国青年亦必闻风而起。”

我的二伯父是打土匪时被打死的。他死后，他家就由我父亲来养着。他的大儿子叫张学成，跟我在讲武堂里是同学，后来叫我给枪毙了。

他同日本人勾结！这是“九一八”以后的事。我这个人铁

面无私，我是毫不客气的。他勾结日本人，卖国，我就把他枪毙了。为这事，我多少日不敢回去。他的弟弟叫张学文，在我手底下当旅长。我的部下都知道我的个性。有个营长犯了错误，来同我见了面之后，我也没说什么，让他先到外面等一等，他一出去，我立刻下令把他枪毙了。

那当然是抓到证据了，没有证据，我怎么能枪毙他？他跟日本人勾结，日本人给他枪，让他招兵买马，当汉奸。

我当然能发现他通敌，他在我的家乡做坏事我怎么能不知道？九一八事变后，我人虽然不在东北，但那里仍有我的人，是我派去的人把他抓到打死的。

原来，“九一八”前夕，张学成一度与石友三暗中勾结，企图投靠日本人，在东北兴风作浪；“九一八”后，日本人又利用张学成，他便以“东北自卫军总司令”的名义，在黑山、北镇一带勾结土匪，为非作歹。他还发表宣言，声称要与日本人合作，建立东北“新政权”。

对此，张学良义愤填膺，即派原沈阳市警察局长熊飞带义勇军进剿，将其缉获。熊飞电告北平行营，请示处理办法，张学良马上复电：“立即枪决，以遏乱源。”其大义灭亲的爱国之举，博得人们的称赞。

由于“判断错误”，在忍痛不抵抗的过程中，张学良仍怀着坚定的抗日决心。“九一八”后，他曾经组织过多次的局部抵抗，如锦州抗战、榆关抗战、热河抗战，在剿灭汉奸队的同时，他又积极支持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这也是勿庸置疑、众所周知的事实。

事变后，辽、吉两省首先沦陷，黑省亦在告急之中。此时，日本侵略者正阴谋策划“新政权运动”。可是，东北人民并不甘屈服，纷纷发表通电，并派代表到北京谒见张学良，要求建立抗敌政权，待机收复失地。张学良完全支持这一正义要

求，先后在辽、吉、黑三省建立了抗敌政权。

九月二十三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任命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米春霖代理省主席，锦州军政权就此建立。

十月初，日本为颠覆锦州政权，以高价收买日本豢养的走狗、大汉奸凌印清，令他招收土匪，组织队伍。在日本间谍、浪人仓冈繁太郎等唆使下，他兵出沈阳，向辽西进发，为害地方。

为消灭这股土匪，熊飞奉张学良之命率两个公安骑兵总队前去剿办。在辽西义匪"老北风"、"老梯子"等人的协助下，于十月底全部剪除了这股匪军。事后，张学良奖赏有功人员现洋五万元。

一九三一年十月初，张学良与张作相协议，恢复吉林政权，决定在哈尔滨成立吉林省政府行署及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公署行署，任命诚允为省府主席。诚允为人正直，精力旺盛，工作积极。在他的带领下，吉林境内的抗战将领和民众身先士卒，勇敢杀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收复了二十八个县。

十月八日，张学良又电令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任全省军队总指挥。十日，又电令马占山任黑省代理主席。

十月初，日军出动两个步兵联队、四十余门野炮、八门重炮、八架飞机、四辆铁甲车，向黑龙江省代主席兼省防司令马占山部守卫的嫩江桥发起进攻。马部将士抱着"与桥共存亡"的决心，以低劣陈旧的武器与数万日伪军展开激战。

"与其不战而亡，何如誓死一拼，以尽天职！"这是嫩江桥抗战总指挥马占山将军的豪言壮语。

马占山亲临前线率部冲杀，打得日军第十六浜本联队几乎全军覆灭，高波骑兵队也死伤殆尽。此役歼敌八百六十七人，

几乎活捉日军多门中将。

嫩江桥激战是日军入侵东北以来首次遭到的最强烈的抵抗，日军初战被歼，死伤惨重，一时轰动中外，全国振奋。

日军恼羞成怒，急调第二师团主力进行反扑，中日双方展开激烈肉搏战。马部在弹尽粮绝之后，被迫撤退。马占山亲率所部二万余人撤离齐齐哈尔，退往克山、拜泉一带，张学良电令马占山："即就现住地点整理队伍，继续筹防，以重国土而图后效。"

不久，马占山在海伦组织临时省政府，张学良令哈尔滨中国银行拨款五十万元接济马占山，作整军建军的费用。不料，在日伪诱引下，马占山降日，全国予以声讨。张学良立即派前黑龙江省税捐局长韩立如潜回齐市，劝马占山反正，并许马占山仍任黑省主席。马占山遂暗下决心挣脱日方羁绊。四月初，马占山离开齐齐哈尔，通电反正，于黑河重组黑省政府，再揭抗日旗帜，直至一九三二年末退入苏联国境为止。

张学良支持的辽、吉、黑三省抗敌政权，成了东北地方部队对日作战的指挥中心，鼓舞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迟了日军策动的东北傀儡政权的产生，打乱并延宕了日寇企图"速战速决"、一举吞并东三省的狂妄计划。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日军进犯锦州，张学良决心在锦州地区同日军会战。他命令荣臻率五旅兵力，沿大凌河两岸构筑阵地，并计划把关内的两个军开往关外，在锦（州）、宁（兴城）地区与敌决战。当时，他曾向于学忠表示："即或被打垮，我也要和大家一齐钻山打游击，反攻沈阳市。"

此计划如能实现，当给日军以沉重打击。黄显声当时认为"收复沈阳，确有把握"，因敌军正四处进犯，沈阳是空虚的。但当张学良把这一决战计划转请蒋介石时，却遭阻止，计划因之流产。

十二月十九日，日军向张学良发出最后通牒，蛮横要求他撤退锦州驻军，并准备以两个师团六个混成旅之重兵，沿北宁、大通、营沟线分三路进袭锦州。中国守锦部队不足三万人，又缺弹械粮饷，形势十分危机。

从十二月二十五日至翌年一月五日的十天中，张学良曾七次电告南京政府，电文情真意切，充分表现出他抗敌守城的决心：

"锦州以西，如秦皇岛、塘沽、天津，处处海滨，门户洞开。锦县一带，一有冲破，彼必同时以海军迫胁我后方，并扰乱平津，使我首尾难顾。

"款弹两缺，敌如大举前进，即举东北士兵尽数牺牲，亦难防守。迅饬主管各部，火速照拨，以济燃眉，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良部官兵，已有牺牲决心。良职责所在，誓效捐糜，对此大难当前，绝非有何畏惧。

"我军奋战应敌，激战十昼夜之久，前仆后继，死伤蔽野。"

但南京政府却采取敷衍态度，对张学良的要求，虽有四次复电，但始终未见援助一兵一卒，未拨一枪一弹，致使锦州于一九三二年一月三日为日军占领。

在东北沦陷初期，东北军余部和各地民众自发地组成了多支抗日爱国武装，对此，张学良均给予大力支持。

在辽东，有邓铁梅组织的"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兵力约四千余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邓铁梅亲率大刀队五百人进攻凤凰城，缴获敌迫击炮、轻机枪及步枪三百余件。至一九三二年，邓部发展到三万人，不仅粉碎了数次日军讨伐，还成功地突袭了岫岩城。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一九三三年初，邓部属下的李海山部六百余人，被围于沙金沟老平顶，同敌死拼

六昼夜，全部壮烈牺牲。邓本人一再拒绝敌人的招抚和诱降，被劫持后惨遭杀害，死前留诗抒发壮志："七尺躯何足惜哉，四省土几时收复？"

在辽西，黄显声将军率部分警察和公安队组成辽西义勇军，展开了对敌斗争。一九三二年一月，关东军第八师团骑兵联队长古贺中佐率二百余骑兵进犯辽西，被诱入包围圈，遭义勇军全歼，古贺中佐在乱军中毙命。

另外，唐聚五组织各县警察大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等成立了"辽西自卫军"，与日伪军周旋于凶山恶水之间。

在吉东，东北军营长王德森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人员，组成了"国民救国军"，兵力发展到数万人。一九三二年三月，日田野少将率领近万人追击"国民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南湖大摆口袋阵，四面夹击，一举歼敌千余，缴获三八式步枪上千支。"国民救国军"由此声名大振。

东北军将领李杜、冯占海、丁超率部成立了"吉林自卫军"，并接受了辽、吉、黑民众后援会所授予的"东北义勇军第六军团"的称号，展开抗日武装斗争。一九三二年一月三十一日，自卫军与进犯哈尔滨的日军多门第二师团、第三旅团在双城展开激战。他们从三面发起突袭，日军伤亡惨重，自卫军取得了继嫩江桥保卫战后的又一胜利。

六月，自卫军兵分两路袭击哈尔滨，日伪军闻风而逃，自卫军顺利进抵香坊。日军广濑师团和伪军几个旅在几十辆装甲车和二十多架飞机掩护下猛攻自卫军，自卫军人人奋勇，血战数小时，打退了日伪军数次进攻，并乘胜追击，截获敌装甲车数辆。香坊之战打击了日伪军的骄横气焰。

"能为国家保存一寸土地，即算尽我军人一分天职，牺牲一切，皆在所不惜。"这是李杜将军发出的誓言。在北满，日

伪军不敢走出距哈尔滨城十余里外，伪满“首都”新京也岌岌可危，整个东北三省除铁路沿线及一些城市外，广大农村则基本都在义勇军的控制之下。

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九三二年初，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总数最高发展到四十余万人，他们袭击火车、兵站、机场，使日伪军惶惶不可终日。

“自奉天事变发生后，我军对安奉附近暴徒中心地之讨伐不下六十二回之多，结果收效甚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这样哀叹道。

一九三一年末，张学良通过北平行营支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一万四千元，发行爱国奖券又使“救国会”每月得到固定收入二万元左右。张学良还利用“救国会”名义拨出很多枪械、弹药、被服和现款，转发给义勇军，并不断地用白绸条写成秘密手谕，命令关外旧部与救国会合作。

据曾在张学良身边做过参谋的惠德安回忆说：“在此期间，张学良多次派遣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常务委员车向忱、联络员黄宇宙携带张的亲笔手谕，化装后秘密进入东北。车向忱远到哈尔滨、珠河、齐齐哈尔，并越过兴安岭进入黑河，慰问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等部，并传达张学良的抗日指示。黄宇宙先后两次携带张学良亲笔信件，与唐聚五、邓铁梅等取得联系，推进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张学良又痛剿天津汉奸便衣队。

当时，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为策应关东军进攻辽西，牵制驻华北的东北军出关，乃在天津收买汉奸，组织便衣队制造暴乱。

十一月八日，张学良接到情报后，即和王树常、张学铭慎重计议，严令天津市警察局负责痛剿，限期肃清，必要时令独立第十五旅协助。当便衣队在北宁路和南市警察署区内先后发

动暴乱时，张学良判断，这是继九一八事变后又一严重事件。

“如果日军发动战争，你在大沽与天津两处，要不顾一切牺牲，支持七天，以待全军集结。”午夜十二点，张学良电话指示卫戍司令姚东藩。

“必要时，王永盛、王和华两旅归你指挥。”两小时后，张学良又来一次电话告知姚东藩。

据姚东藩回忆：“八日晚，便衣队来势极为凶猛，但终不堪我保安队一击，不久即行溃逃。九日午间，枪声时断时续，较为沉寂。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椎浩平借口我保安队追剿匪徒逼近日本租界，击毙其退役军人某少佐，威胁其租界安全，危害其侨民利益，遂提出抗议。”

同日，河北省主席王树常和代理天津市长张学铭召见各国驻津领事，通报了便衣匪徒暴乱的情况，表明了我军誓死戡乱的决心。

十日拂晓前，日租界及海光寺等处又窜出大批便衣匪徒，双方开火战至深夜十二时，战况殊为激烈。次日，便衣匪徒又窜犯南关下头、南开、兴华桥一带。

十二日，天津成立戒严司令部，以张学铭任司令。司令部发出布告：准许便衣匪徒悔过自新，不咎既往，并对携械投诚者定出重金赏格。至十三、十四日，闸口、南关、美以美会等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之中。

十五日，日本使馆要求河北省、天津市当局前往日本军部，与香椎浩平司令官会商津市治安问题，张学良表示同意。

当省主席王树常见到香椎时，香椎态度极其傲慢，多端责难，一口咬定是中国军队向日本兵营射击。说话间，突然传来了密集枪声。香椎说：“你听听，这不是你们的军队又在野蛮地射击了吗？这种敌对行为是违反条约的。”王树常一语点破道：“这是从贵兵营发射出的枪声！”香椎气极败坏地说：“要

不是夜间，一定带你去看看你们军队炮毁的我兵营建筑物。"

这次会议，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是：消除敌对行为，拆除已退到距日租界三百米以外的防御工事，并在该区域内恢复日常警察岗哨。

此后十天，中国军队在枪声继续、匪不进犯、我方不越线搜剿的情况下，仍将汉奸便衣队打得溃不成军。香椎见状，恼羞成怒，认为是丢了他"大日本皇军"的颜面，遂发表蛮横无理的声明，胡说什么："日本驻屯军司令官尽力协助中国，议定正当的解决办法；而中国方面背信毁约，长期影响各国在津的商务进展和侨民安全。大日本军司令官是我国驻津军队的指挥者，有责任、有权力使用自卫权。中国当局以剿办乱匪为名，对日本驻屯军和租界地采取严重的敌对行为，必须予以膺惩。"

从二十七日起，日本租界地宣布正式戒严。便衣队以此为依托，复又大举进犯，日军则出动重炮和重机关枪为其助战，但仍遭我方迎头痛击。

二十八日，南京外交部照会日本公使重光葵，抗议日军炮轰、枪杀天津和平居民的非法暴行。同日，南京指示北平当局就近派员与日军交涉。张学良遂指派参议周龙光赴津，与日本领事馆洽商天津治安问题。日方理屈词穷，乃提出惩处河北省和天津市当局的无理要求，以便借机下台阶。

不久，在张学良亲自交涉与处理下，在中国军队毫不留情的武力剿歼下，将近一个月的日本汉奸便衣队暴乱终于平息了。

当时，日寇侵占辽、吉两省后，青年学生纷纷去南京请愿，敦促政府抗战。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京沪学生愤怒捣毁外交部，殴打外长王正廷。从此，请愿蔚然成风，南北各地此呼彼应。

十二月四日，北平辅仁大学九校学生二千余人准备南下请愿，路局奉蒋介石“宁可停车，不许通行”的命令，不予开车，双方争执不下。张学良非常理解学生的心情，建议说：“请每校推代表十人赴京，一切费用由我张学良负担。”

但学生仍不应允，张学良乃转知北宁路局为学生挂车。七日上午十一时，二千名学生由北平南下。下午三时，又有北大等校学生要求南下，张学良亦令平浦路局将北大七八十人载去南京。

张学良不仅支持学生的请愿行动，他本人亦从中受到触动和鼓舞。他在致北平各校学生的信函中这样写道：“国难当头，诸位激于义愤，种种爱国举动，昭著世界，非惟学良衷心钦佩，全国青年亦必闻风而起。”

第四十八章　汪 张 交 恶

1932.8

——“我就对汪精卫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

——“值此外侮日极、千钧一发之际，原应共赴国难，私人之间，讵容再生意见？”

——“他辞职了，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后中央又挽留了我，他辞职就走开了。”

只要有人能领导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出去，不论他是哪一个阶层的中国人，我都愿意把自己所有的力量都交给他，我还愿意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尽管张学良支持义勇军和东北人士的抗日复土运动，但他

仍然没有、也暂时无法改变依赖蒋介石来领导抗日的念头，这反映了张学良既迫切希望抗日，而又不敢也无法单独抗日的心态和处境。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爆发。面对穷凶极恶的人侵者，中国军队顽强抗击，日军阴谋未能得逞，只得罢兵言和，从而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抗日的决心。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日本在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由溥仪出任执政。日军为巩固新占领区，开始着手进攻东北各地风起云涌的抗日义勇军。东北义勇军号称四十多万，大部分是由原东北军、警察、爱国知识分子、少数农民乃至山林胡匪组成。由于缺乏明确的政治信念，并受不抵抗政策的影响，寄希望于张学良、蒋介石，甚至国联；加之没有统一领导，各占山头，墨守正规军的阵地战。到年底，面对势力强劲的日本关东军，义勇军绝大部分被各个击破，少数部队如冯占海、邓文、李海青等率部退入热河，还有小部分如苏炳文、马占山、李杜、王德林等部退入苏联。

日本人占领锦州之后，山海关遂暴露于敌前。七月，张学良设立临永警备区，守卫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五县和都山等地，任命原驻守榆县城山海关的第九旅旅长何柱国为警备司令，增拨步、骑各一旅及炮、工兵各一营归他指挥。旅长何柱国以"身为军人，守土有责，火来水淹，刀来枪抵"之语自勉。

至此，中日双方以天下第一关为界，虎视眈眈，箭拔弩张。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两人再度释怨，重新上台合作后，一个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掌军事；一个任行政院院长，掌政府，但实权仍操在蒋介石手中。

蒋介石复职后，即以“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的名义，前赴汉口，部署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攘外必先安内”，全力剿共，对日妥协，并以剿共为名，把南方七个省区（豫、鄂、皖、湘、闽、浙、赣）全部划归“总司令部”管辖。汪精卫对此甚为不满，认为蒋介石这样干，是侵犯了他的行政权，但他不敢向蒋介石发泄，就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因为在他看来，蒋与张是一伙的。

一九三二年六月十八日，汪精卫偕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飞抵北平，与“国联调查团”接洽。张学良因与宋子文关系很好，便对宋子文颇为礼遇，对汪精卫则稍有冷淡。

汪精卫的事是这样的。很早以前，我在奉天时就与汪精卫相识，我那时对汪精卫是非常佩服的。

后来与他又怎样闹翻了呢？其实就为一件事闹翻了。九一八事变后，我仍在北平负责任，这时他来了，和宋子文一块儿来到了北平。汪精卫那时任行政院长，蒋先生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汪先生带来蒋先生给我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蒋先生说得很客气，说汪院长到你那儿去，要与你谈，你好好地跟他谈一谈。

汪精卫就对我说，现在，你的军队应该跟日本人打一下。我就问他，这是真打吗？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有所办法？如果没有，打一下结果会怎样？一定打败！那你为什么要打呢？

他说，现在外面的压力太大，南京政府受不了啦，你呀，军队动一动，打一下，跟日本人打一打，就可以了。你要是不这样，政府恐怕就维持不住了。打一下，可以先平息一下国内反对的声浪。

我说，汪先生你这是在说什么？照你那样做，我问心有愧，让我的部下打一下，让我的部下拿生命来换你们的政治生

命?

我这个人说话，唉，我一着急，说起话来就毫不客气。我就对汪精卫说，我张学良从来没有靠牺牲我部下的生命，来换取我的政治生命。为这事，你中央政府也好，你也好，都别来找我！

他说，这是蒋先生的意思。我说，蒋先生的信中讲得很明白，是要你跟我商量。你中央政府，你军事委员会有权，你给我下命令，我当然服从，我没有法子，我非服从不行，我就得动！如果这事让你同我商量，让我自个儿动，我不干。你中央是不是有所准备？你要真行，那我打！你让我敷衍一下，我不干。你要问我的意见，问我的态度，我就是这个样！

我张学良从来不拿我的部下、利用我的部下给我打个地盘。你在历史上翻翻，我从来没有干过这个！我的部下现在还有不少，你可以去问一问。以前，我是跟我父亲南征北战，我在我父亲手底下是个将，他让我打什么，我就打什么。可是到了我自个手里，你看我打过什么仗？

听我这么一讲，那他当然十分生气了，他觉得我以行政院长的身份来跟你谈，你给我碰这么大的钉子。

当然，有件事情也是我做的不对。我跟宋子文是好朋友，我俩最要好了。我晚上跟宋子文出去玩，到北海去玩，我就没有理他，对此事他非常不高兴，觉得你怎么也不好好地招呼我，你们却出去逍遥自在。

有人说，汪精卫每次要与我谈话，我就去打针，他就火了，说我不尊重他。没有，没有，他根本就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打针，我打针任何人都看不见，仅大夫在那儿。不是谈了一半就不见人啦，他讲我不尊重他，就是指我不听他的话，没有照他的意思去办。

回南京后，汪精卫指桑骂槐，痛斥张学良“割据地方，把

持财政，丧师失地，放弃国防”，要求张学良同他一起辞职，“以谢国人”。

汪精卫表面上高喊“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骨子里却是个货真价实、不折不扣的“不抵抗主义者”，是个亲日派。他这种人也出来骂张学良，还送给张学良一顶“不抵抗将军”的帽子，张学良当然难以容忍，双方遂展开了密集的电报战。

八月六日，汪精卫电张学良曰：“北平张主任汉卿兄勋鉴：溯兄去岁放弃沈阳，再失锦州，致三千万人民、数千万里土地陷于敌手，敌气益骄，延及淞沪，赖第十九路军及第五路军奋死抵御，为我民族争生存，为我国家争人格，此本非常之事，非所望于兄。然亦冀兄之激发天良，有以自见。乃因循经年，未有建树，而寇氛益肆，热河告急，中央军队方事剿匪，溽暑作战，冒诸艰苦，然为安定内地巩固后防计，义无可辞。此外惟兄拥兵最多，军容最盛，而敌兵所扰，正在兄防地以内。故以实力言之，以职责言之，以地理之便利言之，抵抗敌人，兄在职一日，断非他人所能越俎。须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凡属族类，皆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第十九路军及第五路军作战淞沪，实本斯义，岂有他求。及战事既酣，在中央固悉索敝赋，以供前方，而人民更裹粮景从，以助士气。今兄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所责于铁道部者，即筹三百万；昨日，则又以每月筹助热河三百万责之行政院矣。当此民穷财尽之际，中央财政竭蹶万分，亦有耳目，兄宁不知，乃必以此相要挟，诚不解是何居心。无论中央无此财力，即令有之，在兄实行抵抗以前，弟亦断不忍为此浪掷。弟诚无似，不能搜刮民脂民膏，以餍兄一人之欲，使兄失望于弟，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兄一人，并以明无他。惟望兄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毋使热河、平津为东北锦州之

续，则关内之中国幸甚。惟兄裁之。汪兆铭鱼（六日）”

当日，张学良就汪精卫来电发表谈话说：“得汪院长来电，极为痛心，值此外侮日亟、千钧一发之际，原应共赴国难，私人之间，讵容再生意见？汪先生如欲余去职，尽可直告，何必牵涉其自身，更何必于电文内栏人远于事实之语。自‘九一八’以还，余个人身家性命均早经置之度外，更何论乎去留。惟余为负有地方治安之责任之人，事实上去留颇难自由。自今以后，立当部署所属，准备交代，绝不能拂袖引去，而危及治安。”

两天后，张学良复汪精卫电，电文曰：“上海汪院长精公赐鉴：接诵鱼电，万分痛心。良供职无状，重累我公。抚躬循省，渐悚曷极！顾区区之意，尚有愿为公一陈者。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良职责所在，凡有吁请，均为自卫所必需。若夫明知中央困难，而故作要求，良虽至愚，亦曷敢出此？尊电所云，自一纸宣言抗御外侮以来，所责于财政部者，即筹五百万，至少先交二百万等语，两月前虽有此请，惟因财政特别困难，近实未敢再提。热省为自卫计，提案请求中央协款，经北平政委会大会决议，由全体委员列名电恳，非良个人之请求。尤无以每月三百万责行政院之事。铁道部二百万元，乃系由北宁路局筹备，由铁道部转帐，前承宋部长电示，我公体念艰窘，已商令铁道部长照拨。虽事经中变，亦具见我公维护之苦心。总之，良奉命守土，从来一维中央之意旨是遵。倘以为良如在职，有碍于内政或外交之进行，自当立时引退，绝无瞻念迟回之意。若以良故，而使我公为难，政枢无主，良之罪戾，真百身莫赎矣。顷已遵照公电，电请中央罢免本职，遴员接替。惟念我公党国柱石，海内具瞻，万不可飘然远行，置国难于不顾。敬祈即日复职，主持大政，庶几可拯时艰，即良以得少减罪戾。剖心奉复，切希鉴纳。张学良庚（八日）印。”

八月八日，是汪、张交恶中最激烈而关键的一天。这一天，双方互相指责的电文不断，并纷纷向报界发表谈话。

当日，张学良还致电蒋介石："奉职无状，累及汪公，反躬循省，惟有深自怨艾。顷已电请中央罢免现职。一、华北安危，极关重要，在继任人员未到以前，在短期间，仍必尽力负责，以减中央北顾之忧。惟望速派大员，早定局面。二、军事一项，关系地方治安，尤为重要，钧座负军事最高全责，尚请主持。三、国家今日危险万分，良心平气和，决不敢因一时之负气，致军事更为严重。良深知内忧外患统属于钧座一身，良为国家计，为钧座计，一切无不唯命是从。"

同日，汪精卫又致电中政会驳斥张电："顷接张主任庚日复兆鱼电，有云：'自卫必先准备，准备非财莫举，良职责所在，凡有吁请，均为自卫所必需'等语，循读再四，万感钻心，骨鲠在喉，愿得一吐为快。各省税收，分为国家税与地方税两种，国家税归之中央，地方税归之本省，实为不易之原则。……至于地方税收，名目繁苛，更无可究诘，其用途则十有九以上养兵。而兵几何，每兵每月所得几何，中央亦无过问之权。一旦疆场有事，中央责以防御，则请饷之电来如雪片，自卫固必先准备，准备固非财莫举，但所谓财者，平日已被一口吞尽，涓滴无余，中央何从得财以应其请，请而不遂，则一切责任归于中央，而举土地以委诸敌人，亦非其罪矣。呜呼，此等现状，非独河北、热河、察哈尔为然，而张主任治下为尤甚。名为一家，实则异国，兴言及此，可胜痛心。窃以为今日而欲抵抗强敌，惟一办法在打破各省军人割据之局面，使中央能聚全国之财，运全国之兵，以为全国争存亡。能如是，即不敢言必胜，而长期抵抗，则可必其把握。否则，土崩瓦解，自亡不暇，遑言救亡乎。……"

当天，汪精卫又对上海报界发表谈话说："晨各部长来谈，

余决辞，因商院长继任人选，宋不允代，中央行政不可一日无人主持，继任者约四日内可决定，因九日行政院会、十日中政会、十一日中常会后可发表，各部长当留任。张学良来电甚客气，中谓自卫方有抵抗，抵抗乃需款，理固为然，但国款赖税收，冀、热、察等省平日无款解中央，今乃向中央求款，中央不能举内外债，何能应付。河北现收入几何，中央不得而知，以民十四言，国地两税每月有五百万，若军队有二十万，则二百万足矣，余数用在何处？日本图热，两月前即有企图，前攫东省，声言不动热河，今攻热河则言不动平津，试问果得热河，谁能保其不窥平津？现非先集中各省财政，不能集中军队。目下全国军队三百万人，能听命不截税者，只苏、浙、皖、赣、湘。其他各自为政，中央非遇事不管，但须各省将收入解交，遇有困难，中央自有解救办法。苏省财难，现中央已为设法，有例可证，新院长人选，于右任、戴传贤均可，蔡元培来更好，中央应准彼及张学良辞，张可来京任军事委员，华北不抵抗，实不在张一人。继任以何应钦、朱培德为宜。有询以阎、冯如何者，汪谓不可，将予人以口实，增加纠纷。又谓本人固可称为政客，但仍将奋斗，以政客破坏军人干政截税之局。”

汪又谓，行政院无惩戒军人力量，惟华北将为辽沈之续，与其因循，何如皆亡云云。

与此同时，张学良发表辞职专电，文曰：“南京洛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行政院钧鉴：窃良以菲材，谬膺军寄，外侮日肆，饮恨痛心。原思忍辱负重，尽力职责，奋其待罪之身，勉图方来之效。乃以识力短浅，事与愿违。匡济无方，寸功未立。长此素餐席禄，诚恐陨越贻羞。国难方深，反躬惭悚，即请罢免北平绥靖主任现职，简贤继任。披诚上陈，主任迫切待命之至。张学良叩庚（八日）印。”

辞电发表后，张学良于八日晚七时，在北平顺承王府接见新闻记者，发表长篇谈话，说至其历史时，极为痛心，以致落泪。

首先，他解释向中央请款经过，及汪氏鱼电所指各节。然后说："余现在所处之境，上有婆婆，下有儿女，其在中间者，实感困难。向中央请款，中央可以延缓，部下向余请款，则不能不负责筹措。余常谓此时不应只求胜利，应先存与敌人同归于尽之决心，无准备，如何能长期抵抗？有人谓汪先生前次来平，余有简慢开罪之处，适余有病入协和医院，有诊断书可查。余近年以来，顾惜华北政治军事教育，及东北灾官灾民，失业学子，无处不需款办事，筹措万分困难，而受者尤为不足或不满，实痛苦万分。当此国难，凡我同胞，对国事当如何振奋，为官者更应尽其职责，余安敢因困苦而卸责乎？华北各友军，中央命余照料，余每次发饷，必先筹划庞、宋等部军饷，良以职责所在，有不顾推诿者，假如新旧所属军队不一律看待，亦可省许多款，不致如现在困难。余一切甚愿开诚布公也。总之，年来对国事感受十八分之困难，但为国家稍存体面计，不愿尽行披露，所以关于社会间误会不致具辩论，但自问良心无愧，尽我职责而已，事久则必有公论，何必就个人一时之快，置国家体面于不顾，尽行宣布乎！"

又云："余决非负气，只以环境关系，决愿辞职。关于华北治安，最好请蒋先生来负责，但在剿匪其中，不能功亏一篑，在接替无人时，短时期中余必负责到底。"

"余反躬自问，再三思维，近年来误国之处甚多，使政府长官耽忧，致部属朋友受累，更陷自身于痛苦，皆是自己年轻，少读书，天性憨直，凡事误于坦白，缺乏政治阅历。只知爱国之成见，不计世道人情，致生许多困难。余素常不自明了，不知爱国之辈其理由安在，今日余知其中之滋味矣。余心

中十分难过，假如不因爱国二字，张氏父子无今日之结果（言至此，哭有顷），生命财产，一切损失，造成外则为邻国之仇，内则受国人之唾骂，所以余必须再读书，广求学问，好在年富力强，报国日长。再切愿国人勿因此回事件，对汪先生有误认之处。”

九日晚七时，张学良再次接见新闻记者，对汪精卫“齐电”声明说：“汪先生齐电之意，一方面认为现在各省军事长官全系割据，深加痛恨，一方面则认为冀察各省似乎全属余个人，一切军事财政以及对外，应由冀察各省自任之。此种思想，似乎忘却政府之地位及责任。汪先生谓余截留税收，不解国库，然此项拨付办法，系民国十九年由政府及财政部规定，有案可考，汪先生必因公事缺掌，未加详查。税收官吏除各省政府范围内者，依法由各省政府自行委派外，中央所属机关官吏，统由政府任命，或由财部委派，皆有政府命令部令可考。所谓收入被余一口吞没，语意未免太重。果真如此，是余犯刑事条律，汪先生为最高行政长官，自可找出实据，执法以绳，监察院亦可随时纠弹。查冀察各省财政，向来一切公开，近由财政整理委员会监督指导，所有收支，有议决案及旬月报表可资考证。且财委人员多为军委政委兼充，至余所辖军政各费，历经呈报政府及财部有案，汪先生一查便知。”

我当时坚持认为，要我辞职是可以的，但这不属于你汪先生的管辖范围，因为我是属于“军委会”管的。

汪、张纠纷，使蒋介石很难处理。因为，他一方面要利用汪精卫应付“党内纠纷”，并为他分担外交责任（汪兼任外交部长）；一方面又要用张学良来为他“绥靖”北方，防止阎（锡山）、冯（玉祥）势力的复活。两者缺一不可。

为敷衍汪精卫的面子，蒋介石遂下令准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主任之职，改北平绥署为“军委会北平分会”，自兼分会委

员长，命张学良代行此职。

与此同时，宋哲元等将领联名通电，痛斥汪精卫“夺将帅于三军”，表示与张学良共进退。在此情况下，汪精卫愤然辞职，负气出国；张学良则依旧留任北平，代蒋介石主持“军分会”。

他辞职了，我也辞职了。但是，我辞职后中央又挽留了我，他辞职就走开了，这样，我两人就闹翻了。

至此，南京政府的统治，又形成了“南蒋北张”的局面。蒋介石全力“剿共”，张学良则在北方支撑危局。但这时，张学良的地位已江河日下，声誉大跌，国内人民反蒋斥张的呼声日益高涨，张学良则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苦闷异常。

这时，日本人以取缔义勇军和确保“满洲国”的安全为借口，准备引诱何柱国创立一个包括滦东和热河的“缓冲区”。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何柱国的拒绝。何柱国认为：“无论从个人的人格或民族的气节而言，都绝无考虑的余地。”

于是，十二月八日，日本关东军铁甲车公然炮击驻守榆关的东北军。事件发生后，何柱国亲自与关东军谷贺联队长、吉岗参谋等交涉，以解决炮击问题。但日方态度蛮横，狂妄叫嚷“日本已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完成并巩固‘满洲国’国境线”，企图迫使何柱国就范。另一方面，又以二百万日元的价码企图拉拢何柱国建立独立的自治区。

为应付这种形势，何柱国亲自到北平请示张学良，他说：“事情已经到了图穷匕首见的最后时刻了！”张学良答道：“我知道，咱们拼了吧！”

接着，张学良连续开了几天秘密会议，并做了如下的军事部署：晋军商震的三十二军开赴滦河；西北军宋哲元的二十九军调到喜峰口；东北军王以哲的部队增防古北口，万福麟和缪澄流的部队推进到何柱国所部的右翼界岭口以北地区。

正当张学良调兵遣将之际，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张学良命令何柱国迅即赶回前线指挥，于是，热河抗战的序幕拉开了。

第四十九章　热 河 抗 战

1933.1

——“如果我不救亡抗日，你们就号召东北的父老乡亲挖我的祖坟！”

——“热河抗战，部队接受任务出发，接敌后，连这些部队的位置都查不清，怎么指挥？”

——“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托付之重。”

汤玉麟这个人粗野得很，他外号叫汤大虎，意思是糊涂的人。大虎，就是混，混人，不是蛮。那热河就是他失守的！我当政东三省时，最难过的就是热河省这事。我本来打算要撤换他的，可是为什么不敢呢？因为九一八事变之后，我怕我一动，他就去投靠日本人。我真没有办法，你明白吗？

本来，我都预备好了，我在北平时，已准备让宋哲元去做热河都统，把汤玉麟换下来，可是踌躇再三，终于没有去做。因为我做错一件大事，就是杀杨宇霆。

他怕我了，弄得他们都怕我。我那时叫他到北平来，他不敢来，你明白吗，他怕来了以后我干掉他，杀他。

当年，他们都不怕我，以为我是个年轻小孩子，待我把杨宇霆他们杀掉了，他们一看，好家伙，这小孩子怎么这么凶?

当年我父亲手下有个孙烈臣，你大概知道吧，我那时当参谋长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吃饭，他就说，如果老将要杀我、要枪毙我的时候，一定就是你了！他的意思是说，去执行的人肯定是我，最后是我去杀他。

汤玉麟是张作霖的拜把兄弟，是与张作霖一同起事的绿林英雄。因为这层关系，他在热河飞扬跋扈，作威作福。他自命是天上星宿转世，降生来辅助张作霖的。

在几位同洋兄弟中，他们称吴俊升为黑熊投胎，故此，吴家平时养了几头大熊，吴本人行动走路也都模仿熊的动作。另一位把兄弟张海鹏，则自称是张飞转世，因此一过关羽庙，他便进去叩头，连声对着关羽泥像呼二哥。

这位汤玉麟，被称为是猛虎投生，所以他酷爱老虎：在客厅里摆着一只老虎标本，墙上挂着他手持机关枪骑在虎背上的照片，坐的椅子上也蒙着一张虎皮；就是平时他坐着谈话时，也常常将两手握拳前扑桌上，借以表示“虎威”。实际上所谓汤大虎的“虎”字，据张学良解释，并无“虎威”之意。

汤玉麟自郭松龄反奉后就任热河省主席，至此已经七年，部队扩充到三万多人。他父子三人在热河横征暴敛，大开烟禁，跋扈专横，贪赃枉法，是个腐败无能的“土皇帝”，简直视热河为他汤家的私产。

“满洲国”建立后，日本曾对汤玉麟进行劝降，要他承认

自己是“满洲国”委任的省长，同意把铁路由北票延伸到承德。此事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汤玉麟未敢轻举妄动。

日本占领东北，“国联”派了个李顿调查团到中国进行所谓的调查，殊料，调查报告建议“国联”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所取得的全部特权，只是不承认“满洲国”。日本为此大为光火，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开始向关内进攻，热河之战开始了。

侵占热河省本来就是日军蓄谋已久的军事行动。早在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日本陆军参谋长就密电关东军参谋长：“关于热河问题的计划应随时汇报，如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

关东军的战略企图是：“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扰乱满洲国的祸根，即华北张学良的势力创造条件，进而确立满洲国的基础。”

面对日军出兵热河、攻势咄咄逼人的危局，北平军分会的最高长官、统辖华北五省三市的张学良将军，国难家仇，齐涌心头，决心御敌于长城之外，他誓言道：“如果我不救亡抗日，你们就号召东北的父老乡亲挖我的祖坟！”

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亲笔拟电给张学良：“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此间自中正回京后，已积极筹备增援，期共存亡，并已密备六个师，随时可运输北援，粮秣弹药，中正到沪亦备办。甚望吾兄照预定计划，火速布置，勿稍犹豫。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请兄急起，如何，盼复。”

接电后，张学良满怀一腔沸腾的复仇热血，支撑着病弱之躯，当众声明带兵亲征，欲在长城一线同日军决一雌雄。

一九三三年元旦，日宪兵借故挑衅，向我山海关南门开火。在双方交涉中，日军提出，我军必须“开放南门，由其警戒”，这一无理要求遭我方严词拒绝。日军立即撕下伪装，当

晚，关东军步兵第四旅团在铃木少将指挥下，配以飞机大炮，向山海关大举进攻。

当时，驻守山海关的是东北军何柱国的部队，守军不过千余，难抵日军凶猛攻势，加之内缺弹粮，外无援军，处境垂危。但是，他们惟一可依赖的是几千年前古人留给他们的城墙和一个军队为民族、为个人争生存的信念！

结果，双方展开了激烈巷战，东北守军第一营和第三营将士，与日军坦克、步兵殊死拼杀三昼夜，全部阵亡，实现了他们以血肉之躯再筑长城的豪迈誓言。

山海关陷落，举国震惊，民众哗然。

"我认为各国之和平运动今已无效，我们为争取民族的生存，只有拿我们的血肉、我们的性命来维持和平、来保障中国，舍此，再无其它办法了。"

一月八日，张学良为山海关失陷召开记者会，义愤填膺地说。

张学良急电蒋介石。蒋介石一面声称已调中央军黄杰、关麟征、刘戡率三师兵力北上增援，一面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一行人浩浩荡荡乘专车北上。表面上看，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好似很重视长城抗战，全力支持张学良，实则是来看看风向，明里抵抗，暗里却欲与日本搞妥协外交。

军政大员几乎倾巢北上，完全蒙蔽了张学良的政治视野，他还以为蒋介石接受了九一八事变的教训，全力支持他御侮抗战，遂一扫多日来的沮丧颓唐之气，决心为保卫热河而大干一场。

"热河地高多山，北接外蒙、龙江，东连辽宁，西接察绥，南接平津，四方均是平原，故热河如同炮垒，为华北最重要之关键地区，热河如保存，则进可恢复东北，还我河山。国人应

深切关注热河之重要性。”

二月六日，张学良在一次有各方面人士参加的军政会议上，首先指出了热河的天然形势和固守热河的重要意义，接着，他号召将士们奋起抗战。

二月十六日下午，张学良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讲，热烈支持北平爱国人士朱庆澜等人组织东北热河后援协进会。当晚，张学良在顺承王府官邸召集有关将领开会，分配防务，调兵遣将，并布置翌日前往热河视察的各项准备。



山海关沦陷后，一九三三年二月三日，张学良率东北军二十七名将领通电“保卫热河”。二月十一日，代理行政院院长宋子文到热河，公开表示“愿做后盾”。

在顺承王府，东北军主要将领除不能离开防地者外，都来了，宋子文、杨杰、商震、宋哲元也都在场。张学良把热河地图摊在地上，手拿红蓝铅笔，划分各军防地。

"明轩，请你把守长城冷口、喜峰口一线，好吗?"张学良抬头对宋哲元说。

"我的兵力不足，装备又不好，这一线关系重大，我担负不了。"宋哲元当时以很不客气的口吻说。

"你不必担心兵力单薄，何柱国摆在你的右翼，他可以全力支撑你。"张学良按捺住性子，善言道。

"何柱国是败军之将，靠不住，我不能信任他，这个任务我不接受。"殊料，宋哲元更加不客气地说道。

何柱国后来著文回忆说："宋哲元说我是败军之将，指的就是我在山海关战役中，没有能够阻止日军前进，奉命撤退到滦河西岸。其实这次榆关之战，是东北军撤出东北后第一次与日军的激烈战斗，他说这种话，不过是有意给张学良以难堪。张学良在一九二六年帮助吴佩孚对冯玉祥军作战时，宋哲元当时就是张学良东北军的手下败将，那次作战的结果是把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了平津。"

宋哲元出言不逊，一时搞得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张学良强忍着火气，继续开会，并在会议结束时宣布任命张作相为保卫热河的统帅，兼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汤玉麟任副司令。

二月十七日晨四时许，张学良与宋子文等偕同随员乘三十余辆汽车为一路，朱庆澜、黄炎培等乘十余辆车为另一路，浩浩荡荡向承德汤玉麟的防地进发。张学良这时因染有烈性毒品瘾，所以在热河路上每走三十里，就要停车打一次吗啡针，及到承德时，已疲惫不堪。

欢迎午餐于十八日举行。宴会上，宋子文首先讲话，表示南京与全国皆非常关注热河的安危，要大家保国卫土，所需饷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七日，张学良偕宋子文、汤玉麟、朱庆澜、张作相在承德合影（右起汤玉麟、宋子文、张学良、张作相、朱庆澜）

械，他义不容辞，全力负责。张学良接着致辞，他勉励大家誓守热河，准备反攻，以雪“九一八”之耻。

利用这一在热河前线视察的机会，张学良、张作相及随行的高级参谋人员，将由北平带来的两个电稿从承德发出：一是致日内瓦中国驻国际联盟代表团的电报，电文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决心抵抗日寇的侵略，现集中兵力，保卫热河。该电由宋子文、张学良等署名。另一电是张学良、汤玉麟、万福麟、宋哲元等二十七名誓守热河的将领向南京及全国发出的通电，表示决心上阵杀敌，呼吁全国一致支持热河抗战。电文曰：“舍奋斗无以求生，舍牺牲无以救死，但有一兵一卒，亦必再接再励。幸而成，固可复我河山，雪莫大之耻辱。”

二月二十二日，就在宋、张察看热河军情后的第四天，由关东军司令长官率领三个师团的兵力，以锦州为大本营，分兵

四路：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一路由林西攻多伦，拉开了入侵热河的战幕。

参战的有日本第六、八两个师团，军本部直辖两个步兵混成旅团，一个骑兵旅团及飞行联队、重炮队和坦克队，并配有伪满张海鹏和于藏山的两个军，共约十万多人。日方计划前三路攻下承德后，再进攻长城各口。

张学良也针锋相对地加紧部署，他成立了两个集团军，各辖三个军团。第一集团军由张学良自兼总司令，由于学忠、商震、宋哲元分任一、二、三军团长，约十七八万人，防守滦东至喜峰长城一线。第二集团军由张作相任总司令，万福麟、汤玉麟、张作相分任四、五、六军团长，防守热河。

然而，热河统帅张作相原计划配备的兵力，此刻竟有一半以上未到达防地，更谈不上完整的防御体系。当日本人用飞机扔了几个炸弹，用机枪扫射了几下，又出动坦克一击，结果，开鲁一线，汤部崔兴武旅即首先投降，日兵蜂拥而入；守凌源一线的万福麟的第四军团与日军拼杀了一阵，但架不住腹背受敌，不得已退守喜峰口；朝阳一线亦即告失守。这样，三条阵线同时溃败。万福麟、张作相连忙指挥所部反击，激战中，于兆麟将军壮烈殉国。

后来，张学良曾对刘鼎说过当时的混乱情况："热河抗战，部队接受任务出发，接敌后，战地指挥官连这些部队的位置都无法查清，怎么指挥？"

当张作相赶到承德时，承德已经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城内乱成一团。汤玉麟则用大批车辆抢运私人财产，向天津租界运送，置紧急军情于不顾。张作相找他，他人也不见面，电话也不接。

万福麟当时指挥的东北军有五个旅、三个炮兵团，兵力并不算单薄，由于北票、朝阳的陷落，腹背受敌，在没有得到总

指挥部命令的情况下，他就全部撤至喜峰口。已到达赤峰的杂牌军孙殿英部，则观望不前；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开到古北口，就不敢贸然前进了。张作相的总指挥部设在承德旧将军衙门里，恰似孤身守空城。

三月三日早晨，日军兵临城下，枪声四起，张作相身边除了几名卫士和几个文职参谋人员以外，兵将全无。他一个人坐在椅子上，口吸旱烟，两眼流泪。左右身边人问他怎么办，他恼怒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的副官卫士把他拖上汽车，向古北口急驰，一直逃到他儿子张廷枢那里，才算逃脱了一条命。汤玉麟则带着卫队逃到滦平去了，家眷也早已送往天津，日寇仅以一百二十八名骑兵的先头部队便占领了承德。

热河首府就这样闪电般地丢掉了，喧嚷一时的热河保卫战，就这样草草结束。

前线溃败，张学良目瞪口呆，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东北军竟如此不中用，热河的防务竟如此不堪一击。一阵急火攻心，他险些晕倒。盛怒中，张学良下令将汤玉麟追捕正法，以壮军威，以振士气。但汤玉麟畏罪逃往察哈尔，竟得幸免。

热河失陷以后，全国舆论哗然，一致谴责南京国民政府。张学良更被国人攻击得体无完肤。三月七日，张学良致电南京，引咎辞职。电文中说：

“自东北沦陷之后，效命行间，妄冀戴罪图功，勉求自赎。殊料热河之变，未逾旬日，失地千里。皆学良一人诚信未孚，指挥不当，以致负政府督责之殷，及国民托付之重。戾愆丛集，百喙莫辞。应恳迅赐命令，准免各职，以示惩儆。一面迅派大员接替，用伸国纪。转还之机，在此一举。”

张学良的这个辞职电文也是言不由衷。他原本还指望能得到蒋介石之慰留，以戴罪立功，重整旗鼓，拼死反击。发出辞职电后，他还对左右说：“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

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

蒋介石得知热河失守，即宣称要北上督师，筹划反攻。随后，偕宋子文乘专车到达石家庄，电约张学良在保定会面，言称共商反攻大计。

张学良本来是兴冲冲地想再去打日本，哪里知道蒋介石实际上已在准备他下台的后事，因为在蒋介石的妙算里，战必败，那只有牺牲张学良来了局。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认为：“热河抗战之失败，不能完全归咎于张学良。张不战而退出东北，遭到全国舆论的强烈谴责，他为了一洗‘不抵抗将军’之恶名，想守住热河，保全河北，决心与日军在榆关热河一战。榆关失守后，他把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开进热河布防，张当时的名义是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以蒋介石的名义，他不仅可以全权指挥东北军，还可以指挥华北所有的部队，包括阎锡山、冯玉祥的部队在内，但张学良和冯、阎都打过仗，现在冯、阎部队受他的指挥，事实上是有困难的。”又说，“张学良知道要保住热河，没有其他部队支援，光靠东北军是阻挡不住精锐的关东军的。他也知道冯、阎的部属宋哲元、商震的队伍是靠不住的，只有乞援于中央。这时蒋介石还在江西坐镇‘剿共’，在张之请求下，为了应付全国舆论，为了敷衍张学良，蒋答应调尚未参加江西‘剿共’的中央军刘戡的八十三师、黄杰的第二师、关麟征的第二十五师北上支援，但却迟迟其行。同时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名军政大员和军事专家于一九三三年二月初乘专车北上，前往北平，名义上是说帮助张学良襄赞谋划，保卫热河，实际上是探索形势，以战求和，逼张学良下野。”

实际上，在当时的形势下，东北军单独抗击南下入侵的日军难度是很大的，战而胜之的把握是极小的。热河抗战中，正

在“剿共”的蒋介石虽然调三师北上，但对张学良来讲，只不过是望梅止渴。其实，未参加“剿共”的中央军还不少，如精锐的胡宗南的第一师当时就驻在河南闲着没事干，袖手旁观。你看，这个仗让张学良怎样去打？

当时，《大公报》曾发表社论总结热河抗战失败的原因：“在于武装之劣弱，给养之困乏，而何以劣弱与困乏？在于政治改革未成，故经济实力甚弱。此皆非一般民众之责，而少数上层社会之咎也。”

第五十章　兵败下野

1933.3

——“蒋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职，我立即说，那当然，我先跳，我先跳下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

——“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唾骂要好得多，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

——“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而已！”

热河一战，我是失败了。那时，蒋先生同我见过一次面。他对我说，现在船上有三个人，但这船不能载三个人，总得下去一个。蒋先生的意思是让我辞职，我立即说，那当然，我先跳，我先跳下去。回来后，我就辞职了。

谁说我不愿意辞职？我这个人是拿得起放得下的，是一扔就扔掉了的。再说，不辞也没有别的法子。

三月七日，张学良虽然发出引咎辞职电，但这时的他仍想坚守长城一线，拟亲率东北军，反攻热河。他令王以哲守古北口，并想请求蒋介石补充些轻机枪、重机枪与迫击炮。万福麟想回北平，张学良电令："命你率部反攻，你要回来，拿头见我。"

万部缪澄流旅打得较好，在热河喇嘛洞阻击日军，杀敌几百人，缴获甚多，张学良闻讯大喜。他把参与此役的独立十六师中校参谋吕正操叫到北平来，了解与日军作战的情况，研究如何才能战胜日军。

然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徒劳的。

热河失守后，蒋介石于三月六日由南昌飞往汉口，再偕宋子文乘专车北上石家庄。何应钦、黄绍竑及阎锡山的代表徐永昌等前往石家庄迎接。蒋介石问何应钦等人，对张学良的请辞有何意见。

对此段经历，黄绍竑回忆道："蒋介石在南京时就早已决定要何应钦来取张学良而代之，现在为什么还要问呢？因为他对于东北军的底子还没有摸清楚，还有些顾虑。"

这时，何、黄表示说："第一，如果还让张学良干下去，不但全国舆论不满，而且北方军队如山西阎锡山的军队，西北宋哲元的部队，以及商震、孙殿英等部队都会不服。我们以后就指望这些军队继续抗战，中央军是不能多调出来的。第二，张学良虽有亲率东北军去收复热河与日本鬼子拼到底的表示，但从他的精神、体力来看是做不到的，而且拼下去也不会有好结果。第三，即使准张学良辞职下野，东北军方面也不会有什么顾虑。"

"蒋介石根据我们的报告，就决心允准张学良辞职下野。

由何应钦来接替。”黄绍竑回忆说，“张学良知道蒋介石来石家庄，也打电报去，想和何应钦等一同去石家庄迎接。但蒋介石还没有得到何应钦和我的报告，主意没有打定之前，不便与他见面，就复电说：‘前方军事吃紧，调度需人，不必就来，有必要时再约见面。’蒋介石同我们见面商量的次日，就约张学良到保定见面。张学良先到车站迎候，蒋介石后到，在蒋介石的专车上见面，仅有宋子文一人在座。何应钦和我在另一专车上，没有参加，怎样谈的，我们都不知道。”

原来，蒋介石同何、黄谈完之后，即电约张学良到保定会晤。

三月八日晚，张学良偕顾问端纳、副官处长汤国祯、秘书王卓然、周从政前往保定。

在专车上，张学良对王卓然说：“我与蒋先生约定在保定会见，我要与他商讨反攻热河，主要条件是必须补充枪炮弹药。若是中央有决心抗日，应向日本宣战。我是有决心亲临前线的，战死了比活着受全国人民唾骂要好得多，就怕南京假抵抗，真谋和，那我就没有办法了。你看我想的是不是？听说南京有一些亲日和恐日派，正同日本人拉拢讲交情。我已于昨日发出辞职电，南京可能牺牲我，以平息国人愤怒。同时外交上，因为国联靠不住，要与日本谋和。你看我想的对不对？”

此时，蒋介石再次与亲日派合作，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假抵抗，真谋和。

九日晨五时，张学良专车抵达保定。蒋、宋等原约定同时到达，但此时仍未到，车站上也无消息。张学良亲自到站长室向石家庄要电话，宋子文接电话说：“蒋先生有一项重要意见，要我先来保定与你商谈。因为太重要，电话中不便谈。我即来，见面再详细商量。”

张学良放下电话回到车上，面色阴沉。端纳忙问：“T.V怎

么说的？他们怎么还不来？”T.V是宋子文的英文名字缩写。

“我的预料果然不差，T.V先来传达蒋先生的重要意见，这里大有文章。我估计绝不是共谋反攻热河，更谈不到全面向日本宣战了。老王你好好译给端纳听。”张学良语气凝重地说。

随行人员连忙劝张学良上床休息，静观事变。同时，大家不由得对蒋介石的用意猜测纷纷。

约十时，宋子文的专车来到保定。张学良立时登车与他接谈，约二三十分钟，张学良匆匆下车，神情紧张。王卓然、端纳等人趋前急问。

“蒋先生认为热河失守之后，我守土有责，会受到全国民众的攻击。中央政府更是责无旁贷，他首当其冲。这正如同三人乘坐一只小船，本应同舟共济，但是目前风浪太大，如先下去一人，以避浪潮，可免同遭沉没。将来风平浪静，下船的人仍可上船。若是互守不舍，势必同归于尽，对自己对国家皆没有好处。我已干脆告诉了宋子文，当然我先下去，正好趁机会休息休息，我要他速告蒋先生不必烦心。”张学良说道。

张学良与随员们谈话时，宋子文便向石家庄方面打电话，告诉蒋介石说，汉卿态度很好，一切服从委员长的命令和安排，请委员长速来见面。

下午四点，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进入张学良专车站台的另一边。张学良的卫兵吹接官号。张学良戎装立正，行军礼恭迎。车停后，张学良与宋子文立刻登上蒋介石的专车前去商谈。

“接到你的辞职电报，我知道了你的诚意。”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言，板着脸劈头说道，“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子文传达说你慷慨同意，这是好的，好的。一切善后问题，可按

照你的意见办理。有什么问题可同子文商量，他可以代表我。”

蒋介石还对张学良讲了一套为“不抵抗政策”作辩护的“理论”，说什么“根据目前情况，我们无法战胜日本，如果再打败仗，我们的责任将更重大，目前的做法只能是稳定局势，和缓敌人，作好准备，长期抗日”。

蒋介石以此来应付张学良，张学良无可奈何，唯命是从，但他对蒋介石的论点并不能苟同。

“我感谢委员长的关心。”张学良回应说，“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丢失，我早就想引咎辞职。这次热河之变，我更是责无旁贷。免去我的本兼各职，正应以此申张纪律，振奋人心。我想日军必很快进攻华北，以遂其并吞整个中国的阴谋。国联列强各怀心事，决不可靠。我看委员长应考虑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目前，应急调中央劲旅与东北军配合反攻热河，以阻止日军前进。”

蒋介石含糊其词地说：“是的，是的。”

对张学良的请求，蒋介石点头称“是”，但内心是反对的。他答非所问地对张学良说：“关于你的辞职，为了免于张夫人的误解，我一定要和她当面讲清楚”。几天以后，蒋介石真的又赶到石家庄，面见张夫人于凤至，对之“安抚”，以表示他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

蒋、张会谈后，张学良的随从人员立即围拢过来，询问会谈内容。张学良神情阴沉地说：“我马上辞职出洋。”

随从人员群情激愤，皆为张学良鸣不平。适有保定驻军、东北军一一七师岳如升团长上车见张学良，痛哭失声，车中人也为之落泪。张学良却走过来安慰说：“有什么可难过的？咱们不久还是可以见面的。”

“蒋介石太不够朋友，用得着时，万种恩情说不尽，用不着时，一脚踢开！”在场的人个个义愤填膺，“蒋介石说遇到了

大风大浪，但这种风浪究竟是谁召来的呢？主张对日不抵抗的正是蒋自己，而您的内心是坚决主张抵抗的。现在遇到了风浪，正应该同舟共济，研究如何抵抗，但事到如今他仍然坚持不抵抗方针，却叫别人去做替罪的羔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一致反对张学良下野出洋，甚至都有把蒋介石扣留起来、硬干一下的想法。但张学良被蒋介石迷惑太深，甚至在想法上也与蒋介石产生某些共鸣。他相信，蒋介石的话是对的。因此，他对大家说，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主张自我牺牲到底。

几分钟后，蒋介石即偕宋子文到张学良的专车上回访，好言劝慰，劝他即飞上海，办理出洋手续。蒋介石再次嘱咐说：“一切都可与子文谈，子文可以代表我。”他下车后，边走边回首说：“汉卿，再见，再见啦。”接着，又转过头来对宋子文说：“子文你留下，与汉卿多谈谈。”说完，登上专车开往石家庄去了。宋子文与张学良则同车开往长辛店。

在张学良的专车上，宋子文与张学良商量，将东北军编为四个军，分别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率领，于学忠仍任河北省主席。调东北军参谋长鲍文樾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中央军第二、二十五两师开赴古北口，阻止日军前进。至于全国开战一事，留待中央从长计议。

谈毕已夜十时半，宋子文与张学良说声“上海再见”，便回到了自己的专车上，由长辛店折返石家庄，向蒋介石复命去了。

宋子文走后，张学良专车继续向北平开去，他也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王卓然正要休息，忽见副官长谭海跑过来慌慌张张地说：“王老师，副司令正在大哭，你快与端纳过去劝劝吧。”

王卓然急同端纳闯进张的卧室，但见张学良伏枕大哭，显

得非常沉痛。

端纳见状，连忙安慰说："少帅，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勇敢与坚强。"

"副司令，你还记得老子的话吧，'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王卓然安慰道，"你正好借机休息，恢复健康。若是真要责成你反攻热河，你的身体、精神皆不胜任，那时失败，不如这时痛痛快快地走掉，把病治好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王卓然回忆说："我与端纳正等待他的反应，这时，张学良突然一跃而起，仰天狂笑，然后急拉端纳和我坐在他的床上。此时汤国桢与谭海皆在一旁呆立。

"他说：'我是闹着玩，吓你们呢！我说蒋先生对日本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外交涉，这使我想起了一个笑话，我来说说，让我们开开心。话说有一个财主，夜里遭土匪来抢，土匪持刀要杀人。财主跪地求饶，边叩头边说，要什么都行，就是饶我一命。土匪一眼看见财主的老婆还好，就说，这样吧，我玩你的老婆，你跪在旁边叩头，头叩得好，就饶你的命，财主连声答应。及土匪兴尽席卷而去，财主老婆起身整衣哭骂财主说，哪有你这样无耻的人！我被贼作践，你应拼命救我，怎么还在旁边一个劲地磕头？财主说，你别哭，你哪知我们还占了他便宜呢！妇人大哭说，老婆被奸污，你有什么便宜可占？财主说，当你们最紧张最忙乱的时候，贼顾不上看我，我少叩了许多头，岂不是占了便宜！'"

讲完这个嘲讽南京对日外交政策的笑话，张学良转头对王卓然说："老王，你好好地翻译给端纳听，问他若有这样的便宜交涉，他干不干？我说这位财主最好去当外交部长，好与黄郛唱双簧。"

"过了一会儿，谭副官长进来报告说，已到西便门车站，

请副司令下车。”王卓然回忆说，“于是，我就伴张学良驱车回顺承王府，到达时已是午夜十二时。张学良在下汽车时，我问他：‘蒋要副司令马上飞上海，你想想，我可帮你做些什么准备工作？’他深思一下说：‘老王，你看我放弃兵权和地盘，就像丢掉破鞋一样，别的军人能办得到吗？但是中日问题，蒋先生以和为主，还不知演变到什么地步。人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是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仿佛记得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你替我查查原文，最好能马上译出送给我。’我进屋翻参考书，查出了这三句话，译文是：‘你可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久，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我送交他时，已是午夜二时，他还在阅读文件。”

三年后，张学良在西安曾对刘鼎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由于全国人民要求抗日，中央军也北上参战，我很兴奋，哪知在保定见了蒋委员长，他不谈抗战，反而逼我下台，所有以前的热情支持，只不过是诱我上圈套，好逼我下台。这是日、蒋合演的百戏而已！有谁较为善良，或者让人稍微喘口气呢？毒害是一样的，如果定要加以区别，那就是蛇比虎更狠。因此，回到车厢，我就闷倒在床上，号啕大哭。”

回到北平后，张学良在顺承王府立即召集师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宣布他即将辞职出洋。到会者愤愤不平，同声反对他下野，主张与老蒋硬拼，和老蒋见个高低。骑兵师长王奇峰甚至愤怒地说：“蒋要副司令下台，我们就挂红旗，加入共产党。”杂牌军师长孙殿英显然也是为了讨好东北军，甚至站起来大呼道：“如果是这样，我们就造反！”

面对群情激昂的军官们，张学良竭力劝阻，要他们切勿轻举妄动。

“我要到国外走走，不久就会回来的。”张学良说，“为什

么在国难家仇这样严重的关头，丢下你们，离开袍泽？这不用讲，你们都明白。我走以后，你们要好好干，要保存东北军这一点实力队伍，作为抵抗日本、收复东北的基本力量。我们不收复东北，对不起先大帅的在天之灵，对不起东北三千万父老百姓。中央给我们河北这个地盘子，交孝侯负责，流亡关内的东北老乡很多，已无家可归，要照顾这些人。大家要顶住日本人的进攻，保牢河北这块地方。”

张学良的讲话表明，他虽然暂时下野，但决不忘抗日；要注意保存东北军的实力，为将来的抗日复土而斗争。

当时，东北军还有二十六万人左右：王以哲、何柱国、万福麟各率三万人；张学良的贴身劲旅有刘多荃统帅的两万人；其余十多万，都由于学忠统帅，驻屯河北地区。

三月十一日，张学良向全国发表了下野通电。这份由章士钊代笔的通电，列举了他一九二八年上台以来主要的反日、拥蒋事迹和引咎下野的原因，并表明了今后的希望：

“余父与余历以保持中国在东北之主权为己任，余父且以身殉焉。迨余就任以后，仍本先父遗志，始终以巩固中央，统一中国为职志，兢兢业业，未尝或渝，即如不顾日本之公开恫吓而易帜，辅导国民党在东北之活动，与夫民国十九年秋余奉命入关，拥护中国统一。凡此种种，事实俱在。盖余深信惟健全政府，然后可以御外侮也。九一八之变发生，余正卧病在平，初以诉诸国联，必主张公道。洎乎日军侵热，余奉命守土，乃率师整旅，与敌周旋。接战以来，将士效命者，颇不乏人，无论事之成败若何，然部下之为国牺牲者，已以万计矣。此次蒋公北来，会商之下，益觉余今日之引咎辞职，即所以效忠党国、巩固中央之最善方法，故毅然下野，以谢国人。惟眷念多年袍泽，东北之健儿，孰非国家之将士？十九年奉命率其入关，援助中央，于今国难未已，国土未复，无家可归者数万

人，但盼中央俯察彼等劳苦，予以指导，并请社会人士加以援助，彼等为国为乡，皆抱热诚，并熟悉东北情形，倘遇报国之机，加以使用，俾得为收复东北之效命，遂其志愿，免于飘泊，于愿斯足。并盼国人鉴余诚悃，谅余庸愚，虽愆尤丛脞，而余本心只知为国，余皆不复自计也。”

在张学良向全国通电时，东北军将领义愤填膺，曾欲联名通电，表示与张学良共进退，以示抗议，但被张学良婉言劝止。

张学良的下野通电一发出，南京政府立即照准。下野后，蒋介石为贯彻其对日妥协的方针，任命亲日派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取缔河北的抗日义勇军及救国军；又派自己的侄子蒋孝先到北平，统领宪兵第三团，搜捕中共地下党员和抗日爱国的进步青年，破坏华北的抗日活动。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派黄郛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主任。黄郛与汪精卫都是亲日派的首领，黄郛去北平就任时，蒋介石致书参加长城抗战的中央军将领，要求他们对黄郛犹如对他自己一样。

这时，汪精卫也急忙回国，重任南京政府的行政院长，蒋、汪两人再次携手合作，共谋对日的妥协方针。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军在占领热河之后，又进犯长城各口。面对日寇的进攻，虽有广大官兵（如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等）的英勇抵抗，但因蒋、汪的妥协方针作祟，前线将士，孤军无援，长城抗战终于失败。

长城抗战失败后，在黄郛、何应钦主持下，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这个协定的条文事前未报告蒋介石，由于蒋介石曾指示停战协定不要用文字方式，黄、何怕蒋介石责怪，特派黄绍竑专程去庐山向蒋介石报告。协定中只规定双方停战及划分缓冲区范围等，未涉及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四省归属问

题，蒋听后连声说："好，好，你们处理得对！"

而实质上，这个丧权屈辱的《塘沽协定》，又出卖了华北的主权。

张学良下野后，国民党中一些别有用心的分子为搞臭他，以落井下石的卑劣手段，对他采取了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如在"一二八"抗战时，曾与日军勾结的海军部长陈绍宽、次长李世甲公然造谣，指控张学良把天津的海军医院出卖给法国人。国民党著名元老张继也跳出来，诬称张学良拿走了颐和园的古字画，还特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要他在张学良搭船出洋时予以查扣。吴铁城认为对张学良的指控毫无根据，于法不合，拒不办理。但张继仍抓住不放，大肆造谣。而事实是，张学良在颐和园养病时，曾借阅园藏古字画十五件；仓促离平时，已于四月九日委托朱光沐会同胡若愚负责检还；至五月九日，北平市长周大文亲携该字画检交颐和园管理事务所，该所会同故宫博物馆专家审核无误。

上述这些毁誉性的人身攻击，蒋介石不会不知道，但他却未加以制止。而张学良对部下的训词，句句都在极力维护蒋介石。如他曾叮嘱部下说："此次引咎辞职，对国家、对个人皆为必要。蒋先生是为大局着想，对本人也是仁至义尽，大家服从蒋先生，就是服从我，对不起蒋先生，也就是对不起我。"

张学良为人，坦率直爽，崇尚信义。关键时刻，他总是顾全大局，而将自己的名誉和地位置于非常次要的位置。

第五十一章　痛戒烟毒

1933.3

——“那滋味，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

——“米勒给我打上一种药治疗，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不知道，什么事都不知道了。”

——“这米勒，他跟我很早就是朋友，所以他的胆子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的痛苦状，要揍他。”

那时，我决心出国调理自己，我要借出国把大烟戒掉。没有这个嗜好的人不知道其痛苦。我当时有句话，我说过一句土话，就是一个活人叫一个死东西管着，你要是不能把它应付完了，那你什么事情也做不了。

我跟你说，一个人哪，不是我吹，能把烟戒了，那人就了

不得。我跟你说，戒烟时难受得像什么似的。那滋味，那肉就好像没皮肤一样，就好像烫了以后没有皮肤一样。尿尿、大小便，都不敢坐，烫的你不能坐，那可真痛啊！

我第一次抽鸦片烟，是因为作战发火。南下河南打仗时，我的部下要求退却。那时，我们总是两个伙计来管事，向来是这样，一般的事情他们做，重要的事情就找我，一找我，肯定就有什么大问题来了。那一次，部下不敢见我，就先找范连昆，范连昆就来找我，这下子可把我气死了。他说，你去吧，去看你的部下吧。我问什么事，他说，他们要求退却！我就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发脾气吗？两方短兵相接，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可能退得下来呢？我向来是不发脾气的，平时我要稍微把脸拉下来，他们都害怕。就这么一气，我通夜抽鸦片解烦恼，一下子就染上吸毒了。

张学良当然知道，吸食鸦片是很不光彩的恶习，所以当他主政东北时，就曾下决心戒除这一嗜好。那时候，杨宇霆向他推荐了一种日本注射药，名叫巴文耐鲁，说它具有特效。张学良急不择医，由当时帅府的马医官按时给他注射。可是，这种巴文耐鲁中含有海洛因，日久天长，张学良不吸鸦片烟了，但却离不开这种吗啡针。张学良对此大为恼火。

我后来不吸鸦片烟了，改打一种针。那是我的一个大夫，马大夫，当时是他的主意。每当犯鸦片烟瘾时，打一针就不犯了。问题在这儿，每天打一针、两针就可以了，可后来越打越多。

从一九二六年起，张学良吸毒已达七年之久，并因注射巴文耐鲁，毒瘾加深，甚至看文件时也要医生在背后给他注射。他在指挥作战时，如毒品供应不及时，极易暴跳如雷。吸毒已使他丧神误事，体弱不堪。

端纳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底，当我首次拜访张学良时，

张已十分瘦弱，不时痉挛般地颤动，已病入膏肓。”

一九三〇年后，张学良住在北平，因生活不检点，吸毒更重。九一八事变前后，北京张学良的私宅里，常常接到恐吓电话和来信，斥责他软弱无能；而报纸的投书栏目里，亦常见读者写给他的忠言和警语：“东北的年轻领袖如此懦弱，不思奋起，是由于他糜烂的生活。如不根治鸦片中毒，他的肉体不久也将灭亡。”

尤其是热河失守之后，张学良烦恼愈甚，心绪焦躁，郁郁寡欢。那些天，他注射吗啡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精神随之也变得越来越萎靡，加上上一年一场伤寒大病，一个刚刚三十多岁的人，看上去竟是一副老弱之态。

张学良下野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二日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端纳一行飞往上海。当天下午抵达，他发表短声明说：“东北军乃国家之军队，身为军人，既已解除职务，将统率的国家军队还诸中央。辞职后，励志修身，增益学识，使自己成为良好一国民。”

此时，宋子文招待张学良入住福煦路八十一号，并为他办理了出国手续。

在上海，张学良的部下和他的亲属看到少帅被毒瘾折磨得身心疲惫不堪，都十分焦虑。于凤至夫人和赵四小姐也多少有此嗜好，亦愿借机调理自己，便一齐力劝张学良早下决心，尽快戒毒，恢复健康，重振精神，以便在不远的将来率领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她们请顾问端纳和“洋宰相”宋子文一起来说服张学良。

于是，端纳来到张学良面前，恳劝他利用出国考察的机会戒掉大烟，康复身体，做一名真正的大丈夫。但对此忠告，张学良并未加以重视。

“汉卿，出国之前，你一定要戒除嗜好。这不仅是关系到

你个人的身体健康，而且也关系到中华民族的体面观瞻啊！”宋子文忍不住进言道。

宋子文与张学良兴趣相投，志同道合，都属“洋派”人物。他在劝张学良时，起初是天南海北地讲了一堆生理学理论，可张学良一句也听不进去。但他临别时的这一句话，却使张学良心头为之一震：“是啊，我张学良到国外去，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国家、代表中华民族，是关系到国家的体面啊。如果继续吸毒下去，依旧这样面黄肌瘦、精神萎靡不振，外国人准会耻笑我：大名鼎鼎的少帅，原来是个大烟鬼，靠这样的人能带兵打仗吗？洋人称我们是‘东亚病夫’，这种气还没受够吗？”

此时，张学良痛感到，如不彻底根治毒瘾，其前途不堪设想，不仅有辱国体，将来回国也无法工作。一想到国仇家恨，遂下决心戒毒。

宋子文恐其中途反悔变卦，便背着张学良召集几位东北军将领和侍卫人员开了个小会。他宣称：“张先生要戒毒，你们同意不同意？”大家均无异议。宋子文当即作出严格规定：“自即日起，要严格遵照医生的嘱咐，任何人不得接近治疗中的张先生和夫人，他们的安全由我来全权负责。”

宋子文请来名医米勒博士。米勒与张学良也是老相识，他略略诊视了一下，便用那双深陷的蓝眼睛盯视着张学良，郑重告诫道：“要清除病根，就得在五脏六腑之中翻江倒海，这是极其痛苦难忍的，而且时间将长达一周。副司令阁下，请您认真考虑，能忍受这种痛苦吗？肯下这个决心吗？”

张学良望着这位神色严肃的医生，知道这位洋博士对自己的决心存有疑虑，便微微一笑，坚定地说了一句：“请放心吧，米勒博士！”

我那次决心戒除嗜好，在大的方面说，固然是由于蒋先

生、端纳先生和宋先生对我的劝告。外间甚至有人说，是宋子文逼着我戒的，其实如果不是我自己下大决心，纵使十个宋子文也没法逼我戒啊。

到了上海以后，我便决心要戒除嗜好，请了上海疗养院的主任米勒博士主治。在未进行戒治以前，我把家里所有的人都找来，当着他们的面，把实弹手枪放在枕头下，警告他们说，你们记住，从我戒治之日起，无论何人，不论看见我怎样难过，也不许理我。如果有人拿毒品给我的话，我马上拿枪打死他。

张学良及其夫人们被送进治疗室，医护人员把张、于、赵三人分别用丝带绑在三张病床上，并关照所有的人说："不论这三人发出什么样的命令或请求，一概不要理会，旁人更不能擅自进入病房。"

米勒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先让病人服药使全身发泡，再由泡中取出液体注射在病人身上；一面抽出腐血，一面注入新血。

戒毒之初，三人极感痛疼，张学良因毒瘾最大，其痛苦更是深重难熬。

米勒给我打上一种药治疗，我连着三天处于昏迷状态，不知道，什么事都不知道了。这人呀，是个外国人，是德国籍的美国医生，要是中国医生，下不了狠心，那就不管用了。

不，不是杜月笙帮的忙。这米勒，他跟我很早就是朋友，所以他的胆子大。我的部下看到我的痛苦状，要揍他。他们对米勒说，你要是把他治死，你的命也就没了，你明白吗？

这事是这样的，早先在奉天时代，他那时还是孔祥熙的人，他到奉天为他的医院募捐，我就帮了他一点儿忙，捐了十万块钱给他。后来，他在奉天那儿建了一个小疗养院。以后，他又在汉口搞了一个疗养院，我又捐了十万块钱。这样，我跟

米勒也算是相当好的老朋友了。他后来写了本书，说了很多话，其中有一些不该说的话。

张学良下狠心戒毒，真可以和三国时期关云长刮骨疗毒的精神相媲美。戒毒过程确实苦不堪言。手脚都被捆绑在病床上的张学良，虽然痛感揪肠裂肚，但已束手无策。实在疼痛钻心时，他或用牙齿撕扯衣服或挣扎着打滚。衣服扯烂了，胳膊被自己咬青了，汗珠落在地板上，他呻吟着，哀号着，声声撕人心肺！亲朋好友实在忍受不下去了，几次都想冲进去解救他。

“我说过，谁也不许进来！”张学良在屋内吼道，“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违抗！”

当毒瘾发作时，张学良便用头“咚咚”撞墙。这声音像利剑一样，刺痛了门外人们的心。渐渐的，那“咚咚”声越来越小，频率越来越慢。最后，屋里一点声响也没有了。

这时，人们冲进屋里，只见张学良横躺在地板上，满头是血。米勒博士来到少帅身旁，见他双眼紧闭，浑身抽搐，知道他正在忍受着常人无法忍受的痛苦。米勒从内心佩服少帅的坚强意志，决定给他打安眠针，但从昏迷中醒来的张学良见到针头，条件反射，大吼道：“我不打针，我不打针，你们都出去！”说到这儿，张学良便又昏了过去。

就这样，一连七天七夜，经过一番死去活来、脱胎换骨的折磨，张学良终于铲除了痼疾，拔掉了病根。戒毒成功，是他以后建立丰功伟绩的第一步。

在谈到戒毒时，张学良将军还提到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儿。

我跟那个墨索里尼小姐是好朋友，在北京时就是了。她的先生齐亚诺在北平当驻中国的公使，我那时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平来，我招待她，就是这样认识的。陪她出去玩玩儿，吃顿饭什么的。

没有吧，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只是一般关系，我也没有想到她会喜欢我。我有一位秘书，是意大利小姐，是这个小姐告诉我的，我这才知道，她对我很好。她离开北平，临走时告诉我两句话。她说，你呀，希望你把烟好好戒掉，希望你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专车把他们送到天津，后去上海。结果，她在车上大哭一场，她哭我也不理她，一点儿也不理会她。以前在北平，我对她应酬、招待，都是一些礼貌上的事情。她就这样去了上海。

不久，我也到上海去戒针，给我戒针的米勒博士告诉我说，每天早上，都有一个外国女人打电话来，问你情况好不好，怎么样怎么样了。我想，她肯定就是墨索里尼小姐。

戒毒成功后，当张学良的密友齐亚诺及夫人与他重逢，准备陪伴他同去欧洲出游时，齐亚诺竟惊愕地叫起来："哎呀，少帅，仅仅一个月，阁下竟判若两人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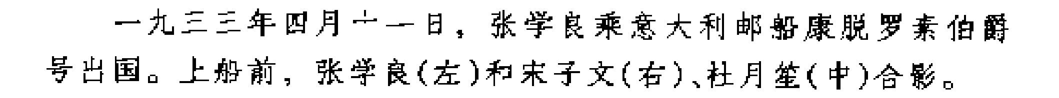
由于年轻体壮，加之平素喜欢锻炼，注意保养，未及一月，张学良便精神大振，神采奕奕。当友人请教张学良戒毒秘诀时，他欣然挥毫书写一条幅：

陋习好改志为鉴，
顽症难治心作医。

三月二十五日，胡汉民派何思毅持函赶到上海，劝阻张学良出国。函曰："自热河沦陷，吾兄去职，华北局面日趋洋沌。兄典军东北，久历岁时，今为人所乘，有怀莫白。闻将有远适异国之志，弟以为个人权力为轻，党国安危为重，恝然远行，似非其时；即不得已而行，亦须力策善后，挽回危局。是非所在，天下不乏同情，此间国人正具决心为兄后盾也。兹遣何思



热河抗战失败，张学良引咎辞职，出国考察。



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一日，张学良乘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出国。上船前，张学良(左)和宋子文(右)、杜月笙(中)合影。

毅同志趋陈近意，至盼廷洽。”

四月八日，张学良给胡汉民复信，内云：“何思毅同志携示琅翰，捧诵一一，辰维勋履绥和，式符私颂。良乍息薪劳，闭门自讼，乃蒙远垂记住，勖以方来，高谊殷隆，曷胜感奋！抚时多艰，耻痛毋忘，苟图少补涓尘，敢委匹夫之责！引詹檠范，弥切心驰，尚祈时赐教言，俾其待罪之身多叨宏益。”

四月十一日，张学良偕同于凤至夫人、赵四小姐及子女、顾问端纳、意大利朋友齐亚诺夫妇、翻译沈祖同夫妇、李应超夫妇及随从人员，一同登上意大利邮船康脱罗素伯爵号，踏上了去欧洲的行程。

这时，张学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容光焕发，又恢复了当年少帅的风采。

第五十二章　旅欧缉闻

1933.4

——“墨索里尼对我说：‘你来欧洲是没有用的，欧洲现在是自顾不暇。’”

——“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采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国家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

我先到了意大利。到意大利是他们用专车把我接过去的，人家对我那么客气，待我那么好哇。

一九三三年五月四日，张学良一行抵达意大利布林迪西港，在友人的热情接待下，当晚下榻罗马古兰特宾馆。

张学良为什么要把意大利作为他旅欧漫游考察的第一站呢？

张学良去意大利的目的，并不单单是游山玩水，去欣赏罗马教堂和威尼斯的水乡月色，更重要的是想向墨索里尼求经取宋。

原来，在北平时，张学良常和要好的朋友齐亚诺伯爵一起打高尔夫球，与他的夫人墨索里尼小姐跳交际舞，来往频繁，情投意合。齐亚诺常向张学良宣传法西斯的那一套。他说："你们国家之所以不能很快富强，就在于领袖太多，主张不统一，力量不集中。"

张学良初闻此言，颇以为然。他常想，为什么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能很快地"复兴"起来呢？是不是法西斯运动的作用呢？他很想了解和探求其中的"奥秘"，决心出游意大利。他在意大利考察游览达数月之久，颇受官方优待。



张学良（右三）和夫人于凤至（右六）到罗马时受到意大利朋友欢迎。

"你见到过墨索里尼没有?"唐教授问。

见到过，我见过墨索里尼，他对我很好。那时我去，他也知道我身上多少带有点儿任务，认为我是有政治活动的。我认为墨索里尼说的是好话。墨索里尼对我说:"你来欧洲是没有用的，欧洲现在是自顾不暇。你中国要想对付日本，只有美国。我告诉你这个现实情况，意大利没有力量、英法都自顾不暇。"

墨索里尼说得对，他对中国也不算是坏，但后来墨索里尼火了。为什么火呢? 因为国联制裁意大利的时候，中国是一言未发完全同意制裁，所以他说，我意大利对你中国这么好，你们怎么这样呢? 他非常生气，还写了封信大骂了我一通，我说我不负政治上的责任。那是我在汉口当剿共副总司令的时候。

"工作是大家的，"墨索里尼对张学良说，"而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人的。"对此法西斯名言，张学良当时颇为欣赏。

在罗马期间，张学良专心研究法西斯党的组织及其运动，曾与意皇及首相墨索里尼晤谈数次，对法西斯制度极感兴趣。

五月八日，张学良电邀由苏联经欧洲返国的东北抗日将领马占山、苏炳文、李杜三人前来罗马交换意见。相聚时，张学良赞扬马占山等人奋勇抗日之精神，勉励他们回国后要不忘国耻，继续抗日。张学良还认为，在东北要发展抗日武装，必须取得苏联的援助，为此，他想访问莫斯科。他曾转请中国驻法公使、他的好友顾维钧与苏联驻法使馆联系。但苏联怕刺激日本而引起苏日外交的纠葛，另外，因中东路事件，张学良被看成是反苏人物，斯大林不同意张学良访苏，因此，莫斯科谢绝了他的请求。

张学良游欧期间未能前往苏联访问，是他一生中的憾事。这件事也说明苏联的外交政策是僵硬的，狭隘的。

身在异乡，但张学良始终惦念着祖国。五月十二日，他曾

致函王树翰说："现虽寄身海外，但有三事尚不敢忘：一曰国难，二曰乡患，三曰家仇。"

六月二十日，张学良一人由罗马乘飞机去伦敦作短期考察访问。然后，他又飞回罗马，租赁了一所住房，院内有游泳池、网球场等设施。

在意大利时，张学良获悉《塘沽协定》签订的消息，心情十分沉重，他痛感到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想早日回国共赴国难。

七月，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出席国联在巴黎举行的中国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途经意大利。七月十四日，墨索里尼设宴欢迎宋子文，张学良出席作陪。

宋子文和张学良两人在异国相会，倍感亲切。张学良向宋子文表示，他在欧洲作短期逗留后，即拟回国，共赴救国大业，以此来试探蒋介石对他抱什么态度。

"蒋先生希望你多在外国考察一段时间，现在还没有适当的职位可以给你，你应当安下心来，以待机会。尤其是你必须得到蒋先生的召唤后，才可成行，这是特别要紧的。"宋子文郑重地叮嘱张学良。

这次和宋子文的谈话，使张学良感到心灰意冷。报国无门，归国无期，他数日郁闷，无限伤感。

不走不行了，人家对我那么好，那么热情。

七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一行从米兰飞抵巴黎，法国总理达拉迪派代表欢迎，顾维钧大使亦到机场欢迎。张学良计划在此地考察各军事机关和历史名胜，并拟前往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战场维丹参观。

夏季的巴黎，娇艳妩媚。张学良将军带着家眷来到巴黎城郊拉雪兹公墓的巴黎公社墙下。他手里拿着束鲜花，心情沉重。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默默地跟在后面。

这几天，张学良接到何柱国、王以哲等将领的来信。告诉



张学良（前排左五）访问巴黎，与法国朋友合影。

他国内抗日形势越来越糟，蒋介石下令全力剿共，却不许抗日。得知此消息，张学良心急如焚。

想到这里，他凝视着远处公社墙中央突出的母亲立体雕塑，仿佛听见了巴黎公社母亲在向人们诉说梯也尔反动政府的残酷；似乎听见了倒在这公社墙下的二千多公社战士的呐喊；又仿佛看到了万里之外的东北父老兄弟、数百万中华儿女倒在长城脚下的血泊中。

将军的眼睛湿润了，颤抖着双手准备把鲜花献到公社墙下。

正在这时，身后围上来十几个青年男女，从穿着打扮上一看，便知是中国留学生。他们直盯着张学良，其中一位直率地问道："你是张学良将军?"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问，张学良愣住了，然后，他点了点头。



张学良(左三)在法国巴黎向无名英雄墓献花圈。

“我听人说，法国大使馆给这位‘不抵抗将军’的到来保密呢。”有个学生用讥讽的口吻说道，周围的同学也都蔑视着张学良。

“你手里的鲜花是往公社墙下放的吗？不必了，你的鲜花应该献到长城上去！”

“对，张将军，你的权力在长城，而不是在这里观光考察。东三省三千万父老兄弟还在等着你回去呢！”

“张将军！我们这些同学明天就要回祖国去了，要回到东北去抗日。我们的血，我们的身躯，也应该像公社社员一样，留在祖国的长城上。张将军，带我们去收复东北吧！”

张学良激动地看着身边的热血青年，深深地被他们的爱国热情所感染。他拉住他们的手，说：“你们的爱国热情令人钦佩。如果中国人都像你们这样爱国，我们丢失的土地一定会夺回来，丢失的尊严也一定能挽救回来。你们的行为教育了我，

我张学良也是抗日的。同学们，看我的行动吧！”

同学们听张将军这么一说，都激动起来。其中一位学生对张学良喊道：“张将军，你要回到长城去，我们会在你的麾下打鬼子的！”

七月三十日，张学良携家眷飞往伦敦，再次赴英考察。八月十日，张学良参观了朴茨茅斯造船厂，他还在航空母舰上参观了海军的演练。当日，英海军司令在官邸设宴款待，张学良一行至晚始返伦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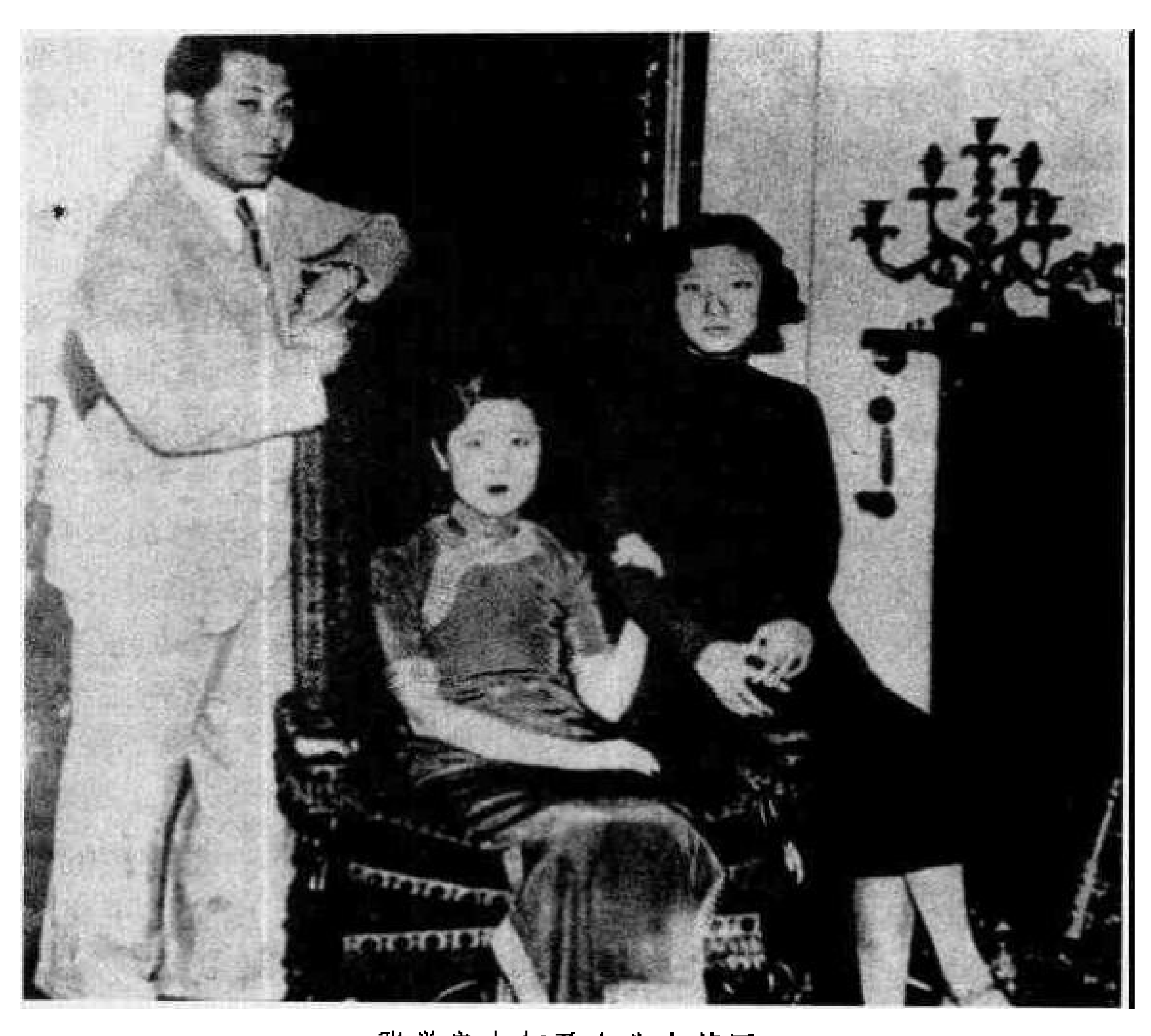
游历英国期间，英国摩登式的自由生活，给张学良以很大的影响。在英国，他出入波斯顿的洋餐馆，往来于英国的社交界，和英国的上流社会人士及夫人们互相交往，领略贵族生活的韵味，接受欧风美雨的洗礼。

在英国，我还碰到张发奎，你晓得他吗？

可惜他死了，他不死的话，你可以问他。我们俩都到了英国，那时郭泰祺当英国公使，他请客，给我们介绍。张发奎说，你不用介绍，他说我们俩早就认识了，他认识我，我认识他。北伐时，我们俩打得最凶，我俩的部队碰上了。张发奎说，我自率兵北上，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军队，那仗打得可真凶，还把蒋总统最喜欢的一个副官打死了。

我对张发奎说，我打仗也没有碰到过你这么厉害的部队，你那真是铁军！我也阵亡了好几名团长。我那时手下有一个团长，他是国民党的人，但这个我不管。过去，我手底下有共产党，我也知道这个事，但我也不管，你要干就干，凭你的自愿。

张学良在英国考察游历时，曾在布赖顿租了一座房子，把孩子们送进学校。后来他又到了伦敦，住在达彻斯特。那时，他结识了一些英国朋友，其中有海尔先爵士、亚斯透夫人，以及曼克多那尔先生等。


张学良夫妇及女儿在英国。

我在伦敦时，曾到《泰晤士报》去过，我与《泰晤士报》的人有关系。《泰晤士报》主管向来是不见客的，因为那主笔太忙。他对我说，我是不见客的，因为你来，我陪你一分钟，仅谈一分钟。那我就跟他说，我有个儿子，那时他还在读大学，快毕业了，可否到报社来干？他当时就能用拉丁文写文章，往《泰晤士报》投稿。主笔说那我非常欢迎，他说我这个地方，差不多有上百人，但是没有一个对中国通的，他要来，那好极了。所以，这事一下子就谈妥了。

九月十日，张学良由伦敦飞赴德国柏林考察访问。在德期间，张学良受到航空部长戈林元帅及国防部长布隆堡将军的热情招待，参观了步兵、炮兵、航空学校及若干兵工厂。其中，他特别详细地考察了克虏伯兵工厂，对德国青年之新精神印象极佳。

在德国时，我曾同一位高级军官谈话。我问他："听说德国于一周内，便可完成全国军事化的工作，是吗？"他回答说："诚然！但是法国不会给我们一个礼拜的时间。在几小时内，法国的飞机便可以毁灭柏林；在几小时内，法国的陆军便可长驱直入德国腹地。虽然这样，我们也要干，完成我们的工作！我国宁肯因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他的话说得很对。

我说，德法的情形与中日有相似的地方。我们现在也是宁肯斗争致死，决不束手待毙！因为束手待毙是必然的死，若是斗争，则有死有活。

当时，张学良片面地看到德意两国国民能完全服从领袖，而使国家一丝不乱，进而联想到中国。他认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只能依靠希特勒、墨索里尼那样的独裁者，用全体主义的方法来统帅全国，才能抵抗日本的侵略。

于是，他在致国内友人的信中说："意大利与德国之复兴，主要是人民全心全意地拥护领袖，使领袖得有充分力量克服救国途中的障碍。而中国则不然，当一个领袖刚刚显示出其安邦治国之雄才大略的时候，一些无耻的嫉妒小人就已经在背地里煽风点火，把他搞垮。内战与外侮皆由此而出。如果吾国之人民意欲奋起，救亡图存，他们必须绝对忠实于自己的领袖，全力支持他。"

旅欧期间，十月一日，张学良抵达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谒见了古斯达阿克五世皇帝，并出席了阿德夫殿下之午宴。在瑞访问期间，张学良为训练中国宪兵，拟在瑞招聘教官。十月

十四日，张学良又乘飞机赴芬兰访问。

十二月一日，张学良由伦敦飞巴黎。六日，又由巴黎飞罗马。八日，张学良再次谒见墨索里尼首相，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辞别之际，墨索里尼亲自授予张学良意皇之大十字勋章。次日，张学良对记者说，对墨索里尼治下的法西斯意国之进步，印象非常深刻。

另外，在旅欧期间，张学良还先后到过瑞士、丹麦等国参观访问。

在英国，他曾去下议院旁听，对议会民主很欣赏，认为“发言自由，态度和蔼，有民主作风”。但他又认为资本主义民主在中国不适用，行不通。

不能学英国的民主来救国，因为他们是资本主义国家，有长期的经验，民主作风深入民间，金钱的作用很大。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尚未产生开明的、大的资本家，政党政治很难稳定下来，军人要想领导民主政治更是南辕北辙。

中国的政治要安定，非采用开明的集权不可；国家建设要想迎头赶上，亦只有此路。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线：一为法西斯路线，一为共产主义路线。

同时，张学良又臆断，共产主义只有在阶级矛盾极其尖锐而又无外患的国家才能实现，对中国不适用。因此，他所设想的集权政治模式，只有走法西斯道路，模仿意德，复兴中国。这是张学良游欧谋求救国之道的结论，也是他回国后拥蒋武力统一中国的思想基础。

张学良出国期间，日本进一步入侵华北。而蒋介石一方面对日妥协投降，另一方面却加紧剿共，几次想调东北军为其驱使。

一九三三年五、六月间，新疆发生变乱，蒋介石想利用东北军“平定新疆”，但东北军将领却不愿受命，他们一心要打

回东北去，不愿远征西北；同年十一月，国民党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人民政府，高举反蒋旗帜。蒋介石想调东北军入闽“平乱”，不料又遭拒绝。

当时，蒋介石正发动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进攻江西和湖北，但都为红军所粉碎，消耗了巨大的实力。于是，他又想调东北军剿共。而要调东北军，非起用张学良不可。因而，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底，蒋介石终于同意张学良回国。

在张学良出国时期，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杂志上，登了一首打油诗讽刺张学良道：“赞助革命丢爸爸，拥护统一失老家。巴黎风光多和丽，将军走马看茶花。”林语堂等辈文人们哪里知道张学良奔走抗日救国的苦衷呢？

天知道，不抵抗的责任不应由我张学良一个人担负。就算是我一个人的罪过，那么，一误岂堪再误？国人皆骂我不抵抗，现在大家就应一致奋起，一致抵抗才是！

那时，人们把“不抵抗”的罪名一古脑儿全加在张学良头上，是欠公道的。

欧洲一游，张将军的行装中，樟木箱子有四十多个，柳条包也达四十多件，此外还有一些小物品。木箱和柳条包里装有古书古画、人参、鹿茸、呢料服装，还有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送的两支枪，一支是用金子镶饰，一支是用银子镶饰。这些物品后来都堆放在一个屋子里，专门有人负责保管。

这次出洋，张学良在政治上染上了法西斯毒素，生活上却更欣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这种政治上的法西斯主义和生活上的自由主义，再加上他固有的封建主义哥们儿“义气”思想，构成了他思想上的大杂烩，支配着他以后的言论和行动。

第五十三章 武昌就职

1934.2

——“我说我已经跟蒋先生约好了，一定要回到南京去。”

——“说良心话，我很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这样可以到上海去玩玩儿。”

——“我们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争夺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却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

“此次出国，纯系游历性质，兼考察抗日救国之道。通过观察，我觉得中国人与外国人脑汁与体质相同，但爱国之心则远不如之。外国人都以国家为前提，中国人不肯牺牲，只自顾金钱地位。今后救国责任，固望民众一致，更望青年努力。本人归国，非奉中央召，无非思乡念切，将卜居沪上。”

一九三四年一月六日，张学良一行到达香港。登岸后，张

学良即向新闻界发表游欧归来之感想。

原来，在张学良旅欧期间，中华民族的危机日趋深重。先是日军侵入华北，导演了“华北特殊化”丑剧，全国反侵略反内战的呼声日益高涨；而蒋介石则倾全力进攻中央苏区，围剿红军。

不料，十一月二十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的十九路军发动了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并与共产党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订立了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的政治地位转瞬之间又发生了危机。

在此情形下，东北军不仅不愿听从蒋介石的“平乱”调度，将领们还纷纷要求张学良回国。他们在电告了闽变后的国内形势后，恳嘱张学良“务请立即返回”，张学良也期盼着早日回国，以求有所作为。

蒋介石一直不愿意张学良早早返国。但“福建事变”发生后，考虑到张学良仍具较大的利用价值，亦以私人名义致电张学良，盼其尽快返回。

当时，张学良征求夫人于凤至的意见，问是否一同回去。于凤至考虑到眼下孩子们正在学习备考，需要她在身边照顾，遂表示愿暂留英国，等孩子们学业告一段落后，再考虑回国。而赵四亦愿意暂时陪伴一下她的于凤至大姐。

一九三三年于二月十五日，张学良一行由意大利威尼斯乘昆特帕尔特号轮船启程，南下返国。

张学良回国前，曾派陈言赴港向胡汉民致意。十二月二十三日，胡汉民派刘显丞持函前往迎接。胡汉民在信中说：“闻兄东归，至为欣慰。显丞兄前来相迎，并将国内政情有所陈述，藉备参证，因嘱奉候兴居。弟意种种，兄可并询之，能得其详也。”

当时，胡汉民正在广州从事反蒋活动，便与陈济棠亲赴香港与张学良会面，两人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加入他们的反蒋阵营。

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经过香港。胡汉民的意思，是要把我留在香港，他派他女儿到船上接我，接我去见他。见面后，胡汉民就劝我，不让我回南京，我没有答应。他又建议我好好去玩玩儿，到广东、广西去玩玩儿，我说我已经跟蒋先生约好了，一定要回到南京去，我到南京去看一看再说吧。

胡汉民还跟我讲了这么一段，你记下，也许你写文章有用。他实际上是在骂汪精卫，可是，他骂汪精卫比咱骂得好，这老头说的话很有意思。他说，当年，在总理面前是两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一个是他。他说，总理总是派汪精卫到外面去办外交这些事，干这些事都得说假话呀，不能说真话。因此，汪精卫习惯了，他跟谁都说假话。而我呢，他说我是办内务的，我得说实话，我在总理面前什么话都说，我不在乎，好听的不好听的，我都不管，结果得罪了总理。胡汉民这话说得很有意思，他骂汪精卫骂得挺有技巧。

同时，胡汉民还批评蒋介石"为人私欲过重，缺乏忠诚，不足以为民族复兴的领袖"。

我当时认为，胡汉民的批评不能说毫无根据。但环顾当前领袖人物，在政治上、军事上真能领导全局者，除蒋先生外又有何人？

张学良决定继续拥戴蒋介石为领袖，容许他有个试验的机会。

而后，张学良乘轮船去上海。这时，他的部下和老相知纷纷前来欢迎。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下午四时，张学良所乘轮船驶进上海水域。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蒋介石的代表蒋伯城、宋子



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张学良乘船返回上海，与吴铁城（左）、杜月笙（中）合影。

文的代表黄纯道、上海保安处长杨虎以及魏益三、朱光沐、杜月笙等人乘专轮到江心迎接。这时，宋子文乘坐的防弹汽车也到了天文台码头，欢迎张学良归来。

我回国时，有人到新加坡接我，有人到香港接我。从香港到上海的船上，有的旧相知仍如九一八事变前那样狂饮豪赌，全无东北国土丧失、国破家亡之恨，我真感到有些失望。但也有很多人在搞抗日救国，支持义勇军。我看那些到新加坡、到香港去接我的那些人，不是为了官，就是为了钱。

抵达上海后，张学良在莫利哀路二号的私宅住下后，东北军旧部闻讯纷纷前来看望。有人向他告状，诉说蒋介石对东北军在待遇方面的歧视；有人劝他回国后，对蒋介石要提防；原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已退职闲居家中，听说张学良回到上海，立

即前往拜访，劝告他快回北平，不要去南京见蒋介石；原北宁路局长高纪毅是张学良的心腹密友，也来劝他自立门户，不要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但张学良此时已有自己的主意。

抵沪第二天，张学良在寓所与王化一等人畅谈欧游感想，十分赞赏墨索里尼的独裁统治，并表示愿意拥护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中国。

中国必须真正统一，拥护一个强有力者做领袖，像德、意两国那样，先把国内搞好，然后才能对外抗战。现在，只有蒋先生有这种资格，因此，我们决心拥护他做领袖。

一月十一日，张学良向报界发表书面讲话，内容如下：

> 出国游踪所及，达意、瑞、德、法、英、丹、瑞典，于各国物质文明，利用厚生之建设，感受印象最深。进一层追求，则有不少感觉：（一）各国民众皆能热烈拥护其领袖，俾得放手做事。意、德于大战残破之后，皆能转否为泰，而为领袖者亦忠诚无私，努力奋斗。返顾国内，争做领袖者太多，猜忌争斗，阻人成功，而成既不能令、又不受命之亡国病症，宁受外侮，而不许自己兄弟来统治。全国人若不愿为亡国奴，必大彻大悟，容许一个领袖有试验机会，发展效能。（二）西方学者治学专挚，有磨穿铁砚精神。而我国则名不副实，太学甚多，教师为金钱，学生为文凭，对于国家所贡献者，亦仅摇旗呐喊。（三）西方备战空气浓厚，厌恶战争到万分，各国猜忌及备战之急亦到万分。国人应速准备，泯除恩怨，否则惟有亡国。
>
> 至于本人回国原因，第一，我是倦鸟归林。在外国居住久了，天天受到刺激，心总像火一般地燃烧着，恨不能化作精禽，立刻飞来，劝国人真正做到“精诚团结”四个字，把这个多难多灾的国家，明天就治好；第二，我是匆

匆去国，家庭个人私事多未得安置，不能不清理；第三，东北难民及失业的人太多，他们不断地给我写信，我得知他们的困苦情形实在难过，也急于回来同政府商量个根本救济东北难民及失业者之办法。至于是否做事，则本人系军人，惟有服从命令。国家如有用我的地方，自度力能胜任，决不敢偷闲；不能胜任，则不敢一误再误。维持和平，促进统一，向生产建设之路迈进，乃始终不变之志愿。如志不得行，拟再出国调查研究。

张学良刚抵沪，蒋介石即致电欢迎，召他在杭州会面，张学良立即应邀前往。在杭州车站，军统头子戴笠等专往迎接，蒋介石对张学良“热情款待”。

席间，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向蒋介石讲述了他旅欧的情况，大谈德、意法西斯独裁体制的优越性；说德、意的办法真好，值得仿效；建议蒋介石也建立一个法西斯政党。蒋介石听后显得由衷的高兴，但口上却说：“我们有三民主义，不需要法西斯主义，国民党是国父创造的党，不需要再组织法西斯党。”

“汉公，您老从国外回来后，为什么要去打共产党呢？”唐德刚教授问道。

当时，老总统对我是很不错的。我不是在老总统死的时候写过一副挽联吗？说实在的，老总统对我是不错的，回来后，他什么话都跟我讲。他说，汉卿，我知道你好玩儿，回来之后，你不要再玩儿了，这是一；第二，过去，国内对你不谅解，你现在选择一下，愿意做哪样事情？

蒋先生对我说，我给你两个事情，一个是你去打刘黑七。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刘黑七的大土匪，闹得很厉害。老总统又说，另一个是你去打共产党。

汪精卫的意思是让我去当京沪卫戍司令。说良心话，我很

愿意当京沪卫戍司令，这样可以到上海去玩玩儿。我不想再干别的了，也不想带东北军了。我把这个想法都跟老总统说明白了，可是老总统他不答应。

“那东北军怎么办？不带东北军了？”唐教授纳闷地问道。

这个事，大概一般人都弄不明白。东北军是我的包袱，我当时跟老总统说，我不想带军队，不想带东北军了，不干了！所以，我如果当上京沪卫戍司令，那我就不可能带东北军了，因为东北军始终是我脱不掉的包袱。

东北军有的将士抱怨我时，曾这样说，你跟蒋先生是这样密切的关系，但我们是跟着你来的，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无家可归，无处可归。中央也不愿意要我们，被打死了也领不到抚恤金，因为军政部规定，这种事都要回本乡本土去领，那我们就该回东北去领了，我们回东北去向谁领抚恤金？这不是不讲理的事情吗？

所以，我这个包袱，没法子脱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除国难家仇之外，我还有这个包袱，东北方面的包袱。所以，后来戴笠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他说，当年，你说东北军是你的包袱，我们都不理解，现在，我也有包袱了，我也同你一样，现在我的部下该怎么安置？

我回来后不想再带兵，我已把兵权交出去了，我当时很愿意同蒋先生接近，我愿意给他当侍从室主任，可蒋先生不答应我，还让我带兵。他说，你回来了，国人对你有很多不满的地方，你要做几件事情，以求得到国人的谅解。我问哪件事情最难？他说剿共最难，那我就挑了这个最难的。

但是，东北军却不愿剿共。东北军想回家乡是主题，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打，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部下对我心存怨怼，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了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然而，我到南京后，看得更多，体会更深，不满更强烈。看看眼下的国民党，也令我大感失望，国民政府军队作风比老式军队还坏，政治比原来的老政客更腐败。国民政府内部只有四个字：争权夺利。他们都不是为了国家。而共产党则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一九三四年二月七日，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当时，东北军许多人士如王树翰等，都认为东北军应该用来抗日，不同意张学良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副司令。但是，张学良别无选择，只有接受蒋介石的任命。

在张学良看来，东北失陷后，东北军在经济上依赖蒋介石，吃人家的饭，也得听人家的话。再说，张学良旅欧萌生了只有拥护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彻底消灭共产党，无后顾之忧才好抗日的念头。

虽然张学良返国后意欲振奋精神，有所作为，但对此职务仍不甚感兴趣，这一则是因为多年来他对打内战非常厌恶，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很愿意担任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

“良由国外归来，拟为将来抗日作预伏之工作。”张学良对朋友说，“过香港之时，胡汉民先生劝阻暂止于港，陈济棠派人欢迎入粤，良一概拒绝。到沪之后，本希冀为侍从室主任，其原因，良自思从未作过任何人部下，未有过任何长官，先大人父子关系，不可同论。良愿在蒋公左右学习学习，亦可加深彼此之认识；又可同中央诸同志多有接触，以便为将来对日作战时易于共处。以先在杭澄庐时，良曾向蒋公道及愿任侍从室主任之意，不幸之甚，此一志愿未能达到。三省剿匪副司令一职，本拟不就，王维宙再三劝阻，嘱良不可有所表示。”

当时，我曾对王卓然等人说过，目前，我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回北平，掌握起自己的军队，整顿训练，待机而动



张学良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八日奉蒋介石电召回国。三月一日，被任命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图为张（中）到部就职。

一条是拥护蒋介石，完全听他的。前一条路，必须得到日本人的谅解，受他们的摆布，不然，在华北是待不下去的。我张学良绝不能屈膝事仇，甘做汉奸，这条路决不能走。要想抗日复仇，打回老家去，单靠我们几十万军队，是无法对日本作战的，即使加上中央军，也未必于事有济。必须全国统一，再得到世界上同情我们的国家的援助，才能对日本作战。

我也曾对应德田说，现在外有强敌入侵，内有共产党捣乱，要求国家真正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委员长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是绝对正确的，我们为挽救国家危难，收复失地，只有拥护委员长，贯彻委员长的国策。

显然，张学良幻想蒋介石一旦统一中国，就会抗战。他对反抗日寇侵华的迫切性虽有所了解，但对共产党和红军却认识不足，因而终于追随蒋介石参加了反共内战．这是他谋求抗日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张学良（前右四）在武昌就副司令职后与张群（左三）、钱大钧（右三）等人合影。

救国道路上的大曲折。

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上午八时，张学良戎装由汉口渡江赴武昌“剿匪”总部，宣誓就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职，中央监誓员张群主持了典礼仪式。

在向总理像行礼之后，张学良举右手朗诵誓词曰：“余敬谨宣誓：余恪遵总理遗嘱，实行三民主义，服从长官命令，捍卫国家，爱护人民，克尽军人天职。如违背誓言，愿受严厉之处罚。”

三月九日，张学良率沈鸿烈、汤国桢等到南昌晋谒蒋介石，报告了就职后的军政情形。两人商谈良久，共谋了“剿共”之良策。

从南昌返回之后，坐镇武昌的张学良指示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调东北军南下，执行蒋介石的“剿共”计划。这样，张学良把散驻北京、天津附近的东北军各部队先后调防到

自己的任地，其兵力分配如下：

何柱国率五十七军驻湖北省；

王以哲率六十七军驻河南省；

于学忠率五十一军以及万福麟率五十三军布防武汉周围；

刘多荃率一〇三师，由张学良直辖。

这样，张学良重又掌握了旧东北军的基干部队，开始陷入反共内战的深渊。尽管他此时瞻前顾后，疑虑重重，但东北军诸将领们依然推崇他为领袖。

就在张学良履任新职之际，三月二十四日，张夫人于凤至偕赵四小姐乘轮船经新加坡返国。嗣后，两人一直随夫在军旅中奔波。五月二十六日，在随夫赴赣考察时，于凤至在南昌拜访了蒋夫人宋美龄。

上任之初，张学良认为，既然身为"剿匪"副司令，就要研究研究共产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伙"匪徒"，于是责成总部机要组组长黎天才，派人搜集有关共产党革命的理论、历史、人物、事件、词语等材料，并仿照《辞海》按笔划的多少，分部分类编辑成书，定名为《匪情辞通》，印发到各部队，作为了解、分析红军情况的工具书。

驻节武昌时，张学良脚踏实地，勤于军政，较之从前判若两人，众口皆碑。

一九三四年六月五日，张学良偕安徽省主席刘镇华去大别山防区视察。路过鄂东麻城时，地方父老列队欢迎，张、刘的车子缓缓驶过，并没有停下来。等车队过后，人家才知道前面那位身穿士兵服装、戴着墨镜、驾驶第一辆汽车的司机就是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一方面喜驾车，另一方面，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安全措施。

过了麻城，进入山区，此地已靠近中共的苏区。当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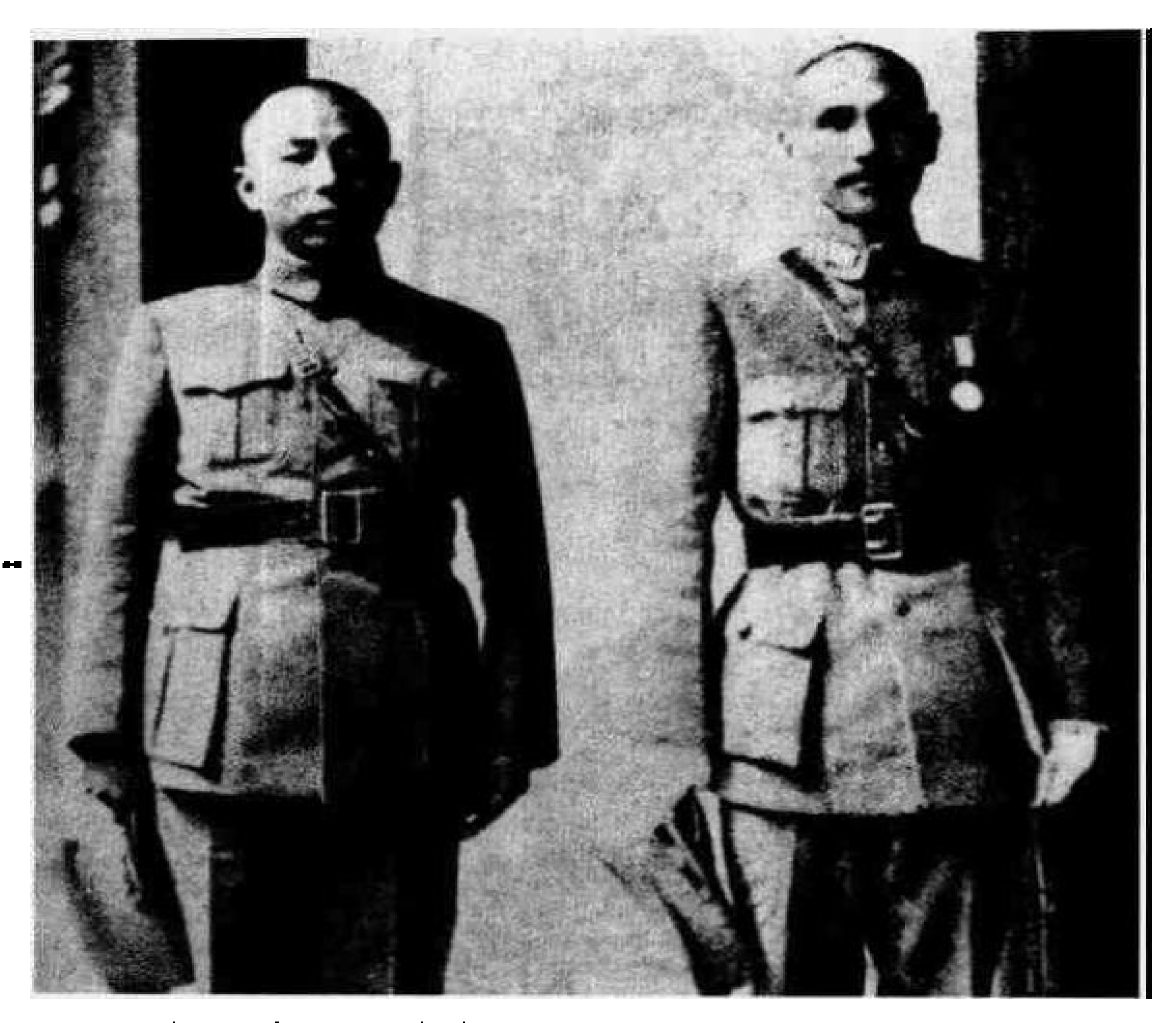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武昌对期的张学良。

行人在张学良的部队防地金家寨住宿。吃过晚饭，正闲聊时，秘书呈送捉住惯匪“张学良”批件一份，请副司令批示。

事出巧合，名姓皆同，在场的人都感到太奇巧了。一时，众人皆在猜测，静观张学良将如何处置。只见他拿起笔，在“张学良”的“良”字边加上一个“犬”字旁，变成了“张学狼”，然后红笔勾示，依例枪决。

这个惯匪“张学良”，是福建沿海一带人，后流窜到内地，在安徽六安和湖北麻城之间行抢十多年。他的力量先由官军已消灭得差不多了，刚好在张学良抵达此地的这一天，他在附近村庄落网，也是活该命绝。

六月十七日，张学良在黄安视察了一一一师及四十四师，并在防地对两师特务营训话；十九日，在潢川视察六十七军军



一九三四年六月，张学良（左）与蒋介石（右）在南昌合影。

部、直属特务营及一〇七师的驻地防务；六月二十日，赴商城，并对驻军防地视察，次日，他主持了潢川会议，布署了“剿匪”事宜；六月二十二日，继续检阅豫南驻军，指示“剿匪”方略；六月二十三日，冒雨抵唐家汇，视察一一七师防务，并对该师官兵训话；六月二十四日，在茶棚、丁家埠视察四十七师驻地防务；六月二十五日，赴安徽立煌县视察六十四军防务及了解“剿匪”情况。

“我们为什么要‘剿匪’呢？因为‘赤匪’是中国最大的

破坏者。"张学良在潢川向六十七军官兵训话说，"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我们且不管'赤匪'宣传的主义如何好，理想如何高，这是第二个问题。目前，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我们已经受不了这种破坏了。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共匪'这样破坏中国了。无论'共匪'口头上是怎样说的，可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造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剿匪'。"

然而，"剿匪"岂是轻而易举、一蹴而就之事？

"和红军打仗没法打，"东北军何柱国军长回忆说，"我们习惯于打正规战争，红军却不是这样，他们完全以游击方式，来去无常，行动飘忽。我们各有战区，各有阵地，既不能随意调动，又无法寻找目标去主动出击，像一块肥肉一样摆在那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红军就会来咬我们一口，抢了武器给养即跑，等我们调动部队去追，连影子也没有了。红军以动制静，打了就跑，我们穷于对付，有时一个连一个营地被他们吃掉。"

在鄂东，东北军与红二十五军几番交手，连连吃亏。"剿共"内战军事上的挫折失利，以及国内的抗日呼声的日益高涨，使张学良的思想受到不断的冲击。

一次，张学良到武汉大学视察。在校门前，他刚跨下汽车，还未来得及走上台阶，忽见所有大楼的窗子同时推开，每个窗子探出两三个人头，同时高喊："不抵抗将军，快打回东北去！"喊罢，头缩进窗子，窗户又关上了。顿时，张学良脸色煞白，只好中止视察，狼狈而返。

回到公馆后，张学良思绪万千，苦闷彷徨，内心始终不平静：自己应何去何从？打内战，还是打日本，收复东北失地？这些问题走马灯似的一直在他脑际萦绕。

视察大别山时，张学良在一处泉水边的茅草中发现了一种矿苗，他拿起矿石感慨地说："你打来，我打去，让这些矿藏白白睡觉，何时才能开发利用？"

当张学良看到内战如此频仍，民生如此疾苦时，曾黯然痛心地说："我们在内战中一寸一寸地争夺土地，而在外敌侵略下，却一省一省地丧失土地。这样，必将丧失民心，结果将是政府与人民同归于尽。"

第五十四章　晋 升 上 将

1935.4

——“我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

——“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

——“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

“诸位有的是我的部下，有的是我的老朋友，有的是我的新朋友，有的是我的学生。无论是旧的关系或新的关系，我都愿以国民的资格，和诸位说几句良心话。”

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东北军赴庐山军官团成员聚合在汉口银行公会，聆听张学良训话。

“国家必须统一，才能抵御外侮。”张学良深有感触地说，“我生长在东北，在座的也有不少东北人。在多少年前，我们所亲眼见到的和亲身感受到的帝国主义的压迫与侵略，使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如何才能更好地凝结反抗的力量，深知道那必须要每一个人都能具有国家思想，见仁见智，纵有不同，而欲解除帝国主义之束缚，则非把国家力量集中不可，这确已成为人所共喻的前提。老实说，就是用国家整个的力量去一致对外，是否能解除帝国主义的束缚，都不能具有绝对的把握。如以支离破碎之局，谋其御侮，谈何容易？拥护国家统一，可以说是我生平一贯的主张，过去已有事实证明，今后我更要在这一方面尽最大努力。”

张学良继续说：“我已决心来改善东北军，诸位在东北军任政训工作将及一年，对于东北军必已具有相当认识，军队的弱点，诚然不少，这也勿庸隐讳。东北军一般的知识、精神、军容、器械也未必后人，惟其一般的行为趋于散漫，染有嗜好，确已造成过去的严重错误。然而，这个责任应当由我来负百分之九十五，因为多由于我个人过去的不检点，过于溺爱了他们，而致领导错误。虽不能说我个人的一切言行足以支配整个东北军，但至少是可以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在今天，我已经觉悟了过去的错误，决心走向新的途径，一面要切切实实地管好我自己，一面要领导我的部下重新做人，要做到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我常想：我们不也是圆头方趾吗？我们能永久忍辱含垢吗？我深信果能痛下最大决心，拼命领导我的部下，总可以使得他们彻底改变，相信终会健全起来。同时，我更信迟早必有雪耻的那一天！”

会后，设宴款待受训军官。张学良身穿米黄色军装，精神抖擞，走进宴会大厅。全体军官起立，向少帅致敬，张学良挥手让大家坐下。

这时，只见宴会桌上摆满了整瓶的酒，但酒瓶盖都未打开，全然不似酒宴惯例那样按宾主席位依次斟满、准备干杯的迹象。

突然，张学良从自己的位子上站起来，态度严肃，声音低沉，即席演讲道："九一八事变以来，国人称我是'不抵抗将军'，我蒙受了如此不白的耻辱。我为什么不抵抗，苦衷难言。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占领了沈阳。我随后接到加急电令，电文内容是：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当时，我立即召开了高级将领会议，共商对策。从政治和战略上分析，敌强我弱，假如违令抵抗，孤军作战，后继无援，其结果不仅有可能全军玉碎，还恐怕给东北同胞带来战祸，造成极大的苦难。为了避免无谓的牺牲，保存实力，所以汉卿我忍辱负重，暂率东北军退出东北，卧薪尝胆，同仇敌忾，整军经武，提高部队素质，希望有朝一日打回老家去，消灭日本侵略者。你们到庐山受训，路经汉口，我设宴款待，略尽东道主之谊。席上虽备有名酒，但你们不能喝，我们今天要效仿古人岳飞'痛饮黄龙'的壮举。我将此酒赠送你们每人两瓶，请带回妥为保存，等待时机，我誓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收复失地，那时用此酒与诸位痛饮于鸭绿江边，以洗雪强加于我头上的'不抵抗将军'的耻辱，以谢国人！"

张学良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在座的军官大部来自东北，张学良发自肺腑的演说深深地打动了他们的心灵，满座群情激奋，个个泪流满面，誓言披甲执戈，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杀敌报国。

此时，蒋介石已取得了对江西中央苏区"围剿"的基本胜利。十月上旬，他偕宋美龄、杨永泰、晏道刚等去华北、西北视察。他在北平接见了东北方面的莫德惠、王树常、马占山、苏炳文、米春霖；在察哈尔接见了宋哲元；在归绥接见了傅作

义、德王、云王、沙王；在太原与阎锡山密谈多次；在西安接见了杨虎城、马鸿逵等人。蒋介石对他们说：“我不是不抗日，是共产党拉住了后腿，非消灭红军不可。”他竭力争取各地方实力派同情他反共，缓和对他不抗日的攻击。

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央红军突破重重包围，开始长征，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宣告流产。蒋介石哀叹道：“六载含辛茹苦，未竟全功。”于是，他亲人黔、滇、川，组织追击红军，并乘机吞并川、黔等地方军阀势力，从而拉开了对长征红军围追堵截的战幕。

张学良的部属幕僚多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在豫鄂皖作战的下级官兵更普遍表示：打内战而死，死得冤枉，不如打日本而死，死得光荣。

马占山，既是抗日名将，又是张氏两世“老臣”，他一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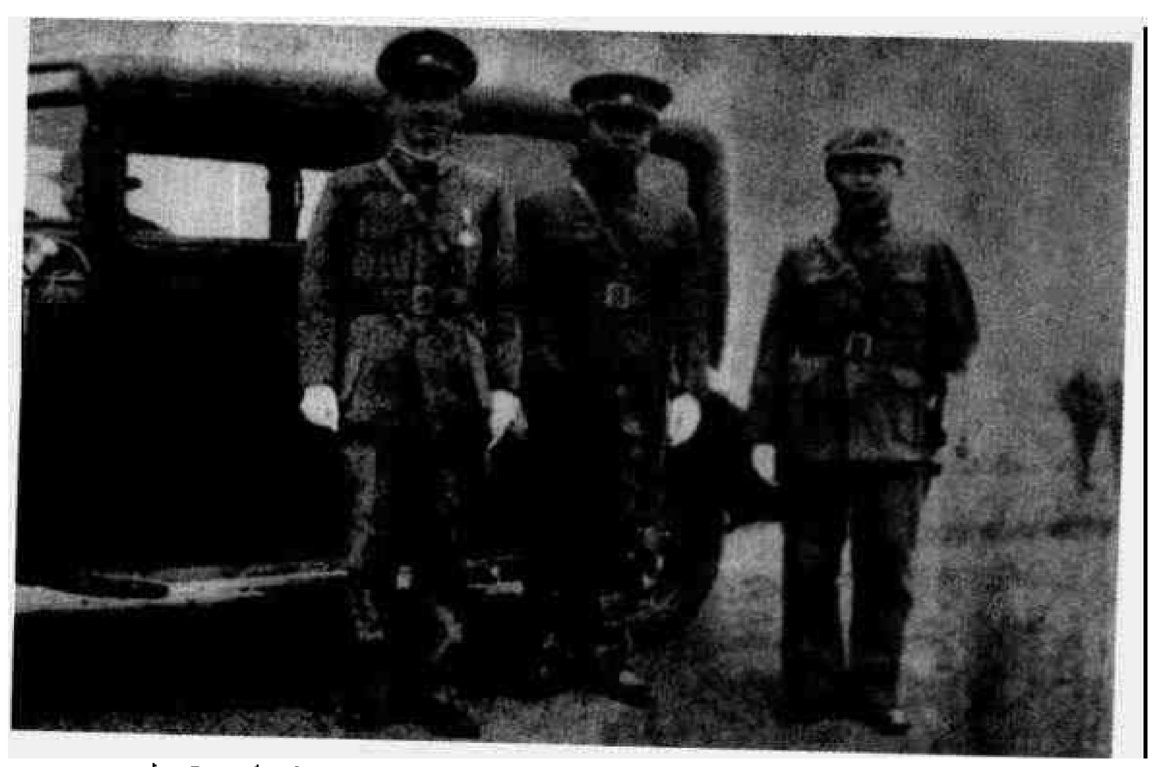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张学良陪蒋介石游茂陵，在茂陵前合影。右起杨虎城、蒋介石、宋美龄，右五为张学良。

敢对张学良直言。在武昌时，马占山批评张学良犯了三大错误：即一九二八年不该易帜；九一八事变不该听从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替蒋背上卖国的骂名；回国后不该宣传法西斯能救中国，不该拥蒋并参加剿共。马占山说："剿共是卖命换饭吃，共产党打不完，东北军就已先消耗光了，拥蒋打共产党是死路一条。"

面对这一现实，张学良的思想开始有所转变。

游欧时，张学良发现西欧各国都有共产党，深切感到共产主义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回国后，虽然他主张拥护蒋介石用法西斯方式武力统一中国，追随蒋"剿共"，可自己又陷入想抗日而不能抗、不想打内战而又不能不打的惶遽状态。为谋求出路，他开始了解和研究共产主义。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一日，蒋介石（左）飞至武汉与前来迎接的张学良（中）、何应钦（右）合影。

在汉口的时候，张学良经常与满铁调查部的职员熊谷康往来。熊谷康回忆说，这时，他看到的张学良是一个“正在勤奋攻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谈吐优雅、因打网球而晒黑了皮肤的贵公子”。

张学良攻读《资本论》，是为了探索真理，准备和共产党打交道。

当时，武昌“剿匪”总部设在望山门原两湖总督衙门，张学良住在武胜门外徐家棚粤汉铁路宿舍。张学良利用这段往返时间，特邀参谋、秘书数人，每日随车研讨与军事、政治、经济有关的问题，午间仅在办公室吃三明治、饮红茶，聊充午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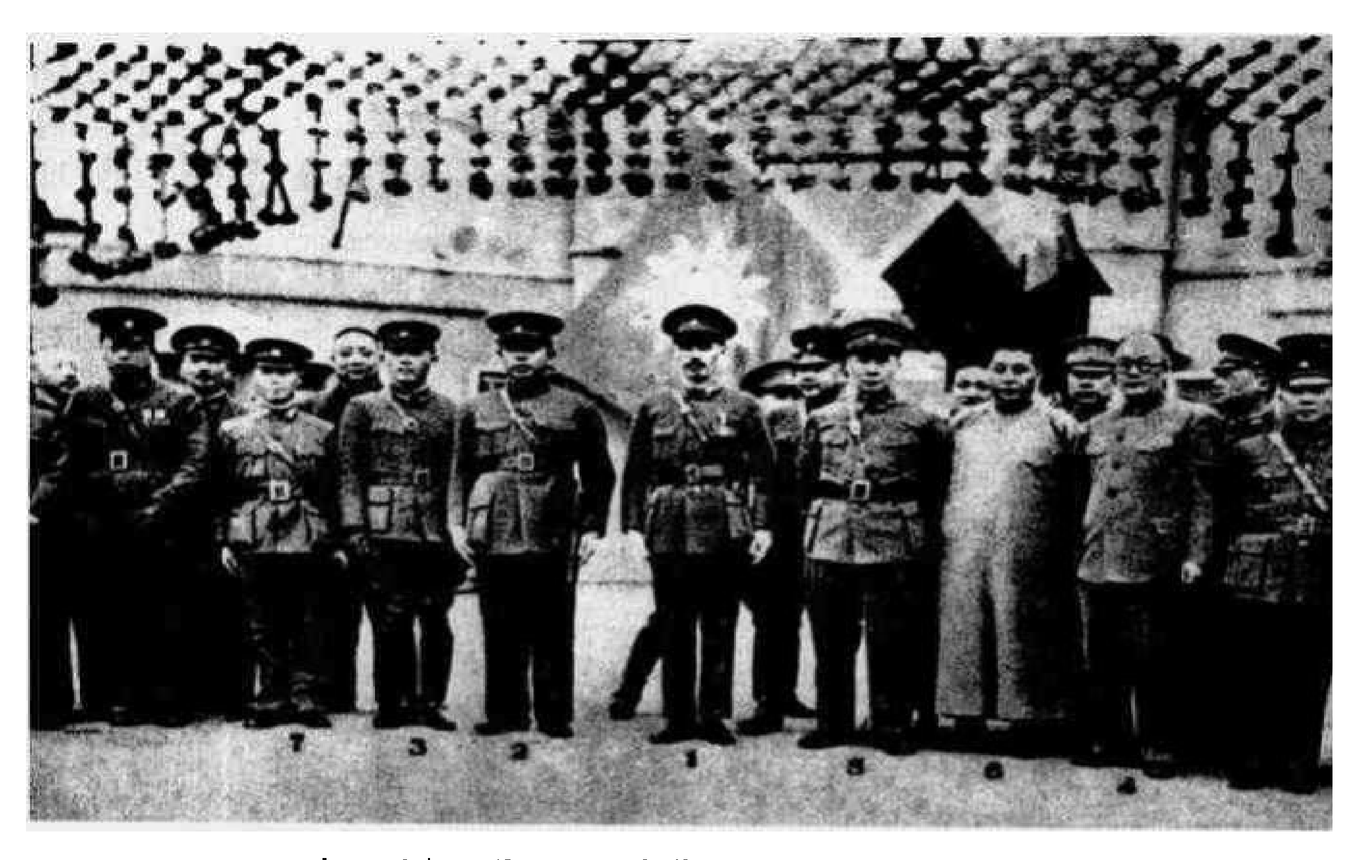
有一天，张学良问他的秘书张慎修：“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

张慎修闻言不禁大吃一惊：“我没有研究过，副司令意见如何？”

张学良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的主力击溃，共产主义也是不可能被消灭的，因为这是全世界的问题，哪个国家没有共产党呢？这个问题到最后还须用政治方法求得解决。”

此时，王以哲将军的侄儿王育才，因被指控有共产党嫌疑而被捕。张学良把他找到家里进行谈话，了解一些有关共产党的政策问题。过了两个月，他便把王育才释放了。张学良自己也承认：“在鄂时，王以哲之侄，因共匪嫌疑被捕。良深加询问，准其自首，但彼之态度和言词殊动良之心。因之，时动同情之感。”

一九三五年一月，红军长征北上。有鉴于此，二月二十八日，蒋介石撤消了“鄂豫皖剿共司令部”，于三月一日在武昌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改任张学良为行营主任，钱大钧为参谋长，杨永泰为秘书长。行营下设十一处，



一九三五年三月一日，张学良就任武昌行营主任后合影。四月，张学良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图中1. 蒋介石，2. 张学良，3. 钱大钧，4. 杨永泰，5. 何成濬，6. 张群，7. 陈诚）

除运输处等几位处长为中将外，其他各处长均为少将，行营主任定为上将军衔。

三月二十七日上午八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举行第四百五十次会议，决议通过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何应钦、李宗仁、朱培德、唐生智、陈济棠为一级陆军上将；会议并通过决议追任"特派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主任"。

虽然高官厚禄在身，但张学良"身在曹营心在汉"，他官拜一级上将，身任"剿匪司令"，心想"抗日还乡"。对东北家

乡的沦丧，他悲愤异常，每每思之，有时竟痛哭流涕。

当时，武汉有不少流亡的东北同乡，张学良时常鼓励他们从事抗日活动，表示将来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东北同乡会开会时，他要求赴会者在入场时，都要先喝一杯黄连苦水，散会后再喝一杯，要大家卧薪尝胆，誓灭日寇，光复故乡。

有一天，张学良因有事，没能出席同乡会，周达夫受他委托主持会议。在会上，周达夫激动地说："张副司令今天没来，若来，他要喝十杯苦水，因为他集国恨家仇于一身，其苦比谁都大。"

张学良则在另外的场合直言不讳地说："以前同胞们谴责我对日不抵抗，现在我希望蒋公变更我的任务，不要让我再去打共产党，而让我去打日本人吧！因为我觉得，在剿共中战死，不如为抗日而死更有价值。"

但这时的张学良，仍然在"剿共"与"抗日"之间彷徨苦闷，摇摆不定，他无法摆脱蒋介石的控制。在军事上，他仍然必须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指令，调集南下的东北军、中央军和杂牌军对鄂豫皖边区的红军实行"围剿"，自己也常去前线视察督战。

这一时期，张学良拥蒋武力统一中国，不仅参加了剿共军事，而且极力谋求在政治上、组织上与蒋介石进一步合作。

张学良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期间，决心以"东复会"核心同黄埔系骨干来组成一个统一的组织，这是张学良向蒋介石合股入伙思想的继续。张学良认为，二十多万东北军是他拥蒋的一个大股份，如果在干部方面融合双方核心力量，壮大拥蒋力量，这又是一大股份。张学良选择黄埔系，是因为它是蒋介石的嫡系，东北军与黄埔系都是军人，连成一气，共谋救国，一旦成功，双方均有好处。同时，他认为蒋介石是全国领袖，而他自己则是最大的以实力拥蒋的人物，是在蒋介石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由此可以左右政局，实现抗日的愿望。

为此，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一日，张学良电邀王卓然、王化一由北平来武汉，然后再去南昌，向蒋介石说明情况并提出成立新团体的事。十八日，二王抵汉口，二十八日由戴笠陪同去南昌，四月一日谒蒋。

商讨结果，蒋介石同意成立新组织，指定刘健群、邓文仪、戴笠和王卓然、王化一商量具体办法。五人将其定名“四维学会”，为一秘密组织。“四维”的说法，源自管子所说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五月三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去汉口，同张学良作了长谈。张学良对他们说：“此次是请你们来开四维学会成立会的。咱们东北人的主要目的是打回老家去。我们自己的力量不够，必须与握有军事实力的黄埔系相结合。同时，国家的统一，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这是我这次出国吸取德、意两国经验的结果。目前，只有蒋先生有资格作领袖，咱们须拥护他。蒋先生已批准四维学会以复兴民族为己任，咱们应该诚心地同他合作，继续东北的工作，以实现抗日的大目标。”

五月十二日，四维学会在汉口银行公会举行成立大会，选出理事共十五人。蒋介石方面的人有：贺衷寒、刘健群、戴笠、邓文仪、邱开基、丁炳权、袁守谦；张学良方面的人有：王卓然、王化一、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吴瀚涛、黎天才、关吉玉；另有候补理事五人。嗣又根据蒋介石的指示，选出王卓然为理事长，刘健群为副理事长，王化一、黎天才、邱开基为常务理事。蒋介石为名誉会长，张学良为会长。

至此，表面上以“拥护惟一领袖”、“团结一致救国”相号召，而实际上貌合神离、各怀用心的怪胎“四维学会”，就这

样呱呱坠地了。

在此期间，为了和蒋介石合作，张学良还让东北军校以上军官集体加入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分期分批地到庐山军官团受训，并在师以上的部队中设立政训处，由复兴社派人担任。张学良采取这些措施，目的都是为了加强与中央军、黄埔系的团结。

张学良自一九三五年四月二日正式晋升为一级陆军上将后，其军衔一直保留至赴台。被解赴台湾时，张学良鉴于复出无望，遂办理了上将退役手续，领到了一笔钱，但这笔钱却被保密局扣了下来。待到发给他时，因时局不稳，市值大跌，已不值多少钱了，只买得起商务图书馆出版的全套书。后来，由于他的视力越来越差，阅读起来十分吃力，于是，他将这套书捐赠了出去。

第五十五章　潘文郁案

1935.5

——“老潘现在是我的老师。”

——“对你和老潘的关系，我着实也有些怀疑，但你不要怕，我不会出卖你。”

——“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

杀朋友是最不应该的，也是最难过的。

谈到潘文郁案，张学良曾伤心地说道。

发生在张学良身边的潘文郁案，当时轰动武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此案彰显了张学良对共产党所持有的同情心，也反映了他身为“剿匪”副总司令，面对蒋介石大开杀戒的指令，对朋友却爱莫能助、无可奈何的心境。

潘文郁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

潘文郁是湖南人，名东周，号文郁、问友，笔名冬舟。早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留苏，曾负责中共北平市委的宣传工作。一九二八年被捕自首，一度消沉。有人说他曾是中共地下湖北省委委员，曾给李立三当过秘书，而黎天才透露说，潘文郁是脱党分子，后被他引荐到机要组。

在武昌“剿总”里，没人能搞清楚他真正的身份，他是一个谜一样的人。

要了解潘文郁，需先交代黎天才这个人物。

黎天才原名李经天，号伯海、渤海，山东蓬莱人，一九〇〇年生。一九二三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继刘伯庄之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一九二七年被捕后叛党。

黎天才是张作霖在北京当大元帅时搜查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李大钊等人时一起被捕的。当时他还是北大的学生。京师警察总监陈兴亚在审讯时，觉得这个小山东年轻俊秀，学问也不错，就动了爱才之念，把他从死里救出来，改名为天才。黎很感激陈氏救命之恩，而陈氏也非常赏识黎的才干。

一九二八年奉军退回关外，张学良委陈兴亚为东北宪兵司令，黎天才也因此做了宪兵司令部的机要秘书。

东北易帜后，张学良邀黎天才在东北筹办国民党组织。自此，他先后任张学良的私人秘书、东北讲武堂教官等职。后因帮张学良主持东北情报工作，日益受到张学良的重用。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北方局派吴成方前往说服黎天才为革命做些工作，以赎前愆。黎天才同意了，先是提供了中共被捕人员的全部情况，后又按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思想，写了《帝国主义炮火下之中国国防问题》一书，成为发行万册以上的畅销书。黎天才又接受吴成方的委托，把与之相交甚厚的中共秘密党员潘文郁推荐给张学良做秘书，从事争取张学良的工作。

张学良下野出国前，曾交代黎天才说，东北的情报工作仍

要继续，且要注意内部的团结，同时告诉他说："蒋介石也许会来找你。"

原来，黎天才奉张学良之命建立了东北情报网，很有成效，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

张学良出国不久，蒋介石企图把黎天才拉过去，为己所用。于是，在保定专车上召见了黎天才，询问东北的情况，并嘱咐黎天才说："张副司令出国，你还要照常服务，有困难可以找何部长（应钦）与戴参谋（笠）。"

蒋介石当即写了一封充满夸奖的信，把黎天才介绍给何应钦。但黎天才不为所诱，把这封信搁置起来，仍继续办张学良交代的工作。

张学良返国在武昌上任后，东北军纷纷南调，准备与红军对垒，张学良遂电令黎天才来武昌见面。结果，两人谈得很投机，张学良旋即任命黎天才为机要组的上校组长，后晋级少将。

机要组里分三个科。第一科搜集研究国内外时事和有关共产党的问题，由黎天才亲自掌握。第二科负责东北军内部的调查研究，科长为陈昶新。第三科名义上属机要组，实际上不归黎管，科长邓文仪不在武汉，由一个姓王的秘书代行，直属南昌行营。

在机要组里，黎天才安插了许多有政治背景的人。这些人，有的出身于莫斯科中山大学，见过世面；有的以前是共产党员，后脱党改行，另有他就，潘文郁即其中具代表性的一位。

自一九三四年起，张学良在潘文郁、黎天才的帮助下，开始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如《资本论》、《辩证唯物主义》、布哈林的《共产主义 ABC》、列宁的《左倾幼稚病》等，并请潘、黎经常给他讲解阅读中遇到的疑难问题。潘文郁才华横溢，颇

受张学良的器重。

一次，在苏联塔斯社任记者的刘尊棋意欲拜访张学良将军，便找留苏时的朋友潘文郁，希望他从中帮忙。

落座后，张学良指着潘文郁对刘记者说："老潘现在是我的老师。"

"什么老师，您在学俄文吗？"刘记者问。

"不，不，不是俄文，是《资本论》。"张学良答道。

当时，东北军在鄂东连续遭到红二十五军打击，张学良的头脑逐渐清醒，决计要对共产党做一番探索和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潘文郁和另外几位秘书都成了张学良的顾问和助手。张学良时常和他们在一起，谈得很对路。前面提到的《匪情辞通》，就是潘秘书在一个小房间里，一支接着一支地吸烟，用铅笔在便条上起草，大约用了一个星期编写完毕的，张学良特别嘉许他在这方面的渊博知识。

一九三五年初，中共北方局特科的杨青林叛变，供出潘文郁为中共提供军事情报一事。蒋介石马上密电张学良，电文中说："据驻平宪兵三团、河北省党部、北平市党部密报称：共党河北省委破获后，发现豫鄂皖三省总部机要秘书潘文郁与匪勾结，证据确凿。潘在黎天才掩护之下进行匪谍阴谋已久，着即一并来京。"

张学良当即派员从"剿总"机要组办公室带走了正在上班的潘秘书。但被捕后，潘尚有一定自由，食宿也给予方便。

不久，南昌蒋介石方面紧跟着又发来第二道急电，把事态扩大到要逮捕机要组长黎天才和其他有关的几位要员。南昌还另电指示驻武汉的宪兵团搜查黎天才的住宅，同时，北平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也接到蒋介石的密电，搜查了北平东单西裱背胡同黎天才驻北平的一所办事处，并逮捕了黎天才派往北平的工作人员多人。

张学良顿感震惊和焦虑，“剿总”内部亦人心惶惶，不晓得事变的来由。

约过了一月时间，蒋介石又拍来电报，说江西进剿部队在苏区缴获红军的文件里，发现有豫鄂皖“剿总”参谋处印制的所属部队团以上的军官姓名、兵力、驻地表的抄写本一册，并由其他文件中查明确系潘秘书通共，辗转抄寄苏区，限令即处潘文郁死刑，并将黎天才和其他有关人员一并押解南京。至此，张学良才明确了这是一件严重的“泄漏军密通红军”案。

“剿总”参谋处印制的军队驻地表，是军事机密文件，照例发给团以上的带兵主官和“剿总”直属各厅处组。机要组也按规定领到一本，由潘文郁负责保管。这样一来，潘文郁窃取军事机密暗通苏区，证据确凿，无可置辩。

张学良在接电后，除电复蒋介石为潘秘书讲情外，并未将黎天才扣押。同时，他还婉转地向蒋介石保证，谓黎绝无涉案可能。张学良抓住潘、黎二人情况各异，而黎又无直接罪名可指控，力主仅以用人不当为由给黎予以处分，并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如黎与潘一并问罪，他也只好辞职，从而使黎得以化险为夷。

“这都是你的机要秘书潘文郁报到北平共党河北省委的，不相信，有他们的自己人，名叫杨青林，可以当面指证他。”当蒋、张会面时，蒋介石拿出潘文郁送出的军事情报，一边展示，一边向张学良说道。

“你的部下，还是交给你办吧！”蒋介石把这些文件转给了张学良，最后说道。

这样，以通共之罪，蒋介石将潘文郁交给了张学良，一则是给张学良留面子，二则也以此来测试一下张学良的立场和态度。

由于蒋介石还要用张学良和黎天才，而黎天才又无直接和

明显的罪证，黎天才便得以开脱。蒋介石还让邓文仪给黎天才送一本与蒋介石直接通报的密码，关照黎天才有事可以直接与他联系，同时又投黎天才之所好，送给黎天才十几幅字画。

张学良摸到了底牌，也开始大做文章。一天，张学良约黎天才吃晚饭。

“对你和老潘的关系，我着实也有些怀疑，但你不要怕，我不会出卖你。为了应付环境，我要公开地‘打击’你一下，取消你机要组组长的职务，把你编为直属我的少将秘书兼科长，你所辖的业务与经费照旧。”餐桌上，张学良对黎天才说。

“一切愿听命令。”黎天才回答道。

“我承认你有高度的政治修养，和社会主义者的组织才干，在我面前服务，谁也干不过你。”张学良说完大笑，黎天才也一笑置之。

在此期间，黎天才抵制了CC系要在东北军中设立特别党部的企图。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学良拟在东北方面选出五个中委，黎天才组织竞选，结果选出七人。张学良对黎天才十分倚重，黎天才与当年的郭松龄，堪称是张学良政治生涯中两个最重要的助手。

至于潘文郁，他则向张学良表示不作声辩，任凭处理。但是，张学良却把案子搁置下来了，并未立即执行。因为，他感到潘文郁是个有用的人才，杀了非常可惜，遂致电蒋介石，请其缓频，不料遭到严斥。蒋介石还责备张学良疏于防范，执法不严，指定要由参谋长钱大钧监刑。为此，张学良绕室彷徨，很觉为难，最后只好按蒋介石的意志执行。

驻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是恶名昭著的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的刽子手。此刻，蒋孝先致电张学良，询问潘案如何发落，同时又致电黎天才，说他一周内将来武汉。张学良知道潘文郁已难以幸免，如果送往南京，他还要受刑，万一熬不住

刑讯，势将牵连其他人，更不稳妥，便决定在武汉处死潘文郁。

“委员长的脾气很厉害，我不能保全你了，你还有什么身后的事要办？”刑前，张学良深感惋惜地问潘秘书。

“我把我妻子的住处写下，希望能通知她。”潘文郁从容地说道，“我为革命，死而无怨。但念儿女幼小，妻子年轻，愿她另择佳偶，把孩子培养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别无牵挂。”

张学良问他还有什么临终遗言，潘文郁听了之后，镇定从容，奋笔疾书，挥挥洒洒写了三万多字的自述，说明他脱党后的精神痛苦，及再次取得与中共党组织联系的经过。其中，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以及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等，都作了详尽的叙述，对累及黎天才则深表遗憾。最后，他要求将其妻儿送回原籍谋生。

张学良看了这份自述，对潘文郁的经历和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感叹不已。

潘文郁从容就义后五天，蒋孝先到了武汉，暗中作了察访，证实潘文郁确实已被处死。蒋介石获悉后，对张学良总算放心了。

但张学良对此事件深感惋惜和不安。他按潘文郁的遗愿送潘的妻子、两岁的儿子和一个女儿回湖南，赠川资五千元。当时，潘妻也是中共党员。潘案发生后，吴成方也被捕了，中共北方局特科与张学良联系的线，就此中断。

蒋介石一直怀疑黎天才是个共产党员，很不可靠，也曾一再示意张学良赶走他。但由于张学良和黎天才相处得很融洽，张学良执意挽留了他。后来，张学良到西安走马上任，黎天才又当上了西北政训处的副处长，这是部队里负责政治的高级首长。

潘案之后不久，九月，红军朱德、毛泽东、徐向前部已由

川北进入甘肃、青海边境，国民党“剿共”中心已由四川移往陕西。蒋介石遂呈准国民政府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统率指挥陕、甘、宁、青、新五省各军围剿红军。

十月二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晏道刚为参谋长，蒋介石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代行总司令职务，总部设在西安。武昌行营则定于十二日关闭。

蒋介石还下令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

在正式接令之前，张学良考虑到陕西这块地方多年来就是杨虎城的根据地，历史上几次客军入陕都引起地方人士的疑惧和误会，甚至兵戎相见，他这次率十三万东北军到西北来，容易被人看成是反客为主，抢地盘来了，因此，为了消除误解，立稳脚跟，实现抗日救国的主张，他选派杨毓珣先行入陕联络杨虎城。

张学良的挚友杨毓珣，是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由陆军大学毕业后，到巴黎游历了一段时间，混了个留法陆军学生的头衔。当年他到东北的时候，恰逢东三省陆军整理处缺人，张作霖便要杨毓珣来，还说：“叫袁总统的姑爷、那个姓杨的来，他的名字底下那字很特别，像个‘苟’字。”张老帅错把珣字当做苟字，一时传为笑谈。

杨毓珣在奉天官运亨通，当上了镇威军上将军公署副官处长，官拜少将。“杨驸马”和“张少帅”情投意合，引为知己，来往密切。

现在，张学良要调到西北，他知道杨毓珣与杨虎城是老关系，又是同姓，彼此称同宗兄弟，关系不一般，便邀他为“通融特使”，前往西安。

杨毓珣到西安活动了一阵子，即将张、杨两方关系撮合得极其融洽。关系打通后，张学良便率总部人员由鄂入陕。



一九三五年，武昌行营主任张学良自驾飞机，从开封抵西安。张学良（左二）在杨虎城（左一）、邵力子（左三）陪同下步出机场。

一九三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张学良乘专机飞往西安，总部办公厅副主任洪钫、少校科员应德田、赵四小姐、两个副官和两个参谋随机。飞机是张学良自用的波音飞机，驾驶员是美国人巴尔。西安绥靖主任杨虎城和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到机场迎接。

张学良到西安后，杨虎城对张学良很恭敬，也很亲切，每天早晨必定前来探视，这说明张学良事前的工作很有成效。

张学良在新城大楼住了半月，就自己买了一所房子，搬到西安市东门里金家巷公馆里。这个公馆有三座楼，分别称为东楼、中楼和西楼。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住西楼，二层楼是办公室和客厅，三层楼是寝室和书房；中楼住侍卫副官们；东楼住着总部人员，大部分是管函电的。

张学良公馆的外围由手枪营站岗，里边是卫士站岗。公馆共有六十名卫士，都是尉官；有八名副官，都是校级军官；副官之上是副官长谭海少将。

此后，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学良以西安古城为政治大舞台，在这里导演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

第五十六章　西 北 剿 共

1935.9

——“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

——“我张某人混得不值二十万块钱了。”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我们的老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残酷狡诈的敌人正阴谋向关内逐步蚕食，国家处在危急之中，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应举国同仇，抵御倭贼。”

“共产党在后方捣乱，危害国家，使我们不能集中优势力量对敌作战，有负众望，只有首先剿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除了先剿共而后攘外之外，抗日又有其他什么好办法呢?”

"为了抗日，为了集中力量抗日，为了免除抗日战争进行中的后顾之忧，为了保证能够取得这一战争的最后胜利，希望我全体官兵，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到那时候，我们该多么愉快、多么光荣啊！"

进驻西安之初，张学良向部队训话时常常这样讲。

那时，张学良虽然心里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满，但在实际运作上，他还是继续执行蒋的剿共政策。每当陆续西开的东北军路过西安时，张学良都去训话，鼓舞士气，一是强调剿共，二是力主抗日。

当时，张学良的这些讲话引起东北军中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及高崇民、黎天才为代表的少壮派的不满。

"联共抗日的问题迫在眉睫，不容迟疑，应该从速解决。"

"无论是从是非上讲，还是从利害上讲，联共抗日才是惟一的出路"。

"我们应当保持实力，勿做有害无益的牺牲。"

东北军中的少壮派重感情、讲义气，对张学良竭尽忠诚，但决不盲从。此时，他们认为张学良无视震天撼地的民众联共抗日救国的呼声，遂不断向张学良陈诉，屡进谏言。

当张学良率军进驻西安之际，日本正加紧侵占华北。而蒋介石对日本则一味屈辱退让。如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九日，日华北驻军提出撤消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将北平市长袁良免职，蒋介石照办；二十九日，日军指使汉奸在北平和天津游行，制造骚乱，迫使宋哲元自治，蒋介石不但不表示抗议，竟于三十日忙着拟定"华北自治方案"；接着，何应钦又应日方要求，设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这一半傀儡式的政权。

一句话，蒋介石对日本是节节退让，日本人欲壑难填，紧接着是平津危机，华北危机，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一九三五年六月三日，张学良飞成都见蒋介石。张、蒋商谈后返武汉。此为蒋介石（左）送张学良（右）上机前留影。

然而，就在这国难当头之际，张学良却奉命指挥东北军及西北各地方军阀部队进犯陕甘地区的红军。

最初，张学良有些盲目乐观。他原认为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二十六军不过数千人，没什么战斗力；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战斗力虽强，但长途跋涉到达陕北，已是疲惫之师。十几万的东北军围剿这支只有七八千人的红军，必定不费吹灰之力。另一方面，他还指望以剿共成功来取悦于蒋介石。

一九三五年九月底，踌躇满志的张学良兵分两路：一路是王以哲的六十七军一一〇师、一二九师、一〇七师、一一七师，由关中北上，进占洛川、富县、甘泉，并向延安方向进

攻；一路是董英斌五十七军的一〇六师、一〇八师、一一一师、一〇九师、一二〇师，共五个步兵师和何柱国骑兵军的一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一带向陕北进犯。

东北军深入陕北后，红军经过三天的急行军，绕过延安，来到甘南以北十五里的劳山附近。然后，红军用少数部队围住了甘泉之敌，以"围点打援"的战术，在劳山埋伏。

正在延安寻欢作乐的一一〇师长何立中和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闻甘泉被围，急电王以哲。王以哲即刻命令何立中率部解甘泉之围。

十月一日晨，何师仓促冒进，在行至九里山和劳山之间



一九三五年九月十三日，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前与西北要人合影。左前为邵力子、王曾涵、张学良、杨虎城、刘竹君。

时，遭到红军伏击。经过六个小时激战，除该师一个团留在三十里堡，另五个连被围于甘泉之外，伤亡一千二百余人，二千三百余人被俘，团长以上无一人生还。何师长颈部中弹，七日后身亡。

劳山战役后，红军乘胜进攻，在咸（阳）、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要塞榆林桥，又歼灭六十七军一〇七师六一九团的四个营。该团是东北军主力之一，团长高福源曾任张学良卫队营营长，极得张学良的信任。激战中，高福源拼命顽抗，但终于被俘。

被俘后，高福源混杂在俘虏群中企图蒙混过关。徐海东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指着一个穿着漂亮的俘虏，对军部手枪队说："把他带走，他就是高福源。"

那个俘虏连忙哀求说："我不是，我不是，我是理发工人。"并用嘴往旁边一呶，原来高福源就在他身边。

高福源终于被辨查出来。就是这位高团长，后来在争取张学良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

十月十九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中央红军抵达陕北西部前沿的吴起镇。这时，东北军何柱国骑兵军的四个团尾追而来。毛泽东当机立断，便决定在吴起镇切掉这个追击红军的尾巴，以巩固陕甘根据地。结果，次日，当骑六师师长白凤翔指挥四个骑兵团约二千余人尾追到吴起镇附近的头道川和二道川之间时，立即遭到红军伏兵的猛烈射击。

"红军居高临下，弹雨如注，骑兵受到伏击，到处乱窜，骑三师、骑六师两个师损失惨重，山炮、迫击炮等重型武器都丢光了。"军长何柱国回忆说。

激战两小时，红军歼灭东北军一个团，击溃三个团，俘虏六七百人，缴获一千多匹战马和大量枪支弹药。为此，毛泽东曾作诗曰："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红军劳山战役、榆林桥战役和吴起镇战役的连续胜利，给张学良和东北军以沉重的打击，这在东北军战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张学良本以为在短期内就能把刘志丹的红军肃清，可万万没想到，中央红军迅速北上，接连给他以重大打击。自此，他对剿共前景丧失了信心。

一九三五年十月下旬，张学良怀着不安和苦恼的情绪离开西安去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五全大会”。临行前，他惟恐东北军再受损失，特意指示王以哲和董英斌停止向陕、甘的红军根据地进攻。可是，六十七军的一个团被围于甘泉，军长王以哲向总部叫苦连天。参谋长晏道刚和参谋处长徐方没有通过张学良，竟下令五十七军“全部东进，解甘泉之围”。

军长董英斌接到命令后，在太白镇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要解决是走南道还是走北路的问题。南道是由太白镇向南转东经过七畛子，直向洛川前进，要走二百余华里。走北路，路窄而险，又要通过黑水寺、直罗镇、张村驿等苏区，虽然路近，但易被红军截击。

与会者一致主张走南道。惟有一〇九师师长牛元峰独持异议，他振臂而言：“我主张走北路，我们晚走早住，怕什么？那样胆小，还打什么仗！我一个师都不怕，这四五个师又有什么关系？”

殊不知，毛泽东亲自发起并指挥了直罗镇战役，提出这一仗“要的是歼灭战”。

十一月二十日拂晓六时，一〇九师开始前进，沿途有连续不断的零星战斗。大约在正午以前，六二六、六二七两团先后进入直罗镇两侧高地和直罗镇齐头地点。牛元峰向总部和军部报捷，说他已占领了直罗镇，并带着一些幕僚兴高采烈地徒步走了几里，后又骑马进入直罗镇内。

初战告捷，牛师长牛气十足，根本没把红军放在眼里，所以他没有指示各团就地构筑工事。那时，镇内到处贴着花红纸的标语，写着"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你们的敌人是日本鬼子"、"我们帮你们打回老家去"等内容。标语是新贴的，浆糊还没干。镇内看不见一个红军，连老百姓也走得干干净净。全师官兵连走带打快一整天了，即疲倦又饥饿，于是大家分头到各处搜索，有的找到一些米面，有的找到一些鸡、鸭、小猪等牲畜。官兵们马上高兴起来，这回可以解解馋了。他们吃得心满意足，而后开始蒙头大睡。

十一月二十一日晨四五点钟，直罗镇南北山上，突然步枪、机关枪声大作。师部人员从梦中惊醒，推断红军由两侧攻上来了，双方立即展开激战，火力甚猛。牛元峰向军部要电话，然而线路已断。

两团的战斗情况，据溃兵事后讲，战斗一开始，红军就从后面包抄上来，抵抗者死于枪弹之下的甚多，集体缴枪的也不少。六二六团团长石世安认为大势已去，自戕而死。六二七团团长郑维藩受伤过重身亡。

天亮后，牛元峰率领师部幕僚、马匹向直罗镇北边撤退。刚刚走到半山腰，即被红军由山头和山下两面卡住，师部大部人员和马匹为红军俘获。此时，牛元峰等简直像是一群没头的苍蝇，到处乱窜，最后退到镇子南面一个小高地的土围子里落脚。牛部未被俘的残兵败将，这时也都陆续退到土围子上，总算得以暂时的喘息。

约摸到了下午二三点钟，忽然听到西面枪声大响，又看到一架飞机在土围子上空盘旋，牛元峰马上摆联络符号和摇晃手巾，可是飞机根本无法瞧见这小土围子。牛元峰见状，便对参谋长刘德裕、参谋处长沈叔明说："看情形是军部派来了解围的部队，我们应该作好突围的准备，然后一鼓作气冲出去同解

围部队汇合。”但是，当时马匹损失罄尽，徒步又不能走，牛师残部翘首西望，徒唤奈何而已。

又过了两个钟头，枪声停止，推测解围的部队已经走远，牛元峰恨恨地说：“这一定是王肇治的阴谋，他记过去的仇恨，想置我们这些人于死地。”说完，闭目不语。

天色渐黑，两面山上和西南面的枪声完全停止，许多残兵都聚集在土围子里。从凌晨逃到天黑，他们一天没有进食，官兵们随身所带的给养早已吃光，便不顾死活，偷偷爬下土围子找死马肉，用火烤熟充饥。刘德裕先到各处观察，然后集合残兵，请牛元峰讲话，作突围的动员。

“今天我们到了最后关头，只有大家一心，勇敢突围，除了死里求生，没有别的办法。”牛元峰垂头丧气地讲道。

盼援兵是没有希望了，残兵又不能在土围子里饿死，牛元峰决定夜间率五百余人突围。这时，忽然有个士兵要进土围子，说他是六二六团一个被红军俘去的士兵，送来红军一封信。经盘查属实后，这士兵进来，将信交给牛元峰。牛元峰此时心情颓丧已极，哪有心绪看信，刘德裕只好拆开来念给他听。

信的内容大意是：“葫芦河边，老人山上，望远镜中，看到你的官兵均已厌弃内战，纷纷投降。我们北上抗日，是帮助你们打回老家去，你们东北军没有什么理由到西北打内战。现在你师大部被歼，最好你投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抗日。这是光明的道路，否则玉石俱焚，悔之晚矣！”牛元峰听后，默默无语，左右也没有人敢作什么决定。

“我们先写封回信，说可以稍加考虑，然后再作决定吧。”中校团副孟广云建议说。

“好，你就写吧。”牛元峰点头同意。

孟广云把信写好仍交给来人带回去。信送走后，牛元峰和

所有的人心情更加紧张。这时已近午夜，红军从四面八方对土围子严密监视，并配备了一批神枪手，枪口对准土围子，只要土围子里的官兵在围墙边一露头，马上开枪，一枪一个，百发百中。由下午到夜晚，这样被打死的已有好几人。最后，万般无奈中，牛师长决定半夜十二时开始突围。

午夜，六二七团刚一开始突围，即遭到红军的集中射击，马上混乱起来。李洁堂胆子小，指挥能力不行，压不住阵角。马镇夷见此情况，便对牛元峰说："李团副指挥不灵，恐贻误突围时机。"牛元峰听完，叫副官去把李洁堂找来，又叫另一个随从副官把手枪准备好。

李洁堂走进窑洞，面见牛元峰。牛元峰拉着他的手说："走，到外边有话讲。"刚走出窑门，牛元峰就叫副官动手，副官连发三枪，李洁堂登时毙命，接着把李的尸体扔到土围子下面。这事发生之前，牛元峰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看情形他已失去常态。李洁堂之死，引起许多人的疑惧，谁也不敢再跟着牛元峰走了。

六二七团在冲出土围子后，各逃性命，已无法集结了，这样又耽误了一两个小时。牛元峰又催马镇夷行动，马带六二五团官兵向下溜。红军集中火力猛打，官兵们到处乱窜，谁也顾不上谁了。

当牛元峰拼死突出土围子后，身边只有四五十个人了，他们茫然地向西南方走去。约摸走了四五里地，天渐渐亮了，隔沟看到孟广云带着一百多人往南逃，牛元峰这群人向他们喊话，可那帮人自顾不暇，一会儿就逃得不见踪影了。

这时，一支红军小部队紧追牛元峰一行，牛元峰的这帮人为了表示身上有枪，逼迫红军远离，不断向后方开火。不久，刘德裕和其他许多人再也走不动了，便躺在山上，牛元峰身边也只剩下沈叔明和一个随从副官。追踪的红军越来越近，甚至



一九三五年，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时的张学良。

双方的面孔都看得一清二楚，但红军不开枪，只是高喊着：“缴械！缴械！”

这时，牛元峰突然从腰间把勃郎宁手枪交给副官，颤声地说：“你把我打死吧！”副官接过手枪，对准牛元峰右后脑勺扣动了扳机。子弹从牛的前面穿出，面颊炸碎而死。

据身临其境的沈叔明回忆说：“我听到枪声刚一回头，见牛元峰已死，就问副官，为什么把他打死？副官把经过讲完后又说：‘师长已失常态，不打死他怕发生别的事情。’”

十一月二十日，一一一师在一〇九师后面约十华里，于一凡的六三二团还在前面一点，离直罗镇只有五里。二十一日晨，他们听到直罗镇方面的枪声，想问明情况，然电话已经中断。于团长请示军部，军部命令各就宿营地警戒，等天明弄清情况后再作决定。

天明后，一一一师参谋长走到高处了望，只见一部红军押

着俘虏、马匹、枪炮向北走去。接着，军部命令一一一师前去增援，王肇治派于一凡团为先头部队。于团一行动，就遭到红军的迎头痛击，支撑不住又退了下来。王肇治指挥刘启文、常恩多两团，刚刚占领阵地准备进攻，又听到黑水寺军部方面也枪声频传，同时，一〇六师方面也出现了敌情。总部虽然派来飞机，但因没有空地，又缺乏联络设施，于事无补。

直到二十一日下午三时，军部不得已下令全军退却，又增派了四架飞机作掩护，一一一师才安全撤出了战场。

战役结果，东北军损失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五千三百人、三千五余枪支被俘获。

正在南京开会的张学良接到从西安总部发来的电报，获悉一〇九师被歼，师长牛元峰阵亡，一〇六师一个团被消灭，恰似晴天霹雳。他心急如焚，急忙赶回西安处理。短短三个月的时光，东北军就损失了两师一团，令他极度震惊，目瞪口呆。

随后，张学良又迅即返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然而，蒋介石、何应钦对他的"报告"冷眼以视，毫不关切，而蒋介石的嫡系将领们更对东北军的失败冷嘲热讽，幸灾乐祸。

更有甚者，当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给与补充武器、弹药，以及给两位阵亡师长特别抚恤金各十万元时，蒋介石的回答是："特恤碍难照准，两师番号予以撤销。"

对此，张学良对蒋介石极为不满，他曾愠怒而又无可奈何地自嘲道："我张某人混得不值二十万块钱了。"

所有这一切，对张学良的打击太大了。

这时，张学良终于意识到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剿共"，果然是一石两鸟。假如打败了红军，东北军的实力也会大大削弱甚或同归于尽。这样下去，东北军的前途如何得了？

不仅如此，东北军广大官兵此时对反共内战的厌恶情绪也与日俱增。



蒋介石、杨虎城、邵子力、张学良视察部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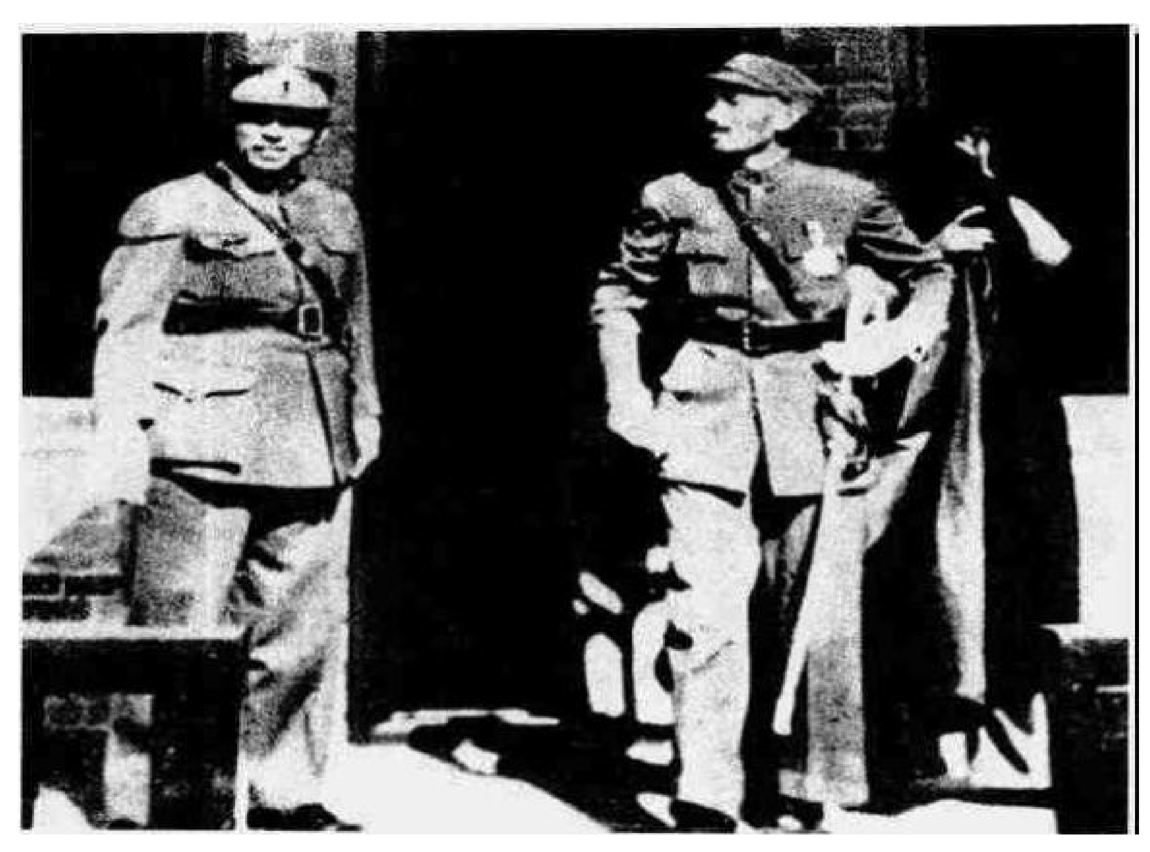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背井离乡，拖妻带子，随张学良剿共，形同流浪。他们盼望的是用手中的武器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打回老家去。他们愤怒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被打死，不如去与日寇拼命!"

在西安街头，死难官兵的家属成百上千，齐至西北"剿共"总部门前，呼天唤地，泣不成声，向张学良请愿，要求他抚恤遗属，停止罪恶的剿共战争。至此，张学良深深感到：剿共是绝路一条，要报家仇雪国耻，再也不能去钻剿共的死胡同了。

"事已如此，这些教训应引以为鉴!"东北军中的少壮派应德田向张学良谏言。

"我们刚刚移师西安，就遭到这么惨痛的挫折，委员长他……"张学良低沉地说。

此时此刻，不知道张学良提到蒋介石是什么用意？是自心


张学良、蒋介石在临潼华清池。

惭愧，还是胸怀愤懑？

“东北军今天的失利，委员长会有所预料的，他深知会有这样的下场，这是极明显的。先剿共而后攘外是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么样呢？进攻江西红军四年，前后五次投入总兵力共达百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红军仍然存在。”应德田说。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途疲惫，还能击败东北军，是值得深思的。

我常对我的部下说，我们都是带兵的，这万里长征，你们谁能带？谁能把军队带成这个样子，带得都跟你走？还不是早就带没了？



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六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检阅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蒋介石（右三）和张学良（右二）在检阅台上，右五为杨虎城。

应德田又语重心长地说："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剿共声中毁灭自己。委员长的治国决策不能不令人警惕。再者，东北军迁驻西北剿共前线，越俎代庖，兵马弹药损失得不到补充，先不说东北军阵亡将士的家属如何安抚，他们跟着副司令辗转南北，是为了有一天打回老家去，现在他们却成了异乡孤魂，如何不令人寒心？这些东北军阵亡将士的鲜血是感动不了委员长的。他远居南京，坐山观虎斗，是想借用内战之机一箭双雕，达到既剿灭共产党又削弱东北军实力的目的。到时候，我们如何能在抗日的疆场上克敌制胜？我们拿什么披甲凯旋？还有，委员长对东北军、对副司令是不是果真高枕无忧了呢？我看也未必如此。副司令是知道

的，委员长在西安布置了那么多'中央宪兵'，耀武扬威，横冲直撞，不仅俨然凌驾于东北军之上，是不是还有监视我们的意图呢？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委员长的决策，请副司令深思。"

"你说的有些道理，容我考虑考虑。"张学良心事重重地说。

"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稍候片刻，张学良又说道，"你的意见也有谬误的成分。反对委员长的'剿共'政策，就差不多等于反对他个人，也就等于说，团结一切力量，而单单不包括委员长在内，这是行不通的，也是不实际的。俗话说得好，鸟无头不飞，马无头不走。爱国抗日，不能凭意气用事，必须实事求是。委员长是握有全国军政大权而最有实力的领袖，他要'剿共'，你就无法停止内战。他不要抗日，中国就无法抗日。为了团结抗敌，我想应该设法谏诤他，说服他，争取他，不应该抛弃他，把他拒之于门外。既反他，又抗日，这怎么行得通呢？共产党主张团结抗战是对的，但为什么一定要反蒋呢？也许因为委员长要'剿共'，因此，他们就不能不针锋相对吧。也许他们对中国整个实际情况还不够清楚。我一定要好好地研究研究。"

从此，张学良开始转变了。当时，张学良的处境正如他自己所说："既挨红军的打，又受中央的气，不能不痛改前非了。"

后来，对为何要改弦更张，张学良曾作过如下的追述：东北军两个主力师的先后覆灭、两名"佼佼者"师长的阵亡，使他"倍增痛苦"；他痛切感到，"因内战而牺牲优秀的将才"，是太"可惜"了。为此，在东北军的干部会议上，他曾要"引咎辞职"。但他的部下们不但反对他临阵脱逃，并对他发出了愤慨的忠告。

“我等东北人，背井离乡，随汝张学良入关，心中所希望者，有朝一日同归故土。可现在，你却要舍弃我等而去，是何等心肠？”

“你忘却父仇，不顾抗日大业，盲目服从，求一己之禄位。”

“东北军人本志在抗日，而你，对东北军之牺牲不知爱惜，反竭力逼迫东北人走上内战的绝路！”

这些发自肺腑的忠告，给张学良以极大的震动、极大的启发和教育。

第五十七章　密访上海

1935.12

——“这次五中全会的表现，则是貌合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

——“我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

——“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但论是非，不计成败。凡能吃苦，肯牺牲的，都跟我来；凡贪安逸，惜生命的，都请出去。”

张学良自欧洲回国之初，常以此豪言自勉，也以此昭示他的部下和友人。

那时，张学良是以蒋介石的是非为是非的，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这个是非标准发生了变化。及至国民党五全大会，

他已清楚地看透了他的蒋介石仁兄对“剿匪”心急如火，但对抗日却冷若冰霜的真实面孔。

十月下旬，张学良赴南京出席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暨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期间，蒋介石作了《对外关系之报告》，他说：“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不到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在蒋介石看来，华北事件还不是“最后关头”。其对日屈辱退让之嘴脸，至此已彰显无遗。

此刻，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大”，杨虎城看到张学良心情不好，便劝他不要过于伤感，宽慰他说，出路总是会有的。

就在这时，张学良又获悉东北军一〇九师被全歼、师长牛元峰阵亡的消息。惊闻恶耗，张学良恼怒万分，迅速偕同何柱国等人乘飞机赶回西安，因大雪不得已迫降洛阳，后改乘火车回到了西安。他撤掉了董英斌的军长职务，并对参谋长晏道刚大加斥责。随后，又返回南京继续开会。

南京开会时刺杀汪精卫是这样的。有人问我一句话，说张先生你为什么要救汪精卫，你救他干吗？我就说，问我这话的人，证明这人没有脑子。人皆说我多宽容，不计与汪精卫的隙怨，实际上，救汪只是刹那间的事情，是一秒钟的事情，是瞬间反应，哪还想那么多？

那天是十一月一日，是开幕式集体照相。事先去谒陵时，气氛就有点紧张。照相时，张居正老先生在前台，他当时穿着一件花条呢中山服，在后头几排上的我们几个人就开他玩笑，说张先生今天怎么打扮得这么漂亮，原来是要等着照相呢。

那天很奇怪，蒋先生没有出来，大家都在等他，等委员长出来一齐照相。他为什么没有出来？后来我们才知道，他生气了，因为他气中央委员们在阎锡山入场时都鼓掌，但汪精卫入场时却很冷淡，所以，他找来秘书长叶楚伧，在里面骂，他火

了，不出来拍照了。就因为他没有出来，后来为此引起了好多闲话。

这样，大家就不等了，就合影照相了。当大家照完了正要离开时，刚转身，就响枪了。你知道吗，当年哪，南斯拉夫还不叫南斯拉夫，叫塞尔维亚，我看过一部讲塞尔维亚王子遇刺的影片，枪一响，警察就拿着刀向刺客冲来，大家都往响枪的地方跑去。但中国人相反，咱们倒好，“聋子放炮，——散了”。这一枪打出来，大家“哗”地一下子散了，跑了，这笑话多着呢，就别提了。

良心话，我是坐山观景，我在高处，在第三排上，我回神一看，这些人都跑了，我一个人在那儿看这究竟是怎么个事儿，当然，这是刹那间的事儿。只见张居正老先生跑过去抱着一个人，抱着这凶手，幸而那凶手也不是太厉害。他这枪里，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左轮枪，他装了三颗子弹，不，四颗子弹，装的是白朗宁子弹。

打得出是打得出来，但没有力量。他也许误会了，认为这白朗宁的钢弹与那铅弹一样，你白朗宁子弹没有来复线，你不能转呀，它松，小嘛。

我看得很清楚，张居正就抱着那个人，那个人拿着手枪，就这么拿着。这张溥泉，我都喊他张溥泉，他危险呀，我就下去帮他个忙。我冲下去，我从前学过武，会一点儿，但不是太好，我上去就给那凶手一个绊脚，“叭”的一声，他就倒下了，张溥泉就扑到他身上，就这样，就这么个经过。

最难得的就是那个拍电影的，还在那儿拍呢，可人都吓跑了。那什么警察、警卫呀，都跑了，就剩下我跟张溥泉两个人了。所以，那时上海，我记得是《申报》，将此事称作是“北方之强”。因我们两个人都是北方人嘛，张溥泉是河北人。

张学良能在千钧一发之际不计个人安危得失，奋勇救汪精

卫，彰显了张学良光明磊落、胸怀坦荡的个性。

帮他拿凶犯，那完全是基于公谊，假如一个人因小愤而忘大义，那还算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吗?

后来，是汪精卫的卫士，给了一枪，把他打伤了，不但打了一枪，还踢了他一脚，踩了他一脚。所以，他这就不行了。我气极了，骂他说，人都抓住了，你打他做什么?

在医院里，卫生署长、名医刘瑞恒告诉凶手说，我是通知医生给你治伤的，你不要误会，我问你，你死了以后怎么办?他说我死了你随便扔给狗吃了算了，我家里没人。刘说，我不是骗你，问你家中有人没人，是为了好收殓你呀。他说，没有，死了你就把我扔给狗吃了算了。

我佩服他，是有这几样事。这个人真够一位凶手、够一个刺客的资格。他打了三枪。我跟你说，我这个人好研究事情，我太太骂我，说你大事小事，什么事都好研究。他汪精卫挨了三枪，一枪打在背上，一枪也打在后头，一枪打在脸上。你听我讲，情形是这样的，汪一转身，他就给汪一枪，凶手是冲着背来的，“叭”就是一枪，这个人枪打得好准呢，在那个时候他不乱呀，你要晓得，你要明白这个情况。一个人在那个情况下，还能够镇定住，不容易。你研究他这枪法，头一枪就往背部往心上打，他正冲着他的心打去，大概这汪精卫一扭身，打背上了。第二枪他还是冲他这个地方来的。这第三枪，汪一回头，他就给他脸上一枪，给他往脑袋上一枪。你看这个人打的，弹着点都不是离得很远。

你就研究他这个人是多么沉着、稳健，他没有乱放枪。所以，这个人够一个刺客资格。他是王亚樵的弟子，这王亚樵厉害。

孙凤鸣头一天当刺客的时候，那天晚上，王亚樵把太太给他睡了一宿觉。王亚樵的女人还在这儿，王亚樵就是死在这个

女人身上。后来就是这个女人把戴笠的人带进去，把王亚樵刺杀了。

问他，你是来打谁的？他说我是来打汪精卫的，与蒋先生没有关系。听说王亚樵是受广东胡汉民派的指使，王亚樵拿了钱，他们对与蒋合作的广东人，如宋子文、杨永泰、汪精卫皆欲杀害。他们广东人很奇怪，王的目标是专门打广东的。

汪精卫这个人，以前我对他的印象还不错。当然，他后来当了汉奸，历史自有定论。不过，我当时倒是觉得他太太陈璧君非常了得。

事情闹完了，把铁门关上了，大家都跑进去了，只见汪先生在那边坐着，他受了重伤，满脸是血。我是最后进去的，我正走着，陈璧君，这汪太太同我走了个碰头，她问我，张先生，你看见汪先生了吗？我说，汪先生那不就在那儿，她看见了汪精卫，就走过去了。这时，汪先生就跟她说，我完了，我完了！

这一点我真佩服陈璧君，这个女人不得了！你想想，一个女人，看见丈夫挨了枪，她丈夫又哀叹地说我完了，你想她头一句话说什么？她骂汪精卫说，你刚强点好不好，你硬一点好不好，干革命的，还不早晚就有这一手，早晚会有这个结果！你看她，这家伙多厉害！

你知道她最初与汪精卫是怎样交往上的吗？不是探监。当年，她也是革命党人，但她与汪并不认识，后来，汪精卫那天决心去刺摄政王，她就答应了汪，她说，你去干吧，你明天就要去死，我没有旁的送给你。就这样，她就跟汪先生睡了一晚。

我就说这女的了不起，够厉害的，够一个革命党的资格。开会时，她就坐在我前头。我说，不但汪精卫怕她，我看见她都有点儿怕，她那神态怕人得很。

开枪时，蒋介石不在场，闻枪声后，他出来探视，陈璧君气呼呼地对他说："蒋先生，要我们不做，可以，为何出此手段？"

蒋介石含冤莫白，严令戴笠限期破案。后知是上海斧头党的王亚樵干的，其中与中央和两广的政治恩怨以及对亲日派的仇视有一定关联。王亚樵最终在桂林被戴笠派人刺杀。

那时候我到上海，根本没有什么保镖，还到处跑。杜月笙就跟我讲，他说，你到上海，有我杜月笙，你谁也不用怕。他给了我三个电话，他告诉我，假如你这家伙到处乱跑，叫人卡住了，你就给我打电话。但你要小心王亚樵，他倒不是跟你有仇，只要买他，只要有钱，他就干，他不管谁都去杀的。

王亚樵向杜月笙要十万块钱，杜月笙就给他十万。我就问他，月笙，这个事真假？他说这事是真的！他说是我给他的。我说，你怕什么？他说我怕麻烦嘛。他说，哎，汉卿，你真是。所以我说杜月笙厉害。他对我说，我十万块钱算个什么，我给他十万块钱就拉倒了，我给他十万块钱，他以后得听我的话啊，我又何必跟他找什么别扭。

我在北方负责的时候，杜月笙找到了我，请我帮他个忙。他跟我说明白了，他说，我要带着鸦片烟土到北方去卖，你想法为我保镖。我说，我才不给你保镖呢，我不干。我说这样吧，你带着什么，我不管，我派车，派我的座车，我去接你一下就是了。

话又说回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张学良说，照相时，他本在前排，后说依年龄排，故他与黄少谷两人就同被放到后三排上去了。事后，张学良做打油诗一首："少活三十年，队列后三排；不怕挨枪子，屁味实难捱。"

对五全大会，张学良很失望。后来，他在《自述》中曾有如下一段话："五全大会后，良在京耳所闻、目所睹，使心情

受重大的刺激，今尚记忆者，略述如下：（一）朋友之奉劝，如沈钧儒、王造时之鼓励；（二）少壮同志则责良不应同所谓亲日者辈同流合污；（三）刺汪凶手孙凤鸣之行为和言词；（四）党内之纷争，多为私，少为公；（五）良认为中央负责之同志不热衷抗日，而反有内心为亲日者，而良个人之观点上认为贤哲者，或在外工作，或无权位；（六）汪兆铭之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良认为非是对外，乃系对内。”

但由于这个《自述》是专门写给蒋介石看的，所以，张学良只能含蓄、曲折地表达。

“全国本来应当和衷共济，可是这次五全大会的表现，则是貌合神离，说起来令人痛心。”

张学良对洛阳军分校师生和二十五师团以上军官训话时，批评了国民党五全大会。

谈到国民党，我是老党员了，但是我脱党已久。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时也说不完。过去我参加党内会议，老总统总是在会上给我下条子，叫我不要说话，怕我放冲。党内皆在混，没人认真。我说几个笑话给你听。有次，某人为文件的“也”还是“亦”的写法在会议中争持不下。又有一次，会已拖了很久，将要散了，蒋先生说，他仍有话，请大家留一下，便又说了些话之后，大家正要散，突然有一元老又说：“各位慢走，我有话要说。”众人闻言，转头便说：“你放屁！”

国民党“五全大会”刚刚结束，张学良返回西安不久，便迫不及待地于十二月一日到了上海，秘密会晤杜重远和李杜等人。

杜重远是东北著名的爱国进步人士，和张学良关系很好。当时，他因在《新生》周刊上发表了《闲话皇帝》一文，日本侵略者指控其“侮辱天皇”，国民党政府便以妨碍“中日邦交”

的罪名把他逮捕，后“狱外就医”，当时住上海虹桥疗养院。

晤谈中，张学良坦率地说：“我过去到意大利，学法西斯，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所以一心不二地拥护蒋介石的政策，跟着蒋介石去‘剿共’，实指望国家统一后再抗日。但现实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我觉得过去的想法、做法错了，今后真不知该怎样办。”

“东北军能攻善战，应当用于抗日疆场；日寇并不可畏，真正可畏的是一个民族丧失了气节；只有抗日，东北军才有前途，你个人也可以有荣誉。”杜重远语重心长地对张学良说，“蒋介石借剿共消灭异己，东北军决不能给蒋做牺牲品，而应联共抗日。你和东北军的主力驻在陕、甘两省，有许多联合抗日的条件，就看你做不做。首先，你们和红军离得不远，可以和红军搞好关系；其次，杨虎城有抗日思想，又在你旁边，可以与他合作；另外，盛世才在新疆，同苏联关系不错，又是东北同乡，也可以联合起来。《八一宣言》申明中共愿同所有抗日力量建立联合阵线。共产党最忠实于自己的主张，只要你决心抗日，共产党一定会同你联合。不联共抗日，是空谈抗日。只有联共、联杨、联盛，再加上全国人民，一致起来抗日，你和东北军一定会有前途，东北失地一定能够收复。”

张学良听完杜重远这一席话，很受启发。他不是不想联共抗日，但他顾虑共产党肯不肯要他这个朋友，因为在《八一宣言》上，他的列名仅次于蒋介石，属于被打倒的目标，而且红军在《致董英斌书》上面，仍然骂他是卖国贼。

在上海，张学良又找到了东北抗日将领李杜，同李杜在郊外的汽车上长谈。张学良知道李杜由东北退至苏联时，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张学良向李杜表明他决心不再跟着蒋介石一齐打内战了，愿与红军联合抗日，要李杜去沟通同苏联的联系，并寻找和中共的联系。李杜欣然答应，说可以竭力设法办妥。

除与杜重远、李杜接触外，张学良在上海还拜访了宋庆龄、沈钧儒、王造时等，受到很大鼓励。

张学良在上海还和许多朋友、部下商讨了联共抗日问题。有一次，张学良在上海寓所招待同仁品尝其夫人亲酿的玫瑰露。此酒以鲜玫瑰花浸在白酒中酿制而成，色香味俱佳，颇为同仁所欣赏。进餐时，汤国桢打谜语说，张副司令调往西北皆为前世已定，在李淳风与袁天纲的《推背图》上已有记载，原文写的是“西北将军会八牛”，请大家猜想如何？在座的同仁均茫然不解。黎天才斟酌了片刻，便猜测说，副司令属牛，他属牛，或在张副司令身边的将军中还有六个属牛的，亦未可知。当时不过是酒后谈笑，未能细想。及西安事变后，众人才恍然道：“八牛者朱也，朱者赤也，红军也。”

此乃张学良促成国民党与红军合作一事之趣谈。

当张学良回到西安后，王以哲向他表示：“我们全体官兵都要打回老家去，不愿剿共了。希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好对日作战。”

张学良听了王以哲的意见，便把自己和李杜谈话的结果告诉了他，并要他在前线通过与红军的接触，寻找与中共联系的途径。

正当张学良主动要找共产党领导人会谈、商讨一致抗日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也展开了争取张学良和东北军的工作。

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红军发出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二十名将领署名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红军在此声明书中指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来共同实现这一主张，成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

此声明书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以及广大士兵的思想震动极大，影响至深，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起了重要作用。

“共产党有无剿灭的可能？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能否就此停止？剿共与抗日二者能否同时并进？”对此一系列问题，张学良自己做出的答案是：否！

张学良还说：“原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看来，则是非抗日不能统一。”

由于形势的发展、并经过旅欧回国以后两年的实践，张学良终于否定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国策。

第五十八章　东 大 西 迁

1936.2

——“东北大学除了它的本身使命外，实具有深远的国家民族意义。”

——“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我的军队没了，我的军衔没了，我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

保存东北大学，不是由于封建思想，而是因为东北土地亡了，要用东北大学作联系。它是东北的生命线，国家可借此以维系东北人心，东北人民可借此以知道国家不忘东北，国内同胞亦可借此睹物伤情，痛鉴覆车，愈知效忠国家。所以，东北大学除了它的本身使命外，实具有深远的国家民族意义，一定会受到政府的维持，国人的援助。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迁至北平后，学校假奉天馆收容学生，设东北大学办事处，一面送学生到平、津各大学借读，一面筹借校舍以便复校。一个月后，十月十八日，东大正式在北平南兵马司税务监督署开学，借读生也纷纷返校复课。

当时，文、法、工学院在西直门陆军大学旧址，理工教育学院在彰仪门北京师大研究院内。张学良任命杨毓桢接任理工学院院长，任命前附属中学主任姬振铎为教育学院院长。

一九三二年二月，东大又借得北师大广安门大街校舍。适东北交通大学学生由锦州逃来一百五十人，也归东大收容，于是又增设交通学院，由留美学生王卓然接任院长。同时，文法学院院长以曹国卿继任，教育学院院长改由方永蒸继任。至七月一日，又迁入西直门里崇元观五号原陆军大学旧址。同时，冯庸大学也并入东北大学。

东大虽在"九一八"后名义上改为国立，但在张学良将军兼任校长时，均不受任何方面的支配，仍是一个独自为政的高等学府。

热河失陷后，张学良扮演了替罪羊的角色，提出辞职，代人受过，被迫下野。旅欧考察行前，张学良和幕僚密议"还乡大计"，他说："武要保全东北军实力，文要发展东北大学。"

为办东北大学，本人先后捐款二百万元，实在费了好多心血。当初的目的，在于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以促成国家现代化，消弭邻邦的野心。谁知变起仓促，尽失所有，师生来平复学。今后训练要在明耻自强上多注意，即不徒怨恨日本人太凶横，更要怨恨自家太不长进，所谓"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要训练东北青年知耻自强，就是要他们天天流汗，时时准备流血，这样方可达到复土还乡的目的。

严格讲起来，自己不配做大学校长，但是命运、历史造成

了自己的地位与责任，没法逃避。为担负起这一责任起见，需要一班进步青年同胞，为救国还乡宏愿，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办理好这个大学。应按照这个使命的需要，特别注意去发现这样的人，认识他们，并训练他们。要是有丝毫造就私党之心、以遂个人争权夺利之欲，必遭天诛地灭，永世不能做人。

九一八事变前，东大的经费向来是充裕的。在北平复校后，自一九三二年九月起，南京每月拨给补助费两万五千元；是年十一月，又决定每年补助设备费两万元，虽不无小补，但仍感十分拮据。由于经费困难，是年农学院停办。

张学良校长旅欧归国，王卓然等亲赴香港迎接，同船到上海。一个月之后，二月二十八日，正值东北大学春季开学之日，张学良由汉口致电东北大学全体学生，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电文如下：

东北大学，王代校长（王卓然）转全体同学鉴：

王代校长在沪晤谈，备悉校中近况，差慰远怀。余由欧观察，所得彼中者，教育印象至深。世界各国，生存竞争，无不以培养人才、阐明学术为根本之计。其教者之善诱，学者之攻苦，孜孜不倦，远非我所能及。我国文化落后，国势阽危，愿求急起直追，非倍力倍速不可。诸生务须认明今日教育为救国方法之出发点。今日学生，为将来国家之主人翁，从此立定志向，振奋精神，努力作人，努力向学，艰苦卓绝，恪守规纪。必须养成完美人格，求得真实学问，方不负养士之初衷，才可负救国之重任。余对诸生爱之愈深，望之愈切。今当开学之期，不克亲临共话，特电勖勉，务望久志不忘，躬行实践。至要！至要！

张学良俭（二十八日）

不久，张学良撤消了东北爱国人士的秘密组织"东复会"，于五月改建拥蒋独裁的"四维学会"，于是，东北大学乃严格

实施军训，厉行“新生活运动”，甚至把“三民主义”都收了起来。同年十月，又在校内建立了东北青年“励志社”，作为四维学会的外围组织。

一九三四年五月，张学良在南京东北大学校友分会、励志社成立会上发表讲话，他说：“我要你们大家时刻不忘的有三点：第一，你们要时时想念北陵校舍是何等完备壮观；第二，你们要时时想念东北家乡是我们祖宗田园庐墓之所在，是何等丰富伟大；第三，比东北重要的是我们国家，我们必须时时刻刻放在心头，去爱护她，立志去为她牺牲。……你们要以人格为根基，要以国家为前提，要以为国家最高领袖牺牲为志愿，把自己的私利私见放在后头，国家自然有办法，个人自然有出路。”

在致东北大学代校长和几个院长的电报中，张学良说：“方今我国文化落后，危机四伏，非才无以救国，非学无以成才。”

在致电东北大学军事教官高仁绂等人时，张学良说：“兄等当知变化气质、整饬纪律，实为培育真才之第一要务。应养成学生服从领袖，恪守规纪之精神。”

返国之初的短时期内，张学良无论是写信、发电、讲话，中心议题不离救国、抗日、服从领袖之类的言论。

一九三五年七月，《何梅协定》订立后，华北名存实亡，北平各大学纷纷准备外迁。

十二月，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东大同学奋起参加，成为运动的先锋。绝大多数同学倾向进步，学校面貌大为改观。曹靖华先生说：“当年的东北大学是北平学生运动中反蒋抗日救亡的堡垒。”

但是，当时在东北大学实际管事的是秘书长王卓然，他对东北大学学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暗中反对，同北平反动当

局沆瀣一气，处心积虑地压制镇压积极分子，这些，张学良当时都没有预料到。

运动兴起后，张学良给王卓然拍电报，要求他将此次学潮的积极分子选派数人到西安汇报情况。王卓然借此大作文章，他气势汹汹地说："张副司令要闹学潮的主动分子去西安见他，闹学潮的人你们说话呀！报个名，我出路费，多好的事情，为什么不'主动'了呢？你们如果不吱声，我可要点你们的名啦。"

进步学生因不知道张学良的政治态度，加之电报又有指责学生闹事之嫌，把爱国运动说成是"学潮"，故都不表态。被王卓然点了名的，也声明不去西安，怕上当挨整。这正合了王卓然的心意。他趁机指派了跟着他屁股转的一批右派学生作为代表去了西安。

"你们都参加过一二九学潮吗？"接见时，张学良问道。

"没有。"这些右派学生都抢着回答。

"你们为什么不参加呢？"

"那是闹事，不符合党国利益，我们不能参加。"

"学生要求抗日，怎么会是闹事？"张学良说，"你们的家乡都在东北，可东北被侵略者占领了，有家不能归，你们流亡北平，可日本鬼子又把魔爪伸向华北，还要把中国人往死里卡，因而，我们团结抗日是最紧要的事，是最大的事。作为东大的每一个学生，都应当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站在最前列，因为我们最懂得什么叫践踏蹂躏之苦、家破人亡之苦、流离失所之苦。"

张学良深知这些所谓的"学生代表"代表不了真正的爱国学生，便教训他们一通，送回北平了事。随即，张学良又向王卓然打第二次电报，并派军法处长赵翰九亲自到北平请真正的学生代表。

可第二次派的代表仍使张学良失望。张学良生气地说："是不是叫我亲自到北平去一趟呀，可是我多么忙呀。"

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学良第三次致电东北大学："希望参加学生运动的学生派民主代表到西安一谈，弟实善意。"

这一次终于请来了真正的代表。代表由宋黎、马绍周、韩永赞三人组成。他们抵西安后，张学良就用小汽车把他们接到公馆里畅谈。

"'一二九'那天有多少学生上街游行？"张学良迫不及待地问道。

"有六七千人，北大、清华、东大等学校学生都是带头的。"学生代表回答说。

"你们的主张是什么呀？"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政府害怕极了，出动大批军警镇压，我们赤手空拳同他们搏斗。第二天，各大学举行总罢课。一个星期后，市民们又同我们一起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开大会通过'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组织民众共同抗日'等决议，之后，全国各地都响应了。"

代表们讲得起劲，张学良听得入神。彼此的心越贴越近，越贴越紧。

"校长，带领我们打日本吧，我们都不怕死！"

"校长，带领我们打回东北老家去吧！。"

东北军一定要打回老家去，我张学良何曾忘记家乡的父老？列宗列祖的坟墓都在东北呀！

显然，张学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站在时代的前端，引导学生，奋勇前进。

一二九运动后，当张学良看到东北大学秘书长王卓然同北平六位大学校长发表声明、阻止学生运动时，愤慨地说："迴

波遇到这种事情，怎么分辨不清，挺不起来啦?!”

他毅然撤换了王卓然的职务，另换了秘书长。

一二九运动推动了西安事变，东北大学学生从中起过重要作用。

一九三六年二月，张学良因华北形势日非，更重要的是想在西北掀起学生爱国运动，便勘定西安西门外原陕西农业专科学校校址，将工学院先行迁至西安，作为西安分校。

一九三六年春夏之交，张学良为加强对东大的领导和管理，又将文、法、理学院先后迁至西安，并以留英法学硕士白世昌任法学院院长，以留美工学硕士王文华和金锡如分任理、工学院院长。

张学良将东大由北平迁到西安后，便在西安市西南城外建筑校舍，置于他自己的直接领导之下。他任命周鲸文为秘书长，负责进行抗日还乡教育，提出收复失地、打回老家去、抗战到底的政治口号，并特别指出打到鸭绿江边为终点。

新建校舍（在现西北大学内）落成时，校方决定在礼堂基墙内砌立一块石碑，由张学良亲拟碑文如下：

沈阳设校，经始维艰。
至九一八，痛遭摧残。
流离燕市，转徙长安。
勖尔多士，复我河山。

校长　张学良立

然而，这块有纪念意义的石碑后来竟遭厄运。抗战时期，胡宗南在该处办“西北战干团”，下令把石碑挖掉砸毁。可是，那些与人民为敌的人不可能料到，这个题词早已深深根植在东北大学学生的心里，是永远无法挖掉的。

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后，张学良经常在百忙中拨冗对学生发表演讲。其中，三月二十八日的演讲甚为精彩。他说：

"我很想和你们常常见面，因为职务繁忙关系，未能如愿。今天和你们相见之下，有无限的感慨。东北的青年，今日到西北，将来到什么地方，尚不可逆料，这不但是东北人，即中国全国人民也是如此。回想在北陵时代，有堂皇富丽的校舍，若和现在校舍两相对照，不但诸位觉得苦，更使我有无限伤感。

"不过，古今圣贤，英雄豪杰，先不受苦，先不失败而凭空成功者，不可多见。'多难兴邦'，'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这两句话，并非是随便一说的无稽之谈。诸位想想：复兴民族之责任，固是在全国人民之身上，但东北青年所负之责任，应更重大一些，若不自己勉励自己，去苦干，去创造，将来指望什么？所以，我盼望诸位由感慨变作兴奋，国家光荣，在我们身上；国家失败，是我们未做好。如果大家能抱定这种心理，我想我们的失地总有一天是能够收复的。

"西北历史遗迹最多，那正是表明我们先祖先宗当年并非如此无能，决非如今日之受人凌辱侵略。一到此地便可知道，中国由秦、汉、唐以来，建设之伟大，历史之远久，以西北为最。由此可见，一国之强弱，在乎其国民之能振作与不能振作，如果自己肯埋头沉心下苦功夫去做，什么难事都可以成功的。

"一般青年都犯一种苦闷病症，由忧国忧民以至于自暴自弃，要知道，国家之弱，非一朝一夕而来，所以也不是我们一朝一夕所能解脱的，好像得病容易除病难，是一样的道理。因此，我要勉励同学下列数事：

"（一）要有沉痛心理。我们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环境，总觉精神上不能满意。除非你是冷血动物，可以不回念以往。所以，我盼望你们无论做什么事情，不必先看效果，不先

见效果就未必不是效果，这好似吃药一样，吃下药未必即时好病，吃下药病就即时可好未必就是好药，所以凡是一桩事情，正面看是坏的，侧面看，倒有很多收获。正如九一八事变一样，中国失掉的固多，同时国人也知道了团结、知道必须猛醒、除去陈腐之气等等，收获方面也得了不少。失掉的不必即时找回，要在悲愤中找兴奋、找进步。无失败何能成功？不退化焉见进步？我想，我们的苦痛还不止如此，日后恐怕还有比今日更多的苦痛。

"（二）须自己要强。当年袁项城应许二十一条时，我是学生，一腔热血，誓死反对，及至二十年后我执政，还不如人家。个人才浅力薄，固所自知，然而社会问题也太复杂，换言之，二十年来，国人依然不知自强。东北青年今后须彻底地觉悟，你们所负的复兴民族责任重大，所以，要受苦，我先去。要牺牲，我先去，要流血，我先去。没有这种精神，谈不到救国自强。

"现在，一部分人也希望外国人先和外国人战争起来，我们从中取利，这是幸灾乐祸的心理，于实际无补。人家不强，同时你自己也未强，等于无用，自己不振作，自己便吃亏。因此，我们只可责己恕人，不必去骂那四角钱一天的便衣队，也不必骂人家不帮我们的忙。"

张学良校长的讲话，既充满激情，又富有哲理。他还以戊戌六君子中谭嗣同的壮举，来抒发爱国之情和亡家之恨，他说道：

"谭嗣同传上记载了这样一段情节，就是戊戌政变在六君子尚未遭难以前，有人劝谭逃走，但他坚决不走，曰：'不流血，不足以促变法。'请问我们东北事变，谁流了血？谁有这种精神？

"任何事可以牺牲，但国家利益不能牺牲，最低也不得由

我手里断送。有人说，中国人自私，其实中国人并非彻底明白自私。有些人动不动就骂人家不牺牲，先要看一看你是否肯去牺牲，你要牺牲不必问合算不合算。中国以前有些官吏，自己要看自己的'德政'，这是不对的。要种树，不必要我自己吃果子。

"关于本校一切，我要向你们说明的，就是现在本校不是东北时代的学校，中国也不是以前的中国，所以我们不想前不想后，要顺应环境，吃米吃糠都可以。环境愈苦愈能成功，东北人现在吃苦，就是当年享受太多的反照！

"我们东北大学学生，有他的特殊使命：回故乡！所以我们造就学生出来，非但要有专门学识，还要训练他有比专门学识更深的救亡思想。将来复兴民族的使命，要使举国都企望在东北大学学生身上，学生要是没有这种勇气，不必在东北大学。

"西北是我国先祖发展之地，中国地方很大，各地风气不同，要入乡随俗。西北人能吃苦，这是我们知道的，希望你们能常到农村去，知道他们的思想如何，心理如何，做将来可以和民众打成一片的准备。

"学校前途方面，我简单一句话，凭我自己的良心说，我对东大比任何人都关心，我尽力设法维持，将来校址基础一旦确定，必尽力量设法将全校集合在一起。以后我更忙了，两三月内不能常到校，但同学个人有何难处，我必尽力帮忙。"

年底，西安事变发生，接着，张学良将军被扣，从此，他失去了东北大学的领导职务。

一九三七年春，国民党CC派的臧启芳取得东北大学校长职务，自此，东大便置于国民党统治之下。抗战期间，校址又迁往四川三台。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原东北大学代校长、九十二岁的宁恩

承从香港赴台湾看望张学良，谈到了东北大学复校的事。张学良闻之，非常高兴。十一月三十日，张学良欣然挥毫，题写了“东北大学”校名

翌年四月十三日，张捷迁教授受蒋仲乐校长的委托，专程从美国飞赴台北，当面向张学良致送了东北大学聘书。张将军面露笑容，拿出放大镜，看得非常认真，欣然接受了聘请，同意出任东北大学名誉校长、名誉董事长，并快步走到书桌前，挥笔写下“教育英才”及“东北大学七十周年纪念”等题词。

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一时，在张将军九十三岁寿辰之际，又接受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名誉理事长的聘书，然后，他当众挥毫，题写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名。

十一月中旬，东北大学校长蒋仲乐、副校长赫冀成等五人抵台，拜会了时年九十三岁的老校长。当蒋校长谈到了当年张将军对东北建设、东北大学的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时，张学良笑着回忆道：“我把父亲留下的钱用来办了东北大学。”

“老校长创办的东北大学，为社会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蒋校长说。

“不能这样讲，东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叫王永江。”张学良连连摆手说道。人们对张将军如此惊人的记忆力都很钦佩。

蒋校长把送给张将军的礼物拿了出来。他先送给老校长一个完整的鹿茸，张学良欣然接受，高兴地说：“这东西我内行，因为我父亲喜欢这个东西。”他边说边仔细看，然后满意地说，“这是质地非常好的鹿茸。”

当看到两幅同泽书画研究院院长王盛烈教授的字画时，张学良颇感兴趣，并指着一幅画说：“这画得远点看。”原来，这幅油画上画的是张学良接见记者的肖像，画高二米，宽一米，他很喜欢。

这时，一本名为《张学良和他的将军》的书，递到张学良的眼前。他接过书，一边翻阅，一边问："这书是谁编的?"当他听说作者是原东北大学学生宋黎时，还关心地问："宋黎现在做什么?"

会见中，东北大学的代表向名誉校长张学良递交了一份邀请书，邀他一九九四年回校视察。张学良收下后，很高兴，但没有即刻表态。对此，后来蒋校长道出其中的奥妙："大家都关心老校长能否回大陆来，我看关键取决于赵一荻女士。赵女士现在身体不好。老校长在最困难的时期，赵女士一直陪伴着他，如今她身体不好，老校长绝不会一个人回大陆。老校长能否成行，关键在于赵一荻女士。"

一九九五年五月底，新任东北大学校长郝冀成与前任校长蒋仲乐再次飞抵檀香山，向张学良祝贺九十五岁大寿。

六月一日早上，郝校长一行拜会了张学良将军，赠送了由辽宁岫岩玉石雕成的玉牛。家乡的山石令老人大喜过望。当郝校长等人问起张将军能不能择机回家乡一探时，他连声说："我会回去看看，会回去的!"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九日，东北大学校长郝冀成同副校长杨佩祯又飞抵夏威夷，第三次拜会张将军。三十一日，张将军接见了他们，精神状态比前两次还好。在题写"东北大学校董会"几个字时，张将军落完月、日款后，郝校长以为老人家忘写年款了，便想提醒一下，可张将军却边写边笑着说："没忘没忘，年款得放在最后写。"

六月一日，郝校长等又参加了张学良将军的九十六岁华诞之宴。第二天，当东北大学代表与老校长话别时，老校长一再叮咛："搞好东北大学，多多培养人才。"

东北大学校长的数次来访，勾起了张将军对家乡、对东北大学深深的情感。

我的军队没了，我的军衔没了，我只有东北大学、老朋友和过去的事了。

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割舍不了张将军血泪交织的东北乡情！

第五十九章　洛 川 密 会

1936.3

——“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

——“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你好大胆！打了败仗，当了俘虏，还敢回来叫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张学良向他的亲信高福源大发雷霆。

“副司令息怒。我这次冒死回来，确实有话要对您说，我是为了您和东北军好，决不是为了我自己。至于您怎样对待

我，我是不在乎的。我不怕死，怕死我就不回来了。您想杀我，还不是跟踩死个蚂蚁一样？但副司令，您可不能忘记我们东北被日本鬼子强占了，不能忘记三千万东北同胞已沦为亡国奴，也不能忘记先大帅是怎样惨死在日本人的手中！现在共产党和红军主张团结抗日，并诚心诚意帮助我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我们有什么理由拒绝人家的好意？又有什么理由骂人家为'匪'？难道非要把我们东北军这点力量全消耗在自相残杀的内战中才心甘吗？"

高福源说到这里，泪流满面，痛哭失声。

原来，高福源团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后，在优待俘虏的政策感召下，聆听了周恩来号召东北军官兵在抗战中贡献力量的讲话，自告奋勇，要前去规劝张学良。

一九三六年一月初，高福源身负特殊使命，离开瓦窑堡，来到甘泉城，托人致信王以哲。这时，王以哲正奉张学良之命设法与红军沟通，见此状况，喜不自禁，立即把高接到洛川。

高福源抵洛川后，向王以哲报告说："我是红军派回来见张副司令的，有重要事情报告。"王以哲即以密电告张学良。

此刻，张学良刚从上海归来，正急切盼望能与共产党取得联系，接密电后，立即驾机亲赴洛川，会见归来的高福源。但为了摸清高福源的虚实，张学良决定先考验他一番，因而故作震怒状。

"福源，别难过了，你说得好，说得对，你是我的老部下，我哪能那样做呢？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察看一下你的真情。你回去可以转告红军，请他们派一位正式代表来，双方可以作一些商谈。"当高福源慷慨陈词完毕，张学良不禁泪流满面，怀着激动而又沉重的心情走过去，亲切地安慰他说。

高福源还向张学良谈了在苏区的见闻，他说："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成立了各种抗日组织，开展了各项活动，而

我们这里却是抗日犯法，救国有罪。

“共产党号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问政治见解、宗教信仰，是团结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最好形式，共产党倡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是真诚的。

“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一支有政治思想、有训练的部队，与民众关系极好，是不可战胜的部队。红军同情东北军的处境，极愿合作共同抗日。东北军必须同红军联合起来，才谈得到打回老家去，这是东北军今后惟一的出路。”

张学良向高福源询问了共产党的若干政策措施，高福源就其所知，如实作了回答。他并把周恩来写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张学良阅毕，被信中的词句深深地感动了，信中说：“中国人不应该打中国人。杀死自己的兄弟，以饱狼腹，这非人类所为。”

“你谈的很好，休息一两天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放心去办这件事，此去如有危险，你的家属生活和子女教育都由我和王军长负责，由佟处长代为办理。”分手时，张学良向高福源叮嘱道。

高福源很高兴，他带着张学良和王以哲的意见，返回陕北苏区，把见面情况向李克农作了报告，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于是，中共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密谈。

二月十日，周恩来对李克农说：“按目前形势，这次和张学良谈判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成功的可能性很大，但也有一定困难和危险。要力争谈成，按瓦窑堡会议精神谈。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先商谈局部的合作抗日、经济通商等问题。重大问题及时请示中央。”

二十五日傍晚，李克农、苏区外贸局长钱之光、高福源、

机要人员戴镜元及警卫人员等一行六人抵洛川，张学良因事去南京，嘱咐王以哲妥为招待，可先商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留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按照张学良的意见，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六十七军局部合作问题。双方达成口头协定，大意如下：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果是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月三日，张学良从南京返回西安。四日，他身着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礼帽墨镜，手提文明棍，一副商人打扮，径飞洛川，前往会见李克农。

"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是整销，不是零售。"一见李克农，张学良就单刀直入、幽默地说。

"张将军，你解甲从商啦？"见张学良身穿便装，李克农诙谐地说。

双方在亲切、友好、诚挚、坦率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

"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陆海空军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抗日，就得联合他，否则很困难。排除蒋介石，是个很大的失计。你们共产党为什么要反蒋抗日？你们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在内呢？"

张学良首先提出了关于拥蒋联合抗日的问题。

"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许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

我们现在号召一切反对日本侵略的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仍然专打内战，死不抗日，他已经成为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又怎能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所以我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在内。”李克农说道。

张学良不同意这种看法，双方进行了激烈争论。

“要抗日如何抗？共产党对国防问题的看法如何？”张学良又问道。

“抗日主要依靠全国人民的力量，同时也要争取国际援助。战争的胜负不决定于武器，而决定于人。发动全国人民一致对敌，这个力量是巨大的，是不可战胜的。另外，抗战是长期的、持久的，不可能速胜，投降论和速胜论都是错误的。中国地广人众，有利于长期作战，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李克农回答道。

“共产党为什么不去宁夏，反而东渡黄河去山西呢？”张学良接着又问。

“红军东征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了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到山西、河北，政治影响大，到宁夏对全国影响小，我们对东征胜利是有把握的。”李克农解释说。

张学良又提出红军与东北军分别派出代表与苏联接洽有关援助中国抗日的问题，并与李克农商定，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当时盛世才与苏联关系较好。

张学良最后提出要求，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中推出一位来再作一次会谈，次之，是博古或彭德怀，会谈地点在肤施（延安）城，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身份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予掩护，以便与各方联络，推动有关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南京方面同情建立国防政府的颇不乏人，只要中共确定有团结抗日的诚意，我愿意为此而奔走。"张学良告诉李克农说，"近来，蒋介石托我去甘肃、南京等地公干，为期约两周，借此机会也可以做些工作。"

洛川会谈达成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停战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王以哲军长拨给红军七九步枪二千五百支，枪弹六万粒，子弹带若干，由军部少校副官王政用汽车运交红军。

张学良恳切要求能同毛泽东主席或周恩来副主席会见。李克农向中共中央转达了张学良的这一要求。

这是张学良第一次和红军接触，至此，他终于如愿以偿。双方通过交谈，相互了解了对方的观点和态度。从此，张学良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转折。

正在这时，张学良收到李杜的上海来电，说他要找的"朋友"找到了。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去上海迎接。三月二十日，赵毅把原名叫阚尊民的刘鼎从上海接到西安。

"刘先生，你是共产党，我有几件事想请教你。"张学良以严肃的口吻对刘鼎说，"我张某人与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毁家之恨，抗日救亡我决不后人，可是你们共产党却骂我是不抵抗将军、卖国投降；中东路事件，苏联红军把东北军打得那样惨，还骂我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反苏反共；在陕北，红军打东北军为什么打得那么厉害，使东北军遭受了严重损失?"

对张学良所提的几个问题，刘鼎分别作了如下的说明：

第一，张将军身为东北军边防司令，率领几十万大军，守土有责。九一八事变猝起，张将军执行不抵抗政策，一夜之间，沈阳失陷，不到四个月，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东三省，这当然应遭到全国人民的唾骂。中国共产党与全国人民一样，不能不表示态度。

第二，东北当局受蒋、日挑唆，首先挑衅、撕毁中东路共

管协议，苏联被迫自卫，是正当的。东北当局允许日本在东北扩张势力，而对有条约的中东路的管理采取片面行动，事实上则成了亲日反苏，苏联对张将军的指责也绝非无中生有。

第三，东北军替蒋介石卖命，变成剿共大军，在鄂豫皖和陕西使苏区和红军遭受了很大损失。红军在陕北自卫反击，使东北军受到挫折，这与苏区及红军损失相比，算得了“厉害”么？红军是有人民支持的不可战胜的新式军队，蒋介石的百万大军也对红军无可奈何，何况东北军？蒋介石驱使东北军剿共是借刀杀人，同时也是借此消灭东北军。共产党及其红军和蒋介石打了十来年交道，深知他剪除异己的一套阴险手段。究竟是红军对东北军“厉害”，还是蒋介石对东北军“厉害”，值得考虑。

“对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形势，将军当有深切的体会。”刘鼎接着说，“当今之计，打回老家去是东北父老、全国人民对你和东北军最大、最适应人心的愿望。东北军最好是联共抗日，既可以摆脱蒋介石消灭异己的阴谋，也可以一洗‘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将来抗日胜利，张将军和东北军将名垂史册，并占首页。”

“刘先生的见解非同凡响，我们还要再多谈谈。你是我请来的朋友，就请住在我这里吧。”刘鼎的一席话，说到张学良的要害处，张学良点头称是，向刘鼎发出邀请。

随后，张学良把不久前与李克农在洛川密谈的情况告诉了刘鼎，并邀他去洛川相谈，也可避人耳目，他说：“我们一同去吧，你先到洛川住几天。”

刘鼎闻言后欣然同意。于是，少帅带着刘鼎飞到洛川。

在洛川，张学良和刘鼎住在王以哲军部西侧一个两套的四合院内。他们在这里同饮食，共起居，每天有十几个小时在一起，共同探讨了许多问题。刘鼎把共产党当前的政治主张、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联合抗日、红军的军事制度、政治制度、军队生活和运动战、游击战等问题，系统地向张学良作了介绍和解释。

“红军用什么方法使得部队能征善战，能够战胜一切艰难困苦，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团结一致呢?”张学良不解地问刘鼎。

“因为红军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阶级觉悟。”刘鼎答道。

张、刘在洛川的谈话持续了十几天，每天从早饭后开始，经常谈到下顿饭，直到勤务兵不得不收拾饭桌时才打断一下。有时坐累了，就上城墙边散步边交谈，三四百米见方的洛川城墙，他俩一转就是两圈。

至此，张学良已把刘鼎引为知己，两人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为即将开始的同周恩来的会谈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四月六日，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电文如下：

甲、敝方代表周恩来同志偕李克农于八日赴肤施，与张学良先生会商救国大计。定七日由瓦窑堡启程，八日下午六时前到达肤施城东北二十里之川口，以待张学良先生派人至川口引导入城；关于入城以后之安全，请张学良先生妥为布置。

乙、双方会商之问题，敝方拟定为：

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

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帝逼进问题。

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

四、联合苏联及选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

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

问题。

丙、张学良先生有何提议，即祈预告。

张学良抵洛川与中共进行秘密会谈，必须迷惑南京方面并避开国民党特务的耳目。所以，他是以推进“剿共”军事为名，报请南京在洛川设立“西北剿总前进指挥所”。他致电蒋介石说：“预定设前进指挥所于洛川，学良即日赴前方督剿，以期早奏厥功，释钧座西顾之忧。”

蒋介石对张学良自告奋勇亲往前线推进“剿共”战事，非常高兴，遂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中正手启。”

正当蒋介石对张学良深表嘉许、期其“立歼灭之大功”之际，张学良却在肤施与中共中央的代表周恩来举行了秘密会谈。

第六十章 肤施会谈

1936.4

——“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

——“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

——“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彼自称为李克农，良当时不悉李克农是共产党中何等人物，谈判之下，所提之请求，与后来共党所提之条件大致相似。良答复如彼等真诚，可以容纳转陈。但彼之地位，是否可能代表该党，表示怀疑，促其首领如毛泽东、周恩来辈来见。彼答以共党所提诸事，曾经其全体表决者，如良诚信，彼可商请毛、周来见。彼立即北返。得其答复，周恩来愿来会见，请

约地点和时日。

“待周答复至，良衷心忐忑，本一动扣留之念，再一寻思，偶起‘岂有鸩人羊叔子哉’之句，彼既卒然敢来，余当磊落光明，既然彼等声言为国，声言抗日，何不推诚相见？”

谈到洛川和肤施会谈时，张学良在他所谓的“忏悔录”中曾这样回忆道。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在肤施（延安）天主教堂与周恩来秘密会晤，双方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

肤施会谈最终定在四月九日。会谈前，天气一直不好。八日那天，先是大雪，后又下雨，给行路带来许多不便。九日，天虽晴了，但雾大。可张学良已顾不了这许多，带领王以哲、刘鼎、孙铭九等少数随行人员，驾机直飞肤施。下机后，张学良觉得有点疲倦，胳膊、腿都有些发酸，直到下午，他都没有再出门，就在会谈地点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教堂附近的一个小院里休息。

中共代表也是顶风冒雪，骑着马经两天跋涉，天擦黑时才

来到天主教堂门前。他们一共五人，走在最前面的一位，中等身材，人较瘦弱，着黑色中山装，眉毛浓而黑，留着浓密的黑胡子，目光炯炯有神。

“欢迎，欢迎，请！”孙铭九很有礼貌地把他们引到里面。他只觉得这位大胡子衣著朴素庄重，仪态沉稳和蔼，一定是个不简单的人，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原来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周恩来。

此时，张学良已在教堂门前迎接中共代表。他久闻周恩来是出名的美髯公，所以，当周恩来一行人出现在眼前时，他一眼就认出来，大步向前迎接，紧紧握住周恩来的双手，用非常肯定的口吻说：“你一定是周先生，久仰，久仰！”

有关张学良的传奇，周恩来也早有耳闻，但一直没有机缘面识，此刻，初次相见，即被张学良的热情所感染。他持重地打量着张学良，风趣地说：“张将军，好眼力啊！”

“不，不，”张学良谦逊地说，“谁人不晓得共产党中的美髯公啊！”说罢，大笑不止。

“初次相见，就感到张将军是个痛快人，有着一种故人相见的亲切感。”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豪爽，不无感慨地说。

“周先生，这话从何而来？”张学良听了，不禁一楞，问道。

“张将军有所不知，我是东北长大的，我少年时代，曾做过你父亲张大帅三年臣民，对东北人的性格是熟悉的，而且打心里也是喜欢的。”

“我了解，听我的老师张伯苓说过。”张学良幽默地笑道。

“张伯苓怎么是你的老师？”周恩来一怔，不解地问道。

“我早年听过张伯苓的演讲，因此拜张伯苓为师。后来我抽大烟、打吗啡，其中也是听了张伯苓的规劝，下决心完全戒除掉了。”张学良爽朗地答道。

话锋--转，张学良又风趣地对周恩来说："我和你是同一名师的弟子哩。"

会谈就在这种非常轻松融洽的气氛中开始了。

"从上海来了个共产党的代表，叫刘鼎，是否可以来一起谈？"会谈开始之际，张学良很有礼貌地征求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阚尊民的化名，但当见面一看，竟是自己熟悉的老部下。他紧紧地握住刘鼎的手说："原来是你啊，想不到我们在这儿见面了。"

会谈开始，张学良首先坦率地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统治，相信法西斯能够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张学良又接着说："我认为必须实行民权主义，才能唤醒民众。联俄、容共、扶助农工是中山先生积四十年的革命经验而提出来的三大政策，我们不能放弃，所以，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热烈赞成。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的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洛川已经和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约请周先生来亲自谈一谈。"

"哪里，哪里，咱们共同研讨，共同研讨嘛。"周恩来一直静静地听，当见到张学良这么客气时，立即作了谦虚的表示。

"不，请周先生指教，学良讲的是真心话。"张学良又补充道。

"张先生到国外看了看，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看到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这是难能可贵的。"周恩来见张学良态度诚恳，是真心实意要抗日的，便开诚布公地说道，"不过，关于法西斯主义，我也是持否定态度的，因为它不是--种先进

的思想，而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它主张个人独裁，压迫人民，摧残群众，把资产阶级统治的最后一点表面上的'民主'全抛弃了，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思想观点，是没有任何进步意义的。中国要抗日，必须实行民主，以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只有发动和依靠广大群众，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假如仿效德国和意大利，搞法西斯主义，只会投降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真正抗日的。张将军，我说的这些也都是个人看法，是否妥当，也请你多多指教。"

"不敢当，不敢当，"张学良忙说，"你谈得好，我完全赞同。近来我对这个问题也有些想法，经你今天再一点拨，心里就更亮堂了，今后将不再谈法西斯主义。但现在究竟应当怎样抗日呢？"

双方就此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关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总方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他说："红军是真抗日，抗日与剿共不能并存。"

对中共的抗日救国纲领和成立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的主张，张学良也完全同意，并建议说："有关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将来实行时再研究。"

这样，双方全面合作抗日的方针和主要方法就首先肯定了下来。

当谈到红军兵出华北，以号召和推动全国抗日的问题时，张学良表示赞成，但他不赞成取道山西。

"我和晋军打过仗，晋军防御力量很强，红军入山西，阎锡山若与部下结成一体，坚持苦战，甚至会促使阎和蒋联结起来，红军孤军作战，恐难立足。"张学良担忧地说。

"红军在山西站得住脚。所以要兵出华北，不仅是为了我们抗日，还要带领群众一起抗日，这样才有力量。"周恩来肯定地说，"红军对日作战取得胜利，就会推动全国友军和民众

的抗日浪潮。华北大规模的抗日战争一起，红军愿担任左路。”

“如果红军入河北，我可以通知驻河北的万福麟部和红军联络。”张学良说，“阎锡山太保守，不要逼之太甚。会后，我就去太原和阎联络。”

但是，张学良还是认为红军开入山西阻力太大，最好兵出绥远，东向察北，与日军接触。他说：“出绥远有两条路，一是经延长、清涧、绥德一线北上，一是绕道宁夏。”

周恩来凝神地听完张学良列举的理由后，说：“有道理，但要和毛主席商量，这个问题正在研究中。”

当周恩来提到红二、四方面军将北上抗日时，张学良说：“欢迎在川西北一带的红军北上来陕，来多少都欢迎。红四方面军北上，驻陕、甘的东北军可以让路。红二方面军要经过中央防区，我可以去斡旋。”

当谈到抗日救国的道路时，张学良提出几个有关抗日战争爆发后的问题向周恩来请教：

一、日本会建立许多伪政权并封锁我国沿海，将使我国难以取得外援。

二、日军占领要冲地区屯兵固守，怎么办？

三、抗日战争一起，是否可以引起日本内部的变化？

周恩来说：“不抗日则伪政权会愈来愈多，抗日则上下一致，汉奸反而少有活动余地；我国领土广阔，从日本兵力和国际关系上来看，日本不可能将我国封锁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军工器材，不仅可得之于英、美，也可以得之于苏联；日本入侵我国后，如在占领了一定地域即实行固守的防御战略，则必然导致失败；只要抗日战争能持久，日本革命危机增长，可能引起日军哗变。”

统一战线，联蒋抗日，是张学良最关心和最希望解决的问题。对此，周恩来诚恳地说：“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很愿意

听听张将军的意见，以便考虑，补充完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坦率地说，“蒋介石是中国现在实际上的统治者，我们发动抗日战争，如不把他争取过来，困难是很大的，他势必会与我们作对，甚至可以用中央政府的名义讨伐我们，像在张家口对付冯焕章先生一样。蒋介石的脾气我是知道的，为了自己，他会一意孤行到底的。”

周恩来沉着冷静地说：“蒋介石集团，不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政治、经济上，力量确实是很大的，抗日战争如果争取不到这个集团参加是个很大的损失，争取过来，对抗日战争有好处。可是，蒋介石目下正像清廷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他对日寇无耻退让，对爱国群众残酷镇压，高叫什么‘攘外必先安内’，其实是依靠出卖中国的主权来维持他的统治，不管他口头上如何诡辩，但实际上，他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忠实走狗。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来参加抗日，只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他这个反动集团，对抗日救国才有利。”

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问题是我们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去争取，想尽一切办法去争取。

“蒋介石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日本人给他难堪，他也发泄过牢骚，诉说过心中的仇恨。但他有个很错误的固定想法，就是认为必须先消灭共产党才能抗日，因为共产党的一切口号、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打倒他。要是他到前方去抗日，他很不放心。这就是他‘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依据。”

周恩来愤懑地历数了蒋介石自清党以来，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屠杀共产党人的桩桩罪行。接着，他断然地说：“旧

帐，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对啊，抗日是当前急迫之事。”张学良赞同道，“据我这两年的观察，蒋有民族情绪，有抗日的可能。但是他身边的亲日派也不少。”

张学良介绍了汪精卫改组派、政学系、安福系等方面的情况。随后又说：“主张联俄乃至联共抗日的也大有人在。”

接着，张学良又历数了孔、宋、CC派、黄埔系的张治中、陈诚、胡宗南等人，认为他们至少是抗日不剿共。非蒋嫡系的冯玉祥、蒋光鼐、唐生智和许多地方实力派，也积极要求抗日，停止内战。然后，他说：“蒋介石是在歧路上，他错在‘安内攘外’，把这个错误国策扭转过来，就可以实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要做艰苦的工作。对蒋介石就得逼一逼，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面劝，我们对他来个内外夹攻，定能扭转过来。”

最后，张学良还向周恩来亮出了他的底线：“除非蒋介石投降日本，否则我不能反蒋。”

对此，双方争辩激烈。

“你们的抗日和蒋委员长的攘外，如果都附带倒蒋或安内这些条件，我实在不能苟同，因为日本军部绝不会等着倒蒋或剿共完毕再入侵。”张学良心情很沉痛地说，言毕痛哭。

周恩来也陪着流了泪。

“那应该怎么办呢？”周恩来问道。

“只有在拥蒋抗日的目标下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张学良语气坚定地说。

“我们怎么能拥蒋呢？”周恩来反问道。

“联蒋如何？”张学良建议道。

“可以。”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

我与周恩来，我们两人把话说得很明确。他说，如果真能

这样，我们立刻赞成。不过，他提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陕北这个地方，仍让我们后方家眷在这儿呆着，另一个是你们不要把我们共产党消灭。除这两个条件，其余那我们一切都服从中央，军队也可交给中央改编。

我跟你说，中国的现代政治人物，我最佩服的是周恩来，我最佩服他。我们一见面，他一句话就把我给刺透了。当然，他也相当佩服我，你看到报刊上发表的周恩来说过的话吗？可以说，我们两人一见如故。我当时答应了周恩来，周恩来便说，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共产党可以放弃这些事情，我们很希望，并更愿意你能领导我们。

我自个儿当时也太骄傲，太自信了。我说我去说说蒋先生，我可能会把他说服了，但是，也不是说就肯定有把握，不过我一定负责任，如果你们的说法是诚恳的。周恩来就说，好吧！

我哪能说了的话不算话？大家都说好了的事，说了就要算数。也许我上了周恩来的当，也不一定，这话你可以这样讲，但在我这一方面，我说话是要负责任的。

从张将军与唐德刚教授的一席对话中，我们可以窥探到发动西安事变的秘密动机之一是：以重信义著称的张学良在周恩来面前把大话说过了头，他在“劝蒋”之中，屡遭重挫，诺言无法兑现，主张被迫搁浅，一筹莫展之际，待至诸因素迸发，张学良便不惜铤而走险，终于在西安采取了激烈的手段。

关于苏联问题，会谈中，张学良问周恩来：“苏联援助中国是否出自真心？”

按北伐战争的历史和当时的国际形势，张学良认为苏联会支持中国抗日，他这样提问的目的是希望从中共方面得到证实。

周恩来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国是真心诚意的，利己，又利中国。帝国主义国家只求利己。”

双方商定，张学良派人去欧洲去苏联，利用东北义勇军与苏联红军的旧关系去加强联系；中共派人经新疆去苏联，由张派人和盛世才联络，既帮助中共人员成行，又为西北自成抗日局面作准备。

会谈中，张学良明确表示不愿再打红军了，并希望以后如有军事行动，双方都要预先商定。对此，周恩来表示同意。

周恩来提出："抗日战争发动了，红军需要无线电器材、医药和医疗设备，请东北军帮助采购。"

张学良说："我方库存军用物资已调入陕西，包括红军在内，二三年也用不完，这事我完全负责。"

事后，张学良曾对人说："这算不了什么，等于东北军多装备一二个师。"

张学良还对周恩来表示说："抗日战争一起，我有一笔很大的私款可以移作军费。"

张学良感到抗日干部缺乏，很苦闷。他认为共产党的干部多得很，成长也快。所以，他对周恩来说："请你们赶快派有政治头脑而色彩不浓厚的人常驻我那里，你们派多少人来我都欢迎。我派一个人去你们那儿，身边就没有人了，所以，我一个也不派。"

周恩来说："我们一是穷，二是人少，文化又低，很多人不识字，文化水平在你们那里不成问题，东北军将士的军事知识、政治知识也很丰富。由于我们穷，才不得不随时随地地注意培养干部，这才稍稍解决了目前干部缺乏的问题，否则更不行。"

"即使你有干部，也应该不断地培养自己的新干部。"周恩来继续说，"我们现在办红军大学，你可以办军官训练团；红大上面将来可以办抗日大学，军官团上面也可办抗日大学，两边都有抗大，将来可以联合在一起成为联合的抗日大学。"

不久，张学良与杨虎城共同办起王曲军官训练团，为抗日战争培养了干部。

而后，两人又讨论了国共合作和停止内战的具体条件和措施：红军全部编入国民革命军，接受改编的部队也包括所有留在江西、湖南两省和大别山脉中的游击队；红军应得到与国民革命军正规部队同样的待遇；共产党人同意在军队中停止政治活动；共产党的非军事人员应该被允许居住在陕北；打败日本以后，红军应和国民革命军享受同样的退役待遇；与日本的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将继续作为一个合法的政党进行活动。

周恩来对张学良说，如果蒋先生仍然怀疑共产党参加抗日统一战线的诚意，他周恩来愿意被扣押在西安，作为人质。

张学良为周恩来的人格和共产党人的追求所倾倒，他答应周恩来说："我一定向蒋先生报告这次会谈的情况，努力劝说蒋先生同意这一既成事实。"

"我张学良是坚决抗日的，我正准备与日本人决一死战！"最后，他真挚而坦率地向周恩来表示。

"我们都是爱国主义者，我们一定要打败日本，挽救中国！"周恩来坚定地说。

日本不仅给我的家庭带来了不幸，也给中国造成了民族耻辱。我决不甘心在为中国而奋斗中落在他人后头。然而，我有自己的上级，许多事情以我的地位是不能决定的。但是，我要尽最大努力使蒋先生理解。

张学良与周恩来立下誓约：彼此决不背信弃义！

十日清晨四时，会谈结束，双方都非常满意。夜餐后，张学良拿出一本《申报》纪念六十周年印制的大地图送给周恩来，深沉地说："让我们共同保卫中国！"

这本大地图是我国第一本比较精确的等高投影设色地图，可辅助军用，这对缺乏地图的红军是一件珍贵的礼品，也是红

军仅有的两本《申报》大地图之一。另外，张学良赠送私款二万光洋，后来又赠送了二十万元法币。这笔巨额赠款，对处境困难中的红军不啻雪中送炭。以后，还陆续有所接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军需帐上查明，接济红军所用款额达七十六万元之巨。

会后，周恩来一行辞离肤施，抵十里堡遇雨停宿时，他对同行的人说："谈得真好呀！想不到张学良是这样爽朗的人，是这样有决心有勇气的人，出乎意料，真出乎意料！"

不久，中共决定正式派刘鼎为驻东北军代表。四月二十二日，周恩来写了一封信，嘱咐刘鼎一定要面交张学良。信的开头写道："坐谈竟夜，快慰平生，归语诸同志并电告前方，咸服先生肝胆照人，诚抗日大幸！"

刘鼎从苏区回到洛川后，告诉张学良说："那边的同志都欢迎你，欢迎你作为一个大有作为的红军的朋友，说你是当今全国最勇敢的第一个决心抗日的将军。"

"我同你来洛川会晤周先生，预想一定会谈出很多理想的问题，为我解决疑难，树立抗日信心。"张学良对刘鼎说，"会谈后，我太满意了，比我想像中好得太多了，我结识了最好的朋友，真是一见如故。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周先生是这样的友好，说话有情有理，给我印象很深，解决了我很多的疑难。我要是早见到他该有多好呀！"

张学良又说："我和蒋先生相处了多年，但弄不清他打完红军后是否就抗日。对中国共产党，我不仅知道她第一步是抗日，而且还知道她第二步是建立富强的中国。"

最后，他说："中国的事从此好办了。"

张学良终于找到了抗日救国的朋友和道路。

肤施会谈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也影响着张学良的一生。

第六十一章 三 位 一 体

1936.5

——“那时中央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有约。”

——“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被逼上梁山，我们就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那时，我带你们一起加入共产党。”

——“共产党和红军是最可靠的抗日力量，我张学良爱国绝不后人。”

西安事变之前，我是这样想的：东北军西北军、共产党、阎锡山，联合这三支军队，抗日作战时就这么摆着。那时，大家都说好了 周恩来还对我说，我们绝对服从你的指挥，大家配合作战。

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同共产党联系上了。现在事情都已经

过去了，我都九十多岁了，也没有什么顾虑了。所以，我说，中央啊，那时中央糊涂，他就不知道我跟共产党有约。后来我同戴笠见面，戴先生说，我真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干！我说，你那些特务尽扯淡，什么特务，你特务不了啦！

“张周会谈”后，经过中共和张、杨的联合努力，西北形势大为改观，“三位一体”的抗日局面逐渐形成。

当时，中共中央认为，既然连张学良这样愿意走联合抗日道路的人对“反蒋”都难以接受，显然，如仍继续坚持反蒋，对扩大统一战线是不利的，所以采纳了他的建议，将“反蒋抗日”改为“逼蒋抗日”。

五月五日，杨虎城将军前往洛川，同张学良将军举行秘密会谈。经过周密协商，张、杨双方达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以及与红军合作的密约。

同日，中共发表“五五通电”，指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幡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之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从一九三六年五月开始，中共即积极倡议建立以张学良为首的“西北国防政府”，主张与东北军密切合作，促成西北大联合，打通与苏联的联系，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共产国际也积极给予支持，希望中共能够在西北成就大局面。

当时，东北籍的党员干部如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宋黎以及非党进步人士高崇民、车向忱等，均先后来到西安，利用各种形式深入东北军，联络东北军的上层人士，促进西北抗日局面早日形成。

高崇民、栗又文、孙达生等还印发小册子《活路》，意思是东北军只有联共抗日才有活路。在小册子中，特别提到张学良将军国难家仇集于一身，认为他是最适合领导东北军抗日的。而要决心抗日就必须联共，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国家民族，他个人才有出路。也只有这样做，他才能不辜负全军的期望。

这个小册子在全军发行，影响很大。张学良本人对此也很重视。

不久，小册子被特务发现，蒋介石下令严加追查。此即众所周知的“活路事件”。

一九六二年，周恩来总理到长春视察工作时，还问栗又文：“《活路》小册子现在还能找到吗？那是我们地下党搞的，还不错嘛！”

为推动东北军抗日，中共中央决定：争取张、杨两部的统战工作由周恩来总负责；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简称“东北军工委”，并举办了专门的训练班，开展对东北军的工作。

六月二十日，中共又发出《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十条，指出：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目标不是瓦解东北军、分化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纲领，使东北军成为坚强的抗日武装力量；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军；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是依靠我们耐心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

中共这些举动和决策，张学良都看到了，他衷心拥护，因而，他对联共抗日和争取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物共赴国难一事，更加积极了。

栗又文在《西安事变与张学良将军》一文中说：“张自四月间和周恩来同志见面后，抗日情绪大为高涨，记得有一次南

京进步青年几十人来西安见张，张令我陪见。当时同学们提出许多问题，由张学良回答。同学们问张学良：你看共产党能成功吗？张学良答：一定能成功。同学们又问：为什么？张学良答：因为共产党代表穷人的利益，而穷人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以他当时的身份敢于这样向青年回答问题，使我都有些吃惊！"

常和张学良接触的孙达生也回忆说，那时的张学良在讲话时，确实说过一些"左"的言论。有一次张学良对他说："如果真的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而被逼上梁山，我们就要破釜沉舟，不顾一切了。那时，我带你们一起加入共产党。但今天还不是那个时候。"

五、六月间，当东北军某部修筑洛川公路时，张学良为了解士兵的动态，化装成士兵混入队伍。士兵们边修路边漫骂："他妈的，这些苦差事何时是个头？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回老家去？"

张学良听了后，感慨地对栗又文说："参加修路的都是山东、河北兵，连他们都以东北为老家啦，咱们如果再不抗日，连这些兵也带不了啦！"

为培养抗日干部，六月十五日，张学良创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张学良亲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训练团以"披甲还乡，抗日救国"相号召，使受训的军官思想进步得很快。

刘澜波、孙铭九、应德田、万毅、解如川（解方）、贾国辅（贾陶）、郭维城、吴家兴等，都参加了第一期干部连受训。开课后，张学良亲自和学员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以便观察和掌握学员的思想情况，有的放矢地进行思想教育。

应德田回忆说："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晚上的情景。晚饭后，全体学员时常坐在饭桌两旁聊天。这是一条挖好的约二十丈长的土桌，两边是挖好的同样的土椅，吃饭时，大家在两旁对坐。张学良和干部连连长王以哲、排长缪澄流坐在中间，学


张学良（左一）在王曲军官训练团与学员共同进餐。

员们依次坐在两侧，大家吃的同样是一饭一菜，张学良将军这种与大家同甘共苦的精神使全体学员都很钦佩，很感动。

“晚饭过后，大家坐在一起随便地议论。当大家谈到日寇侵略、东北沦亡、东北军流离西北、蒋介石屈膝投降而忍辱卖国、抗日无期时，情绪十分激昂悲愤。一个叫黄冠南的营长忽然站起来，眼泪纵横，用沙哑的声音高喊：‘请副司令领导我们走上抗日战场，打回老家，收复东北！’接着，学员们争先恐后发出相同的请求，场上显得又激烈又悲壮。

“此时，张学良将军内心非常激动，站起来，环视一周，他流泪了，但他并未沮丧，他用慷慨沉重的语调说：‘大家的心情和意见很好，请大家相信我。我，张学良，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和大家一样，我不会忘掉报仇雪耻，收复失地！请大家相信我，不要急，要做好思想准备，我一定能够领导各位走上抗日的征途，披甲还乡，重返家园。’张学良将军这简短的几句话讲完之后，学员们热烈欢呼，掌声雷动，这一气壮山河的

场面，无论对张学良将军，对全体学员，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

六月二十二日，张学良在王曲军官团作了题为《中国出路唯有抗日》的演讲，集中体现了他誓死抗日的坚定信念：

“诸位，在目前的非常情况下，我们唯有不顾一切，用尽全力，坚决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侵略！我们要相信：牺牲我们自己，便可以完成我们的使命！

“‘九一八’前后有一个最大的错误，就是委曲求全。现在明白了，对日问题实在没有委曲求全之道。今后对日唯有抗战，抗日是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抗日是东北军最大的使命，时间已不容我们空谈准备了！我们要马上把准备与行动联系起来。头可断，血可流，一切一切都可牺牲，唯有日本不可不抗，没有这种最大的决心便不配为中国军人！

“东北军抗日没有任何希图。成功，我们未必亲眼看见；荣誉，对于我们这些负有耻辱的人早已绝缘；至于东北的土地、主权，那是中华民族的，我们也绝不能有任何非分的妄想！所以说，东北军抗日，唯有牺牲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决心不但我有，想诸位也都有！不但诸位有，想东北军全体将士们也都有！

“理论和实践，本来表里相应，互为因果的，决不容割裂分开。理论离开实践等于幻想，实践离开理论便是盲动。能实践抗日，才不致使抗日理论落空，才能保障抗日理论的胜利。过去我们中国人，无疑是把抗日理论与实践分开，造成了极大的错误。今后我们不能再有这种现象。我们决定把抗日的理论与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们要全民动员，长期抗战，马上就要积极努力于唤起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

“我们所争的是最后的胜利，如同我同我的仇敌打交手仗、

我挨几拳头算不了什么，甚至头破血出也没有什么遗憾，只要我的敌人先我而死在我的面前。

“我张学良早有决心，违背国家民族利益的事决不干！反之，又决不惜牺牲！假如说，把我的头割下来，国家便能强盛，民族便能复兴，那我张学良决无所惜！”

张学良还将共产党驻东北军代表刘鼎引为知己，他对刘鼎说：“你在名义上可以作为李杜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代表，也是我的随从军官。你要在东北军内部多活动，多多帮助我。”

从此，刘鼎开始考虑如何帮助张将军把东北军变成一支真正抗日的部队。据刘鼎回忆，在那个时期，张学良主动承担劝蒋抗日的工作，蒋介石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找蒋介石谈联共抗日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不止五次：南方一次，山西一次，洛阳二次，西安一次，几乎达到每月一次。谈话中，蒋介石总要摆出领袖架子，让张学良听他的话。蒋对张说，自己已经吃了共产党的亏，他顽固地认为和共产党合作是不可能的，责备张学良年轻无知，容易受骗。

张学良一向好胜、不肯随声附和，苦口婆心地劝蒋抗日。他对蒋介石说：“日本人步步逼近，自己已把东北失去，再这样下去，军队都不听我的了。”但蒋介石一直不为所动。

七月初，张学良准备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临行前把刘鼎叫到他在王曲的住处，对刘鼎说：“请你立即向你们党中央和毛先生、周先生报告东北军的抗日规划，我马上派飞机送你到肤施。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

翌日，刘鼎乘飞机到肤施。当他步行到安塞小镇时，党中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童小鹏等人已等候在那里。

晚饭后，刘鼎向中央领导汇报了张学良提出的问题，以及

东北军内部情况，军官训练团开办的情况，张学良和晋、平、鲁、川、桂、粤等地方实力派联系的情况等。中共领导对这些问题开会研究到午夜。

最后，毛泽东做了重要发言，大意是：东北军正处在亡省亡家流离西北的地位，由于我党抓紧做他们的工作，东北军由“剿共”工具变成抗日军队是完全可能的。张学良敢在肤施与周恩来商谈，回去又宣传抗日，是大好事。要对张学良作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都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是，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应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劝他抗日，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这时，东方已亮，会议结束了。刘鼎刚要睡下，又被周恩来叫起来，说毛主席要找他单独谈话。毛主席对刘鼎强调说：“当前，我党对东北军的方针是争取团结、联合抗日。任何不符合这个方针的都是错误的。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收集情报，更要做好张学良的工作，使东北军成为一支真正的抗日力量。你不要怕年轻，也不要怕没经验，我们都在做张学良的工作嘛！中央支持你，刘鼎，你这个代表要当好啊！”

刘鼎告别了毛主席后，立即返回西安。这时，张学良已在南京参加完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秘密去了上海，刘鼎又马上追到上海，前往汇报。

在南京会议期间，张学良曾向蒋介石建议：停止剿共，联合抗日。蒋介石不仅无动于衷，反而对张学良严加申斥，并对张学良的“剿共不力”、“阳奉阴违”表示极大的不满。从蒋介石非同寻常的不满中，张学良敏锐地感觉到，另立西北的抗日局面已刻不容缓了。

会后，张学良抵上海并会见了苏联驻华大使，他意味深长地对鲍格莫洛夫说："中国自然非抗日不可，成败与苏联皆有关系，日本野心无穷，苏联终难免其害。与其单独应付困难，莫如中苏订立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

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谨慎地说："如果中国能够团结起来，苏联政府一定会郑重考虑你的意见。"

不久，当刘鼎面见张学良，把中共中央领导人的态度向张将军作了汇报后，张学良深思了好久，说："过去有些人担心共产党讲联合是要以此吃掉对方，真乃'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国民党军队一向互相拆台、互相吞并，司空见惯；而你们共产党是真正帮助东北军，发展东北军的。以后，你就大胆工作，我给你撑腰。"

最后，当谈到推动全国抗日局面早日到来时，张学良说："我以后要尽一切办法劝说委员长，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此时，张学良还接受了刘鼎的建议，发起组织了东北军中的秘密核心机构——抗日同志会。发起人共十五名。他们是：张学良、刘澜波、刘鼎、苗勃然、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卢广绩、车向忱、何镜华、贾国辅，还有高崇民、栗又文、关时润、杨心梅等。后来，陆续参加的会员达七十多人。张学良亲任主席。

"同志会"入会誓词是："我决心参加抗日同志会，遵守组织纲领，服从组织纪律，拥护抗日领袖，艰苦奋斗，不辞牺牲，努力向前，以求达中华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此誓。"

八月间，张学良在西安又成立了类似军校性质的"抗日学兵队"，为东北军培养抗日青年骨干，增加新鲜血液。张学良对"学兵队"非常关心，常去讲话。有一次，他在讲话中很坦率地说："共产党和红军是最可靠的抗日力量，我张学良爱国

绝不后人。我自有主张，决不听人摆布。”

在谈到日本侵入华北，大好河山岌岌可危时，张学良激动地说：“同学们！祖宗生下我们，是要我们做主人，不是要我们当奴隶的！”说到这里，声泪俱下，听者痛哭失声。

杨虎城是国民党西北地区一位重要的军事领导人，是一位抗日爱国将领。

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华北危急时，杨虎城曾向蒋介石要求将十七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了大批弹药。一九三六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当他的爱国要求屡被当局拒绝后，他极为不满。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杨虎城也一直持反对态度。

中共对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很重视，开始得也比较早。一九三五年冬，当杨虎城到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全大会”时，在南方从事地下工作的南汉宸就委托申伯纯到南京去见他。后来，党中央还派汪锋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到西安找杨虎城。

汪锋前往西安与杨虎城谈判时，申明了红军联合抗日的主张，并递交了毛泽东、彭德怀给杨虎城的亲启信。信中说：“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山河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全军之力。鄙人等更愿联合一切反蒋抗日之人，不问其党派及过去之行为如何，只问今日在民族危急关头是否有抗日讨蒋之诚意，凡愿加入抗日讨蒋之联合战线者，鄙人等无不乐于提携，共组抗日联军，并设国防政府主持抗日讨蒋大计。”

经汪锋与之深谈，杨虎城终于消除了对红军的误会，下定了联共抗日的决心。

在西安，东北军和西北军两支不同的旧军队驻扎在一起，

矛盾和纠纷是不可避免的。蒋介石竭力在两军间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制造矛盾。蒋介石对张学良说，只要东北军剿共立功，可以考虑把杨虎城调出陕西；同时又散布张学良有大西北主义思想，要杨虎城注意。蒋系特务人员还在两军下层间制造纠纷。但在联共抗日这个共同政治大方向下，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开诚相见，宛如兄弟，一起商定改造部队，整顿内部，以迎接抗日新局面的到来。

八、九月间，叶剑英作为红军代表常驻西安，协助张、杨改造部队，准备抗日。九月下旬，红军与东北军签订了全面合作的抗日协定。主要内容有：停止内战，武装抗日，保卫中国，收复失地；实现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的抗日联合战线；实现依据民主纲领而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

这一协定的签署，使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结成了巩固的联盟，标志着双方的合作已达到了新的境地。

十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书张学良，再次申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并请他将共产党的主张转告蒋介石，以便互派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共产党抗日救国的诚意，更坚定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决心。

十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与阎锡山会谈。阎表示决心到陕并要求蒋介石联合红军抗日，倘蒋拒绝，则愿联合东北军、红军共同抗日，并愿把绥远的固阳、包头、五原、安北、临河五个县给红军作根据地。

在此基础上，西北的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形成了红军、东北军和十七路军以及阎锡山的晋军在西北鼎足而立的新形势。三者互相联合，三位一体，推动了全国抗日事业的发展。

第六十二章　艳 晚 事 件

1936.8

——“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

——“特务们搞的那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那都是胡说八道。”

——“什么共产党员？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

“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我今天要杀几个人，命令已下，马上行动。想最后听听你的意见。”

八月二十九日晚，张学良把黎天才找来，劈头盖脸、声色俱厉地吼道。

当时，黎天才看到五辆满载武装士兵的卡车已整装待发，谭海、周文章、应德田肃立在张学良身旁，孙铭九手持驳壳

枪，一副杀气腾腾的模样，他不觉大吃一惊。

"为什么？"黎天才惊讶地问道。

"省党部的特务，随便逮捕总部职员，殴打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后，东北子弟随我流亡，我连他们的人身自由都不能保障，太对不起他们了。我准备查抄省党部，救人，杀掉特务行动队长。"张学良怒气冲冲地道。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八月二十九日这天是"艳日"，故此事被称为"艳晚事件"。事件的当事人之一宋黎曾著文回忆，详细谈了该事件的起因：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九日，我接到西安绥靖公署交际处处长申伯纯的电话，暗示国民党特务可能对我们采取行动，要我们加倍小心谨慎。情况危急，我让马绍周速到'总部'政训处找他的熟人弄清情况，以便决定对策。后来才知道，他出去后就被特务逮捕了，羁押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

"马绍周刚走，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几个人进来找我，研究撤换东北中学校长王化一的事。当时我心里很急，考虑他们年纪轻，怕吓着他们，不好明讲，又担心随时可能发生意外，只简略地说了几句就让他们走了。代表团负责人曹富琨（曹裕民）留下来要跟我深谈，我不好推辞。他正在讲着，突然门被踢开，接着闯进两个人，进门就喊：'宋黎！'我一目了然，顺口答：'不在家，出去了！'特务横眉竖目，声嘶力竭地叫道：'就是你！'说完猛扑过来，把我和曹富琨一起逮捕了。两个特务架起我的两只胳膊往外拽，刚出房门，特务头目对他的喽罗宣布：'抓到了共产党要犯！命令谁也不许打电话，不许走露风声，来一个捕一个。'

"这时，爱国民主人士车向忱先生迎面走来。一个特务说：'这个老头来了，逮捕他！'抓我的三个特务分出一个去抓车，

剩下两个特务拖不动我。一会儿，那个特务空手回来造谣说：'车带了枪，赶快先把这个送走。'三个特务把我抬起来，我极力反抗，他们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弄出小院。我趁机猛然挣脱出来，又跑回小院，发现车向忱先生还没逃走，特务追进院来只顾抓我，七手八脚把我拖出西北饭店后门，车先生这才乘机脱身，离开了险地。这时，我发现只有一个特务押着曹富琨，就向他高喊：'快跑！快跑！'曹一转身，从西北饭店前门跑进前院楼上。那里住着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学生代表团十多个人，其中东大代表有景全丰、萧润和等五六个人。因学生较多，特务没敢进去。三四个特务把我抬起来往省党部走。后来听说，有几个学生代表跑出来试图营救我，但没有成功。

"西北饭店与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在一条大街上，相距二里路左右。眼看快到省党部门前了，恰巧十七路军宪兵营骑兵巡逻队迎面而来，我大喊：'土匪绑架！土匪绑架！'巡逻队五六个人跳下马先缴了特务的械，然后喝问：'怎么回事，为什么抓人？'

"特务抢先说：'我们是省党部的，他是刚捉到的共产党要犯！'我赶紧分辩：'我不是共产党要犯，他们是土匪绑架。我叫宋黎，是张副司令请来的东大学生代表，我是副司令的秘书。'

"巡逻队中有人认识我，因为我在西北饭店已住了半年多，负责查店的宪兵知道我的姓名和公开身份，我又去过西安绥靖公署，在西北军中宣传过抗日，因此不少人认识我。一位巡逻队员机智地向特务要逮捕证，特务强词夺理地说没有逮捕证！巡逻队员质问特务：'没有逮捕证为什么抓人？'一个特务趾高气扬地说：'我们是奉蒋委员长命令逮捕共产党要犯，你们别来碍事，不信跟我们一起去省党部问问。'

"特务们蛮横地坚持要把我送交省党部。我强硬地说：'我

是张副司令的秘书，要送就送交张副司令或杨主任。’这时，认识我的那个巡逻队员说：‘他讲你们是土匪；你们说他是共产党要犯。我们管不了这些，我们巡逻队查街遇到此事，都应上交杨主任处理。若不然，杨主任问我们要人，我们怎么办？张副司令知道后向我们要人，我们哪儿去找？’巡逻队长听了后，点头同意，便高声说：‘带走，都上交。’特务们无可奈何，只好如此了。我想，若把我交到巡逻队连部，必得走西大街，从国民党宪兵一团门前经过，倘生不测，这岂不是躲过虎口又进狼窝！我连忙说：‘你们连队处理不了我的问题，干脆送交营部吧，营部离这儿又近。’巡逻队长表示同意。

“不久，宪兵营的营副谢晋生来了。他以特务捕人既无公文又无逮捕证，事先又没和宪兵营联系共同办理为由，严词拒绝交人，特务迫于无奈，提出让他们回省党部取公文来提人，谢营副明白硬顶顶不住，就同意特务回去办理提人手续，借此拖延时间，再想别的办法。

“特务们刚走，大门咣地一声关上了。谢营副走进来让我到他办公室，对我说：‘这件事闹得很大，各方正在设法解救。刚才搜出的东西全在桌子上，你看看，有碍事的就处理掉，特务回来还得要这些东西。’又说，‘你放心，没有我盖章谁也提不走人，不过还得审讯一下，留个口供。’

“过了一会儿，十七路军的军法官李木庵（地下党员，西北特支领导成员）来了。我们一起研究了‘口供’，除了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等俗套外，主要讲我来西安是张副司令请的，一贯奉公守法，不是共产党，我主张抗日，但抗日无罪。

“为了营救我，杨虎城将军决定迅速报告张副司令，由张下令提人，并研究了几条应付省党部的措施。

“张学良将军听到我被捕的消息，愤然说道：‘捉人居然捉到我头上来了！’他一面命令孙铭九去接我，一面由孙铭九派

参秘室工作人员关时润去西北饭店我的住室取筹办学兵队的材料，以免落入特务手中。关去后被守候在那里的特务逮捕了，同马绍周一起押在省党部。张学良将军得知这些情况，既为国民党特务如此胆大妄为而震怒，又担心被捕人的安全，为此断然决定采取军事行动。”

黎天才听完张学良一番发作之后，冷静地认为如此处置极为不妥，便郑重地向张学良谏言道：“泄一朝之忿，解决不了问题。如果立即反蒋，响应绥东，实行抗战，杀几个人也可以。否则，只为痛快，授人以柄，陷自身于不利，可谓小不忍则乱大谋。”

张学良听了颇觉有理，立即从孙铭九手中收回手令，要谭、孙等去外面待命，随即关上房门，握住黎天才的手说：“天才，你说对了。不过这一幕怎样收场呢？”

“那容易。”黎说，“去搜查省党部的特务部门，查抄文件，捉主要特务，全案交军法处依法办理，但避免直接杀人。”

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随即令孙铭九带人去抄查省党部。

同时，张学良认为，在军事行动之前，还得做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的工作。邵力子虽然也是拥蒋的，但他与那些国民党的特务和党棍是有区别的，对他还是应当争取。于是，深夜时分，张学良又把邵力子请到自己的公馆来。

邵力子刚迈进客厅门槛，我一反谈笑风生的常态，勃然大怒道：“省党部逮捕我的学生、秘书和职员，为什么不通过我？我是代表总司令、代表蒋委员长的！我是中央委员，是代表中央的！”

我又说：“你们瞧不起我张学良，就是瞧不起委员长，就是瞧不起中央！省党部这些人算什么东西，竟敢如此藐视我？他们为什么要抓我的人？为什么抓共产党不让我知道？他们怎敢这样大胆妄为？他们居心何在？”

邵力子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连声说："副司令息怒，副司令息怒，这个事我还不清楚，容我查明原委，再来报告。"

我仍怒气未消地说："我决不能容忍，我已派队去搜查，请你负责查明，限天明以前把抓去的人送回我处。"

与此同时，张学良又下令将他的蒋系参谋长晏道刚请进金家巷，关在客厅里，既不接见，也不让他走，以免走漏风声。

后来，张将军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唐教授问："汉公，您对晏道刚印象如何？喜不喜欢这个参谋长？"

晏道刚，还有钱大钧，倒也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简单地说，我那参谋长，实际上就是蒋先生派一个间谍到这儿来作监视的。晏道刚是一个老实人，是一个好人，蒋先生对晏道刚很信任。晏对我的事并不太理会，对我那时的所作所为，他不是那么太注意，他实际上也不知道，一句话，老实人。而钱大钧比他油条，但他会把关系弄好，他圆滑。

特务们搞的那些材料我都看过了，那都是胡说八道。他们特务报告的那些，根本没那回事情。那都是些什么玩艺儿，花那些钱真冤枉！所以，那时，中央啊，这个亏吃大了，对各省都没有好感的原因，就是特务在里头搞的，中央就信那一套。其实人家本来就没有那个事。

特务造谣诬蔑的成分，肯定免不了。但东北军联共抗日的蛛丝马迹，确实也被特务们抓到了。

晏道刚曾回忆说："及到西安三个月后，我知道张汉卿常驻陕北洛川，与延安已有联系，东北军前线官兵与红军时有往来。张汉卿曾派栗又文到新疆去联系，进步人士高崇民经常在张汉卿公馆居住，为张的顾问。这类事情我佯装不知，只劝张不要久驻洛川，免人怀疑，而驻西安的特务们又直接给蒋的情报很多。蒋为表示对张推诚相与，竟把这些报告原文抄送张学良，叫他答复。这时，张学良感到惶恐不安，对我往往诉说东

北军官兵责难他的苦境，但却仍隐讳他个人的真正意图。我见张既然隐讳，亦不便明说，一面安慰张，一面电蒋为张解释。”

七月二十日，张学良给晏道刚一封亲笔函，现将函文抄录如下：

甸樵吾兄：

弟自入关以后，对蒋委员长极端忠诚，弟曾替他解决许多困难，万怨不辞。今日弟处此痛苦环境，这些特务人员对我严密监视，挑拨离间，令人气愤。譬如王曲军官训练团的学员提起‘蒋委员长’四字没有立正，岂是我教给他们的吗？前线官兵与共产党私有往来，这是秘密，我何能知道？我又哪能管这许多？他们甚至说我与共产党曾有联系，真是无中生有。兄自动去电替我解释，爱我之情，不尽感激。

弟 张学良 七月二十日于王曲军官训练团

八月初，东大学生代表宋黎等也已获悉国民党特务在严密监视他们的行踪，宋黎曾直接报告给张学良，并提出要回北平暂避风险。张学良心情沉重，反复思考，最后果断地说：“你们哪儿也不用去，就住在西北饭店，反正我还带兵，可以保证你们安全。”

因此，宋黎等人仍住在西北饭店，直到东窗事发。

八月三十日凌晨，孙铭九率卫队冲进“省党部”大门，救出了正被刑讯的马某等，接着查抄了特务的电台和档案。档案中有许多向蒋密告张、杨的材料，西安群众如何亲共抗日的材料，以及东北军、十七路军中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的黑名单，甚至还有调查邵力子的材料。

清晨四点，邵力子向张学良汇报说：“经省党部委员查明，这事是调查统计室的人办的，有委员长的命令，逮捕刘澜波、栗又文、马绍周、孙大发（达生）四个共产党员。但事先未请

示副司令，是他们的错误，现在托我向副司令请示。"

当时，抄查省党部已经完毕。我对邵力子说："什么共产党员？还不是捏造罪状，诬陷好人！我的秘书我不知道，哪有个方秘书？"

接着，我又说道："很对不起你，深夜惊动，请回去休息吧！"

为了应付蒋介石的命令，张、邵两人商量后，又一度把刘澜波、孙达生（栗又文已被张学良派去新疆）、马绍周抓了回去，先押在军警督察处，后转到剿总军法处。不久，又都释放了。查抄来的文件，张学良派人连夜审阅，其中没有发现他和杨虎城联共的任何情报，这才放了心。

事隔两天，我又找到邵力子，对邵力子说："看过从调统室搜来的文件，才知道您也是他们造谣密报的对象。他们对你我都任意诬蔑，荒唐到了极点，我深信您决不会有像他们密报所说的那些事吧。"

查抄"省党部"后，我为先发制人，主动致电蒋介石，自请处分。电中先述陕西省党部无视我中常委和副司令的地位，径自逮捕西北总部职员，然后说："这是不信任良，不信任总部，群情激愤，迫不得已，遂向省党部索还被捕人员。惟因事出仓猝，未能事先呈钧座，不无急躁之失，请予处分。并拟将马绍周等交总部军法处严加审讯。"

这时，蒋介石尚在广州处理两广事件，无暇顾及，只好隐忍不发，在批复张学良的电报中说："我弟处理此案，殊失莽撞；惟既知错误，后当注意，所请求处分一节，应免置议。至于马绍周等的审查，准如所拟办理。"

张学良把蒋介石批准逮捕的马绍周、刘澜波、孙达生等人送交总部军法处，由江雄风负责审理。

江雄风在西北总部任办公厅情报科科长兼西安市公安局督

察。张学良交代江雄风说，对人犯一不许刑讯，二不得离开西安；同时派人通知被审理人员，要他们在法庭上做斗争。

孙达生不知道张学良的部署，跑到新城杨虎城那里躲藏起来。张学良让孙铭九把孙达生找回来。

"你是不是共产党？"见面后，张学良突然用严肃的口吻问道。

"不是！"孙达生矢口否认。

"是不是有什么把柄落在他们手里？"

"没有。特务抓人哪要什么证据？"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要躲起来？"张又问。

"我没有军籍。"孙说。

"没有军籍，我可以给嘛。"

接着，张学良把他所规定的不许用刑、不许离开西安等审理的条件告诉孙达生，嘱咐孙达生在受审时应有东北人的样儿，在法庭上可以控诉国民党不抵抗和亡省亡家之苦。

孙达生、马绍周、刘澜波等按照张学良的嘱咐应付审判，江雄风当然定不出什么罪名，他们在法庭上还趁机把国民党不抗日大骂一通。事后，张学良赞许了孙、刘两人。

这场被人们称为"艳晚事件"的风波，大长了西北抗日人士的志气，大灭了特务的威风。此后，特务分子的嚣张气焰亦有所收敛。

事件后，总部政训处长曾扩情把东北军不稳的数条情报呈报蒋介石，蒋介石批示："胡说，送副司令阅。"

显然，蒋介石故意卖个面子给张学良，以达笼络安抚之目的。

八、九月间，路过西安的共产党要人潘汉年提醒张学良说，蒋介石不会忘记这件事，要他保持警惕。张学良便请东北元老莫德惠出面，向蒋介石说项。莫老先生追踪奔波了一个多

月，十月才在杭州天竺别墅见到蒋介石，向蒋介石解释此事，并表述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忠心。蒋介石只颔首“嗯，嗯”几声，既无愠色，也无谅解之意。最后，只说了一句：“张副司令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莫德惠察觉不妙，对陪同他前往的总部职员吴家兴说：“看来，蒋是居心叵测呀！你回去要对汉卿说，要多加小心呀！”

“艳晚事件”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一次不宣而战，显示了张、蒋之间在抗日问题上深刻的矛盾。

自肤施会谈后，张学良的思想在急遽变化，他决心为团结抗日不惜一切，甚至与蒋介石彻底决裂。

这一事件，也可以说是西安事变的前奏。

第六十三章　请缨抗战

1936．11

——“我认为打内战肯定调动不灵。要是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挡。”

——“如果蒋介石仍是那样蔑视我的意见，对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要考虑我自已的问题。”

——“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

“居今日而欲救亡图存，复兴民族，良以为除抗日外，别无他途。比来寇入益深，华北半壁河山，几全沦陷，而多数民众咸感觉忍无可忍，抗日声浪渐次弥漫于全国。……总之，就各方而言，欲救亡必须抗日，欲抗日必须全国力量之集中。良



一九三六年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会上，张学良在讲话中悲愤地表示："将率东北健儿披甲还乡，报仇雪耻，驱逐日寇，收复东北。"

此时在钧座指挥下尽剿匪之职责，尤愿早日在钧座领导下为抗日之牺牲。"九月二十二日，张学良电复蒋介石，在电文中反复申述自己的观点。

原来，两天前，陈诚电告蒋介石，说张学良曾向冯庸表示，让冯庸代向陈诚转达"决意统率所部，抗日图存。与其剿匪损失，不如抗日覆没的决心"的电文，陈诚并向蒋介石警示说："汉卿预定出绥远。职意汉卿此举，比两广之抗日，尤为严重。钧座如认为抗日时机已至，则明白领导之。如认为尚非其时，则须力阻之，决不可听之而处于被动，使整个国家陷于万劫不复也。"

当时，蒋介石正在广州进行“两广事件”的善后处理，他用分化、利诱手段解决了粤桂的反蒋行动后，正踌躇满志，准备大举进攻西北红军，以“竟其八年剿共之全功”，因此，对张学良在电文中再三陈情停止剿共、早日抗日，大为不悦，即电令陈诚查明真伪，并电张学良，问：“为何托冯庸转达？”

十月四日，我会见了中共代表叶剑英和潘汉年。我对二人说：“中共《致中国国民党书》恐蒋介石难以接受，最好由中共负责人写一封信给我，先谈停战谈判问题，我再把这封信转给蒋介石。”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即按照张学良的意见联名给张学良写了一封信，文曰：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的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我残杀的内战。……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华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与此同时，张学良获悉西北的红军有困难，当即又拨五万

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信，提出："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元。东北军被服厂还为红军赶制了一万套棉衣及一些食品，并派军车悄悄送到红军驻地。这些钱物不仅接济了红军，还挽救了病情危急中的邓小平。

邓榕后来回忆说："父亲邓小平罹患严重的副伤寒，昏迷不醒，什么东西都不吃，生命垂危。当时任中央红军先遣队政委的聂荣臻把张学良送来的一些罐装牛奶全给了邓小平。正是靠了这些牛奶，才救了我父亲的命。"

这时，红二、四方面军抵达陕甘宁，红军胜利会师。蒋介石气急败坏，乃调兵遣将，兵分数路，准备大打出手。为此，十月二十二日，蒋介石御驾亲征，赶西安视察、督战。

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之到来心中忐忑，原以为军事上无任何进展，蒋介石肯定会大发雷霆。殊料，蒋介石却故作悠

闲、超然的样子，不问西北的军事情况，同张、杨尽谈些他怎样解决广东问题，称赞广东空军人员脱离陈济棠，架机飞往南京拥护他的举动，并极力反驳外间传播的他拿钱收买对方的说法。蒋介石以此来暗示张、杨：反对他的人总是要失败的。

到西安后，蒋介石每天偕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等，登华岳，游终南，看秦陵，逛骊山，纵览西岳风光。他还语带玄机地说，“西岳之胜在于险，一有失误，便会掉到万丈深渊里”，暗示张、杨要“悬崖勒马”。

在游山玩水的逍遥气氛中，有一次，蒋介石问张学良近来看些什么书，张学良坦率回答说，近来看了两本书，一本是《辨证唯物论》，一本是《政治经济学》。蒋介石听后大为震惊，训斥道：“这些书都是苏俄人写的，你看了会中毒的，以后不许你看这些书！你要好好读读《大学》和《曾文正公全集》等书，你把这些读通了，就能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一辈子都受用不尽。”

张学良闻言，不以为然，又不愿辩解，只好一笑了之。

此时此刻，张学良所思所想的，不是什么“大学”、什么“曾公”，而是收复失土，抗日救亡。他在陪同蒋介石一行游华山时，曾借景寄情，诵《华山绝句》一首，诗曰：

偶来此地竟忘归，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山河无恙主人非。

数日后，蒋介石收敛了他悠闲的面孔，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宣布“剿共”计划，要张、杨立即准备、着手向红军进攻。但出乎他的意料，张、杨不但不同意他的主张，反而正式向他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并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见，而是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

官兵的一致主张。

张学良还把毛泽东、周恩来十月五日写给他的信向蒋介石呈送转达。

蒋介石勃然大怒，厉声训斥道："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至于士气，关键在官不在兵，只要当官的身先士卒，士兵们是决不会后退的；如果当官的贪生怕死，畏缩不前，士兵们也是不会认真作战的。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这个道理我想你是懂得的。"

我当时争辩说："委座言之有理，但我认为打内战肯定调动不灵。要是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挡。风吹草动，兵随将走，诚哉斯言！但这个将应是良将，并真正是爱国爱民的，还必须得把路看清楚，若是不走正路走邪路，那就糟了。士兵们因为不明真相，也可能暂时会跟他走，但他迟早是会被抛弃的。再说，你有你的理，他们也有他们的理，譬如他们爱说，日本侵略我们，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殖民地，要把中国的老百姓变为亡国奴和他们的奴隶，这，我们是决不答应的。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时，杨虎城也要表示这样的看法，却被蒋介石制止了，蒋介石断然道："抗日之事，不要偏听'共匪'蛊惑。士气问题，我来解决！"

蒋介石决定深入东北军、西北军，以彰显自己坚强的"剿共"意志和不可动摇的决心，迫使张、杨执行他的"剿共"大计。为此，蒋介石径直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

消息传出后，不少军官向张学良要求和蒋介石辩论，张学良说："只许君子动口，向委员长提问题可以。"

二十七日，蒋介石在蒋鼎文、顾祝同陪同下到了王曲军训团。他登上讲台，一开始就搬出他那套所谓礼、义、廉、耻的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蒋介石（前右）在张学良（前左）陪同下到王曲军官训练团训话。



一九三六年十月三十一日，蒋介石在洛阳四经堂庆祝五十寿辰。图中右二起：阎锡山、蒋介石、宋美龄、张学良。

哲学信条，大讲"军人首先要明礼义，知廉耻，在家要尽孝，为国要尽忠，要服从长官"。

"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蒋介石谬论一大套地说："日本离我们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在家不孝，为国不忠。对那种不忠不孝的人要予以制裁。"

蒋介石顿了一下，又说："共产党不以民族为本位，不论其标榜如何，政府坚决贯彻戡乱方针。"这套谬论使听者恼怒万分，有人已按捺不住，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当晚，"抗日同志会"的苗剑秋甚至致函张学良，要求扣押蒋介石。

十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利用谒见蒋介石的机会，向他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并强调说："中国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就必须联合苏联，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

"你不要说了！"蒋粗暴地说道，"直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士兵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那时再来谈论这一问题吧。"

说到这儿，蒋介石又把口气缓和下来："我们要把局势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别担心，苏联将完全愿意讨论同盟问题，有无红军都无所谓。如果我们首先消灭了红军，我们今后在与苏联谈判时，就能处在一个优越得多的地位。我们的责任是消灭国内的共产主义威胁，首先把中国人民从红色帝国主义手中拯救出来。然后，我们再考虑选择其他的同盟，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抵抗日本。"

张学良这次对蒋介石的劝谏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两天后，蒋介石偕宋美龄飞到洛阳"避寿"。为再次劝说蒋介石停止内战，张学良便邀请阎锡山携王以哲、何柱国同赴洛阳，以祝寿为名，行进谏之实。

我去洛阳前，曾对黎天才说："如果蒋介石仍是那样蔑视

我的意见，对发动抗战毫无诚意，我将要考虑我自己的问题。”

殊料，张学良、阎锡山来洛阳的目的，早已被蒋介石察觉，结果，张学良碰了更大的钉子。蒋介石厉声问张、阎：“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呢，还是你们该服从我？”

为阻止他们的劝谏，蒋介石又在洛阳军官分校讲演，大骂主张抗日者。他说：“你们要知道，日本是皮肉之患，不足虑；共产党是心腹之患，非彻底消灭不可。剿共是我们的既定国策，就是有人拿枪打死我，我也不能变更。”

蒋介石又说：“现在断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张联共，否则就是出卖国家民族，存心与赤匪同声相应，甘为共产党下面的二等汉奸。”

钱大钧看见在台下立正的张学良闻此言之后，面色惨白。会后，钱大钧对何柱国说：“知道内情者，听到此话觉得实在太过火了，希望你劝劝张学良，不要误会。”

当晚，张学良与阎锡山在军校操场上借散步长谈，令随从远处等候。

“汉卿，看蒋先生的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临别时，阎锡山握着张学良的手，老泪纵横地说，“你要恢复你的家乡，我要保护我的家乡，一切得全靠我们自己，蒋先生永远不会采纳我们的抗战主张。今后我们要结成血肉相连的关系，要干就靠我们自己干了。”

回西安时，何柱国在飞机上把钱大钧的话转告张学良。张学良说：“阎百川饱经世故，昨夜劝我不能再和委员长谈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之事了，我已决心不再谈了。”又说，“我现在想干什么，连我的太太也无从知道。”

此刻，张学良深深感到，劝蒋“放弃剿共，早日抗战”，难度实在太大了。他开始考虑劝蒋以外的办法了。

回西安后，张学良对黎天才说：“完了！一切不能靠他

（蒋）了。”

与此同时，蒋介石的态度也日趋恶劣，他开始考虑东北军调防问题。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张学良要求带兵抗日，而不愿剿共，此其做事无最后五分钟之坚定力也。”

我在回答韦尔斯女士访问时说：“如果政府不顺从民意，就站不住脚。如果共产党能够真诚合作抵抗共同的外国侵略者，这个问题（指内战）也许有可能和平解决。”

十一月初，日本决定以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和匪首王英各部为先头部队，首先进占绥远东部军事要镇红格尔图，然后攻下归绥（今呼和浩特），再进犯甘、宁两省。十一月中旬，傅作义部激战七昼夜，保卫了红格尔图，二十四日，又乘胜收复了百灵庙。

此时，各地援绥运动风起云涌，上自达官贵人，下至乞丐妓女，都纷纷捐款支援抗战，全国一片沸腾。

十一月二十七日，张学良向蒋介石发出《请缨抗敌书》，写道：“……半载以来，良屡以抗日救亡之理论与策划，上渎钧听，何蒙晓以钧旨，并加谕勉，感奋之念，与日俱深。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盖深信钧座对于抗日事件，必有整个计划与统一步骤，故惟有静以待命，无烦喋陈，乃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已早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尽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

当这份载着张学良拳拳之心的信由专人送达洛阳蒋介石行辕后，张学良便朝思暮盼，等待蒋介石的批复。十二月二日，洛阳终于回信，《请缨抗敌书》的信头上只有蒋介石用毛笔写的六个小字：“时机尚未成熟。”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参加西安围城十周年纪念大会的张学良（右）和杨虎城（左）。

早在一个月之前，十月二十九日，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曾致电蒋介石，为张学良陈情曰："张副司令心中痛苦，指挥确有困难，万望对于副司令不要督责过严，使他难于忍受。张副司令曾经请求开赴绥远前线抗日，此时，可否考虑将东北军开赴绥远、察哈尔一带，担任抗日前线作战？"

此一电文发出后，据钱大钧透露，蒋介石曾有较长时间的考虑，举棋不定，然终未改变其顽固态度。

现在回头来看，此乃蒋介石之一大失策。若蒋介石当时应允请战，调东北军北上，既能满足张学良强烈的抗日热望，予入侵之敌以痛击，又可使中央军轻而易举地进驻西北，则全盘

棋局顿活，诚如是，蒋介石亦可免西安“翻船”之灾，历史也必将重新改写。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下旬，张学良乘飞机经兰州转飞平凉，在平凉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密商谏蒋步骤。参加会议的人有王以哲、于学忠、高福源、唐君尧等几位少帅的心腹将领，西北军只有杨虎城参加。

会上，张学良谈了蒋介石剿共计划和他个人的想法。他说他曾多次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但均无效果，因而，他准备电邀蒋先生到西安，再作最后诤谏，若其拒绝，将以武装扣留，实行兵谏。

张学良的谏蒋步骤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这是一次西安事变前的准备会议。

“内战我是绝对不打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苦跌打’(coupd'état)。”（法文“政变”之意）十一月底，张学良在西安对叶剑英说。

“蒋介石不抗日，有些人尚未认识到，抓起他来，会出现全国大分裂，人民一时不了解我们，会使我们孤立。”叶剑英冷静地分析说。

当中共方面知道张学良的打算后，曾派人劝说张学良要慎重，但张学良此时已进退维谷。正如东北军将士所言：“我们的副司令已快红了。”

毕竟是血性军人，十二月三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往洛阳，再次向蒋介石痛陈国情，反复阐明只有坚决领导抗日救亡，才可称得上是中国的领袖，才能代表中华民族，才是中华民族之灵魂的道理。同时，恳请蒋介石下令释放以莫须有罪名逮捕的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

然而，两人针锋相对，各执己见，态度极为强硬，交锋仅寥寥数回合，便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第六十四章　哭谏蒋公

1936．12

——“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委员长身为一国之首，也应循国父先例，和共产党联合抗日。”

——“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对于剿共，后来，我也很不同意。我倒不是倾向共产党，我觉得大家都是中国人，剿什么，打什么？可与共产党谈嘛！所以，后来我就主张坐下来谈，不是不能谈的事，何必呢？我就把这意见对蒋先生说了。我对蒋先生说，你剿共也打不赢，你剿不完的。他说，为什么？我说，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共

产党有老百姓支持 我说，你剿不完的。对这件事，蒋先生对我很不高兴。我同蒋先生当时争论的问题是，他是安内攘外，我是攘外安内。

十二月三日，在洛阳时，我与蒋先生两人对时局的争执达到了白热化。

我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蒋："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制，这样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还有什么两样?"

蒋介石气得浑身发颤，他猛地一拍桌子，怒向我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放肆！除了你张学良，没有人敢对我这样讲话！"

盛怒中的蒋介石朝着我继续大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

"你不要以为你的政绩就那么清明！没有人批评你，斥骂你吗?"我丝毫未被蒋介石的气焰所吓倒，不无嘲讽地回敬道："其实骂你的人大有人在，只不过碍于你的地位，别人不敢当面讲就是了。"

事已至此，我也不再有任何顾忌了，逼视着暴跳如雷的蒋介石，忧愤地大声嚷道："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就没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你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地接应道，"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那一套宣传！"

"好吧，学良在西安恭候了！"说完，我扭身便走，门在身后发出砰地一声猛响。

十二月四日，蒋介石杀气腾腾地返回临潼。随同蒋介石一同回到西安的张学良则神情沮丧，郁闷不安。

此时，拥兵二十万的少帅陷入纷乱如麻的矛盾之中：丧父之恨，失土之痛、全国民众的谴责，以及他与蒋介石难以调和的严重分歧，这一切，都搅在了一起。

后来，我在我的"自述"中，有如下的回忆：从洛阳劝蒋返回西安时，心情十分懊丧，对杨（虎城）谈及蒋公难以容纳余等之意见。该时良对蒋公发有怨言，并问计于杨，彼有何高策，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公领导实行抗日之目的？杨反问良，是否真有抗日之心？良誓志以对，杨遂言待蒋公来西安，余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良闻之愕然，沉默未语。彼露有惧色，良即抚慰之曰："余非卖友求荣之辈，请勿担心！不过汝之策，在余有不能之者。"彼遂讥良"乃感情作用，以私忘公"。良答以"容余思考商讨"，请其安心，余绝不向任何人道及彼之意见也。

蒋介石一到华清池，就着手部署对红军的进攻。数十万大军咄咄逼近潼关，战斗机在西安纷纷降落。一时间，天空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

十二月五日，《大公报》主笔张季鸾谒见蒋介石，告曰，时下谣言很多。蒋介石问他："是否已听到了张汉卿与共产党在延安面商、拥护中共一致抗日的消息？"蒋介石又说，"共产党的目的并不在'一致抗日'，这不过是其过渡的手段而已。"

在西安，蒋介石还个别召见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军长、师长谈话，用请客、威胁利诱的办法来拉拢他们，并对他们说："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这最后一战贡献力量。"又说，"有我蒋某在，一定可以带你们打回东北，你们要听我的命令，不可轻信谣言。"

接着，蒋介石即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张、杨选择：一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赴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张学良（左）、杨虎城（中）、蒋介石（右）在临潼华清池合影。

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二是如不愿剿共，即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分别调驻闽、皖两省，将陕甘让给中央军。这两个方案，对张、杨来说，都是极难接受的。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作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思考，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七日，我与杨虎城再次密商停止内战的办法。

“我们再劝蒋一次，他再不听，‘先礼后兵’，那我们也对得起他了。”我说。

杨虎城不同意，一则他认为蒋介石是个死不回头的人，劝不转；二则怕说翻了，露出马脚，蒋介石走了反而不好办。

我坚持道：“看不出蒋有提防我们的迹象。蒋很骄傲，以

为我们只会服从他。或许，蒋认为我们既去劝他，便不会有其他的举动。”

杨虎城不好再阻拦，同意了我的意见。

七日晚上，我再次只身前往华清池谒蒋，痛哭陈词，对蒋介石作最后的“哭谏”。

“陈述什么？”蒋介石慢吞吞地问，“是不是还是洛阳的那些话？”

“是的，还是那些话！”我激昂地说起了日寇的侵略、民心的向背，恳请蒋介石枪口对外，联共抗日。我说：“现在全国老百姓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民心，涣散士气。日寇由占领东北而控制冀察，今又由冀察而进窥绥远。这种节节逼进永无止境的野心，如再不加以制止和反击，将使整个国土全部沦于敌人之手，到那时，我们都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罪人！目前，共产党已一再表示愿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我们有什么理由拒不接纳？据我所知，共产党不但主张抗日，同时还要拥护你为最高领袖，你还将成为全民族的伟大英雄。委员长，学良之陈述完全是从党国的利益出发，没有夹杂任何个人私念。”

我越说越激动，眼泪夺眶而出：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九一八’国难之后，各方怨谤集于学良一身，惟有委员长能够体察保全我。学良向来以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民族的事业，纵使粉身碎骨，也难报答委员长对我的厚待。

“可是，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应当是枪口对外。学良已数日难眠，熟虑深思，认为委员长必须放弃剿共，领导全国抗日。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您宣布，我们必须有两年的准备时间，可现在，五年时间已经过去了……”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张学良与蒋介石合影。

说到此处，我涕泪俱下，泣不成声：

"我们应该认识到，内战的结果，无论谁胜谁败，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自我消耗，无异在客观上帮助了民族的敌人。

"国父孙中山先生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委员长身为一国之首，也应循国父先例，和共产党联合抗日。"

"一派胡言！"蒋介石声色俱厉地打断张学良的话，"你懂什么？共产党那一套我比你清楚。我和共产党合作过，也去苏俄考察过，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当今之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剿共之事耗时多年，现在已到了最后关头！"

蒋介石用手指着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仗打输了，就想投降敌人，和他们搞联合，还有什么军人气节可言！现在我再

对你说一遍，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拿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绝望了。他猛地挺直身子，狠狠地瞪了蒋介石一眼，步履沉重地跨出了房门。

八日上午，我对杨虎城说：“我的劝说失败了。蒋介石还拍桌子和我吵了一阵，你可以再走一趟。如果他再不听，那我们就‘先礼后兵’了。”

十二月八日上午十一时左右，杨虎城来到华清池，诚恳地对蒋介石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是没有出路了。人心是趋向抗日的。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着办，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不宜再对红军用兵。”

听完杨虎城之劝说，蒋介石表面平和，但措辞严厉。他对杨虎城说：“我有把握消灭共产党，我决心用兵。红军现在已经成了到处流窜的乌合之众，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叫邵主席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顽抗，我们以数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是有绝对把握的。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沙漠一带，在那里红军没法生存，只有瓦解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全部解决。”

蒋介石还对杨虎城说：“你是本党的老同志，你要知道，我们和共产党是势不两立的。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

杨虎城见蒋介石如此顽固，自以为是，觉得谈也无用，便郁郁返回西安。

第二天，张学良从杨虎城那里所得到的，仍然是深深的失望。

“老蒋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杨虎城激愤满腔。

“那好，从今往后，我和蒋介石之间，谁也不欠谁的了。”

一种轻松感在我心中油然而生。到现在，我对蒋介石已经仁至义尽，我将再也不带任何私情和歉疚来对待这位委员长老兄了。

"逼上梁山啊!"我仰天长叹道，"虎城兄，现在你我别无选择，惟有依你所言，挟天子以令诸侯了!"

"就凭你一句话了，副司令!"杨虎城将手往胸上一拍，大义凛然地说，"你放心，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与你休戚与共，听你指挥，决不退缩!"

"那么，委员长，别怪我张学良失敬了!"我朝着临潼方向，咬着牙关，挤出了这句话。

九日，是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发动下，东北与西北两个救亡总会组织了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

请愿队伍先到南院门"西北剿总"司令部门前请愿，要求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支援绥东抗日。张学良派参谋长接见学生，对学生的要求表示支持、欢迎，并保证向上转达。

中午十时左右，请愿队伍抵达省政府门前，省主席邵力子出面接见，指责学生干预国政。他此举不啻是火上加油，更加引起学生强烈的不满。在游行过程中，特务开枪打伤东望小学的学生，群情激昂，义愤填膺，决心步行到五十里外的临潼去见蒋介石。

张学良得知后，马上用电话报告了蒋介石，请求他接见游行的学生。

"你这是对学生的放任，让他们闹到我跟前来，那是绝对不允许的!"蒋介石在电话里怒斥张学良。张学良怕出事，立即乘车追赶游行队伍至十里铺。

大队行至十里铺，临潼蒋介石行营已得到消息。蒋介石派侍从室组长乘汽车前来阻止，对学生说蒋介石明天进城来答复，你们不要前往临潼，如果不听，到前面发生了事，我们不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
密嘱陕大公报记者发
表以下之消息：
蒋鼎文、卫立煌先后到
西安，闻蒋鼎文为
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
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
边区总指挥，陈诚以军
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
中央军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
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
发表为要。
中正 十二月九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九日，蒋介石致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信，准备撤掉张学良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职，另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司令。这封密信西安事变后被张学良查获。

能负责。其实，在十里铺，蒋介石已布置了军队，马队已排满街上，高地架设了机关枪，走在前面的学生交通队已被扣留，形势甚为紧张。

正在相持的时候，张学良乘汽车赶至，要求与群众说话。他说："各位同胞，各位同学，你们的救国热忱，我是非常钦佩的，但是今天时间已不早，路程尚远，而临潼又无餐宿之地，太辛苦了，不如请大家转行回去，把你们的请愿书交给我，由我代你们转向蒋委员长陈述，这比你们自己去还要快些。"

群众说："蒋委员长是全国党政军权最高统揽者，必须他

亲自答复我们的请愿，方能相信。临潼虽无大队餐宿的地方，我们宁愿不吃饭，宁愿集体露立达旦。救国之事，还怕辛苦吗？”

张学良见群众意志已决，难以挽回，又对群众说：“你们的救国志愿，我并不来阻挠，只是政府不满学生干预国事，你们此去必触动最高主权者之怒，我为爱护你们，不忍见你们去流血牺牲。”

站在前列的东北大学男女学生听到要流血牺牲的话，高呼：“我们愿意为救国而流血，愿意为救国而牺牲，死在救国路上是光荣的！”遂放声大哭。女学生相继号哭，由队头至队尾，万余人都哭起来了。群众连哭带喊道：“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愿为国而死，我们前进吧！”一时哭声喊声震动山岳，道旁停观的行人，也跟着一起流泪。张学良随从的马弁也在拭泪。这时情绪的凄惨和哭声的悲壮，任何铁石心肠的人都不能不动感于怀。

至此，我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感，亦掩面而泣，继续向群众说道：“各位同胞、同学，我张学良不是不救国的，我的心情是和你们一样的，自从失掉东北四省，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无不骂我张学良。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我不是愿做亡国奴的人，我与日寇有杀父之仇，是不共戴天的，我的最后一滴血，是要流在抗日战场上的。请你们大家相信我，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准有满足你们心愿的事实答复你们，请你们今天暂行回去，我不欺骗你们。同学们，我是国家的军人，我不是蒋某人的走狗，如果逾期欺骗你们，我张学良愿意你们群众在任何地方把我处死。你们相信我吧！”

群众见张学良有如此恳挚的表示，遂应允他的要求，回去听候满意事实的答复了。时天已近黑，群众自晨六时至午后七

时未进粒米，但却精神焕发，毫无倦色，而且个个都像得了胜利似的。尤其是小学生及女学生队伍行列，秩序井然，自晨至晚，无一中途离队者。大队入城时，他们脸颊上的救国热泪尚未尽干，见者无不为之感叹。

当天晚上，我与委员长谈话。他先骂我是两面人，怎么可以又代表他又代表学生？这我已有些不高兴了。

“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上？”蒋介石训斥道。

“不，不是这样的，”张学良尽量心平气和地说，“我没有为他们辩护。据我了解，他们只是要求政府抗日，并无恶意。我曾亲自到现场查看了，他们不是捣乱，都是纯洁的爱国青年。”

“什么，爱国青年？”蒋介石冷笑道，“我看结论还是不要下得太早了吧！爱国不爱国，不是光看唱高调，而是看行动。当学生的，不好好读书，动不动就干预国事，示威游行，有的还破坏交通，冲击政府，甚至聚众殴打政府官员，试问，这是什么爱国行动？”

“不过，这次示威游行，秩序还好。”

“不，不！这个我不管。今后不许再胡闹，今后不管在哪里，凡发现有搞示威游行而又不听劝阻的，就坚决镇压，就用机关枪扫射！”

我听蒋先生说这话，真的火了，就想说，有机关枪为什么不让去打日本人？可我话到嘴边，终于没有说出口。

但是，当双方为“抗日”还是“剿共”激辩到最后时，我实在忍无可忍了，便愤然道：“打内战，打内战！优秀的将才一个个战死沙场，再这样下去，你这个委员长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

蒋介石闻言，脸色骤变，手指着张学良训斥道：“全中国

只有你一个人敢这样诬蔑我！你这是犯上作乱！”

谈话自然无法进行下去。这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赶来拉开了张学良，才没有使这次争执愈演愈烈。

望着张学良气呼呼远去的背影，蒋介石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嘘叹。

至此，蒋介石彻底认为张、杨已不可相信了。

按原定计划，蒋介石将于十二月十二日离开西安，而那以后，西北整个“剿匪”局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不出三五个月，共产党将在陕北被歼灭殆尽。

十日，蒋介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仅限于他的嫡系将领，会议确定了第六次“围剿”计划，预定十二日上午公布，并决定将张学良撤职查办，调离东北军，逮捕在西安的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

形势异常险恶，气氛令人窒息。

刀出鞘，箭上弦，图穷匕首见。

双方都在磨刀霍霍，两派皆与时间赛跑。

第六十五章　临潼捉蒋

1936.12

——“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千难万难，今夕要见它个分晓！”

——“你这个老头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

——“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

我要造反！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已决定扣蒋！

十二月十日，张学良紧急召见了东北军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孙铭九、于学忠等几员主将，开宗明义地向他们宣布捉蒋决定。

最初的震惊过去之后，人人都摩拳擦掌，沉浸在即将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巨大兴奋之中。

“我们跟着副司令干！插旗杆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军

长于学忠挺直身子，手往胸口一拍道。

我当时审视着这几位亲信部下说："那好，天不打雷我打雷，非达最后目的不罢休。话我不多说了。此举成功，是大家之福，是中国之福；如不成功，由我担着，我张学良提着头进南京！"

众将领一一向张学良敬礼告别，回去部署部队。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的张学良。

此时此刻，张学良心潮澎湃，激动万分。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杨虎城两度来到张学良官邸，对兵谏详加部署：张学良的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和一〇五师师长白凤翔、团长刘桂五负责扣押蒋介石，封锁西安至临潼的交通；驻兰州的东北军须同时解除驻扎在那里的中央军武装，并控制停在兰州机场上的所有飞机；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负责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军政要员，解除西安城内蒋介石嫡系部队、警察和宪兵的武装，并负责关闭西安机场，控制住所有飞机。

捉蒋成败，事关重大，谁为最佳捉蒋人？

张学良选中了白凤翔师长、骑兵团长刘桂五和卫队营长孙铭九、王玉瓒。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左）与杨虎城（右）合影。这是两人最后一张合影。

“我待你怎么样？”张学良劈头便问出身绿林、有胆量有忠心的刘桂五。

“副司令这样问是什么意思？我本来是该死的人了，副司令不但没有叫我死，还让我当上了团长，我还有什么说的呢。”刘桂五不知何事，脸色顿变。

“我今天给你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你去刺杀杨虎城，你敢去吗？”张学良严肃地说。

“敢去！”刘桂五毫不犹豫。

张学良紧盯住他的脸，并摸了摸他的胸膛，他面不改色心不跳。

“我领你去。”张学良立即起身说道。

“你不要去，太危险了！”刘桂五说。

“我不去，你见不着他，马上走吧。”张学良催促道。

“不是去绥靖公署吗，怎么向远处开？”途中，刘桂五纳闷道。

“我不是要你去刺杨虎城，”张学良低声对刘桂五说，“杨虎城是我们风雨同舟的兄弟，我是领你去刺蒋介石，你敢去吗？”

“敢去！”刘桂五毫无惧色地答道。

“不是要你去刺杀，而是要活捉他。”张学良见刘桂五仍面不改色，便进一步对他说，“请他不要再打内战了，要枪口对外，收复失地，我们要打回东北老家去！”

“这很好，”刘桂五说，“但我没见过蒋介石，不认识，怎么办？”

“今天我就是要领你去见见蒋介石，认识一下，先熟悉一下情况。”

车至临潼，张学良把刘引见给蒋介石，介绍说：“这是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部下的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作战勇敢，与共产党多次交锋，很有成绩，是剿共的猛将。”

蒋介石很高兴，握手命坐。张学良乘机外出散步。蒋介石问刘桂五家庭情况，对刘桂五夸奖一番。不久，张学良回来问："委员长还有什么事没有？"蒋答："以后再谈。"张学良即偕刘桂五返回西安。

后来，刘桂五曾对人说："张副司令胆真大，那天，我要把他出卖了怎么办？"话锋一转，他又向朋友们说，"我刘桂五是拥共反蒋、主张抗日的人，我不能做忘恩负义、出卖抗日将军张学良的罪人。"

为了成功地活捉蒋介石，张学良想了很多办法，做了十分周密的部署。十一日下午四时，张学良又把在华清池担任保卫蒋介石任务的卫队营第一营营长王玉瓒叫来。

"我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要抓活的，不许打死他。"张学良脸色严峻。

"保证完成任务！"王营长信心十足地说，"蒋介石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也不过数十人，我以步、骑两连三百多人的兵力包围之，保证捉来。"

"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作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要互相协助，切实作好这件事。"张学良再三叮嘱。

同时，张学良还命令王玉瓒及其所带领执行任务的人，都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蒋介石侍卫穿的黄色军装有所区别。然后，又交代王玉瓒说："具体事情由谭海副官长再告知你。"

"捉蒋"将领出发之际，张学良又叫住全副武装的卫队营营长孙铭九，反复叮咛说："一定要把委员长平安带回城里，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开枪。一定要把委员长活着带到！"

"请副司令放心，完不成任务，我决不回来见您！"孙铭九一个立正，胸有成竹地道。

就在当天下午，住在西安的陈诚觉察到西安情况有异，慌

忙赶到临潼，劝蒋暂避。但蒋介石认为，中央军威力强大，又近在咫尺，张学良在西安无重兵，断不敢有何异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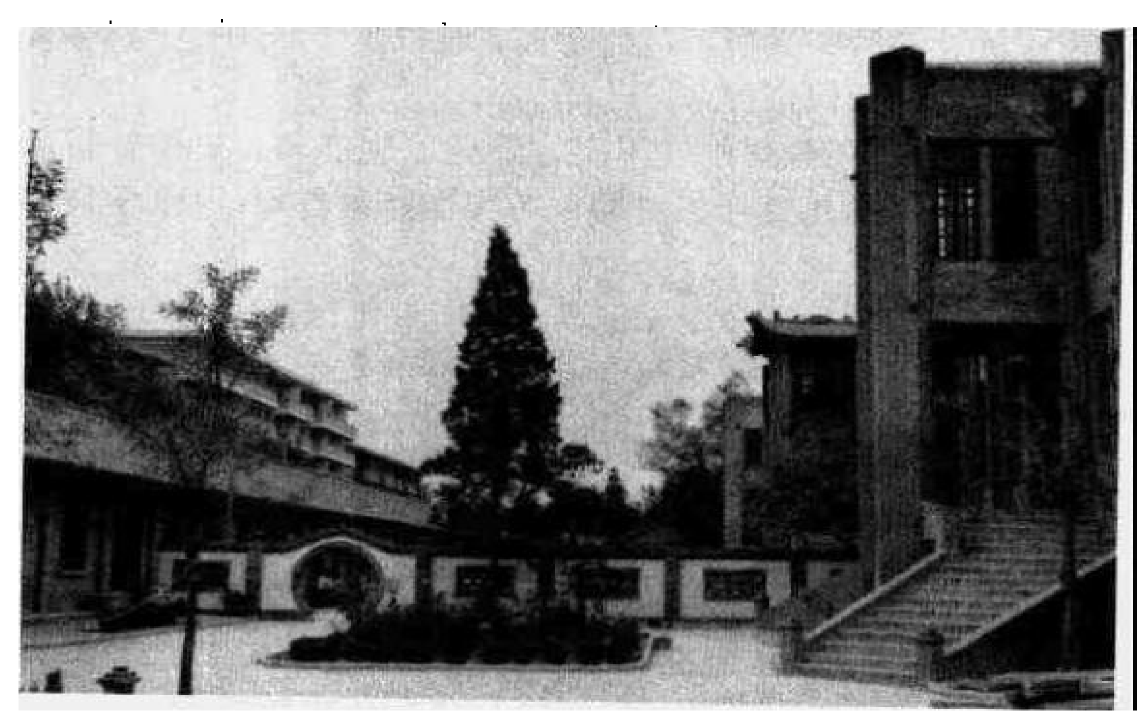
蒋介石为探查虚实，当晚七时特请张、杨吃饭。张学良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后，颇为紧张，急与杨虎城密商，最后决定张学良前往临潼赴宴，杨虎诚以待客为名留守西安。

“虎城为何没来?”蒋介石见到张学良后，当即问道。

“我俩今天做东请客，请帖已发出，无法改期，他留家中待客，要我来向委员长致歉。”张学良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蒋介石点了点头，似已不疑。

此情形，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是晚召张、杨、于各将领来行辕会餐，商议进剿计划。杨、于均未到，询之张汉卿，则知彼亦于今晚宴来陕之中央军政长官，杨、于先在西安招待，俟此间餐毕，将邀诸人同往也。汉卿今日形色匆遽，精神



西安金家巷张学良公馆。

恍惚，余甚以为异。”

晚上十点左右，张学良自临潼返回西安，先回到金家巷公馆，旋后又参加了杨虎城、于学忠宴请中央大员的宴会。零点前后，宴毕，张学良在官邸召集了东北军将领会议。

此刻，张学良已是全身戎装，腰佩手枪、短剑，显得英武、威严。

我临离居室之际，转身朝愁眉不展的赵四一字一顿地说："小妹，我张学良活到现在，今晚也许是最有价值的时刻。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千难万难，今夕要见它个分晓！"

这是值得历史再三回眸的一刻，也是东北军军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张学良一出现，众将领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董英斌、黎天才、唐君尧、白凤翔、米春霖、黄显声等人，唰地起立，焦灼的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他们敬重的少帅。

我慷慨陈词，四壁被震得嗡嗡作响："我们东北军亡省亡家，又背上了不抵抗的骂名，为全国人民所不谅解，这几年的闷气，我们实在受够了。几年来的事实证明，不抵抗是完全错误的。十月间在西安，十一月在洛阳，最近在临潼，我多次向委员长痛切陈词，反复说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必要，要求他领导全国抗战；只有先抗日，然后才能统一，不能先安内而后攘外；只要抗日，共产党和红军的问题是可以用政治方法解决的。这些请求都遭到委员长的严词拒绝，并受到他声色俱厉的斥责。现在他硬逼着我们去打内战，不服从他的命令就要把我们调离西北，要赶我们去福建，再一口口把我们吃掉。我们实在忍无可忍了！我们东北子弟是有血性的！话已经说尽了，我们已被逼上了绝路！"我仰天长叹了一口气，然后抬起手腕看了看表，又说，"经过我和杨主任反复商量，明晨五时采取行动，用强制手段请委员长到西安城里来，逼他抗日。我的指

挥部设在新城，与杨主任共同指挥。现在我命令：'今夜西安、临潼同时行动，采取非常措施，扣留委员长，迫他停止内战，宣布抗日！'"

全场一片肃静，众人心中均是雷电滚腾。

"抓住蒋介石以后，第二步怎么办？"于学忠和米春霖几乎同时问道。

"捉了以后再说。"张学良直视着两人，"只要他答应我们抗日，我们还拥护他做领袖。如果不答应，反正他在我们手中。"

午夜十二时，张学良率领手下的十一员大将，乘车来到设于新城杨虎城公馆的指挥部。大厅内，灯光雪亮，一片辉煌。两位主帅只简单地握了握手，便分别落座。

"虎城兄，"张学良突然打破寂静，两眼直视杨虎城，"现在还来得及，要是不干，你就把我和这十一员大将都给捆起来，到南京升官领赏！"

"张副司令，"杨虎城倏地站起来，"我杨某决不是那种人，今晚是干定了！"

"好！"张学良一拳砸在扶手上，"今晚的事我打头阵，我背后是虎城兄。要是成功了，是我二人的联合行动；失败了，我听任杨将军的处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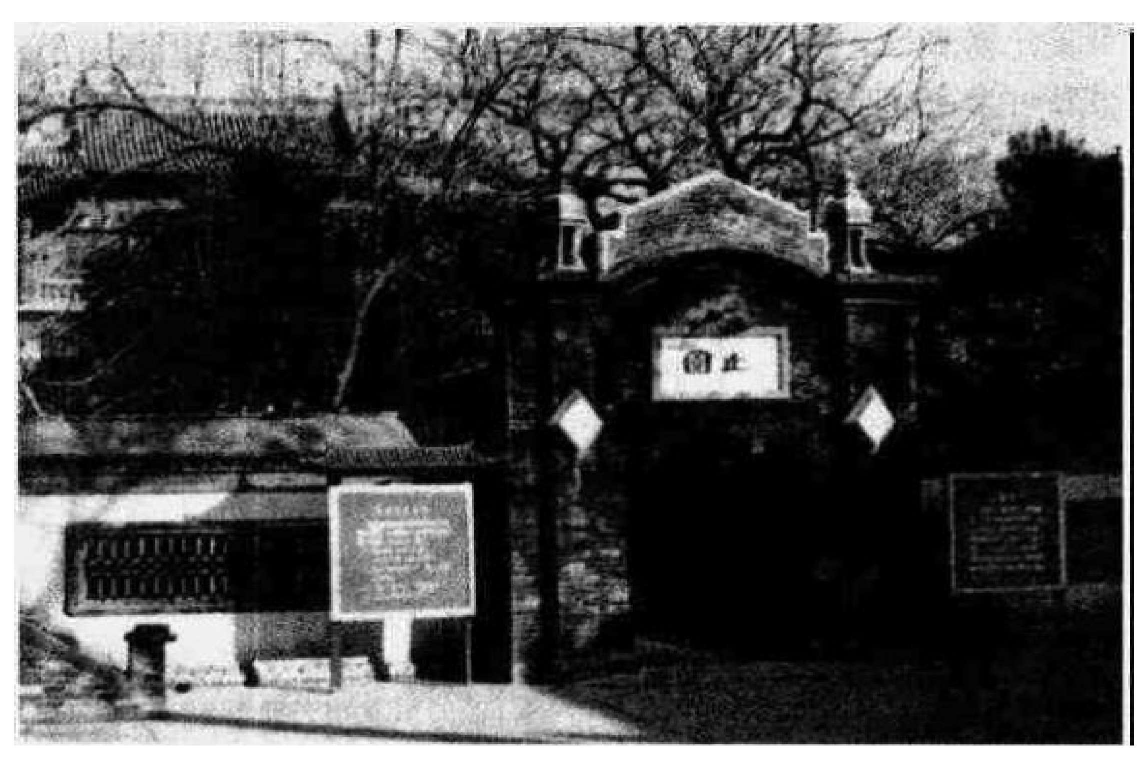
听了这肺腑之言，杨虎城禁不住心头一热。

凌晨五时许，从蒋介石下榻的临潼方向传来了隐隐约约的枪声。张、杨二人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相视着点点头。随即，西安城的夜空，升起了一串串红色的信号弹。

晚年时，张将军曾向唐德刚教授叙说了此时此刻他自个儿的心情。

我当时心里在想，你这个老头子，今天我要教训教训你！

临潼捉蒋，内线指挥官由一〇五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担任；战场指挥官是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骑六师师长白凤翔、



西安新城杨虎城公馆。

团长刘桂五则率孙铭九的卫队营直捣虎穴，去执行捉蒋任务。

凌晨五时许，华清池方面动手了。王玉瓒、孙铭九首先劝说蒋介石的警卫打开大门，但遭到拒绝。孙铭九手枪一挥，下令士兵们硬冲。蒋介石的卫士大惊失色，双方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激战。硝烟弥漫，弹如飞蝗。

激战中，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率领一队精兵穿过假山小道，直扑蒋介石下榻处，冲进卧室一看，房内已无人影，桌上放有一条武装带，一套特级上将服，还有一副假牙。刘桂五、孙铭九大吃一惊，忙伸手去摸床上的被窝，发现里面尚有余温，显然，蒋介石并没有走远。

"搜，快搜！"孙铭九把枪一挥，下令道，心里却在咚咚打鼓：四下里枪战正酣，要是蒋介石被乱枪打死，自己怎么回去见张副司令？

此情此景，蒋介石在《西安半月记》中曾这样写道："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少顷，侍卫官竺培基及施文彪来报：'叛兵已蜂拥入内，本已冲过第二桥内，被我等猛射抵御，死伤甚多。'余问：'叛兵如何形状？'答曰：'戴皮帽子，皆是东北军官兵。'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此墙离地仅丈许，不难跨越；但墙外下临深沟，昏暗中不觉失足，着地后疼痛不能行。约三分钟后，勉强起行，不数十步至一小庙，有卫兵守候，扶掖以登。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东行进。山岭陡绝，攀援摸索而上。约半小时，将达山巅，择稍平坦处席地小憩。"

当没有找到蒋介石的消息传到新城指挥部时，张学良脸上陡然变色，向众人道："若找不到委员长，我便把自己的头割下来，请虎城兄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为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那我张学良岂不就成了千古罪人？"

"别忙，别忙！"杨虎城连连相劝，"看看老蒋的汽车还在不在？"

当电话里报告说老蒋的座车仍在车库里时，众人松了口气。凭着对蒋介石体力、对周围地形和时间因素的综合分析推算，蒋介石根本不可能逃远。

张学良再度拿起电话，跺着脚，向刘多荃、白凤翔下令道："告诉孙铭九，若是上午九点还找不到委员长，就把你们

的头给我送来!”

“捉蒋”的细节，身临其境的孙铭九有如下详尽的回忆：

“此时天色即将全明，可以看清地形地物了。我同士兵一起急往山上搜索，恨不得将蒋介石一把抓住才好。忽然跑在我前面的陈思孝喊道：‘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呢，在这里呢！’我应声赶紧跑上前去，只见蒋介石刚从洞里出来，弯着腰扶着石头站在洞口边，卫队营的卫士们四面包围，拥挤在左右。发现蒋的陈思孝和卫士们报告说，我们先看见这块大石头旁边像有人在走动，我们沿这个方向搜索至大石头旁，见洞里蜷伏着一个人，便喊道：‘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出来就开枪了！’里面连忙回答：‘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不要开枪！’随后便钻了出来。

“我走到蒋介石的面前，只见他全身冻得发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赶紧避开，说：‘你打死我吧。’我说：‘不打死你，叫你抗日！’此时，蒋的脸色苍白，赤着双脚，上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穿一条白色睡裤，浑身上下都是尘土。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我回答说。

“‘啊，你是孙营长，你就是孙铭九？’

“‘是我！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嗯，我知道，有人报告我的。’蒋可能看出我不伤害他，便说，‘你是个好青年，你把我打死好了，你打死我吧。’

“‘副司令要委员长领导我们抗日，没有叫我打死委员长。’我解释并催促蒋说，“委员长快下山进城吧，副司令在那里等着你呢！’

“蒋一歪身子坐在地上，发怒地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蒋的腰痛是真的，是他从五间厅往外逃跑翻越

后墙时摔的。

“我见蒋不走，便劝他：‘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赶快下山去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还是不动，并要马骑。我示意左右卫士把蒋从地上挟架起来，拥推着下山了。来到华清池，蒋又不愿意进西安城。我和几个卫士便连推带拉把他弄上了小汽车。我也上了车。

“在车里，我坐在蒋的左边，唐君尧坐在蒋的右边，前面是副官长谭海和司机。蒋皱着眉头刚说出‘太挤了’一句话，随即又把话咽了回去。”

进入西安城时，坐于车内的蒋介石发现，街上所有的军队都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他怀疑东北军已解除了十七路军的武装，并穿上了他们的军服以混淆视听。

当汽车直驰新城大楼杨虎城司令部时，他更是困惑不解在蒋介石看来，杨虎城的十七路军与张学良的军阀队伍不同，杨绝不会与东北军一道背叛他，但现在看来，张、杨定是合谋无疑了。

蒋介石一声长叹，仰靠在汽车座背上。他精明一世，怎么就没有想到张、杨竟会联手对付他委员长呢？

在捉蒋的同时，杨虎城的部队解除了宪兵第二团、陕西省保安处、省会公安局、别动大队和西安城内外中央系统零星部队的武装，省会公安局长马志超化装潜逃。

十七路军还控制了飞机场、火车站、银行、邮电局等；扣留了停在西郊飞机场上的五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及空军人员；包围了西京招待所，逮捕了住在那里的蒋系军政大员十余人，连同他们的家属、随员、卫士共五六十人，集中在楼下大客厅中。逮捕时，唯邵元冲不听制止，跳窗外逃，被击成重伤，送医院不治身亡。

搜捕这些大员后集中点名时，发现少了陈诚。原来，他身

带处分张学良、杨虎城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迅速撕毁了文件投入抽水马桶里，用水冲走，然后逃入地下室。当士兵搜查时，发现他在一个垃圾箱下面，遂被揪了出来。

点过名后，即把中央军政大员与他们的家属、随员等分开看管。此外，还逮捕了总部参谋长晏道刚、陕西省主席邵力子等人。

兰州方面，张学良发密电，通过五十一军参谋长刘忠干搞“兰州事变”，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事变的第一步已经成功，久悬于张学良心头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一种难于支撑的疲乏，令他不由自主地跌坐在身后的沙发上。

大幕是拉开了，可收场戏该怎么演呢？我缓缓起身，毅然向众将领说道：“我和虎城兄胆大包天，把天给捅了个大窟窿。现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掌握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要负责。事不宜迟，有几件事必须马上着手：赶快筹划起草文件；打电报给陕北共产党，请他们派人来西安；军事方面，组织一个参谋团；政治方面成立一个设计委员会，现在就动手！”

“好，就按张副司令说的办！”杨虎城朝众人做了个手势。

新城指挥部立即又处于紧张和忙碌之中。

众将领为这次事变正式确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称——“兵谏”。

第六十六章　西安事变

1936.12

——“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

——“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

——“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委员长，您受惊了。”

十二日上午九时，我身着上将戎装，神态自若地走进了禁闭蒋介石的房间。

蒋介石闭目端坐，不吭一声。后来竟干脆将脸扭向一旁，不予理睬。

我提高嗓门说道：“我们依据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

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抗日力量，坚决抗日，以争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你不要叫我委员长！我不是你的长官，你也不是我的部下！"蒋介石色厉内荏地冲向我。

"我当然是委员长的部下，我惟一的目的就是拥护委员长抗日。"我诚恳地说。

蒋介石说："既然是这样，你立刻送我回洛阳。否则法币、公债都要完了，经济崩溃了，抗日也就无从谈起。"

我禁不住有些恼："委员长，今日之事，恐怕要有个明确交代。东北军、西北军将士莫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委员长不视下情，坚持偏见，那，只有让民众公裁了。"

"公裁？"民众公裁几个字一出口，蒋介石脸上顿时变色，"过去我对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民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国家，还是先把我送回洛阳！"

上午十点，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已传遍了西安城。人们成群结队，一边游行一边高呼："打倒蒋介石！""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各救国团体一致呼吁全国各界代表齐聚西安，共商抗日救亡大计。

远望着大街上兴高采烈涌动的人流，张、杨二人的心情反而越来越沉重了。他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怎样处置蒋委员长？

直到这时，张学良和杨虎城才意识到，当初他们过于注重如何捉蒋的细节，而忽视了捉蒋之后的行动，眼下要想迈出这第二步，是何等的艰难。

十二日上午，张、杨宣布成立西北抗日临时军事委员会，

由参谋团和作战处拟定军事防御计划，调动部队在赤水、西安之间构成七道防线，以防御中央军的进攻。

与此同时，张、杨两将军领衔通电全国，陈述了捉蒋“兵谏”的动因和目的，提出了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先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

“对不起，让诸位受惊了！”我朝众人笑着拱手道：“我对你们毫无恶意，只是同委员长争政治主张。”

接着，我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

张学良宣读如下：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暴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当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现在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宣读完后，又说："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

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董英斌、缪澄流、钱大均等都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份通电，但却未置一言。此次被扣，是他生平遭遇的最大挫折，他反复思忖，料定自己必死无疑。

"美龄吾妻：余决心殉国，经国、纬国吾子即汝子，望善视之。蒋中正。"十二日下午，蒋介石所写的一份"遗嘱"式的电文，转到了张学良手中。

遗嘱的内容，有关资料在文字上说法不尽相同，而且有的还谈到，他不光是给宋美龄写，还另给两个儿子也写了遗嘱，内云："经国、纬国吾儿：余只承认宋美龄为余唯一之妻，务望汝等以生母待之，则余虽死于九泉下亦瞑目矣！蒋中正。"

张学良看罢，摇头苦笑。他知道，委员长这次是执意硬抗了。思忖良久，他首先致电宋美龄，电文如下：

蒋夫人赐鉴：

学良对国事主张，当在洞鉴之中。不意介公为奸邪所误，违背全国公意，一意孤行，致全国之人力、财力，尽消耗于对内战争，置国家民族生存于不顾。学良以待罪之身，海外归来，屡尽谏诤，率东北流亡子弟含泪剿共者，原冀以血诚促其觉悟。此次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介公以国家最高领袖，当有以慰全国殷殷之望，乃自到西北以来，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青年救国运动，反横加摧残。伏思为国家、为民族生存计，不愿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大义当前，学良不忍以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妥为保护。耿耿此心，可质天日，敬请夫人放心。如欲来陕，尤所欢迎。此间一切主张，（以）文电奉闻。挥泪陈词，伫候明教。

张学良叩

接着，张学良又给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拟了电文：

绥东战起，举国振奋，乃介公莅临西北，对于抗日，只字不提，而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弟陈辞再再，置若罔闻！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私害公，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

张学良在致宋子文电中称："此间所有举措，皆为增强抗战力量，决非从事内争。"

这些电报，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和第二次国共两党的合作，起了促进作用。

扣蒋以后，为了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张、杨曾先后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邓宝珊、李烈钧、阎锡山、程潜、唐生智等，请他们亲临西安，共商国是。同时还决定分别


解放日報

解放日報社啓事

西京日報社啓事

張楊發表對時局宣言

八項主張要求全國採納

蔣委員長在兵諫保護中

但安全問題可保無慮

西安事变第二天创刊的《解放日报》。

向两广、山西、山东、绥远派出代表，说明兵谏真相和抗日救国的主张，以争取他们的援助。

“汉公，西安事变中，您对阎锡山的印象如何？有一个说法，说西安事变时，阎锡山给你发了一个电报，要你下手杀掉蒋介石，有这回事吗？”唐德刚教授问道。

阎锡山这家伙老谋深算，我非常佩服他，同他打交道，没有什么感情上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同情不同情的问题。

没有，我没收到这个电报。换句话说，我记得没这个事。那个时候，你知道，西安事变后我忙得不得了，要应付各方面的事情，一连好几天我晚上几乎没有睡觉，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阎锡山发来了电报，那也不能说他是扯后腿反悔了。你知道，政治这事是变化不定的，他自个儿要留个地步，干政治这

个事，就像汪精卫说的那样，不一定是实在的。

事变次日，我对“剿匪”总部全体人员作了一次语重心长的讲话：“我们这次举动，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一切都是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对蒋委员长绝没有私仇私怨，我们绝不是反对蒋委员长个人，我们是反对他的主张和办法，使他反省，正是爱护他。

“如蒋能放弃错误主张，主持抗日工作，我们绝对拥护他，服从他！”

有的书上说，这时，东北军交通处长蒋斌突然叛变，扣下有十九人署名的致全国各界的通电，并向南京密报。但据蒋之同僚郭维城后来回忆，这纯系少壮派的诬蔑和陷害。

发自西安的一切消息均被封锁了，张、杨抗日民主的政治纲领在外界鲜为人知。与此同时，南京宣传机构则捏造了大量谣言，一条条有关西安的骇人听闻的消息发往全国和世界各地。

谣传中，西安被描绘成了一座疯人院，而张学良在世人眼中变成了一个具有其父遗风的绑票土匪。除广西等少数地方实力派之外，国内外当时对西安事变的反应，大都是对张、杨的规劝、谴责甚至警告，其总的倾向和要求是尽快释放蒋介石。

这种近乎一边倒的舆论，使张学良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诸要员极为惊恐，乱作一团，出现了讨伐派与主和派两种对立的意见。

以何应钦、戴季陶、居正、吴稚晖、朱培德等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兴兵讨伐，其理由冠冕堂皇：“政府决不允许只考虑一个人的安危得失，而损害国家的利益和尊严。”换句话说，即便牺牲蒋介石，也决不妥协。

李烈钧、孙科、冯玉祥等人，为蒋介石的安全着想，主张和平解决。

由于主张讨伐的占多数，遂通过了两项决议：（一）由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由何应钦指挥调动军队；（二）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委会惩办。

十二日，宋美龄正在上海。十三日晨，她赶回南京，对何应钦主张讨伐的决定极为不满。宋美龄为蒋的安全着想，认为：武力讨伐“非健全之行动，余个人实未敢苟同，因此，立下决心，愿竭我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

十三日早八时，宋美龄即电告张学良，拟派端纳飞往西安。端纳既是张学良的外籍友人，又是蒋介石的顾问，是双方最理想的调停人。

十四日下午，端纳和黄仁霖两人从洛阳起飞到西安，他们带来宋美龄给张学良和蒋介石的信各一封。给张学良信的大意是，希望张学良顾全与蒋介石个人的公私关系，顾全国家大局，予以考虑。

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宋美龄这样写道：

“夫君爱鉴：昨闻西安之变，焦急万分。窃思吾兄平生以身许国，大公无私，凡所作为无丝毫为自己个人权利着想，只此一点，寸衷足以安慰。

“你脾气不好，你心中的话总不肯好好地说给部下听，同时你也不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东北军都是亡省亡家的人，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很好地加以安慰。可是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事情来了！我现在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意亲自去西安一趟。

“目下兄所处境况真相若何，望即示知，以慰焦思。妹日夕祈祷上帝赐福吾兄，早日脱离恶境。请兄为国珍重。临言神往，不尽欲言，专此奉达，敬祝健康！

"祈求上帝赐福于你。最后告诉你一句话：南京的情形是戏中有戏。"

当天下午，端纳便抵达西安，见到了已明显有些憔悴的张学良。

"蒋先生的安全怎样了？"简短的寒暄之后，端纳便单刀直入地问道。

"要是蒋先生不安全，我会在机场点火欢迎你降落吗？"张学良微微一笑。

"少帅的人格，我是最相信的。"端纳心中踏实了许多，也随之笑了起来。

当晚，张学良陪端纳一起去见蒋介石。未及坐下，端纳便将已由张学良过目的宋美龄给蒋的亲笔信递上去。蒋介石连忙接过，细细地看了两遍，泪水止不住顺着瘦削的脸颊流淌下来。良久，蒋介石用虚茫的目光望向窗外，轻轻说了声："想不到南京会这样。"

"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端纳说，"同张汉卿将军谈话以后，我首先向蒋先生告慰的，就是张将军对蒋先生并无恶意，只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只要蒋先生答应这个要求，张、杨两将军还要竭诚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个主张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主张，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成。蒋先生若能接受这个主张，今后将变为这样大大的伟人，要是不接受这个主张，今天将变为这样小小的人。国家和蒋先生个人的安危荣辱就系于蒋先生个人心思的一转。"

端纳的到来，使蒋介石的抗拒心态有所转缓，也最终同意搬迁至高桂滋公馆。

"第二天，我和几个副官去了高公馆。"张学良的副官张沛汉回忆说，"从门缝往里一看，只见蒋介石躺在床上，神情沮

丧，十分狼狈，不停地哼哼着，往日的威风一点也没有了。这时，谭海副官长走进蒋介石的房间，向他敬了个礼：'请问委员长，您要吃什么？'蒋介石一看有人来了，暴跳如雷，大声喊道：'我什么也不吃，你把张学良给我叫来，我跟他有话谈。'谭海说：'委员长先吃饭吧，吃完饭我去给你找来。'蒋又喊道：'我不吃！我是军人，我要以身许国，不成功便成仁，不放我出去，我就死在这里给你们看。'不管谭海怎么劝，他也不吃饭，差不多过了两天，他饿得实在受不了才吃饭，吃了一大碗羊肉泡馍。当他知道张学良不会杀他，只是要求他答应抗日时，他的心情也平和多了。一次，谭海给他倒茶，他对谭海说：'这是什么茶，你先喝一口。'他知道东北军将士对他恨得不得了，怕张将军的部下背着张将军暗害他。"

当事变的消息通过中共中央驻西安的代表刘鼎用电报传到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的临时首都保安小镇时，人们简直不敢相信。正在制订作战方案的刘伯承将手中钢笔一扔，兴奋地大喊一声："天公开眼，蒋介石也有这一天！"

事变当天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便通过决议，决定支持张学良，并立即应邀派代表前往西安。第二天，毛泽东在一个有三百名干部参加的会议上作报告，说一九二七年以来，蒋介石欠共产党人的血债高积如山，现在应当将蒋介石押到保安来，清算血债。

张国焘在其回忆录中说："这个突如其来的电报，使我们都为之激动。有的人说：'蒋介石也有今日！'有的人说：'张学良确实干得不错！'平素持论温和又不多发议论的朱德也抢先表示：'现在还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先将那家伙杀了再说。'这时已经回到保安几天的周恩来则冷静地表示：'这件事不能完全由我们做主，主要是看张学良、杨虎城的态度。'毛泽东也接着表示：'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

阵。'”

“恩来拟赴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请派飞机至延安来接。”中共当即电复张学良。

我当时很兴奋地说：“用我的座机随时去接！周恩来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捉蒋的兴奋和审蒋的议论转瞬而过。十二月十四日，一份通过上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之手转来的发自莫斯科的电报，令中共领袖们目瞪口呆。

在这份由斯大林亲自起草的电报中，阐述了三点意见：西安事变是由日本人、汪精卫和张学良共同炮制的阴谋；蒋介石是唯一有资格领导中国抗日的人选；中国共产党应力促事变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

电文还警告，若中共不为释蒋努力，苏共将不惜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以土匪相看。住在窑洞里的毛泽东禁不住跺脚大骂：“真是万思不得其解！”

苏联的态度也使张学良万分恼火。特别是苏联《消息报》十四日发表西安事变消息，指责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的要求，“包括对日宣战及联共等项”，“仅属发动之烟幕，实际为中国对外抵御之破坏”。又说：“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不独为南京政府之危险，抑且威胁全国。”诬蔑事变为“叛变”、“军事阴谋”等。并谴责道：“张学良因曾有抵抗日本之一切机会，乃彼却抱不抵抗主义，不战而将东北各省拱手让与日人，现又以反日运动为投机，高揭反日旗帜，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令张学良深感意外。他原以为“联共抗日”这一正义主张理应得到苏联的欢迎和支持，可万万没想到，苏联竟这样不理解他，且强烈地反对他。为此，张学良心里十分难过。


张学良在讲话。

"我待他们那么好，可他们却这样对待我。"伤感之余，他抱怨说。

"张学良反复无常，此次与苏俄携手，并非出于其对共产主义之信仰，仅系企图颠覆蒋介石将军之势力云。"十五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如此电称，亦恰似兜头给了张学良一盆凉水。

"此次陕变，全国一致谴责张学良，任何派别无人与其共鸣。"日本媒体在报道时幸灾乐祸地说。

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曾任驻中国代办，与张学良个人关系较好。他闻知西安事变后，致电张学良说："汝系吾友，兹若与共产党联盟，即成吾敌，中国苟无蒋介石将军，即不见重于人云。"

英国、美国等国家因情况不明，也都纷纷指责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犯上作乱，是"叛变"、"兵变"等等。

总之，由于对西安情况不明，或出于某种偏见，国际舆论

都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这些舆论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增加了许多复杂的因素，给张学良增添了许多政治压力。

在西安，张、杨两将军为使东北军、十七路军全体将士了解这次事变的意义和今后任务，于十六日发表了《告将士书》。文中指出："我们为什么要发动这样的运动？是为争取地盘吗？不是！是为泄忿吗？也不是！我们反对政府的屈辱外交。国家都要亡了，还在这里出死力地自相残杀！所以才提出抗日救国运动的八项主张。"

十二月十六日上午，西安革命公园举行了有两万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张、杨两将军都在会上发表了讲演，受到热烈拥护。

张学良将军首先演讲说：

"各界同胞们：这次事件，是我们一些人为了实行救国主张，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为民请命'。我们为了国家复兴，早有'生死以之'的决心！

"在'一二九'那天，我曾经向参加请愿的同学们讲，关于抗日问题，一星期以内，有事实答复你们，想诸位还记得。那天的事情，真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刺激。现在我再把发动'一二一二'事件的近因、也是最主要的原因，简单地向诸位讲一讲。

"我同蒋委员长私交感情很好，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我几次用书面诤谏，当面诤谏，请他放弃他的错误的违反民意的主张，领导全国民众从事于全国民众所愿意做的工作，做一个全国民众所爱戴的领袖，可是他不但不接受，近来反而变本加厉了。

"他在上海逮捕了七位救国领袖，我为了这件事，曾单身一个人没有带，乘军用机飞洛阳，请他释放那几位无辜的同

胞，可蒋委员长绝不采纳我的请求。

“因为‘一二九’西安学生运动，我同蒋委员长在言语上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我认为学生请愿的动机绝对是纯洁的，处置的办法，只有和平劝导。而他却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各位同胞们，我们的枪，不是打中国人的，我们的枪，所有中国人的枪，都是打日本帝国主义的。由于上项事情看来，我们认为，蒋委员长的主张和决心，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所以才同杨主任和其他西北各将领，发动了‘一二一二’事件。

“同胞们！我们是只求主张实现，我们既不要钱，也不要地盘，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主张，我们要立于抗日战线的第一线，我们要在抗日战场上效死。同时，我们要求全国同胞，一致起来走向抗日战争……”

杨虎城将军在演讲中说：“‘一二一二’的义举，我们应该知道是真正的民气的表现，更是民众自动起来救国抗日热忱的表现。我们的主张是要抗日，因有见于蒋委员长对外政策的错误，经过了多次劝谏无效后，万不得已才有这次的兵谏。这次的事，是以国家民族为前提的，决不是对蒋委员长个人而发生的。”

此时此刻，张、杨也正承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南京“讨逆军”的五个师纷纷西进，步步进逼，两军对垒，剑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在市内，“讨逆军”的飞机不时进行威胁性的飞行，搞得人心惶惶。

更令张、杨恼火的是，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八旅旅长黄永安拒不执行阻止中央军西进的指示，向国民党驻洛阳军事当局告密，并表示愿意听从南京指挥；驻大荔的十七路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则不听杨虎城调遣，公开通电反对西安事变。由于他们的叛变，致使潼洛防线不攻自破，“讨逆军”越过潼

关，进驻二华（华阴、华县），迫进渭南，威胁西安。

这时，蒋介石的态度虽有好转，已能够心平气和地与张、杨讨论抗日的问题了，可还有些三心二意，有时竟固执己见，仍想以军事进攻相要挟。他不承诺张、杨“必须停止一切军事行动”的要求，只同意停战三天。他在给何应钦的亲笔信中说：“敬之吾兄：闻昨日空军在渭南轰炸，望即令停止。以近情观察，中正于本星期六日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日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令停止轰炸为要。”

后来，蒋鼎文从西安飞回南京，面交了蒋介石的信函，进行了口头说明，主战派这才不得不下令停止轰炸。

但西安事变将怎样发展，对蒋介石应如何发落，仍然是个棘手的问题。

经过反复商讨，中共中央提出了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联合南京政府中的抗日力量，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给张、杨以军事和政治上的实际援助，制止内战。

显然，在最初的冲动反应之后，人人都意识到，南京政府最高领导地位一旦最终出现真空，无论张学良还是何应钦都不能填补，就是说，倘若蒋介石命丧西安，将会引起一场较之国民党和共产党间的十年厮杀更为惨烈的内战。

十二月十六日，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罗瑞卿等二十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顶着漫天大雪，踏上了去西安的征途。毛泽东站在大路口，向渐渐远去的马队高高地扬起了手臂。

“周恩来此行，难哪！”毛泽东朝身边的朱德轻轻地叹了一声。

当周恩来一行走进金家巷张公馆时，张学良幽默地问：“美髯公，你的胡子呢？”

“刮掉了。”周恩来作了个手势，“来西安嘛，要讲点礼貌。”

应邀前来西安的中共代表团周恩来（右）、叶剑英（中）、博古（秦邦宪，左）。

“周先生原来和副司令熟悉啊？”迎候的官员们都大感不解。

“我们是老朋友了。”周恩来淡淡一笑，说道。

当晚，张学良和周恩来来到西楼，开始会谈。

我对周恩来说：“我俩实在是忍无可忍。倘若不捉他，不临之以兵，就无法使他猛省。内战不停息，抗日只能是一句空话。现在我已是举步维艰。中央军大兵压境，南京方面磨刀霍霍，而蒋介石又拒绝退让。更令人痛心的，是苏联的那一派胡言！”

“对苏联的态度，请张将军不必介意，他们并不太了解我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对你和杨将军的爱国热忱表示钦佩和敬意！扣蒋抗日，符合全国人民的心愿，也一定会成为转变

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事件。”周恩来望着张学良，尽量放缓语气，字斟句酌地说，“可是，事变的方式却是军事阴谋。”

“军事阴谋?”这正是苏联对他的指责。张学良一听，勃然变色。

“我为公不为私，扣蒋还算阴谋?”张学良涨红了脸，辩解说。

“张将军，你我是朋友，彼此相知，言语也就无所忌讳。”周恩来从容地一笑，“事情从另一面点透，解决起来也就更为稳妥了。”

“我想听听周先生的高见。”张学良愠色稍减，困惑地望着周恩来。

“所谓军事阴谋，同群众暴动不同，而是采取武装要求的方式。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后的沙皇尼古拉被群众暴动推翻，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全军覆没后被流放。这次捉蒋是出其不意、乘其不备而进行的，他的武力还原封未动。在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推动下，蒋的广大官兵的抗日思想日渐增长，从各方面考虑，对蒋的处置是极需慎重的。”

接着，周恩来又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个前途，他说：“如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把他杀掉，这不但不能停止内战、还有可能引起更大的内战，不但不能抗日，反而会给日本提供进一步灭亡中国的机会。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前途，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放他回去。蒋介石还实际统治着中国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战争。”

“抗战是举国一致的行动，并不仅限于西安一隅。”周恩来

又坦然而言，“只要蒋介石改变态度，同意抗日，就应当体面地释放他，并拥护他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袖。”

张学良听得全神贯注。这些天来，西安、南京情况瞬息万变，张学良问策无人，徬徨束手，周恩来一席话可谓价值千金。

我当时就赞同道：“我张学良对您和毛先生的意见一向是很尊重的，既然中共都同意和平解决，那我还有什么话说。”

逼蒋抗日，乃是张学良发动“兵谏”的初衷，现在，既然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态度如此明朗，这不是同他张学良不谋而合吗？

但杨虎城会同意这个方案吗？毋庸置疑，说服杨虎城的工作又落在了周恩来头上。然而，周恩来同杨虎城之间的谈话进行得不太顺利。听说张学良和中共方面都同意放蒋，杨虎城大失所望。

“我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杨虎城皱着眉头说，“这个人心如刀刃，毫无信义，绝无宽宏大量的气度。况且此次‘兵谏’是以下犯上，触犯了中国传统伦理纲常之大忌，蒋介石日后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杨虎城虽未言明，但实际上，他主张长期扣蒋，直至出现全国抗日高潮的局面。但张、周已经达成一致，他若是不同意，西北军将面临内外交困的不利局面。

十二月二十日，宋子文不顾何应钦等人的反对，以私人身份飞抵西安。

当宋子文将宋美龄的第二封信呈上时，蒋介石双手抖动，居然好久没有拆开。当他读到信中“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时，不禁唏嘘有声。

在与周恩来等人进行一番长谈后，宋子文得知，张、杨和中共均已同意放蒋，心中这才安定下来。于是，二十一日，他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张学良与蒋介石顾问端纳会谈。

带着满意的心情回到了南京。在了解了详情之后，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决定，十二月二十二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军统头子戴笠一行乘飞机前往西安。

当飞机抵达洛阳机场时，宋美龄见军人们正手忙脚乱地往轰炸机上装弹药，准备前往轰炸西安，大惊失色，厉声对机场指挥官说："我们现在正要到委员长那儿去。没有委员长的手令，一架飞机也不准接近西安！"

吃过午饭，飞机又腾空而起。临近西安上空时，宋美龄从提包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递给端纳。

"端纳先生，我不知道现在西安情况怎样了。如叛军失去控制，把我们也扣住了，你要毫不犹豫地用它把我打死。"已多次进出西安的端纳接过枪，无可奈何地笑着摇了摇头。

下午四时，专机在西安机场缓缓降落。出乎宋美龄意料，

他们一下飞机，便受到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周恩来的热情迎接，仿佛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

“汉卿，我带的行李，希望你不要检查。”宋美龄下飞机后，对张学良要求说。

“夫人请便，我不检查就是了。”张学良微笑着答应道。

喝过一杯茶后，宋美龄便被领进了蒋介石的房间。正面壁冥思的蒋介石见到妻子突然出现在眼前，大惊失色，高声嚷道：“你何苦到这里来，这是步入虎口啊！”随即又说，“尽管我叫你无论如何不要来西安，但我感到是无法阻止你来的。今天早晨我打开《圣经》，眼睛便停留在这段文字上：耶和华今将有新作为，将令女子护卫男子。”

“大令，此时此刻，我不来陪你，又有谁来呢？”言未毕，宋美龄已是满眶泪水。

宋氏兄妹一到，蒋介石立即委托他们为代表，与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进行谈判。

于是，三方就如何落实哪些条款，何时怎样放蒋，展开了紧锣密鼓的谈判。

第六十七章　放 蒋 送 蒋

1936.12

——“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

——“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

——“可为了放蒋，我后来几乎与杨虎城闹翻。”

二十二日，我在会谈时对宋夫人说：“兵谏只是让委员长同意抗日，绝没有伤害他的意思。如果夫人在这里，也许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委员长自被禁后，一直怒不可遏，拒不谈问题。望夫人劝劝委员长，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他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签不签文件都可以。”

随后，在蒋介石住所，张学良、杨虎城向宋子文、宋美龄

解释了西安方面提出的八项主张的具体内容。

“第一项主张就是明白表示改组行政院为战时内阁，西安方面绝不推荐己方的任何人士出任部长。阁员人选仍是南京的各位先生，譬如说，陈立夫先生可以出任教育部长，胡宗南先生可任军政部长，CC系统和黄埔军校同学都是抗日的，我们只是帮助他们推动抗战而已。”张学良首先开诚布公地说道。

“你说怎么样？”宋子文转问蒋介石。

“军政部长的人选，宗南在军政方面的经验不如辞修。”蒋介石回答说。

“我们没有意见。”张学良接着说，“为了保证能一定执行抗战政策，我们赞成推出一位主张抗战的人，出任改组后的行政院院长。”

“你们说是谁？”蒋介石问。

“宋子文先生，委员长以为如何？”张学良答道。

“那不行，我并不合适。”宋子文连忙插话说。

“你们的八项主张，第二项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蒋介石接着问下去。

“第二项是停止一切内战，就是放弃安内政策，也就是枪口对外。”张学良刚说完，蒋介石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蒋介石提出两项原则：一是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谈判，他不出头；二是商定的条件，他以“领袖的人格保证，回到南京后将分条逐步执行，但在西安不签字，不公布或对外有什么公开表示”。

张学良、杨虎城从国家民族利益的大局出发，同意了这两项原则。

同日，张学良将周恩来引见给宋美龄和宋子文，他们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

“在中国的目前阶段，除了蒋委员长之外，别人谁也没有资格成为国家的领袖。”周恩来坦诚地向宋美龄表示说，“我们不是说委员长不抗日，我们只是说他在抗日的问题上态度不够明确，行动不够迅速。”

周恩来还向宋美龄表示，西安领导人是以最充分的敬意留住委员长，他对委员长不愿意与他们讨论国策感到遗憾。

周恩来的精明强干、横溢才华，侃侃而谈中所流露出的对国际国内形势的精辟见解，以及他那种务实的态度，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委员长腰部受伤，这几天疼得不行。”宋美龄向周恩来解释说，“谈判的事，他要我和子文代表他。另外他还提出，所有商定的条款，不做书面签字，均由委员长以领袖的人格保证执行。”

初次会谈结束时，宋子文忍不住再次喟叹：“周先生是个天才，罕见的天才！”

二十三日，三方代表，一方是张学良、杨虎城和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一方是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端纳顾问和被扣于西安的南京大员；另一方则是由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正式举行会谈。谈判的结果如下：

（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并组织使各方满意的政府，肃清亲日派。

（二）中央军全部撤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即携蒋介石手令飞洛阳办理停战撤兵事宜。

（三）蒋回南京后释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发消息，宋子文负责办理此事。

（四）苏维埃、红军名称照旧。宋氏兄妹担保停止剿共，由张学良负责接济红军。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番号，统一指

挥，联合行动。

（五）先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开放政权，再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召开国民代表会议。

（六）政治犯分批释放，具体办法与宋庆龄商定。

（七）抗战爆发后，共产党可公开活动。

（八）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

（九）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十）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

此外，宋子文提出，只要蒋介石下令撤兵，就放他回南京。

二十四日，在张学良和宋子文的安排下，周恩来走进了蒋介石的房间。

“蒋校长，您好！”周恩来一进门，便庄重地向蒋介石行举手礼。

看见自己十年来一直悬赏缉拿其头颅的对手忽然出现在面前，蒋介石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脸色变得煞白。

“蒋先生，我们有十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了。”周恩来首先向蒋介石致意。

“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蒋介石点点头，叹了口气，然后说道。

“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应对如流，“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

蒋介石闷坐半天，最后终于嗫嗫嚅嚅地说道：“我肯定不会打内战了，在我们交战的每时每刻，我常常想起你，我甚至回忆起你为我出色工作的那段时间。我希望我们能再度合作，只要我生存一天，保证中国决不会发生反共内战。”

宋美龄在一旁也说："以后不剿共了。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是感激得很。"

交谈中，周恩来提到了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经国现在在苏联，生活很好，学习也有长进。"周恩来笑着说。

"是吗？"蒋介石应了一声，难以掩饰对儿子的思念之情。

"如果委员长有意思让经国回来，我可以通过有关方面，让他尽快回到你身边。"周恩来很诚恳地说。

"那好，那好，谢谢恩来。"蒋介石脸上现出难得的笑意，"我回南京以后，在适当的时候，再请恩来到那里去谈谈。"

在座的张学良和宋氏兄妹，都以喜悦的目光望着周恩来。

"倘若真能如此，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周恩来站起来，深沉地说道。

据周恩来二十五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蒋介石当时作了三点表示："子. 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 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 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宋子文对谈判的结果很高兴，表示希望共产党派人常住上海，保持联系。

这时，蒋介石显出很疲劳的样子，指着宋氏兄妹说："你们可以同恩来多谈一谈。"周恩来说："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说："好，好。"周恩来就告辞了。

在谈判中，宋氏兄妹代蒋作出什么保证，周恩来在二十四日晚见蒋介石时究竟还谈了些什么，这一直是个谜。张学良不愿说详情，只说此事不应出自他口，说周恩来是他带去见蒋先

生的，周恩来只是与蒋介石聊家常，没谈什么政治的事，还说："其实是外面存有很大的误传。"

不过，这些疑问也确实不是什么谜，因为周恩来早在事变时就把隔日谈判的结果电告了中共中央，但中共却长时间一直没有把它公开发表，经过半世纪后，才在《周恩来选集》上卷所收录的"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中，第一次披露出来。为什么会压了那么久，或许是周恩来指示不要使张学良为难，等到完全"境迁"之后，再将这些电报发表吧。

蒋介石拒绝在达成的协议上签字，加重了西北军和东北军中部分将领的疑虑。西北军将领本来就不同意释蒋，此时，对张学良也产生了怀疑。他们认为，蒋介石与张学良情同父子，日后蒋介石可以原谅张学良，但决不会放过西北军。

一想到日后西北军和他们个人的命运，将领们便不寒而栗。有人暗中建议，趁现在局面未定之时，杀掉蒋介石。

即使在东北军中，主张继续扣蒋或杀蒋的也大有人在。在二十三日下午召开的西北抗日联军设计委员会的会议上，人们议论纷纷，坚持说：若蒋介石不签署一份承诺文件，就决不放他，即使少帅愿意，我们也决不答应。

"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个人的事情。"有人大声疾呼道，"他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不行！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听我们的话，我们干脆就把他杀掉！"

气氛顿时变得紧张，反对放蒋的人占了上风。张学良听说后，感到事态严重。

二十四日下午，张学良一面委托周恩来继续与宋氏兄妹接触，一面在客厅里召开设计委员会会议。

"听说昨天设计委员会开会大家有些意见，现在可以向我提，但不许在外面乱说，尤其不许胡闹！"说完，张学良那双

严厉的眼睛不时扫视着在座的将领。

会场上出现了沉默。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高声叫道："说呀！怎么不说了啊？"

终于有人站起身来质疑道："副司令所说的蒋、宋答应我们的这些条件，究竟有什么保证没有，将来说了不算怎么办？"

我绷着脸追问道："你们要什么保证？你说，你说！你们所提的意见，我考虑过，都是行不通的。蒋关在我们这里，他现在说的话，何应钦都不见得肯听。我们逼蒋下命令，如结果无效，怎么办？即使蒋下命令生效，中央军退出潼关，释放了'七君子'，改组了政府，甚至对日宣战，那时放不放他？保证实现了，当然要放他，但他不是心甘情愿的，一定存心报复。如果他回南京后，一切推翻重来，怎么办？所以我说你们的意见都行不通。只要他原则上承认了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

我诚恳自信而又义愤地说道："至于要阎锡山做保证人更不可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联共抗日的事早和他说过，他表示赞成和支持，可事变爆发后，他的回电用了好几个'乎'，最后质问我们：'何以善其后乎？'满篇责备，毫无半句同情，还把这个电报送给南京，他打的是什么算盘？这样的人是不能共事的，不能让他投机取巧。"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又说："是的，我打算亲自送蒋委员长回南京。我这一着是要抓住他的心，比你们想得高。"

仿佛是一颗炸雷，在众将领心头猛地一震。张学良是这次事变的主心骨，要是他一走，西安的局面会怎么发展，谁也没有把握。此刻，众人惊愕困惑地望着情绪十分冲动的副司令，不知如何是好。

我语气变得有些沉重："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乖话。"

接着，我又说："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的情绪十分激动，场内一片寂静，再也没有人愿说什么了。

有人问："杨主任的意见怎样？"张学良说："杨主任虽有些不同意见，但他是顾全大局的。"

大家对张学良的意见虽不以为然，但不好当面争辩。他是东北军的统帅，在东北军内，向来以他为中心，独断独行，他决定了的事很难变更。

我想，我们既然敢捉，也就敢放；既然敢放，也就敢送。

其实，在这一点上，历史证明张学良又一次"判断错误"。试想，想捉就捉，想放就放，想送就送，这岂不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玩最高当权者于股掌之上吗？难道这不是其更为忌讳、更丢面子的举措吗？

自二十四日谈判达成口头协议后，宋氏兄妹便缠住张学良，要他早日放蒋介石，宋美龄说她与蒋介石都是基督徒，最好能在圣诞节回京。宋子文还说："改组政府应打铁趁热，早日进行。"

这些日子里，宋子文觉得张学良行为有点异常。他发现，张学良有时显得语无伦次，并有好几次痛哭流涕。十二月二十

二日，张学良甚至请求他和宋美龄照顾他尚滞留在英国的妻子儿女，并将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告诉给宋子文，与他商量如何才能安全地把这笔钱财转入宋子文之手，以用于日后赡养家眷。有时候，张学良似乎忘记了他发动这次事变的政治宗旨，一个劲儿地谈他的个人安全。显然，这些天来，来自外界各方面的压力与内心巨大的焦虑，加之日以继夜的忙碌，已把张学良搞得精疲力尽，神智恍惚。

二十四日晚，张学良和杨虎城在绥靖公署的新城大楼举行宴会。在张学良想来，这次宴会自然有为蒋介石饯行的意思。

宴会一开始，张学良便站起身，将酒杯高高举起，激昂地说："委员长，诸位仁兄，你们受惊了。我采取这个行动，是不得已而为之。有人说我是叛乱，笑话！我向谁要官要钱了吗？我对日本人是有国仇家恨的人，希望在座诸君，能为抗日运动献策出力！干杯！"

只见张学良一仰头，一杯酒一饮而尽。待他垂下头来，眼里已是泪水盈盈。只听"啪"地一声，酒杯被张学良猛地掷地而碎。

宴会上的气氛顿变紧张。人人都注视着张学良，但却无人开口。

这时，周恩来从容地站起，举起酒杯说："委员长，汉卿、虎城两将军，诸位朋友、同事，这次事件是个大变动，今天举行宴会是个大团结，在座的为促进团结作出了贡献。汉卿、虎城两将军在促进团结方面贡献最大。通过这件事，希望各方面联合、团结起来，为此，让我们干杯！"

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现在国难当头，东北沦陷，华北也危在旦夕。我们当军人的，有保国保民的天职。以前，我听南开大学校长张

伯苓讲过一句话：中国不亡有我！我们做军人的，更应当有此气魄！我第二次向大家举杯敬酒。说完上述话，将酒一饮而尽，从椅子上跳下来，又将酒杯猛掷在地。

众人惊愕之时，张学良已伏身餐桌，恸哭失声。

张学良的这一举动，自然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东北军将领们，不少人掏出手帕，揩着脸上的泪水。一位副师长突然跨到张学良和蒋介石面前，泣声喊道："我十几岁就跟着少帅，现在有家难归。盼望委员长回到金陵，说话算数！"

几名卫兵见他失态的模样，生怕他做出什么意外之举，连忙将他扶出了大厅。

接着，我又斟满一杯酒，来到蒋介石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委员长，我这次行动唯一目的，是拥护委员长领导抗日。我国仇、家仇都还没有报，我是中华民族的罪人。您如果与我有共同心愿，也许不会有此事发生，您也不会受这场惊吓。我的行动不太好，我想结果是好的。委员长同意了一致抗日，希望返回南京，说到做到。我希望能打回老家去。东北不收复，我死不瞑目！为委员长的身体健康干杯！"

张学良举杯又是一饮而尽，喝完后，又使劲将酒杯摔得粉碎。

三次痛饮，三次摔杯，张学良的豪爽与真情令所有人震惊不已。

一直端坐着的蒋介石神情沮丧，只扬了扬手，用浓重的奉化口音说："我身体不好，酒也不会喝。"

"我来！"宋子文一步抢上。他生怕由于蒋介石的拒绝，使本来就显得沉重的气氛弄得更僵，"汉卿，你的一番美意，我代委员长领了。委员长的这杯酒，我代喝。干杯！"

宋子文一饮而尽，此时此刻，他看到的，仍然是那个一腔热忱、雄姿英发的少帅。

如何放蒋，何时放蒋，晚宴之后，蓦地又成为困扰张学良的一个大问题。

蒋介石在十二月二十五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心送委员长回京，惟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意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死，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

张学良没有料到，杨虎城会这么坚决地反对立即释放蒋介石。

"放虎归山，日后伤人。没有担保就放人，一到南京他就会翻脸。"杨虎城尽量压制住自己的火气，沉稳地说道。

"我们的本意是请求委员长领导全国一致抗日，而不是考虑我们自己的后果如何。"张学良几乎已控制不住自己，忍不住大喊，"他已经答应把我们的建议提交中央政府考虑。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们就不应畏惧个人的损失和危险。那你要怕，你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害怕了？我害怕什么?"杨虎城终于有些火了。

我这个人是这样的，好汉做，好汉当。当年干这件事的时候，我同杨虎城两人都没说要把老先生怎样怎样，没有这个动机。可为了放蒋，我后来几乎与杨虎城闹翻。就为这个事，杨虎城怕了，我就同他说，咱俩当年是怎么决定的？我们当初是因为反对内战、不要内战才干了这事。当时，那些主张内战的

人甚至不愿意见到蒋先生回到南京，而我愿意负起一切责任不要再有新的内战。可现在要是不放蒋，就会惹起内战，将会扩大内战，这不是你自个儿做的事与你自个儿的愿望相违背了吗？

未能即刻说服杨虎城，张学良怒气冲冲地回到金家巷公馆，请求周恩来再去开导杨虎城。然后，张学良又告诉周恩来说："周先生，为了给委员长挽回面子，我打算亲自送他回南京。"周恩来一听，大吃一惊。他严肃地望着这位血气方刚的少帅，一字一句地说道："汉卿，我们是朋友了，我送你两句话，'政治是无情的'，'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希望你三思而行。"

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宋子文匆匆来见张学良，将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们联名所写的信放到了他面前。

"看来，事态确实很严重。"张学良木然地望着窗外说。

"汉卿，事情宜早不宜迟啊，再拖下去，还不知会出什么乱子呢。"宋子文惶遽地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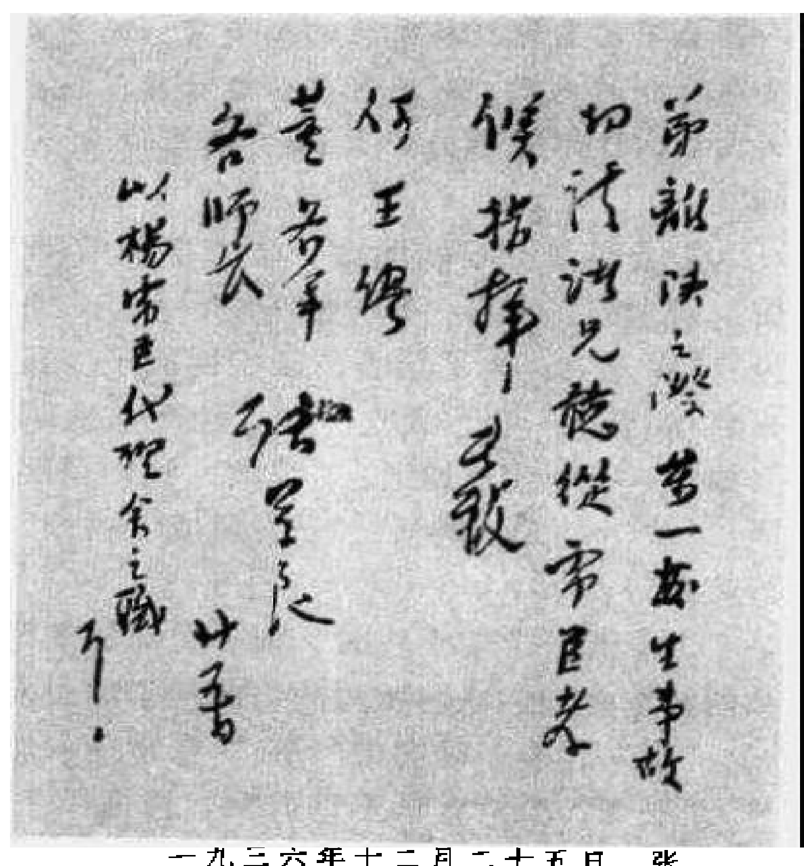
"好吧，请你转告委员长和夫人，今天下午三点，我送他们回南京！"张学良沉思良久，终于对宋子文说道。

正在点雪茄的宋子文愣住了。他猛地将雪茄按灭在烟缸里，连告别的话都来不及说一声，疾步走出了张公馆。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张学良匆匆忙忙地来到杨虎城家中，一坐下便连叹了几口气。

"现在不走不行了，夜长梦多，不知会出什么大乱子。"张学良语调沉重，"送委员长的时间我已定在今日下午，我亲自送走。我想几天之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就完全归你指挥。"

说完，掏出一张纸交给杨虎城。杨虎城展开一看，原来是张学良已经写好的手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送蒋介石返南京时，留给杨虎城、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董英斌各军长及各师长的信。

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城）、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张学良

二十五日

以杨虎臣代理余之职

即日

杨虎城抬起头来，愕然地注视着神情紧张的张学良。

实际上，杨虎城这几日也一直处于矛盾之中：南京方面情况复杂；中央军大兵压境，咄咄逼人；东北军内部出现不稳；张学良决心已定，很难扭转；宋子文软缠硬磨，哀求不已；现在中共也同意放蒋了，若他再坚持己见，势必成为众矢之的。

“放他，就足以见你我之诚意了；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啊！”杨虎城力劝张学良。

“老兄之言，学良感铭在心，但事情已定，只好如此了。”张学良摇摇头说道。

事后，杨虎城曾向他人表露过他此时此刻的心迹：“这样匆

匆忙忙地放蒋，张先生事先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而他一定要陪蒋走，更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张纵然不对我说，也一定会对周先生说明的，及至我和周先生见面的时候，周先生说他对二十五日匆忙放蒋事前也毫无所闻。我不是不同意放蒋，但不能就这样放啊，没有同周先生和我商量，还有什么三位一体！"

后来，宋美龄在其《西安事变回忆》中写道："张对余解释，谓彼实有赴京之义务，盖彼已向各将领表示，愿担负此次事变全部之责任；同时彼更欲证此次事变，无危害委员长之恶意及争夺个人权位之野心。"

张学良在离开公馆前，匆匆将立即放蒋和亲自护送的决定告诉了他的私人秘书、同时也是好友的应德田和卫队营长孙铭九。两人一听，顿时心惊胆颤。

"副司令，你要走了，我们东北军怎么办哪？"应德田一声大喊，双手抱头，痛苦万分地跪下来。孙铭九一听少帅要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顿时俯身下跪，抱住张学良的大腿呜咽不止，央求道："副司令，你不能走啊！"

"起来！"心烦意乱的张学良早已失去耐心，他大吼一声，并用手指点着孙铭九说道，"我去南京的主意已经下定，你们谁也不要再说了！要是你们坚持不听，那就掏出枪来，把我张学良打死在这儿！"

说完，头也不回地跨出了大门。

目睹张学良渐渐走远，应德田像垮掉了一般，俯身桌上，双肩抽动不已。

孙铭九则连连嚷道："怎么办？怎么办？"急得在屋内团团转。突然，他像发疯似地冲出门，急急奔向周恩来住的东楼。他想，此时此刻，唯有少帅所敬重的周先生，或许能止住少帅的鲁莽行动。但遗憾的是，周恩来不在屋里，他去了西安的一个地下共产党员涂作潮的家里。孙铭九东奔西跑，终于在涂家

见到了周恩来。

"周先生，少帅和杨主任送委员长去机场了！"一见面，孙铭九便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嚷。

"走了多长时间了？"周恩来大惊失色，忙问。

"十几分钟了。"

"快！快！马上去机场！"周恩来疾步出门，上了孙铭九的车。

汽车风驰电掣般开出城门，向西驶去。

二十五日下午三时，张学良和杨虎城分别陪同蒋介石夫妇、宋子文和端纳，分乘两部汽车，悄悄地驶向了西郊机场。机场外，聚集着黑压压一片大约有好几千人，看模样像是学生。

蒋介石急了，忙问张学良："这是，这是怎么回事？"

张学良也莫明其妙。送蒋是秘密行动，知道内情的仅有张、杨二人和极少数副官、卫兵，连将领们都未通报，难道有谁泄漏了消息？张学良也不禁紧张起来。

蒋介石目光惊恐地望着学生们，急上前两步握住杨虎城的手，颤颤地说："虎城，以后的内战是不能再打了，美龄和子文代我签字的条件，我一定会实行，这个你们放心。我再重复一下议定的事情：一、回南京后立即命令入关部队撤出潼关，停止内战；二、一致对外，立即宣布抗日；三、改组政府，……今后西北的军政事宜概由你和汉卿负责。是不是这些，虎城？"

"是这些，委员长。"杨虎城站得笔直。

"那么，这些人……"蒋介石朝学生们看了一眼，又盯住杨虎城，惊恐地问道，"他们来这里……"

杨虎城这才明白过来，他大声回答道："委员长，今天傅作义将军要来西安，学生们出于对抗日将领的敬重，提出要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蒋介石由陕返京，邵力子、杨虎城到机场送行。



张学良送蒋介石回京在洛阳机场留影。右方穿白西服戴帽者为张学良，不戴帽者为宋子文。

机场欢迎，绥署通知了一些学校，组织了这么些人来机场欢迎。”

“噢，噢……”蒋介石这才松开了杨虎城的手，转身走向舷梯。突然，蒋介石停下脚步转过头来望着张学良道：“汉卿，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有人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

“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张学良义无反顾地说。

蒋介石似有些感动地“哦”了两声，又回转过头继续登梯。就在这一瞬，张学良发现，在蒋介石那双冷如寒冰的眼里，似乎还蓄含着一种让人无法捉摸的深意。

当周恩来乘车赶到飞机场时，专机已经起飞了。遥望蓝天，周恩来叹息道：“唉，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看坏了，他现在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张学良亲自送蒋的消息，立即在西安市传开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将士皆感突然，担心蒋介石不实现诺言，并扣留张学良。有人去见杨虎城，问道：“蒋介石走了吗？”杨虎城沉痛地说：“走了一个还不算，还跟了一个去！”

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们对张学良亲自送蒋的举动，不仅感到震惊和不可理解，而且深感忧虑和恐慌。有一个青年军官嚷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想活了！看吧，哪还有他的自由，他永远回不来了！”

但是，毛泽东则认为此举有积极的一面，有其历史功勋。他说：“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回京一举，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

宋美龄对张学良毅然放蒋送蒋之举非常感动，她说：“这不啻是给国家一个无价的圣诞礼物！”

遗憾的是，张学良，这个圣诞老人，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第六十八章 军 法 会 审

1936.12

——“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

——“我在西安的行动，为的是谏止中央的独断专行。”

——“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

西安事变，我当时就说过，委员长就好像是盏灯泡，我暂时把它关一下，我把它擦一擦，我再把它开开，让它更亮。在西安时我也说过这话，西安现在还有人在，如当年的警卫处长。我到了南京，我仍这样说，我这样做，他不是更亮了吗？

不客气地说，那是泥菩萨，首领就是泥菩萨，我把这泥菩

萨已经搬倒了，我再自行把它扶起来，它若有灵，我拿脑袋疼它，不能不给它磕头。在西安，蒋先生既然这样答应了，那你是权威，我维护你，我陪你去南京，去请罪。蒋先生也真是，他没有说假话，他后来也真是这样做了。他对我说："我不剿共，我不剿共了，我跟共产党合作！"

这话是蒋先生亲自对我讲的，他当时不让我把这个事情说出去，我过去是不说这话的，可现在事情早已过去了。我直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说的这话。

很多人讲，我不该亲自把蒋先生送回南京。

那怎么讲话？这话不对！我这个人不同，也许与旁人不同的是，我这个人是这样，我是个军人，我自个儿做的事情，我自个儿负责任，杀我的头我也负责，我也不在乎，我真的是不在乎，我不是在说假话。我到南京，也许就把我枪毙了，我不在乎。我到南京送蒋先生，我是请罪，简单地说，我甚至把后事都预备好了。我到南京，是准备去被处死刑的，但蒋先生待我很宽厚。我是个军人，我做这个事情，我自己负责，我没有什么旁的意思，我是坚决反对内战的，假如我不这样做，恐内战更扩大。直到现在我还这样说，我自己牺牲自己是毫不顾虑的。蒋先生一直很爱护我，飞机到洛阳，他不叫我下飞机，他一直在保护我。

我决定陪蒋先生到南京，那我是早就打定的主意，就是叫南京政府把我整瘪了就是了，我真的是去死呀！我后事都准备好了。自个儿说，要是我的部下这样对待我，我早就把他整瘪了，早就把他枪毙了。

但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还未等张学良抵南京，蒋介石的态度就立刻大变了。

二十六日，由陈布雷炮制的《对张、杨的训话》在洛阳发表，训斥张、杨"蔑法坏纪"，并倒打一耙说："如余在西安允

许尔等，签署只字于尔等之要求，则国家等于灭亡。”并信口雌黄，说什么张、杨是受了蒋介石的“伟大人格”的感动，才释放他的。

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荒谬已极。更有甚者，此时，蒋介石已密令戴笠：“张学良到南京一下飞机，就派军统局人员把他监禁起来。”

关于这段历史内幕，曾任南京复兴社特务处书记长的张严佛回忆道：“十二月二十四日，戴笠从西安回到了南京。晚上九时，戴笠在鸡鹅巷五十三号找我和军统局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去，他非常高兴，一边笑，一边很严肃地对我们说：‘张学良将于明日送委员长到南京来，我已经和宋部长商量好了，张学良一下飞机，就由我与宋部长接到北极阁宋部长公馆去，软禁起来，不让他接见任何人。张学良到南京的消息千万不可张扬出去，你们要特别注意。’戴笠又说：‘乙光赶紧在特务队挑出十几个人来，要机灵可靠的，仪表好的，都穿蓝色中山服，佩带二号左轮，由乙光带到宋公馆去，看守张学良。”

相反，张学良对蒋介石，那真是人情送到了家。张学良陪蒋介石抵洛阳后，蒋介石立即要求张学良给杨虎城发电报，嘱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人，张学良立刻遵嘱照办。

二十六日九点四十分，蒋介石的座机由洛阳起飞，中午十二点二十分抵南京光华门外大较场机场。南京政府自林森主席以下文武百官均到机场欢迎，军乐高奏，爆竹齐鸣，万头攒动，盛况空前。

然而，当张学良由宋子文陪同，乘第二架飞机于二十六日下午二时许在南京城外的一个军用机场降落时，这里没有欢迎的人群，有的却是宪兵和特务队的严密警戒。

张学良走下飞机，即由宋子文、戴笠两人拉上汽车，直驶



从西安飞回南京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

北极阁宋子文公馆，这就是张学良被军统局囚禁的开始。

“到飞机场接张学良的只有我一个人，外加一位姓杨的小姐。”原东北大学校长宁恩承回忆说，“张下机后，我们俩同坐在一辆汽车上。他在车上问我：‘哎，南京怎么样？’我想了想说：‘南京不是咱们的天下，你到南京来，就等于入了虎穴，就要听凭南京的宰割。’张想了想，用东北话说道：‘我这么大的个子，他那么大个子，我说了话算，难道他说了话不算数？’”

张学良随蒋介石来南京的消息，起初严密封锁，但不久还是泄漏了出去。

从二十六日午后开始，宋子文公馆变得门庭若市。新闻记者、军政显要、知名人士、群众代表，纷纷前来看望这位为抗日不惜犯上，而后又磊落坦荡地来南京的少帅。

"谢谢各位的关心了，各位的厚爱，学良感铭在心。西安的情况现在比较复杂，过一两天我就回去。欢迎大家到西安做客。"张学良略显局促，但神情却相当乐观，每当客人离去时，他必送到大门口。

此时，张学良并没有意识到，危险已渐渐向他逼近。

在众多前来的客人中，张学良见到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张学思。他吃惊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是军校长官叫我来的。"弟弟看着兄长，似有许多话想说。

原来，事变当晚，张学思即被逮捕，押回南京受审。在确认张学思与"兵谏"毫无干系后，他被当作"人质"投进了禁闭室。

"大哥，我想……"张学思迟疑道。

"学思，这几天我很忙，"张学良一扬手，打断了弟弟的话，并向旁边坐了一屋子的人指了指，"有些话三言两语说不清楚，你改天来，我再和你详谈。"

直到二十八日，兄弟俩再相会时，仍无暇详谈。张学良在大门口拉住弟弟的手，沉郁地说："我们有的是时间。这里，我有些事，一时还不会离开南京。"

二十六日回南京的当天，蒋介石略事休息，便发出了一系列命令：解除何应钦讨逆军总司令之职；让代理行政院长的孔祥熙正式任职；让驻陕甘一带的中央军加强戒备；准备召开中央党部大会；令张学良写请罪书。

当天，蒋介石要宋子文转告张学良，应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张学良立即照办，挥毫写了如下一封"请罪书"：

介公委座赐鉴：

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罪。兹腼颜随即来京，是以至诚愿受钧座之责罚，处以

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专肃，敬叩

钧安

张学良谨肃

十二月廿六日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要他写请罪书，不过是为自己下台阶的例行公事，因而毫不迟疑地一挥而就，殊不知，这正是蒋介石所需要的刀柄。

二十七日上午，荆有岩前来见张学良，张学良对他说："我尚有事，今天走不了啦，要等几天。"这时，他情绪虽有点低沉，但对蒋介石的诡计并未识透。深夜，他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虎城仁兄大鉴：

京中空气甚不良，但一切进行，尚称顺利，子文兄及蒋夫人十分努力。委座为环境关系，总有许多官样文章，以转圜京中无味之风，但所允吾等者，委座再三郑重告弟，必使实现，以重信义。委座在京之困难，恐有过于陕地者。吾等在陕心中仍认蒋先生是领袖，此地恐多系口头恭维，而心存自利也。此函切请秘密、勿公开宣布，恐妨害实际政策之实行，少数人密知可也。此请

大安

弟良顿首

廿七日夜中

自十二月二十八日起，一般人已不能随意去看望张学良了，但是，在南京的东北知名人士阎宝航则例外。此时，阎宝航奉命来到宋公馆。

"我同蒋夫人、张副司令已经商议妥当，请你去一趟西安，说张副司令几天内就会回去。另外，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

城先生，请他把扣在西安的五十一架飞机放回来。要抗战嘛，飞机是离不了的。”一进大厅，宋子文便迎了上来，亲切地对阎宝航说道。

然后，宋子文把阎宝航领进张学良的小客厅，自己避到了一旁。

“宋先生方才让我给西安传话，说你几天之内就回去，是不是真的？”阎宝航说出了最关心的问题。

“我这次举动是为了国家，也为了领袖，他们对我怎样，我不在乎。”张学良凝重地说。说完，又暗示性地用手指向西北方向，轻轻补了一句，“他们若不让我回去，那边能答应吗？”

从张学良那儿告辞后，阎宝航又去见宋美龄。

“阎先生，西安这次差点就弄出了大乱子，委员长、子文，还有我都吃了不少苦头，现在总算是大乱初定了。你到了西安，请务必告诉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头头们，张副司令用不了几天就会回去。大家一定要平静，凡事多想想，不要再生出事情来。”宋美龄反复嘱托阎宝航说。

“夫人，”阎宝航迫不及待地问道，“先前宋部长也对我说，张副司令很快就会回西安，这有把握吧？”

“怎么，还信不过我和子文吗？”宋美龄不禁笑起来，“我们去西安的时候，汉卿以礼相待，守了信用。现在，我们怎么会回过头来整汉卿呢？”停了停，她又说，“我们宁可牺牲一切，也不会对汉卿失信。”

在送阎宝航出门时，宋美龄又叮嘱阎宝航，务必带话问候杨虎城的老母亲：“这个话你一定要给我带到哟。”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二十七日，蒋介石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上呈文，文中写道：“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会（府）准予免去

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查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代理总司令职务，而在管辖区内发生如此巨变，国法军纪自难逭免。”并附上了张学良的请罪书。

二十九日，国民党召开第三十一和三十二次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此案。对蒋介石引咎辞职、自请处分一节，不仅“着毋庸议”，还予以褒扬；对张学良“请罪”一节，没有经过讨论即作出“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李烈钧为审判长。

决议一出，许多人大吃一惊。当然，最为吃惊的莫过于张学良本人和宋子文了。

当天，张学良换穿便服，驱车来到蒋介石官邸，求见委员长。殊料，足足等了半个小时，蒋介石仍未出现，只有一名侍卫从楼上下来说，委员长身体不佳，请张副司令先回去。

张学良恼愤不已，要来纸墨笔砚，匆匆写下了这样几句话：

委座：

适来未蒙接见为怅，今后苟有利于国者，虽万死不辞。

张学良刚走不久，宋子文又进了门，直冲冲便上楼来到蒋介石的办公室。

“委员长，你不放张学良回去，你说话算数吗？这对中外影响都不良呀！”

“汉卿犯上作乱，应交法庭审判。不这样，我还能当委员长吗？”蒋介石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

“你不讲信用，叫我怎么做人？”宋子文用力跺了下地板，脸色变得铁青。

“我不能放他回去！这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问题。军事法庭一定要开！放他走，今后我对部下怎样治理？！”

"你不要做人，我是要做人的！"宋子文勃然大怒，也不管面前是妹夫还是委员长，"你胆敢碰汉卿一根毫毛，我就把全部内情公布于世。不仅让国内老百姓知晓，而且向全世界发布新闻，让外人也可以了解你！"

蒋介石无言以对，像没听见一般。宋子文喘着粗气，恼恨交加，转身即走，将门摔得"砰"的一声响。

三十日下午，宋子文再度驱车去见蒋介石和宋美龄，很晚才沮丧地回到北极阁。

"汉卿，有件事你听了不要激动。"宋子文垂头丧气地说，"西安的事情委员长面子上很不好过，反复考虑，觉得还是要走走过场。军委会明天上午要组织对你进行审判，走走形式，审判一完，就马上宣布特赦。"

张学良怎么也没有想到，他将面对的是军委会的军事法庭。要在往日，张学良一定会拍案而起，怒不可遏，可是，一连几天来的沉郁和对西安方面的挂牵，使他不得不再次退让。听宋子文说完，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坐了一阵，又默默地回到自己房间。

李烈钧后来著文回忆说：

"我被特任为高等军法会审审判长审判张学良的消息，京沪各大报纸均予披露。中央很多要人都来找我，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其中以宋子文和傅汝霖两人最为关心。他们先后来找我详细询问处理此案的意见。我回答说：'我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一切秉承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意旨办事。'

"三十日，我去见蒋。蒋让座后，问我：'审判长对此案将如何处理？'我回答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的打算，但能悔改，亲送委员长回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免对他的处分而释放他。'我完全是为蒋着想，愿蒋借释张而使国人因此崇拜蒋胸襟的'宏伟'。我接着又说：'我

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一个是齐桓公，他不追究管仲对他曾有射钩之仇，却拜管仲为相。另一个是晋文公，寺人披几次要谋害他都未得逞，后来有人要谋害晋文公，寺人披闻知，赶到晋文公处告发。晋文公先不见他，经寺人披说明来意后，晋文公宽恕了他，并接见了他。这样，晋文公终于免受一次暗害。这两桩历史事件可否作为本案的参考，请委员长核示。'蒋未置可否。我临走时，又对蒋说：'关于此案，我将依军法审理。'蒋说：'君慎重审理之。'我于是告辞而出，筹备明日开庭的事情。我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但此案所关重大，我将慎重审理。"

三十一日晨，张学良穿好军装，又蹬上锃亮乌黑的马靴，扎上武装带，漂亮的小手枪斜佩于腰间。这是他来南京后第一次全副武装。作为一级陆军上将，号令数十万大军的统帅，他希望在法庭上展现出他将军的威势。这一点，他相信不是几句胡诌瞎扯的审判词所能夺去的。

可是，刚进入候审室，一名宪兵便迎上前，木然地说："按照法庭规定，请您摘下领章、肩章，还有腰间的手枪。"

有生以来，张学良还未受过此等侮辱，一股怒火直冲脑门，令他雄狮一般怒视着宪兵。大概是从未受过如此高官阶将军的逼视，宪兵怯懦地侧了侧身子。

张学良昂首挺胸，大踏步而入。

李烈钧见参加会审的人员到齐，乃于休息室召开预备会，就审问要点逐项交换意见，大体上没有什么异议，只其中照例要问的几项，如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等，鹿钟麟认为似嫌过于形式，为照顾事实，且免得张学良难堪，提出可否略去不问，代为填上，李烈钧颇以为然，当即采纳。

十时整，李烈钧偕全体会审人员走进法庭，分别入席。坐定后，李烈钧命鹿钟麟先至候审室巡视。当时张学良由宋子文

陪同已在该室听传，鹿和张相见，先与之握手，继说："汉卿，今天开庭，有话尽管说！法庭内不许携带武器，如身边怀有武器，可放在外边。"

法庭四周，布置周密，警戒森严。奉审判长之命，张学良被带进法庭。不一会儿，张学良面带笑容，趋立案前。因为张学良是陆军上将，又是未遂犯，李烈钧让他坐下，但他仍笔直地站着。

"你知道犯了什么罪吗？"李烈钧问张学良。

"我不知道。"张学良回答说。

"陆军刑法的前几条，都是你犯的罪。你怎胆敢出此？我们准备了一份向你提问的问题，要你逐条回答。你愿先看看这些问题吗？"李烈钧一边翻开陆军刑法，一边对张学良说道。

"很好，请给我看看。"张学良回答说。

"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何劫持长官，进行叛变？"等张学良看完问题后，李烈钧径直质问他。

"这个问题实在太大，一切经过的详细情形，蒋委员长知道得很清楚，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便可明白，在此地我不能随便说。但我绝对不是劫持委员长，而是爱护委员长；我也绝不是叛变，相反，而是爱护我们的国家民族。我在蒋委员长面前陈述了我们的意见，表明了我们的主张，怎么能说是叛变呢？如果是叛变的话，请问审判长，蒋委员长今天不是安全回到了南京，我张某人不是也跟随他到南京来了吗？"

张学良态度从容，答话直率，铿锵有力，毫无惧色。事后，李烈钧撰文回忆说："我心想，学良真不愧是张作霖的儿子啊！"

"你胁迫统帅，是受人指使呢，还是你自己策划的？"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主意。一人做事一人当，我所做的事，我自当之。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张学良毅然回答

说。

“我有一句话，想请教审判长，可以吗？”张学良反问审判长道。

“当然可以。”李烈钧不摸底细，爽快地答应说。

“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有这回事吗？”张学良问道。

“是的，有此事。”李烈钧回答说。

“审判长在江西起义讨伐袁世凯，为的是反对袁世凯的专制与称帝，对吗？”张学良语气平和，很有礼貌地又问道。

“是的。”李烈钧点头承认。

“你在湖口起义反对袁世凯实行专制，如果这是正义的行为，那么，我在西安用兵谏的方式制止蒋介石的独断专行，何罪之有？”

法庭上的张学良大义凛然，侃侃而谈，毫无顾忌。

“胡说！那袁世凯怎能与蒋委员长相提并论？你在西安搞事变，是自寻末路，怎能归罪于谁？”李烈钧蓦地被张学良将了一军，尴尬至极，语无伦次，气急败坏地斥责道。

这时，法庭空气异常紧张，亦颇具戏剧化：受审人的声音比审判官声音大；受审人讲的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有道理，比审判官讲的更具说服力。张学良振振有词，几乎把李烈钧问倒。

“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将中央和地方的大员统统拘留起来呢？这不是叛变吗？”李烈钧又强打起精神，提高了嗓门，厉声问道。

“审判长，您不提这班大员倒也罢了，您定要提起他们，那我只好直说。这班大员平时穷奢极欲，把国家大事丢在脑后，我国糟到今天这种地步，他们是要负责任的。这次西安事件，我只对蒋百里先生表示敬佩，因为他现在不是大官，为人

相当正派。其他诸人当然也有令我敬佩的，但太少了。这班大员，勇于私斗，怯于抗战，一点为国家民族牺牲的思想都没有，难道这班人也值得受人敬佩吗？譬如陈调元，身为军事参议院院长，在西安扣留期间还有心情调戏万耀煌的姨娘，这种老而好色之徒，您还认为值得敬佩吗？再如陈诚，平时口出大言，装模作样，貌似忠诚，一旦领袖蒙难，他既不设法营救，也不拔枪自戕，却一头钻进垃圾箱里，难道这种大员也值得人家敬佩吗？"

张学良侃侃而谈，连续地向李烈钧发问道。

"不要说了，与本案无关。"李烈钧急忙制止说。

"这怎么能说与本案无关？凡事都有个根，这个根如果没有毛病，他的枝叶一定鲜艳茂盛；如果这个根有了毛病，它的枝叶便要枯萎坠落。"

休息片刻，继续审讯。

"你在西安做的事，应据实供出。你是否受外党的拨弄，不然何以糊涂至此？望你抓紧时机，从速实告。"李烈钧劝告张学良说。

这时，张学良要求作一总的答复，李烈钧同意。张学良随即作了如下一段陈述：

"这次事件，皆由我一人负责。我对蒋委员长是极信服的，我曾将我们的意见，前后数次口头及书面上报过委员长。

"我们痛切地感到难过。国土年年失却，汉奸日日增加，而爱国之士所受压迫反过于汉奸，事实如殷汝耕同沈钧儒相比如何乎？我们无法表达意见于国人，也无法进谏于委员长，所以，用此手段以要求领袖容纳我们的主张。

"我可以说，我们此次并无别的要求如地盘、金钱等，完全是为要求委员长准许我们作抗日的一切准备行动，开放一切抗日言论，团结一切力量抗日。我认为眼下中国若不打倒日

本，一切事全难解决。中国抗日非委员长领导不可，只不过我认为委员长还未能将抗日力量十分发扬，而亲日者之障碍高过于抗日者之进行。

“我此次来京，也有三点考虑：（一）维持纪律，不隳我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二）恢复领袖之崇高尊严；（三）此事责任皆由我一人承担。

“我并无一点个人的希求，一切的惩罚我甘愿接受。我写给委员长的信，不知道他要发表的，否则我不写。原先我们也想不这样做，因为事情紧迫，无法更好地做出来。

“我始终是信佩委员长的，而且看见他的电文更加钦佩。至于个人的生死毁誉，我早已置之度外。

“如不是崇信蒋先生之伟大精诚，其他如中枢怎样处置，那我是不在乎的，也可说是不接受的。我对于我们之违反纪律之行动，损害领袖之尊严，我是承认的，也是愿意领罪的。但我们的主张，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我在西安发动的事件，确有颠覆政府的意图，但根本的目的无非是要求委员长团结御侮、抗日救国。”

“既然如此，又为何亲送委员长返京？”李烈钧追问道。

“我在事变中，意识到委员长被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和患恐日病等分子所包围，其本人还不是没有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想法，且委员长又答应了我们所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团结御侮、抗日救国的目的既达，个人得失在所不计，特随即来京待罪，请给以应得的处分！”张学良坦然答道。

片刻，李烈钧向全场宣布，不再对张学良追讯其余。随即，宣读了判决书，主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蒋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

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月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

听了判决书，张学良心中非常气愤。判决书中不提其抗日主张，只说“强迫蒋委员长承 认其改组政府”；自己是自愿送蒋回南京的，可被说成是经“蒋委员长训责”，“旋即悔悟”，“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为此，他要申辩，然而，法庭不允许他再说什么。

至此，审判终了，总共不到二十分钟。张学良核对了记录，签字交回，经全体审判人员传阅并签署后，呈送蒋介石。可是，此记录蒋介石“恐尚未寓目”，即将军事委员会事先准备好的判决词发下。判决词主文如下：

“张学良首谋伙党，对于上官暴行胁迫，判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

判處張學良徒刑

並褫奪公權五年仰呈國府核定

軍事委員會高等軍法會審判決書

判決

被告張學良

主文

事實

南京 中央日报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被判处十年徒刑。

军法会审之后，李烈钧说了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打心里满意这句话。他说，——当然，他不是直接跟我说的，他说的这句话，对我父子俩都有意思，他说："真不愧为张作霖的儿子！"

事实确是如此，李烈钧曾对人说起这次高等军法会审："那简直是演戏，我只不过是奉命扮演这幕戏的主角而已！张汉卿态度光明磊落，对话直率，无所畏惧，真不愧为张作霖之子！"

副审判长鹿钟麟后来回忆会审经过时，也直言不讳地说："所谓高等军法会审，只不过是蒋介石所玩弄的一套把戏，立法毁法，在其一人。"

审判结束，张学良被正式"逮捕"，送往和平门外孔祥熙的别墅，由宪兵和特务看管。从此，他失去了自由。

然而，蒋介石的戏还没有演完。三十一日下午，蒋介石向国民政府递送了请示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原呈这样写道："……呈为呈请事：窃以西安事变，西北剿匪副司令张学良，惑于人言，轻于国纪，躬蹈妄行，事后感凛德威，顿萌悔悟，亲诣国门，上书待罪，业蒙钧府饬交军事委员会依照陆海空军刑法酌情审断，处以十年有期徒刑。大法所绳，情罪自当，从轻减处，已见宽法。……敬恳钧府俯念该员勇于改悔，并恪遵国法，自投请罪各情形，依据约法，更沛仁施，将该员应得罪刑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藉瞻后效，而要示逾格之宽仁。是否可行，理合备文呈请，仰祈鉴核施行。"

该特赦呈文于高等军法会审宣布判决后两小时，即送达国民政府。

新年休假期满。四日上午，林森召开国民政府委员会议，出席的有：王伯群、邓家彦、马超俊、李文范、经亨颐、陈立夫、叶楚伧、宋子文、李烈钧、张继、冯玉祥及王正廷等。林


國府明令特赦張學良
仍交軍委會嚴加管束
國府明令
國府令議

国府明令特赦张学良，仍交军委会严加管束的报道。

森将蒋介石为张学良请求特赦的呈文连同司法院的核议作了说明，旋付表决。会议一致通过准予特赦，并于当日下午由国民政府发布如下命令：

“张学良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

“严加管束”是个活扣，可松可紧。事实上，张学良在“严加管束”之下被囚禁达半个世纪。

正如此案审判长李烈钧后来所评述的那样：“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生禁锢，蒋介石这人真狠毒啊！”

第六十九章 软禁南京

1937.1

——“当时在西安，我如果不冒险送他回京，日后早晚也会有变化。……不过，委员长这一手，更暴露了他的为人！”

——“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的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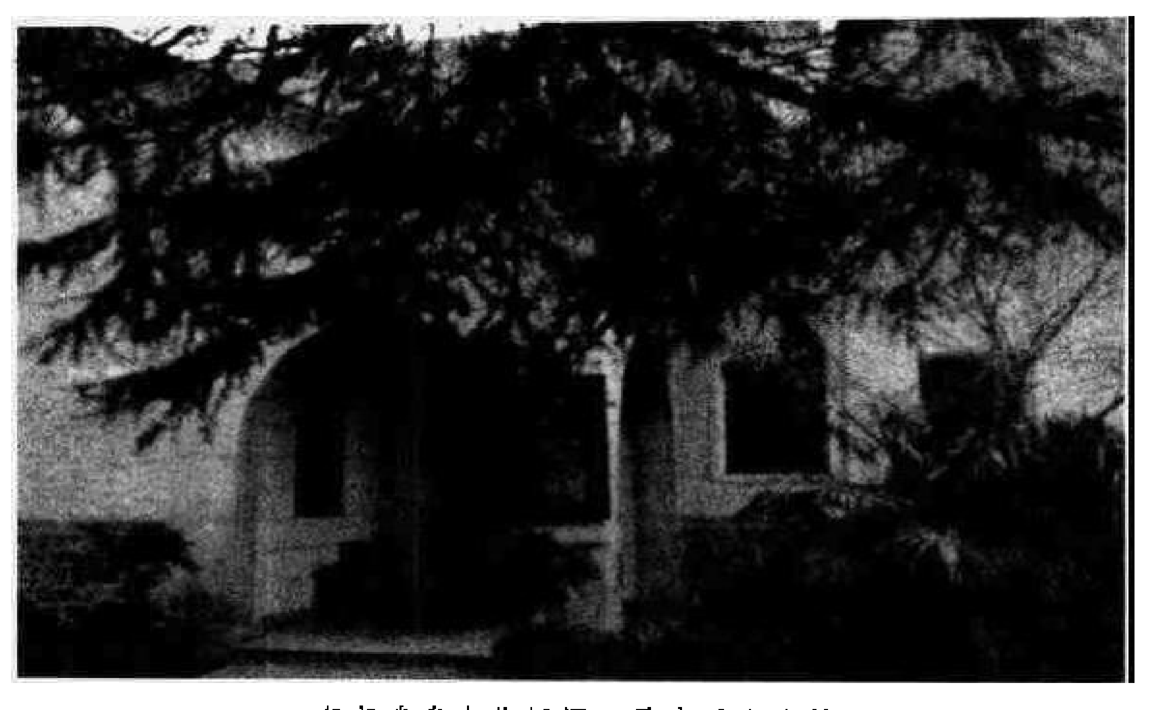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为国为公而遭贬谪的人，何止我张学良一人，我会自解的！”

“我这一次来京，是听候处分的！”

在北极阁宋公馆，张学良对前来造访的孔祥熙开玩笑说。

“有处分，我陪绑去。”孔祥熙颇为豪爽义气。

军法会审后，张学良的车子并未开回宋公馆，而是直趋孔祥熙公馆。这幢华丽雅静的公馆，所有房子事先都已腾空，声



南京鸡鸣寺北极阁一号宋子文公馆

称愿意“陪绑”的孔祥熙，此时却早已不见踪影了。

审判结束后，宋子文、端纳去见蒋介石与宋美龄，商议如何履行在西安的诺言。

“委员长，汉卿的事怎样了?”端纳首先问蒋介石。

“判了十年徒刑，特赦文件什么时候发表?”宋美龄迫不及待地插问道。

蒋介石心里很不高兴，面露不快之色，慢吞吞地说：“两小时后就可以特赦了。”

端纳听了非常高兴。可蒋介石一挥手，又说道：“不过，这样做是不是好?”

“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委员长声望比以前更高，显出委员长的气魄宽宏，这不是很好吗?”端纳天真地应道。

“你又有什么新主意，你说说看。”觉得蒋介石的话里有话，宋子文立即变色道。

“大家不是都讲好了吗？”宋美龄也有点儿着急。

“大体上都依照你们的意思。”蒋介石慢条斯理地说，“但关于汉卿的问题，由我来处理吧。”

“你怎样处理？”宋子文急不可待地问。

“你不是说特赦吗？”宋美龄马上追问道。

“特赦是可以的，特赦的目的是使张汉卿不受牢狱之灾。但他这一次的行为，确非寻常，他的修身养性功夫实在太差，无论作为一个上司，一个朋友，一个同事，我都应该负责。”蒋介石表情冷淡地说道。

“你预备怎么办呢？”宋子文急忙问道。

“我预备在特赦之外再加上一句，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蒋介石冷冷地说。

“怎么，你变卦了？”宋子文生气地说。

“委员长，算了吧！”端纳顿时也显得很不高兴。

“我决定了！”蒋介石脸一变，气极败坏地说。

“不行，这样做绝对不行！你不让汉卿回去，你变卦了，我不干，你不能开玩笑，你不能开玩笑！”宋子文大声喊道。

“难道交给我看管，我会把他吃下肚去不成？”蒋介石也怒声相对。

“你这个流氓，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西北方面可能发动战争，我就要到上海去另想办法，不愿意同你这个流氓见面。”负责担保张学良安全的宋子文，此时看到蒋介石竟不认帐了，怒气冲冲地用英语骂道。

宋美龄则急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完了，一切都完了。”端纳流着眼泪叹息道，“包括张汉卿的前途，自己的前途，以及中国的前途都完了。我不愿意留在中国，我要走了。他（指蒋介石）一定会遭到惩罚。”

参与监禁张学良的军统特务邱秀虎回忆说：“监视看守张



一九三七年，幽禁生活开始时的张学良。

将军，当时由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军统局方面是由该局书记周伟龙负责，派有军统局特务队队员十五人，由王芳南任组长。宪兵司令部方面，是由警务处处长丁昌负责，实际上是由该部中校处员欧阳湘负责。另有宪兵特高组组员七人。还有武装宪兵一排担任孔公馆大门和房屋周围的武装警卫。从这时开始，对张学良将军的监视就从暗中变为公开了。在二楼张住房的楼梯口站有武装宪兵，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还各派一人配合武装宪兵在住房门口监视。楼下周围设有宪兵和便衣，并有游动哨。孔公馆的门外也站有武装警卫。自到孔祥熙公馆后，张将军就完全失去了自由。”

张学良被逮捕囚禁后，在孔公馆里呆坐着，整天不发一言。送去的菜饭虽然很丰盛，每天要吃百元的西餐，连特务队员的伙食费也一天十二元，这在当时是了不得的豪华，可说是“顿饭成席”，但张学良吃得却很少，每天闷闷不乐，蒙头大睡，也没有访客来和他讲几句话。

有一天，一名特务发现张学良在睡觉时把身上穿的一件背心脱下来垫在床上，就睡在这背心上，便认为这件背心里一定藏有什么秘密，或者藏有武器，但又不敢公开去检查，即向负责的特务报告了。于是，他们便派宪兵特高组的一个组员，在张学良睡后翻身的时候去探查。当这个特务偷偷摸摸去检查时，什么东西也没查到，却被张学良发觉了。张学良非常不高兴，大声对这个特高组组员说：“你们真缺德！真缺德！”

这就是张将军被囚禁后所讲的第一句话，可见他的心情是何等愤懑。

被囚禁的第二天一早，宋子文、宋美龄和端纳，这三位西安事变的当事人，相继来到孔公馆，看望并安慰张学良。

宋美龄显得尤为尴尬。早在离开西安的飞机上，她心里就有某种预感，但想到委员长总算是从张学良手中走脱的，而且

少帅又亲送回京，蒋介石再狠也不至于恩将仇报。

回到南京的第二天，蒋介石听说有许多军政大员、新闻记者都去看望张学良，连许多群众都争相去一睹少帅的风采，当即就骂了声："娘希匹！"随后，又恨恨地说，"把他捧成民族英雄，我成了什么？"宋美龄这时便感觉有些不妙。

也就在这天，冯玉祥去看望蒋介石。言谈中，蒋介石突然冒出一句："我哥哥蒋介卿，可是为西安事变而死的啊！"当时，宋美龄也在座，心中暗暗为张学良捏了把汗。

屋子里的沉默渐渐转化成张学良无声的谴责，几位客人如坐针毡，极度不安。宋美龄暗暗向宋子文使了个眼色，示意由这位胞兄来打破难堪的沉寂。

"汉卿，"宋子文也早已受不了屋里令人窒息的气氛，怯怯地说道，"我没有料到有这一步。"

"我早该料到有这一步！"我突然大声嚷道，"当时在西安，我如果不冒险送他回京，日后早晚也会有变化。不说别的，单说东北军的几十万将士，个个都有国仇家恨，我自己也控制不了的。不过，委员长这一手，更暴露了他的为人！我个人是很渺小的，如何处置我，我可以不计较。只要委员长能认清大局，不反悔在西安达成的条件，大家一致对敌，领导民众抗日，我也就了却心愿了！"

"汉卿，"宋美龄欲转开话题，"你看是不是找个什么清静的地方，好好歇一歇，这些年来你也……"

"你说得这么轻松，汉卿他现在已没有自由了！"宋子文猛地打断妹妹的话，撩开窗帘，指指外面来回走动的特务说，"他蒋委员长这种行为，简直没有做人的基本信义。你也来帮着他说话，我为你感到难受。"

宋美龄尴尬至极，掩面而泣。

"我要说的话，同子文一样！"端纳此刻也已怒气冲冲。这

次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端纳立了大功。一回南京，蒋介石便论功行赏，授予他一枚最高宝石勋章。此时，这个奖赏已成为一种讽刺。

“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蒋先生会是这样一个人！我在中国几十年，为中国人重信厚义深深折服。这一回，我冒着风险，三进三出西安，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可是却伤了汉卿，犯了个大错。我过去很自豪，为自己做过汉卿的顾问，后来又做蒋先生的顾问而感到光荣，现在我才明白，他把我只看作了一本字典，一根手杖。我为这个感到痛心，恨自己错看了人。”

“不，端纳先生。”张学良为端纳的话所感动，上前握了握他的手，说道，“看错人的应该是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同一个毫无信义可言的人讲信义！”

一九三七年一月一日下午，一场争吵发生在蒋介石官邸。

“大令，”不知什么时候，宋美龄已坐到了他的身边。蒋介石一怔，回过头，见宋美龄一脸阴郁，眼圈微红，似才哭过。

“你这是……”蒋介石嘴上在问，其实心中早已明白了。

“大令，这几天，子文同你吵了好几回了。他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实现在西安许下的诺言，没脸再见汉卿和其他人了。先前端纳先生告诉我，他对这个结局也很失望，打算辞去顾问，离开中国。”宋美龄伤感地说，“大令，我觉得你也应该好好想想，他们毕竟为你出过力、冒过险啊！”

“冒险，冒险！在西安，有谁比我冒的险更大！华清池那天早上，弹雨横飞，乱枪四射，邵元冲、蒋孝先不就被张汉卿的部下打死了吗?！要是哪颗子弹偏一点点，打到了我蒋某人的身上，你们现在还会为张汉卿求情吗？政治是要流血的，不是靠感情来支配的！”蒋介石已是青筋鼓胀，呼呼地直喘粗气。

“好歹汉卿也是个重信义的人嘛，不然他会亲自送你回南京?”宋美龄腾地站起身，涨红着脸说。

"我早就叫他不要来，不要来！他自己非要到南京来负荆请罪，我有什么话说？再说，南京的事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就算的！"蒋介石忍不住大吼起来。

"可你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啊！"宋美龄仍不退缩。

"这件事你不要管了。我已经对侍从室说了，明天我就离开南京，回家乡溪口休息养伤。"蒋介石阴沉着脸说道。

话说西安方面。当张学良陪着蒋介石一行乘车疾驰而出西安北城门的时候，高崇民奉张学良的命令正在召集高级将领们开会，商议在什么条件下和什么时候才可以让蒋介石离开西安。

会议刚开到一半，门被撞开了。东北军秘书处处长洪钫惊惶失措地告诉大家，少帅已陪同蒋介石夫妇等人去了机场，并将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这些提着脑袋跟随少帅一同举事的将领们，被这消息惊得目瞪口呆，会议室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

突然，有人"哇"地一声大叫，随即爆发出呼天嚎地的痛哭。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追随张氏父子南征北战，在战场上出生入死连眉头都不皱一下，此时却像落入深渊一般捶胸顿足地大喊："完了，完了！""荒唐啊，荒唐啊！"

只见高崇民抑止住恐慌，站起身一声大吼："别闹了！副司令坦荡磊落，独闯南京，抵得住他老蒋在潼关的几十万大军！西安将因为少帅而免遭战火之灾！"

可是，未及把话说完，高崇民已声调颤抖，泪垂两行。

消息传到西安王以哲军长的公馆，王以哲当场掩面痛哭。

二十六日一大早，杨虎城便收到张学良发自洛阳的电报，要他释放陈诚、卫立煌、朱绍良、陈调元四位大员回南京。从本意上讲，在张学良返回西安之前，他不想释放被扣的任何一人。但兵谏一事非他杨虎城一人所为，少帅虽走，东北军的诸

位将领还在，若不征求他们的意见，势必会生出两军的矛盾。于是，杨虎城下令，请东北军的两位军长王以哲、何柱国来新城会客厅商议。

果然，两位军长一见是张学良的电报，当即便表示同意释放，而且还认为，不仅要放陈诚等四位，所有被扣的军政要员都应统统放走。

然而，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等人坚决反对，他们匆匆赶到杨公馆，代表少壮派军官们向杨虎城进言。

“昨天副司令还对我说，他到南京去的事不用担心，中央有十几位大员在西安我们的手中，不用怕。副司令显然是用这些人来作他安全的保证。一家伙全放光了，副司令的安全怎么办？”孙铭九大声说道。

“这十几个人是蒋介石的心腹，蒋介石不会不管。不见副司令我们不放人，老蒋就不敢为所欲为了。”应德田也附和道。

“可这是副司令的亲笔信，又是发给杨主任的，不放人，杨主任怎么办？副司令在那边又怎么对老蒋说？”王以哲扬着手上的电报反问道。

“不能放，一放就害了少帅！”孙铭九言语沉痛，已带哭声。

“请各位长官三思，决不能先放人。我们可以再给副司令去封电报，就说请他回来亲自主持放人的事……”应德田和卢广绩也大声嚷道。

“不要再说了！”王以哲一声大吼。眼下在西安，他是张学良在东北军中的最高代表。少帅何时回返尚不得而知，若军中起了内乱，岂不坏了大政？想到这里，王以哲咬紧牙关一字一顿地说，“任何人胆敢不遵守副司令的命令，格杀勿论！”

孙铭九、应德田、卢广绩脸色顿变，甚至连杨虎城听了这话，也不免吃了一惊。

曾率兵攻入华清池捉拿蒋介石的白凤翔师长，在得知蒋介石、张学良均已离开西安的消息后，郁闷难解，独自提着酒瓶灌了个酩酊大醉，然后揪住妻子，大打出手，发泄他心中的忧愤。

四天过去了，突然传来张学良在南京受审的消息。整个西安顿时人心惶惶，奔走相告，不知所措。随之而来的，又是南京方面步步紧逼的军事高压。

元旦之后，十几个师的兵力向西安集结推进，至潼关、华阴、华县一带布阵筑垒，炫耀武力，而统率中央军的将军，几乎全是刚刚由张学良下达手谕、由西安释放的南京军事大员，如陈诚、卫立煌、蒋鼎文和朱绍良。此种情形令西安忍无可忍，与中央军决一死战的情绪逐渐占据上风，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三方都作了军事部署，准备对进犯的中央军予以反击。

一月五日，以杨虎城为首的八位将领，向南京发出了一封后来被称作“歌电”的通电，电文如下：

“……凡我国人均公认张副司令只知爱国，纯洁无他，苟可救亡，粉身何惜！……忆蒋委员长到京之后，曾令中央军向东撤出潼关，而离陕之前，更有‘有我在，决不能再起内战’之语。乃正当蒋委员长休沐还乡，张副司令留京未返之际，中央军匪惟遵令东还，反而大量西进。如不问土地主权丧失几何，西北军民之真意为何，全国舆论之向背如何，而惟知以同胞血汗金钱购得之武器施于对内，自相残杀，则虎城等欲求对内和平而不得，欲求对外抗日而不能，亦惟有起而周旋，至死无悔……”

同日，杨虎城又派出三位代表赴南京，陈述西安的要求。三天之后，东北军、西北军一百二十六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完全支持八位将领在“歌电”中所采取的立场。

蒋介石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烦恼：是答应西安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继续拖延这一政治和军事僵局，时间已不允许他再作过多的犹豫。

一月七日，已抵奉化溪口老家养病的蒋介石，亲笔给尚在南京孔祥熙公馆的张学良写了一封信：

汉卿吾兄勋鉴：

……在乡医嘱静养，山居极简，略愈当约兄来此同游。关于陕甘善后办法，中意：(一)东北军应集中甘肃，其统率人选可由兄推荐一人往率领，使免分散，以备为国效命。(二)虎城可酌留若干部队在西安，使其能行使绥靖职权。请由兄手谕告虎城及各将领，勉以切实服从中央命令，不可再错到底。若再不遵中央措置，则即为抗命。国家对抗命者之制裁，决不能比附于内战。而且中央此次处置，全在于政治，而不用军事。兄如有所见，并请酌为补充为荷。

此信写毕之后，蒋介石专召戴笠将信亲自送到南京，交给了张学良。

阅罢蒋介石这封硬软兼施的信，张学良半天没有吭声，只默默地坐在沙发上，愣愣地出神。而其内心，则如江河决堤，波涛汹涌。

反复思忖之后，当日，张学良提笔，给杨虎城写了一封信：

虎城兄大鉴：

委座返奉化为其老兄之丧，南京之处置，有多不合其意。兹由奉化七日早之函，委座亦十分难办，但此事仍有转圜办法，切盼勿发生战争，在此星期容弟在此间设法。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请兄稍忍一时，勿兴乱国之机也，仍能本我等救国之苦心，全始全终为祷！专此并颂

近安

弟良顿首

此时，张学良认为，内战会有损国力，不利于抗日；倘若内战再起，人们必然看作是他发动西安事变的后果，为万人所责怨。于是，他一再叮嘱杨虎城，千万不要诉诸武力。

接下来，张学良又写了两封信，一封给东北军诸将领，一封给杨虎城并西北军各将领，除陈述他不愿看到西安出现战事外，又嘱众将领释放所扣压的南京方面的飞机。

在张学良下令释放飞机和空军人员之时，可能他并没有去想一想，他将就此失去争得自由的最后的砝码。

三封信写完后，即由看守张学良的卫兵送给戴笠。下午，蒋介石便从南京发来的电报中获知了信的全部内容。看到这只笼中之虎已在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他颇为得意。

“好嘛，汉卿还是理解了我的意思嘛。给南京回电，派几个交涉代表，把这几封信带到西安，交给杨虎城。”蒋介石开心地说道。

交涉代表很快便由戴笠物色好了。

一月八日，张学良刚刚起床，打开门一看，东北名流王化一、吴瀚涛立在客厅。

“少帅，好久不见，您瘦多了。”王化一声调有些凄楚，“还望您珍惜身体，准备率领大军抗敌。”

“是啊，少帅，”吴瀚涛接着说，“这次我们俩专程去西安送您的信，同时还想问问，少帅有没有话捎给家人。”

张学良凝神地望着客厅角落处的一个大花瓶，好半天没有吭声。

“少帅，”王化一又开口道，“现在这个局面很让人担心。作为东北人，我们非常盼望您能站出来，制止战事的爆发。少帅有什么话，我们一定向西安方面转达。”

“我没有料到，我会在南京一留不回，好多事情都无法亲自料理了……”张学良终于开口说道，可话未说完，眼里已是

泪光闪闪。

交谈中，又提到捉蒋。王化一问："要想抓人，为什么不借在城内纪念周的机会，可以不动一枪，一网打尽？"

"你这是事后诸葛亮。"张学良说，"当时对蒋是否采取这样的行动，考虑至再至三，总是希望能用说服的办法，联合一致，抗日救国。接到你的电报，和他当天斥责黎天才的情况，才肯定他不但不能接受抗日主张，反而相逼过甚，迟则必遭意外，因之临时决定，临时布置。白凤翔、刘桂五等行动又不恰当，闹得破头乱齿的，至使蒋先生受了伤害，还使他随行人员遭伤亡，出我意外，非常抱歉。中央扣留我，西安将领发出歌电，何应钦调兵遣将，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如果发生冲突，不可收拾，使抗日力量因内战而消耗，敌人更可不费兵力，消灭我们，和我的初衷完全相反，这是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言毕，痛哭失声，王、吴两人也同时落泪。监视人员借换茶为名，进来东张西望。

张学良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写好的两份遗嘱，交给王化一。一份是给他家属的；一份是写给张作相、万福麟、于学忠、王以哲等全体东北将领的，表示为造成混乱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将自杀以谢天下，以明夙志。

王化一看了张学良的遗嘱，心中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痛。

"局势真的到了最后的关头吗？"两人安慰张学良说，"只要有一线希望可图，我们就尽最后一份力量。即使决裂，也不能轻言牺牲，未来是怎样一个结局，还不可知。你不是常说吗，中国是亡不了的，何必如此悲观。西安的事，本意还是为国为民，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副司令正当盛年，年轻有为，前程远大，万不可说出让大家伤心的话来。"

王化一、吴瀚涛抵西安后，即把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亲笔信交给了杨虎城，并把张学良的话向其转达。于是，杨虎城召集

了一个圆桌会议，参加人员有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将领，共产党代表博古及东北军将领马占山、鲍文樾、米春霖等人。

会上，王化一将张学良的意见作了转达，主旨是以抗日救国为重，力求和平解决事端。

在王化一讲话中间，东北军刘佩苇、杜维纲两位团长站起来吵吵嚷嚷。刘佩苇掏出手枪，往圆桌上啪地一放，大声喊道："无论说什么，不放张副司令，一切谈不到。我全家老婆孩子都准备牺牲。"

他们两人的举动，无疑是向南京的一种示威，但与会者则力劝道："要安静些，要安静些，王、吴两先生是传达消息，又不是南京代表，说这些有什么用。"

最后，杨虎城说："大家听了张副司令的意见，请好好考虑考虑，回头我们再开会商讨办法。"

经反复研究，西安方面同意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但要求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一）即日释放张副司令回陕主持一切；（二）蒋介石必须实行在西安的诺言；（三）中央军队须撤回原防；（四）西安方面派代表去南京商谈。

王化一、吴瀚涛在西安活动三天，完成了传达消息的使命，于一月十一日上午飞回南京，赵四小姐也随机同行。

返回南京之后，王化一等往见何应钦，报告了西安之行的情况，谈了一些两军停火、开始和谈乃国家民族之幸的赞誉的话。王、吴还特别强调了杨虎城和东北军将领要求张学良回陕的问题。

十二日晚，戴笠邀王化一、吴瀚涛共赴孔祥熙公馆面见张学良，王、吴报告了西安之行，以及西安方面的代表米春霖已到南京的消息。

我说，我心平气和地尽我最大力量挽此危局，保存国家元

气，准备抗日。不但东北军、西北军应当同中央军团结在一起，中央军和红军也必须团结在一起，全国抗日力量都须团结一致，只要全国一致抗日救亡，我个人生死安危，无足计较。

至此，王化一和吴瀚涛总算是不辱使命，很快便得到了西安方面的回话：同意停止军事行动，就释放张学良和部队改编、换防、待遇等问题进行谈判。

“歌电”的咄咄攻势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化解了，蒋介石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自从张学良送蒋介石去了南京，赵四小姐便一直处于惊恐交加之中。

“汉卿，你，你不能太意气用事！”从不干涉张学良政事的赵四，得知他要亲自送蒋回京，突然一声大嚷。

“怎么，你担心了？”张学良轻轻拍了拍她的肩头，“小妹，你放心，南京我又不是头回去，过上两三天，最多三五天，我就会回到西安。”

“不知怎么回事，这几天我总有一种预感，你会出什么事。”赵四抬起头，凄然地望着张学良。

“放心吧，小妹，我不会有事的。”张学良宽慰道，随即又严肃地说，“我对蒋介石怎么样，他心里有数，还不至于恩将仇报吧。若是真有不测，那我也是为抗日。为中国不亡，别说牢狱，就是刀枪相加，我也死而无悔！”

往事真是不堪回首啊！几天前，张公馆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瞩目的中心，可仅仅过了一个星期，这里景物依旧，但却人去音缈了。

正当赵四暗自垂泪之际，客厅里忽然传出一声问话：“四小姐在吗？”

像是杨虎城夫人谢葆贞的声音。这几日，她几乎天天都来张公馆陪伴赵四。

“杨主任、杨夫人好！”赵四连忙擦去泪水，又整整衣襟，走进客厅。她一边很有礼貌地问候，一边忙请两人坐下。

“这几天南京乱，西安乱，我心里也乱。”杨虎城一开口便沉重地说，“南京对待张副司令的事，大家都很气愤，但一时半会儿还没想出个妥帖的法子。今天来，是告诉四小姐一件事，南京派王化一、吴瀚涛到西安来了，捎来了张副司令的几封信。另外还有句话转告你：他在南京生活很不方便，想让你去南京见见他。他们二位明天就回去，你收拾一下，跟他们一块儿走。”

“谢谢杨主任、杨夫人。”赵四已经不知道该如何来应付这突如其来的消息，只木讷地说了这一声。

“你快收拾吧，我们不打扰了。”杨虎城说着站起身，“我们还给副司令准备了些水果，明天一起送到机场。这儿有我和几位东北军将领给副司令的信，你先看看，记下来，然后把信烧掉。请转告副司令，多多保重！”

赵四默默地点点头，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日，于凤至从英国给宋美龄发来一封急电，电文如下：

“亲爱的姊姊：听说张学良判罪，幸蒙特赦，但须严加管束，不知道如何得了！学良不良，离开我以后发生这件事，甚为遗憾。可否把他交给我看管，我当尽力而为，以不负兄姊等一番好意。”

于凤至想得也太天真了，蒋介石怎肯将负有“叛逆之罪”的张学良放出囚笼？在严酷的政治面前，所谓“兄姊之谊”，不过如纸一般苍白。

十天过去了，南京方面无一字回音。于凤至抹着眼泪，不得不踏上了归国之路。

在南京，张学良这只被囚禁的“东北虎”，脑际中一幕一

幕闪现的，是西安，是“三位一体”，是东北军……

想着想着，他听见身后的门开了，背后飘来一声女人的啜泣。那气息他再熟悉不过了。

张学良猛然回头，是她，果然是她，情牵梦绕的赵四！刹那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两人相顾无言，惟有热泪两行。

此时此刻，赵四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猛地向前扑来，喊了一声：“汉卿！”

“小妹！”张学良张开双臂，迎住扑来的赵四小姐。

跟在后面的戴笠和一名副官，很知趣地退出了房间。

那一夜，孔府楼上的灯光第一次透出了温暖。一个女人注人的生气，驱逐了朔风中不眠者的孤独。

第二天上午，宋子文驱车来见张学良。一见面，他便神情黯然地说：“汉卿，我是来向你告别的。”

“怎么啦，子文？你是要……”

“我已经无颜再见你，无颜再见西安军民。昨天晚上我同溪口通了电话，又同他大吵了一场，气得他摔了电话。后来美龄在电话中一再表示歉意，并让我转告你，蒋介石有意让你去溪口，说那里风景好，环境安静，你可以自由走动。说现在西安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你去了溪口，可以随时同他商量。我后来再也听不下去了，骂他们把汉卿还害得不够，还想要……”

“子文！”当时我打断宋子文的话，十分诚恳地说，“子文，你对我的情谊，这么些年来我一直铭记在心，这一次，我绝不会怪你没履行保证我安全的诺言。权在他手中，我没理由责怪你。我早已想好去过囚犯生活。在中国历史上，为国为公而遭贬谪的人，何止我张学良一人，我会自解的！”

“我不是禽兽，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抹一把泪，又说，“你为我操心，我心领了。只望你不要为我的事，误了自己的前程……”

“别说了，汉卿！”宋子文突然咆哮而起，“我如今已是负义之人，要那些前程又有什么用！我已经想好，明天就离开南京，回上海去过清静日子。南京的官，我再也不做，随他蒋介石独霸朝纲、不仁不义！”

“子文！”张学良也站起身，紧握住宋子文的手，“子文，你为我……”

“汉卿，事到如今，只有南京负你，蒋介石负你！你张汉卿光明磊落，坦荡无私，国人有口皆碑，哪还能向我表示歉疚！”宋子文越说越激动，平日温文尔雅的绅士派头已荡然无存。

“对不起了，汉卿！”宋子文泪如雨下，向张学良深深鞠了一躬，然后倒退着缓缓走出。到了门口，又猛然抬头，嘶哑着嗓子一声大喊：“你我后会有期的，汉卿！”

站在门外的卫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这位蒋介石的妻舅掩面而出，一边走向汽车，一边喃喃自语道：“Sorry！Sorry……”

端纳早已避开，蒋介石和宋美龄又去了溪口，宋子文也告辞了，“西安事变”的核心人物，只有他张学良一人尚在南京。西安方面虽已同意罢兵和谈，但他深知，杨虎城驾驭不了东北军，而东北军内部，王以哲、何柱国等一批老将领同应德田、苗剑秋、孙铭九等“少壮派”，在军务上早有不同之见，稍有不慎，自己的后院便要起火。

一想到两代人苦心经营的东北军，国仇家恨还没报，却有可能出现内乱的局面，张学良不寒而栗。作为东北军的主帅，他认为，虽身陷困境，仍不能无所作为。

张学良陷入了苦苦的思索。下午，他打电话叫来戴笠，要他转告蒋介石，自己决定接受蒋介石的旨意，去溪口跟他读书，反省作为，修身养性。

话一说完，一丝凄楚浮上张学良的脸庞。

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张学良在南京度过了最后一个夜晚。

次日上午十时，张学良、赵四小姐在戴笠及一班卫兵的“护送”下，离开南京，前往浙江奉化溪口镇。

第七十章　初 识 溪 口

1937.1

——“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

——“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为了我而误了前程，那就太可惜了。”

——“委员长是要等准备好了再对日本作战，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

张学良在宋子文等人陪同下，刚下飞机，就在宁波机场意外地遇见了张钫。张学良立刻敏感到，他一定是刚从溪口领受了蒋介石的命令。

“啊，汉卿，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你。”张钫的面色有些尴尬。

张钫是西安人，曾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后又任第二十路军总指挥。关于这次机场偶遇，张钫曾著文回忆道：

"我对张学良说：'你先别着急，到楼上洗洗脸，喝喝茶，休息一下我们再谈。'我们四个人一同上楼，宋子文、贺耀祖同时说：'请谈吧。'张学良问我：'你来干啥，委员长对你怎样谈的？'我说：'你放心！我决不到陕西去。你说：我若去你就回不去了，这是什么意思？'他神色紧张地说：'我曾经对虎城说，我把委员长送到南京就回去。'我说：'你把委员长送到洛阳，为什么不在那时就要求回去？'张没有答复这句话。接着，他说：'我不回去，彼此打起来可不好。'我说：'不会吧。'他仍在喋喋不休地和我谈，可宋子文却一言不发。我因为飞机就要起飞，便和他们三人匆匆告别，离开了奉化。谁知从此再也未能见到张汉卿。"

从宁波机场出发，张学良一行人马车行大约三小时，速度明显减缓下来。

"怎么，到了？"张学良问身旁的戴笠，老戴点了点头。

"这儿离溪口镇还有几里路，委员长的住地离这儿不远。由于给副司令准备的房屋还未收拾停当，今天就暂时住这儿了。"戴笠指着那片房舍说，

张学良走下车来，见这儿视野开阔，环境安静，满意地点了点头。当他目光转向不远处的山口时，只见兵士散布，如临大敌，脸上顿时有些不悦，向戴笠皱了皱眉。

戴笠讨好地笑了笑，说："这儿是委员长的故居，现在副司令又来了，不得不加强安全防卫。负责副司令驻地保卫的是宪兵连的陆连长。"

接着，戴笠又指着站在身后的刘乙光对张学良说："乙光在这儿，专门负责副司令的内卫。有什么事，你尽管吩咐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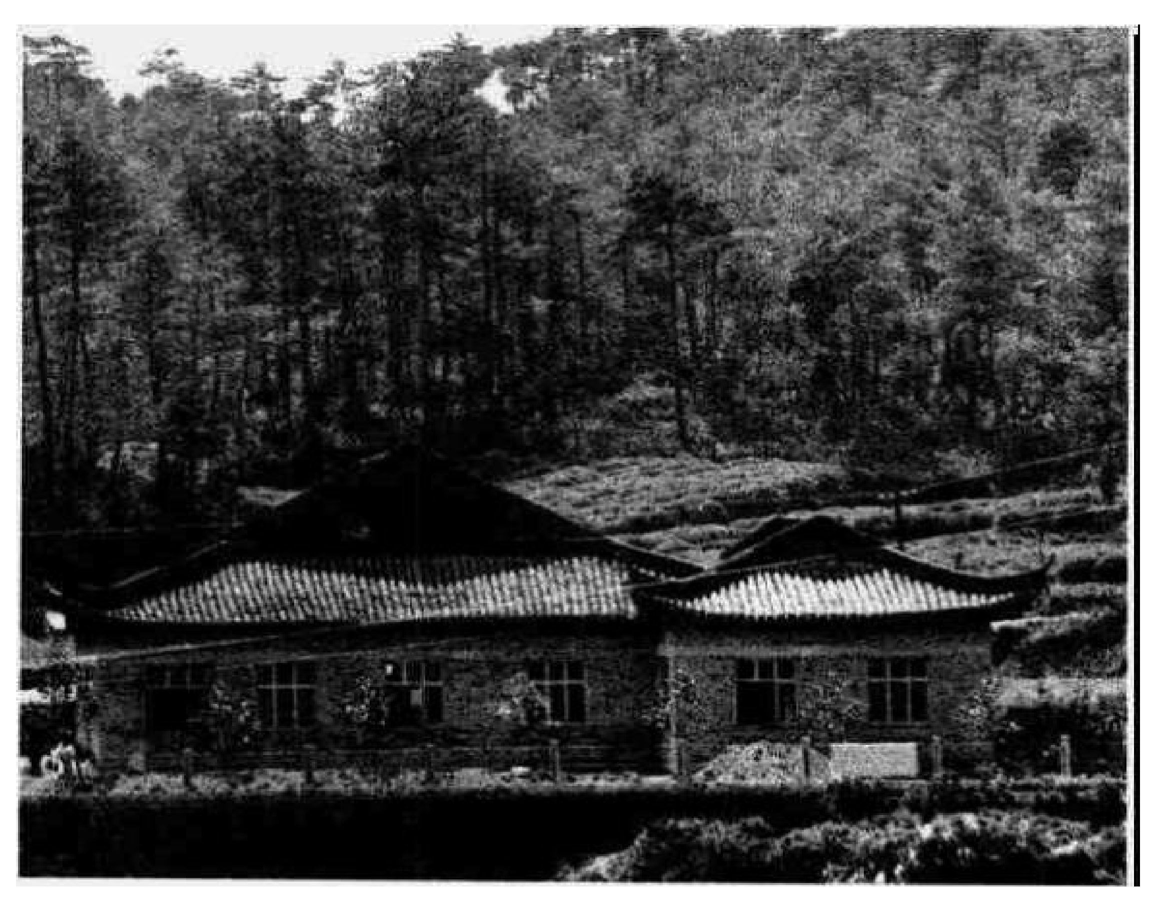
说完，他向刘乙光招了招手："乙光，副司令的安全，今

后就交给你了，要是有什么差错，别说是你，就是我戴笠也担待不起哟！”

“请局座放心，乙光将全力而为。”刘乙光向戴笠敬了个礼，又转向张学良道，“副司令日后有何差遣，尽请吩咐，乙光将尽心为之！”

张学良朝刘乙光瞟了一眼，见其个头不高，大约三十七八的年纪，军阶是中校。他有些淡漠地挥了下手，口里“嗯”了一声。

此时，张学良绝然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刘乙光，将从此陪伴他后半生几十年的幽禁岁月，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浙江奉化雪窦寺，位于溪口镇西北。张学良于一九三七年二月住此。

张学良在武岭文昌阁刚刚住下，即提出前去拜见蒋介石，但却未获批准。两天后，蒋介石给戴笠下达命令，将张学良移至溪口镇西面约十五六里的雪窦寺中国旅行社。

雪窦寺因建于雪窦山而得名。雪窦山层峦叠嶂，风景优美，游客众多，名闻遐迩。山上有高不可攀的徐凫岩，山中有峭壁凌空的三隐潭、瀑布直泻的千丈岩和空谷幽深的妙高台，山下则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入山亭。

一大群人拥着张学良进了一楼宽大的客厅。其中，除了戴笠、刘乙光等人外，还有张学良的两名副官，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及其夫人傅学文，从宁波陪同张学良来奉化的杭州市市长周象贤，以及杭州市警察局局长等人。赵四小姐因听说于凤至将于近日来奉化，在头天便与少帅挥泪而别，去了上海。

吃过午饭，陪同的人渐渐散去，戴笠也告退去了溪口，向蒋介石复命去了，屋里只剩下张学良和邵力子。

张学良慢慢呷了口茶，望着邵力子半晌没吭声。邵力子朝他笑了笑，叹道：“副司令，你这次来溪口，我也算讨了个清闲，一心一意陪你读书来了。西安的事，牵涉的面远不只是你张、杨两人，有好多事，我在委员长面前也言说不清了。”

“怎么，委员长把你也看作是我的同谋了？”张学良有些诧异，随即又笑了起来，“邵夫人不是还受伤了吗？要是与我同谋，那子弹总不会往夫人身上钻嘛，委员长未必连这个也看不出来。”

“哎，提起西安的事我就头痛。汉卿哪，你那一威风，可把我们都害苦喽！”

但蒋介石对邵力子的“昏聩无能”似乎并未大动肝火，在同他谈话时，语气反而显得比过去更为和蔼：“张汉卿读书太少，才会有此莽撞之举。你是绍兴有学问的人，陪他读读书，

好不好？”

既然是委员长的意思，好也得执行，不好也得执行，邵力子哪有丝毫选择的余地呢？

早餐很丰盛，有火腿、鸡蛋、牛奶，还有金山桔，全都是应着张学良平日的早餐习惯。喝着乳香浓郁的牛奶，张学良禁不住想，也难为戴笠这一班人了，对他的生活习惯会熟悉照应到这种地步。

“早上好，副座。”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问候道。

张学良鼻孔里“嗯”了一声，算是作了回答。

“请问，副座上午是不是要出去？”刘乙光仍是一副谦恭的姿态。

张学良没有回答，一言不发地望着眼前这个军统局的中校特务队长。他比张学良略大几岁，个头不高，显得有些敦实，但为人却精明得很，善于迎合上司意图，办事一板一眼，滴水不漏。张学良知道，刘乙光是深得“戴老板”赏识的人，不然，决不会把看守一个“党国重犯”的任务交给他来执行。

刘乙光在戴笠手下干过多年，对上层的各种关系脉络也略知一些。“张学良”这三个字，以前对他来说也是如雷贯耳，可如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东北军的统帅居然会成为他管束的“重犯”。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乙光每一见到张学良，心里便涌上一阵激动。这么一位大人物，现在就掌握在他的手中，这使他深深体会到“权力”的重量。同时，也令他忧心忡忡：要是在对待张学良的问题上出了差错，后果也是不堪设想的。

他常常回想起戴老板派他出任务时的情景。

“最关键的是两点，这也是派你去的目的。”戴老板对他叮嘱道，“第一是要注意他的安全，既不能让他自杀，又要防止来自外界的任何威胁；第二是要留意他的一言一行，要做到有

言必记，有行必书，直接向我报告。这一点，委座是再三有所交待的。”

“是，局长！”刘乙光毕恭毕敬地道。

“在有关张学良的问题上，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插手，直线领导。你向我负责，我向委座负责。”

“明白了，局长！”刘乙光站得笔直，回答得响亮。旋即，他又小心翼翼地问：“局长，张学良交际很广，恐怕少不了有人看望他，对这些人我们怎么应付？”

戴笠默思了一阵，说道：“不管怎么说，张学良现在是在管束期间，他的活动应当受到限制。至于看望他的人，必须先报我这里批准，否则一律不准会见。有的人，恐怕还得先报委座批准才行呢。”

“明白了，局长。”

“我再重复一句，你们的任务就是看住张学良，一定不能出了意外。你们布置好以后，我会亲自去检查的。出了问题，不要说你刘乙光，就是我戴笠也担当不起！”戴笠缓缓地在屋里踱步，用手摸着刮得青乎乎的腮帮，“不过说起来，张学良也算得上是我的上司，有些事情，你们不要太难为他。”

“我一定记住局长的指示。”刘乙光点了点头。

这个任务太重大，太艰巨，也太令他振奋了。戴笠把这一任务交给他，很明显，是对他的高度信任。从这一刻起，刘乙光的命运便同张学良紧密地连在了一起。

张学良与戴笠亦非一日之交，戴笠对张学良也知之甚详。戴笠逢人便说，要讲玩儿，谁也比不过张副司令。

一九三五年二月，张学良到庐山觐见蒋介石，听他布署三个月肃清豫皖鄂三省境内红军的战事。有一天，戴笠去看望张学良，见他正在训斥副官，说忘了给他把猎枪带上。见戴笠来了，马上拉住这位军统局长，一定要他去弄杆猎枪。戴笠只得

去借了枪，陪着这位副司令满山遍野地跑了两天。猎枪一放下，他又让戴笠陪他去打网球，骑马。

几天下来，把戴笠折腾得精疲力尽。张学良却没事儿似的问他："雨农啊，明天我们去哪儿玩呢?"弄得戴笠连连摆手说："不行了，陪不起了，请副司令自己尽兴吧!。"

有一次，张学良当着众人的面，用手指点着戴笠说："你这个'戴老板'哪，连玩都不会，只会当特务!"弄得戴笠在一旁只能尴尬地向众人打哈哈。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时，戴笠身为军统局长，事前却无一点情报，自知难逃惩罚，所以硬着头皮去了西安。当时，他随身携带的小手枪被十七路军收缴，他惟恐自己活着出不了西安，见到张学良后便哀求不已，要张副司令保他一条命。张学良见状哈哈大笑，当即解下自己镶有珍珠的手枪送给戴笠，令戴笠感激不已。

然而，眼下情势反过来了，张学良变成了他的"掌心之物"。出于对蒋介石死心塌地的忠诚，他当然要执行"老头子"的指令。但出于私人感情，他似乎还不打算过度难为这位前任上司，更何况，蒋介石表面上对张学良也没有太激烈的言语。

现在，张副司令真的可以"玩儿"个够了。

张学良刚到奉化，戴笠便派人送去一匹白马，一辆小汽车，一顶抬桥，任其驰骋山野，任其登山观景。为了满足张学良的运动嗜好，戴笠又令人在招待所前安置了一副单杠，开辟了一块网球场地，并让人在溪口上游找了一处游泳场地，又派人送来钓鱼竿，让张学良在这里游泳垂钓。刘乙光又专门在特务队中指定了四个身体结实灵活的人，随时陪同张学良登山观景。

"严加防范，相对自由"，是管束张学良的基本原则。自张学良搬到旅行社之后，"中国旅行社雪窦山分社"的牌子便被

摘了下来，改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的名称也改为“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

来招待所的第一天，特务们便被分成了四个小组，轮流值班。张学良的卧室、饭厅、出入的前后门，都配上了看守，他的一举一动，时时刻刻都处于一双双眼睛的严密监视之下。

旅行社的门口，站上了武装宪兵，并设有游动步哨，任何人未经特别许可，不得靠近一步。在登雪窦山的惟一要道口“入山亭”处，刘乙光布置了一个班的宪兵和四名特务，一面巡逻放哨，一面对上下山的游客严加盘查。

张学良被安排住在“招待所”的二楼，隔壁便是刘乙光。宪兵和特务均住在距离约一华里的雪窦寺内。若有风吹草动，他们便会荷枪而出，团团包围住“招待所”。在这里，张学良纵然插翅也难以飞逃。

戴笠指示刘乙光，张学良的活动范围东不能出镇海口，西不能出曹娥江。在这六十公里的圈子内，他若想出游，必须事先安排便衣先行，宪兵随后“保护”。若要想到宁波市等人口稠密的“复杂”地区，则要提前一天“登记”，由刘乙光挂电话获得戴笠的准允，在其座位的前后左右安排上便衣，才能得以成行。

闲下来这位副座怎么过，着实让戴笠和刘乙光费了一点儿脑筋。后来，戴笠当面请示蒋介石，问可不可以给张学良订一些报纸、买点儿书。

“张汉卿不是受过西方教育吗，还可以给他弄点外国书报看看嘛。”蒋介石踌躇良久，总算同意了。

很快，在“张学良先生招待所”里，便出现了一间宽大的书房，里面摆上了军统局专门为张学良订的《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其它一些无关紧要的书籍。张学良还托人从上海运来了一批英文书报和外文杂志书籍，宋子文也经常给他邮

寄杂志和书，每次都有二三十本。

戴笠给军统局财务部门下达的指示是：凡“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的经费，一律由军统局全数供给，实报实销。而蒋介石给戴笠的指令是：用维持一个步兵团的经费，供养张学良。在蒋介石心里，只要好好地看守住这只东北虎，免生异乱，用去一个师甚至一个军的费用，又何足惜哉。

春天已至，万物复苏，张学良的心也在尽情地感受迎面扑来的阵阵春意。举目四望，雪窦山的天空清澈蔚蓝，阳光四射；九座苍翠的山峰此起彼伏，一片翠绿；陡峭的绝壁悬崖间，云气飘浮弥漫。

吃过早饭，负责看守的特务们得知张学良要去游山，忙不迭地赶紧去张罗布置警戒。

“这寺庙的年代也算得上悠久了，”张学良指着雪窦资圣禅寺向邵力子问道，“恐怕有不少传说吧？”

“两千多年来，这儿的传说，一本厚书也写不完。”邵力子说，“不过，这儿最有名的还是出过一个典故。”

“什么典故？”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句成语就出自这里。”

“是吗？”张学良一听来了兴趣，忙说。

“唐代的时候，这寺内长有一条大蚯蚓，每天天不亮就吱吱地叫，比鸡鸣还早。有个小和尚刚入佛门不久，方丈便指点他说，每天听见院内的蚯蚓叫，便要起身诵经做课。小和尚小小年纪，正是贪睡的时候，日子一长，便对这条蚯蚓厌烦了，也不管佛门不杀生的戒规，打好主意烧了一壶开水，浇到蚯蚓的洞口，烫死了它。没想到这事让寺里的方丈发觉了，大为震怒，马上就要小和尚从千丈岩瀑布跳下去，以命赎罪。小和尚站在瀑布前，心惊胆颤，放声大哭。恰在这时，邻村有个以杀猪为生的屠夫正巧路过这里，看见小和尚的模样便上前盘问。

当他听完小和尚讲了事情的原委之后，内心大为震动，便对天长叹道：‘我靠杀猪为生，有三千头猪在我刀下丧命了，你一条蚯蚓还没我一条猪尾巴长，要跳崖应当由我先来。’说完扔下杀猪担，一纵身跳下了悬崖。”

“千丈岩，千丈岩，屠夫的尸体恐怕也跌得粉碎没法收拾了。”张学良“啊”了一声，惊叹道。

“不，不，你万万想不到，”邵力子使劲摆着手说，“屠夫刚刚跳下，还没来得及落到崖底，突然间天光四射，大地生辉，一阵香风徐徐袭来，且伴有精妙绝伦的鼓乐。一只白鹤从岩底展翅飞起，托着那位屠夫，缓缓升天了。”

“这是怎么回事，念他放下屠刀啦？”张学良不解地问道。

“不，是屠夫抢了仙命。小和尚平日早起晚睡，青灯黄卷，天庭发慈悲，打算在小和尚赎命之时，接他升天，没料到却让杀猪的给捷足先登了。后人根据这个故事，演成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个典故。你说，这不是很有趣吗？”

张学良没有回话，兀自走向寺内的殿堂。到了大雄宝殿跟前，他忽然驻步，朝着邵力子连说两声“立地成佛，立地成佛”，眉头拧成一团，像是从中悟出了什么。

统令万军、叱咤风云的主帅，要他卸甲弃戎，闲若野鹤，会是怎样一番心境？邵力子有些后悔讲这个典故。

“我这次冒生命危险，亲自送委员长回京，”我朝向溪口方向，满脸涨得通红，大声地说，“原想扮演一出从来没有演出过的好戏。如果委员长也能以大政治家的风度，放我回西安，这一送一放，岂不成为千古美谈！唉，真可惜呀，一出好戏竟演坏了！”

“我看这事不要多想了，汉卿，委员长有委员长的难处。你呢，就把在这儿的日子看成是临时疗养吧，吃饱睡足，再游游山看看水，将来回想起来，恐怕还是难得的呢。”

“将来？哼！”张学良露出一丝惨笑，袖子一拂，转身出了



张学良在溪口野餐。

大雄宝殿。

就眼下而论，在溪口，张学良还算得上悠哉乐哉。

张学良是个好动的、闲不住的人，游山玩水、观赏风光，大吃野餐，他乐此不疲。

邱秀虎回忆说："记得在炎热的暑天，张将军每天外出时，我大都跟随。因为太阳暴晒，有两次我没戴草帽，真是汗流浃背，汗衫也脱了，结果后背晒起了水泡，疼痛难当，睡觉也极为不便。于凤至知道了，她亲自拿药膏给我擦背上有水泡的地方。这件事，至今我印象还很深。"

雪窦山上最著名的风景区是千丈岩。千丈岩有一座寺庙，

庙里的和尚都欢迎游客在石台上扶着栏杆观看瀑布。和尚用很考究的盘子装许多爆竹，供游客嬉戏，游客把大爆竹点燃后，用力向对面的瀑布扔去，爆竹声与瀑布声发生共鸣，震天动地，清脆悦耳。游人高兴了，就给和尚一些赏钱。

每次去千丈岩，和尚都用盘子端出“天地响”，张学良对此很感兴趣，也放它几个。张学良热衷于放“天地响”，并非仅仅为了解闷，实际上是借此表达和抒发他那渴望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复我河山的凌云壮志。

张学良喜爱运动，有时要在住所门口打打网球，队长刘乙光便指定几个警卫陪他打。他还喜欢游泳，而且泳技颇高。警卫中有一年轻人叫王心德，不会游泳，有次，张学良游泳时，非要他也下水，他执意不肯，张学良见他那副窘相，便在水中纵声大笑。

在雪窦山，春秋时节，张学良往往上穿一件毛线背心或羊毛衫，下穿灯笼裤，外出时有时加穿一件夹克；夏天则穿一件短袖衬衣，短裤，脚穿长统翻口袜，外国进口的力士鞋。入冬后有时穿一件秋大衣，冬天喜欢穿长绸丝棉袍，头上戴鸭舌帽。他打扮随便，逍遥自在。

每天晨曦初露，张学良便会自动醒来，站到露天走廊上，远望渐现轮廓的群山，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然后再到饭厅吃早点。早餐完毕，就到书房读书一小时。午饭前，他照例要到走廊走动一下。

午饭后，略事休息，他便去下象棋。警卫中下得较好的余鉴声、吴时泰、王文晓、韩庆勋等，都陪他下过。由于张学良棋艺高明，这些人常常输给他。有的因棋艺差不愿与他下，他发觉后就说：“我让你一个车。”下得更差的就再让一个马。

有一次，张学良找胡祥林下棋，并风趣地说：“我让你车、马，若是谁输了就打三下手板。”后来胡下了两盘都输了，挨

了两次手板，以后他再喊胡，胡说啥也不来了。这时，张学良就爽朗地笑了起来。

一九三七年夏季快要到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打了防疫针，张学良也打了，只有邱秀虎不肯打，他说："打针反应，我受不了，我愿意害霍乱病，宁死我不肯打针。"张学良听了后，对邱秀虎开玩笑说："你害霍乱病死了不要紧，传染给我们死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要打哟！"说完，他就到房间里拿了两片药，对邱秀虎说："我算怕你了，这是德国拜耳药厂的防疫药片，与注射打针有同样效力，又没有任何反应，快吃了吧！"

每天吃晚饭时，副官应汉民都要请示张学良明天吃什么菜，然后就叫大师傅照着做，每天吃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特务队每个星期都要去宁波，购买张学良所需的海味、水果等食品。宋子文曾给张学良寄来整箱的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局也委托中国旅行社代买些运来。张学良每天都要喝三四瓶可口可乐，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

张学良每天晚上十点钟左右就寝，临睡前要洗澡。洗澡后有按摩医生滕蔚萱按摩。滕原在上海一个外国医师开设的医院里当护士，后来由这个外国医师介绍给张学良当按摩医生。

张学良勤奋好学，少年时就博览群书。在溪口时，虽是幽居，但他仍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都是些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正是学知识长见识的时候，为了我而误了前程，那就太可惜了。"有一次，张学良对刘乙光说，"这我已经想过了。我在北平副司令行营的时候，有人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学问大得很，凭我的面子，我们可以把他请到这儿来，给我们讲点古书。"

"请人讲古书？好事情嘛！"蒋介石听完汇报，立即应允，"多读点书，对张汉卿，对那些年轻人都有好处。让他们去请

吧。”

吴老先生是前清举人，衣帽鞋袜、言谈举止无不有清代遗老遗少的风范。读书会的第一课，吴老先生讲的是《左传》上《郑伯克段于鄢》那一段历史故事。

“这么个大人物还念着为我们办事，不容易啊！”有的队员私下议论，言谈间流露出对张学良的敬重。

吴老先生在雪窦山讲课期间，张学良每月从自己的钱中拿出五百元法币给他作报酬。这在当时实在是一笔大数目，令吴老先生感激不尽，以后讲课越发尽心尽力。

张学良在溪口期间，特务们对他都有好感。一个特务曾这样说：“经我和张先生较长时间相处的结果，我觉得张先生这个人，有两点特别值得一提：一个特点是爱国思想极端强烈；另一个特点是有知人之明，决不像外间有人批评的那样，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张常说：‘委员长有委员长的看法，我也有我个人的看法，委员长的看法是基于国仇，我则除了国仇之外还有家恨！委员长是要等准备好了再对日本作战，我则是要抗日就必须立即动手！’”

张学良将军强烈的爱国思想，溢于言表。

第七十一章　大兵压境

1937.1

——“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

——“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

——“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杨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

我是不是有私心在里头？我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我是不是问心有愧？好了，我没有！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私心！我敢跟你说，我做每一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面，没有混入与我自个儿地位有利益的事，没有！

假如我有个人的利益在里面，就不会有西安事变。我跟你

说，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后来能原谅我，因为我没向蒋先生要钱，没管他要地盘，我没要！我是牺牲我自己。牺牲我自己是为了什么？我第一个问题是不要再打内战了。

张将军在接受唐德刚教授采访时，斩钉截铁地说。

原来，蒋介石一回到南京，犹如猛虎归山，马上就翻脸不认帐了，连续演出软禁、审判、特赦、“严加管束”等一套又一套政治把戏，挟学良以令西安诸将领，事态突然变得复杂起来，局面日趋危急。

一月五日，蒋介石发布如下几项命令：

（一）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

（二）对杨虎城的西安绥靖主任和于学忠的甘肃省政府主席兼五十一军军长，均给予撤职留任处分；

（三）派顾祝同为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

（四）任孙蔚如为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免职；

（五）派王树常为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免职。

与此同时，蒋介石把他的军队组成五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驻华阴、华县方面；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蒋鼎文，驻甘肃方面；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朱绍良，驻宁夏方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陈诚，驻渭南方面；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驻商洛。

一月初，蒋介石召集这五个集团军总司令开会，要他们迅速赶赴前线，占领有利地形，但不得随意开仗，作战之前必须听他的命令。

当时，“三位一体”方面的武装力量，红军约有三万余人，东北军十三万人，十七路军四万多人，加上陕甘地方武装，总共拥兵二十余万。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威胁，西安方面也重新加强了军事部

署。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在渭南、渭北和华阴、华县一带布防，对潼关加强戒备。此外，从潼关至西安，又选择有利地形，构筑七道防线。红军则接防延安、洛川，南下至栒邑、淳化、三原以至蓝田一带，配合十七路军担任防务，来往游动，以警戒和威胁蒋军的侧翼。周恩来表示，为了巩固三位一体，红军同意在军事方面与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合作，以保卫西安。

一月六日，当西安方面将领要求释放张学良的“歌电”在报上发表后，中央军准备对西安大打出手，形势十分险恶。

此刻，王化一和吴瀚涛就如何解决西安善后，奔波于西安、南京之间；而张学良怀着一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真情，宁愿自己蒙受一切痛苦，也不忍再看到内战重起。

一月七日，莫德惠、刘哲经戴笠和何应钦的允许，在孔祥熙公馆与张学良见面，张学良说：“战端将起，有违初衷。”言毕，极为伤感。

张学良认为，对西北进兵是何应钦的主谋，嘱托莫、刘两人去面见何应钦，劝阻用兵。莫德惠、刘哲径往何应钦处，传达了张学良的意见，何应钦表示同意暂停进兵。

十三日，蒋介石又派米春霖携甲、乙两种方案飞往西安，要求西安方面择一而行。两案主要内容如下：

甲案：东北军移驻甘肃和陕西邠州以西的西兰路上；十七路军移驻泾、渭河以北地区；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沿陇海路潼关至咸阳段驻十二个团；陕西省政府主席仍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乙案：东北军（包括甘肃的于学忠部）移驻安徽和淮海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中央军进驻西安和关中地区；安徽省政府主席可委东北军方面的人充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可委十七路军方面的人充任。

有鉴于此，一月十三日，张学良在抵达溪口武岭文昌阁的

当夜，便奋笔疾书给杨虎城等将领的信：

"弟今早同瑞峰来溪口。为目前救此危局，勿为乱国计，商定办法二则，请兄速下最大决心，使委座及弟等易收束陕甘之局。关于改组政府及对日问题，准我等可在三中全会提出，公开讨论。关于两案，请兄等速即商讨，下最后果断。如有意见补充，盼虎城派人，更盼来一军长。如兄等认此二案之一案无问题，那是更好。盼即刻表示受命。委座告弟十六日为限，盼请兄为国家、为西北、为东北，请详计之。凡有利于国者，弟任何牺牲，在所不惜。盼勿专为我个人谋计。西望云天，无任期盼好音。"

张学良希望杨虎城、于学忠等西北军和东北军将领在甲、乙两案中选择其一，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了抗日和避免内战，张学良决定再度委屈求全。

但是，西安方面持何态度呢？

此时，东北军内部两派意见分歧愈演愈烈："少壮派"坚决主张南京必须先放张学良回陕，然后撤兵，否则不惜拼死一战；以王以哲、何柱国等为首的高级将领，则表示应以张学良的指示行事，避免内战，一致对外，对西安事变，应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一切都应为国家民族利益着想，不能贸然开战。至于营救张学良的问题，可以采用和平方法。只要"三位一体"好好团结，张学良是能够营救出来的。

少壮派认为王以哲主和是为了向南京投降，并欲取张学良而代之。因此，他们对王以哲、何柱国等疑忌丛生，以致最后发展到誓不两立的地步。

十七路军中，也有主和与主战两种意见。主和派有孙蔚如、赵寿山、南汉宸、申伯纯、王炳南诸人；主战派有李兴中、许权中、王劲哉、孔从周、李振亚、宋文梅等人。杨虎城动摇于和、战之间。

中共采取的方针，仍是继续逼蒋实现其抗日救国的诺言，主张和平解决，反对纠纷，反对亲日派挑起内战、分裂中国的阴谋。为此，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成员彻夜不眠，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为回击南京的军事进攻，周恩来又同两军高级将领共同商定：组成三方面的联军，拟订作战方案，作好可战可和的两手准备。同时，杨虎城又派十七路军李志刚、东北军米春霖和鲍文樾去南京、奉化与蒋介石会谈，质问蒋介石为何向西北进兵，并要求立即释放张学良。

“我和鲍见到蒋介石，问候之后，”李志刚后来著文回忆说，“接着就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全体将士要求张学良早日回去，以便进行善后工作……”

“这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蒋介石翻脸说，“而是国家的问题，是纪律的问题。张汉卿来京以后，承认了自己的错误，觉得自己读书少，修养不够，再三表示要跟着我读书、学习、修养。他自己不愿意回去，你们也不能强迫他回去。”

最后这句话显然是弥天大谎，连蒋介石自己都觉得太过分了，脸上显出不自然的神色。

“你们应该明白的，”蒋介石又说道，“西安闹的事，他和杨虎城使我威信扫地，我现在的话，在南京产生不了效力。”

这是推托的话，李志刚心里一清二楚。蒋介石虽然回到了溪口，但南京的哪一项重大决策敢不经过他点头？

李志刚回忆说：

“后来我们又提出中央太举向西安进军的问题，蒋说：‘西安方面必须按照南京提出的甲、乙两案，择一执行。’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你们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他们不服从我的命令，就是不守国家的纪律，这是不能容忍的。’蒋说到这里，就说，‘你们先吃饭吧，休息一下再谈。’蒋有意地

把我和鲍两人分开，并暗示留我再单独谈一次。

“鲍文樾看到明明是蒋不让张回去，反说张自己不愿回去，非常生气，对我说：‘我从此不再与蒋共事，也没有再同蒋谈的必要。’于是他就单独先回去了。

“当天下午我一人去见蒋。蒋对我说：‘你可以讲一讲，他们究竟打算怎么办?’我说：‘自从委员长回来以后，对于答应的问题，还没有能够实现，又把张先生留住不让回去，并且大量的中央军开进潼关，西安方面群情愤激，东北军、十七路军团结一致，张先生若不能回去，他们要打仗。’蒋听到这里，就翻身起来说：‘他们要打仗呀，要打就打，我早就准备好了，因为怕糜烂地方，所以未进击，要打的话，我在几天之内就可以消灭他们。’我说：‘现在陕北和甘宁边区的红军也正在向关中开进，打起仗来，恐怕不好。’蒋听了这话，不作正面答复，却转缓语气地说：‘顾祝同部西进，用意不在打仗，而是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如果不听国家调度，才要解决的。’又说，‘虎城与十七路军有革命的历史，不能与东北军相提并论，今后东北军即归虎城指挥。陕西省政府由虎城的部下充任，你回去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答应的话都可实现。我要亲自给他写一封信，你带回去。明天你来再谈一次，就赶快回去。’我当夜住在溪口。

“一月十八日早晨，我再去见蒋，蒋把信交我后，告诉我把他讲的话好好向杨说明，要杨听他的命令，立即撤除二华防线，让顾祝同进驻西安办理善后。蒋并说盼望我两三天内再来奉化，告诉他西安方面的反映。

李志刚继续回忆说：“蒋介石那封亲笔信，现在不知存在何处，现回忆其大意如下：‘你不学无术，也不知好好读书，因此不免于谬误。但你的部队是有革命历史的，你不可偏执谬误，毁灭自己。现在东北军即拨归你管辖，要把它们分开驻

防。对陕西地方行政，要赶紧促孙蔚如就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职，以安定地方秩序。你万不可轻信人言，作战争的打算，以糜烂地方，扰乱人心。你有什么具体困难，或关于人事和物资上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尽量给你解决。必要时可再派李志刚来谈。'"

二十一日，蒋介石再次召见米春霖，他装模作样地对米春霖说："汉卿如同我的亲兄弟一样，我不会亏待他，只是他年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只因读书太少之故。我留他在这里多读些书，你先回去吧。"

"一月二十三日，我和戴笠又到了奉化，"李志刚又回忆说，"蒋立刻召见。蒋问我说：'我的信交给虎城了吧，我的话都告诉他们了吧，他们现在怎么样？'我说：'委员长的信我交给他们了，委员长的话我也都告诉他们了，虎城和东北、西北军军政负责人还在一起开过两次会，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讨论结果，大家一致意见，还是要求让张先生回去。'蒋一面摇头一面说：'我在西安上飞机时，张汉卿要送我到南京来，我当时劝他不要来，他不听，一定要来，我也只好听凭他来。他现在就住在这里，你可以去看看他，问他是不是那样。他要来南京的时候，由他也由我，但是他来南京以后，要想回去，就不能由他也不能由我了。'

"上次蒋说张自己不愿意回去，现在他又变了说法，我知道再说也无益处，于是就转到谈潼关以西的军事问题。蒋说：'顾祝同部西进，目的不在打仗，而是为了调度军队恢复原来秩序。他们（指张、杨）既然要我领导，我就有调度之权，如果他们不听国家的命令，我就要用军事解决。我已通知顾祝同相机处理，因此你们应当与顾接洽，什么问题也能解决。'

"然后，他又盛气凌人地说：'如果要战，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消灭他们。'蒋要我把他谈的话立刻电告杨虎城，劝他

们不要自误。我又委婉地说：'他们极关心委员长对抗日的政策问题。'蒋听到这里，怒气冲冲地说：'杨虎城不学无术，不看我的《庐山军训讲演集》，不了解军训的精神，不懂得我的意向，怎么你们也不帮助他看呢？你们也不懂得吗？'最后他重复地说，'你切实告诉虎城，只要他听我的命令，我就一定对得起他们。'当时我连贯起蒋前后讲话的意思，是在表明他在庐山时早有'攘外'的准备，杨虎城如果拆散了西安的团体，就能得到优待，西安事变中他的诺言也就算数了。

"当日，我将与蒋谈话的情况，用电报详细告诉了杨虎城，同时，蒋亦直接致杨电报，要杨表示态度，并留我候接复电，说还有话要我传达。

"我在候杨复电中，在蒋的允许下，见到了张学良。我同张一起吃过一次饭，因有戴笠陪着，不便讲什么话。只有饭后离座，戴不在时，我同张才有机会说了一些话。"

"张副司令，现在西安方面的最大心愿，就是想让副司令回到西安。我临走时，杨主任和东北军的诸位将领都一再表达了这个意思。周恩来副主席也要我向副司令致意，盼望您能早日回去主持大政。"

李志刚抓住时机，迫不及待地讲道。

张学良久久没有吭声，他看看李志刚，又看看窗外。正是夕阳西下之际，层层叠叠的群山，都变成紫褐色的一抹，涂在天际上。

我当时说："老蒋是不会让我回去的，我回去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我对不起杨虎城，请告诉虎城多容忍，要团结。除非爆发全面抗日，东北军还存在，并能在东北战场上发挥一定作用时，我或者有可能回去，否则我是回不去的。"

一月二十四日晚，蒋介石接到杨虎城的复电，同意派米春

霖、谢珂为代表与顾祝同谈判。

李志刚回忆说：

"我同时亦接杨回电，要我迅速回陕，汇报后转赴潼关协助谈判。一月二十五日临行前，蒋介石又把我叫去说：'我与虎城什么话也说到了，专看他能不能听我的话，保持他部队的革命历史了。虎城已复电同意派人与顾祝同商谈，不过他必须把真正困难的地方具体地提出来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他们解决不了的由顾请示我，我一定能给他们解决，以后你们不要再来直接问我了。还有，最要紧的是，现在时机迫切，我不能再等了，他应当派正式代表，诚心诚意地以研究的精神，与顾祝同商洽解决，不得派人试探，贻误时机，这要他们自己负责的，你把我这个意思切实告诉虎城吧。'

"一月二十五日，我乘飞机于当日抵西安。到西安后，杨虎城立刻召集东北、西北各军政负责人开会，听取我的二次去南京、奉化归来的汇报。我汇报以后，大家对张不能回来，感到失望。杨虎城认为蒋介石在政策上的转变是有所准备的，他同意冯玉祥说的'蒋今后还要再打内战吗？我看他再也打不下去了'的说法。"

返归西安后，一月二十六日，李志刚和谢珂两人乘汽车，在这个阴云密布的冬日，通过两道防线，抵达潼关。顾祝同在火车上正在集合军官作出安排打仗的姿态。李、谢就与顾祝同在火车上开始了谈判。

谢珂首先发言。他以质问的口吻，态度很强硬地说："蒋委员长在西安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既有诺言在先，军队就应东开，准备抗日，为什么中央军反而西进，是不是又要来打内战？东北军和西北军对此都非常激愤，假如压迫太甚一定要打仗的话，我们是有准备的。"

顾祝同说："你们西安方面既然表示接受国家领导，就应

该服从国家的命令，国家有统一指挥调度之权，现在国家要你们撤除二华防线，中央军进驻西安，十七路军调驻渭河以北地区，东北军调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你们不听国家命令，反而在二华增兵布防，这就是不服从国家领导的表现，所以国家要进兵解决。"

谢珂说："在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你们中央军是决不能再西进的。"

这时，陈诚、陈继承、蒋鼎文等人在旁嚷叫道："开始进攻就完了，还有什么谈头！"意在进行恫吓。李志刚则打圆场说："现在问题很严重，蒋委员长要我们直接谈判，我们应该好好地商谈。"

谈判开始。西安方面的意见是：张学良先生未回西安以前，中央军不能入潼关。顾祝同的条件是：（一）西安方面的二华防线，应立即撤除；（二）中央军一部开驻西安，由潼关至西安一线，中央军长期驻十二个团；（三）十七路军移驻渭河以北三原、蒲城一带地区；（四）东北军移驻邠县以西一直到兰州地区；（五）红军仍回陕北，防区另商。

双方谈了三小时，仍无法一致，遂决定两天之后再继续谈判。

一月三十日，双方大致商谈就绪。甲案的主要内容即顾祝同前次提出的五个条款。另外，顾又提出乙案，具体内容是：（一）中央军进驻西安和陕西；（二）十七路军调驻甘肃；（三）东北军调驻安徽；（四）红军仍回陕北。乙案是甲案的陪衬。甲案对于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方面来说还是集结的，乙案是分散的。因此，西安方面倾向接受甲案。

谈判最后决定采用甲案，中央军进驻潼关，驻西安的部队由十二个团减为三个团。另外，双方还就划分军队驻地、移驻时间、军饷、指挥系统等都作了具体规定，共有二十余条款，

商定后签字执行。

当潼关谈判正接近尾声之际，西安内部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发生了日益激烈的意见分歧。

尤其是一月三十一日晚，当东北军和西北军最高军事会议作出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议后，“二二惨案”骤然发生了……

第七十二章 二 二 惨 案

1937.2

——“只要西安方面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

——“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

“这就看西安的能耐了。只要西安方面能坚持，能撑住，我就会有办法。他们不坚持，我完了，他们也长远不了。”

一月二十四日，在溪口，张学良语重心长、一针见血地对李志刚说道。

李志刚默默地点着头，心想，若回到西安，一定要向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们反复讲明这一点。他明白，要是没有张学良，东北军的分化只是早晚的事；东北军一散，杨虎城孤掌难鸣，也难以撑持危局。

正如张学良所担忧的那样，此刻，西安的"三位一体"正面临着严重危机。

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一日，新城杨公馆内，杨虎城正与十七路军一些将领研商局势，突然门被推开，东北军六十多名营团军官拥进客厅来。

"杨主任，副司令临走时令我们东北军听你指挥。现在副司令被久扣不归，东北军的头头们又无动于衷，各谋私利。我们这些人都追随副司令多年，现在大家签名表明心迹，请杨主任指挥我们，到潼关去拼个死活，让中央立刻放副司令回来。"孙铭九说完将一张布满签名的大纸放到桌上。

此刻，孙铭九已是涕泪满颊，到后来竟哭出了声。背后的几十个人也开始掉泪，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将领们也忍不住热泪满腮。

在众人的哭声中，杨虎城决定，采纳少壮派的主张，先打后和。

然而，王以哲为了说服少壮派放弃动武念头，统一东北军内部的思想，于一月二十九日在渭南召集了高级干部会议。不巧得很，王以哲因病没有出席，特委托总部参谋长董英斌主持会议。

"现在局势很严重，南京叫我们东北军后撤，"董英斌代表王以哲首先发言，"无论是先撤兵而后营救副司令，或者是先营救副司令而后再撤兵，我们必须意见一致，团结起来，这样才能有力量，对于副司令、对于东北军才能有好处，希望大家好好地研究，详细地谈谈。"

“服从中央的命令，一定能得到中央的欢心，中央也就容易接受我们的请求，到那时，再设法请放副司令，为时不晚。”何柱国首先发言，坚持与南京议和。

“我们绝对不能把营救副司令回来的希望寄托在讨南京的欢心上面，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及全国各方面对我们的同情和支持。”应德田历数了蒋介石背信弃义的种种事实，强调了坚持“三位一体”的有利形势，主张先营救张学良将军，蒋介石不放张学良回西安，就坚持不撤兵。

“我们坚决拥护‘三位一体’，反对分裂独裁。但是张副司令不回来，我们就不撤兵!”常恩多师长也坚持说。

红军总参谋长叶剑英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说：“我们主张放蒋是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西安事变，是为了避免大规模内战，顾全国家和民族存亡这一大局。只要我们团结一心，步调一致，就能最终取得胜利。”

渭南会议最后决定：副司令不回来，决不撤兵，中央军如进攻，坚决打退它。

很显然，这个决议是违背王以哲、何柱国、刘多荃等高级将领主和意图的。这时，主战派的呼声日益高涨，东北军内部战与和的分歧愈演愈烈。

三十一日晚，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周恩来，分别代表十七路军、东北军和红军，在王以哲家中举行最高军事会议，最后决定和战大计。会议由杨虎城主持。

“从目前局势看，不撤兵恐怕会引起战争，战争一起，对副司令、对东北军、对‘三位一体’都不利。”于学忠首先在会议上发言。

“不撤兵，等于给中央施加压力，一定会使中央认为我们还在与他们对立，怎么能放副司令呢?”接着，王以哲将军又说，“其结果，会导致中央军进攻我们，我们怎么能胜过中央

军呢？打不过，副司令怎么能回来呢？我们不是白白付出牺牲吗？先撤兵，服从中央命令，以后可以慢慢设法营救副司令。”

接着，何柱国发言，表示赞同王以哲的意见。

左右为难的杨虎城大失所望，说话时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从道义上讲，应当主战，我们十七路军不打算撤退。但事变以来，我们同东北军一直一致行动，现在既然你们主和，我力量少，就按你们的意见办，和平解决吧。”

杨虎城说完，周恩来接着发言说：“我们本来就主张和平解决，只是考虑到你们中有许多人主张用战的方式促使南京放回张先生，所以我们才表态支持朋友们的决定，不惜流血牺牲。现在，既然诸位将领都一致主和，那我们当然表示赞同。”周恩来很郑重地看了王以哲和于学忠一眼，又提醒道：“希望你们注意内部团结，耐心说服部下，不要再另起风波。”

西安的前途就这么定下了。当一行人走出王以哲公馆时，已是后半夜。何柱国送走杨虎城和周恩来，又回到王以哲身边，表示了对少壮派的担心：“要是他们知道了今晚的决议，可能会采取极端行动。”

“怎么，难道少壮派敢杀人？”王以哲不以为然。

“这很难说，”何柱国心神不定地说，“我看，咱俩是不是搬到新城杨主任那儿避一避。”

“笑话！我一个堂堂军长，我不信，少壮派吃了豹子胆，敢在我王以哲头上动土。”王以哲摇摇头。

何柱国无奈地独自走出了王以哲的公馆。这些天，他一直在同少壮派打交道，知道那些年轻气盛的人一旦绝望，什么样的事都可能干得出来。他不能不小心提防。当夜，何柱国便搬进了杨虎城公馆。

就在这天晚上，应德田、苗剑秋和孙铭九等人又来到张公馆东楼，在周恩来面前痛哭流涕，请求红军帮助他们打仗，与

蒋介石拼个高低。

“张副司令对于东北军的重要性，我们十分了解，”面对少壮派的请求，周恩来耐心相劝，“我们极盼望副司令早日回到西安。但现在不撤兵而与顾祝同对峙，很容易引起战争。一旦开战，就违背了张副司令发动事变的初衷，也违背了他在信中的苦苦嘱托。再说，仗一打起来，南京方面更不会放回副司令，对抗日的前途有害无益。”

“难道副司令就这么回不来了吗？难道红军也不帮我们打仗吗？我们合作一场，没想到就这么以破裂告终啊！”

“你们不帮助，我们也要打！”

“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掉？”

孙铭九一面哭泣，一面在周恩来面前长跪不起。就这样，一直闹到后半夜。

少壮派说出这种话来，意味着他们对红军的态度已生出了怨愤，而在此敏感时刻，少壮派的任何轻举妄动都可能破坏抗日大局的形成。周恩来举措不定，决定第二天给以答复。

午夜后，周恩来与叶剑英立即摸黑赶到了渭北云阳镇红军司令部驻地，与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左权等一起商讨处置方案，红军统帅部的灯光一直亮到天明。

第二天上午，杨虎城和东北军少壮派均得到了中共代表团的答复：共产党一定会对得起朋友。为了维护“三位一体”，共产党方面可以暂时保留主和的意见，只要东北军、西北军团结一致，红军就同两家站在一起，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与此同时，二月一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何镜华在张学良公馆先后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

何镜华当时是抗日同志会的军事部负责人，应德田是抗日同志会的书记，孙铭九是行动部的负责人，苗剑秋是理论部负

责人。

“在第一次会议上，先由我把在何柱国家中看到已经在起草撤兵命令的情况讲了一下。”何镜华后来回忆说，“我还提议：我们是不是找人去王以哲家中再同他谈谈。”

“再到王以哲家中去谈，也是没用的，王以哲是不会听大家的话，也更不会听我们的。”苗剑秋愤然道。

“那只有把王以哲干掉，干脆，连何柱国也一块儿打死”。孙铭九恶狠狠地说。

“你想用什么办法打死他们，是用明的还是用暗的？”何镜华问道。

“若用暗的，得使用便衣刺杀的办法，这样我的部下没有把握，故不能用暗杀的办法。只有用明的，派部队去把他们打死。”孙铭九提议说。

“派部队打死他们的办法，影响不好，各方面会引起反感的。再说，王以哲在前几天，已经把他军部的手枪队调来一部，住在他家附近，已有了戒备。”何镜华提醒说，“就是能打死他，缪澄流、刘多荃和王以哲的关系最好，关于不要求副司令回来就撤兵，也是王以哲和他们事先就商量好的。如果王以哲在这个时候被打死，他们在前方要和我们对立起来，会造成东北军内部的混乱，我们更不能控制整个局面了。我认为用打死的办法不好。为了控制住局面，以便要求张副司令回来，我主张现在就派人去把王以哲、何柱国都接到副司令公馆里来，和他俩人商谈，并把他两人留在这里派人加以监视；同时，可由于学忠和董英斌主持，立即召集前方缪澄流、刘多荃和各师长到西安来，与驻西安的各师长团长们在张副司令公馆再开会议，遵循大家的共同主张，依据渭南会议决议，执行先不撤兵、再向蒋介石要求副司令回来的方案。”

“这个办法怎样？”苗剑秋问孙铭九。

"要把王以哲、何柱国接到公馆里来，然后再派人监视，我的人恐怕监视不住，我没有把握，这样做不行。"孙铭九说。

四人议论了很长时间，仍未作出决议。

当晚，西安街上出现了少壮派张贴的"除奸"标语。

晚十时许，当西安方面发出撤兵命令后，何、应、孙三人又召开了第二次紧急会议。

应德田问："前方部队，根据渭南会议的签字能够撤兵吗？"

何镜华说："现在有西安发出的命令叫撤兵，再加上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在事先都已说好，所以，前方部队在接到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撤兵是没有问题的。"

应德田说："我们可不可以叫前线的师长团长们不撤兵呢？"

何镜华说："前方部队，今晚就能接到命令了，在明天就开始准备撤兵了。我们在事前也没有派人去联络，就是有联络，能有一部分人同意不撤兵，但是在接到从西安发出的命令以后，控制不了全线的不撤兵。"

有鉴于此，少壮派决定采取极端行动。

二月二日早晨八九点钟，众多东北军少壮派军人来到应德田、孙铭九的住处。其中，有一一五师师长刘启文、参谋处副处长邓玉琢、工兵团团长杜维纲、炮兵团团长刘佩苇、军警督察处督察长文英奇以及抗日先锋队参谋长、分队长、特务团营长、连长赵龙涛、乌庆鳞、周锟、贾国辅、黄冠南、商来东、王协一、华国璋、于文俊、魏治国、朱云飞、孙聚魁等，此外还有苗剑秋、孙东园、孙铭九、应德田等，约三十多人，几乎站满了两间堂屋。

"杨主任、周副主席都一再要副司令回来，王以哲、何柱国究竟安的是什么心？"有人大声喊道。

“一和一撤，我们就再无希望见到副司令了！”有人哽咽，有人发出了悲恸声。

“不行，东北军的前途不能断送在他们手上！谁出卖东北军，出卖张副司令，我们就杀掉谁！”

“对！把王以哲、何柱国，还有于学忠，一起杀掉！”

“不行，”有人表示反对，“渭南决议还得有人领头执行。于学忠是副司令指定的东北军负责人，再说他也不了解情况，是被王、何二人挟持的。我建议，杀掉王以哲和何柱国，留下于学忠！”

“对，对！”刹时间，屋内人声鼎沸，有人甚至掏出枪来。

“除掉王、何，拥护于学忠，执行渭南决议，坚持营救副司令，大家同意吗？”应德田问大家。

“同意！”与会者齐呼。

“有人不同意吗？”应德田又问。

没有反对意见。这样，一个不是正式会议的决定，依据在愤怒之中聚成的意志，匆匆忙忙开始付诸实施了。

一份拟处决者的名单很快开列出来，上面列有何柱国、王以哲、缪澄流、刘多荃、米春霖、鲍文樾、蒋斌、徐方等十余人。

第一个牺牲者是王以哲。当他听见大门被撞开，接着又有一声枪响之后，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将被子往妻子身上拉了拉，然后转脸朝向门口。

手枪营连长于方俊率领一队士兵，一脚将门踹开，面向王以哲。他曾做过王以哲的学生，此时，他将两手一拱，大声说：“军长，学生对不起你啦！”说罢，和身边的一名排长同时举枪，向王以哲连开数枪。

几乎在同时，王以哲的副官长宋学礼也被枪杀；前西北“剿匪”总司令参谋处长徐方和通讯处长蒋斌亦被开枪打死。

徐方的罪名是与南京秘密勾结。二月十八日，王一哲、蒋斌两人的遗体装入灵柩，专车运往北平公祭。

少壮派们的另一主要目标是何柱国。当孙铭九的汽车刚开到杨公馆门口，便见这里戒备森严。孙铭九咬咬牙，想率人冲进去，却被警卫挡在门外，接着杨虎城出现在门口，将孙铭九及众人喝退。

由于杨虎城的庇护，何柱国幸免于难。后来他做了一个银鼎送给杨虎城，上书“再生之德”四字。

得知王以哲等人被杀，于学忠忍不住痛哭流涕，两眼红肿，心神不安。他向少壮派陈言道，王以哲被杀，东北军军心不稳，他的部队又远在甘肃，实在是无力左右西安的局势。众人一听，始觉于学忠也有他的难言之隐，于是，只好让他和杨虎城联名签署了一道不撤军的命令，准备发往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西北军部队。

驻守渭南的刘多荃师长得知王以哲被杀之后，大吃一惊。他同王以哲曾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平日很是亲近。少壮派犯上作乱，将其杀掉，刘多荃顿时火起，当即便命令他的一个团开往临潼，一来防止杨虎城的再度动摇，二来向少壮派施加压力，以防再生不测。

此时，外界已有传闻，称少壮派的活动是受了中共的指使，亲近王以哲的东北军已扬言，要找中共代表团“讨还血债”。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周恩来、叶剑英、秦邦宪等人连忙商议，决定立即作出姿态，表明少壮派的举动与中共完全无涉，同时稳住杨虎城，力争执行“三位一体”的最后决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下午三时，中共代表团抬着一个硕大的花圈，走向南苑门外王以哲的公馆。在灵堂前，周恩来敬上祭品，又向遗像三鞠

躬，沉痛地说：“王将军不死于‘九一八’，不死于古北口，竟死于自己人之手，我心里非常难过！”接着，周恩来又历数了王以哲的功绩和他在沟通东北军与红军联系方面所作的贡献。由于悲伤，周恩来满脸泪痕。他的沉痛话语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从而消释了误会。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又赶往新城大楼，去面见杨虎城。

“应德田、孙铭九这帮人，真是太无法无天了！现在既已闯下大祸，他们应该学日本的武士道，剖腹自杀，要不，就自己绑了，出面自首，抓起来交给蒋介石！”杨虎城掩不住他的愤怒，气呼呼地说。

“不能这么做。”周恩来摆摆手，“少壮派要求放张副司令的心还是真诚的，在东北军中也有一定影响，对他们抓或杀都会把东北军搞乱。我看他们最好离开西安，先到云阳镇红军那里避一避。你这里为了应付蒋介石和平息怨气，可以过两天签发逮捕他们的通缉令，以稳定军心。”

“也只好如此了。”杨虎城痛苦地点点头。

“那么，关于与潼关的协议问题……”

“事已至此，部队乱作一团，打是彻底不行了，”杨虎城长叹了一声，心情沉重地坐到椅子上，“我已经想过了，现在只能走‘和’这条路了，也算是执行了‘三位一体’的决议。今晚上我就派人去潼关，跟顾祝同签和平协议。”

“我们中共代表团尊重杨主任的决定。王军长死后，他的部队这几天可能会有行动，杨主任还要多留意一些。”

然而，周、杨的措施仍没有止住东北军缪澄流军长和刘多荃师长的报复行动。他们擅自从潼关前线撤军，回师西安，扬言要为王军长报仇。

一〇五师旅长高福源是最早在红军和张学良之间沟通关系的人，本来与孙铭九等人毫无关系，但却被怀疑为“少壮派”，

由刘多荃下令予以枪杀。

枪杀王以哲的手枪营于文俊连长亦被刘多荃的部队逮捕，剖腹挖心，以祭奠王以哲的在天之灵。

与此同时，许多少壮派军官都遭到逮捕，有的莫名其妙地遭到枪杀。孙铭九被抄家，其妻险遭杀戮。仅仅几天之间，东北军一片混乱，人人自危，大有自相残杀之势。杨虎城的部队在少帅被扣之后，散的散，降的降，整个十七路军只余下三万多人，对西安的混乱局面无能为力。

二月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朱德、张国焘等向王以哲将军家属致电吊唁。

毛泽东在与美国作家史沫特莱谈西安事变时说，有一部分患着"左倾幼稚病"的人士，这种人各地都有，枪杀王以哲的那位孙铭九，就是这类人物的极端的代表。他们爱国出于热忱，他们为丧权失地的悲惨历史而愤激，他们的心地是纯洁的。但是，他们缺乏政治经验，在大事变中认不清方向，不知道局部与全体、过去与现在、今日与明日的差别与联系。

解放后，孙铭九也认识到自己在"二二事件"时出于激愤，政治上太幼稚，误认为王以哲等对张学良将军不忠诚，大开杀戒，结果犯了历史性的错误。

二月五日，杨虎城、于学忠和西北军将领发表和平宣言说，"但求抗敌救国之策得以早日实现，对内固不惜最大之隐忍，对外更不计一切之牺牲"，决心"以张副司令之心为心，竭其全力，为国效死"。

宣言中还提出了关于恢复张学良公权、移防位置酌予变更、张学良返陕训话一次再行移防以及维持爱国民众团体、安置流亡人员等要求。

南京方面在得知西安面临的困境和严重局面后，亦感到再无兴兵讨伐的必要，遂促使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月八

日，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率领中央军顺利开进了西安。

此时的东北军，正处在其形成以来最严峻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军中论争纷起。于学忠等人只得派何柱国军长前往奉化，面见少帅，请求张学良的指示。

二月十六日中午，何柱国带着王卓然和机要员田雨时抵达奉化溪口。

“报告副司令，部下何柱国、王卓然、田雨时前来晋见!”三人一起举手向张学良敬礼。

“弟兄们辛苦了。来，先到屋里谈，待会儿再给大家接风。”张学良没有还礼，只点点头说道。

“柱国兄，你这是……”未及开口，何柱国已是热泪长流，张学良见状惊愕地问道。

“副司令，弟兄们日日夜夜都盼望着您回去啊……”话语未完，何柱国已是放声大哭。王卓然、田雨时也用手抹着脸上的泪水。张学良也禁不住热泪盈眶。

“副司令，你不在西安，应德田、孙铭九一帮人目无法度，兴兵叛乱，王军长他已经……被杀了!”何柱国嚎啕大哭道。

“什么？鼎芳兄他……”张学良大吃一惊，猛地站了起来。

何柱国哭得说不出话来，王卓然见状，便将西安“二二事变”的情况和平息结果向张学良作了报告。

“鼎芳兄，你命不至此啊!”张学良满脸是泪，双手微微颤抖。这么一位将才，一位侠肝义胆的兄长，却死于自己人的乱枪之下，叫张学良怎能不痛心疾首。

“鼎芳兄，”张学良双手紧抱，泣不成声地说，“学良在这里拜你在天之灵了!”说完，面朝西北方向，连连鞠躬。众人恸哭不已。

哀过，哭过，足足过了一个时辰，张学良才稍稍平静下来，同何柱国谈起了东北军的出路问题。

“副司令，东北军没有您，实在是不行啊！”何柱国哀恳地说，“你走时，手令于军长号令全军，可是这一阵子，于军长显得优柔寡断，难以镇住大家。我原想，不行就让王军长出来，他的话大家总还是听的。你走后，西安的事大都是王军长决定的，上层将领们也没什么话说。应德田一帮人叛乱的事，我给王军长提醒过，可是他太自信了，不信东北军里有人敢把枪对准他，结果就……”何柱国又哽咽起来。

“上上下下现在都有些什么打算？”张学良禁不住问道。

“高层将领们一般都倾向东调，认为这样可以保存实力。不过，师以下的一些官兵另有些想法，他们不想离开西北。”

“为什么？”

“大家对‘三位一体’还有留恋，对周先生的人格也很赞赏。”

“是啊，”张学良回过头来，逐一注视着三位下属，“‘三位一体’来之不易啊，大家都在这上面花费了不少心血。鼎芳兄曾经对我说，要保存东北军，只有依靠共产党。这一点，大家都是有体会的。”

张学良缓缓站起，在屋里走了几步，最后站到了何柱国面前：“我为国家牺牲了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位袍泽今后维持这一友谊。”

“是！”何柱国响亮地回答了一声。

“看起来，短时间我是回不去了，委员长还要我在这里读书思过。”话说至此，张学良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修身养性，难得啊！”

“东北军的去向问题，大家还想听听副司令的指示。”王卓然说道。

“诸位将领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九一八’之后，弟兄们离乡背井，吃尽了苦头；同红军打仗，又弄得大家疲惫不

堪；兵谏之后，人心浮动，人人都在想自己的出路，所以才有杀王军长的举动。”张学良言语缓慢，神色惨淡，好一阵没再说话。

“我看，就按诸位将领的意思办吧。”此话一出，两行热泪从张学良眼里夺眶而出，“东北军是需要休养一阵子了。苏皖是富庶之乡，好歹比西北强。稳定下来，好拼足劲打日寇！”

“大家也都是这么想。不想再打内战了，要求把自己的命拿去拼日本！”王卓然说。

那时我点点头说：“军人就应当这样。‘九一八’之前，我对日本的判断失误了。我认为日本人无论如何不会大举入侵，侵占我东北三省。后来，日本人又占了锦州、热河。我想日本军人应该知道，这样做对他们是不利的。没想到，他们居然用枪逼着他们的政府定下了侵华政策。国难家仇啊，人人都应当向日本人讨还这笔血债！”

“副司令的话，柱国记住了！”何柱国起身立正，恭敬地答道。

已经是后半夜了，张学良慢慢离开窗台，来到桌前铺开信纸，给于学忠写信：

孝侯兄大鉴：

柱国兄来谈，悉兄苦心孤诣，支此危局。弟不肖，使兄及我仝人等为此事受累，犹以鼎芳诸兄之遭殃，真叫弟不知如何说起，泪不知从何处流。目下状况，要兄同诸仝人，大力维护此东北三千万父老所寄托此一点武装，吾等必须将吾们的血及此一点武装，供献与东北父老之前。更要者，大家共济和衷，仍本从来维护大局、拥护领袖之宗旨，以期在抗日战场上，显我身手。盼兄将此函转示各军师旅团长。东北军一切，弟已嘱托与兄，中央已命与兄，大家必须对兄如对弟一样。弟同委座皆深知兄胜此任。望

张学良为解决西安事变善后问题给于学忠等东北军将领的信。

各同志一心一德，保此东北军光荣，以期供献于国家及东北父老之前，此良所期祝者也。有良一口气在，为国家之利益，为东北之利益，如有可尽力之处，决不自弃。弟在

此地，读书思过，诸甚安谧，乞释远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开源、宪章、静山、芳波全此，并请转各干部为祷。此颂

近安

弟张学良手启

二月十七日于溪口雪窦山

"虎城兄，真是难为你了！"张学良自言自语地叹道，遂又提起笔，开始给杨虎城写信：

虎城仁兄大鉴：

柱国兄来，悉兄苦心支撑危局，闻之十分同感，现幸风波已过，尔后盼兄为国努力，不可抱奋（愤）事之想，凡有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弟读书思过，诸事甚好，请勿念。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在何柱国谒见张学良以后，于学忠也来到了溪口谒晤张将军。相见时，因有特务监视，张副司令便在报纸边上写了一行字："只要东北军紧紧团结，实现抗战定有希望。"

分别时，于学忠叹息道："可惜咱们东北军有些人对不起张副司令啊！"

经过协商，东北军的调防情况是：刘多荃的一〇五师改编为四十九军移驻南阳附近；缪澄流五十七军调周口一带；吴克仁继王以哲为六十七军军长，调蚌埠、商邱一带；周福成一二九师归还保定五十三军建制；于学忠五十一军最后由甘肃开拔，与一一〇师先开到安徽蒙城，遂将该师改编，并入五十一军的两个师内；何柱国骑兵第二军仍驻咸阳未动。

南京方面发表于学忠为豫皖绥靖主任，驻蚌埠；王树常为开封绥靖副主任；刘尚清为安徽省主席；何柱国为西安行营副主任。后又将五十一军调至江苏宿迁一带，任命于学忠为江苏绥靖主任，驻淮阴。

一九三七年六月，东北军调遣、整编完毕。

在东北军调离西北时，十七路军也被调到三原一带驻防；红军开到西安附近的部队，也返回陕北。至此，“三位一体”联合阵线被蒋介石拆散。

从此，东北军驻地分散，不相统属。但尽管如此，在抗日战争时期，原东北军将士皆能浴血奋战，英勇杀敌，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七十三章　雪窦风雨

1937.2

——“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

——“我在书房里简直坐不住，好像屁股上长刺一样。”

——“我尚且有心存幻想、上当受骗的时候，何况你一个外国人。”

“西望云天，不胜依依。”

当东北军将士得知少帅在囚禁中仍挂念着东北军时，军营里顿时泪雨横飞，哭声震天。原王以哲军长的一个营，在营长锺福荣的带领下，全体向东，面向张学良被囚的方向集体跪下，高喊：“少帅，您多保重啊！”“少帅，您快回来啊！”“少帅，我们不能没有您呀！”

众多官兵悲痛欲绝，哭得匍匐在地。东北军对少帅的情

感，令山河为之动容。

西安事变的结局，不仅标志着一位声威显赫的青年统帅政治军事生涯的结束，而且也使一支实力雄厚的地方部队从此消失。

这个结局，是张学良在发动“兵谏”之初绝然没有料到的。他原来指望，只要东北军能够“撑住”，他便有同蒋介石对峙的资本，就能逼蒋将他放回军中。现在，东北军既已被分散调离，蒋介石已无任何后顾之忧，对放不放张学良也就没有任何顾忌了。张学良重获自由的最后一点希望破灭了。

一九三七年三月二日，东北军发布了《移防致陕甘同胞别词》，字里行间，情忧意愤，对陕甘同胞一片依依惜别之情，令人潸然泪下。

西安街头，三个月前曾张灯结彩支持张、杨扣押蒋介石的各界群众，如今又含泪挂起标语，舞起了旗帜，欢送东北军离开陕甘。

辞别西北之前，二月下旬，东北军六十七军副军长吴克仁、一一二师师长霍守义、一一三师师长李振唐、一二九师师长周福成、一〇五师师长唐述尧等六人，曾于二十五日乘机抵南京，尔后转奉化溪口，见到了他们日思夜想的少帅。

哭过，哀过，呼唤过之后，六名将领都向张学良表示：希望少帅早日返回军中，主持东北军大计。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没有了少帅这个“东北军的灵魂”，东北军的分化与消亡只是迟早的事。

“为了东北父老的这支武装，大帅和我都付出了全部心血。”我神色黯淡地对大家说，“大帅为此还丢了性命，大家要万分珍惜。现在，大家要服从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的命令，做好移防的事。只要大家能维护东北军的荣誉，我个人的荣辱已不足惜。”

说到此，我已是满眼泪花。但不一会儿，我脸上又洋溢着

坚毅与豪迈："凡是一个现代国家，军队都是国家的，东北军也绝不是我张某一人的。回去告诉东北军的弟兄们，有朝一日我定会领着大家打日本，收复家园！好了，就这些。拜托了！"

说完，张学良头也不回，独自走出了房间。

"少帅！"六位将领悲痛欲绝地大声喊道。

"东北虎"既已被缚，南京便得以从从容容地来对付杨虎城和他的十七路军了。

"三月中旬，我陪杨先生乘飞机到杭州见蒋。"李志刚曾撰文回忆说，"会见时，在座的有宋美龄、宋子文、邓宝珊、于学忠、胡宗南等和我共八人。坐定后，杨首先问候蒋：'委员长身体好些了吧！'蒋答：'腰痛渐渐地好了，不要紧。'又说：'我对身体上的折磨，向来很能忍耐，吃一点苦，不算什么。'接着吹嘘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们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但对部下，过于信任，以致发生这次事故，使各方面受到损失，我身为长官，自觉不足为训。'说到这里，蒋骤然改变语气，对着杨指桑骂槐地糟蹋张汉卿先生，他说：'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着他老子走，没有他老子了，他跟着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说他服从领袖。可现在他竟如此，你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说：'他打不住共产党，就向共产党投降，若是打不住日本时，还不是向日本投降吗？'又说：'他的部队正在火线上牺牲，他和王以哲竟秘密到陕北与敌人议和了，怎样对得起长官，怎样对得起部下！'蒋愈说声调愈高，大发脾气，嘴里说张，显然是对杨的。这时候，宋美龄一再上楼拿苹果和梨给在座的人们吃，并且不断地把削了皮的梨和苹果送到蒋口边打混，蒋的语调渐渐地缓和下去了。蒋接着说：'张汉卿这样一个人，虎城竟是跟着他一路走，仔细想想，能对得起谁！幸亏还没有荒谬到底，假如后来不肯回头，还能有今天吗？'"

杨虎城满脸铁青，目光始终盯住面前的茶几。

宋子文似乎听不下去了，插进来说道："其实汉卿也是个守信义的人，这阵子在奉化，也为防止内战做了很多事……"

蒋介石扬起手，止住宋子文，继续说道："张汉卿这些天自我反省，已经有了些认错的表示，又一再说要跟我学读书，学人格。"说到这里，蒋的语调缓和了些，"他年少气盛，不知天高地厚，才铸成西安大错。不过，虎城，你是老同志了，竟会跟着他走，让人怎么想嘛！"

蒋介石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杨虎城始终默然无声。

第二天，蒋介石又同杨虎城进行了单独谈话，明确提出，对他革职留任，让他出洋考察。对此，杨虎城早有预料，仍然只是默默地点点头，接受了这一残酷的命运安排。

五月二十七日，杨虎城告离西安。消息传出，西安各界市民、各救国团体、各校师生以及十七路军的官兵，聚集在西郊机场，为杨将军送行。送行场面极为壮烈，口号声、军乐声、锣鼓声，响彻云霄。人们情绪激动，热泪飞洒，以各种方式向这位因强烈要求抗日而被罢黜的爱国将领致敬。

出洋前，杨虎城在上海祁齐路寓所里，与前来送行的十七路军主要将领们进行了一次长谈，言语间情绪激动，对西安事变这一义举毫不后悔。他说："只要十七路军在抗日战场上积极作战，有了战绩，得到人民的支持，他蒋介石就不敢把我们怎么样。"

众将领告退前，杨虎城又逐一紧握着他们的手，谆谆嘱托道："我杨虎城缠不下蒋介石，你们更缠不下他。能缠下蒋介石的只有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到了蒋介石压迫我们，我们的存在发生危险时，我们就断然倒向共产党，跟共产党走！"

就这样，西安事变的主角，一个被幽禁，一个被放逐，蒋介石似乎终于如愿以偿了。

在溪口，虽然早在二月二十日张学良就已得到通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恢复张学良的公权”，但“自由”之风并未吹拂到春意盎然的雪窦山，军委会“严加管束”的枷锁并没有丝毫松动。对此，张学良既想笑，又想哭。他笑南京政府玩的花样把戏太拙劣，太无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哭自己奋争数年，叱咤风云，威风八面，如今却落到任人宰割、肆意玩弄的境地。

有时候，他真想跑到一个无人之处，痛痛快快地哭上一场，吼上一阵，一解心中的烦忧。可是，天下之大，他张学良竟然连一个可以自由哭笑的地方也寻觅不到。日日夜夜，他身边都有警卫来回巡行，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令他无论做什么都难以遂意。

“这种日子，真不知要过到什么时候？”张学良不由自主地抬起了手，往桌上重重地一拍，惊得在一旁的邵力子差点连书都掉到地上。

“汉卿，你这是……”

张学良始知自己有些失态，抱歉地向邵力子点点头，又转身朝向窗外。

邵力子和夫人傅学文在雪窦山陪同张学良住了一个多月，与张学良情深意笃。那时节，雪窦山到处都是丛林绿荫，气候凉爽。他们与张学良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谈得眉飞色舞，吃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他们乘竹轿到山下桃园中去赏景。一路上，张学良对邵力子说：“我在书房里简直坐不住，好像屁股上长刺一样。”邵力子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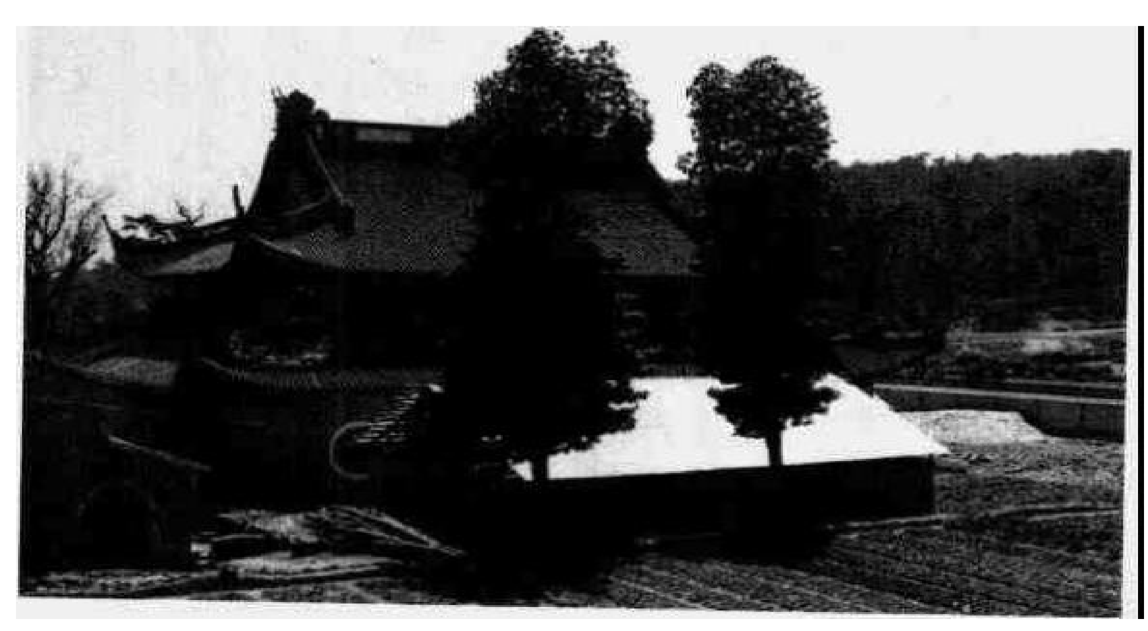
邵力子夫妇离开雪窦山不久，国民党中国银行总裁贝祖贻夫妇又上山来陪张学良住了半个月。贝夫妇离开后，原浙江省警察局局长赵龙文夫妇也上山来陪住了十几天。

这时，张学良天天外出游山，吃了早点即出去，中午在外野餐，一直要玩到晚上打火把回来。张学良出去是坐滑竿，他是个胖子，要七八个竿夫轮流扛抬，队副熊仲青则跟着走路。熊仲青白天跟着跑，晚上还要查勤，内务安全的事刘乙光全都交给他管，使他常常失眠，不堪其苦。

张学良在雪窦山的时候，国民党的一些首脑和高级官员、将领，经过蒋介石的允许，还是可以到雪窦山来看望他的。

一九三七年四、五月间，蒋介石同父异母的哥哥蒋锡侯在溪口坟庄开吊。一时间，国民党的党、政、军要人云集溪口，前来吊唁，蒋兄出殡，竟形同“国葬”。

当时，张学良也略为表示了一下。他吩咐刘乙光置办了些吊唁祭品，又亲手写了挽联，差人送去。自己则静静地呆在屋中，与赵四小姐下棋对奕。



雪窦寺后的两株楠树，为张学良手植。

在此期间，来溪口雪窦山探访张学良的人，除戴笠之外，还有端纳、宋子文、汪兆铭、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祝绍周、宋子良、董显光，以及东北耆宿与旧属莫德惠、何柱国、于学忠、刘尚清、王树翰、刘哲、王树常、王卓然、田雨时等人。他们有的是专程来访张学良，有的是借吊祭蒋兄之丧，顺便上山看望。他们往往坐上一两个小时，寒暄完毕即走，或是盘桓稍久与少帅畅谈。

在山上受到张学良招待吃饭的有端纳、汪兆铭、董显光、贺耀祖和莫德惠等人。

张学良不想见人，但有人却想见张学良。就在葬礼的当天，宋子文装了满满一车罐头、果品、书报和其他营养品，径直驱车上山，看望张学良。

“汉卿！”宋子文只叫了一声，眼圈便湿润了，再也说不出话来。

“没想到你还能来看看我，谢谢你了，子文。”学良神色黯然地说。

“你这么说，叫我如何开口呢？汉卿，在西安的时候，好话都被我说尽了，谁能想得到他一回南京就换了面孔。不管怎么说，我是愧对朋友的。”

“话也不能这么讲，子文。有些事不是你能左右的，你的心意、你的情分我都明白。这些日子难得这么清闲，把好些事情翻来复去都想过了，可我还是觉得，这本是一出好戏，可惜被委员长演砸了。”

显然，张学良对蒋介石拒绝“入戏”，拒绝配合“演出”，始终懊恼不已。

“汉卿！”赵四小姐叫了一声，似乎想要阻止张学良再说出什么不得体的话，若被刘乙光等耳目听了去，报告给蒋介石，没有什么好处。

"事到如今，汉卿说什么也是应该的。"宋子文望一眼赵四小姐，低沉地说，"我早就表示过了，汉卿的自由是我保证过的，只要你还不自由，我就守寓闲居，不出来做事。"

"难为你一片好心了……"张学良哽声道。

"我力量有限，但保障二位的安全和生活还是做得到的。今天我坐的车，是特制的防弹轿车，专门带来送给你们的，出去转转也方便。"宋子文叹道。

"子文，我看今天你就不必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客房，我们俩的网球好久没有较量了。"

"行啊！"宋子文一扫脸上的愁容，"我还生怕你不让我在这儿住一晚呢。"

接着，他又转脸看看赵一荻："四小姐，有你陪着汉卿，他的网球水平肯定提高不少，恐怕我连招架之功都没有了吧？"

晚饭后，张学良又与宋子文关在屋里，促膝长谈。刚见面时那种伤感的情形早已一扫而光，两人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

第二天两人分手时，宋子文说："以后生活上有什么需要，随时发电报给我。"言罢，掏出手绢抹了抹脸上的泪水。

"子文，你我相交多年，彼此都知道心思。话我不多说了，也不再远送。希望你也多保重。"张学良好容易才忍住滚滚欲落的眼泪。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和素有蒋介石"文胆"之称的陈布雷，也到雪窦山来，同张学良有过长时间交谈。他们给张学良带来了些许安慰。

当张学良把客人迎入客厅时，只见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

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只见四个箱子里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线装书、一些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学良自我嘲讽道。

但张学良也深知，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左右蒋介石，更没有人能够说清在“严加管束”的背后，蒋委员长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因此，相见之时，不过仅仅是安慰一番，感叹一阵，甚至陪着洒几滴清泪而已。

张学良没有料到，亲日派首领人物汪精卫也会来看他。陪同汪精卫来的，是蒋介石的老师董显光。张学良一眼便看出，蒋介石对汪精卫来看他似乎也颇不放心，故派董随行。

在居所内招待汪、董二位吃过午饭，张学良便陪客人们上山览胜。

“你要多保重啊，汉卿，国家会有重用你的时候。”汪精卫笑着说。

“只要对国家有利，学良何去何从不足为念。请转告蒋委员长，”张学良又转向董显光，“我在这里情况很好，正好好读书呢。”

“我一定转达。”董显光认真地点了点头。

双方在半山腰上客客气气地分了手。汪、董二人尚未钻进停在入山亭口的汽车，而张学良却早已乘轿悠然而去了。

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在招待所的门口，张学良迎来从南京千里迢迢专程赶来看望他的莫德惠。

莫德惠与张作霖是同乡，亦是好友，深得“大帅”信任，

被纳为幕僚，十分倚重。从辈分上来讲，莫德惠算得上是张学良的父辈，但从身份上来说，又是他的下属。然而，此时的张学良已顾不得什么身份了，趋步上前，双手相扶，迎莫老进客厅。

一番泪眼相看和长吁短叹之后，张学良简要地讲述了自己来雪窦山后的情形，然后听莫德惠讲起了外面的局势。

"看来，中日之间战事难免了。倭寇步步进逼，大有吞并整个中国之势。全国百姓怨声载道，纷纷上书，要求政府领导抗日。尤其是东北三省，铁蹄之下，哀声不绝。"

"我对不起东北的父老，没能守住家乡。"说起东北，张学良不由脱口长叹道。

莫德惠掏出一大包信件放到桌上，对张学良说："这些都是你在东北的故乡的社会贤达们辗转写来，让我带给你的，人人莫不信任副司令，把收复家园的希望寄托在你和东北军身上。"

"父老乡亲至此仍能信任我，学良死亦足矣！"张学良重叹一声，泪水夺眶而出。

来雪窦山看望张学良的人中，最使他感到意外的，要数澳大利亚人端纳。

"想不到你还能想起我，大老远地跑到这儿来。"一见面，张学良便惊喜地说。

"从西安回来后，我几乎没有一天不想起将军，"端纳说道，"对你失去自由，我想我是负有一定责任的。"

"这事怨不了你，"张学良宽谅地说，"你虽然来中国多年，先是给我，后又给蒋委员长当顾问，但是，你对中国的政治和中国人的性格还是缺乏了解的。"

"可是在西安我是做过保证的呀！之所以那么久没来见你，是因为无法平静坦荡地面对你。"

“我再说一遍，这怨不了你。”张学良加重了语气，“我尚且有心存幻想、上当受骗的时候，何况你一个外国人。”

在雪窦山上，张学良还会见了第二位外国人——意大利贸易商伊雅格。

原来，张学良曾在美国订购了一架具有武装设备的大型客机。由于西安事变发生，飞机交货的时间被迫推迟。后来，张学良被囚禁，东北军东调，飞机交付给谁一时没了着落。于是，张学良叫刘乙光派专人赴上海，将伊雅格找来溪口，亲自告诉他，那架飞机须在近期内运来中国。

“我决定把这架飞机送给蒋先生。请你到南京具体同他联系。我这里，会先捎信给他的。”张学良对伊雅格说。

大约一个月之后，这架飞机飞到了南京，交给了国民党中央空军。蒋介石在得知飞机已正式交付使用之后，只让宋美龄转达了一句话：“谢谢汉卿的美意。”

青岛市长沈鸿烈是东北旧部。蒋介石曾关照沈鸿烈说，张汉卿心绪不畅，你可以前去安慰一番。沈鸿烈去溪口后，蒋介石又对沈鸿烈说：“听说你已与汉卿相见，可多留几日，妥为劝勉。”这样，沈鸿烈就在溪口停留了十余天。

一天，张学良逛溪口街市，但见迎面走来一群人，中间是一个三十多岁、身躯微胖的男子，旁边是个一身缟素、金发高鼻的外国女人。张学良有些奇怪。

“他们是什么人？”张学良问身边的队副熊仲青。

“不认识。”熊仲青摇摇头。片刻之后，又说，“上次听刘队长说，委员长的大公子蒋经国也来溪口读书了，还说他娶了个苏联女人。这会不会就是蒋经国夫妇？”

张学良“哦”了一声。他想起在西安时，周恩来同蒋介石会面，谈到要把在苏联留学的蒋经国弄回国来，让他们父子团聚的事。看来，这人定是蒋经国无疑了。张学良本想上前打个

招呼，若真是蒋经国，便可攀谈几句，还可托他向蒋介石转致问候；若不是，那就只当是认错了人。但旋即又一想，我现在已是“严加管束”之身，能否引起误会？再则，从辈分上来讲，当唤蒋经国为侄子，先行礼是否妥当？于是，张学良对熊说：“我们回去吧。”

此时，蒋经国也已注意到迎面打量他的人，但却不知其为何人。他窃思，其仪态目光均有威猛之气，此人肯定非同一般。待那人转身远去，蒋经国便问身边的人。当他听说那人就是在西安发动兵谏、扣押他父亲的张学良时，愣了好一阵子。良久，才叹了一声：“果真是员虎将啊！”

经队长刘乙光的允许，蒋经国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了张学良，蒋经国对张学良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在与蒋经国交谈中，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

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夫妇请蒋经国夫妇进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学良先后见了三次面。

在雪窦山时，有一件事使张学良虚惊一场。那是三月的一天，张学良坐着滑竿游山归来，在寺庙门口同一个熟识的和尚点了点头，又向前走了两步，想看清殿中央长垂的纸条上写的是谁的名字。

做佛事的女人此时已止住哭泣。望着这个仪态不凡的人缓缓走近，她悄悄问身边的和尚：“这个人是谁呀？”

“他叫张学良，是个大人物。”

和尚话音未落，那女人突然两眼发直，随即“哇”地一声大叫，发疯般地向张学良扑去，抓住他的衣衫，又拉又扯，口中不停地叫喊：“你赔我的丈夫！赔我的丈夫！”

张学良被惊呆了，一时间不知所措，只是本能地躲避着那

女人不断撞来的头。刘乙光一个箭步冲上去，使劲掰开那女人的手，又转身揪住刚才同女人说话的和尚，逼问道："她是谁？你刚才对她讲了些什么？"

和尚吓得连忙作揖，嗫嗫嚅嚅地说："她叫袁静芝，来这儿超度她的丈夫蒋孝先。她说，她丈夫在西安被副司令的人打死了。"

这时，只见坐在地上哭叫的袁静芝头发蓬乱，声调嘶哑，头上的孝绢已经散乱，长长地拖在地上。

张学良上前一步，抬手止住正要呵骂她的刘乙光，和颜悦色地对袁静芝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

听完张学良的话，袁静芝的哭声小了些，使劲儿地点了下头，又转身扑向先前伏跪的地方，继续哭喊："孝先呵孝先，你死得太惨了，我可怎么活呀！"

刘乙光和警卫们簇拥着张学良出了大门。张学良边走边不住地摇头："真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蒋孝先的妻子！"

对于三十余年间从来不知空虚颓丧与寂寞孤独为何物的张学良来说，雪窦山的幽居，真可谓度日如年。寥寥数月，那焦虑，那悲凉，那悔恨，那沮丧，那种对于坎坷命运束手无策的懊恼，瞬间他就已经全身心地感受到了。

第七十四章 幽谷深情

1937.3

——“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我能在这里会面！”

——“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我这四弟很有骨气。我所有的弟弟中，他最有骨气。”

“你这么一个小小的旅行社，让我给包下来了，怎么过意得去啊！”

有一天，张学良颇感内疚地对钱经理说。

“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钱经理蛮不在乎，乐呵呵地说。

为幽禁张学良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张学良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

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

然而，在愤懑、孤寂与惆怅中，唯亲人带来的深情，给置身幽谷中的张学良带来莫大的慰藉。

"夫人，这是您要买的报纸。"

在伦敦，仆人王妈把当日的英国《泰晤士报》递给了于凤至。突然，"张杨兵谏"四个大字赫然闯入了她的眼帘。她惊呆了，怎么也不相信会发生这样的事。然而，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几天来，英国报刊几乎天天登载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和文章，对事态的报道也越来越详细，还配有部分照片。

接着，国民党驻英国特务开始在于凤至及子女居住的旅馆周围频繁活动。他们张贴标语，煽动一些旅英华人到旅馆骚扰，搞得她们日夜不得安宁。

这天，于凤至在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通电的全文，阅后，她悬挂在半空的心才稍有着落。特别是从报上得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参与解决西安事变，她的心安稳了许多。

然而，何应钦筹划轰炸西安的消息又使于凤至紧张起来。尔后，她又不断获悉各种传闻，什么"张学良在西安爆炸中身亡"、"日本指使张学良逮捕蒋介石"、"东北军变成了土匪"、"东北军倒戈刺杀张学良"等等。

正当于凤至被纷至沓来的传闻惊扰得坐立不安之际，家人王妈又急匆匆地给她送来了报纸。突然，一条醒目的新闻令她震惊：《南京军事法庭审讯张氏，蒋委员长发布特赦令》，但随即又被"送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顿时，她觉得天昏地旋，全身无力。

忽然，她想到了与宋氏姊妹的深情厚谊，立即提笔拟写了电文。可是，这份电报发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此

时，她没有别的选择，决定立即回国去向蒋介石求情。

“汉卿已经被害成这样子了，我想，你那位委员长夫君总不至于不仁慈到连夫妻相见都不准允吧？”宋子文在上海见到于凤至后，激愤地、不无讽刺地打电话给宋美龄。

“子文哪，他虽然是委员长，但也不是每样事情都说了算。他有他的难处，这你也是知道的。南京这里什么样的人都有的。凤至现在既然回来了，要到溪口去，我想没什么不可以的。我马上就去告诉他，让给戴笠打个招呼。”

“小妹，你怎么现在也带上南京的官腔了。你知不知道，张夫人是拖着有病之身，万里迢迢回国来寻夫的。”宋子文明显抬高了嗓音。

“请转告凤至，去见汉卿的事我会尽快给她办好，让她多注意身体。南京现在复杂得很，我一时还脱不开身。等有了空，我一定会去看她的。”宋美龄语气马上亲近起来。

两天后，宋子文接到宋美龄从南京打来的电话，说蒋介石已经同意让于凤至去溪口同张学良会面，并转达蒋介石的话说：“汉卿是个喜欢热闹的人，让他一个人在溪口肯定寂寞得很，有人去陪陪他当然好。不过，不管是凤至还是赵四小姐，最好在汉卿身边只能有其中一个。”

几天之后，于凤至由戴笠派专人陪伴来到了雪窦山。

“汉卿！”当三年多没见面的丈夫出现在眼前时，于凤至顿时鼻孔一酸，热泪夺眶而出，颤着声叫道。

此刻出现在她面前的张学良，面容憔悴，神色虚茫，满腮胡须，衣衫不整，与几年前夫妻分别时简直判若两人。

“大姐！”张学良突然大吼一声，冲了过去。于凤至“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头扑向张学良，伏在丈夫胸前恸哭失声。

“怎么也没有想到，你我能在这里会面！”张学良感叹道。

于凤至的到来，对于情绪颓丧、精神苦闷的张学良来说，

不啻是一个巨大的安慰，他的孤独感顿时一扫而光，显得像孩童一般热情天真。

“闾珣长高了吧？闾瑛、闾玗淘气不？”当于凤至将三个子女的照片掏出来递给他时，张学良高兴得合不拢嘴，发出呵呵的笑声。但当两人四目相对，这才发现，彼此眼里早已噙满了盈盈泪水。

“汉卿，这到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嘛？”于凤至抽泣着，眼望着丈夫问道。

我当时腾地站起身来说，怎么回事，是我张某人要团结抗日，收复失地；而他蒋某人放着日本人不打，硬逼着我去打红军，围剿共产党！我是迫不得已才举行兵谏，事后又亲自将他送回南京。他丢了面子，失了威信，怎么会不找人发泄一通，挽回点他的威风。

我张学良这辈子还没做过什么值得大悔的事，这一次我算是领受了后悔的滋味。弟兄们一再劝我不要来，共产党的副主席周恩来也向我暗示过送人的危险，但我当时只想尽快结束西安的局面，又过度相信了他这个领袖的人格，结果，就弄成了这个样子。

是啊，我的性子一点儿没变，要变就不是我张学良了。兵谏的事儿，功过后人自有评说。我张学良为抗日的一片拳拳之心，可以对天！个人的荣辱进退，又有何惜！

一轮红日从山峰间冉冉上升，东方彩霞飞溅，通夜未眠的夫妻俩沉浸在清新的晨光与团聚的欢欣之中。

第二天，在刘乙光等一班警卫的簇拥下，张学良夫妇登上雪窦山，去观赏当地的奇景千丈岩。山高路陡，刘乙光提出，请夫人坐进轿子，于凤至却不肯，说要陪着丈夫走走山路。

我对夫人说，你呀，就该多到高山野地里转转，经经风雨。我这人最怕静，静起来胸口就闷得慌。前些年听枪声、炮



张学良和夫人于凤至在雪窦山上小憩。

声，现在听风声、雨声。要是哪一天天下太平了，什么声音都听不到了，我张学良也就难得活下去了。

一连许多天，张学良都陪着于凤至游山逛水，附近的山水寺庙都已看过了。虽然是闲着游玩，但身体孱弱的于凤至还是觉得疲惫不堪。

张学良整日里陪着夫人，要么同她在家里看看书报，要么在旅行社外的小径上漫步闲谈，偶尔也在山脚下的河边钓钓鱼，日子过得颇为悠闲恬淡。

一日黄昏，夫妇俩信步来到雪窦寺，于凤至指着寺院正前方长着浓密松林的土岗问道："这个土岗是不是当初建寺的和尚垒的，里面是不是埋着那位高僧？"

法师双手合十，念了声"阿弥陀佛"，说："这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来历。这片长着松树的土岗叫做含珠林。夫人请看——"老法师往远处一指，"这土岗左右有两条溪水蜿蜒而来，恰似两条摇头摆尾的游龙。到了土岗前又合为一处，汇流而去。圆圆的土岗被围其中，恰如龙口所含的一颗宝珠。所以，很久以来，人们就把这儿叫做'含珠林'。"

"嘿，这么一说，倒真有些像呢。"张学良驻足看了一阵，笑着说，"方才夫人问到，这土岗里是不是埋着那位高僧，这算是猜着了点儿。"

老法师颔首含笑，说道："这里的确埋着个人，不过不是什么高僧，而是唐朝末年起兵反抗朝廷的黄巢。"

"黄巢？"张学良心中一惊，"史书上不是说，黄巢死于山东泰山吗？难道还有两个黄巢不成？"

"不，黄巢只有一个。"老法师正色道，"寺里藏有《雪窦寺志》，上面就说黄巢当年兵败远走，到了雪窦山，隐名埋姓皈依佛门。有句诗云'铁衣着尽着僧衣'，指的就是黄巢。据说，这附近的驻岭村、大晦岭、小晦岭，还都是当年黄巢命名的呢。"

张学良闻言，心中风云翻滚，脸色遽变。蒋介石是本地人，含珠林的来历想必早有所闻。对于我这个将天捅了个窟窿的人，他不动声色地置我于黄巢墓前，其含意居心可谓昭然。

张学良再也无心散步，扭头便往回走。于凤至在后面连唤了几声也未能将他止住。

自从那天观看了含珠林之后，张学良的情绪明显低落下来

了。山也很少转了，话也很少讲了，饭量也略有减少。刘乙光等人不知是怎么回事，便去问于凤至。于凤至当然知道，但这些话她又不便当着这些蒋介石的耳目说，于是便借口称张学良有头晕的毛病，近日犯了，所以心绪有些不太平稳。

转眼间，于凤至到雪窦山已一月有余。虽说是闲居无事，但山区的条件比起都市来，毕竟艰苦许多，加之水土不服，虽才几十天时间，人却明显消瘦了。考虑到于凤至日渐衰弱的身体，张学良不得已提出，让夫人到上海去看看医生，静养一个时期，待有所好转再来山上陪伴。于凤至起初执意不肯离开丈夫，但禁不住张学良一再相劝，终于同意暂时告别雪窦山。

"不过，"于凤至很诚恳地对丈夫说，"你现在这个样子，总得有人在身边照料才行。我走后，你把小妹接来吧。"

听夫人这么一说，张学良心中一热，情不自禁地拉住于凤至的手，动情地说："大姐，事到如今，我已是个落魄落难之人，可大姐还这么体贴我，真不知让学良该以何言相对！"

夫妻俩执手慨叹，久久无言。临别时，于凤至同丈夫商量，决定她与小妹以后每个月轮流一次，来溪口陪伴少帅。

一九三七年三月下旬，于凤至含泪暂别了雪窦山。

当赵一荻接获张学良那封让她来雪窦山相伴的电报时，芳心剧跳，热泪长流。从上海到奉化，直线距离只有几百公里，但在赵四小姐心中，却似将要踏越十万八千里的遥途。

"啊哈！"张学良一见赵一荻，便立刻迎上去，将她揽在臂中，脸上溢着孩子般的笑容，"我算了算日子，估摸你要过两天才到，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来了，是想我了吧？"

"真不含蓄！"赵四小姐嗔怪地望着张学良，眼里充满热情与温柔，"我是怕你把眼望穿了呢。"

说过，笑过，赵四小姐随张学良来到二楼客厅，吩咐人打开一个木箱，对张学良说："这里面是些珍珠罗翻领汗衫和卡

叽短裤，我带来是想送给陪你的这些弟兄。”

“真是难为四小姐了，”刘乙光在旁感慨道，“大老远的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礼物。”

“噢，对了，”赵一荻打开一个红色的小皮箱，从中取出两个精致的小长方盒，对刘乙光说，“这是两支派克金笔，就送给你吧。副司令在这儿，多亏你照应了。”

“谢谢四小姐，”刘乙光感谢说，“这样吧，我留一支，另一支给熊队副吧。”

一连许多天，赵四小姐都陪着张学良登雪窦山，涉妙高台，观千丈岩瀑布，看峭壁凌空的三隐潭。若张学良想运动了，赵四便伴他溪口边垂钓，或打网球，下围棋。有时夜深人静了，门口的警卫还见到楼上卧室里灯影朦胧，那是两人仍在灯下娓娓倾谈呢。

张学良与于凤至生育一女三男，与赵四生有一个儿子，叫张闾琳，当时六岁多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回来看望父母。这儿子一直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他要吃蛋炒饭，却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后仍把他送回了美国。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何时才能再团聚呢？夫妇对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赵四忍不住泪满两颊，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也湿润了。

一天，张学良偶听雪窦寺和尚讲起天台山有座大佛寺，寺内有一千五百多年前雕成的大弥勒佛像，寺外附近还有佛教天台宗祖师智者大师的圆寂处，是著名古迹，很值得一游。张学良便向刘乙光提出要去看看。

天台山，位于天台县城北，群山挺立，峰峦争秀，飞瀑流泉，景色迷人。张学良一行边走边观赏这里的秀美景色，不觉


儿童时代的张闾琳。

来到山中古刹清国寺。这座庙宇是隋代建造的，拥有约六百间殿宇，比雪窦寺更加宏伟壮观。张学良被这座卓绝的古代建筑吸引了，他满有兴致地在大雄宝殿中观赏那明代铜铸的释迦牟尼巨型坐像，对寺内的隋梅、隋塔等古迹赞赏不已，暂时排遣了萦绕在心间的愁绪。

中午，张学良一行人在清国寺内吃了顿素餐。临走时，张学良特意拿出六十元钱，说是斋席的花费，令老方丈感叹了一番。

饭后，他们又去观赏天台山八景，还游览了“铜壶滴漏”、“华顶秀色”等名胜奇观。归途中，张学良见天台山出产的板栗颗颗硕大如盅，便欣悦地买了些带回雪窦山。翌日，张学良捧着板栗，逢人便送一颗，让人品尝。便衣和宪兵人人都说：“这是张副司令最高兴的一次。”

“七七”抗战后，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要求释放张学良，中



一九三七年，张学良与赵一荻等在浙江奉化溪口剪岩合影。

共也积极开展营救张学良的工作。就连国民党大员傅作义、宋哲元将军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尽快释放张学良。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听到这个消息，十分惊喜，决定亲自去溪口探望被幽禁的大哥。

是呀，我兄弟之中，我最喜欢四弟张学思。

是啊，他到溪口看过我。

八月初，张学思与赵四小姐由宋美龄的亲信、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陪同，来到了溪口。张学思望着大哥，伤感地直摇头，悄声说："大哥，你太难了！"

张学良默然无语，惟以苦笑相对。

南京一别，不过才半年多时间，但兄弟两人却像已分隔了三年五载，彼此都有千言万语要诉说。然而，刘乙光和他的手下以款待张学思、赵四小姐为名，不停地在屋里屋外穿梭进出，两兄弟无法单独相处，无法倾诉衷肠。

翌日上午，蒋介石的"黄代表"、这位少帅青年时代的密友，奉命找张学良单独谈话。

"委员长的意思……"黄仁霖有些嗫嚅，但终于还是直说了，"现在抗战开始，军队须置于领袖的统一指挥之下，绝不可三心二意。东北军调离西安之后，传说有的官兵有些想法，委员长担心将来调度起来可能会不方便，以致影响整个全局……"

"东北军都是些有国仇家恨的人，只要是打日本，哪里会三心二意。委员长怕是多心了吧。"

"外面有些流言，说要是副司令不回去，东北军就不打仗，委员长有些忧虑。"

"流言都是无稽之谈！"张学良激动地站起来，"打仗是为了赶跑日本人，收复失地，这是我最大的愿望，怎么能说他们不见我就不打仗呢？难道你们也听信这种流言？"

"委员长想让我干什么?"接着，张学良一语点破道。

"委员长说，不管这些流言是真是假，从抗战大局出发，请你给东北军各军长写封信，让他们听从委员长指挥，服从调度，创立勋绩。"

"原来如此。"张学良眼里浮起一层冷光，"我没想到，到现在委员长还担心东北军另有图谋。你回去告诉他，不用在这种事情上费脑筋，信我马上会写的。"

直到中午，张学良才从客厅里出来，神色大为不悦。张学思心里觉得蹊跷：不是说蒋介石要释放大哥吗?难道又变卦了?他想问问大哥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在特务严密监视下，除了谈生活上的琐事，无法涉及政治。

午后，张学良兴致勃勃地邀学思和赵四小姐去游览雪窦山名胜。学思笑道："大哥，天这么热，还是明早再去吧!"其实，他只是想在屋里找机会和大哥攀谈一次，听听大哥对东北军的前途和抗战事业的看法，了解大哥有无获释的可能。

"你难得来一趟，怎能不尽情逛逛?"张学良没有理会他的心情，一手拉着学思，一手拉着赵四小姐，说，"走吧!不抓紧时间，过两天下起雨来，想逛还逛不成了呢!"

在游山的路上，张学良身穿短袖衣裤，特务们也穿汗衫和短裤，惟有张学思穿得很严整，风纪扣也不解开。张学良指着四弟风趣地说："你们看，我这位弟弟，像不像一个标准的卫兵?"逗得特务们哈哈大笑。

张学思痛苦地望着走在前面几步的大哥。此刻，恰逢张学良转首，四目相对，稍纵即逝，但就在这一瞬间，张学思清晰地看到了大哥眼中流露出来的痛楚、苦闷、孤独与怨恨，以及隐隐约约的期盼。它们交织在一起，似一支利箭，扎得张学思心中一阵剧痛。

张学思心事重重，没有游山观景的闲情逸致，一路上不声

不响；张学良却兴致勃勃，谈笑风生；赵四小姐也不时发出温柔活泼的笑声。他们边说边笑，转眼间来到了千丈岩风景区。

"四弟，你听说过吗？北宋的王安石也曾在此处观过瀑布，还写过一首好诗呢！"接着，张学良抑扬顿挫地吟起了王安石的诗句："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

忽然，随行的特务拿来许多大爆竹，张学良告诉学思，这叫"天地响"，放起来特别有趣。说着，他点燃了一个大爆竹，用力向对面的大瀑布扔去。一声巨响，万山呼应，声音回荡，经久不息。张学良开怀大笑起来。

张学思盼望吃晚饭时能找个机会和大哥说几句话。可是，饭桌一撤，张学良又拉着他打乒乓球，叫特务来当裁判。玩累了，他又拿出国际象棋，张学思暗暗叫苦："大哥啊，你怎么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其实，张学良何尝不急于同弟弟谈话呢？可他知道，如今他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与外人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细心观察，然后有人详细记录向上报告。

张学思在溪口一连三天，时光都在玩乐中消逝了。

在临走的前一天，突然雷雨大作。吃过早饭，张学良对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

这时，赵四忙着张罗特务们玩牌，示意说："你们兄弟俩去吧，我们在这里打牌玩儿。"

张学良把学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个书架和一个报架，正好挡住门窗外的视线。这时学思才明白，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张学良示意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掏出了纸和铅笔。张学思会意，隔墙有耳呀，为了安全保险，大哥用纸笔同他进行无声的谈话！

"现在抗战局势是否已真正形成？"张学良刷刷地在纸上写

了一行字。

“全民已经动员，将士群情振奋，中日必有大战。”张学思飞快地用笔回答。

“东北军近况如何？是否有人弃战？”张学良又写下一行字。

“官兵们莫不希望早日开战，打回老家去，收复失地。”张学思望了大哥一眼，又写道，“全军上下都盼你回去号令抗日。”

张学良沉重地叹了口气，接过笔，重重地写道：“自由，渺茫，很渺茫！”

弟兄俩就这么你书我写，以笔代口。张学良又询问了中共的主张，当他得知周恩来等中共领袖已在杭州、庐山同蒋介石谈判、决心联合抗日时，神情有些激动，在纸上写下：“西安‘三位一体’不存，中共统一战线又起。”

接着，他又告诉四弟，他曾上书请缨，但宋美龄复信只叫他“好好读书”。

“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张学良写道，又在“自由”二字下，划了一条粗杠。

“大哥！”张学思心潮激涌，热泪滚滚而下，止不住低声呼唤。

“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张学良拍拍四弟的肩头，接过笔写道。

“大哥的话我一定办到！”张学思用颤抖的手在纸上写着，边写边抹眼泪。

第二天上午，兄弟俩挥泪相别。张学良执意相送，直走出一里多路，才由众人劝住。

“大哥保重啊！”张学思忍不住一声哭喊，眼望着身穿短衫布鞋的大哥钻进了汽车。


青年时代的张学思。

两兄弟谁也没料到，此次雪窦山分手，竟成手足间的永别。

"汉公，张学思到溪口看望你，你们用笔谈了一阵子，是这样吗?"访谈时，唐德刚教授想证实一下。

你说学思到溪口看我，我们用笔谈了一阵子。是这样的。那时，我四面都有人，只好这样。他在纸上写道，说他是共产党。那时，我看书，他说你不要看那些书，那不是些正经书。那个时候他很厉害，他明说他是共产党，说他在学校里时就是共产党。

他是黄埔第十一期的学生。所以，我说，国民党过去是大失败，整个学校叫共产党全渗透了，好多学员都是共产党。我四弟毕业的时候，我曾把他推荐到胡宗南那儿去，可他没去，他跑到东北军那儿去了，他的司令是吕正操，最厉害的是吕正操，他曾当过师长，以后叛变了，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

我曾跟你说过这话，你记得吧，宁给好汉牵马提灯，不给赖汉子当祖宗，你懂得这句话吧。我这四弟很有骨气。我所有的弟弟中，他最有骨气。

他与我那三弟是同母所生。那时，我三弟在北戴河喜欢上一个女的，一半中国血统，一半外国血统。你想，那个时候，对外国人什么样?我母亲非常生气，就用鞭子打他，让他跪在



张学良与三弟学曾（左）、四弟学思（右）合影。

地下，把我三弟大打了一顿。这时，我四弟回家看到了，什么话也没说，三弟就哭着骂他，说我四弟没有手足之情，说妈妈那么打我，你都不说一句，连一句讲情的话都没有。可我四弟说什么呢？他说，我不讲话更好，我要讲话，那只会多揍你，打你打得更狠！

我还在东北的时候，我四弟很喜欢海军，本来我预备让他带海军的。他凫水凫得也很好。

后来，他还是干了海军。他后来在大陆做到海军参谋长，海军副司令员。

他是很有骨气的人。

第七十五章 妙高呐喊

1937.7

——“现在抗战既已开始，我张学良的愿望就已实现，即使一死，也可以含笑瞑目了！”

——“就是把东北军一个连一个连地调着用，大家也要服从！东北集团和我个人，都不足多虑！”

——“现在，日本鬼子大举侵略我们祖国了，我要带你们打日本鬼子去！”

“知道吗，全面抗战爆发了！我张学良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幽禁在雪窦山中的张学良，从迟到的报纸上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了，突然像注射了兴奋剂，神情激动地在房间内外来回奔走，逢人便举着手中的报纸高喊着。

“刘秘书，你去通知伙房，今天做些好吃的，我们大家庆贺庆贺！”张学良兴奋地说，平日常有的那种忧郁和颓丧顿时一扫而光。

卢沟桥事变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和强烈反响。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国民党的对日态度也发生了变化。

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说：“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如果战端一开，就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日本进攻上海的第二天，国民党政府又发表了《国民政府自卫抗战声明书》，指出：“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遇有侵略，惟有实行天赋之自卫权以应付之。”

听说抗战爆发，众人都有些兴奋，加之好久没见张学良这么高兴过了，所以晚餐席上是一片激动的喧嚷。

“弟兄们，大家陪了我这么久，我的心思你们也都明白。我张学良的所作所为，目的只有一个，打败日寇，收复家园！谢天谢地，苍天有眼，这一天终于让我等到了！我敬大家一杯，祝贺抗战开始！”张学良叫人从房中搬出宋子文赠送的外国名酒，高举酒杯大声说道，言毕，仰首一饮而尽。

“难得副座今天这么高兴，我代表诸位弟兄敬副座一杯，感谢副座平日对我们的关照！”刘乙光也站起来举杯说道。

“不是你们谢我，而是该我谢你们，平日多有麻烦。现在抗战既已开始，我张学良的愿望就已实现，即使一死，也可以含笑瞑目了！”张学良声音哽咽，眼中泪光闪闪。略为一顿，他突然提高嗓门，像喊口令似地大呼一声，“日后大家抗日战场上见！”说完，又一饮而尽。

平日不大喝酒的张学良，这次竟一连干了五六杯，脸庞面

红似血，额上青筋突暴。到席终时，他已是步履踉跄。刘乙光忙叫人将他扶住，送回房中歇息。

静静地在沙发上坐了一阵，又喝过两杯茶，张学良醉意渐消，思维也明晰起来。他抓过报纸，将有关抗战的消息又读了一遍，然后坐在桌前，提笔写下了“介公委座钧鉴”几个字，然后笔走龙蛇，洋洋洒洒地挥洒了自己的一腔抗日热望。

当这封请求杀敌报国、参加抗战的请缨书托人送走之后，张学良便处于苦苦等待之中。每日的报纸一到，他必仔仔细细从头到尾读上一遍，对着一幅中国地图，研究敌我两军的位置和战略态势，并密切注视着东北军将士们的动静。

有一天，张学良来到图书室，见有几名警卫正在那里看报，并对抗战的事议论纷纷，便激昂地对众人说：“日本亡我之心早已有之，多年前我就有所预言。可是，‘九一八’时我误信国际联盟及其和平机构，错认公理可以制裁强权，所以步步退让，总希望得到外来的帮助，现在这一切迷梦都可以醒了。我们惟一的道路，就是靠自己死中求活，政府应当发动整个民众与日寇拼命！”

“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见人们不吭声，张学良又继续说，“我现在很希望领袖能给我机会。前年‘何梅协定’的消息传来后，我就说过这样的话：‘不要让我去剿什么匪，应当叫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更有价值。’现在也是，让我在这儿闲死，不如让我上战场去同日本人拼死！”

然而，望眼欲穿的满意答复终于没有来，倒是宋美龄回了一信，说是代表蒋介石的意见，认为现在让张学良去领兵打仗尚欠适宜，嘱他要“好好读书”。

寥寥数语，将张学良的一腔抗日热望击得粉碎，他顿时像变了个人，重又回到郁闷、萎顿的状态之中。

没过几天，戴笠到了溪口，名为看望张学良，实则来观察

他的动静。

“其实，副司令的一片心思委员长是明白的，只是他现在忙于组织抗战，难得抽出时间同您好好谈谈。据我所知，委员长不止一次地暗示过，国家早晚会倚重于副司令的。”戴笠不阴不阳地说道。

我就说，我同委员长之间并无个人恩怨。相反，这么些年，我张学良所作所为，无一不是在维护他的领袖尊严和权威。一九三〇年的事自不必说了，就拿西安的事来说，我为什么会送他回南京，难道我就不知南京有刀丛箭雨？我还不是为了他领袖的面子，为了他的尊严？可是，现在他却这样对待我，连抗战的机会也不给，让人怎么思想得过嘛。

现在时机什么不成熟？日本人杀了我的父亲，占了我的故土，现在已占了平津、上海，中国眼看就要被他们全部占完了，难道真要等成了亡国奴，时机才会成熟？

戴笠无言以对，尴尬地沉默了好一阵，才吞吞吐吐地说：“副司令，南京的情况你是知道的，我做事都是遵照委员长的意思。”

张学良抬手止住戴笠，说道：“雨农，这些事哪能怪你。你来看我，我很感谢．只望你回去之后，见着委员长，一是代我向他问好，二是向他表明我抗战的一片决心真意。”

殊料，戴笠走后不久，蒋介石却派了一个中过前清进士的浙江籍步老先生来溪口教张学良读书。步老进士讲课分外卖力，他摇头晃脑，唾沫四溅，讲《论语》、讲《中庸》、讲《四书》，但张学良却始终打不起精神来，他的心思完全飘向远方的抗日战场。

这时，汪精卫在全国广播电台上大谈“焦土抗战”，一个特务听了后，感到这个演说太动人了，但张学良却告诉他：“你太年轻，你别以为老汪的演说动人，其实，这个人的言行

极不一致。我可以断言，恐怕第一个不和蒋先生合作抗日的，就是汪精卫哩！"

果然，没多久，汪精卫终于做了大汉奸，可见张学良对汪知之甚深。

抗战爆发后，九月初，被调往豫南、皖北、苏北地区的东北军各部都派出了代表，前往溪口探望张学良，听候他对东北军抗战的指示。

眼前的少帅已明显消瘦、憔悴，精神也显得有些萎顿，众人一见，难免心酸，叫一声"副司令"，眼泪便扑簌扑簌地往下淌。

"我在这里过得很好，回去告诉大家，请大家放心。"张学良沉稳地安慰部下说。

"副司令，"一位少将师长向张学良说道，"我们东北军现在有两大心愿：一是早日打回老家，收复失地；二是盼望副司令早日归来，指挥我们上前线杀敌。"

"我们都盼着副司令回来主持东北军。"另一位将领说，"西安兵谏之后，东北军被分散调度，驻地各异，相互间没有军令上的统属关系，打起仗来，互相没有协调。而现在，又无人能担此重任。副司令，东北军没有你，就要这么散了啊！"

张学良听大家说完，叹了一口气，说："大家的心情我都知道。可是现在，我们的愿望恐怕还难以实现。现在还不是我回去的时候。何时回去，中央和委员长自有安排。抗战之事，是我们东北军盼望了几年的事，西安兵谏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请回去转告全军，一定要服从中央，努力杀敌，收复国土。"

"没有副司令，东北军首尾难顾啊！要打胜仗谈何容易？"一名将领哭诉道。

"我们要求的是全民族的利益，全抗日战场的利益。"张学良忽然提高了嗓门，"就是把东北军一个连一个连地调着用，

大家也要服从！东北集团和我个人，都不足多虑！”

张学良的一席话，让部下们再次看到了他那颗火热的赤子之心，领略到他那宽博的胸襟。

中秋节到了。

张学良在一次游妙高台时，见这里山崖险峻，古树参天，下可观绿湖碧波，上可触浮云天光，便说，中秋之夜，若能到这里摆酒赏月，倒不失为人生的一桩乐事。刘乙光记下了这番话，回来便吩咐熊仲青置办一下，别忘了中秋到妙高台赏月。

夜色降临，玉兔东升，月光乍起。张学良、赵四小姐和刘乙光、熊仲青等二十多个警卫分三桌坐定，一边赏月，一边进餐，气氛相当热烈。

“中秋是个好日子，大家都应该干杯！”张学良站起身来，端着酒杯，遥向明月说道。

熊仲青向前凑凑身，建议赵一荻小姐唱支曲儿来为赏月酌酒助兴。

“她别来，还是我来吧。”张学良手一摆，说着放下酒杯，遥望圆月，诵起韩愈那首《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当诵到“幽居默默如藏逃”一句时，触景生情，他抑扬顿挫的声调突然颤抖起来了。

眼望如盘圆月，想起故土沦丧、山河破碎、白山黑水遭受蹂躏之惨状，而自己却被幽闭深山，虎躯难伸，胸中的愤懑难以抑制。

多喝了几杯之后，张学良情不自禁慷慨激昂地挥着手对众人说：“如果讲到钱，有多少我自己也不知道；讲名，除了蒋先生就是我了。唉，今天还说这个干什么？现在，日本鬼子大举侵略我们祖国了，我要带你们打日本鬼子去！”

一阵山风拂来，将这妙高呐喊带向峰峦沟壑深处，它回荡在松林山岳之间，永存于在场众人的鲜活记忆之中。

中秋节后，张学良未出门。第三天，赵四小姐才陪着他到附近散了散步。警卫们发现，张学良似乎比往日略瘦了些，但精神却很亢奋。

“仗打起来了，他该回去领兵抗战了吧？”门口两名卫兵望着张学良的背影，悄声说。

“难说，”另一名警卫回应道，“蒋委员长会轻易放过绑过他的人吗？”

“这倒也是。”

此刻，张学良常常望着窗外青山发呆，或在书房内焦躁不安地踱步。他为自己远离抗日战场、远离东北军弟兄、孤独地在这幽山静谷中过着无聊的生活而悲愤。在义愤填膺中，集国难与家仇，他低沉而亢奋地吟诵起岳飞的《满江红》。

中秋节后第三天，“张学良招待所”的厨房突然失火。由于气候干燥，加之有风，火势越来越猛，整个招待所都被吞没在浓烟烈火之中。附近的乡民和雪窦寺的僧众见到火光，纷纷跑来救助。

赵一荻望着呼呼作响的大火，急得连连跺脚：“快，快叫人去救书房哪，千万别把书画烧掉了！”她大声疾呼，指点着几名警卫抢险。

张学良则站在一旁，看着赵一荻和众人急煞的模样，感到有些好笑。

“你们慢着，等我拍下这个镜头再说。”众人困惑地望着这个神色泰然、安若无事的“副座”，看着他“啪、啪、啪”地揿动照相机快门。

由于附近无水，扑救困难，不到一个小时，招待所便被烧成一片废墟。所幸的是，后来修建的书房因位于另一边，所以没有一本书报被烧掉。

张学良对其他所焚之物毫不介意，惟庆幸书画保留下来

了，他说："书画是花钱也买不到的。"

招待所被毁，张学良便无安身之地了。刘乙光急得团团转，他赶去雪窦寺同住持商量，在寺中借了几间房舍，让张学良、赵四小姐和一些陪伴人员暂时栖身。

那天晚上，赵四小姐发现：张学良睡得格外安稳！

整个招待所焚毁后，外间对起火原因纷纷揣测。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他蒙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放火灭迹。其实这种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妄测之词。

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

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遇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历八月十七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的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这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他一时好奇，回到招待所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给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不幸引起火灾。时值深夜，警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了。

这时，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如火如荼，溪口亦不是一个安全的后方。所以，张学良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被迁往黄山。

雪窦风雨之旅，是张学良漫漫幽禁岁月中的第一站，是惟一的一段颇为宽松、颇为惬意、略具生机和多彩多姿的囚禁时光。而告别雪窦后，艰难困惑、颠沛流离的日子，从此便接踵而至！

第七十六章　过 客 黄 山

1937．11

——“在车中颠了好几天，闷死人了，到了山上，也该好好地透口气。”

——“委员长倒是很关心我呀！”

——“多吃点儿，多吃点儿，这鱼是我捉来的呢。”

“我尝够了无家可归的滋味，现在又知道什么叫‘无立锥之地’了。”

招待所被焚毁的当晚，张学良在寺里的油灯下对赵一荻说道。

雪窦寺是佛门之地，僧众们每日晨钟暮鼓，青灯黄卷，作息雷打不动。游山的旅客到了雪窦山，难免要进到寺里烧几柱香，许几个愿；附近也有些固定的香客，隔三差五便要到寺里来。这就使刘乙光在安全保卫上有诸多不便，他急电南京，请

示下步如何安排。

此时此刻，正值日本侵略军企图大举进犯南京，宁波、溪口已危在旦夕，蒋介石见势不妙，特命戴笠务必马上着手转移张学良。

两天后，军统局派宁波警察局长、蒋介石的外甥俞济民前来溪口料理此事。

招待所失火之后，张学良发了封电报给在上海的于凤至，告诉她雪窦山的近况和即将移往黄山。于凤至很快回电，说她即刻启程前来溪口，陪伴丈夫迁往安徽。由于蒋介石早有明令，只能有一人陪伴张学良，于是，赵一荻很识大体地向张学良提出："大姐好久没见到你了，我也想去看看闾琳。这一路上，就只有麻烦大姐照顾你了。"

"小妹，现在的情形你都了解，大家都吃了不少苦。今天迁往黄山，以后还不知道再迁往哪里去呢。闾琳还小，需要有人照顾，你不在他身边，孩子会有很多苦头。所以……"张学良说到这里，已是声音颤抖，泪光闪闪。

"我明白，汉卿，"赵四小姐一把抓住张学良的手，啜泣着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无论你到哪里，我的心都随着你。孩子的事，你放心。他姓张，是我们俩的骨血，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赵四小姐以其温柔娴淑、活泼多才的性情以及对张学良无微不至的关怀、对爱情的忠贞不二，赢得了大家的尊敬。她临走时，许多警卫都依依不舍。

"什么时候回来，我再去接您。"一个曾求赵四小姐帮忙写过家信的小兵，帮她把皮箱拎上汽车后，红着眼圈说道。

赵四走后不几天，于凤至抵达溪口。随之而至的是南京派来的七辆小轿车、十四辆大卡车，新的转移行动开始了。

装车之后，发现东西尚有余留，于是，刘乙光又给浙江保

安处打电话，让其再增派两辆大卡车。一切装置停当，刘乙光请张学良前来检查一下。

张学良用作战眼光对车辆又进行了调配，建议开道的为一辆小车，紧接着是四辆大车，然后是轿车和其余的大卡车。他对刘乙光说："有一辆小车在前，窄道能过，便于熟悉道路地形；四辆大车若能通过，后面的车也不再会有问题。警卫人员主要在前头四辆车上，后面也要留一些，使首尾都能照顾到。"

"坚决按副座指示办。"刘乙光立正说。

"为了防止路上遭遇敌机空袭，戴局长让布置了十四挺高射机关枪。我拿不准，是稍微集中一下火力呢，还是每辆大卡车上都放上一挺？"刘乙光又征询张学良的意见。

"当然是每辆车装一挺！"张学良肯定地说，"这样散布面大，对敌机威胁大；再者，就是挨了炸，火力也不会全都完蛋呀！"

"副座不愧是将才。"刘乙光奉承道。

临行之际，张学良走进屋内，舒展笔砚，给经理钱君藏留下一信，感谢他数月来在生活上的多方照顾，同时，请他将在水涧岩所修的那几间书房代为赠送雪窦寺的住持。

此时，雪窦山"中旅社"钱经理正在上海向总社汇报旅社被烧之疑案。当他返回雪窦山时，张学良已踪影杳然。他看完信后，禁不住连声叹道："将军自是仁义之人，奈何今世多坎坷！"

虽是深秋，但雪窦山中仍是一派林木丰盛、嫣红姹紫的景象。出发之际，东方呈现鱼肚白，淡淡的薄雾组成一片帷幕，罩住了雪窦山挺拔的山峰。

车队浩浩荡荡地开拔了。张学良和夫人乘坐宋子文赠送的那辆高级防弹轿车，行进在车队的中间。不一会儿，车队开进一个窄窄的山口，张学良知道，这就要出入山亭了。

"停一下，我再看看。"张学良从车座上挺直身，对司机说

道。

司机连忙踩定煞车。停车后，只见身着玄青衣袍马褂的张学良从车中走出，走入“御书亭”中，久久地凝视着亭内巨碑上宋理宗所写的四个大字：“应梦名山”。末了，又抬眼望望后面叠嶂生灵的山峰，寻觅着自己曾留下无数足迹的山间小径和林中古亭。他默默地停立了约摸两分钟，才又返回车内。

后面车上的两名警卫一直注视着张学良的举动。待车又开动后，一名警卫说：“副司令这人恋旧，舍不得离开这里呢。”

“屁！”另一名警卫反驳道，“他张学良是个敢捅天裂地的人物，这小小的雪窦山禁了他那么久，现在离开了，哪有不庆幸之理？刚才他是在向这片山水道别呢。”

此刻，于凤至仿佛猜到了丈夫的心境，伸手整理了一下盖在他膝上的毛毯，亲切地唤了一声：“汉卿。”张学良回头看了看凤至，又扭头回望窗外。

从溪口到黄山脚下的歙县，沿途交通状况不甚好，车队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有时一天只能行一百来公里。每到一处，熊仲青便带着两名警卫，探看镇上村里是否有青砖红瓦的大户人家，或铺面整洁的旅店，中意了，便进去同主人商谈借宿。但即便是选中的最好的住处，走进屋来，仍会闻到浓重的潮气和霉味。若抬眼一望，四处灰尘遍布，顶上屋角皆可见到一圈一圈的蜘蛛网。

张学良过惯了军人生活，风餐露宿的日子也多有体验，所以对路途上的艰苦还能适应。于凤至就不同了，她从小锦衣玉食，嫁给张学良后更是生活优裕，婢仆成群。居留英国时，她的生活方式也有了些洋化，很难容忍恶劣的卫生条件和颠簸不止的旅行。虽然一路上鲜有遂意的时候，但于凤至却没讲半句埋怨的话。

两天后，车队进入安徽境内。第三天中午，车队在屯溪停



黄山居士林，一九三七年十月张学良被转移到此。

下。刘乙光安排大家午餐。正巧，从黄山下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张澜在屯溪午餐休息。张学良与张澜双手相牵，对视良久，互致问候。两人似有许多话要说，但见有武装士兵在旁警戒，不便多说。分手时，张澜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说："汉卿兄，要多加保重啊！"

车到歙县时，正是薄暮时分。夕阳隐去，险峻雄伟的黄山在暮霭中显得幽暗苍凉。眼见颠簸的旅途终告结束，众人的心情豁然开朗。

当地县政府获悉张学良要来的消息，早已派人在通往黄山的路口处等候。当车队抵达时，县长立即迎上前，引导车队上山，直奔已选定好的住处。

汽车沿盘山公路缓缓而行，到半山腰时忽见一块平坦的旷地，再往前拐进一个岔道，一幢覆掩在苍松翠柏之间的大别墅顿时映入眼帘。

"这是当过总理的北洋军阀段祺瑞的别墅，叫'居士林'。"县长一边下车一边介绍说，"这是他晚年修建的，本准备用来

拜佛念经，可是，他却没来住过一天。现在房间是空荡荡的。前些日子，一些受伤的空军军官来疗养时住在这里。接到上头指示后，他们都搬走了。这边上的温泉区也封了，专等着留给你们用。”

张学良对“居士林”的匾额很感兴趣，他站在匾前，连看了几遍，久久不愿离去。

“居士林”的租金由南京方面以高出几倍的标准支付。这所别墅房间很多、很大，熊仲青为张学良夫妇挑选了一间干净而宽敞的房间做卧室。从张学良夫妇的住处，到便衣队队员和宪兵们居住的空军俱乐部，附近的风景区都布下岗哨，划为禁区，严禁任何人入内。

第二天，吃罢早点，刘乙光来请示，问是在家歇息还是登山游览。张学良不假思索地说：“当然是游览。在车中颠了好几天，闷死人了，到了山上，也该好好地透口气。”说罢扭头去看于凤至。

“夫人这些天过于劳累，安排她好好地再休息半天，上午游山就不要去了。”见夫人仍是一副慵倦的模样，张学良便对刘乙光说。

于凤至感激地望了丈夫一眼，说：“下午我再陪你游山。”

为方便张学良在山上游览，歙县政府专门派了一位熟悉黄山名胜古迹的人住在山上，随时进行讲解或充当导游。张学良叫他来和自己走在一起，一同前往太白楼和长庆寺塔游览。

导游向张学良解说道，太白楼建于唐代，相传是李白当年饮酒赋诗的地方；长庆寺塔是北宋时建造的。张学良对这两处古迹观赏得很认真，不断向导游问这问那。当走到堂中柱前，张学良还停下脚步，朗读上面的楹联和诗句，兴味盎然。

抵达黄山的第二天下午，有一个身穿长袍、年约六十岁左右、看上去颇不起眼的老头来看望张学良，对张学良毕恭毕

敬，谈了一个多小时就下山了。此人便是原奉天省省长、时任安徽省主席的刘尚清。他曾是张老帅和少帅的部下。临离去时，他紧紧握着张学良的手，眼圈都红了。

离别墅不远，有一远近闻名的温泉。在张学良到达的前两天，这里便接到命令：温泉区将划为专用，外界任何人不得入内。

抵达黄山之初，张学良除了每天到风景区游览外，便是在温泉里浸泡洗浴。偌大的温泉顷刻间竟变成只有一人可以进出之禁地，这引起往日常来洗浴的空军军官们的不满，背地里议论纷纷。可是没过几天，他们便注意到，这位曾经纵横捭阖、气吞万里的少帅，此时已身陷囹圄，处于严密的看管之下。于是，军官们便转而对这位独享温泉的将军同情起来。

一天，趁着张学良上山游览之际，五六名空军军官靠近想同他接触一下，攀谈几句，但跟在张学良身边的警卫不由分说，将众人同张学良远远地分开。

有一次，几位空军军官黄昏漫步，正好走到段祺瑞别墅前，远远地看到张学良正在花园中独坐，军官们便向门口的警卫提出，想进去同张学良闲聊几句，哪怕是请个安、问候一声也好。刘乙光闻讯，急冲冲地从屋内赶出来，厉声将众军官斥退，并声言若以后再来纠缠，将通报他们的部队，给予最严厉的处分。

到达黄山的第三天，张学良游山归来，欲去温泉洗个淋浴，却见一辆吉普车飞也似的奔来，警卫们一边掏枪，一边大喊："站住，大家快散开！"

张学良、于凤至和站在一旁的刘乙光见状，都大吃一惊，想要躲避已经没有可能了，汽车"嘎"地刹在众人面前。刘乙光抢上一步，挡住张学良，惊恐地望向车内。但见车门"砰"地一声打开，急冲冲地跳下一个面皮白净、身着长衫的年轻

人，亮着嗓子大喊：“我是歙县政府的人，要找刘秘书，找刘秘书！”

“我就是刘秘书，什么事？”刘乙光嘘了口气，上前一步，打量着年轻人，扬手让警卫们把他放开。

“哎呀，快！快！”年轻人边说边用手抹额上的汗珠，“南京官邸来电话，说蒋委员长要和你讲话，电话还放在那儿等着呢。县长要我马上赶来，刚才多有冒犯，……”

“快，快开车！接电话！”听说是蒋委员长要找他，刘乙光眼睛一亮，顾不得听来人道歉啰嗦了，急匆匆跳上尚未熄火的吉普车。

“你们在路上走了几天？为什么一直没有消息？”蒋介石的声音明显流露出不高兴。

“报告委座，路上交通不好，一共走了三天。我们沿途都在想同南京联络，但一直找不到通讯的地方。”

蒋介石“噢”了一声，又问道：“汉卿在路上好吗？”

“副司令很安全，精神也好。请委员长放心。”

“你们在黄山住的地方怎么样？”

“很好。住的是段祺瑞以前的房子，条件很好，很安静，安全上也没问题。”刘乙光大声说。

“那就好。”蒋介石似乎松了口气，语气也缓和了许多，“你们一定要照顾好汉卿，免得我挂心。”

“是，是，请委员长放心！”

“黄山并不是一个适宜的地方，你们要随时待命。”蒋介石又说道。

“是，是！”刘乙光连声答道。

蒋介石对黄山空军军官要求面见少帅的情况很担心，他告诉刘乙光说：“要严密注视情况的进展。”

“以后的行动由戴局长布置给你们，要随时向我报告！”最

后，将介石叮嘱说。然后“啪”地一声挂上了电话，听筒中只有“呜、呜”的电流声。

过了许久，刘乙光才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放下电话。

回到段祺瑞别墅，刘乙光径直走进了张学良的房间，告诉他说，刚才是委员长亲自打来的电话。

“有什么新的指示吗?”张学良问道。

“委员长问了副座在路上的情况，要我们好好地照顾你。还说以后的行动要随时向他报告，以免他在南京挂心。”

“委员长倒是很关心我呀。”张学良冷冷地说道。

“是啊。”刘乙光接口道，“现在全国正忙于抗战，委员长日理万机，可还专门把电话打到了歙县，足见副座在委员长眼里不一般哩。”

“是吗?”张学良淡淡地应了一声，既像是在问刘乙光，又像是在问自己。

黄山虽然风景秀丽，古迹遍山，但日日登临，难免有些疲乏；而歇息下来，闭门不出，张学良又颇觉无聊。他总想找点事做，消遣一番，遗憾的是，附近没有他所喜欢的运动场；赵一荻走后，下棋又找不到对手；加之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之后，赵四又从上海避居香港，一想到这些，他心中倍感烦躁。

此时，黄山已是初冬季节，寒气渐渐袭来，服侍张学良夫妇的王奶奶怕他们身体受凉，赶紧忙着织毛衣，于凤至怕王奶奶累着，就劝说道：“王奶奶你休息休息吧！我们又不等着穿，你老忙什么?”

王奶奶却关切地说：“没关系，我闲着也是闲着，天冷，你们年轻人早晚不穿毛衣，受了寒怎么办?”

这位心地善良的王奶奶，总是像爱护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体贴着少帅夫妇。

一天，张学良在山脚下见到几个黄山老农正兴冲冲地在河

中抓鳗鱼，那种奇特的方式引起他极大的兴趣。回来之后，他便告诉熊仲青，说第二天他要下河去，让熊队副给他挑两个年轻手快的警卫，一同去捉鱼。

第二天一早，几个人便提着用油浸过的白米，来到山脚下的小河边，先用石头在河边堆起一个圆圈，在顺流的一头留下一个大缺口，然后掏出米来，撒到圆圈中间，静候鱼儿上圈套。两个小时后，他们将缺口堵上，跃入圈中，七手八脚地摸鱼。不一会儿，二十几条鳗鱼便被捉拿进桶，另外还有许多肥大的黄鳝。张学良像打了胜仗一般，高兴得手舞足蹈，吩咐将鱼送进厨房，摆一桌香喷喷的鱼宴。

吃饭时，张学良不停地给于凤至夹鱼，口中不住地说："多吃点儿，多吃点儿，这鱼是我捉来的呢。"其欣喜之态宛若孩童一般。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南京陷落，日寇攻入这座古城，实施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沿苏、皖一线，国民党败军不断，散兵游勇随时可见。黄山附近的情况也渐趋混乱，有的国民党士兵擅离部队，携枪躲进黄山为匪，山上开始出现抢劫、杀人的案件。

一连几天，刘乙光都心情紧张，坐立不安，不停地到县城打电话、探消息。十二月十七日，戴笠终于发来指令：立即离开黄山，移往江西萍乡暂住。

"现在一没有交通工具，二也没有钱了，怎么办？"刘乙光在电话里哭诉道。

"没有交通工具，就在屯溪封车！没有钱，可以先向歙县县长借用！"戴笠在电话中厉声命令说。

刘乙光找到县长，县长一听说是军委会军统局要"借钱"，不敢怠慢，马上拿出了三千大洋。

这天，张学良和于凤至从山上游览返回住处，刘乙光前来

告诉他们夫妇："整理行装，准备转移。"

此刻，屯溪市面秩序混乱，人心惶惶，哪里有汽车可封呢？特务们急得团团乱转，毫无办法。最后，他们拿出"军事委员会"的大封条，贴封了江苏省公路局的四辆客车，但还嫌不够，又封了安徽省公路局的三辆卡车和一辆客车。这一下子共封了八辆汽车，司机、助手共十五人。

本来，封车人家就很不愿意，可现在还要"封人"，这就更令他们恼火。但一看特务们拿的是"军事委员会"的封条，又带有武装宪兵，再恼怒也得跟着去。

歙县县长这时也在屯溪，他帮助特务们封了车，又立即派了十名保安兵押车，他本人也随车一同上黄山。被抓来的司机、助手见此情况，只好哭丧着脸把车子开到黄山，待命出发。

张学良车队的下一个目标：江西萍乡。

第七十七章 浪迹萍乡

1937．12

——“抗战期间，哪儿还管得上什么舒适不舒适！我是军人出身，睡地铺的事也干过，不要把我看成个洋佬阔少。”

——“想不到煤矿工人这么辛苦”

——“来，来，今天我请客，咱们一边剥花生，一边吹吹牛，好不好？”

兵荒马乱，兵败如山倒。

张学良是带过兵的人。在从黄山到萍乡途中，他一路上看见撤退的部队和逃难的百姓混在一起，冒着滚滚烟尘、艰难地蠕动，便深知局势已十分严重。

夫人于凤至则心神不安，她一会儿望望丈夫，一会儿望着车窗外受难同胞纷纷逃亡的惨相，触景伤怀，焦躁担忧地说：“汉卿，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啊！”

局势混乱。为防不测，刘乙光在张学良防弹车的一前一后，都布置了荷枪实弹的宪兵，防止敌机空袭的高射机枪也在车顶架起，阵势慑人。

历经两天的颠簸，张学良、刘乙光一行终于艰难地抵达了江西萍乡。

萍乡是个山城，地势偏僻，交通不便。熊仲青先于车队一天出发，跑遍了整个县城，都难找到一个合适安顿张学良夫妇和宪兵、警卫的地方，直到大队人马抵达，这才无可奈何地包下了一个外形古旧、上下两层的赣西饭店，开了六个房间。张氏夫妇被安排在中间房间，特务队员分住两旁各间。

这旅馆的条件实在太差了，不要说张学良夫妇，就连刘乙光自己也觉得确实难以忍受。

熊仲青忐忑不安地来见张学良，说实在没有办法，请副司



萍乡绛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张学良转移至此。

令给予宽谅。

"这是什么话！抗战期间，哪还管得上什么舒适不舒适！我是军人出身，睡地铺的事也干过，不要把我看成个洋佬阔少。"张学良一听，生气地打断他的话。

虽然挨了骂，但熊仲青的心里却很舒畅，他被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和精神所深深感动。第二天，他又带上几个人，跑到萍乡城外去寻住处。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天后，终于在距县城三四华里的一个山脚下，找到一幢砖石结构的两层小洋房：它依山傍水，四周是一大片茂盛的林木，前面有一棵三人合抱的大黄桷树。楼房的侧面还有一条小河，在古树前绕了个弯，蜿蜒而去。

在这个穷乡僻壤能见到这么个幽静雅致的地方，真是作梦也没有想到。

房屋的主人姓李，是萍乡当地人，曾是北京清华大学的教授，现年老退休，带着夫人和儿女回到故乡闲居。当熊仲青提出租用这幢小洋房的部分房间，安排给一位长官暂时住一下时，李教授颇为犹豫。

李教授有个女儿，叫倩玉，肤色白皙，聪颖伶俐。她从小在北京长大，讲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对突然从大都市搬到乡间幽居很不习惯。听说有人要来这里借住，高兴得连连拍手，非让父亲同意不可。李教授夫妇架不住熊队副的再三游说，同时也耐不住女儿的死纠活缠，只得勉强表示同意。

当搬迁到小洋房的事报告给刘乙光时，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反倒有些犹豫，后经调查证实，李教授一家没有任何政治背景，对党派活动也没有任何兴趣，李家迁来萍乡后，孤门独处，与外界极少往来，在安全和保密上不会牵涉任何麻烦，这样，刘乙光才最终点了头。

于是，熊仲青便将二楼的七个房间连同楼下的三间饭厅全

部租下，月租金一百六十元。二楼的正中住张学良夫妇，剩下的六间房子则住便衣特务。

能在这么个偏僻的地方住进一幢安静舒适的洋楼，颇令张学良诧异；特别是李教授一家人非常好客，教授的女儿年轻可爱，和少帅夫人于凤至也很谈得来，亦令张学良感到高兴。

刚刚安顿下来，倩玉便来看望，对于凤至随身携带的许多新奇玩意儿，她充满好奇地问这问那，银铃般的笑声为旅途劳顿的人们增添了不少轻松气氛。

于凤至旅居英国时，喜欢上流行歌曲，回国时专门带回一部留声机和许多唱片，一静下来便喜听唱片消遣。倩玉也很喜欢唱歌，对唱机、唱片更是兴趣浓厚，百听不厌。于凤至见自己喜欢的唱片能在乡间遇到知音，也十分高兴，对倩玉自然也就宠爱有加。

大敌当前，作为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抗敌救国，这令张学良的情绪变得十分低沉，有时，他对于凤至放唱片显得有些不耐烦。

"张先生你也真是的，夫人的音乐那么好听，你怎么就不喜欢？"倩玉是个小姑娘，天真活泼，喜欢为于凤至打抱不平。

"小孩子知道什么，那边一吵，就影响我的情绪，影响我思考问题。"

"哟，看不出来张先生还是个思想家呢。将来说不定会当上个大人物吧？"李小姐尖着嗓子说。

小倩玉，包括李家老小，此时此刻绝对想象不到，他，这位暂住客，就是当今中国威名赫赫的张学良将军。

在兵荒马乱中奔波，张学良的情绪自然不好。不过他心胸开阔，为人豁达，随遇而安。在黄山时，他整天游山玩水作消遣，以此排忧解难。可是，萍乡是一个小县城，街道不多，偏

僻闭塞，更谈不上热闹，附近也没有名胜古迹，实在无处可去。所以，张学良在萍乡时倍感寂寞苦闷。

早晨和傍晚，于凤至常常陪着张学良散步，可他往往是半天不说一句话，大部分时间以读书来消磨时光。

于凤至见此状况，不得不去找刘乙光这个"秘书"，说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调节一下张学良的情绪，千万别让他闷出病来。

见张学良这般闷坐，刘乙光也甚感焦急。于是，他便让宪兵和警卫们一齐动手，在离李教授家不远的一片空地上修了个网球场，让几个身手好些的警卫陪着张学良打网球。但运动哪能排遣张学良因无法奔赴抗日前线而积压的烦忧？加之警卫们的球艺都在他之下，玩上几天，他便兴趣索然了。

自从负责监管张学良之后，刘乙光给自己确定了一条最基本的原则：只要不违反南京的禁令，张学良怎么高兴就让他怎么去做，他愿意怎么寻乐就怎么去尽兴，反正军统局每月给他拨一个团的经费，钱从来不缺，再说，张学良本人的财源也很丰厚。

一年来，蒋介石对刘乙光的"管束"工作十分满意，明令不准再换他人。戴笠在前不久同他通电话时，已经暗示考虑给他晋升上校的问题，这更令他劲头倍增。他相信，只要张学良这个人不出问题，那么，不出年底，他的领口上一定会变成两杠三星。

可如今，张学良整天憋闷在屋里，这可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刘乙光灵机一动，便把警卫们召来，要大家出主意想办法，使副司令走出屋子高兴高兴。众人冥思苦想了好一阵儿，仍无计可施。这时，有个叫胡祥林的警卫把大腿一拍，说："副司令这个人敢作敢为，越是险的、奇的事，他越有兴趣。前些天，我听当地人说，萍乡西门外有个山洞，可以

一直通到湖南的安源县。但这洞从来没人敢进去过，因为传说洞里藏有毒蛇猛兽，凡进去的人，没有一个生还。”

刘乙光将山洞的事向张学良一说，果然引起他极大兴趣，立即嚷着说明天就去，叫刘乙光赶紧准备探洞所用的武器和物品。张学良突然高涨的情绪也感染了刘乙光，他当下便去布置人员，并找了一个当地人充作向导。

第二天吃过早饭，探洞的警卫们带着手枪、冲锋枪、火把、手电、木材、鞭炮、绳索等集合于黄桷树下。张学良上前检查了一番，又同那个当向导的老头闲聊了几句，便像是要去完成一项惊天动地的大业一般，气昂昂、虎威威地领着一行人向山洞进发。

“大家切不可莽撞。这洞内到底有什么谁也说不准，贸然钻进去，说不定会碰上什么意外的事。我看先把鞭炮丢进去，要是有野兽肯定会有反应。”在洞口，张学良告诫众探险者。

爆响之后，洞口飘出了一股浓浓的蓝烟，却未见到有任何野兽的动静。大家这才携着武器、举着火把钻进洞中。洞口一段，四五个人能并肩同行，但越走越窄，到五十来米处，竟只能容一人通行。大家略略商议，决定让两名警卫手持冲锋枪走在前头，张学良紧随其后。洞里的路坑洼凹凸，行走极为困难，加之阴暗潮湿，又有恐惧心理，所以前进速度缓慢。往前又走了约半里路，山洞豁然开朗起来，阳光透过顶上的岩缝照射进来，惨白耀眼，如同探照灯一般，大家稍稍松了口气。

“快来看，这是什么？”突然，一个举着火把的警卫蹲下身，指着地上连声惊呼。大家连忙围上去，发现脚下的路不知何时变成了泥土，上面有许多宽大的脚印，而且从泥土松动的情况来看，显然是新印。

“这里肯定有猛兽！”举火把的警卫惊恐地说。其余几个警卫也面面相觑，不知是该进还是该退，大家的目光一齐投向张

学良。

张学良蹲下来，再次察看了野兽的脚印。从印迹上看，这不像是一般的野兽，泥土被压得那么深，说明野兽是庞然大物，而且，好像还不止一头。如果这野兽是狮子、老虎或熊的话，那么，将会使探险者们处于危险境地。

张学良望了望几名警卫，见他们畏畏葸葸，没有人表现出那种他所期望的敢于一搏的勇气。看来，只得中途罢兵了。

"算了，咱们回去吧。"他低沉地说，又望了望一片漆黑、深不可测的山洞。

一场"探险"就此告终。

但张学良仍意犹未尽。一连好几天，他都在同几名去过山洞的警卫谈论那个山洞："我看什么时候我们再去一次，带上些手榴弹，再扛上挺机关枪，一见野兽就开火，没准儿我们还能从那洞里发现点新奇玩意儿呢。"

一天，张学良偶然听人说萍乡附近有座煤矿，便向刘乙光提议要去看看。

动身那天，于凤至和李小姐正谈得投机，张学良便问于凤至是否愿意去，于凤至回答说："我不去了，到煤矿有什么意思呀！"

张学良只身在刘乙光和警卫们的陪同下来到煤矿。

张学良显得很高兴，他率先套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然后由矿长领着，一行人坐着小火车开进洞里。

这是个老字号煤井，洞很长，一进去便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众人在沉闷的黑暗中，耳听小火车单调的隆隆声，一直穿行了十来分钟，才到达了点着油灯的采煤点。

走下小火车，张学良发现，这里比地面上不知要单调无聊多少倍。除了歪歪斜斜支撑着煤洞的木柱和黑黝黝的煤块之外，没有任何别的东西。洞里空气十分恶劣，只待上一阵儿，

便觉得胸闷气紧，呼吸困难。至此，张学良早已没了下洞前的兴趣，匆匆看了一下，便招呼刘乙光离开煤洞。参观煤矿的事就这样草草收场了。

“想不到煤矿工人这么辛苦。”走出煤矿好久，张学良才开口说话。

“这还不算呢，”身旁一名警卫接口道，“有的矿井里进了水，工人采煤要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若是哪口井里发生瓦斯爆炸或者坍方，里面的人就全都完了……”

张学良闻言，黯然无声，深深为劳工们的辛酸而感叹。

转眼到了春节，萍乡街上热闹起来了，人们在玩龙灯、耍狮子、唱花灯、踩高跷。张学良为排忧解闷和了解民情，执意要去看看，刘乙光无可奈何，只好派便衣“陪同”。

正月初五，吃过早饭，张学良和特务队员们都化了装。张学良穿了一件卡其布工装，上身工作服，下身背带裤，头戴蓝色鸭舌帽，活像一个汽车司机。他手插裤兜里，一边走，一边哼着京戏。

街道上，人头攒动，锣鼓喧天。忽然，从人堆里传来一声东北口音的叫喊：“这不是少帅吗？”听到耳熟的乡音，张学良急忙转视，只见一个东北汉子挤过来。此人似曾相识，可他显然已记不起来了，正欲挤过去打个招呼，见见这位东北老乡，不料，却被刘乙光抢了先：“老乡，你认错人了吧，他是我们的汽车夫，什么少帅老帅的！”说完后，一阵讪笑。在旁边的便衣特务们连忙拥着张学良挤出了人群。

后来，经过盯梢侦探，得知那个东北汉子原来曾在大帅府里当过理发师，也为少帅理过发。这件“小事”顿时引起了特务们的惊慌，刘乙光连忙与戴笠通话，请示处置办法。戴笠立刻下令切断“电源”。刘乙光得到指示后，马上采取了措施，于是，那位东北理发师便在萍乡城里神秘地“消失”了。

这时候，张学良的双腿开始肿胀，特别是脚背竟肿得发亮，一按一个坑，医生说是缺乏营养，宜多吃蔬菜，问题不大，可于凤至仍急得团团转。

"没什么了不起的，只要多出去走走，活动活动，血液流快一点，就会没事的。"张学良安慰夫人道。

"刘秘书，你看这太不公平了。弟兄们在前线打仗，流血流汗，我在后方闲得腿都肿了。这不行，我得多运动运动，一声令下，我至少还可以往前多冲几步啊！"

张学良在幽默中抒发着自己渴望前线杀敌的凌云壮志。

"这是我们同日本人算总帐的时候啦！一定要拼个你死我活。蒋先生也说了，非打到最后不止！"几天后，张学良又对着客厅中的警卫大声喊道，随即，神情凄惶地望着窗外的春雨。

"不给他东北军，也可以给一个师、一个团嘛，"警卫们私下议论说，"至少还可以让他在战场上冲杀一阵，了却他收复故土的夙愿，这总比老这么闲着，还牵扯我们大家在这儿无所事事要好啊。"

"委员长怎么想，谁也弄不清楚。"有位警卫说，"大人物间的事，复杂得很呢。张先生在很多人眼里是只上下不惧的老虎，恐怕有人担心放虎归山，后果可怕吧？"

连着下了十几天雨，很难得地出现了一个好天。待天一放晴，张学良便提出要到萍乡县城里走走，并提出少跟点警卫，让他能像普通人那样在街上随便同人聊聊天，或者从与店铺老板讨价还价中寻点乐趣。

刘乙光想了想，认为萍乡是僻壤，政治空气亦不浓，自来后从没在安全上发现过任何问题，于是便同意了，仅派两名便衣警卫陪伴张学良夫妇，后面再远远地跟上两名便衣宪兵，以防不测。

雨后道路泥泞湿滑，于凤至怕出问题，想坐汽车到城里，但张学良坚决不同意，硬是一步一挪地走到城里，虽满头大汗，但因活动了筋骨，他反而感到浑身轻松多了。

逛萍乡城回来，张学良拿出他从街上买来的花生和炒胡豆。

"来，来，今天我请客，咱们一边剥花生，一边吹吹牛，好不好？"

大家见张学良心情好了起来，都十分高兴，纷纷围上前来，说着笑着地吃起了花生、胡豆。楼上的房间里，于凤至的留声机传出了动听的歌声，间或还可以听见倩玉小姐时高时低的伴唱，和她那银铃般的笑声。

自南京陷落之后，国民党政府的要员们开始纷纷西逃，国民政府迁都山城重庆。蒋介石的威势随着他逃离龙盘虎踞的紫金山，变得衰竭虚弱了。惊魂甫定之际，他还顾不上与刘乙光联络，张学良在萍乡的一举一动，都由戴笠通过电报进行遥控指挥。

一月底，刘乙光突然接到戴笠的电报，要他将张学良迁出萍乡，转移到湖南郴州。于是，颠沛流离的日子又开始了。

第七十八章 闲居郴州

1938．2

——“人生忧患，千古同此啊！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

——“咱们在苏仙岭上来它几段清唱，热闹热闹。”

——“东北这块儿好地方，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

“唉，日本人打来，比我们跑得还快。我们还没有住定，又要奉命跑了。那就干脆再跑远点儿算了吧！”

听刘乙光说又要搬迁，张学良无可奈何地叹道。说完，他又去察看挂在墙上的地图，不断地摇头。

从江西萍乡到湖南郴州，大都是山路，盘山绕岭，坎坷颠簸。一路上，凡经过较大城镇时，车队都会停下来歇息一阵儿，吃饭，买东西，上厕所，忙乱一番，而张学良和于凤至则

饶有兴致地逛商店，享受购物的乐趣。

车到安仁县，张学良意外发现这里的商店里居然网球、羽毛球、乒乓球样样都有，他大喜过望，当下便让店员将存货全部搬到他的车上。付款时，应副官拿出几张面值一百元的中央银行大票，没料到店员竟从来没见过这么大额的钞票，翻来复去地看，不知是真是假。后来，张学良怕起误会，叫应副官另凑了些零票，这才结了帐。

“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当时的郴州，瘟疫猖獗，满目疮痍，一片败落。

湖南山青水秀，真是个好地方，没想到房屋这么陈旧，百姓穿得这样破烂。

当张学良一行走到离郴州不远的一个名叫“凤栖渡”的地方时，看看天色将晚，已到歇息的时辰，恰巧此处有一所很大很古老的房子，刘乙光便对张学良说：“只好在这旧房子中将就一夜了。”

“行啊，军人四海为家，何况还有房子住。”张学良很爽快地答应了，又回头宽慰了一下夫人。

第二天，有人回来报告说，在郴州历尽周折，终于在距城东四五里的苏仙岭找到了一座大庙，叫苏仙庙，庙是四合院式的古老建筑，大小有二十多间房屋，只有几个和尚居住。

真是难得的好地方。刘乙光本人即是距郴州仅几十里远的永兴县人，对苏仙岭早有所闻，当下便表示同意。

苏仙岭是湘南胜地，山色秀丽，万木葱茏。相传西汉文帝年间，有一名叫苏耽的人在此修行，最后得道成仙。到了唐代，人们根据这一传说，在山顶修了苏仙观，此山峰亦被称作苏仙岭。山上奇峰异石，古松拔秀，有白鹿洞、三绝碑、玉溪、跨鹤台、望母松等名胜古迹。

张学良一边登山，一边欣赏着苏仙岭上的景色，顿觉眼界


郴州苏仙岭正门，一九三八年一月张学良被转移至此。

开阔，胸怀舒展。他觉得这里的景致比起萍乡来，不知要好多少倍。

我说，苏耽当年能够在此修行得道，成为仙人，说明这里的山水非比寻常。如今我又要在这里修行，不知将来能不能成仙升天呢？

"我要成了仙，天宫寂寞，不胜萧寒，每年七月七日，我还得重返人间，与你相会哩。"

张学良对夫人说笑着，于凤至、刘乙光及随从们闻言，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进庙后，熊仲青安排张学良夫妇住观堂东北角的几间屋，他和刘乙光紧靠邻室住下，其余警卫宪兵分住大殿和一些闲空庙屋，另有部分宪兵则驻守郴州城内。

"书房在哪里？"张学良对卧室很满意，接着便问书房。

熊队副领他看了另一间大房子，说这是面积最大的一间，

用来放书正好合适。

“辛苦你了！”张学良很满意，接着吩咐说，“赶快叫人把书都搬到书房里去，把那张大地图也挂上，我想看看这些天局势发展得怎么样了。”

在离开溪口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报纸成了张学良了解全国抗日局势的惟一消息来源，他发表言论说：

“老是消极地防守，助长了日本人的进攻。张家口、大同是怎么丢的？还不是刘汝明这些人被动守城，贻误战机的结果！保定是怎么丢的？刘峙这个人根本就不是将才，平日里颐指气使，结果日本人一来，抱头就跑，把个保定白白送给了土肥原。还有淞沪战场，我们太被动，太消极了，简直是等着别人来敲自己的脑袋，这怎么能行？

“上海争夺的时候，敌人只有六千人，我们是两万人，居然会战败！应该把指挥官押上军事法庭！唐生智口口声声要与南京共存亡，现在南京丢了，怎么没见他杀身成仁？还有那个韩复榘，是个彻头彻尾的卖国贼！”

张学良越说越气愤，言语间掩不住对蒋介石“持久消耗战略”的批评和对一些临阵脱逃的高级将领的蔑视。

第二天，张学良没顾得上游山，整整一天都在房中看报纸、看地图，并不时用铅笔在地图上圈圈点点。局势确实已十分严峻：上海失守、华北陷落、南京被屠；华北日军沿津浦路南下，华东日军渡江北进，企图南北夹击，占领战略要地徐州，以打通津浦线；加之日军已渡过黄河，侵入济南，又攻下了阻敌天险泰安，若中国军队再不全力反击，退敌于津浦一线，势必会引起全线溃退。为此，张学良忧心忡忡。

“唉，我们这些小当兵的，有些事情就是弄不明白。”一名外号叫“小钢炮”的警卫困惑地对张学良说，“就说您吧，委员长对您这么好，随时都在打电话让人问候您，还派人给您送

这送那。可是，现在打日本，正是用人的时候，他又怎么老是不让您出去呢？您的名声、地位，对抗战都很……"

"有些事情，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清楚的。"张学良往椅背上一靠，望着高高的尖阁屋顶说。

略事休息后，张学良开始携夫人游山观水。当他站在高山之巅，眼望浩瀚浮云和滚滚东去的郴江，不禁思接千载，想古今兴亡，叹人生荣衰，不时感叹几声，还向夫人念几句古人的或自己即兴而发的诗句，惹得于凤至不禁用陌生的眼光凝望着他。

"汉卿，跟你这么些年，我还真不知道，你挺会吟诗作赋的嘛。"

"是呀！"张学良得意地一笑，"要不是当年父帅有意让我承继大业、投身军中，说不定中国会多一个大诗人哩！"

在一旁的刘乙光也凑上来说："我们久闻副座是文武全才。什么时候清静了，好好作几首诗，叫人刻在石壁上，让后人也知道，副座曾经留居过此地。"

"行啊，"张学良满口应承说，"早年读书的时候，我还跟先生认真地学过一阵子诗，练过几天字，可这些年忙忙碌碌，早就荒疏了，现在闲着没事，正好练练。"

"郴州这地方出产算不上丰富，但砚石还是很有名的。"刘乙光说，"我明天就叫人到城里去选一块好砚，再买几支好笔回来。"

"嗬，"张学良嚷了一声，"你们还真的想让我弃甲从文，当个诗人啊！"

说完，众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张学良夫妇一行说说笑笑，沿着那一千七百六十级石阶逐级而下，来到白鹿洞前观赏"三绝碑"，它是苏仙岭最有名的古迹。

也许是刚被雨水洗过，现在又正逢阳光照射，崖壁上为世

纪风雨染成紫褐色的《踏莎行》词摩刻，此刻显得分外清晰：

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张学良对这阙词很熟，但此时立于“三绝碑”前再诵读它时，顿感赫然惊心！这秦少游的凄婉绝唱，分明是在写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啊！张学良呆若木鸡，目光在词句上反复移动，两行热泪不禁夺眶而下。

秦观的《踏莎行·郴州旅舍》带给张学良极大的心灵震撼。历史居然会如此相似！八百多年前一位古人遭贬来此，他的凄惋，他的悲怆，他的忧愤，居然会同他这个国民党一级上将如此相似乃尔！

落日西沉，苍凉寂寞的气氛笼罩着苏仙岭，也笼罩着张学良的心房。

“人生忧患，千古同此啊！”他低吟一声，冲动地转向侧面的屋壁，提笔便书：“恨天低，大鹏有翅愁难展。”写罢，将笔往身后一扔，发出几声惨淡的笑声。

值班的警卫听见笑声，连忙跨进屋来，陡然被张学良那副欲哭无泪、激愤难当的模样惊呆了：“副司令，您……”

张学良的两道目光嗖地横过，如两把利剑将警卫的问话斩断，没等他反应过来，张学良早已一步跨上，从他腰间冷不防地夺下手枪，对着窗外的大桂花树连连扣动扳机，直至弹尽，方才扔下手枪，拂袖而去。

听见枪声，警卫和宪兵们发疯一般地冲过来，围拢一看，墙上的诗句墨迹未干，地上的手枪尚在冒着袅袅青烟……



张学良在苏仙岭居室的后窗。他曾用手枪向窗外一棵老桂树射击，以解忧愤。



老桂树干上，累累弹痕今仍可见。

为了改善张学良的心境，刘乙光和熊仲青轮番进去劝说，提议他到郴州卫阳街上逛逛，看看这里的风土人情。但每一次，张学良都是闷坐无声，毫无回应。

于凤至有些摁不住了，也帮着来劝，说要是老这么下去，一定会闷出病来，警卫们也会跟着受罪，连上街的机会都没有。众人就这么你一言，我一语，说得他终于同意了。

殊料，刚刚走近卫阳街，由于路上行人太多，街面又窄，前头的汽车一不小心，轻轻撞到一个胳膊吊着绷带的伤兵，那伤兵回过头来便破口大骂，同时用另一只手掉过斜挎在肩上的步枪，对准汽车。那伤兵的同伴和在街上散荡的士兵一见汽车撞了人，又见是辆小轿车，当即便围拢上来。

大约是看见了后面第三辆小轿车豪华的派头，士兵们估计里面一定是个大官，于是，一些人又向张学良的防弹车移来，有人开始用巴掌砰砰地拍打车身。后面的两车宪兵一见这阵势，连忙端起枪来，驾驶室顶上用来防止空袭的高射机枪也垂下了枪口，瞄向了围住汽车的伤兵们。

"弟兄们，大家不要误会！我们是军统局执行特别任务的，都是自己人。刚才我们的车不小心，撞了这位弟兄，我在这儿向你赔不是了。"刘乙光走到那名伤兵跟前，很亲热地拍拍他的肩头，"对不起了，兄弟，你是哪个部队的？"

士兵们一听这几辆车是军统局的，又看见卡车上的宪兵荷枪实弹，随时准备开火的模样，心中早就蔫了一半，现在听到这位军官诚恳道歉，也就顺台阶而下了。

"算了，算了！都是自己人。你们开车小心点就是了。"他没敢说自己是哪个部队的人。军统局鹰犬众多，谁也不想自寻倒霉。

然而，张学良逛街的兴致却被刚才的纠纷破坏得一干二净，只漫不经心地到两家商店随便看了看，便回到了车上，打道回府了。

接连几天，张学良郁郁不乐，弄得大家都情绪不振。刘乙光无奈，便去向于凤至讨教，问用什么办法才能把副司令从愁闷中解脱出来。

"那你们试试看，拉他打麻将吧。他以前是喜欢打的。"于凤至建议说。

刘乙光、熊仲青、应副官，还有于凤至等人，都是牌桌上的老手，论牌技，张学良不是他们中任何人的对手，因此，绝大多数的时间里，张学良均是连连败北。连输上几圈后，他便心不在焉，呵欠连天。

麻将打不下去了，刘乙光便撺掇他人去找张学良下棋。"小钢炮"第一个响应。

一看"小钢炮"那副殷殷求战的模样，张学良笑了一笑，便问："你说吧，还要我像过去那样，让你双车吗？"

"不，一个子儿也不让。""小钢炮"把棋口袋摇得哗哗作响。

"那你这是来引颈就义啊？"张学良打量着小伙子，又摇摇头，悲天悯人地说，"不忍心，不忍心哪。"

"副司令，你就行行好，让我跟你下一盘好不好？如果我再输，就永远不下棋了！""小钢炮"把棋子往桌上一放，很坚决地说。

"呵，立誓了！"张学良终于动了心，手往桌上一拍，"好吧，再跟你下最后一盘棋。先说明白，别怪我下手太狠。"

战局一开，张学良仍像过去那样，重炮猛轰，天车飞驰，烈马奔腾。但十步过去了，"小钢炮"不仅没被打垮，反而布局严整，兵马有序，绵里藏针。再走了十步，张学良兵马损失殆尽，而"小钢炮"则狠打猛冲。

虽是二月天气，可张学良的额头上已沁出了一层细汗。这盘棋整整下了两个小时，"小钢炮"最后以一步之先取胜。

“嗬，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哪！”张学良感叹了一声，问，“你怎么进步这么快？”

“小钢炮”雪了耻，自是十分得意：“在溪口输给了副司令，我就一直在琢磨，心想哪天一定要在副司令面前露上一手。”

“我刚才还用老眼光看人，操之过急，骄兵自然必败嘛。”张学良总结说。接着，他又仔细地打量了一下小伙子，说：“刚才你是给了我一个突袭，让我措手不及，咱们再来，谁也不要手软，再较量一盘！”

这第二盘棋，张学良下得极为认真，也极为艰苦，终于在人马死伤大半之后，攻进“小钢炮”的宫苑禁地，生俘老将。

春节后，“小钢炮”离队上了前线。在台儿庄战役中，他奋勇杀敌，身中数弹而亡。当张学良得知“小钢炮”阵亡的消息后，难受了好些天，并让人把他同“小钢炮”下过的棋封存起来，以作纪念。

为使张学良的生活丰富多彩，应副官提议上山打猎。

“大家都是军人，打猎是打活靶子，对弟兄们也是训练。我也可以跟着看看，看谁打的猎物最多。”张学良的话，明白无误地告诉刘乙光：他不会摸枪。

刘乙光一听，顾虑顿时打消，大声对警卫们说：“行啊！大家展展身手，让副座尝尝苏仙岭的野味。”并宣布，副司令有言在先，谁打得猎物最多，谁便可以得到副司令奖励的一瓶洋酒。

狩猎那天，张学良一身精干的短装，裤角还用绳子扎住，拄着一根长棍，兴致勃勃地随大队人马上了山。

不一会儿，寂静的山林里传来了清脆的枪声，隐约还听到野兽绝命前长长的哀鸣。

第一次狩猎还算成功，警卫们一共打了一头麂子、一头狍

子、七只兔子，还有几只山鸡。当他们抬着、提着战利品回到观里时，个个神气得就像刚打完胜仗凯旋归来的将军。

当天晚上，清炖、红烧的野味便端到了晚餐桌上。张学良吃得十分带劲，并频频地往夫人的碗里夹肉。

春节快要到了，张学良对刘乙光说："弟兄们和我在一起都很辛苦，今年春节要好好地乐一乐，这座破苏仙观要有过节的气氛，扎几个灯笼挂上……"

除夕之夜，北风呼号，窗凝冰花。荒凉破旧、沉寂了不知多少年的苏仙观骤然洋溢起喜庆的气氛。在相连的两间大屋内，放置了五张方桌，上面摆满了鸡、鸭、鱼、肉，热气腾腾，酒香扑鼻。

开席前，张学良专门叫应副官封了年钱红包，一一分送给特务队的诸位警卫。刘乙光、熊仲青和宪兵连长所得的那份，自然要比一般人的多得多。众人见张学良身陷囹圄，仍不失长官、兄长的风度，时时给他们以体恤关照，心中甚是感激。

在刘乙光的带领下，三十几名队员全都立起身，高擎酒杯向张学良敬酒，宴会上充满欢声笑语。接着，众人又摆上麻将，一决输赢。

辞旧迎新的时刻到了！在震耳欲聋的爆竹声中，幽居中的张学良迎来了一九三八年的新春佳节。这是他囚禁生涯中的第二个春节。

春节后，有一次熊仲青在同张学良较量网球时，球拍啪地一声猛击在膝盖上，他一个趔趄，扑地栽倒。张学良见状，急忙吩咐人去烧热水，又叫人取来两个木桶，桶中分别装上了雾气腾腾的热水和寒凉透骨的冷水。张学良抓住熊仲青的伤腿，猛地塞进热水桶里，熊当即被烫得呲牙咧嘴。约摸过了五六分钟，又将他的腿抽出来，忽地塞进冷水桶中。如此循环往复了四五次，熊仲青腿上痛感居然消失，可以随意走动了。

“看不出来，副司令还是个妙手回春的良医呢！”站在一旁的警卫们赞叹道。

警卫们都赞叹我是个妙手回春的良医，我笑着说，这也不是我发明的，我也是跟一个大人物学来的。

我是从意大利元首墨索里尼那儿学来的。当年在意大利，我去拜会他时，不慎扭伤了脚，墨索里尼便是用这种方法很快使我的脚痛得以消除。没想到，这个来自意大利的“巫术”，居然在苏仙岭派上了用场。

月圆如盘，清辉遍地，张学良正凝神读书，忽闻一阵悠扬的胡琴声。

“夜阑人静，对月鸣琴，妙极了！”张学良悄悄走到熊队副身旁：“看不出来，你还有这么一手。”

熊仲青慌忙站起，收住琴：“把副司令惊动了，我真该死……”

“哪里，”张学良抬手止住他，“挺好听的。跟了我这么久，我还不知你会拉琴。你会不会拉京戏？”

“会一点儿。”

“那好，”张学良显得有点兴奋，“我这人最爱听戏，有时候也偷偷地哼上几句。明天你给我拉琴，我来唱几段试试。咱们在苏仙岭上来它几段清唱，热闹热闹。”

张学良喜好京戏，《三岔口》、《将相和》、《群英会》、《追韩信》等，他都谙熟于心，对白唱段皆能脱口而出。这次，他琢磨了好久，选了《四郎探母》中的《杨延辉坐宫院》。

一句开腔，声调倒是高亢婉转，但没唱到一半便溜到了另一个调上去了。

“不行啊，副司令，你这一咋呼，我都不知是你走板还是我溜调了。”

“我走板儿了？”张学良问了一句，又看了看一旁笑得前仰

后合的于凤至，不解地问道，“是我走板儿了吗？”

“不是你还有谁？”于凤至抹抹笑出的泪花，“都走到对面山头上去了，简直笑死人了。”

自打这天起，张学良便每天都到山顶吊几下嗓子，“嘀——嘀——”“啊——啊——”地吼它一阵子。

在苏仙岭，曾发生一件令张学良很伤心的事。

在戴笠给刘乙光下达的若干条指令中，最关键的一条就是严密封锁有关张学良的所有消息，绝对保障他的人身安全。一般说来，只要在邮电上一卡，与外界基本也就断了联系。

春节过后不久，邮电所的特务“黄小姐”在邮局信件中发现了一封由苏仙岭寄出的信，挑出一检查，原来是张学良的李副官写的，收信人是他的亲戚。虽然信中主要是报报平安，但李副官是跟随张学良的人，他所在之处必定有张学良。那么，是谁将这样一封可能暴露张学良所在地的信交到邮电局去的呢？几经查证，最后，所有的疑点都集中到了随队替张学良打针的一名男看护身上，刘乙光马上对他采取了行动。

张学良从警卫的口中略知此事后，只不屑地“哼”了一声，未再作任何表示。当男看护被迫来向他“请假”时，张学良盯着他凝视好久，只说了一句：“你多保重吧！”

第二天，男看护奉命收拾行李，离开了苏仙岭。刚一下山，早已守候在山下的特务们便将他扣住，押到郴州宪兵连的驻地关闭起来。后来，他又被关进监狱，以“泄漏军事机密”罪被判了五年徒刑，直到抗战快结束时，他才重获自由。

二月中旬，张学良要下山到城内东大街一家浴室去洗盆浴，照例是刘乙光陪同，十二个警卫随行。这时，只见正前方走来一位佩戴炮兵中校领章的军官，一见张学良，突然恭敬立正，啪地抬手敬礼：“张副司令！”

张学良向他看了一眼，显得异常镇静，既不答话，也不还

礼，若无其事地从中校军官身旁擦肩而过。走在张学良身边的刘乙光，惊得脸色骤变，后面几位警卫也立即包抄过来，将敬礼的军官团团围住。街上的行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都用惊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个场面。张学良却连头也不回，倒背双手，缓步扬长而去。

“我真没想到，会在这个小地方撞上张副司令！”中校军官忍不住激动的心情，翘首向张学良远去的方向张望。

情况很快便弄清了。原来，前不久，东北军炮兵部队被改编，这位中校被调至炮兵旅担任了炮兵团的副团长，新近才调来郴州驻防。

“敬礼事件”引起了刘乙光极大的恐慌。他匆匆追赶上已临近浴室正门的张学良，气喘吁吁地说道：“今天盆浴等候的人太多，不会有空的了。”

事实上，刘乙光是惟恐出事，有意扯谎，希望张学良赶快回到山上去。

“那就改天再来，我们回去吧！”张学良一笑说。

事件发生后，人人都变得紧张起来。有人提出，张学良是东北军之魂，官兵们对他的信赖已达迷信的程度，要是那几个东北军的军官发现了张学良的住处，串通起来，采取意外行动营救少帅，一个小小的宪兵连和特务队哪里会是他们的对手？

经过一番争论，刘乙光最后决定，立即将张学良转移到一个安全地点。

刘乙光是邻县永兴亭司镇人，前些天刚回过一趟故里，知道那里有一所名叫“文明书院”的小学，二十多间房舍教室，正好可以作为暂时的安身之处。

“局长那里怎么办？”熊仲青问。他担心戴笠不知道搬家的事，将来有所怪罪。

“事情紧急，只有先斩后奏了。”少顷，刘乙光又说道：

"明天你们先开始搬，我到城里给局长挂个电话。"

永兴县距郴州不过四十公里，由于搬迁过于仓促，房屋住舍均是学生们迁走后匆匆拾掇而成，其简陋自不必说，但张学良对此并不怎么介意，只吩咐将这些天的报纸拿来，再把地图给他挂上。

"东北这块好地方，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了？"张学良望着地图，脸上显得十分忧郁。

"是啊，好久没见到东北那边来的人了。"于凤至接口道，语气中流露出对故乡的深深怀念。

一天，阴沉沉的乌云终于消散，张学良夫妇这才得以到院子里晒晒太阳。

"永兴这地方，气候还是满好的。"刘乙光跟在后面，没话找话地说。

"刘秘书，"张学良忽然唤了一声，向刘乙光转过脸来，"那天在郴州街上向我敬礼的军官是谁？"

刘乙光没料到张学良会提起这事，一下子怔住了，好半天才回答说："噢，那是新调来郴州的一个炮兵副团长。"他看看张学良，见他并没有就此打住的意思，只得将这名军官的情况一一讲了出来。

"原来如此，"张学良点点头，沉吟一阵，对刘乙光说，"东北军里的官兵对我是很尊敬的，见了我敬个礼是很正常的事，我希望他不会因为这件事受什么影响。"

"不会的，副司令。"刘乙光很快地回答道，脸上的表情却有些不大自然。张学良望望他，没再说什么，阴郁的目光再次转向了远山。

在永兴住了不到十天，戴笠传来命令：速将张学良转移到湖南沅陵。

又是一次新的艰难跋涉。

第七十九章　惆 怅 沅 陵

1938.3

——“‘张老板’与那个‘蒋老板’是不同的，我‘张老板’是爱国的！”

——“我只是惋惜，我报效国家、上阵杀敌的愿望落空了。”

——“你们赶快下山抢救被淹人家，凡救起一个人，奖大洋五块，由我张学良当场兑现！”

“啊，沅陵在这儿，我们在沅陵又能住得了多久呢?”

张学良指着地图，满面忧虑地说道。

“汉卿哪，先让他们收拾吧。到什么地方，住留多久，是委员长考虑的事，我们照他的意思办就行了。”于凤至在旁劝解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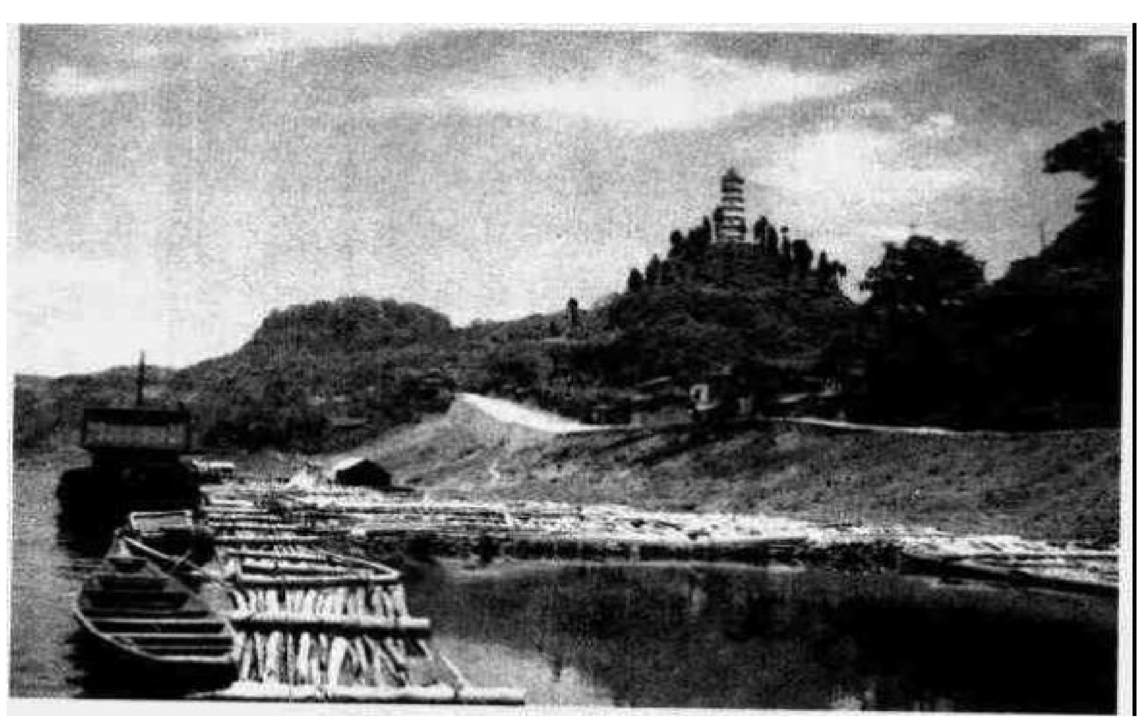
一九三八年三月二于二日，张学良一行离开永兴，开始向沅陵转移。

跋山涉水，乘车坐船，遥远的旅途单调而又烦闷。每天，一坐进宋子文送的那辆防弹轿车，于凤至便痛苦地闭上双眼。张学良看看身边的妻子，又望望前方似乎遥无尽头的黄尘土路，心中充满了对前途无法测知的茫然。

当车队经过桃源县时，刘乙光命全队人马下车休息。张学良在于凤至的陪伴下来到路边不远的石壁前，看到上面有“桃源洞”三个大字，经向这里的老乡询问，才知这里有个山洞，是当年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中提到的古迹。张学良听了，一扫全身的旅途疲劳，嚷着要上山参观。

“走吧，我们都去看看美丽的桃花源。”张学良向众人招呼道。

可是，在老乡指点的地方，他们仅见到了一个小得几乎连



湖南沅陵凤凰山，位于湖南西部沅江上游。一九三八年十月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张学良被幽禁于此。

狗都进不去的小洞，哪里有什么古人生存居住过的痕迹？再看看四周，地荒坡秃，根本就不可能是“芳草鲜美，落英缤纷”之地。

“上当了，上当了，”张学良连声悔叹，“这里肯定不是真正的桃花源。”

“陶渊明写《桃花源记》，不过是想逃避现实的一种精神寄托，我倒是宁信其有。可惜现实之中，这样的桃花源是寻不到的。”回到车中，张学良对满脸倦容的于凤至说道。

车队从桃源县起程，又行两日，抵达沅陵凤凰山脚下。

在异峰迭起的湘西，凤凰山算不上名山，但却是个清静幽雅之地。山不高，仅六七十丈，山形颇似一只振翅欲飞的凤凰，故而得名。

此山北临沅水，天成陡峭如削的绝壁，东、南、西三面连着起伏如涛的山峦。它兀立在绿水和群峦环抱之中，古树参天，林木奇异。绿树掩映之中，有一座巍峨壮观的古寺。这古寺是明朝万历年间建造的，由山门、大佛殿、送子殿、弥陀阁、观音堂、玉皇楼等建筑组成。

穿过山门，进入大佛殿，殿内陈列着“金刚”、“罗汉”等神像。穿过大佛殿，再往里走，就是送子殿了，这儿就是张学良夫妇新的起居室和书房。

刘乙光在凤凰山上为张学良划定了活动范围：山上前后左右五里为界；沅水江上，上至洲头，下至河涨洲十五里为限。少帅的散步、运动、钓鱼、游泳等活动，均不得超越此界限。

略事休息，张学良便让人领着四处转悠。站在山上，远远望去，但见碧透的沅江上，渔帆点点，百舸争流，景致迷人。张学良的心情豁然开朗了。

“你看，前有大江，后有高山，这个小岛就像江中的一条大船。只是这船太孤单了，我们何不在这岛上修座房子，再在寺墙上开个小门，用木桥把寺院同小岛连接起来，这样进进出

出，垂钓望江不就方便多了？”张学良饶有兴致地说。

“熊队副，既然副座有这个想法，你就马上组织人干，先修木桥，再修房子。您看怎么样，副司令？”刘乙光当机立断道。

“我看这房子要修就修成个船形，上下两层，全用木头，远处一望，活脱脱就是行驶于江中的一条大木船。你们看怎么样？”

“副司令高见。”熊仲青赶紧奉承了一句。

“用不了许久，我们就可以登楼望江了。”刘乙光也讨好地说，“这主意是副司令出的，理应由副司令先给这楼起个名字。”

“对，对。”熊仲青点头称是，“不仅楼要起名儿，将来这桥也应当有个名儿。”

“我看哪，”张学良略作沉吟，然后说，“这楼既然临江，将来登上去也是为了欣赏江上的景色，我看就叫做‘望江楼’吧。”

“‘望江楼’，这名字好，这名字好！”刘乙光和熊仲青同声附合道。

“至于这桥，”张学良说着回望一眼约十来丈远的寺墙，“寺在高处，岛也在高处，将来这‘望江楼’也低不了。要想从寺院直通‘望江楼’，这桥至少得两三丈高，我看，就叫‘天桥’吧。”

“对！木桥悬在空中，肯定险峻得很，叫‘天桥’再合适不过了。”刘乙光满口赞同，熊仲青在一旁也频频点头。

离开湘南永兴，张学良对短期内获得自由已不抱热切希望，对内对外也绝口不再提“自由”二字。每日徜徉山水之间，观日落日出，心性倍受陶冶。

“汉卿，你比从前老成多了，像换了个人。”一天夜晚，于凤至见他端坐案前捧书夜读的模样，忍不住说道。

张学良点点头说：“是啊！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只要生

命之火不熄，我张学良终有出头的日子。”

这天，张学良诗兴大发，提笔挥洒《致于凤至》诗一首，以此来表达对夫人的感激之情。诗曰：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张学良在凤凰山幽禁，按规定，他的伙食标准为每天五块大洋。上边为他配备了两名厨师：一个是四川人，会做拿手的川菜、湘菜、大菜及面食糕点；另一个是浙江人，擅长烹调下江菜。有时，于凤至要求厨师为张学良做些有营养的菜肴，但他们甚感为难，因为当时沅陵城里实在买不到什么好吃的或营养丰富的东西，只好时常给少帅炖一只鸡补养一下身子。

张学良，闻名遐迩，辉煌响亮，神州叱咤，他是何等如雷贯耳的人物啊！可他居然会来到小小的沅陵，屈居于凤凰山顶。一想到这里，县长王潜恒心头便一阵激动，他托人带话，要求上山晋见少帅。

可是，一想起蒋介石“不得擅自与任何人晤见”的禁令，一看见山上江边巡游的特务和宪兵，张学良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只是让杜副官向王县长传话：很感谢王县长的这番美意。

时隔一月，由张学良命名的“望江楼”和“天桥”修好了。竣工的第二天，刘乙光、熊仲青等一干人，陪同张学良夫妇第一次登临“望江楼”。

“啊，这凤凰山又添一景啦。”张学良兴奋地边说边踏上楼梯。

“这全是副司令的功劳。”刘乙光恭维说，“哪天副司令兴致好，把‘望江楼’三个字写下来，我叫人去刻个匾，挂在楼


凤凰山上的望江楼，张学良常登此亭远眺。

上，好让后人也知道这楼的来历。”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写。”张学良说，“不过，何人所建就不必写了，三个字足矣。”

站在楼上，凭栏远眺，浩浩江水自天边而来，又滚滚向东流去。太阳虽已升起，但江上雾气尚未散尽，罩着点点渔帆，在江上轻荡慢弋。远处临江的山峦，朦朦胧胧，似青似绿，将一幅近似水墨画的景致呈现在人们眼前。张学良简直看呆了，一种超越尘世的迷幻之感油然而生，他痴痴地立于楼台上，久久不忍离去。

不过，最令张学良着迷的是两项新添的活动，一是游泳，二是钓鱼。不到两个月，自由泳、蛙泳、蝶泳、仰泳，他全都掌握自如，游水的区域也从江边移到江心，后来，两三百米宽的沅江也能游个来回。七月间，他提出搞个游泳赛，让特务队、宪兵连中凡会游水的人都参加，由刘乙光、于凤至坐在船上当裁判。结果，一番奋力争夺，张学良得了个第二名，乐得

他像个孩子似的笑个不停。

刘乙光知道张学良酷爱钓鱼，所以一到沅陵，便投其所好，从山下杨家淇村雇了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杨绍泉为他划船，又将买下的一条渔船进行了改造。

头一次钓鱼，张学良带上托人从香港买来的鱼竿，待船稍稍停稳，便安上鱼饵，抛线下水。

"我们这地方钓鱼不是这个样子。"船工杨绍泉告诉张学良。

张学良吃惊地望着这个光着胳膊的小伙子，一脸困惑相。

"说来张先生会觉得很奇怪，"杨绍泉说，"我们钓鱼是用竹筒，上面缠一根很粗的长线，拴上几个大鱼钩子，大钩子上又分出来三个小钩子。有鱼游来，被钩子挂住，我们就抓住竹筒往上拖。由于线粗，鱼再大再多也弄不断。"

张学良觉得很新鲜，入乡随俗吧！

首次用土法钓鱼，便出师大捷。沅江鱼多，杨绍泉介绍的法子又很灵验，每次抛下竹筒，都会有所斩获。拉到船上的鱼，一般都是六七斤重，大的有一二十斤。仅仅一个上午，张学良就钓了二十几条鱼，乐得他合不上嘴。

当满载的渔船归来时，特务队人人都显得兴奋，七手八脚地将一条条鱼取来装进早已备好的大木桶中。张学良走上前，让人挑了几条肥大的鱼送到伙房，其余则叫人抬到天桥下早已凿好的鱼池中。这个养鱼池是刘乙光找民工专门为张学良挖的，池宽二十米，长三十五米，深二米，位于寺庙的右侧。

我在奉天的时候就喜欢养鱼，什么样的鱼种都有，当时就只能养大鱼了，看什么时候我们能把鱼池装满。

当天的餐桌上，热气腾腾，鱼香扑鼻。大师傅老刘为了显示烹调手艺，清蒸、红烧、油煎，搞了好些个花样，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接连几天，张学良钓鱼的兴致越来越浓，中午都不愿上岸回寺里吃饭了。刘乙光图省心，索性把厨师也叫到船上，烹调各种可口的鱼肴，供大家在船上品尝。

但是，张学良毕竟是叱咤风云、征战沙场的虎将，钓鱼之乐怎么能消磨掉他那抗日救国的鸿鹄之志呢？

雨中山水，别有一番情致。张学良夫妇双肩并依，凭栏远眺。

"你在想什么，汉卿？"于凤至转过头，望着丈夫。

"我在想奉天，想北平，想南京。"话音未完，张学良眼中又泛起了盈盈波光。

我张学良一生最大的弱点就是轻信，毁也就毁在"轻信"二字上。要是在西安我不轻信他蒋介石的轻诺寡言，或者多听一句虎城和周先生的话，今日情形又何至于此！

再往前说，九一八事变，我也是轻信了老蒋，刀枪入库，不加抵抗，结果成为万人唾骂的"不抵抗将军"。一九三三年三月，老蒋敌不住全国民众对失土之责的追究，诱我独自承担责任，结果我又轻信了他，被迫下野出国。我和老蒋之间，他算是抓住我轻信这一点了，结果我是一个跟头接着一个跟头，将来还不知要跌到何种地步呢。

我对船工杨绍泉说，我是什么"司令"，你不知道我早就被蒋介石撤职罢官啦？以后再不准你叫我"司令"，就叫我"张老板"，"张老百姓"。不过你可要弄清楚，"张老板"与那个"蒋老板"是不同的，我"张老板"是爱国的。

四十余年后，杨绍泉回忆起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日子，仍感慨万端地说："'张老板'年轻英武，是个十分和气、看重友情的人。"

一九八〇年，已身染沉疴的杨绍泉老人还不停地念叨说："不知台湾岛上的'张老板'，还记不记得我这个当年的船

工？”

就在张学良性耽山水，流连旷野之际，沅陵城中突然传出恶讯：土匪即将攻城！

刘乙光闻讯后十分紧张。凤凰山距沅陵县城才不过几里，匪临城下，没准儿就会拐个弯儿，攻上山来，杀人劫物。要是张学良因此出了意外，莫说他一个刘乙光，就是十个刘乙光也担待不起。

得到消息的当天，刘乙光便派人进城打探消息，第二天又派人去找了县城的保安司令。回话果然惊人：土匪的确要进攻沅陵，而且人数众多。

消息传开后，当地百姓莫不人心惶惶，城内店铺纷纷关闭。县保安司令还专门派人带话，要凤凰山做好防匪准备，因他要领兵守城，届时恐难以顾得了山上，安全问题只有请刘队长好自为之了。

刘乙光顿感事态严重。他的特务队仅有三十余人，加上防守外围的宪兵连，也只一百五十人左右，若土匪真的纠合起来聚众攻山，很难说不会出现差漏。

匪敌当前，所有人都不敢怠慢，赶紧挖修工事，建掩蔽部。山上乱石多，沟壑纵横，修起来并不困难，仅半天时间，一个简单的防御体系便已建成，并部署好了兵力。

应刘乙光之邀，张学良来到山上山下的工事前，巡视察看了一番，说这样部署倒也可以，只是退敌战术须作改进。

“土匪大都是乌合之众，不像正规军那样打起仗来有统一号令，叫攻就攻，叫撤就撤。土匪才不这样哩！”张学良对刘乙光等人说，“土匪打仗向来是满地乱窜，躲躲藏藏，只要对方火力一猛，或者见了同伙死伤，就会胆怯得抱头鼠窜。我们人不多，山上山下兵力又分散，应该尽量利用地形地物，造成火力强大的声势，让他们根本不敢上山。”

毕竟是将军，寥寥数语，便让众人无不叹服。

"那您看我们该怎么退敌呢?"刘乙光问。

"土匪无论攻城攻山，大都是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干。我估计他们现在未必弄得清我们的虚实，那我们正好来个奇兵退敌。"说着，他扬起手中的拐杖，指了指四处的树林山石说道："《三国演义》你们大家都看过了吧，那里面有种作战方法，叫'滚木擂石'，就是从山上往山下扔木头石块。一九二〇年秋天，我领兵在黑龙江剿匪的时候，有一次大部队出去了，山上只留下了一个排和指挥部，土匪不知怎么知道了消息，趁夜来攻。结果，我们就用'滚木擂石'把土匪打了个大败。现在我们又是在高处，石头木头都多得很，完全可以用这个方法。到时候你们看吧，声势大得很哩!"

经张学良这么一点，众人纷纷说好，刘乙光立即布置人员准备木、石。无论是特务队员还是宪兵，谁也没打过这样的仗，都觉得很新鲜，干起来也分外带劲。天黑之前，一道道工事前已堆满了石块和被截成一段一段的木头。从树上砍下的茂密树枝，按张学良的吩咐全都堵在了通向山顶的路口。

夜幕徐徐降临，凤凰山上一派紧张气氛。所有人员都荷枪实弹进入了指定位置，半山腰树上的两名观察哨更是凝神屏息，注意着山下的动静。

时值午夜，刘乙光力劝张学良回屋休息，张学良呵呵一笑，说道："我身为军人，见过的打杀场面比你们多，你们在外御敌，我在家睡觉，这成什么话！再说，心里有事，就是上床也睡不着觉啊。"

刘乙光见他态度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用，便从寺里搬来一把太师椅，让张学良坐了，自己在旁边的一个小凳子上坐下，陪着聊天。

当夜平安地过去了，第二个夜晚仍平安无事，大家都放心

了许多。为摸清情况，刘乙光派人到城里找保安司令，才知土匪了解到沅陵内外已有严密戒备，故放弃了攻城计划，重归山林了。但张学良却没忘记那些堆在山上的滚木擂石。

“我还就是想要试试它的重量哩！”张学良笑着说，“这些日子老是闲着，骨头都觉得生锈了。再说，看飞石入江，浪花飞溅，也是一种乐趣呀！”说完，运足力气，将一块大石头推下山去。随着骨碌碌一阵响，江面上激起一朵朵银花。

一连好些天，凤凰山上都有木石滚滚的砰砰声，沅江一度不再平静了。

于凤至有时也来到寺外，观看丈夫同警卫们玩推木石的游戏。一看见丈夫手舞足蹈的兴奋模样，她便忍不住地说：“又犯小孩子的傻气了！”然而，只有她最清楚，正是凭了这种“傻气”，张学良才得以打发掉这空虚寂寞的“管束”岁月。

“唉，又失守了，怎么尽打败仗呢？”秋天悠悠而至，面对报纸上接二连三传来的坏消息，张学良心情十分沉重。

即使在抗战最艰难危急的时刻，蒋介石仍没有忘记他所“管束”的这只“东北虎”。在日军加紧对华东进犯之际，蒋介石亲自指令国民党军令部和军统局，一定要保证张学良的安全，严防日机袭扰。刘乙光秉承上峰旨意，立即在凤凰山顶修筑了一个高射炮炮台，装备了一架高射炮，挖筑了一个防空洞。完工之后，刘乙光请张学良前去检查。

张学良感叹道：“蒋先生真是‘关怀’我啊！看来，短时间他是不打算让我离开此地了。”

一九三八年九月，由松沪前线下来转任湖南省主席将近一年的张治中，从长沙前往湘西视察，专程登上凤凰山看望张学良。

在国民党众多高级将领中，张治中与张学良交情甚笃，被张



坐落在凤凰山顶的凤凰寺。

学良引为知己。此次相见，两人畅所欲言，感慨万千，直到日头西斜时，方洒泪而别。回到寺内，张学良又坐在他同张治中谈话的地方，独自沉默了许久，然后走入房中，在贴着白绸的墙壁上挥笔疾书，写就《自我遗憾作》诗一首。

张治中走后不久，便传来了广州沦陷的消息。紧接着，保卫武汉的第三道防线被突破，十月二十七日，日军攻进了武汉。

报纸晚到了半个月。当张学良从第一版的大标题上看到"武汉失守"几个黑体字时，惊得好久说不出话来。一个月前，他还和张治中在这寺里谈论如何打好武汉保卫战，然而，仅仅才一个月，这种担忧不幸就变成了现实。

秋日已尽，西风更烈。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忧，折磨着这位身陷囹圄的将军。一连许多天，他都寡言少语，闷闷不乐。鱼是不钓了，体育活动也没了兴致。日复一日，他困守寺中，只望着空旷的殿堂出神。

日子变得分外惆怅，分外寂寞。这天，夫妇两人并肩立于望江楼上。

“汉卿，”于凤至转过身，挽住张学良的手臂，“你已经为国家、为民族尽了力，将来抗战胜利了，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张学良转过脸，看着妻子说道：“忘不忘记我倒没什么关系，我只是惋惜，我报效国家、上阵杀敌的愿望落空了。我后悔在西安的时候没有听信虎城兄的一句话：‘老蒋做事太狠太毒！’”

托张治中带给蒋介石要求抗日杀敌的信，如泥牛入海。多少回夜半熟睡之中，张学良梦见自己全身披挂，率领着东北军在沙场拼死搏杀，所到之处，日军丢盔卸甲，人民振臂欢呼。可是，梦中惊起，环顾四周，所见到的只有沉沉的黑暗和无边的孤寂……

一九三九年四月，张学良原来的部属鲍文樾禁不住汪精卫的劝诱，跑到南京当了汉奸，并出任了汪伪政权的“河南省主席”。当张学良从戴笠来信中得知这一消息后，气得七窍生烟。

这个鲍文樾，一年前还在为我的自由和东北军的前途奔走，没想到才仅仅一年，就变成了个软骨头！看来，我是看人看得不透啊！早知道他会投敌，我一枪毙了他，也算给东北父老除了个逆种！

张学良又按照戴笠的意思，提起笔给鲍文樾写了封信，要他认清形势，不要认贼作父，干出危害国家危害民族的事来。

恰在这时，张学良从报上读到了一条消息：他的旧部、西安事变时攻打蒋介石下榻处的总指挥刘多荃师长，率东北子弟在前线与日寇拼死搏杀，战绩辉煌。张学良读罢，兴奋异常，当即提笔给刘多荃写了封信，信中说：

"听说你们打得甚好，弟虽然隐居山中，听了也十分快慰。但是又知鲍文樾追随汪逆做了小汉奸，闻之令人发指。他忘了谁是敌人！谁杀害了我们的同胞！谁强占了我们的田园！谁要来灭亡我们！'九一八'的火药气味，他已经忘了么？真令人可恨！这真是东北人的耻辱，弟个人更是又气又愧！盼望兄等努力抗战，用我们的血洗去这污点，为东北民众争一口气，弟虽林下息影，也少有荣焉！"

字里行间，张学良那对抗日大业的关注、对抗日将领的慰勉、对汉奸部属的痛恨，以及切盼复土雪耻之激情，跃然纸上。

一连数日，张学良闭门不出，专心写信，有时直至深夜。于凤至劝他注意休息，他却连连摇头："将士们在前方天天流血牺牲，我不过动动笔杆子而已，何累之有！"

当熊仲青将满满一包信带去县城寄发时，刘乙光开玩笑说道："看来沅陵的邮电所要变成副司令的专用机构了。"

"惟愿如此啊。"张学良庄重地说，"如果这些信能发挥点作用，我也算是为抗战尽心尽力了。"

转眼间，一九三九年的端午节临近了。按当地规矩，端午节先行祭礼，再食酒肉。杨绍泉代表杨家淇人，邀"张老板"主持祭礼，张学良也不推辞，应邀前往。

"今天，能到这里来同村中父老们一起过端午节，是我张某人的荣幸。二千多年以前，楚大夫屈原忧国忧民，投江而死。听杨船工说，你们这里人都说屈原投的是沅江。我入乡随俗，也把沅江当成是屈大夫的归宿之地。我提议，大家先把第一杯酒敬给屈原。"

张学良站起身，向大家拱拱手，开门见山地演讲道。然后，他端起酒杯，庄重地将酒洒到地上。众人仿效他的样子，洒酒于地，空气中顿时弥漫出一股酒香。



张学良的网球场。

“各位！”张学良放下酒杯，继续说道，“大家都了解屈原是为何而死的。如今，日寇进犯，国难当头，我们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发扬屈原的爱国精神，为国效力，为国效命……”

张学良正讲到兴头上，却感到有人在扯他的衣襟。他转头一看，原来是夫人。张学良明白，于凤至是在提醒他不要讲得太多。出门之前，她便叮嘱过丈夫，言多必失，稍有过头语言，便会被老蒋记上一笔，自由更是无望。

张学良轻嘘了口气，不得不停下来，回身坐到椅子上。

端午那天，张学良又转到杨家淇村。当他得知有户姓麻的人家穷得衣不遮体，家中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小孩饿得哇哇乱叫时，吩咐副官从他和于凤至的衣服中挑一些出来，装进口袋，再带上几个银元送去。这时，麻姓全家人正愁眉苦脸，饥肠辘辘，突然有贵人雪中送炭，一家老小非常感动。麻家女人

热泪长流，哭喊着跪下，说菩萨的大恩大德，她一家终生不忘。

回到寺里，副官将麻家的情形作了禀报．好一阵子，张学良一声没吭。后来，才小声地对于凤至说："穷人家这么苦，何时才有个尽头呢?"

一九三九年七月，暴雨不断，沅江水猛然上涨，山脚下一些人家纷纷遭殃。张学良在山上见到被江水冲毁的房屋、冲跑的耕牛和被冲得四散逃命的村民，心急如焚，立刻叫副官去集合警卫，说他要训话。

不一会儿，二十来名警卫都站到了殿堂内。张学良情绪激动，指着山下对大家说："大水无情，好些百姓都叫水淹了。诸位穿衣吃粮，靠的都是百姓的辛苦。现在百姓有难，我们怎能见死不救?!"

警卫们大都是穷苦人出身，见百姓被淹，也多有同情，听张学良这么一说，纷纷表示愿意立即下山抢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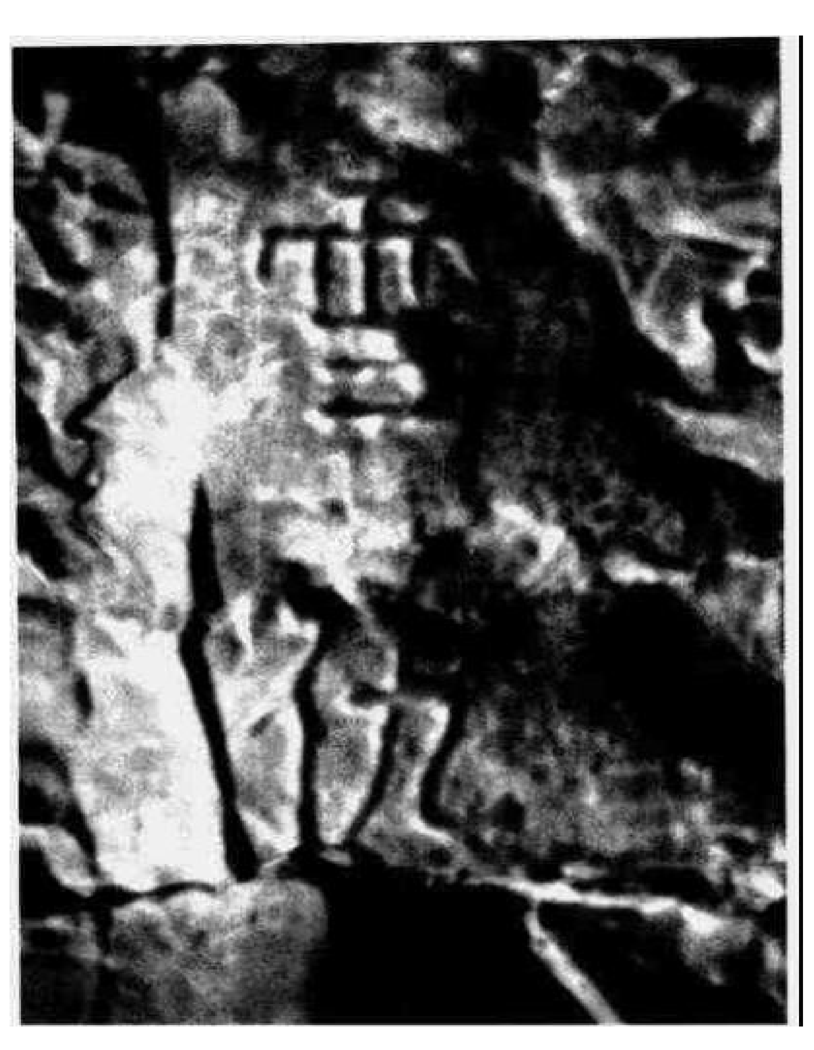
"对！你们赶快下山抢救被淹人家，凡救起一个人，奖大洋五块，由我张学良当场兑现！"他说完后将手一挥。

警卫们冒着暴雨，一窝蜂冲下山去，跳入水中解救被困于洪水中的百姓，仅半个时辰，便将束手待淹的人统统抢救上岸。

死里逃生的百姓们惊魂甫定，纷纷跪下，向山顶连连叩头。一直撑着雨伞在寺墙边注视的张学良这才放下心来，回到房中。

不久，杨绍泉在船上告诉"张老板"，说这一带的百姓都说，凤凰寺住了一个姓张的活菩萨，若不是山下警卫阻拦，好些人都要上山来跪拜呢。

张学良闻言一笑，随即用低沉的语调，神色严峻地说："看来，为百姓做事的人的确是太少了，我只不过是尽了自己



张学良在洞内石壁上凿刻“雪仇”二字，以示报仇雪耻光复东北的决心。

的一点能力而已。杨船工，你帮我转告大家，百姓们如有什么难事，只要我张老板力所能及，一定替大家办！”

然而，令沅陵人十分遗憾的是，“张老板”的凤凰山之旅很快就要结束了。

九月中旬，新上任的日军“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和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中将策动犯湘，由赣北、鄂南和湘东向长沙发动进攻，就在日军积极筹划犯湘之时，戴笠和他的随从副官王鲁翘突然出现在凤凰山上。

“听说，有人放火烧长沙，毁了不少民房，还烧死了不少人？”张学良问戴笠。

“是啊，一把火烧得人心惶惶。不少人提出要追究责任。”戴笠简要地介绍了长沙大火的情况，最后说：“张文白已经被革职留任，他怕是在湖南也待不久了。”

见过张学良的第二天，戴笠分别找特务队的警卫们谈话，连厨师也不例外。他详细询问了张学良近一个时期来的言行书信，以及与外界接触的情况。每次与人谈话，戴笠的副官王鲁翘都在一旁记录，一天下来，已汇成了厚厚一本。最后，戴笠接过去翻了翻，告诉副官说："回去好好整理出来，上报给委座。"

军统局长有时也闹不明白，为什么到了国破人亡的最后关头，蒋介石还是这么密切地注视着张学良的一举一动呢？

戴笠在凤凰山待了两天。临行时，他对张学良说，现在局势发展很难预料，恐怕要做好再度搬迁的准备。

此话一出，意味着张学良这一"惆怅且丰富多彩"的沅陵囚禁生活，就此结束了。

第八十章　阳 明 苦 度

1939.9

——“即使是上前线拼刺刀，说不定我还能比你们多挑两个日本兵呢。”

——“我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哪。原来还有点儿兴趣四处看看，现在连看山转水的兴致也没有了。”

——“我并不赞成王阳明的观点，我认为他是唯心的。”

搬迁？再往哪里搬？

张学良早已料到戴笠凤凰山之行有传达搬迁的意向，但仍不觉一愣。

“这个嘛，待我回去请示委座，看局势怎么发展再定吧。”戴笠含糊道。

张学良知道此问多余。一个丧失了自由的人，哪里还有权

利选择自己的囚笼呢？

戴笠离去不久，便拍来电报，指令曰：张学良一行撤离沅陵，向贵州首府贵阳转移。电报甚至还明确规定了转移路线：沅陵——辰溪——芷江——玉屏——黄平——贵阳。

沅陵一年零六个月的流放生活结束了，随之而来的是又一次艰难的跋涉。

"一九三九年秋天，号兵叫我上山有事，去了之后才知道张老板要离开凤凰山了。"沅陵老乡黄忠义回忆说，"记得有一天，天刚蒙蒙亮，凤凰山的人马动身了，我挑着张老板的两只精制的小木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跟在张老板一行人的后面。当时，我看到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张老板走得很慢，时而回头望望，好像舍不得凤凰山似的。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跟在后面，一直把张老板送到凤凰山脚下上了船。后来，我才知道张老板的真实姓名，他就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如今回忆往事，令人难以忘怀。"

出沅陵仅两天，张学良一行便见到了土匪剪径的暴行：在距辰溪不远的一个山口，逃难的一家四口被土匪残杀在树丛中。县长告诉张学良，前些天有辆装运军用物资的卡车在麻阳前面的山道上也被土匪劫了，押车的士兵全被杀死，车也给推到了山崖下。

"那你们怎么不组织清剿呢？"张学良责问道。

"怎么不剿？"县长一脸苦笑，"从清朝剿到现在，一两百年了，匪患是越剿越烈，没有办法啊！"

过了镇远县，路口的混乱消失了，向当地人打听，并未提起此地有什么匪患，大家都松了口气。

"现在好了，下一站黄平快到了，大家可以好好地歇歇，再赶一两天就到贵阳了。"刘乙光向大家宣布，然后又来到张学良乘坐的那辆防弹车旁，说请副司令和夫人再坚持坚持。

车到黄平，该地的两大特产地瓜和洞箫吸引了大家。张学良先拣起一个，去了皮尝了一口，未及下咽便连连称赞：“我看这地瓜，足以抵得上苹果的味道呢。”

按照张学良的吩咐，熊队副买下了半卡车地瓜，足足有好几百斤，准备带到贵阳后再慢慢地吃。

至于洞箫，张学良更是爱不释手，当下便买了一对一长一短、一粗一细的雌雄箫。他抚着黄澄澄的丝坠，对副官说：“这玩意儿我没摆弄过，但是自小我就喜欢听箫。我母亲当年就会吹。”

到达贵阳那天，已是下午。张学良的新居住地在贵阳以北六十里、距修文县县城四里地外的龙岗山上。

龙岗山景色一般，然名气非凡。四百余年前，明朝王阳明贬谪到龙场驿来当驿丞，曾于龙岗山东洞隐居讲学，著书立论，成为后世景仰的大学问家。此洞后人称之为阳明洞。洞内宽敞



阳明洞王文成公祠正门，张学良被幽禁在此院内。

明亮，四通八达，可容纳百余人，洞壁有石乳凝结而成的象形动植物和日用器皿，洞外岩石嶙峋，古树参天，美景天成。

为纪念这位旷达的学者，自嘉靖年间起，后人在阳明洞上方的石坪上修建了四合院式的“王文成公祠”，即阳明祠。清康熙后，又累经扩建和重建，已颇具规模。

上山之后，张学良夫妇被安排在阳明祠大殿斜对面的三间砖木结构厢房中。围绕着祠庙，刘乙光奉命设了三道封锁线，层层把关，要逃出龙岗山，那真是难上加难。显然，蒋介石要把撼损了他尊严的这只“东北虎”像小鸡一样牢牢地攥在手心。

从秀丽的湘西走进贵州的雨季，张学良的情绪转入低潮。于凤至最能体味出丈夫心境的苍凉，但却无从叙说，惟有暗自垂泪。

除于凤至之外，对张学良的生活、情绪最为“关心”的，便要数刘乙光了。由于蒋介石不会在短期内给张学良以自由，所以，刘乙光的家小也随之来到龙岗山，安顿在阳明祠内。

短短三年，刘乙光大有斩获。由于他在“看管”张学良期间所表现出来的周到、缜密，以及他对党国的耿耿忠心，深得蒋介石和戴笠的赏识，不仅从中校晋升为上校，戴笠还暗示，只要对张学良的看管不出任何问题，不出两年，他肩头上便可扛上一朵“梅花”，当上将军。

对于军人来说，再没有比当上将军更有诱惑力的了。自此，刘乙光对张学良夫妇照看得更加耐心细致周到，表面上是为张少帅，实际上是为他自己。

一连数日，刘乙光都陪着张学良去逛街，去听歌，到集市上看人们交易。苗族人大都会讲汉语，张学良常常边逛边停下来同老妇老汉聊上几句，或站到货摊前翻看缝绣得花花绿绿、十分精致的荷包、小孩帽子。有时，他故作购买的样子，同他

们讨价还价。

有一次，刘乙光还拉着张学良来到集市外的树丛里，听苗家青年男女在这里对情歌。

但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不可能长久地对他人的自由抱以巨大的欣赏热忱。不久，张学良便感到意味索然了。

再也没人来劝他外出赶集了，龙岗山上一片沉寂，暮色降临，夜幕深沉，松柏掩映下的阳明祠显得有点阴森森的。

可日子总不能长久地这么沉郁。此时，院外的球场已经建好，乒乓球桌也在院中的石板地上架起。刘乙光撺掇了张学良的副官和于凤至，邀约张学良发起一次球类和玩牌比赛，说好些弟兄都跃跃欲试，想在赛场上同副司令一竞高下。

张学良生性好强，不甘人后，既有人向他提出挑战，他焉能不踊跃而上？经过一番磋商，他和刘乙光定下了网球、羽毛球、乒乓球、象棋四个比赛项目，并吩咐人将场地、器具准备妥当，即日便拉开战幕。

“优胜者有没有什么奖励呀?”杜副官在一旁问道。

“对了，有奖励玩起来才更带劲儿。”张学良表示赞同，接着一拍桌子说，“奖励费用由我出，凡第一名，发十块大洋。”

打网球，张学良是当然的霸主。墨索里尼女婿齐亚诺赠送的那支球拍被他抡得呼呼作响，一场球常常不满二十分钟，对手便被打得落花流水。最后，他抹了抹头上的汗珠，笑着说：“这十块大洋，就算是我省下了。”

接着是羽毛球。张学良将以种子选手的身份同优胜者决一雌雄。没料到一番厮杀下来，所有参赛者均为于凤至的手下败将。张学良哈哈大笑，指着警卫们说：“你们还是大男人呢，怎么连一个女流之辈也敌不过，还是看我的吧！”

轮到同丈夫较量，于凤至一改平日羸弱文静的形象。不知是真的赛不过妻子，还是想成全她的美名，激烈拼杀之后，张

学良居然败在妻子手下，俯首称臣了。

“这叫做夫胜妇随，强将身边无弱妻啊！”张学良心中也好不惬意，笑着环视众人道。

轮到赛乒乓球时，熊队副使出了浑身解数，左推右抽，敏捷非常，张学良连输两局，屈居第二，这样一来，张学良这十块大洋省不了啦，非破费不行了！

象棋比赛，连着进行了一个星期，张学良斩关夺将，又省下了十块大洋。

我当时说：“看来，我还当不了你们这些小伙子的手下败将啊，即使是上前线拼刺刀，说不定我还能比你们多挑两个日本兵呢。”

一九三九年十月初，日军由赣北、鄂南、湘北集中十二万兵力，分三路进犯长沙。国民党军队在第十五集团军司令关麟征等人指挥下，英勇抗战，歼敌数万。闻此大捷后，张学良无比兴奋，步关麟征所写《鹧鸪天》原韵，填写了一首词：

欣闻长沙传捷报，敌骑难越旧山河。关军能继先哲志，碧血黄沙把敌却。

民欢庆，我亦乐。乘胜直捣长白山，松花江畔奏凯乐。

一天，张学良偶然从一份小报上得知东北流亡学生组织的剧团在贵阳大戏院演出，异常兴奋，即向刘乙光提出要和于凤至一同去看戏。刘乙光不同意，他要求再三，刘乙光无奈，急电戴笠，戴笠回电说，只同意于凤至单独去。

次日晚，于凤至带着王妈和一个副官，由特务队四个便衣“陪同”，乘吉普车来到贵阳。于凤至被领至大戏院第六排的正中座位，她发现自己周围全是行迹可疑的人，知道这是刘乙光

早已部署好的警戒网。

东北学生精彩的演出，使于凤至感动不已。一名女生演唱《在松花江上》，当唱到“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时，于凤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泪夺眶而出。她回到住所，一下子扑到张学良怀里，抽泣着说：“汉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咱们的东北啊？”说完痛哭失声。张学良神色黯淡，喟然长叹。

不久，传来了“贵阳大轰炸”的消息。日机狂轰滥炸后，市中心一带几成废墟。

“日本人太猖狂了！”闻此暴行，张学良忿忿地骂道。

由于日机骚扰，局势混乱，张学良的活动范围大大缩小，足迹仅局限在阳明祠和阳明洞之间。在阳明祠的门上，有一副书写得刚劲潇洒的对联，张学良每每外出归来，总要在对联前伫立一阵，仔细品味这副对联的涵意：

三载栖迟，洞古山深含至乐。
一宵觉悟，文经武纬是全才。

四百多年前在这里住过的那位古人，能否给他这位后来者什么启迪？他是否也能在龙场驿获得“至乐”，而终得“一宵觉悟”？

于是，张学良开始捧读王阳明的著述。他一连数日闭门不出，帘外风雨，花开花落，他已全然不知，整个身心都投入到了阳明学说之中。他发现，这位思想家的经历与自己有着惊人的偶合。每当读到与自己所思所想契合之处，他便掩卷沉思，或起身独自来到大殿，望着王阳明的彩色塑像出神。

“看来，圣人自古多磨难啊。”于凤至沉吟片刻，笑着说，“你前半辈子太顺，还看不透这个世界，所以才有今天的磨难。

不过，你也许就因祸得福，将来更有作为呢。王阳明不就成了文经武纬的全才了吗?”

看来，老蒋是不肯放我的。既然如此，我也得多少找点儿事做，免得荒废了自己。武将当不成，儒士或许能弄出点名堂，不然，以后的日子怎么熬啊。

于是，张学良托人找来集王阳明思想大成的《大学问》，一字一句读得废寝忘食。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动静合一”、“心理合一”、“爱之差等”等理论，对张学良的内心颇有触动。

刘乙光闲得无聊，便借了张学良的书，回家翻读起来。这样，龙岗山上就有了两位王阳明的“隔代弟子”了。但刘乙光学得不深，常常是坐在椅子上，听张学良一口气说上一两个小时。他发现，这位曾经统兵数十万的将军，居然在短短数月之内，变成了言语深邃、宏论迭出的学人。

“副司令真不愧当过东北大学校长啊，这么快就弄懂了王阳明的学问!”有一次听完张学良的宏论，刘乙光忍不住恭维道。

我当时对刘乙光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当年我的真正志向不是行武,而是做学问。十几岁的时候,我本想去美国留学,研究一下西方的历史或者医学,但是,大帅坚决反对,东北的元老也不支持,说是‘父母在不远游’。过了两年,我又提出到北京上学,还在北京国立大学登记报了名,也被大帅否决了。要是当初我真上了学,说不定今日还真的当上了知名学者呢。”

“那中国可就少了一个知名将军了。”刘乙光嘴上这样说，心里却在想：要是那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西安事变，你也就不会被“严加管束”，我刘乙光也不会和你孤处于这穷乡僻壤一隅了。

潜心于阳明学说的张学良，这些日子分外焦躁不安。因为自夏季以来，夫人于凤至的病情日益加重。与世隔绝的幽禁生

涯，使这位贤淑的女人变得憔悴不堪，有时胸口痛起来，她的呻吟声使张学良也难以入睡。

“有病不让出去治，难道非让人死在这里不成！”为此，张学良大为光火。

“戴局长回电，说过几日亲自来修文，看望副司令和夫人。”刘乙光只得陪着笑脸说。

果然，没过多久，戴笠来到了阳明洞，随车给张学良夫妇带来了好些日用品和张学良喜爱吃的一些食物。张、戴见面，十分客套。

“我代表校长问副司令好！”戴笠彬彬有礼道。

“委员长日理万机，还记得我这个被囚之人，谢谢！”张学良苦笑着说。

“我这次来，委员长还特地吩咐过，看看你在这里的生活怎么样？有什么要求没有？”戴笠说道。

“我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哪。”张学良自嘲地对他说，“原来还有点儿兴趣四处看看，现在连看山转水的兴致也没有了。不过呢，我这人也闲不住。前些日子让刘队长他们找了点书来，没事我就啃书本了。”

“委员长最关心副司令读书的情况，他吩咐我说，如果你要什么书，可以列个单子，他负责替你找。”

“我不过是读读闲书而已，哪能劳委座大驾替我找书。你替我找的这个地方是当年王阳明住过的，这些日子我的时间都花在他的书上了。”

张学良说着便来了情绪，兴致勃勃地讲起了阳明学说。戴笠何曾研究过王阳明？张学良话头一起，他便如坠五里云中，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听上一阵，边听还边不住地点头。

“副司令真可谓是文武全才啊，”戴笠讨好地说，“待我回去把你的读书情况告诉委员长，他肯定高兴。”

谈到于凤至，戴笠问道："副司令的意思，是不是让夫人外出休息治疗一段时间？"

"我是这么想的。"张学良说，"这地方条件不太好，久呆下去对她的病恐怕没好处。再说她也想去看看儿女们。"

"可是副司令这里的饮食起居也得有人照顾陪伴哪。"

"我考虑过了。我想叫四小姐来住一段时间。"张学良停了停，又补充了一句，"如果她情愿的话。"

"既然副司令有这个意思，回去我一定向委员长禀报，尽快让夫人去检查治病。四小姐那边，我马上联系，请副司令放心。"

"这件事就有劳雨农兄了。"张学良感激地说。

戴笠辞别张学良后，便同刘乙光、熊仲青进行了密谈。

"我这次来，是奉委员长之命，一来看看这一带是不是安全，二来了解一下张学良的思想情况。委员长担心，西安的两只虎会不会隔山呼应。"戴笠说着站起身，向北面指了指说："还有一只虎，就在附近，杨虎城就关在息烽的玄天洞，离这儿不过三十几里地。"

刘、熊二人闻言，不由吃了一惊。

"另外，还有件事，"戴笠转向刘乙光说，"委员长特别批准了我的报告，任命你为军统局少将专员。"

刘乙光愣了一下，接着呼地站起来，脚跟一靠，在戴笠面前立正道："感谢局长的栽培！我刘乙光……"

当赵一荻在香港收到要她前往贵阳陪伴张学良的电报时，两行热泪顺着脸颊簌簌而泻。她先把小闾琳重又安置到美国，并一再告诫美国朋友，闾琳是她和张学良的惟一骨血，为防意外，更为了提防有人加害，务必不要让孩子同外界随意接触，亦不可向人泄露这是张学良之子。然后，她辗转奔往贵州。

"汉卿，你吃苦了！"久别之后，异地重逢，赵四一阵心酸，一句话未说完，眼泪已簌簌地往下落。



一九四〇年三月，于凤至患病去美就医，赵一荻由香港来此陪伴张学良共度幽禁生活。图为赵一荻与亲友在香港合影。左一为赵。

“见面是高兴的事。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张学良拍拍她的手，反倒安慰起她来。

“你来了我也就放心了。”于凤至伤感地说，“今后汉卿要靠你照料了。”

"大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说着，赵四眼里又涌起两汪泪水。

赵四小姐的到来，宛若一道阳光，照亮了幽深的阳明洞，也令张学良沉郁的心情豁然开朗。不久，于凤至获准赴美就医，赵一荻完全承担了女主人的一切责任。

自从有了红袖添香、佳人伴读的新环境，大大减少了张学良幽居生活中的苦闷和寂寞。此刻，他已从埋头阳明学说转向对明史的研究。夜深人静之时，张学良面对青灯黄卷，时时发出声声喟叹。

我并不赞成王阳明的观点，我认为他是唯心的。他说的那句话说：我看花，花在，我不看花，花不在，我就给他改成了这么两句：你看花时花在，你不看花时，花也在。

刘乙光等人并不清楚张学良读史有何心得，只是见他日日伏案，乐而忘倦，便频频向重庆报告。蒋介石闻报后非常高兴，很快传下指示：希望张学良每个月能上交一份"读史心得"，他要好好看一看。

虽然"兵谏"已过了四年，但蒋介石仍严密注视着这只让他吃了苦头的"东北虎"，他的一举一动，连他的所思所想，他老蒋也不打算放过。

一九四一年五月的一个晚上，张学良腹痛加剧，宛若刀绞，赵一荻急得连连跺脚，哭喊着去找随队医生。诊断结果，他得了急性阑尾炎，只有手术才能解决问题。

张学良这病来得如此突然，病情又那么危急，要想等重庆的指示显然已来不及了。于是，刘乙光赶到吴鼎昌家中，将这位省主席从睡梦中叫起，报告了情况。吴鼎昌也怕耽误了无法交代，遂同意先将张学良送到贵阳中央医院。

足足过了近一个小时，手术室的门才被推开，大汗淋漓的沈克非、许殿乙等医生走出门来，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对众人



贵阳黔灵山麒麟洞。一九四一年五月张学良患急性阑尾炎在贵阳中央医院治疗，转居此处。

说，已经切除了阑尾，没有危险了。

为了不让外界探知任何风声，张学良旋即又被转到了贵阳中医医院，住院部两层楼均被包下，楼下住特务队的警卫和宪兵，楼上住张学良、赵一荻和刘乙光等人。院内外军警密布，防范甚严。

在张学良秘密住院期间，只有一个人可以随意出入这所医院，他便是吴鼎昌。吴鼎昌同张学良算不上朋友，但却是老相识，加之张学良现在他管辖的区域内，因而他每过两天便来探望一次，送点鲜花、水果或滋补品。探视中，他吃惊地发现，几年前那位耿直、豪爽的张学良，现在居然文气十足，满口儒言雅语，言谈中引经据典，不乏醒世精辟之见。

此时，宋子文虽然远在美国，但非常牵挂张学良，多次向

戴笠询问张学良的病情。

七月十七日，戴笠又给宋子文发电：

> 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为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盛暑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当张学良伤口完全愈合后，刘乙光张罗着出院。张学良却把他叫到跟前说："我想在贵阳再住段时间，暂不准备回阳明洞。"

刘乙光听了，惊愕地望着张学良，半天没说出一个字来。

"是啊，"赵一荻也在一旁插话道，"汉卿在阳明洞住长了，想换换环境，在贵阳多呆些日子，万一有病痛，在这儿治也及时些，不要像这次，可把我吓死了。"

"副司令，这事……"刘乙光有些为难地说，"您是知道的，这种事我是做不了主的，等我请示一下戴局长。"

戴笠的回电第二天就传到了贵阳：同意张学良暂住黔灵山麒麟洞。

麒麟洞因洞口有一巨石酷似麒麟而得名。洞内幽深曲折，有天然生成的石花、石幔、石椅；洞前花木繁茂，一弯游廊濒临鱼池，举目还可望见对面秀丽雄劲的狮子崖。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其乐融融啊！"张学良览景感叹，情不自禁道。

赵四小姐听他念起陶渊明的诗，也随即接口念了另外两句："'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汉卿，山高水长，你会有'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日的。"

"到现在，我是什么也不想了，"张学良回答道，"也算是'心旷神怡，宠辱偕忘'吧。"

病愈后不久，经吴鼎昌力邀，张学良兴致勃勃地前往花溪



[illegible]

游览完毕，名士们回汉云楼吃过午饭，禁不住诗兴大发，纷纷填词赋诗赠与他们早就仰慕的将军，句中不乏劝安慰宁之辞。陈恒安即兴挥毫，将早已填好的一阕《南乡子》题写给张学良。词曰：

北国暗云稠，戎马倥偬战未休。半壁山河是旧垒，忧忧！收复故土志未酬。

将军胆识优，易帜兵谏有权谋。拟向苍穹摘北斗，休休！醉向花溪垂钓钩。

接着，邹国斌教授站起身，拱手说道："敝人有首拙诗，写得不好，但却是想了好久，想当面念给张将军。"说罢，诵诗道：

壮志欲酬，光我神州。疆场气壮，百战未休。
力主杀敌，袍泽同仇。东北易帜，版图固有。
西安兵谏，震撼全球。抗日复地，万民效道。
促成抗战，扫荡瀛州。将军赋闲，昊天罔求。
花溪度夏，韬晦权谋。风雷再起，碧霞畅流。

邹教授充满激情，抑扬顿挫地颂道，未及念完，其声已颤。

接下来，几位名士一一赋诗。吴鼎昌也填了一首《鹧鸪天》，词中有句云："甲被卸，任遨游。一让飘踪随他去，花溪伴随度春秋。"

这时，只见张学良站起身来，凝眉沉思一阵，遂轻轻念道：

犯上已是祸当头，作乱原非愿所求。
心存广宇壮山河，意挽中流助君舟。
春秋褒贬分内事，明史鞭策固所由。
龙场愿学王阳明，权把贵州当荆州。

这是张学良被“管束”之后，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论及西安事变。诗一念完，他端起面前的酒杯一饮而尽。

谢六逸凝视着张学良，良久，说了一句：“将军心思，我算是知了。”说完，端起酒杯，也跟着一饮而尽。

后来，这首诗传到了蒋介石手中。他看过之后，只说了三个字：“诗言志。”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戴笠奉命来到麒麟洞。

“张汉卿近来情绪如何?”戴笠问刘乙光。

“很好，跟我们的人和宪兵玩得也很开心。”刘乙光说。接着，他详细地数说了张学良打发时光的那些新花样。

“嗯，你的工作很有成绩，校长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戴笠听完后，笑着对刘乙光说。

这天中午，张学良和赵一荻请戴笠共进午餐。刘乙光也应邀出席作陪。

午餐时，张学良向戴笠问起杨虎城将军的情况。戴笠哪肯从实招来?便撒谎说杨虎城还在国外进行考察观光。其实，杨虎城夫妇这时正在监狱中备受虐待。

张学良和赵一荻听信了戴笠的谎言，心里感到十分欣慰。因为他们也曾到国外考察过，觉得那样的生活总比幽禁生活自由得多。

张学良请戴笠向蒋先生转达他的心愿：只要能解除幽禁，出去后随便干点什么都可以。戴笠表示一定代他转达给蒋委员长。



张学良（正中）与监管他的刘乙光（左三）一家。

但是，“花溪诗会”后，知道张学良住在黔灵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麒麟洞一带常有人徘徊，想一睹张学良的风采。

刘乙光深感不安，连连向重庆请示，是否应将张学良再移往他处？不久，戴笠回电：将张学良迁至贵阳以北一百公里处的开阳县。

再次搬迁之际，跟随张学良多年的两位副官走进了他的屋子。

张学良被“管束”之后，随身带了于、应、李和杜四位副官。他们能文能武，长期以来被张学良当作心腹。于凤至离开时，带走了于副官。现在，看到李副官迟迟疑疑、畏畏葸葸的样子，张学良已猜出了他的心思。

“是不是不打算随我去开阳了？”没等他开口，张学良便径直问道。

“副司令，”李副官怯怯地说，“我家中有些实际困难，我想回去看看。”

“人各有志，我也不强留了。你走吧。”沉默了好一阵，张学良终于说道。

“谢谢副司令！”李副官的眼泪突然夺眶而出，垂着头哭诉道，“我对不起副司令！这些年，您这么关照我，提拔我，可是我却不能报答您！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啊！”

“不要说了！”张学良大喝一声，打断了他的话，“你走吧！”

“如果你要走，我也放你。你们都可以走！”张学良转过脸，望着应副官道。

“我决不离开副司令！”应副官啪地一个立正，“哪怕是到天涯海角，我也寸步不离！”

“谢谢你，应副官。”赵四小姐走上来说道，“你们先下去吧，让副司令休息一会儿。”

待到走的那天，李副官自觉无颜再见副司令，先是向张学良住的方向敬了个军礼，而后又深深鞠了一躬。殊料，当他九曲径尚未走完时，早已守候在山下的几名宪兵立即将李副官扣押，关进了一间小黑屋。李大吵大嚷，呼喊着要见刘乙光。岂知，主使扣留他的正是刘乙光！

对李副官离开张学良一事，刘乙光向重庆作了几次报告，戴笠两次回电。第一次电文内容为：不可让其擅流社会，拟先将其扣下。第二次电文则明确指示：将其押往息烽监狱。

希求获得自由的李副官，连一天自由的日子也没有得到，便成了黑牢囚徒。一九四六年，他从息烽监狱转到了重庆的渣滓洞。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他同所有被囚于歌乐山的"政治要犯"一道，被国民党刽子手残酷地杀害了。

不过，张学良对此全然不知。他一直以为李副官带着他给予的赠款安返故乡，同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去了。

这一期间，张学良将军所需日用品以及各地的名产品，通统以宋美龄的名义，每月派一部大卡车由重庆运来，每次还带给张学良五百元钱作为零用。此时，张学良手头用钱已有诸多不便，但蒋介石也不愿多给他，怕给钱多了，他用来收买监视他的人。

宋美龄送来的东西，张学良经常同警卫和特务人员分享，但绝无收买之心，皆因其慷慨豪爽的性格使然。

一九四二年残冬之际，张学良恋恋不舍地告别了麒麟洞，又开始了新的迁移。

第八十一章　刘 育 乡 愁

1942.2

——“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

——“老人家，买杯酒喝，交个朋友吧。”

——“当不成养鸡大王了，唉，当不成了。”

“搬吧。”

当刘乙光向张学良报告要离开风景秀丽的黔灵山时，张学良只轻轻地应了一声。

一九四二年二月，在凛冽的寒风中，张学良和赵一荻踽踽行走在贵州开阳县刘育乡的阡陌小道上。

刘育又称刘衙，距开阳县城约七八里地。开阳、息烽、修文三县临近，地理位置成三角形。这里距贵阳八十二公里，是

贵阳至遵义、湖南的交通要冲，距当时的“陪都”重庆四百二十公里。

自张学良从湖南迁入贵州后，戴笠便一直想把刘育作为张学良的长期幽禁之地。

早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戴笠就已指令军统局在此地建造所谓“行辕”。“行辕”者，统帅出征执事之地也。可是，蒋介石从未到过此地，打着造“行辕”的名义，只不过是为日后押禁张学良而掩人耳目罢了。

由于要把张学良迁往开阳，国民党军统局便加强了对开阳县的控制。戴笠派军统特务李毓桢任开阳县长，军统特务廖文钦为刘育乡长。与此同时，各特务机关的势力也随之渗透进了这个荒僻之地。

为了对张学良进行“慎重防范”，控制社会舆论，在“军统局驻贵阳站”的协助下，国民党开阳县政府专门编写了一份《张学良到底是个什么人》的小册子，广为散发，说西安事变是“倒戈造反”，是“劫持统帅的叛逆行为”。很明显，其目的是使民众从心理上与张学良隔离开来。

张学良到达刘育那天，天气阴沉，凉风飕飕，让人深感残冬的寒意。此时，张学良身穿灰色旧棉军装，坐在藤轿上，木然地注视着沿途的山水景致。到镇上时，正逢赶集，老百姓见突然来了这么多大兵，都很惊奇，胆子大一点的，纷纷凑上前去看热闹。

张学良的“行辕”位于黔北古道南侧，距刘育寨子百米左右，附近四周山头上修有四座碉堡和几座哨棚，院墙高筑，警戒森严，令人望而生畏。整个“行辕”覆掩在参天古树之下，既显得幽静，又有一种阴森神秘的气氛。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居处位于正房，连着图书室、澡堂、会客室和副官室，特务队的办公室和住房则与此相对。

令张学良气愤不已的是，一到刘育乡，对他的监控更为严密了。除了宋美龄和宋子文不定期的信件外，其他亲友们寄来的书信包裹无一不被打开检查。虽然他的活动范围被划定为半径十公里，但每次出门，“护送”的警卫从过去的十来人增加到三五十人，一路上戒备森严，很难单独同当地的民众接近。

更令张学良气愤的是，在麒麟洞时，他每日尚可看到《中央日报》和《贵州日报》。可是到了开阳，外界的信息忽然中断了。仅仅相距才一百多里地，就恍若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他去问刘乙光，能不能找点报纸看，刘乙光面有难色，迟疑了半天，才说：“这里地偏，报纸一时半会儿送不来……”

“这儿离县城不是才几里地吗，难道县太爷也看不到报



一九四二年二月，张学良又被转移至开阳县刘育乡住了两年。这是他住室前的老井。

纸?”张学良气愤地质问道。

一股巨大的愤怒从心头涌起，随即又泛起一阵悲哀。阶下之囚，俯仰由人哪！他头一摆，怅然而去，径直走向寒雾弥漫的山野。

“汉卿，大的气都受了，这点小气难道还忍不下吗?”赵四小姐匆匆赶上来，柔声对他说道。

“这儿雾好大啊。”张学良深深地吸了口气，胸内顿觉一阵潮润，他注视着围遮上来的雾气，一语双关道，“怕是看不见太阳了!”

“雾终归是要散的呀，汉卿，别那么想。”赵四宽慰道：“以往不是也见过很多雾吗，到后来还不是都散开了。”

“小妹，跟着我，让你吃苦了。”张学良偏过头望了望赵一荻，动情地拍拍她的手。

开阳似“夜郎国”，狭小闭塞，难有理想去处。张学良的时日，都消耗在运动与读书之中了。

球场上，他仍像一只猛虎，左右奔突，蹲伏跳跃，潜藏的力量顷刻间迸发出来，一只小球被打得嗖嗖作响，来回飞窜，警卫们在一旁看得眼花撩乱。

静下来，他就读书，一章一节，字字句句，读得那么专心，那么认真。一个个王朝在他眼底浮现，史海波澜拍击着他的心胸。读到惬意时，他击节而呼，连声叫好；每逢哀伤处，他则推案而起，感叹无限。

“不读历史的人，终究不能成其大业。”张学良怅然喟叹道，良久，又自言自语道，“也不知现在局势怎样了?”

“这里看不到报纸，什么也不知道。”赵一荻抱怨道，“过两天我们去县城里转转，兴许能得到点儿什么消息。”

“我们得到了消息，这些日子形势很不妙。”刘乙光向张学良通报说，“前些日子，我们和盟军配合，空中远航轰炸了东

京和名古屋，日本人一直想报复，正在大规模调兵遣将。敌人的间谍活动也相当频繁，县城最好就不要去了，要去的话，到乡里好了。今天正是新贸易集市开市的日子，热闹得很哩，可以去逛逛。”

张学良一行来到集市，令筹划者们格外高兴。开场之时，鞭炮齐鸣，热闹非凡，乡公所前摆上了二十多桌酒席，恭让张学良坐了上席。张学良吩咐警卫们将他的“红吉士”、“杜米罗”等美国铁盒高级香烟分送给商贾们品吸。在即席讲话中，张学良鼓励客商们好好经营，活跃刘育市场，方便百姓。当客商们拿出礼品送给张学良时，他一再谢绝，最后，盛情难却，才收下了两斤四川金堂产的烟叶。

午饭之后，张学良和赵一荻来到了郑韵之的商摊前。赵四说想买点“维尔肤”和“生发油”。郑韵之高兴中又显出几分尴尬，他如实告之曰：“雪花膏倒是真货，生发油小瓶的也可以，大瓶子里是我用山茶籽油熬煎以后加的香精……”

“不能生发，可以用来擦机关枪打日本鬼子嘛。”张学良见郑韵之局促不安的样子，便微微一笑，幽默地说道。

临走时，张学良见郑韵之的目光凝注着自己的手杖，便说：“嗯，你这位兄弟很好，对我说了真话，我也让你看看这东西。”说着，便将手杖递到了郑老板面前。

张学良的手杖不仅精致美观，而且藏有秘密：曲形握柄头上装有一个打火机，打开一个隐形小盖一按，便有一柱火苗窜起。握柄中央，是一只微型记时器，放到耳边，可听见清脆的细响。更令人惊奇的是，张学良的拇指在柄上一按，同时将握柄向边上一扭，“咔”地一声便抽出一只一尺多长的闪光利剑来。郑韵之见状，禁不住连连称奇。

随后，赵四看中了一堆白嫩嫩的卷心菜，这是张学良最喜欢吃的蔬菜之一。问问价钱，便宜得惊人，只两分钱一斤。卖

菜的是个鬓发皆白、衣衫褴褛的老人，张学良同老人聊天，得知他已是七十六岁高龄，因为儿子被抓了壮丁，孙子们又嗷嗷待哺，只好撑着一把老骨头担着菜走了三十里地，来换点油盐钱。

一番话使张学良顿起怜悯之心。赵四共挑了十斤卷心菜，只须付两毛钱，可张学良却叫赵四拿出一张五元的钞票递过去。老头张罗着要找钱，张学良按住老人的手，说："不必了。老人家，买杯酒喝，交个朋友吧。"说完便转身而去。

老人一生何曾受过这样的恩惠？但见他老泪纵横，望着这位善人渐渐远去的背影，感动得颤声说道："菩萨保佑善人哪，菩萨保佑善人哪。"

张学良显然听见了老人的话，但却再也没有回头。走出好远，他才低沉地对赵一荻说："这天底下，穷人太多，不平也太多！"

转转街，逛逛店，又去戏院兜了一圈。台子上演的都是些老掉牙的戏，而且演技拙劣，腔调呆板。张学良看了一会儿，实在呆不住了，站起身拂袖而出。

"台上那老生，还不如我唱得好哩。"他笑着对赵四说，"你要上去，也准比那花旦唱得好听。"

"我可不敢这么说，"赵一荻道，"我倒是好久没听你唱过戏了。听大姐说，你在苏仙岭的时候，还让熊队副拉胡琴吊了阵嗓子，把大家肚子都快笑破了。"

"嗨，我天生五音不全，不过是吼吼而已，哪天你想听，我再来试试。"张学良爽快地说。

"那好哇！选段戏文，我陪着你唱。"赵四边说，边抿着嘴笑。

"副司令，快！快去看老虎！"刚走出戏院不远，便见一个警卫上气不接下气地跑上前来。

“老虎？什么老虎？”

“有人打了只老虎，请副司令去观赏。”

张学良赶到时，放虎的大院已围得水泄不通。张学良走到近前观赏了一阵，但见这头老虎足有六七百斤重，色泽斑斓，虽一动不动，可乍一看，仍让人觉得有点胆颤。

“好啊，你们真是当代武松哪！”张学良连连赞赏道。

袁化鹏当年与刘乙光的儿子是开阳中学的同班同学，关于这一情节，他回忆道：“张将军个子比刘乙光高，风度翩翩，英姿飒爽，确是叱咤风云、驰骋战场的宿将，身手不凡。他兴致勃勃、语调亲切地向捕虎人问长问短，备极关怀。一会儿，行营的一位秘书把一叠钞票送给捕虎人，说这是张先生的犒赏，老乡们喜出望外，抬着死虎扬长而去。事后，我问小刘：‘张先生怎么不把这张极好的虎皮买下来呢？’小刘说：‘他家有的是长白山虎皮、熊皮和著名的东北豹皮。虎皮是李县长买了，张叔叔奖了他们三十块钱。’”

猎人们得到犒赏，感激得连声称谢，却不知道这位给赏钱的是何人。后来悄悄一打听，才知道原来他就是张学良将军，众人皆大吃一惊。一位猎户羞惭地说：“张将军才是真正的英雄好汉，我们打只老虎算得了什么？可当着他的面，我们还洋洋得意呢！”

“记得是一个深秋时节，我独自一人在古树下背诵古文。”袁化鹏继续回忆说，“正在聚精会神时，张将军来了，他从我手中拿过国文手抄本，我这才惊觉，忙起来向他行礼致敬。他问我：‘你这名字出于何典？’我答：‘《庄子·秋水篇》。’接着，张将军要我背诵文天祥的《正气歌》。我背完以后，赵四小姐从张将军手里拿过国文，又要我背《费宫人刺虎》。这篇文章我本不够熟悉，有些夹生，这时不知怎么搞的，竟能流畅地背出，没有差错。这时，县长、校长以及县政府的一些人都来

了，还有一些同学。那些女生见我被‘考秀才’了，都在那里做鬼脸，出我的‘洋相’。但是张将军和赵阿姨却对我说了一些勉励的话，表示对我很满意。临别，张将军还要我代为问候刘震寰先生。刘是我的国文老师，在刘育，他经常和张将军谈诗填词。刘老师常对我说：‘张先生很有才华，这些年的囚禁，使他在诗词方面有了较深的素养。但诗以言志，他却不敢言志，所作都是风花雪月、咏物写景，皆为抒情而不敢有明心见性之句，他的苦闷心情不言而喻。’”

袁化鹏著文回忆说：“在刘育，军统特务对张将军的监视很严密，张的一切行动，都要经过并得到以‘秘书’身份出现的少将军统特务刘乙光的允许，因此，张的心情十分苦闷。没有听他唱过，也没有看他拿过书、百无聊赖之时，他只在门口的大青杠树下坐坐，凝视蓝天，一言不发。有时，在卫兵的‘护送’下到北安营去钓鱼，或是在划定的范围内散步，看孩子们用草编织笼子，捉蟋蟀关到笼里相斗……”

在开阳时，张学良偶然听人说起李县长有匹黑马，又听说有个大校场，便坚持要借县长的马“溜达几圈”。虽然好久没有骑马了，但张学良的骑术并没有完全荒废。只见他弓身伏在马背上，手中的马鞭一挥一扬，“的哒的哒”的声响骤起，旁观者禁不住兴奋起来，纷纷为之鼓掌。

“汉卿，你骑马的神气又让我看到了你过去的样子！”当张学良翻身下马时，赵一荻迎上前去，欣喜地说。

跑完马，赵一荻说想到县城里去转转，买点东西，于是，一行人又来到大街上。刚走不远，便见一家店铺门口围堵着一大群人，正互相推搡，叫骂不止，人群中隐约还见有人在挥动拳头。

“有劲儿不去打日本人，却同胞相残，成何体统！”张学良喝斥一声，然后叫警卫们上前将聚众闹事的人群驱开。

原来，县里长期缺盐，今日店里进了几百斤，人人都来抢购，出现了拳头相向的混乱局面。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张学良对李县长说："我住在开阳，喝开阳水，吃开阳米，自然也应当为开阳人民做些事情。没有资金，我来想办法，务必让老百姓吃上盐。你这里赶快组织运输，从速去自流井拉些盐回来。"

张学良通过刘乙光，将购盐所需资金一事通报了重庆的戴笠，戴笠又电传给省主席吴鼎昌，很快，上头便给开阳拨下了一笔盐款。不到十天，开阳百姓已不再为吃盐犯愁了。

连着赶了几次集的另一个重大收获，是张学良买回了七八十只小鸡。

"你想当养鸡大王？"赵四戏谑道。

"说不定呢，"张学良拍拍身上沾着的菜叶，眉飞色舞道，"你别看现在只有七八十只，几个月以后，就会有一百多只，再往后，就有两百只、三百只。我再把这儿修个正经八里的鸡场，生蛋的专门生蛋，孵小鸡的专门孵小鸡，用不了几年，我不就是个养鸡大王了吗？"

可是，谁也没有料到，眼看鸡长到半斤多重了，突然袭来一场鸡瘟，不到一个星期，七八十只鸡全部死掉了。

"当不成养鸡大王了，唉，当不成了。"张学良喃喃自语道，目光有几分呆滞。

离"行辕"大约两三里地，有一处从南京迁来的汤山炮校。因师生们生活枯燥，校方便时常举办联欢晚会，每次，他们都邀请张学良出席，张学良从不拒绝。在寂寞的生活中，能偶尔回到军人们中间，与他们同唱同乐，他觉得也是人生一大快事。

炮校有个京剧团。一次晚会上，国文教员李源浦用南胡演奏了《霸王别姬》中舞剑的一段曲调以及《夜深沉》，指法娴熟，优美动听。张学良坐于台下，闭目细赏，频频点头，十分

惬意。一次，张学良问李源浦会不会拉《流亡三部曲》，李源浦很遗憾地说不会，不过可以学，待学会了一定拉给将军欣赏。张学良连声道："好，好，那我就等着听你的《流亡三部曲》了。"

刘育乡东去六公里，有个叫白岩营的避暑胜地，此处地形险要，峻峰兀立。山峰上，有一座四合院大庙，只有一条小径可从西面攀至顶端。每临春夏，这里林木参天，古刹烟云，花香鸟语，幽美如画。张学良、赵一荻常乘坐藤轿来到山上，听风望景，消度时光。

在愁苦的日子里，这是一种将自己融人大自然的消遣。每次一到山顶，张学良都要在庙宇的回廊上独坐一阵，远望巍巍峭壁，独览茫茫云海，当看到数以百计的苍鹰在天空中翱翔时，他触景生情，很快便陷人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从一九四四年四月至十二月，短短的八个月间，日军集中了几十万兵力，攻占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等省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军队损兵折将五六十万，余下的几十万残兵犹如惊弓之鸟，向西南溃退。兵败如山倒，日军一直追到贵州独山，距贵阳仅一百二十公里。

日寇猖獗，兵临城下，贵阳城内人心惶惶，市民们扶老携幼，四散奔逃。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七日，刘乙光接到军统局指令：速将张学良秘密迁往开阳以北二百余里的桐梓县。

第八十二章　幽 默 桐 梓

1944.12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也不知现在战争打到何种地步了？东北那边，也好久没有消息了。”

——“时间已经不短了，这块表走得那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

——“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十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吗？”

“就是这里吗?”

张学良走下车来，环顾四周后问道。

“就这里了。请副座先进屋休息。”刘乙光走上前来恭敬地答道。

这便是张学良的新居地：贵州桐梓天门洞。

放眼一望，只见群山环抱之中，有几十亩大的一围碧湖。湖面上，清湛明澈，天光倒映；湖堤上，阳光铺洒，垂柳成行；碧波中，亭阁玉立，宛若仙境。

"这简直就是杭州的西湖嘛。"赵四小姐惊呼道。

"四小姐说得对，这湖的名称就叫小西湖。你们看，"刘乙光指向湖心，"那儿是映月三潭，那儿是湖心亭、放鹤亭、望湖亭，完全是仿照杭州西湖的样式修建的。"

"好一派秀美的风光！怎么会在这儿建个小西湖呢？"张学良不解地问道。

原来，天门洞是一个偏僻的山村，由于战争的需要，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所辖的四十一兵工厂和海军学校都迁到这里。然后，由人工筑成一道堤坝，把天门河水拦腰截住，建成了一个人工湖用来发电，当地人称"小西湖"。在天门洞的山麓上，又建筑了几座砖木结构的平房，此时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以及特务们居住。

"这些房子格局很讲究啊，"张学良说，"只差一横就成个'品'字了。"

"马上就要变成品字了。"刘乙光说，"现在厨房、洗澡间和厕所还没安排妥当。熊队副张罗去了，要修就修在我们住的后面，三组房子正好成个'品'字。"

张学良继续沿房屋四周巡看。只见沿山一带的垭口、树丛中，修建了十二座碉堡、暗堡，警卫被分作三层：外围是特派来此地的特务二团；第二层是宪兵连；第三层便是刘乙光的特务队。没有特别许可，任何人都不能靠近这座湖边要塞。见此情景，张学良的脸便阴了下来。

仅仅才几天，张学良便把附近的山山水水游了个遍。接着，便提出要去参观天门洞的发电厂。

张学良本意是想通过参观同工人们聊聊天，岂料，赶到那

里，但见警卫密布，森严壁垒。参观时，当两个值班的工人转过身来，想要一睹将军的风采时，立即遭到警卫的呵斥。

参观完毕，张学良说想上厕所，刚迈开步，便被一名警卫拦住，说是请副司令等等，他先去安排一下。张学良不禁哑然失笑：上个厕所还要什么安排？待他被准许走向厕所时，发现厕所外居然也站了好些警卫，他走进时，后面还跟了两个“尾巴”。

“何至于此呢？”张学良愤然道，满脸愠色，也不打招呼，径直走出了厂门，边走边沮丧地说，“真是乘兴而往，败兴而归！”

桐梓的日子如湖水般平静，没有任何波澜。除了关在房里读书之外，张学良干得最多的事便是钓鱼。常常是吃过午饭，张学良便拎着鱼竿，来到湖心亭上垂钓。

亭柱上原有一副对联：“一湾西湖水，半壁桂林山”，刘乙光又让人在对联旁边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少帅钓鱼台”。规定除了警卫之外，任何人都不得再上湖心亭。

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消磨时间而已。有时，张学良长久不动，即使看见鱼儿咬钩也不去答理。小西湖鱼多，有时拉起来一看，一条足有五六斤重。坐上半天，钓千几斤鱼是常有的事。这些鱼中，只有很少被警卫提回去变成盘中之餐，绝大多数的鱼，张学良都是钓起来，又重新放回湖里。

上钩的鱼儿尚有重获自由之时，身陷囹圄的少帅却历不尽漫漫的囚期。每一次钓鱼，在旁陪伴的赵四小姐的心都经受一次沉重的煎熬。

“过去在溪口，在湖南，总还有人来看看我，问候几句，现在怎么一个都见不到了？难道我张汉卿才几年功夫，就给人忘记了？”到桐梓已近三个月，可一直没有人来看望张学良，他禁不住抱怨起来。

"你不会被人遗忘的，汉卿，"赵四安慰道，"恐怕是桐梓这地方太偏太远。再说，别人恐怕也很难知道你到了这儿。"

"山中才一日，世上已千年，也不知现在战争打到何种地步了？东北那边，也好久没有消息了。"张学良感叹道。

赵四知道张学良的心思，但却无以为劝，只轻轻地说道："汉卿，外面的事情，你就不要想那么多了。"

有一次，兵工厂警卫中队长张亚群因公来找刘乙光，办完事后，一同到张学良屋里聊天。就在张亚群坐下的一刹那，张学良眼里倏地亮了一下，他发现，张亚群的衣兜口上，露出了报纸的一角。

这时，外面传来喊"刘队长"的声音。刘乙光站起来，身影刚刚消失在门口，张学良便来到张亚群跟前，将报纸从他的兜里猛地抽出来。

"我看看这张报纸！"张学良说了声，捧着报纸退回沙发上，贪婪地读了起来。

这时，门外传来了脚步声，张学良"哗"地一声将报纸合上，折成方块，垫在座位下。当刘乙光再次离座时，张学良迅疾从屁股下抽出报纸，将它扔进沙发背后的一只皮箱里。当他转过身看见张亚群神色有些紧张时，便微微一笑，说："不要怕，不过读读报纸罢了。"然后，张学良同他聊起了天门洞小西湖。

"这儿的美景都是用命换来的，不容易啊！"张学良听完张亚群的介绍，不禁感叹道。

"我来的时候，这个大水库和电站已经修好了，没有看见当时的情形。"张亚群告诉张将军，"听人家说，竣工那天，主持人陈祖东呜呜大哭，仰起脖子喝光了一瓶酒，然后提笔写了《石工歌》。"

《石工歌》是一首长长的四言诗，镂刻在塔的底部。一天，

张学良伫立塔前，一字一句地诵读起来：

> 嗟嗟石工，黄帝子孙。不期而会，众志成城。
> 胼手胝足，风曝雨淋。夜以继日，无时或宁。
> 或钻隧穴，鸠面鹄形。或涉水流，澈骨寒心。
> 冬无寸被，夏抗蚊蝇。衣不蔽体，食止酸辛。
> 己惟一饱，妻孥何存。偶撄山怒，折肢亡身。
> 来如落叶，去如飘萍……

“好啊！好诗啊！”张学良念着念着，声音有些哽咽，突然大声道，“我等常常只知赏景，未知此景都是以生命以血汗筑成的，读之汗颜哪！”

但是，张学良决然没有想到，正当他在小西湖畔无限感慨之际，巨大的危险正在向他逼进。

“一九四四年冬，当日寇侵占独山准备向贵阳进犯时，我随同戴笠去贵阳抢运物资。”军统局西南站站长沈醉曾著文回忆说，“有天中午，何应钦来到戴笠在贵阳麒麟洞的住处，谈了一会儿便吃午饭。我们三人正在吃饭时，看守杨虎城将军的特务队长龚国彦赶到贵阳来向戴请示，戴叫他在客厅等着。何应钦刚一离开，戴便要我把龚国彦带到他的办公室。龚问戴，杨虎城何时可以迁移，戴笑了笑说：‘这么紧张的时候，连运物资的汽车都调不过来，还能管他们？万一日军继续进犯，你们一听到贵阳沦陷，敌人向重庆进军时，你就可以在混乱时把杨虎城一家结束，用不着再让他们留下去。’龚国彦走了之后，我便问戴，还有在桐梓的张学良是否要先转移？戴毫不考虑地回答我说：‘等到了那个时候，还不是一样解决。我们自己都顾不上的时候，就不得不采取简单的手段来对付这些人了！’”

幸运的是，更加严酷危急的局面没有出现，厄运终究没有

降临到张学良头上。

在动荡的局势与蜂起的战火中，人们又迎来了难忘的一九四五年。

“又是一春了！”清晨起来，张学良自言自语地说。

冬去春来，年复一年，岁月悠悠，但人们并没有忘记张学良将军。此刻，各方要求会见、探视张学良的请求源源不断地汇往重庆，尤其是他的一些旧部和东北的各界人士，一直在为张学良恢复自由而八方奔波。但所有的恳求到了蒋介石面前，都遭到了漠视与拒绝。

虎虽囚，患犹在，蒋介石老谋深算，一刻也没有掉以轻心。

当戴笠再次向他请示，是否准允部分人去贵州桐梓探张时，蒋介石犹豫了很久，最后阴着脸指示戴笠：“他们要去看，就让他们去好了。不过，政府里的、军队里的人，尤其是原来东北军的人，不能去。”

在这一系列苛刻条件下，一九四五年二月，东北元老莫德惠获准在军统局人事处长李肖白的“陪同”下，来到了桐梓。

得知莫德惠将要来访，张学良兴奋得几乎一宿没有合眼，一大早便翻身起床，伫立在窗前，远眺通往山外的小路。

午后，当莫老的汽车抵达时，张学良快步迎上前，还未曾走到车门前，人已泪流满面，一声颤抖的“莫老”，使得莫德惠老泪纵横，他只叫了声“少帅”，便已泣不成声。

故人相见，自有千言万语，但一看见紧紧跟在他们身边的李肖白，两人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很显然，政治上的事是绝口不能提的。

“早就听人说，副司令读史很有心得，说您从修文开始，就‘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莫老听讹传了，”张学良微微一笑，“我不过只是对明史



张学良与莫德惠在桐梓县天门洞小西湖钓鱼。

有点兴趣而已。过去'皇皇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如今得有闲暇读点书，也算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罢了。"

"大家都很惦记副司令。听说我要来，很多人都让我转致问候。委员长和夫人也送了很多东西。一些朋友还专门写了信。"他俩沿湖堤而行，边走边谈。

"学良非常感谢。前些年我做过一些事，也算是'狂走趁浮名'吧。而今久居深山，惟所愿者，就是不要那么快为人所忘。诸位父老友朋还能念及学良，算是我之大幸了。"

"副司令深明大义，为国为民颇多建树。这样的人，焉能为人所忘?"莫德惠说着，看了李肖白一眼。李肖白只当没有听见，侧脸望向小西湖中的亭台。

回到张学良的客厅，莫德惠将携来的礼物、信件一一点交

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然后，他又从怀里摸出一块金质怀表，说："这是蒋先生委托我送给您的。"

"时间已经不短了，这块表走得那么好，它是不容易停的。"张学良接过怀表，幽默地说。

"自有佳期君莫问。"莫德惠风趣地、半开玩笑地说。

这时，张学良也把他在瑞士买的飞利浦派克金表托莫老送给蒋介石，含蓄地暗示：关押八年，已经期满，应当释放他了。他希望蒋介石能守一次信义。

连着几个晚上，张学良都夜难成寐，一遍遍地捧读着莫德惠带来的一大扎信件。信全都是张学良的一些旧好和部属写来的，人人尽诉对少帅的怀念之情，盼望他能早日回到大家身边，壮拥旌旗，率军破敌。

夜色如墨。张学良独坐灯下，给千里之外的友好及部属们一一回函。八年幽禁，贮下满腹话语，可是提起笔来，竟不知从何诉起！待溅墨纸上，千言万语，竟浓缩为寥寥数语：

"请勿以弟个人事介介。稳而后方能健，平而后方能正，切请勿河汉之。纸短情长，心照不宣。"

"汉卿，过几天，请莫老把这些信……"赵四刚一开口便愣住了，只见张学良两眼死死地盯住这捆回信，泪水夺眶而出。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两个星期。每一日，张学良和赵四都陪着这位难得一见的故人转山游湖，吟诗钓鱼，谈经论史，但却未能找到机会畅谈政治局势。因为李肖白无时不在履行戴笠交予他的使命，与他们寸步不离。

临到要分别了，李肖白同刘乙光有一番密谈，莫德惠瞅住时机，约张学良到湖山钓鱼。十几天中，两人第一次有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我这次来，很多朋友都要我转告副司令，他们对你仍怀

着充分的敬意。希望你千万珍重，再度出山，主持大局。”莫德惠说。

我说：“替我谢谢朋友们了。这几年，蒋介石让我转移了这么多的地方，又让四小姐从香港回来陪我，可见他并没有放我出去的意思。再说，抗战期间，正是用人之际，他却对我出去的事只字不提，可见他是不见容于我了。”

“按说该是放你的时候了。”莫德惠沉吟着说，“要说改过，八年来你哪一样事情不是照他的意思办的？就说读书这事，每月向他提交一篇读书心得，也足见你对他的一片心迹了。”

我对莫德惠说，老蒋的为人，你还不了解吗？他是恨我在西安扫了他的面子，想拿我做个受罚的例子。倘若他放了我，西安的事就被抹了。他是怕还有人会走我的路，他再也经受不起这桩子事了。

虎城实在是受了我的牵累啊！老蒋对他，早就存有戒心，现在正好借机剪除掉。

自由，难，很难！我这几年想得最多的就是这两个字，觉得最难实现的也是这两个字。我反复想，我要恢复自由，只有两种情况出现才有可能。

一是抗日取得胜利之时。西安的事情，我的初衷是为了让他领导民众抗战，抗战胜利，他自然没有理由不再让我出去。再说，抗战胜利，我张学良没放一枪一弹，而他是抗日英雄。放了我，一显得他宽宏大量，二来不怕我争抢抗日之功，三则我手下已没有一兵一卒，他用不着对我再加防范。

第二种情况，这是要在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大会召开，全国各党各派合作，一致公推老蒋为大总统之日。他的声望可以在这时候达到顶点，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国家统一，内乱平定，人民都安居乐业了，他再扣住我已没有任何意义。

莫德惠沉默了一阵儿，说：“这几年我同政府内外的很多

人都议论过这件事情，大家虽见解不一，但都觉得对老蒋不能过于乐观。现在听副司令这么一说，我觉得是很有道理的。世上哪有为一时之忿而将人囚禁终身的道理！何况副司令曾经有恩于老蒋，对他也算得上忠心耿耿。如果以上两种情况出现，他若再不还你自由，于国于民都不好交待了。”

“学良虽落难于今日，但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现在一心读书，以待来日了。”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副司令潜心读史明典，治国抚民之道自然谙熟于心，一旦出山，则国之大幸，民之大幸！”莫德惠双手相交，向张学良一揖。

“莫老所言，哪里敢当。学良所愿，惟自由二字而已！”

“我等静候佳期了。”

囚禁中的张学良在与世隔绝的困难情况下，没有忘记他的老把叔张作相。莫德惠在天门洞时，张学良一再打听辅帅的情况，并挥毫在绢上为张作相写了一条幅，称张作相为辅翁，还送给张作相几张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照片，嘱张作相替他多多关照东北父老。后来，莫德惠到北京看望张作相时，在张作相次子张廷枢家中把张学良所赠的条幅与照片交给了张作相。可惜的是，条幅和照片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一九四五年春，张学良应戴笠请求，策反在沦陷区的东北旧部，先后共写了二百余封绸函，惟独于济川将绸函保留于世。

这封写给于将军的绸函，是张学良用墨笔在黄绢上一气呵成的，全文如下：

济川我兄大鉴：

自九一八事变别来于今，已十有四年矣。每一念及，

诚如古人所云：肠可九回。想兄亦当有此同感乎？

抗战以来，八载于兹。就国内近日大势，为兄一陈：盟军迫近柏林，希特勒之败即在目前，不待计而后知之者。日军在太平洋及缅甸屡败，动则全员战死，此乃非其猛勇，是无抵抗之力、无可退之地也。日本海空两军，外强中干，不堪为盟军之对手。菲列宾之海战可以证之。现日本船只损失泰半，致海外日军孤悬，恐不久皆得为全员战死乎！我中美空军联合袭敌，万里航行，如入无人之境。此等情事，想兄早已知之矣。此不过盟军一部分力量而已。转瞬德国问题解决，盟军陆海空将联袂东来，我国五百万大军同时反攻，而我盟友苏联西方之敌已灭，其不忘张鼓峰、哈欣河之役必得行有以报之也。日本之必败，路人皆知。此之实现当在不远矣。古人云：久蛰思启。愿我兄当大军反攻之日，纠合同志，领袖群伦，扰敌后方，断其归路，使其片甲不回，建不世之功，此诚男儿报国之时也。

最高当局宽仁下士，对人之诚，当为兄所悉，对兄当能保障，弟亦愿以人格生命担保之，切勿介介于怀，坐失良机。时乎时乎不再来！愿兄好图之。

笔拙情深，不能叙心境于万一。谨布区区。

并祝顺利

弟张学良顿首

三月十五日

此绢信现保存在北京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

当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小西湖时，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欣喜若狂，同警卫们一道，又笑、又叫、又跳，孩子似的手舞足蹈。唱过、闹过，两人又跑回屋里，搂抱成一团，放声大

哭。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汉卿，你的苦吃到尽头了!”赵四用微颤的手抚摸着他花白的两鬓，又用手绢抹去他脸上的泪水，“你是为了抗战才落到这一步的，要论功劳，你当为天下第一人!”

有功无功，我已经毫不在意。抗战能以胜利结束，我心足矣。现在惟一的愿望，只是自由二字。

几天后，张学良正在湖边钓鱼，却见一帮人吵吵嚷嚷地向他走来。原来，几天前，兵工厂的工人在桐梓县城里同两家伤兵医院的伤兵在街上大打出手，兵工厂死伤七人，伤兵死伤十二人，一家酱油铺全部被砸。桐梓县无法解决，案子又上报到省里和兵工署，久久未得答复。人们无奈，只得来求张将军出面公断。

“这成何体统!”张学良听罢此事，禁不住大喝道，“现在抗战胜利了，大家应当团结起来，共同建设国家才是，怎么能同室操戈，久不解怨呢?这事我要管一管，我就不信有人不服裁决!”

调停那天，张学良先让兵工厂代表发言，再让两家医院院长发言，并规定每人只准讲十五分钟。各方讲完之后，张学良并不同其他人商量，立即现场裁决。

“兵工厂打死打伤七人，两院死伤十二人，抚恤、安埋各自负责。打烂南门酱油铺，限期十天、由伤兵医院赔偿四十块大洋。”接着，张学良提高声调说，“兵工厂造武器是为了抗日，这样的兵工厂全国只有几家。如果你们两家医院不服从这个裁决，那我亲自给蒋委员长去信，取消你们的伤兵荣誉!”

在调停之前，各方人员均已得知，主持裁决的是威名赫赫的张副司令，故裁决之前，便已略感紧张。现在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哪里还敢争辩，忙着表示：服从少帅裁决，立即做好

善后工作。

一桩闹得满城风雨、兵戎相见的案子，就这样不到一个小时，被张学良处理得妥妥帖帖，出了县政府大门，两位伤兵医院院长禁不住连声感叹："没想到张学良这个人，如今还是这么威风啊！"

那些天，是张学良被禁近九年来最觉心情舒爽、最感轻松愉快的日子。他认为，抗战胜利，国民政府将由重庆返都南京，国家百废待兴，人民需要休养生息。战火既息，政党、派系之间的杀伐将逐渐得以消弭，恩恩怨怨，不堪回首的争斗较量，也理应趋化为爽心的玉帛。

但是，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过去了，蒋介石并没有作出任何特别的表示。日渐加深的不安和忧虑随着寒风渐渐袭来，张学良终于明白了，他自由的愿望已经付诸东流。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拉开了帷幕。民盟代表周鲸文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向参加会议的周恩来、董必武要求道："中共是国内唯一能与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较量的政党，我们希望周先生、董先生能在会上提出张先生的自由问题。"

经过反复思量，周恩来向周鲸文表示：共产党做事，决不会对不起朋友。张学良、杨虎城是为国受难，自然应当恢复自由。此事中共代表将在适当时机向大会提出。

"张、杨二人的西安之举，其动机乃是为了抗日，而事实上，也确实起到了促进全民抗战早日到来的作用。"周恩来随即在会议上指出，"就这一点来讲，张、杨二人并非罪人，而是英雄。要是没有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不可能得以和平解决，抗战的进程要受到严重影响，今日，我们甚至不能坐到一起来召开这个政治协商会。再则，两位将军失去自由已达九年，若再不还以自由，于国于民都说不过去！"

周恩来的发言，在代表们中间激起极大的反响，多数代表都主张立即释放两位将军。民盟代表还拟定了一封要求释放张学良的长信，交给了蒋介石。

各党各派的呼声总不能置之不理，这毕竟是政治协商会啊！于是，蒋介石让邵力子代表他向大会辩解说：他与张学良的关系，不能以国法、公义来论，而“乃如父子的私情”，他“管束”张学良，完全是“出于爱护之心”。

一件关系到民主政治的大事，就这么被蒋介石罩上了一层“家法处置”的外衣。至此，对自由望眼欲穿的张学良终于知道，蒋介石是彻底不会“原谅”他了。

老蒋的心思我算是彻底看透了。自由之事，我今后决不再想，决不再提！

不要再天真了！我过去吃亏就是因为天真，现在又天真了十年，难道我还要这么天真下去吗？此恨绵绵哪……

生活重又回到原来的轨道。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就被日复一日的阴郁惆怅所取代。警卫们发现，同赵四小姐一同在湖边漫步的张学良，背脊已微有弯驼，加上他滞缓的步态，若从后面一望，已完完全全像个老人。

昔日威风凛凛的大将，终究敌不住十年寂寞的放逐啊！

但在忧伤和激愤中，张学良仍然雄心未泯，浩气长存。在桐梓时，他挥笔写下了两首诗，《新华日报》于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予以转载：

一、发　芽

盼发芽早，
愿根叶
　　长的茂；
深耕种，

勤除草，
一早起
直到
　　太阳晒的
似火烧，
呀！
芽，毕竟发了！

二、顶　好

到处打主意
抢粪
　偷尿
活像强盗。
在人前夸口为的
那样菜
　　是我的顶好，
呱呱叫！

一九四六年春，原任道真县县长的赵季恒调到桐梓当了县长。赵县长曾著文回忆这一时期他与张学良的交往，大致内容如下：

六月二十四日，监视张将军的特务刘团长到县府找我解决部队军需。为了结识张将军，我对他十分热情，请他一起共进午餐。

我见刘团长很直爽，就说："老兄，你能否帮帮忙，让我去会一会张将军？"

"我没问题，但是得问问少帅，他是一个怪人，对下面士兵很好，对上头来的达官贵人却不屑一顾。省主席杨森专程来看他，少帅始终不见，让他吃了一个闭门羹；考试院院长戴传

贤来，少帅却高兴得很，还一起打了一场网球。他见不见你，我心中可没底，我尽力而为吧。”刘团长说道。

饭后，我备了两份礼，一份给刘团长，一份请他转给张将军。每份礼品中有：两瓶茅台、一斤茶叶和几样土特产。两周后，刘团长亲自开了一辆吉普车，接我去见张学良将军。

一进兵工厂，我见四周山峦上电网密布，岗哨林立，梆梆声此起彼伏，让人感到阴森恐怖。张将军住在一座接连五间的平房里，左旁是当地人称的小西湖，右靠一个大广场，门前两个花台，屋后是几株杨槐。

我们的汽车一直开到门前。刚下车，身材苗条、端庄俊逸、身着栗色暗花绸旗袍的赵四小姐便从房里迎了出来，落落大方地把我让进客厅，说：“汉卿正在练字，赵县长请稍候。”然后，端了一杯茶放在茶几上便进里屋去了。

一会儿，张将军从里面走了出来，因气候炎热，他穿一身白色的短衣短裤，脚上的拖鞋也是雪白的，显得英姿勃勃，神采奕奕。

一阵寒暄之后，他说：“承蒙你对我这个阶下囚的关心。你托刘团长带来的礼物我收到了，釜底之鱼能使像你这样过去不认识的人想到，我就十分感激了。”

“将军为驱强虏，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实行兵谏，万人敬仰，区区小意，略表寸心，何足挂齿？”

他苦笑了一下，拉着我的手走进了书房。书房里一尘不染，一排书柜靠着墙壁，里面的各类书籍陈放得整整齐齐，临窗的书案上放着墨迹未干的条幅，案角摆着一部《明史》。

落座后，我问张将军在这里是否习惯，还需要什么，他指着窗外说：“已经习惯了，什么也不需要，只是一听到梆梆声就心烦，有一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不过，我这里很‘安全’，也有一般人难得的清闲。我有时读《明史》，看报章杂志，有

时练习毛笔字。这得感激蒋先生……”

我怕隔墙有耳，小声地谈了谈官场中的一些弊端，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古封建王朝亡于宦官内戚者多矣，正如你所说的裙带关系一样，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我见他毫无顾忌地大声抨击时政，怕于他于我均有不利，忙起身到书案前欣赏他的书法。欣赏中我赞不绝口，从中选了几张求他送我。

“这怎么行？写得不好，过两天我重新写，写好派人送到你府上。”我们像是他乡遇到了知己，畅谈了一个多小时。

三天以后，张将军果然派人送来一张横幅，上面写的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署名为“毅庵”。

一九四六年九月九日，我又去看望张将军。我把外面的局势以及我对这场内战的前景和忧虑告诉了他。张将军不无讥讽地回答：“蒋先生不是常说以不变应万变么？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唉！我但求无愧我心。想当年冯、阎讨蒋，在这场中原大战之中，不是我拥军入关助他，仓促应战的中正兄只好束手待擒也。唉！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但我怎么也忘不了九月十八日这个日子，是那一天我为制止内战统兵入关；一年后的这个日子，日本人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炮，随即侵吞了东三省，弄得我有家难归，受掣于人。现在想起来，好像是做了一场梦，演了一台戏，我们几个人当面称兄道弟，其实，浑身全是戏，如今品咂，才解其中味。”

想不到我几句话勾引得张将军如此悲忿，我后悔不迭，却又束手无策。此时，赵四小姐又出来解了围，她几句得体的话使我们一扫愁云：“汉卿，你自己定的规矩，现在是打牌的时间了，赵县长难得一来，你看我已经准备好了，这就去请刘团长。”

一会儿，刘团长来了，我同他们打了四圈麻将后就起身告

辞了。

五天以后的一个下午，张将军派人送来一张便条和几样礼物，来人只说了一句话，放下东西就匆匆回去了。礼物是两卷字画、一小罐泡海椒、一个精致的竹笼里装的一对波斯猫。便条上这样写道：

> 两卷字画系我多年珍藏；泡海椒是赵四小姐亲手所做；猫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解绳本领很强，初到一地必须关好，不然会跑掉，喂熟后很会捕鼠。区区小意不成敬意，望笑纳。
>
> 汉卿
>
> 民国卅五年九月十四日

我立即起床，把张将军送来的字画和泡菜藏进卧室的夹墙里，并给一位可靠的朋友写了一封信，要他来完成我未完成的事。

天一亮，我便让一心腹把信给朋友送去，随即赶到兵工厂。迟了，已经迟了，那里已经人去屋空。昨晚深夜，张将军又被秘密押走了，究竟被押送到哪里，无人知晓。

张将军生死未卜，令人悬心。以后我托人多方打听，才知道他是被星夜押送到了重庆，不久又转送去了台湾。

第八十三章　押 送 台 湾

1946．11

——“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我只希望早日飞到南京，见到委员长。”

——“高山人对我们很不错，幸亏他们接济我们。那时，大家都吃番薯，就我一个人还吃点儿米饭。”

“情况变化很大啊。”

当沈醉带着哭腔，将戴笠机毁人亡的噩耗告诉张学良时，张学良半天没吭声，最后，终于说出这一句让沈醉摸不着头脑的话。

沈醉怔怔地看着张学良，一时不知是什么意思。本想让张

学良与他共同分担这一悲痛，以期从中获得一点慰藉，然而，他失望了。

“大家都要回去了，连兵工厂也要关门了，可我还继续留在这个夜郎国，不知什么时候能够离开？”张学良叹道，“八年抗战，我身为一个军人，却没有为抗日出一点力，想来很感惭愧，恐怕我已被人遗忘了啊！”

“哪里，副座不会被人所忘的。”沈醉连声说道，“副座是党国要人，部属又多，哪里会为人所忘呢？”

是啊，蒋介石更是时时“惦念”着张学良。

一九四六年九月，莫德惠亲奉蒋介石之命，又风尘仆仆地来到了桐梓。

“莫老，莫非您有什么喜事？”张学良见莫德惠春风满面，颇感惊讶。

“当然有喜事，”莫德惠朝他神秘地一笑，“自由在望了！”

原来，迫于各界的压力，蒋介石提出了对张学良解除“管束”的三个条件。

“哪三个条件？”张学良急急地问。

“一是承认西安的事是上了共产党的当；二是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给你发的那封电报；三是自由后必须出洋。”

你想，我怎么可能接受呢？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前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又不是他们撺掇我捉的委员长。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不好，但有一条，我不撒谎，不做对历史不负责任的事！

至于第二条，这我就更要对历史负责了！其实，他要索回的电报何止一封？再说，电报现在不在我手里，也不在四小姐

手里，也不在于凤至手里。

第三条嘛，我张学良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逐出国门的道理！大概是他担心我出来后会重掌兵权，召集旧部，干扰他的军政吧？其实大可不必。我早就表示过，出去后，我可以不带兵，不问政，做个纯粹的闲人，他到哪里我就到哪里，甚至到大学里做个教书先生也行。如果连这点也见容不下，非要我出洋不可，那还我自由又有什么意义！

自由诚可贵，名节价更高。张学良不肯以违背真理和良心为代价来换取自由，断然拒绝了蒋介石的条件。

莫德惠在桐梓住了几天，不得不拖着沉重的脚步与张学良依依告别。

显而易见，在与共产党铁血较量之际，蒋介石对与共产党交了朋友、又始终不肯屈从于他的张学良，怎能纵虎归山、轻易还他以自由之身呢？

一九四六年九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官邸召见了新成立的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他阴沉着脸对郑介民说，张学良是同共产党交了朋友的人，他究竟适合住哪里，需要认真考虑。

不久，正在重庆处理军统局善后工作的张严佛接到郑介民的来电："委员长指示：张学良应即刻解到台湾去。已通知刘乙光与兄接洽，先把他解到重庆，候兄交涉赴台湾专机，然后由刘乙光负责起解。"

为免生意外，张严佛下令：有关张学良先来重庆后解送台湾的消息，一定要严加封锁，违令者按军法从事。

如何在张学良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将他秘密移往台湾岛，刘乙光同张严佛密谋策划，研究好了诱骗张学良转移的借口，并几经勘察，最后确定将重庆西郊歌乐山松林坡戴笠生前的寓所作为张学良在重庆逗留时的暂住地。

一回到桐梓，刘乙光便直奔张学良房中，激动地说："这次我到重庆得到了天大的好消息，委员长给重庆来电报啦！说让副司令和四小姐离开桐梓，先到重庆住上一阵，然后回南京去！"

"回南京？"张学良先是一愣，接着激动地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这么说，委员长终于想起我张学良了，终于要让我走出这深山古寺了！"

"委员长还有什么话？"倏地，张学良又转身向刘乙光问道。

"另外就是命令我和张严佛主任做好您的安全转移工作，不得出任何纰漏。我在重庆已经和张主任反复研究了，为您找好了住处。等您到了重庆，再请示南京何时赴京。"

"好，好！"张学良激动地连连搓手，"我已赋闲整整十年，就是按当初军法会审判的刑，也满期了，再不放我，委员长恐怕也不好交待了。你说，让我去南京是不是准备放我了？"

"我想是的，"刘乙光狡黠地一笑，"我和张主任都这么认为。"

"好，好，谢谢你给我带来了好消息。"张学良向刘乙光连声道谢。

我拥住赵四，激动地说："小妹，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张学良总算熬出头了！怎么啦？小妹？你难道不为这个消息感到高兴？你想得也太多了，小妹。十年期满，好多人都在为我奔走呼喊，他老蒋也不能不有所顾忌。再说，抗战胜利了，他的威望已经到了顶峰，十年前那点扫面子的事，再怎么说也被冲淡了。他没有理由不放我，不然，怎么会叫我们去南京？"

一个星期后，张学良一行离开桐梓，前往重庆。

张严佛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透露说："张学良由桐梓来重庆解往台湾的消息，对外封锁。因此，刘乙光押解张学良由



一九四六年冬，张学良被转移到重庆，住在歌乐山戴笠公馆。杨虎城也在此被囚禁过，并被害于此。现已辟为张学良、杨虎城囚禁生活展览馆。

贵州来重庆时，在重庆市三十里的九龙坡渡口过江，汽车不经过重庆市，以免被人发觉而张扬出去。”

下榻戴公馆的第二天上午，负责照料张学良在歌乐山生活的军统局上校组长侯桢祥、保密局副局长毛人凤和沈醉来到了松林坡。

当天，侯桢祥下了一番功夫，专门请了位北方名厨操持，美美地摆了一桌席，端上桌来的几乎全都是张学良喜欢的菜肴。张学良本不胜酒力，但在他看来，这是何等高兴的时刻啊！他频频举杯，与毛人凤、沈醉连连痛饮，不一会儿，便满脸通红。席间，张学良滔滔不绝，谈兴甚浓。

“别的我什么都不想了，”张学良说，“我只希望早日飞到

南京，见到委员长。”

为免张学良提出到重庆市区游览的要求，刘乙光同张严佛商量，决定用车轮战术将张学良稳在戴公馆，由毛人凤、沈醉、张严佛和重庆绥署二处处长徐远举等轮番前往松林坡“看望”。

张严佛还安排李觉夫妇去看望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李觉曾任过军长以及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其夫人何玫是原湖南省主席何健的女儿。一九三五年，张学良出任武昌行营主任时，李部归张学良指挥，说来也算是老部下。

李觉已有十几年未见张学良，一听他到了重庆，第二天便携妻子前往歌乐山。相见之后，不禁大吃一惊：当年年轻英武的少帅，如今已是鬓发花白，举止迟缓，略具老态之人；活泼秀丽的赵四小姐，也已变得消瘦憔悴，衣着陈旧，徐娘半老。李觉顿时心酸，何玫忍不住泪落两颊。

能在重庆见到昔日的部属，张学良自然很是高兴。李觉也以为此番蒋介石真要还张自由了，因此也陪着张学良着实兴奋了好一阵儿，说了许多宽慰的话。张学良高兴得呵呵直笑，连连说待安定下来，一定请李觉夫妇到家中做客。

“你以后看见芳波兄（刘多荃）的时候，告诉他要好好地干，将来我们还要在一起，大干一场！”张学良对李觉说道，重振雄风的志向溢于言表。

“将来不仅是芳波兄啦，我们大家都要跟随副座好好地干一下！”李觉也激动起来。

不久，张严佛匆匆来到松林坡，向张学良报告说：“飞机已经交涉好了，明日拂晓在离重庆六十里的白市驿军用机场起飞，直飞南京。”张学良信以为真，相当高兴。

看着张学良满心欢喜的模样，想到他在得知事实真相后会是怎样的一番心情，张严佛心里有些难受，忙退出屋来找到刘

乙光，传达毛人凤有关起飞前安全工作的指示。

“去台湾他有察觉吗?”刘乙光问。

“没有，”张严佛摇摇头，“毛人凤说，晚上他来这里给张汉卿饯行的时候再说，此事拖得越晚越有利。”

“跟在张学良身边的应副官是张学良的心腹，又和宪兵们厮混熟了，妨碍看管得很。”刘乙光对张严佛说道，“我不想让他跟去台湾，明天动身之前，你能不能找个借口把这个人给留下来?”

“我不知老兄是想把他打发走呢还是给扣起来?”

“当然要扣起来，”刘乙光凶巴巴地说，“他知道的事太多，放出去会对我们不利。你这里不就有看守所吗? 往里面一塞不就完了!”

“好吧，我同意，这就指示侯桢祥、庞进科去办，干脆就把他押在军统局渣滓洞看守所里吧!”张严佛答应道。

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在大溃败、最后撤离重庆时，狱中展开了大屠杀，应副官和共产党人及其他爱国人士，最终惨遭杀害。

在饯行酒会上，毛人凤端起酒杯，缓缓朝向张学良，说道：“汉卿，委员长方才来电，情况有些变化。”

“变化? 什么变化?”张学良正嚼着菜，一听这话，顿时愣住了。

“委员长说，不去南京了。”

“不去南京，去哪里?”张学良瞪直了眼睛。

“委座指示，明天的飞机直飞台湾。”

“啪”的一声，张学良一掌猛击在桌上，众人都吃了一惊。赵四小姐忙伸手拉住他，又取过一条湿毛巾，递到他的手上。

张学良虽然震怒不已，但他知道与看守人员争吵发脾气没有什么用处，也解决不了问题。他呆坐了一会儿，情绪安定下

来后，遂表示同意去台湾。

“什么时候走?”张学良竭力控制住自己，闷声问道。

刘乙光见毛人凤使了个眼色，忙站起身来，挺直身子开口道：“报告副座……”

“还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张学良猛地打断刘乙光道，说完，便再不作声，发痴一般地瞪大眼睛望向窗外。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日上午八时十分，驾驶员王赐九奉命登上座机准备执行飞行任务。这时，一对中年夫妇来到机旁，他眼睛突然一亮，猛地想起，这二人不是少帅张学良夫妇吗?西安事变后，登在报纸上的巨幅照片使张学良和赵一荻家喻户晓。

王赐九仔细地打量着张学良，只见他身穿藏青色中山装、明显地看出有好长时间没好好修饰了。赵一荻则紧紧地挽着张学良的胳膊，两人互相依偎着登上飞机。

八时三十分，飞机从白市驿机场腾空而起，穿云破雾，径直向东飞去。军统局随同张学良赴台的，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队副熊仲青和六名老队员。

飞机座舱中，张学良余怒未消。他紧皱眉头，不与人交谈，也不从窗口向外张望，只微闭双目，倚靠在椅背上，静静地思索着。

去台湾的消息确实来得太突然、太意外了，他一时还没有从这个打击中反应过来，眼中露出茫然的神情。这一次，他再次，也许是最后一次，因为轻信蒋介石而又吃了一回苦头。在老谋深算、轻诺寡信的蒋介石面前，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太幼稚了，太天真了，纵有十个张学良，又怎么斗得过这个用心叵测、翻云覆雨的委员长呢?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被囚禁了整整十年之后，蒋

介石还会对他再耍这么一个花招，将他骗出大陆，押往遥远陌生的一个孤岛。

回想起前半生的戎马生涯，虽然没有在战乱中丧生，但也未能为抗日战争出上力，作为军人，他深感内疚和遗憾。自"九一八"泣别了白山黑水，直至西安事变，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舍得一身剐，义无反顾，举行兵谏，逼蒋抗日，如今抗战胜利了，而自己却仍然不能获释，仍然没有自由！人间何世？公理何在?!

若是一个有威信、重信义、守诺言的政府，判处十年徒刑，也该期满释放了，可是现在，他的拜把子老哥执掌大权的当局竟又强迫他飞往台湾！自己何时才能"披甲还乡奏凯乐"呢？

此时此刻，悲怆之感直涌心头。

下午，飞机缓缓降落在台湾桃园机场。

"到了，副座。陈长官他们已在机场等着接您了。"

"陈长官？哪个陈长官？"张学良诧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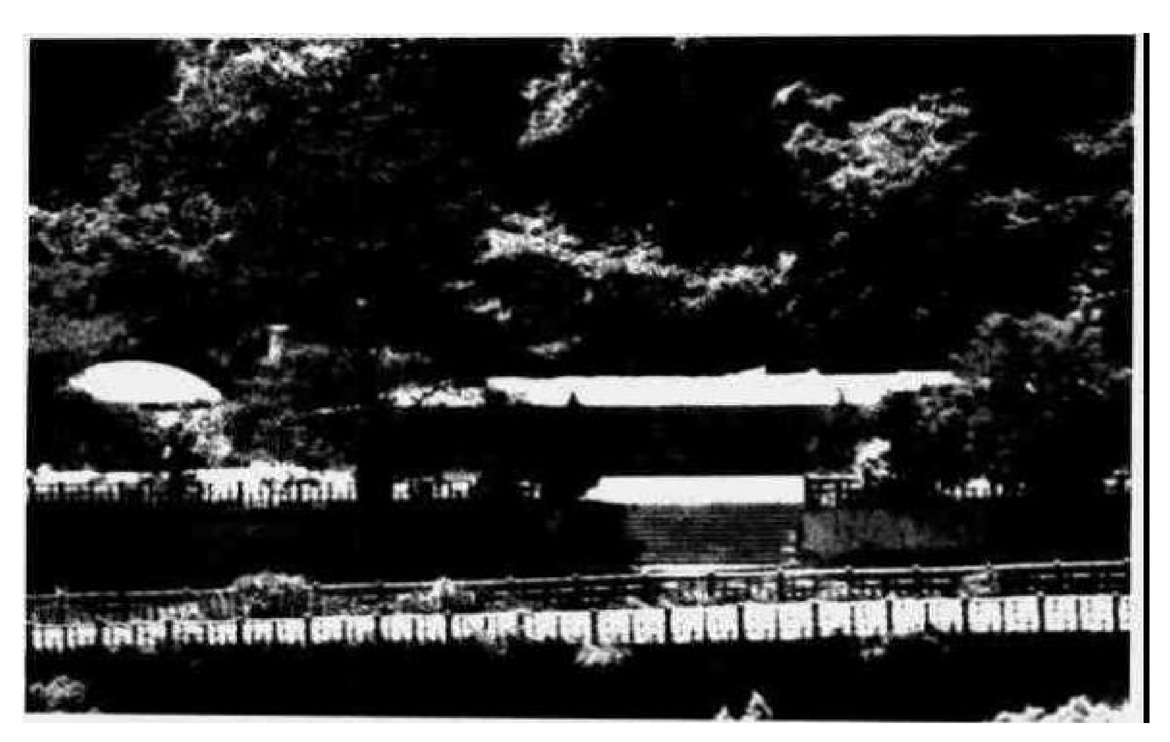
"是陈仪。他现在是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刘乙光答道。

在国民党中，陈仪也算得上是个老政客了。二十年前，他曾同张作霖有些交往，张学良与陈仪有过往来。

停机坪上，一阵寒暄之后，陈仪便将张学良让进自己的汽车，说："汉卿兄肯定没来过台湾。车开慢点，让我们边走边看看台北的市容。"

当天，张学良一行被安排在台北市北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由陈仪亲自陪同，前往精心选定的居处——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此处又称清泉。

张学良一见这里的景致，便有些喜欢，觉得与贵州桐梓的小西湖相比，皆为美景胜地，却也各有千秋。赵四小姐一下子



张学良井上温泉居住地旧址。

被山边盛开的野花和清清的泉水迷住了，当即蹲下身来，用手去拂弄温软的泉水。

“这几间房子光线好一些，走廊也宽，是专为汉卿和四小姐准备的。另外，我还从台北找了两个女佣人，专门负责照料你们的饮食起居。”陈仪指着几间外表装饰较好的房子说道。

“陈长官想得真是周到，谢谢陈长官的关照！”赵四感激地说。

“委员长有令，我陈仪哪敢违命。再说，我同汉卿的交情也不是一日两日了。以后有什么困难，请尽管说，过几日我还会再来看望你们的。”

陈仪走后，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便去看温泉。待他们回来，顿时目瞪口呆：先前陈仪特地指明给他们住的带有走廊的那几间大房，已经被刘乙光一家占了。

"四小姐，张先生，我想跟你们商量商量。我们一家人多，那边的房子住不下，能不能跟你们换一换？反正你们只有两个人……"刘乙光太太恬不知耻地说道。

一会儿，刘乙光回到招待所。张学良原以为他会斥责他的女人，或来道个歉，殊料他满脸得意地在那几间大房子里进进出出，毫无愧疚之色。张学良这才明白，占房子原来是他的主意，刚才他不过是借故躲开一会儿罢了。

抗战胜利之初，刘乙光以为蒋介石可能会释放张学良，因此，对张学良的态度显得特别恭敬。后来，刘乙光见老蒋压根儿就没有还张学良自由的意思，对他们的态度便渐趋恶劣，加之自己又是掌持"管束"大权的"少将专员"，言语举止也就放肆起来。

大约一个星期之后，陈仪又来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一见房间被换，大为窝火，拉住刘乙光便斥责一通，叫他立即把房子腾出来，让给张学良和赵一荻。刘乙光的老婆则嘟嘟囔囔，指东骂西，勉勉强强地搬了出来。

司机龚永玉回忆当年的生活状况时说：

"我是随车在十二月一日到清泉入队的。那时，他们从上海带来一部中吉普，我就开那车做采买工作。长官公署每月拨二十五万元招待张，通过区公所采办。'二二八'后，保密局不放心陈仪，就改由局直接拨款，自己来弄。当时，山上吃得很好，每四天买一次菜，猪半条，鸡鱼都是整箩筐地买，罐头是一打一打地买。那时用的冰箱，除了放冰块的外，还有一种点灯的瓦斯冰箱。

"当时我们与张先生隔离开来，他们住在东边，我们住在西边，都是榻榻米的木造房子。晚上六七点，张先生一定单独去洗温泉，杜副官在外面守着。上房原是为裕仁太子来台时所建，后为日警招待所，外面有樱花，背后是山，房前为河流，

河水很清澈，对面是个派出所。到竹东都是石子路，路很坏，车沟很深，只三十五公里，却要走一个多钟头。平常张先生就是到竹东、新竹的一些寺庙、精舍里走走，当时他还没信基督教。"

青山古树，淙淙溪水，使刚刚迁入异地他乡的张学良汹涌的心潮渐趋平静。

一九四七年元旦，南京中央政府公布了《大赦令》。但在《大赦令》中，人们找不到张学良的名字。周鲸文及东北人士，如莫德惠、万福麟等人聚集上海，乘此机会向中央政府请愿，认为张学良已被管束十年，应准予恢复他的自由。

正在这时，台湾爆发了武力反抗南京国民党政权的"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国民党缉查人员在查缉私烟时，用枪托打伤了一名卖烟的老妇人，又因枪机走火打死了一名无辜市民，台湾人民的反抗由此一触即发。他们呼啸而聚，攻打烟酒公卖局，殴打国民党派到台湾的官员，并意欲夺取兵器，与国民党军队抗衡。

当天，刘乙光便得到了通报，当即加强了对井上温泉的警戒。同时，刘乙光还接到台湾警备总部的密报，说是有人想趁乱营救张学良，并已派人到井上去查看过地形。他这一惊，非同小可！

原来，参与这次事变的吴克泰和一些有社会主义倾向的人，想趁事变混乱之机，救出张学良和赵一荻。于是，刘乙光将手下的二百名特务宪兵全副武装起来，实施紧急状态以应付事变：惟一入口桃山隧道被封闭了；电话也切断了；宪兵特务们在招待所四周层层布防，不分白天黑夜地来回巡逻；几个专门负责"照料"张学良和赵四小姐的警卫荷枪实弹，提着枪在屋门口来回走动，脸上露出阴冷可怖的表情，并不时地擅自闯

进屋内，窥探张学良的动静。

临近午夜，喧哗吵闹声渐趋平息，张学良正准备脱衣上床，外面的门却悄然被推开，一个平日同张学良相处融洽的警卫探进头来，神色紧张地说："副司令，你恐怕得有点思想准备。"

"出了什么事？"张学良连忙问，将几个解开的衣扣重又扣上。

"这几天台湾人闹事，还有人想趁乱把你从这儿抢出去。刘队长已经作了布置，说要是局面闹得不可收拾，他就对你采取紧急处置。"

"怎么处置？"赵四小姐惊恐地问。

"他想——把副司令和四小姐开枪打死。"

"他敢！"张学良怒不可遏，"打死我看他怎么向南京交待？"

"他说要是真的到了这一步，就向上面报告说是台湾乱民劫狱的时候干的。"

"这个刘乙光！""嘭"的一声，张学良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你放心，副司令，"警卫临走时小声说，"我们几个弟兄都说了，决不会让他伤着副司令的一根毫毛！"

"谢谢你，谢谢弟兄们啦！"张学良把警卫送到门边。由于惊讶和愤怒，他满脸通红，额上青筋鼓胀，两手也微微地颤抖。

"你想怎么办？"赵四小姐忧心忡忡地望着他。

"我还没想好，"张学良凑过身，从烟盒里取出一支烟，点燃后轻轻地吸了一口，一字一顿地说，"不过，与其等他杀我，不如我先杀他！"

"杀他？你怎么杀？"赵四小姐听了这话，吓得站起身来，惊恐地问。

“我有把握掌握得住特务队和宪兵的大部分人。他们知道我同委员长和夫人，还有宋部长有特殊关系，关键时刻他们肯定愿意听我的命令。要杀他容易得很，起码可以弄个同归于尽，我也不枉落个军人的死法。只是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用这个办法。”

“汉卿！”赵四小姐走过来紧紧挽住张学良的胳膊，“我听你的。人早晚会有个死，但不能死得憋气、窝囊。我不会给你丢脸的！”

幸好，刘乙光所担忧的民众劫持张学良的局面没有出现。但是，外界的紧张混乱情况仍没有结束。

我那时在山里住着，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知道是发生了事变。怎么知道的呢，没有吃的了嘛！没有法子。高山人对我们很不错，幸亏他们接济我们。那时，大家都吃蕃薯，就我一个人还吃点米饭。要是没有蕃薯，我们就会被饿死。在山里，通路都被封锁了，省政府的钱也来不了啦，那真是太严重了。

熬到三月四日，除了张学良每天中午可吃一顿米饭外，其他人一粒米也吃不到了。刘乙光的孩子、老婆饿得直骂娘。张学良见状，便把惟一的一顿米饭让给了刘乙光的孩子，和大家一样吃起山芋和蕃薯来。熬到第九天，山下的军队才上山和刘乙光取得了联系，送来了粮食等食品。至此，这场令张学良险遭杀身之祸的混乱终于结束了。

这时，刘乙光对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态度又有了很大的转变，不像事变期间那样冷酷无情了。当刘乙光主动来房内问这问那表示关心时，张学良冷冷地看着眼前这只“鹰犬”。

“刘队长，这一次你本应该立大功的！”张学良嘲弄地说道。

刘乙光听了，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支吾道：“这些天，形势紧张，有不周之处，还望副座和四小姐包涵。”

"刘队长说到哪里去了，这些天，多亏你关照了！"赵一荻说完，一转身便走了。

此后，井上温泉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二二八事变"，我认为还是蒋介石的责任。那时有一个厨师在我们这儿做饭，他说，要是蒋总统来台湾，我就在他面前吊死，我让他看看，政府是怎样蹂躏台湾人民的。对此事，我真是不服，这是历史的事，你能抹掉吗？谁能把历史抹掉？

台湾混乱期间，保密局对时局难以确切掌握，曾打算将张学良押解回内地，关押到江西兴国县阳明洞。刘乙光依命而行，已开始命人收拾行李、打包装车。但此时正值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之际，晋冀鲁豫冀、东北等地战火熊熊，各大中城市反内战呼声此起彼伏，国民党政权危机四伏，所以，郑介民的这个点子一经提出，当即遭到蒋介石的斥骂。

随后，郑介民传达了委员长的"口谕"：要对张学良作长期"管束"于台湾的准备。

第八十四章　温泉苦水

1947．5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

——“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了，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

——“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张学良被转送到台湾省新竹井上温泉继续幽禁。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月莫德惠曾两次访张。

“我数年来精神甚好，身体也还不坏，惟独眼睛有点花了。这，就是所谓过四十岁才觉得老的道理吧！也许是这几年来在菜油灯下看东西的关系……我的一切，请你们不用挂念，尤其是身体，我自己会照应自己的。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上说过，哪个混蛋才把会身体弄垮呢……”

这是张学良写给大姐张冠英的家信。情深深，意融融，体现了他与冠英大姐的亲情。

五月初，一直为释放张学良而奔走的莫德惠又获准到井上温泉探望张学良。这是莫德惠第二次来这里探望张学良。第一次是在三月份，他给张学良带来大姐的亲笔信。

手捧亲人的来信，张学良浮想连翩。他忘不了，当年母亲去世时，他年仅十岁，而大姐仅长他五岁，却亲自照顾他和弟弟张学铭的日常生活。如今，他已是四十七岁的人了，大

姐还念念不忘幽禁在台湾的弟弟。阅毕家书，他深为感动，热泪盈眶。与此同时，他对大姐的敬仰挂念之情油然而生。

如今，他乡再次遇故知，张学良兴奋异常，他急不可奈地拎着鱼竿，到河中钓了几条鱼，又挽起袖子亲自下厨，为这位他们“父子档”的朋友、东北政坛耆宿莫老烹调清蒸鱼、豆瓣鱼。

“没想到能够在台湾岛上吃到副司令亲手做的美味佳肴，南京、上海那些大师傅的手艺也不过如此，真是想不到哇!”莫德惠连连感叹。

“莫老想不到的，可能还多着呢，”赵一荻说道，“汉卿这些年不仅学会了烧饭做菜，还学会了植树种花，饲养小鸡……”

“那算什么，”张学良打断赵一荻的话，“人要活下去，办法是很多的。给你军队，你能带好兵；给你田地，你能当好农民；给你书读，你能成为一个称职的学者、教授。反正，不要辜负了一日三餐的白米饭就行了。”

“好啊，”莫德惠翘起大拇指，“大丈夫能屈能伸，贵可为帝王，贱可做布衣，一生一世都轰轰烈烈。”

接着，他又说：“在南京的时候，听人说，老蒋曾经夸你写的读书心得，说汉卿这些年闭门读书，学问大有长进。到这儿来一看，果不其然，满屋书香扑鼻啊。”

“莫老过奖了，”张学良谦逊地一笑，“前些年我在给老蒋的信中说过，我是想借着空闲，多读点书，长些见识。这几年读的书，都是历史方面的，主要集中在明史上，以后再涉及到清史、民国史。”

崎岖秀美的山道上，张学良和莫德惠各拄着一根手杖，缓步而行，边走边谈。两名警卫远远地跟在身后。

“我很想到某个大学去做一名历史教授，比如到台湾大学去教明史，或者到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去当个研究员。要不然，就学朱熹和王阳明，设斋讲学，培养弟子。”

“你还真的想成个史学大家啊，汉卿？”莫德惠颇感吃惊地望着他。

“真正的大家是鵰伯赞、王崇武、容肇祖这些人，他们写的明史书，让人佩服得很。将来若有机会，我真想向他们当面求教。”

我读历史所得的启示是：世间最有权威的人，是学术最为渊博的人，没有学术，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惟学术而已！

莫德惠深深地感到，张学良已几乎完全变了，与十年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前些天我作了一首五言绝句。诗不好，但却是我真实的心境写照。”张学良说着说着，便悠扬顿挫地颂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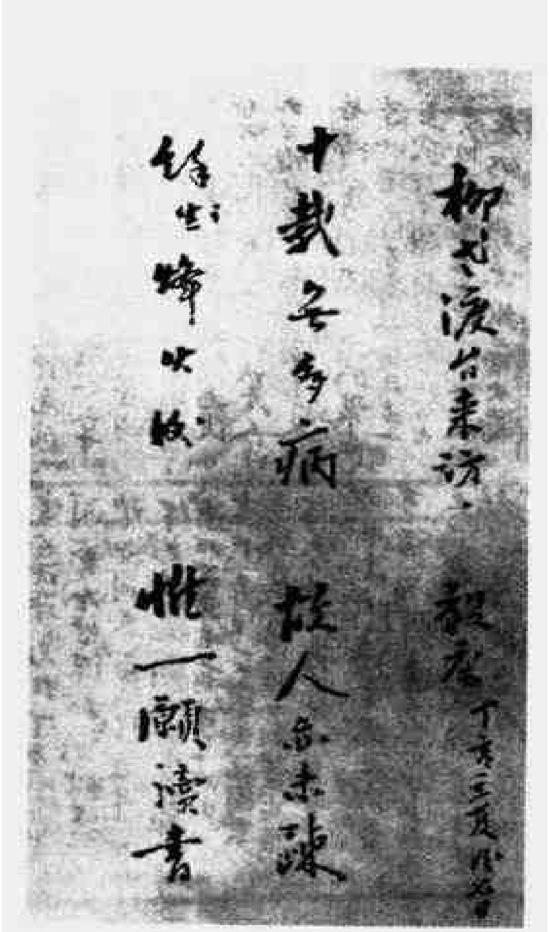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数日后，当莫德惠向张学良告辞时，张学良以“毅庵”署名，书此诗相赠。

莫德惠在井上温泉逗留了一个星期，每天不是陪着张学良游山、钓鱼，便是同他一起到温泉洗浴，在家中打牌，或到厨房里烹调菜肴，但说得最多、议论时间最长的，还是张学良孜孜不倦攻读的明史。

五月十二日，张学良、莫德惠和赵一荻三个人在网球场横网前的合影冲印出来了。莫德惠望着三人合照，爱不释手，请张学良题字。张学良欣然应允，挥毫在照片上写下“网球作戏，于台湾井上温泉，柳老纪念”，落款为“毅庵，民国卅六、五、一二日”。



张学良赠诗《柳老渡台来访》。

网球场上。左起：刘乙光、赵一荻、张学良、莫德惠。



莫德惠临走时，张学良托他给大姐冠英捎去第二封回信。他在信中写到：

首芳大姐：

您的四月卅日的信和照片十张，附函两封，俱已收到。孩子们都已婚嫁，姑老爷亦都不错，闻之欣快。您已五十之人，亦可以了却一桩心愿了。上次莫先生走时，我得写几十封信，把我写得头晕，所以给您的信写得有些简略，现在详细说一点……我现在想托您办一件事，如果您去北平，您给我买一部好版大字的《明史》来。也许西安旧书铺里有（南辕门街有两个旧书店，很不错），如果您买到，千万用油纸包好，打箱或用他法，总之别叫它受湿，或污，或破了。我非常需要一部大字《明史》，我眼花了，开明版的《明史》我看起来太费力了。如果《明史》能在西安买得到，不一定要好版，大字就可以。我很需要，等着看，并且要在书上胡批胡写，所以纸张不可要太破的，一碰就会破的。注意是《明史》，可不是《明史纪事本末》或《明纪》、《明鉴》等等。或者商务印书馆百衲本的，中华书局四部备要版的，那都十分合用。

四小姐附问候

弟良手奏

五月廿日

莫德惠自台湾归来后，提供照片，由玫玉写了一篇《张学良在台湾》的文章，发表于当年六月上海艺文书局发行的《艺文画报》第一卷第十二期上。

这是张学良被囚十年来，第一次有消息和照片公开传出。人们这时才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爱国将领张学良仍然身遭不

幸，竟被囚禁在遥远的台湾岛上。

这时，保密局局长郑介民令张严佛到台湾去暂代刘乙光。张严佛曾在“西北总部”代理过由戴笠挂名的机要组第二科科长，当年与张学良相处得不错，说来也算是张学良的老部下。

“张学良现在台湾新竹县井上温泉，他同刘乙光关系搞得不好，”郑介民对张严佛说，“而刘乙光的老婆又有神经病，夫妻吵闹。这个女人，同赵四小姐也处得不好。刘乙光已经把她老婆送到台北市医院去了，他要求请假一个月到医院去照料病人，也想借此休息一下，缓和他和张学良之间的空气。你与王新衡过去和张学良关系不错，但王新衡现任上海站站长，无法抽身，现打算派你去陪同张学良住一个月，并对他进行考察。”

对此，张严佛曾撰文回忆说：

“这实际是派我去接替刘乙光看管张学良，怕我不肯去当看守，故意说得好听一些罢了。当时，我这个空头设计委员会主任正无事可做，又跟毛人凤呕气，闷得慌，借此机会到台湾去一趟也好，于是我就答应了。郑介民叫总务处处长成希超准备了美国货‘加利克’牌香烟一巨听、白兰地酒一打以及其他食物，作为郑介民和我的礼物送给张学良。我由上海坐飞机先到台北市和刘乙光见了面，第二天坐火车到新竹，然后坐汽车进入山区，到了井上温泉张学良被监禁的地方。

“我到后的第二天，刘乙光就赴台北市休假去了。关于看守警卫张学良的日常工作，我叫刘乙光交给他的一个助手多负实际责任，以便我能腾出工夫来和张学良攀谈，进行考察。

“刘乙光暂时离开了，换上了一个伪善者，张学良觉得思想上稍微轻松了，也显得比较高兴一些了。刘乙光走的那个晚上，我在张学良房间里，他当着赵四小姐，仿佛满肚子幽怨，都向我尽情倾泄了。他谈到了十年期满仍然关押不放，也谈到了十几年的囚禁生活，受尽了刘乙光夫妇的百般凌辱和精神虐

待，含冤抱屈，无处申诉，无理可说，几乎一字一泪，痛哭不止，赵四小姐也坐在一旁揩眼泪。当晚，我们谈到深夜，足有四五个钟头。

“第二天早饭后，我又到张学良房间里去，他用毛笔在信纸上写下了夜里他自己作成的一首诗交给我，他说：‘你这次来算是难得，这首诗就留作纪念吧！’诗是这样写的：

山居幽处境，旧雨引心寒。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上款写‘严佛兄存念’，下面写‘张学良敬赠’。”

从第二天起，张严佛几乎时时同张学良呆在一起，转山、游泉、打球、论史，倾听着他对长期关押的不满和对刘乙光夫妇种种劣行的斥责。

后来，张严佛著文回忆说：

“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张学良同我所谈的话，已经记不完全了，现在，我把印象深一些的写出来。

“张学良说：‘西安事变，为了制止内战，为了抗日，我没有错。我不该扣留委员长，判刑十年，无话可说。但十年期限已满，如今抗战胜利了，日本人都投降了，还把我关下去，这是什么法律？这样对待我，无论如何，是非法的。我心中不平。希望你回到南京把这些话告诉郑介民，就说我要求你转达的。’

“‘老戴、老宋当初都对我说，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修养，研究学问，派刘乙光是保护你的，为了你的安全，不得不如此，你尽可以在屋子里看书，也可以到外面去散步、打球、游泳、钓鱼，刘乙光不得限制你。我相信老戴他们的话，不应该是骗我的。’张学良愤然道，‘但十多年来，刘乙光却把我张学良看作是江洋大盗，惟恐我越狱逃跑，又怕我自杀，处处限制我，给我难堪，不管我受得了受不了，他要怎么干就怎

么干，实在做得太过分了。我们一到台北，陈仪主席陪我们来到这里，他当着刘乙光的面对我说，这个地方是委员长来电叫他找好的。我现在住的几间房，光线和建筑都比较好，外面有宽阔的走廊。因为我不好随便到外面去，有了走廊，早晚可以散步，也可以看画报，免得刘乙光他们时时为我操心，也不很好。而现在刘乙光一家住的那几间房，背着太阳，比较阴暗。陈仪交代刘乙光说，光线好的房间，给我住，刘乙光满口答应了。但陈仪走后，一转眼间，刘乙光就变了卦，他夫妻儿女占住了我现在所住的这几间，硬叫我和四小姐住到那边房，还有什么可说的？我只好忍受了。幸而不几天，陈仪又来看我，他觉得刘乙光做得不对，便逼着他再把这几间房让给我们住。'

"'初来的时候，有两名下女，陈仪雇来照料我和四小姐的，可是不几天，就被刘乙光打发走了。十几年来，夫人（指宋美龄）和亲友送给我的东西，经常被刘乙光夫妇克扣，有时被截留一半，有时竟全部被没收了，与来信所写的对不上数。刘乙光公开大胆地这么干，被我们发觉了，他仿佛没有这回事，毫不在乎，我怕为了这些小事和他们夫妻闹翻了，更受罪，只好不作声。'

"'我们每次吃饭，刘乙光一家六七口，大的十几岁，小的一两岁，都同我们一桌，他们吵吵嚷嚷地抢着吃。这些事不值得一谈，可是搞得太脏了，我同四小姐几乎每顿都吃不下饭。刘乙光的老婆有时还指桑骂槐地骂小孩，而暗地里却是在骂四小姐。可好，你来了，刘乙光一家暂时离开了，我们也可以吃几顿清爽饭了，你看这样好的菜饭，难道是专为刘乙光一家预备的吗？这些，十几年了，我都向谁说去？'

"张学良又说：'今年二月，台湾人闹事，刘乙光也紧张起来了，那几天，他恶狠狠地盯住我，好像要把我吃下去，话都不和我说了。他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加倍警戒，如临大敌，

宪兵特务来回不停地在我屋子周围巡逻，并向室内窥伺动静。夜深了，我还听到刘乙光同他的部下时而嘈杂喧嚷，紧急集合，时而又蹑手蹑脚地窃窃传话，总而言之，是一种应付非常事件的可怕现象。就在这个时候，刘乙光的部下和宪兵方面有人偷偷告诉我说，刘乙光已经作好了准备，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的时候，为了防止我越狱逃跑和台湾人民把我劫走，他就采取紧急处置，把我和四小姐开枪打死，对上面报告则称台湾乱民前来劫狱所为。我实在不甘心。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说鬼话，刘乙光的部下与宪兵有大部分人我都掌握得了，他们都会听我的话。'

"'那几天我老盘算，如果刘乙光真要对我下毒手，我是引颈就戮呢，还是我先下手把刘乙光杀了，或者同归于尽，这都是我所极不愿意的，我张学良就这样的下场吗？准备在混乱中把我打死？幸而台湾事变几天就平息了，否则，真难说我今天还能够同你在这里见面。'

"张学良说完这段话，心情十分激动。我看他对刘乙光恨极了，也看不起刘乙光。

"'你凭什么可以掌握刘乙光的部下，他们同你通声气，刘乙光能蒙在鼓里？'我反问张学良。

"张学良觉得说话走了口，有些后悔，于是他又说：'像刘乙光这个蠢才，他平日待部下那样刻薄，一味死扣，加上他那个又蠢又恶的老婆，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两个人都那么狠，还能够得到部下心服吗？我张学良真要同刘乙光拼，我还拼不过他？这里面的情形，我不应再向你说下去了。我想你能够相信我的，我张学良决不是因为有了刘乙光看管我，才不敢越狱逃跑，才不寻什么短见！碰上了刘乙光，不过多受些闲气，本来就算不得什么。我不把你当部下，你还有你的身份，算我们还是朋友吧，过去的事不过向你说说，消消气算了吧！'"

以上是张严佛抵温泉后，张学良向他倾吐的苦水，多年压抑在胸中的郁愤，今日可谓是无所顾忌，一吐为快。

张严佛听完张学良诉说后，长长地“唉”了一声，说：“汉卿，你别跟刘乙光一般见识。你是什么人，全中国谁人不知？他刘乙光算得了什么？千万别因为他伤了你的身子。”

此后，张学良又同张严佛谈论当前的局势。

“现在就是明朝末年那个样子，大势已去，人心全失，政府官吏和带兵官都是暮气沉沉的，积习太厉害了，我看已经无可挽回，老百姓实在太苦了。”张学良评论说。

那时，正当陈诚到了东北。提到陈诚，张学良就非常厌恶，他说：“陈诚到东北去，等于火上加油，更糟。东北的颓势，决不是陈诚可以挽回得了的。”

张严佛还回忆说：

“张学良不止一次和我谈到了陈仪，他说：‘到了台湾后，陈仪看过我几次，对我非常关切，他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向来是敬重他的，我看他比较正派。’一九四七年二月台湾人民起义时期，省府主席为陈仪，但我到台湾后，从各方面了解到，台湾人民并不恨陈仪，而对于执行血腥镇压的台湾警备总司令彭孟缉，则恨之入骨。当时台湾民间有这样一种传说，‘一代不如一代’，指的是魏道明不如陈仪，而陈仪又不如日本人。我到台湾的时候，正是魏道明接替了陈仪当台湾主席。因此，张学良同我谈到了魏道明。他说：‘魏道明是一个十足的傀儡，他完全受他的老婆郑某的摆布。很多人知道宋美龄受孔祥熙老婆宋霭龄的操纵而在幕后左右政局，却不知道郑某还在幕后操纵宋霭龄。’

“我在井上温泉的时候，张学良还和我谈起了他的四弟张学思：‘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十期生，当时军校教育长是张文白，因此，老四是张文白的学生。’他还说，‘我相信老


张学良在台湾井上温泉留影。

四，他是有前途的。’张学良以十分关切和怀念的心情不止一次同我谈起了张学思。”

张严佛最后回忆说：“我在井上温泉一个月，同张学良谈作诗，谈明史和历史上的人物，也同他打网球。他的饭量少得令人吃惊，经常每餐大半小碗，最多一小碗，饭后吃水果则特别多。他几乎完全秃头了，牙齿不很好。赵四小姐的牙也不好。一九四七年，张学良不过四十七岁，看来他的身体在长期囚禁生活中，已经拖得很坏了。”

张严佛同张学良的谈话，常常是海阔天空，信马由缰，令他甚感吃惊的是，无论对什么话题，张学良都能侃侃而谈，而且常常是智语迭出。尤其是对政治上的问题，他原来以为张学良不会轻易谈，要谈也只会是轻描淡写，没料想张学良谈兴最

浓的就是政治，分析评点起来头头是道，入木三分。

张严佛不由得想起在南京时所听到的传闻：蒋介石在听完各界人士要求还张学良以自由的请求后，阴沉着脸未置一词，良久，才冷冰冰地说了一句："虎放出来是要伤人的。"看来，老头子的话真的没有说错。

张学良的确是只虎，虽然虎囚笼中，然而虎威未灭，要是重还他几十万大军，他一定能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再上演一幕轰轰烈烈的大剧来。

关于张严佛的回忆文章，台北的作家郭冠英曾亲自登门拜访了刘乙光的儿子刘伯涵。刘伯涵回忆说：

"由于到处移居的关系，我与邱秀虎、龚国彦、周养浩、张严佛都很熟。张严佛与我父亲非常熟稔，但他在大陆写的东西却不甚公正，话一讲偏了，常常真相就扭曲了。事实上，上面对张先生的生活起居是非常关心优待的，老总统、蒋夫人、宋子文、戴笠都常有关切、馈赠，住的地方都是他们选的环境良好、风景清幽之地，且常交代我父亲要好好招待，善加保护。要说我父亲敢擅自克扣虐待，是不可想象的事。

"就以同桌吃饭一事，我们与张先生同住一屋的两头，是戴先生决定的，他是想希望我们家人能陪伴张先生与四小姐，分享点家的温暖，也可以让我父亲因携眷而安心工作，所以，凡到任何地方，上面都拨有安家眷的经费。

"有很多人都写张学良的幽居生活片断，包括许颖、邱秀虎、张严佛、张治中、沈醉，其中甚多提到我父亲，毁誉参半。有些写的是事实，但有些或许迫于在大陆共产党统治下的环境，许多事实都扭曲了，把我父亲写成了一个恶劣贪鄙的人，一个无人性、寡情的牢头，把张先生折磨得落发掉牙、苦弱不堪，其实张先生身体一向健壮，我看了实在啼笑皆非。

"就以'二二八'来说，当时情况紧张，我父亲是做了些

保护措施，后来张严佛就说我父亲准备要杀张先生。但据我弟妹说，当时张先生常走到他们的房间里来安慰说，要他们小孩子不要怕，听到枪声不要出去，要躲好卧倒以免为流弹所伤，真是关怀备至，安危与共，哪里会有如外传的那种不快呢？

"张严佛说张先生对我弟妹们的同桌吵嚷感到不快，但我们从未见过张先生面现不悦之色，他似乎很高兴与我们聚在一起。这种生活小事只需一句话就可改善的，但是他却顾及我们的情面，隐忍不发，可见张先生的修养耐性都是很高的。难怪他对上面从未发出怨言，宽宏静心地度过那些幽居岁月．或许宗教力量对他的影响也是很大的。

"可能在三十八年前后，张先生有忧烦的时候，但是每次见到我们弟兄回来，他还会高兴地跑到厨房中弄点好菜来给我们吃，又常送点好用的小东西给我。我想，一时的怨气不满可以暂时忍耐，但长年久日掩饰喜怒、伪装情感是很难办到的，尤其是以张先生率真的个性，更不可能。他那些发自真情的关爱，而且持续十多年，我们是永不忘记的。

"跟着张先生一辈子的杜副官，对张先生极为忠心，他身体高大，武术很好，又会讲故事，他有时教我们打拳，有时讲'济公传'给我们听，我们兄弟都很喜欢他。但我爸爸因职责关系，反不得不防着他点。有一天杜副官在温泉中洗澡，听到旁边水声哗啦，以为有人同浴，他还打招呼，但久未回话，定神一看，原来是一条大蛇，吓得他连衣裤都没穿就跑出来了。武林高手被蛇吓，事后成了笑谈。后来杜副官年老，张先生送了他一笔钱，让他在观音山养老。张先生对部下是很宽厚的。

"我父亲一生的精华都在陪伴张先生，忠义廉节，两袖清风。那段时光也是我们全家最值得回忆的岁月，张先生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张先生的历史功过自有定论．但他的爱国心却是绝对值得肯定的。我们永远记得那山中的张学良。"

第八十五章 文白造访

1947.10

——“文白兄，我觉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没什么。只要国家不打内战，能统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

——“我希望与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因为刘的家眷既吵又闹，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我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

——“地方倒是好地方，可是不属于我张学良。平时我也难得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四小姐在这屋子里看书。”

总府远来义气深，山居何敢动佳宾。

不堪酒贱酬知己，惟有清茗对此心。

这是一九四七年十月张学良在井上温泉幽居时，赠来访的

挚友张治中的一首七绝。

“我同张汉卿早先并不认识，是在他一九二八年易帜以后才相熟的。”张治中回忆说，“我喜欢他说话爽快，待人热诚。他也很看得起我。他每次到南京，我们都有往还，后来就成为很要好的朋友。在西安事变以后，我钦佩汉卿的胆量义气，并同情他的遭遇，所以一有机会总想去看看他。从一九三六年底汉卿被拘之日起到一九四七年这十年间，我看过他三次。”

西安事变发生时，张治中正在苏州秘密制订京沪地区的防御计划，闻讯后立即赶回南京。

二十七日中午，张治中听说蒋介石一下飞机就发表了《对张学良、杨虎城训话》。从表面上看，蒋介石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但从话语中，不难听出背后潜伏着杀机，他从心里为张学良的安全担心。于是，他驱车直奔宋公馆看望张学良。

当时，宋公馆警戒森严，张学良实际上已遭软禁，他本人似乎也有所觉察。此刻，他正独自在屋里，一边吸烟一边思考，表现出很不安的样子。突然，房门被敲了几下。门开了，只见宋子文乐呵呵地说：“汉卿，你看谁看你来了？”

“文白兄，是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张学良定神一看，满怀惊喜地迎了上去。

两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热情地相互问候。

“文白兄，我希望能早点回西安，那里情况极端复杂，我不回去，是一定要发生乱子的。”寒暄之后，张学良直言道。

“是的，汉卿，不过你刚到京，还是暂时放宽心，免得影响健康。”张治中安慰说。

“蒋委员长已经答应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打日本鬼子，我们非团结起来不可，非好好地准备不可。现在日本人步步进逼，形势危急，我也非早日回去不可。西安的事情，临行前虽然委托给虎城全权代理，但终非长久之计，请文

白兄向委员长转达我张学良的要求，早作决定。”张学良言语之间，充满激情。

“抗日是没有问题的，全国军民都是这样想的，政府态度也已明朗了，再说委员长也有诺言，不过事关重大，不是短时间所能决定的。”张治中宽慰道，并向张学良表示，一定把他的意思代转给蒋委员长。

“有些话我也不好明讲，只是空话安慰他一番，即告辞而别。”张治中后来回忆说。

这时，张治中已从有关方面了解到，蒋介石已决定不放张学良返回西安。但由于“京中空气甚不良”，即使是张学良平时最要好的朋友，也不敢站出来为他说话，退一步讲，即使说也无用。而张学良本人则对即日返回西安充满信心，这就更使知道内情的张治中深为不安。

几天后，南京便开庭“审判”了张学良，接着，便开始了漫长的“严加管束”岁月。南京一别，两人再也无缘相会，张治中也无法向张学良表达自己愧疚的心情。多年来，每当他一想起张学良，眼前就总浮现出在南京分别时，他那充满希望和热切期待的目光……

“第二次会见是一九三八年九月间。”张治中回忆说，“那时抗战已爆发年余，武汉正在吃紧，我在湖南省当主席，张汉卿就被拘禁在湘西沅陵县城隔河的一个寺庙里。我因到湘西去视察，所以特意到沅陵去看他。”

张治中要来沅陵凤凰山的消息，张学良头一天便得知了，心情分外激动。第二天一早，他特意叫于凤至为他找出已许久未穿的西装，又郑重其事地系上一条蓝底白点的领带，早早便来到寺外的山坡上，向远处眺望。

“呀！你就像在盼等远道而来的情人。”于凤至忍不住开玩笑道。

"岂止是情人呢！"张学良笑着回答说，"文白兄是我的旧友和知己，好久未得一聚了。他现在是抗日名将、省主席，我正要听听他给我讲外面的形势，我也可以向他谈点儿我的心情，这岂是情人能够办到的？"

正说话间，身穿米色中山服的张治中已经来到寺前。

"文白兄，文白兄！"张学良疾步上前，口中连连呼唤，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张学良觉得还不尽意，又抽出手，纵身搂住了这位分别已久的老友，激动地说，"总算是把你这位父母官盼来了！"

"你这尊大佛到了湘西这块小庙，我还敢不来？只是太忙，一直抽不出身来看你。为兄的请罪了。"张治中亦分外动情。

走进张学良卧室，张治中看了看墙上的题诗和桌子上的文稿、书籍，高兴地说："汉卿，你总算宽下心来，我很高兴。你潜心研究明史，这很好，若需要什么资料、书籍，我一定帮你找。"

"我在这儿无所事事，可谓是两耳不闻山外事，一心只钓沅江鱼。"张学良听后，只是苦涩地一笑，"快给我说说，现在抗战局势怎样了？武汉能不能守得住？"

"唉，没想到日本一个弹丸小国，竟然会置我堂堂中华民族于万难的境地。"张治中长叹了一声，说起了日军占领开封、郑州、合肥、安庆、湖口，又进逼武汉的情形，然后激愤地说："我们的牺牲实在是太大啦！六月份，为了阻止日军的攻势，委座亲自下令炸了黄河铁路桥，又扒开了花园口黄河大堤，淹了豫、皖、苏三省四十四个县，淹死八十九万老百姓，数百万人流离失所。但日军却没有被挡住，改而利用长江水运，溯江进攻武汉，气势凶猛得很呢。"

"武汉可不能再丢了，不然，民众的抗日决心会受很大的影响。"张学良忧虑地说。

“汉卿所言极是，我担心的也正是这个。倘若武汉真的失守，日军必沿粤汉路南下，进攻长沙，完成对我东南半壁的包围态势。我这次来湘西，就是要看看地形，如果日军犯湘，好组织抗击。”

“文白兄在湖南主政，不知现在整个湖南的形势如何？万一日军犯湘，你有什么打算？”

“湖南现在乱得很，老百姓人心惶惶。”张治中忧虑地说，“很多人的眼光都盯着武汉保卫战，想等着那里的胜败再定进退。我呢，是想从最坏的情况着手，提早做准备。湖南山多林多，适合打游击，如果日本人打进来，我就把队伍拉上山。”

张学良口若悬河地说：“抗战一年多了，全国军民都踊跃参加，我身为军人，反而旁观坐视，实在憋不住了！对我来说，这是国难家仇，我怎能忘得了皇姑屯事件，我怎能忘记九一八事变！我的部属望着我，全国人民望着我，他们哪能不问：张学良到哪里去了？

“国家正是有事的时候，为什么老把我关在这里？我希望能早日恢复自由，为抗战做点事情，不论做什么事都可以。

“我张学良纵有欺天之罪，也应当让我到战场上去戴罪立功啊！当初在西安放他之前，他对我信誓旦旦，要我领导好东北军，整肃军纪，准备抗战。可现在，把我抛在这个远山古寺里，就不闻不问了。”

张治中对张学良的一席话只能表示同情，却无能为力，只好转换话题，问起张学良的身体情况。

“你看，我的身体是不错的，为了抗战，我打篮球、划船，锻炼身体，参加抗战是没有问题的。”张学良对张治中说。

正当张学良慷慨陈词之际，刘乙光前来通知吃饭。

午餐是“鱼宴”，几乎全是用张学良钓来的鱼做的菜。两人吃得很尽兴，好久已不饮酒的张学良还陪着张治中连饮了三

杯。

“文白兄，我有一事相托，不知会不会使你为难?”

“你有事尽管说好了，汉卿，我们之间哪还用得着客气!”

“我想请你在见到委员长的时候，转达我希望参加抗战的要求。”

“这是自然，你不说我也会向他讲的。不过……”张治中略为沉吟，说，“为了引起他的重视，我看你最好再给他写封信，我在陈述时一并交给他。”

张治中回忆说：“张学良立即写了一封给蒋的信，写得很简单，除问候外，只说有许多话，希望能见蒋一面，当面陈说。”

午后，张治中起身告辞，张学良夫妇送他走出寺庙。在门口处，两人又合影留念。

“此番一别，又不知何时才能相聚!”张学良紧紧地握住张治中的手，动情地说。

“我看用不了多久了。”张治中尽量做出高兴的样子，“也许再过三两月，你我便会重逢于抗日前线呢!”

两张热泪盈眶，久久相视，依依惜别。

“我回长沙后，把张学良的信立即转给了蒋。”张治中回忆说，“蒋没有给我回话，我想蒋更不会直接回答张汉卿。”

此次在井上温泉相会，是张学良被囚禁后两张的第三次会面。

“当时我当西北行辕主任，在为新疆问题极度紧张工作之后，去作休假旅行，到了台湾。”张治中后来著文回忆说，“张汉卿那时关在台中新竹。当时台湾警备司令彭孟缉是我的学生，我到台湾后即向彭提出要去看张汉卿。彭很犹豫，不敢答应。我当即对彭说：‘一切责任由我负，不会连累你。’彭才勉强答应。

“一九四七年十月三十日清晨，我带着我的妻子、女儿一家人搭火车到新竹，再改乘汽车去看张汉卿。汉卿住的地方叫井上温泉，距新竹约有两小时汽车的行程。公路在山谷中蜿蜒而上，风景别具一格。刚走不远，就遇到一个宪兵分驻所，有几个宪兵走出来盘问。经放行后，不久，汽车就在一个木桥旁边停下，司机说：到了。我们下车走过大木桥，上了一个小坡，就见一个大木牌，上书‘井上温泉’四个大字。再上一级石级便是张汉卿住处。他住的是一所平房，四周全是山，屋旁有一个温泉，风景林木很幽静，附近没有居民居住。我们是上午十时到的，张汉卿已预先知道，早已站在院子里迎接了。”

“汉卿！”张治中一走进院门，就看见了张学良，迫不及待地喊道。

“文白兄，真的是你来了！”张学良欣喜万分。

自沅陵凤凰山一别，弹指已八年了，如今能在台湾的深山中重逢，两人心情异常激动，紧紧拥抱在一起，眼眶都湿润了。

“我这次同他见面，觉得他比从前瘦了许多，也苍老了一些，眼睛显得比以前小了。据他自己说，因为眼睛有毛病，看书很费力。”张治中回忆说，“那时，陪同他住的是赵四小姐，我的家属由赵四小姐陪同出去游玩，只有我们两人留在屋里谈话，我们谈得很痛快。”

“汉卿，你显老了。”张治中望着他两鬓的白发和头上的秃顶，伤感地说。

“是啊，我是‘乡音未改鬓毛衰’哪，连我自己都不敢照镜子了。不仅我不敢，连四小姐也不愿往镜子面前站。一看见自己现在的模样，心里就止不住发酸。”张学良长叹了一声，说道。

“你还是要看开一些，”张治中安慰道，“现在形势变化很



一九四七年十月，张治中到井上温泉看望张学良时两人合影。

大，政府内外都有多人在为你的自由奔走呼吁，蒋先生不会看不到这一点。”

闻听此言，张学良心中略感宽慰。随即，他们谈到了国共两党的情况。

“文白兄对时局发展怎么看?”张学良关切地问。

“常言说，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我看是大厦将倾了啊。”

“真有这么严重吗?”张学良虽有同感，但仍禁不住地问道。

“事实上比我刚才说的还要严重，”张治中接着说，“政府中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风与日俱盛，发财的发财，刮地皮的刮地皮，将领们贪功诿过，喝兵血有如狼蝎。这些人怎么治得了国，打得了仗?!”

“那我的自由更是遥遥无期了。”张学良脸上露出深深的哀戚。

“我倒不这么看，”张治中说，“战火终有平息之日，国内总有一天要实现和平。”

“不知这仗还要打多久啊，”张学良侧脸看着墙上的地图，“国家实在是经受不起了啊。”

“汉卿说得在理，”张治中连连点头，“国内总是要和平的，国共终究是要恢复和谈的。依我之见，国共和谈成功之日，即你恢复自由之时。”

“若文白兄这番话能实现，则学良之大幸矣!”张学良脸上漾溢起笑容。

午饭时，张学良显得兴致勃勃，不停地同大家说笑，介绍当地的风情和高山族的生活习惯。午饭之后，张学良和张治中继续留在书房里晤谈。

“文白兄，我觉得自己受幽禁、受屈辱没什么。只要国家不打内战，能统一，人民生活得幸福，我再受苦也值得。我张学良当年把东北军带到青天白日旗下，图的就是这个，从没有想到个人的荣华富贵。现在，我的东北军也瓦解了，我也不想

再重掌兵权了。我只托文白兄向委员长提出两点要求：第一，我希望恢复自由，做一个老百姓，什么事也不做，哪里也不去，委员长在哪里，我就住在哪里；第二，我希望与刘乙光一家分开住，因为刘的家眷既吵又闹，和他们在一起，生活十分不方便。我希望有一定的自由和清静。这两点，请文白兄一定转达到。”

“汉卿放心，我一回南京，就去见蒋先生和夫人，转达你的要求。”

接下来，两人的话题又转到了东北的战事上。

“如果这次国军在东北战败，你张学良是有责任的哦。”张治中看着张学良，一本正经地说道。

“仗是陈诚、杜聿明、范汉杰那帮人打的，意图是他老蒋定的，战败了跟我有什么关系？”张学良一愣，不解地问道。

“当然有关系。因为共军第四野战军林彪的麾下，有位纵队司令叫张学思。”张治中神秘地一笑，说道。

“原来如此！我还不知道我的四弟已经当上共产党的将军了！”张学良哈哈大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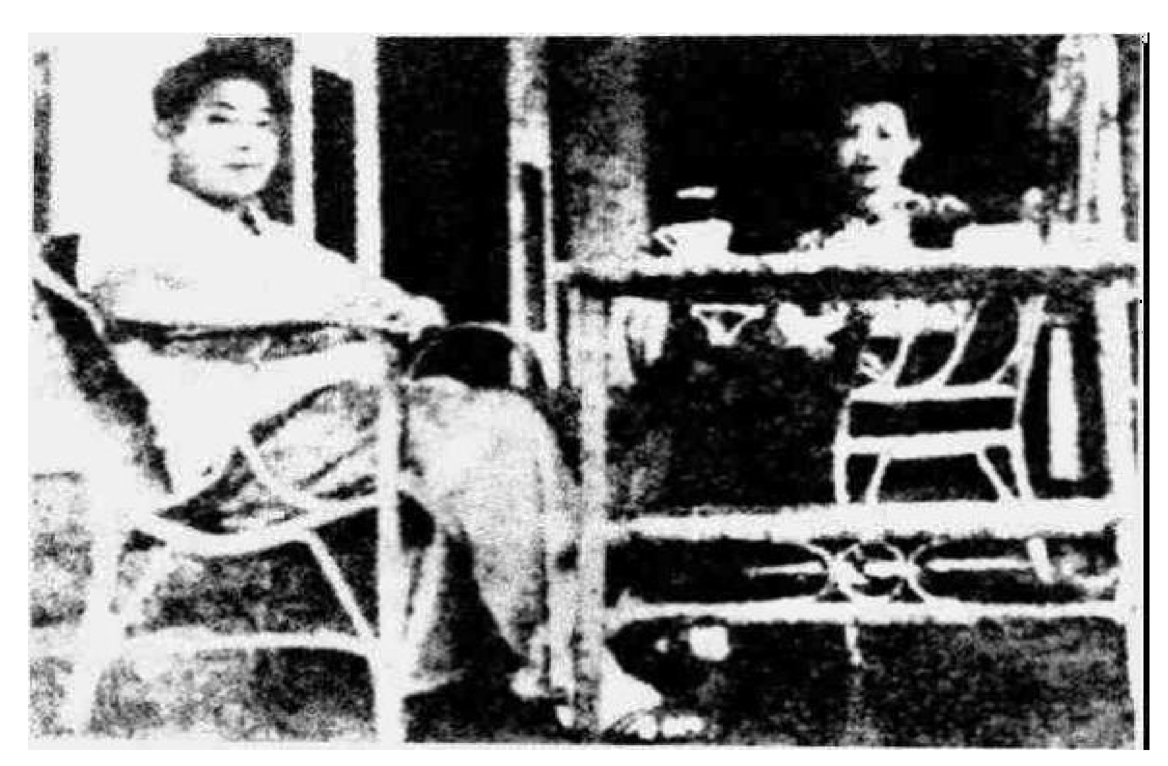
“张学思是你的兄弟，他逃跑了，你也是有责任的。”

“要谈责任嘛……”张学良故意拉长了语调说，“你的责任比我大得多。老四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十期生，而你当时是军校的教育长。他是你的学生，你教出来的，他逃跑了，与我有什么相干！”

“这个……”张治中反被将了一军，只好笑道，“我们各负一半责任吧。”

“汉卿，你这里是修身养性、做学问的好地方啊。”张治中幽默完毕，话锋又一转。

“地方倒是好地方，可是不属于我张学良。平时我也难得出门，大部分时间都是同四小姐在这屋子里看书。”



张学良与赵一荻合影。

张治中著文回忆说："张汉卿在井上的日常生活仍是小范围的自由，可以在屋内屋外自由活动，打打篮球，洗洗温泉澡。他的屋里摆了一些线装书，记得还有一部《鲁迅全集》，这部书大概他全部阅览过。他对我说，鲁迅笔锋锐利，骂人很厉害。还说他看过不少中国史书，对明史很有研究，还学会了作新旧体诗，那次他还做了一首送给我。原诗当时在上海《大公报》上发表了。我们两人还在一起照了一张相片，相片和汉卿的亲笔原诗稿一并制版发表。"

张治中的女儿张素我在回忆中着重谈了她对赵四小姐的印象。她说：

"赵四小姐人也很直爽，可惜身体不太好，瘦得可怜。她穿一件藏青呢的旗袍，一双自己做的鞋子。她是一个爱漂亮的人，这十年来居然能过这样俭朴的日子，也真难得。她告诉我

们她年轻的时候是怎样因爱漂亮而拔去几个牙齿，以致口腔发炎，弄得没有办法，竟将牙齿全部拔掉，镶上了假牙。”

“今天可说是我们到台湾后最悠闲的日子，当父亲和张先生畅谈时，同去的各玩各的。我和母亲、斌妹、赵四小姐沿着小路上山去散步，走到一架一百五十米长的空中吊桥旁，斌妹和我毫不在乎地放大步子走了过去。赵四小姐有心脏病，简直不敢动一步，慢慢地叫一个人扶着，走了一节竟头昏眼花心跳不止，只得退回去。休息了一会，她见我母亲也平安地走了过去，于是她鼓起勇气，仍叫人扶着，勉强走过桥头。她说，到井上温泉已一年多了，从未去看过吊桥，今天非常高兴，竟能走过去，她自己认为这是一件颇足自慰的事。”

下午四点，张治中一行要回去了，张学良送到汽车旁，紧紧握着张治中的手不放。

“我在这里，除你以外，没有人来看过我，我对你万分感激！我们这一分别，不知何年何日能再见面?”张学良动情地说。

两人黯然相对，眼眶湿润，挥泪而别。

张治中飞回南京后，找机会见到了蒋介石，报告了他在台湾看望张学良的情况，并转达了张学良向蒋介石提出的两点请求。蒋介石还没听完，脸色便阴冷下来，只“啊、啊”地哼了几声，不作任何明确答复。

张治中想起张学良临行前的殷殷托付和他清苦寂寥的生活，心中有些着急，便动情地说：“张汉卿心里现在很苦，生活也不顺心，希望总统能予以体恤。”

蒋介石乜视张治中一眼，将头转向别处不再吭声。过了好久，他才又说起了别的话题。张治中见状，不得不告退，只好另找宋美龄帮助。

“夫人，汉卿他现在很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张治中将张



赵一荻在台湾井上温泉养鸡。

学良的请求又恳切地讲述了一遍。

“唉，文白兄，我们对不起汉卿哪！”宋美龄听完，长叹了一口气，说道。

张治中没料到宋美龄一开口便会说出这种有悔意的话，颇觉吃惊，刚想发问，宋美龄却又接着说：“张汉卿的两点要求中，第一点不容易做到，恐怕现在不可能得到许可。第二点嘛，我一定想办法做到。”

“谢谢夫人。”张治中十分感激地站起身来，向宋美龄鞠了一躬。

这天晚上，蒋介石回到住所。宋美龄见忙碌一天的丈夫回来了，满面春风地迎上去替他摘下手套，脱下戎装。然后从侍

从手中接过长衫，为他穿上。她见丈夫的情绪挺好，便把张治中来找他的意思说了。

“我们对不起汉卿啊！我觉得汉卿的第二条要求，是不是就答应……”宋美龄试探地问道。

蒋介石听夫人说到这，不由抬起手托住下巴，眯起眼睛，使人看不出是笑还是怒。但是，和蒋介石朝夕相处的宋美龄知道，丈夫已同意了她的建议。于是，她吩咐副官立即按委员长的意思去办。

蒋介石马上叫住副官，说：“我再补充一条：以后非经我亲自批准，任何人不得面见张学良。”

由于宋美龄的斡旋，张学良托张治中转达的第二项要求几经辗转，最后终于得以实现，“管束”了张学良十二年、官阶由中校晋升为少将的刘乙光不久便被调离了。保密局又委派了一个军校六期的副处长王恺运来到张学良身边，暂代刘乙光工作，对外则称刘乙光去阳明山联战班受训，以此来缓和张学良的情绪。

然而，“管束”仍然没有丝毫松动。遥远偏僻的新竹山中，林涛阵阵，幽谷空空，张学良和赵四小姐依旧青灯黄卷，苦对夕阳，消度着那孤独寂寞的时光。

第八十六章　孤 岛 春 秋

1949.1

——“杨虎城出洋的时候，我曾托人转告他不要回来，因为回来没有好处。”

——“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这些年辗转太多，老是在油灯下看书，我的右眼已经不行了，平时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情上也遭受很大影响。”

“辗转眠不得，枕上泪难干。”

张严佛一诵起张学良赠他的诗句，顿生悲天悯人之感，对张学良充满同情，亦能体谅到他幽囚孤岛的凄凉心境。也许因此缘故，他对张治中的来访持温和宽容的态度。

“张治中先生偕同夫人、女儿看望了张学良，在那里吃了一顿饭，他两人谈了两三个钟头。我避开了，不晓得他们谈了

些什么，事后也没有问张学良。”张严佛后来如此回忆道。

张治中走后不久，张严佛也完成了他的“考察”使命，回到了南京。临行前，张学良特地设宴为他饯行。

“快要离开时，”张严佛回忆说，“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办，张学良说：‘你到了南京，如果看见莫德惠，请把我在这里的情形再详细告诉他。’

“我回到南京后，把张学良和我的谈话以及我对他的考察所得，连同张学良亲笔写给我的诗，用书面报告郑介民，并由郑介民转报了蒋介石。

“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刘乙光到了南京。他见过蒋介石后，对我说：‘张治中到台湾同张学良见面，委员长很不高兴，当面吩咐我，以后非经他批准，任何人不准去看张学良。’而这期间正是我在温泉顶替刘乙光。”

一九四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面胜利的决定性阶段。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结束，国民党军队被歼灭一百五十四万人，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国民党败局已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一日上午，蒋介石在总统官邸召开有一百多名国民党军政界高级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基于国民党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均陷入绝境，他本人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李宗仁代理。此时的蒋介石，精神颓唐，声音低沉，似有无限悲伤，与他平时训话的激昂慷慨截然不同。

当会议结束时，老态龙钟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忽然拄着手杖追上前去，喊道：“请总统留步，请总统留步！”蒋介石稍停，身也未转，冷冷地问道：“院长有何见教？”于右任说：“为了和谈方便起见，请总统在离开南京前，开恩下手令把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吧。”

蒋介石一听，板起面孔，向于右任瞥了一眼，将右手一

甩，提高嗓门说："你找德邻去！"便加快脚步走出了会场。

拖着一大把胡子的于右任，在众目睽睽之下，拖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到座位上，仰首朝天一声长叹。大家面面相觑，相继散去。

岂知，李宗仁也不含糊。他代理总统后，发布文告，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接着，他接连给参谋总长顾祝同、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张群拍去电报，命令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时，又派遣程思远以代总统特使身份专程飞到台湾，找自东北铩羽归来后转任台湾省主席的陈诚，商议释放张学良之事。

蒋介石为了不让李宗仁知道张学良的幽禁地，就把张学良送到高雄寿山要塞躲藏起来。为了保密，甚至不让一个宪兵跟随。

不久，蒋介石乘坐兵舰在高雄登岸，住在要塞司令部内，立即召见了刘乙光。刘乙光忐忑不安，不知是福是祸。当蒋介石听完了刘乙光关于张学良的情况报告后，深表满意，然后通知保密局发给特务队一万元。这笔奖金，在当时相当于三百两黄金！返回驻地后，刘乙光还向全体特务队员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你们辛苦了！"

当特使程思远抵达台湾，向陈诚说明来意，陈诚以此事一向归军统管理、只听命于蒋介石一人，别人无权过问为理由予以拒绝。对此，李代总统尽管恼怒万分，但也束手无策，释放张、杨的命令遂成一纸空文。

不仅如此，仅隔数月，蒋介石亲自给毛人凤下令，将杨虎城将军全家屠杀于重庆"中美合作所"。

"好惨啊，用刀杀的，白布一包就埋了。"特务队熊仲青队副说。

提起杨虎城，我心里十分难过。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为

什么这样对待他。杀杨虎城，是蒋先生的意思，还是经国先生的意思，还是毛仁凤干的，我也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不明白，我也不赞成，我觉得不应该这么干！

杨虎城这个人，我与他很要好，人是个好人。他看事情不是那么很深，可以说他是个老粗。他这个人很时髦，他后来结交了很多人，他手下有不少人是共产党，他受他们的影响很大，但他实在不清楚深层的情形。他有很强的爱国意识。

杨虎城出洋的时候，我曾托人转告他不要回来，因为回来没有好处。就像我，我没有死，完全是蒋夫人保的，依蒋先生的意思，是要把我枪毙的。

这情况最初我也不知道，但后来我看到了一个东西，这是美国的一个名字叫约翰的公使写的文章，有朋友抄写下来，拿给我看。上面说，宋子文警告蒋介石，他对蒋先生说，你要是对那个小家伙有不利的地方，——当年，他们都喜欢称我为小家伙，宋子文说，那我就立即把你的内幕都公诸于世。他这句话很厉害。

蒋夫人称我为 gentleman，绅士，蒋夫人很保护我，我很感激他。

我与蒋夫人认识的时候，那是在上海，有人请客，介绍说，这是孙中山先生的小姨子。后来，蒋先生在北京请我们吃饭，在座的记得还有阎锡山等人。在宴席上见到蒋夫人，我就说，蒋夫人好。蒋先生很奇怪，问我，你怎么认识她？我说，我认识她，比认识你还早。

蒋夫人有一句话很厉害，她对蒋先生说，西安事变，他不要钱，也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

蒋介石究竟有无杀张的意图，作家王爱飞对此有精辟见解，他说："蒋介石所不齿的人物，是那些'被俘归来之人'。他常以'被俘殉节'教导军人，并厉行'永不录用被俘归来之

人’的原则。而‘西安兵谏’，他自己竟为张学良所‘劫持’，在方式上无异于被俘，这种心理创伤，何能平复？抗战期间之所以不放张学良，是蒋介石深恐他重拥二十万东北军，妨碍国民党军权的统一；抗战之后仍将他羁押，是担心这位曾同中国共产党有‘三位一体’关系的人物，再被共产党所利用，影响他蒋某的权势；退居台湾后仍不放他，是惟恐他一出山，成为一股政治力量，或被那些对蒋介石有微辞的人所用，干扰国民党的‘改造’，扰乱‘强人政治’。但是，张学良毕竟不同于杨虎城，他先是易帜，后又挽救中原大战，是对蒋介石统一中国有功之人，亦是使蒋介石声望达到巅峰而能成功地进行了抗战之人，再加上张学良同蒋、宋两家私交甚笃，故而蒋介石对之从未起过杀心，只用给他生活以充分保障的“管束”，将他无限期地摈绝于自由之外。”

唐德刚教授说：“西安事变之后，张将军知道国民党不会杀他了，但他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去得罪国民党。实际上，他那时生命是毫无保障的，国民党想把他杀掉，也就杀掉了，像杀杨虎城一样。”

“也不能这么说，”唐教授又说，“蒋介石、国民党不是不想把他搞掉，无所谓的，要杀就杀。只是还没有出现严重到非要把他搞掉的形势。张将军曾对我说，在适当的时机，国民党说搞掉就搞掉我了。当时，张将军在桐梓，日本人打到了独山，国民党向大后方撤退，要撤往重庆。大撤退时非常混乱，什么都顾不上了，只管逃命。张将军那一大家子人，东西又多，那时哪有那么多汽车？戴笠就说，我们自己都没有车子运，还运什么张学良，搞掉算了！戴笠认为，他们在兵荒马乱中把张学良搞掉，蒋介石也不会怎么样。他们对蒋介石很清楚，蒋要杀谁，要留谁，他们心中一清二楚的。当时张学良对蒋介石来说，可有可无，要杀要留，也无所谓的。有人认为，



学良在一起，多少有点感情，就赶紧派人把他从医院撤走了。戴笠派去的医生扑了一个空。后来，刘乙光将此事告诉了张学良。张学良在台湾时，共产党那时没有打台湾，如果打，蒋介石在台湾待不住了，要跑了，那张学良也就完了。”

自从张治中走后，再没有什么人到井上温泉来看望张学良了。台湾的行政长官已换了两届，陈仪之后是魏道明，继而是陈诚，他们好像从来没有动过要来看望他的念头。难道真的被人们遗忘了？每每想到这里，张学良心底里陡然涌出一团悲哀。

与此同时，他眼巴巴地期待着他的两点要求能得到蒋介石的允诺。果然，刘乙光被调离了，长期受刘乙光夫妇压抑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他以为，随之而来的会是千呼万唤、朝思暮盼的自由。

在那些日子里，张学良与赵四两人书不看了，球也不打了，双双携手并行在幽静的山道上，憧憬获得自由以后的日子。张学良像是突然年轻了许多，脸上荡漾着爽心的笑意。赵四小姐更是兴奋，连服饰也讲究了许多，有时还摘一朵红灿灿的花儿别在胸襟上，像是随时准备去参加朋友们为她举行的聚会。

可是，几个月过去了，一九四九年也已接近尾声，自由仍迟迟没有降临。热烈的期待凝固了，张学良终于大彻大悟：自由已不属于他，他再也没有必要对蒋介石的“仁慈”抱任何奢望了。

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挣脱了久久萦绕于脑际的羁绊，忘却了十几年来无休止的纷扰，全身心地投入到一堆堆发黄的线装书中。

一九四九年末，张学良在台北住所接到旧友、原北京大学教授萧承恩由日本东京辗转寄来的一本书稿《孤岛野火——中

日战争秘录》。这是一本报告文学，记录了作者参加抗日时参与情报工作的秘事及抗日游击队的经历和后方政府腐败的种种社会现实。

萧承恩对蜚声海内外、力主抗日的爱国将领张学良非常崇敬，希望自己的手稿能得到他的审阅，更想得到他亲笔书写的序文。张学良很有兴致地读完书稿，很希望《孤岛野火》能顺利出版发行。

翌年初，张学良把自己阅稿的意见汇集到一起，欣然给萧承恩写了一封信，并表示可以此信作为《孤岛野火》一书的序言。张学良在信中表示支持“全民抗战”，指出中共“对世界大势的认识是正确的”，“应付侵略者的手法是高明的”，认为中共在抗日救亡中“不临阵脱逃，不竖白旗，自始至终担任了实际的救亡工作”。

萧承恩得到张学良的亲笔信后，喜出望外，立即将信放到书稿前作了序言。由于张学良还在幽禁之中，所以萧承恩没有张扬，将序言中的“张学良”签名以“×××”隐蔽起来。很快，东京《每日新闻》便抢先连载了《孤岛野火》书稿。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便如此，国民党当局仍然发现了此事。结果，国民党驻日本军事代表团通过麦克阿瑟的盟军总部进行了强制干预，令《每日新闻》停止刊载，已经出版的英文和中文版也分别受到了查封和查禁。张学良为《孤岛野火》作序一事，也被国民党当局视为“越轨”之举。

蒋介石知道张学良写序之事后，很生气，下令外界寄给张学良的物品不能轻易地不加检查地送到，而张学良寄出的信件，则必须严加检查之后才能邮寄出去。

囚禁之笼，被限制得更小、更死了。

一九四九年底，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尽管蒋介石孤注一掷，也终于未能挽回颓势。十一月十三日，代总

统李宗仁逃离重庆，赴美国就医。十二月十日下午，蒋介石逃向了台湾。国民党在大陆二十二年的统治就此彻底结束。

蛰居孤岛之后，国民党内部一片愁云惨雾。李宗仁指责蒋介石下野后继续揽权，干扰他的政治、军事部署，失败完全是由于蒋介石独裁和汤恩伯、胡宗南等将领的无能；蒋介石则将失败归咎于国民党的“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

一直在政治、经济、军事上支持蒋介石政权的美国政府则认为，国民党的崩溃，“归因于世界上最无能的领导，以及使军队完全丧失战斗意志的其它许多败坏士气的因素”。

在吵吵嚷嚷中，突然有人提出一种谬论，说国民党在大陆之溃败，应当归咎于张学良和杨虎城。他们认为，一九三六年底，如果蒋委员长以数十倍于共产党的军队，三面合围西北共产党的计划能够实现，那么红军早就被赶到长城以北的沙漠地区，且因无法生存而不复存在了，国民党现在又何言失败，何言被赶出大陆？

把失败的责任推给张学良、杨虎城，这种论调赢得了国民党中不少人的附和，后来，国民党秘书长张其昀竟然把这种论调写进了他所主编的国民党《党史概要》中。而此时此刻，正幽居于新竹山中的张学良作梦也没有想到，他所发动的“兵谏”，在十几年后居然还要承担国民党丢失大陆政权的“罪责”。

对这种论调，蒋介石虽然觉得不无道理，然“不足以为据”。但张学良毕竟已成为国民党中一部分人因失败而揪住不放的替罪羊，成为败军之将推卸自己罪责的挡箭牌。

对此，张学良则认为，他就是做了，也没有错与不错的问题。西安事变与后来的大陆失败没有必然关系，历史如果可以这样推，那首倡“联俄容共”的孙中山及助他建组党军的蒋介

石，不是更脱不了干系？从某个角度来讲，后来的失败，正证明了国民党暨蒋本人未能掌握西安事变为它提供的历史时机，这怎么能诿过于他人呢？

国民党政权退踞台湾之初，岛上处于严重的混乱状态，危机重重，风雨飘摇：政治上，内外交困，人心动荡，失败主义论调甚嚣尘上，党内派系林立，互相牵制倾轧；经济上，萧条凋零，严重衰退，有钱人纷纷远走欧美，或避居港澳；军事上，残兵败将六十余万，成分复杂，士气低落，一蹶不振。

为挽救危局，蒋介石开始着手对国民党的党、政、军进行“改造”，以实现他“立足台湾，反攻大陆”的政治意图。

于是，蒋介石将原来的两大特务组织“中统”和“保密局”统统撤销，建立了包括其子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统一所有的情报工作。稍后，这个委员会又改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实际大权由蒋经国操纵，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归其管辖指挥。这样，原来由保密局“管束”的张学良自然也移到了蒋经国手下。

此时，蒋经国想起他父亲所说过的一句话：他同张学良的关系有如父子，不能以国法公义而论。于是，他脑海里顿时闪过一个奇特的念头：他要同这位曾经囚禁过父亲、后来又被父亲所囚禁的将军，尝试着做个朋友。

所以，当有关“管束”张学良的厚厚一札档案摆放到蒋经国面前时，他便决定对“管束”工作进行调整：日常的看守交由“警备司令部”负责；张学良的动态由他亲自过问；为便于“管束”，他将张学良迁出偏远的清泉，先搬到高雄西子湾，后又搬到台北，新选的居处是台北北郊的阳明山。

阳明山位于台北七星山以南、纱帽山东北，站在绿蓁蓁的山上，可以望见清清的矿溪水逶迤西去。在日本统治时代，阳明山叫草山，台湾光复后改为阳明山，其意是纪念明代的大思

想家王阳明。

张学良真没有料想到，他的幽居生活会和三四百年前的这位大儒息息相联：在贵州修文时，他所住的是阳明祠，旁边是阳明洞；“二二八事件”时，保密局曾一度打算将其迁往江西兴国的阳明洞；现在，他要去的地方，仍然冠以这位先哲的名字。

在正式搬出井上温泉之前，张学良曾去过一趟阳明山，但见这里青山翠谷，温泉棋布，原野开阔；举目一望，桃树、杏树、樱花、杜鹃满山遍野；公园里，有中山楼、阳明山庄、阳明湖、小隐潭、阳明瀑、快雪亭、永河台等幽美的去处。虽然是冬天，但此地仍气候温和，游人如织。

见此景象，张学良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儿，觉得此处是他修身养性、研究学问的上好居处。但是，他所选择的地方，既不是山庄，亦不是小楼，而是半山腰阳明山公墓上的几间旧平房。

“这儿好房子那么多，副司令怎么会看上这么个阴森森的地方？”

“我这个人，这些年寂寞惯了，去热闹的地方反而不舒服。明朝末年有个人，名字我记不得了，他就住在一座公墓里。我很喜欢他做的一幅对联：‘妻何聪明夫何贵，人何寥落鬼何多。’既然人人都跑不了‘死’这一关，我住在公墓里又有何妨?”张学良苦笑道。

“这，这……”保安处长被张学良一席话噎得无言以对。

“我再给你说几条我选这儿的理由，”张学良看着保安处长吃惊的模样，觉得有些好笑，“公墓里埋的一些人我认识，有的还是我的朋友，以后也还会有朋友埋到这儿，我住在这儿可以经常去拜访他们；第二，公墓边上没有汽车，我走路碰不着；再者，有朋友来看望我，只要告诉司机我住在阳明山公墓

上面，很容易就找到，省得别人麻烦。”

“副司令这么讲，倒是自有您的道理，”保安处长说，“可是这么大的事，我做不了主，得报告上面。”

“嗨，搬搬家，不过是换一个地方而已，何必那么讲究。”张学良不以为然道。

搬家的报告递到了已升任国民党总政战部主任蒋经国的手中，他自然未予批准，而是另选了靠近阳明山、位于华南饭店后面优雅路上的安全局招待所。

可是，蒋夫人在巡视了之后，对蒋经国说，你怎么能让他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不久，当局又另选了靠近阳明山的一幢别墅给张学良居住。

此时，副处长王恺运在暂代刘乙光一段时间后离去，蒋经国又派了其英文秘书李俊清前来，李还兼教张学良英文，因为那时张学良在翻译英文圣经。

刘乙光调走后，乃升熊仲青任队长。熊仲青接任前，蒋经国对刘乙光的工作有些微词，刘乙光便以为是熊仲青在做他的“秘密督察”，打他的“小报告”，因而，对熊仲青不太谅解。

刘乙光是特务队长出身，在处理公务上很严厉，得了“希特勒”、“德国人”的绰号。若手下的特务人员一不听话，他就打报告调人，得罪了不少人，当然，要带好那批人也不容易。只有熊仲青一人跟着刘乙光做了副手十七年，一切内部的苦差都是熊仲青一人张罗，刘乙光对熊仲青也很好，只是时局使然，使熊仲青受了很多苦，最后还遭刘乙光的误会背了黑锅。后来，熊仲青每言及此，不胜感慨之至。

熊仲青说他的升任并非刘乙光的举荐，而是一九五〇年他在石牌受训，蒋经国召见谈话，记了本子，略有印象。后刘要调回局里做特勤室副主任，小蒋乃升熊取而代之。先一天，陈大庆召见告知熊仲青，第二天，蒋经国亲自召见，第三天就公

布了任命书。

在熊仲青任队长期间，蒋经国一年内总要召见他一二回，问问话。有一次，蒋经国问熊仲青张学良最近怎样，熊说，自受洗后，他比较谦卑了。蒋经国一听，“呀”的一声，好像是在说，你怎么能同情张学良？熊仲青见状，马上改口补充说：“但他仍然放不掉优越感。”

就这一句答语，因为没有说到蒋经国的心坎里，因此，本应升少将的熊仲青，从此失去获升机会，后来，便在上校任内退役了。

阳明山的秋日，淡泊而悠远，苍郁而沉雄。清冷中，别有一番幽深的情致。

读史做诗之余，张学良由赵四小姐陪同，携手漫游于山间幽径，看清风远树，红叶黄花，感平芜播露，衰草寒烟，领悟着一种人生的旷达和宁静。

一天上午，张学良拿起一本线装诗词，翻了几页，目光定定地凝在了书上，久久没有言语。赵四小姐见他神色有异，连忙凑过身来，诵读那阕词：

秋风萧萧愁杀人。
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

张学良叹口气说：“小妹，我们的心情，古人早就道尽了，叫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

“今后？今后是什么时候？抗战等过了，十年等过了，现在已经是第十八年了，连我们的闾琳都已是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了，可是我呢？春去秋来，都不知今夕何年了！”

时光老人的脚步，不知不觉地便挪移到一九五五年五月。

“报告副司令，刚刚接到通知，有急事要你马上下山。”一天，保安处的一名警卫敲门进来，径直向张学良报告说。

“下山？去哪里？”

“通知里没说，也不让问。只说有专车来接副司令。”刚说完，警卫又补了一句，“只接副司令一人。”

张学良看一眼赵一荻，刚想说什么，却被她用手势止住了：“汉卿，你去吧。这么急来接你，肯定是件紧要事，说不定会有好消息。”

“好消息？”张学良轻轻自语道，然后，徐徐走到外间，取下衣架上的帽子，又转身对赵四小姐说，“都十八年了，还会有什么好消息？”

汽车沿山道蜿蜒而下，间或可以看见掩映在不远处树丛中的一幢幢白色或黄色的别墅。再往前走，别墅消失了，前方出现了一座显得简朴典雅的小楼。

“莫非是要见老头子？”张学良早就听说，蒋介石的官邸就坐落在山脚下中山北路和福建路交界处，名曰“士林官邸”。这是自一九四九年从大陆败退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居住的地方。

汽车在灰色的小楼前停下，张学良被引进一间摆着中式古典家具的宽大客厅，未及坐下，便有一名男侍端来茶水放到面前，客厅里只有张学良一人，静得出奇。

须臾，传来手杖拄地的“笃、笃”声，身着长袍马褂的蒋介石出现在客厅。张学良连忙站起身来，望着那个他曾是那样熟悉的身影，心头排浪涌动，眼角竟有些湿润了。

“委员长，总统！”张学良挺直身子，像当年他在蒋介石面前一样，以一副军人的姿态，两腿紧靠，叫了一声。

蒋介石微微颔首，嘴角动了动，似笑而未笑，伸出手来同

张学良一握，接着便用他浓重的奉化口音招呼道："坐，汉卿，你坐。"

待蒋介石在椅子上坐定之后，张学良才缓缓地落座，然后，默默地注视着蒋介石。

日月如梭，弹指十八年过去了。在"西安兵谏"的那些日子里，两人在古城天天相见，而自送蒋回南京的途中两人在洛阳分手之后，这是继贵阳会晤之后的再次晤面。

在张学良眼中，这位以"家法""管束"了他十八年的人，也显得老多了，瘦多了，额上满是细密的皱纹，真是岁月不饶人哪。

而在蒋介石眼里，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张少帅也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张汉卿，头顶光秃，微显虚胖，那双虎虎生威的眼睛变小了，细长了，一张一合间引出了无数道皱纹。尽管张学良是坐在椅子上，但蒋介石还是看得出来，他已微微有些驼背了。

"汉卿，你老多了！"蒋介石手扶一根紫檀木拐杖，一直细细地注视着张学良，以一种悲悯的语调说道。

一句话，将无限往事勾上了张学良的心头。他望望蒋介石，又望望窗外，血冲脑门，心潮翻腾，千言万语、齐涌心头，似要决堤而泄，却又哽阻在喉咙。

"都十八年了，我该老了。"张学良用平静而低沉的语调回应道。

"汉卿，你还不到说老的时候嘛！这些年，你读书写字，有时候还做诗，进步很大啊。"

"总统过奖了，"张学良喉头干涩，忙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说，"这些年辗转太多，老是在油灯下看书，我的右眼已经不行了，平时看东西模模糊糊的，心情上也遭受很大的影响。"

"眼睛不好可以治疗，意志上可不能消沉，"蒋介石说着，

将拐杖往地上戳了一戳，“好多年前，我就对你说过，要好好读书，这个话，现在仍然适用。”

张学良沉默着，他想说，但嘴唇仅动了动，却没有只字片语说出口。

“汉卿，对你我是了解的。”蒋介石用语重心长的口气说道，“再忍耐些，国家会有需要你的时候。”

“总统，我的确是老了。”张学良长吁了一口气，惨淡地笑道。

“才五十几岁嘛，何言谓老？这个我清楚。”蒋介石扬起手止住张学良，又缓缓地说道，“今天我找你来，只是想同你聊聊。十八年了嘛，我们该见见面了。再计较过去那些事情，没意义了，没意义了。”

张学良点点头，颇显出有些感动的样子，两眼一眨不眨地望着蒋介石。

“第二层意思嘛，是我想请你写点东西。”

“请总统明示。”张学良不卑不亢道。

“我们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认真地检讨。”蒋介石干咳了一声，接着说，“这其中嘛，苏俄共产势力也有相当的渗透，是中共的靠山。我打算写一本书，叫《苏俄在中国》，研究共产势力给我们的教训。我的意思，你搞的那个‘西安兵谏’，在历史上终究是一件大事，党国方面当年的应变计划和资料十分完整，而关于中共方面的资料相当欠缺。你是举事的人，知道的应该不少，这么多年了，还有什么话不好说呢？安闲无事的时候写出来，作为史料保存，对后人研究历史也是会有教益的。”

张学良对西安事变这个问题最不愿回答。可是，如今蒋介石亲自出马问话，他该如何应对呢？

“总统指示，学良理当坚决执行。”张学良立即答道，“只

是西安事变的事情，多少年来我从无心提及，想把那段记忆带进棺材里算了。既然总统要我写，我一定从命。不过，既是历史，我只能从实记述了。”

“那当然，”蒋介石点点头，但脸上却掠过一丝苦笑，“历史嘛，当然要讲究‘真实’二字，这个你倒不必多虑。”

“那虎城呢？可以提及虎城吗？”张学良情绪略显激动，“我这些年所以不去想西安的事，有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对不起虎城。他是受了我的牵累，一家人才落得如此下场。”

“杨虎城的情况和你不一样，我从不把你们相同看待。你要提，也就一笔带过吧！”蒋介石面有愠色地说道。

“我明白了，总统。”张学良觉得不便再问下去。

“你眼睛不好，平时要多注意休息。写东西嘛，可以由你口述，让赵一荻小姐记下来，再整理整理。听说她很能干嘛。”蒋介石话锋一转，故作关怀状。

“这些年也多亏了她，不然，很难说我的日子是个什么样儿。”张学良点点头，感慨地说。

“汉卿哪，凡事看开一些。国家不会忘记你的，我也不会忘了你的。”蒋介石站起身来，显出送客的架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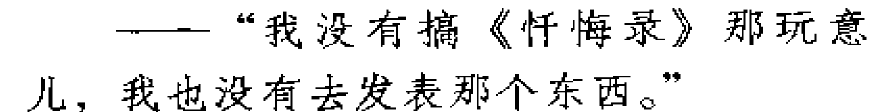
“谢谢总统的美意，”张学良也跟着站起来，“不过，廉颇老矣……”张学良喉头哽塞，竟再也说不出话来。

数年后，张学良在回忆这次接见时，曾对他的老部下周鲸文说：“头两年在新竹住，忽然有一天把我接到台北，让我一个人在一间大客厅里等候，我原以为一定是外国人或记者要会见我。等了一会儿，进入客厅的不是别人，而是蒋总统。我没有见过他已经有数年了，这次见面我有新奇之感，觉得蒋总统风姿不减当年，他见到我后，表情上是很亲切的，询问我生活情况和健康状况。我说：‘一切都很好，请不必劳神挂念。’我并请他多为国家珍重。蒋总统还很严肃郑重地对我说：‘汉卿，

你要多保重身体，国家还有重用你的地方。我叫经国和你经常联系，有什么事可以向他讲。你可以搬来台北住，你和经国商量一下，看看什么地方适宜你居住……’”

第八十七章 “忏 悔”始 末

1956.8



——“我没有搞《忏悔录》那玩意儿，我也没有去发表那个东西。”

——“蒋先生见到我这信稿后很高兴，说你确实帮了我的大忙。”

——“为这信稿的事，后来闹得很厉害，闹得很多人都被撤差了。”

我现在要向你宣布一个秘密：我没有搞“忏悔录”那玩意儿，我也没有去发表那个东西。

你听我讲。蒋总统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为了写这个东西，他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有些情况不清楚，怕写错了，让我这个当事人提供他一些事变的内情。我同意了，就写了一信稿给他。在开头时，我写道：对西安事变，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对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的，

决心至死不说一个字。现在，既然你鞠诚问我，我不能不回答，你问我了，我不能不说，我也应鞠诚相告。

“那时，你同老总统常常见面吗?”唐德刚教授问道。

不常见面。但到后来，有时常常碰到。做礼拜时，每个礼拜他一定去，我们每个礼拜都能见上一面，但是我们不说话。往往是他在前边走，我们在后头跟着。就是从礼拜堂出来，也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有说话的。见他来了，大家行行礼就是了。

“那你同老总统怎么联系?”唐教授不解地问道。

那时，我和老总统常常通信。

我懒得写。写东西，不是嘴上说说，写在纸上，就要像个玩艺儿。可你让我写东西，等于是赶着鸭子上架，这拿枪杆子的和拿笔杆子的，就是不一样！我最怕的是写回忆录，写回忆录就要回想，让我写西安事变，这事很简单嘛，可要我写过去的事，如我父亲的死，我都要回想嘛，再如郭松龄为什么要叛变，这前因后果，我也要想嘛，那就把我的伤心事都想起来了。

西安事变虽然只有短短十三天，但促成其发动的因素却是积年累月：皇姑屯的杀父之仇，九一八事变的夺土之恨，与红军作战的惨败，共产党诚心抗日的呼唤，对蒋介石不抵抗政策的一再失望。凡此种种，此时此刻，一古脑儿都涌上心头，叫张学良一时不知从何下笔。稿纸铺在桌上几天了，但却没有落下一个字。他斜倚在一把旧藤椅上，呆呆地独坐，从上午到下午，又从下午到黄昏。

十八年来，他从不谈“西安兵谏”的事，甚至连想也不让自己去想，现在，思绪的焦点突然对准了它，竟叫他一时难以接受它迎面扑来的排浪似的冲击。那些早已变得遥远、早已变得陌生的往事，现在又明晰起来，一桩桩，一件件，历历在

目。于是，他挥笔疾书，思绪追溯到自已坎坷的少年时代。

“良年方十一岁，慈母见背，先大夫宠爱有加，但忙于军政，素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而未及弱冠，出掌军旅，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过。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独掌大权，此真古人云：“少年登科，大不幸者也。”处事接物，但凭一已之小聪明和良心直觉，关于中国之礼教殊少承受，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忿事急躁，有勇无义，此种熏陶，如今思来，恐受之西方师友者为多也。”

写完一段，张学良掷笔案上，唤过赵四小姐，问道：“你看看，觉得怎么样？”

赵一荻仔细读过，噗哧一笑，说：“这哪里是在写兵谏，倒像是在写你的自传呢。”

“对了，就应当是自传，”张学良说着，站起身，“你想想，我都五十多岁的人了，却从未细细地回忆过自己，而后来的许多事情，都与我早年的所想所历有所关联，仔细理理，也让人看出个所以然。老蒋既然叫我写史，供后人研究，总不能掐头去尾地只写兵谏，而不言及它的来历呀！”

“这话倒也是，”赵四小姐俯下头，将纸上的叙述又复读了一遍，说，“这样写下去可以道出许多原委，让人看出兵谏不是出于偶然。”

由于眼睛不好，对往事的回忆又十分纷杂繁乱，张学良的记叙十分缓慢。后来，他干脆将赵四小姐叫到身旁，两人聊一阵儿、忆一阵儿，由他口述，赵四小姐代为记录。

接着，他陈述了自己从青少年时代就产生的团结御侮之思想：

“厌恶内战。良年方弱冠，屡参战事，亲见因战乱原因，满目疮痍，民生凋敝，自己同胞互相残杀，而有为有志之青年，多为牺牲，大伤国家元气，衷心时为忏悔。

"痛恨日本之对华侵略。年幼时，亲见日人在东北之横暴。及长也，明国家之大义。先大夫之遇难，'九一八'之暴行，致痛恨无已。念自力不足，国力不强，对国事问题，遂致时生幻想。

"总统召见我，也就是要这一段材料，而且是要跟共产党有关的，因为他要写的书名叫《苏俄在中国》。过去，也早有人对我提起过，说兵谏是受共产党挑唆的结果。我一听就觉得好笑。西安的事完全是我同虎城做的主，事前共产党哪里知道？不过，要说影响，倒还是有的，因为有'三位一体'嘛。这点上，我也只有让总统失望了。

"曾忆在京某晨，蒋公偕良同车至宪兵司令部，举行毕业典礼，良向蒋公陈述共产党有联合抗日之意，并拟乘时向蒋公直述已同周恩来会面之事，不幸车已抵司令部门前矣……不料蒋公在阅兵后训话，痛斥共匪为大汉奸，主张容共者，比之殷汝耕不如。良聆听之下，有如凉水浇头，良欲向蒋公陈情者，至是则绝望矣。沮丧万分，回至寝室，自伤饮泣。

"陕北剿匪失利，良立返陕，本先，一一〇师曾遭覆灭，师长何立中阵亡，此则一〇九师又遭覆灭，师长牛元峰拒降而死。此两师长为东北军之佼佼者。……两次惨败，使良心中倍增痛苦，更加深良素认为因内战而牺牲优秀将才之可惜，并对共匪之战斗力不为轻视，遂触动用'和平'办法解决共匪之念生焉。

"当是时也，共产党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高唱入云，实攻我心。不止对良个人，并已动摇大部分东北将士，至少深入少壮者之心。当进剿不能再现成功，良觉一己主张，自问失败，征询众人意见，遂有联络共产党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种种献策。"

笔锋至此，张学良对赵四说："西安的事多亏有周先生，

不然虎城和少壮派那里不知要生出多少意外。这一点，总统自己心里清楚得很。但他不会说活着离开西安有周恩来一功。若我再不说，那以后可就辩不清了。”

“可你怎么说？这一点要是明写出来，老蒋不气死才怪呢。”

“隐秘之事，哪能用白纸黑字来明说？”张学良笑道，“这一点我已想好了，你记下来，看怎么样。”

“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事变之后，良一观察，伤感后悔万分，痛部属之无能，惊杨部之无纪律，自悔孟浪，此辈安足可以共成抗日救国大业乎？彷徨束手，问策无人，除成立两委员会外，立即电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二三日后，周偕二人同来，一为博古，另一则记忆不清矣。周至此时，俨为西安之谋主矣。”

“你觉得怎么样？”见赵四小姐记录完毕，张学良征询道。

“太妙了！”赵一荻点头说，“我看这一段把最关键的三个问题都说明了。”

“哪三个问题？”

“一是兵谏前未曾同共产党商量；二是为何要请周恩来；三是周先生到西安后的作用。话不多，而且隐晦，但明眼人一看就可明白。”

“真不愧是我的私人秘书啊，小妹！”张学良打趣道。

蒋介石一直怀疑西安事变是张学良上了共产党的当，但张学良坚持实事求是，实话实说，还历史于本来面目，致使蒋介石无话可说，不得不表示信服。同时，张学良还用含蓄的措词委婉曲折地说明，团结御侮不仅是他的主张，而且也是蒋介石点过头，尔后又身体力行、付诸实施的。因此，张学良用颇具讽刺的语调继续往下写道：

“良对日本军人为什么那样痛恨，是因为目睹身受，到后

来更彻底认识到，彼等非要征服中国不止，无协调余地、非作殊死斗争不可。对共匪则不然，由于没能认识清楚，总觉同是中国人，不过是所见不同，权利之争。今日可以为敌，明日在某一目标下，又可为友矣。良敢武断一句，不只良个人有此错误，恐过去好些同志也犯了这类错误。”

末句中“好些同志”显然包括蒋介石在内，因为蒋介石不但接受了张学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要求，而且亲自决定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

张学良在《自述》信稿中，曾提到与周恩来会谈时讨论的几个问题，其要点如下：

“共党武装部队接受改编集训，准备抗日；取消红军名称，同国军待遇一律；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赦放共产党人，除反对政府，攻击领袖外，准自由活动；准其非军人党员，居住陕北；待抗日胜利后，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一如英、美各民主国家等等。”

张学良关于西安事变的自述写成之后，又搁置多时，反复斟酌修改，最后定下稿来，托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老朋友张群转呈蒋介石。

送走这份回忆稿子后，我不清楚是谁，大概是经国，也可能是王升，不敢肯定，反正是他们把我这封信稿改了又改，把信稿开头的话撤掉了，又拿了回来，让我重新抄写。这原稿我都有，现在还保留着呢。他们仅把誊抄稿拿了回去。

蒋先生见到我这信稿后很高兴，说你确实帮了我的大忙。他又觉得很奇怪，他叫人告诉我，说你的文笔这样好，你能写，那你就写文章吧，你把过去的事情都写一写，闲来无事还可多写点北洋旧事。蒋先生让我写，我就随便写，高兴了，就写一点，不高兴，就不写了。记年月也是我最怕的事，我说我不能写东西，就是指我不会记年月。后来，我也就懒得再写

了。

可是，为这信稿的事，后来闹得很厉害，闹得很多人都被撤差了。

原来，一九五六年，由蒋介石亲自编写的《苏俄在中国》一书出版后，蒋介石下令将张学良的“自述”信稿摘要复印了三十余份，发给少数高层领导人士参阅，其机密程度之高，连负责国民党史的主任委员秦孝仪也未看到。

蒋介石又召来蒋经国，将《自述》的手稿交给这个时任国民党军总政战部主任、并负责张学良“管束”工作的儿子，说：“该文倒是写得很真实，可以相机运用，作为军中的政治教材。”

不久，国民党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蒋经国便将张学良的《自述》作为“极机密”文件在会上传阅，并传达了蒋介石打算将其作为军中政治教材的“口谕”。

会议完毕，这份文件即被收回，交给了“总政战部副主任兼执行官”王升，在总政战部，这份一万字左右的“自述”被缩编为五六千字的短文，由王升批转给主管文宣的政二处萧处长，嘱咐他在张学良的“自述”稿上润润色，使它成为军队的政治教材。岂料萧处长没有体会到所谓“相机运用”的真正含义，将“自述”放在保险柜里锁了很长一段时间，又取出来交给总政战部创办的对外刊物《希望》杂志，在其创刊号上以《西安事变忏悔录》为题发表。于是，一九六四年七月，这份国民党最高级会议的“极机密”件被送进了印刷厂，开始排版印刷。

印刷厂的印刷机尚未开始转动之时，台湾《民族晚报》的军事记者黄仰山通过私人渠道，拿到了即将由《希望》杂志登载的《西安事变忏悔录》全文，如获至宝，立即返回报社，捷足先登，在报上全文刊出。大约他已意识到此文价值非凡，事

关重大，刊出后恐引起当局的责难，于是便在文章末尾加了一行小字："转载自《希望》杂志。"而《希望》杂志是总政战部所办，其最高长官是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若有人要打板子，自然轮不到他这一区区小报的副总编辑。

《西安事变忏悔录》在《民族晚报》上一发表，立即引起轰动，岛内及香港华文报纸争相转载，外国记者纷纷拍发专电，瞬间便流向海外，因为这是西安事变惟一幸存的主谋者首次披露事变的重大内幕，亦是张学良被禁之后首次有文章公开发表。

当王升接到报告，得知《民族晚报》已刊出张学良的《忏悔录》后，大惊失色。待报纸送来，他仔细一看，方知是总政战部的《希望》杂志出了问题，他立即下令停止发行此创刊号。然而，该杂志已有部分流向社会，他随即又下令，将发行出去的杂志全部收回。可是，雨点一落，何能复回？这本原定价不过台币十元的杂志，顷刻间在黑市上涨到一百元一册，欲购者仍难遂心愿。

身居阳明山的张学良不仅看到了载有他的《自述》的《民族晚报》，也看到了先期流散出的《希望》杂志。

"自述"信稿被"润色"后作为《忏悔录》公开发表，外传张学良对此大为恼火，其实并无此事。

起初的时候，他们把我这信稿的前段去掉，把前头改了改，又加了一点，把这玩意儿又送回来时，也没有说这是我的忏悔录。岂料，后来他们又公开发表了。假如他是以《张学良忏悔录》的方式发表，那我也不吱声了，我也不会说什么话的。可是，发表时的标题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又署名张学良，这样一搞，就好像是我自己主动发表出去的。那我就给蒋先生写了封信，信中说，我不是反对发表刊登这个东西，我只声明这个东西不是我自个儿去发表的，请蒋先生不要误

会。什么人发表的，我不知道。

蒋先生火了，后来，就把那办事的人撤掉了，把那东西都收回来了。至于蒋先生怎么火，怎么骂他们，我就不知道了。我估计这事是政治部干的，政治部的人办事糊涂，新闻处也常常干这种混蛋的事，不会宣传，不懂得宣传，完全凭主观性去做事。

原来，蒋介石接信后，方知他的“相机运用”最后变成了“公开发表”，当即责怪下来。总政战部顿时诚惶诚恐，未及发行和部分追回的《希望》杂志立即销毁，化为纸浆，《希望》杂志仅发行一期便没了希望。

杂志停刊后，接着追究主办人的责任。政战二处肖处长对材料处理不当，革职查办；《民族晚报》未经许可，先期转载《希望》杂志尚未出版的文章，由“新闻局”追究责任，予以严办。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事后，蒋经国来到阳明山张学良居处，当面致歉。哪知张学良却呵呵一笑，说：“文章寻常事，发表何妨，妄改又何妨？但历史还是历史，何人能够重造？”

蒋经国尴尬不已。

第八十八章　解除管束

1959.3

——“蒋先生事后是原谅我了，他若不原谅我，早就把我枪毙了。”

——“在座各位为学良之自由，数年来奔走呼号，颇多委屈，学良感激不尽，借此一杯薄酒，再次向各位表达谢意！”

——“算了，回忆录不写了。……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家不高兴。”

蒋先生对我，该怎么说怎么说，他对我很关切。我有病，旁人就想让我死掉，可他特别关心，派了中央医院的医生为我看病。我迁移到哪儿，从大陆直到台湾，老先生总是指示要找最好的地方。到台湾时，他还亲口嘱咐陈仪，一定要找好地方让我住，他对我，那真是关怀得很！

至于蒋经国先生，那对我就更好了。后来都是经国先生同我见面，我跟经国先生很要好，我们之间无话不说。

我虽然向蒋先生称臣，但为了联共抗日，我俩吵翻了，我说你这样下去，就等于向日本人投降啊！蒋先生骂我，骂得很厉害，骂我无耻。我自从当军人后，从来没有人这样骂过我。可我仍然对蒋先生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你就这样眼看着日本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战而一点点地把中国吞掉吗？这不是比投降还不如吗？

西安事变前，我跟蒋先生发生冲突，没有旁的，就是这两句话：他要安内攘外，我要攘外安内，没有一点其它旁的冲突。那时蒋先生有一个秘书名叫王玉章，他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哪一个人敢同蒋先生这样争吵。

我跟蒋先生就这样吵啊吵。当时，蒋先生觉得我的情绪很怪，怎么敢这样同他大动肝火？争吵中，蒋先生也难为了我几句，我也顶了他，现在，他人已经不在了，我也不愿意再说出来。但他的那一句话把我给激怒了，我真的发怒了。你知道吗？

“知道，他让你用机关枪打游行的学生，你觉得这太不像话了，手中有机关枪不允许打日本人，反而要去打学生！”唐德刚教授回答说。

你怎么知道的？是啊，我真火了，这话把我激怒了。西安事变就是逼出来的！今天我忍不住了，我对你们说，事情完全是逼出来的。我这人是这样，别看太太对我这么凶呀，她可怕我发火啦，我要发起火来，我谁也不怕，我发起火来会开枪打人的。我真动怒了，所以，才有后来的兵谏。我的意思，总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我就是这么样个人！

“汉公，你觉得蒋先生事后原谅你了吗？”唐教授问道。

蒋先生事后是原谅我了，他若不原谅我，早就把我枪毙了。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那是应该处死刑的。我是一个军人，我也带过兵，我懂得，假如是我的部下这样对我，我早就把他枪毙了。

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不在乎，真的是不在乎。就是今天，我虽然已经九十岁了，我仍敢说这句话：假如国家要用着我，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为了国家，假使哪些事没人能干，没人敢干，我今天仍有这股热情去干！但为私人的事我不干，我也不帮谁人的忙。就是过去，我也不是帮蒋先生的忙，我怎么做，全是凭我个人的判断，是凭我个人的主张。我在“扩大会议”时也不是帮蒋先生的忙，而是我认为我那样做是对的，有利于中国的统一。

张学良被“严加管束”之后，是否存在提前释放的可能性，对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概而言之，有以下五种说法：

一，蒋介石第一次想放张学良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介石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因此曾一度考虑让张学良回到西安，后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顾虑很快打消。虽然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但在当时，扣留在西安的人质及飞机不失为要求释张的一个有分量的筹码。

二，以杨虎城为首的八位将领向南京发出“歌电”，决与蒋“起而周旋，至死无悔”。三天之后，东北军、西北军一百二十六名高级将领联名向全国通电，完全支持八位将领在“歌电”中所采取的立场。此时，蒋介石面临巨大的危机：是答应西安的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还是冒大动干戈的风险？终于，蒋介石“挟张学良以令诸将”，化解了危机，爱国心切的张学良不得不以囹圄之身，换取避免内战流血的愿望与现实。

三，在舆论压力下，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七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声称："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果该协议得以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已虚假地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这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如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

四，勿庸置疑，稳固的"三位一体"是促蒋释张的最大筹码，"二二事件"后，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三位一体"解体，营救张学良的力量削弱了，机会丧失，蒋介石才得以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

最后，台湾史学界有一种说法，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宋美龄与宋子文曾提议释放张学良，并由张将军率国军挺进东北，他们还认为果真如此，东北的战局决不会演变成后来的局面。当时，山城重庆对释放张学良有两种意见：一是宋子文和宋美龄兄妹，他们认为无论是从法律的观念出发，还是从个人的私谊而言，都应当释放张学良；另一种意见是陈诚和杜聿明等人，他们不仅不同意释放业已管束了整整十年的张学良，而且还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找借口杀掉张学良。

蒋介石为什么最终没有释放张学良，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有一件鲜为人知的事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张学良在听到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之后，在一幅红绸子上写了四个大字"东山再起"，并通过关系送给了原东北军的高级将领。没想到，这件事被戴笠他们知道了，并报告了蒋介石。结果，张学良不但未被释放，反而被押解到了台湾。

这幅写有“东山再起”四个大字的红绸子究竟落在了谁的手里呢？据了解，解放后，此绸幅一直保存在一位原东北军高级将领在北京居住的家中，“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强行拿走后烧掉了。此事人证俱在，千真万确。

一九五九年三月，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满面喜色，兴冲冲直驱张学良的阳明山居所。

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除宋子文外，张群与张学良交往最多也最深，并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有密切关联。然而，自西安事变后，两人在政治上有所疏远，加之张学良一直被禁于深山僻壤，二张之间再未晤面。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于几年的风风雨雨、恩恩怨怨在一阵阵叹息唏嘘声中消融了，两人才又重新引为挚友，相交甚笃。

当年，蒋介石召见张学良，即是由张群出面做的具体安排；张学良的《自述》和信件，也都是通过张群之手；一九五七年九月，蒋介石七十寿辰，张学良托张群向蒋介石赠送礼物，以示贺寿，蒋介石也回赠了一根制作精美的手杖，让张群带给张学良，意为让他多走走，多看看，释心开怀。

张学良拄着这根拐杖，在阳明山上踯躅徘徊了近两年。此刻，张群又携着蒋介石赋予的使命，再度登上了阳明山。

“四小姐，快给我弄点茶来，我都快要兴奋得渴死了！”张群一改他平日沉定稳重的习惯，大声说道。

“怎么啦，岳公？有什么喜事值得你这么高兴啊？”张学良从里屋走出来，问道。

“是有喜事。不过更值得高兴的是你们！”张群接过赵四小姐递来的茶杯，呷了一口，慢条斯理地说道。

“哦？”张学良和赵一荻都有些吃惊，“有什么喜事？你快说呀，岳公！”

“那我说啦！”张群看一眼赵一荻，又看了看张学良，一副

故作严肃的样子，“不过，你们可得挺住啊。”

“岳公，你再不说出来，我可要去忙别的事了。”张群这一卖关子，把赵四小姐给憋急了，做出要走的样子。

“好，好，我说，”张群抬手将赵四小姐止住，向坐下来的张学良凑过身子，说，“汉卿，你自由了！”

“自由了？”张学良重复一句，一时没反应过来。

“是的，你自由了。”张群说道，“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解除军委会对你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二十二年的自由突然降临了，然而，此时此刻，张学良并未欣喜若狂，相反，屋子里却寂然无声。好久，才传出赵四小姐低声的啜泣声。张学良从椅子上慢慢站起，一只手抓住胸前的衣襟，一只手扶住桌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

“汉卿，四小姐，这消息有些突然，但也是情理中的事。你们俩先高兴高兴，过几天，我再约几位朋友，大家一起好好地庆贺一场。”

张群刚刚告辞出门，这边赵四小姐已经大哭出声。她高叫一声“汉卿”，便扑到了张学良的怀中。

那个夜晚，张学良与赵四一宿未眠，默坐到天明。这么多年来，两人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着自由，幻想着自由之后那些舒畅快活的日子，可是，当自由陡然复归之时，两人竟异乎寻常地那样安祥，那样平静。

确切地说，从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起，二十二个春夏秋冬过去了，多么漫长屈辱、多么凄楚寂寞的岁月！那雪窦风雨，幽谷深情，过客黄山，浪迹萍乡，闲居郴州，惆怅沅陵，阳明苦度，刘育乡愁，幽默桐梓，温泉苦水，一幕幕从张学良眼前闪过，千般怨怒、万种恨意此时都猛然涌上心来，令他心潮难平。

尽管，这场为了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兵谏，使他本人付出了

沉重的代价，付出了他的青春年华和前途事业，然而，他耿耿此心，无怨无悔，他不惜把这牢底坐穿！岂料，就在他对自由已不抱幻想之时，"管束"居然解除了，自由翩翩而至。

几天后，张群、莫德惠、王新衡、冯庸、何世礼等人来到阳明山，向张学良和赵一荻表示祝贺。

王新衡原是军统局戴笠手下的第二处处长，西安事变时，他正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地区情报组组长，算得上是张学良的部下，与少帅相处十分融洽，此时，他任国民党的立法委员；冯庸与少帅是世交，少年时代的朋友，西安事变后，曾任东北大学校长，说来也是张学良的下属；何世礼原是东北军一〇五师炮兵营长，是张学良的直接部下，时任台湾国民党联勤副总司令。

如今，昔日的老友、长官喜获自由，他们自然高兴万分，在张群的邀约下，各自携带着礼物，兴冲冲地驱车上山。

自由后第一次会见客人，而且又是几十年的老朋友、老部下，张学良十分激动，他坚持要亲自下厨，为大家做一顿可口饭菜，以表达他对诸位的感激之情。

"饭天天都有得吃，今后也少不了，但今天的聚会意义可不一样，大家是来向老长官道贺的，有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足矣。"张群劝阻道。

尽管如此，张学良陪大家聊上一阵儿后，还是执意钻进厨房，亲自操持着做了一道红烧鲫鱼，众人品尝后，均交口称赞。

"这二十多年我也算没白过，至少我学会了做一手好菜，当得起半个美食家。"张学良听了众人的夸奖，颇有几分得意。

"汉卿会做一手菜也不容易。当年在湖南，他一手拿菜谱、一手提锅铲，口里念念有词，让我吃了不知多少顿要么淡死要么咸死的菜哩！"赵四小姐浅浅一笑，说道。

大家闲聊笑谈一阵儿，又转回到相聚的主题：庆贺张学良获得自由。

张学良对大家说："学良未死于冷枪暗箭之下，而有今日之获释，实乃不幸中之大幸。在座各位为学良之自由，数年来奔走呼号，颇多委屈，学良感激不尽，借此一杯薄酒，再次向各位表达谢意！"

张学良将酒杯重新斟满，高高举过头顶，然后一饮而尽，待酒杯放下，两行热泪从脸颊上滚落而下。

"纵览国史，凡有大作为之英豪，各有其非常之功业。"众人沉默一阵儿，莫德惠斟上酒站起来，脸上老泪纵横，"汉卿秉白山黑水之正气，英年继统东北军政，为防边守土，不惧血战。为爱护国家，毅然举东北四省同时易帜，首开国家统一之局。为消弭割据混战，而挥军入关，再造统一。又为抗战救国，于西北谋策呼号。迨因时隐退，而犹以在野幽居系天下苍生之望，以宁静无为而不坠乡邦累世之德。以沉潜缄默，而读史证道，参悟高深，集英豪贤哲为一身。德惠曾受两代恩德，感戴殊深，欣逢自由降临，吾辈无不慰藉至深，谨饮此酒，恭祝汉卿康乐长春！"

莫德惠一番话，悠扬顿挫，头头是道，历陈张学良的功德，众人莫不点头称是，纷纷举起酒杯，再次开怀痛饮。

"还有一杯酒，大家是非喝不可！"大家正要坐下，张群却摆手将人们止住，"我们应当为四小姐干一杯。汉卿隐退，辗转流离，四小姐毅然舍离幼子雅居，与汉卿朝夕相伴，以沫相濡，倾其温雅娴秀，扶助汉卿度难排忧，其高洁风范足令后世痴男倩女馨香景慕。如此红颜知己，天下几多？这杯酒，四小姐你应当喝，我们大家都应当喝！"

此时的赵一荻，早已泪流满面。她掏出手绢，抹去泪水，两手将酒杯举起，连声说："谢谢岳公，谢谢大家！"仰首将酒

饮尽。

吃过饭，众人回到客厅喝茶漫谈。莫德惠看见门口有警卫人员出入，便问：“汉卿，安全人员还没撤啊？”

“有这些免费跟班，惯了。”张学良淡淡一笑，“这些天，老有新闻记者往这儿闯，有他们还可挡挡驾，免得骚扰。”

“又是来探问西安事变怎么怎么的吧？”王新衡说，“他们总是搅得人不得安宁。”

“我现在最不想谈的就是西安事变，叫我怎么开口嘛！”张学良两手一摊，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

“主要是这事太大了，人人都想去撩开那重帷幕。”何世礼说。

“可是叫我怎么说嘛？”张学良无奈地说，“如果说我是被中共所欺骗，显然是骂我自己糊涂、愚蠢；如果说我是一时冲动，显然是骂我自己无能、荒唐；如果说兵谏是义举，他老先生活该被扣留，显然表示我还没有承认过去的错误。算了，算了，”张学良摆摆手说，“我干脆谁也不见，何况我已经过惯了这种清静的幽居生活。”

“副司令一生建树隆盛，历劫不磨，最适合写写回忆录，”冯庸说道，“我相信，这份回忆录无疑是当代史上最珍贵的，对于后世也是一个重大贡献。”

“汉卿是有这个打算，”赵一荻道，“而且还……”说到此，她突然住口，望着张学良，“这可是汉卿的秘密哟！”

我当时对老朋友们没有保密，我告诉他们我已经把回忆录的大纲都拟好了。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第一是写自己经手办的，第二是写自己亲眼看见的，第三是写自己亲耳听见的。既不妄自菲薄，也不文过饰非，一切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写出来。

自从张学良被解除了“管束”之后，来阳明山看望他的人

渐渐多了起来。宋美龄的亲信、原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也登上了阳明山。

黄仁霖与张学良同庚同乡，年轻时过从甚密，有过不寻常的友谊。自从张学良被押送溪口后，两人便再未谋面。现在，两位少时朋友以花甲之年相会阳明山上，隔世之叹骤然而生。

"汉卿，这些年你真不容易啊！"

"是啊！我甚至都不敢去回想，这二十多年是怎么过来的。一晃，我们都老了，真像古人说的，'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飙尘'啊。"张学良感叹道。

"往事如烟，真有点不堪回首。西安那几天，我真以为你一怒之下，会把我这个说客给杀了。圣诞节那天，你派副官坐吉普车来接我出班房，我心里就想，一定是我的末日到了。没想到后来事情演成了另一副样子，真是有点戏剧化的味道！"

"这些事情你还记得那么清楚啊，老黄，我可早就忘了，"张学良笑道，"这么多年来，我不想谈西安的事，跟任何人都不想谈，我自己也不愿去想。"

"听说汉卿研究明史很有心得，还准备写回忆录，是吗？"

张学良摇摇头，没有说话。

"汉卿对明史确实很专心，还计划研究清史、民国史，想从中找出我们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的内在症结。也准备写回忆录，可是现在，他已经决定放弃了。"赵四小姐接口道。

"汉卿，你要放弃写回忆录那可太可惜了！"黄仁霖大声说，"无论怎样，你都应该给后人留份记录啊！"

我当时就说："算了，回忆录不写了。这么些年，我一直在读明史，根据我的经验，记录下来的历史都不过是管见，人言言殊，常常很不正确。一来呢，我要写回忆录，涉及的都是当代人物，有时候难免会有批评，惹得人家不高兴。再说，我也不愿意丑表功，千秋功罪，还是留待后人去评说吧。第三

呢，”张学良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接着道，“我老啦，一回忆起往事，我就会激动，会坐不住，我受不了。”

“没有你的回忆录，现代史上就像缺了一页，让人遗憾哪！”黄仁霖虽然理解张学良，但仍坚持道。

“那有什么？愿意写回忆录的人多得很哩！总统前几年不还写了本《苏俄在中国》嘛。”张学良仍固执己见。

“那汉卿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呢？”黄仁霖话锋一转。

“你还记得不，我在南京被押的时候，你送过我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圣经》啊！当时你还在上面写了一段话：‘我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你，就像它所帮助我的一样’。”

“哎呀，汉卿！还是你的记性好啊，这事我都给忘光了。”

“当时我心情不好，拿到书只翻了翻，就给塞到箱子底下了，不过，朋友送的东西我可没敢丢，二十年搬了那么多次家，我都把它带在身边，现在可派上用场了。”说完，张学良到书房取出一本蓝色布封、已显得陈旧的书来，放到黄仁霖面前。

黄仁霖接过《圣经》，翻开扉页，便见到了二十二年前自己写在上面的那段话，顿时激动不已：“哎呀！真是这本书啊！当年送给你的时候，可没有想到你会把它保留几十年啊。”

“老黄，这本书我冷落了它二十多年，现在才认真看，获益匪浅呢！”

“汉卿的两位朋友董显光和曾约农来看他，引他去山下总统和夫人常做礼拜的士林教堂，听牧师讲过几次道，兴趣倒是蛮大的。”赵四小姐道。

“好啊，好多年没见面了，以后我们应该多聚聚才是。”黄仁霖感慨道。为不让张学良与赵四过于疲劳，他欲起身告辞。

“欢迎黄先生经常来，”赵一荻热情地说，“汉卿常说，人愈到老年，愈感到朋友的珍贵。像你这样儿时就是朋友的人，就更少了。”

“只要两位主人欢迎，我巴不得天天都来这里坐坐呢，”他指指头上的白发，伤感地说，“老啦，想同你忆忆我们年轻时候的事了。”

“欢迎常来，”张学良上前同他握手，“你放心，我这里不是西安金家巷，再不会把你给关起来了！”

两位老人顿时开怀大笑起来。

第八十九章　北 投 岁 月

1961.8

——“小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啦！”

——“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里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台湾的建设吧！”

——“不少朋友都误会我张学良，以为这些年我浪费了政府很多钱，谁知道我花的大都是自己的钱。”

自从和蒋先生会面之后，经国先生和我往来两年多时间。其间，我们看了不少土地，最后他和我商量，选定了北投这个地方。地皮是公家的，建筑费是我自己出的。我选择北投这个地方，是因为它好似北京西山附近，向南望去有条河、北京城南不是有条通往芦沟桥的永定河吗？早晚眺望可引起我对故国

山河的思念。

原来，一九六一年初，张学良向前来看望他的蒋经国说，他年纪大了、住阳明山，上下都不方便，距台北市区又远，与朋友往来有诸多不便，能否自己出资，在市郊盖一幢房子。蒋经国当即同意，并自告奋勇地说，地基由他去选，一定让“老汉公”满意。

约莫过了一个月，蒋经国派车将张学良接到台北西郊的北投复兴岗，让他看看勘定的地基。张学良登上小山岗，见这里视野开阔，台北市区大道上，车水马龙，尽收眼底；附近建筑又少，槐绕柳合，环境安静，是家居的绝妙之处，空地上还可建个花园和网球场。张学良和赵四对此地皆十分满意。

建房之事既然由蒋经国张罗，速度自然很快。到八月底，一幢两层的灰色小楼已经落成，宅号为复兴三路七十号。楼前面是一个大院，两边是姹紫嫣红的花园，高高的柳树，风吹枝摇，荡出爽爽凉意。

搬家那天，张学良显得格外兴奋。来台以后，无论是新竹井上温泉还是阳明山的寓所，都是当局为“管束”他而选定的，每道门，每扇窗，都带着羁押的阴影。而现在，他终于能按照自己的意思，拥有一幢自己的住宅，能够吐纳自由的空气了。

当年手握重兵的少帅，现在为了这一块小小的领地，竟激动得绕前绕后，老泪纵横。

“小妹，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家啦！”

得知张学良乔迁新居，张群、王新衡、莫德惠等一批老朋友都赶来恭贺。蒋经国则差人送来了一套崭新的客厅家具，以示祝贺。

就在张学良搬家期间，国民党在阳明山召开了著名的“阳明山会议”。

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由于蒋介石一味专制独裁，备受美、日、港和岛内“第三势力”的抨击。为了缓和形势，扭转蒋介石独裁者的形象，并为日后的出路寻找对策，国民党邀请了一些海外知名的华裔文人、学者、社会贤达，以及港台的部分党派到阳明山上进行“恳谈”，一时间，阳明山上名流显贵云集，国民党官员们做出一副谦恭姿态，听任人们对蒋介石政权的种种批评指责。

会议参加者中，有不少张学良昔日的部下、朋友。原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便是其中的一位。

周鲸文多年为“释张”奔波呼号。此次，他原以为很快就可以见到张学良，稍一打听，才知道还要经过许多关卡。适逢莫德惠前来看望他，说起拜见张学良的事，莫德惠忍不住击掌大笑：“你这个少帅当年的秘书长，怎么现在连如何去见长官都不知道了？要见少帅啊，跟我来吧！”

周鲸文见到张学良，正是张学良夫妇搬入新宅的第四天。阔别二十五年，当年的满头青丝皆已变成苍苍白发，两人乍一见面，百感交集，万语千言涌堵心头，竟像孩子一般大哭不已。赵四小姐立于一旁，也陪着流泪。

哭过叹过，渐渐平静下来后，才说起了这二十多年来的沧桑岁月。

“我真没有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汉卿，当初要是你还在，我又何至于背井离乡，远渡重洋啊！”周鲸文唏嘘道。

“虽然没有见面，你的情况老朋友们还是给我讲过一些。这二十多年，你一直在为我的事奔走，也吃了不少苦头，学良在这里向你道谢了！”说完，张学良两手相拱，向周鲸文一揖。

“这哪里使得，哪里使得?！鲸文等人无能，才使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周鲸文连忙伸手将张学良扶住。

“真是浮生若梦哪！这些年，山居无人，寂寞相伴，开始

还烦躁得很，慢慢的也就习惯了，淡漠了。三国的曹植说：‘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想想就是这个道理吧，我又何能求得一世的荣耀呢?”

“鲸文虽在海外，但一直在关注你的消息。听说过去你一直在研究历史，近来却又皈依基督教了?”

“是啊!”张学良说道，“在明史研究告一段落，正准备研究清史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圣经》是一部最完美的经典。又听过一些讲经布道，精神上顿时豁然开朗了，一扫当年的困顿迷雾。”



一九六一年八月，张学良（右）与前东北大学秘书长周鲸文合影于台北北投复兴岗张学良自建住宅中。

“我真难想通，汉卿你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周鲸文脸上满是困惑。

“是啊！当年我崇拜学术，认为天底下最有权威的，是最有学术的人。现在不同了，我一心一意求取心灵的宁静，对神充满全部的虔诚。”

谈话中，周鲸文了解到张学良和赵一荻一起去做礼拜，信仰极其笃诚；张学良还精通英文，不仅能说能写，还用笔名以英文写阐述基督教义的书。

“信奉基督，汉卿觉得自己有了更多的自知和自忏。”赵四小姐在一旁道，“汉卿读史，使他的人生得‘通’，而皈依上帝使他的人生得‘达’，‘通达’之后，他觉得自己的性格更能摆脱开人事，更能看破红尘了。”

周鲸文并不能完全理解两人的话，但听后还是点了点头。

“我二十七岁的时候就写过一副对联，叫‘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没想到会有那么强的预见性，应了我后来的情形。”张学良平静地说，“你想想，我一从讲武堂出来，就当旅长，当少将，统兵握权，其实我哪有那么大能耐？所学所知，最多是一方面的，怎么能应付复杂的局面呢？再加上我少年时代受的教育，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不完善，生性又争强好胜，怎么说都难当大任。如果这二十五年我过的仍然是任意独行的生活，很可能会犯大错，甚至可能把命都丢了。”

“汉卿的话，鲸文一时可能还理解不了，可是我能感觉得到，少帅如今是心地坦荡，豁达超然了。”周鲸文说。

“汉卿常常说，他现在是怀慈悲之心，不欲与人争，不欲与人辩，只求心灵的安宁。”赵四小姐为周鲸文的茶杯续上水，站在一旁说道。

接着，张学良向周鲸文详谈了他与蒋介石会见时的情形。然后说道：“经过两年多和经国先生亲切往来，我两人相处得很好，但不知什么缘故，近来不相往来了，据我侧闻，好似老



张闾琳夫妇与儿子在一起。

先生不叫他再和我往来了，我们已经有好多天没见面了。”

谈话间，一个三四岁的小男孩从里屋蹦跳着出来，叫着“爷爷”，扑进张学良的怀里。张学良满面笑容，慈爱地将孩子搂紧，逗起笑来。

“这是……”周鲸文侧脸望着赵一荻。

“这是闾琳的儿子罗比。”赵一荻答道，“蒙总统恩准，每年闾琳夫妇都从美国回来一趟，看看我们。”

“那你媳妇是……”

“叫陈淑贞，是陈济棠的闺女。”

“啊，堂堂粤军主帅的闺女嫁给东北军主帅的公子，真是门当户对，天作之合啊！”

“他们两人都在美国读书，见面一谈，都觉得满意，就结婚了，”赵一荻脸泛笑容地说道，“这个是小儿子，还有个哥哥，叫巴比。我也常去美国呆几天，看看儿孙们。”

“真是老天有眼，”周鲸文叹道，“汉卿儿孙有继，阖家美

满，心灵又有寄托，真是不枉此生了！"

这时，小孙儿吵着嚷着要"骑马"。张学良不顾有客人在座，当即匍伏在地毯上，让罗比骑上后背，口里一边"哦哦"地叫，一边载驮着孙儿在屋里爬行。赵一荻有些看不过，上前欲将罗比抱下，可是孙儿一哭叫，张学良便将赵一荻止住了："逗逗孩子，也是天伦之乐嘛，何必管他。"

周鲸文面带笑容，看着张学良继续在地上爬行，心头却像堵了块石头，哽塞得难受。

二十多年前，张学良英姿勃勃，骑在他那匹远近闻名的"盖西北"马背上，纵横驰骋，号令三军。可谁会料想到，二十多年后，他会以花甲之身匍伏在地，为孙儿当起了牛马！

不知不觉，两人已谈了五六个小时。当时台风袭击台北，电线被台风吹断，他们点上蜡烛，继续海阔天空地聊，谈兴盎然。

事后，周鲸文又接连去看了张学良三次，最后一次从深夜谈到凌晨两点。张学良侃侃而谈，豪放、豁达，再现了当年少帅的风采。

与此同时，在参加"阳明山会议"的嘉宾中，又有一对不速之客来到了北投，他们就是阔别了二十五年的张学良的大女儿张闾瑛、女婿陶鹏飞。

陶鹏飞原籍辽宁凤城。当年，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陶鹏飞正是该校学生。谁知万里有缘，陶鹏飞在欧洲求学期间，竟然结识了母校校长的千金。两人的关系很快从同乡之谊升华为爱情，并于一九四一年结婚，后离欧赴北美。

自从定居美国加州以来，陶鹏飞一直在圣旦克兰大学担任教授，除教学以外，十分热衷于侨界社会活动，发起组织了全球性的"中华联谊会"，十分活跃。

陶鹏飞和张闾瑛来台湾后，提出要见张学良，但当局几经

推诿，迟迟不见答复．张闾瑛不得已，只好去造访她的张群伯伯。

张学良是从报纸上得知女儿女婿来台湾的。当张闾瑛和丈夫四处托人求情时，台湾《自立晚报》发表了一条新闻："张学良之女来台探亲，官方不理不睬。"

为了排遣张学良的忧愁，赵一荻一连几天外出买菜，实则想寻到张闾瑛夫妇居住的宾馆，同他们见见面。但由于"保安"人员的监视，她找不到面见张闾瑛夫妇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赵一荻劝张学良给宋美龄写封信，请她帮忙。张学良为了不使女儿女婿失望，便给宋美龄写了信，同时，又写信向张群求助。

正当张群想见一见张闾瑛夫妇时，不料，他们两人却找上门来了。当张群听完张闾瑛夫妇的请求后，欣然表示一定帮忙，答应马上去找蒋介石。

"总座，"张群向蒋介石进言道，"您既然已恢复汉卿的自由，那就让他们父女见见面吧，再说汉卿已是六十岁的人了……"

"岳军兄，你就放心吧，既然你都出面了，我怎么能驳你的面子呢！"蒋介石转而对身旁的蒋经国说，"你马上就去办，快让汉卿和女儿、女婿见面！"

九月初，张闾瑛和丈夫陶鹏飞乘坐一辆雪佛莱轿车，沿着曲折的盘山公路，向北投复兴岗疾驶而来。当轿车在一幢爬满了绿藤的二层楼前停下时，张闾瑛和丈夫看到便衣保安人员已三三两两地站在了房子四周。

刚一走进客厅，两人便见到了父亲。坐在沙发上的张学良拄着拐杖缓缓地站起身，一只手伸向前方，嘴唇哆嗦着，欲呼无声。

"爸爸！"张闾瑛抢上一步，紧拉住父亲的手，一声悲叫，

引出满脸酸楚，竟嘤嘤地哭了起来。陶鹏飞也走上前去，先称呼了一声“校长”，接着又唤了一声“爸爸”，泪水也夺眶而出。

张学良老泪纵横，哽咽无语，他伸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好半天才颤着声叫着女儿的名字：“闾瑛……”

刹那间，二十多年的思念，二十多年的期盼，以及自己二十多年的凄楚苦痛，如潮水一般地漫卷而来。

这时，陶鹏飞走到岳父身旁，用双手扶着老人颤抖的双肩，搀着他坐回到沙发上。

“闾瑛，”张学良用泪水盈盈的双眼打量着陶鹏飞，轻声问道：“你女婿叫……”

“爸爸，我叫陶鹏飞。”

“爸，鹏飞当年还是您的学生呢！”

“是的，爸爸。”陶鹏飞说，“我记得爸爸当年任东北大学校长时，戎装佩剑，步履雄健地走上主席台，面对东北大学学生讲演，您说道：‘汉卿我实在不配任校长，但在命运上、历史上造成了自己的地位和责任！为担负起这一责任，为救国的宏愿，大家要一心一德，共同奋斗！’当时，我就在台下，聆听完您的讲演后，我们激动得掌声雷动，热泪涌流……”

在张闾瑛的记忆中，父亲气宇轩昂，英姿勃发。一九三四年在欧洲与她们母女分别时，他是何等的踌躇满志、豪爽英迈啊！而此时，父亲已垂垂老矣。闾瑛在想，在那些密布的皱纹里，含留着多少辛酸、多少屈辱和苦难啊！

张学良知道女儿的心思，他摆摆手，将自己的手绢递过去，安慰道：“都过去了，你们不要再为我掉泪。苏东坡说‘人世一大梦，俯仰百变，无足怪者’，我们又何必把自己缠在旧事之中呢？还是说说你们吧，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

陶鹏飞回答说，一家人在美国很好，不愁衣食。他又递上

一家人在寓所前的合影，说孙儿孙女们都向爷爷问好。张学良看着照片，脸上漾起了笑容。

“美国我没去过，将来若有条件，我要到那里去看看你们。”张学良兴奋地说。

“前几天我还和鹏飞商量，想请您到美国去转转，散散心也好。”

“还是以后吧，我现在不好随便走的。”张学良摇摇头说道。

“您不是自由了吗，想到美国去还不方便？”闾瑛不解地问。

“是呀，我是自由了，我可以去台北市啦，也可以去下馆子啦！”张学良苦笑着说。

接着，闾瑛讲起了母亲，说他们差不多每年都去洛杉矶看望她老人家。

“你母亲现在怎么样？”一提到“母亲”，张学良的心像被蜇了一下，忙问道。

“妈妈到了美国后，诊断是患了乳腺癌，做了手术，但没什么后遗症。”闾瑛回答说，“她现在住洛杉矶莱克瑞治路……”

“她现在……”张学良打断闾瑛，猛然问道，“她愉快吗？”

“妈妈生活上虽然很优裕，可是她经常念叨说‘千好万好，不如人好’，说着就掉泪。我们常常去看她，陪她解解闷，可是老人家却难得高兴一次，老是对着房间里你的照片看，口里叨念着你的名字。”闾瑛说着说着，轻声抽泣起来。

张学良呆呆地望着地上，满脸苦痛与伤感。

“我们临走前去向她老人家告别，她闷着声一直没有说话，”陶鹏飞叙说道，“直到我们要走了，她才拿了一张最近的照片，说让带给你。”说着，张闾瑛将照片取出递给父亲。

这是于凤至在自己别墅庭院里照的，她斜倚在一把藤椅上，神态平静安详。张学良颤颤巍巍地接过照片，见当年俊秀娴雅的妻子如今也已两鬓染霜，再仔细地凝视她那双眼睛，平静中却似蓄含着巨大的幽怨和哀伤。

二十一年了，大洋阻隔，亲情难诉。于凤至无时不在关注着丈夫的命运，从美国不时寄钱寄物，表达自己深深的思念。在酸楚漫长的幽禁岁月里，妻子的关怀与情爱给了张学良巨大的安慰，成为他熬过艰难人生的一根精神支柱。

七十多个日夜滞重地流逝了，于凤至离别时那一声声“汉卿，你多保重”的呼喊，仍不时萦绕在他的耳际。

现在，看到照片上已二十多年未晤面的妻子的容颜，张学良怎能不激动，不伤悲！

女儿女婿陪着父亲又落了一阵眼泪，陶鹏飞急忙岔开话题，问道：“对了，爸爸，妈妈说您老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研究《明史》，是吗？”

“唔，研究《明史》，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阵子我确实对《明史》着了迷，可现在，我不再研究了。”

“那为什么？”

“现在，我在读《圣经》，这可是一部最光辉的经典著作啊！”

接着，父女俩又谈了些家事。一小时瞬间就过去了，闾瑛体谅老人的处境，起身准备告辞，并一再嘱咐父亲多多保重，说一有机会还会再来看望的。陶鹏飞也伸出手来，与老岳丈紧紧相握。

“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在这里很好，叫她不要惦记，”张学良对儿女说，“请她体谅些我的难处，有事情我会写信给她的。”

“明白了，爸爸。”张闾瑛边答应着，边扑上前去紧紧抱住

父亲，然后捂着脸，转身奔出房门，快步上了汽车。

关于张学良北投新居的情形，曾任蒋经国副官的罗启先生曾回忆说：

“一九六一年，张学良北投房子建好后半年，蒋经国叫我上车，在车上才告诉我要去见张学良，谈了些情形。他说，本是董显光陪，现在由你陪，因你懂英文，为周联华牧师证道的事，可做做联络人，陪张上上教堂。

“到了张宅，诸人皆在，有张群、王新衡、叶翔之、陈大庆等。一会儿，蒋夫人到，提了蛋糕贺四小姐生日，蒋经国马上趋前扶候，甚为恭敬慎重。”

“张学良曾对我说过两件事：一未见蒋日记，二未识胡蝶。我问与蒋有否协议，张不答。我认为一定有，只是公布了有人会 look bad。”

是的，我说西安事变时看了蒋先生的日记，其实是给他一个台阶下。我是看了，但我看了更生气。唉，里面怎么写的就不谈了。蒋先生太狭隘了，天下就败在 CC 与戴笠手上，总是安个特务在你身边。蒋先生就喜欢听这些人的话。

有人说我在贵州得盲肠炎时，戴笠派了特务要把我弄死。他这样干也不算错。在那时就把这事完了，解决了，死了就死了，没有了，省去这个麻烦了。而且，我也不认为就是戴笠。

一九六二年，美国白雪溜冰团第二次来台公演。有一天，蒋经国派人去买票，在座位表上选了连号四张，又在这四个座号的前后左右买了“插花式”不相连的门票七八张。晚上，蒋经国同三位贵宾同来观看表演，当时，在场的人都不认识和蒋经国一起来的是什么人。

这时，负责安全保卫的头目把场内负责人找去，说今天是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看表演，要求场地负责人要留意一些。第一，不能随意告诉他人；第二，不可让新闻记者知道；第三，

如果身背闪光灯照相的记者走进这一区域，应立即知会安全人员。这样一来，在场的场务主任、票务主任才知道同蒋经国一起来看演出的，原来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和赵四小姐。

过了两三天后，原来的安全人员又来买票，并和前一次一样。由于他们已和场地人员相熟，便坦率地说张学良还想再看一次，蒋经国只好再陪一次。

蒋经国当时的工作十分繁忙，在短短两三天内，能够抽空连续陪张学良去观赏白雪溜冰团的表演，可见蒋、张之间深厚之情谊。

但是，张学良是很有分寸的人。后来，当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时，为减轻其负担，他坚决要求减少与蒋经国的往来，他对蒋经国表示，如若不接受此项建议，将考虑拒绝院长的邀请。这样，蒋经国才迫不得已接受了张学良的请求。

张学良的“管束”虽然已被解除，但他并未获得普通人那样全面的自由。搬来北投时，他抛下了一大批敷染着幽禁阴影的物品，过去保密局配给他的汽车，他也坚持退掉了。另外托人买了一辆二手的福特牌轿车，闲着无事，便开车进城转转，但去的地方有限得很，不外是拜访一下莫德惠、张群、王新衡等老朋友，有时也去台北看看父亲的五姨太王夫人、六姨太马夫人以及她们的子女张学森、张学英、张怀敏等人。若他要见蒋介石，须通过张群的联络；若见蒋经国，须通过王新衡；见宋美龄则通过黄仁霖。但外人想要见他，就不那么容易了，须通过以上几位张学良的老朋友搭桥牵线。

这时期，张学良在台北市内活动无须事先备案，他可以在市内随便走走、逛逛。

我与张发奎很要好，我们从前不认识，后来我旅欧，在英国认识了他，他到台湾，总要来看望我。有一天，我们两人，又加上空军的张会昌，我们三个姓张的一起去“红宝石”饭店

吃了一顿饭。过了三四个月，我又到“红宝石”去吃饭，掌柜的说，哎呀，那时你们三个姓张的一起来吃饭，可现在那两个人都没了。那掌柜的我喊他张向华，我就说，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怎么还没死，是吗？他连说，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

另外，台北的天厨、国宾西餐部、红花餐厅内，也常常出现张学良的身影。

张学良常去五条通与王新衡来往。蒋经国住四条通，张学良也常过去交谈。有一次，张学良对蒋经国说：“你有那么多钱，又不能反攻大陆，放在那里做什么？我看还是好好搞台湾的建设吧！”

于是，加速建设台湾的构想就在他们的闲聊中诞生了。

台湾高速公路开工后，台中以北没有哪一段工地张学良没有去看过。看过之后，他就与蒋经国长谈，常常谈到凌晨二点。张学良叮嘱蒋经国一定要重视台湾建设，并畅谈了他在东北、西北时的建设经验。

一九六二年春节期间，张学良身体欠佳，心肺功能不好。荣总副院长姜必宁曾为他在胸前锁骨下安装了一个小型打火机式的人工心律调整器，以维持正常的血液循环。除了患有轻微心脏病外，张学良右眼还患有严重的白内障。

不少朋友都误会我张学良，以为这些年我浪费了政府很多钱，谁知道我花的大都是自己的钱。

在美国花的钱更多，我内人于凤至长年住在医院，她用的钱非常多。

我父亲兴建东三省铁路时，请了一位美籍工程专家当顾问，他返国时，我父亲送了他一大笔钱，让他投资经商。这位专家确也是个理财能手，几十年后竟变成了亿万巨富。十分难得的是，这位专家为人忠厚，对我父亲时刻不忘。在他致富之

后，曾一再打探我们家人的下落，直到国府迁至台湾，他才得到宋子文先生的帮助，来台北看望我，归还给我一大笔钱。这位知恩报恩的美国豪富，也就成了我的好朋友。

一九六二年，负责监管张学良的刘乙光已经六十四岁了，在他升调安全局任特勤室主任的饯别宴会上，张学良风趣幽默地说："刘乙光是我的仇人，也是我的恩人。仇人是他看管我，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现在他要走了，我知道他家的情况，我想送他一笔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

但在场的蒋经国对张学良的"心意"表示了婉谢。

张学良说的"仇人"，虽是出自幽默，但还是有所指的。他与刘乙光曾经相处得很不错，后来又一度变得很不好。刘乙光惟恐张学良逃跑，处处限制其自由，使张学良很难堪。刘乙光和张学良那火爆性格撞在一起，免不了要发生冲突，但在长期的相处中，张学良理解了刘乙光，也体谅到刘乙光的所作所为是在奉命执行特殊任务，是在尽忠职守。后来，管束张学良的任务由蒋经国负责，蒋经国对刘乙光的一些做法是不满的，这是因为时代在变化，刘乙光扮演的角色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在台湾，特别是对张学良"解除管束"后，张学良与刘乙光及其家人相处得亦不错，刘乙光及其家人在感情上是偏袒张学良的。刘乙光的大量照片记录了刘家与张学良及赵一荻在"山居幽处"时恩恩怨怨、风雨同舟的命运。

一九八二年，刘乙光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四岁。有一次，记者在问到与刘乙光的关系时，张学良说："刘乙光有他的立场，我还是很怀念他的。"

第九十章　白首缔盟

1964.7

——“平生无憾事，惟一好女人。”

——“我同意蒋夫人的意见，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小妹，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载，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白兰花送给你。”

我现在已经老了，才肯说这些话。我有两句诗：“平生无憾事，惟一好女人。”我乱七八糟得很，不能说得上是什么爱情，我年轻时是非常荒唐的。

一次，记者让张学良回忆一下他一生不平凡的爱情。

记者问：“请您谈谈您和赵四小姐这段深刻的爱情，以及你们这些年相处的状况。她真的是您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依靠吗？”

张学良："本来是我和我夫人于凤至在一起，后来于凤至在贵州时得了乳房癌，政府很恩典，答应她到美国医治。蒋先生蒋夫人对我很好，就召赵四回来陪伴，我的后半生都是她在陪我。"

记者问："您觉得她怎么好？"

张学良："当年，她年轻时也是个很好玩儿的小姐，陪我这些年她也实在不容易。"

"汉公，你同赵四小姐是恩爱有加的，这一点不容否认。可不少人也开玩笑说，要不是西安事变老总统把你关起来，也许你早就找别的女人去了。"唐德刚教授直言不讳道。

这也真得要感谢他，假如不是西安事变，我自己还不知道我能做出什么恶业，不知道。我现在的太太，有一天她跟我说了一句话，她说，要不是西安事变的话，咱俩说不定早就完了。她说，你这个混蛋，我也受不了。

我的女朋友好多，行的却没有几个。其实我并没有怎么追过女人，除一两个女人我主动追过以外，大都是女人追我。在这方面，我父亲不管我，但也不完全是放纵我。我父亲最喜欢在吃晚饭的时候，没事，他一个人坐下来喝点酒。我就专门找这个时候，陪他喝两盅，吃点肉。当他喝得多一点时，也不是喝醉，这时，如果跟他商量点事，要钱也好，办军务也好，这事就好办多了。

有一次，我父亲在我第五个母亲那儿，他冲着我说，你这小子，你当我不知道你，你尽出去跟人家混，混女人。我可告诉你，玩女人可以，但你可别叫女人把你玩了。我的五母亲在旁边说，得了吧，你的儿子够坏的了，你还教他呢。

但是，我问心无愧。我这个人待朋友，待部下，以诚相见，问心无愧。我除了好点色之外，没有出过旁的错。我从不与部下的老婆、部下女人搞暧昧关系，甚至我家里的人，我都

不许与她们来往，连部下们的姑娘我都不许她们到我家里来玩儿，为什么呢？我怕招风惹蝶，怕惹事，怕惹出闲话来。这就是我自个儿做人的界限。

不客气地说，我有好多女人，不是女朋友，我指的是跟我发生过关系的女人，但都是与我政治上没有关联的女人，都是在酒饭、打麻将一类事情上交往。

我跟溥杰很要好，我跟他太太有关系。不过，不少人也都知道这事。

不，是他的前妻，她后来跟溥杰离婚了。她不是汉人，是满人。她父亲当过清朝驻西藏大臣，她家境很好，她几几乎乎成了溥仪的人，选妃子时都把她选上了。她是谁呢？珍妃、景妃你晓得吧，两妃都是她们家出来的，她叫她们姑，她一直是在宫里长大的。她跟我讲了不少，所以皇宫里的事我知道得很详细，西太后怎么整的，珍妃、景妃怎么整的，她都很清楚。珍妃跳井死了，她是跟着景妃长大的。宣统帝很喜欢她，可是景妃说这个人不能当妃子，因为她的性情是很淫荡的，最后就没有选上。她聪明极了，混蛋透了，她要不是坏蛋，那我就会娶她的。

我跟溥杰、我俩很要好，我就劝溥杰说，你要听我的好话，你应当做个军人，你到奉天来我的讲武堂念书，然后在我的军队中留下来做点事。但他的家人劝他不要来，说他把你弄到奉天，会把你弄死的，因为他和你太太有关系。

她姓唐，我们怎么认识的呢？有一次，我与朋友们在北京饭店吃饭，在座的我的一个亲戚对我说，那边有俩人在吃饭，想认识一下你，那我就过去了，见了面，是溥杰和他太太。然后，他们就说明天请我到他家里去吃饭，这没有什么好客气的，我就答应了。第二天到他们家里去时，一下子把我惊呆了。这位溥二奶奶拿出这么厚的一本粘好了的新闻剪报，都是

近几年来报纸上有关我的消息的剪贴，这就证明她早就对我有心嘛，就这么着，我就跟她偷了，以后几几乎乎差一点娶了她。

不过，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完全是玩儿假的，我最恨人作假。哎呀，这个人可会做人了，她有点才气，能写能画，作诗能文，什么都会，我很喜欢她，可是，后来我发现，她画的画是人家改过的，作的诗也是人家替她改的。她现在大概还活着，在香港定居。

我还给你讲一个我的秘密，我还和国府王外交部长的妹妹同居了一年多。

那还是中俄会议之后，王部长带着他的太太、他的小姐、他的妹妹到奉天来。天地良心话，我喜欢上了王部长的小姐，可是他的这妹妹是一个大混蛋，她对我有心，夹在这里面，把我给抢过去了。怎么个事儿呢？我给她们寄照片，我说寄给王小姐就行了，可是她却把信给拿去了，不让王小姐知道，还给我回信，就这样一来一往，好上了。那王小姐也有点傻不里几的，不像王部长的妹妹那么聪明。

我再给你说一个人，这人现在死掉了，她是自杀的。天津最有名的是梁家，他有四位小姐。这梁老头可真有意思，他有很讲究的大楼，但楼上不点电灯，都点油灯，为什么呢，怕电灯走火。那么阔气，但没有汽车。他是天津怡和洋行的买办，是何东最要好的朋友。

他有个四小姐，我很喜欢她，我就跟她开玩笑。她说，张先生你别跟我开玩笑，我问你，你喜不喜欢我？我说我喜欢你，那你呢？她说我也喜欢你，但你不要那样跟我乱逗着玩，你喜欢我，你真能娶我吗？

后来，她嫁给了叶公超的哥哥。她嫁了以后，我还到她家去过。她对我说，张先生，你到我家，我无法请你吃一顿饭，

我没有钱请你吃饭。

叶公超的哥哥也很有钱，因为他有钱，她爸爸梁老头就在她出嫁时仅陪了四千多块钱，那叶公超的哥哥就看不上她。结婚后，她给他生了个儿子。后来，她丈夫得了肺病，病稍微好了一点时，在一个宴会上，有一位太太，实际上是交际花一类的，在那儿灌他酒，他太太就在旁边说：'你的病刚好，你少喝一点吧！'这不是好话嘛，可是他过去就给了她一个耳光。这一打，他太太就走了，坐火车去了上海，在火车上自杀了，吃了洋火头自杀的，可怜啊！可见这个女子是很刚烈的一个人。

你要是把我的艳史写成书，准能发财！

张将军说完，与唐德刚教授、王一方一起纵声大笑。

尽管如此，张将军的红颜知己，终生陪伴他的，则非赵四小姐莫属。

当张学良同赵四小姐被幽禁到台湾时，他们俩强烈感觉到需要有一个信仰，心灵上需要有一个依靠。

那时，刘乙光是个佛教徒，常与张学良谈佛教，并为张学良安排去见新竹的几位佛教法师，张学良也买了许多佛教的书来研究。

五十年代初的一天，宋美龄前往阳明山造访，她问张学良最近都看些什么书，张学良告诉她说，他正在研究佛学。

"汉卿，你又走错了路。"宋美龄诚恳地说道，"你也许认为我信基督教很愚蠢，但是，世界各国许多有名的、伟大的人物都是基督徒，难道他们都是愚蠢的人吗？"

宋美龄这个"又走错了路"的"又"字用得很妙，张学良后来于一九九四年一月二十一日在夏威夷教堂做见证时，特别提及此事。

不久，宋美龄介绍曾约农来教张学良有关基督教的教义，

但是曾约农有高血压和心脏病，需要休养，便又换了董显光。董显光的夫人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除了跟张学良谈教义之外，还送了一本《马丁·路德传》给张学良。宋美龄也送英文的基督教书《相逢髑髅地》（The Met At Calvary）作为课本，张学良还把它译成中文。这本书一九七〇年在香港出版，因译者署为“曾显华”，名不见经传，所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蒋介石发表讲话，谈到关于恢复张学良自由一事。接着，宋美龄又在蒋氏官邸接见了张学良与赵一荻。

宴席间，宋美龄说：“汉卿，听说你对《圣经》很感兴趣，今天把你们请来，是想给你们介绍一位有名的牧师，待吃完饭后，我就陪你们去见他。”

饭后，一辆美式轿车载着宋美龄、张学良、赵一荻去士林附近的一座基督教堂。在和张学良的对话中，周联华牧师感到张学良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了。他问张学良有什么要求，张学良回答说，请牧师为他举行受洗礼仪式。

“事倒是好事。可是依现在的情形，受洗是不够格的。”宋美龄说。

“怎么？”张学良有些吃惊，以为蒋夫人另有他指。

“你想想看，你和凤至还有正式婚姻关系，是夫妻，但是你现在又一直和四小姐同居，等于同时有两个太太，按教义，这是不许可的呀！如果你要成为虔诚的基督教徒，必须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后，才能接受洗礼。”

张学良一下子噎住了，他真没有想到还有这层说法。是呀，虽然他与于凤至分离已二十五年了，但毕竟两人间还存在着正式的婚姻关系。而赵四小姐虽与他朝夕相伴，肌肤相亲，但名分上，她一直是他的“私人秘书”，顶着“四小姐”这个暧昧的称呼。现在，他必须在她们两人之间进行选择了，否

则，便不能踏上他所选定的心灵归宿之路。

赵一荻听了宋美龄的这席话，觉得这样做太伤凤至大姐的心。她劝张学良说："汉卿，你真的那样做，对凤至大姐的打击太大了！说心里话，我之所以能这么长久地陪伴你，都是大姐的苦心。对这，我已经很满足了。"

尽管赵一荻一再如此表示，但，张学良还是郑重地说："我同意蒋夫人的意见，和于凤至解除婚姻关系。"

就这样，张学良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向她提出请求，准备托人带到美国，转交给于凤至。

恰在此时，凤至的亲生女儿和女婿前来北投探视，张学良便对他们说："闾瑛啊，爸爸老了，现在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你妈妈和一荻的原因，牧师不肯为我进行教徒洗礼。这封信带给你妈，就说我请求她帮助我下决心吧！"

张闾瑛从父亲的话里明白了信中所写的内容，只好怅然接过父亲写给妈妈的信。

一九六三年秋天，美国洛杉矶一处乡间别墅的台阶前，于凤至正在和女儿观赏碧绿的草坪。

"闾瑛，你和鹏飞从台北回来大概有两年了吧？"

"是的，妈妈。"张闾瑛回答。

"孩子，说心里话，这两年，我总是怀疑，你们有事在瞒着我，我总是在想，你爸爸为什么连封信也没给我？"

闾瑛被母亲这突然的问话弄得很紧张。她把父亲写给妈妈的信压了两年。此时，她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又问起了这件事。

闾瑛瞒着妈妈，自有她的道理。她知道母亲的不幸。乳腺癌手术后，虽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但是长子闾珏、次子闾珣先后病殁，对她的打击太大。多少年来，母亲在远隔重洋的异

国，时时刻刻思念着她那遭受幽禁的丈夫，作为女儿，怎么能把父亲要求离婚的信给她，在她受伤的心上再撒上一把盐呢？想到这里，张闾瑛禁不住抽泣起来。

“闾瑛，你今天怎么了？你一定是有事在瞒我！”

闾瑛狠了狠心，终于把父亲写的信交给了妈妈。对于一个女性，尤其是对一个已渐入老境的女性而言，要作离婚的抉择实在太苦、太难了。可是，倘若汉卿不作出此举，他又将面临何等困窘的处境！望着隐约可见的洒在信纸上的斑斑泪痕，于凤至完全体会得到，张学良在写这封信时，内心是何等的矛盾和痛苦。

一连几天，于凤至坐卧不安，常常一人独自静静地思考着张学良的请求。丈夫的信是他们夫妻自一九四〇年分手以来的第一封亲笔信，然而竟是离婚请求信。她想到自己已有二十多年未尽妻子的义务和责任，深感内疚，同时对赵一荻二十多年如一日伴随张学良的忠贞爱情深感钦佩。所以，她看完来信后并不过分难过与嫉妒。相反，她为赵一荻能长期伴随幽禁中的张学良、度过二十多年与世隔绝的艰辛生活而大为感动。

“大家的心意我都明白。我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汉卿的苦处我不是不知道，我自己也曾经想过这件事。”于凤至对前来劝慰的儿女们说，“赵一荻是位难得的女子，二十五年来，她一直陪着汉卿同生死、共患难，一般人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对她十分敬佩。现在由她陪着汉卿，汉卿高兴，我也放心。至于我个人的委屈，同他们所受的无边苦楚和寂寞比起来，那又算得了什么？”

接着，于凤至语气坚定地说：“只要能使你父亲熬过苦日子，我任何事情都答应。”于是，她欣然挥笔向张学良表示，接受离婚之请求，向赵一荻表示祝福。

“你们之间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堪称风尘知己。尤其是

绮霞妹妹，无私地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任劳任怨，陪侍汉卿，真是高风亮节，世人有口皆碑。其实，你俩早就应该结成丝萝。我谨在异国他乡对你们的婚礼表示祝贺！”于凤至在信中这样写道。

凤至的豁达与体谅，使离婚之事进行得十分顺利。一九六四年三月，张学良收到了她同意离婚的有关文件。

对此离婚案，张氏父子的重臣萧振瀛的公子、美国中国东北同乡会会长萧朝智先生，同作家王朝柱曾有这样一番对话。

王朝柱问：“萧先生，作为于凤至的义子，您能给我们谈谈您干妈同意和张将军办理离婚的事情吗？”

“可以，”萧朝智先生沉吟片时，强压着内心的悲恸，几乎是哽咽着谈了自己对这出令人心碎的人间悲剧的看法，“首先，我不赞成外界这样的报道，一是说张将军为了履行基督教的教规，不得已提出和于凤至离婚的；再是说于凤至为了成全张将军和赵四小姐的爱情，自愿在离婚书上签了字。”

萧朝智先生有意镇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旋即和盘托出了这出人间悲剧的内幕：“世人皆知，张将军身边有一位于夫人和与之相随的赵四小姐。同时，这些年来也没有任何人说赵四小姐不是张将军的夫人。在这期间，早已皈依基督教的赵四小姐，也没有哪一位牧师说她的名分违背了教规。时下，张将军决定皈依基督教了，为什么蒋夫人宋美龄就提出了教规问题了呢？显然是出于政治考虑的。蒋介石与蒋夫人清楚：在大洋彼岸的洛杉矶住着张将军的元配夫人于凤至，而且于夫人明确表示，决不回台湾。在蒋氏夫妇看来，这就等于在美国为张将军预留下一条退路。他们为了根绝张将军走出台湾的念头，将张于离婚当作试金石抛了出来。对此，张将军心里是清楚的，遂忍着内心极大的苦楚给于凤至写了一封信，请求他的‘大姐’能够理解他提出离婚的要求。”

"对此，于凤至女士能够理解吗？"

"能！因为我的干妈也是懂得什么是政治的。"萧朝智说到这里，禁不住落下了悲愤的泪水，"当时，她亲自对我说：'汉卿是他们笼子里的一只鸟，他们随时都会把他掐死的。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死都不怕，还怕在离婚书上签个字吗？'所以，我干妈是为了张将军更好地活下去才同意离婚的。"

郭维城先生于一九八八年赴美国洛杉矶拜访于凤至女士，谈起当年的离婚一事，于夫人说："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

"在于夫人的心目中，她是否真正认为自己与张将军解除了婚约了呢？"有人这样问萧朝智。

"我干妈从来也没有这么想过！谁要说她不是张夫人，她就把她视为仇人。"萧朝智断然地说道，"这些年来，张将军给她来信的称谓没有变化，就说蒋夫人宋美龄吧，她每年给我干妈寄圣诞贺卡的时候，也依然写的是张夫人。"

是啊，正是这位蒋宋美龄向张学良提出：想洗礼皈依基督教吗，你就必须和我的干姐妹于凤至办理离婚手续；当她获悉于凤至同意在离婚书上签字以后，她每年又以张夫人的地位宽慰远在大洋彼岸的干姐妹于凤至。

从这里，也许会让人认识到什么叫政治。

对于一个已过花甲之年，而且又具如此身份的人来说，再续鸳盟自然不是一件小事。为此，张学良悄悄地征询了几位老朋友的意见，大家全都赞成赵四小姐成为正式夫人。

张群指着当年曾做过他长官的少帅说道："我说汉卿哪汉卿，这件事你早就该办了。人家赵四小姐十六岁就跟定了你，一直跟到五十三岁，百般体贴，冷暖相知，娶他做夫人，是你的艳福呢。"

王新衡也说道："古人言，人生得一知己足矣！四小姐跟

着你三十多年，风风雨雨，百难不悔，这样的红粉知己，哪里去找啊！"

有了于凤至的理解，有了朋友们的支持，张学良心中释去了忧虑，变得快慰起来。

"来，小妹，坐下，"张学良把赵一荻拉到身边说，"我有件事要让你做。"

"有什么事你尽管说行啦，还这么郑重其事的干什么？"赵一荻有些诧异地望着他。

"是件大事情。"

"说吧，只要你愿意，什么事情我都肯做。"

"要你做我的太太。"

"太太？"

"是的。我想同你正式结婚，让你名正言顺地成为张夫人。"

赵一荻一时没反应过来，只愣愣地望着他。良久，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她猛然捂住脸，跑进了卧室，传来的嘤嘤哭声，像是诉说着一种突如其来的喜悦，又像是在倾吐着爱的坚贞、爱的幸福和爱的辛酸……

张学良本想进屋去安慰安慰，却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让她哭吧，让她将这三十多年来的委屈和痛楚统统用泪水冲洗得一干二净吧。

一连许多天，两人忙忙碌碌。先是翻历书择喜期，最后定在七月四日。接着是选结婚地，有人建议说，婚礼即使不在台北的大教堂，至少也应在北投的士林教堂举行。但张学良却表示反对，他不想弄得满城风雨，赵一荻也支持他的想法，商议一阵，大家最后决定在台北的美籍人士吉米·爱尔窦的家中举行。

爱尔窦是张学良的老朋友，早在沈阳时就同少帅来往密

切，西安事变时，他为和平解决事变也曾出过力。他是位虔诚的基督徒，住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宽敞，客厅华丽而又有宗教气氛。在这里举行婚礼，不会惹人注意，可免却许多外界的纷扰。

婚礼的日子渐渐临近，赵一荻却为两人的结婚礼服费了不少心思。她反复思量，反复选试，最后挑出了一件湖蓝色旗袍，穿在身上显得十分淡雅脱俗。一串晶莹闪亮的水晶项链挂在脖子上，顿时，于朴素中又显出了几分华贵。

张学良选择结婚礼服则随意多了，认为只要有一套整洁的西服就行了，可赵四小姐却不依，坚持为他做了一套浅灰色的西服。

我们俩结婚，可以说一半是蒋夫人出的力。当年我在溪口的时候，蒋夫人是很不愿意她在那儿陪我的，说像个姨太太似的，对蒋先生也不方便。可是到了后来，蒋夫人非常喜欢她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是张学良和赵一荻终生难忘、幸福甜蜜的日子，在历经三十余年坎坷岁月之后，他们终于向世人宣布结为伉俪。这年，张学良刚过六十四岁生日，赵一荻五十三岁。

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蒋夫人宋美龄、张群、王新衡、何世礼、莫德惠和冯庸等十二人。他们的证婚人是百岁高寿的博士陈维屏，主婚人乃请黄仁霖充当。

黄仁霖在《从西安事变谈到张少帅其人》一文中写道："结婚典礼即在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台北寓所举行。由我太太文华弹琴，在少数几位观礼者之中，蒋夫人亦赫然在座。当我搀扶着赵四小姐的手臂，并伴送她登上那个改造过的礼坛的时候，整个西安事变的情景，在我的心头涌现着。"

赵一荻与张学良并肩而立。当牧师唱完圣歌后，便神情肃

穆地开始了基督教的婚礼仪式。此时此刻，新娘赵一荻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

往事如烟，历历在目。

赵四小姐最初是以马君武写的一首讽刺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正当行”而闻名于世的。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起，她甘领秘书之名，伴着张学良走过春夏，走过秋冬，从关内到关外，从西安到溪口，从大陆到台湾，忍受着数不尽的凄风苦雨，经历了说不完的颠沛磨难，用她那柔弱的双肩，分担着张学良的悲恨与苦痛。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西安事变之后，赵一荻不惜抛弃一切，甘愿做一只比翼鸟，自投囚笼，与张学良相依为命，患难相从。

在与世隔绝的苦闷中，再加上种种精神上的折磨，她的流离凄苦可想而知。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张学良把一切希望和欢乐都寄托在赵一荻身上，赵一荻则尽自己的全部力量，给张学良以安慰和照料。凡是张学良愿意做的事情，赵一荻就陪着做、跟着学，她样样都会，事事随和。

张学良在幽禁中经常看英文报刊，用英语会话，赵一荻就用英语与之对答；张学良要打网球、钓鱼，赵一荻就陪他一同前往；张学良研究《明史》，写文章，赵一荻就给他购买书籍，查找资料，帮助做文字工作；张学良视力不好，看书报颇费气力，赵一荻就读给他听；张学良喜欢文物古董，赵一荻就去帮他采买、鉴别和收藏；幽禁中，许多生活琐事都由赵一荻亲自动手，比如缝制新式样的衣服，烹调可口的菜肴等等；张学良使用假牙要用一种细线绳，这些细线绳都是她一根一根用手捻成的，然后再打上蜡料备用；赵一荻虽然出身官宦家庭，但没有贵族子女的骄矜之态，有的却是一颗对爱情始终如一的诚挚之心。

一九五八年秋，周恩来总理见到张学铭夫人朱洛筠，问道："你认识赵四小姐吗?"朱洛筠答道："我和她从小同学，很熟。"总理听了，很有感触地说："赵四小姐，聪明贤慧啊!"

三十五年，弹指一瞬间。此时此刻，老牧师按照基督教例行的仪式，首先向张学良问道："张先生，你愿意赵一荻做你的妻子吗?"

"愿意!"张学良高声答道。

老牧师又转向赵一荻，问道："小姐，你愿意张毅庵做你的丈夫吗?"

赵一荻哽咽着说："愿……意……"

话音刚落，圣诗又起，参加婚礼的人鼓着掌，为他们祝福、贺喜。

"交换饰物!"老牧师喊道。

张学良拿着戒指的手在抖动着，半天也套不进赵一荻的手指。

目睹此情此景，众人感慨万千。新郎新娘，万语千言涌心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两人无言以对，惟有深情相视。

赵一荻的双手发颤了，眼泪扑簌簌从脸颊直滚而下。戒指虽小，但这是夫妻之证啊！从她认识少帅张学良那天起，她不就盼望能高高兴兴、欢天喜地地戴上这只结婚戒指吗?

婚礼结束了，赵一荻挽着张学良的胳膊走出教堂。

"走！到台北最好的酒楼聚一聚!"张学良兴高采烈地对来宾说。

在漫长的幽禁生涯中，张学良和赵一荻适应了寂寞孤苦的生活。今天，面对台北市喧哗繁忙的环境、婚礼的热闹气氛，他俩有些不适应。然而，这是何等令人陶醉的喜庆时刻啊！赵一荻伴着张学良翩翩起舞，博得众人阵阵掌声和喝彩声。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

卅載冷暖歲月·當代冰霜愛情

少帥趙四·正式結婚

紅粉知己·白首締盟

夜雨秋燈·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樓東風·往事不堪回首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正式结婚。图为台北《联合晚报》的报道。

婚礼当天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告别了各位朋友，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复兴岗住地。

夜幕垂落，月光皎洁，为良辰增辉。

夜里，我握住赵四的手说：“小妹，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载，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白兰花送给你。”

不久，台湾《联合报》向世人披露了一则令人瞩目的消息：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举行婚礼。文中的各段小标题这样写道：

卅载冷暖岁月·当代冰霜爱情
少帅赵四·正式结婚。
红粉知己·白首缔盟。
夜雨秋灯·梨花海棠相伴老

小楼东风·往事不堪回首了
基督见证·宗教婚礼
妾似朝阳常伴君·此情感动于夫人
遥想公瑾当年·何曾蝴蝶翩翩

文中最后报道说："张学良近年来，甚少与外间接触，但近三年来，他仍然接见了若干著名人物，例如他的女婿陶鹏飞教授、香港《时代批评》的发行人周鲸文以及最近返国的妹丈赵世辉博士，凡探视过张学良的人，都曾私下告诉朋友说：'少帅老了，赵四也老了！'"

第九十一章　中秋乡思

1979.10

——“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子也喜欢。”

——“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得好好转转。”

——“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理，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内人总愿意跟我开玩笑，说我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这也是事实。

本来，我本人是个儒家，但我对佛教又很有研究，后来，我又信奉基督教。现在，我认为基督教是最高的。在社会学上，可以认为基督教是一种宗教，但我个人却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是一千九百多年前发生的一件实实在在的真事。我信仰

耶稣基督，是信仰真有这么一个人，由他身上，以及他所做的事，反映了上帝的时代，而他本人就是上帝的化身。至于我个人，一点没有什么奢求，一切都围绕着上帝。

婚后的张学良和赵一荻，相扶相伴，步入上帝洒播的圣洁光环之中。这样，在漫长的凄苦与折磨之后，张学良终于为自己那颗飘零的心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一座避风港。

张学良是受宋美龄的劝告和引荐而研究《圣经》的，在基督教方面对他启发最深的三个人是曾约农、董显光、周联华，张学良就从这三个人的名字中各取一字，以“曾显华”作为自己的教名。赵一荻的教名为“赵多加”。

“曾显华”说：“信教是一项了解上帝存在的过程，所以，若有人说不信上帝则下地狱，是绝对错误的。人家不信教，是因为我们基督徒没做好工作，没有把上帝这个存在让人们晓得，这是我们的责任。对我们基督徒来说，耶稣复活、圣母童贞怀孕、以色列人过红海，都是确有的事实。”

他又说：“我们信主的人，生病也会感谢主。我太太生病，别人会说，生病还感谢什么？我太太说她有这么好的医院、医生、药品，她不该感谢吗？我们能活下来，就是上帝的意思。我太太在十多年前与陈太庆同时检查出肺黑点，陈因为公务繁忙，拖了半年才开刀，已无救。我太太也检查出肺部有小指大的东西，三位诊治医师卢光舜、丁农及另一位胸腔专家本来都签字决定不开刀了，我在荣总走廊上遇到第三位，我问应不应开刀，他说应该，我说，那你为何签字呢？他说怕有违资深医师丁农的意见。我说这怎么行呢，找到卢光舜，他也说应该开。三位医师刚好都在，结果推翻前议，开了刀，在癌肿最初的阶段加以切除。所以，我太太能活下来，这完全是上帝的安排。她的身体仍有很多病痛，说不定随时会去上帝那儿，我们完全接受上帝的旨意。

"我注意保养身体，并不是为了贪生。我有两个理由，一、我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我要使它洁净，以接受上帝的留在；二、我是上帝的工具，就如锯子和螺丝钉一样，我要保持它的锐利，以备它有天要用。"

由于《圣经》文字艰深，张学良和赵一荻决定把《圣经》的教义深入浅出地写出来，编成浅易读物。两人写的第一本教义名为《好消息》，表达了人类因有上帝指引而不致迷路犯错的欣喜。接着，又写出了《新生命》、《真自由》、《大使命》。

董显光、曾约农、周联华等人见到这些字迹娟秀的传教文章，十分欣喜，分别为之作序介绍，大加赞赏推荐，在台北的宗教界颇有影响。受了这些鼓励，两人对证道册子的写作越发专心，不久，又有《女人》篇闻世。

除了研读《圣经》外，张学良又热衷于植养兰花，与"花中君子"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养兰，我买了有关兰花的书籍和杂志，而且向这方面的专家请教。近年来，我家只订两份报纸、一份月刊。两份报是《中央日报》和《联合报》，一份月刊是《兰花世界》。兰是花中的君子，其香也淡，其姿也雅，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兰的境界幽远，不但我喜欢，内子也喜欢。

台北地区养兰的人不少，每逢岁末年初，正是兰花盛开时节，台北桥下的兰花交易所、重庆南路的民众活动中心，兰界人士济济一堂，热闹非凡。每逢此时，"赵先生"必定到场，随兴所至地浏览观赏，台北市区及近郊，只要稍有名气、略见规模的兰园，他几乎全都访遍，还同主人一起，对兰株的优劣品头论足。

兰界人士把"赵先生"的到来看作是一种荣耀，他每次光临，主人必热情相待，敬奉香茗，一同闲坐园中悠悠漫谈，只是话题不离兰花。后来他们才知道，这"赵先生"原来就是大

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

这一时期，“赵先生”曾一下子买回二百多盆兰花置放在园中。

蒋经国得知张学良酷爱养兰后，每次看望他时，总带上一两盆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相赠，张学良则笑逐颜开，连声道谢。

此时，张学良北投家中的布置是这样的：一进门，楼梯一侧挂着张大千先生的画，右边是接待来访者的客厅，最右边有一套小的圆桌椅。左边是张学良的书桌，书桌旁有一副蒋经国的画，上面写着：“森森君子节，奕奕古人风。”中间壁炉上，有一“先总统”蒋公和夫人照片制成的瓷盘，墙上还挂有蒋夫人的画。

一九六五年一月，蒋经国当上了台湾的“国防部长”，张学良向他表示祝贺时，委婉地提出，先生的担子重了，工作更加繁忙，以后能否减少同自己的来往。

“我一个老头子，打发时光的办法多得很，我不想更多地耽误你的时间。”张学良向蒋经国恳求道。

“工作再忙，看看老朋友的时间还是有的嘛，”蒋经国在电话中说，“只要汉卿你不烦我就成。”

“那个时候，经国先生经常不打招呼，就把车子开到北投来了。”蒋经国身边的副官回忆说，“经国先生在张学良这边很自在，看到什么酒好，也不经过主人同意，开了就喝。”

一九七二年，蒋经国当上台湾的“行政院长”。为此，张学良专程前望蒋经国的官邸，当面祝贺之后，明确表示：鉴于蒋经国现在的身份和工作的繁忙，希望日后减少彼此之间的来往，若蒋经国不接受这个意见，他将考虑拒绝蒋经国的拜访和邀请。

“没想到汉卿你这么固执，”蒋经国苦笑着说，“那好，我每个季度去看看你，总可以了吧？”



一九七三年春，张学良在台北。

“不行，”张学良摇摇头，“还是太频繁了。你一个行政院长，哪里抽得出那么多时间。我看每年大家见一次面就足够了。”

但蒋经国坚决反对，两人争执了一阵子，最后达成“君子协定”：每半年两人会面一次，有事可通过电话随时联系。

“你看你汉卿，”蒋经国摇着头说，“本来大家是朋友，结果搞成邦交式的例行会晤了。”

“那有什么办法，”张学良固执地说，“谁叫你是行政院长呢？”

一九七五年四月五日上午，蒋经国还和往常一样，向总统父亲请了安，报告了些政务情况。当时，蒋介石点头示意，并无异状。但到了午后，他突感不适，旋即进入昏迷状态，经急救无效，当晚十一时停止了呼吸。

斯时，屋外大雨如注，间有雷鸣电闪。凌晨二时，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将张学良从睡梦中惊醒。电话是张群打来的，告诉他蒋介石已于几个小时前去世。张学良听罢一惊，在电话中“啊”了一声，便再无言语。

当年“兵谏”的枪声，已使张学良同蒋介石之间成为仇敌。蒋介石每每同人谈起兵谏之事，便会恨恨地骂上几声“张汉卿真是可恶”。但是，张学良毕竟在易帜和中原大战时有功于蒋介石；一九三三年，他又代蒋受过，下野出洋；就以西安事变而论，要是没有张学良的努力，他又如何能平安返回南京？最后，又如何能成为权倾一时，声望隆盛的全国抗日领袖？

蒋介石之所以不杀张学良，而要对他处以漫长的囚禁，并时常关注他的健康和安全，不时让宋美龄送些礼物，都是出于这种爱恨交加、十分复杂的矛盾心理。

而在张学良内心，对蒋介石则始终抱有君臣父子之情，常常在痛恨之后，从心底里又涌起一股难以说清的感激。

张学良最后一次见到蒋介石，是在蒋介石逝世前八个月的士林教堂礼拜上。蒋介石那时已十分虚弱，脸色蜡黄，举止呆滞，行走起坐都由宋美龄和一名侍卫搀扶。张学良远远地望着他，但他却始终没有将目光转向张学良，留下的仅仅是一个虚



一九七五年秋，赵一荻在台北郊外。

弱不堪、颤颤巍巍的背影。

蒋介石去世后第四天，遗体移至台北市的“国父纪念馆”。张学良携夫人前来吊唁，向这位恩怨交织的长官告别，看他最后一眼。

蒋夫人让她的秘书带我到蒋先生的遗体前看看。说起这些事情来，像我们这种关系，都是很有意思的。蒋先生对我很好。一个人，有他好的一方面，也有他坏的一方面，仅仅是好的方面多，还是坏的方面多而已。蒋先生无论如何是有功的，当年，他在致力于中国的统一方面，是有功的。

张学良站在水晶棺旁，久久凝视着双眼紧闭的蒋介石。在大权独揽、呼风唤雨、叱咤风云六十年之后，这位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强人亦是一代败君终于永久地寂灭了，随之而去的是他的政治权术、孤傲专制的作风，和他永远不能“光复”大陆的梦憾。

张学良抬起头来，看着自己写来的挽联：

关怀之殷，情同骨肉；
政见之争，宛若仇仇。

为这幅挽联，张学良足足想了三天。这短短的十六个字，生动地概括了两人之间的关系，可是，它又怎能将他们之间的爱憎恩怨彻底详尽地说白道清呢？

事隔多日，张学良听人说起，蒋介石在临终前曾同蒋经国有过一番谈话。说到张学良时，蒋介石以四个字告诫他的儿子：“不可放虎！”

张学良没有想到，在自己幽居四十载之后，蒋介石居然还把他看成是一只虎。

我认为蒋公失败了，是失败者！我很不愿意批评他，我今天跟你俩人说句心里话。蒋先生这个人哪，是很守旧、很顽固

的人。这么讲吧，我说一句话来批评他：假如能做皇帝，那他就做皇帝了。

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个性，正像马歇尔说的那样，他是死拿着权不放的人。就像你那本《李宗仁传》上写的那样，那李宗仁说的一点也不错，他说蒋先生，你不干了，你还在那儿操纵什么？你还照样在那儿下命令，你这样干，人家怎么办？你到底干，还是不干？这是蒋先生的错误。

蒋先生有大略，没有雄才。是啊，这也是我对他的批评。我把蒋先生跟我父亲比较，一个有雄才，一个有大略。蒋先生这人没有雄才。

张晓林这个人你知道吧，杜月笙你也知道吧。当然，他们都是帮会的人啦。他们说蒋先生不会做，说蒋先生应该把你放回去，你把他送回来南京，他把你放回西安去。这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惜蒋先生没有这个雄才。

说实在的，蒋先生对我也很够意思，我在他困难的时候帮他，他对我也相当看得起。

多年来，为了让蒋家解除对自己的顾虑与戒心，张学良频频用各种方式表示对政治已没有任何兴趣，竭力想甩掉过去的名声。他曾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甚至连张学良这个名字，我都不想要它了！我不想当张学良，我只想当个普通人，自己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言下之意，自己绝不再是过去的张学良，决不会再向当局提出任何挑战。

所幸，"放虎"之说没有影响到蒋经国与张学良的友谊，两人的交往不断，相互间执礼有加。

一九七八年，已任国民党主席两年的蒋经国被选为"总统"，子承父业。蒋经国宣誓就职后回到家中，第一个打来电话祝贺的，便是张学良。

蒋经国当然意识到了张学良的良苦用心。在他看来，父亲



左起：刘乙光、张学良、蒋经国。

将垂垂老矣的张学良仍畏之如虎，实在是多虑了。这位当年的少帅已没有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难道他还能在这个孤岛上再演出一场“西安事变”、再掀起一场政治风暴吗？既然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何不再迈出一步，以显示自己思想的开明与政治的宽容呢？

一九七九年十月五日，时值蒋经国就任“总统”一周年之际，蒋经国伉俪在大直寓所举行中秋茶会，邀请张群、何应钦、张大千夫妇、黄少谷夫妇、张学良夫妇、马纪壮夫妇、张宝树夫妇到寓所欢聚。

会后，蒋经国陪张学良夫妇到阳明山赏月。张学良触景生情，当场挥毫写就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诗：

来是空言去绝踪，月斜楼上五更钟。
梦为远别啼难唤，书被催成墨未浓。
蜡照半笼金翡翠，麝薰微度绣芙蓉。
刘郎已恨蓬山远，更隔蓬山一万重。

张学良以此诗感念身世，怀念亲人，寄托思乡之情。

第二天，“总统”邀请客人共度中秋的消息赫然刊登在台湾的各大报纸上。对于其他嘉宾，民众兴趣平平，人们感兴趣的是，“先总统蒋公”昔日“管束”的囚徒，怎么会出现在现任“蒋总统”的官邸，而且是同这么多的军政要员在一起？

五天之后，蒋经国又邀请张学良夫妇前往总统府，参加“双十节”庆祝活动。当天，他们夫妇就座于观礼台贵宾区的座席上，兴致勃勃地观赏阅兵式，成为众所瞩目的又一大新闻人物。

人们不禁要问，难道蒋氏家族与张学良之间已泯尽仇怨、握手言欢了吗？或者，蒋经国是在偿还父债，用他的微笑与尊

重，来弥补张学良在几十年幽禁中所受到的凌辱与委屈，抑或用张学良来点缀他民主与开放的新政？

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日上午，蒋经国又满足了张学良的愿望，由“总统府”副秘书长张祖诒夫妇和“国防部”副参谋长马安澜陪同，乘专机前往金门参观。

这天上午九时，张学良与赵一荻抵金门，参观了这里的各项军事设施，同官兵见了面。当张学良看到这里景色秀丽、民风淳朴、一派生机勃勃时，禁不住赞誉说：“金门不仅是军事前线，也是海上乐园啊。”

赵一荻担心丈夫的身体吃不消，不时地问他是否要休息一下，张学良却说：“好不容易来金门一趟，得好好转转。”

马安澜见张学良游兴甚浓，又带领他们一行人来到古宁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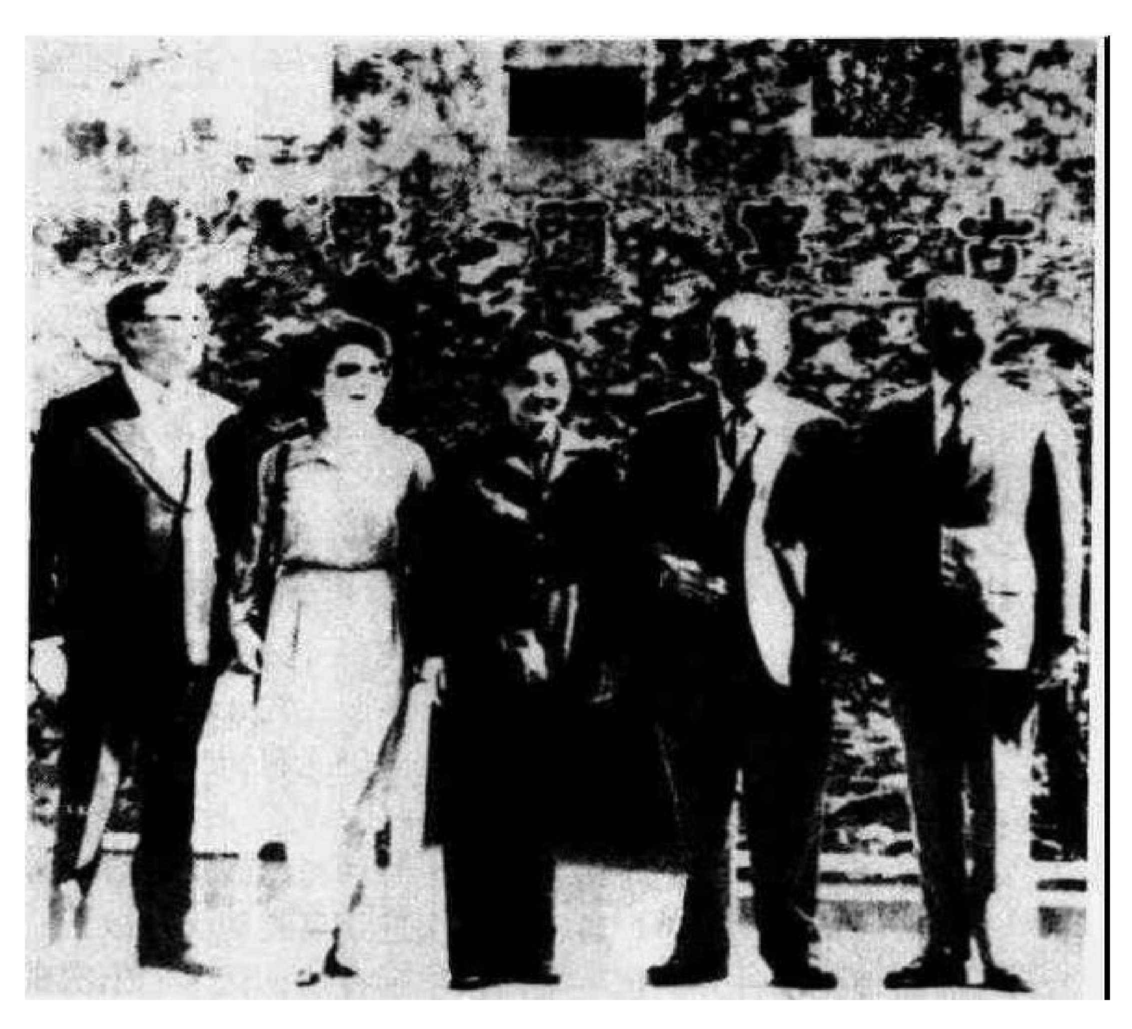
古宁头是金门岛距大陆最近的凸出部。一九五〇年，国共两军在这里曾进行过一场殊死血战，眼下仍能看到当年炮火留下的痕迹。

张学良与赵一荻站在滩头，面对大海汹涌的波涛，心潮起伏。这是他们来台三十多年后，第一次近距离眺望大陆故土。

马安澜带领一行人来到一架高倍望远镜前，让人们依次观赏大陆风光。当张学良夫妇看完后，马安澜问张学良：“怎么样？”张学良避谈政治军事，仅淡淡地说：“风光很好。”

这时，摄影师来到众人面前，张学良夫妇与马安澜、张祖诒夫妇留影纪念。当天下午，张学良夫妇乘专机离开金门岛，返回台北。

张学良偕赵一荻的金门之行，台湾官方的“中华社”和军方的“军闻社”均作了报道。美国中文报纸《世界日报》还刊登了题为《张学良在金门眺望故国河山》的报道，并配发了两幅照片：一幅是张学良与赵一荻的合影；另一幅是张学良眯着眼睛，脸紧贴在高倍望远镜上，贪婪地观看海峡对岸大陆的照片。



一九八〇年十月，张学良（右二）偕夫人赵一荻（右三）由张祖诒、马安澜陪同，到金门访问。

参观金门之后，张学良在给亲友的一封信中，引用了于右任晚年思乡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故土深切的思念之情：

葬我于高山兮，望我大陆；
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苦。

一九八一年六月十七日至三十日，张学良因患重感冒到台

北荣民总医院住院治疗，当时同在这家医院治病的《联合报》记者于衡，曾多次趁机闯进张学良的病房访问他。

第一次，“随从人员”没有察觉，使于衡得以同张学良攀谈了五十多分钟。当于衡第二次去访问张学良时，“随从人员”就向他发出警告“以后不要再来麻烦张先生”，要他“自我节制”。但是，以后于衡仍作了六次时间较短的访问。采访中，张学良向于衡侃侃而谈。

“西安事变前后的一段日子，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日子。”

“九一八事变后，我看到《大公报》张季鸾写的一篇有关‘九一八’的社评，文中有血有泪，有些文句，到现在还留在我的脑中，虽然半个世纪过去了。”

“人不是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别人而活。”

经几次访问，于衡写了一篇数千字的《张学良访问记》，发表在同年九月十八日的《联合报》上。文中写道：

“张学良已满头灰发，头顶中间的头发脱落，成了罗汉秃。有人说他‘声若洪钟’，其实是由于他两耳重听，讲话时怕对方听不到，所以嗓门拉得特别高。

“除了患视网膜炎和老年性重听病以外，他心脏、肾脏、肝脏、血压，都很正常。

“望着他那疏落而灰白的头发、面部的老斑，再加上医院病人所穿的宽大睡衣，还有他那一脸纯朴的表情，看去真似乡间的老农，哪里会想到他就是五十年前叱咤风云的张少帅呢！”

在谈到对张学良夫妇的印象时，文中说：“张学良头脑清楚，精明中带有粗犷，粗犷中带有精明，境界很高，对中国文化理解也深；赵一荻辞锋锐利，咄咄逼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下午，蒋经国因心脏病突发，大量咯血而死。

第二天，张学良获准来到荣民总医院怀远堂，吊祭这位同



一九八八年，张学良夫妇进餐时合影。

他交往了四十余年的“总统”。当他缓缓步入灵堂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背脊微驼、头发脱落、步履艰难的老人，极少有人知道他便是威名赫赫的张学良将军。

台湾《自立早报》曾载文报道说：“他的到来，并未惊动新闻界，年轻记者不认识此老。张学良是老了，步入灵堂后，脸上神情哀伤凝重，他在经国先生灵前，深深鞠躬。就在这弯腰顿首间，多少纠缠的历史恩怨，从此云淡风轻……”

我到台湾来的时候，台湾很不景气，现在台湾很有进步。在这一点上，我要稍微说说。台湾的进步，应该说主要是蒋经国的功劳。我对蒋经国这个人非常佩服。经济问题、建设问题、军队的整顿、政治方面的整理，他都下了很大的功夫。很

可惜他去世太早了。

吊唁完毕，赵一荻轻挽丈夫，两人双双走出灵堂。

在低沉悲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缓缓回首，驻足凝望，那眼神，那目光，分明是在告别一个时代，分明是在向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沉重历史作最后的诀别！

第九十二章　九 秩 华 诞

1990.5

——“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我自已从来没有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

——“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互依靠，我早不知到了何种地步了！”

我父亲在奉天城外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对此，我有点迷信，总感觉父亲与我有特殊关系。我出生时，父亲头一次打了个大胜仗，起了家。我现在六月一日的生日是假的，我不能过生日，因为这会使我想起父亲。

谈到祝寿一事，张学良如是说。

正因如此，张学良从此不提他生日之事。后来，他年事渐

长，不忍拂逆大家的好意，爱在哪天过都无所谓。

有人曾就生辰当面问过少帅，他答得很妙："这个问题要问主，我的出生是他赐的恩典！"

这些年来，台湾政局宽松，言论自由，因此，张学良说："我有完全自由，心灵自由，身体也自由。"

这也确实是事实。依照政局的发展，如果蒋经国先生在世的话，出面为张学良做寿庆生的，很可能是经国先生自己。然而，张学良也知道自己身份敏感，再说，他恬淡已久，十分珍惜这份宁静的自由，因此并不愿与外界多作接触。

但是，外界仰慕关怀之情不断，要说张学良完全不领情，未免有点不近人情。不公开出面，外界说他仍没自由，一旦出来，他所喜爱的自由又被打扰。

何况，何谓公开露面，公开到什么程度？每到寿辰，这些压力就一齐涌来。为此，张学良曾半玩笑半认真地说："你们不要逼我，否则我干脆住到金门去。"

然外界对此内情却不甚了解。

就在张学良九十寿辰前夕，台湾舆论界刮起的翻案风吹到了张学良头上。

一九八八年初，台湾"国大"代表、史学家刘心皇在杂志上撰文为张学良鸣不平。他愤然写道："如果将特赦部分说上，就更证明关押十年之后的再关押，是更非法的！非法的关押就是冤狱，就有人要求翻案，要求平反！"

三月一日，台湾"立法委员"董正之又致函"行政院"，要求开释幽禁五十多年的张学良。这是蒋介石去世十三年后，第一次有人这样提议，宋美龄对此十分重视，不久即派员慰问张学良，并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新闻界的采访，是否愿意接受社会各界的邀请。

恰巧，三天后，东北大学在美国的校友会电邀张学良赴华

盛顿，参加将在四月十六日于美国举行的东北大学建校六十五周年和张学良兼任校长六十周年纪念大会。

三月二十三日，东北大学在美校友会再次致电邀请张学良。电文中还说，如张学良不能前往赴会，校友会将组织一个代表团前往台湾向其表示慰问。在这种情况下，新闻界的记者更是强烈要求采访张学良。

八十八岁高龄的张学良对社会各界的关怀深表谢意，并将他最近的生活状况与感想，口授给他的侄女张闾芝，让其笔录，作为回答各界关怀的公开信。

这是张学良被幽禁五十多年来，首次发表的公开信，内容如下：

> 学良迁居来台以后，平时生活简单宁静，与内子莳花、饲鱼、读书，怡然自乐，深足自慰。多年前信奉耶稣基督，勤于灵修，颇有领悟，不问外事。近来社会各方对良颇表关怀，至为感激，但评论报道，不无失实。良为保持一贯之平静，虽不欲有所多言，乃连日造访寒舍人士络绎不绝，使良失去居家安宁，不得不作如下几点说明，以谢垂注：
>
> 一、本人与内子日常生活行动一向自由，并无受到任何限制，亦不愿改变目前宁静之生活方式。
>
> 二、良因年事已高，视听衰退，且往者已逝，故不愿接见宾客探视或接受访问，务恳各方善意人士勿再劳驾枉顾。
>
> 三、海内外团体对良邀请参加集会，或作讲演，遵医嘱概予谢辞，函电亦恕不答复。
>
> 四、良目下心情如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中所说的："我为他已丢弃万事，看作粪土。"十四节中又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竿直跑，要得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以上各点均系出自肺腑，敬请惠谅。

张学良

（民国）七十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公开信发表后，台湾刮起的为张学良翻案风总算是停息了，但是，舆论界和海外学人认为，为张学良翻案之风是不会真正停息的，因为台湾当局对"张学良公案"还没有明确表示态度。

在此情况下，李登辉"总统"居然也抢了一则头条新闻：一九八八年三月二十七日下午，李登辉邀请张学良夫妇到寓所聚晤，并以茶点款待。他们相互交谈，欢悦自如。李登辉殷殷询问了张学良的健康、生活起居及家庭状况。张学良对李登辉的关怀深为感激。

李登辉夫妇和张学良伉俪均为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对《圣经》教义都有精深的研究。在这次聚晤时，他们谈话间互抒信道哲理，气氛亲切愉快。当这次聚晤结束时，他们还共同作了基督徒虔诚的祈祷。

尽管如此，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日，张捷迁教授等人仍在华盛顿纪念西安事变五十二周年时，再度呼吁台湾当局给张学良以真正的自由。《新新闻》在三天之内发表了《张学良幽囚何时了》等相关的七八篇文章。

翌年初，东北大学美国校友会决定：组织代表团前往台北，筹备六月三日为张学良举行八十九寿辰祝寿会。会长张捷迁请求张学良夫妇届时赴会接受校友们的祝寿。

张学良读完了张捷迁教授的信后，颇感惶恐，便提笔写了一封婉言谢绝的回信：

捷迁弟大鉴：

来函奉悉，余何德何能，诸公对余深厚友爱关怀，良

何人斯，敢以言寿。此间亲友，已酝酿为我作寿，我已严词拒绝。你们诸位，如此一来，等于推波助澜，岂不是对我内外夹攻。避寿不敢言，那么，我只好“逃之夭夭”，离开台北。良对诸位郑重恳求，千万千万不要万里奔波，虚此一行。我再郑重谈一句，诸位若是来，也绝对见不着我们俩。良绝非是不通人情的人，诸公对我如此深厚友爱，我十分了解，我也十分感愧。诸位也能了解我的心情和处境，我已惯于静默安居，逍遥自在。我年老，老眼昏花，又提笔忘字，写信有些困难，如今亲笔作书，乃为示信。兹录近作二十字如下：“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良再郑重恳求一句，万里奔波，虚此一行，使我心中多少不安，诸位既然这样爱护我，自然也会体谅原宥我。天假以年，后会有期。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　手启

三月十八日

但是，拒绝各界函邀，并不等于张学良不见访客。就在这年三月份，张学良首次接见了“敏感性”的来访者，他就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

王冀是张学良原东北军部属王树常之子，是研究张学良的专家。多少年来，他期盼能见到父亲的长官张学良，不求谈什么，只求问候以了心愿。

几年前，他曾向友人王一方的父亲王新衡表达了想拜访张学良的心愿。王新衡因王冀之父是张学良的亲信部属，便向蒋经国请求。但蒋经国却说：“有这个必要吗?”于是，王冀的心愿未能实现。

然而现在，多年的冰层解冻了。王冀教授又来到台湾找到王一方，寻求实现多年的夙愿。张学良闻知后，欣然应允。

这天，晚六时五十分，王冀终于如愿以偿，在北投寓所见到了他思念已久的张学良及夫人赵一荻。

“人家问，我不出来是否有隐情？我说，是有的。”张学良首先开口说，“因为，一，说我自个儿好，老王卖瓜；二，辩我清白，伤害别人，我不愿意，故不愿见外人。本来，我也想写写回忆录，写我亲眼看到的，亲耳听到的，亲手经办的。但是后来我还是决定放弃不写了，因为写出来，是在表功，我不干；既然写了不免要批评别人，这样会伤人；我记的不一定精确，个别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我过去研究明史，发现历史是人说的，并不一定代表真实，事实在那儿，不说也不会变……”

这时，在一旁就座的赵一荻说：“不要说，不必说，上帝那里有本账。”接着，她又谈起基督教，从宗教谈到了“魔鬼诗篇”事件，最后，又送给客人三本证道的《好消息》。

对此，张学良说：“我虽然不赞成霍梅尼的做法，但是若以回教徒的立场来看，霍梅尼作为教主，是有权为其教义而战的。我的宗教观念其实很开放，我太太常说我这个人是三教九流。我曾受一个喇嘛的影响很深。在汉口时，我遇到一个喇嘛教的活佛要去西康，我送他一程。这个喇嘛吃肉，我很奇怪。他说：‘这有何怪？西北地区没有草木，食肉乃环境使然。天生万物以养人，何能拘泥于教义？佛为了救世，可以杀人，必要时还可以杀天下人，就看你的动机如何了。’”

随后，张学良夫妇与王冀及友人到饭厅共用晚餐。饭前，张学良夫妇率大家祷告。张学良说：“今有故人王庭午（王树常号）之子在座，是平生一大快事。”

饭间，张学良讲了自己在两次直奉战争中的往事，谈了郭松龄之死，讲了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等事实真相。

当谈及台湾的民进党时，张学良说：“一个党总得有个目

张学良到台北中正机场迎接赴美探亲归来的赵一荻。

标，民进党的目标何在呢？反对民进党为反对而反对，没有国家观念。民进党是假民主之名行台独之实。"

"那国民党呢？它的目标何在？"

"谈到国民党，我是老党员了，但我脱党已久。"对此，张学良笑了，说，"国民党的问题，积重难返，冰冻三尺非一日



一九八九年三月，张学良与《张学良在台湾》一书的作者郭冠英合影留念。

之寒，一时也说不完。”

席间，张学良极为健谈。进餐时，由于他的眼睛不好，视力太差，看不清菜肴，赵一荻便将饭菜转到他眼前并告知。她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丈夫讲述今昔往事。当她发现丈夫袖口上粘有饭粒时，便轻轻拿掉，情深意切，全在不言之中。

最后，张学良坦诚地对王冀教授说：“在中国社会做事，我有一字相勉：‘真’，要真诚，才能成功。”

同年，张学良还会见了《张学良在台湾》一书的作者郭冠英。

一九九〇年初，就在张学良即将迎来他的九十大寿之际，他又提出要见一见著名美籍华人史学家、时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的唐德刚教授。

张学良对唐德刚教授的学识与文笔颇为欣赏，在数度邀宴与访谈时，张学良有意请唐德刚教授为其撰写一部类似由唐教

授曾执笔的《李宗仁回忆录》那样的大部头自传。

在唐教授访谈期间，恰遇东北同乡会一再表示要为张学良筹办九十华诞祝寿活动，但张学良一再坚拒。然而，张群则持“祝寿没商量”的态度。

在台湾，只有张群与蒋夫人的辈分可与张学良相比。当张群坚持要为做过他长官的老友张学良祝寿时，张学良仍表示反对。可张群则坐在轮椅上挥挥手，毫不客气地说：“去，去，去，我不与你辩。”张学良哑口无言，无计可施。

接着，张群指定秦孝仪、张继正、王铁汉、何世礼、赵自齐五人，每人提二十个名字，然后淘汰十名，凑成九十个人，以示九十之庆。这本来只是友好间的大范围庆生，谈不上什么筹划，各人交了名单，订了饭店就是了。

开列的名单也不是基于政治考虑，首先考虑此人与张学良是否相识，然后再征询张学良以及参加者是否同意列名。像郝柏村是以前安排张学良去金门参观时就认识的，两人同为军人，话也投机，故后来偶有餐聚；至于梁肃戎，以前与张学良并不熟，甚至是东北人中与反张的齐世英一道的人，此次梁肃戎也欣然参加，主要代表东北人对这位爱国者的敬意，过去的政治恩怨如今早已一笔勾销。

张学良九十诞辰祝寿活动公开后，许多人认为这是政府有意安排的，是一项“平反”活动，甚至认为是李登辉“总统”就职后一系列寓含政治意义的举措之一，其实这只是想当然的推论而已。

当然，因为张学良是个政治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不可避免地被赋予政治意义，如果政府反对此事，参与的党政要员或会受到劝阻，因此，这也可以解释成某种“平反”。但知道张学良的人皆知，他已心向上帝，对于尘世中的“平反”早已不在意了，如今，对张学良只有“评价”，而无“平反”问题。

正因此事原本以“平常心”出之，一些爱护张学良的故旧反而为寿宴活动的被迫公开而担忧，怕中外记者闻风而来，有违张汉公以及亲友们为他祝寿的初衷。

五月初，已有九十名要员在“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庆筹备会”的邀请函上签名，其中赫然在册的有：“行政院长”郝柏村，国民党“中央常委”李国鼎、倪文亚、郭婉容，国民党“中央政策会秘书长”梁肃戎，“行政院研考会主任”马英九，“财政部长”张继正，“总统府资政”张群、孙运璇，曾任国民党军“参谋总长”的宋长志、“副参谋总长”马安澜、“空军总司令”乌钺、“海军总司令”马纪壮、“国家安全局长”宋心濂，国民党的元老或资深人士秦孝仪、蒋彦士、黄少谷以及旅美史学家唐德刚教授等人。

此刻，台湾当局的最高主宰李登辉也向张学良作出了不同寻常的姿态。五月三十一日，他委派“副总统”李元簇到北投复兴岗张学良寓所暖寿，以一幅寿屏和一盒人参表达祝贺之意。宋美龄也派人送来一个精致的花篮。“总统府资政”、原国民党中统局创始人陈立夫也专程从美国赶到台湾，参加祝寿盛会。

一时间，复兴岗张宅门庭若市，车辆不绝，客厅里堆满了花篮与寿礼，贺寿的电报、信件雪花似的从四面八方飘来。

六月一日，台北市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被布置得一派喜气。大厅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张放大了的请柬，上面写着：

“中华民国七十九年国历六月一日为张汉卿先生九秩大庆谨詹于是日正午十二时假座圆山大饭店十二楼昆仑厅洁治菲觞共申祝嘏之忱尚祈高轩莅临以介眉寿”

以下是以张群为首的九十名党、政、军要员及社会贤达的署名。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由国民党元老张群等发起的为张学良将军九秩华诞寿宴，在台北市圆山大饭店昆仑厅隆重举行。

另一面墙上，悬挂着已故周恩来总理夫人邓颖超发来的贺电，正中有一个红底金字的“寿”字；下面是李登辉“总统”和李元簇“副总统”赠的寿屏；还有一百零三岁的张群题书的“长寿永康，福寿无疆”的条幅以及各界致赠的花篮、寿屏。

邓颖超发来的贺电电文如下：

汉卿先生如晤：

欣逢先生九秩寿庆，颖超特电表示诚挚的祝贺。

忆昔五十四年前，先生一本爱国赤子之忱，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在外侮日亟，国势危殆之秋，毅然促成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战；去台之后，虽遭长期不公正之待遇，然淡于荣利，为国筹思，赢得人们景仰。恩来在时，每念及先生则必云：先生乃千古功臣。先生对近代中国所作的特殊贡献，人民是永远不会忘怀的。

所幸者，近年来，两岸交往日增，长期隔绝之状况已成过去。先生当年为之奋斗、为之牺牲之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大业，为期必当不远，想先生思之亦欣然自慰也。

我和同辈朋友们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长寿健康，并盼再度聚首，以慰故人之思耳！

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邓颖超

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

上午十时，两辆扎着大红绸花的雪佛莱轿车开到了饭店大厅前，身穿黑色西装、结着枣红色领带的张学良，在穿着红色套装旗袍的夫人赵一荻陪伴下进入大厅，身后跟着专程从美国赶来为父亲祝寿的三公子张闾琳和大女儿张闾瑛及女婿陶鹏飞。

当张学良夫妇抵达寿庆大厅时，迎面被一堵记者人墙挡住，几十架闪光灯一齐闪亮，场面极为壮观。

正午十二时，前来贺寿的各方人士已经到齐，发起人张群宣布寿典开始。这位国民党元老坐在轮椅上，首先致词说：

“今天，是张汉卿先生九十华诞寿宴。我和张学良在东北、华北、华中和抗日初期，同生死共患难，是六十余年的老朋

友，今天不但为老友祝寿，还写了篇祝寿文。”

张群边说边向张学良点了点头，从随员手中接过早已拟好的《张汉卿先生九秩寿序》，高声诵读起来：

“古之良史，不以魁杰英伟之士盛年意气，一失虑失据，而遂非之议之，其必以能悔祸盖愆，卒之守死善道，而伟之重之。如我张汉卿先生者，不当以此论之耶？……”

祝寿文中，张群赞誉张学良在早年“以国家统一为重，力排众议，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其治军也，采寓兵于农方针”；“其理政也，尤重民生疾苦”；“又以发展教育，提倡科学，培养人才，为建设要务”。

在谈及中原大战时，张群说：“既而中原鼙鼓相寻，先生居举足轻重之地”；“于九月十八日通电全国，请各方即日罢兵息争”，“于是，渠魁讳祸，分崩离析之局复告统一，此又先生有造于国家至大者”。

谈到敏感的西安事变时，张群用语十分谨慎，“时陕北剿抗失利，共党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相煽惑，遂误兵谏之义，致有西安事变”；“且以此一举世震惊之事变，造成全国安内攘外之共识”。此后，“先生自是即脱然于军政之外，幽居读书，养性慎道”；“先生与夫人赵一荻女士，优游林下，见者疑为神仙眷属。故总统蒋经国先生及今总统李登辉先生，均加优礼焉”。

最后，张群诵道：“先生得天独厚，阅世方新，今岁六月之吉，寿跻九秩，同人等或谊属桑梓，或情殷袍泽，或为著籍之门生，或为缟纻之故旧，永怀雅谊，愿晋一觞。谚有之，曰：‘英雄回首即神仙’，其先生之谓欤！至于南山北山台莱之什，不足为先生诵也。”

孙运璇“资政”也应邀在宴席上致词。他说：“我是以学生的身份，感恩的心情来拜寿的。我本人原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学生，而张先生是校董。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校内许多学生



张学良与夫人赵绮霞女士在祝寿宴会上。

面临经济困难，有退学的危险，张先生决定，凡是成绩好的学生而经济发生困难者，免学杂费且每月补助六十元生活费，许多学生就是如此才完成学业的。自己就是其中受到眷顾的一位学生，大学毕业后，立即参加了抗日战争。自己过去六十年来能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成为有用的人，全依赖当年张先生的眷顾。”

孙运璇代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校友祝张学良先生“福寿无疆，万事如意”。最后，他举杯动情地对张学良说：“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

致词后，牧师周联华带领大家祷告，希望主赐福给张学良夫妇，也希望他们两位能替主做见证。

寿筵上，张学良五十四年来首次公开答谢关心他的人。他说：

“承张岳公，还有孙资政，这样地奖誉我，使我实在不敢当。人家古人说‘虚度’，我真是虚度九十，对国家、社会、人民毫无建树，正如《圣经》上所讲的即保罗所说的话：‘我是一个罪人。’我不但是罪人，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自己感觉真是万分的惭愧。张学良何德，能够蒙诸位亲友这样来给我做寿，我怎么能做寿，我有什么寿！自己真是惭愧得无地自容。

“我现在可以告慰于关怀我的亲友的，就是我现在一切的生活，蒙基督耶稣的慈爱，上帝的恩典，我现在能这样子站立地活着。我自己从来没想到我还能活到九十岁，这真是上帝的恩典！我除了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有什么。

“我现在虽然老了，可是我还没有崩溃；我耳朵虽然是听不大好，但是我还没至于全聋；虽然是眼力减退了，但是还没至于瞎。这都是上帝的恩典，除去感谢上帝之外，我没旁的话。我现在就是在诸位亲友以及友朋之间给上帝作证。

"有的友人对我说：你很开心啊，你身体那么好啊！不是的，我是完全活在耶稣基督内，我的喜怒平安，都是由他那里来。所以，我现在一切事情都交给了主耶稣，其他我就没有所求。

"现在，我虽然年迈了，假如上帝有什么意旨，我为国家为人民还能效力的话，我必尽我的力量。我所能做得到的，我还是照着我年轻时一样的情怀去做，只是我已经老了。"

张学良的答谢讲话，朴实诚恳，引来阵阵掌声。

至此，寿宴进入高潮：由张学良和赵一荻亲手分切两座九层高的生日蛋糕，分送到各位客人的餐盘中，大厅里响起一片掌声和祝福声。待张学良回席坐定，人们纷纷拥上前来，争着向张学良敬酒。

张学良为了礼节，干脆一直站着和众宾客敬酒。赵一荻在旁时时关心地问张学良累不累，与会贵宾们见状，皆羡赞老夫老妻的相互扶持。张学良动容地说："要不是这些年幽居岁月让我们相互依靠，我早不知到了何种地步了！"

言罢，朝赵一荻举起杯，"呯"的一声，两人的酒杯发出脆响。

这时，有的记者想从赵一荻的口里得到些什么，然而，赵一荻一律以微笑避开了话题。实在避不开记者时，她就认真地说："关于我丈夫的事，可以从我发表的文章中去找答案。"

原来，在庆祝张学良九十大寿之际，赵一荻特意撰写了《张学良是怎样的一个人》这篇文章，发表在台湾的《中央日报》上。

文章中说：

"张学良是一个非常爱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的人。他诚实而认真，从不欺骗人，而且对他自己所作的事负责，绝不推诿。……他之参加内战，不是为名，不是为利，也不是为争地

盘。他开始时是为了遵行父亲的意愿，后来是服从中央的命令，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

又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占领了东北。尔后，日寇步步入侵，他不忍再看到自己的同胞互相残杀，削弱国家的抗日力量，所以他就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他并不爱哪一党，亦不爱哪一派，他所爱的就是他的国家和他的同胞，因此，任何对国家有益的事，他都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去做。

“今天是他九十岁的生日。真是感谢上帝在过去的岁月中这样地看顾了他，赐给他健康的身体，又赐给他圣灵的智慧，使他因信耶稣基督而永生。……他知道既然上帝要他活在世上，他就应该尽心、尽意、尽性、尽力地去完成上帝所给他的使命。”

党政军要员的齐声祝贺，使张学良的九十寿辰活动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这是否意味着当局对张学良的平反呢？

当陈立夫被记者问到这个问题时，先是一愣，想了想之后，他说：“西安事变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了，没有反，哪有平呢？”

国民党党史研究会主任秦孝仪也说：“张先生目前已是自由之身了，没有什么平反不平反的问题。”

但是，许多人却持与此相反的意见。孙中山的嗣孙孙治平说，当年张学良受尽委屈，今天由当局的头面人物出面祝寿，当然有平反的意味。

一直为张学良的平反而奔走的张捷迁教授认为，李登辉接见张学良，以及李元簇“副总统”和李国鼎、张继正夫妇同张学良夫妇共进晚餐，而今党政要员齐为张学良祝寿，显然表明当局有平反的意思。

曾任东北大学校长的宁恩承亦认为，张学良一生多姿多彩，坎坷不平，今天是欢乐收场，当然是平反。



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张学良在台北与美国东北大学校友会会长张捷迁合影。

此刻，海内外舆论界人士也纷纷在报纸、杂志上撰文，指出：既然当局有那么多要员参与祝寿，既然李登辉、李元簇、宋美龄都送了寿礼，那么，张学良显然已被视为一位对历史有功德的人物，与蒋介石当年对他施以漫长非法关押相比，这不是平反又是什么？

张学良和赵一荻的儿子张闾琳则平静地告诉记者，父亲长久以来一直心平气和，给不给平反或者是不是平反，早已无所谓了。

第九十三章 广交诤友

1990.12

——“我跟张大千认识，是因为我爱好画画儿。”

——“‘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你一定要把你皇帝老子的那一套臭玩艺儿都摆掉，你要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

我的消息太闭塞了，人事多变，几年的时间，我大哥张大千竟飞黄腾达成了大帅了，真是文武双全啊。

原来，一九六七年秋，张大千应台湾历史博物馆邀请，在台北举办个人画展。他一踏上台岛，报纸在发表消息时，将《张大千大师回台北观光》印成《张大千大帅回台北观光》。这一字之差，是因铅字排错之故。

"要我当大帅，手无一兵一卒，不敢，不敢！不过，吾老弟张学良本是个大帅，新闻界早猜到我在想念老弟张汉卿了，这也是好事。"张大千笑着对人说道。

不久，两张在北投见面了。张大千一进门，就张开双臂亲密地与张学良拥抱。

"大哥，你是什么时候改了行，何时晋升，现在何地统率陆海空三军呀？"张学良开口便问道。

"我在机场被加官晋级！而且，何止统率三军，还得加一个军，即笔墨纸砚，统率'新四军'啊！"张大千开心地说。

张学良诙谐地说："新闻界敕封时，一字就抵千军哩！"

言毕，张大千铺开纸笔，当即挥就了一幅庐山山水图，在画的上款恭敬地题道："汉卿先生方家正之"，落款为："大千大帅"。此画是张大千一生中惟一落款"大帅"的画作，现已成为稀世珍宝。

得此精品，张学良大喜过望，由夫人赵一荻亲自掌厨，治馔款待张大千。

两张相识，应追溯到"少帅"当年在北平当"大帅"时。

一九三〇年，张学良任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号令北中国时，得知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旅居北平，便抽闲走进张大千小小的画室。

"先生，您找谁？"

"我找画师张大千。"

"不敢当。我就是张大千，先生贵姓？"

"我也姓张，名学良，字汉卿。"

于是，两个彼此慕名的青年握手拥抱，一下子便成了好朋友。这是张学良与张大千的第一次见面。

我跟张大千认识，是因为我爱好画画儿。我认识他不久，有一次，我买了一张画，记得是大画家石涛的山水图。张大千

见了后就告诉我，说这画是假的。我说你怎么知道这画是假的，这是我花了一万块大洋买来的。他说，我说假的就是假的。我就问，你怎么知道的？他说这画是我画的嘛，当然是假的！

两人相识不久，一天，张大千逛琉璃厂，见到一幅《红梅图》。张大千仔细地看过画的风格、用笔、着色之后，断定这是清朝初期著名画家新罗山人华嵒的精品，当下同店家商定，以三百银洋买下。可是，张大千一摸口袋，未带足钱，双方讲好三日内带钱来取画。恰巧，第二天张学良也去逛琉璃厂，他也慧眼看中了《红梅图》，店主说此画不卖了，已被人出三百块大洋订下了。张学良一听，争奇斗胜的兴趣上来了，他说："我出五百大洋买这张画，你卖不卖？"

就这样，张学良把《红梅图》买到手，并自鸣得意地让张大千观赏。张大千叫苦不迭地说："那天我要是带足了钱，这画就是我的了！"

少帅张学良虽出身尚武之家，后又执掌军政，但他自幼舞文弄墨，好书法，爱古画，藏古画，对中国传统艺术兴趣浓烈，不亚于他热恋网球、高尔夫球和开飞机。

一次，张学良上街，见一家店内挂有几幅他的"真迹"，便装作买主问价。店主不知底细，说出一个偌大的数字。张学良哈哈大笑地说："啊，张学良那么值钱，我现在就写几幅给你卖。"

惊闻此言，店主方知面前这位年轻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张少帅，惊得讨饶不已。

在北平时，张学良也曾拜访过国画大师齐白石。

"张将军，你也爱画？"齐白石惊讶地问他。

"对，我爱画。我上学时就爱美术，但我无才，画笔下不出成就，可是爱画已成瘾了。年积月累，家里也收藏了许多名

家之作，其中也包括您老的作品。”

齐白石捋了捋大胡子，拉着张学良走进了自己的画室。

之后，两人来往频繁。齐白石每有佳作问世，即邀张学良品头论足，张学良总是赞叹不已；张学良每得珍品，也必请齐白石到家里一同欣赏。将军和画师结成了忘年之交。

一九三五年十月，张大千游西岳华山，登大华峰写生，后又来到西安。时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的张学良强拉大千去张公馆小住叙旧。大千却面有难色，告之次日必须启程返回北平，因他酷爱京剧，明晚是他老友余叔岩的告别演出，而且又是最拿手的《打棍出箱》。

“没关系！”张学良爽快地说。他让张大千退掉火车票，当晚搬进他的官邸，告诉他说，“明天我派专机送你回北平！”

张大千见盛情难却，当晚便搬进了张公馆，一边同少帅叙旧，一边提笔为张学良画了一幅华山山水图。画毕，张大千执画在炉火前烘烤，不料由于过度兴奋，画作靠火太近，竟起火烧掉了，还烧着了他的胡须。张学良心疼至极，伤感地说：“看来我的背运还没走完，连享用这样绝美山水图的福分都没有了。”

“不用这么伤感，”张大千又重新执笔展纸，“我宁可对不住余老板，也要为你再重新画一幅！”

于是，张大千挑灯夜战，泼墨挥毫，一幅精美的《华山山水图》到午夜时分终告完成，接着他又挥笔题诗，将一幅诗、书、画交融一体的艺术珍品呈现在张学良的面前。张学良兴奋不已，激动地对张大千说：“这幅凝结着先生情意和精神的画作，是我收藏的珍品中不可多得的瑰宝啊！”

对于张学良的一片厚意，张大千十分感动，一直念念不忘。不久，他又精心挥毫，画了一幅《黄山九龙瀑图》，上题：“黄山九龙瀑”；上款为：“以大涤子法写奉汉卿先生方家博教”；下款是：“乙亥十一月，大千张爰”。

可是，这幅画尚未送抵张学良手中，西安事变便爆发了，张学良随之失去自由。当这幅《黄山九龙瀑图》几经辗转，终于送达少帅手中时，张学良视若至宝。望图思友，他无限感伤。不久，张大千在香港定居一段时间后，举家先后移居到阿根廷和巴西。从此，一对挚友天各一方。

一九六一年，张大千从海外归来抵台北探亲，首次拜访了张学良。分别数十年，两人竟夜长谈，感慨万千。

张大千离台时，张学良和赵一荻亲到机场送行。当大千登机时，张学良将一个红绸包送给他。张大千拉着张学良的手，依依不舍，对形影不离的赵一荻称赞道："你，可敬，可佩！"

飞机升空后，大千打开红绸包一看，竟是那幅失而复得的《红梅图》，心情异常激动。随画还附有一短笺，文中这样写道：

> 大千吾兄台鉴：
>
> 三十年前，弟在北平画商处偶见此新罗山人山水，极喜爱，遂强行购去，非是有意夺兄之好，而是爱不释手，不能自禁耳！现三十年过去，此画伴我度过许多岁月，每见此画，弟便不能不念及兄，不能不自责。兄或早已忘却此事，然弟却不能忘记，每每转侧不安。这次蒙兄来台问候，甚是感愧。现趁此机会，将此画呈上，以意明珠归旧主，宝刀须佩壮士矣！请兄笑纳，并望恕罪。

读完张学良的这封短笺后，张大千感慨不已，老泪纵横。

一晃又是十年，一九七一年，张大千在美国旧金山砥昂博物馆筹办四十周年作品回顾展，需向世界各地友人借用他赠送的珍品。出乎他意料的是，张学良居然送来了三十六年前他专为张学良所作的《黄山九龙瀑图》。张大千深受感动，立即在下榻处摆开纸墨，画了一幅梅花图相赠，画上又题了一首七绝



一九七八年春，张学良夫妇、张大千一家和张群于台北双溪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合影。左起：张学良、张大千夫人徐雯波、张大千、赵一荻、张群。前为张大千的两个女儿。

《赠张汉卿学良宗兄》：

攀枝嗅蕊许从容，欲写横斜恐未工。
看到夜深明月蚀，和画和梦共朦胧。

一九七八年，张大千定居台湾，张学良同他交往更密切了。有一次，张学良到张大千住所探望，正赶上他的宗弟张目寒患重病，张学良目睹病人惨状，悲痛不已。

当时，张群、王新衡、张学良和张大千皆认为：人生短暂，来日不多，这样各自分离的情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于是，他们共同倡导组织了“转转会”，相约每月聚一次。人称“三张一王转转会”。

王新衡，曾在西安事变的前两天抵达西安，接江雄风任复兴社特务处西北区主任。那时他刚结婚，家还在上海。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他还没上任，深夜即听到西京宾馆外枪声骤响，他打开门想看个究竟，这时西北军冲入，将他逮捕。他所带来的新婚照片、信物等全被搜走，从此遗失。对此，张学良曾一再向王新衡夫妇表示歉意。

后来，王新衡被委派负责“管束”张学良。在朝夕相处中，张学良常与王新衡开玩笑说：“我说你们是什么特务？西安事变那么大的事，你们事前一点都不晓得。”

王新衡听了只是笑笑。然而，他的儿子王一方却很不服气，他对张学良说：“张伯伯，那时我爸爸去晚了，他要是早到西安，就一定会晓得的。”

张学良见到张群时，总是径呼其字“岳军”。王新衡曾私下对张学良说：“张群比你大十多岁。现在的地位又很高，你直接叫他岳军，是不是不太好？”

张学良说：“没办法，几十年叫习惯了，改不过来。如果改叫他岳公，我不习惯，他也不会习惯。”

“三张一王转转会”开始最常去的地方是张大千的摩耶精舍。张学良尤其喜欢到张大千的处所，一面赏画，一面品尝他烹调的佳肴。

后来，他们又改为轮流做东，聚会餐叙。待轮到张学良做东时，赵一荻便亲自下厨烹调，制做丰盛的菜肴，供众人欢聚。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日，著名画家张大千在台北去世。张学良对此悲痛万分。

斯时，王新衡感叹说：“最近，他（张学良）很感寂寞，老先生（指蒋介石）死了，蒋夫人去了美国，张群年迈，张大千也去世了，他没事就往我家跑，所谈论的，不过是哪家餐厅什么菜好，哪家不好之类的话。有时在我家中，看到我的小孙

子，他会主动趴在地上，让我孙子骑在他背上玩儿。”

一九八六年三月，张学良与赵一荻陪张群游新竹桃园龙潭“小人国”，这时，王新衡正在病榻上与死神搏斗。第二年，即一九八七年一月五日，王新衡去世了，至此，“转转会”仅剩下“两张”了。



一九八六年，张学良夫妇与张群（坐轮椅者）合影。

一九九○年三月七日，张学良突然接到女儿张闾瑛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一件不幸的事：于凤至当日上午在洛杉矶林泉别墅于睡眠中去世了。惊闻噩耗，张学良与赵一荻都深深地陷入了哀痛之中。

一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张群在主办张学良九秩华诞后不到半年，也以一百零三岁高龄撒手人寰。

“‘三张一王’就只剩我一个人了。”张学良极度伤感地说。

对于张群之死，张学良抒发了不少感慨之言。



一九八八年圣诞节前，张学良与李登辉合影。

张资政真是信主，他视死如归，他大概也知道自己要走了，交代得清清楚楚。那天是他生日，他送了儿子一个马克杯，说这是我做父亲的最后送你的礼物了。

张资政死了，你猜最不满的是谁？是第一殡仪馆！张资政说一切从简，他连治丧会也不要，只要做个追思礼拜，然后火葬，葬在他太太身边，荣总摆灵堂也不要，相片都不挂，他一生都在做榜样，死了也如此。

那天美国有人打电话给我，叫我代送个花圈，我说他不要，我给你打电话致意就可以了。

这个人正直，有爱心，一视同仁，对自己子女也一样。我看他有次责怪家人，就是因为家人心软，为人请托，张岳公听了非常不高兴，他非常反对家人来给别人说人情。●

对张岳公来说，死，就是回家了，回到上帝的家去了。

张学良说他最受不得激，有人激他说他活不过百岁，张学良说，他一定要同张岳公一样，活过一百零二岁。时至二〇〇一年，张将军以一百零一岁寿终，可见，他为自己所定的寿限

指标，离成功显然已近在咫尺了。

暮年丧挚友，悲伤自不必说，但就个体生存而言，张学良的寿命确实是漫长的。

国民党中，几乎所有与他政治生涯有联系的人，无论是爱他、恨他、拥他、薄他的人，都已纷纷作古。从七十年代以来，他已出席过多次追悼会，写下若干副挽联祭文。先是端纳、宋子文、蒋介石、张大千、莫德惠、周鲸文，继而是蒋经国、刘乙光、王新衡、张群，以及他当年所统率的东北军的大多数将领。他们曾经构成了他生命和政治跌宕的大背景，可最终都未能挺过岁月的煎熬，纷纷被上帝先召而去，只余下了他和宋美龄。而宋美龄这位当年风姿绰约的第一夫人，早已赴美幽居，静静地面对生命的晚景。惟有他，仍在北投复兴岗上，在夫人的伴陪下，日复一日，惯看秋月春风、残云夕阳。

然而，张将军风云际会一世纪，他的新朋旧友，何止成千上万！死去的，健在的，他无时无刻不在与他们心心相印，情牵魂绕……

在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中，有一位永难忘怀的挚友。两人一见如故，患难与共。五十余年风风雨雨过去了，两人虽未再晤面，但却彼此悬念，心灵相通。他，就是周恩来。

一九三六年四月九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会谈一晚。当年十二月十七日，周恩来又来到西安，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这八天九夜的相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使两人惺惺相惜，情定一生。一直到他幽囚台湾，处在早期那种萧杀的情形下，张学良依旧执着地坚称说，他最佩服周恩来。

八天九夜，我们彼此坦诚相见，肝胆相照。兵谏能和平解决，周先生是出了大力的。可惜我送蒋先生离开西安的时候，因为担心周先生劝阻我，动摇了我，结果连招呼也没打就走了。想起来遗憾得很，一别竟成了永诀。

一九七六年周先生去世，听到这个消息我难受得很，连个吊唁的电报都发不出。听人说，周先生临终前，听说我患眼疾，有失明的危险，还让他身边的人查明情况，看能不能为我做点什么。这样知我重我者，天下能有几人？

多年来，周恩来一直为早日释放张学良而直言敢谏。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复电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特使赫尔利，提出恢复国共会谈的四项先决条件之一便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及其他被囚的爱国人士。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周恩来发言时，忽然传来一声“立正”号令，大家都站起来，接着是一阵降旗音乐。礼毕坐下，周恩来接着讲下去，他说：“在刚才这几分钟的静默中，我想起了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的朋友，也是在座各位的朋友。今天我们在这里谈团结，这个人对团结的贡献最大，这个人就是促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张汉卿先生。我们怀念他，诚恳地希望他能早日获得自由。”

周恩来的声音充满动人的情感，严肃的眼光扫射着全场，这时，整个会议厅像死一般沉寂。大家面面相觑，个个陷入深深的同情与思念之中，以沉默来表达对当局的愤懑与抗争。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五十号举行的与重庆文化界话别茶会上，报告了国共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后，接着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这番话使大家欲哭不能，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丝悲凄的泪光。这就是历史上记载的周恩来一哭张学良的情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在北京召开的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座谈会上，周恩来指出，“西安事变是值得纪念的。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即使当时一枪打死蒋介石，也是千古功臣”；“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是个英雄人物，很豪爽。他这个英雄人物是个人英雄主义，但用在抗日上就用对了。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但无论如何，他是千古不朽的人物了，他是名垂千古的了”。

一九六一年，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之际，周恩来邀请在京的原东北军与西北军部分将士参加西安事变二十五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周恩来又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二十五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纪念会结束后，周恩来总想着要给张学良将军写封信。可是，写信容易，欲把信送到被幽禁的张学良手中，就难上加难了。为此，他几经思索，终于找到了一位神通广大、理想可靠的转信人——郭增恺的夫人。

郭增恺是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做出过贡献的十七路军参议，其夫人如今在香港居住，能自由出入台湾，她与张学良夫妇很有交情。

不久，郭增恺夫人带着周恩来的亲笔信来到台湾。但她无法获准和张学良夫妇见面。后来，她得知张学良夫妇每星期都去教堂做礼拜时，就把周恩来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然后，她在做礼拜时，把装有信的口红当作“礼品”送给了赵一荻。

据曾是周恩来部下、西安事变中共代表之一的童小鹏同志回忆：周总理的信中既没有收信人姓名，也没有写信人署名，

全信共写有十六个字："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有期。"

周恩来生前期盼再晤张学良的心愿，最后并没有实现，直到他临终时，还谆谆嘱托邓颖超："不要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一九九〇年五月三十日，正值张学良将军九十寿辰之际，邓颖超特电表示深挚的祝贺。

一九九二年七月十一日，邓颖超逝世。张学良和夫人得知后，立即委托在北京的侄女张闾蘅代他们向邓颖超遗体敬献花圈，上书"邓大姐千古"，落款为"张汉卿、赵一荻敬挽"，以此表达哀思。张闾蘅对记者说："他们是好朋友，伯父、伯母从电视中看到邓颖超去世的消息，很悲痛，很怀念她。"

宣统皇帝溥仪，我跟他也很熟识。他对我不错，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在天津，他没有钱了，但东北有他家的地，有他们皇家的地，我们给他处置了一些，得了一百万，政府留下一半，另一半给他了。他在困难的时候，有了这五十万，他很高兴。我曾经劝过溥仪，我说，你呀，把你皇帝老爷的那一套去掉，你现在应该到大学去念书，南开你若觉得不方便，你甚至可以远走，你到美国去念书。

还有，他见了我的面老是打听军队的情况，问这问那，我就说你打听那玩意儿干什么？你不要问这些，你呀，好好地做一个平民，以你的身份，将来普选大总统，也许你还有机会，但你一定要把你皇帝老子的那一套臭玩艺儿都摆掉，你要老想着当皇帝，早晚会把脑袋混掉。他现在没有了，也不晓得他写回忆录写上我这些话了没有。

张将军晚年在台北时，仍心系大陆，经常与故旧友人书信来往，题诗题词。

一九八五年，是抗日将领宋哲元百年诞辰。为怀念宋哲元将军，张学良以"毅庵"署名，亲笔题字："忠义永怀"。

张学良九十大寿前夕，其旧属卢广绩、刘鸣九、荆有岩、郭维城、张庆泰、吴家兴、杨志信七位老人，在沈阳给张学良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祝寿信，并在信中恭请张学良回故地叙旧。

卢广绩时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还把收集到的有关张学良的文章精心剪下来，遥寄台湾。张学良收到信件后，感动不已，于十月九日亲笔回信：

广绩乡弟：

寄来剪报及报纸均已收到，多谢！最近甚忙，迟迟未能复信，请原谅。请代为问候各位乡弟。专此敬祝大安。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学良在台北的寓所内，亲笔给杨虎城之子杨拯民题词：

拯民世弟：

爱人如已

张学良将这个题词写在一张精美的私人信笺上，而后托人捎给杨拯民。

一九九一年二月七日，张学良亲笔写信给辽宁大学教授张德良、周毅，信中说：

德良、毅二乡弟鉴：

来信及寄来的《东北军史》、《张学良将军诗词注释》已收到，谢谢。余老矣，恕目力不佳，不能多写，写字相当困难，请原宥。愿上帝祝福！

一九九一年六月六日，张学良在美国度过九十一岁生日后，即给挚友阎宝航之子、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阎明复回信：

明复弟大鉴：

手书奉悉，无限欣快，虽多年不见，一睹手书，如见故人。良之一切，明光妹来此，详知一切，自当述及。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顿首再拜

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九日，辽宁人民出版社接到张学良为该社《九一八事变丛书》写来的题词：“历史伤痕，痛苦回忆。”

所有的来信，张学良皆亲自看过，然后再决定处理的方式，有些须他亲自回信的，则用黑笔在信封上批交处理。帮张学良处理信件的，主要是一位赵姓女教授，她是赵四小姐的亲戚；除此之外，身边的雇用人员也常协助处理。信件的处理方式是依寄信人的身份来决定。仰慕者向他索取签名或照片，这只好说抱歉；有向他诉穷的大陆人士，则不在回复之列；只有张学良过去在大陆的旧部故人或亲戚的来信才会回复。通常对亲友旧部的第二、三代的来信，他都会尽可能回信，因为这些人多数贫病不堪，他觉得应该回信鼓励一番。

池宫城晃是日本《每日新闻》的摄影记者。一九八八年，他将在中国东北三省拍摄的一千多幅风土人情的照片装订成册，寄给了张将军。同年五月三十一日，张学良给宫池城晃回信，信中写道：

池宫先生：

华函奉悉。老朽林下幽居，素不见外客，敬请原宥。老朽年岁衰迈，目蒙手软，又乏记事，对于一般信件素不作复，感先生素昧平生，远邦厚谊，破例勉为动笔，字迹草率，文句粗陋，先生当可见及矣。愿上帝祝福！

通信之后，两人开始了交往。从一九九〇年四月至一九九五年三月，宫池城晃曾三次在台北及夏威夷拜访了这位千古功臣，拍下了不少“今日张学良”的珍贵照片。

一九九六年四月五日，是中国著名爱国教育家、南开大学创办人张伯苓先生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纪念日。这个日子，不仅使所有南开学子萦绕于怀，也牵动着世纪老人张学良先生的心。

丙子年正月初二，当人们沉浸在节日的欢悦中时，九十六

岁高龄的张学良在美国檀香山寓所，为他早年的老师和朋友张伯苓先生动情地写下了五个大字："桃李满天下。"

张学良与张伯苓及南开大学有着不同寻常的关系。

早在一九一六年，张伯苓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张学良听了演讲之后，"志气为之大振"，从此立志救国。

张学良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后，对校务实行改革，特别倚重张伯苓，聘请他为东大校务委员会委员，并任命南开校友宁恩承为秘书长，代行校长职务。张伯苓多次赴沈阳，为东大的改革和建设出谋划策，并派南开大学秘书长、体育系主任等到东大指导工作。张学良还把南开庶务课主任借调到东大管理后勤工作。于是，南开的办学成功经验得以在东大推广。当时报刊称，"南开精神由白河之津而展至辽河之滨矣"。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学生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张学良想方设法收容学生和难民。张伯苓主动为张学良分忧解难，先后接纳七十八名东大学生免费借读。这对一所私立大学来说，自然是不小的负担。

张学良对张伯苓一直感念不忘，总是以师礼事之，并以张伯苓私淑弟子自居。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陕北肤施的一座教堂会面时，曾对周恩来说："我和你同师，我们都是南开的人。"

大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没有冲淡张学良对张伯苓的感情。一九九〇年八月，被幽禁五十四年的张学良在台北首次接受日本 NHK 采访时，还不止一次地提起张伯苓和南开大学。当记者问他"年轻时受谁的影响最大"时，张学良不假思索地回答："是张伯苓先生！"

当宁恩承从美国将张学良的题词寄往南开大学时，曾附言道："汉公年老眼花，久不执笔，恐怕这是最后的墨宝矣。"

手捧张学良先生的墨宝，南开人怎能不感慨万千。

第九十四章　赴美探亲

1991.3

——“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

——“好玩儿就多待一点儿，不好玩儿就少待一点儿，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

——“美国很发达，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有那么些人自杀，说明他们没有信仰主题，生命空虚。我看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我的一生被日本断送了，我不希望日本的年轻人再犯过去的错误。”

九十大寿之后不久，张学良接受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

(NHK) 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向日本青年一代提出忠告。

公开作寿后，台湾及海外记者都想采访张学良，结果，日本 NHK 捷足先登，分别于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七日和八月四日至六日分两次在台北采访成功。

张学良虽已年届九十高龄，但却神采奕奕，面对新闻记者和摄像机侃侃而谈，讲述了日本对东北的吞并野心和自己决定东北易帜的前前后后，也谈到了热河失陷后，他“身负重谤”、“下野出洋”的具体过程，但很少涉及最敏感的西安事变。

“日本人在杀死我父亲的事上，态度非常暧昧，试问，我如何能和日本人合作？和日本合作迟早会被日本人杀掉。我不想当卖国贼，因而和土肥原发生冲突。后来，土肥原想让我当满洲皇帝，我不答应，并要求日本关东军将土肥原调回，但日本拒绝了。虽然土肥原不能撤除，但我有权不见他。此时，我正在安排东北易帜的事。

“九一八事变时，我决定维持东北军原来的‘不抵抗主义’。但是日本军部并未因此停止侵略，他们半年内攻占了整个东三省。紧接着又提出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推出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当时，我实在没有想到日本的野心会大到如此地步。因此，我开始兴起了中国人应抵抗日本人侵的念头。

“一九三三年二月，日本由东三省发兵侵占热河。当时负责守卫热河的是我父辈的汤玉麟将军。我再三命令汤作战力守，但汤倚老卖老，根本不听我的命令。我当时曾打算换下汤来，但实际状况令我未能换得成。

“我赴欧洲考察回国后，曾打算找机会说服当时正全力剿共的蒋介石，劝他应先团结共产党共同抗日。为此，我曾与周恩来见过面，密谈了一次。

“我对周恩来的评价是：谈话反应很快，说话一针见血，

而且对于事情看得很透彻。可以说我们两个人一见如故。

"当时部队内比较强烈的愿望是回家乡。怎么能回家乡？只能跟日本人打。部队不愿跟共产党打而失掉力量，愿保存力量回家乡，所以，那时我的处境非常难。在这件事情上，部队对我很不满意，他们说：'你服从蒋先生是为你自己，可我们怎么办？'

"可以说，我自己整个一生的毁灭是出于日本。我父亲被杀，我自己的家庭整个地毁掉了，我的财产一切都没有了。我是有反抗性的一个人，我要是看出这件事不合理，我不管是谁。我现在九十岁了，脱开了政治环境我才说这些话。有许多事情，我为什么要反抗，我就是看事情不合理，我对自己的权力、生命都毫不在乎。"

接下来，日本记者又同张学良作了一问一答式的采访对话，

问：您那时被任命为剿共司令官，您是否认为抗日比剿共更重要？

张：我根本就不愿意剿共。

问：您对共产党作何评价？

张：当时，中国抗日情绪高涨，政府不想抗日。共产党则利用抗日抓住了民心。

问：你同蒋介石总统在感情上关系良好，但似乎政见不同？

张：这很简单。蒋委员长主张"安内攘外"，我主张"攘外安内"。

问：您何时提出"攘外安内"，并同蒋先生持对立态度的？

张：我们一直意见不同，只是后来更加尖锐罢了。

问：你们是做事的次序不同，还是目的本来就不同？

张：当然目的不同。我是先对外作战，再安内。蒋先生是

先安内，再对外。现在我承认，也许我的想法是不对的，但当时我就是那种思想。

问：蒋介石和周恩来曾在西安会面，当时您在场吗？

张：这是尖锐的问题，请不要再问了。我不但在场，而且是我领周恩来去见蒋先生的。

问：您愿不愿意谈他们当时谈话的内容？

张：对不起，我不能再往下讲。请体谅我的苦衷。这件事不应该出自我的口。我也不愿意伤害他人。

张学良的这次谈话在日本播出后引起重大反响。台湾电视台随即买下此节目，在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平安夜，在特别节目《让生命等候》中播出了十分钟，引起民众的极大兴趣。

与此同时，台湾《华视新闻》记者也对张学良进行了采访。双方谈到了学生生活、从军、日常生活、夫妻相处、爱国理念和基督教等，内容相当广泛：

记者：我听他们说，您年轻时，考试的时候，您不是很用功，可是老考第一，大家都不服气，是不是这样子啊？

张：我小聪明大概是有一点。我是很顽皮的，我不好好念书，不过，我在学校考得很好，但那也不能说明我什么，因为在我们讲武堂里，大家都是行伍出身，可我是一个读过几天书的人。

记者：是不是您在军事方面考得特别好？

张：那是小节，上帝赋予的小聪明。我自己承认小聪明我是有的，但我不承认我有什么能力。

记者：平常您都做些什么？

张：说起我做事情，我眼睛，比如说您坐在这儿，我看不清您是谁呀，我看不清的。所以，我在家里，看书是很难的；看报，我都是用十五倍到二十倍放大镜，才能看清小字，所以

看报我不看小字，我只看看大字就是了。其他的，耳朵也不太好。在家里就听听收音机，对电视，我是从来不看的。

记者：（对夫人）您最欣赏他哪一点？

夫人：他这个人就是诚实呀！他从来也不骗人，他也不说瞎话。

记者：有没有什么夫妻相处之道啊，可以告诉我们年轻朋友们吗？

夫人：没有，什么都没有。我就是一天什么事情都做，应当做的事情我就做。

记者：那张先生，您觉得呢？您觉得夫妻要怎么样才能维持比较好的感情啊，你们两人是怎样相处的？

张：这个话很难说，夫妻两个不能说天天就是好，也吵嘴，也吵架。要是有事情，各人稍微退让一点，就完了。

记者：有很多人啊，这么多年来，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张先生到底是不是有完全的自由？对于这样一个问题，您有什么答案？

张：人们问我这句话，我是很不高兴的。这完全是给政府安上一个名称，这是反对政府的人拿这个做名堂就是了，这是做文章。我今天要上哪儿去，就能上哪儿去，我不去就是了。我真要上哪儿去，就可以上哪儿去。

记者：（对夫人）您觉得呢？对外界的关心，您有没有要跟他们说的话？

夫人：没有什么话可讲（笑）。跟您一样啊。

张：问您有自由没有自由，您怎么说？

记者：我很自由啊！（记者大笑）

张：您也不自由，您得做您的工作啊。

记者：啊，对对对，我得每天去上班啊（笑）。

张：这个话讲的，我觉得很可笑。我现在要说句话，有好

多人讲话非常幼稚，有些人问话也很幼稚，你得知道这个情形，您得知道环境。研究一个事情，你得知道过去，知道现在的环境，知道背景，你才能做到不随便张嘴说话。我说这个话，好像在批评媒体。我的朋友要写我的东西，他要给我看，我说不看，你愿意褒就褒，愿意贬就贬。我说，我这个人毫不在乎。您看，张学良，不但是今天，就是在历史上，我从来不申辩一件事情，随便，随便！

记者：是呀，您怎么能做到褒贬由人呢？

夫人：希望您信上帝，真理能让您自由。您信了上帝，您就不要讲了，上帝知道，你不要别人知道。你知道我怎么样没有关系，你说我好，也没有什么关系，你说我坏，也没有关系。

张：我们一点都不在乎。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四日，旧历除夕，张学良驱车来到李登辉官邸。在简短寒暄和道过新年祝贺后，张学良径直提出了打算出国的想法，

"过去的'三张一王'已经凋零殆尽，只剩下我和内子在复兴岗苦度时日，常常会触景生情。"张学良向李登辉表示说，"儿女孙辈都在美国，趁着还走得动，我想去他们那里看看，不知总统有何看法？"

"我很同意张先生出国的想法，出去散散心也好，起码可以同儿孙们共享一个时期的天伦之乐。至于张先生什么时候成行，到国外呆多久，我看应该充分尊重您的意见。"李登辉开门见山道，"过去政府有很多解不开的结，现在环境现实都有了变化，我愿乐观其成，一些具体问题可以让政府有关部门协助办理。"

春节后，张学良又幽默地向来客王冀教授谈到了赴美之事。

"他一见我的面就说，王冀，我想出远门。"王教授回忆道。

"张老伯，是想去香港看看吗?"

"不！去香港不算出远门。"

"那……您想去什么地方呢?"

"去美国。"

"去美国做什么?"

"看女朋友。"

"我听后忍不住地笑了，一个年届九十一岁的人还要去美国看女朋友，听后真是有点天方夜谭。"王冀教授回忆说。

"我就是去看女朋友嘛，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在大陆还有女朋友呢!"

一九九一年三月十日下午三时，张学良身着灰色西装，头戴法兰西便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边墨镜，仪态潇洒，步履稳健，由夫人赵一荻女士挽着右臂，步入台北桃园中正机场"华航"贵宾室。

刚一进门，张学良便被早已等候的记者们包围了。专程来为张学良夫妇送行的华航董事长、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乌钺在一旁对记者们说："你们抓紧时间吧，张先生马上就要登机了。"

记者：您马上就要踏出国门，此刻的心情如何呢?

张答：我觉得好，现在的心情很好。我好吃好喝，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心情。

记者：您是在何时和李登辉"总统"谈到希望出国的？何时获知当局准许您能出去的？"行政院长"郝柏村对您出国的事是否表示过什么?

张答：这件事你应该去问总统府发言人邱进益，有些话我不方便说，也不应该说。我和政治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也不想

谈政治，郝柏村说了什么你去问郝柏村好了。

记者：您预计在美国待多久？此行的目的是什么？会不会和旧属见面或作公开演讲？

张答：我不一定能待多久，好玩儿就多待一点儿，不好玩儿就少待一点儿，我是土包子，从来没去过美国。……（说到这儿张指了指夫人）她倒是去过很多次，不过从前欧洲我可去过。此行我主要是去看儿孙，现在儿子只剩第四个还活着。我在美国的亲属加起来比在台湾的还多呢！我去美国不会作公开演讲，不只在美国不会，在中国也不会作公开演讲。

记者：听说中共大使馆很注意您的行程，您有可能转回东北老家看一看吗？

张答：我不知道中共注意我的事，我也从未和大陆亲属联络。我不排除到东北去的可能性，大陆是我的国家，我当然愿意回去。

记者：有没有考虑回东北定居？

张答：考虑什么？我从来就没有“考虑”这一回事，我要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回去。你大概不知道我这个人吧，孔老夫子的“三思而后行”对我一点用处都没有，我是“要干就干”！我是个莽撞的军人，从来就不用“考虑”这两个字眼。

记者：您说您是莽撞的军人，您回想西安事变的过程，和您的个性有无关联呢？

张答：我这个人就是鲁莽，草芥一个……

记者：研究近代史的史学家许多人都很推崇您，认为您在三十五岁以前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出自对国家统一的忠诚仁义，您自己觉得呢？

张答：那是对我客气，人家抬举我。我不是那么好的人，我只是平凡的人，他们太恭维我了！我这人从来是任人褒贬，你要认识我，看我过去的历史你就知道了，人家写什么我从不

辩，一切毁誉由人。不但现在是这样，过去也一样。

记者：西安事变有很多谜，您是否愿意写回忆录来解开这些谜呢？

张答：我从不写回忆录，也不回想。圣保罗说："忘却背后，努力向前。"我从来不往后看，我已经九十一岁了，脑子已经装满了，没有什么好再回想的啦。

记者：几十年来您的行动受到限制，海内外对此事都很关心，您平常都做些什么？

张答：你们为什么老要说我行动受限制？我就是你们记者给限制住的。我和政治毫无关系，平常也是和老朋友聚一聚，吃点小馆子。现在老朋友都过世了，不是他们死得早，是我活得太久了。我平常就是在院子里散散步走走路，北投后面的大屯山我都没有去爬过。

记者：听说蒋夫人对您的信仰方面影响很深，您最近还常去士林凯歌堂做礼拜吗？最近有没有看到蒋夫人？

张答：蒋夫人是真正的基督徒。我年轻时对佛教很有研究，刚刚来台湾住在高雄时和佛教界印顺法师常常来往，从前也向班禅法师请教过佛法。有一次，蒋夫人到高雄来看我，我很得意地对他们说起我对佛教的研究，蒋夫人却说："汉卿，你又走错路了！"后来我和我太太在正式结婚时领洗，以后就常去凯歌堂做礼拜。从前老先生在时，每个礼拜他们夫妇都来，最近我还是常到士林去，但是老夫人腿不好，已经好几个礼拜没有在凯歌堂出现了。

记者：谈谈您的养生之道好吗？

张答：我没什么养生之道，就是好吃好喝。我内人的菜烧得很好，平常我白开水、茶、咖啡都喝，走路运动，就是这样而已。

记者：您曾说"两字任人呼不肖，一生误我是聪明"，"聪

明”是如何误了您的一生？

张答：我没有高见，就是用个小聪明，人其实很鲁莽，我回答你的话也很聪明。

登机时，看到那么多摄像机对准自己，张学良便哈哈大笑地说：“别人都说我成了电视明星，你们采访我，我要向你们收钱啊！”

下午五时三十分，张学良夫妇乘坐华航004号班机离台飞往旧金山。经过十九小时的飞行，跨越了东西两个半球，飞机在美国西海岸旧金山机场徐徐降落。

张学良身披一件乳黄色风衣，坐在轮椅上，由华航旧金山经理刘永祥、机场主任李中选两人引路照料出海关。他们的儿子张闾琳、儿媳陈淑贞及孙子张居信夫妇等前来机场迎接。

尽管张学良千方百计地设法避开众人的视线，但他们的行踪还是被高度敏感的记者发现了，记者们立即围了上来进行现场采访。

“我年纪大了，视力听力都不好，我听不清你们的问题，我也不回答你们的问题。”张学良虽然这样说，但终于还是架不住记者们的再三缠问，边走边说起了他出国的打算，“虽然是第一次来美国，但是并没有任何特别的感想，主要是看看儿女和孙子们。”

停了停，张学良又补上一句：“出国没有什么高兴不高兴的，到哪里去都是一样。”

张学良夫妇抵达旧金山后，探亲的顺序是先张后赵，这是赵一荻的安排。他们夫妇决定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同女儿、女婿团聚，长住在儿子张闾琳家中。这样的决定是因为在美国儿女辈中，只有张闾瑛和张闾琳姐弟俩了。

当晚，张学良夫妇下榻的女儿家中电话铃声不断，其中既有记者打来的，亦有张将军的故旧、东北同乡打来的，也有许

多与张将军并无任何关系，仅仅是钦慕张将军英名的人。陶鹏飞守在电话机旁，穷于应付，铃声一直响到深夜，令他口干舌燥。

“今晚这屋里的电话真是比白宫还忙啊。”陶鹏飞苦笑着说。

“好啊，八方风雨会中州嘛！”张学良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第二天吃过早饭，张学良便兴致勃勃地嚷着要外出游览，一行人决定先去游览东河。

儿孙们扶着两位老人下了车，先在岸上望了一阵海湾，其繁忙热闹的景象令老人家很有感慨。接着，人们又簇拥着两位老人走进了“西部华尔街”——蒙哥马利街。

“这里是什么地方呀，楼这么高？”在一幢高大的楼房前，张学良停下步子问道。

“这儿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美利坚银行总行大厦，有五十二层呢。”陶鹏飞答道，“爸爸要是有兴趣，我们可以进去参观一下，上面还有餐厅和游览厅呢。”

“外面看看就行了，我又不进去取钱，我跟它是无缘分的。钱财还不都是身外之物！”张学良边走边说道，“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人把我的私人财产装了三列车厢送到北京，但我拒绝接收，我说，如果不把东西原封不动地给我运回家里去，我就把它们全部堆在北京火车站上烧掉。”

“结果呢？”闾琳问。

“我连问也没问。国家都沦陷了，个人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张学良说完，猛地挥了一下手臂。

“下一站我们去哪儿？”老人家问道。

“去金门公园吧，”陶鹏飞说，“那里风景满好的，您看怎么样，爸爸？”

金门大桥全长一千六百米，是世界上桥墩间跨度最大的桥梁，涨潮时，桥面离水面达六十七米。张学良站在桥头，赞叹着那伸向对面的桥面，兴致勃勃地望着往来如梭的汽车。突然，他发现桥身侧面有一层带栏杆的狭长桥面，奇怪地问：“这下面是不是还有一层附桥，供行人走动？”

“这哪是什么附桥，这是防自杀用的！”女儿张闾瑛笑道，“金门桥这地方桥高水深，每年都有一些走投无路的人在这儿跳海自杀。市政当局为了防止这种事发生，就在下面的桥两边加了这么一层障碍物，要想再成功的自杀，就不那么容易了。”

张学良长叹了一声，望着海水沉默了一阵，回头对大家说道：“美国很发达，但是金钱并不能解决一切。有那么些人自杀，说明他们没有信仰主题，生命空虚。”停了停，他又说，“我看美国的教育是失败的。”

“你们不是说旧金山的唐人街很好玩儿吗，我们去逛逛唐人街吧！”逛完金门大桥，张学良仍游兴盎然，一点儿不觉得累。

陶鹏飞原想将汽车开慢些，让岳父在汽车里领略一下唐人街风情就行了。可是，车刚进唐人街口，张学良坚持要下车看看，陶鹏飞劝不住，只好搀着老人走进了熙熙攘攘的游客中。

“我看这里的中国货，比台北还要丰富哩。”张学良边看边感叹道。

夜幕初降，张学良夫妇在张闾瑛、张闾琳两对夫妇陪伴下来到湾区一家法国餐馆，由陶鹏飞做东，请大家品尝法国菜。席间张学良胃口大开，不但吃光了面前的汤、菜和甜品，而且还吃了不少水果和面包，令儿女们惊喜不已。

“想不到爸爸胃口还这么好，真让人高兴。”女儿张闾瑛说。

“这算什么，”老父亲一边用餐巾擦着嘴，一边说道，“我

要是真的开了胃口，再来一份说不定还能装下呢。”说着，又指着那瓶已经喝光了的 XO 白兰地说：“法国酒味道不错，平时在家里我也喝这个，过去张群老说我是个品酒专家哩。”

餐毕，服务小姐前来收帐，张学良一看帐单，才一百五十美元，便连连感叹说：“这儿的价格比台北便宜多了。”

回到家中，大家聚在客厅里，问两位老人家第一天的感觉如何。老父亲将一天的所见所闻评点了一番，最后下了个结论：“美国还真是不错。”

“父亲是个说故事的能手，”陶鹏飞对亲友们说，“在旧金山这些天，他每到一处，常常见景生情，谈古论今，无一不是学问。”

在旧金山，张学良夫妇几乎游遍了所有名胜，又看望了久未谋面的三弟张学曾。

三月十四日，两位老人又来到儿子张闾琳家中团聚。

第九十五章　纽约之行

1991.4

——"学良无德无能，还让身处异乡的故人这么牵挂，真是惭愧得很。"

——"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我九十一岁了，从十九岁开始，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出什么呢？不要怕和共产党谈。"

"我一点也不累，歇什么？过几天我还要去纽约，那儿还有好多亲戚朋友呢！"

刚一抵达旧金山，张学良就惦念着纽约之行。

旧金山四天游览、洛杉矶小住数日之后，张学良便只身飞往位于美国东部的世界大都会纽约。

抵纽约后，张学良住在贝太太家里。贝太太原名蒋士云，

苏州人，当年为张学良的女友。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期北平的上流社会，蒋女士的芳名可以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后来，蒋士云嫁给了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总裁贝祖贻。

张学良被幽禁在溪口和台湾时，贝太太亦曾前往探视过。如今，贝太太就住在纽约曼哈顿花园街一幢非常高级的公寓里。

作家王朝柱来纽约时曾就此采访过贝太太，其采访实况如下：

“贝太太，张将军造访纽约期间，是住在这幢公寓里吗？”

“是的。”贝太太说罢引我们来到一间卧室，指着一张很像我国南方那样的木床说道，“他当时就住在这里。”

“您能谈谈张将军留住纽约时的生活情况吗？”

“可以。白天，我安排他会朋友；晚上，我们一起打打小麻将，有时还听听京戏唱片。”贝太太边说边指着临窗的一迭唱片，“我这儿有很多京剧唱片。总之，张将军在我这儿过得很充实，也很愉快。”

“张将军的视力不好，你们二人打小麻将的时候，恐怕您赢的时候多吧？”我半开玩笑地问道。

贝太太听后开心地笑了。

“贝太太，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张将军好吗？”

贝太太落落大方，从容地谈了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以及对蒋介石软禁张学良的愤懑。当谈到张学良的人格时，她很动感情地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认为，张将军是那种可以终身引以为朋友的人。”

“少帅很愿意吃饺子。”二〇〇一年春节期间，旅居纽约的王书君、符图、严华、刘冰等人邀宴贝太太与唐德刚教授夫妇吃饺子。席间，贝太太回忆说，“少帅在纽约时，曾到医院做了一次全面体检，虽已九十一岁高龄了，但他的血压、心、肺

各方面都很正常，特别是对少帅那一副完美无缺的牙齿，医生们都感到很惊讶。"

来纽约之初，张学良深居简出，平时就与孔宋时代的老朋友一起打打扑克、吃吃饭，偶尔去乡间看看亲友。

由于眼睛不好，体力也有限，所以，旅居纽约期间，帝国大厦、自由女神、西点军校等景观，张学良都没有去。大都会博物馆特别请他去观赏了该馆珍藏的中国名画，因为张学良是这方面的行家。

另外，张学良去了两次大西洋城，玩了二十一点，输了几百美元。他说那发牌女好厉害，别人劝他换张桌子再赌，他就是不肯，结果一路输了下来。

本来，张学良出国时并不打算参加公开活动，但是后来却变得不可能。在纽约时，他接见了哥伦比亚大学学生、《世界日报》记者、"美国之音"记者。他的秘书田雨时替他安排了同纽约一些东北同乡见面，其中包括张治中的女儿，而且只有这次聚会，张学良坚持由他作东。

两位与白宫关系良好的友人，本欲请他与布什总统一见，但因摸不清张学良的意向，而未敢贸然安排。

直到四月初，张学良到纽约的消息才在华人社交圈里传了开来。

四月七日上午十时，当中华海外宣道会播恩堂的牧师郝继华向大家宣布张学良到来时，堂内的二百多名会众立即起身，向张学良热烈鼓掌。张学良面露微笑，鼓掌向大家致谢，接着便同大家一起坐下来，聚精会神地听牧师布道。宣道结束后，众教友们围拢上来，其中有不少东北籍人士。

"少帅啊少帅，我们盼了你多少年，等了你多少年啊！"一位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人热泪盈眶地说，"当年在奉天，我远远地望着你骑着高头大马，在北大营进进出出。少年英

雄，让人好钦佩、好羡慕啊！后来听说你西安举事，被关了，被囚了，我心里多少年不是个滋味。现在，没想到我还能活着见到你，再看到少帅……”

“学良无德无能，还让身处异乡的故人这么牵挂，真是惭愧得很。”张学良伸出手来，与老人紧紧相握，颤声说道。

当他走到门口与众教友们告别时，又转身拱手作揖道：“能在纽约同乡亲朋友们见面，学良三生有幸！”

四月八日，张学良会见了美中文化交流基金会董事长及哥伦比亚大学中文系汉语班上的洋学生。接见时，他容光焕发，谈吐自如，声音洪亮。

“我年轻的时候，最不喜欢年纪大的人说话，一说话就是教训。我设身处地替年轻人想，大概你们也不愿听我说话。不过，我可以这么说，如果同学中有人对清末民初的历史有兴趣，只要是以东北地区为主的，我知道的可能比任何人多。我耳朵听到的，眼睛看到的，亲身所经历的，老实说，不能不着重北方这一段，可以说，我是唯一的‘宝’。”

当洋学生问是否可以录音时，张学良爽快地说：“无事不可对人言，你们录吧。无论什么事，私事、公事，假如有不可对人言的事，我不能说，也不能做。”

这时，在场的张之丙女士对张学良说：“青年们很想向您请教，以您的经历跟他们说几句话，对他们做人与求学，都会有很大的启示。”

“我对日本青年该说的已经由 NHK 的访问说了很多了。我年轻时可以说是‘爱国狂’。”张学良说到这儿，将目光转向日裔青年冈本公一，“不客气地说，我恨日本！当然，不是指日本人。”

“我接受我父亲的栽培。我父亲有势力，所以我下决心，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条件来做点什么？我本来想学医，‘救人’

没学成，却学会了‘杀人’。”

说到这儿，张学良不由地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二十二岁领兵打仗，一直打内战，所以我对内战厌恶到头了。一次，我去河南，亲眼见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我问老百姓，他们说儿子当兵去了，到哪儿了没人知道，自己打自己，没活劲儿了，只剩下老弱妇孺，我看了心痛极了。从那时起，我就下了决心，一旦我能掌权，一定要尽量避免无意义的战争。打了和，和了又打，到底为什么？为了能打胜，双方不知牺牲了多少有为的青年。我简单地说说我的感觉，打仗则求必胜，要打胜仗必须派遣精锐亲信，也就是自己喜爱的部下。可是每次派出去的多半不再回来。我是很富感情的人，我喜欢我的部下，我现在想起他们来心里就难过……”

张学良说到这里，话音有些暗哑，热泪在眼眶里涌动。

后来，有人问关于西安事变的事。张学良只说了一句：“我做事，我负责。”

五月三日，纽约华文报纸《世界日报》记者魏碧洲来到张学良的下榻处，见到了这位名闻遐迩的历史人物。访谈中，张学良畅所欲言，谈兴甚浓，回忆了当年东北易帜、郭松龄兵变、杀杨宇霆以及西安事变等旧事，内容与一年前在台北同唐德刚教授所谈的基本相同，只不过没有那样详细生动。

关于郭军反奉，张将军说：“为这件事我很难过，因为茂宸要反的事，我老早就知道，他们打的也是要我上台的旗号。可是我没有采取行动，担心别人会骂我太狠，连郭茂宸这么亲的人都容不下，将来谁敢跟我？郭茂宸起事时间虽然不长，但却造成东北军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这都是我一念之私，顾及自己名声所造成的，若及早采取行动，战祸自然可免。”

关于杨常事件，张将军说：“当时若不采取断然行动，等到事发后才兵戎相见，不知会造成多少东北军民伤亡，我宁可

让人责备我处置老帅旧部不当，也不愿见东北又起战端。这也算是郭茂宸的事给我的一个教训。可以说，杨、常二人是死在郭茂宸的手里。”“我最大的包袱就是东北军，东北军这个包袱粘在我身上。”

“为什么会有负担呢?”记者问。

“问题就在这里，东北军要是国家的兵，我就没有这个包袱……简单说一句话，我受累，甚至西安事变，与这个事都有关系。我们东北的同乡就攻击我，他们说：‘你对蒋某人恭敬，这我们没话说。但我们是跟你来的，你把我们带进来，我们的目的是要回家乡，我们不愿意剿共，怎么样回家？只有打倒日本才能回去。

“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营长，我受他的刺激非常大，后来我也公开说了，那个时候的中央啊，实在是处置事情不太恰当。我手下这个营长，在‘剿共’时受了伤，那个时候，中央的规矩是‘你负伤了，你有抚恤，你有钱拿，但你要回原籍拿。’中央不拨抚恤，东北老家又沦陷给日本人了，伤者又回不去原籍，这不是不讲理吗?”

张学良说，那时，他遭到来自东北军民的压力，自悔自责之深，心情之沉重，令他昼夜难安。不到十二个月，他就做出了一个自己认为“外为国家民族，内可平慰东北军民”的重大决定，发动了改变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史的西安事变。

五月十一日，美国之音“新闻广角镜”记者也对张学良进行了采访，内容如下：

问：少帅，自从发动西安事变以后，您的住所一直飘泊不定，这些年来您一直住在台湾，现在来到美国看家人，您觉得现在您的家究竟在哪儿呀?

张答：我年轻时当然是家在东北。我飘荡不定，随遇而安。但我还是想我自个儿的大陆故土，我还是怀念故土，自

“九一八”后，我就没再回过东北老家。

问：您既然如此想家，这次您有没有打算就便回东北去看看您的故土，看看老乡亲？

张答：我当然是很愿意回到大陆，但现在时机尚未成熟。

问：在什么样的状况下您会回去？

张答：假若两方敌对的问题完全没有了，我就可以回去了。

问：看见您就不能不谈有关西安事变之事。事情过去几十年啦，请您亲自告诉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西安事变？如果时光倒流，您仍会做此事吗？

张答：此事我不愿说太多，外边发表的也很多，大家也差不多都知道这些事情了。我不说，是不愿用语言伤害到他人。这件事留给历史去评论吧，它爱怎么评就怎么评，事情清清楚楚摆在那里。

问：西安事变后您失去自由被软禁，那也是您一生当中最好的年华，如果这半世纪您没被软禁，能自由地在政治上发挥，统率您的军队，您觉得会对整个中国产生什么贡献呢？

张答：此事难说。我当然很痛苦，我恨日本军阀，一生主要就是抗日，心中最难过的就是抗日战争我没能参加。我请求过几次，蒋委员长没答应，我想这也是上帝的意思。假如我参加中日战争，我这人也许早就没有了。非我自夸，我从来不把死生放在心里。假如让我参战，我早就没有了。

问：您说送蒋回南京是准备受死。你有没有想到一去会软禁五十年？软禁五十年这日子不好过的。假如时光能倒流，您还如此做吗？

张答：我还是一样那么做。我是军人，需要负责任。我做的事，我负责。别说软禁五十年，枪毙了我都不在乎。

问：事变时周恩来赶到西安，周、蒋及您三人还单独见面，你们见面所谈的问题对事变的结果是否产生了关键性作用？

张答：此事现在我应该说不应该说，你叫我想一想。周恩来见蒋先生是我领他去见的，那时蒋先生身上稍微有点伤，他们政治上并没有谈什么。外面很多都是谣传。他问候蒋先生，他自称自已是蒋先生当年的部下。蒋先生见到他后也说了一些。但总地讲，可以说三个人并没有谈什么。

问：事变中共产党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

张答：事变开始时共产党并没有参加。事情起来了，我们才把周恩来先生接来，谈此事该怎么办。

问：中国共产党对事件发生的态度如何，是赞成还是反对？

张答：他们没有预谋，他们也很惊讶怎么忽然出来这个事情，没有赞成或反对的意思。此事我说不出来。

问：您觉得周恩来先生怎样？您有无与毛泽东接触？

张答：周恩来先生我非常佩服。我们初次见面，他说我反应很快，我认为他也反应很快。这个人说话一针见血，没什么委曲婉转绕弯，虽然他是那么大的一个政治家也是外交家，但是他说话直截了当，人很聪明，我俩见面感情极好。毛泽东我没见过。

问：两岸都说要和平统一，你对此有何希望？

张答：我个人衷心希望两岸双方能和平统一起来。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当年我有权势在手，我就是赞成统一的，如中原大战种种事情，我都是如此。我很反对内战，我非常希望和平统一。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问：你觉得你对和平统一能做出什么样的贡献？现在海峡两岸的领导人以年龄辈分来说，都是您的后生晚辈，你想对他

们提出什么建议吗？

张答：虽然我已衰老了，但仍未昏庸，我很愿意能有所贡献，但我不知能贡献什么？他们需要我做什么，我很愿意尽点力，但尽得上尽不上则另当别论了。

问：现在台湾经济繁荣，中国在国际上地位很高，对双方这种成就，你作为一个中国人感到高兴吗？

张说：这自然。我住在台湾就等于是台湾人一样，我很希望政治蓬勃向上，能发展多快，因我未参加，故没资格说。当然，做个中国人，对台湾、对大陆我都有期望，所以我很不愿双方分裂，我希望看到双方以和平方式竞争，看谁干得好，将来还不是统一吗？

"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内容在电台、报纸上披露后，人们似乎又从中窥见到了张学良凛然的军人气概和为民族利益不畏生死的浩然正气。

一位当年少帅的旧部在华文报纸上撰文说："汉公集英豪贤哲为守之大义，养之有素，为之有方，尤其传奇丰采，超逸绝伦，为世人所景慕，无分中外，且将传之久远。"

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决定委托吕正操代表党和人民赴美国看望张将军。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吕正操一行飞抵纽约，前往贝太太家会见张将军。张将军一身西服，穿戴整齐。吕正操快步上前，紧紧握住张将军的双手，半个世纪的离别思念之情尽在其中。

进屋落座后，吕正操送上从北京带来的生日贺礼：一整套张将军爱听的《中国京剧大全》录音带和大陆著名京剧演员李维康、耿其昌夫妇新录制的京剧带，新采制的碧螺春茶叶，还有画家袁熙坤先生为张学良将军赶画的一帧肖像和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亲笔手书的一幅贺幛。



吕正操与赵一荻、张将军的儿子张闾琳（后立者）夫妇、孙子居仰和居信等合影。

吕正操与张学良将军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谈话。

“我可迷信了，信上帝。”张学良幽默地说。

“我也迷信，信人民。”吕正操说。

“你叫地老鼠。”张将军笑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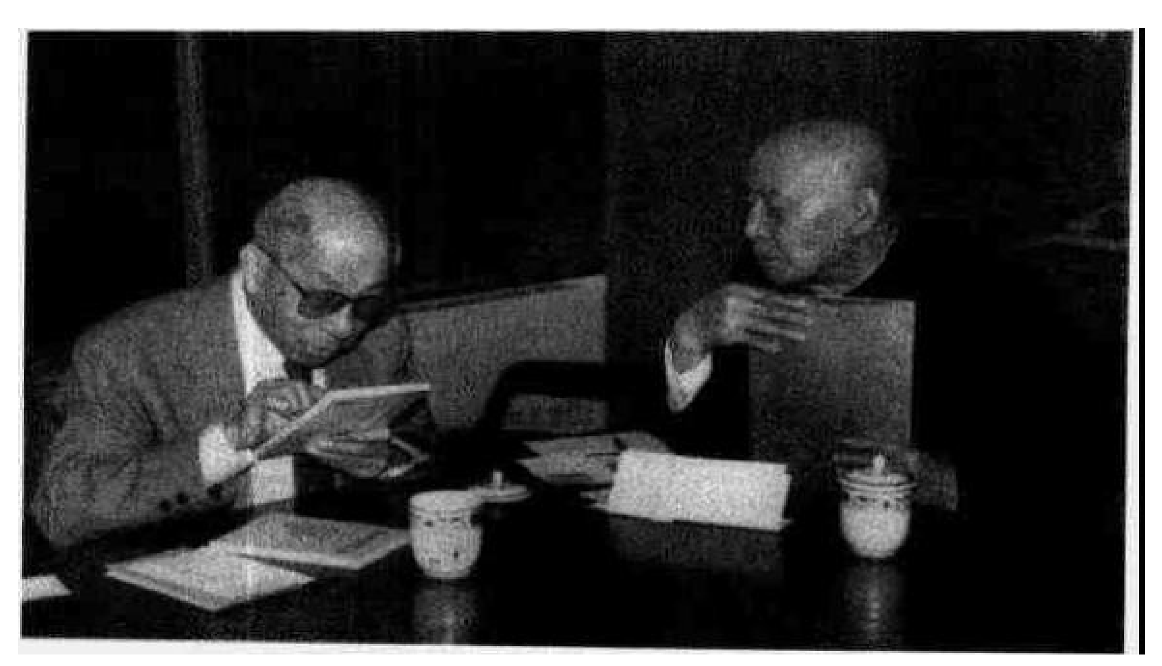
“地道战是人民创造的嘛，我个人能干什么，还不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八百万军队被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吕正操接话道。

“得民者昌！”张学良感叹道。

五月二十八日，唐德刚教授邀请了张学良与著名物理学家袁家骝、吴健雄夫妇聚餐，为张学良九十一岁寿辰暖寿。

次日，张学良在曼哈顿中城会见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东北同乡，同他们畅谈了国共恩怨、中日战争和国仇家恨。

忆往昔，张学良非常怀念死去的父亲张作霖。谈到日本侵



吕正操向张学良赠送《冀中回忆录》。

华战争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及杨虎城的遇害，他感到十分痛心。当东北同乡向他谈到盛世才时，他说盛跟着他父亲起家，但后来知道此人很不安分，对后来他在新疆杀人，甚至把他岳母、弟弟杀死的事情，张学良则表示对此事竟一点不知道。

谈话中，张学良对西安事变很敏感。他说，过去不少新闻记者访问他，都想从他口中探出点东西来，但他是绝对不会说的，因为他不想做伤害任何人的事，也不想将这段历史恩怨从他口中说出。至于外界毁誉，他一点也不在乎。他同意当年《大公报》王芸生在西安事变后所说的一句话："明白的人不用辩，糊涂的人辩什么？"

在问到张学良对蒋介石"安内攘外"的政策时，张学良十分肯定地说，他仍然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可取。他坚定地认为只有国共合作"攘外"，才能最终"安内"，所以，他至今还认为"安内攘外"政策不当。

有人问："就是因为蒋老总统的'安内攘外'政策不能贯彻，导致中共统治神州四十年，不知张学良先生如何解释？"

张学良回答说："我不想再涉及政治，但作为一个曾经与中共交过手、打过仗的人，我必须承认中共的军事力量不可忽视。当年我手下两个精锐师与中共红军对阵，他们人数虽不多，但最后还是把我的两个师吃掉了，师长战死。面对这样顽强善战的军队，既然消灭不了他，最好就与他合作。"

张学良对中共两万五千里长征颇为赞许。他说："我自己也是带兵的人，深知带兵不易。中共能够在经过长途行军后，仍然保持军容实力，的确不能忽视，想消灭他们，谈何容易！"

五月三十日下午，吕正操和张将军在曼哈顿第二次会面。吕正操首先向张将军递交了邓颖超的信，并转达了中共中央领导对他的问候。信中，邓颖超受邓小平的委托，诚恳欢迎张将军在方便的时候回家乡看一看。

张学良读信时，没有用放大镜，脸几乎贴到了信纸上，一字一句地认真地看着。

"周恩来我熟悉，这个人很好，请替我问候邓女士。"当看到信末尾邓颖超的签名时，张学良说道。沉思片刻之后，他又说，"我这个人清清楚楚，我很想回去，但现在时候不到，我一动就会牵涉到大陆、台湾两方面。我不愿意为我个人的事，弄得政治上很复杂。"

不久，张学良给邓颖超写了亲笔回信，信中说："寄居台湾，翘首云天，无日不有怀乡之感，一有机缘，定当踏上故土。"

五月三十一日晚七时二十分，张学良抵达曼哈顿万寿宫，参加亲友故旧为他举办的祝寿宴会。大厅内，早已挤满争睹张先生风采的宾客，此刻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照相机闪光灯闪烁明灭，有人高喊"副司令"、"校长"，场景热烈，感人心肺。

当晚，万寿宫内近四百个席位座无虚席。美国前驻中国大



吕正操将军访美时，刘红路秘书向张将军展示启功书写的祝寿挂轴。

使洛德夫人包柏漪、《纽约时报》资深记者索尔兹伯里等人也参加了祝寿宴会。

张学良坐在主宴会席上，旁边是包柏漪夫人，同桌还有孔大小姐、宋二小姐；左右两桌分别是孔家、宋家、蒋家、阎家在美的后辈。

进餐中，宾客们争先恐后地向张学良先生致意问候，并摄影留念。张学良含笑应答，几乎无进餐机会。当张学良切割大型生日蛋糕时，全场来宾齐声高唱生日快乐歌。

六月三日晚，在一百余位亲友的陪伴下，张学良又被邀宴在曼哈顿中国园餐馆欢度他的九十一岁生日。参加这次晚餐会的都是张学良的亲友，并且有中兴国剧社的票友们捧场助兴。

寿宴上，张学良兴致始终高涨。在大家的鼓动下，他还亲自选唱了京剧《战太平》和《斩马谡》中的唱段。

“今天的生日庆祝形式，和当年在大陆时的庆祝完全一样。”张学良的一位朋友说。

“我很高兴听到少帅唱京剧，因为听了之后，觉得自己还会有三十多年的京剧可唱。”一位六十多岁的票友感慨地说。

在这天的祝寿晚餐会上，琵琶高手汤良兴也前来为寿辰助兴，弹奏了《阳春白雪》曲。演奏之后，张学良十分激动，站起来和汤良兴握手，并连连道谢说：“‘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晚餐会上，向张学良祝贺九十一岁生日的亲友中，不少是演艺界人士及知名学者，童芷苓、童小苓、唐德刚等人及蒋纬国夫人丘如雪女士均在场。

六月四日下午，张学良前往吕正操一行下榻的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团长李道豫大使的别墅做客。这次会面，谈话涉及范围很广，从过去、现在到将来，从政治、经济到故旧，还谈了海峡两岸将近半个世纪的风云变幻。张将军在谈及共同关心

的问题时，朗朗出口，独有见解。谈到祖国统一问题时，他说："我过去是做这件事的，现在，我虽然九十多岁了，但天假之年，若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很愿意尽力。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愿意为中国出力。"

至此，已没有人再去问张学良是否自由的问题了，台湾对他毫无限制，大陆也不想揠苗助长，他要去哪里、何时去，完全在他一念之间。他所考虑的主要还是台湾的人情世故，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政治影响而已。

此次赴美，张学良在私人关系上的处理并不圆满，在其东北旧部及至亲中曾引起许多怨言，有人曾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长信，以春秋大义责之，希望他勿再走回"九一八"前后的老路。

但对张学良来说，他肩负着的历史包袱已太重太久了，他弱冠戎伍，似乎没有过一天自己想过的日子。正如包柏漪在祝寿贺词中所说的那样："要让张学良实现这些愿望几乎不可能，他不可能做一个普通人，因为没有一个普通人能够改变历史；他也不可能自由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因为他住在一个闪耀着荣誉的城堡中，它限制了张学良的行动。"

张夫人赵一荻曾写了一本证道的小册子，名字叫《真自由》。对他们夫妇来说，人间难求真自由。

张学良在纽约度过九十一岁生日之后不久，便飞回美国西岸。纽约之行，历时三个月。

一九九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晚，张闾瑛、陶鹏飞夫妇为父母第二天返台饯行。二十六日，张学良偕夫人赵一荻乘华航班机返抵台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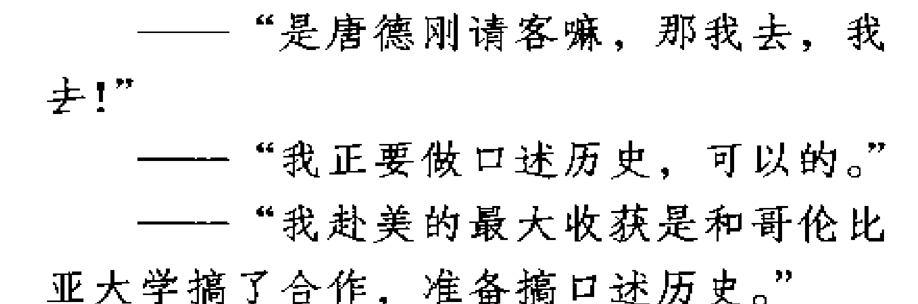
张学良在离开美国时，对记者谈及在美探亲访友、旅游观光三个多月的感想时说："很好，该看的人都看到了。"夫人赵一荻也连声说："很好，很好。"

同年九月十八日，是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纪念日。值此之际，张学良在台北接受媒体采访，他在谈话中指出："海峡两岸之间可以开诚布公地谈谈，两岸间总要跨出谈判的第一步。"

"我九十一岁了，从十九岁开始，就玩谈谈和和的政治游戏，没有诚意，能谈出什么呢?"张学良最后表示，他赞成台湾国民党和大陆共产党坐下来谈，他以国民党前辈的口吻对台湾当权者说，"不要怕和共产党谈。"

第九十六章　口述之秘

1991.5


——“是唐德刚请客嘛，那我去，我去！”
——“我正要做口述历史，可以的。”
——“我赴美的最大收获是和哥伦比亚大学搞了合作，准备搞口述历史。”

蒋介石和蒋经国都劝我写东西。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我决心写，但写出了大纲以后，还是决定不写了。为什么，我没法写！因为好的、坏的，都应如实地写，我不能只说好的，有些事不是不能说，而是不能从我嘴里说。

既然不能自己写，是否有意请别人来写回忆录呢？实际上，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张学良已在考虑进行这一工作。

张学良最早属意的回忆录人选是唐德刚教授。唐教授一九四八年赴美，就读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获史学博士、哲学博

士学位。任教哥大时，为中国历史学部口述史的创始人之一，先后出版过中英文版的《胡适口述自传》、《李宗仁回忆录》、《顾维钧回忆录》、《中美外交史》、《史学与红学》等巨著。后转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作为终身教授，他学贯中西，著作等身，蜚声海内外。

有鉴于此，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访问学者王书君曾就此在新泽西州唐教授的北林寓所对其进行了采访。

唐教授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纽约大学傅虹霖女士的博士论文《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一书出版之际，我作为她的博士导师，为该书写了一篇序文，名曰：《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序文中这样写道：

"张学良可能是中华民国史上最有名的公子哥儿了。但是，治民国史者也不能否认他是一位统兵治政的干才。把个花花公子和政治家、军事家分开来做，则民国史上实在是车载斗量，没啥稀奇；可是把这三种不同的行业拼在一起，搞得三位一体，如鱼得水，则学良之外，也就真的别无分店了。少帅张学良之所以成为历史性的传奇人物，其难就难在这个三位一体上……

"尤其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共产党有群众有理论……有谁能保证，一把野火就可把共产党烧得死灰不燃？所以，西安事变，未始不是国共之争的光荣收场。

"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岂料，台湾《中国时报》于一九九〇年初掐头去尾将序文

刊登，又将题目改成了《花花公子、军事家、政治家——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

“说张将军是花花公子，他肯定会不高兴，说不定会大动肝火呢！”王书君断言道。

“没有！张将军阅后，不仅没有大动肝火，反而大为欣赏。”唐教授笑着说。

“是不是大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王书君问道。

“是啊，他阅后，就向身边的人表示要约我见面聊聊，当时，他也有意让我为他作传。巧了，我那时正在台湾。”

“请他来吃饭，请他来吃饭。”张将军得知后非常高兴，并让他身边的人悄悄去打电话寻找唐教授。

唐教授经常去台湾讲学探亲。其岳父吴开先是CC派大将，大革命时期，吴先生曾出任国民党宣传部总干事，与时任宣传部代部长的毛泽东在一间屋里并桌办公。一九三七年抗战前，吴先生已出任国民党组织部副部长。他生前在台湾任“总统府资政”。唐教授结婚时的证婚人，便是陈立夫先生。所以，在台湾，唐教授也是有点背景的人，他是国民党的高干子弟。

当唐教授接到“张学良将军要请你吃饭”的通知后，受宠若惊，诚惶诚恐。

张将军大名鼎鼎，唐德刚乃一海外教授，何故被邀为张府嘉宾？再说，那时张将军实际上仍被看管，未完全获得行动自由，这在政治上对张将军来说，岂不也是十分敏感的事情？唐教授一头雾水。但名人相邀，岂敢怠慢，乃连夜搞到一张飞机票，清晨六点便径飞台北。

“当我初次与张将军相见时，我觉得我的文章写得真是一点儿不错。那时，张将军已是九十岁高龄的老人了，但他还是那样风度翩翩。”唐德刚教授开怀大笑说。

初次相聚，彼此之间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张将军频频地



一九九〇年一至五月，唐德刚教授采访张学良将军。

说："下次请你同太太一块儿来，我们再吃饭。"

就这样，唐教授与张将军从相识到熟识，前后相聚多次，总共吃了十几顿饭。那时，每逢相聚，唐教授便打开一个随身携带的录音机，他们边吃边谈边录。

毋庸置疑，若干历史上有关张学良将军珍贵的第一手史料，都被收录在录音带里了。席间，唐教授曾问张将军："依您的意思，我们所谈的这些事，要不要写出来呢？"



张学良在台北北投家中与美籍华人史学家唐德刚合影。



一九九〇年春摄于台北北投张学良寓所庭院。左起：王一方，唐德刚，张学良。

张将军沉吟了片刻，说："写出来，倒也可以，但我不想依照《李宗仁回忆录》那样，不喜欢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出书。"

"据我所知，张将军晚年极少接受别人采访，是不是他对往事的回顾一旦诉诸于文字，有一定的顾虑？"王书君猜测地问了一句。

"正是。"唐先生解释说，"张将军那时尚未完全自由。当时，在张将军的寓所里，他曾抬起胳膊指了指窗外，但见别墅四周几十位宪兵在游弋，张将军便对我说：'有时三十几位，有时则多达七十，数量不等。'可见，张将军那时仍处在监视之中。"

正值唐教授与张将军熟识之际，一九九〇年春，台湾军政商学界的名流开始考虑着手为张将军作九十大寿，公开祝寿。

"听说您也是九十位祝寿发起人之一。"王书君问道。

"我本人的发起人资格还是有争议的。我是属于台湾当局不太欢迎的那一类人，常常写文章今天批评张三，明天抨击李四。本来嘛，我们学历史的，受欢迎的地方也真是太少了。再说，我常常跑大陆，他们便指责我是亲共分子，有时我进台湾，偶尔他们还找我点小麻烦。但幸好我不参加任何组织，我是君子动口不动手。再说，也是张先生执意，让我做发起人之一。"

"张将军对我们后辈是十分看重的，"唐教授动情地说，"吃了那么多的饭，谈得那么好，真令人回味无穷。我记得有一次到张将军府上去，张夫人还亲手做牛排给我吃。我在一旁静观，不由感慨多端：啊，这不就是中国现代史上有名的赵四小姐吗？我对张将军说：'我参加的第一个学生运动，就是打倒张学良。'那是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我正在读小学。上街游行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打倒张学良！打倒赵四小姐！'而

今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谁又能想到，半个世纪之后，赵四小姐又亲手给我做饭吃呢！”

唐教授对王书君讲：“张学良的故事，哪一桩我不知道？在访谈时，我对张将军讲：‘你的故事我全知道，现在的问题是只需你自己讲。’张将军连说：‘那我讲，你写。’我便说：‘那我就要出本书，书名就叫作《张学良“我讲你写”录》’。

“开始时，张先生让我写他，体裁是唐德刚写张学良，用我的口气写。而我的意思，是用他的口气写，就像我写《李宗仁回忆录》一样，可张先生又不同意。那时，郭冠英倒是很有兴趣，我就对郭说，那你来写吧，可是，张先生、台湾中国近代史所、联合报等又不同意让郭写。”

“本来，我为张先生作传的事基本上谈妥了，可是，让宋楚瑜的一句话搞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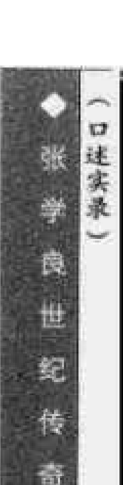
“宋楚瑜？就是现在正在竞选‘总统’的那个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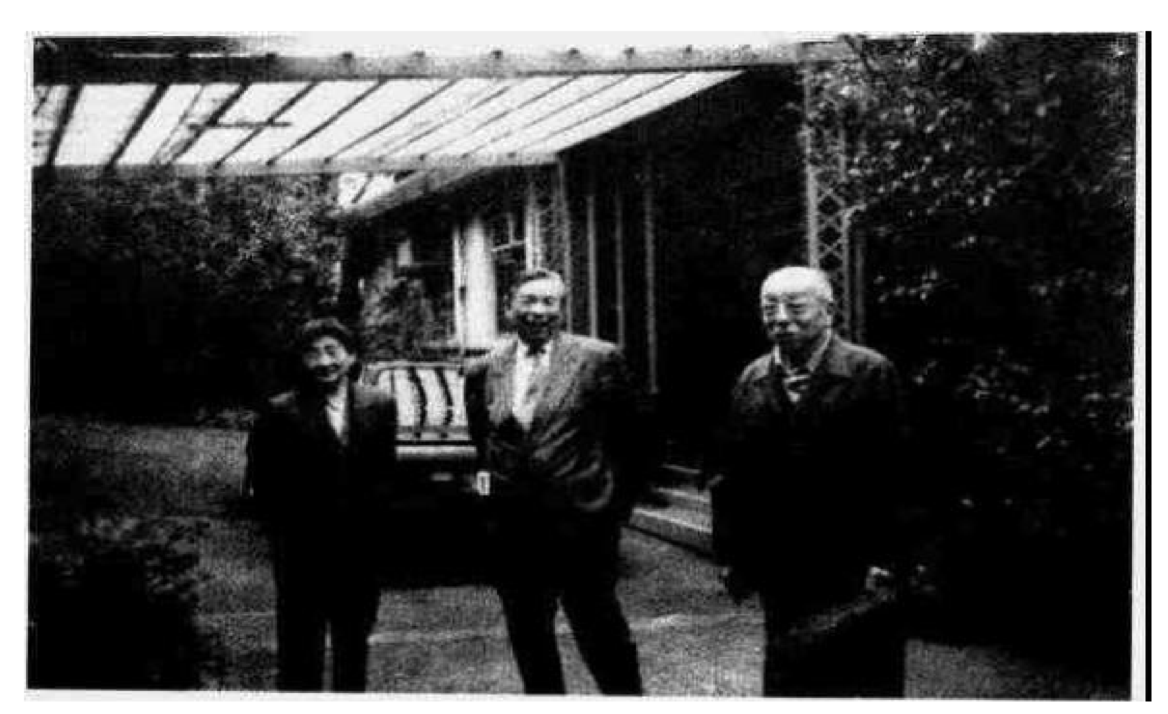
“是啊！那时，他任国民党秘书长，他知道此事后，就警告张学良，说台湾有这么多的史学家，你为什么偏要找唐德刚来作传？言下之意，我是从美国来的，对台湾的事又常说三道四的，态度不友好，是亲共的。这样一来，张先生就有点恐慌。”

“恐慌什么？蒋介石不是在一九五九年就解除了对他的管束了吗？”王书君问道。

“没有的，话是那么说，他真正解除管束的时间是他作九十大寿时。就算不恐慌，但他心里总是有点紧张。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知道国民党不会杀他了，但他也不敢，或者说不愿去得罪国民党。”

“我就问张学良，汉公，他们真的要把你搞死吗？张学良说，是啊，是啊！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哎呀，劫了一板子




在台北北投寓所，唐德刚与张学良夫妇在庭院内合影。

啦。意思就是，已过了一个阶段了，他与蒋的合作关系，已告一段落了，完结了。"

唐教授说："张学良在接获宋楚瑜的警告后，就同我取得了联系，说咱两个人要发表一个联合声明，声明说唐德刚没有替他张学良写回忆录。我就回应张先生说，咱两个不能联合声明，因为咱俩不是一样的人。你是国民党元老，我是一个海外华侨，咱俩人的身份不配。我说咱们可以各自声明各自的。结果，记得是六月十一号，声明登在了《中国时报》和《联合报》上。

"就这样，我们把宋楚瑜这桩子事打发掉了。随后，我就对张将军说，汉公啊，如果你还想写传的话，你将来可以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部合作，秘密地留下录音，然后，你百年之后再公布发表。张先生一听说：'哎，这个办法好。'

“我说，将来有机会，或哥伦比亚大学派人来，或者你到哥大去。我自己也老了，又有繁重的教学任务，我也没有太多的功夫再去搞口述历史了。你与哥大合作还是很好的，他那儿有一套制度，你的所有资料也可以存在哥大，等到二十一世纪再发表。对我这一番话，张将军还是很感兴趣的，连说‘很好，很好’。”

第二年春天，张将军赴美探亲，并开始了他的纽约之行。

唐教授继续回忆道：

“在纽约，张先生就住在贝太太家里。张先生耳聋，所以，我们打电话给他，都是贝太太接。我对张先生说，我要约你吃饭。张先生说，贝太太就是我的秘书，你任何事情都通过贝太太，由他替我安排好啦。

“我对张先生说，我请你吃饭时，我会把哥伦比亚大学的主持、把中国口述历史学部的教授们都请来，同你直接碰面。会面之后，如果你有意同哥伦比亚大学合作的话，你们可以再直接去谈好了，我负责从中介绍。张先生说：‘好，好！’

“张先生到纽约来是个春天，大约四月初，在初步谈好之后，我同张先生把具体餐会的时间都订好了，并约好了哥大的几位名教授以及主持这类事情的哥大东亚研究所的若干位教授，还有我在哥大已四十多年的老友吴健雄、袁家骝教授夫妇，请他们一起来餐聚。贝太太也答应了。

“就在餐会的前两三天，我又打电话给张先生，再来确认一下。因为张先生来纽约后，我们虽然见过几次面，吃过几顿饭，但那都是别人请客。这次轮到我请客，那我就要 confirm，我要告诉张先生，客人我都找好了，到时候光来见面吃饭、谈口述史合作一事就是了。

“不料，接电话的贝太太告诉我说，张先生到佛罗里达去了。哎呀，我说，怎么会到佛罗里达去了呢，不是讲好了要吃

饭吗？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贝太太说，不回来了，从佛罗里达直接回台湾。

"我说，这不是笑话吗，这人是不是太古怪了？都说好了的事，怎么不通知一下，又去佛罗里达了呢？我把客人都请到了，这该怎么办？好了，算了，不请了。我就打电话给哥大的教授，说张先生不来了，他糊里糊涂地跑掉了，以后再说吧。这样，我就把餐会取消了。"

"张将军真去佛罗里达了吗？"王书君追问道。

"不清楚，他去过大西洋城和华盛顿，时间很短，仅是去游览了一下。

"听贝太太这么一说，我真的以为张先生走掉了。可是，后来我在纽约碰到一位我的学生，这个学生要请我吃饭，我说，你为什么要请我吃饭呢？他说，张学良常在我主持的教堂里作礼拜，我知道你是史学教授，所以，我要请你们碰碰头。

"我问，张学良现在还在纽约吗？他说，在啊，他每个礼拜天都到我这儿来。

"所以，我就打电话问贝太太，张先生现在还在纽约嘛，这是怎么回事？我说，我叫唐德刚，你再问一下张先生。

"原来，由于请张先生吃饭的人太多了，所以，凡是请张先生吃饭的事，贝太太就一概拒绝掉，但她也不清楚我跟张学良有特殊的关系，再说，吃饭的事早已讲好了。我就说你再问问汉公，我叫唐德刚。"

"你以前不认识贝太太吗？"王书君问道。

"不认识。我同贝聿铭很熟的，但以前不认识贝太太。这时，贝太太就跑去问张先生，张先生说：'是唐德刚请客嘛，那我去，我去！'

"回过头来再请张先生，已经是五月底了，那我就要重新安排，因为这时哥大放假了，口述历史部的那些教授都走了，

我请不到他们了，只能请几位中国人，如吴健雄、袁家骝等陪客。

“安排好之后，张先生就到我家来了。那时，刚好我的一个朋友郭冠英正在纽约，我就开车子接，郭冠英就带了录影机摄，贝太太也一起来了。我们一路上还观看了哈德逊河风光。

“到了我家之后，因张先生走路有点困难，我就扶他上了我家的台阶。稍事休息后，我就告诉张先生，我们到‘鲤鱼门’去吃饭。”

途中，唐教授顺便带张将军去欣赏附近的房子。这个区是全美房价最贵的十区之一，不少房价都在美金百万元以上。唐教授的儿子是建筑师，也在这一带设计了几座房子。有一座是给一位台湾医师设计兴建的，是两层传统中国式的四角有亭阁的建筑,结合了中西建筑之美。但建好了之后，主人却嫌风水不好,而以一百二十万美金的低价脱售给另一位中国人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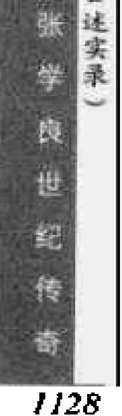
我不信风水！我的家住在大帅府后边，后来前面加盖了办公室。我父亲在的时候，一个墙上不许开两个门，因此有一道长墙，要从原来的门走回到后面办公，很不方便。我父亲去世后我就打开了一个门，我的四姨和五姨就反对，说这是我父亲的规矩。但我不管，仍开了门。后来我第三个儿子死了，她们就骂我，说你这忤逆啊，你就不信这一套，现在你开门把儿子弄死了。我就问她们说：“我爸爸没开门？”她们说：“没开门啊！”我说：“那他怎么死了？”

袁家骝与夫人吴健雄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家，张学良与他们见面相谈甚欢。唐教授说，今天，袁世凯的孙子会见张作霖的儿子，也是一桩历史佳话。

宴会上，张学良边吃边谈，兴致极高，滔滔不绝地谈了很多轶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张学良作客新泽西州鲤鱼门饭店，与友人合影。后排左一为唐德刚教授。



袁家骝是袁世凯之孙，父亲是袁世凯的二子袁克文。袁克文后来住在上海，成为青帮中的大爷，在上海滩徒众无数。晚年潦倒，许多字画都转给了张学良。

张学良说，他父亲在旧军人中最佩服袁世凯。一九一三年张作霖进京谒袁，临走，袁世凯把自己的貂皮大衣送给了张作霖，张作霖不敢收，袁世凯说你拿去，东北天冷，你可以穿穿。张学良告诉众人说："我父亲得意极了，后来把这件大衣留给我保存。"

袁世凯曾向家人说，张作霖真土，拜见他的时候，眼睛一直盯着桌上的一只表，他意识到张作霖喜欢，就坚持把此表送张作霖。由此可见，袁世凯特别善于笼络人。

唐德刚教授的夫人吴昭文是党国元老吴开先的女儿，她回

忆说，早年，张学良曾送给她父亲一件紫羔羊皮筒子，他父亲一直珍藏着。去年她父亲去世，整理遗物时，许多衣服都丢了，因为台湾热，毛皮不易保存，只有这件皮筒子带来美国作纪念。后来，唐夫人把它做了件皮袍子。

唐德刚教授继续说道："我请了一大桌客，共十二人，除袁吴夫妇之外，还有刘老、刘老的儿子等人陪客。宴请的格调是很高的，我不能请一桌赖饭，我就告诉饭店老板，你给我办一桌你饭店最好的酒席，你们能做到怎样好就怎样好，没有限制。结果，我们吃了一顿饭，除酒水之外，饭菜是八百五十美元，总起来算，超过一千美元。幸好饭店的房东是刘老的儿子，老板和房东都说，不要让唐教授付钱了，这钱我们负担了，因为张先生来我们这儿，也是我们的荣耀。后来，我本人坚持付了酒水钱。"

"宴会上还谈了些什么？"王书君关切地问。

"谈得很好啊，讲了许多笑话，不少还是黄色笑话。我还说，袁世凯的孙子与张作霖的儿子历史性会面，共有哈德逊河畔谈历史的味道。"

"但由于哥大口述史部的教授们都放假走了，没有到会，这口述史的事在吃饭时我也没有提及。不久，张先生就走了，先回西岸，后返台湾。"

然后，唐教授继续对王书君讲述了有关张将军口述历史的事：

"这期间，估计是四月初，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中文会话的讲师张女士插了进来。张女士很活跃，她班上有许多洋学生，她就利用张学良侄女的关系告诉张先生，说她班上有许多洋学生想看望他。

"听说洋学生要看他，张先生很高兴，那些洋学生大个子、黄头发，又是中文会话班的，就这样与张学良谈了起来。他们

也谈到了口述历史，张先生就说：‘我正要做口述历史，可以的。’

“有了张先生的这句话，这张女士就开始活动了。她对张学良说，为了搞口述史，我们现在需要申请钱，你可不可以出个报告？张学良说，可以。

“但张女士在美国很难搞到这笔钱，在美国是要查资格、查底细的。她的资格不够。她就与台湾方面联系。后来她找到王永庆，王永庆觉得，张学良既然要做口述历史，那就资助五万美元吧。有了这五万美元，张女士的本事就大了。

“搞中国口述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哥大东亚研究所，一个是哥大东亚系。中国口述历史学部属东亚所。

“张女士得到五万美元的捐款后，她不去找东亚所，也不去找东亚系，中文系也认为她不是搞此事的合适人选，她就去找柯瑞尔。”

“这柯瑞尔是个什么人物？”王书君问道。

“哥大还有一个全校性的总部，叫哥大口述历史部，它是管理哥大所有各系、各所口述历史资料和拷贝的，比如东亚的口述资料、欧洲的口述资料、中东的口述资料等等都综合到这里。它是一个行政管理机构，当时的负责人叫柯瑞尔。

“按理说，柯瑞尔不该管这个事，管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学术上应该属哥大东亚所的业务，或是东亚系。但张女士告诉柯瑞尔，说她这儿有五万块钱，那柯瑞尔当然就抓住不放。但外人不清楚，以为都是哥大的口述历史。所以，哥大里有这么个复杂的情况，但张学良怎么会知道呢？

“这样，柯瑞尔就正式用哥大口述历史部的信封，写信给张先生，说我就是哥大口述历史部。其实，这部门在学术上与东亚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部毫无关系。

“张女士搞的这事，当时张学良在纽约时，我们大家都不知道。后来，张先生回到台湾后，有人问他，你的美国之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张学良回答说：‘我赴美的最大收获是和哥伦比亚大学搞了合作，准备搞口述历史。’这个消息刊登在纽约《世界日报》上，我们这才知道。

“得知这个消息后，哥大东亚所所长安卓·乃森就向柯瑞尔提出抗议，说这工作是属于我们东亚所中国口述历史部的职责，你怎么跑到我们的职责范围里来了？

“乃森的这封抗议信曾事先拿给我看过。但因这五万块钱的关系，柯瑞尔就是不理这一套，他说，你们可以搞，我也可以搞。他们还专门临时加写了个‘口述历史’的牌子，挂在办公室里。

“但是，柯瑞尔是个洋人，不懂中国历史嘛，不像乃森那样，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又有中文著作。但有柯瑞尔撑腰，张女士就可以不受约束地自行其事了。这时，有人转告张学良，说张女士不是搞口述历史的，她不具备这个资格。但张学良说，我不相信张女士，但我相信哥伦比亚大学。

“问题是，哥伦比亚大学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张先生可能只知道哥大有一个口述历史部，那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的口述历史，都是这么出来的，但他不知道这里面有复杂的情况，有不同的部门，不知道这里面还有内行和外行嘛。”

唐教授继续说：“后来，台湾方面的中国近代史所、联合报等单位准备为张先生做口述历史，但张先生婉拒了，他说：‘关于口述历史，我已经答应哥伦比亚大学了。’他答应的哪里是哥大，他答应的是张女士！”

“这么说，张将军的口述历史搞得阴差阳错了？”王书君遗憾地问道。

“是啊，可惜了嘛，张女士躲着东亚所中国口述历史部搞，

你知道，那个部门是中国口述史的老祖宗，但她怎么能够和老祖宗搞在一起呢，和老祖宗搞在一起，明摆着就没有她的了嘛。"

"我就告诉过张学良，"唐教授对王书君说，"搞口述历史，看起来很容易，但搞好却很难。严格地说，搞口述历史的人，要对你访问的对象的历史背景比他自己还要清楚，这才能搞得好，才能搞成功。"

"张女士揽了这么个大差事，但她自己搞不了，只好请她姐姐来帮这个忙。

"她姐姐原先在美国南方的一所大学里做一名图书管理员。由于她父亲是教古汉语的，所以她就跟她爸爸学了一套古文功夫，一出手写文章，之乎者也就出来了。问题是，研究张学良你不能仅仅之乎者也，你要懂中国近现代历史。张先生年纪大了，许多事件历时久远，他的记忆也会有错误，你要是对历史不清楚，没法子发问，没法子下笔。张学良若打开话闸子、漫天乱讲的，同一个故事，他会翻来复去地讲好多遍，完全没有一个系统的思路。这也不能怪他，因他不是学历史的，不是搞学问的嘛，不像我们经过历史专业的科班训练，采访的关键全靠采访者如何利用专业知识去启发他、去引导他。"

"张家姐妹是在哪里进行采访的？"王书君追问道。

"在台北。张学良后来回台北去了，姐妹俩就跟到台北，后来张先生又定居夏威夷，她们又跟到夏威夷。"

"搞得效果如何，您知道吗？"王书君探问道。

"效果不是太好，听说张姐去了之后，跟张学良谈了，张学良说怎么她什么都不知道，什么叫'奉系'，什么叫'直系'，她一概都不知道。据别人告诉我们，说把张学良搞得很被动。

"由于听别人说，张家姐妹两人是冒牌的，张学良就派他

的一个侄女去哥大打听底细，张女士就主动带她去见了柯瑞尔，拜访了那个行政部门的口述历史部，但绝不去东亚所的中国口述历史部和东亚系。”

“张学良后来知道他的口述历史搞得不理想吗？”王书君问道。

“知道的，后来，张学良自己心里也清楚了。”

“我打个比方，是不是一个盛大的宴会，山珍海味、上等佐料一应俱全，但却请了一个不善烹调的厨师，结果没有炒出应有的味道来？”王书君比喻道。

“是啊，可以这样说。”

“唐老，您现在知不知道她们姊妹俩录了多少张学良的口述资料，质与量如何？”

“肯定会录一些，但我想她们搞不出什么新东西。张学良后来对人讲，他说，我同唐德刚讲，唐德刚听得明白，那张家姐妹听不明白，她们查书也很难查到的。”

“据您估计，张学良对您讲的，与他对张家姐妹讲的，会有什么不同？”

“我想大同小异啦。到二〇〇二年，有可能会公布他的一些信件、档案材料，口述录音估计也会有的，但质量如何，我现在也不清楚，对此并不乐观。

“后来，哥大方面就问张学良，你能不能把你的一些资料捐给哥大？张先生说，可以！原先，张先生的想法是开辟一个‘张学良室’，张先生自己起名叫做‘毅荻斋’，毅庵是张先生的字，‘荻’则是赵一荻名中的一个字。”

“现在哥大有这样一个室吗？”

“没有，因为哥大没有那么多地方。现在，柯瑞尔知道我这儿也有张学良的口述录音带，就写信给我，要我的这批带，但我暂时没有给他。”

一九九六年十月，张学良夫妇委托儿子张闾琳将自己的私人文件和口述历史资料捐赠给哥大，并举行了简短的交接仪式。根据张将军的意愿，这批资料文件将在二〇〇二年后才能对外公开。

第九十七章　将 军 福 地

1995．5

——“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就能使人长寿。”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一九三六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

“这次先去旧金山看望儿子和孙子，然后再去夏威夷看望五弟。”

一九九三年春，张学良夫妇第二次赴美探亲，张学良在台北机场这样答记者之问。

“是否还想回大陆东北去看看？”记者问道。

“有适当的机会当然要回去看看，那里是我的家。不过，





一九九二年七月，张学良与赵一荻在台北家中留影.

我这个人从来没有时间预计和准备，时机一到，高兴就马上走，不高兴就晚几天去。具体时间现在还没有确定。"

接着，张学良谈及此行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夫人的健康状况一直不大好，患有骨质疏松症，有一部分骨头已出现裂缝，给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去夏威夷陪她疗养疗养。

一九九三年盛夏，在夏威夷的金色海滩上，人们看到一对老年夫妇在夕阳晚风中缓缓漫步。这对老夫妇就是九十三岁的张学良与八十二岁的赵一荻。

同年十二月十五日，张学良与夫人第三次离台赴美探亲访



一九九三年，张学良夫妇在旧金山机场由服务人员协助坐轮椅出机场大厅。

友。他们在美国旧金山与儿女团聚欢度新年。这是自西安事变后近六十年来张学良首次在异国他乡过新年。

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著名京剧爱好者仝玉洁和汪文娟邀来了几位京剧名角，加上旧金山当地的一些京剧爱好者，兴致勃勃地为张学良举办了欢迎会。

这天傍晚，张学良由他的五弟张学森夫妇陪同，乘车前来赴宴。夫人赵一荻因身体关系未能出席。晚宴主持人仝玉洁等人见张学良不需他人搀扶而径直步人客室，顿时报以热烈的掌声。

首先演唱的是大陆江苏省京剧团的陆根章，他唱的是“杨延辉坐宫院”一段，接着是旧金山名旦宋祖莲和本次欢迎会的

女主人汪文娟演唱，然后是北京京剧院的齐啸云。

欢迎会上，张学良听得津津有味，摇头击节，不断叫好。突然，他站了起来，众人以为他老人家要去上厕所，有人甚至正欲上前为他引路呢，可是他却摆摆手，径直走到琴师沈福庆跟前，面对大家说："我也唱上两段，过过戏瘾！"众人一听大悦，纷纷鼓掌欢迎。

张学良先唱《战太平》，后唱《失街亭》，再唱《空城计》，又唱《斩马谡》，他的唱腔韵调准确，戏词吐得清晰。大家对九十四岁高龄的他还能唱好繁杂的腔调，赞叹不已，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岂料，此时他的戏瘾还在高涨，大有欲罢不能之势。当他要唱《斩黄袍》时，年轻的沈琴师竟然不会拉。这时，幸亏有人自报奋勇上来拉琴，才让张学良过足了京剧瘾。由于他唱得有板有眼，博得众人齐声喝采。唱罢，张学良拱手道："见笑见笑，多谢大家捧场！"这使人们不禁想起一九九三年四月张学良在台湾观看大陆北京京剧团演出时和同年七月观看赴台的李维康、耿其昌夫妇等人演出时，油然表现出的对京剧艺术的热爱。

京戏唱完后，女主人全玉洁向众来宾宣布开宴，美食佳肴全是名餐馆送来的。张学良对席上的鸡肉韭菜水饺非常感兴趣，不断赞扬烹饪名家谭莺伟及万雯的高超技艺。

宴席结束后，张学良又兴致勃勃地同众人一起讲故事、说笑话、猜谜语、谈往事、写字、作诗。

人的生活要简单，简单的生活就能使人长寿。我这个人有个特点，如果明天我被枪毙，今天晚上我仍然会睡得又香又甜。我这一生有三爱：一、爱打麻将；二、爱说笑话；三、爱唱老歌。

这时有人拿来笔墨，请张学良挥毫遣兴。张学良欣然在纸



一九九三年七月，张学良在台北张学森家中与耿其昌、李维康夫妇共唱京剧传统老戏唱段后，非常高兴，耿、李二人鼓掌庆贺。

上写下一幅对联：

惟大英雄重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

众来宾看着这古朴苍劲的墨迹，不由赞叹张学良书法之功力，另成一体。

晚会上，张学良还作了一首诗，这首诗不仅有趣，还给人以联想。诗曰：

自古英雄多好色，未必好色尽英雄。
我虽并非英雄汉，惟有好色似英雄。

读着这首诗，大家似乎看到了张学良那诚挚坦荡的胸怀。

五弟张学森见夜色已深，便建议大哥回家休息。

“我不回家！”张学良故作执拗地说。

“你不回家，我要报告大嫂！”张学森开玩笑道。

“那我就告诉你大嫂，说你不带我回家！”张学良逗乐说。

兄弟两人你一句话我一语，逗得来宾哈哈大笑。

“我带大哥到这里玩得这么开心，大哥应当发给我奖金啊！”沉寂片刻，张学森又逗趣道。

张学良闻言，真地从衣袋里取出钱包，然后慢慢地翻找着什么。众来宾以为他在拿钱奖励五弟，谁知他却拿出一根牙签。

“这牙签，是我发给你的奖金。”张学良面带微笑地对五弟说。

见此情景，众人又是一阵大笑。

最后，张学森说：“大哥，咱们回家吧！”

张学良听了五弟的话，沉思片刻，语重心长地说：“你的家在哪儿啊”。

张学森闻言，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

一月二十四日，张学良夫妇乘飞机抵达四季如春的夏威夷，在五弟张学森寓所休养。为了不给五弟添更多的麻烦，不久，他们又另租了公寓暂住。

张学良暂时居住的“礁岩塔”公寓大楼位于檀香山市区，该区域为希尔顿酒店集团所拥有和管理的“希尔顿夏威夷村”。公寓楼依傍着蓝色大海，景色秀美，楼前还有一碧波荡漾的淡水湖。在“礁岩塔”里居住的人只能承租，不能购买，居民大多是退休老人。

张学良在此公寓试住了两个月，感到夏威夷的气候对自己及夫人特别适合，就托人把台北北投幽居了三十多年的住宅卖

掉，决定在夏威夷安度晚年，并向美国移民局申请了长期居住的“绿卡”。

在当地人的眼睛里，张学良夫妇是一对安祥恩爱的中国老伴儿，邻居都亲昵地称他们为“张先生”、“张夫人”，对他俩的过去几乎一无所知。一位白人老太太说：“那位中国人张先生很安静，从不打扰别人。他的夫人相对比张先生出来勤一些。”而大楼管理员则对记者说：“有人向我交待过，说张先生是个特别人物，我们不能随便跟外界讲他的情况。”

张学良夫妇定居后，生活上毫无寂寞之感，他们以强烈的宗教信仰充实着自己的心灵。闲暇时，他会和朋友打打小牌或偶尔在夫人陪同下坐轮椅到海滨和人工湖畔晒太阳、观风景。邻居们都不相信，这位张先生居然是将届百岁的老人。

张学良定居后的一项固定活动是到教堂做礼拜。他去的是赫赫有名的夏威夷“中华第一基督教会”教堂，牧师陈家和说：“张学良先生十分随和，教友们都知道他曾是大名鼎鼎的张学良将军。然而，他与教友们谈的都是有关宗教信仰的事。他生活十分单纯，宗教是他的生活重心。在做礼拜的时候，张学良的精神十分专注。他和教友们同唱诗歌、祷告和读经。宗教信仰是他生活的最大的欢乐。”

一九九五年六月一日，是张将军九十五岁生日。此时，张学良夫妇在夏威夷檀香山礁岩塔新居欣喜地接待了前来祝寿的亲朋好友。

张学良的老朋友阎宝航先生的女儿阎明光专程从上海前往檀香山，为张将军祝寿，并代表其弟阎明复向张将军转达了祝福。

从美国各地赶往张将军新居祝寿的，还有东北大学校友张捷迁、方庆英及张将军故旧宁恩承等人。

近年来，张学良和夫人赵一荻因年事已高，身体不如以前



一九九五年，张学良（前左）、赵一荻（前右）与美籍华人邝友良（后左）夫妇合影。

硬朗，平时不远行，外出大都由轮椅代步。在张将军九十五岁生日之际，其子女携家眷从各地来到将军夫妇家中聚会陪伴，欢度生日。

回忆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我对一九三六年发动的事变无悔，如果再走一遍人生路，还会做西安事变之事。

这年冬天，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血液病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抵檀香山作短期研究访问，马军很想借此机会拜见“东北老乡”张学良将军。十一月二十六日，张学良欣然接见了马军。

“马先生，您是从东北哪疙瘩来的？您去没去过沈阳？”张学良操着浓重的东北口音问道。

马军教授对张将军的问话，一一作答。

二十年代，我去过几次哈尔滨，道外人很多，道里有条大街，马路全是石头铺的，马车走在上面嗒嗒作响，声音可好听了！马路两边都是俄式建筑。那年，我住在大和旅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了？

东北的高粱米、小米很好吃啊！

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星期天上午，张学良夫妇公开露面，在檀香山市中心的中华第一基督教会参加了众亲友为其举行的九十六岁生日祝寿会，约有一百多名亲友到场。

上午十点半，张学良夫妇在家人的簇拥下坐着轮椅进入教堂，全场骤然响起掌声。据到场人士说，张学良的气色很好，一直微笑着与亲朋好友们握手或抱拳致意。

祝寿会开始，主持人首先请少帅讲话。老人接过麦克风，沉思半晌，浓重的东北口音在肃然的会堂里响起："我年轻时就憎恨日本人，希望中国强大，不被日本欺负，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来干事儿的……"

少帅显然是过于激动，说到这里，语音哽咽。旁边的赵一荻低声讲了几句，老人想继续讲，却又语塞。主持人体谅地打开录像机，播放张学良事先录好的一段话。

录像机里，张学良的语气是平静和缓的。他简单叙述了近几十年来的生活，以及他成为一个虔诚基督徒的心路历程。讲述之中，众人不时地以阵阵掌声回应。接着，唱诗班献诗，杂耍开始表演，最后切了生日蛋糕。

六月一日，张学良九十六岁华诞之宴，在夏威夷希尔顿饭店举行，由其已故弟弟张学森的女公子张闾芝小姐主持，从夏威夷时间下午六时三十分开始至晚上十时，欢宴历时近四小时。欢宴中，前往祝寿的至亲好友、东北同乡及当地侨界人士众多，包括东北大学代表团、中国京剧代表团、前联勤总司令



一九九六年，张学良（左）与赵一荻在生日蛋糕前。张学良指着蜡烛说："我一口气能把它吹灭！"

何世礼将军、前美国华裔参议员邝友良、侨务委员黄卓棠、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于定玉夫妇、华航夏威夷经理胡绍瑛等，总计二百余人。

宴会开始后，何世礼、邝友良先后致词，推崇张学良当年"东北易帜"对国家统一做出的贡献，颂扬张将军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的重要关键人物。接着，教会会友为他唱诗祝贺。

寿宴结束后，首先由国家级演员演出《四郎探母》，接着由马小曼率阵演唱《凤还巢》。张学良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唱段，脸上一直露出愉快笑容，并先后客串唱了《借东风》和《空城计》，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欢宴结束后，张学良告诉亲友说，这是他自民国二十六年被监禁至解禁长达四十九年来，过得最愉快且最有意义的一个

生日。

欢宴之际，他还真诚地表示，希望有一天，当他和她的夫人身体状况许可时，能够以老兵的身份回东北辽宁老家看看亲友。

同年十一月，中国张学良基金会副会长赵双城也专程飞往夏威夷探视。张学良再次表示，希望回东北老家与乡亲叙旧。

一九九七年九月七日中午，台湾李登辉抵达夏威夷。傍晚，他前往檀香山张学良寓所拜访，与其晤谈四十分钟。此前稍早，台湾官员丁懋时、章孝严、胡志强亦曾先行抵张宅探望，并向张学良赠送了礼物。

张学良夫妇定居檀香山后，常受外界探视打扰。为了过安静的生活，张学良于一九九七年十月郑重声明，对国内所有来访者一概回绝。

九十年代初，当张学良公开露面时，他确实曾想重返东北一探故里，但却阴差阳错未能成行。如今，在经历了一世纪跨台海两岸的传奇生涯后，张学良选择了气候温和、风景怡人的夏威夷檀岛颐养天年，那么，他有无落叶归根之念呢?

对此，纽约《世界时报》记者汪士淳报道说，少帅心境已超脱，余生只想安居檀香山，神殿山谷已悄见将军福地。

在美国，实际上存在两处张学良“生圹”。一处在洛杉矶，是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为他购置的；另一处在夏威夷。

“国内的人们可能还不知道，我十妈为了实现与张将军生不同床、死也要同穴的愿望，她生前在洛杉矶玫瑰园墓地为她与张将军买了一块墓地。”于凤至的义子萧朝智先生说道。

“我出于对于凤至女士的景仰，举起照相机，把于凤至为张学良将军在好莱坞山顶购置的别墅摄入了镜头。”作家王朝柱著文回忆道，“然后，又乘坐萧朝智先生的轿车来到了玫瑰园墓地。接着，又随萧朝智先生走进墓地的大门，来到右边不

远的一块不算太大的墓地，这就是于凤至为自己和张学良购置的墓地，而且她已经于一九九〇年长眠于此了！首先，萧朝智先生在于凤至的墓前献上一束鲜花，接着，我们一行不约而同地把头垂在胸前。有顷，萧朝智先生抬起头，指着葬埋于凤至旁边的一块空地，低沉地说：'干妈生前吩咐过的，这里是留给张将军的。可惜的是，张将军百年之后不能埋在这里了。''为什么？''听说，赵四小姐在夏威夷也买了一块墓地。'"

萧先生所言的这块墓地，位于檀香山"神殿之谷"纪念公园内。

"神殿之谷"位于檀香山北边，距市区约五六十里。一进入公园，满目绿意。纪念公园里，占地最广的是香港航运巨子包玉刚的墓园，占了公园里整整一个小山丘。墓园中有实木搭建的一座方亭，庇荫着正中央的黑色大理石墓。墓碑上记载包玉刚生于一九一八年，卒于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三日。在黑色的墓台上，镌刻了这位航运巨子的治家格言："持恒健身，勤俭建业。"

管理员说，当年菲律宾的被废总统马科斯到夏威夷落脚后没多久，一个名为"菲律宾人协会"的组织又买下包玉刚墓园旁边的一块墓地。后来马科斯过世，葬到此地，他们才知道是为马科斯买的。当然了，马科斯最后还是改葬到他自己的家乡了。

然而，张学良的墓地到底在哪里？管理员却不知道。但是，一九九五年九月，张学良在华航檀岛办事处任职的五弟张学森，在北京参加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活动后，突然因心脏病发作去世，后来就葬在离管理办公室不远、较为平坦的一个地方，这里有醒目的张学森的墓碑。

墓园管理员试着以电脑查资料，也无记载。但他猛然想起，"一位著名的中国将军"两年前曾经买下一块相当大的墓

地，并且建好了空圹以备不时之需，经他指明地点之后，探访者们在其弟张学森墓上方山坡上，终于找到了显然是属于张学良的墓园。

张学良的墓园坐南朝北，占地大约有二百平方米左右，风水很好，以“中国海景”（Chinese Ocean View）名之；在入口处，有块大理石，上面刻着“以马内利”，意即“上帝与我们同在”；进门之后，约二三十公尺的曲折步道完全没有台阶，轮椅可以直达黑色大理石墓台。墓台四周，间隔栽植着扶桑和扁柏。

在拱型墓台外围，另一块大理石上以中英文镌刻着《圣经》“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经文：“复活在我，生命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亦必复活。”大理石墓台前方则是英文的“以马内利”。整个墓园的后方正中，是白色十字架。

不过，墓园内并未如中国人的习俗事先把未来主人的名字刻在上面，也就是说，这座墓园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未来要葬的是张学良夫妇。

管理员指出，电脑资料里面查不出这座基督教双人空圹拥有者是谁，这有两个可能：一是以别人名义代购墓地，二是以特别合约来购买；但是他确实知道，这块墓地是“一位中国著名将军”未来的长眠之地。

皈依宗教的张学良早已看透生死，他生前就经常公开表示“死不过是搬个家而已”，“人生在世，有如旅人，回到天国，才是归宿”。他与赵四小姐所选的墓园，原本计划铭刻“张氏墓园”于大理石碑上，后来又打消了这个念头而仅以希伯来文“以马内利”铭之，这也表达了这对携手走过山河岁月的患难夫妻的最终心境。

当张学良为自己预先安排好身后之事，选择神殿山谷作自己的最后归宿时，他此生迁葬父亲于元帅林的最后心愿，尚未

实现。

元帅林位于辽宁省抚顺市东方约三十八公里的高丽营子村南山丘上，是张学良为他的父亲张作霖兴建的大陵，大陵原先占地一千两百余亩，坐北朝南，陵园缭绕墙由山下浑河依照山势起伏绵延上山，四角建有炮楼。整个陵园由方城、圆城、墓室三部分组成，建筑风格沿袭了古代帝王陵园，又有中西合璧之意。

陵园现已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跨入圆城，一座高达于公尺的汉白玉石牌坊矗立于前；牌坊后方约三十公尺处是一个半球形的实顶，这就是张作霖的墓园了。

通过两座墓室进入最里面的半球形墓室，上方绘画着日月星辰，门的两侧上端有西式的飞天雕塑，手工极为精致。墓室内灵台上，空荡荡的，没有棺椁和任何殉葬物品，这是因为张作霖于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后，灵柩暂厝沈阳珠林寺待葬。

元帅林于一九二九年破土动工，一九三一年秋天已大致建成，但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东北，张作霖的灵柩未能运到此处安葬，元帅林也就成为一座空墓。

走在圆城里，宝顶周围陈列着一对对的石人、石马、石羊等汉白玉精美石雕。这些石雕均是建陵时张学良从北京西郊墓地等处买来的。整个建陵工程，当年的预算是一千四百万大洋，除了辽宁捐款四百万，吉、黑两省各捐两百万，热河省一百万之外，大帅府自行负担五百万元大洋。这是张学良当年对他父亲及其家族的心意。如今事隔六十多年，将父亲迁葬于此的心愿并未实现。

第九十八章　故 土 亲 情

1996．5

——“我们张家的人都不喜欢我，说我眼睫毛长，不认亲。”

——“我愿意中国统一，从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我也非常想念咱东北的老少爷们啊！”

我要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我的亲友。这事与政治无关，我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我希望人们不要把我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不要这样，我不喜欢这样。

我从来都是主张中国统一的，我非常反对中国分裂。我一直希望海峡两岸早日实现统一。

自“九一八”之后，张学良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老家。他一生颠沛飘荡，长期幽禁，骨肉分离，随遇而安。

我们东北人有句笑话，说眼睫毛长不认亲。我们张家的人都不喜欢我，说我眼睫毛长，不认亲。我的姨，就是我母亲的妹妹，她儿子来找我要点事干，他向我说：“你给我个顾问当当吧！”我说：“为什么给个顾问？顾问不是我给的，那是政府的职位，我不能随便给。”他说：“你给一个不就行了嘛，你给旁人就不能给我吗？”我说：“你有什么资格能当顾问呢？你有什么功劳当顾问？”他说：“你这人就是这么不认亲！”我说：“你要钱我给你点钱，我不能拿国家的职位随便给你！”他说：“唉，你这人真是不认亲！”所以，我们家里的亲戚都骂我不认亲。

我二伯父是剿匪时被打死的。二伯父死后，他们全家就住在我们家。我二伯父的大儿子叫张学成，是被我枪毙的，因他与日本人勾结。

二伯父的二儿子叫张学文，在东北军里当团长，后升了旅长。现在到加拿大去了。

我还有个姑夫姓杨，在我父亲手底下。那时，我父亲当二十七师师长，他在我父亲手下当骑兵团团长。骑兵团长原是张作相的，后来是他接任。我最不喜欢我这个姑夫，我当二十七师师长时，他立刻辞职走了，他知道我不会给他好事，连面没见就走掉了。

我父亲在北京当大元帅时，那时赵尔巽还在，他就想给他儿子求婚，想娶我的一个三妹子，我父亲没有答应。什么原因呢？因为我管赵尔巽叫爷爷，我的妹妹叫赵尔巽也叫爷爷，他的儿子大我们一辈。我父亲很讲究这个，所以没有答应。不久，赵就病故了，我父亲为这事很难过。他说，我对不起赵，让他误会我闹气了，他求婚，我不答应，其实，我是因辈份原因而不肯，现在想来，我应该答应他，所以，我现在很难过。

后来，等回到奉天时，我父亲也去世了，我就跟我母亲商量，他们两个老头都有这个心愿，我们好不好就让他们结合了？我是自由派，我母亲也很开通，说这样吧，怎么也该让他们会会面，两个若是愿意，就好，不愿意，就不订婚。所以，就托人介绍，后来，赵世辉到了奉天，他们就结婚了。

我很喜欢我这三妹的儿子，她的儿子叫赵守文，这孩子当大夫了，是妇科大夫，很好。后来，他和白崇禧作了亲，他的姑娘嫁给了白崇禧的儿子。他们来过我这儿。

我给你讲个笑话。我三妹她跟我说："白崇禧的儿子很好！"我说："是很好！"她很奇怪，问我："你认得白的儿子？"我说："不认识。"她说："不认识你怎么知道很好？"我说："要是我有你这样的丈母娘，我早就一脚把你踹出去了！你住白家，就冲你这丈母娘，他没把你踹出去，我就知道他人很好。"

我的大儿子早就死了。他死得真奇怪，他正在跟人家说话呢，那护士眼看着他的脸色就变了，赶紧去唤大夫，可回来一看，他已经死了。大夫说可能是脑溢血，这毛病已有多年。他神经方面也不正常。

很可惜啊，我最喜欢他，他的学问是最好的。他是牛津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还在牛津搞了一段时间的研究，他当时就能用英文写文章在《泰晤士报》上发表。

实际上，他还是小孩子时就有毛病，脑子就有点不对头。他念中学时，一次，同学们结伴出去玩，把他丢了，他就在野地里跟那草啊树啊说话。他从小神志上就有点儿异样。

我的二儿子喜欢抽香烟，他一天到晚差不多不停地抽，他可能就死在这香烟上。老二死在美国。

老三小时候很聪明，但他后来得了肺结核。这病，现在算不了什么，但那时却非常难治，他十一岁时就死了。

我的三个儿子都死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姑娘，还有一个小儿子了。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二战时期，正在伦敦教会学校就读的张学良的长子张闾玗，于一次德国纳粹飞机轰炸的时候，在极度的惊恐之中，患上较为严重的精神分裂症，经数家医院治疗均无效果。到美国后，闾玗发病的次数越来越多，不得不从哥伦比亚大学休学。后来，因有宋美龄从中玉成，闾玗得以在一九五四年由美国到台湾求医。当时，于凤至明知台湾的医疗水平远不及美国，可是她的用意在于藉此机会让与父亲分别多年的闾玗能见到被蒋氏幽禁在台湾的张学良。闾玗来到基隆以后，在见到父亲后不久，就因病情笃深而死于永和医院。张学良为此悲痛欲绝，亲自将长子的棺椁安葬在临海的鸡笼山下，这里隔海可以遥望大陆。张学良的次子闾琦，因高血压猝患中风，死于一九五八年秋天。

你知道，我在东北有多大的家产？先不说有多少地，就财产说，按那时的钱算，少说有五六千万。那时，日本人准备把我的家产还给我。

是啊！“九一八”之后，他们日本人把我的家产装了三列车厢，要运过来还我，但我不要。

这事是本庄繁干的。我跟他是很要好的朋友，我俩相当好，我到日本去参观，就是他陪我去的。“九一八”之后，他自个儿花了六千块钱，把我的家产打包，都包得很好，装了三列车厢送到北京的正阳门外车站。他还写了一封信，派他的亲信来送给我。

我大火，我说你这是在羞辱我。我是一个封疆大吏，我的疆土丢掉了，你却来送还我自个家的东西，你这是给我羞耻。你马上把这东西运回去，我原先摆在哪儿，你就给我摆在哪儿，要拿，我自己会回去拿的。你要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你

可别说我对你不客气，到时候，我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一把火都烧了，你别说我不给你面子，别说我给你丢脸面！你要还，你把东三省还我，你首先要还我的土地！

我家原先跟日本人大仓有来往，“九一八”后，大仓就出来跟我说，你把家产都托付给我吧，我代你保管。我跟他毫不客气地说，我们过去是朋友，但今天我跟你日本人是敌人，你不要管我的事。我就是这样一个倔强的人。为了这个，我家中的人，我家的亲戚，都骂我，说你这个人真不是东西。

“我觉得今天与我们那个时代不一样，那时有点过分爱国，因为我们从小受日本人欺负，太厉害了。而现在，谈爱国，反而好像有点神经病似的。”赵一荻在旁感叹道。

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的一个部下，这人已经死掉了，死得很可怜啊。他是谁呢，就是吴俊升的儿子，他是我讲武堂的同学，本来我很想提拔他。

后来，在武汉时，有一天晚上他来见我，我就很奇怪，为什么白天不来晚上来。我就问他，是不是我部下有对不住你的地方，他说不是。他说，是这样的：日本人把我家的财产弄光了，他们说可以还给我，但有个条件，就是我不能做中国的事，不能为中国政府做事。

我一听就火了，我说，那好吧，你出去，从今以后你不许进我的家门，我也不认识你这个人，你要再来，我决不见你。你就因为这么点钱，就不做中国人了？我没有想到你会是这么个人。

他吴家的家产，他家存的钱，比我们家要多。在东北，他家拥有的财产第一，他父亲吴俊升是黑龙江的督军。有一次，奉天要办一件事，号召募捐，他家捐的地，光是地，还不算旁的，就有两个火车站长，你想，他家有多少钱财！可是，他死的时候，连十块钱都找不到，身上一个铜板都没有，死得很可怜啊，是穷死的！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张将军曾吟诗一首，以诗明志，写照晚年，诗曰：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晚年，特别是九十华诞之后，神州故土亲情，少帅难以忘怀；同时，他也强烈地感受到海峡两岸人民对他真挚的情感。

一九九二年九月十日下午三时，张学良在台北北投住宅接受了新华社记者团翟象乾等四名记者的访问。

记者问：两岸大多数人民都想统一，您老人家有何看法？

张说：那是大多数，我也是大多数之一。

记者问：您对和平统一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张答：我看时机到了就一定会统一。历史上我是从来都赞成统一的一个人，国家当然要统一。我为统一奔走得也很多了，现在老了，没有这个力量了。

记者问：您对国共两党第三次合作有什么看法？

张说：我可以促成这个成功就是了。现在已经老了，在政治上也没什么可顾虑的了，我能帮忙。我很愿意尽我的力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愿意中国统一，从年轻时到现在，我这个人过去的事都摆着呢，凡是为国为民的事情，我都很愿意帮忙。

记者问：您对两岸关系有什么看法？

张答：对于两岸关系，我觉得很不错。头一个要把敌意取消，这是最要紧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我也不愿意谈政治敏感问题，慢慢来。我想还是往好的方面发展，我看乐观方面多。

记者们向张学良表示：大陆人民非常关心你们，去年北京播出一系列关于少帅的电视剧，形成了“张学良热”。

张学良听了哈哈大笑，说："这些都把我戏剧化了。"

张学良向记者表示，他知道大陆巨大的变化，他说："希望能回大陆，看看大陆的变化，我这个人是好动的。"

对家乡人的热忱关切，张学良说："我当然知道。我的家我也是经常挂念的。台湾也是我的家，也是中国。可是一个人总会想到自己的老家，希望有机会回去看看。"

这时，记者们向张学良夫妇赠送了一根上面刻着一百个"寿"字的手杖、几幅字画和一本大陆风光画册，祝福他们健康长寿。张学良高兴地接受了礼物，并把自己和夫人赵一荻有关布道的著作赠给了大陆记者。

一九九二年岁末，应台湾"金马奖"执委会的邀请，以著名导演谢晋为团长的大陆电影代表团一行十人，踏上祖国宝岛台湾参观访问。团员们渴望此行能见到仰慕已久的张学良。

十二月二十五日，正值圣诞节，下午二时三十分，谢晋、丁荫楠、王铁成等大陆影人，如愿抵达台北市北投区复兴三路七十号张学良宅地。此时，张学良已经笑盈盈地在客厅迎候大陆客人。赵一荻见大陆客人光临，也步入客厅与大家握手见面。

张学良说，自己已是九十二岁高龄，视力减弱，看不清楚东西，但满口牙齿均完好如初，心情坦荡，身体很好。他说自己是"浪漫主义"，潜心研学《圣经》。

赵一荻女士也将自己出版的《好消息》、《真自由》套书赠送给客人。王铁成欲将一帧自己扮演周恩来的剧照送给"少帅"，但是看到张学良那种已经完全超脱的样子，最后还是没有开口。

谢晋告诉张学良夫妇：东北当年的"帅府"已修葺一新，东北同胞渴望一见二老丰仪。张学良听罢，马上表示："看机会吧，一切由上帝决定。"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三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之子裘少戎随中国京剧团首次踏上宝岛台湾。在台演出期间，张学良、蒋纬国、辜振甫、陈立夫等知名人士分别宴请了裘少戎等一行大陆艺术家。

“我已有几十年没看国剧了，”张学良拉着裘少戎的手说，“这次我一连看了三场。你的扮相、嗓子都酷似你的父亲裘盛戎。当年我看过你父亲不少戏。不看国剧，就不算是中国人。”

当记者问张学良对大陆京剧的印象如何时，张学良称赞说：“演法与以前的大致差不多，有些调新了些，也还习惯。”他强调说，他还是喜欢“大陆味儿”的京剧，对台湾京剧则极为陌生。

张学森在一旁补充说：“哥哥有时听完一段唱，谈兴大发，会把整出戏的故事说一遍给大家听。”

张学良说，听京剧是他的嗜好之一。早年在奉天时，家里每逢生日宴会，都要邀戏班名伶唱“堂会”，连唱三天方歇。当他在北京念书时，更有机会上戏园子听戏，与伶人结交。他听过名家谭派老生第一代创始人谭鑫培的戏；听过三十年代的京剧名家陈德霖、裘桂仙、杨小楼、郝寿臣等人的戏；听过京剧第三代名家“四大名旦”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的戏。

中国京剧院在台演出期间，张学良先生欣赏了《杨门女将》、《春草闯堂》、《文昭关》、《辛安驿》和《四郎探母》等剧目。

张学良与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刘长瑜的父亲周大文交谊匪浅，故一见到刘长瑜，便与她逗乐说：“你还认得我吗？”

刘长瑜说：“父亲曾任北平市市长，当时与您来往密切，两家常一起去看戏。”张学良听后，脸上绽出微笑，并问候了



刘长瑜在台北和张学良将军合影。刘的父亲周大文曾与张学良结为金兰。周大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任过北平市市长。

刘长瑜的母亲。

五月中旬，北京京剧团赴台湾进行访问演出。五月十七日傍晚，台湾资政陈立夫先生为北京京剧团举行欢迎晚宴，团长周述曾率部分团员应邀出席。当见过陈立夫、蒋彦士、黄少谷、王叔铭等几位东道主之后，周述曾和团员们一眼就认出了正要从沙发上起身的张学良。周述曾急忙上前，握住老人家的双手，激动地对他说："我们从北京带来了对您的问候，带来了北京黄埔同学会给您的信件和一些礼品，希望能安排时间专程前往看望您。"

张学良听了周述曾的话，兴奋异常，连连点头应答说："好，好，谢谢，谢谢！"

在欢迎晚宴中，张学良先生兴致极高，他和已故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之子梅葆玖交谈热烈，深情地回忆了曾与梅兰芳、金少山等艺术大师结交的往事。

“我俩可算是台湾的‘活宝’——活的国宝。凡是来台湾的人都希望见见我们。”宴会上，张学良先生满面红光，谈笑风生，指着比自己年长一岁的陈立夫先生说道，引得与会者哈哈大笑。

这时，梅葆玖提议每人唱一段助兴。于是梅氏姐弟、谭元寿、马长礼、张学津以及台湾著名京剧演员顾正秋、戴琦霞等人，先后演唱了各自拿手的唱段。

张学良对演员们的绝妙演唱入了迷，情不自禁地说：“我也来唱一段。”说着，他便走到曾追随梅兰芳先生多年的琴师姜凤山先生面前说：“我唱《战太平》流水一段，我调门高。”

可张将军毕竟是九十三岁高龄的老人了，加上听力不佳，刚一开口便唱低了。琴师姜先生见状忙把琴音压低，不料他忽又唱高了，弄得琴师只好随其音调而变换琴音。唱完这段流水，张将军还觉得不过瘾，又唱了一段《失街亭》中的“斩马谡”。这回他唱得字正腔圆，回肠荡气，声如裂帛，众人齐声叫好。

北京京剧团在台湾访问期间，共演出了七台节目。张学良四次前往剧场祝贺，先后欣赏了《凤还巢》、《霸王别姬》、《四郎探母》和《龙凤呈祥》等戏。每场剧终谢幕后，演员们都不顾一切地跳下台，与坐在前排的张先生合影留念，这情景深深地感染了台湾观众，久久不愿退场。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北京京剧团团长周述曾和杨燕宏按照预先约定的时间去拜访张学良先生。宾主寒暄之后，周述曾展开带来的书法作品对张学良先生说：“这是我请求北京的一位东北籍老作家端木蕻良先生特意为您书写的。”

张学良看着字幅上写着“学良乡长”的亲切称呼，不由得

激动起来，连连点头说："这位作家我知道，我知道他，谢谢他。"

接着，周述曾为张学良先生大声朗读条幅上的两行诗句："复土喜酬将军志，乡亲齐唱彩云还。"读罢，他对张将军说："不仅东北的乡亲，整个大陆的同胞都是这样的心情，都盼望您能返回故里，到北京、到大陆各地走走、看看，您肯定会看到'齐唱彩云还'的动人情景的。"

张学良先生接过周述曾递上的这份条幅礼物，兴奋得连连说："谢谢朋友们，谢谢乡亲们，我是很想回去的，等身体好些再说。"

身居宝岛，心系大陆。一九九三年北京第三届中国花卉博览会期间，张学良还委托世界兰卉协会会长黄秀球先生把自己亲手培育长达二十年的一盆名叫"爱国号"的兰花带到博览会，送给前往参观博览会的江泽民主席，寄托他对大陆同胞的一片深情，此举成为中国养兰史上的一则佳话。

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六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部说唱艺术团一行三十人抵台北演出访问。

七月二十八日晚，姜昆、黄宏、冯巩、牛群、倪萍等著名演员到台北张学森公寓里访问了张学良老人。当笑星们走进这座地处绿树环抱之中雅静的公寓时，张学良向众笑星说："欢迎，欢迎你们！"

小品演员黄宏大步上前，双手握着张学良的手，激动地说："张将军，您好啊，我们祝您老健康高寿啊！"

张学良幽默地说："别再高寿了，再高寿就成了老妖精了！"他的话逗得众人一阵大笑。

这时，黄宏主动自我介绍："张老，我是东北来的。"

"啊，你是东北的？东北哪疙瘩的？"张学良一听"东北"两字，不由惊喜地问。



一九九三年，著名笑星、小品演员黄宏在台北与张学良将军合影留念。

“我是沈阳那疙瘩的。”黄宏回答说。

“沈阳哪个区的?”

“沈阳和平区的。”

“那个区老名字叫什么啊?”张学良把座位向前凑了一点，又问道。

“老名字我说不上来，反正是火车站那个区。”

张学良一听是火车站那块儿，不禁“啊”了一声，他知道那是什么区了。然后他兴致勃勃地向大家讲了沈阳老区的一些名称，什么街道上有哪些小吃土特产了，著名建筑在哪条街道上了，等等。

黄宏说：“张老啊，咱们沈阳的父老乡亲都非常想念您

啊！”

“我也非常想念咱东北的老少爷们啊！”张学良扬着眉头，问大家，“你们说对不对呀！”众人听了张将军的话，都点头笑了。

这时，张学森一一介绍来访的客人，张学良听罢，连声称赞道：“你们的工作很光荣啊！你们给千家万户送欢乐，这是多么有意义的事啊！过去一说幽默好像是洋人的专利，这不对！咱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有着幽默传统的民族，你们说对不对啊？”

当张学良听说黄宏演的小品颇受欢迎时，他执意要眼前的这位东北小老乡给他说个笑话。黄宏欣然讲了个《打电话》的笑话。这笑话说的是一位谢干事保密意识差，在打电话时把部队的代号、番号、驻地、编制、岗哨士兵的枪里有没有子弹都无意中告诉了朋友。

张学良听后，咯咯笑个不停。他说：“看来这个谢干事是乱干事，至少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兵，该送教导营去重新训练。”

“好吧，我也给你讲个笑话”。张学良跃跃欲试道，“这个故事的题目叫《扣子》。你们知道吧，咱东北人管扣子不叫扣子，叫疙瘩。有一天，有个东北老乡在关内一家商店买扣子。他对售货员说，我买个疙瘩，售货员愣了愣神，然后纠正他说：先生，那不叫疙瘩叫扣子。买完扣子出门时，他冷不防一头撞到门上，结果脑门上撞了个包。他捂着脑袋回头对服务员说：我光顾买扣子啦，你看，这脑门子上硬是给撞了个扣子。”

众人被张将军的笑话逗得哄堂大笑。

而后，冯巩、牛群、李金斗等笑星，每人都讲了一个笑话。张学良将军听了非常开心，每听完一个笑话，他照例还给一个故事或唱一段京戏，最后他干脆唱起了独角戏，内容几乎

是清一色的东北民间小调。他唱得那么认真，那么执著，唱到动情时，他离开了椅子，眼里的泪花在闪动……

台湾的丁中江于一九九三年在北京会见江泽民时，特别提出“重写影响中国现代史最重要的西安事变”，并配合安排蒋纬国、张学良结伴返大陆扫墓、省亲的计划。该计划包括先回溪口、后至沈阳、再去西安，到西安开一个历史研讨会，将历史做一交代。江泽民对蒋、张携手返乡的计划欣然同意，并表示：“必要时可以派专机。”

得到江泽民的拍板定案后，丁中江返台向蒋纬国报告，蒋纬国又亲自同张学良协商。殊料，两个月后，蒋纬国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更不巧的是，赵四小姐得了老年性骨质疏松症，也进了医院，病房就在蒋纬国病房的对面。在此情况下，返乡扫墓的计划胎死腹中。

五十多年来，中国人民从未忘记过张学良。年复一年，他在大陆的亲友、故旧，都在遥对明月，寄诉对这位千古功臣的关切与思念。

张学良的弟弟张学铭、张学思，分别任全国政协委员和解放军海军参谋长，几十年间，每每忆及大哥张学良，便情绪激动，热泪盈眶。每年六月张学良生日之时，两位弟弟都要按传统习俗，在家中摆上寿桃、寿席，领着全家人吃长寿面。每次一谈起学良大哥，张学铭便愤然道：“我大哥被老蒋关了几十年，至今还被软禁在台湾，我们在大陆的一家子老少盼了一年又一年，就是不得见面！多少年来，我只能在梦中与大哥相会。”

一九七八年二月，在全国政协第十五届全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张学铭情绪激动地从怀念周总理又说到了大哥张学良。

“我大哥张学良被蒋介石软禁，已经是第四十二个年头了。当初他要能听从周总理的劝告，也不至于落得这样长期的骨肉分离，这是一；再说打西安事变至今，周总理一直惦念着我大

哥，关怀着我们全家，为我们全家人操碎了心！如今，我们一大家子都好好的，只有弟弟张学思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最后还是周总理亲自主持，为他平反昭雪。我大哥几十年来身陷囹圄，孤零零在台湾度日如年，真是苦海无边哪！我们弟兄都老了，难道要我们都到了阴间后，才得以骨肉团聚吗？祖国统一，亲人团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我每每想到这些，就气愤、不平、伤心，心里不是滋味！我……”

张学铭异常激愤，气喘吁吁，老泪纵横。在座的许多政协委员们也都鼻子发酸，情不自禁地掏出了手绢。

一九八二年，张学铭已身患重病，病榻上仍念念不忘身在台湾的大哥。从一本海外出版的中文杂志上，张学铭看到了大哥访问金门的消息，并看到了大哥用望远镜眺望大陆河山的照片。四十多年未见，大哥已垂垂老矣！张学铭悲伤地说：“为什么不放我大哥回大陆，而要摆弄什么望远镜呢？再说，可以让我去看望大哥嘛！我什么都不怕，单枪匹马一个人去也敢，就看台湾当局肯不肯放我进去。我张学铭今生见不着我大哥，做鬼也要去一趟台湾！”

可是骨肉相聚的心愿未了，张学铭便于一九八三年溘然长逝。两岸骨肉分离的悲剧中，又新添了一段哀歌。

继张学思、张学铭之后，张学良自小敬重的大姐张首芳和其他几位在大陆的亲友均相继谢世。二妹张怀英、四妹张怀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盼着大哥的归来，她们说：“我们姊妹若能在古稀之年再聚首谈心，死亦无憾。我们期待大哥早日归来！”

赵一荻的亲友朱洛筠、陆静嫣、李兰云、吴靖多年来也一直盼望能与儿时的好友绮霞相聚，“共剪西窗烛，白首话髫年”。

若非造化弄人，西安事变主角张学良早在一九九〇年初，

就可以返回阔别六十多年的东北故乡了。少帅过了九十大寿之后，老友何世礼的孙子准备在香港结婚，邀请他到香港参加婚礼。何世礼是香港何东爵士之子，当年是张作霖父子的部属，后来两人成为挚友。

那时候，张学良夫妇计划参加婚礼之后，在香港留住几天，然后便搭机直飞东北。夫妇俩申请了香港签证，没多久，香港政府就给了两年的多次往返签证。张学良曾经说，他要向当局报告，希望能得到首肯，回大陆去看看。那时，李登辉对张学良的返乡行动已表示支持。

就在万事齐备之际，何世礼的夫人突然过世。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如果父亲或母亲过世，除非在百日之内结婚，否则就要等到几年以后。结果，何世礼的公子在加拿大成亲，停办了香港的婚礼。再者，百日之内结婚，不能宴请诸亲友。这么一来，张学良的香港之行不得不取消，可能成为两岸焦点的大陆之行随之泡汤。

张学良究竟想不想回东北老家？说实在的，张将军一直没有断了这个念头，只要他们夫妇身体许可，他一定会回去的，因为他要把父母亲迁葬到他当初建的“元帅林”里，这一直是他的心愿。

“什么样的时机才能实现大陆之行？张学良不是说过，两岸之间敌对问题完全没有了，他就可以回去？”有记者问道。

“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讲那话是一九九一年在美国的时候，那时，他担心受到利用。我可以明白地说，他把夏威夷的家安顿好了之后，现在只考虑两个因素：一个是气候，不能太冷。张先生说，他小时候对东北的冷还可以忍受，现在九十多岁了，可就受不了啦；另一个是他和赵四小姐的身体状况，得经得起长途飞行，且能够在东北待上一阵子时，他们还是会回去的。”熟悉张学良的王冀教授回答说。

大约在一九九一年二月，在张学良将军九十华诞来临之际，由于对故国山河的思念之情难以抑制，张将军忽萌返乡之愿。春节期间，张将军在台北对与之有世交之谊的美籍华人王冀教授说，上半年他要去美国探望亲友，可能要逗留一段时间，下半年因为适值九一八事变六十周年，他很想回沈阳去同东北父老见见面，因此，委托与两岸都有交往的王冀教授与中共当局试着沟通一下。

不久，北京方面的中央统战部门获悉信息之后，便邀请王冀教授到北京和有关主管官员面谈。王冀教授表示说，张学良将军已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希望回一趟东北和乡亲们见见面，同时，他也想把张作霖的墓地从锦州迁往老家海城，最好由中国当局发一封邀请函件，以便对外有所交待。

这位官员表示，北京欢迎张学良回来探亲访问，由邓小平或杨尚昆发邀请信也没有什么问题。最后商定信件写好之后由中国驻美大使馆通过王冀教授转交张学良本人。殊料，此事谈妥之后，许久没有下文。

问题出在哪里呢？据有关人士透露，信件是以杨尚昆的名义写了，但没有如所商定的那样交给王冀教授，而是通过另一渠道，委托当时一位被北京方面奉为上宾的台湾人士传送。由于此人有某种政治背景，据分析，信件难免落到李登辉手里。当时，李登辉上台不久，正在暗渡陈仓跟中共拉关系，他是否封杀了张学良的回归之路，难以断定。但李登辉对张将军返乡之举显然有所猜忌。加之还有其它几种变数，因此，九十年代初的返乡计划就此功亏一篑。

张学良的余日无多。他自己讲过，自己已是秋后的蚂蚱，蹦不了几天了。他现在想的，只是如何尽人子的一份孝道罢了。

如今，张学良已是百岁之人，这一返乡愿望的实现，显然已愈加飘渺了。

第九十九章　世纪老人

2000．5

——“打牌很好，第一手臂可以运动，第二可以用脑，还可以联络感情。”

——“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她关心我，她关心我！

今天是我九十八岁生日，我应当感谢、赞美我主耶酥基督，这么多年来，主赐我身体健康，平安喜乐，也能常去教堂主日崇拜，主的恩典真是数说不尽，感谢不完，我还有什么话可以说呢？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他，直到万代。

他的恩典够我用，他的恩典够我用！

我要敬告大家，应当快来信耶稣，得永生。

他的恩典够你用的。阿门！

这是由张学良亲笔签名的九十八岁生日感恩致词。

一九九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清晨，夏威夷檀岛晴空万里，辽阔海天湛蓝深远。檀岛中华第一基督教会为张学良将军举行的生日感恩会即将开始。

来自两岸三地的贺寿使者相继赶到了。他们是前中共中央统战部长阎明复、东北大学校长郝冀成、北京工业大学校长左铁镛、沈阳市张学良归国亲属联谊会会长裴兆麟、吉林省图书馆馆长金恩辉、张学良家乡海城市的代表以及北京电视台记者等三十余人。

来自台湾的有前“立法院院长”、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梁肃戎，前“立法委员”汪渔洋，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等。

来自美国的有王冀教授夫妇，美国中国东北同乡会主席萧朝智及李树金、王同勃等人。

来宾虽然互不相识，但都是为了一个共同心愿走到一起来的，话题就是：祝愿张学良将军健康长寿。

九时，一辆中型轿车缓缓驶抵教堂门前广场，两岸三地赶来祝寿的使者不约而同地拥了上去。车门打开，乘坐轮椅的张学良将军被慢慢送下车来，接着，戴着氧气面罩，用白布吊着右臂的赵一荻也乘坐轮椅从车上下来。两岸三地的使者争相向张学良夫妇问候，合影过后，又簇拥着寿星老人走进教堂。

感恩会在程嘉禾牧师的主持下开始，宗教仪式结束后，接下来是寿星老人发表生日感恩致词，由张将军的长女张闾英女士走上讲台，代为宣读。

当张将军看到十几位不同种族的儿童为他演出的时候，他那苍老的脸上露出了童稚般的微笑。



一九九九年六月，明光、克良为张学良将军祝贺99岁大寿，赠送寿桃图（右一为阎明光）。

当张将军故乡沈阳的代表向他敬献大幅寿联时，他侧首仰望，禁不住高兴地笑了。

当美国中国东北同乡会会长、于凤至的义子萧朝智发表演说，郑重指出“张学良是中华儿女的民族英雄，我们为他感到光荣、骄傲和自豪”时，他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当北京电视台朱振权导演走到张将军的面前，向他转交为纪念周恩来总理诞辰一百周年特制的一对印有周恩来、邓颖超头像的情侣表的时候，他凝视着客人双手捧着的这对情侣表，在生日感恩会的高潮中陷入了深深的思念。

近两个小时的生日感恩会结束了，众人挥动着双手，目送有些倦意的寿星老人偕夫人登车离去。

中午十二时，萧朝智先生主持了“庆祝张学良先生九十八岁华诞”酒会。数十位与会者兴致盎然，频频举杯。

来自台湾的梁肃戎道出了与会者的共同心声：“西安事变是惊天动地的大事，虽然两岸对该事变的评论各有不同，但是



一九九八年，阎明复夫妇（后左二、三）和张学良在一起。

该事件却促成国共两党共同抗日，从这点来看，张学良将军对国家是有很大贡献的。虽然他被幽禁了近六十年，但是他那段历史贡献，应赢得东北同乡及两岸所有人民的敬重。”

作家王朝柱即席演讲说：“大家都知道周恩来总理对张将军有八个字的评价：千古功臣，民族英雄。当年，我亲耳听张将军的机要秘书郭维城先生说过，周总理在谈到张将军的人格时，还讲了四个字：铁血男儿！”

“铁血男儿”这一高度概括、画龙点睛之说，博得了与会者雷鸣般的掌声。

最后，阎明复起立发言，相约明年在张将军九十九岁华诞时再来聚首。他的提议得到了与会者的一致赞同。

为庆祝六月三日张学良将军九十八岁诞辰，沈阳张学良旧



一九九八年六月，王朝柱与两岸三地的有关人士参加张学良的祝寿活动，并与张学良夫妇合影留念。前坐者左为赵一荻、右为张学良，后排站立者右一为王秦、右二为张学良的侄子张鹏举（张学铭之子）。

居陈列馆、台湾世界交流协会、北京绿化基金会、中华台北国兰联合总会等十余家单位，于七日特地在昔日的“大帅府”举办“庆祝张学良将军九八华诞兰花特展”。

张将军亲手培植的十三盆兰花，被摆放在“大帅府”二进院的东厢房内。摆放兰花的正面墙壁上，还挂着张学良将军的大幅彩色照片及将军养兰赏兰、切磋养兰之艺的许多珍贵画面。

兰花特展上，为庆祝张将军九八华诞，各界人士还向张将军赠送了书画、篆刻作品，其中有已故中国著名花鸟画家郭西河的《寿比南山图》。

在夏威夷，张学良和扶持他一辈子的赵一荻时时感受到海峡两岸人民对他们的深情厚意。他们夫妇晚年生活悠闲自得、



张学良（前中）与阎明光（右一）、雷平（左一）在夏威夷海滩合影。推轮椅者为张学良的孙子。

相当惬意。一位华航当地主管说，据他所知，少帅的作息通常是上午睡到相当晚才起床；由于眼睛不好，就由张夫人读《圣经》给他听，偶尔会坐着轮椅出去散散步；午餐后则会有牌搭子过来打几圈麻将，兴致好时，晚餐再打几圈。至于他的牌友，就是那么几位当地的华裔老太太。

住在张宅附近的郑杰西，是牌搭子之一，她因与张学良已过世的弟弟张学森熟识，而一直和张学良频繁往来。长期以来，她每个星期都会到张宅陪她以“大哥”相称的张学良打次小牌。由于张学良要睡午觉，所以她大约是在下午五点左右到张宅喝下午茶，聊聊天，喝完就开始打牌，至于打多久，那要随张学良的兴致。有时打了一两圈，老先生觉得累了，一句话：“我要去睡觉。”就离开牌桌，睡觉去了；有时突然外出的兴致一来，交代一句“我要去兜兜风”，就坐着轮椅下楼去享受夏威夷的山色海景去了。这个时候，她们就会停下来聊聊天，很体谅地等着他。

“我的感觉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大哥大概有十七八个小时在睡觉！”郑太太回忆说，“吃晚饭时，张学良会领头做谢饭祷告：‘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么好的饮食，今天又来了两位朋友，求主看顾她们……’通常晚饭是不错的，张宅来自大陆的女佣人烧得一手好菜，总有七八道。”

晚饭后，如果张学良兴致好，精神好，就再打几圈牌。他们的输赢可真小，整个输光是四十美元。不过，赢家总是张学良，因为他算得精。

“我们打的是十张牌，每张牌都很大，大哥手一搓就知道是什么牌，他喊一声‘三万’，然后往桌上一放，果真是‘三万’！”杰西说，“大嫂赵一荻为张学良准备了一个钱包，里面就是一些小钱，由于张学良老是赢，我们有时会打趣说：‘你根本不需要钱包嘛。’”

张学良喜欢打牌，他说："打牌很好，第一手臂可以运动，第二可以用脑，还可以联络感情。"这就是张学良从台湾直到夏威夷从来没停过的健身之道。

有时牌搭子之一没来，赵一荻就会上桌打牌。由于肺不好，这几年她都戴着氧气管，随身有氧气筒跟着。

与张学良打牌，可以感受到他风趣的一面。有时，牌搭子逗他讲话，要求少帅交代往年的罗曼史，张学良便毫不保留地一一讲出来，话题总是从"有一个小姐……"开始，不过这些话是背着夫人讲的，讲到后来，张学良就连连摆手说："不能再讲了，讲多了，大嫂会骂的！"

打牌时，张学良兴致一来，就干脆一句不漏地唱个全本《空城计》或《战太平》，这是他最拿手的。

张学良能吃，几乎每个与他吃过饭的人都这么认为。他中西餐都吃，而且极为讲究。举生菜沙拉为例，那些叶子一定要像在地里长的一般鲜嫩，叶叶都竖得起来少帅才吃，否则就把盘子往前一推，不吃了。他最喜欢吃的是鱼翅羹及北京烤鸭，不论自己请别人吃饭或别人请他吃饭都是如此。

"我一说请他吃个饭，他就说好啊，毫不客气地点鱼翅及北京烤鸭。他真能吃，鱼翅羹一次可以吃两碗！"杰西说道。

夏威夷生活真是无忧无虑吗？也未必如此。

杰西觉得，近一年来，张学良情绪显然要比过去几年消沉，主要是因为老友何世礼的谢世，他为此无心打牌，甚至为此掉泪。

"我最近心情不好，好不舒服啊。"一个月前，张学良忧郁地对杰西说。

"怎么啦？"杰西关切地问道。

"我的好朋友死掉了。"少帅揉揉眼睛，语带哽咽。

"人死了也没办法了，对不对？"杰西试着安慰他。



张学良将军接到沈阳张学良陈列馆暨同泽书画研究院聘书后，亲自回函的情景。

"我就是想着他，我是很重感情的！"张学良伤感地说。

张学良，他这辈子经历的生离死别可谓不胜枚举。尤其是最近一个时期，他五弟张学森在大陆过世，他心情消沉了好一阵子；何世礼将军是他七十余年的老朋友、老部下，自他幽居岁月时就是常来常往的少数老友之一，生前还多次来檀香山看过他，对这样一位老友的过世，这锥心之痛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张学良又是一位少见的性情中人，所以，对老友的思念，竟是那样实在，那样真诚，那样投入，那样执著。

张学良的人生旅途到底有多长，这只有上帝知道。这位传奇性的历史人物，如今又以他令人难以置信的高寿谱写出另一段传奇。

一九九九年五月底，就在张学良九十九岁生日来临之际，

牧师程嘉禾问张学良："我们为你举行百岁感恩礼拜，好吗?"

"你怎么知道我只能活百岁啊?"老先生回问得很妙，这意思是在告诉程牧师，他有信心过实际上的百岁。

"我们当然愿意您活得愈长愈好啊。"牧师程嘉禾笑了，他深深地感受到张学良热爱生活、对继续活下去充满信心。

五月三十日，星期日，在夏威夷中华第一基督教会，几百位来自台湾海峡两岸及美国本土的各界人士又欢聚一堂，参加教会为张学良举行的九十九岁生日感恩会。

台湾国民党秘书长章孝严、国府驻美代表陈锡藩及驻檀香山经文处处长王恺所致赠的大花篮，整齐明显地置于教堂入口处一侧。中华民国侨务委员长焦仁和则敬赠屏风一幅，上书："民族英雄心如日月，坚贞节概寿比冈陵。"

美国东北同乡会及各省同乡会所题的寿字与百寿图也贴在花篮后方的墙上，几乎成为每位与会人士照相的必选背景。

此外，东北大学校长郝翼成、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杨士勤等人又携来国内大陆官员、社会各界及各学校敬赠的寿礼。

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北约炸毁事件似波及大陆为张学良祝寿的意愿，包括前统战部长阎明复在内，许多原来预定赴夏威夷为老人祝寿的大陆人士，此次均未能成行。原先东北人士预定由辽宁省政协副主席肖正福率领"辽宁侨务考察团"赴檀岛祝寿，但是，由于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停办签证业务，因此考察团必须"推迟出访日期"。

去年，张学良于教会举办的生日感恩礼拜，由于各界争相与他合照，使得秩序大乱，这也影响了不少人的出席意愿。今年台湾官方未有人赴夏威夷参加张学良的感恩礼拜，但香港方面仍然有人组团赴檀岛。

另外，张学良夫妇对各界祝寿未予回应，也是台海两岸来者不多的原因之一。



张学良夫妇与前来参加祝寿活动的各界来宾合影留念，站立讲话者为赵一荻。

鉴于张学良的历史地位，来自中国大陆与其他各地的人士，也都以能与这位英雄人物合影为荣，甚至传出与张学良合影能增加个人名望的说法，因此每年此时来夏威夷“朝圣”的人络绎不绝。

三十日这天，八时三十分刚过，教会外草地上即有两位口操北京口音的人士因争座位相互扭打，其中一人在被击中面颊后右鼻孔出血，虽经在场人士大力劝阻，但双方仍不肯罢休，此时已引起礼拜堂内的一些外籍人士注意，并有人要求报警，所幸众人再次极力劝阻，才制止了这场不幸事件。

曾经叱咤近现代中国政坛的寿星张学良，不知是否能够感受到这一盛大的祝福与关怀，此时此刻，他只是静静地坐在教堂的一角，任由照相机闪光灯明灭，面部没有丝毫表情。



一九九九年六月，张学森两个女儿闾芝（左一）、闾蘅（右一）和明光（后中）与张学良在一起合影。



一九九九年六月，张学良不愿刮胡子，在闾蘅、闾芝、明光的劝说下，让照顾他起居的捷木斯给他刮了。

礼拜由教会的范宝峰弟兄主持，在中文堂献唱诗歌颂后，张学森长女张闾蘅上台代读张学良感恩见证。夏威夷州长夫人的五姐张美仁并上台弹奏了两首圣歌献给张将军。

由于现场秩序有点混乱，张学良夫妇在感恩会一结束，未等各界呈送寿礼即匆匆搭车离开教堂。

当晚，来自美国本土的东北同乡会则以百岁名义为张学良举行祝寿宴会，虽然张学良夫妇没有露面，但席间仍然气氛热烈，充满温馨。

九十九岁寿诞之后，张学良曾经于八月间因肺炎住院，且病情一度危急，在夫人赵一荻彻夜祷告守候之下，老人家度过危难张学良住院期间曾经插了呼吸管及胃管，但因以胃管输入营养剂之故，身体反而养得比前一阵子好得多，面容也红润起来了。

往年，张学良还可以离开轮椅走动一下，大病之后，就全靠轮椅了。看护常常推着他到处走走，有时还找个平坦的地方稍微飙飙轮椅，让老人家乐一下。不过，他觉得这样也蛮不错的，他说："坐着也挺好，干嘛要走路？"

张学良是蛮关心老伴的，凡事都能想到她。一九九九年母亲节，他就亲自为赵一荻选了张母亲卡。他的儿子张闾琳告诉记者说，父亲一直头脑清楚，知道所有的事情。

虽然，眼下张学良已不问世事了，但仍思维清晰，观察敏锐，政治方面的事也偶有涉猎，且多有评论。二〇〇〇年台湾大选，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陈水扁当选，国民党失掉政权，张学良难得地告诉身边人士说，他早就知道陈水扁对总统职务的企图。陈水扁会不会走向台独呢？张学良回答："陈水扁不敢的，他知道不能这样做！"

二〇〇〇年五月底，张将军迎来了他的百岁华诞。

"我要满一百岁啦！"老先生兴奋地对朋友们说道。显然，他对自己能活过一个世纪感到很高兴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张学良研究会副会长赵双城向张学良递交“中华世纪宝鼎”说明书。





张将军在散步时，常有记者或仰慕者去拜访他，有时与他一起合影。张将军总是亲切地和他们微笑招手。后立者是他的儿子闾琳

海峡两岸的少帅亲友这几天已陆续抵达檀岛，准备为老人家过百岁大寿。全家上下都在忙碌着，并且很少见地在中午寿宴之前安排了一场二十分钟的记者会，张学良夫妇将在那时公开会见媒体记者。

台湾某公司一位派驻檀岛的主管，与张家一向熟识。他说，张学良对二十八日的寿宴相当高兴，还讲了句："我有新'洋装'穿了!"言下之意，他将在那天穿新西装亮相。

由于比往年更需要医疗照顾，张学良夫妇搬离了希尔顿海滨公寓，住进一处医疗、饮食照料十分完善的老人公寓，二十八日的记者会及寿宴都将在这处公寓内相当大的餐厅里举行。这次寿宴，由张学良之子、七十岁的张闾琳亲自张罗。寿宴当天，约有百位亲友到场为张学良祝寿。

虽已是高龄且耳背多年，老先生依然眼神炯炯，谈起话来简捷有力，有时豁达，有时调皮，言谈之间有真情流露；至于敏感问题，他则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以下是纽约《世界日报》记者的访谈纪要：

记者问：即将满百岁啦，您的感受怎么样?

张答：做个小老百姓，最舒服。我也感谢主，给我那么好的生活，那么长的寿命。

问：对于百岁以后的生活，您觉得该怎么过?

答：还是做个小老百姓吧。我现在是政治思想一点也不碰。

问：国民党现在在台湾已经不执政了，张先生知道吧。

答：我连知道都不想知道，我现在就是要做个小小老百姓。

问：您对当前海峡两岸，中国大陆及台湾关系的发展，有没有什么看法或呼吁?

答：这我没有意见。

问：对您的东北故乡，您现在还想回去看看吗？

答：我当然愿意回我这个家去。

问：身体状况允许您走这么一趟么？

答：我的身体很好。

问：有没有打算安排回东北老家？

答：当然我愿意回去，但我回不去。

问：为什么回不去？什么原因？

答：没什么原因，我回去就受不了。

问：怎么说受不了？是气候、感情，还是政治？

答：不是政治，是感情上的因素。

问：对台湾的友人，谁是您特别想念的？

答：（想了想）我一下子说不出来，我这个人就是马马虎虎的。

问：先总统蒋公，会不会常常想起他？

答：（点点头）

问：现在您在夏威夷这么几年了，对先总统蒋公的看法怎么样？

答：（停了下，郑重地）他是一个好人。

问：您的长寿有什么秘诀？

答：我这个人就是没什么思想，什么都不挂心。

问：您在饮食上，现在特别喜欢吃什么？

答：我有什么就吃什么。

问：听说您很久不打麻将了？

答：我还打啊。

问：没有啦，您很久不打啦。

答：（促狭地）我没有钱。（张学良笑着再追加一句）我一个钱都没有。

问：该是夫人帮您保管着？

答：那我什么也不在乎，我就是睡大觉

问：夫人陪伴您这么长一段时间，谈谈您对她的感情？

答：我太太很好　最关心我的，是她

问：您的气色及精神比前阵子好多了

答：我就是过简单的生活

问：张先生，您现在最喜欢的是什么？

答：我最喜欢小孩子，我喜欢跟小孩子在一起，小孩子很天真。

问：外面有传言说，您因为年龄大了，又生了病，所以脑子会有些不大清楚，我看不是。

答：管他呢，我根本不到外边去。

访谈以大笑结束，老先生对自己的回答似乎很满意，自得地微笑着。

百岁华诞之际，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以贺电及鲜花向张学良将军贺寿，这是北京方面首次由最高领导人向张学良祝寿张学良伉俪在寓所内接见了代表江泽民致送贺电的中国驻洛杉矶副总领事许士国以及夏威夷中华总商会执行副会长林文中夫妇。江泽民的贺电电文如下：

汉卿先生：

欣逢先生百年华诞，特致电深表贺忱！先生当年之殊勋早已彪炳史册，为海内外华夏子孙所景仰铭记。先生之爱国精神，更将发扬光大。

遥祝先生善自珍重，颐养天年。谨此问候您的夫人赵女士。

与此同时，台湾陈水扁"总统"暨"副总统"吕秀莲亦致电祝贺，贺电如下：

（驻美国檀香山办事处）请转张汉卿先生崇鉴：

本岁五月二十八欣逢期颐嵩寿大庆，特电申贺，并祝



二〇〇〇年三月十二日，张学良暨东北军事研究会领导在夏威夷合影。后左起：张德良、王维凡、周毅。

百龄锡嘏，福寿维祺。

殊料，就在张将军百岁寿宴二十余天之后，夫人赵一荻病逝檀岛。

赵一荻的身体状况比少帅要差得多。她曾罹患红斑性狼疮，后因以“美国仙丹”类固醇进行治疗又造成骨折。由于长期抽烟，肺部出现癌病变而动了大手术，切除了半边肺，成为影响她晚年健康至巨的因素。张学良曾有意回大陆老家却未能成行，赵一荻的健康状况是主要考虑之因素。

六月七日，赵一荻下床时不慎摔了一跤，虽觉相当疼痛，

但尚无大碍。几天后她呼吸发生困难，遂于十一日住进医院，住院十天来一直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病危期间，她睁着眼，眷恋地看着病床旁的每一位亲人，最后，她把视线留在共同度过七十二年岁月的老伴那儿。张学良牵起她枯槁的右手，用浓重而沙哑的东北乡音声声呼唤着：“咪咪，我来看你啦。”

在檀岛史特劳比医院里，赵一荻在生死之间拔河多日，既痛苦又疲惫。

张学良每天都到医院探视，他这回也知道太太撑不过去了，几度凄然地说：“太太要走了。”

弥留之际，老太太实在熬不住以呼吸器支撑生命的痛楚，在医师的善意劝解下，家人最终决定，把让她无比痛苦、又无法讲话的呼吸管除去。赵一荻先前全靠呼吸器才能将生命延续下来，呼吸器除去，就意味着她要告别人世了。

夏威夷时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赵一荻是醒着的，但她无法用语言交流她的感受，只能默默地一个个地看着围绕她的亲友们。约在八点三刻，老伴张学良坐着轮椅来到床边。张学良伸手握住夫人的手，喊着自己私底下对老妻的昵称，无限依恋。

赵一荻深情地看着少帅，一直想说点什么，但她无法言语。

九点钟。医师说，现在到拔管的时刻了，请各位暂时到外面去。亲友们一一向赵一荻道别，离开了病房。没多久，医师说，可以进来了，众亲友又回到病房。

赵一荻没有了妨碍讲话的呼吸管，但她却因镇静剂的效力而沉沉地睡过去了。

张学良抓住老伴的右手不放，就这么过了两个多小时，上午十一点十一分，享年八十八岁的赵一荻平静地停止了呼吸，

监视生命现象的仪器显示她已离世，她的亲生独子张闾琳和亲友随侍在侧，众人都哭了。但张将军却浑然不觉、依然紧握着妻子的手。牧师带领亲友向上苍祷告，

“太太走了！”有人大声地告诉少帅。张学良流下了泪水。

“很难过，很难过，我心里很难过啊！”张学良不断哀伤地说，一直没把老妻的手放下来，又握了将近一小时，才在众人的劝说下恋恋不舍地离去。

张学良身边的人士说，赵一荻生前最后这段日子虽然身体状况极差，但仍然尽心为少帅打点照料身边各种琐事。她以不渝的感情伴随少帅，如今此情已成追忆。

由于张学良夫妇感情弥坚，人们很担心赵一荻走后，张学良能否承受这种锥心之痛。

曾经有不少书商想请赵一荻口述历史，但都被个性拘谨的她先后回绝了，但她最后终于答应了周联华牧师。

与蒋家关系密切的周联华牧师在接受记者访问时曾透露说：“过去几次来夏威夷，她都跟我提到想写《少帅与我》，要我帮她写，以后准备中英文同时出版。她每次都说，这本书并不是要突显她和张先生的爱情，而是上帝无形的带领、她希望这本书成为畅销书，以为主工作。”

前年，张学良九十九岁大寿时，周联华提前来到檀岛，赵一荻再提此事，甚至连书的提纲都准备好了。

“我很乐意帮她写书，”周联华说，“并且敲定每月来夏威夷一个星期做访谈。可惜的是，那天敲定要写之后，当晚赵女士就失眠了，第二天精神不济，于是，她就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了。”

对此，周牧师觉得很惋惜。随着赵一荻离开人间，后人又少了一个详尽了解张学良叱咤风云、坎坷一生的渠道。

宋美龄女士获悉赵一荻过世，十分难过，交代外甥女孔令

仪送花致意，并请张学良节哀。蒋夫人与张学良夫妇情谊深厚。张学良曾说，一生中有两位女性对他恩同再造，一是蒋宋美龄，一是赵一荻。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命在旦夕，是蒋夫人力保，才使得他转危为安。赴台后，经蒋夫人介绍，张学良成为基督徒，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思想。在台岛时，蒋夫人常与张学良夫妇往还，对他们多有维护。

几天后，张学良晚年丧妻的锥心之痛已渐趋平复，张家预定夏威夷时间二十九日为赵一荻举行追思礼拜。

"她走了，我要把她拉回来。她关心我，她关心我！"相互扶持七十余年的老伴辞世，张学良在追思礼拜上情绪激动，频频呼唤着赵一荻，许多亲友为之落泪。

少帅夫妇的老友周联华应邀专程由台湾赶来主持中午的追思礼拜。他在讲道中指出，赵一荻放弃一切，跟随张学良软禁，有如《圣经》里童女怀孕一样，是个"不可能的使命"，然而她这么做了，"她纯粹为了爱，这爱远比台湾最近流行的《人间四月天》更专，更纯，更久远"。

周联华赞叹道："她当时真正和汉卿互许一个未来，共担一个未来。这未来是暗淡的，是黑暗的，但她却无怨无悔。最后，在上帝的带领下，这未来竟盼到火奴鲁鲁明亮的阳光和自由的空气。"

追思礼拜在檀香山市波威克殡仪馆的礼拜堂举行，来自海峡两地的政要及张学良部属、乡亲的花环与挽联摆满了会场。蒋夫人宋美龄致赠一个以花装饰的十字架。中华民国"总统"陈水扁、"副总统"吕秀莲、"行政院长"唐飞、"前总统"李登辉伉俪等多位台湾政要都通过台北驻檀香山经济文化办事处赠送了花圈。

家祭后，亲友及社会各界代表默默趋前祭拜并瞻仰遗容，

由张学良公子张闾琳夫妇及张居信、张居仰及三位孙子在一旁答礼。

下午一点十分，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由看护及侄外孙女婿等人推着抵棺木前，欲见爱妻最后一面，但棺木很高，他坐在轮椅上又无法起身，显然难以见到。稍后，他又被推回到第一排。

下午两点四十分，家属亲友陪伴灵车驶入神殿之谷纪念公园，赵一荻将长眠于“中国海景”墓地。

十六岁即与东北易帜而促成全国统一的张学良结伴而行，尔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并开始长达半世纪的幽居生涯。畏途漫漫，苦海茫茫，赵一荻则毅然决然地与少帅风雨同舟，甘苦同尝，历经磨难，无怨无悔。

少帅与赵四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坎坷人生，被誉为近现代伟大而传奇的爱情故事。

令人惋惜和遗憾的是，这段充满传奇色彩的爱情交响曲，今天却谱上了休止符。

从此以后，所遗留在人间的，仅仅只有无穷无尽的美好与甜蜜的回忆！

第一〇〇章 千 古 功 臣

2000.9

——“我这一生是失败！一事无成两鬓白！”

——“当年，杨宇霆想操纵我，后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我要是受操纵，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我的一首诗“白发催年老，虚名误人生。主恩天高厚，事事如浮云”，招惹了张岳公不少骂，他说，你这首诗最没有意思！

我这一生是失败！一事无成两鬓白！

“哪里，在我们学历史的人看来，汉公是成功了。评论汉

公，不能看短期效应。汉公名垂千古！”唐德刚教授不同意张学良的观点。

我九十多岁了，还来什么？明年就完蛋了！”

“我们看得出来，汉公虽然九十多岁了，但是仍然还有二十多岁时的豪情。”唐教授感慨道。

遥想二十多岁时的少帅是什么样子呢？

东北讲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不久即升为旅长，二十岁出头就已荣升少将，独掌方面；在乃父的指挥下，参与军阀混战，东征西讨，冲锋陷阵；挚友郭松龄倒戈；父王张作霖被害。局面混乱，现实严酷，久经磨练。

一九二八年七月，年方二十七岁，继承父亲的军政大权，张学良成为蜚声中外的“东北王”。当年，日本派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吊唁大帅，林特使惊叹将军如此年轻，而能负偌大责任，甚觉罕见。

“我与你们天皇同庚，他能统治你们全国，我承东三省人民爱戴拥护，承先父旧属辅佐，领导数省有何不可！”张将军理直气壮地说。

从此，他在东北这块宝地上，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大兴教育，振兴经济；北拒苏俄，南抗日本；拒绝称帝，心向统一。

短短几年，他幡然易帜归顺，断然处决杨、常，平息中原大战，再造中国统一。至三十年代初主政北平时，三分天下，他几乎已有其二。斯时，他官拜全国陆海空副总司令，成为大名鼎鼎、名副其实的“少帅”。

我说我自个儿一生是失败的，什么理由呢？我年轻时，做事全是凭我自己的判断。除有时有一两次大事件，我跟我那时的秘书长王树翰商量过以外，很多事都是我自己独断专行，并不跟旁人商量讨论。我经历过几件大事，像郭松龄倒戈，郭倒

戈是一个很难度过去的事件，而我父亲的死尤其使我难过。这都是大事件，这些内忧外患都让我给对付过去了；还有后来的易帜归顺中央，同中央合作，这些事我都做了，我都度过了这些难关，因此，我自己觉得得意地很。少年得志，我那时是很骄傲的。

现在回想起来，由于自己太骄傲，凡事没有去好好考虑考虑，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事当做或不当做，认为当做的，就去做，认为不当做的，就应不去做。结果，后来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

但是，我也有我个人的特点。我为什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我今天九十多岁了，我不想，也不能出去做事了，我才说这句话：我这个人是不受操纵的，但凡做事，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有我自己的见解。当年，杨玉霆想操纵我，后来，蒋先生也想操纵我。但我是不受操纵的，我要是受操纵，我会落到今天这个样子吗？按说，开始我也不信基督教。我做事问心无愧，为国为民，为了统一，我就这么做，我不是为了我自己！

这就是一个民族英雄的赤子之心，一位千古功臣的豪言壮语！

面对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野心和残暴行径，张学良在弱冠之年就得出一个中心思想：反对内战，抗日救国。

早年，他倚信郭松龄，结果郭反奉倒戈；他不愿对抗北伐军，泣劝其父罢兵出关，结果老帅在皇姑屯为日人炸死；日本关东军当时就要发动满洲事件，侵占东北，但因东北当局因应得宜，秘不发丧，日人不知虚实才作罢。

我不是不愿与日本人合作，我父亲当时很愿意同日本人合作？但他那样子都被暗害了，那我还不是同样会被刺杀？什么人能同日本人合作？怎么合作呢？当卖国贼?!

国难家仇，集于一身。张学良对日本人“痛恨不已”，他

要对着干。日本人劝他东北独立，他说我是中国人，我要易帜统一；土肥原顾问劝他行王道，做满洲皇帝，他断然拒绝，并且不再见此人；他办教育、修铁路、建军港，事事都与日本在满洲的利益相冲突。

一九三〇年九月十八日，张学良为了调停“中原大战”，率东北军主力入关。他认为只有国家统一，才能一致抗日，殊料，为了统一，也开了日军轻取东北的后门。

日本人知道张学良无法“合作”，乃决心动手。一九三一年中，先后发生万宝山事件与中村大尉事件，日本军人寻机挑衅，但张学良仍掉以轻心，他错误地认为：“日本不会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对他日本也是不利的，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的。”所以，张学良主张“节制”，而中央这时因忙于两广分立及东南剿共，无心也无力与日本对抗，因此在中村事件后，便力主不抵抗、力避冲突，此即“不抵抗”政策之由来。“不抵抗”政策虽出自蒋中正，其实也是甚得张学良之心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张学良身体很差，这对他关于时局的判断也是有一定影响的。过去的经验又使他过于自信，在“自述”中，他曾说：“虽数遭大变，但凭一己独断孤行，或有成功，或能度过。”因此他骄傲了，他没想到“日本军人会疯狂到那样”。

最初，他以为退让妥协可以解决问题。而事变发生后，他承认自己对事件的判断是错误了。

后来国人骂我，我说你骂我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我是一点不认这个账的，我没有错。可是你要骂我是封疆大吏，没把日本的情形看明白，那我承认。

我这个人是胆大妄为的，假如我真的知道日本人要这么干，我当时会跟日本人拼命的。

当时如果拼了，日本人的狂妄企图也许难以得逞。日本关

东军当时在东北只有四五万人，而东北军留在东北的尚有十二万之众，综合战力东北军略占优势。然而，由于末下不是鱼死就是网破之破釜沉舟之决心，结果，在不抵抗政策的误导下，东北拱手让人。

一前一后两个“九一八”，张学良被林语堂讥为“拥护统一失老家”。

历史事件，环环相扣，节节纠缠，什么才是对，什么才是错呢？

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公报》载文指责张学良说：“其操卫则大逊于乃翁，居历史事实积重难返之地域，乃以国仇家恨，著之颜色，形之文字，于是，日本视张为不并立，而沈阳之变起矣。此由张氏壮年轻视天下事，不解乃翁为委曲应付之苦心，而率以逞快一时之心理，事事予强敌以难堪，为国为家招致巨祸。”

但是，日本人的野心又岂是委曲求全可以化解的吗？老帅已被指为日本人的走狗，却仍不免为日人炸死，如果张学良再软弱下去，就能保住东北？

张学良年轻气盛，又久经战阵，日人杀他父亲，他能忍下这口气？实际上，他已经如此“节制”，如此“委曲求全”了，“九一八”之前，他实际上已是“不抵抗将军”了，可日本人还不是照样动手！

再说，老帅若是不死，关起门来东北称王，就可免于日人鲸吞？或者郭松龄倒戈成功，东北整军经武，就能与日军一战？或者若大帅不事败身亡，少帅虽挥兵入关，后方由大帅坐镇，就可镇慑日人不致于发动“九一八”？

须知，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崛起后，田中奏折中说得很明确，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此“二期”均已实现，第三期是吞并满蒙、征服中国全土。日本并强调，满蒙是

日本的生命线，要在满洲成立一个“王道乐土”的新国家。旅大租约到期，中国要收回，日本对张学良说：“城是箭射来的，想要就拿箭射回去。”实际上，日本人的箭要射向全中国、全东亚、全世界。

正如张学良认为的那样，中国只有统一，才足以对抗日本，此为他不顾日本警告，毅然易帜的原因。如果他不如此刺激日本，日本就不会如此急着动兵吗？张学良的入关拥护统一，是被关内的政争内战给拖累了呢？还是他应作壁上观，以稳定东北的情势为要呢？

如果国民政府及政党之间不争权夺利，不“多为私，少为公”，如张学良所言真正能团结治国，日本人会不会知难而退，或即使贸然出兵，也会遭到迎头痛击呢？

一言以蔽之曰，中国当时政军结构落后，国家积弱不振、分崩离析，才使日人有机可乘，才使得日本军国主义者得以在中国横行霸道。

我是个爱国狂，如果国家要我的脑袋，很简单，当刻就给！

年轻时人家说我是个花花公子，我放弃花花公子，出来做事，就是决心对国家有所贡献。我起来，完全是仗着我父亲的环境和权势，当时我意识到，人家走两步，我走一步就到了，我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为国家做点事？这是我的决心。

从事内战使我心里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敌对的方面也不是真正的敌人，只是政见不合或是为了一些不相干的事。我们本来当面的敌人是日本，我从来就恨日本军阀，对日本军阀的狂妄与侵略，我是中国人，我受不了。

我这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到抗日战场上去同日本侵略者拼！

谈到西安事变，唐德刚教授文中有一句张将军多次提到且

很欣赏的一句话："张学良政治生涯中最后一记杀手锏的西安事变，简直扭转了中国历史，也改写了世界历史。只此一项，已足千古，其它各项就不必多提了。"

西安事变绝对是我一手策划的，杨虎城是个好人，却也是个粗人，对事情看不清楚，英雄主义太高，所以整个事件是由我负责的，杨虎城只是同意。至于你们问我，为什么会有西安事变，我只能这么说，我相信中国一定要统一，要枪口对外，不要再打内战了。这是我的一贯信仰，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都如此，谈不上什么后悔不后悔。

关于西安事变，真可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如同人们看待黄河长江。有人说，黄河在咆哮，有人则说，黄河在呜咽；有人说，长江波澜壮阔，有人则说，江水无奈地缓缓向东流去。

唐德刚教授认为："这件历史事实，今后恐怕要被史家争辩一千年而终无定论。"

迄今为止，综观海内外各种观点，最终可以归纳为两派。

一派认为，发动西安事变，张学良是"待罪之人"。蒋介石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派的观点是，西安事变阻止了蒋先生安内攘外政策的执行，给了中共以活口，使中共得到喘息的机会，留下了祸根。

王铁汉将军回忆说："一九四七我到东北去打共产党，出发前老总统与我吃点心，只有我及另外曹、萧二位秘书。""蒋老总统说，共产党闹到今天，都是张学良害的，他现在还不悔过，说共产党不对，中央剿共也不对。老总统谈到这里，气得点心也放下了，说：张学良多可恶，事变前他竟叫人给我照相。"

他们这派认为，由于中共得以存在，可以合法地扯国民政府的后腿，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这就给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

侵华的良机。因此，西安事变后仅半年，日本就急不可耐地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规模全面侵华。如果说，西安事变给中共留下了活口，那么日本发动芦沟桥事变，就是给中共投下了救生圈。后来，中共与日本遥相呼应，一唱一合，共同对付国民政府。难怪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后，对前来为侵华道歉的日本访客说，我们要感谢你们，不是你们来侵略，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富丽堂皇的人民大会堂接待你们。

持这一派观点的人还设想说，假如不发生西安事变，张将军不背离蒋先生安内攘外的大政方针，坚定不移、一鼓作气，彻底、干净地消灭中共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狼狈逃窜到陕北、仅剩下一万多人、疲倦不堪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没有扯后腿的势力，上下一致，团结在国民政府周围，日本侵略者未必敢于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未必发生芦沟桥事变。

如果没有中共势力扩大、夺取政权，而是在蒋先生领导下取得抗战胜利，张将军很可能会成为行宪后蒋总统之下的副总统，除了蒋先生之外，没有人能与张将军争高低。可是，如今，由于西安事变后果的影响，可以说张将军什么都没有得到，什么都没有了。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张将军不是要收复失地吗？如今，东北的任何东西，张将军都收不到。

持这一派观点的人还从道德与道义上指责张学良。他们说，张学良受蒋先生高度信任，出任剿共副总司令，竟秘密与中共领导谈判，协议停战，以大量金钱接济中共，并送上军需物质，纵容共党活动，掩护共军聚众会师，把剿共机密泄露给中共，方便中共人员撤逃，听任东北军坐视友军被共军袭击而不施援。他以“剿共”之名，行“援共”之实，这种在战地通敌的行径，于法不容，于德有亏，于义有损，这哪里是什么英

雄行径？

半个世纪以来，国民党方面将张学良当成反面教材，将大陆失败的责任都推到他头上，《苏俄在中国》一书中说他已忏悔。《风雨中的宁静》说他无知，而蒋纬国又说他在事变中单骑救主，从杨虎城、共产党手中把委员长“夺走”，说他在事变中仍然抽鸦片等等。到现在张将军已是九十多岁的耆老了，蒋纬国却还说他在“与国人共同谋求光复大陆的目标”，这个豆腐真是吃大了。

但是，海峡两岸的主流观点皆认为张学良是“千古功臣”，是“民族英雄”。周恩来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

毛泽东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江泽民在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周年大会上说：“西安事变是一件大事，在中华民族解放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今天我们纪念它，就是要弘扬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中国人民表现出来的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团结精神。”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推动了中国从长期内战到全面抗日的重要历史转折。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的，张、杨两将军的义举“有大功于抗战事业”，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王铁汉将军回忆说：“抗战后和谈三人小组，我代表汤恩伯在南通开会，开了四次会，每次开会，周恩来都提张先生，说张好，纯洁爱国，政治反应快，统御力超过蒋介石；说汉卿先生有强烈的爱国心，有天赋的统御才能，他为人有德、有仁、有容量，临政有大智、有大勇、有大方略。”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位记者在采访时向张学思将军提问：“您对张学良将军是如何评价的？”

“我个人认为，家兄张学良一生做了两件大事。”张学思很

有感触地说，“一件是一九二九年实行东北易帜，结束了军阀割据，促成了中华民族的统一；另一件是一九三六年发动西安事变，扭转了内战狂澜，促成了举国团结一致的抗战局面。他的一生，虽有诸多坎坷，但对于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解放，是立过大功的。家兄虽然遭到长期幽禁之灾，但他在政治上是胜利者。我对他的遭遇，当然有所悲伤，但对他成为肯定的人物，将永载于史册、流芳百世，也倍觉荣幸和振奋。前一时期，有人告诉我，说周恩来同志在重庆的军委会上，仗义执言，严厉指斥国民党政府不放他出来，我深受感动。如家兄知道此事，必为他得到这样一位知己的良师益友，而感到由衷的愉快和安慰！作为他的弟弟和原部下，我是多么盼望他早日荣归故里，和亲人团聚啊！”

张学思这段讲话，不仅说出了他们同胞之间的肺腑之言，同时也表达了东北人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在纪念西安事变二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再次高度评价张学良说：“无论张学良将军是死是活，我们中国共产党都评价他为千古功臣！”

“西安事变张是犯上但没有作乱，凭的是一股爱国的忠心义胆。张的这一生够了，他的事业在大陆，他会在中国留芳千古。”后期负责监管张学良的特务队长熊仲青如是评价说。

“汉公，为什么蒋先生不放你回去？”访谈时，唐德刚教授问道。

我不知道为什么蒋先生不放我，可是，张岳公曾告诉我，他说，你是个宝贝，谁把你抓住，对谁就有用。你明白这句话吗？那意思就是怕共产党抓住我，怕我跑到共产党那边去。

宋子文？我们一见面就是好朋友，我们两人最要好。宋子文与蒋不合，为什么呢，这话也难说，宋的脾气也很坏。端纳是我的顾问，他本是《泰晤士报》的记者，后来成为北京政府

的顾问。我退回奉天后，就把他带回奉天，我就让他办这办那的，我是私人出钱，他做我的私人顾问，也只好这么办，因为一旦聘为公家的顾问，由公家出钱，那日本人就会来找借口，也要求当顾问。

“汉公，据说端纳写了一个东西，里面谈到西安事变的内幕，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是写了个东西，里头有西安事变的事，他曾跟我说过。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叫什么来着，到嘴边我就是说不出他的名字，是中国人，在美国开了一个公司。端纳曾交代这人说，我死了之后，最好是在西安事变五十周年时发表。可后来，端纳临死时，又说这东西不能发表，发表了的话，会使中国的朋友难堪。后来，蒋先生也知道有这个东西，非要让我去把这东西找回来，我特地托人去找，但到底在哪儿，不知道，没找到！还有的说有人已把这东西买去了，落到外国人手中。买去当然就是想发表，赚钱嘛，可是至今仍没有任何消息。

张将军阅毕唐德刚教授写的《论三位一体的张学良将军》一文中有关西安事变的论述后，颇为欣赏，大有“知我者，唐德刚也”之感，唐文中这样写道：

“第一，事变之发动是激于张学良对国难家仇的义愤。他反对内战，主张枪口向外，是绝少、甚至完全没有考虑到私人利害的。在学良看来，北伐之后，他为谋求国家统一，不惜自弃历史，毅然‘易帜’，归顺中枢。如今外患急于燃眉，蒋公必欲置中共全军于死地，不灭不休，毋乃太过，学良口劝不动，乃贸然实行兵谏，希望蒋公不为已甚，张氏这种心理基础，盖亦为史家所不容否认者。

“第二，西安事变之发生，建议为杨，主动为张。迨至骑虎难下之时，学良‘问计无人’，致使精明而识大体的周恩来

变成‘谋主’。这点也是不争之论。

“不过话又说回来，西安事变之受益者，也不全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国民党乃至蒋公本人也未尝不无实惠。……所以西安事变对蒋公对国民党，也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总之，抗战八年，实是我国家民族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如果没有西安事变，没有全国的大统一，没有惨烈的武装抗战，则人事全非。一个独裁专政的领袖、和一个忍辱含羞的政党，在历史舞台上以何种脸谱出现，我们写历史的人就很难妄测了。

“蒋公和国民党，当时有此声望，有此契机，好好搞下去，正是天降大任，民赐良缘，来复兴民族，重建国家。谁又想到八年苦战之后竟落了个派系倾轧，五子登科，关门自杀的局面？这又是谁之过欤?! 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西安事变提早全民抗战是真；使反对派的中共因此壮大也不假；但是说它毁灭了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那就过甚其辞了。”

唐教授认为：“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爱国的人很多，许多人还牺牲了生命，但张汉卿成了爱国的代表，名垂千古。”

这位中国“哈姆雷特”遭受近半个世纪的幽禁，长期被剥夺了在政治舞台上自由表演的权力，活生生地由一位叱咤风云、血气方刚的“少帅”张学良，脱变成随遇而安、脱凡超世的基督徒“曾显华”，这是否一桩人间悲剧呢？

对此，“千古功臣”派理所当然地认为，此案是千古奇冤；“待罪之人”派则顺理成章地认为，这是罪有应得。看问题的立场各异，其结论自然也迥然不同了。

但也有不少“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者认为，此乃不幸中之大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

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六日，火奴鲁鲁当地时间上午十时，

率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在美国访问演出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带领艺术团的部分残疾人演员专程到张学良先生的寓所，拜访这位历尽沧桑的百岁老人。

在寓所客厅的玻璃窗前，坐在轮椅上的张学良先生显得安详、沉静。从中国大陆来的客人，使这个小客厅顿时热闹起来。

张学良用和蔼的目光看着大家。当他看到同是坐在轮椅上的邓朴方，脸上露出了笑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这两双手，分属不同的时代，但它们穿越了时空的界限，彼此感受到了久别重逢般的那份欣喜，因为他们都植根于同一片土地。

邓朴方和老人聊起了家常。他关切地问起老人的身体和日常起居情况，听说老人平时还打打纸牌，精神不错，邓朴方十分高兴。邓朴方祝福老人健康长寿，越活越年轻。老先生高兴地笑了起来，邓朴方则大声地对老人说："您是中国人民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大家都很敬仰和挂念您。"

在小客厅里，肢残演员孙晓梅为老人演唱了歌曲《我爱你，中国》，老人高兴地鼓起掌来。盲人演员单寅生用民族乐器葫芦丝吹奏了一首《瑶族舞曲》，老人认真地看了看葫芦丝的构造，并随着音乐的节奏轻轻点头。

一曲奏罢，有人问他还想听什么曲子，他说："什么都可以。"单寅生坐在老人身边，又演奏了一曲排箫《太行山上》。因为怕影响老人休息，艺术团原本只安排了两个节目，但老人家却希望再看一个。

于是，一同前来拜访的聋哑演员邰丽华又即兴为老人表演了舞蹈《雀之灵》的片断，老人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二〇〇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在夏威夷颐养天年的张学良就要过一个没有夫人赵一荻在身旁陪伴的一百零一岁生日了。此

时此刻，少帅的身体依然健朗，只是常常思念逝世已近一年的老伴。

与老人家接近的人士透露说："他有时会突然冒出一句话：'太太已经走了。'但他讲这话时神色平静，接着又说，'上帝都有安排。'"

对张学良而言，赵一荻是别人无法取代的。一年来，想起夫人，少帅常常简洁地说："她最关心我，我们两人最要好！"

赵一获去世后，张学良再也没有去第一华人教会参加主日崇拜。那个教堂是他与夫人定居夏威夷数年来做礼拜的惟一场所，当地华人以为他从此停止了这一例行的活动，但以张学良过去多年来的虔诚而言，人们似乎又难以置信。

果然，他老人家依旧继续参加主日崇拜。不去第一华人教会，是因为每次去总有若干崇拜将军的民众要求合照，有时甚至出现推挤现象，加上夫人已不在身边了，他就干脆换了个地方。

这一年来，张学良的生活相当简单，早晚都会坐着轮椅外出散散心，他的亲属也常常来探视他，同他聊聊天，逗他说几句话。值此一百零一岁寿辰之际，张学良的儿子张闾琳在五月三十日为老人家办了个家庭式的庆生会。

与此同时，六月一日，在大洋彼岸，在张学良的故乡沈阳，为庆贺张将军一百零一岁寿诞，大帅府旧居特别举办了贺寿兰花展。在琳琅满目、姹紫嫣红的展品中，十三盆张学良亲手培育的生机盎然的兰花格外引人注目。

一九九四年张学良离开台湾之际，将他心爱的兰花交给了兰友，一九九八年，在世界兰蕙交流协会会长黄秀球的热心联络下，送达张学良旧居陈列馆。

陈列馆馆长张力说："张学良在五十年的幽居岁月中，情系兰花，尤为钟爱大陆所产的兰花。在他的花园里，浙江产的

绿云、四川产的大红朱砂、广东产的报岁白墨、福建产的龙岩素等，都被摆放在显著位置。”

由于张将军的声望及对兰花的精深研究，他曾被兰花界推举为世界兰蕙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在展馆内，张学良的大幅照片挂在他曾居住过的大青楼上，照片下方的长案上摆满各界送给张学良的百岁寿礼，其中有张学良最喜爱的“爱国兰”。

傲然绽放的“爱国兰”，象征着张将军息内争、御外侮，爱国爱民，心向统一的人生乐章的主旋律，展现了他那颗火热的赤子之心！

二〇〇一年九月二十八日，张学良将军因肺炎住进史特劳伯医院，进加护病房后仅几天，就感到呼吸困难，病情持续恶化，经家属同意，院方不得不在肺部插上呼吸器协助呼吸，但仍未见好转。由于插管痛苦，加之张将军亦曾交代不要如此做，院方应家属要求，于十月十一日上午拔除了他的维生系统。殊料，此后一段时间，他竟能自己呼吸，意识亦相当清醒。

至十二日，老将军血压降低，呼吸缓慢到一分钟只有六次。为免病人痛苦，家属同意关掉他的心律调节器，只用吗啡点滴为老将军止痛。然而，老将军却展现了强韧的生命力，在只有胃管的灌食下，心脏一度恢复了有力的跳动，让医生惊讶不已。

在与死神进行了数日搏斗之后，老将军的呼吸渐渐沉重。夏威夷时间十四日晚八时五十分，在檀香山史特劳伯医院，在儿子、女儿和三个孙子的哀伤低泣中，这位传奇的世纪老人，这位风云际会一世纪、辗转坎坷一百年，功勋彪炳的伟大的爱国将领，走完了他叱咤风云、悲壮绚丽的人生之路，平静谢世。

张学良将军去了，普天同悲。

尾　　声

张学良将军病逝檀香山的消息传出后，世人深感哀痛，两岸同声悼念。

北京方面，江泽民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学良先生亲属：

惊悉张学良先生逝世，十分悲痛。我谨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

张学良先生是伟大的爱国者。六十五年前，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张学良将军和杨虎城将军以爱国的赤诚之心，秉持抗日救亡的民族大义，毅然发动西安事变，联共抗日，为结束十年内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族抗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堪称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后，张学良先生虽长期遭受不公正待遇，却始终淡泊荣利，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大业，企盼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张学良先生的卓越功勋和爱国风范，彪炳青史，为世人景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永远怀念张学良

先生。

张学良先生千古！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江泽民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五日

台北方面，陈水扁发出唁电，全文如下：

张汉卿先生家属礼鉴：

惊悉汉卿先生捐馆，曷胜震悼，谨电致唁，敬祈节哀。

陈水扁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五日

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在获悉张学良将军辞世的噩耗后相当震惊，他指示海外党部全力协助治丧，并表示说："张学良将军的一生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一页，如今，张将军走入历史，留给后人无限的追思。"

"国民党对于张学良将军的去世感到很遗憾，"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发言人周守训说，"姑勿论其历史功过，张学良是中华民国的资产。张学良这位历史人物如今走入历史，国民党希望过去的恩怨也能随之走入历史，至于其历史功过，则留待世人去评价吧。"

台"外交部长"田弘茂于十月二十二日抵达夏威夷，代表陈水扁"总统"颁发褒扬令给少帅张学良的遗属，表彰张学良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忠心，同时肯定他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褒扬令全文如下：

东北耆宿张学良，早预戎行，勇略聿昭，英隽秀发，蜚声于时。民国十七年，临危受命，主政东北。怀民族大义，秉爱国志节，勇拒日人威逼利诱，毅然宣布易帜，拥护中央，促成统一奠定。训政时期，建设根基，旋于中原大战期间，通电支持国民政府，调停各方，止息战祸，厥功至伟。终其生平，爱国情殷，慷慨贞固，淡泊恬静，寿登期颐。惊闻殂谢，悼惜良深，应予明令褒扬，以示政府笃念耆贤之至意。

总统陈水扁　行政院长张俊雄

中华民国九十年十月十九日

与此同时，北京隆重举行了张学良先生悼念会，追念这位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悼念会以"民族英雄"的名义高规格举行。

在张学良将军的故乡，十七日，辽宁省各界在张学良旧居陈列馆（即大帅府）隆重举行追悼大会，十七个单位的代表上千人与会，中共辽宁省委书记闻世震、省政协主席等参加了追悼大会。

在张学良一手创建的东北大学礼堂，师生们精心设置了张将军的灵堂，供各界人士前来祭拜凭吊。

十八日上午，在张学良的老家辽宁省大洼县东风镇马家村的"张氏墓园"中，举行了"大洼县乡亲沉痛哀悼张学良将军追悼会"。会上，张学良先生的亲堂侄孙张志军代表老家的各位张学良亲属族人表示，切盼张学良能忠骨还乡。

现在的"张氏墓园"里，安葬着张学良的高祖张永贵、曾祖张发、祖父张有财和二伯父张作孚等直系族人。张学良在生前得知家乡社会各界修缮张氏祖墓时，欣然题写了"张氏墓园"，托人带回家乡。现在，这四个字已经勒石为碑，矗立在

墓园前面。

十月二十日，张学良将军的亲属在北美洲《世界日报》上刊登了“讣闻”，全文如下：

女 闾瑛　　男 闾琳　侍奉无状祸延显考

张公汉卿将军讳学良府君恸于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下午八时五十分奉主宠召，寿终正寝于夏威夷史特劳伯（STRAUB）医院，距一九〇一年六月一日生得年百有一岁，积闰享寿百有五龄，闾瑛等随侍在侧，遵礼成服。谨择于十月廿三日上午十时移灵波扶域殡仪馆（Borthwick Mortuary，Honolulu）大殓，并举行追思礼拜与公祭，旋即发引殡葬于神殿谷纪念陵园墓地（Valley of the Temples，Memorial Park Cemetery）安息。

叨世乡戚　在学族寅　　　闻

谊哀此讣

未亡人 于凤至 赵一荻

哀孤女 闾　瑛　婿 陶鹏飞

哀孤子 闾　琦　闾　玗　闾　琳　媳 陈素贞

（以下亲属众姓名从略——作者）

夏威夷时间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张学良将军的亲属、生前友好及中外各界人士聚集在檀香山市博思威克殡仪馆附设的礼拜堂内，为张将军举行隆重的葬礼。

礼拜堂外摆满了各界人士敬赠的花圈。治丧委员会把两岸领导人的花圈分别安置在棺木两旁：来自北京的花圈由左方排起，依次是江泽民、李瑞环等人；来自台湾的花圈则由棺木右方排起，依次为蒋夫人宋美龄、蒋方良女士、陈水扁、吕秀莲等人。宋美龄赠送的花圈是一个由白花编织而成的十字架，象

征着基督徒获得永生之意。

葬礼由周联华牧师主持。上午九点开始家祭，张将军的亲属先举行了亲人告别式，十点开放各界宾客进入礼拜堂瞻仰少帅遗容。由于行礼的人士众多，一直到十点五十分才封棺，然后进行葬礼仪式。

周联华随即证道，他从宗教观点来评述张学良的一生。他最后说："西安事变之后，张先生受到软禁，使得他的志业画上句点，从个人的发展来看是不幸的；但他为国家为历史尽了一己之力后，从此远离所有的政治纷扰而安享天年，这又可以说是他的幸了。"

代表宋美龄前来致悼的台湾妇联总会秘书长辜严倬云女士说："我与张学良夫妇是在六十年代相识的，当时张学良每周日到台北的凯歌堂作礼拜。如果不谈张学良年轻时的历史，我会认为他是一位学者。"

东北大学郝翼成校长表示说："我校师生为了感怀这位老校长，计划兴建一所'汉卿会馆'，并计划于二〇〇三年邀请所有张学良家属回去参加东北大学建校八十周年大庆。"

前来祭拜的中外人士超过五百人，夏威夷州州长夫人张美琪也代表州长前往致悼。因中国驻美大使杨洁篪回上海参加亚太经合会，遂改由驻美大使馆代办何亚非参加张学良将军的葬礼及悼念活动。

葬礼之后，张学良遗体旋即移往檀岛北方神殿谷纪念公园中的"中国海景"墓地，与其妻赵一荻女士合葬在一起。

张学良安葬美国夏威夷后，沈阳台商发起建立张学良衣冠冢与纪念堂的倡议。

原来，一九九六年，张学良曾亲自为辽宁台资企业题写了"天山福园"四字，同时捐出一百万元台币，支持弘扬孝道的殡葬事业。该园投资者即宣布捐出一万个灵骨塔位，给予流落

在海外的张学良东北军旧部，协助这些将士落叶归根。

十月二十五日，又一批流落海外的三十八位张学良旧部骨灰在“天山福园”举行了入塔仪式及祭祖仪式。

沈阳台商协会会长张杨表示说：“希望能取得张学良衣冠等遗物，在沈阳兴建张学良衣冠冢和纪念堂。”

少帅临晚景，归乡梦牵萦。

张学良是一九三七年开始他的管束生涯的，一九四六年又押解台湾。那时，台湾省籍的林渊泉才十九岁，临时被找去伺候张学良，殊料，这么一跟就是半个世纪。

“张先生事实上是想回东北家乡看看的。”现年七十四岁的林渊泉说，“他在台湾对我说了一次，以后到夏威夷来又跟我讲了两次。”

最近一次张学良对林渊泉谈到回东北仅是两三年前的事。那时，张学良及赵一荻的身体都已不太好。有一天，林渊泉推着张学良的轮椅走到一个路口时，老人家突然开口说：“我要过那边去！”

“可以啊，不过这边不好走，从那个路口过去比较好。”林渊泉以为老人家意欲过马路，马上回应说。

“不是，我说我要到东北！”少帅讲这话时声音很大，林老管家终于知道了老将军的心愿。

张学良现在惟一在世的女儿张闾瑛，今年已经八十四岁了。日前，她就父亲因西安事变遭长期软禁后，对蒋介石的真实态度如何答记者问。她说：“父亲向来对蒋介石毫无怨言，不单在公私场合总是称呼蒋介石为‘蒋先生’，偶尔跟我谈到西安事变时，他也会说：‘大丈夫做事要敢做敢当。’”

张闾瑛还回忆说，父亲向来对名利看得很淡，老人家经常对她的训示是：“做一个好中国人，要多为国家想，少为自己想！”

张学良将军与世长辞了。终其一生，他抗击外侮，嫉恶如仇，爱国爱民，心向统一，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伟大的爱国者。

他坚称自己是“爱国狂”。他说：“如果国家要我的脑袋，我立刻就给。”

拳拳赤子之心，令人感奋不已。

他，历经百年沧桑，在战场上，在政坛上，叱咤风云，轰轰烈烈。

与此同时，在情场上，他也非同凡响，红颜知己，舍命相随。一对患难夫妇，又谱写了当代伟大爱情的新篇章。

听说，在六朝金粉旧地，莺飞草长的江南，紫金山前，白鹭洲上，柳阴之旁，桃花深处，人们已为张将军夫妇建了一座生祠庙，是痴男情女、佳人才子，才许把香烧……

他，比起他的父亲“老东北王”、人称“张大帅”的传奇将军张作霖，不仅毫不逊色，且正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正是，父亦传奇，子亦传奇，子比父更传奇！

磊磊英雄真铁汉，
撒手人寰山河叹。

惟大英雄重本色，
是真名士自风流！

后　记

我最早获悉唐德刚教授访谈张学良将军并录制了十一盘与张将军交谈的录音带、准备为张将军作传的消息，是一九九〇年春在青岛时，从大陆发行的《参考消息》报上得知的。

初闻此讯，惊喜万分。这一则是因为唐德刚教授是海内外著名的史学大手笔，著作甚丰，如今又要新添佳作，想必非同凡响；再者，在一九八一年，唐德刚教授在任纽约市立大学亚洲学系主任之际，曾作为“交换教授”来中国十二所大学教授“美国史”，其第一站即为山东大学，我有幸聆听过他的史学专题讲座。而今老师将又有大作问世，学生自然喜出望外，翘首以待。

殊料，写传之事竟然雷声大雨点小。一盼再盼，写了几封信，往新泽西州打了几个越洋电话前去探询，都被含糊其辞而带过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在山东枣庄召开的“纪念台儿庄战役五十五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我有幸又与唐德刚教授及唐师母吴昭文女士相聚，首次了解到唐德刚教授《张学良大传》写作流产内幕之一二。

四十天后，我又得以与唐德刚教授在海滨青岛重逢，共同参加“胡适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期间，我又进一步询问了许多有关他与张将军之间的秘闻轶事。

原来，鉴于当时张将军的处境及台湾方面政治上的种种原因，加之时任国民党秘书长的宋楚瑜出面干涉，节外生枝，致使作传计划的进展不似两位老人原先预计的那样如意。后来，事情发生逆转，竟中途夭折了。

那时，唐德刚教授对我说：“这事说起来简单，然内情也是很复杂的。这事发生在台湾，而我们海外寄客，做事也犯不着太过分，写传之事，就这样从此不了了之。”

当时，张将军与唐德刚教授相谈十余次，总计有十一盘录音带。据我所知，这都是非正式的采访，仅仅是为正式采访和作传所做的一些准备工作。

经唐德刚教授举荐，一九九四年九月，我得以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所做访问学者。抵纽约后，我对张学良传记的写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而，最关心的便是这十一盘珍贵的录音带。当我思虑良久、鼓起勇气提出借阅时，唐德刚教授连声说好，十分爽快，大出我意料之外。不久，唐德刚教授又利用他在唐人街参加宴会之机，亲自驾车偕同师母一起来到我的住所，送来一些家具和生活用品，以及这套珍贵的张学良口述历史录音带。

随后，我根据录音整理成文字，大约有六万字左右。之后，我又复录了一套自存，将原版奉还唐德刚教授。

如何全面、生动、系统、详实地述评、撰写张将军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使之既有一定的学术性，同时又具相当的知识性和可读性呢？如何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以新的构架和生动的文笔来描述张将军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的长幅历史画卷，将其尽如所愿地奉献到读者面前呢？这一直是我本人反复思考的

问题，完成这样的一部著作，也是我个人赴美多年的夙愿。

一九九六年底，《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一书完成了写作构思。

依据写作主旨，本书力求囊括张将军一世纪风云际会的传奇经历，注重以丰富真实的史料，来全方位地展现张将军叱咤风云、慷慨悲壮的一生。

为此，我曾将此书的写作构想和一百章详细写作目录制成大号字，在唐德刚教授引荐下，托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王冀教授代转寓居夏威夷的张将军过目。

在立论观点方面，诚然，对张将军的历史评价，由于立场不同，观点各异，贬褒不一，这也不足为奇。而笔者则坚持站在历史的公正立场上，以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和翔实的史料，来论证张将军不愧为名垂千古的爱国将领。

在写作手法上，本书采用传统的记事本末体，且又力求不落俗套，开章一律选用有案可查的张将军的原话，力求使文章生动新颖，单刀直入，开门见山，未画“龙”即先点“睛”，以使读者直接进入镜头。同时，在众多的历史事件的述评中，以纵线为主的同时，兼顾横剖面的发展，使之有详有略，有近镜头，又有远镜头；有粗线条，又有细线条。

在史料的筛选方面，本书力求最广、最新、最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笔者在书中首次披露了唐德刚教授采访张将军的十一盘录音带的内容，用张将军的现身说法，陈述并解开了若干历史之谜。

写作中，吾师唐德刚教授提供了其本人访谈张将军的口述史料，又在百忙之中为拙著撰写序文。付梓之际，在此深表感谢。

同时，笔者对下列先生的著作也多有参考和引用，在此一并致以真挚的谢意。他们是：王爱飞著《张学良的幽禁岁月》；

郭维城、刘鸣九、何柱国、于学忠等人的回忆文章集《民族功臣张学良》；刘多荃、李烈钧、张严佛等人的回忆文章集《西安事变亲历记》；周大文、汤国桢、高纪毅等人的回忆文章集《张学良和东北军》；范克明著《少帅张学良》；武育文、王维远、杨玉芝著《张学良将军传略》；张永滨著《百年少帅张学良》；李敖编著《张学良研究》；傅虹霖著《张学良的政治生涯》；传记文学丛刊《张学良进关秘录》；张德良、周毅主编《东北军史》；王铁汉著《东北军事史略》；（日）松本一男著《张学良与中国》；司马桑敦著《张学良评传》；张魁堂著《张学良传》等。本书所采用的图片，部分选自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礼广贵主编的《张学良将军》和华文出版社出版、张友坤编著的《张学良世纪风彩》，在此，谨对以上两出版社及图片作者表示真挚的谢意。

有关张将军的史料浩如烟海，卷帙浩繁，且学者众多，观点不一，无疑给研究与写作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今笔者以忠于历史、注重史料、去芜存菁、辨伪鉴真为治学原则，反复勘证，撰成此书，目的在于生动、客观、系统、全面地介绍并评价张学良的历史功绩，以总结过去，借鉴当今，启迪未来。

如果本书能作为一个心血织成的花环，奉献到恰恰在今日辞世的百岁老人张学良将军的灵前，如果它的出版能使海内外历史爱好者及广大读者对张学良将军绚丽多彩的一生有一个总体上的了解，如果它的出版能成为张学良研究的一块引玉之砖的话，我将深感宽慰，不胜荣幸之至！

今不揣浅陋，将这一作品呈献给广大读者，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赐教指正。

王书君

谨识于北美洲

纽约艾姆赫斯特寓庐

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八日